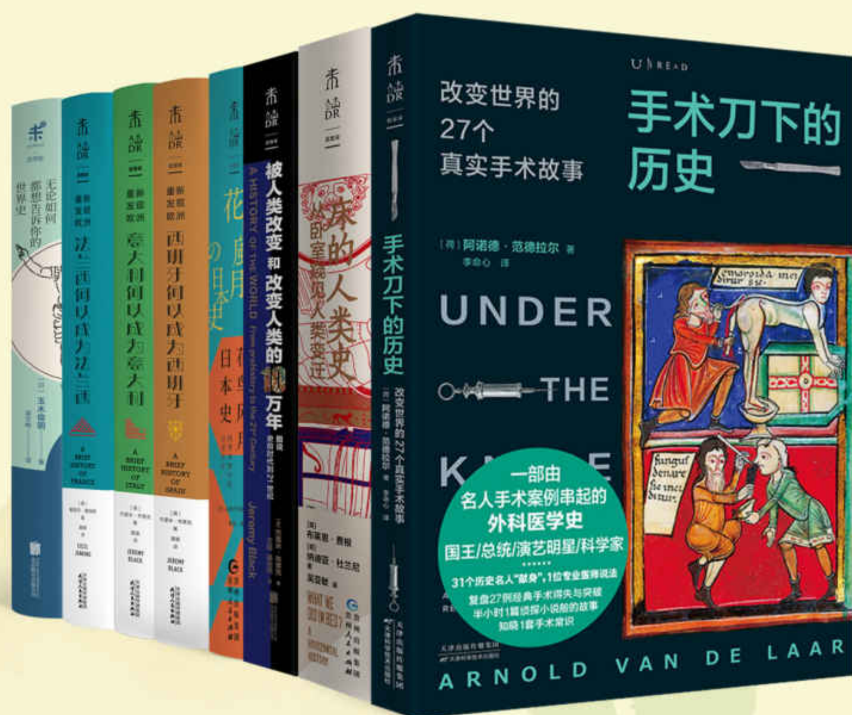
人类生活史

（套装共8册）



生老病死、风花雪月如何改变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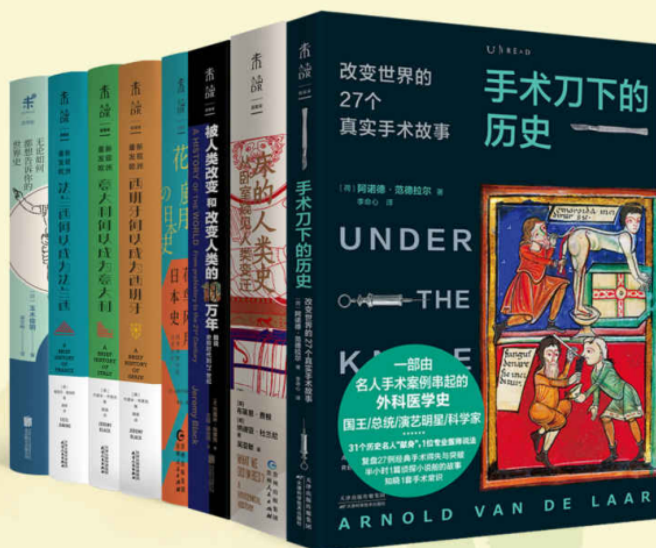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未读 A DR

人类生活史

（套装共8册）



生老病死、风花雪月
如何改变历史？

总目录

手术刀下的历史

床的人类史：从卧室窥见人类变迁

被人类改变和改变人类的10万年：图说史前时代到21世纪

花鸟风月日本史

重新发现欧洲：法兰西何以成为法兰西

重新发现欧洲：西班牙何以成为西班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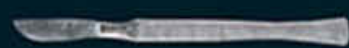
重新发现欧洲：意大利何以成为意大利

无论如何都想告诉你的世界史

UNREAD

改变世界的
27个
真实手术故事

手术刀下的历史



［荷］阿诺德·范德拉尔 著
李命心 译

UNDER THE KNIFE



一部由
名人手术案例串起的
外科医学史
国王/总统/演艺明星/科学家
……
31个历史名人“献身”，1位专业医师说法
复盘27例经典手术得失与突破
半小时1篇侦探小说般的故事
知晓1套手术常识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ARNOLD VAN DE LAAR

UNREAD

手术刀下的历史



改变世界的 27个真实手术故事

［荷］阿诺德·范德拉尔 著　李命心 译



ARNOLD VAN DE LAAR

UNDER THE KNIFE

A HISTORY OF SURGERY IN 27 REMARKABLE OPERATIONS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版权信息

手术刀下的历史

Onder Het Mes

作者：［荷］阿诺德·范德拉尔（Arnold van de Laar）

译者：李命心

出品方：未读·探索家

出版社：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Copyright © 2014 by Arnold van de Laar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Uitgeverij De Bezige Bij B.V.,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20 by United Sky (Beijing) New Media Co., Ltd.

目录

引言　治愈之手：外科医生
1　取石术　阿姆斯特丹铁匠简·德·多特体内的石头
2　窒息　世纪性的气管切开术：肯尼迪总统
3　伤口愈合　皇家包皮：亚伯拉罕和国王路易十六
4　休克　女士和无政府主义者：茜茜皇后
5　肥胖　教皇：从彼得到方济各
6　造口　奇迹子弹：卡罗尔·沃伊蒂瓦
7　骨折　德摩斯医生和希腊式方法：大流士国王
8　静脉曲张　露西和现代手术：阿法南方古猿
9　腹膜炎　逃脱艺术家之死：哈里·胡迪尼
10　麻醉　女王的麻醉：维多利亚女王
11　坏疽　小湾战役：彼得·史蒂文森
12　诊断　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赫尔克里·波洛和夏洛克·福尔摩斯
13　并发症　大师与伊朗国王：穆罕默德·雷扎·帕拉维
14　播散　两位音乐家与他们的大脚趾：卢利和鲍勃·马利
15　腹部　罗马人与腹壁成形术：卢修斯·阿帕罗尼鲁斯·西亚努斯
16　动脉瘤　外科相对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17　腹腔镜　内窥镜和微创革命
18　阉割　一种简单手术的历史：亚当、夏娃和法里内利
19　肺癌　在家中进行的开胸手术：国王乔治六世
20　安慰剂　第五个登上月球的人：艾伦·谢泼德
21　脐疝　一位丰满女士的悲惨死亡：卡罗琳王后
22　早回家，快康复　叛逆与革命：巴西尼和李奇登斯坦
23　死在手术台上　手术的局限性：李·哈维·奥斯瓦尔德
24　假体　“美好时代”的奇妙发明：面包师朱尔斯·佩杜
25　胃切除术　“牛仔”与外科医生：特蕾莎·海勒夫人

26　肛瘘　大手术：国王路易十四
27　电　600伏特：阿提斯动物园的电鳗
后记　十大未来的外科医生
术语表
返回总目录

引言

治愈之手：外科医生

1537年的一个晚上，在为都灵战斗了一整天之后，年轻的法国军队外科医生安布鲁瓦兹·帕雷终于彻底清醒过来。他非常苦恼——战场里挤满了被火绳枪和毛瑟枪打伤的士兵，自己却没有处理这种伤口的经验。他在一本书中读到，将滚烫的油浇在伤口上，可以中和有毒性的火药。于是，他将这沸腾的液体滴在士兵们的血肉之躯上，油便像在平底锅中煎肉时一样溅起。可受伤的人实在太多了，仗打到一半，他的大油锅就空了。没有了油，他不得不用玫瑰油、蛋黄和松节油混合而成的软膏来减轻受伤士兵的痛苦。整整一夜，他都听着伤员尖叫着和死神斗争，觉得这是自己的错。第二天早上，他惊讶地发现，尖叫的正是他用沸腾的油治疗过的士兵，其他的伤员则没有。从此以后，他再也不用沸油治疗伤口，并在后来成为一名伟大的外科医生。这是迈向现代外科学的第一步。

自人类行走于地球之始，外科学便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因为人类会遇到必须“手工”治愈的疾病。用手治病的治疗师被称作“chirurgeon”，源自希腊语“kheirourgia”，意思是手（kheir）和工作（ergon）。我们的现代词汇“surgeon”（外科医生）和它是同源的。战斗、狩猎、迁徙、挖根、从树上坠落、逃离掠食者——艰苦的生活使我们的祖先面临无尽的受伤风险。因此，处理伤口不仅是最基本的外科操作，而且很可能是第一个外科操作。从常识来看，我们应该用水冲洗被污染的伤口，对流血的伤口施加压力，并将开放性伤口覆盖；如果伤口愈合了，我们下次就采取同样的措施。但在中世纪，常识却被传统所掩盖。我们中世纪的前辈并不会去观察他们行为的结果，而是遵循某位伟大的先知在古书中所写的内容，所以伤口不会被

清洗干净，而是会被用烙铁或沸油煎焦，再用一块脏布包裹起来。在那个愚昧时代过去之后，常识渐渐占据上风，一种基于实验的崭新的外科学诞生了。

但回头来看，我们的祖先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到通过切开的办法来处理溃烂、脓疱、痈或脓肿之类感染的呢？脓的引流是第二个基本的外科操作，你只需要一个尖锐的物体，比如金合欢刺、燧石箭头、青铜匕首或钢手术刀。刀就这样走进了外科学，今天的外科医生仍然谨记一句古老的拉丁格言："Ubi pus，ibi evacua．"（即"有脓液，清理它"）

第三个基本的外科操作是处理骨折。逃离狼群、狩猎猛犸象、被岩石和树根绊倒——史前生活绝对会提供足够多的机会让你的骨头断掉。在伤者面对巨大的痛苦时，那个年代是否能有人拥有足够的理智将骨折复位？无论如何，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事。他必须有胆量才能去做，更重要的是，伤者必须愿意让他这样做。只有拥有足够的勇气、权威和经验，并表现出足够同情心的人，才能赢得这种信任；而且，他的双手还要灵活。这个人就是外科医生，能用双手治愈疾病的人。

为患者提供紧急治疗仍然是外科医生工作的一部分。处理外伤和严重的失血、保证患者的呼吸、维持患者生命体征平稳，依然是医院急诊外科医生的首要任务。这是明确又实在的原则。处理伤口、脓肿和骨折，诊治急性病症，患者便会对医生产生感激之情。

但是更进一步，进行一场手术却是另一件完全不同的事。你不是治愈一个伤口，而是创造一个伤口。一位明智的外科医生（以及明智的患者）会权衡风险。手术通常会成功还是失败？还有其他替代方案吗？如果我什么都不做，患者会怎样？如果手术失败，患者会怎样？我们始终在寻求全力救治和避免伤害之间的平衡。罗马执政官马吕斯曾让一位外科医生剥除了他曲张的静脉。他术后活了下来，还继续统

治了罗马许多年。外科医生约翰·兰比为英格兰的卡罗琳王后进行了脐疝手术，导致了她的惨死。然而，他的那位罗马同行受到了严厉的谴责，并且被禁止在马吕斯的另一条腿上进行手术，而兰比却因他为皇家提供的服务被封爵。外科医生真是一种难以预测的职业。

外伤、骨折、化脓感染和手术会留下疤痕，而感冒、腹泻、偏头痛之类的疾病通常不会留下任何痕迹。这种差异可以用两个不同的词语来表示“好转”：我们用“疗伤”——“使机体完整”——来描述手术、伤口、瘀伤和骨折，用“治病”——“使健康恢复”——来描述疾病。笼统地说，外科医生疗伤，而内科医生治病。外科医生长期以来也顺便兼做内科工作，但他们把自己限制在外科手段可解决的问题上，这些问题只占所有疾病的一小部分。大多数病症根本不需要外科医生或手术的干预。16世纪的外科医生所提供的服务是如此简单和有限，以至于他们可以像普通商人一样在一家小店铺里完成工作。在阿姆斯特丹，外科医生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职业群体，他们与其他三个行业——滑板制造者、木偶制造者和理发师，同属一个行会。

18世纪以前，处理外伤、感染和骨折占了外科医生有限的执业范围的一大部分。除此之外，还要加上切割或烧灼可疑的肿瘤和增生组织，当然还有当时最流行的手术——放血，可这与其说是治疗，不如说是迷信。总而言之，这是一个相当简单又无聊的行当。如果在那个年代当外科医生，我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享受我的工作。

随着经验、知识的增加和方法的改进，越来越多的病症可以通过手术治疗了。直立行走是许多我们人类特有疾病的重要病因。我们的祖先400万年前迈出的第一步，带来了一系列需要大量手术干预的健康问题。静脉曲张、腹股沟疝、痔疮、腿部血液供应不足（间歇性跛行）、髋关节和膝关节磨损（关节炎）、脊椎病（椎间盘突出）、胃灼热和膝关节半月板撕裂，都是因为我们用两条腿走路。

有两种疾病是当代外科医生工作的重要内容，直到最近才对人类

生命造成严重威胁。癌症和动脉血管变硬（动脉硬化）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以高热量饮食和吸烟为代表的生活方式造成了这些疾病的高发。发病者通常是老年人，在过去，你或许在得癌症或动脉阻塞之前就已经去世了。

从19世纪开始，人们的寿命突然变长。这得益于西方世界的一项显著进步：人们开始更加注意卫生。这比任何伟大的发现或著名的外科医生对现代外科学的贡献都要大，并使外科学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难想象人们为什么花了那么长时间才将卫生和手术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有机会回到18世纪的手术室里，必然会感到非常震惊。尖叫一定十分骇人；向四面八方飞溅的血液，以及截肢肢体被灼烧的恶臭都会令人作呕。那是恐怖电影中才会有的场景。

拖鞋，帽子和手术口罩

现代外科医生常换衣服。做手术时，他们穿上“洗手服”——干净的浅蓝色或绿色上衣和裤子、白色拖鞋以及帽子。在手术室里，他们还会戴上外科口罩；手术开始时，再把无菌的、被称为“手术衣”的手术外套穿在洗手服和无菌橡胶手套外。19世纪末，有人发现病菌可以通过微小的唾液飞沫在空气中传播。布雷斯劳的外科医生约翰·冯·米库利茨认为，在手术过程中不仅要尽量少说话，还要戴上口罩。也许当时的男外科医生戴布口罩主要是为了遮盖胡须，就像用手术帽盖住他们的头发一样。无论如何，根据米库利茨的说法，他们很快习惯了这种做法，正如他1897年在书中所写的那样，戴着口罩呼吸和女士在街上戴着面纱一样容易。艾滋病的流行也使得许多外科医生在手术中佩戴防溅眼镜。这在戴口罩时会很麻烦，因为如果口罩没有紧贴脸颊和鼻子，眼镜就会起雾。被称为手术目镜的放大镜常与前额照明灯相搭配，用于精准手术。最笨重的手术服是在使用X射线的手术中用到的，手术服下面会穿一件很重的铅衣。

现代手术室一般都很安静，可以闻到消毒剂的味道，有吸引器来

吸除血液或其他液体。唯一的背景噪声来自监护仪上沉睡患者的心跳，收音机有可能开着，但手术团队也可以自由交谈。然而，现代手术和以前的手术之间真正的差别更为细致，并且对于外行人来说不再是那么简单明了。这一差别就是无菌，是通过实施严格的规则来实现的，这一规则构成了整个现代医学的基础。

在外科领域里，无菌意味着“完全没有细菌”。我们的洗手服、手套、手术器械和其他设备都经过消毒。它们被放在高压灭菌器（一种高压锅）内几个小时，用蒸汽处理或者用γ射线照射以杀死所有细菌和其他微生物。在手术过程中，我们采取近乎于苛刻的措施，在伤口周围形成一个无菌区域，在该区域内的任何人和任何物品都不能触及区域外的人和物品。如果你是手术团队的一员，那么你就是无菌的，这意味着你的衣服和手套上不该有任何细菌。为了保持这种无菌状态，无论是在穿手术衣和戴手套的过程中，还是在患者周围走动时，你都必须遵守严格的程序：双手始终放在腰部以上，在经过彼此时对视，在系手术衣时完全转过身去，永远不要背对患者。为了进一步限制手术室内的细菌数量，每个人都要戴着帽子和口罩，手术中在场人数保持在最低限度，门尽可能地关闭。

所有这些措施都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效果。在过去，手术后脓液从伤口渗出被认为是正常现象，只有愚蠢的外科医生才不知道这一点，所以那时候的伤口不得不保持开放，以便脓液流出。直到术中的无菌得以确保，常规伤口的感染才得到预防，并且在手术完成后可以立即缝合伤口。因此，卫生不是外科学中唯一的新元素，伤口的缝合也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进展。

外科医生是什么样的人？究竟是什么让你想要切开其他人的身体，即使他们感觉不到？患者在术后痛苦挣扎时，你该如何入睡？哪怕你没有犯错，患者却因为你的手术而死亡，你该如何坚持下去？外科医生是精神错乱、优秀过人，还是肆无忌惮？是英雄主义，还是喜欢卖弄？一名外科医生总是充满了紧张感。手术是一件美妙的事情，

但其中的责任重大。

外科医生本身就是治疗的一部分。毕竟，他们的双手和技术就是治疗所用到的设备。一旦出现问题，你必须对自己有所判断。你要问自己，问题是否由于你在治疗中的作为产生，还是一切都按部就班，问题是由其他原因引起的。毕竟无论治疗方案多么先进，我们都永远不会知道疾病将如何转归。疾病本身的发展过程也可能造成问题。但作为一名外科医生，你得学会对自己做出解释，这对内科医生没那么重要，他们不用自己的双手干预治疗。你还要问自己，你是否做了正确的事，是否尽了力。大多数外科医生将这永恒的质疑隐藏于自信的外表下。这种态度塑造了外科医生无所不能而又高不可攀的形象。但是，即使对于最自信的外科医生来说，这也只是一种表象，使得他们能够承担责任，远离内心深处的内疚感。无论如何，坚持下去吧，这是他们的座右铭。

每个外科医生都会遇到患者在术中或术后死亡的情况，即使他们没有犯错。你必须克服它并继续前进，因为还有下一位患者在等待治疗。这有点像火车在铁轨上撞了人，司机却无能为力，火车必须继续运行下去。患者的死亡是戏剧性事件，而根据不同的情况和手术的原因，有些是更难释怀的。如果患者本身患有癌症或遭遇了严重事故，则除了手术之外别无选择。如果是选择性手术，也就是说还有非手术的替代治疗方案，或者患者是儿童，则外科医生很难为自己开脱。

你的经验多少自然也会产生影响，做过5次与做过500次手术有很大差别。每个过程都有一个学习曲线，在前几次实践时，并发症发生的概率会高一些，但随着你经验的累积，这一风险也会降低。每个外科医生都必须经历这种学习曲线，没有例外。我想知道当我刚开始做外科医生时，我的第一批患者是否意识到我相对缺乏经验。在19世纪，查尔斯·弗朗索瓦·费利克斯·德·塔西绝不是一个新手，但当路易十四找他看病时，他还从未做过肛瘘切开术。因此，他请求国王给他6个月的时间，先在75名患者身上试验过之后，再为国王动手术。

外科医生的时间极为紧迫，你要有足够的体力连续工作几个小时，大多数时间站着，没有固定休息时间，值夜班并在白天接着工作；写出院文件，训练年轻医生，指导你的团队，保持和蔼的态度，告诉人们坏消息，给他们希望，记录你所说和所做的一切，详尽地解释每件事，而且永远不能让下一个患者在候诊室等太久。

幸运的是，工作中的挫折和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事都能被患者和家属的感激所消解，而且手术的巨大乐趣远远超过了工作的辛苦。做一场手术很复杂，但也很令人享受。外科医生所做的大部分事情都是非常基础的，用到的都是在幼儿园能学到的技能，比如切割、缝合，以及整齐干净地做好一切事情。如果童年时我没有玩过乐高或者不喜欢做手工，那么我就不适合做外科医生。还有一些事让手术变得享受：像侦探一样工作，找出患者哪里出了问题。寻找潜在的问题，并与同事讨论最佳解决方案，是一种愉快的消遣。

对于那些没接触过手术的人来说，外科医生的工作可能看起来很神奇：一个人能够拥有拯救他人性命的责任、技能和知识。这就是外科医生经常备受尊重，甚至让人敬畏，被描绘成英雄的原因。面对灾难和可怕的工作环境，外科医生试图用他们的手术刀挽救患者。但这种形象通常是扭曲的。也有外科医生冷血、天真、邋遢、笨拙或为金钱和名利折腰。

在这本书中，我讲述了与我的专业有关的一些故事、一些著名的患者、闻名的外科医生和非凡的手术。这并不简单，因为手术不仅是一项有趣而令人兴奋的工作，更重要的是非常具有技术性。外科学涉及复杂又精细的人体机能，还使用对于外行人来说几乎无法理解的术语。没有外科背景的读者可能不懂我们在说什么，例如“急性腹主动脉瘤”“乙状结肠穿孔”或“比-II式切除术”。因此我需要对外科概念进行解释，以便每个人都能理解这些故事的重点。这就不仅涉及手术的历史，还涉及我们的身体如何运转，以及外科医生可以做些什么来维持它的运转。

一些外科术语可能需要进一步解释。“切口”和“切除”这两个词来自拉丁语，字面意思是“切入”和“去掉”。“创伤”来自希腊语，意为“受伤”或“伤口”。从经历痛苦后感到创伤的意义上来说，创伤也可以是心理上的，但在外科学中，它意味着身体受到了某种损伤。“指征”是指“手术的原因”，而“并发症”是一种需要避免的结果或是灾难。其他术语可以参见书后的术语表。

这些故事并没有完整地呈现出外科学的历史，但它们能够给读者一个关于外科学的印象。什么是外科学？过去的外科学是什么？手术过程中会发生什么？手术中需要什么？人体在被刀、细菌、癌细胞或子弹攻击时会作何反应？休克、癌症、感染以及伤口和骨折愈合的原理是什么？什么可以通过手术修复，什么不可以？常见的手术是如何出现的，是谁发明了它们？大多数章节描写了在历史名人身上进行的手术以及这其中有趣的细节。你是否知道，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寿命原本没有这么长，胡迪尼在患有急性阑尾炎的情况下奉献了最后的表演，茜茜皇后在60岁时被刺伤，约翰·F.肯尼迪和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由同一位外科医生做了手术，一名阿姆斯特丹男子切开自己的膀胱取出了一枚石头？你是否知道，在手术过程中有电流通过你的身体，直到150年前外科医生才开始在手术前洗手？

有些故事对于我来说尤为亲切。患有膀胱结石的男人简·德·多特是我的最爱，因为我自己就住在阿姆斯特丹，距离他给自己做手术的地方不远；贪吃教皇的故事也令我着迷，因为我对肥胖患者的手术尤感兴趣；还有关于波斯国王的故事，因为我曾有幸成为他那迷人遗孀的外科医生；以及彼得·史蒂文森的故事，因为我在美丽的加勒比海圣马丁岛工作过几年；还有一个关于微创手术的故事，因为我的老板在进行史上第一次远程手术时，我也在场。最后还要提到的是，在很久以前，阿姆斯特丹还有另一位外科医生也写了一本有关他对外科手术的观察的书，他就是尼古拉斯·杜普，伦勃朗在画作《杜普教授的解剖课》中描绘了他。他在《医学观察》（*Observationes Medicae*）中用

有关黑猩猩的章节做结尾，我追随这位阿姆斯特丹同行的脚步，将本书最后一章献给一种特殊的动物。

尼古拉斯·杜普将他的书献给了他的儿子。我也把我的作品献给我的孩子——维克多和金，我常不得不放弃晚上和周末陪伴他们的时间去医院工作。

阿诺德·范德拉尔

阿姆斯特丹，2014年

1　取石术

阿姆斯特丹铁匠简·德·多特体内的石头

“AEGER SIBI CALCULUM praecidens”直译过来就是“一个生病的人切开自己身体前侧，取出一块石头”。这是17世纪的外科大师兼阿姆斯特丹市长尼古拉斯·杜普书中某章的标题。杜普描述了他在这座城市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疾病和其他的奇妙医学现象，包括“连打12天的嗝”“放血疗法后拇指坏疽”“口臭的罕见诱因”“吃了1400条盐渍鲱鱼的孕妇”“阴囊穿孔”“每天尿出蠕虫”“排便4小时后肛门疼痛”“阴虱”以及相当可怕的“烧红的铁烫掉了臀部”。他用拉丁语撰写了《观察医学》一书，供年轻的外科医生和内科医生阅读。但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这本书被翻译成荷兰语，并成为非医学读者追捧的畅销书。其中，铁匠简·德·多特切开自己膀胱取石的故事想必是最受欢迎的，因为他被画在了书的扉页上。

简·德·多特对杜普的同行们失去了信心，决定亲自动手解决问题。多年来他一直深受膀胱结石之苦，外科医生两次试图取出他体内的结石，但均以失败告终，他也差点因此丢了性命。这种手术被称为取石术，正如它的字面意思“切开取石”。在那个年代，取石术的死亡率，即患者死于手术的概率，是40%。成功的取石师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有一匹好马，这样他就可以在患者家属找他算账之前跑得远远的。因此，取石师这个行业就像拔牙的和治白内障的一样，本质上是一种旅行职业。这种游牧式执业的优势在于，下一个村庄总是有不堪疾病折磨的可怜人，他们愿意承担风险——当然，还要为此掏钱。

简·德·多特曾经冒着极大风险尝试过两次取石术，从统计数据来看，综合风险高达64%，所以，他能活下来已经算是很幸运了。难以忍受的剧痛和不适让他在夜晚也无法入睡。膀胱结石自古以来就有，

它们在古代木乃伊中被发现，而且关于“取石术”也时有记载。膀胱结石造成的疼痛曾是一种日常的症状，就像疥疮和腹泻，所以你可以将它类比为现在的常见病，比如头痛、背痛或肠易激综合征。

膀胱结石由细菌引起，是不注意卫生的直接结果。人们有一种误解，认为尿液本来是脏的。在正常情况下，这种产生于肾脏的黄色液体在经由尿道排出之前不会接触任何病原体。因此，尿液中有细菌是不正常的，细菌会导致膀胱出血、化脓，进而产生坚硬的沉淀物。只要沉淀物小到能够通过尿液排出，你根本感觉不到它。但是如果膀胱感染连续发生，沉积物可能变得很大，以至于无法从尿道排出了，然后它就会形成一块石头。而且，一旦石头在膀胱中形成，由于过大而无法排出，往往还会诱发新的感染。所以一旦你患上结石，就永远无法摆脱，并且随着每次感染，结石都会变大。因此，膀胱结石具有典型的层状结构，像一颗洋葱。

为什么17世纪的人那么容易得膀胱结石，而在今天非常罕见？在阿姆斯特丹这样的城市里，房屋寒冷、潮湿、透风，风从门框、窗框的裂缝中吹进来，墙壁被潮气打湿，雪也从房门底下钻进屋内。人们对此束手无策，只能不分昼夜地穿着厚厚的衣服。伦勃朗的画中画着身穿皮草大衣、头戴帽子的人们。在那个年代，人们不可能每天用干净的水洗澡。运河里的水是脏的，死老鼠漂浮在水面，人向水里排便、扔垃圾，制革商、酿酒商和画家向里面排放化学品。城里约旦区的运河只不过是交错于周围的牧场的泥泞沟渠的延伸，牛粪在其中缓缓流入阿姆斯特尔河。你没法在河水中洗个体面的澡，或清洗内衣，连厕纸都还尚未被发明。

这就造成他们的腹股沟和私处总是很脏。尿道，是从体内排出尿液的腔道，它对于细菌进入膀胱只是一个很小的屏障。对于这种来自外部的侵袭，最佳措施是尽可能多地排尿来冲洗尿道和膀胱。这意味着要喝很多水，可干净的饮用水也是很难得的。水泵的水也并不总是值得信赖。确保水安全的最好办法是用它来做汤，还可以做成葡萄

酒、醋和啤酒长时间保存。在1600年前后，每个荷兰公民平均每天要喝超过1升的啤酒。可这对儿童不适用，因此膀胱感染通常在童年时期就开始了，使得结石有足够长的时间越长越大。

希波克拉底和取石师

年轻的医生宣誓希波克拉底誓词时，他们向众神承诺了许多事情，被归结为以下4个基本原则：照顾的责任（为所有患者尽力）、职业道德（尊重和忠诚于同事）、职业保密（隐私和自由裁量权）以及一个无所不包的起点——“不伤害原则”（拉丁语为Primum non nocere）。根据希波克拉底的说法，取石术并不符合这些原则。在他的誓词中，他敦促医生将取石这项工作留给别人。今天，这个特定的段落被解释为，如果你自己不能治疗患者，就将他们转诊给专科医生，但这实际上是无稽之谈。希波克拉底的意思正如字面所说，他坚定地将取石师排除于医疗领域之外，连同拔牙的、算命的、做毒药的以及其他骗子。在他那个时代，这可能有充分的理由。无论一块膀胱结石让你多么痛苦，取出它的死亡风险都实在太高了。后来，手术的风险极大降低，即使在威胁生命的情况下，对手术的恐惧也不再有正当的理由。希波克拉底可能想象不到，如今的外科手术不仅可以挽救生命，还可以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

任何膀胱感染都会造成3种令人不快的症状：尿频（排尿次数异常增多）、尿痛（排尿时疼痛）和尿急（强烈的排尿冲动）。由于杜普将简·德·多特的行为描述为一项史无前例的杰作，多特的膀胱一定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他才迫不得已自己动手切开了自己的身体。除了以上膀胱感染的常见症状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症状让这位铁匠陷入如此的绝望之中呢？

在膀胱的出口处，尿道的底部，有一种压力感受器。当你的膀胱充盈时，感受器会受到刺激，你会产生尿意。但是，无论你的膀胱是否充盈，沉在底部的结石都会造成同样的刺激。如果你尝试排尿，压

力将导致结石挡住膀胱的出口，所以几乎没有东西能排出来。此外，结石将更加用力地压在感受器上，增加了排尿的冲动。这种恶性循环将导致更大的压力，更少的尿液排出，以及更强烈的排尿冲动——足以使人发疯。我们知道，罗马皇帝提比略令他的行刑官绑住受刑者的阴茎，当然也会造成这种症状。如果你日夜承受这种痛苦，无论膀胱是满还是空，你还担心40%的术中死亡比例吗？

从未患过膀胱结石的人，一定很难想象要在哪里切口来取出结石。压迫膀胱出口的石头被压力向下推，所以像简·德·多特这样的患者会确切地知道它的位置：在肛门和阴囊之间，这片区域被称为会阴。但是任何熟悉人体结构的人都不会从这里切开，因为这里血管密集，紧邻括约肌。从上方进入膀胱更为容易，但也因为靠近腹部和肠道而很危险。可取石师们不是解剖学家，而是狡猾的骗子，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毫无概念。他们从下面会阴部切入身体，直奔结石，不去管切口对膀胱功能造成的损害。大多数在取石师刀下幸免于难的患者都尿失禁了。

在简·德·多特所在的年代，有两种方法可以去除膀胱结石："小"手术（使用"小器械"）和"大"手术（使用"大器械"）。罗马的塞尔苏斯早在公元1世纪就描写过第一种方法，但当时已经应用了许多个世纪。"小"手术的原理很简单：患者仰卧，双腿悬在空中，这个体位至今仍称为截石位。然后，取石师将食指伸入患者的肛门，通过直肠能够摸到前方膀胱中的结石，再用手指将结石朝着会阴方向拉。接着，让患者或其他人托起阴囊，在阴囊和肛门之间切口，直至可以看到石头。最后让患者像女人分娩胎儿那样用力排出结石。其他人可以通过按压腹部来帮患者排出，取石师也可以用钩子将结石拉出来。如果以上所做的一切成功了，那么还必须尽可能久地用力按压住伤口，以防止患者因失血过多而死亡。这项手术只能对男性患者做，而且患者的年龄要在40岁以下。男性在40岁左右，其前列腺（来源于拉丁语"pro-status"，意思是"位于前面"）会开始膨胀，挡住切口的位置。

1522年，马里亚努斯·桑科塔斯·巴利坦努斯描述了“大”手术，这是由他的导师——克雷莫纳的乔安尼斯·德罗马尼斯设计的一种新方法。这种方法不是将结石拉近器械，而是将器械作用于结石。这种“马里亚手术”需要用到大量的器械，因此称为“大”器械。患者往往光是看一眼这些金属工具就会晕过去或是改变主意。“大”手术也是在截石位下进行的，但并不需要托起阴囊。医生将一根弯杆通过阴茎插入膀胱，用手术刀在杆的方向上，沿着会阴的中心线在阴茎和阴囊之间做一个垂直切口，再用“颈甲”——表面有沟槽的器械——插入膀胱，通过它使用分离器、镊子和钩子将石头打碎并取出。“大”手术的优势在于，伤口变小了，降低了尿失禁的风险。

简·德·多特没办法拿到这些复杂的器械，因此别无选择，只能一切从简。他只有一把刀，通过一个大大的横向切口做了“小”手术。这位铁匠亲自打造了这把刀，还在手术开始之前找了个借口将他的妻子（她丝毫没有怀疑）打发到卖鱼市场——这一步并非多余。在1651年4月5日的这场手术里，唯一的旁人是他的学徒，帮他把碍事的阴囊拎起。杜普写道：“小兄弟把阴囊托起来，以便他用左手固定结石（scroto suspenso a fratre uti calculo fermato a sua sinistra）”。然而，从这段含混不清的拉丁文中，我们很难确定是谁将左手食指伸进了多特的直肠里。也许多特试着自己完成了一切，他的助手只是震惊地旁观了这场“手术”。多特切了3次，但切口还是不够宽，所以他用两根食指（显然，其中一个来自他的左手）伸入切口并将其撕开。他很可能并没有遭受太多的痛苦和失血，因为他将切口选择在早年手术留下的疤痕组织上。在大力的按压下（这在杜普医生看来更多靠的是运气而不是判断），结石终于出现了，被嘎吱嘎吱地挤出来，最后掉在了地上。它重达113.4克（4盎司），比鸡蛋还大。这块结石以及多特的刀，被铭刻在杜普书里的版画中。图中清楚地显示出了结石上的纵向凹槽，很可能是被刀割到的。

伤口实在太大，最终不得不交给外科医生治疗，还溃烂了好几

年。卡尔·范·萨伏依在这英勇行为的4年后，为多特绘制了一幅肖像，画中这位铁匠站在那里（而不是坐着！），脸上带着苦笑，手里拿着结石和刀子。

就在简·德·多特的绝望之举后不久，在会阴中心做切口的原始方法被取代了。不幸的是，新方法并非没有风险。多特从自己的膀胱取出结石的那一年，一名叫雅克·比尤利的男子在法国出生了。他以“雅克兄弟”之名，在欧洲各地巡游进行“大”手术，切口在中线旁几厘米处。18世纪初期，他因在阿姆斯特丹开展的手术而闻名。随着死亡率和并发症的减少，取石术的切口越变越小，结石可以被更精确地取出。1719年，约翰·道格拉斯做了第一例耻骨上切石术，即下腹部的“高位切石术”。由于希波克拉底的警告，这条手术入路始终是禁忌，他认为膀胱上方的伤口一定会致命，但事实证明他是错的。在19世纪，切石术几乎完全被经尿道碎石术（transurethral lithotripsy）所取代，这是一个复杂术语，代表经过（trans）尿道（urethra）打碎（-tripsy）结石（litho）。可伸缩的细长镊子和锉刀通过阴茎插入膀胱，将结石打成碎片。1879年，膀胱镜在维也纳诞生了。这是一个小型的可视探头，可以通过尿道直接插入膀胱，使得粉碎和取出结石更为容易。然而，预防依然是最好的治疗方法。与其对抗任何新式手术方法对人类的折磨，每天清洁内衣裤更为管用。到了今天，真正的切石术已经很少进行，而且从不在会阴做切口。此外，手术不再由外科医生进行，而是由泌尿科医生进行。

如果仍然有人好奇，在两腿之间做切石手术究竟是什么感觉，那么可以听听法国作曲家马兰·马雷在1725年经历过“大”手术之后谱写的音乐。这首E小调大提琴奏鸣曲名为《膀胱结石手术图》（*Tableau de l'opérationdela taille*）。曲长3分钟，从患者的角度描述了手术的14个阶段：看到器械，恐惧，支撑自己靠近手术台，爬上手术台，再爬下来，重新考虑是否手术，让自己被绑在手术台上，切开，伸入镊子，取出结石，几乎失声，血流如注，被放下手术台并带到床上。

简·德·多特在全国出了名。很多人宣称他疯了。术后1个月，1651年5月31日在阿姆斯特丹，他在公证人彼得·德巴里起草的一份契据中描述了自己的行为。其中写道：“简·德·多特，居住于英施特格（Engelsche Steeg），30岁……”其中还写了一首诗：“……由他亲手书写、押韵和作曲。”这位骄傲的铁匠在诗中暗示：尽管他的行为和姓氏都表明他早该死了，但他还活着：

是什么惊奇了整片土地？
是这双幸运的手。
虽是凡人所为，
却由上帝的旨意指引。
当生存看上去如此渺茫，
他再次赋予德·多特以生命。

不知他的妻子从市场回来后会怎么想？

2　窒息

世纪性的气管切开术：肯尼迪总统

一个星期五刚下午的时候，在达拉斯的帕克兰纪念医院，一名45岁的男子被送入急诊室，他头部有一个裂开的巨大弹伤，血和脑组织正从洞中滴落。其他患者很快被转移到别处。陪同伤者一起进来的众人，全都焦急万分，记者在外面乱转。男人的妻子在担架旁边，脸上溅满了鲜血。伤者被推进了创伤室，门随即关上。只剩他独自一人面对着医生和护士，而他的妻子在走廊里等待。

这位医生是28岁的查尔斯·卡里科，那是他当外科住院医师的第二年，当晚在急诊室值班。他一眼就认出了伤者，躺在他面前满身是血、头上破了一个大洞的男人，正是约翰·肯尼迪总统。他失去了意识，身体正在缓慢地抽动。卡里科看出总统呼吸困难，便掰开他的嘴将呼吸管插入气管。他将一个带有照明灯的钩形器具——喉镜，探向总统的口腔深处，将他的舌头拨到一边，尽可能地打开喉咙，直至看到覆盖气管入口的软骨瓣——会厌。他可以直视位于会厌后方的声带，接着又设法将这根塑料管子挤进两条声带之间。虽然总统还有其他需要注意的伤，但当务之急是为他通气。血液从总统脖子中间的一个小伤口中缓缓流出。门开了，走廊里骚乱不断，当晚值班的外科医生马尔科姆·佩里进入了房间。

正如全世界所知，肯尼迪没能活着从创伤室里出来。当晚，总统的遗体被匆匆地空运到华盛顿的贝塞斯达海军医院，在那里，军事病理学家詹姆斯·休姆斯对总统的遗体做了尸检。休姆斯意识到这是一场世纪性的尸检，他不可以犯错误，很多人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那些身着深色西装身份成谜的男人。躺在他面前的不仅仅是一具尸体，也是还原事件真相的关键证据——这关乎国家利益。如果休姆斯发

现，所有弹伤来自同一个方向，那么这场枪击可能是一人所为，是一个脑子混乱的疯子的单独行动。但如果子弹来自不同的方向，那么就意味着这肯定是一次多人联合的刺杀行动。

然而，从一开始，休姆斯就遇到了问题。X光片上没有显示出子弹，这意味着子弹一定全部穿过了身体，分别在入口和出口留下了伤口，然而他只发现了3处弹伤。其中头部后面的一个小洞和右侧一个较大的洞，明显在一条直线上。第三个小伤口位于背部右侧，正好在颈底部的下方。由于它太小，所以很可能是子弹的射入口。射入口总是小于射出口的，但高速子弹造成的射出口也可能很小。无论是哪种情况，问题在于相应的射出口或射入口在哪里。在尸体上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

肯尼迪的继任者是副总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在肯尼迪的遗体被从达拉斯运往华盛顿的同一天，在同一架总统专机上，他宣誓就职。肯尼迪去世一周后，约翰逊总统做出了上任后的首批决定，其一就是成立一个由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担任主席的审判委员会，以调查枪击案。委员会还对参与抢救肯尼迪的医生提出质疑。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对公众开放，在互联网上很容易找到医生的证词。以下内容可以从他们的记录中推断出来。

在被枪击的8分钟内，肯尼迪被送往帕克兰纪念医院的急诊室，护士玛格丽特·亨奇利夫和外科住院医师查尔斯·詹姆斯·卡里科参与了抢救，卡里科第一时间进行插管并将呼吸管连接到呼吸机上。就在那一刻，34岁的马尔科姆·奥利弗·佩里进入了房间。和卡里科一样，他注意到总统发生了窒息。他看着总统脖子前方中间的那个小伤口，血液从那里缓缓流出。他只有一瞬间来评估情况并做出决定。

总统已经失去意识，但他的胸部却在缓慢地起伏。然而，尽管已经插管，但他的呼吸依然不正常。也许是呼吸管插的位置不对，又或者出了其他问题，可能是气胸（肺组织塌陷）或血胸（血液充满胸膜

腔）。总统脖子前面有一个小伤口。是气管的伤口吗？如果卡里科插入的呼吸管在气管中，为什么没有气泡从伤口逸出？如果管子插错了，插到了食管（食道）里该怎么办？这就需要立即采取行动。

佩里拿起手术刀进行了气管切开术，顾名思义，就是切开颈部气管，让空气进入肺部。之后就可以将特殊的气管套管插入气管。因为脖子上的小弹伤恰好在他需要做切口的地方——颈部中间，喉结以下，佩里决定就用这个洞进行气管切开术，用手术刀将它在水平方向上向两侧扩大。正因如此，休姆斯才找不到第四个弹孔。

在佩里到达之后，1号创伤室迅速挤满了其他医生。在他之后首先到达的是查尔斯·巴克斯特和罗伯特·麦克莱兰，他们当场协助他进行气管切开术。在他们将气管套管插入总统的气管时，接下来到场的两名医生，一名外科住院医生和一名泌尿科医生，分别在两侧放置了一根胸管。这是一根从肋骨之间插入胸壁进入胸腔的塑料管，在发生气胸或血胸时，能够排出肺组织周围的空气或血液。一名麻醉师管理呼吸机，通过心电图监测总统的心脏活动，并在总统的手臂开通静脉通路以输入血液和液体。血液是O型阴性，液体是乳酸盐林格溶液——一种水和矿物质的溶液。

神经外科医生威廉·坎普·克拉克检查了总统脑部的损伤。因为当时他正好站在那里，他还被要求从总统嘴里取出呼吸管，以便佩里可以用气管套管代替它。当他取下管子时，克拉克看到总统的喉咙里有鲜血。一根鼻胃管也经过食管插入他的胃中。尽管做了以上这些努力，总统的呼吸也没有改善。一名护士正用纱布用力按着总统头部的伤口，但还是有大量血液流失。医生们看到地板和担架上的血液和脑组织。试图开放气道后，他们发现总统的脉搏停止了。克拉克和佩里立即开始心脏按压，但这导致更多的血液从头部伤口流失。在参与了22分钟的救治之后，克拉克医生最终停止了心肺复苏术，并在当天的下午1点宣布总统死亡。

很快，特勤局人员强制带走了总统的尸体，并把尸体运送到位于华盛顿的军队医院。达拉斯的医生与军医之间没有交换信息，这导致了关于弹伤的争议，引发了许多固执而旷日持久的阴谋论。佩里以及在达拉斯的1号创伤室的其他10名医生，没有时间把总统翻过来检查他的背部，因此从来没看到他背后脖子下面的伤口和头部后面的伤口。那天下午的惨剧发生后，佩里在临时新闻发布会上被记者包围得水泄不通。他将颈部的创口称为射入伤，导致媒体在总统被暗杀后的前几个小时和几天内，假定有来自前方的一次或多次射击。显然，这完全与逮捕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理由相悖。这名年轻人在袭击发生后不到一个半小时就被逮捕，并立即被确认为唯一的枪手，尽管他是从总统背后的位置开的枪。

紧急医疗援助中的ABC

在紧急医疗援助中，字母表为我们提供了实用的记忆辅助。ABC表达的是所需采取行动的顺序，以使患者的状态在生命危急的情况下稳定下来。A代表气道：气道必须是开放的，否则患者就会在几分钟内窒息死亡。通常需要往患者的口腔和声带之间分别插入呼吸管和气管，这种操作被称为插管。如果出于某些原因这种做法不起作用，必须立即通过颈部前方切开气管，这被称为气管切开术。千万不要犹豫，因为时间就是生命。“当你想到气管切开术时，就去做！”它的紧迫性和拯救性就在于此。B代表呼吸：你必须确保患者的肺能够获得足够的氧气并排出足够的二氧化碳。这可以通过给患者使用呼吸机来实现。血液和外部环境之间的气体交换不足存在导致大脑、心脏和所有其他重要器官无法获得足够的氧气而停止工作的风险，这种症状被称为缺血。在缺氧状态下，肌肉可以维持6个小时，但大脑只能维持4分钟。其次，如果血液中的二氧化碳无法排出，血液的pH值就会下降。酸性血液对器官的损害更大，并且不利于血液循环。这就是C所代表的含义：你必须稳定患者的血液循环，确保他们不会失血至死，并且控制心脏和血压。接下来还有D和E……

因此，关于总统死亡的通报与尸检报告不一致，给人一种有所掩饰的感觉。直到第二天早上，休姆斯才打电话给佩里，之后听说了气管上的弹孔。对于他而言，这个信息就是拼图中的最后一块：总统背后颈部下方的弹伤、胸腔内右肺顶部的挫伤，以及佩里所做的气管切口所在的弹孔，三者完全吻合，正如头部的伤口一样符合从背后射击的弹道特征。这意味着总统是从背后中了两枪。这是一场暗杀，而非政变。然而，比起在军队医院半夜进行的秘密尸检报告，许多人更愿意相信英勇的年轻外科医生下意识的说法，毕竟他在总统还活着的时候亲眼看到了伤口。

关于肯尼迪枪弹伤的解释可以在亚伯拉罕·扎普鲁德拍摄的业余电影中找到，多亏了他的秘书，他清清楚楚地记录下了车队行进的过程，也因此拍下了总统被袭的那一幕。扎普鲁德为了获得更好的视野站在了墙上，因为他患有眩晕，秘书在他拍摄时一直抓着他的腿。直到15年后才发布的录像显示了如今尽人皆知的一幅画面：总统头部的碎片在空中飞过，他绝望的妻子杰奎琳爬过行驶中汽车的后盖。总统头部中弹前五秒所拍摄的图像就没那么广为人知了。很少有人注意到，肯尼迪脸部突然间扭曲并双手抓住自己的喉咙，所有人都在微笑并高兴地挥手时总统似乎在窒息。

这就是事情的真相。总统头部骇人的伤口是由第三枪引起的。第二枪击中肯尼迪的后背，并斜着从他的声带下穿过气管。这使他无法呼喊或尖叫，没有人注意到他喘不过气。子弹从他的颈部前方射出，击中了坐在他前面的得克萨斯州州长约翰·康纳利的胸部、右手腕和左大腿。这颗子弹因其诡异的轨迹而被称为“魔弹”，又名“沃伦委员会399号展品”。然而，扎普鲁德影片所还原的事实表明，子弹的轨迹并没有它看上去的那么奇怪。在这之前的第一枪错过了目标，打伤了观众詹姆斯·塔格的右颊。第一声枪响使得车内的康纳利转身拿起他的帽子，因此他和肯尼迪因第二枪所受的伤都在一条直线上。这条线甚至可以延伸到得州教科书仓库6楼打开的窗户。在窗口的是李·哈维·奥斯

瓦尔德或是还有其他人，仍然是个未知数，因为奥斯瓦尔德否认这次行刺，并在两天后被杀身亡。

从医学角度来看，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两处弹伤以3种不同的方式威胁了总统的生命。头部的一枪炸掉了右侧大脑的大部分。这部分究竟有多少，具体是哪部分，我们永远不得而知：约翰·肯尼迪的大脑丢失了。但无论大脑的伤口多么可怕，并不一定会致命。大脑右半部的损伤会导致瘫痪（偏瘫）、感觉减退（偏身感觉障碍）或对左侧身体的刺激缺少注意（偏侧空间忽略），或视野左侧视力下降（偏盲）。它还可能导致人格改变（额叶紊乱），无法执行简单的数学任务（失算症），失去对音乐的鉴赏（失乐症）和失去记忆（失忆症）。但说话和理解语言的能力主要位于大脑的左半部分，而更为重要的调节呼吸和意识的区域则远在脑干。因此，虽然脑外伤会使肯尼迪失去作为人的大部分功能，但他的身体很可能会继续存活。

头部大量失血也不一定致命。只要心脏能够维持血压，医生就可以通过输液和输血来缓解严重的失血。肯尼迪到达医院时一定还有足够的血压，因为他的脉搏仍然在跳动。尸检显示没有其他意料之外的内出血。当然，很难在事后讨论当时是否能够阻止脑部敞开的伤口出血。

更直接的威胁来自气管的伤口。从气管中枪到卡里科插入呼吸管之间的8分钟内，肯尼迪一直无法呼吸。长时间血氧饱和度不足被称为窒息，是表达难以呼吸的医学术语。它很快就会对大脑和脑干造成损伤，因为在人体所有器官中，它们在缺少氧气的情况下存活时间最短。最初，损伤是可逆的，伤者失去意识并晕倒。之后，损伤不可逆，伤者再也无法恢复意识，但仍然可以自主呼吸，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昏迷。最后，损伤变得致命，维持生命的系统以及脑干中的意识、呼吸和血压的调节中枢，完全关闭。缺氧所导致的脑干呼吸中枢受损造成了总统在窒息时奇怪的动作。尸检显示肺组织没有塌陷，肺部周围也没有大量血液。因此，如果他们能更早地为总统插管或进行气管

切开术，或许就可以挽救他的生命。如今，失去意识的患者在插管之前绝不会被移动，而是先由救护车上的人员将管子插好，因为每一秒都很重要。

因此，在一屋子医生都束手无策的情况下，美国第35任总统死于严重失血以及由于气管切开术进行得太晚而无法控制的窒息。诡异的是，美国的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也死于类似的情况，不过在他的案例中，失血是由他的医生导致的，这位医生还拒绝行气管切开术放任他窒息死亡。

华盛顿的私人秘书——托比亚斯·李尔上校，作为目击者详细描述了华盛顿生命中最后的几个小时。1799年12月13日，星期五，华盛顿因喉咙痛而醒了过来。前一天，他在大雪里骑过马。他声音嘶哑，咳得很厉害，但在这寒冷的冬天，他仍然要前往种植园。当晚，他因高烧而醒来时几乎不能讲话，并开始感到呼吸困难和无法吞咽，变得越来越焦虑。他试着用醋漱口，却差点被呛到。星期六早上，他不顾妻子的强烈反对，命令督察员给他放血。但他并没有感觉好转，于是又叫来了3位医生——詹姆斯·克拉克、古斯塔沃·理查德·布朗和伊丽莎·库伦·迪克。他们给总统放了几次血，16个小时不到就放出了近2.5升血！最终，华盛顿虚弱得无法坐直身体，而坐直身体对呼吸非常重要。到了晚上，他的呼吸变得越来越费力。他的喉部一定是出现了感染，导致会厌肿胀，几乎阻塞了他的气管。这通常会使患者感觉自己随时都有可能窒息而亡，这是一种非常恐怖的体验。虽然已经失去了近一半的血，但华盛顿还保持着相对平静。3个人中最年轻的迪克医生想要进行气管切开术来挽救华盛顿的性命，但克拉克和布朗却认为这么做风险太大，拒绝实施手术。严重的失血和喉部感染造成的窒息使华盛顿筋疲力尽，最终在晚上10点钟去世，享年68岁。

在20世纪初期，气管切开术不再是缓解急性呼吸问题所必需的方法，它被插管——通过口腔将呼吸管插入气管——所取代。呼吸管是现代医学中最成功的急救设备之一，它是一种结构简单、质地柔韧的

一次性塑料管，直径约1厘米，长30厘米。呼吸管的尾部有一个小气球，一旦管子穿过声带进入气管，气球就会被吹起来，在肺和呼吸机之间产生一个真空气囊，由呼吸管连接。这种方法不仅用于缓解呼吸问题，也用于处理全身麻醉手术期间患者的呼吸。在患者气管中使用呼吸管进行有效插管已成为每台大规模手术的基本操作。在插管不成功，患者面临窒息危险的罕见情况下，气管切开术总可以作为最后的手段。

1963年11月22日那个星期五发生的事件将贯穿马尔科姆·佩里的余生。这一切发生时，他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仅仅两个月，并为此忙活了好几天。事发后他立即被叫到手术室，为康纳利州长进行手术。两天后，他又一次回到那里，试图控制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腹腔动脉出血。

3　伤口愈合

皇家包皮：亚伯拉罕和国王路易十六

一位老人听到了一个声音。他拿起一块石头，击打自己的阴茎以去除包皮。之后，他在儿子和奴隶们身上做了同样的事。一定是由于这种手术过于痛苦，不久之后法令颁布，包皮环切术最好不要对成年人，而应对出生第8天的男婴进行。

这位老人就是亚伯拉罕。《创世记》第17章讲述了这个故事。为什么他会对自己做出如此惊人的事情？这不仅可以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神学的角度来解释，也可以用外科学解释。当时，这位老人在过去的13年里没能成功生育过一个孩子。《创世记》中这一章清楚地记载，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莎拉都已经上了年纪，但他们仍然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只是没有这个运气。亚伯拉罕的包皮会不会与此有关呢？

有这样一种疾病，使得性交对于男性来说非常痛苦：包茎，即由包皮和龟头之间的慢性感染引起的包皮收缩。亚伯拉罕的人民生活在吾珥城和地中海之间的沙漠中。那里非常干燥，每迈出一步都尘土飞扬。当时人们穿的长袍下面是敞开的，里面什么都不穿，所以灰尘沾得到处都是。而且，他们不懂卫生。《创世记》中一再谈到人们用水洗澡，但其实仅限于脚。沙漠中水资源匮乏，牛群也需要水，每天都洗澡是不现实的。这就是为什么割礼的传统——现在也是如此——主要流行于居住在沙漠中的人们之间，不仅是像亚伯拉罕、犹太人和穆斯林这样的中亚人，还有在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和许多非洲人民。

包茎主要影响男性的勃起功能，龟头受到阻碍，包皮可能会被撕裂。性交时的运动加剧了这种症状，使得性行为越来越难令人满足。

这是否至于让一个男人，一个急切地希望延续自己血统的男人，愿意用一块石头敲打他的包皮，去除这个合乎逻辑的病因呢？大多数外科手术不都是这样起源的吗？如果脓疱或脓肿带来的疼痛使你无法入睡，你会将它切开。如果发炎的牙齿持续抽动着你的神经，连绵不断的疼痛使你难以忍受，你会把它拔掉。如果膀胱结石让你心烦意乱，你会把它取出。如果你的包皮毁了你生育的愿望，你就会用石头敲掉它。无论如何，就在这次手术后不久，亚伯拉罕得偿所愿。

割礼之后发生的事情是《圣经》故事的主题，在《创世记》第34章的第24和25节达到了高潮。我们现在说的是3代之后的故事。雅各的儿子们承诺，如果所有希未男性都接受割礼，他们就不会报复名叫舍科姆的希未男人对其妹妹底拿的玷污。属于少数族裔的希未人非常高兴就这样了结事端，同意了此事。但他们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就是让所有人同时受割礼。这一点并不明智，因为雅各的儿子们显然比希未人更了解正常的术后病程。每一次手术后——包括割礼——都会发生一样的事情，出现相同的症状。

在外科手术中，皮肤中的神经纤维直接受到刺激，这意味着手术一开始就非常疼痛。在把刀（或者石头）放下之后不久，最初的疼痛几乎完全消失了，机体开始了愈合过程。在第一阶段，通过炎症反应修复对组织造成的损害。这是由名为巨噬细胞（“大胃王”）的特殊细胞进行的，它可清除所有残骸。由于这种炎症反应，手术后约3小时，组织开始肿胀，再次引起疼痛，但比之前轻得多。伤口轻微肿起、发红、发热。在较好的卫生条件下，病情发展就到此为止，几天后炎症反应随着疼痛一起消失。被称为成纤维细胞（纤维制造者）的细胞被带到损伤区域并开始生成结缔组织，最终形成瘢痕。这被称为一期愈合（per primam），通常持续8～14天，具体时间取决于伤口的深度。

炎症

炎症是我们的身体对异常存在的事物做出的反应。它是由各种细胞介导的复杂且多样的反应，其间释放出大量物质，这些物质或引起另一种反应，或成为其他细胞的信号。通过这个复杂的过程，炎症反应可以根据其成因表现为多种形式。踝关节扭伤、牙痛、湿疹、腹泻、艾滋病、吸烟者的咳嗽、疣、感染的伤口、移植肾的排斥反应、花粉症、甲状腺功能障碍、头皮屑、伤寒、哮喘、动脉阻塞和蚊虫叮咬，都是炎症反应不同的表现形式。炎症的局部症状可以归结为5种征象：红、肿、热、痛和功能障碍。两种细胞在炎症中至关重要：巨噬细胞（清除细胞受损所产生的碎片的大型细胞）和淋巴细胞（可以识别异物成分，并且产生抗体来对抗它们的小型细胞）。过敏是对失控的外来物质的一种炎症反应。入侵者（病毒、细菌或寄生虫）的攻击所引发的炎症被我们称为感染。如果炎症细胞将我们的身体组织误认为外来物质，就会导致自身免疫性疾病。比如，风湿病就是部分关节受到炎症反应的攻击而产生的。

然而，在卫生条件较差的情况下，如《创世记》书中所描述的那样，伤口中的细菌会在受损组织中繁殖，并吸引第二波炎症细胞。白细胞，也被称为白血球，试图破坏细菌。这导致脓液形成——一锅有害细菌、死亡的白细胞和坏死组织混合而成的“汤”。伤口变成深红色，肿胀并发热。在这种情况下，过了疼痛轻微尚可忍受的初始阶段，通常在手术后第二天，疼痛会到达新的巅峰。在《圣经》时代，事件发生的当天也被计算入日期，因此术后的第二天被描述为第三天（正如耶稣被描述为在第三天复活，而复活节实际上是受难日后的第二天）。

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希未人会在割礼后的第三天痛苦地卧床不起。凭借敏锐的外科洞察力，雅各的两个儿子西米恩和利维算到了这一点。他们带着刀剑潜入城市，冷血地屠杀了一群手无寸铁的患者。

如果患者在3天以后存活下来，手术伤口会发生什么变化？只要伤口是开放的，没有严重污染，组织没有严重受损，机体就有足够的

能力抵御感染。脓液可以从伤口滴出，细菌被驱离健康组织，使得伤口愈合。直到19世纪中期，手术伤口总是保持开放，因为伤口感染是不可避免的。这被称为二期愈合（per secundam）。伤口逐渐被肉芽组织充满，皮肤从边缘开始生长直到伤口完全愈合。根据伤口的大小，二次愈合可能需要几周到几个月的时间。

无论如何，我们可以从这两个《圣经》故事中得出结论：割礼——至少对成年人来说和在不良的卫生条件下——不是一种毫无痛苦的体验。没有哪一个成年的罗马人或希腊人会考虑让自己接受割礼。在公元2世纪，罗马皇帝哈德良（在英国，有一堵墙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割礼。这导致了政治和外科学上的两种反应：一种是进步的，另一种是保守的。

在此之前，割礼只需切除可以拉过龟头的那部分包皮，这被称为马舒克（mashuk）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回应哈德良的法令，西蒙·巴尔·科赫巴领导了犹太人对罗马侵略者的第三次反抗，并挑衅地传播皮瑞亚（periah）方法——完全暴露龟头。这需要通过切割龟头底部来切除包皮的其余部分（这是包皮环切术的起源，意思是“切开一圈”）。巴尔·科赫巴的许多支持者在起义期间自行重新割礼，完全割礼成了标准方法。

正如重新割礼是一种政治声明一样，没有狂热政治观点的人也可以采取相反的手术。任何受过割礼但又不想加入犹太人起义的人都可以修复包皮，继续做罗马帝国的好公民。这项被称为包皮修复术（epispasm）的手术，显然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的，罗马百科全书的作者塞尔苏斯在1世纪的《医学》（*De Medicina*）一书中就有描述。根据塞尔苏斯的记述，这种修复包皮的手术方法巧妙，并且没有那么痛苦。

你只需要一把刀和一根牙签就可以开展包皮修复术。首先在阴茎根部周围做一圈切口，然后皮肤就像鞘一样在轴上向前滑动，这样就

可以将末端拉到龟头上，形成一个新的包皮。用牙签将皮肤固定，直到基底部周围的环形伤口完全愈合。这是一个巧妙的手术，因为患者的尿液没有与开放性伤口接触：这是在卫生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利用二次愈合的一个绝妙例子。

在随后的黑暗时代，西方文明迷失了方向。古代的哲学家花时间思考的都是诸如“存在”的本质、国家和伦理的理想形式这样的宏大问题，而中世纪的大思想家关心的问题却是包皮。如果耶稣在升天日真的以肉体形态升入了天堂，那么他幼时被割下的包皮怎样了呢？它是否如同希腊学者利奥·奥拉提乌斯声称的那样，独自进入了天堂？

虽然梵蒂冈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发表任何官方观点，但是旅游经营者们热衷于利用圣包皮仍然存在于地球某处这一可能性。声称拥有某个神圣的遗物是一个城镇或村庄收入来源的保障。旅游业是一个利润丰厚的行业，即便在当时也是如此，朝圣者是欧洲的第一批游客。科隆有“东方三博士”，君士坦丁堡有施洗者约翰的手，特里尔有圣袍，布鲁日有圣血，而神圣的十字架的碎片则散布在整个欧洲大陆上。在法国的小镇沙鲁宣称拥有耶稣的包皮之后，这“神圣遗物之母”又出现在欧洲的其他十几个地方，甚至安特卫普也有。最后遗存的圣包皮在1983年被人从意大利小村庄卡尔卡塔偷走了。

传说法国皇室经由查理曼大帝继承了拿撒勒的耶稣的血脉，因此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此，基督的最后一位皇室后裔是路易十六。可以说，路易斯的包皮在法国大革命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众所周知，他死于这场革命。路易斯还很可能患有包茎。

1770年5月16日，年轻的法国王子路易斯·奥古斯特与奥地利公主玛丽·安托瓦内特结婚。两人都还是孩子，他15岁，她14岁。新婚之夜，王子很早就入睡，并且第二天一早就开始狩猎。他的祖父国王路易十五、皇室贵族和法国所有公民都在担心，年轻的路易斯的爱情生活似乎无法起步。玛丽·安托瓦内特美丽而且心甘情愿，但她嫁给了法

国王朝中唯一一个既不好色又不热血的路易斯。她的路易斯显然是一个无精打采、力不从心的男孩，看上去还没到青春期。有传言称，王子患有性功能障碍，无法进行性交，还有人猜测，可能需要一个简单的手术来解除障碍。路易斯结婚两个月后，他接受了杰曼·皮绍·德·拉马蒂尼尔医生的检查，没有发现任何需要手术的异常情况。

两年后，年轻的路易斯仍然没能履行他的婚姻义务，他的祖父便召见他，亲自检查他的私处。路易斯解释说，性交时的疼痛让他不敢进行下去。国王的观察证实了他所怀疑的阴茎异常，但没有进一步检查，而是为他的孙子推荐了约瑟夫·马里·弗朗索瓦·德·拉索医生。拉索在1773年检查了路易斯的身体并发表了一份官方声明，称路易斯的性器官发育得很好。他得出的结论是，王子的性无能是这对年轻夫妇的无知和尴尬引起的。然而，人们普遍认为，路易斯的包皮过紧，抑制了他的性欲。

1774年，老国王去世，性无能的王子成为路易十六国王，这使问题变得更加紧迫。年轻的皇室夫妇不存在的性生活成了公共事务，在宫廷和城市中被议论纷纷。法国的街头巷尾充斥着假定国王存在包茎的诗作、笑话和歌曲。1776年1月15日，路易十六终于在巴黎主宫医院咨询了一位外科医生雅克·路易·莫罗。玛丽·安托瓦内特后来写信告诉她的母亲，外科医生给出了与其他所有医生一样的建议：不需要手术，问题会自行解决。路易斯不得不继续尝试。

莫罗是对的，正如他的同事拉索也是这样建议的。我们现在知道，幼年时的包茎往往因自发的夜间勃起和性活动而自愈，只在最严重的情况下需要手术。不幸的是，没有资料显示这位18世纪医生的调查细节，但是国王亲自去医院咨询外科医生，而不是把医生叫到家里，这一事实表明他的问题比较严重，他的包皮可能至少有一点收缩。但路易斯似乎什么也没做。

1777年，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弟弟带着他的随从前来探望。显然

他与他的姐夫进行了长谈，并让拉索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这次没有官方报告，但确实产生了结果。几周之后，同年的8月，路易斯和玛丽·安托瓦内特得到了满足。这一次，似乎奏效了。拉索医生受命正式确认：7年后，这场婚姻终于被事实上履行，皇室的床上活动持续了1个小时15分钟。玛丽·安托瓦内特写信告诉她的母亲，这给了她巨大的快乐。第二年，她怀孕了，1778年12月19日，她生下了他们的女儿玛丽·特蕾莎。

将这个故事与亚伯拉罕的故事进行比较很是有趣，没有官方证据证明路易斯进行过割礼或任何其他手术，但是，拉索医生是治疗包茎方面的外科专家，这或许并非巧合。他甚至开发了自己的术式，但直到很久以后的1786年，他才对此进行了描述。这种术式干预最小，只在包皮上做出一些浅的划痕，而不是完全切开它，让它可以更容易地从龟头上拉下来。通过这种方式，包皮完全保持完整而不会变形。拉索是否有可能在路易斯身上进行了这项小手术呢？

因为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突然怀孕没有明确的外科解释，法国人民很可能认为她犯了通奸罪。后来，这对皇室夫妇也很少同床睡觉，玛丽·安托瓦内特也被目睹与其他男人在一起。不久，法国大革命爆发，路易斯和他的妻子被俘。1793年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成为历史。他们总共有4个孩子，其中只有最年长的玛丽·特蕾莎在革命中幸存下来。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2006年，大约有6.65亿男人和男孩曾接受包皮环切术。虽然单个包皮仅重几克，但这意味着每年会切掉数百吨的包皮。据估计，世界上目前人口的30%已接受过包皮环切术。毫无疑问，包皮环切术不仅是现在，而且是有史以来最为广泛执行的手术。

历史上，包皮可能被认为是不卫生的。在阿拉伯语中，割礼的字面意思是“清洁”。然而在现代，去除包皮从医学角度来看没有任何明确的益处。而且，虽然在如今的手术条件下，并发症已经很罕见，但

仍然有可能出现严重的出血和感染，甚至危及生命。从外科角度来看，对儿童进行这种多余的操作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些儿童无法自行决定是否要永久去除自己的包皮。

对于像亚伯拉罕和路易十六这样真正患有包茎的男人和男孩，实际上也没有必要行完全包皮环切术。对儿童来说，包茎常常能够自愈，或者可用药膏治疗。如果无效，可以采用比包皮环切术侵入性更小的手术。对于成年人来说，也有各种方法可以保持包皮的功能完整，就像拉索设计的手术一样。

4　休克

女士和无政府主义者：茜茜皇后

医学术语中，“休克”意味着血液循环系统的衰竭。恒定的血液流动对我们身体中的每个器官都至关重要，这需要足够的血压来保证。如果我们的血压降得太低，器官得不到足够的氧气，就会发生休克，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当血液供应不足时，每种器官可耐受的时间是不同的。大脑和肾脏将首先衰竭，于是我们的意识减弱，尿液停止产生，随后衰竭的是肠道、肺、肝脏和心脏。因此，持续过久的休克状态会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MOF）。要了解休克的机制，首先要知道，我们体内的动脉壁包含小肌肉，能使血管扩张或收缩。这在医学上称为血管扩张和血管收缩，是我们身体调节血压的一种方式。心脏也可以通过加快和减慢跳动，以及加强心肌收缩来调节血压。

循环系统包括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心脏、血液和血管。循环系统衰竭可能由这三个部分中的任何一个引起，导致不同类型的休克。首先，心源性休克（由心脏原因引起的休克）可由心脏病发作、心脏瓣膜病或心脏外伤引起。其次，低血容量性休克（血容量过少），是因外周系统的血容量不足引起的，如脱水或失血。在这两种情况下，血管都会收缩来升高血压。此种反射由血管中的神经和肾上腺释放肾上腺素触发。与之相反，第三种休克（感染性休克）中，有毒物质使血管麻痹，血管壁受损，因而血管过度扩张。这导致血压下降，血压调节系统失调，液体渗漏到周围组织。能够引起感染性休克的有毒物质主要来自细菌或死亡的组织，如烧伤、坏疽、败血症。

手术可能引起以上3种休克：由于心脏负荷过重导致的心源性休

克、由于失血引起的低血容量性休克，或由于组织损伤和感染引起的感染性休克。有时手术可以治疗休克，例如，阻止大量失血，从感染部位引流脓液，或切除死亡及受损的组织。在本章中，我们将讲述一位杰出女性的休克案例，很不幸，结局是悲惨的。

1898年9月10日，一位名叫路易吉·卢切尼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袭击了奥地利皇后伊丽莎白，她更为人熟知的称号是“茜茜皇后”。他将一个小小的三角形锉刀刺入她的胸部。但是当这位60岁的皇后再次站起来，整理好自己的帽子，平静地继续前行时，他一定目瞪口呆。直到后来两名警察逮捕他时，他才知道自己已经行刺成功。

卢切尼在证词中声称，他的主要目标是杀死一个皇室成员，无论是谁。几天前，“狗仔队”在日内瓦湖畔的博里瓦奇酒店发现了他的受害者，而卢切尼在报纸上读到了那篇文章。从很多方面来看，茜茜皇后都可以说是她那个时代的戴安娜王妃。与戴安娜王妃一样，她的死亡也是由“狗仔队”间接造成的。而且，她还是一位公主，嫁给了一个重要国家的英俊王子，就像童话故事一样。1854年，16岁的她与23岁的皇帝弗朗兹·约瑟夫结婚后，便成了强大的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后和女王，领地从俄罗斯延伸到米兰，从波兰延伸到土耳其。20世纪50年代，随着《茜茜公主》这部电影的发行，美丽的奥地利皇后伊丽莎白的人气再次飙升，片中她的扮演者是美丽的罗密·施耐德。然而，真正的茜茜公主的生活远不如电影里所描绘的那般富有童话色彩。她患有饮食障碍，我们现在称之为神经性厌食症。在年轻时，她体重只有46千克。此外，她总是穿着紧身胸衣来保护她的蜂腰，她的腰围不到50厘米——相当于直径只有16厘米！那天，当她离开在日内瓦下榻的酒店，准备乘汽船前往蒙特勒时，她正穿着一套紧身胸衣。

她的侍女，当时陪同她的女伯爵厄玛·斯塔瑞后来说，当她们沿着海滨散步时，皇后殿下突然被一名男子撞倒在地。但她很快站起来，说她没事，命令继续前行以免错过登船。一登上船，她就变得脸色苍白，昏了过去，但马上又醒了过来，并问发生了什么。当时船已经驶

到了开阔水域，船长被命令掉头。为了减轻女主人的痛苦，侍女解开了伊丽莎白的紧身胸衣，这时皇后再次昏倒了。此时，女伯爵才在垂死的皇后的内衣上发现了一摊银币大小的血迹。船靠了岸，船员们用两把桨做成的临时担架，将可能已经死亡的伊丽莎白抬回了酒店。在酒店，一位医生切开她手臂上的动脉，但没有血液流出来，这证实了皇后的死亡，当时是下午2点10分。

尸检发现皇后的左侧第四肋骨附近有8.5厘米深的刺伤，穿透了肺部并横贯整个心脏，引起内出血。为什么心脏受了如此重伤的人还要坐船去蒙特勒？

我们的身体拥有许多调节和储备系统，以便对严重问题做出紧急反应。60岁的伊丽莎白，在被刺破心脏的情况下还能存活这么久，这首先是她身体健康的一个信号。茜茜皇后是一个健康的女人，她没有超重，在山上长大，从不吸烟，一生之中都在骑马。这种健康状况解释了为什么在受到袭击时，她体内的所有器官和系统都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事件发生时，伊丽莎白当然受到了惊吓，而且她害怕错过这条船。这种激动状态刺激了她的交感神经系统，立即使她的身体警觉起来。她的心跳加快，肌肉血流量增加，肾上腺（adrenal glands）被激活，释放肾上腺素进入血液。“adrenal”得名于这两个小腺体的位置：每个肾脏（拉丁语“ren”）的顶部（拉丁语“ad”）。高浓度的肾上腺素流经她的血液，加强了交感神经系统的作用，这给了她足够的能量赶上登船。

茜茜皇后直到上船后才晕倒。这是由休克引起的，也就是血压突然下降。第一个受低血压影响的器官就是需氧量最大的器官——大脑。这就是为什么意识减弱——晕倒——往往是休克的第一个征象。血压下降可能是由心脏血液流失造成的——换句话说，出血导致了低血容量性休克——但这不太可能。毕竟，心脏破裂的内出血非常严

重，伊丽莎白不可能还能行走上百米。因此，血液的流失一定受到了某些因素的限制，休克是由其他原因引起的。

茜茜皇后实际上发生了心脏压塞。“压塞”一词来自法语tamponner，意思是“夯实”或“堵塞”。心脏压塞发生时，从心脏伤口流出的血液积聚于心包，即围绕心脏的坚硬囊性结构。由于路易吉的锉刀相当薄，心包上的洞太小，血液不容易流出。因此，最初血液的流失是受限的，但随着血液在心脏周围聚集，心脏的空间越来越小，而且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这种情况下，少量的血液流失也可能对心脏功能产生严重影响。

因此，休克最初是由心脏活动受限引起的，而不是失血。活动受限使心脏无法正常搏动，因此茜茜皇后第一次出现的是心源性休克。由于心脏功能降低，血压下降，低血压被身体的各个部位所感知。颈部两侧动脉都有感受器，将低血压的信息传递到脑干，在那里，交感神经系统被激活，使整个身体的血管收缩以增加血压。肾脏也感受到低血压，并暂时保持体内的液体储备。如果你有机会问伊丽莎白，她肯定会说自己非常口渴。

侍女的报告说，茜茜皇后的脸色变得非常苍白。正常皮肤的粉红色是由血液流动引起的。如果皮肤由粉红色变得苍白，可能是由于严重的血液流失导致的贫血。但是血管的收缩也会减少皮肤中的血液流动，因此她晕倒时的苍白与心源性休克的解释一致。血管收缩也可以让人因为惊吓而变得苍白，当时侍女的脸色看起来可能和她的皇后一样苍白。

心脏压塞以两种方式降低心脏的功能。心脏是一块空心肌肉，扩张时使其内部充满血液，然后再收缩以泵出血液。在心脏压塞的情况下，心肌仍然可以将血液泵出，但由于心包的压力而不能充分地再次充盈。因此在下一次搏动时，泵出的血液就会减少。另外，心肌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心脏的充盈程度。因此心脏压塞不仅使心脏搏

动频率降低，还减弱了搏动强度。

伊丽莎白在船上晕倒。但很快，她又在侍女的怀抱中醒来。这是因为，晕倒之后，她平躺在地上，这使得从腿部及腹部回流到心脏的血液增加，因为血液不再需要对抗重力向上流动。结果，茜茜皇后的心脏充盈量增加，从而泵出更多血液，最重要的是搏动的力量加强了。几分钟过去了，可以假设，在此期间，大量的血液通过心包中的小孔流入了胸腔，后来的尸检也证实了这一点。那么茜茜皇后怎么可能还活着并和她的侍女交谈呢？

这个医疗谜题的答案可能是她的紧身胸衣。因为她的腹部和骨盆被紧身胸衣压缩，所以上半身的血液比正常情况更多。当侍女松开紧身胸衣时，这些血液储备得以再一次流过伊丽莎白的整个身体，使心脏周围留下相对较少的血液。

因此，在紧身胸衣被打开之后，心脏不再能够充分充盈，她的身体已经没有可供使用的紧急计划。血管已经尽可能地收缩，心跳已达到最大速度，从伊丽莎白的年龄推断，大约是每分钟160次。她也可能遭到最后一场灾难的打击。由于休克，她的心脏本身可能已经氧气不足，心肌的电路会首先发现这个问题。通常，电路确保心跳的规律和协调，以便心脏能发挥最佳作用，但缺氧会导致电路发生致命的错误。伊丽莎白的心脏会开始纤颤，混乱地收缩却达不到任何效果，最终导致她的死亡。

如果伊丽莎白能够被送到医院而不是待在船上，也很难说他们是否能抓住机会手术。全球著名的外科医生，掌握着维也纳学术话语权的西奥多·比尔罗特教授，于1894年去世，但他的言论仍被视为外科学的“金标准”。他对心脏手术的看法一直非常坚定，尽管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他的观点，但教授的学术权威仍在引领心脏外科学：“任何一个试图进行心脏手术的外科医生将得不到同事们的尊重。”比尔罗特去世后仅仅2年，外科医生路德维希·雷恩就首次尝试对心脏上的刺伤

进行缝合。虽然这位被剑刺穿心脏的患者在术后活了下来，但是距离外科医生开始实践心脏外科手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专业化

如果你告诉别人你是一名外科医生，他们通常会问："哪种外科医生?"许多人似乎并不知道，外科医生本身就是一种职业，因此你可以成为一名普通外科医生。医学专业可以分为内科学（"不开刀"的职业）——包括内科、儿科、神经病学、精神病学和病理学，以及外科学（"开刀"的职业）。数个世纪以来，外科医生们把自己的工作范围扩展到外科的各个领域，但到了20世纪，许多专业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妇科医生对女性生殖器官进行手术，泌尿科医生对肾脏、泌尿道和男性生殖器官进行手术。美容外科、重建外科、显微外科和手外科的手术都由整形外科医生进行。神经外科医生对大脑、脊柱和神经进行手术。骨科医生专注于肌肉骨骼系统，而耳鼻喉科医生的工作范围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余的可以按照主题横向分类，也可以按照器官系统垂直分类。横向分类，有创伤学（事故后手术）、肿瘤外科（癌症手术）和小儿外科（儿童手术）。垂直分类，有心外科（心脏）、胸外科（肺）、血管外科（血管）、胃肠或腹部外科（腹部器官）。普通外科仍然包括以下5项内容：创伤学、肿瘤外科、胸外科、胃肠或腹部外科以及血管外科。小儿外科和心外科是分开的专业。在有的国家，乳腺癌不是普通外科而是妇科医生的治疗领域，创伤则由骨科医生治疗。在普通外科领域也有许多"亚专科"，包括头颈外科、移植外科和减肥外科等。

今天，由于外科学新分支的突飞猛进，伊丽莎白将有更大的机会从心脏刺伤中幸存下来。她遭到袭击的地方——勃朗峰码头，到如今的日内瓦大学医院仅有2.5千米，救护车可在10分钟内到达现场。然而，想要取得良好的结果，码头或栈桥上的旁观者必须立即对她进行治疗。侍女必须在茜茜皇后的紧身胸衣被打开而晕倒后立刻开始心肺

复苏。胸骨有节奏的上下运动将使整个胸部变成一个大的泵，这将使伊丽莎白的血压保持在一个安全水平。心肺复苏是非常累人的，侍女苍白的脸很快就会变成猩红色，其他人需要接替她，直至救护车到达。之后，救护人员需要立即将呼吸管插入气管，将针插入静脉，把液体直接输入血管——这是治疗休克最有效的方法。如果心脏发生纤颤，他们会使用除颤器进行电击使心跳恢复正常。他们还会通过静脉注射给予肾上腺素，通过呼吸管给予氧气，做好将皇后运送到医院的准备。与此同时，医院里会组建一个手术团队，手术室中准备好心肺机。等她上了手术台，她的胸骨将被垂直锯开以便在开放的胸腔中连接心肺机的输入和输出管，机器将掌管她心脏的泵动功能和肺的呼吸功能。外科医生会将冰水倒入她的胸腔，使她的心脏停止跳动并冷却，然后开始手术。但当时是1898年，这所有的一切在遥远的未来才能实现。

茜茜皇后是“行动宣传”的受害者，这是一种与无政府主义有关的奇异哲学。在这方面，她不是唯一一个受害者：1881——1913年有一系列公众人物——包括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一世、法国总统萨迪卡诺、希腊国王乔治一世和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均被无政府主义者暗杀。路易吉·卢切尼被判无期徒刑后于1910年在牢房中自杀。他的头被保留下来用于科学研究。直到2000年，人们认为这个无赖的头没有什么科学价值，它才被埋葬在维也纳中央公墓，贝多芬和比尔罗特也在那里安息。按照已故皇族和皇家哈布斯堡的习惯，茜茜皇后的尸体埋葬在维也纳的卡普钦地穴。然而，不同于她姻亲家族的已故成员，她的肠子没有被单独埋在圣斯蒂芬大教堂的地穴里，她穿了孔的心脏没有被放在奥古斯丁教堂的银色高脚杯中。我们可以在霍夫堡宫殿群的茜茜博物馆见到路易吉的锉刀，那件衣服——带有锉刀造成的孔——在布达佩斯的国家博物馆展出，但不包括紧身胸衣。

5　肥胖

教皇：从彼得到方济各

纵观罗马天主教有史以来305位教皇及对立教皇的长名单，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显著的医学结论：他们被授予圣职后的5年生存率仅有54%，其中1/5的人甚至没能活过第一年。因此，被选为教皇的预后情况相当严峻。不过有些人在担任此高职时已是高龄，所以他们没能做得长久倒也不奇怪。克莱门特十二世是年纪最大的，他在1730年当选，当时已经79岁。但他也只当了10年教皇，没能活到90岁。1975年，教皇保罗六世规定红衣主教可以当选为教皇的最高年龄为80岁。本笃十六世在2005年当选时，比这个年龄上限只小2岁。

在过去，教皇常见的死因是流行于罗马周围沼泽地区的疟疾。疟疾主要发生在那些非意大利本地的人身上，他们不习惯当地的气候和肆虐其中的蚊子。教皇的死亡常常秘而不宣——不仅仅是在遥远的过去。1978年，57岁的教皇约翰·保罗一世在他当选仅33天后去世，其细节至今仍然笼罩在神秘之中。一天早上他被发现死在床上，当时他作为一位教皇还相当年轻。由于没有进行过验尸，各种指控在意大利和梵蒂冈的金融业界来回传播。只有9位教皇在位时间比他更短：西辛尼乌斯死于708年，在位20天；戴多禄二世死于897年，在位3个星期；利奥五世死于903年，在位整整1个月；塞莱斯汀四世死于1241年，仅在位17天；庇护三世死于1503年，在位26天；马塞勒斯二世死于1555年，在位22天；乌尔班七世死于1590年，在位12天；利奥十一世死于1605年，在位27天。动荡的9世纪，教皇博尼费斯六世在上任仅仅15天后死亡，死因据称是“痛风发作”，但他可能是被他的继任者斯蒂芬六世所毒害，这位恶毒的教皇于896年挖出了博尼费斯的尸体，对其进行审判。最后要提到的是，在752年，斯蒂芬二世甚至

没能赶上授任，在当选后3天就去世了。唯一当选过教皇的英国人阿德里安四世，在上任5年内去世，于1159年被葡萄酒中的苍蝇呛死。与他同名的来自乌得勒支的阿德里安六世——罗马天主教历史上唯一的荷兰教皇——在罗马活了12个月，死于1523年。

从外科学的角度来看，一些教皇的病史值得一提。1404年，博尼费斯九世在发病两天后死亡，死因据称是可能位于胆囊的结石；亚历山大八世于1691年被腿部坏疽夺去了生命；拿破仑·波拿巴时期不幸成为教皇的庇护七世，在卧室摔倒导致髋部骨折，45天后死亡；20世纪末，保罗六世在梵蒂冈的公寓里，秘密进行了经尿道前列腺手术，专门为这次手术购买的设备后来被捐赠给发展中国家的传教医院；2009年，本笃十六世在度假时摔断了手腕，但可以用简单的石膏固定治疗，他后来又进行了两次小手术，植入心脏起搏器来纠正心律失常；豪尔赫·贝尔格里奥，即现任教皇方济各，在21岁时切除了右肺上叶治疗支气管扩张，也就是肺炎引起的肺组织中气道扩张。

还有一位教皇本人也是外科医生。教皇约翰二十一世在他的祖国葡萄牙担任医学教授，之后于1276年当选为教皇。在那之后，他也一直作为外科医生而活跃。在任职期间，他继续在意大利学习哲学和医学。他写了一本关于医学和外科学的书，这是一部标准的中世纪作品，却戏剧性地命名为《穷人的宝箱》（*Thesaurus Pauperum*）。它是一种历书，旨在使普通民众获得医疗保健方面的知识，这样他们也可以从中受益（当然，前提是他们能读懂）。数个世纪以来，医生们急切地保护自己的知识，担心患者不再为他们的服务付钱。也许是怕留下把柄，因为这些知识实际上并没什么了不起，教皇的这本书主要是广泛收集家庭疗法和迷信的无稽之谈。书中写了针对各种症状的治疗方法、外科手术和制备药物的配方。他甚至描述了几种避孕方法和堕胎的方法。任何声称避孕和堕胎都与梵蒂冈主流观点不相容的人，都应该看看教皇约翰二十一世的这本书。

但不是所有在旧书中找到的东西都能完全相信。作为一名真正的

中世纪教授，他必然熟悉炼金术，也一定摆弄过蒸馏器和占星盘。在13世纪，这尤其引发人们怀疑。大家认为约翰表里不一，谣言盛传这个奇怪的（外国）教授实际上是一个魔法师。人们说他将受到上帝不可挽回的惩罚，1277年的春天，他工作室的天花板突然掉落砸在了他的头上。据说，当他倒在那里，被埋在碎石和成堆的沉重手稿下时，他只是喃喃自语："我的书！谁来完成我的书呢？"人们一致认为，这是他玩弄黑魔法所应得的惩罚，6天之后，他最终重伤不治。

手术与肥胖

减肥手术是与肥胖有关的胃肠手术分支。"bariatric"这个词来自希腊语"baros"（体重）和"iater"（医生）。它是一种功能性手术，有两种手术方式。第一种是减少胃的容积，使患者进食减少。这可以通过胃旁路手术、胃束带术或袖状胃切除术来实现。第二种是肠旁路手术，减少肠道的功能，从而消化更少食物。两种方法还可以结合。自1969年以来开展的胃旁路手术是减少胃容积最有效的手术。我们现在知道，这些手术可治疗的不仅是肥胖症。它们还用于治疗II型糖尿病、阻塞型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SAS）、高血压和高胆固醇血症。肥胖是所有手术的风险因素，患者体重越重，可能发生的并发症越多。由此可以预想，相对于其他手术，减肥手术的并发症发生率更高。然而，自从引入腹腔镜（微创）手术以来，它变得相当安全。减肥手术并不奢侈——肥胖对患者的健康构成严重威胁，而迄今为止，减肥手术是唯一治疗肥胖的方法，能够使患者对持续减肥抱有较高的期望。

数个世纪以来，教皇们的共同特点是贪食。据称，1285年教皇马丁四世在博尔塞纳湖上因暴食用牛奶喂养的鳗鱼而死亡。教皇英诺森八世也很胖，常常一整天都在睡觉。除此之外，他也不是一个可爱的人。他发起了恐怖的捕杀女巫行动，导致数千名无辜的妇女被活活烧死。他最终变得十分肥胖，以至于再也无法移动，不得不由年轻女性

母乳喂养。可以想象，提出这个建议的医生很容易在教廷中保留自己的职位。出于一些不可理解的原因，为了延长这位教皇的生命，人们决定为他进行输血。3个健康年轻的罗马男孩为了1达克特金币献出了血液，但最终无济于事。教皇和他的3个献血者都死了，传说那几枚硬币是从年轻人紧攥的拳头中抠出来的。

当年的输血是不是如今天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已无法得知。也许他们只是让教皇喝血，男孩们失血致死，然后患者也不治身亡。但即使是静脉对静脉输血，也很容易解释这4个人的死亡。毕竟，直到400多年后的1900年，卡尔·兰德施泰纳才发现血型。英诺森是罕见的AB型阳性血的概率很小，这种血型能在血型不合时起到保护作用，而3个年轻人都是O型阴性血的概率更小，这种情况下无论教皇是什么血型，都能成功使用他们的血液。

从宗教角度来看，肥胖、白天入睡以及不合宜的情绪是七宗罪中的3种——贪食（gula）、懒惰（acedia）和愤怒（ira）的组合。但从医学角度看来，它们可以兼容于一体，即阻塞型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SAS）。这是一种主要由肥胖引起的昏睡病，表现为夜间呼吸在短时间内反复停止（呼吸暂停），通常伴随着打鼾。由于这种夜间休息的中断，患者无法进入深度睡眠必需的快速眼动睡眠（REM）阶段，使得他们在白天昏昏欲睡、脾气暴躁、无精打采。患者还经常感到饥饿，更加剧了他们的肥胖和睡眠问题。查尔斯·狄更斯在1837年的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中描写了一个具有上述症状的角色。因此，OSAS有时也被称为匹克威克综合征。

如今，OSAS可以通过腹腔镜胃旁路术进行有效治疗，这是一种缩胃手术，可以打破嗜睡、肥胖和失眠的恶性循环。对于英诺森八世来说，这项手术可能起很大的作用，因为一个健康、满足和成功的世界领导者正是医生在那些黑暗时代所要求的。如果英诺森八世确实患有OSAS，他的死必须被视为真正的医疗失败。阻塞型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可导致长期缺氧，刺激红细胞的产生，这导致血液中红

细胞水平过高，而不是贫血，这意味着绝对不应该给患者输血。无论真正的原因是什么，1492年英诺森的死亡都标志着黑暗的中世纪的终结。

与英诺森八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孙子乔凡尼·迪·比奇·德·美第奇，佛罗伦萨的贵族，代表了教皇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刻。乔凡尼，即教皇利奥十世，据说在37岁当选时曾说："既然上帝赐予我们罗马教皇，那么让我们享受它。"在任的7年间，他成功地赚了500万达克特（相当于现在的数亿欧元）。他通过向穷困的罪犯兜售赎罪券以及拍卖牧师职位积累财富，并将其用于狂欢、派对、艺术和奢华的生活方式上。

尤利乌斯三世是最无耻的贪吃教皇之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出现了吞咽问题。最终他根本无法进食，终于在1555年饿死了。这些症状与胃癌或食管癌非常相似，食道与胃相连部位的恶性肿瘤具有典型症状，预后严峻。主要问题是吞咽困难，即使在肿瘤生长得不大时，也会导致吞咽固体食物困难，特别是肉类等难以咀嚼的食物。患者会逐渐"害怕吃肉"（horror carnis）。食物卡在食道中，导致患者口臭（foetor ex ore），吞咽变得越来越困难，并且在几个月之内发展为只能摄取液体食物。快速生长的恶性肿瘤所需的能量增加，急剧消耗体内储备的蛋白质和脂肪。当需要更多营养时，患者却再也无法进食，逐渐消瘦，并发展成恶病质——严重的营养不良——最终导致死亡。

400年后，安吉洛·朗卡利成为善良和广受喜爱的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他在20世纪60年代通过召开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引导天主教会与时俱进。他也严重超重。大选之后，当他该在圣彼得大教堂的阳台露面时，他却找不到穿得下的衣服，因此，他不得不穿着背部开口的长袍。广场上欢呼的人群没有注意到任何异常。这位教皇也死于胃癌。

除非到了后期，胃的肿瘤通常不会引起吞咽问题，因为食道不会受到影响。但是“害怕吃肉”，通常是胃癌的首要症状之一。在胃中，肿瘤受到胃液的侵袭，这会导致溃疡，在上腹部产生疼痛。肿瘤上的溃疡可能会出血，慢性出血引起贫血或急性出血，导致呕血和黑便——肠道中的血使粪便变为黑色。

与食管癌患者一样，随着肿瘤变大，胃癌患者将越来越难以进食。未被消化的食物被吐出，最终导致致命的恶病质。教皇约翰二十三世没有撑到这个阶段。为了调查贫血症状，他接受了胃部X光检查，后被确诊为胃癌，这一诊断被保密了尽可能长的时间。超过200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主教参加了大公会议，约翰是众人关注的焦点，却也不断被疼痛和胃部疾患所困扰。他经历了多次胃出血并数次住院治疗。1963年，位于肿瘤上的溃疡蚀穿了他的胃壁，他死于胃穿孔，享年81岁。

如果胃部穿孔，胃内容物和胃酸将进入腹腔，患者会感到上腹部突发的剧烈疼痛，如同被刺伤。随后发生的腹膜炎可以危及生命，只能通过紧急手术治疗，必须修复胃部的穿孔或切除一部分胃，并用水彻底冲洗腹腔。不过，老教皇最后没有进行这项手术，无论从医学上或道德上看，这都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既然已经没有恢复的希望，那么何必让他因恶病质而惨死呢？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在胃穿孔引起腹膜炎后存活了9天。他的尸体被安放在圣彼得大教堂的祭坛上，在玻璃棺材中进行了防腐处理。

教皇约翰二十三世被他的继任者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封为圣徒。从外科学的角度讲，这位广受欢迎的波兰教皇是所有305名教皇中最有趣的，因为他经历了最多的手术。

6 造口

奇迹子弹：卡罗尔·沃伊蒂瓦

他是一位文化巨星，与他的意大利前辈们截然不同：他年轻，热衷运动，充满激情，聪明而进取。1981年5月13日，当他从腹部枪击中幸存下来时，他的声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他第二次被枪击，在童年时期，一个朋友不小心走了火，子弹与他擦肩而过。但这一次，他受了重伤。意大利的外科医生们救了他，他们不仅挽救了他的生命，而且努力使手术精益求精。

当天下午5点左右，卡罗尔·沃伊蒂瓦，即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站在一辆白色吉普车里面，穿过响起2万人欢呼声的圣彼得广场。人群中有两个带着枪和炸弹的土耳其人——穆罕穆德·阿里·阿加和奥勒尔·切里克。下午5点19分，23岁的阿加用他的9毫米口径勃朗宁手枪开了两枪。他击中了一名60岁美国人安·奥德尔的胸部，一名来自牙买加的21岁女子罗斯·希尔的左上臂，以及6米外60岁的教皇卡罗尔·约瑟夫·沃伊蒂瓦的腹部。这名土耳其人被人称“莱迪亚姐妹”的修女所制伏。切里克什么也没做。教皇专车穿过尖叫的人群疾驰出广场。受重伤的教皇被救护车送到5000米外的吉米恩医院，这是城里最近的大学医院。抵达后，他没有被送去急诊室，而是被带到了10楼的教皇套房。

当值外科医生乔瓦尼·萨尔加雷洛在教皇的肚脐左侧发现了一个小的枪伤，右侧上臂和左手食指处还有其他伤口。这名患者在短时间内仍然有意识，不过已经有人在进行临终祈祷。当教皇失去意识，进入休克状态后，他就被转移到了手术室。下午6点04分，在被枪击45分钟后，全身麻醉开始了。麻醉师通过口腔插入呼吸管（插管）时，意外地折断了教皇的一颗牙齿。萨尔加雷洛对其腹部进行了消毒，并用无菌布覆盖了周围区域。他拿起手术刀，正准备开始手术时，他的老

板弗朗西斯科·克鲁西蒂冲进了手术室。克鲁西蒂在他的私人诊所一听到这个消息，就马上开车往医院飞驰，以便能够赶到手术室亲自进行手术。

根据外科医生提供给意大利媒体的简单信息，再加上一点想象，我们可以推测手术是怎样进行的。克鲁西蒂和萨尔加雷洛沿着教皇腹部的中心线从上到下做了一个长切口。当腹膜，也就是覆盖在腹腔内侧的膜，被打开时，血液突然涌出。教皇的血压已经远远低于正常的13.3/9.3千帕（100/70毫米汞柱）。医生用手舀出最大的血块，用吸引器吸出血液，并用纱布对出血伤口施加压力。据后来估计，教皇失血量为3升，但在手术过程中，他至少输入了10个单位的A型阴性血，这意味着他的失血量远大于3升。腹腔中不仅有血液，还有粪便。医生用手在整个肠道摸索，在小肠和肠系膜（将小肠连接到腹部后侧的结构）上发现了5个小孔。然后他们将夹子夹在容易找到的所有出血伤口上，但腹腔还是不停充血，出血似乎来自下方。他们将手术台倾斜，使教皇头朝下躺着。医生们用4只手，尽可能地向上推动肠管，这样他们就可以看到腹腔的底部，这里可以找到通向下肢的大血管。由于出血，医生们看不清楚它们是否受损，但在更深处，克鲁西蒂在“圣骨”（或称骶骨，脊柱底部的三角形骨）上摸到一个像手指一样粗的洞。他用手按住它，最严重的出血似乎停止了。

克鲁西蒂用无菌蜡填在这个洞里以便检查周围的区域。进出左腿的大血管紧挨着洞，但没有受损，这是一个好兆头，手术台周围的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出血似乎得到了控制。

这是一个与手术台前的麻醉团队商量的好时机，他们也一直很忙。失去的血液不断被补液和输血补充，教皇的血压和心脏活动被密切监测。一切都似乎或多或少得到了控制，患者暂时脱离了危险。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通常，外科医生会再次检查腹腔，制订计划，开始工作。首先，他们将依次从出血的伤口上取下夹子，用

可吸收的缝合线将它们缝合。手术助理对所有夹子进行计数，以确保不会遗留任何东西。其次，医生从腹腔依次取出纱布，检查出血是否已经停止。与此同时，一名护士对纱布进行计数和称重。

医生们检查了教皇腹壁的内部，弹孔位于左侧。他们首先检查了上腹部的器官——肝脏、横结肠、胃和脾脏——它们全部完好；其次他们检查了肾脏——也没有受伤；最后再检查整个肠道，包括几米长的小肠和大肠。在腹腔左下部，他们发现了乙状结肠（大肠的最后部分，以希腊字母sigma命名，因为它呈“S”形）上有一条长长的裂口。现在他们就可以完全重建创伤了。

到目前为止，他们发现的所有洞都符合一条简单的轨迹——从腹壁的左前方，穿过小肠和大肠的一部分，到后面的骶骨。子弹下一步去了哪里？有没有人在患者的背部看到一个弹孔？“该死，没有人检查过教皇的背部吗？”手术室里肯定有人这样喊叫，可现在为教皇翻身为时已晚。他们决定在手术结束时拍一张X光片，看看是否还有一颗子弹留在教皇的骶骨或臀部。

然后他们从骨盆中取出纱布，它们是干燥的。虽然骶骨上的洞紧挨着左髂动脉和静脉（进出左腿的大血管），但它们完好无损。左输尿管（从肾脏到膀胱输送尿液的管道）也完好无损，这真是幸运。现在，可以计划修复手术了。小肠上的洞不是大问题，医生决定切除两段肠管，从而建立两个新的吻合口。回肠末端，即小肠最后一部分上的小孔，很容易修复，但大肠上的裂口就很复杂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小肠的内容物是液态的，由被消化的食物与来自胃、肝脏（胆）和胰腺的消化液混合而成，这些成分都能抑制细菌的生长。因此，小肠中的粪便相对容易处理，不会过度污染。小肠还具有良好的血液供应和被致密的结缔组织包裹的肌肉壁。相比之下，大肠中充满了细菌和固体粪便，薄薄的肠壁中血管也少。因此，大肠吻合口漏的可能性远大于小肠，而且后果更严重。

在正常情况下，大肠吻合口漏的风险已经相当高——约5%（1/20）。如果腹部发生感染（腹膜炎），这种风险还会更高。由于肠内容物已经泄漏到腹腔长达45分钟，术后沃伊蒂瓦很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这种高危手术的解决方案是做一个造口——腹壁上的开口，通过造口，肠内容物可以不经过肠道上的伤口而转移到体外。这就可以防止任何吻合口漏的发生。

外科学史上出现了使用造口的必要性。19世纪之前没有人敢切开腹部，但如果有人已经被其他人——例如用刀子或剑——切开了，那么外科医生就有机会尝试一下。即便患者死了，也没有人会责怪你。中世纪后期最著名的外科医生之一，德奥弗拉斯特·博姆巴斯茨·冯·霍恩海姆——他的化名帕拉塞尔苏斯更为出名——是第一个记录在伤口前的肠道上制作造口的人，这是给患者生存希望的唯一途径。造口的拉丁术语是“anus praeternaturalis”，字面意思是“超越自然的肛门”。造口各式各样：它们可以是暂时的（可逆）或永久的（不可逆），可以放在小肠（回肠造口）或大肠（结肠造口）上，可以有一个开口（末端造口）或两个（双筒造口）。

在约翰·保罗二世这个病例中，最安全的解决方案是法国人亨利·哈特曼在1921年设计的手术，现在称为哈特曼手术。病变的大肠末端部分（乙状结肠）被移除后，两个断端没有进行吻合，下面的断端直接关闭，上面的断端用于制作造口。这使得手术更为安全，因为它不涉及肠管的吻合，也就不可能发生吻合口漏。如果患者的腹腔发生感染（腹膜炎），可以先等感染痊愈，在第二次手术时再将肠管吻合。这意味着医生可以等到患者和他的腹腔处于最佳状态时再进行手术。因此，大肠吻合成功愈合的概率比在发炎的腹腔里时更高。这就是哈特曼手术最大的优点——通过将手术推迟到更有利的时刻，来减少大肠吻合口漏的风险。

不过，意大利外科医生还做了其他安排。他们没有切除受损的部位，而是缝合了大肠的裂口，并在裂口上游半米左右的大肠上做了一

个造口。与哈特曼手术相比，这个选择的优点是，第二次移除造口的手术更为简单。然而，它也存在缺点，他们得冒着将大肠缝合线留在有菌的腹腔内的风险。

当克鲁西蒂的老板——吉安卡洛·卡斯蒂利昂冲入手术室时，手术已进行了几个小时。他在米兰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登上飞往罗马的飞机，赶到吉米恩医院接手。卡斯蒂利昂、克鲁西蒂和萨尔加雷洛冲洗了教皇的腹腔，并插入了5根引流管——从腹部引流出液体的硅胶管或橡胶管。之后，他们关闭了腹腔，拍了X光片，结果显示没有子弹。后来，他们在教皇的臀部发现了一个出口伤，而子弹在教皇专车中被发现了。

当他们又处理好食指和上臂的伤口后，已经过去了5小时25分钟。当然，向新闻界发表讲话的并不是当时真正的英雄——萨尔加雷洛和克鲁西蒂，而是他们的老板卡斯蒂利昂。这个人有一种高度发达的戏剧感，言语中暗示教皇的幸存是一个奇迹，他说："你在一本解剖书里，找不到一个能让子弹穿过而不碰到重要器官的缝隙。"这当然是胡说八道。教皇的解剖结构完全正常，一共被打了6个洞的两根肠子，还有让他失血3升的大骨头，肯定都算是重要器官。卡斯蒂利昂想表达的是，如果子弹略微移向一侧，就会击中教皇的大血管。如果是这样，从枪击到手术之间45分钟的延误就着实太长了。教皇本人后来有意巩固这个神话。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子弹穿过他的下腹部时被"母亲的手"所引导，暗示圣母马利亚对此直接干预。

手术5天后，教皇在吉米恩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庆祝了他的61岁生日，然后于6月3日回到家中。但由于输血时感染了巨细胞病毒（CMV），而且手术留下的伤口也感染了，他于6月20日重新入院治疗。在进行有粪便进入腹腔的紧急手术之后，伤口感染并不罕见，这经常导致腹壁不能正常愈合，因此，疤痕会在很久以后破裂形成切口疝，需要再次进行手术，教皇也面临着这种境遇。不过他的腹膜炎迅速痊愈，而且他想尽快摆脱造口。8月5日，也就是枪击发生后不到10

周，克鲁西蒂进行了一次短短45分钟的手术，将大肠的两端吻合在一起。9天后，教皇再次回到了家里。

教皇专车配有防弹舱。阿加——后来声称自己是耶稣基督——在意大利的一所监狱度过了19年，教皇曾几次造访他。之后，阿加又在土耳其的监狱里度过了10年。他于2010年获释。由瑞士内衣制造商Hanro制造，约翰·保罗二世在枪击发生时所穿的血迹斑斑的白色T恤，被保存在罗马仁爱修女会的小教堂里。教皇为了向萨尔加雷洛及其同事们致敬，授予他们圣格雷戈里大勋章，这是梵蒂冈所能授予的最高荣誉。

手术团队

在手术过程中，现代手术室严格分为无菌区（清洁且完全无菌）和非无菌区（清洁但不完全无菌）。将患者要进行手术的部位用消毒剂清洁，其余部分用无菌纸单覆盖。手术室里的每个人都穿戴着干净的洗手服、帽子和口罩。手术由外科医生和一位助手完成，洗手护士作为手术助理向他们提供协助，负责器械和其他用到的材料。这3个人都是“无菌的”——他们穿戴着已经消毒过，并完全没有细菌的手术衣和手套。他们必须保持无菌状态，不接触无菌区外的任何东西。所有器械和其他材料，如用于缝合的线，也已经过消毒，只有这3个人才能触碰。第二个手术助理——被称为巡回护士或手术技师——不穿无菌服，用确保无菌的方式将材料提供给手术团队。巡回护士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计算手术过程中使用的纱布。在手术台头端的是麻醉师——负责麻醉管理的医生，以及1位助手。因此，每个患者需要6名医师，其中的3个人穿着无菌服（过去，外科医生也不能单独进行手术——他们需要4个助手来抓住患者的手臂和腿）。

1年后，约翰·保罗二世再次遭到袭击。一位心理失常的西班牙神父用刺刀轻伤了他。这位名叫胡安·玛利亚·费尔南德斯·克罗恩的神父在监狱度过了3年后，在比利时当了一名律师。

1984年起，卡罗尔·沃伊蒂瓦被发现定期在阿布鲁佐山区匿名滑雪。但从1991年起，他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他患上了帕金森病，还于1992年被诊断出患有大肠癌前息肉。肿瘤是在乙状结肠中发现的，恰好是阿加的子弹穿过大肠的部分。这两件事大概没什么关联，但如果医生在1981年进行了哈特曼手术，切除了大肠有裂口的部分，那么肿瘤就不可能在那里长出来。最终，这位老人的乙状结肠完全被切除了，当然，术后也恢复得很好。手术是由11年前同一位外科医生——弗朗西斯科·克鲁西蒂进行的。在手术过程中，教皇的胆囊也被摘除以缓解胆结石的问题。

1993年，卡罗尔·沃伊蒂瓦从楼梯上摔下来，肩膀脱臼。1994年，他在浴室里滑倒，摔断了髋部，通过手术置换了人工髋关节。1995年，菲律宾的基地组织计划对教皇进行第三次袭击，但被及时挫败了。1996年，他因疑似阑尾炎而接受手术。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年事已高，但仍保持了他的幽默感。在他的髋关节手术后不久，他从凳子上艰难地起身，因为疼痛僵硬得像一块木板，他顽皮而巧妙地引用了伽利略的话，嘟囔着：“Eppure，si muove！”——它确实在动！

媒体图文并茂地报道了年迈教皇的病情。2005年，由于咳嗽带来的呼吸困难，已经痴呆的老人接受了气管切开术，颈部插了呼吸管。一个月后，他死于泌尿道感染。毫无疑问，他经历了比历史上任何教皇都多的手术。他在2014年被封为圣徒。

他将射穿他腹部的子弹——据说被圣母马利亚的手引导而躲过他的大血管——捐赠给葡萄牙的圣母法蒂玛，以感谢这种偶然的干预。我们在雕像所戴的皇冠上可以看到它，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她的头顶。

7　骨折

德摩斯医生和希腊式方法：大流士国王

有史以来最激动人心的书籍之一——写于2400多年前的《历史》中，希罗多德讲述了一个已流传1个多世纪的故事。一位大约33岁的男人在狩猎时从马上摔下来，导致脚踝错位，他的脚就畸形地挂在腿下面。

书中关于事故原因的介绍很少，但写了很多随后发生的事情。一位医生将他的脚拉回原位，在医学术语中，这被称为复位。然而，这实在太疼了，男人要求另一位医生提供新的方案。后者的建议直接且简单——休息。显然，脚踝完全恢复了，因为在那之后他一场接着一场地打仗，直到最后在希腊马拉松附近的战斗中被击败。他就是波斯国王大流士，建造了世界上第一条柏油公路的人，也是波斯波利斯的创造者，他称自己为“国王之王”。

那个给他带来如此多痛苦的医生，是一位为国王服务的埃及医生。在当时，埃及人被认为是最好的医生。事实上，他的治疗并没有错，尽管大流士对此并不满意。如果不将扭曲的脚踝拉直，他就犯下了大错。移位的脚必须尽快与小腿重新对齐，否则，足部会因为供血过少而开始坏死。但是拉扯大流士脱臼的脚踝可需要勇气。毕竟，波斯的医生必须遵守1000年前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的法律，它们被称为《汉谟拉比法典》，后来被保存在一根超过两米高的黑色玄武岩石柱上，现在可以在巴黎的卢浮宫看到。

该法典基于贸易规则，外科医生须与其客户达成协议：如果治疗成功，则可收取费用；如果没有成功，医生什么都得不到；如果治疗出了问题，医生们也会像其他人一样被找来算账——以眼还眼，以牙

还牙。《汉谟拉比法典》第197条规定，如果一个人打断了另一个人的骨头，他也应该被打断骨头——除非被打断骨头的是奴隶。根据第199条，支付奴隶价值的一半就够了；或根据第198条，如果是自由奴隶，则支付1明那。第218条规定，如果患者死在外科医生手上，外科医生自己的双手就会被切断。为奴隶治病可能没那么赚钱，但安全得多。根据第219条，如果奴隶在治疗期间死亡，你可以用同等价值的奴隶代替他，同时保全自己的双手。

关于国王的医患关系，该法典并无阐述。但第202条规定，攻击级别及地位高于自己的人，应被当众用牛尾鞭子鞭打60次。当然，大流士国王凌驾于法律之上。他被脚上的疼痛所激怒，于是下令把他所有的埃及医生都钉死在十字架上。

嘱咐大流士休息的第二位医生正是克罗顿的德摩斯，他闻名于整个希腊，但当时是大流士的阶下囚。德摩斯一直是萨摩斯统治者波利克拉特斯的私人医生，但是和波利克拉特斯的随从们一起被捕。直到大流士迫切地需要另一位医生时，他才被注意到。

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德摩斯用希腊式方法治疗了大流士的脚踝，意思是“温柔的手”。在这位历史学家看来，好像德摩斯对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很有把握，而所有其他（非希腊）的医生都摸不着头脑。他的方法一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大流士完全恢复了，还送给他礼物，并任命他为波斯宫廷的奴隶。然而，德摩斯很可能只是检查了一下，并得出结论：脚已经归位（多亏了他的埃及同事）并且还没有坏死。他所要做的就是宽慰国王，让他休息——也就是说，要有耐心——让身体的自愈能力发挥其魔力。有时好的护理就是这么简单。

当然，这个故事很可能是假的。希罗多德完全有理由夸大希腊人和他们的治疗技巧。他本人就是希腊人，在他写这篇希腊奴隶拯救波斯国王的故事时，雅典刚刚在第二次波斯战争中被波斯人摧毁。大流士发动了第一次波斯战争，但在490年的马拉松战役中被击败。他的

儿子薛西斯随后发动了第二次对抗希腊的战役，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事行动，但这一次希腊人也没有屈服。尽管希罗多德尽最大努力对波斯人保持客观，但关于大流士脚踝的故事只能解释为两次波斯战争之后对希腊人的宣传。凭借今天的外科知识，很难相信这样一位重要历史人物的脚踝脱臼没有在记录中留下任何痕迹。我们治愈踝关节而不发生持续性功能障碍或慢性疼痛，需要很高的精确度，这在那个年代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

踝关节当中包含了距骨——足部最上方的骨头，它如同榫舌与小腿踝部的榫眼接合。踝部的榫眼是一个长方形的骨性凹穴，内侧和上侧由胫骨构成，外侧则由腓骨构成。两者的贴合十分紧密，如果脚踝受到创伤，只有在构成榫眼的骨头断裂时才会出现错位。如果断裂的骨头没能回到完全相同的位置——精确到毫米——距骨不再贴合于榫眼，就会造成磨损，进而导致退行性关节病变。这个问题在脚踝处尤为严重，因为踝关节在每一步都承受着身体的全部重量，跑步和跳跃时力量更大。因此，踝关节的严重骨折经常导致慢性功能障碍、疼痛和残疾。在大流士国王身上，这些似乎都没有发生过。

创伤学、外科和骨科

创伤学——治疗由事故引起的损伤和伤口——是一种典型的外科活动，它在战争中显得尤为重要。一位优秀的军队外科医生很受国王器重，因为士兵经过治疗可以再次投入战斗。在和平时期，创伤学的发展是由犯罪、交通事故和工作事故来推动的。固定骨折和护理开放性伤口是外科医生的工作，他们“使之愈合”——使人再次完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和平年代的创伤学工作是由理发师完成的。他们刚好有一把完美的治疗椅、一个洗手盆和干净的刀片。手术成功后，理发师会把溅了血的白色绷带挂在店外的棍子上，作为他的职业标志。这就是你今天仍然可以看到的，挂在理发店外红白相间柱子的起源。“骨科”（Orthopaedics）这个词最初与外科学毫无关系，也不涉

及用刀。这个词来自希腊语“orthos”（直）和“paidion”（孩子），意思是用支架和夹板来矫正儿童的骨骼畸形。如今的骨科医生治疗骨骼和关节的各种疾病，不仅限于儿童，也要使用手术刀。随着关节置换手术的出现，骨科已成为一门完全成熟的外科学。

1851年，荷兰军队外科医生安东尼乌斯·马蒂森发明了石膏模型；1895年，伦琴发现了X射线。1958年，瑞士AO基金会开发了一种全新的手术技术，在这之后，骨折的精确复位才成为可能，踝关节才有可能完全修复。今天，骨折的治疗几乎总是涉及手术，要用到X射线，以及将碎片用金属板和螺钉固定。这种方法被称为骨缝术，字面意思是“将骨头连接在一起”。将所有小块骨头准确地拼装到一起，再用螺钉固定，通常是一项非常烦琐的工作。在脚踝部手术里，从第一个切口到最后一次缝合，可能要用上整整1个小时。

如果大流士没有骨折，他的脚是否有可能在没有踝关节骨折的情况下移位？这样的话，他就只是发生了脱臼，通常被称为脱位。单纯的踝关节脱位极为罕见，这需要十分强壮的骨骼才能做到。然而，我们可以认为大流士并没有强壮的骨骼，这个结论可以从希罗多德本人进行的科学实验中得出——虽然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这位历史学家曾去过埃及旅游，参观过沙漠中的战场。大流士的前一任国王——疯狂的冈比西斯领导下的波斯人，和法老萨穆提克领导的埃及人在这里发生了第一场战斗。波斯人赢了，但双方均损失惨重。按照惯例，在战斗之后（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屠杀），尸体被分堆码放。希罗多德站立着，注视着一堆堆的骷髅，突然做出了破坏行为——向它们扔石头。他观察到，只用一块小石头就能在波斯人的头骨上打个洞，而即使用一块相当大的岩石也不容易打破埃及人的头骨。希罗多德将这种差异归因于太阳：埃及人赤裸的头一生都被太阳照射，而波斯人总是戴着帽子或撑着遮阳伞（太阳的照射确实能使骨头更为强壮，但不是希罗多德所想的原因，这种强壮来自阳光下合成的维生素D）。

如果我们可以检查大流士的骨骼，就可以测量他的骨强度。我们甚至可以找到踝关节骨折的痕迹——如果他有的话。正如皮肤上的伤口总会留下疤痕，骨骼的伤口——或者说骨折——在多年后仍会留下痕迹，至少在成年人身上如此。这是因为，骨头像皮肤一样也是活组织。

骨头由细胞组成，细胞由小血管供血，这些血管穿插于厚厚的钙化层，这就是骨折时会流血的原因。然而，钙会妨碍愈合的过程。破骨细胞（字面意思是“骨的破坏者”）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特殊细胞通过在骨折处两侧“吃掉”几毫米的骨组织来清除伤口周围的区域。在破骨细胞完成工作之后，轮到成骨细胞（骨的构建者）产生结缔组织以填补间隙。这个过程中，由于占用的空间会大于间隙，所以在骨折部位会形成肿块。这种肿块被称为骨痂，含有年轻的骨细胞，可使钙沉积，让新鲜的骨痂变得更强壮。骨痂需要大约2个月的时间才能完全连接骨折。然后幼骨逐渐成熟，直至最终结构与其他部位的骨骼没有差异。但是骨痂仍然会像疤痕一样留存下来。

很遗憾，我们不能对大流士进行验尸，看看他的脚踝是否有骨痂。波斯人确实采用了埃及人制作木乃伊的方法，大流士的坟墓也从现位于伊朗境内的岩石中被凿了出来，但他的木乃伊早已不在其中。在那天的狩猎中，他的脚究竟发生了什么，将永远是一个谜。

从德摩斯的命运中，希罗多德想告诉我们什么？他向我们证明了，不仅要有一双“温柔的手”，还要成为一个温柔的人，德摩斯与他的埃及同事表现出极大的团结，他说服大流士饶了他们的生命。他苦于乡愁，现在国王对他如此满意，他害怕将永远没有机会回到希腊。但是当阿托萨女王发生乳房脓肿，德摩斯成功地将其切开后，他请求国王允许他返回希腊。大流士让他参与了一部分间谍任务，为即将入侵希腊做准备，他被要求担任一群侦察员的指导和翻译。然而，德摩斯利用这个机会逃脱了。回到出生地克罗顿后，他娶了摔跤手米隆的女儿。他结束了从埃伊纳开始的辉煌职业生涯，当时他为国家服务，

每年领取60明那（1塔兰特）。后来在雅典，他的工资是100明那。一年后他又作为波利克拉特斯的私人医生，工资是120明那——如果你用面包的价格作为基准进行比较的话，这笔薪水大致与现代的外科医生的薪水相当。由于他职业生涯中的不幸变故，他又为大流士大帝工作。虽然他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医生，但在历史书中，他的光芒将完全被另一位希腊医生所掩盖，他也谈到了温柔的手和同事之间的团结，这位医生就是希波克拉底。

当然，《汉谟拉比法典》未能抵挡时间的蹂躏。汉谟拉比警告说，任何修改他法律的人都会遭受来自女神宁卡拉克的“无药可救的高烧和重伤”，并被最高神贝尔的无情诅咒打倒。尽管有这种警告，但“提供结果的义务”（不治愈就不付酬劳）已不复存在。在现代医疗法则中，患者不再是购买产品的客户。这已经转变为“尽最大努力的义务”（注意义务）。外科医生不再致力于取得成果，而是尽力去实现这一目标。这可以保护外科医生，因为有时这种成果是不可能达到的。在造成伤害的情况下，有罪责任的判定也会从结果转移到意图：尽力避免伤害患者的外科医生不应该因不良后果而被追责。

现代法律已经界定了用刀伤害他人的人和用手术刀治疗他人的外科医生之间的区别。能力和权限的概念决定了是否有罪。合格的外科医生是经过授权的，但只要他从事本职，他就必须通过积累经验、参加进修课程和追求良好结果来确保他的能力保持在最佳状态。

8　静脉曲张

露西和现代手术：阿法南方古猿

经过数十亿年的进化，我们身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宏观、细胞和分子水平上已经彼此密切相关。要理解它们，你需要了解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包括生物学、生物化学和遗传学。这些知识非常复杂，以至于人们容易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许多组成部分的工作其实非常简单。静脉中的静脉瓣可以防止血液反向流动，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们的工作原理解释起来可能有点难度，但是只要我们对重力和压力有些了解，就很容易明白。

在我们两条腿的内侧，各有一条位于皮肤下方的长静脉，从踝部走行至腹股沟，这就是大隐静脉（the great saphenous vein），简称GSV（其中一个词源为“saphon”，拉丁语中“电线”之意）。GSV与一些较小的静脉在腹股沟中形成一个短而弯曲的静脉段，类似于牧羊人的手杖，称为隐静脉弓。在隐静脉弓中，有一个小的瓣膜。这没什么不同寻常的，因为在这一水平以下的所有静脉都有瓣膜，以阻止血液在重力作用下向下反流。然而，奇怪的是，从腹股沟到心脏，隐静脉弓以上的静脉中一个瓣膜都没有。在白天，成年人隐静脉弓中这个小瓣膜必须抵抗50厘米液柱的压力。这比我们血管中任何其他瓣膜承受的压力都要大5倍。这个小瓣膜并不十分强壮，也不是生来就被设计为要承受如此高的压力。因此，隐静脉弓中的小瓣膜有时会发生故障，当它不能够再阻止血液回流时，血液开始“泄漏”，由此产生了静脉曲张。

静脉曲张是指皮下浅静脉异常扩张，血液向上流动太慢，或根本不流动，甚至向下反流。它不仅影响美观，还会引起周围皮肤的疼痛、瘙痒和湿疹等问题。静脉曲张通常从一个瓣膜的关闭不全开始，

大部分是隐静脉弓中的瓣膜，因为它承受的压力最大。如果该瓣膜失去功能，压力将下移至下一个瓣膜，在腿部大约向下10厘米的位置。这个瓣膜又要多承受10厘米液柱的压力。如果这个瓣膜也失效了，那么再下一个瓣膜就会受到更大的压力。像这样，压力逐渐上升，GSV将像一个细长的气球一样逐渐胀大。最终，所有的瓣膜都会关闭不全，正常情况下直径不超过半厘米的GSV会扩大形成静脉曲张，在某些地方可以长到如同一串葡萄的大小。

因此，静脉曲张的原因是隐静脉弓中的某个小瓣膜不能承担相应的职责，出于某种神秘的原因，它上方的大静脉中没有瓣膜。这里显然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答案非常简单。

为了找到答案，我们必须追溯到320万年前的25岁阿法南方古猿露西。露西以及与她同物种的其他成员，是我们最先用双腿走路的祖先之一。直立行走的露西，构成了现代外科手术根基的一半。1974年，古人类学家唐纳德·约翰松和汤姆·格雷在埃塞俄比亚发现了她的部分骨架。在他们挖掘时，收音机上正播放甲壳虫乐队的歌曲——《露西在缀满钻石的天空》（*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所以他们以这首歌的名字为她命名。目前，我们可以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国家博物馆中看到露西，而她的复制品可以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中找到。

让我们假设露西的母亲仍然用4条腿走路，那意味着腹股沟和心脏之间的大静脉中的液柱是水平的。由于水平液柱不产生压力，所以露西的祖先没有罹患静脉曲张。瓣膜在隐静脉弓“以上”的大静脉中没有存在的意义，原因很简单，它们实际上并不在隐静脉弓上面。

因此，静脉曲张与现代人类一样古老。最早关于静脉曲张的报道来自埃及，已有3500多年的历史。最早的插图可以追溯到雅典的黄金时代，而希波克拉底是第一个用绷带治疗静脉曲张的人。罗马的塞尔苏斯描述了通过做切口，用钝钩将曲张的静脉拉出来的手术。根据普

鲁塔克的说法，尤利乌斯·恺撒的叔叔盖伊斯·马里乌斯领事从这次手术受到的痛苦比疾病本身还要严重，并拒绝为他的第二条腿进行手术。普林尼告诉我们，这位硬汉政治家是唯一一个在手术中保持站立，拒绝被绑在手术台上的人。这确实不容易，但也有点愚蠢，因为垂直的液柱压力更高，在手术时开放的曲张静脉中喷出的血液比躺下时更多。

直到中世纪之后，才有了对静脉中的瓣膜的描述，即便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它们被理解了。安布鲁瓦兹·巴累是第一位想到在大腿高处用结扎线绑住GSV的外科医生。现在我们知道这样做不会造成任何损害，因为有很多静脉可以代偿GSV的工作——但巴累知道吗？

1890年，德国外科医生弗里德里希·特伦德伦堡更详细地描述了高处结扎。他第一个表现出对静脉曲张病因的理解：由静脉瓣膜关闭不全和液体压力增加引起。这标志着有效治疗的开始。患者呈仰卧位，手术台倾斜至头低脚高状，这种手术体位以他的名字命名。在特伦德伦堡卧位，液体压力反转，腿部压力降低，心脏压力增高。心脏压力增加有利于休克患者，腿部低压则有利于静脉曲张手术。

在19世纪末，澳大利亚外科医生杰里·摩尔完善了巴累和特伦德伦堡的方法。他明白不应该在尽可能高处将GSV结扎，而应该直接将隐静脉弓结扎。这成为现代的标准方法，被称为大隐静脉高位结扎术（crossectomy），“crosse”在法语中意为牧羊人的手杖。这种做法不仅可以治疗现有可见的静脉曲张，还可以防止复发。

循环

心脏由两部分组成。右半部分在轻微的压力下将血液从身体各处泵送到肺部。肺很脆弱，无法承受高压。心脏的左半部分将血液从肺部泵送到身体的其他部位。在这里，血压要高得多。动脉将富含氧气的鲜红色血液从心脏输送到身体的最边缘。静脉从全身收集血液并将

其带回心脏。心脏和血管的运作——循环——完全是一个谜团，直到1628年，英国人威廉·哈维切开了垂死的鹿，花了几个小时观察它心脏的跳动。他在一篇题为《动物心脏运动与血液解剖学研究》的论文中描述了他的发现。在这之前，没有人了解过身体的循环系统，主要是因为死后血液凝固，尸体的血管中看上去含有大量空气。通过四肢运动和静脉中瓣膜的共同作用，血液返回心脏，这也被称为骨骼肌泵。胸部的吸力也有助于这个过程，当我们吸气时，在胸腔中产生负压，从腹部和四肢抽出血液。消化系统和脾脏的静脉是循环系统中的例外，它们被称为门静脉，将血液输送到肝脏，而不是回到心脏。

西奥多·比尔罗特是整个外科史上最伟大的名字之一，他强烈反对静脉曲张手术，却没有解释为什么。在20世纪，高位结扎术与“剥脱”相结合，这是一种可以一次性从皮下完全移除GSV的方法。直到2005年左右，这仍是治疗静脉曲张的标准方法，每条腿的整个手术过程不超过15分钟。

后来，瑞典放射学家斯文·伊瓦尔·塞丁格将整个血管外科引领到了相反的方向。1953年，他发明了一种方法，可以从血管内部进行治疗。1964年，在塞丁格穿刺法的基础上，另一位名叫查尔斯·多特的放射科医生发明了经皮血管成形术——用小气球从内部扩张血管，这是一个非常巧妙而简单的解决动脉狭窄的办法。在21世纪，塞丁格穿刺法不仅用于治疗动脉疾病，还用于治疗静脉曲张。GSV可以用激光或微波从内部通过灼烧来封闭，这些都不需要用到手术刀。

露西还给人类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如果她的直肠中没有3条小血管（痔静脉）让她的肛门不会漏水，她可能会在直立行走了几步后就改变主意，回归四肢行走。人类至今没能成功适应排便行为：我们仍然需要把髋关节弯曲90°才能做到。现在排便需要更大的压力，这导致了典型的人类问题，如痔疮、肛门脱垂和便秘。

外科医生日常工作中还有一个常规项目与露西有渊源，就是腹股

沟管。这是腹壁底部的一个薄弱点，但此处本应该是它最强的地方。重力不断地迫使腹腔内容物从内部压迫这个薄弱点。这可能会导致这里产生一个洞，称为腹股沟疝，这是一个似乎已经被进化所遗忘的开口。但是，如果我们想象自己又回到4条腿的状态，那么腹股沟管就位于腹部的重心之上，而不是其下。对于我们4条腿的朋友来说，这没什么问题，但对于两足动物，这确实是一个设计缺陷。因为直立行走，现代男性在一生中有25%的概率会患上腹股沟疝，这对外科医生来说意味着很多工作要做。

从四足动物到两足动物的过渡当然也意味着髋部和膝盖要承受双倍的重量。在脊柱中分开相邻椎骨的椎间盘，从不需要支撑任何东西（水平方向）进化到要承受一半的体重（垂直方向）。膝盖、髋部和背部的过度负荷衍生了外科学的姊妹学科——矫形外科。矫形外科医生大部分时间都在用假体置换过度负荷的髋部和膝盖，还有去除突出的椎间盘。

最明显的缺陷见于向腿部走行的动脉。它们仍然在骨盆后部深面呈90°弯曲，表现出四足动物的特征。这种弯曲曾是必要的，因为动物的后腿与躯干成直角。我们在从原始的陆地动物演变为人类的过程中，大部分时间都是用4条腿走路，自然选择使我们动脉的直角弯曲变得宽大而平滑。因而循环系统中这一段产生湍流的可能性极小，这对我们的生存很重要，因为动脉中的湍流会导致动脉壁的损伤。然而，由于现在我们直立行走，走向下肢的动脉除了像四足动物那样柔和地弯曲之后，还得在腹股沟处再弯曲90°。这就不再是一条平滑的曲线，而是一个没经过适应过程的尖锐扭结，会产生湍流，进而导致动脉硬化，造成扭结附近的血管变窄。这就是人体动脉硬化最常见于腹股沟的原因。如果动脉逐渐缩窄，腿部在运动时——最需要氧气的时候，就会得不到充足的血氧供应。这会导致行走时腿部疼痛，一旦静止不动，疼痛立即消失。此种症状在医学上被称为“间歇性跛行”（从拉丁语“claudicare”演变而来，意为“跛行”），在荷兰语中它

被形象地称为“橱窗浏览腿”，指的是每次你停下来看商店橱窗，在街上行走的痛苦就消退了。最终，腿可能会坏死，产生坏疽。而这些都是四足动物不需要担心的事情。

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现代外科医生需要处理的与露西有渊源的病症，静脉曲张、痔疮、腹股沟疝和动脉狭窄可能占了日常外科手术的一半。换句话说，外科医生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是弥补露西决定用双腿走路时所犯下的错误。顺便说一句，露西在埃塞俄比亚获得了第二个名字——Dinqines，意思是“你很了不起”。外科医生们得同意这一点。

9　腹膜炎

逃脱艺术家之死：哈里·胡迪尼

1926年10月31日，艾瑞克·怀兹的去世成为世界新闻。在大西洋的这一边，这是一个谨慎乐观的时代，但同时也有贫困和动乱。当时仍名不见经传的阿道夫·希特勒和贝尼托·墨索里尼正准备在全球政治中发挥主导作用。这是克劳德·莫奈去世、玛丽莲·梦露出生的那一年。欧洲似乎很嫉妒美国，在那“咆哮的二十年代”，好像一切皆有可能——直到1929年的大萧条的到来。这是查尔斯顿舞和禁酒令的时代，也是洛克菲勒和阿尔·卡彭的时代。

如同查理·卓别林、斯坦·劳莱和奥利弗·哈台一样，艾瑞克·怀兹代表了那段美好时光中的美国精神。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名，但他的艺名在差不多1个世纪之后仍然广为人知，并且已经成为他所开创艺术的代名词。艾瑞克·怀兹就是举世闻名的逃脱艺术家哈里·胡迪尼，他或是给自己扣上一件紧身衣倒吊在空中，或是被铁链缠住，密封在木箱子里，再在纽约港口被从船上扔下去，或是戴着手铐被关在一个装满啤酒的牛奶搅拌器里。他永远都能安然无恙地逃脱，哪怕是被活埋在青铜棺材中。许多人会以为他的死亡与他的生命一样壮观：在表演传奇的水牢节目时淹死——在拥挤的剧场舞台上，戴着手铐，倒挂在水下。但事实远非如此。

胡迪尼用巫术和经典的马戏团技巧为他壮观的逃脱表演锦上添花。他是一名魔术师、杂技演员以及硬汉。例如，他声称他的腹肌可以承受任何打击，还让每个人都试试。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认为他死于腹部受到的一记猛烈拳击，但我们现在知道这与他的噱头无关，主要是因为他固执地拒绝就诊。

戈登·怀特黑德、雅克·普赖斯和萨姆·斯密洛维茨是3名加拿大学生。1926年10月22日早晨，在演出结束后，他们在蒙特利尔剧院的更衣室里拜访了胡迪尼。斯密洛维茨请求为他画一幅肖像，胡迪尼躺在沙发上摆出姿势。怀特黑德问他，他是否真的可以承受任何腹部的打击，以及自己是否可以试一试。胡迪尼同意了，这位学生立刻开始对他出拳。他非常用力地击打了胡迪尼的右下腹好几次。另外两名年轻人后来表示，胡迪尼显然没有准备好面对他们朋友的快速攻击。打到第三下他才完全绷紧了腹肌，他们注意到，尽管这位强硬的逃脱艺术家在前一天晚上的舞台表演完美无缺，但现在躺在沙发上的他看上去似乎因为那精准的几拳感到十分痛苦。

胡迪尼在夜场演出结束后的第二天离开，乘火车前往行程中的下一站——底特律。他感觉不太舒服，提前发了一封电报，要求在到达之后去看医生。但是他一抵达就带着高烧开始了生命中最后一次表演，没有时间接受检查。他可能已经完成了他的水下逃生表演，这让他不得不屏住呼吸几分钟——在演出结束后，医生断定他需要立即进行手术，由此看来，这段表演非常了不起。因此，当时的观众并不知道他们在舞台上看到的那个特技演员有多么令人难以置信。

底特律的外科医生通过简单的体格检查进行了诊断。他把手放在胡迪尼的腹部，宣称这位逃脱艺术家得的是一种常见病——阑尾炎，但这种病在当时才刚刚开始被认知。40年前（胡迪尼12岁时），雷金纳德·菲茨才在波士顿首次正确描述了这种疾病，这对于一种威胁生命的疾病来说有着重大意义，它已经困扰了人类数千年。古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以及罗马的医学文献都没有提及它，虽然它在这些古老的文明中一直很普遍，而在这些文明中，医学知识已经相当先进。首先描述它的是18世纪的解剖学家乔瓦尼·巴蒂斯塔·莫尔加尼，但他也没能说明其致命的真正原因。直到1887年，费城的托马斯·莫顿医生第一次通过手术成功治疗阑尾炎后，人们才清楚地知道这种疾病并不一定要以患者的死亡为终结。

医学术语

症状和疾病用以　　　　　-osis结尾的单词表示。因此，关节病（arthrosis）是影响关节（arthron）的疾病（由磨损引起）。以-itis结尾的词表示炎症：关节炎（arthritis）是发炎的关节。并非所有的炎症都是感染，只有在它们是由病原体，例如细菌、病毒和其他寄生生物传播引起时，才被称为感染。前缀a或an表示“没有”，ec或ex表示“外”。呼吸暂停（apnoea）的意思是没有呼吸，肿瘤切除术（tumourectomy）的意思是切除肿瘤。Haemat或haemo与血液有关：血尿（haematuria）是尿液带血，咯血（haemoptysis）是咳出血。肿瘤（tumour，拉丁语中“肿胀”一词）由以-oma结尾的词表示。它可以是液体的聚积，例如，血肿（haematoma）是聚积的血液，但也可以是实体组织，脂肪瘤（lipoma）是由脂肪组织构成的肿瘤。肿瘤可以是恶性的或良性的。恶性肿瘤是癌性的，它们的名称以癌（carcinoma，皮肤、黏膜或腺体来源的癌症）或肉瘤（sarcoma，其他组织来源的癌症，如骨骼或肌肉）结尾。良性肿瘤不是癌性的。如果确诊或显示出疾病，则检查结果为阳性。因此，阳性结果通常对患者来说是负面的。此外，没有任何检查结果是100%可靠的，因而结果有时可能是假阳性或假阴性。以-genic结尾的词表示原因，如果某些东西具有致癌性（carcinogenic），它可能会导致你罹患癌症。

胡迪尼本该在蒙特利尔就去医院就诊，这样他可能会通过手术得救。他究竟是太顽固、太虚荣、太贪财，还是仅仅是害怕医生？他可能在想“演出必须继续下去”。结果，他直到3天后才在底特律手术。外科医生发现阑尾破裂引起了腹膜炎。胡迪尼的腹腔完全被感染，充满了脓液。手术后他也没有恢复，4天后他的腹腔不得不再次被打开冲洗。情况仍然没有改善，而且当时还没有对抗感染的抗生素。两天后，哈里·胡迪尼去世，享年52岁。在公众关注的风口浪尖，他被埋葬于纽约皇后区，在曾被用于逃生表演的那口青铜棺材中。艾瑞克·怀兹——魔术师、杂技演员、巫师以及逃脱艺术家——举世闻名的伟大的

胡迪尼，死于平庸而日常的疾病——阑尾炎。

阑尾炎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疾病，超过8%的男性和将近7%的女性在其一生中得过阑尾炎。它可以发生在任何年龄，是急性腹痛最常见的原因。阑尾——更准确地说是蚓状阑尾——是一个盲端肠管，从与小肠连接的大肠起始，位于腹部的右下方。它直径不到1厘米，长约10厘米。

医生们早就知道这个小小的器官，但是从来没有人想到这么小的东西会带来如此灾难性的后果。这是因为它太小了，一旦发炎，可能就会很快破裂。之后肠内容物就会释放到腹腔，引起腹膜——覆盖于整个腹腔内壁的膜的炎症。因此从没有人把小小的阑尾与腹部炎症的致命后果关联起来。在19世纪，外科医生敢去打开一个活生生患者的腹部之前，他们只能看到死者体内阑尾所呈现的最终状态。尸检时，在一塌糊涂的腹膜碎片中，没有人注意到那个小小的、蠕虫状附属器官的破裂。

阑尾炎产生一系列能够反映疾病进程的典型症状，从阑尾本身的炎症开始。这导致了中上腹部模糊的器质性疼痛。在1天之内，炎症在阑尾周围扩散，并开始刺激右下腹阑尾所在位置的腹膜。这种局部的疼痛远比模糊的器质性疼痛更加尖锐和明显。阑尾炎患者的典型主诉是从中腹部到右下腹的转移性疼痛，且转移时疼痛加重。腹膜的局部刺激也会引起发热、食欲不振（厌食），其中最重要的是活动时疼痛。患者不能再忍受被触摸或突然移动，喜仰卧位，双腿蜷起。对于一个处于该病程的正常人来说，似乎不可能站在一个满是人的剧场里，更不用说像胡迪尼那样，被绑起来，倒挂浸在水牢里。

之后，脓液围绕着阑尾形成。起初，脓液可以被周围的肠道所包绕，但是到了下一阶段，阑尾会局部坏死并破裂。然后，粪便和肠道气体被释放到腹腔中。患者会感到右下腹的疼痛骤然加剧，然后在整个腹部蔓延，疼痛变得十分剧烈，以至于说不清是从哪里开始的。这

是危及生命的腹膜炎的阶段。

腹膜炎可以被整体概述为“受刺激的腹部”。腹部肌肉紧张，变得很硬，每一个动作都很痛苦。不仅当腹部被触摸时会感到疼痛，在放手时还会加重——这被称为“反跳痛”。患者脸色苍白，神情焦虑而紧张，眼睛与脸颊凹陷。腹部的肠道对炎症做出反应，停止正常的运动。通过听诊器，医生可以听到腹部不寻常的安静。所有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腹膜炎症状，几秒钟内就可以诊断出来：快速查看患者（观察面部和体位），问几个问题（哪里痛以及疼痛从何时何处开始），按压腹部（腹部僵硬且在用力和放手时疼痛）并使用听诊器听诊（不能闻及肠鸣音）。在最后阶段，患者会因血液中毒引起感染性休克，腹膜的表面积很大，使得细菌大量释放到血液中。这导致全身中毒，引起高烧并累及所有器官，最终导致死亡。

腹膜炎是一种外科急症。外科医生必须尽快修补或消除引起腹膜炎的病因，并冲洗腹腔。这些应该在尽可能早的阶段——感染性休克发作之前，或者更好的是在弥漫性腹膜炎之前完成，但最佳的时机是感染问题仍局限于受累器官，即小小的阑尾时。因此，急性阑尾炎也算是外科急症。

1889年，美国外科医生查尔斯·麦克布尼描述了阑尾炎手术的原则：手术越早，完全康复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且只要腹膜炎尚未发生，切除发炎的器官就足够了。这使得麦克布尼与阑尾炎密不可分地联系起来。阑尾炎所导致的腹部疼痛最严重的位置被称为麦氏点，阑尾切除术中腹壁的手术切口也以他的名字命名。如果一位同事说患者“在麦氏点有压痛”，每个外科医生都会立刻知道问题是什么。

典型的阑尾炎手术进行方式如下：患者取仰卧位，外科医生站在右侧，助手站在左侧。外科医生在右下腹麦氏点的位置做一个小的斜切口，这里正好是肚脐和髂嵴（骨盆外缘的骨性标志）之间连线的2/3处。在皮肤和皮下组织之下，有3层腹肌相叠。恰好在腹壁的这一

点上，可以在不切割肌肉的情况下通过它们，你需要巧妙地拨开肌纤维，如同打开3层窗帘一样。第三块肌肉下面是腹膜，你必须小心地提起它并将它打开，确保不损伤肠道。如果你很幸运，你现在就可以看到阑尾，但通常它隐藏在腹部深处的某个地方。你可以用手指去触摸寻找它，小心地将其游离并拉出来，用小钳子和可吸收线切断并结扎供应阑尾的血管，然后对阑尾本身做同样的操作。之后，就可以关闭腹膜，将肌肉移回原位，关闭腱膜——3层腹肌最外侧的扁平肌腱。最后，缝合皮下组织和皮肤。整个过程大约需要20分钟。然而在今天，外科医生已经不再用经典的办法切除阑尾了。如今腹腔镜下切除术成为首选，医生可以通过肚脐和两个非常小的切口进行微创手术。

胡迪尼的症状是典型的阑尾炎——发热和右下腹疼痛。演出结束后，只能在底特律的更衣室里给他做检查的医生发现他情况很糟，右下腹刺激症状太严重。症状实在太明显了，医生甚至根本没考虑过戈登·怀特黑德3天前对胡迪尼胃部的打击。这一诊断在手术中得到证实——他们发现了穿孔的阑尾及其引起的腹膜炎。然而，胃部的打击成为后来被关注的焦点。其他涉嫌“创伤性阑尾炎”——由直接打击、跌倒或其他腹部创伤引起的病例被引用。然而，在创伤和阑尾炎之间没有发现任何因果关系，这两个仅仅相隔几天发生的事件只能被视为巧合。尽管如此，阑尾炎的病因并不总是很清楚。我们仍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会在某个时刻患上阑尾炎，而其他人则不会。

在胡迪尼的案例中，找到一切的起因显然很重要。这3名学生被警方全面审问，可怜的戈登·怀特黑德所打的那一拳被确定为死亡的原因。还有一点也很重要，考虑到胡迪尼不无危险的职业，他购买了包括事故条款在内的人寿保险。该条款规定，如果胡迪尼在进行特技表演时因意外事故而死亡，他的妻子兼终身助理贝思·怀兹将获得双倍赔偿——50万美元。虽然在肚子上被打一拳以证明自己的力量可以归为此类，像阑尾炎这样的日常疾病则显然不能。幸运的是，怀特黑德并

没有因严重人身伤害或过失杀人而被起诉，因为普赖斯和斯密洛维茨能够证明，是胡迪尼允许他打的。

1926年10月24日，胡迪尼在底特律加里克剧院的最后一场演出中，观众中有一位叫哈里·瑞克尔的人。他后来回忆起那是一个令人失望的节目。表演推迟了半个多小时，而且胡迪尼看上去状态不太好。他失误了，观众可以看穿他的技巧，还有好几次他需要被助手扶着。但是当瑞克尔后来读到，这位逃脱艺术家是带着破裂的阑尾在表演，而且几天后就去世了，他才意识到胡迪尼是在用生命为他的观众演出，直到最后1分钟。

10　麻醉

女王的麻醉：维多利亚女王

汉诺威王朝的维多利亚是英国女王和印度女皇。在她的帝国中，太阳永不落下：她的子孙后代遍布欧洲的王室，她统治的时代甚至以她的名字命名。她嫁给了她的堂兄——萨克森-科堡与哥达公国的阿尔伯特亲王，他们的结合看起来佳偶天成，被认为是英国王室历史上所有夫妻中最为恩爱的。但鲜为人知的是，他们经常吵架，有时还会动手，而且往往是因为同样的问题让白金汉宫不得安宁。维多利亚无法承受“动物般的”生育经历及其带来的难以忍受的痛苦。她变得如此易怒，以至于阿尔伯特亲王最后威胁她，如果她再一次打他就离开她。维多利亚女王是一个坚强的女人，但她觉得生孩子这种事是对她精神和神经肮脏而丑陋的攻击。尽管她前7个孩子的出生都平安无事，但对她来说这种经历是难以形容的创伤。每次生产后都有持续至少1年的产后抑郁，直到进入下一次孕期。1853年，维多利亚再次怀孕，再次为即将发生的事变得歇斯底里。阿尔伯特决定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召来了一位名叫约翰·斯诺的医生。现在是麻醉的时候了。

让患者进入睡眠状态，或诱导其完全失去知觉的技术被称为全身麻醉或麻醉（希腊语“睡眠”）。第一次全身麻醉下的手术于1846年10月16日在美国波士顿麻省总医院进行。一位名叫威廉·莫顿的牙医麻醉了一位名叫爱德华·阿伯特的患者，让其吸入醚，准确地说是乙醚。阿伯特的脖子上长有一个肿瘤，必须将其切除。在他睡着的时候，一位名叫约翰·华伦的外科医生切掉了肿瘤。一切进展顺利，患者什么感觉也没有，在手术后就醒来了。华伦倍感震撼，说出了历史性的一句话：“先生们，这可不是骗局。”这是外科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自从发明了锋利的工具以来，任何希望通过切开人体来帮助别人

的人，都不得不与手术中挣扎的患者相抗衡。切开人体不仅仅带来疼痛，更重要的是患者惧怕无法在这种折磨中活下来。因此，外科医生必须动作迅速，这不仅是为了尽可能地缩短疼痛持续的时间，还因为在患者被助手或其他帮手压住的情况下，你几乎没有可能从容不迫。因此，这是一个“越快越好”的问题。伦敦外科医生罗伯特·利斯顿总是在开始手术时向他的观众大喊：“给我计时，先生们，给我计时！”如果你没能在患者从助手们手中挣扎出来之前完成你的工作，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受害者仍然会大量出血，再加上他的挣扎和恐慌，血液将喷向四面八方。看到这种场景，这位不幸的患者将会愈加恐惧和疯狂，使得助手更加难以控制他。一种非常独特的着装规范应运而生。直到约150年前，外科医生在手术时总会穿着黑色外套。这样它在溅上血时就不那么明显，而且还不需要经常清洗。一些外科医生喜欢吹嘘说他们的外套因为沾了太多血而变得很硬，脱下来都可以立起来了。

所以你的动作必须快，不然情况会很糟糕。速度意味着安全。这就需要做出又短又深的准确切口——位于正确的位置，并在一次切割中穿过尽可能多的组织层。因此，血总是最后才被止住，“在回来的路上”医生们用线缝住组织层，或是用烙铁将其封闭，或者只是用绷带紧紧地包扎。这种方法很有效，但并非很安全。没有时间仔细检查你的工作，也没有时间或空间来应对意外情况。这就是1846年10月16日之前的手术：快速、血腥并且标准化，因为没有时间让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因此，对于崇尚速度的外科医生来说，管理一次全身麻醉是对时间的浪费。在欧洲，麻醉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成为常规的外科步骤。许多外科医生公开反对这种他们认为危险又多余的东西。麻醉在英格兰被称为“美国佬的骗局”，只对那些手术不够快的庸医有好处。但多亏了维多利亚女王的脾气，这种局面得以改变。自从她敢于尝试麻醉并从中受益匪浅之后，没有人再能弃之不顾了。为了说服普罗大

众，正需要这种方式来推广这种崭新、未知但有益的发明。

麻醉学

今天，麻醉学本身就是一门全面的学科。在手帕上滴几滴乙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代全身麻醉中使用三种药物。镇静催眠剂会降低意识，导致睡眠和遗忘。由于镇静催眠剂不能完全抑制身体对手术疼痛的反应——例如心跳加速和血压升高、立毛肌收缩和出汗，还要用到镇痛剂。这些药通常是鸦片衍生物。麻醉意味着“没有感觉”。为了抑制术中操作引起的肌肉紧张，这份“鸡尾酒”中通常还包括肌肉松弛剂。这种药来源于箭毒，是亚马孙印第安人涂于箭头的毒药。这三种药物的组合使患者进入一个放松、睡眠的状态，对手术没有任何生理反应。麻醉师使用呼吸机来管理患者的呼吸，通过口或鼻将插管插入气管。当患者处于全身麻醉状态时，麻醉师通过血压袖带和胸部及手指上的电极连续监测心跳、血液中的氧含量和呼出气体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在手术过程中，麻醉师还会进行包括血常规、尿量、血糖水平和凝血功能在内的多项检查。让患者入睡的阶段称为“诱导”，醒来阶段称为“苏醒”。

约翰·斯诺是农民的儿子，也是一位业余麻醉师，他写过一本关于乙醚和氯仿的书，还设计了一种特殊的面罩，能控制剂量缓慢地释放氯仿。1847年，在波士顿进行了第一次乙醚麻醉的1年之后，詹姆斯·杨·辛普森在爱丁堡进行了第一次氯仿麻醉。因此，约翰·斯诺在1853年所做的事并不是创举，但很罕见。维多利亚女王是否知道斯诺实际上并不是专家，是否知道他并不清楚自己的行为会对她和她的孩子带来怎样的风险？当斯诺在宫殿里爬着通往皇家卧室的楼梯时，他的心一定怦怦直跳。当时是晚上，走廊、接待室和楼梯都被煤气灯照亮。工作人员绷紧神经。内阁处于待命状态，人们在悬念中等待，而越过前厅和许多道门，斯诺听到女王的呻吟。毫无疑问，斯诺会想，女王是否能够冷静而尊重地接受他——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一个平民。当

他进入房间，他站于床头，由于不被允许使用他自己设计的面罩，他在女王陛下的鼻子和嘴巴上放了一块干净的手帕。他从瓶子里用移液管吸取氯仿，滴几滴到手帕上。他当然也会吸入一点氯仿——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会不时地转过头来呼吸新鲜的空气。

斯诺记录了每一个细节。他一滴一滴地给女王吸入氯仿，直到她表示感觉不到疼痛为止，同时留意着氯仿对仍然很严重的宫缩有没有影响。在1853年4月7日午夜过后的20分钟里，他在手帕上给维多利亚女王滴了15滴氯仿。“女王陛下表示出极大的宽慰，”他写道，“宫缩时的疼痛变得微乎其微，而在宫缩期间则完全缓解了。”氯仿没有给女王带来任何不适，而且她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都保持清醒。53分钟后，凌晨1点13分，孩子出生了。几分钟后，胎盘跟着娩出，女王很高兴，“……表示自己对氯仿的效果非常满意。”她自己形容为“……上帝保佑的氯仿，无与伦比地令人舒适而愉悦。”新出生的王子被命名为利奥波德，是他们的第八个孩子、第四个儿子。

阿尔伯特亲王欣喜若狂，可他们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太久：不久之后，女王陷入了如往常一样的产后抑郁，而且这次是最糟糕的一次。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了一篇谴责性的评论，《圣经》学者们愤慨万分，因为《圣经》中说女性在分娩时必须忍受痛苦。但这个消息对整个欧洲的广大公众来说都是一个重磅炸弹。在法国，氯仿的使用变得非常受欢迎，并被赋予了吸引人的名字“女王的麻醉”（l'anaesthésie à la reine）。再也没有患者想在无麻醉的情况下进行手术了，外科医生被迫遵守他们的要求。

几十年后，老式的追求快速的手术时代结束了，一种新的秩序诞生了。多亏了麻醉剂，外科医生现在有时间更精确地进行手术，而不再为患者在疼痛中的挣扎和尖叫而分心。手术变得准确、细致和干燥，没有吵闹，没有四处飞溅的血。切口更为仔细精确。组织不再被一次切开，而是一层一层地切开，在下一层被切开之前进行止血——“在途中”而不是在手术结束时。随着像弗里德里希·特伦德伦堡、

西奥多·比尔罗特和里查德·冯·福克曼这样的新英雄的出现，外科学成为一门精准的科学。黑色手术衣被白色的所取代。

其中一个伟大的新名字是美国人威廉·哈尔斯特德。作为治疗腹股沟疝和乳腺癌的创新者，哈尔斯特德在手术中引入了橡胶手套，并与同事一起组建了一个工作组来开发局部麻醉，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新发明。这个过程需要在神经周围注射麻醉药，让患者保持清醒，但在被麻醉的区域内什么都感觉不到。该小组成员定期在彼此身上练习，一起享受美妙的夜晚。哈尔斯特德成为局部麻醉的先驱，却也因为他们使用的药物是可卡因而成了瘾君子。在局部麻醉中，可卡因早已被具有相同作用但没有兴奋性副作用的衍生药物所取代。

麻醉是外科学的一次革命，下一步是引入卫生的概念。1847年，匈牙利人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发现，医学生们从解剖室解剖尸体回来之后，如果不洗手就协助生产，会导致产妇患上产褥热——这是母亲在分娩后不久发生的一种感染性疾病。然而，没人相信像洗手这么简单的事情可以产生生与死的差异，人们认为塞麦尔维斯疯了（不幸的是，他患上了一种逐渐使他发狂的神经系统疾病）。直到路易斯·巴斯德揭露了细菌是疾病产生的原因，塞麦尔维斯的基本卫生原则才被接受。1865年，约瑟夫·利斯特首次使用消毒剂防止手术伤口感染。尽管这一举动是革命性的，但这些方法在最初使患者非常痛苦，因为消毒剂在伤口中具有腐蚀作用，并且需要长时间施用。因此，由于麻醉的发明，它们才得到应用。

令维多利亚女王如此欢喜的氯仿在20世纪被淘汰，它被发现会损害肝脏并导致心律不齐。乙醚也被另一种物质取代——氧化亚氮（N_2O），也称为笑气，是一种强力麻醉剂。但是，当它被证明是一种重要的温室气体，对环境的破坏性比二氧化碳高300倍时，它也被弃用了。

在现代麻醉中，药物被直接注入血液，这意味着它们可以更快地

起效，并且在手术过程中可以更精确地调整剂量。现在最常用的麻醉药物是2，6-二异丙基苯酚，通常称为异丙酚。异丙酚具有显著的优点，并且一旦停止注入，其效果会迅速消失。更妙的是，当患者醒来时，他们感觉自己睡得很香。由于其牛奶样的外观，它也被称为“快乐牛奶”或“健忘乳”。但是这种神奇的麻醉剂并非没有风险：流行歌星迈克尔·杰克逊对异丙酚成瘾，并在2009年使用过量而死亡，因为给他用药的医生并未对他的健康状况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是一次真正的医疗过失，因为一名合格的麻醉师需要在患者苏醒后进行24小时的密切监测。

我们不知道约翰·斯诺能否以这种方式监测他的患者。尽管他曾为女王服务，但斯诺医生并没有作为一位伟大的麻醉师被铭记，他被人们记住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1854年，他描述了伦敦暴发的霍乱疫情，确定了一个公共水泵作为感染源。他是第一个展示疾病如何传染的人，也是流行病学——研究疾病如何传播的学科——的奠基人。

1857年4月14日，维多利亚坚持要求斯诺在她下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带着麻醉剂出现。女王产下一女孩——比阿特丽斯公主。并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次女王并没有患产后抑郁症。比阿特丽斯是她的第九个孩子，也是最后一个孩子。

11　坏疽

小湾战役：彼得·史蒂文森

在向西寻找印度的第二次航行中，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看到地平线上升起了第一块土地，他以发现它的那一天给这个岛屿命名——多米尼克（拉丁语中的“星期天”一词）。他向西北继续航行，8天后抵达另一个岛屿。他又以发现它的那一天为它命名，那是1493年11月11日，星期一。但哥伦布发现的当然不是新土地。人们已经在那里生活了数千年。那里的原住民——加勒比印第安人，称他们的岛屿为Soualiga，意思是“盐地”。从1627年开始，来自荷兰的船只定期造访此岛，就是为了从能俯瞰大海湾的山丘之间的一个巨大盐田中得到盐。17世纪，为了保存鲱鱼，荷兰对盐的需求量很大。毗邻的圣尤斯特歇斯岛上有许多可用的奴隶，他们直接被从非洲运往新大陆以采集盐。然而，西班牙人仍然认为这个岛屿是他们的。而且，他们正与荷兰交战，不能容忍荷兰人争夺“自己地盘”的盐。1633年，西班牙重新占领了该岛，建造了许多堡垒。其中一个堡垒位于延伸到大湾和相邻小湾之间大海的岬角。从那里开始，他们使荷兰的“商船”，也就是携带盐的船只寸步难行。1644年，库拉索岛西印度公司的董事前来解决这个问题。

今天，这座岛屿——它的名字不是“星期一”而是圣马丁，因为哥伦布看到它的那一天（11月11日）是圣马丁节——因其有34个美丽的海滩而受到人们的喜爱。因此，彼得·史蒂文森本可以选择从其他33个海滩来进攻岛屿。但他想征服小湾，因为从那里可以进入西班牙堡垒。史蒂文森知道，如果他可以拿下那个海滩——如今那里的游客躺在阳光下，在水晶般清澈碧绿的海水中浮潜——他就可以拿下整个岛屿。

史蒂文森并不是个伟大的战略家。这次袭击对荷兰军队来说是彻底的灾难，对他个人来说则是痛苦的羞辱。他的船只用了很多天，从遥远的背风群岛横跨加勒比海航行了将近1000千米（500海里），到达了圣马丁岛。当史蒂文森的旗舰——“布劳威翰号”接近这个岛时，他们完全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在1644年3月20日棕树节那天进入了礁湾，一个小小的水湾，就在美丽的小湾附近。他们划着划艇，穿越浅滩来到岸边。这位弗里西亚公使的儿子骄傲地走进温热的水里，大步踏上海滩。在博内尔岛的统治者雅克布·波拉克的指挥下，男人们将一门大炮拖到山上，俯瞰小湾和位于另一边岬角的西班牙堡垒。但小湾太大了，或者说大炮太小了，炮弹没能击中堡垒。他们得找到一个更靠近目标的位置。随着侧翼移动，史蒂文森一路前往小湾海滩正上方名为贝尔艾尔的小丘。在那里，他竖立了荷兰国旗，他面前的西班牙堡垒已进入大炮射程内。

砰！西班牙人射出的第一炮直接击碎了史蒂文森的右腿。“布劳威翰号”的船长正站在史蒂文森旁边，他也被击中，失去了半边脸颊和一只眼睛。史蒂文森立刻被救走，同划艇一起被吊回船上。

彼得·史蒂文森在帆船上呻吟时，心中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幸运的是，这件事我们早就不需要去面对。他可能不敢看自己的腿，但他一定马上明白——无论伤情严重与否，或是伤口有多大——他都必须被截肢。直到大约150年前，截肢都是腿部开放骨折的唯一有效治疗方法。如果不立即截肢，即使伤口不那么复杂，后果通常也是致命的，因为气性坏疽——伤口愈合的最大阻碍——永远是个威胁。

“坏疽”一词是泛指活组织坏死的术语。它是皮肤、皮下组织、肌肉，甚至整个肢体缺氧的最后阶段。虽然坏死的组织摸上去像冰一样凉，但患者却高烧不退。坏疽可由动脉阻塞引起，也可称之为梗死。这会导致一部分肢体上产生边界分明的黑色干性坏死。坏死部分是干燥的，这被称为干性坏疽。坏疽也可能是伤口感染导致的。由于会有脓液和腐烂的液体产生，这种坏疽被称为湿性坏疽。还有一些细菌会

产生气体，会导致一种被称为气性坏疽的湿性坏疽。

气性坏疽是最致命的一种坏疽形式，主要由一种名为产气荚膜梭菌的微生物引起，它的名字来自拉丁语中的一个动词“perfringere”，意思是“粉碎”“摧毁”“攻击”或“暴力突破”。在这个星球上，它随处可见。它遍布在沙子、土壤、粪便和街道垃圾中。产气荚膜梭菌来自一个危险的家族。破伤风梭菌会导致致死的破伤风病或“牙关紧闭”，艰难梭菌会导致危及生命的大肠感染，而肉毒杆菌会导致严重的食物中毒。在不卫生的条件下，产气荚膜梭菌也会引起可怕的产褥热，在过去，这种病夺去了许多产妇的生命。

产气荚膜梭菌是一种厌氧生命形式，这意味着它只能在无氧环境中存活。这种细菌具有两种危险的特性：它会释放出腐坏的气体，并产生名为毒素的有毒物质。在过去的许多世纪里，气性坏疽和伤口感染使外科学的发展受挫。但是，为什么有的伤口会被感染而有的不会？为什么彼得·史蒂文森的伤口发生了气性坏疽？为什么如今气性坏疽几乎不再发生？

有3个因素决定伤口是否发生感染或坏疽。首先，当然要有一个伤口。至于皮肤开口的大小，则并不那么重要。细菌体积很小，最小的伤口也可以通过。第二个决定因素，是在伤口成功繁殖的细菌数量。消毒伤口并保持清洁可使之最小化。但最重要的是伤口周围组织“创面”所受的损伤。创面的状态对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至关重要。

对于由锋利的刀造成的伤口，创面几乎不会受损。伤口的边缘没有受到伤害，健康的组织使得免疫系统能够杀死任何进入伤口的细菌。当你被锋利而干净的刀割伤时，如果立刻用水、肥皂或消毒剂冲洗伤口，它甚至可以马上关闭。这就是一期愈合（per primam）。如果切口不干净，伤口就会感染，产生脓液。之后，受感染的伤口不再能够马上关闭开始一期愈合，而是必须进行二期愈合（per secundam），这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健康的创面也保证了足够

的氧气供应。由于产气荚膜梭菌在有氧气存在的条件下无法存活，无论伤口多么脏，健康的割伤中几乎没有可能产生气性坏疽。

与之相反，在挤压伤中，周围组织产生瘀伤、挤压或撕裂。创面中的血管也因此受损，减少了氧气的供应。这将导致实际死亡的组织面积大于伤口的面积。这种死亡的组织被称为坏死（necrosis），为各种细菌的繁殖提供了理想的温床。但是，由于伤口缺氧，其中产气荚膜梭菌的生长最为旺盛。气性坏疽就是这样产生的。

对于任何知道这一切的人来说，解决方案相对简单。那就是尽快清洁伤口，用清水（比如，圣马丁海湾清澈透明的海水）冲洗干净，将伤口打开，然后用锋利的刀子切掉所有坏死的部位，直到看到健康的组织。这一过程在外科学中有着好听的术语：法语中的debridement或nettoyage，德语中的anfrischen或英语中的necrosectomy（清创术，来自拉丁语或希腊语）。随后保持伤口清洁，直到它完全愈合——二期愈合。

不幸的是，过去的外科医生所做的事情完全相反。他们不是通过冲洗或刷洗来清洁伤口，而是将其火烧。这样能够杀死细菌，但同时也破坏了创面上的组织和血管，从而加重了缺氧。外科医生还通过放血来治疗由此引起的发热，导致患者贫血，进一步限制了伤口的氧气供应。

刀与叉

就像刀、叉子、勺子、玻璃杯和餐巾是餐桌上让我们能够享用美食的标准配置，手术台上也需要一套标准的器械才能进行一场现代手术。手术刀以前是一体式的，现在则是由一个手柄和一次性的可以卡入的刀片组成。这样刀片就总是锋利、干净且完好无损。刀片各式各样，用不同的数字表示。最常用的是10号（大而弯曲的刀片）、15号（小而弯曲的刀片）和11号（尖刀）。固定组织用的是手术镊子。镊

子包括无齿的“解剖”镊和有齿的“外科”镊。剪刀分为组织剪和线剪。缝合针固定在一个特殊的夹子中，称为持针器。伤口用牵开器拉开。不同大小的无菌纱布用于擦去血液。冲洗液和消毒剂装在器械台上的小碗中，还有各种形状和尺寸的钳子，具有各种用途。骨科手术中，有螺丝刀、锯、骨刀、骨凿、骨钻、锤子和骨锉。还有手术探针、扩张器、腔镜和吸引器。现代手术中会用到各种各样的吻合器，用于腹部胃肠道间的连接。最后，几乎没有手术能在没有电刀的情况下进行，它用来切割或灼烧组织。

彼得·史蒂文森的伤口遭受到了更多的附加伤害。炮弹的碎片击碎了他的骨头，断端刺破了伤口。毫无疑问，他的腿成为微小的产气荚膜梭菌的盛宴。在这些条件下，厌氧细菌能够非常迅速地繁殖。免疫系统通过炎症对这种攻击做出反应，引起发烧并产生脓液。之后，微生物产生毒素，杀死附近仍然健康的细胞。这会产生腐烂的液体，与脓液一起形成湿性坏疽。由病菌产生的腐烂气体被压迫进入健康组织，切断其血液供应。气体可以在皮肤下摸到，摸上去是脆脆的，如同在刚落下的雪上行走一样。气体和毒素杀死越来越多的组织，感染更快地传播。随着坏死组织数量的增加，氧气的供应进一步减少，环境逐渐变得对病原体更有利。这种大规模攻击总是致命的。

彼得·史蒂文森的伤口充满了产气荚膜梭菌。它们在贝尔艾尔的土地里，在西班牙一侧地面上的炮弹上，在把史蒂文森送回船上的肮脏的单桅帆船上，在医生肮脏的手上、黑色的指甲缝里，在肮脏的手术台上，在医生肮脏的锯子和绷带上。船上的外科医生对这些一无所知，但他知道，如果截肢的位置足够高，达到健康的组织，就可能挽救患者的生命。对他来说，这是一次例行的手术，他需要4种器械。

患者被放在台子上，医生在他的大腿上扎了一个绷带，这样不仅可以阻止血液流动，还可以使腿麻木。这样扎上半小时后，就会使患者的腿发麻，来分散伤口疼痛的注意力。

接着，医生拿起了截肢刀，这可不是像手术刀那样小巧的器械，而更像屠夫的屠刀，长30厘米，宽3厘米，刀刃锋利，刀尖突出，手柄结实。他用刀在膝盖以上一口气切断骨头。单是割伤就足以引起剧痛，但主要是医生切开粗大神经的一瞬间，这些神经如同走行在腿上的粗电缆，产生了突然的、冰冷的疼痛，这必然会让患者痛苦地尖叫。把一块木头放在史蒂文森的牙齿之间，有助于压制那可怕的声音。

在肌肉、肌腱和神经之间走行的大血管，当然也被切开了。由于大腿上扎了止血带，血液没有喷出，但绷带无法阻止血管另一侧的血液流出。小腿中含有的大约1升的血液，现在开始从截下的肢体中流到台子上，很快手术台上的一切都浸润在血泊里了。

切割必须在大腿健康的部分进行，要远高于炮弹造成的伤口。而骨头要在更高的地方被锯断，这样肌肉和皮肤才可以覆盖住骨头的残端。因此，下一步就是刮去骨骼上约一掌宽的肌肉。医生用一个名字相当可怕的工具——“刮骨刀”来完成这个步骤。他用4～5次强力的敲击剥去覆盖于骨头的骨膜，就好像他正在刨一块木头一样。假如此时患者还能发出声音的话，他将会从患者那里听到4～5次可怕的尖叫。然后医生拿出锯子，使用这种坚固又锋利的锯子，用不了10下就可以切开大腿的骨头。患者能够清晰地感觉到骨头上锯齿的震动。骨末、血液、呕吐物、尿液和汗液都混合在一起——肮脏的一团糟。当腿从身上掉下来时，会发出重重的砰的一声。一条人腿比你想象的要重得多。当它不再属于你，你可能会感到出乎意料地轻盈。

残端保持开放，用绷带完全包裹，然后取掉止血带。如果伤口持续出血，医生可以随时使用烙铁，反正患者早就昏倒了。这种开放性伤口可进行二期愈合。

在战争史上，数万条腿必须以这种方式切掉。法国军队的外科医生多米尼克·让·拉瑞保持了这项纪录，据称他在1794年西班牙的谢拉

内格拉战役中，4天内进行了700例截肢手术。如果这4天里他整天都在锯腿，那么锯掉每条腿需要大约4分钟。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归功于一项仍以他名字命名的发明——拉瑞牵开器，它可以撑开固定在骨头周围的支撑物，这样肌肉和皮肤就可以被一次性拽掉，给锯子留出空间。这样就不必使用刮骨刀了。不幸的患者们可能会排成一列，扎上止血带。然后拉瑞就带着他的刀和牵开器过来了，后面跟着一个助手拿着锯子，另一个助手拿着绷带。

现在我们不再使用这种标准流程，要归功于一次令人毛骨悚然的实验，发生在一位毫不知情的11岁孤儿身上。小詹姆斯·格林莱斯倒在格拉斯哥的一辆客车下，他的胫骨断了，从皮肤上穿伸出来，伤口沾满了街上的泥土。如果不截肢，他肯定要死于气性坏疽，但约瑟夫·利斯特让这个男孩免于截肢。1865年8月12日，他没有切断男孩的腿，而是用腐蚀性液体——石炭酸喷洒在伤口上。这种实验性治疗被证明是成功的，詹姆斯的命和腿都被保住了，利斯特则被封了爵位，而抗菌术——使用消毒剂来处理伤口——诞生了。没有人质问这种方式是否合理。在儿童身上进行实验在当时显然是正常的。

彼得·史蒂文森惨败而归，西班牙人大概都笑出了声。但荷兰人没有屈服，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进一步进行了一系列徒劳的尝试，从陆地和海上攻击西班牙堡垒。其中一艘被调动的船是“布劳威翰号”，史蒂文森正在这艘船上养伤。它被3发炮弹击中。4月17日，就在他们到达的4个星期后，荷兰人夹着尾巴撤退了，接下来的4年里圣马丁岛仍属于西班牙。

彼得·史蒂文森回到了荷兰。只有一条腿的他不再适合航海贸易的生活，所以公司给了他一份在岸上的文书工作。他被任命为新荷兰殖民地的主管，并成为新阿姆斯特丹的第一任市长，这是曼哈顿岛上的一个定居点。显然，截肢并不总意味着职业生涯的终结。然而，对于其他失去了肢体的普通海员，通常不能指望这么优越的工作条件。他们通常会被解雇，最后沦落为陆地上的乞丐或海上的海盗。

1664年，新阿姆斯特丹被英国人占领，英国人将其重新命名为纽约。彼得·史蒂文森回到荷兰，但后来又回到纽约，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生活。他于1672年去世，享年61岁，被安葬在圣马克教堂。

1648年，荷兰人根据《明斯特合约》的条款索回了圣马丁，至少，索回了其中一半。法国统治岛的北部（Saint-Martin），而荷兰统治南部（Sint Maarten）。尽管这两个殖民地和谐地共存了将近4个世纪，但岛上的每个人都说英语。大湾背后宏伟的盐滩，现在是国家垃圾填埋场的所在地。

12　诊断

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赫尔克里·波洛和夏洛克·福尔摩斯

过去曾有一段时间，内科医生并不会动手去检查自己的患者。也许是他们自我感觉太好，不愿去做这么无聊的事，或者是害怕自己也染上病。亚洲一些地方和阿拉伯的患者会在一块木头或象牙的雕像上指出他们感到疼痛的地方。至于内科医生是否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就是另一回事了。通常情况下，连这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内科医生其实也无法提供有效的治疗方法。他们开的处方千篇一律：经肛门灌肠，经口腔清洗，还有灵丹妙药——可以帮助缓解所有症状的药物，比如一种用威尼斯蛇干制成的药丸。外科医生与他们天差地别——一切治疗都是靠双手完成的。外科医生的治疗比内科医生更具体。毕竟，手术中没有灵丹妙药——你不能用针对一种疾病的手术来治疗另一种疾病。

幸运的是，医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非外科医生的治疗变得同样有价值而具体。但是，两种职业在处理患者疾病方面始终存在差异。非外科医生应当做出正确的诊断，即确定患者哪里出了问题。目前，医生已经找到了对于大多数诊断的最佳治疗方法，根据固定的方案和指南，用药物对疾病治疗。在这之后，医生要等待患者靠自身的治愈能力来恢复。如果患者没能恢复——即使诊断是正确的——你也无能为力。

外科医生则不同。手术的成功不仅取决于正确的诊断、治疗方案和患者的自愈能力，还取决于外科医生在其中的作用。如果患者没能痊愈，而诊断是正确的，则可能是外科医生出了错。外科医生相对于非外科医生来说，更能亲自参与患者的病程。外科医生本身就是疾病预后的一部分，无论好与坏。

外科医生用与非外科医生不同的方式，来找到患者哪里出了问题。因为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患者的康复取决于你的技能，你一定要找到答案，在开始动手之前绝对地确定。而对于非外科医生来说，这种对确定性的需求远没有那么紧迫。他们完全可以在一开始保守一些。

如何判断患者出了什么问题？换句话说，如何做出一个诊断？在整个医学史上，医生们都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从一开始，他们就要面对患者的恐惧。任何觉得自己命数将尽的人，都想从医生那里得知自己的结局：我还有希望吗？我还能活多久？我会遭受痛苦吗？为了明智地作出回答，你必须认识到患者的问题出在哪里。医生很擅长回答，因为他们在一生中见过的疾病和症状比其他人多得多。一旦他们知道患者得了什么病，就可以做出预测。这两个步骤被称为诊断（diagnosis）和预后（prognosis），源自希腊语“gnosis”，意思是“知识”。诊断（diagnosis）中含有希腊语介词“dia”（通过），意味着“看穿”或“洞察”。预后（prognosis）中含有介词“pro”（之前），意味着预测或设想。

对于初步诊断，仅仅去描述症状就已经足够，哪怕你其实不知道问题是什么。你也不需要用到手。如果你看到一些散布的丘疹，无论这是什么病，那大概都不会有事。但是，如果患者从头到脚长满了渗着液的脓疱，就要当心了。在这两种情况下，你都可以开出简单的家庭用药。就算没有帮助，也没什么坏处。

许多世纪以来，人们对于所诊断疾病的根本病因缺乏了解，这种无知却又被一种虚幻的“四大体液”理论掩盖：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疾病或症状是由体液不平衡引起的，这种观点无益于外科医生。唯一能够补充或减少任一种体液的方法就是放血，而且其疗效非常可疑。这曾是非外科医生的典型治疗手段。

更进一步，医生不仅要找到问题，还要找出其原因。外科医生倾

向于用刀祛除病因。诊断对预后至关重要，病因对治疗也是如此。例如，肠梗阻是指食物和粪便通过肠道时受阻。追溯到人们对病因一无所知的年代，这可以作为一个关于诊断的不错的例子。如果你不做处理，肠梗阻的预后总是悲剧的。患者会出现呕吐、排便排气停止、腹部胀起，并且出现严重的痉挛。如果症状没能缓解，患者终将死亡。但是，如果要进行处理，你不仅要确诊为肠梗阻，还要知道引起它的原因。肠道阻塞的原因可能是肿瘤或炎症，但也可能是一块鸡骨头。诊断是相同的，但手术方法却不同。因此，“患者怎么了”这一问题，其实又包含了一些其他的问题：患者的症状是什么？是什么导致了这些症状？以及这些病因是如何引发疾病的？

现代医学的诊断比以往丰富得多，寻找问题的答案越来越具有挑战性，需要更高级的技能。医生和外科医生的工作方式如同侦破犯罪的侦探。医生试图找出患者的问题，类似于侦探寻找罪犯的过程，寻找病因就像寻找犯罪的动机，探究疾病如何发展就像追踪凶手的轨迹、询问他是怎么使用凶器的。正如真正的侦探都有自己的风格，医生解开谜团的方式也各有不同。

阿加莎·克里斯蒂无疑是最好的侦探故事作家，到目前为止，她笔下最出色的角色是侦探赫尔克里·波洛。波洛是一个善于雄辩的人，迷人而聪明，能够准确无误地破解他所遇到的每一个谜团。但他的创作者也将他塑造成一个具有些许“反英雄”气质的形象。他彬彬有礼，但也很自负；客观公正，但也有些傲慢和喜怒无常；生性好奇，但只在觉得案件足够有趣时才愿意提供帮助；以及，虽然他说法语，但他是比利时人。这位受人尊敬的中年侦探是个古怪、精明又富有的男人，有着一副精心打理的翘八字胡，一次又一次碰巧出现在犯罪现场附近——当然，这让凶手很是懊恼。赫尔克里·波洛的故事总是根据固定的情节展开。波洛的周围总有一群特点鲜明的人物，位于一个相对独立封闭的空间——一幢偏远的乡间别墅、困在雪地里的东方快车或是尼罗河上的一艘船。发生的谋杀案一定由团体内的某人实施。当波洛调

查时，他所了解的很显然远多于他所说的。在最后一章，他会将所有人聚集在客厅或沙龙中，以揭示凶手的身份。然后他分别对每个人进行演说。他解释说，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可能犯下谋杀罪。每个人都有一个隐藏的动机，而没有人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管家有钥匙和得到刀的渠道，男爵夫人有债务因此想要得到遗产，厨房女佣则是妒火攻心——没有什么太离谱的东西。

然而，在讨论了每个角色的动机之后，波洛一一进行反驳论证，表明他或她没有犯下谋杀罪。直到他谈到最后一个人——也就是凶手。直到他单独分析每个角色过后，局势才变得明朗起来。这样一来，紧张的氛围一直持续到波洛分析最后剩下的那个角色，并最终揭开这桩可怕谋杀案的真相。他对每个角色潜在关联的详细描述是如此引人入胜，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忽视他所收集到的大部分信息都与案件无关。毕竟，只有关于真正凶手的故事才能解开这个谜团。

这与内科医生的工作方式何其相似。内科医生作为非外科医生，是普通内科学（GIM）的医学专家，他关注疾病并使用药物治疗。例如，内科医生包括肺科医生、胃肠病医生、心脏病医生、肾脏病医生和肿瘤医生。内科医生可以治疗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血液病、炎症性疾病，实际上是各种疾病，只要不动手术就可以。像赫尔克里·波洛一样，内科医生喜欢用列表来解决问题。波洛对犯罪进行分析时，一开始会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内科医生从患者的主诉切入，询问："你哪里不舒服？"然后他们都将问题提炼出来，在有限而明确的潜在罪魁祸首中寻找答案。波洛思考哪些在场的人可能犯了谋杀罪，而内科医生思考可能引起主诉的原因。这在医学上被称为鉴别诊断。阿加莎常通过限制犯罪现场的人数来让波洛轻松制定名单，同样，内科医生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在鉴别诊断时遇到困难。医学在过去的50年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对于大多数的主诉和毛病，很容易在手册、摘要文章、医学文献或互联网上查找到可能的原因。因此，内科医生很快就可以得出一张鉴别诊断的列表。

然后就该分析证据和线索了。波洛进行审讯和调查，并在必要时让其他人予以协助。内科医生也问他的患者问题，不仅是他目前的主诉，还有他的一般健康状况、他的病史和家庭情况。医生查看患者，进行一些辅助检查——例如验血或X射线——如有必要，还会向另一个领域的专家寻求建议。从本质上讲，波洛和内科医生一样，关注的是所有潜在的犯罪者，而不仅是最可疑的那个。

最后，他们必须排除不可能的罪犯。他们密切关注每个嫌疑人，判断他或她是否可能有罪。他们会彻查整个清单，直到只剩下最后一个——最为可能的那个。对于侦探而言，这个答案是主要嫌疑人；对于内科医生来说，它被称为“临床诊断”。在波洛的故事中，基于概率排除后可能得出非常惊人的结论。例如，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所有在场的人都是有罪的，而在《尼罗河上的惨案》中，受害者本人就是有罪的一方！

外科医生不理解这种工作方式。他们的推理通常更加务实和线性。女人来自金星，男人来自火星，有时在外科医生看来，内科医生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宇宙中，离地球的逻辑十万八千里。比如，当一名患者没有了任何症状应当出院时，内科医生却要求外科医生“除外肠梗阻”，只因为放射科医生在患者的腹部计算机断层（CT）扫描中看到了可能解释为肠梗阻的影像，此时外科医生可能感到非常火大。对于内科医生来说，这样的结果会扰乱他的列表，因此必须由外科医生来排除。然而对于外科医生来说，这显然是胡说八道。很明显，他不可能仅仅出于怀疑而对没有症状的患者进行手术。

相对地，内科医生同样会被外科医生激怒，当外科医生为疑似急性阑尾炎的患者进行手术时，发现有炎症的是小肠而不是阑尾。小肠的炎症不应用手术治疗，而应用药物治疗。但是外科医生坚持他的手术决定，因为他认为患者病情危重，并且可能患有危及生命的腹膜炎。内科医生可能会反驳，阑尾炎的诊断本身就值得怀疑。比如，患者在炎症发生前已经腹泻一周，这样就不太可能是阑尾炎。

这种相互理解的缺乏，背后是演绎和归纳之间的哲学区别，这是两种通过逻辑发现真理的方式。从历史上看，演绎比归纳更古老，但两者都被卡尔·波普尔于1934年提出的“科学方法论”所取代。

在中世纪，人们普遍认为人类知识水平已经在古典黄金时代达到了顶峰。因此，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不加批判地将工作建立在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罗马角斗士医师盖伦的智慧基础之上，而这两位拥有“后见之明”的人并没能为自己的论点提供切实的事实证据。在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家们再次敢于进行批判性思考，并从一般观察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这就是演绎。外科医生从一般观察中得知，腹膜炎可能是致命的，并且手术切除阑尾可降低其风险。从演绎的角度讲，在你怀疑患者可能患有阑尾炎的特定情况下，进行手术合乎逻辑。

在启蒙运动期间，也就是1个世纪之后，实验成为科学的重要基础。由特定的发现得出结论，这就是归纳。某种现象的迹象越多，则其可能性越大，反之亦然。如果CT扫描显示出肠梗阻的迹象，则可能成立诊断，但如果患者没有表现出症状，那么这种可能性减小，如果外科医生认为没有理由进行手术，可能性就更小了。

之后卡尔·波普尔提出了“可证伪原则”和“科学方法论”。他认为，真理是无法被发现的。我们只能提出一个理论，它必须满足一个关键条件：该理论必须以一种可以被反驳的方式来形成。这构成了所有现代医学科学的基础。在日常临床实践中，“科学方法论”的工作原理如下：根据临床诊断，尽快为患者制定明确的治疗方案。这种临床诊断基于可证伪的现实理论。如果治疗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则必须批评性地审视这一诊断。然而，为了得出临床诊断，演绎和归纳都不能抛弃。

诊断

对患者病情的了解主要包括3个要素。首先，医生会询问患者的

就诊史、目前的主诉（症状）和用药情况。这被称为“病史”（anamnesis），来自希腊术语，意思是“记忆”。其次，医生还会询问患者家属所患的疾病，并可能向其他人询问患者情况（他人代述），例如，生病孩子的父母或者交通事故发生时的旁观者。再次，了解病史之后是体格检查，医生会摸、闻、看、听和量。看被称为视诊，摸为触诊，敲为叩诊，用听诊器听为听诊。医生会用食指触诊直肠，这被称为直肠指检。他用灯来测试瞳孔的反射，用锤子测试肌腱的反射，用耳镜来查看耳道，用检眼镜查看视网膜，用锋利的针或音叉测试不同的感觉。医生的鼻子也是一种重要的工具。有时医生甚至可以通过气味准确地确定脓液、伤口感染或体液的性质及成分。医生还可以要求做辅助检查，例如验血、显微镜检查或影像学检查。影像学检查可以是X线片、造影剂检查或CT扫描。其他的还包括磁共振成像（MRI）扫描、多普勒彩超、超声和双功彩超。最后，有时可以通过同位素扫描，利用放射性来识别疾病，这被称为闪烁扫描法。

如果说赫尔克里·波洛是归纳大师，那么世界文学中另一位伟大的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就是演绎大师。福尔摩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解决他的案件，正如外科医生与内科医生得到临床诊断的方法不同。夏洛克·福尔摩斯身材高瘦，外表凌厉。他几乎不吃东西，但因此不停吸烟。他在雾气弥漫的伦敦解开谜题，如同幽灵一般被秘密笼罩。他成功的基础是头脑中各类知识的巨大储存库。他研究水手文身的含义，了解英格兰各地土壤的颜色和成分，还知道每种报纸使用的字体。这些是他进行演绎所基于的一般事实。福尔摩斯方法的优势来自观察。他说：“这个世界充满了显而易见的东西，却没人去观察。”他精神上的父亲以及创造者——亚瑟·柯南·道尔，也是一名医生。福尔摩斯通过演绎来比较他观察到的和他所知道的。他在不停的观察中一路前进，又因为擅长此道而很少需要考虑其他可能或改变策略。因此，他的方法比波洛更有效率、更直接，但也更冒险，因为成功与否取决于他观察到和知道的多少，这就是他独自工作的原因。他确实有一个同伴——他的朋友华生医生，但福尔摩斯更多地把他视为一个学

生，不指望他带来什么帮助。柯南·道尔之所以描写华生，似乎纯粹是为了让侦探寂寞的思想转化为对话，以便于读者理解。

很明显，演绎完全取决于侦探或外科医生的想法。相比之下，归纳要复杂得多，但也更加透明和客观。夏洛克·福尔摩斯不能对他的演绎中许多细节加以说明，只能在最后解释整个事件，因为他的冒险几乎总是以成功作结。包括外科医生在内的医学家们不能允许自己享受如此的奢侈。在伦敦的大雾中，高深莫测的福尔摩斯总能智胜犯罪分子的时代已经过去。现代的外科医生不再将自己视为能够决定患者诊疗质量的唯一专家，对于复杂的病例，越来越多地进行多学科探讨，由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进行分析，才能做出完全合理且记录在案的决策。演绎的时代即将过去，谁知道呢，也许外科医生和内科医生在不太遥远的未来将会相互理解。

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一旦外科医生站在手术台上，手术刀在手，他完全是独自一人，从那一刻起他所做的一切，在患者身上发生的一切，都是他个人的责任。因此，你一定要知道你在做什么，根据概率来治病无助于提升你的良知。

13　并发症

大师与伊朗国王：穆罕默德·雷扎·帕拉维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女演员兼歌手玛琳·黛德丽用一首动人的歌曲——《我从头到脚为爱而生》（*Ich bin von Kopf bis Fuß auf Liebe eingestellt*）[(1)]——温暖了许多前线士兵的心。“想想她的腿有多么修长”，这可不是句寻常的话。甚至有人声称，她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一双腿。照片中的她常常手中夹着香烟，脸上带着那种著名的性感表情。而这些香烟，最终导致了她美丽双腿中的动脉堵塞，黛德丽不得不请血管外科医生进行手术。在她的眼里，只有一个人够格在她举世闻名的双腿上施展魔法：迈克尔·狄贝基。

血管外科医生是专门研究血管尤其是动脉的外科医生。在20世纪早期，一名法国外科医生亚历克西·卡雷尔独自设计并试用了连接动脉和静脉的血管外科技术。卡雷尔的贡献对普通外科学的进步非常重要，因此他于1912年被授予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血管外科手术的条件非常特殊。由于血管相对较小，手术中使用的针和线也比在身体其他部位所使用的要小（细）。一旦血管被切开，血液会立即喷出，因此必须暂时将血管夹紧。但是夹子不能夹得过久，以防止肢体或器官长时间缺乏血供。此外，血液一旦停止流动，就可能会凝固。即使血管被缝合起来后，血液再次流动，血管壁上缝合处产生的血凝块也可能再次堵塞血管。健康的血管对器官和身体其他部位的生存至关重要，血管手术通常会带来更大的紧迫感，一次成功的手术更像是一次抢救。难怪这位血管外科医生被视为国际英雄，在20世纪受到众多名流的推崇。

血管外科手术方兴未艾，激动人心，开辟了通向终极器官——心脏的道路。心脏外科手术的发展，让外科世界产生了无所不能的感

觉，在1967年达到最高峰时——克里斯蒂安·巴纳德在开普敦首次成功进行了心脏移植手术——可以与两年后人类第一次登月相提并论。休斯敦卫理公会医院的心血管外科医生迈克尔·狄贝基一直处于这些发展的中心。他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参与了第一颗人造心脏的开发。他是一种罕见疾病——主动脉夹层治疗的先驱，这是血管外科中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主动脉是人体中的大动脉，起源于心脏，其内膜撕裂会导致主动脉夹层。血液在高压下从裂口进入到主动脉内膜和外膜之间，使得二者分离得越来越严重。这不仅非常痛苦，而且还威胁到大脑、手臂以及身体其他部分的血液供应。狄贝基的手术使得这个重大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

狄贝基被誉为“大师”。他（以及他的绰号）享誉全球，这得益于他最著名的患者——前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国王于1964年秘密前往美国，由狄贝基进行手术。像黛德丽一样，爱德华也是一个老烟枪——事实上，大多数血管外科的患者都是。当时爱德华已经70岁了，这种血管手术在那个年代还有生命危险。但他并没有对媒体透露任何细节，只说：“我来看望大师。”32年后，1996年，当时任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需要做5支冠脉搭桥手术时，他显然不完全信任他的俄罗斯心脏外科医生们，而让这位时年87岁的大师从美国飞过来协助他们。叶利钦称狄贝基是“魔术师”。这些狄贝基的名流患者——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约旦国王侯赛因、好莱坞明星丹尼·凯和杰里·刘易斯、超级富翁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美国总统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以及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一定赞同这个观点。即使迈克尔·狄贝基并不是个谦虚的人，他非常享受名利给自己带来的乐趣，也无损于他的名声。

因此，当伊朗末代国王穆罕默德·雷扎·帕拉维在1980年需要进行脾脏切除术时，在他的眼中，这个星球上只有一位外科医生可以做到这一点。实际上，作为心血管外科医生，狄贝基与脾脏并无关系，显然这对医生和他尊贵的患者都不够合适。

给国王进行治疗的是法国肿瘤学家乔治·弗兰德林教授，他跟随国王在不同国家之间辗转。肿瘤学家是普通内科——而不是外科——中专门治疗癌症的专家。国王不断出现贫血和疼痛，更糟糕的是，还患上了胆囊感染。他在纽约接受了胆囊切除术。美国外科医生证实，他的肝脏由于他的恶性疾病而肿大，脾脏更甚。肝脾肿大是一个医学术语，字面意思是肝脏和脾脏同时增大。脾脏增大意味着他的血细胞不断被破坏，也是造成他疼痛的原因。虽然他的入院导致了外界的示威和骚乱，他和他的家人在美国不再安全，可他的胆囊手术恢复得相当好。他的胆结石问题已经解决，但这对他的病没有帮助。他的疼痛和虚弱与日俱增，是时候切除他巨大的脾脏了。

不久之后，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发生了人质事件，总统吉米·卡特希望尽快摆脱他的这位高级客人。国王和他的妻子法拉赫迪巴王后前往墨西哥、巴哈马和巴拿马，但他们所到之处都充满着引渡的威胁。这种情况下不可能进行手术。只有埃及的萨达特总统愿意为他的老朋友提供庇护所和医疗服务，1980年3月，国王抵达开罗的马迪军事医院。5天后，狄贝基带着他的几名助手、一名麻醉师以及一名病理学家来到这里。3月28日，两名外科医生——狄贝基和埃及的福阿德·努尔为国王进行了切除脾脏的手术。国王的妻子和长子通过与手术室连接的电视观看了手术直播。手术进行得很顺利，根据狄贝基的说法，国王的脾脏和美式足球一样大。

脾脏在体内的作用相对较小，如果有必要，切掉它也不要紧。它通过过滤掉陈旧血细胞，起到维持血液质量的作用，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它是身体免疫系统的一部分。当你在跑步或者咯咯笑的时候，有时会在脾脏附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因此老普林尼认为脾脏的功能与这些活动有关。在16世纪有两次可考的脾脏切除术。据记录，1549年，阿德里亚诺·扎卡雷利在那不勒斯切除了一名年轻女子的脾脏；1590年，同样是在意大利，弗朗西斯·罗塞蒂据称切除了半个脾脏。然而，这些手术不太可能真的摘除了脾脏，因为直到1809年，患

者首次存活下来的腹部手术才出现。更可能的情况是，这两次手术中的“脾脏”都是由于深部皮下挫伤造成的大的血凝块。这种血凝块可以与脾脏非常相似，具有相同的颜色和相同的坚实质地，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两位意大利人会认为他们去除的血凝块是脾脏。第一次真正成功的脾脏切除术是在1876年，由朱尔·埃米尔·贝昂在巴黎进行，切除的是一个20岁女人的脾脏，重量超过1000克。

只要你遵守规则，脾脏切除术就没有那么困难。这个手术可以在外科医生培训的第三或第四年学到，有几个注意事项需要关注，但脾脏本身相对明确。它在正常情况下只有半个牛油果大小，看起来有点像伞菌，进出脾脏的血管位于一侧，类似于伞菌的茎。但它深藏于腹腔的左上方，很难找到。你必须把手伸进腹腔，深过腕部，才能找到它。脾脏很脆弱，如果你把它牵拉得太厉害，它就会撕裂，产生严重的出血。一旦脾脏破裂，很容易因为血液充满视野而找不到它，所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外科医生教授这个手术时，还会给出最后的警告：注意胰腺的尾部！

胰腺是一个细长的器官，德语描述其为腹部的唾液腺。然而，胰腺产生的消化液远比唾液更具侵略性。例如，胰液能消化我们食物中的肉。胰腺的尾部沿着脾脏的血管走行，甚至可以延伸到脾门。如果你将应该夹在脾脏血管上的夹子放得稍远了一点，不仅会去除脾脏，还可能去除一块胰腺。这非常危险，因为胰液可能泄漏到腹腔，逐渐消化身体组织，产生脓液。对于正常的脾脏，一般来说很容易正确夹住血管并分离胰腺。但是切除国王的脾脏特别困难，因为它实在是太大了。

努尔问狄贝基：“胰腺的尾部不是夹在夹子里了吗？”但是狄贝基挥挥手，没有理会他的埃及同事的观察结果，用粗结扎线扎住了夹子下的组织。努尔小心翼翼地建议，至少留下一根引流管，让多余的液体流出腹腔，以防万一，但狄贝基认为没有这个必要，直接缝合了腹腔。他摘下手套时，得到了观众的掌声。切下的脾脏重达1900克。在

脾脏以及切除的肝组织中找到了癌细胞。不幸的是，显微镜也在其中发现了胰腺组织……

手术后第3天，患者左肩背部开始疼痛，并出现发热。但是，手术的伤口很快愈合，国王能够在医院的花园里行走，狄贝基去了休斯敦。在那里，他坦然地像英雄一样接受采访，而他远方患者的病情正在慢慢恶化。高烧不退让国王感到筋疲力尽，他几乎感觉不到疼痛了，整天躺在床上。

发热日复一日地持续了几个月。国王接受了输血和抗生素治疗，一群美国医生来来去去，但狄贝基仍然待在休斯敦，有人将拍摄的X光片寄给了他。他猜测国王的左下肺有炎症，于是进行了支气管镜检查——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气道检查——但没有发现问题。参与国王治疗的专家们完全失去了重点，而在巴黎跟进进展的弗兰德林教授惊异万分：难道就没有人看到患者膈肌下面的那个脓肿吗？

这是手术中常犯的典型错误：腹腔感染会引起发热和腹膜刺激，除非感染位于膈肌下方，此时唯一的症状是发热。“膈肌下方”的医学术语是膈下。因此膈肌下聚积的脓液被称为膈下脓肿。当患者腹腔发生感染时，腹膜受到刺激，会产生剧烈的疼痛，即使最轻微的运动也会使疼痛增加，每位医生都应该发现这么明显的征象。但如果受到刺激的仅仅是膈肌而不是腹膜，则不会出现这些指向性的症状。患者只会发热，或许还有呃逆或肩部疼痛。弗兰德林注意到了这一点，他甚至都不是外科医生。连肺部的X光片都符合这个推断。他决定采取行动，乘飞机到埃及，开始与所有人争论。他让另一位外科医生——皮埃尔·路易斯·法尼兹从法国飞过来。7月2日，法尼兹在国王腹部左上方做了一个小切口，从腹腔中引流出了1.5升的脓液。由此可见，这3个月以来他的膈肌下方一直有一个巨大的脓肿。术后他立刻感觉好多了，能够四处走动，食欲也恢复正常，又开始关注国家事务。然而，3周之后，情况急转直下。他的血压下降，人变得苍白无力，失去了意识。他被输了血，但没有进行手术。1980年7月27日，国王出人意

料地死于内出血，享年60岁。

他所患的是瓦氏巨球蛋白血症，一类罕见的、不太凶险的非霍奇金淋巴瘤，可在肝脏和脾脏中发展。然而国王的死因并不是它，而是狄贝基在脾脏切除术中造成的胰腺损伤。这次并发症是医源性的，即由医生引起。胰腺的尾部被切除后，胰液从切口中泄漏，导致脾脏移除后膈下的巨大空腔发生感染，充满脓液。具有侵袭性的胰液侵蚀了脾动脉壁，导致上腹部动脉突然出血。

这个事件清楚地显示了术后并发症如何危及生命，但不一定都是致命的。如果能及时诊断并采取正确的措施，大多数并发症都可以被成功治疗。只有当持续时间太长，或者一个并发症导致了另一个的发生，才会危及生命。在伊朗国王的案例中，这两种情况都发生了。胰腺受损，导致脓肿产生；治疗得不及时，发生出血，最终导致不幸的患者死亡。

发热

人类、其他所有哺乳动物以及鸟类都是温血动物。我们的身体不断消耗能量，使体温保持在37℃左右。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深埋在大脑的下丘脑中。一种由炎症释放的，名为白介素-6的蛋白质可以破坏它。发热是由体温调定点提高引起的，此后身体更加努力地保持温暖，并感到寒冷。下丘脑将这个不正确的信息传递给大脑，这样我们就会感到很冷，即使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开始发抖和寒战，同时体温调节中枢升高了我们的体温。一段时间过后，白介素-6的影响降低，这个过程就会发生反转：温度下降，我们的身体觉得过热，并开始出汗。发热是否有其作用，目前尚不清楚。我们是应该任由它自然发展、发挥我们尚未得知的作用，还是应该对抗它，尽量降低患者的体温？发热总是有原因的，但有时很难找到。不同的炎症导致不同的热型。病毒感染常导致超过39℃的高烧，而细菌感染引起的发热常在38～39℃。化脓性细菌感染造成有张力的脓肿，也会出现短峰高热（弛

张热），特别是在傍晚。如果是脓液引起的发热，只有在去除脓液后才会消失。结核病发热不明显，但会导致大量出汗，尤其在夜间。伤寒感染会产生一种典型的热型，称为“稽留热”。膀胱感染则不会导致发热。

迈克尔·狄贝基十分高寿。2006年12月31日，97岁高龄的他出现胸痛，他几乎接受了自己将死于心脏病发作的事实。但当他注意到，胸痛持续而自己还活着的时候，这位主动脉夹层手术之父意识到自己患的正是此病。他成为接受这种由他自己设计的复杂大手术中最年长的患者，他在这场磨难中幸存了下来。两年后，在即将满百岁之时，他安详地去世了。

由他设计的特殊镊子——狄贝基镊，至今仍在全世界广泛使用。狄贝基确实是一位伟大的外科医生，也是世界各地许多同行的榜样。但显然，再伟大的外科医生有时也会犯错误。毕竟，并发症是手术的一部分，无论你多么伟大，都无法将其风险排除在外。

玛琳·黛德丽也很长寿。她于1992年在巴黎去世，享年90岁，多亏了狄贝基，她的双腿一直很健康。

14　播散

两位音乐家与他们的大脚趾：卢利和鲍勃·马利

直到19世纪，指挥家们才开始使用如今我们所熟悉的指挥棒。在这之前，他们会站在管弦乐队前方，手持一根顶上带有一个滑稽的装饰球的指挥长杖，打着节拍。这让人联想到行进乐队中在队伍前方挥舞着权杖的指挥。在凡尔赛宫为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服务的宫廷作曲家——让·巴蒂斯特·卢利，在指挥时也会使用长杖。1687年1月4日那个星期六，他在用他的指挥长杖在地板上击打节拍时，遭遇了一场悲惨的意外，77天后，他因此丧命。

巴洛克时代正处于鼎盛时期。凡尔赛宫是世界的中心，而卢利正是其中巴洛克音乐和法国歌剧的大师。2个月前，他的雇主太阳王（路易十四）刚刚在一场肛门手术中幸存下来。卢利将在新年伊始表演《感恩赞》（*Te Deum*）以庆祝国王的康复。为了这个特殊的场合，他将这首最初创作于1677年的神圣颂歌改编为一首权威的杰作。这首歌计划于1月8日星期三在巴黎为国王和大量观众演出，在演出的前一个星期六进行了最后的排练。小号声和钹声回荡在空荡荡的教堂里，还有由50位演奏者以及100多位全国最好的歌手组成的合唱团。站在他们面前的是卢利，他的指挥杖比他自己还要高。

巴洛克音乐的一个典型特征是通奏低音，这是一种主调和声织体，形成整部作品的基调。演奏者们有一定的即兴发挥空间，但卢利会尽可能地干预对于自己作品的演奏，尤其是在排练时。我们可以发挥一点想象，他站在那里，用他那根巨大的指挥杖激情地击打着通奏低音的节拍，不时地敲击地面来引起演奏者们的注意。突然，他戳到了自己的脚趾。让·巴蒂斯特是咬紧牙关继续指挥，还是痛苦地尖叫出来，演奏家和合唱团是沉浸在雄伟的音乐中而没有注意，还是爆发出

笑声，我们都不得而知。或许《感恩赞》的最后一次排练被打断了，痛苦尖叫的卢利被抬下了舞台。无论如何，1月8日的演出照常进行，由卢利主持，并且大获成功。后来，有人看见他一瘸一拐地朝马车走去，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的大脚趾发生了感染。卢利发了高烧，他的妻子请了一位医生——艾略特先生，医生建议他截去脚趾以防止坏疽，卢利拒绝了。

感染缓慢从脚趾蔓延到脚，从脚蔓延到腿。此时截肢仍然可以挽救他的生命，卢利一定明白这一点。然而，他忽视了艾略特医生的明智建议，却让一个开价7万法郎的江湖骗子为自己治疗。一开始，他有所恢复，但很快再次发烧。到了这时，那个骗子已经把钱卷走了。

为什么卢利会拒绝可以挽救他性命的截肢？是因为太过自负，不能忍受失去一条腿吗？卢利不仅是歌剧和芭蕾舞的创作者，同时还是演奏家、演员、舞蹈家和编舞家。他是一位顶级艺人，不仅是在舞台上。他是一位出身卑微的意大利人，在法国从一个小小的吉他手打拼成社会名流。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作曲家、丈夫和父亲，也是太阳王的私交好友。他还是巴黎同性恋圈子里颇受欢迎的一位人物，他用自己的艺术以及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丑闻，活跃了17世纪的法国。如果只有一条腿，他的事业、他的快乐和他的地位都将被抹杀。

还是说，卢利只是鲁莽地低估了情况的严重性？77天对于致命的感染来说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此，不可能是气性坏疽，至少在开始时不是，气性坏疽会像野火那样蔓延，如果不截肢，3天内就会死亡。卢利所患的一定是一种更简单的感染，病菌侵袭性更小，传播得更慢，症状更轻微——轻微到卢利没有感觉到危险。

从事件的描述可以看出，其原因是脓肿引起淋巴管炎和血液中毒，或者是从局部（脚趾）开始的进行性感染，进展为区域性（腿部），再之后是系统性（全身）。这种传播过程称为播散。脓肿本质上是含有脓液的封闭感染。什么是脓液，以及脓液如何产生，已经在

前文阐述过。它是坏死组织、死亡的白细胞和细菌混合而成的“汤”，从感染的开放性伤口流出，质地黏稠，呈米黄色，散发臭气。但它也可以在皮肤之下的身体更深部发展。脓液无法流出，压力增高，就会导致脓肿形成。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开放性伤口和闭合性脓肿，脓液中的细菌是链球菌或葡萄球菌，它们存在于我们自己的皮肤上。如果有脓肿形成，细菌一定是以某种方式进入到皮肤下的深层组织中。这只可能通过伤口发生，我们称之为进入口。它可能是你踩到的钉子，或被狗咬伤，发炎的皮脂腺或汗腺，向内生长的毛发，瘙痒或湿疹引起的伤口，也可能是皮肤上的裂缝。对手指和脚趾来说，甲小皮的损伤可以成为细菌的进入口，卢利的脚趾可能就是这种情况。

此外，卢利的袜子中也满是链球菌和葡萄球菌。在17世纪，没有每天换洗衣服这回事，法国宫廷也不例外。假发、香水和花露水这么受欢迎也就不奇怪了。他们必须用这些东西掩盖没洗的头发、身体和衣服的恶臭。直到100年以后的拿破仑时代，对卫生的理解才渐渐出现，下水道的铺设和提供人们清洗自己身体和衣服的设施开始普及，这一习惯当年与罗马人一起从欧洲消失了。很难想象，太阳王的宫廷生活本来是多么肮脏。卢利汗湿的袜子无疑为细菌提供了理想的滋生土壤。

当脓肿形成，皮肤下细菌起初只会引起炎症。皮肤肿胀起来，变得温暖、紧张、发红、疼痛。但随后，细菌在炎症中击败了炎症细胞，产生脓液。此时，感染正在成熟。越来越多的脓液推挤周围的组织，身体试图通过形成结缔组织或瘢痕组织来阻止这一过程。于是脓液被脓肿壁包裹起来，暂时停止了感染的进一步发展。但因为脓液没有血流，免疫系统无法对抗它，抗生素也没有效果。患者出现严重发热，脓液积聚处摸起来就像一个硬球。如果你将两根手指放在肿胀处，一根手指向内推时，另一根手指被推向外，你就能确定其中充满了液体，这在外科中被称为波动感。如果肿胀处有波动感，说明感染已经成熟，可以切开。

如果切开脓肿壁，让所有脓液流出，那么脓肿壁就有可能像正常的开放性伤口一样二期愈合，这一过程称为切开引流。如果脓肿没有得到及时引流，细菌最终会突破脓肿壁并释放到周围组织中。这会导致皮下脂肪组织的感染，称为蜂窝织炎。

皮下组织中存在交错的微管，它们当中流动的不是血液，而是被称为淋巴液的组织液。这些微管就是淋巴管，其中最小的被称为毛细淋巴管。淋巴管炎发生在这些微管中，感染沿着淋巴管发展，可以在皮肤表面看到一条从脓肿处出发的红线，这条线每天都会变长。

淋巴管汇集于淋巴结，这是一些直径不到半厘米的腺体，聚集在一起成为淋巴管网络中的枢纽。最靠近脚趾的一组淋巴结位于腘窝，其次一组位于腹股沟。感染导致淋巴结肿胀，可以很轻易地从外面摸到皮肤下方的小硬块，第一天在腘窝，第二天在腹股沟。从腹股沟开始，淋巴结在腹部后方继续向上，最后在胸腔汇入血液循环。

没有抗生素，淋巴管的感染——淋巴管炎，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血液中毒，因为大量的细菌将最终进入血液。这些细菌感染会在其他器官中形成脓肿，如大脑、肝脏或肾上腺。整个过程将在这些脓肿中再次开始。患者是否能够幸存下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一般健康状况。健康的个体拥有健康的免疫系统，能存活更长时间。卢利能够坚持77天，一定是个健康的人。

卢利的腿最终变得又黑又绿。他派出一名公证人来起草他的遗嘱，然后让一位牧师听取他的忏悔。在他临终之际，这位10个孩子的父亲，曾与许多男人淫乱的人，作了一曲“*Il faut mourir*，*pécheur*，*il faut mourir*”（现在是时候死去了，罪人，是时候死去了）。卢利于1687年3月22日去世。

屏障

任何生物生存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能够在自身与环境之间保持一道屏障。这需要能量，对动物来说就是需要持续的氧气供应。活细胞只有在其细胞膜完整时才能存活。复杂的多细胞动物，如人类，也有保护其抵御外界的屏障，如外面的皮肤、内部的黏膜以及其间的免疫系统。只有当癌细胞打破这些屏障时，癌症才能发展。在我们的身体中维持屏障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胰腺，它可以消化肉类，但由于其自身的屏障，它不能消化自己。胃黏膜，即胃的黏膜层，甚至可以产生纯盐酸，但自身对其有抵抗力。当活的病原体突破屏障时，就会发生感染性疾病。这可能是皮肤或黏膜上的开放性伤口，或是血液供应不足造成的。后者导致身体组织中缺乏氧气，不再能够产生足够的能量来维持其屏障。物理损伤和缺氧是导致屏障受损的主要机制。了解这些机制是解决现代外科学所面临挑战的基础——在手术中尽可能去修复手术刀所破坏的屏障。也就是说，手术切口周围区域的组织必须保留足够的血液供应，以及，虽然伤口是开放的，但必须保持其中没有活的病原体。

3个世纪之后，另一位伟大的音乐家也死于脚趾的疾病。这个男人的音乐比卢利还要有影响力。他是一种全新类型音乐之父，虽然他全部的音乐作品加起来仅有几个小时。他也曾拒绝切断他的脚趾，尽管切断脚趾可能会挽救他的生命。但是，对他来说，他拒绝的理由不是骄傲或虚荣，而是他的宗教不允许。而且，像卢利一样，他也曾在没能挽救他生命的庸医那里寻求帮助。

一切开始于脚趾的疼痛。他不记得曾在任何地方踢到过它。起初，他可以通过吸食大麻缓解疼痛。他一度以为是踢足球时伤到了脚趾，但疼痛并没有自行消失。医生诊断出脚指甲下面有一个肿瘤，于是做了一个小手术切除，并在显微镜下检查。事实证明，他得了恶性黑色素瘤，一种来源于黑色素细胞（皮肤中的色素细胞）的侵袭性皮肤癌。医生建议他截肢，但他拒绝了这个建议，决定通过绝食、吸烟和草药来应付这场病。两年来，他忽视了自己患病的严重程度，即使

在其他部位也出现了症状。脚趾的癌症已经扩散到全身。最终，他的症状变得非常严重，他再也无法忽视自己行将就木的事实。他用他最美丽的作品之一——《救赎之歌》，表达自己已经接受了这种命运。

鲍勃·马利在德国一个骗子的诊所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8个月，这个骗子认为可以通过特殊的饮食和“全能”注射剂来治愈马利，而此时癌症已经扩散到他的肺和大脑。当马利感到大限将至，他想死在自己家里。在从德国飞往祖国的航班中，他的情况进一步恶化。到了佛罗里达州，由于他病得太重，以至于无法转机去牙买加。1981年5月11日，确诊3年后，他在迈阿密的一家医院去世。他所信仰的拉斯特法里教禁止用截肢亵渎身体，该教的重要特征是避免所有与死亡的联系，比如，致命的疾病。马利享年36岁。

当身体被癌症侵袭，肿瘤细胞的扩散方式如同感染时的细菌。这两种情况都是由局部的病变进展为区域性的，最终影响到整个身体，扩散的机制是相同的。在癌症中，这个过程被称为转移，其字面意思是“移位”。癌症具有3种恶性特征。第一，肿瘤细胞通过离开其原始位置来逃离身体的控制机制。它们能够越过其他健康的身体细胞，这就是侵袭性。肿瘤细胞侵袭的远近，是衡量疾病进展阶段的标志之一。第二，肿瘤细胞的生命周期也能逃避身体的控制机制。它们肆无忌惮地增殖，数量不断增长。第三，肿瘤细胞失去了其起源细胞的特性。越是难以识别的肿瘤细胞，其表现就越恶性。

尽管肿瘤细胞在身体中扩散的方式与细菌感染相同，但它们的速度要慢得多。卢利存活了77天，而马利存活了3年。这两种疾病都是从局部开始，入侵者成功地穿透了身体的屏障。细菌需要等待机会通过受损的皮肤或黏膜进入体内，而肿瘤细胞则主动强行穿过仍然完好无损的屏障。在感染或癌症这两种情况下，身体受到攻击，细菌或肿瘤细胞以快速增殖的形式对身体组织产生活动性损害，从而引起身体的反应。免疫系统试图对抗这种攻击。白细胞、抗体以及巨噬细胞（清除组织损伤的细胞）能够对抗细菌和癌细胞。在这个阶段，攻击

仍然是局部的，局限于感染或肿瘤的起源处。手术切除病源就可以阻止这种攻击。含有坏死组织的感染伤口可以被切掉，脓肿可以切开引流，肿瘤可以被切除。

像细菌一样，肿瘤细胞也可以沿着淋巴管播散到淋巴结。在极少数的皮肤肿瘤中，可以用肉眼看到癌症通过淋巴管的扩散，就像淋巴管炎中可见的皮肤上的红线一样。我们可以想象，癌症就像一只螃蟹：肿瘤是身体，而淋巴管中的播散是腿。这就是“癌症”（cancer）这个名字的来源——拉丁文中的“螃蟹”。然而大多数情况下，癌症的传播无法用肉眼看到。

沿淋巴管扩散的肿瘤细胞会被淋巴结捕获，其作用类似于过滤器。肿瘤细胞在淋巴结中长大成为肿瘤。此时肿瘤的侵袭不再是局部的，而是区域性的。在这个阶段，可以摸到肿大的淋巴结。和卢利一样，鲍勃·马利首先会在腘窝注意到这一现象，之后是腹股沟。原位肿瘤的全切不再有效，而是需要区域切除——也就是说，将受累的淋巴结和肿瘤同时切除。这在外科学中被称为根治性切除术。医学术语“根治性”来自拉丁语radix（根），意思是“斩草除根”。由于事先并不知道淋巴结中是否含有肿瘤细胞，最好在术中将它们全部清除。癌症的手术切除必须是完全的（不遗落任何肿瘤）和根治性的（不遗落与肿瘤相关的任何淋巴结）。抗生素可以治疗区域到局部的大部分感染。对于某些癌症，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也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

一旦入侵者侵入循环系统，它们就会扩散到其他器官。这被称为“远处转移”。疾病到了这个阶段，通常不能再用手术治疗了，只有抗生素（用于感染）和化疗（用于癌症）才可能有效。

我们以TNM分期系统为基础，在局部、区域和系统层面对癌症的阶段进行分类。T代表肿瘤。T1是肿瘤的最早阶段，T3期的肿瘤突破了所在器官的屏障，T4意味着肿瘤已经穿透了相邻器官的屏障。在大多数情况下，全切手术都是可行的。外科医生必须预留出安全范围，

切除肿瘤周围几厘米的组织。这是因为肿瘤细胞通常在微观上比宏观上侵袭得更远。N代表淋巴结。N0代表淋巴结没有被肿瘤细胞所累及，N1表示肿瘤细胞已扩散至最近的一组淋巴结。癌症到了这个阶段，仍可以通过根治性切除术治愈。N2通常意味着受累的淋巴结已不再能通过手术切除。M代表远处转移。M0表示没有远处转移，而M1表示远处器官受到影响。在某些情况下，例如肝脏、肺或大脑中，M1期癌症仍然可以通过手术治疗。

癌症的TNM分期不仅决定了患者的预后——患者还有多长时间可存活——而且还决定了治疗方案的选择。癌症的治疗可以有多种目的。根治性治疗旨在彻底、永久地消除患者的癌症。因此，可以考虑承担严重副作用或致残的风险。这种手术通常只能在早期进行。姑息治疗旨在通过限制疾病的进展，或抑制体内肿瘤细胞数量的增长，来延长患者的寿命。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在获得额外生存年限的收益与治疗的负面效果之间进行权衡。最后阶段的治疗——临终关怀，旨在使患者舒适地结束生命，而不再对抗疾病。

根据医生向鲍勃·马利提出的只截一个脚趾的建议，可以推测当时他的癌症仍然是局部的。肿瘤在他的指甲下生长，很快就会引起疼痛，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在最早阶段就发现了疾病。在这一阶段（T1N0M0期）手术切除恶性黑色素瘤可使患者五年生存率达到90%。但鲍勃·马利拒绝放弃他的脚趾，没能长寿，但他确实是一个传奇。

15　腹部

罗马人与腹壁成形术：卢修斯·阿帕罗尼鲁斯·西亚努斯

在所有可能的生活方式中，西方的生活方式最有可能导致肥胖。肥胖是现代各种疾病的根源，如同流行病一样在世界各地传播。肥胖与II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以及癌症之间都存在密切的联系。因此，西方的生活方式是医疗费用稳步上升的重要驱动因素。这种生活方式其实起源于古罗马。在当时，肥胖正和现在一样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而且也和现在一样，年轻人尤为高发。罗马人发明了汉堡包，这也许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处在公元后的第一个世纪，罗马充满了来自帝国各个角落的奢侈品，至少对于那些能够负担得起的人来说是这样的。城市中富裕公民的生活方式中，最为颓废的是他们的饮食习惯。罗马宴会上可以看到这样熟悉的景象：奴隶拿着水桶，用一根羽毛刺激桌子上斜倚着的客人的喉咙后方来引起呕吐反射，为下一顿大餐腾出空间。烤长颈鹿脖子、填馅大象鼻子、烤猪子宫、海豚肉丸、新鲜鹿脑和孔雀舌馅饼，都是这一时期真实存在过的菜肴。

年轻的卢修斯·阿帕罗尼鲁斯·西亚努斯一定享用过这些美食。他的体重严重超重。他的父亲——老阿帕罗尼鲁斯，是一位勇猛、经验丰富的野蛮杀手，他曾毫不犹豫地惩罚了在战斗中表现怯懦的一队步兵（处死了其中的1/10）。许多年前尤里乌斯·恺撒为罗马帝国攻占的这片区域，日复一日与北方的叛军相抗衡，日耳曼尼亚的生活与城市生活形成鲜明对比。这里的生活包括建造堡垒、进攻和防守，以及简单而贫乏的饮食，都是在当地可以找到或捕获的食物：橡子、兔子、野猪……因为这项工作，阿帕罗尼鲁斯在公元15年被授予罗马帝国的最高荣誉——参加罗马的凯旋游行。他的职业生涯自此腾飞，他

担任了几个月的非洲领事，后来又当了总督，他曾直刺野蛮人面门的长矛被献给了诸神。对他来说，他肥胖的儿子急需改变生活方式。他应该成为一名战士，就像他的父亲一样。

只有一些间接证据证明父子间的这种冲突。老普林尼于公元78年出版的伟大的罗马百科全书——《博物志》（*Naturalis Historia*）一书中，提到了卢修斯经历的这场手术。在第十一册第15章中，关于脂肪组织，他写道："有记录表明，领事卢修斯·阿帕罗尼鲁斯的儿子通过手术去除了脂肪，使他从无法控制的体重中解放出来。"普林尼提及这场手术，来支持他所声称的脂肪组织"没有感觉"并且不含有血管的观点。他还明智地指出，超重的动物（他没有将人类排除在外）不会长寿。

在罗马帝国，这种手术肯定做了不止一次，因为在普林尼时代的几百年之后，在一个遥远的省份朱迪亚，有一名效力于罗马人的当地官员也做了这个手术。据《犹太法典》（第83b章）记载，这位患者是极其肥胖的拉比·以利亚撒·本·西蒙："他们给他用了睡眠药水，把他带到一个大理石房间，破开他的腹部，取出几篮子的脂肪……"这种手术的目的不是美容性的，而是功能性的。《犹太法典》中写道，以利亚撒腹部尺寸的减小，使得他的判断更少出于直觉，而更多出于理智。据称，脂肪还阻碍了他在性生活时的动作自由。

很难相信这些手术是真正切开腹壁，进入腹腔的开腹手术。许多世纪以前，希波克拉底曾写道，切开腹部一定是致命的，罗马人也知道这一点。公元前46年，罗马参议员卡托甚至选择将切开自己的腹部作为可靠的自杀方式。在长时间的冲突后，当他在非洲被恺撒逼得走投无路时，他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在他被人发现在自己的卧室里时，还剩一口气。明知这样做不合适，一位医生还是缝合了他的伤口，但是当天晚上，卡托选择自己抽出了缝线，在日出之际死去了。此时距离人们能够成功完成腹部手术还有1800多年。

第一次开腹手术

第一次成功的腹部手术（开腹手术），竟然是在麻醉发明和无菌观念出现前几十年进行的。美国乡村外科医生伊夫莱姆·麦克道尔于1809年的圣诞节在他位于肯塔基州丹维尔的家中客厅里进行了一场开腹手术，切除了一名44岁女性简·托德·克劳福德左侧卵巢的巨大肿瘤。女人唱着《诗篇》，让自己保持冷静。手术持续了半小时，患者恢复良好，健康且长寿，直至78岁时去世。麦克道尔一打开腹部，肠子就溢出到台子上，但他还是保持着头脑冷静。他写道，在手术过程中他无法将肠子塞回去，但在他移除了巨大的肿瘤之后，显然空间就足够了。如今，开腹手术是腹腔内所有器官的标准手术。腹部可以以各种方式打开：沿着中心线做垂直切口、水平切口、斜切口、弯形切口、V形切口、麦氏切口、科克尔切口、右下腹腹直肌外缘切口，或是普芬南施蒂尔切口。开腹手术可以应用于治疗腹部感染、胃肠道穿孔，切除肿瘤或治疗肠梗阻——食物和粪便通过肠道时发生阻塞。然而，开腹手术已经越来越多地被腹腔镜手术（腹部的微创手术）所取代。

当然，在战争时期，外科医生不得不处理大量撕裂的腹部和溢出的肠子，但这些不幸受害者的存活率非常低，以至于任何有自尊的外科医生在和平年代都不会考虑给患者造成类似的伤口。那么，腹部被打开究竟有什么危险，以至于成为外科医生这么长时间以来的禁忌？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打开和缝合腹部与治疗其他的伤口没有什么区别。危险在于腹壁之下的复杂性。

简单的民间传说告诉我们，我们早期对腹腔的认知并不十分高明。在现实生活中，你不可能走进鲸鱼的肚子，几天后再走出来。你也不可能轻易地从狼肚子救出穿着睡袍的祖母、穿红色连帽斗篷的小女孩或者六只小山羊，再用石头填满肚子，最后缝起来。撇开别的不说，我们吃下的东西不会进入腹腔，而是进入了肠道。

胃肠道从本质上讲是一个从嘴到肛门的长管。长管的不同部位具有不同功能、结构和名称，但仍然是同一根管子。从口腔到咽部，然后是食道、胃、十二指肠、小肠、大肠（结肠），其中包括盲肠和阑尾，最后到达直肠。从胃到直肠，总长约9米的肠管折叠于腹腔中。整个肠管通过肠系膜连接到腹腔的后部。因此，胃和肠在腹腔内并不是完全游离的。血管行走于肠系膜中，进入肠道和胃。腹腔内还有其他4个器官：肝脏、胆囊、脾脏和网膜——大量的脂肪组织。如果是女性，还有子宫和双侧卵巢，只有这些。肠和器官之间有少量液体，但没有空气。腹腔与身体的任何天然孔道都不相通，所以它是无菌的。

腹腔几乎完全被肠道和器官填满，肠道直接紧贴在腹壁上。切开腹壁时必须非常小心，以免损伤肠道。但出于各种原因，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腹腔压力很高，因为腹部的肌肉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每侧有4块肌肉：腹直肌（左侧和右侧连在一起，更常被称为“abs”，即腹肌）垂直走行，腹外斜肌和腹内斜肌分别向下和向上斜向运行，腹横肌水平延伸。我们在站立、坐直，或弯腰时，都要用到这些肌肉。但当腹壁被切开时，腹部肌肉也会紧张，作为对患者疼痛、恐慌和挣扎的反射反应。因此，腹壁紧压在肠道上，使得手术刀很难避开它们。切口一旦切开，压力就会使肠子从伤口溢出，在你反应过来之前，它们就已经在肚子外面或是手术台上了。这当然给外科医生带来很大的困难。反向过程同样棘手，因为几乎不可能塞回一个有意识的患者的肠子，更不用说整齐地缝合伤口了。

在公元前3世纪，托勒密亚历山大的两名医生，埃拉西斯特拉塔和赫罗菲拉斯，被允许对被判处死刑的囚犯进行活体实验，来研究人体腹部的解剖结构。活体的腹部肯定压力很高，但当然，没有必要再将它们缝回去。那些不走运的受害者一定有着非常惨烈的遭遇，但也许其他折磨人致死的酷刑会比这还可怕。他们会注意到，切口的疼痛之后是腹膜的疼痛，腹膜衬于腹腔内壁，延伸到肠道和腹部器官周

围。它含有神经纤维，一碰就会导致严重的恶心和干呕。每次碰到腹部内，你的患者就痛苦地尖叫并开始呕吐，你要怎么有效地进行手术？如果你在打开腹部时损伤了肠道，其中的内容物和所含的细菌都会溢出到腹腔内，患者会在几天内因腹膜炎死亡。所以你需要的是一个平静的患者，他没有任何感觉，腹部肌肉不会紧张，也不会开始呕吐。当然，外科医生也要懂得卫生，而且不会伤到肠子。

在《犹太法典》的故事中，拉比·以利亚撒做手术所用的特殊大理石房间，可能暗示了当时人们认为的手术所需的基本卫生条件。但这肯定不会达到腹部手术所必需的环境清洁标准。手术前给拉比的睡眠药水也暗示着某种麻醉剂，但它肯定不会起到足以使腹部肌肉充分放松并使腹膜麻痹的作用。阿帕罗尼鲁斯和以利亚撒都不可能进行了真正的腹部手术，因为我们知道，这两个人在手术后还幸存了很多年。对于腹部肥胖的人来说，多余的脂肪并非都在腹腔内——它也可以聚集在皮下，也就是皮肤和腹部肌肉之间。如果这两个人做的不是从腹腔内移除脂肪的手术，那一定是从肚子周围去除脂肪的手术。换言之，是腹壁外而不是腹腔内的手术。在医学术语中，这种手术被称为腹壁成形术（abdominoplasty，来自腹部“abdomen”和希腊语“-lastos”，意思是塑造或成形）。它还有一个流行的名称是“腹部拉皮手术”。

然而，在那个年代，即使这种手术也是危险的。我们现在知道，如果你从肥胖的患者身上去除皮肤和皮下脂肪组织，那么伤口就会经常发生问题，因此腹壁矫形只对那些已经减掉相当多体重的人进行。在这方面，普林尼用卢修斯·阿帕罗尼鲁斯的手术来说明他对脂肪组织特性的认知几乎是正确的。皮下脂肪组织虽然的确含有血管，但真的很少。这意味着皮下脂肪层越厚，伤口发生感染或无法正常愈合的风险就越大。

在罗马时代，伤口感染仍然是危及生命的并发症。我们从其他消息来源得知，卢修斯在手术后长寿且健康，对他来说，腹壁矫形显然

没有出现严重并发症。或许他在接受手术之前已经减轻了一些体重，普林尼所提到的“他无法控制的体重”并不是直接指他的肥胖，而是指他减肥后留下的多余皮肤。另外，我们得知拉比·以利亚撒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遭受了可怕的痛苦。这会不会是手术引起的并发症？

今天，腹壁成形术的体重上限通常为100千克。1899年，巴尔的摩的一位妇产科医生霍华德·凯利描述了现代的首例腹壁成形术。20世纪60年代，巴西整形外科医生伊沃·皮坦基因其为伊丽莎白·泰勒服务而闻名，发明了用于美容的腹壁成形术。这项手术成为目前所有腹壁成形术变体的基础。1982年，法国外科医生伊夫·热拉尔·伊洛兹提出了一种用钢管和强力真空去除皮下脂肪的新技术。这种吸脂术是在皮肤上做一个小切口，在皮下脂肪组织中强力地来回拉动钢管，将其打成较小的碎片并吸走。从这一点看，普林尼也几乎是对的。脂肪组织并非完全没有“感觉”，但包含的神经纤维极少，可以在局部麻醉下进行吸脂。去除多余皮肤的选择如今已经大大扩展，其巅峰是“全身轮廓术”，一种360°的整形手术。患者首先仰卧，在腹部皮肤上进行手术，然后在全身麻醉下翻身，这样医生就可以在背部手术。

故事中两位主人公的生活怎样？卢修斯·阿帕罗尼鲁斯真的成为了一名战士，在非洲与他的父亲并肩作战。在那里，远离了城市的颓废，他轻易地保持了健康的新生活方式。他也升职到了最高级别，公元39年，他与皇帝卡里古拉一起成为领事。

大约2000年后，曾给他造成困扰的西方生活方式重新浮出水面。在新千禧年开始时，全世界1/8的成年人患有肥胖症，其中只有5%的人成功地追随小阿帕罗尼鲁斯的脚步，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老普林尼死于公元79年的维苏威火山爆发，熔岩覆盖了整个庞贝城。为了防止被天上掉下来的浮石砸死，他在头上系了一个垫子，但是没有什么用，他在烟雾中窒息而死。顺便说一句，如果我们采信他

的侄子小普林尼对他死亡情况的记录，他自己也是超重的。

在本章中，我们假设普林尼的意思是，做手术的是领事老阿帕罗尼鲁斯的儿子。然而，由于小阿帕罗尼鲁斯和父亲同名，而且他在普林尼写下关于手术的逸事之前也已经是一名领事，做手术的也可能是他的某一个儿子。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故事就不那么精彩了……

16　动脉瘤

外科相对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现代外科学并不是绝对的科学，它是一种计算概率的科学。例如，胆囊的炎症很可能伴有发热，但一个发热的人患胆囊炎的可能性要小得多。毕竟一般来说，发热比胆囊炎更常见。如果除发热以外，出现另一个胆囊炎典型的症状或体征，则更可能是胆囊炎。第三种典型的症状或体征显然会使得诊断的可能性再度增加。三种症状或体征的组合称为三联征。胆囊炎的三联征是发热、上腹部向背后放射性疼痛，以及“墨菲征”——右上腹部的压痛随着吸气而加重。三联征是“特异性”的，换言之，诊断很可能成立，如果所有三种指征同时出现，患者很可能患有该种疾病。但它们大多不够“敏感”，这意味疾病常常不伴随完整的三联征出现。

辅助检查——如验血、X射线或超声——有其自身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在解释其结果时必须考虑到。即使是决定是否做手术（手术指征）也是相对的，仅仅基于概率。必须权衡手术成功的可能性和不做手术的风险。这些概率和风险常用一些术语表示，如“30天死亡率”（患者在手术后第一个月内死亡的概率），“发病率”（手术引起副作用和并发症的可能性），“复发率”（疾病复发的概率）或“5年生存率”（患者在5年后仍然活着的概率）。现在，对于大多数检查、疾病和手术，这些概率和风险的程度是已知的。手术前将这些百分比因素考虑在内被称为循证手术。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必须根据医学研究文献中所公布的数字做出手术决定。这些文献可以在互联网上查阅，例如在pubmed网站上，通过精心挑选关键词，你可以在医学期刊上找到有关某个医学问题的所有内容。因此，在现代外科手术中，没有明确的“是”或“否”，只有或高或低的概率、或多或少的成功机会。

所以当然会有例外。有些患者向我们证明了，不可能的事情也可能发生，比如患有令人意外的疾病，或是活得比预计更久。这些患者是外科相对论无可辩驳的证据。相对论之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就是这样一位患者。他患的是一种危及生命的主动脉疾病，但他的症状却与胆囊炎相似，并且他带病存活的时间超过了理论上的预期。

主动脉是我们体内最大的血管。它从胸腔垂直向下延伸，穿过腹部的部分，也就是腹主动脉，通常直径约为2厘米。如果主动脉壁的刚性受到损害，其中血液的压力将使它像气球一样缓慢地膨胀。不同于其他心血管疾病，这种疾病并不总是能找到明显可证的原因。动脉的膨胀称为动脉瘤，在腹主动脉中称为腹主动脉瘤，简称AAA。因为动脉瘤并不限制血液流动，所以通常不会出现任何症状。然而，腹主动脉瘤最终会破裂，因此一旦达到一定的大小，就需要治疗。腹主动脉瘤成为急性腹主动脉瘤（AAAA），就会表现出症状。动脉压力剧增，动脉壁上产生的小裂口和流出的血液会导致腹部或背部剧烈疼痛，如果没有紧急治疗，主动脉可在数小时或数天内完全破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患有腹主动脉瘤，并且有症状，但不是几个小时或几天，而是许多年。

爱因斯坦在1905年提出相对论时只有26岁。它改变了世界，$E=mc^2$成为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公式。但法西斯思想和公开的反犹太主义正在欧洲酝酿，到了1933年，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纳粹——在德国上台，身为犹太人的爱因斯坦得到了一份在新泽西的普林斯顿的诱人工作，便离开德国前往美国。同年，柏林外科医生鲁道夫·尼森也逃离德国前往伊斯坦布尔。

尼森可能不像爱因斯坦那样出名，但他因尼森胃底折叠术而被外科医生们铭记。这种优雅的外科手术用于治疗胃食管反流病（胃酸反流）——胃内容物反流入食道，引起胃部灼烧感和呃逆等令人不快的症状。但作为普通外科医生，尼森的影响更大。1931年，他首次成功切除了全肺，他发明了术中冰冻切片——一种在手术过程中对标本进

行快速显微镜分析的方法，他还是第一个完成食管全切除术的人。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也移民到美国，但由于他的行医资格在美国无效，他先以外科助理的身份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在1941年于曼哈顿开设了自己的私人诊所。不久之后，他接受了纽约的两家医院——布鲁克林犹太医院和迈蒙尼德医院的邀请，担任首席外科医生，并获得了良好的声誉。

1948年，他在那里遇到了他最著名的患者。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当时已经69岁，从未出现过健康问题，尽管他一生都抽烟，从不进行运动，近年来体重增加可能是因为他著名的不健康的饮食习惯。爱因斯坦向尼森咨询，因为他一年中好几次出现腹部右上方疼痛，每次持续数天，并伴有呕吐。这些症状很可能由胆结石引起。胆结石发作的三联征是右上腹疼痛、恶心或呕吐、无法静坐。但爱因斯坦解释说，这次他在普林斯顿的家中浴室里晕倒了——这就不再是胆结石的典型症状了。X射线没有显示胆囊结石的迹象，在查体过程中，尼森在他的腹部中央触到了搏动性肿块。他担心这可能是腹主动脉瘤，爱因斯坦在他的浴室里经历的突发疼痛和昏厥可能是急性腹主动脉瘤的症状。如果是这样，他不做手术就将面临死亡的危险。

在今天，这是一项具有良好结果和可接受风险的标准手术，而且69岁的患者相对来说也还算年轻。然而，它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在1948年还无法实现的两个先决条件。首先，在手术前，患者必须进行X线检查以确定动脉瘤的大小（直径）、延伸（长度）和位置（相对于肾动脉）。在今天，这些可以通过使用造影剂的CT扫描（增强CT）和超声检查来实现，但在1948年，这些方法尚未开发出来。因此，尼森必须在手术过程当中自己设计好流程。其次，实际上他并没有什么能为患者做的。直到1951年在巴黎，替换腹主动脉的手术才首次成功，外科医生查尔斯·迪博使用了一段来自已故供体的主动脉。在1948年，如果急性主动脉瘤破裂，外科医生可以结扎主动脉来挽救患者的生命，但是，由于切断了腿部血液供应，双腿会坏死。在阿尔伯

特·爱因斯坦的案例中，这种可怕的并发症是不作考虑的，因为看上去他的性命似乎并没有受到威胁。

当尼森为爱因斯坦进行腹部手术时，他发现胆囊中是没有结石的，但他也发现了一个葡萄柚大小的腹主动脉瘤。由于动脉瘤仍然完整，尼森采用了一种实验性的方法：用玻璃纸将其包裹起来。他的想法是，玻璃纸——用于包裹糖果、面包和雪茄的合成材料——对身体来说是异物但完全可溶，会刺激结缔组织反应，形成疤痕组织，从而使扩张的薄弱主动脉壁加强，也许能将不可避免的破裂推迟一段时间。

玻璃纸（赛璐玢）是一种透明的纤维素聚合物，开发于1900年，它有着广泛的用途，为了探索其在外科手术中的潜力，人们进行了实验。虽然这种方法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但长期结果尚不清楚。将有史以来最伟大科学家的动脉瘤包裹在一个三明治袋子（本质确实如此）中，确实需要胆量。在爱因斯坦手术后的几年中，玻璃纸的使用完全被血管假体手术取代，主动脉的病变部分被塑料管替代。今天，提到手术中使用玻璃纸，许多血管外科医生都会大笑。然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带着他包装整齐的葡萄柚般的动脉瘤，又活了7年。从我们对腹主动脉瘤的了解来看，这是一个小小的奇迹。

尼森对爱因斯坦腹主动脉瘤大小的估计大概不是随口说的。医生经常用水果来描述像肿瘤或动脉瘤这类占位性病变的大小。柑橘、橙子和葡萄柚特别受欢迎，因为它们分别能够用来表示直径为2、3和4英寸（1英寸约等于2.54厘米）的物体。尼森一定会慎重选择他的水果，因为动脉瘤越大，患者的预后越差。正常大小的葡萄柚直径为10厘米。未经治疗的直径大于7厘米的腹主动脉瘤患者中位生存期仅为9个月，这意味着有一半患者在此之前死亡。大于8厘米的动脉瘤破裂的年风险超过30%。因此，动脉瘤直径为10厘米的爱因斯坦本应在一两年内死亡。他存活7年的概率只有百分之几。

尽管爱因斯坦处境危险，但他很快康复，并在3周后就离开了医院。在手术4年后，他甚至被提名为以色列国总统。在爱因斯坦生命的最后7年里，他的科学研究自从相对论以后没有取得任何重大突破，但他仍然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工作。但是，当他徒劳地试图将万有引力定律与量子力学相统一时，拉普拉斯的物理定律——动脉瘤壁上的张力在恒定的压力下与直径呈正比——正在他的动脉瘤上起作用。动脉瘤越大，相同压力施加在动脉壁上的张力越大，因此动脉瘤不仅趋于变大，而且随着动脉壁变得越来越薄，增大的速度也越来越快，破裂的风险随之增加。

缝针和打结

外科医生可以用单根手指、双手或持针器非常快速整齐地打结。有一种特殊的外科结是方结的变种，用线的一端缠绕另一端两次，而不是一次。然后拉紧缝线，保持结平整。双重扭曲有助于防止结松动，还要在上面再系一个结。当你把整个结拉到一起时，线的两端缩起，使结的第一部分变得更紧。这些扭曲都会防止结的滑动。然而，手术中最常用到的是简单的挤塞结。不拉紧结，而是在同一根线上一个接一个地将它们系在一起，整个结仍然可以滑动，从而可以调节张力。然后在另一个方向拉紧，“锁定”整个结。最简单的缝合方法是一个单圈：在伤口的一侧从外向内进针，再在另一侧从内到外穿出，并以打结结束。为了尽可能精确地对合皮肤边缘，外科医生会使用“多纳提缝合”（垂直褥式缝合）。缝完一针后，不直接打结，针和线再反向穿过距离边缘两侧只有1毫米的皮肤，然后打结结束。

1955年4月，爱因斯坦再次出现腹痛，这次还伴有发烧和呕吐，此时他76岁。虽然一切都再次指向胆囊炎（完整的三联征存在），但医生自然害怕它是急性腹主动脉瘤。到了1955年，用血管假体治疗动脉瘤是可能的，有此经验的纽约血管外科医生弗兰克·格伦被要求前来与爱因斯坦讨论手术。他造访了教授并提议手术，但是爱因斯坦拒绝

了。“人工延长生命索然无味，”他说，“我已经完成了我的分享，现在是时候走了。我会优雅地离开。”爱因斯坦被给予吗啡，入住普林斯顿医院。两天后，4月17日晚上，他去世了。他特殊的临床症状——以急性胆囊炎三联征为表现的动脉瘤破裂，被命名为“爱因斯坦征”，以纪念他。

所以尼森的玻璃纸究竟起到作用了吗？很可能没有，只是爱因斯坦很幸运。第二天，病理学家托马斯·哈维对这位世界著名的科学家进行了尸检。他观察到了吸烟者典型的肺部、动脉硬化、肝脏肿大、腹主动脉瘤破裂，爱因斯坦的腹腔中有至少两升的血。他的胆囊是正常的，但大脑重1230克，比普通成年男性少200克。

17　腹腔镜

内窥镜和微创革命

1806年12月9日，在维也纳的约瑟芬医学院举行了科学会议后，7位绅士来到一间密室，助手已经在那里准备了一具年轻女子的尸体。教授们将使用这具尸体测试由一位德国医生——来自法兰克福的菲利普·波兹尼所开发的装置。

波兹尼称这种装置——包括一根蜡烛、扩张器（用于检查身体孔道的医疗器械）和目镜（如同显微镜或望远镜上的目镜）——为“光导器”。他承诺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每个医生都知道扩张器的设计是有缺陷的。在理想情况下，扩张器、光源和眼睛都在一条直线上，以防止阴影的产生，但实际上，不是蜡烛挡住了医生的视线，就是医生的头部阻挡了光源——而且蜡烛会使得设备过热。而当主任、副主任以及4位尊贵的教授和主治医师使用波兹尼的设备，来检查台子上尸体的阴道和肛门时，他们高兴地提出：“我们收到并检查了波兹尼医生从法兰克福寄来的光导器，决定直接在为此而准备的女性尸体上进行测试。其结果远超预期，前途无量。”

虽然希波克拉底和古代的外科医生已经使用扩张器来检查身体上的孔道，但是这次取得满意结果的“法兰克福光导器”实验，被视为内窥镜的真正诞生，这种技术可以让医生在充足的光线下检查身体内部。在随后的几年中，光导器得到了各国医生和仪器制造商的改进。1855年，法国外科医生安东尼·让·德索梅将他的改良版本称为内窥镜，也为这一学科命名：内镜学——“向内看”。

大约190年后的1996年2月9日，在位于布鲁日郊区阿瑟布鲁克的圣卢卡斯医院举办了年度腹腔镜手术研讨会后，比利时外科医生卢克·

范·德·海登紧张地坐在礼堂前面的一张小桌子旁。为了这个正式场合，他换掉了手术服，穿上一套精神的西装。电视摄像机的镜头对准他，技术人员正试图与位于150千米外荷兰尼沃海恩的圣安东尼斯医院取得联系。一种相对较新的技术——综合业务数字网（ISDN），使通信连接成为可能。荷兰外科医生彼得·戈出现在屏幕上。图像有些不稳定，他用细小的声音解说道，他的患者已经麻醉完毕，在手术台上做好了准备。患者患有腹股沟疝，他将通过腹腔镜（微创）手术进行修复。然而，患者腹部的摄像头不是人手控制，而是由机器人控制的——卢克·范·德·海登将在比利时进行手术。在荷兰的彼得·戈手术团队成员们双臂抱于胸前时，比利时的一个按钮控制着摄像机在患者的腹部上下左右地移动。

尽管腹腔镜疝修补术最终由荷兰外科医生彼得·戈完成，但这次远程操作摄像头的手术是世界上首个远程手术的实验。20多年后的如今，借助腹腔镜进行复杂的手术——例如直肠切除、肾上腺切除、大肠部分切除或胃旁路手术——已成为标准手术方式。这意味着手术可以更快地进行（通常在1～2小时内），比传统的开放式手术更安全也更容易。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需要点燃蜡烛的仪器是行不通的，1879年维也纳乐器制造商约瑟夫·莱特和泌尿科医师马克西米利安·尼茨，通过将光源从身体外部移动到体腔内，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莱特和尼茨发明了一种经由尿道进入膀胱内部，用发光的电线（这比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发明灯泡早大约6个月）来产生光线、通过水进行冷却的膀胱镜。膀胱镜使得莱特闻名于世。他说服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外科医生维也纳的西奥多·比尔罗特的助手约翰·冯·米库利兹，帮助他开发终极的内窥镜——胃镜，观察胃内部的仪器。莱特和这位助手设计了一个带有水冷灯的长管。由于患者要完全将长管吞下，1880年冯·米库利兹在马戏团表演吞剑的演员身上进行了第一次胃镜检查。冯·米库利兹（有时与他的学生乔治·凯尔林一起）使用胃镜检查了数百名患者的胃。

塔和套管针

腹腔镜手术完全依赖于科技。它需要4种装置，一个叠一个地放在可移动的小车上，称为腹腔镜塔。最上面的是屏幕；下面是摄像单元，手持数码摄像头连接于此；再下方是气腹机，它能用二氧化碳使腹部充气并维持恒定压力；最下面是光源。3根线从塔上连接到手术台：摄像机的电缆、用于照明的光纤电缆和二氧化碳气管。摄像机电缆和光缆连接到腹腔镜镜头，镜头是直径约10毫米、长30～40厘米的管状仪器，带有镜头系统，用于拍摄图像和照明。为了进入膨胀的腹腔，需要从腹壁插入称为套管针的装置。它们是直径在5～12毫米之间的管子，带有密封阀，镜头、夹子和其他器械可以通过它们进入腹腔。腹腔内的切割和烧灼需要使用电，所以腹腔内的气体不能含氧气，所有的器械和套管针都是绝缘的。套管针和腹腔镜器械精密又复杂，而且由于它们容易损坏、难以清洁，许多都是一次性的，每次腹腔镜手术后都要丢弃。这使得腹腔镜手术费用高昂，但患者在医院花费的时间更少，这可以视为回报。

用冯·米库利兹的硬管进行胃镜检查对患者来说一定是一次可怕的经历。患者仰卧在台子上，头悬在边缘。然后，足有60厘米长的金属管将从他张开的嘴插入食道，进入胃部。充气使胃膨起，再打开灯，就能够看到胃的内部。如果患者躺着不动，没有出现惊慌或窒息，医生就能有足够的时间来检查胃的一部分。这并不够理想，但已经比以往任何人想象的要好了。

下一个里程碑实际上是其他想法的一个副产品。给腹腔充入空气的实验已经进行了好多年，被称为气腹，人们用这种方法尝试治疗结核病，当时除了实验，也没有别的方法对抗消耗性疾病，甚至有人声称在某些案例中还取得了成功。不管怎么说，人们知道给腹腔充入空气基本没什么害处。冯·米库利兹也尝试过气腹，还在他的胃镜里使用了相同的气泵。他的助手乔治·凯尔林提出用增高腹腔内气压的方法来

控制腹部内出血的想法，并在狗身上进行了实验。

首先，凯尔林使实验动物的肝脏破裂，然后给腹腔充气并等待。但是这些狗都死了。他想不通为什么这个主意不起作用，想知道腹腔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于是他将一个尼茨-莱特膀胱镜从腹壁插入充了气的腹部，用肉眼进行观察。结果表明，气压完全没有压迫肝脏的伤口闭合。当他看着狗流血致死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发明了新东西。

1901年9月23日，凯尔林在汉堡的第73届自然主义科学家医学大会上，在观众面前重复了这项实验，但没有让肝脏破裂。他给一只健康狗的腹腔充入空气，通过腹壁插入膀胱镜，微创手术就这样诞生了。

很难想象，如今在现代外科手术中不可或缺的腹腔镜，曾经完全属于不做手术的内科医生的领域。当凯尔林在1901年进行第一次腹腔镜实验时，能够支持诊断的辅助检查很少。血液检查仍处于萌芽期，X射线在腹部检查中没有显示出太大的价值，显微镜检查只有在患者死后才能进行。因此腹腔镜成为一种受欢迎的新方法，它促进了医学的重大进展。但此时它还与手术无关，而是被用于检查肝脏和其他器官，以确定疾病扩散的程度。在初期也出现过一些问题：1923年，一次腹部充氧造成了短暂的起火，幸运的是对患者造成的伤害很小。从那以后，不会爆炸的二氧化碳开始被使用。

使腹腔镜从诊断性腹腔镜（在腹腔内观察）更进一步到治疗性腹腔镜（在腹腔内进行操作）的不是外科医生，而是妇科医生，因为从肚脐插入的腹腔镜不仅能看到肝脏，还可以很好地看到子宫和卵巢。只需将手术台头侧向下倾斜，肠道就会从下腹部移位至上腹部。与内科医生不同，妇科医生习惯于进行手术，对他们来说，只需要迈出一小步就可以借助腹腔镜进行小手术。从腹腔镜绝育（将两个输卵管结扎起来）开始，然后再进一步，切除卵巢上的囊肿，去除异位妊娠。

随着他们越来越熟练，进行的手术也越来越复杂。德国妇科医生库尔特·塞姆用腹腔镜切除了子宫肌瘤，并且最终能够切除整个子宫。1966年，他将第一台用二氧化碳给腹腔充气并使其维持在安全的恒定压力下的自动气腹机（CO_2-Pneu-Automatik）推入市场。塞姆还发明了第一台腹腔镜训练机，妇科医生可以通过一个盒子里的模型学习如何进行腹腔镜手术。

1975年12月2日，外科医生亨克·德·库克在荷兰霍林赫姆的医院进行了世界上第一台腹腔镜辅助阑尾切除术，他是从他的兄弟——妇科医生杰夫那里学习的腹腔镜手术。他用一只手拿着腹腔镜，定位到了阑尾，再用另一只手确定腹部切口的位置，做一个非常小的切口取出阑尾，整个过程用腹腔镜进行观察。他的外科同行们认为整台手术都很丢脸。

腹腔镜在外科医生中并没有受到太多欢迎。因为你总是要用一只手握住腹腔镜，只剩一只手来进行手术。随着全新技术的出现，腹腔镜的外科应用才真正成为可能。1969年，乔治·史密斯和威拉德·博伊尔发明了电荷耦合器件，也就是更为人熟知的CCD硅片，可以对图像进行数字化处理。第一台CCD相机于1982年上市，短短几年后，最新型号的相机体积就缩小到可以由外科医生的助手拿着，而外科医生可以站直，眼睛看着屏幕，但仍然有许多外科医生不相信。首次视频辅助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利用摄像机和电视屏幕切除胆囊——由菲利普·穆雷于1987年在里昂进行。穆雷实际上是一名妇科医生，但这次手术的成功使得许多外科医生跃跃欲试，几年之内，腹腔镜手术便如同野火一样蔓延开来。

胆囊切除术成为世界上最常进行的腹腔镜手术。它只需要3～4个小切口，总共不超过4厘米长，而经典的胆囊切除术切口长度超过15厘米。这项创新被媒体作为大新闻宣传后，公众很快注意到其中的差异。患者经受更少的疼痛，不需要再在医院待上1周，而是在术后第二天就可以回家。这是一场真正革命的开端。微创手术——用尽可能

小的手术技巧进行最大程度的手术干预——成为21世纪外科学的关键词。这听起来很合乎逻辑，但只有在复杂高科技发展的前提下才可能实现。

现在，所有的腹部器官都可以借助腹腔镜进行手术。2001年，法国教授雅克·马赫斯克以范·德·海登和彼得·戈的成就为基础，进行了一次跨大西洋的壮观手术，他称之为林德伯格手术。他身在纽约，控制斯特拉斯堡的一个机器人，对近6437千米（4000英里）外的一名女患者进行了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再之后，马赫斯克在没有做切口的情况下，通过阴道内的开口用内镜取出了胆囊。尽管外科医生们尽最大努力在外科学中进行创新，但近年来在微创技术方面突飞猛进的是放射科医生和心血管医生。他们现在可以通过腹股沟穿刺替换心脏瓣膜、对脾脏进行止血、通过肝脏取出胆管中的结石、治疗破裂的主动脉瘤，好像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一样，根本不需要手术。

至于非外科医生，在摄像机腹腔镜手术出现的几乎同一时期，他们也不再使用诊断性腹腔镜检查，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被外科医生所替代。当时其他的技术已经出现，包括超声扫描和计算机断层扫描，这些都能够提供比腹腔镜更清晰的肝脏图像。

发明腹腔镜的乔治·凯尔林于1945年德累斯顿大轰炸时在家中去世。他的尸体一直未被找到。

18　阉割

一种简单手术的历史：亚当、夏娃和法里内利

古希腊创世传说记载了人类历史上最常进行的一种外科手术。传说中分别代表天空和大地的乌拉诺斯和盖亚夫妇，生下了众巨神，而乌拉诺斯害怕被自己的儿子取而代之，于是把他们全部投入地狱深处。但乌拉诺斯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泰坦神克洛诺斯在他母亲的帮助下顺利脱逃，阉割了他的父亲，篡夺了神位。整整10天，乌拉诺斯的生殖器落向大地，最终坠入了大海，诞生了女神阿芙罗狄蒂。克洛诺斯和他的父亲一样害怕失去权力，吞噬了除宙斯以外自己所有的孩子，宙斯逃走之后回来杀死了父亲。我们太阳系中3个最大的行星都是以这3位神的名字命名的：天王星（乌拉诺斯）、土星（萨图恩，罗马神话中对应克洛诺斯）和木星（朱庇特，罗马神话中对应宙斯）。

阉割也在另一个创世传说出现过——虽然是以相反的形式。埃及的神奥西里斯，被自己发怒的兄弟赛特切成了14块，散布到世界各地。奥西里斯的妻子伊西斯四处寻找这些碎片，找到了其中的13块，然后通过外科手术重新组装。伊西斯成为埃及外科医生的守护神，而奥西里斯再次成神并与她生下了儿子荷鲁斯。这可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奥西里斯失踪的第十四部分正是他的生殖器。荷鲁斯最终成为天空之神并杀死了赛特。

与乌拉诺斯和克洛诺斯的神话非常相似的不只是埃及的创世传说，《圣经·旧约》中的创世传说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和希腊传说一样，《圣经》故事也始于男人和女人的创造：亚当和一个女人（某些解释中称她为莉莉丝）是被从大地的尘埃中创造出来的。在这两个传说中，男人都接受了手术：亚当麻醉后被移除了肋骨，而乌拉诺斯被

阉割。被移除的身体部位创造了新的女人——《圣经》中的夏娃和希腊传说中的阿芙罗狄蒂。从外科学的角度来看，《圣经》故事的有趣之处在于，与希腊人和埃及人不同，从亚当身上提取的身体部分不是易于切除的生殖器。摘除肋骨对于那个年代而言过于复杂，实际上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需要外科解剖。此外，《圣经》还告诉我们，手术在亚当的身体上留下了疤痕，然而，男人的胸部并没有疤痕，男人的肋骨数量与女人相同，都是24根。

但男人确实天生就有伤疤，确切地说有两个，正如2001年生物学家斯科特吉尔伯特和《圣经》学者锡尼泽维特在一篇精彩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第一个就是脐带脱落后留下的疤痕——肚脐。第二个疤痕是会阴中缝，一条位于阴囊和阴茎基部正中间的垂直线，这是男性尿道胚胎发育的残留。几乎所有哺乳动物在这条线下面都有一根被称为阴茎骨的骨头，但人类是少数没有这根骨头的物种。耐人寻味的是，在《圣经》中使用的希伯来语单词“tzela”不是指“肋骨”，而是支撑的托梁或支墩。我们可以想象，“tzela”也可能指的是别的长而坚硬的骨骼，也许就是阴茎骨。男人所没有的阴茎骨会不会正是从亚当身上移除的“肋骨”？会不会这其实也是阉割，切除了亚当的“支墩”？

阉割在这些古老神话的作者看来显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由此可见这种手术的起源非常之早。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它不是一个特别复杂的手术：你可以轻松地切掉或敲碎别人的生殖器，即使用最简单的工具也可以做到——比如两块石头。赫克西奥在公元前8世纪记录了克洛诺斯阉割的故事，但这个故事本身已经是更古老传统的一部分，事实上，《圣经·旧约》中也提到了阉割，称睾丸被碾碎或切除的人不能进入天堂。

最初，阉割是一种危险的手术，用以惩戒或征服。在中国和远东其他地区，它被用作战俘处决的替代方案。这些手法非常残忍：在某些情况下，生殖器会被涂抹粪便，然后被狗咬掉。但即使采用较卫生的方法，也只是剪掉或砍断受害者两腿之间的所有东西，出血致死或

发生气性坏疽的可能性也非常高，其结果与常规的死刑也没有差别。

然而，在至少2500年以前，肯定有一些风险不这么大的阉割方法，因为并非所有人都将这种手术作为一种惩罚，而且它的成功往往非常重要。波斯国王从各省获得年度“税收”的方式是得到该国最显赫家庭中一些阉割过的年轻男子。在希腊的希俄斯岛上，一位名叫帕尼奥尼奥斯的男子通过进行阉割手术发了财，这种职业在希腊人看来是可耻的。这位自称为外科医生的人会在当地市场买下最漂亮的奴隶，阉割他们，并在小亚细亚的大陆高价售出。我们无从得知他是如何进行手术的，但显然他非常成功，可以靠这种交易生活得很好。其中一名受害者最终成为波斯宫廷的一名太监，一路打拼后成为国王薛西斯的亲信，这让他有机会报复剥夺了他男子气概的外科医生。他回到希俄斯，强迫帕尼奥尼奥斯阉割了他的4个儿子，他们最终用这种方式“报答”了自己的父亲。

在亚洲部分地区、阿拉伯和罗马帝国东部的拜占庭，太监在国王、苏丹和皇帝的前朝和后宫中都是一个强大而有特权的群体。他们往往是具有很高社会地位且有影响力的人，如外交官、财务主管、公职人员或将军。显然，被阉割的人所具有的一些优秀品质受人青睐。他们被视为忠诚、可信、细致、敏锐、温和、有组织才能的人。穆罕默德的陵墓传统上只能由太监守卫。在中国，太监甚至把控了23个朝代的政治权力，在中国明朝，100000名宦官拥有巨大权力。中国紫禁城最后一位幸存的太监孙耀庭于1996年去世。

在阉割的简单版本中，只需要一刀切去阴茎和阴囊，然后将一个物体——例如鹅毛或由锡制成的特殊塞子——插入新切开的尿道中以防止其闭合。手术不是由外科医生进行的，在北非，奴隶贩子们在贸易站亲自动手，给从苏丹运给奥斯曼皇帝的黑奴做手术。他们用沙漠上炽热的沙子来给张开的伤口止血。血液从阴茎的海绵体和睾丸的动脉中涌出。如果流血在一天内没有停止，奴隶就会失血而死。如果奴隶活到了第二天，他很可能会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发生危及生命的感

染，正常情况下此时伤口已经开始愈合。这是一个残酷的选择过程，更多的取决于运气以及刀与绷带的清洁度，而不是受害者的力量和生存意志。但是，在经历了严峻考验后幸存下来的奴隶，价钱会立刻成倍上涨。

在北京的皇宫，这种手术由专业的阉割者进行。他们用左手抓住受害者的生殖器，右手拿着弯刀放在身后，他们问这个男人（如果是儿童，就问他的父亲）是否真的要进行阉割，一听到“是”这个词，就拿出刀，一下子切断阴茎和阴囊。然后，他们用油纸敷在伤口上，让受害者在房间里四处走上几个小时。患者在3天内不得喝任何东西，以避免小便。阉割者会将生殖器保存在一个带有标签的罐子中，作为太监的一种“终身信物”。

在公元7世纪，拜占庭外科医生保罗·埃吉纳描述了两种外科医生可用的尽量减小损伤的阉割方法。与此同时，埃吉纳承认这种手术完全违背了手术的基本原则。它不是恢复自然秩序，而是将自然秩序不可逆转地扭曲了。此外，阉割被国家和教会明令禁止，任何为别人进行阉割的人都将被处以阉刑或被野生动物吃掉。尽管如此，埃吉纳还是写道，有权之人经常强迫外科医生违背他们的意愿进行阉割。他在教科书中描述了这种对患者和外科医生来说都非常危险的手术，可能意味着因为做法不正确，太多的阉割手术死伤惨重。

根据埃吉纳的说法，第一种方法是将年轻男孩放入温水中，慢慢挤压他们的睾丸，直到他再也感觉不到它们为止。这是一件冒险的事情——你永远无法完全确定青春期受害者的性欲会不会在某种程度上被激发出来。第二种方法，患者必须站立在平台上，双腿分开，在阴囊的两侧各做一垂直切口，显露睾丸。然后外科医生用力地向下拉扯阴囊，直到睾丸弹出。然后只需剥离它们周围的外壳，将它们切除并结扎精索。

埃吉纳为真正的外科医生准备的这些更具选择性的阉割方法，都

避开了阴茎。在泰晤士河的河床上，也发现了相同用途的手术夹，其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当时这座城市被称为伦狄尼姆。它看起来像细长的胡桃钳，装饰华丽，有两个锯齿状的表面，当钳子夹紧时，它们会咬合一起，但在钳子靠上一侧存在间隙。它可能是一个罗马阉割钳，夹在阴囊上而不会挤压阴茎，这样可以用刀子轻松切除阴囊。夹子可以夹闭血管以阻止出血。

阉割在罗马宫廷中非常普遍。在公元9世纪，拜占庭皇帝迈克尔二世不仅推翻了他的上一任利奥五世，还阉割了利奥的4个儿子以终结他宿敌的王朝。其中一人死于血液流失，还有一人据称被吓傻了。有两位罗马皇帝爱上了男人，为了能和他们结婚，这两位皇帝让外科医生把他们阉割了：尼禄和一个名叫斯波鲁斯的男人，还有希利伽巴拉和一个叫作赫拉克勒斯的车夫。

这3种不同的方法产生了3种不同的太监。拜占庭罗马人称他们为“castrati”（没有阴茎和阴囊）、“spadones”（没有睾丸但有阴茎）和“thlibiae”（睾丸被碾碎）。通过大规模的阉割，拜占庭人和中国人在他们的社会中创造了一个独立的太监阶层。太监阶层的作用，是在男性统治者和王国中其他有野心的男人之间，以及统治者和他的女人们之间，做一个安全而有效的缓冲。但它涉及的不仅仅是政治以及权力和血统的巩固。通过让一大群太监围绕自己，统治者也保留了宫廷的神秘性。

腮

随着我们的身体在子宫中发育，胚胎再次经历了我们从单细胞生物进化到人类的过程中经历的相同阶段。在孕期的前几周，我们暂时是像鱼一样的有腮生物，头部两侧各有5个腮。然后鳃再次闭合，并一起生长，最终形成面部和颈部。如果在胚胎发育的这个阶段出现问题，孩子会留下缺陷——疤痕、唇裂或腭裂。这些是先天性疾病，只能通过手术矫正。腭裂在医学上称为“palatoschisis”，唇裂称

为“cheiloschisis”，唇腭裂甚至可延伸至眼窝和眼睑，称为“cheilognathopalatoschisis”。类似的问题也可能发生在其他部位，例如脊柱裂（胚胎神经管闭合不完全）或尿道下裂（尿道发育不完全）。头颈部的结构从5个鳃弓进化而来，你不会想要和鱼或鳃扯上关系。第一个鳃弓形成中耳——3个中耳骨中的2个（听小骨和咽鼓管）。第二个鳃弓形成第三个听小骨（镫骨）、舌骨和咽扁桃体（腺样体）。甲状旁腺和胸腺由第三和第四鳃弓形成，第四和第五腮弓发育成甲状腺和喉（带有声带）。因此，认为我们是由其他生物创造出来的人都是错的——我们最初是鱼。

阉割是一种原始的手术——简单、危险且后果严重。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父亲可以阉割自己的儿子，胜利者可以阉割被击败的敌人，甚至一个人可以阉割自己。毕竟，这只不过是切掉一个附属物，就像亚伯拉罕切除自己的包皮一样。它和刽子手砍掉手、耳朵、鼻子，或是割断舌头一样容易。这种手术需要3个决定性的外科步骤：定位（决定切割的位置和部位）、切开（切割）和止血。相比之下，即使是简单的现代手术，像是切除小的脂肪肿块，也需要至少6个外科步骤：定位、切开、解剖（分开，探查和分离）、切除（去除或取出）、止血和缝合（闭合伤口）。更复杂的手术（例如去除肋骨）需要更多步骤。切除食管、直肠或胰腺等高度复杂的手术需要大约上百个决定性的外科步骤才能成功。然而，寻常的手术，比如阉割，和真正的外科手术之间的最大区别并不在于手术步骤的多少，而在于解剖。

解剖（dissection）是一个拉丁语词，意思是“切开分离”，它包含了所有寻找合适手术平面的外科技术。手术最重要的就是平面。我们的身体由大量的解剖层面组成，从一开始——胚胎发育期间，直到成年期，都保持完整，但它们可以通过解剖相互分离。识别不同的层面、停留在正确的平面上并且知道在那一层中找到哪些重要结构非常关键。因此，解剖就是分离不同的层面和结构，识别它们并切割，同

时保留其余部分的完整性。

仅涉及一个切口的手术，不一定需要解剖。但保罗·埃吉纳提出的第二种方法，将睾丸从壳中剥离然后将其切除，需要解剖——睾丸被至少4层组织包围——为了做到这一点，你需要一位有经验和技巧的外科医生。但鉴于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大量阉割，其中大多数都不是由熟练的外科医生进行的，所以实际上有大批普通的外科医生进行那种手术。那些外科医生手上沾有许多无辜年轻人的鲜血——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均有。

阉割会产生严重后果，后果的严重程度取决于所使用的方法和雄性激素睾酮停止分泌的年龄。睾酮是青春期开始后由睾丸产生的。首先，切断阴茎会导致尿道（或者说尿道残端）出现两个对立的问题。疤痕产生使尿道残孔趋于关闭，导致排尿越来越困难，但手术也影响了括约肌的功能，使得患者无法再储存尿液。尿失禁和尿道缩窄组合在一起，意味着太监一整天都在排尿，一滴接着一滴。在中国和奥斯曼帝国，他们用一根带有绳子或把手的金属杆，插入尿道中防止漏尿，也阻止了开口缩窄。太监的激素平衡发生变化，使他们的骨骼生长得更快，因此他们在年轻时就患上了骨质疏松症，导致自发性的椎骨压缩。他们失去了体毛、乳房组织增多、声音变弱。总而言之，可以从尿酸味、高大的身形、弯着腰的姿势、光滑的面部和唱歌的声音轻易识别出一个太监。这个奇怪的手术也有其优点：太监的寿命往往比平均水平长，虽然这可能更多是由于他们在社会中受到保护且享有特权地位，拥有比同时代人更好的生活条件。

阉割可以防止年轻男孩在青春期变声，这一事实在阉割手术史上写下了一个引人入胜的篇章。在18世纪，阉伶——阉割的男性高音歌手——在欧洲轰动一时。他们是意大利歌剧的巨星，他们的高音让许多女性心跳加速。其中最著名的偶像是卡洛·布罗斯基，早年被称为“小男孩”（il ragazzo），后来艺名为法里内利。法里内利在小时候因为有着美妙的嗓音而被阉割。他在罗马、维也纳、伦敦、巴黎和马

德里进行演唱，在他职业生涯的巅峰时期，他的音域可以从中央C以下的A一直到高音C以上的D。在西班牙，他的歌声安抚了被抑郁折磨的国王，国王为他提供了大臣的职位。在一生的许多年中，他每天晚上为国王唱歌，如同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童话中的中国夜莺一样。他于1782年在意大利逝世，享年78岁。

当然，法里内利并没有把他的成功完全归功于被阉割：他的嗓音天生就很美妙。惊人的是，在那个年代，有成百上千的男孩被阉割，因为他们雄心勃勃的父母想要取得类似的成功，但事实证明他们并没有所需的天分。

阉伶在巴洛克时代大受欢迎，但很久以前就已成为歌剧和宗教音乐的共同特征，并且在此之后仍然存在了许久。许多世纪以来，女性被禁止在公共场合演出，而阉伶在歌剧中扮演女性角色。由于女性也不被允许在教堂唱歌，在罗马的西斯廷教堂，阉伶是罗马教皇唱诗班的杰出成员。因此，直到1870年，意大利才禁止用阉割的方法“留存”声音——尽管在梵蒂冈，阉割继续存在了30多年，直到20世纪初，阉伶仍然在教皇唱诗班唱歌。其中一位阉伶叫亚历山德罗·莫雷斯基，他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声音被记录在留声机唱片上的阉伶。莫雷斯基于1922年去世。

阉割后性欲也会变弱，这当然是手术的意图之一。出于这个原因，阉割还曾被用来“治疗”被认为是变态的性取向。一位著名的受害者是阿兰·图灵，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破解了恩尼格玛密码机并发明了计算机，但由于是同性恋者，他于1952年被法官判处化学阉割。

今天，阉割仍在进行。每年，世界上成千上万名男性为了治疗前列腺癌将睾丸进行手术切除。雄性激素睾酮刺激前列腺癌细胞的生长，通过阉割停止激素的产生，可以帮助减慢癌症的扩散。与历史上阉割男性的其他原因不同，能通过如此简单的手术来治疗癌症当然是一个很好的理由。此外，前列腺癌——需要进行阉割来治疗——通常

发生在老年患者身上，此时他们已经度过了生命中的生殖阶段。

19　肺癌

在家中进行的开胸手术：国王乔治六世

1951年9月23日，经过多天的准备，英国外科医生克莱门特·普赖斯-托马斯放弃了周日的休息，来做一场从很多方面来讲都意义非凡的手术。不仅因为这是一场切除整侧肺的全肺切除术，也不仅因为患者是英国国王乔治六世——现任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父亲，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手术场地是患者自己的家：白金汉宫的一个房间被布置成手术室，就像通常外科医生在威斯敏斯特医院工作的地方一样。

乔治六世患了肺癌。那一年的6月，他退出了公众的视野，官方声称这是由于一场流感。真正的诊断没有被具体说明，新闻稿只谈到肺部的“结构改变”。2010年上映的电影《国王的演讲》中，乔治六世的医生建议他吸入香烟烟雾以缓解口吃。吸烟是20世纪初产生的一种时尚。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直到1951年也是如此——没人认为它是有害的。国王和他的医生都是烟鬼，甚至很有可能他们在手术之前都要抽上一口。

烟草在16世纪来到欧洲。人们咀嚼、嗅闻或用烟斗吸烟。它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产品，很快便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在外科术语中也能找到它的身影。当你张开手掌，手背上拇指根部出现的三角形凹陷在解剖学上被称为“鼻烟壶”，这个部位在创伤学中很重要，因为该处压痛可能意味着其下的舟状骨骨折。荷兰的外科医生一定特别喜欢烟草。围绕结构或开口处做连续缝合，拉紧缝线将其收紧，这在全世界范围内被称为“荷包缝合”，但在荷兰，它被称为“烟草袋缝合”。糖尿病导致小腿细长动脉的钙化硬化形似用白色黏土制成的用于吸烟的细长管，被荷兰人非常生动地称为“烟斗管硬化”。

雪茄在19世纪开始流行，而香烟在20世纪才广泛普及。在这之前，通过嗅闻、咀嚼或抽吸烟斗雪茄，烟草只能到达口腔、鼻子和喉咙，而没有进一步渗入身体。4个世纪以来，这导致了多种形式的癌症，但仅限于呼吸道的上部。例如，口嚼烟草会导致唇和舌发生癌症，而吸雪茄导致喉部癌症。在17世纪，出现了一些口腔肿瘤病例的记录，例如，在阿姆斯特丹外科医生约伯·范·米克伦和尼古拉斯·杜尔的书中，以及弗里德里克·鲁谢记录的一个特殊案例："意外用刀和发红的烙铁切下了上颚的腐肉（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位因常常叼着雪茄而闻名的精神分析师，1939年死于口腔癌。受人喜爱的德国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也是一名吸烟者，在1888年悲惨地死于喉癌。但是肺癌一直很罕见，甚至几乎不存在。来自身体其他部位的癌症有时会扩散到肺部，但是起源于肺组织本身的原发性肺部肿瘤几乎不会发生。191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列出了当时记录在案的所有肺癌病例，只有不到400例。然而在1920——1960年，肺癌病例突然爆发性地增加，成为一种"正常"的疾病。肺癌最终成为癌症当中最常见的死亡原因，每年全球有超过100万人死于肺癌。一开始，没有人知道这些肿瘤来自哪里。

直到近代，癌症还很罕见，大概是出于人们更早死于其他原因，而癌症通常发生于年龄较长者。遗传学的发展已经阐明了数种癌症中完全正常运作的细胞突然转变为恶性的原因，而人们只在有限类型的癌症中发现了明确的外部原因。1761年，约翰·希尔成为第一个在长期使用鼻烟和罹患鼻腔癌之间找到明确联系的人。1775年，帕西瓦尔·波特指出，英国烟囱清扫工中阴囊癌的发病率异常之高，必然与烟尘有关。后来，膀胱癌与涂料中使用的溶剂之间的联系也被发觉，但长期以来肺癌病例暴发的原因仍然是一个谜。20世纪30年代，已经有人怀疑这与吸烟有关，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进行了一些大规模病例调查，这才得到最终证明。即便如此，这个结果还是花了很长时间才被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接受，没有人想要去相信。

事后看来，统计图表非常清晰地显示出肺癌病例的增加与香烟消费的增加完全平行，只是在时间上推迟了约20年。在香烟成为现代文化和数百万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之后，吸烟造成的损害才全方位显现出来。不仅仅是电影明星和音乐家，直到20世纪70年代，医生在自己的诊室里抽烟，孩子在生日那天给他的同学甜香烟，给老师真正的香烟，都是完全正常的。

吸烟还会引起其他类型的癌症，如乳腺癌、胰腺癌和皮肤癌。此外，它还会引起肺气肿和慢性支气管炎，并且是心血管疾病的主要病因。没有任何职业（除了香烟制造商之外）比外科医生从这种坏习惯中获益更多。血管外科医生的大多数患者都是吸烟者（由吸烟导致的动脉硬化造成间歇性跛行、脑卒中和阳痿），心脏外科医生（吸烟相关的动脉硬化导致心脏病发作）和肿瘤外科医生（吸烟导致各种癌症）也是。“多亏”了香烟，肺外科变得尤为重要。

肺部手术尤其具有挑战性，因为肺是一种特殊的器官。肺的左右叶彼此分开位于密封的胸腔中。为了到达肺部，必须在两个肋骨之间将胸部切开，这种手术被称为开胸术，即在胸部做切口，因此肺部手术也被称为胸外科手术。

两根肋骨之间的距离不到2厘米。要在胸腔里的肺部进行手术，这个小间隙必须扩大到足够让双手进入。这就是为什么在开胸手术中，患者需要侧卧，同时手术台的头尾两端均向下倾斜，因为这样肩膀和骨盆就会低于肋骨，这就是所谓的“折断”手术台。沿着肋骨切开皮肤，移动或放松背部、胸部和肩胛的一些肌肉，使肋骨可见。胸腔通常在第四和第五肋骨之间被打开，然后用一种特殊的肋骨撑开器插入两根肋骨之间，慢慢地撑开肋骨，直到缝隙达到约20厘米宽。手术台的“折断”有助于打开胸腔，这样你可以看到胸腔里的肺，以及左边的心包，包裹着跳动的心脏。

呼吸使我们的肺一直和外界接触。因此，大量的外来物质和病原

体会使肺的外观发生改变。年轻的肺呈淡粉色，十分柔软，而老烟民的肺是黑色的，发硬，布满颗粒。这也意味着肺部手术更容易导致感染。肺是人体中独特的器官，有自身的循环系统。它们的血供来自心脏的右半部分，而不是左半部分，肺部动脉的血压也只有身体其他部位血压的1/5。这是必要的，因为肺中的脆弱肺泡难以承受高血压。因此，肺动脉的壁更薄、更脆弱，手术缝线很容易扯开。

气管也很棘手。这些坚硬的管道可以抵抗吸入和呼出空气造成的永久性波动，软骨环使之保持开放，这使得用缝合线闭合支气管非常困难。为了确保缝合处是密封的，在过去会将缝线浸在石蜡里。今天，我们会使用缝合钉。即便如此，当患者在手术后咳嗽时，缝合处也承受着相当大的压力。肺就像海绵一样含有空气，它们不能自己保持开放，而是被胸腔的负压吸开，所以手术后，必须在肋骨之间插入一根塑料胸管来恢复负压。然而，切除整侧肺（肺切除术）会留下一个压力本不应为负的空腔。空洞的胸腔会逐渐被液体充满，再被疤痕组织替代。同时，感染或漏气会导致严重的并发症。

吸烟

没有什么比吸烟更不健康的了。吸烟者不愿意接受这一点，“过马路也会被撞死”是他们在看医生时最常说的借口之一。这或许是事实，但2015年欧洲有2.8万人死于交通事故，远远低于同年死于吸烟的70万人。世界上大约有1/4的人吸烟。他们中的一半人会死于他们的这一习惯，而这些人中还有一半甚至在他们达到退休年龄之前就会死去。第二个最常见的借口是：“我爷爷一辈子都在吸烟，也没有得肺癌。”这或许也是真的，但吸烟引起的健康问题远远不只是肺癌。在抽了一辈子烟之后，爷爷很有可能死于脑卒中、心脏病、肺气肿、胰腺癌、主动脉瘤或腿部坏疽——所有这些疾病都是由吸烟引起的。阳痿、面部皱纹、牙龈感染和胃溃疡都不会致命，但它们都与吸烟有关。儿童中耳慢性感染几乎总是发生在父母吸烟的情况下。怀孕期间

吸烟会影响孩子的发育。最重要的是，吸烟是术后并发症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不管是什么并发症。所以，如果你不得不接受手术又担心手术风险，不要用点燃香烟来缓解压力。还是戒烟吧。

切除整侧肺的另一个问题是，突然之间，整个循环系统从流经两侧肺变为一侧。这使得血液流动的阻力加倍，心脏的负荷骤增。1931年，鲁道夫·尼森（后来为爱因斯坦做手术的外科医生）给一个11岁的女孩做了手术，首次成功地切除了整个肺叶。第一次尝试时，她出现了心脏骤停，但第二次尝试时，她的心脏承受住了血液循环的突然变化。在这一壮举之前，只有肺部分切除术（例如治疗肺结核），但这种手术的风险较低，因为总是有足够的肺组织来填充胸腔。

两年后的1933年，在美国圣路易斯进行了首例成功的肺癌全肺切除术。做手术的外科医生埃瓦茨·格雷厄姆，后来在香烟的故事中扮演了一个不同的角色。格雷厄姆和他的患者、48岁的妇科医生詹姆斯·吉尔摩都是烟民。支气管镜诊断出吉尔摩的左肺患有癌症，支气管镜是一种气道的内镜检查，当时的检查方法是把一根笔直的硬管子从患者嘴里伸进气管。吉尔摩权衡了自己的机会——似乎希望不大。在此之前，格雷厄姆只对实验动物进行了全肺切除术。因此，这次手术是一个危险的实验，但死于肺癌将是非常折磨人的。手术前，吉尔摩让牙医把自己补牙用的黄金取出来，用它们买了一块墓地。手术前一天晚上，一位住院医生来到吉尔摩的床边，让他赶快离开医院。但手术还是进行了。开胸出奇地顺利，肿瘤清晰可见。格雷厄姆用夹子夹住肺动脉一分半钟，看看心脏是否能承受额外的压力。没有出现严重的问题，于是他结扎了肺动脉，然后结扎了静脉和初级支气管。肺已经被剥离了。

格雷厄姆把这个巨大的器官从胸腔中取出来后，发现胸腔里还剩下很大的空间，于是他又花了一个小时移除了几根肋骨，以便让胸腔稍微塌陷一些。这使得胸腔的形状奇怪地扭曲着，但确实缩小了胸腔的大小。吉尔摩在医院里住了75天，由于感染不得不又做了两次手

术。尽管如此，他还是完全康复了，恢复了妇科医生的工作，没有出现任何问题，除了只剩一侧肺。

吉尔摩非常幸运。肺癌是一种致命的疾病，通常在确诊时就已经扩散，即使可以治疗，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复发的可能性仍然很高。吉尔摩医生的案例中，肺癌显然是在早期发现的，因为手术后再也没有复发。他又活了40年（并且一直抽烟直到死去）。

在白金汉宫为国王乔治六世进行的手术也很顺利，尽管我们不太了解国王对手术的反应和康复情况。那一年，他在电台上发表的圣诞致辞显得很是虚弱，而且是由事先录制的各种片段剪辑而成的。国王在这次肺切除术后只活了4个月就在睡梦中死于心脏停搏，享年56岁。他的女儿及继任者伊丽莎白，当时正在肯尼亚访问。回家后，她成为英国女王。

右肺切除并不是乔治六世一生中接受的唯一一次手术。1917年，他因消化性溃疡做了手术，1949年因腿部动脉硬化做了手术。这3种疾病——动脉硬化、消化性溃疡和肺癌——都与吸烟有关。当然还有导致国王最终死亡的心脏停搏。

事实上，与吸烟有关的疾病在皇室家族中并不罕见。乔治六世的父亲乔治五世和祖父爱德华七世都是重度吸烟者，也都死于肺气肿。他们也同样曾在王宫里做过手术，爱德华在加冕那天得了阑尾炎，乔治得了肺旁脓肿。乔治六世的二女儿玛格丽特公主，十几岁时就开始吸烟，1985年患上肺癌，并成功进行了手术。尽管几年前她就戒烟了，但她还是在2002年死于与吸烟有关的脑卒中。乔治六世的母亲玛丽女王于1953年去世，比她的儿子晚1年，死于同样的疾病——肺癌。乔治的兄弟爱德华也抽烟。如前文所述，1964年12月，他在休斯敦接受了外科医生迈克尔·德贝基的动脉瘤手术，后来被诊断为喉癌——不用说，这两种疾病都与吸烟有关。

皇家外科医生克莱门特·普赖斯·托马斯被自己的患者封为爵士。这位外科医生继续吸烟，结果得了肺癌。查尔斯·德鲁和彼得·琼斯为他做了手术，他们曾在白金汉宫协助过他，现在自己也成了外科医生。他们为普赖斯·托马斯做了肺叶切除术，切除了一部分肺，并取得成功：普赖斯·托马斯健康地活了许多年。

圣路易斯的外科医生埃瓦茨·格雷厄姆曾认为肺癌与吸烟有关的观点是荒谬的。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他对684名肺癌患者进行了研究，但发现了完全相反的结果。这项发表于1950年的突破性研究表明，癌症和吸烟之间存在无可辩驳的联系，首次证明了吸烟具有致癌作用。然而，在随后的几年里，香烟的销量继续攀升。对于抽了一辈子烟的格雷厄姆来说，此时意识到自己对身体的伤害已经太迟。他本人患了肺癌，于1957年去世。他的患者詹姆斯·吉尔摩在他弥留之际探望了他。尽管吉尔摩只有一侧肺和畸形的胸部，但他非常健康。烟草制造商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当年的年营业额为200亿美元。

20　安慰剂

第五个登上月球的人：艾伦·谢泼德

在中世纪，如果想要为自己的葬礼添加一点光彩，可以聘请一群僧侣前来吟唱《诗篇》第114篇。最后一句话尤其给最后的告别增添了戏剧性："我会在活人之地使耶和华喜悦"。价钱并不便宜，但它能使这场送行被人铭记。当然，唱诗的人本身与死者并没有关系，他们的哀叹完全是装出来的。从本质上讲，他们是假的哀悼者、商业的神职人员，人们用他们最戏剧性的唱词嘲讽他们为：安慰剂（placebo），拉丁语意为"我会讨好"。

在处理医疗问题时，安慰剂并不具有实际效用，但是有时可以产生有益效果。其中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顺势疗法，即对于一些特定的毛病，给患者开出不含有效成分的混合物。安慰剂并不一定是药水或药丸。精心设计的针灸以及整骨疗法都是形式上的"治疗"，而实际上则完全不算。因此，安慰剂本身没有任何有益效果，但"相信它"的这一行为是有效的。达到这种效果的机制完全是心理上的，包含期望、认可、关注和暗示等元素。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安慰剂能在医疗上起到重要作用，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它的功能非常有限。因此，安慰剂治疗的结果有时是有益的，但是大多并没什么用。例如，在顺势疗法中，医生和患者通常保持着长期联系。这种联系不会以治愈结束，而是由于反复使用不起作用的药物而长期存在，从而使症状也持续存在。它最大的缺点是，患者越来越多地被贴上慢性病的标签，恢复正常而健康的生活越来越困难。

安慰剂效应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荷兰的斯海尔托亨博斯市，圣约翰大教堂圣母堂的墙壁上装饰着银制或蜡制的腿或手臂状的还愿礼物，都是几个世纪以来痊愈的患者出于感激捐赠的。据称圣母马利亚

曾在一位年轻的牧羊女身上现身，在她现身的卢尔德的洞穴中，挂满了发现自己能够再次行走的残疾人的拐杖。

安慰剂效应遵从许多规则。首先，患者必须确信它会起作用。因此，他或她必须不知道（或不想知道）治疗是假的。如果实施的人也认为它会起作用，效果会加强。如果能够在特定的氛围和环境下实施则会更好，因此外科手术有潜力成为一种强大的安慰剂。毕竟，如果患者和外科医生不相信手术会成功，就不会冒着并发症的风险做手术了；而且，手术比药丸或药水更具戏剧性。

对于那些因健康不佳反而得到大量好处的患者，安慰剂效应较弱，例如，有些人享受因生病而受到的同情和关注。相反，对于那些治疗成功的获益超过一般人的患者，安慰剂效应会得到加强。

艾伦·谢泼德在1969年同意进行一项手术，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从康复中得到巨大的收获。谢泼德正在排队等候一次终极冒险，却患上一种疾病，险些失去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谢泼德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美国人，当时他已经37岁了。尽管飞行时间只持续了15分钟，他的“水星号”飞船也只是进行了亚轨道飞行，但谢泼德仍是一位英雄，至少在美国是。这个任务实际上已经迟了——23天前，苏联人尤里·加加林已经成为太空中的第一人，并且在地球轨道飞行了1个多小时——但谢泼德的飞行预示着一场更伟大冒险的开始：月球之旅。

水星任务之后是“双子星号”飞船计划和“阿波罗计划”。在最初的7名“水星号”飞船宇航员中，有6人在登月成功前的一系列任务中发挥了作用。约翰·格伦是第一个绕地球轨道飞行的美国人，第二个是斯科特·卡朋特，戈登·库珀是第一个在太空中度过一夜的人，加斯·格里森是第一个在月球太空任务中牺牲的人，沃尔特·席尔是第一个驾驶“阿波罗号”飞船的人，迪克·斯雷顿是最后一个。

只有艾伦·谢泼德没有进一步发挥作用。他的身体状况不适合执行任务，因为他患有梅尼埃病——准确来说是特发性前庭功能障碍。特发性是指没有明确可识别的病因，前庭是内耳中调节自身平衡感的系统。这种疾病会引起自发性发作的眩晕和耳鸣。谢泼德会突然听到左耳发出嗡嗡的声音，感觉周围的一切都在旋转。然后他开始恶心，就像晕船一样，严重时不得不呕吐。他服用一种名为乙酰唑胺的药物来对抗这种疾病，因为有人认为这种病是由于内耳前庭系统的半规管内淋巴液压力过大引起的。乙酰唑胺是一种利尿剂，即能够促进水排泄的药丸，可以减少内耳中多余的液体，但不幸的是，它在谢泼德的身上不起作用。突发性的头晕、呕吐和失去平衡，对于要在喷气式飞机以及太空火箭上度过数百小时的试飞员来说，自然是灾难性的。

谢泼德不能再飞行，于是接受了一份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办公室里的工作，很快他就获得了机构中“脾气最坏员工”的称号。在他的同事一次接着一次地进行太空旅行时，谢泼德听说了一个新的实验性手术也许能够帮助到他。外科医生则完全相信它会有用。

在尼尔·阿姆斯特朗飞往月球的前几个月，谢泼德在洛杉矶由耳鼻喉专家威廉·豪斯进行手术。豪斯将一根微小的硅胶管插入颞骨的岩部，进入内耳排出多余的内淋巴液。这种方法称为内淋巴分流术。从理论上讲，这会降低前庭系统的压力。手术的细节在这里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在手术后，谢泼德再没发病。

NASA的医生对他进行了检查，认为他可以执行飞行任务。1969年5月，45岁的谢泼德重新成为一名宇航员，并开始为“阿波罗13号”任务进行训练。由于年龄偏大，他需要更长的时间来适应前往月球的航行，所以他被调整到下一个任务。事后看来，这对他来说是个幸运的决定，因为“阿波罗13号”在飞行中遇到了麻烦（那句著名的“休斯敦，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是替换他的宇航员所说的）。1971年1月31日，艾伦·谢泼德终于飞往了月球。作为“阿波罗14号”的指挥

官，他甚至负责整个计划中最艰巨的任务：1971年2月5日，让心大星登月舱在弗拉·莫罗高地着陆。这是所有阿波罗任务中最精确的一次登月。

宇航员必须站起来进行这种操作，这样他们才能靠自身的平衡感感受登月舱在月球弱引力中的运动。谢泼德完美地完成了任务，10多年后，内淋巴分流术的效果被证明完全是基于安慰剂效应，他的伟大才得以显现。

以下实验证明了这一点：对一组患有梅尼埃病的患者进行了手术测试。通过抽签决定分组。内淋巴分流术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去除乳突，即耳后可以摸到的骨性突出，它是颞骨的另一部分。移除它之后，外科医生就能够进入内耳腔。半数的患者接受了完全的内淋巴分流术，而其他患者仅移除了乳突——这不会对其症状造成任何影响。从外表不可能看出或感觉出做的是哪种手术。随后，他们在3年的时间内都接受了测试，患者和测试他们的医生都不知道谁曾经做过哪种手术。这被称为双盲试验，完整地来说是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结果显示，超过2/3的患者症状得到改善，无论他们经历的手术是真是假。

人体的位置和方向

解剖学位置和方向的确切指示对于医生之间的良好沟通至关重要。为此，他们使用拉丁语和希腊语中的术语。正是这些术语使得外行人难以理解。前侧（anterior）和腹侧（ventral）（朝向venter，腹部）均指向前，后侧（posterior）和背侧（dorsal）（朝向dorsum，背部）均指向后。头侧（cranial）意味着向上（朝向cranium，头部），尾侧（caudal）意味着向下（朝向cauda，尾部）。外侧是指靠近侧面，内侧指靠近中间。因此，眼睛位于鼻的外侧，耳的内侧，口的头侧。也可能出现组合，例如前内侧或后外侧。近端和远端分别意味着相对于身体的核心接近或远离。所以肘在肩的

远端、手腕的近端。浅（superior）和supra-指在上面，深（inferior）、sub-、infra-指在下面。Intra-指在其中，inter-指在之间，para-指在旁边，juxta-指靠近，endo-指在内部，exo-和extra-指在外部，retro-指在后面，per-和trans-指通过，peri-指在周围。中央和外周不言自明，median指中线。Volar和palmar均指掌侧，即拇指指向外侧时的前侧。Plantar是足底。手的拇指侧是桡侧，小指侧是尺侧，手背是背侧，脚的上部也是背侧。矢状面（sagittal plane）将身体左右分开——如同箭把你劈成两半（sagitta是拉丁语中的“箭”）。冠状面将人体分为前后两部分，横切面或称水平面将人体分为上半部和下半部。在医学中，外科和解剖学的左右总是从患者的角度来说的（否则你必须指明是从前面还是后面观察患者）。

很难说安慰剂效应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手术的成功，它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重要。幸运的是，由于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在艾伦·谢泼德身上进行的那种纯安慰剂式的手术越来越少。然而在过去，手术的结果没有被系统地记录，发表的科学论文通常仅限于成功的独立案例，而不是为大量患者提供平均数据。外科医生一旦看到已有有利结果出现，他们就会进行手术，而不会批判性地研究其他经历过相同手术患者的结果。这就是许多世纪以来，纯安慰剂式的手术——放血——成为最常进行的外科手术的原因。

放血几乎被当作包治百病的疗法：伤口感染、发烧，甚至反直觉地用于严重出血。虽然大量患者死于放血，但它必定也对某些人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否则它早就被放弃了。然而，这种益处一定是纯粹的安慰剂效应，因为根本没有证据表明放血在医学方面是有益的。换句话说，如果艾伦·谢泼德和他的外科医生相信放血有用，谢泼德很可能在放完血之后也能前往月球，和内耳经历复杂手术的道理是一样的。

进行放血的通常是用刀的男人——外科医生或理发师。这种传统想必源于数千年前的驱魔仪式，医师会切开受害者来驱除恶灵（疾病）。古希腊人会举行祭酒：在地上泼洒红酒进行祭献。因此，放血

可以看作与祭献相当。由于失血可能导致受害者虚弱，他们看起来像是进入了恍惚状态，或是屈服于众神。直到中世纪，对恶灵的迷信仍然是放血的重要原因，但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外科医生青睐更为理性的解释：排出身体中被疾病或感染“腐化”的血液。其中一种方法是在上臂扎上一条止血带，使血液从肘部的切口流出（这就是“坏血”这个说法的出处）。

用于放血的特殊刀具被称为放血刀，它的设计使其不会切得太深。最佳切口部位是肘窝的褶皱处，因为其表面下方就有静脉。不幸的是，静脉深面不远处就是上肢的大动脉，因此，如果外科医生切得稍微深了点，“放血”就会变成“血洗”。好在这两个血管之间穿行的腱膜（扁平的肌腱）提供了些许保护，因此它们被称为fascie grâce a Dieu，即“上帝保佑”的腱膜。

健康的身体可以每天用新生血液补充一次放血的量，但一周后，身体的铁储备就会被耗尽。在医学史上，我们不能用积极的眼光去看待放血的流行。我们当然可以原谅，旧时代的医生和治疗师因缺乏知识和理解而无法治愈疾病或创伤，但仅仅因为不知道更好的办法就故意造成致命伤是十分荒谬的。直到19世纪末，放血疗法开始悄然消失，也许是因为，随着各种疾病越来越多真正有效的治疗方法被发现，医生们不再相信放血的用处，安慰剂效应也随之减弱。

然而，放血疗法被弃用后，又出现了一些现在被认为是纯安慰剂式的手术。在19世纪，高龄的法国生理学家查尔斯·爱德华·布朗·塞加尔给自己注射了一种用豚鼠睾丸配制的药水，并称其具有使人年轻化的功效。通过这些实验，他奠定了内分泌学——医学中研究激素的一个分支——的基础，外科医生开始在患者身上植入动物睾丸的切片以达到年轻化的目的，其效果出奇地好。但许多手术或多或少依赖于安慰剂效应，如切除悬雍垂以改善睡眠、剥除曲张静脉治疗不宁腿综合征（Ekbom综合征）、进行疝气手术以减轻慢性背痛、对胸痛患者进行胃食管反流手术、脊髓植入电极治疗慢性疼痛、腹腔镜腹股沟疝手

术治疗运动员的腹股沟疼痛、对帕金森病患者进行脑外科手术，以及网球肘（肱骨外上髁炎）的手术治疗。

为了缓解无法解释的慢性症状而使用手术方法时，有益的结果往往是由于安慰剂效应，而不是问题真正得到了解决。“症状没有明确原因”的医学术语是“e cause ignota”或“e.c.i.”，拉丁文中“原因待查”的意思。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有各种各样的手术来治疗慢性腹痛，即使是在原因不明的时候。新出现的手术往往效果最好，这令它们看上去很可疑。它们此起彼伏，如同时尚潮流。新的似乎永远比旧的更好，创新通常意味着有用。例如，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切除健康的阑尾来治疗原因待查的慢性腹痛风靡一时。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相信这些莫名其妙的症状可以通过松解腹腔的粘连来缓解。对于一模一样的症状，现在流行的做法是切断腹壁浅表神经，不再通过手术松解粘连或切除健康的阑尾。

外科医生倾向于将好的治疗效果完全归因于自己的作为。他们心想：“患者带着问题来找我，我对他们进行了绝对有效的治疗，患者健康又满意地回到家。这是我的工作带来的好结果。当然，这都是意料之中的。”这种过分自信的思考和行为方式被称为自利偏差。实际上，外科医生应该在每一场手术后自问，患者症状的消失是不是手术造成的，还是并非如此。也许这些症状本来就会自行消失？也许后来症状再次出现了，只是患者没有再来找他？评价治疗价值的唯一方法，就是使自己跳脱出患者和外科医生之间一对一的关系。

要客观评价一种外科手术的真正价值，只能通过对大量相同疾病的患者进行相同的手术，最好是在不同医院由不同医生进行。现代外科学中，这种价值评价被国内或国际医疗指南所采用。指南会定期修订，因为新的患者会带来新的结果，从中会获得新的见解。

如果某些手术被证明是安慰剂式手术，即使许多患者从中受益，也不值得继续进行，因为它们价格昂贵，还会产生不必要的预期。此

外，在许多情况下，它们根本不起作用或是仅仅暂时有效，哪怕看上去确实有效，也是因为症状无论如何都会消失。许多慢性症状本身就会有规律地反复，难以解释。当然，用虚假的治疗方式欺骗患者本来就是不对的。所有手术——包括安慰剂——都有并发症的风险，因此时下流行的假手术是不可取的。

但是，即使手术被揭穿是安慰剂，也需要一段时间才会被淘汰。用关节镜手术（微创手术）治疗膝关节炎（膝关节的骨关节炎），在2002年被揭穿为安慰剂手术。由于患者的反馈良好，这种手术变得非常流行，尽管它实际上除了检查、冲洗和清洁外，对膝关节几乎没有什么作用。

为了验证这一点，美国休斯敦的骨科医生布鲁斯·莫斯利给一大群患者进行了假的膝关节镜手术。莫斯利在皮肤上开了3个小口，在患者的眼前摆弄了各种各样的仪器，把冲洗液洒在地板上，使一切看起来尽可能真实。结果是惊人的。使用关节镜冲洗磨损的膝关节，费力地刮除软骨的磨损，平整受损的半月板，与假装这样做一样，对疼痛的改善同样大，对关节功能的影响也一样小。然而，膝关节镜手术仍然是世界上最常见的骨科手术。一瘸一拐地走到私人骨科诊所去看磨损的膝关节，已经和喝卢尔德的圣水、在斯海尔托亨博斯的圣母雕像上点蜡烛，或者去理发店放血，没有什么区别。你所要做的就是相信它。

12个人曾登上月球——尼尔·阿姆斯特朗、巴兹·奥尔德林、皮特·康拉德、艾伦·比恩、艾伦·谢泼德、埃德加·米切尔、大卫·斯科特、詹姆斯·欧文、约翰·杨、查尔斯·杜克、哈里森·施密特和尤金·塞尔南。在所有这些人中，谢泼德是最年长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尽管他做了内淋巴分流术，但还是在太空出现了症状，如果他在戴头盔时呕吐，可能会造成窒息。在“阿波罗13号”的戏剧性事件发生之后，这也许将意味着月球任务的彻底终结。我们并不清楚在他回到地球后，梅尼埃病有没有发作。谢泼德于1998年死于白血病。

21 脐疝

一位丰满女士的悲惨死亡：卡罗琳王后

古希腊的哲学家们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世界的运作原理。从一开始，他们就将整个科学概括为一个简单的原则：万物皆无定数，皆在不停变化，从古至今。公元前6世纪，赫拉克利特用一个词语传达了这种想法，“panta rhei”——“万物皆流动”。当你第二次去看一条河流，它仍是同一条河，但水却不同了。

生命也是流动的河，不改其形却不停变化。医生最懂得这一点。如果患者的症状令医生无法解释，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等待。大多数的症状都会自行消失，因此医生往往会让你过几天再来，等待更好的时机。只要医生对自己有把握，恰如其分的等待就是最好的诊断方法。可难点在于，如何劝说受苦的患者、担心的家属还有你自以为是的同事们，让他们理解你为什么看上去什么都没做。毕竟，多数人认为，作为外科医生，不应该什么都不做。但其实明智的等待并不比采取行动更轻松，评价外科医生优秀与否也不取决于他手术的快慢，而是结果如何。因此，一位好的外科医生熟悉各种疾病和病症的病程，既不会等得过久，也不会干预得过早。

伤口感染的病程是几天，如果几天后没有化脓，就不会再化脓。癌症的病程是几个月，如果几个月之后没有发现肿瘤，说明一开始就没有肿瘤。肠吻合口瘘（肠道的两端通过手术缝合）的病程是10天，如果10天后没有渗漏，就不会出现渗漏。大腿动脉完全栓塞的病程是6小时，如果6小时后没有坏死，就不会有事。对于小肠梗阻（梗阻部位在较细的肠管），你尽可以在它破裂之前等上几天，但对于结肠梗阻（梗阻部位在较粗的肠管），就要尽快处理了。然而，任何部位的肠梗阻一旦出现绞窄都会在数小时内危及生命，因为肠壁会因缺少血

液供应而坏死。

18世纪的外科医生约翰·兰比为乔治二世的妻子卡罗琳王后进行治疗，可他等得过久了。直到她的病症一直没有好转，他才终于决定采取行动。这使得他的患者送了命。但是在当时，不管是这位医生，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王后到底得了什么病，因此并没有人责怪他。他还被封了爵，因为不管怎么说，他最终还是把手术刀插入了王后的肚脐。做得迟也比不做好，当时的人们一定是这么想的。

卡罗琳王后叫他“傻瓜”。约翰·兰比曾是伦敦一家理发师-外科医师协会的会员，1745年外科医师协会单独成立后，他出任了首任会长。这是第一个真正的外科医生协会，后来演变为负有盛名的皇家外科医师学会。兰比是个举止粗俗又愚笨的人，尽管受到上层社会精英的尊敬，但他在外科生涯中并没有取得什么成功。

勃兰登堡-安斯巴赫的卡罗琳是贵族后裔。她嫁给了乔治·奥古斯都——乔治·路易斯的长子。乔治·路易斯是汉诺威王朝的选帝侯，后来成为英国国王乔治一世。1714年安妮女王去世后，英国皇室中只有遥远的汉诺威分支还留有新教教徒后代。于是老乔治和他的儿子、儿媳卡罗琳一起乘船前往英国，继承王位。这个德国家庭一抵达，突然发现自己身处非常时髦的英国假发时代，后来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为“乔治亚时代”。

英国王室成员彼此之间讲法语，在公共场合则讲着德国口音浓重、令人费解的英语。这两位乔治都是臭名昭著的大胖子，他们粗野、愚钝、喜怒无常。而王妃卡罗琳则完全相反。她有趣、迷人、机智、美丽出众，她和她的侍女们成为魅力和风尚的标志。当时流行曼图亚礼服，这是一种奇形怪状的裙子，臀部两边有一对巨大的侧摆，用鲸骨加强筋支撑着，女士们穿着它，宽到通过一扇门都要侧着身子。她们还会戴上非常高的假发，厚厚地抹上一层有毒的铅颜料，把脖子和脸涂成明亮的白色，再在嘴角上方画上一颗美丽的黑痣。之

后，她们连人带着裙子、假发，被塞进一辆两个仆人抬着的单人轿子里，在伦敦的舞会之间辗转奔波。然而，当卡罗琳上了年纪，她坐不进自己的轿子，也穿不进自己的衣服了。

乔治一世在1727年夏天前往奥斯纳布吕克的途中死于脑卒中。他在去汉诺威路上的一个车站吃了太多草莓，导致消化不良，在荷兰小镇德尔登的厕所里蹲了一夜。新国王乔治二世和他的配偶卡罗琳王后为王位等待了13年。这么多年奢侈和懒散的生活，让一度美丽的卡罗琳肥胖得无可救药。尽管卡罗琳的真实身材从未在画像中展示过，她的胸部也并没有传说中那么夸张，但成为王后时，她的身躯已经变得如此庞大，以至于在没有仆人帮助的情况下，她连在自己床上翻身都做不到。她的国王丈夫找了一个情妇——自己妻子的首席侍女，但无论王后多么不满，她仍然爱着他，他也如此。

酸

为了生存，我们身体里的许多系统必须协同工作。我们的新陈代谢，呼吸，血液凝固，免疫防御，消化，腺体分泌体液和激素，吸收营养物质，消除有毒废物，血液循环系统，肌肉工作，思考，细胞分裂和组织生长，水平衡，矿物元素的分布，以及其他一系列的功能都需要彼此依赖才能维持正常工作。为此，我们的身体必须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使这些系统以最佳状态运作。我们的体温必须保持在37℃，理想的pH值维持在7.4（比纯水的酸度略低）。我们的新陈代谢和呼吸燃烧卡路里产生酸性废物，包括乳酸和二氧化碳（CO_2）。过量的酸通过肾脏和呼气从血液中排除。坏死组织和细菌产生的毒素也是酸性的。严重感染或细胞大量死亡的患者会呼吸加快，排出（呼出）更多二氧化碳来代偿多余的酸。如果患者过于虚弱，不能排出更多的二氧化碳，血液中的酸含量将上升到一个危险的水平。这就是所谓的酸中毒。它会对身体的所有系统造成直接的有害影响。当这些系统失灵时，人体中的pH值将进一步下降。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直至死

亡。

卡罗琳大概并不为自己的暴饮暴食和身材感到羞耻。普通市民可以购买门票去观看这对皇室夫妇周日的用餐。人们可以看到他们肥胖的王后狼吞虎咽，大吃特吃。但是她有一个秘密，只有她的丈夫知道。在她最小的女儿路易丝公主出生后，由于体重过重和多次怀孕，她的腹部中心出现了一个肿块。她巧妙地把这个鼓包藏在衣服下面。这其实是脐疝，最终发展到了“巨大的尺寸”。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有多大，但是对于超重的人来说，脐疝有可能会达到像西瓜那么大。有些甚至在自身重量的拉扯下，会下垂到膝盖以下，如同一个细长的囊。

脐疝是指肠管或其他腹腔器官通过脐突出（或疝出）腹壁的肌肉。肚脐开口自出生后残留，其直径通常不超过半厘米，小到足以承受腹部的压力。然而，如果腹腔内容物长时间膨胀，例如脂肪组织过多或多次怀孕，脐的开口可能会松弛和拉伸。于是，腹腔内容物可以通过扩大的开口被推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推出的腹腔内容物越来越多。

如果脐孔继续扩大，突出的肠子会在疝囊中留有足够的空间而不受挤压。只有当腹部的压力骤然上升，比如咳嗽、打喷嚏、大笑或腹肌用力时，肿块才会带来不便和疼痛。当患者仰卧，重力会使疝的压力降低，这样肠子落回腹腔原来的位置，肿块就会消失，直到患者站起来再次出现。这被称为可复性。但即使是可复性的脐疝也不会自行消失。迟早会有更多的腹腔组织进入疝囊。此时症状将加重，患者仰卧时肿块也不会消失。疝不再是可复性的了。如果更多的腹腔内容物被迫进入，疝可能会紧缩，引起突发的剧烈疼痛和呕吐。此外，如果不采取措施降低脐孔的压力，疝中的组织将会坏死。这就是嵌顿疝，“嵌顿”源于拉丁语“incarcerar”，是“监禁”的意思，其中的内容物可能发生绞窄（血运障碍）。嵌顿疝的结果取决于发生绞窄的是哪种组织，处理这个问题的外科医生是谁，尤其是在什么时候进行处理。

1737年夏天，卡罗琳有两次肚子疼得很厉害，但都自行缓解了。11月9日星期三的早晨，她又经历了极度的痛苦，这种痛苦一直持续到11天后她去世。当时发生在王后卧室及周遭的事情，在约翰·赫维勋爵的回忆录中得到了详尽的记录。赫维勋爵是内廷宫务副大臣，也是这对王室夫妇的私人朋友。王后感到剧痛难忍，还伴有呕吐。可是那天晚上，她还是坚持像往常一样出现在客厅里。晚上，她继续干呕，无法平卧，薄荷水和草药苦味剂并没起到作用。皇家外科医生约翰·兰比被召唤而来，他采取了简单粗暴的措施：他给卡罗琳喝了威士忌，并立刻给她放血355毫升（12盎司）。

第二天对兰比来说是忙碌的一天。因为王后没有感到任何好转，他先是给她放了更多的血。然后他不得不照顾卡罗琳王后的女儿小卡罗琳，她在母亲床边哭了很久，直到流了鼻血。对于这位痛苦的年轻女士，兰比毫不犹豫地给出了治疗方案。他也给她放了血——还放了两次。与此同时，王后被各种各样的医生所烦扰，他们尝试着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他们在她的腿上烫出水泡，让她喝药水冲洗肠道，尽管没有人知道她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他们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胃痛风”。其中一名医生被国王扇了耳光，因为他暗示王后可能无法康复。

星期五早上，王后再次被放血，但疼痛仍在继续，她还把吃的、喝的都吐了出来。到了星期六，国王再也掩饰不住，说出了他妻子的秘密。虽然王后极不情愿，国王把她隐瞒了13年多的脐疝告诉了兰比。直到那时——她发病的第四天——患者才接受了检查。兰比摸到了腹部的肿块，立刻叫来两位外科医生：一位是宫廷外科医生，名叫布西耶，年近90岁；另一位年轻得多，是市里的外科医生约翰·希普顿。当这3位医生照料王后时，乔治二世开始整理妻子的财产。事情终于被严肃对待了。

布西耶建议进行一次大范围的手术，切断疝囊深处的脐孔，这样绞窄的肠管就可以被推回到腹部。这表明这位上了年纪的医生仍然具

有敏锐的外科头脑，但显然，他过于超前了，因为兰比反对这个建议，而希普顿也同意兰比，决定再等上一会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患者的疼痛加剧了。傍晚时分，兰比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折中方案，要做一个不超过皮肤深度的切口。6点左右，3位18世纪的专家在勇敢的王后床边，借着烛光进行了手术。她习惯睡在5块床垫上。这一定对3位外科医生的背造成了很大的负担，他们不仅要俯身面对那堆床垫，还要面对他们患者的庞大身躯。兰比的外套被汗水湿透了。就像3个医学院的学生在解剖室里解剖一具尸体一样，他们切开隆起的脐部皮肤，试图把看得见的一切都塞回王后的腹部。这一定是王后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但他们的努力都是徒劳。结果更加悲惨：这位国家最杰出的女性身上现在不仅有一个绞窄的脐疝，而且还有一个巨大的、裂开的伤口。

尽管3位外科医生担忧这可怕的局面最终将会如何收场——他们当然有理由担忧，但他们忽视了王后病情好转的明显迹象。如果肠道真的嵌顿，卡罗琳就活不过那漫长的前五天了。死亡的肠壁会在几小时内使得坏死细胞产生的有毒废物、消化液和肠道内容物进入血液。这将导致灾难性的生化连锁反应，不断增加的酸度将迅速对身体所有系统造成巨大破坏。她最多也只能活两天。但在11月13日星期日，她仍然非常有生气，神志清醒，能对床边的人做出回应。因此，卡在她脐孔的一定是别的什么东西。

腹腔中有一个巨大的结构悬挂于肠道前方，尤其是在肥胖的人中，称为大网膜或网膜。正常情况下，这是介于腹壁和肠道之间的一层薄膜，但在严重肥胖的人体内，大量的脂肪组织聚集在这层薄膜中。因此，嵌顿在王后脐疝中的更可能是她的大网膜而不是肠管。不同之处在于，虽然大网膜绞窄很疼，但它的危险性较低，因为坏死的脂肪细胞比坏死腐烂的肠道造成的危害要小。

星期天，也就是手术后的第二天，外科医生对疼痛的伤口进行了处理。现在在白天，比前一天晚上在烛光下看得更清楚，他们突然注

意到疝的深处坏死的脂肪组织。在那个年代，伤口发生坏死，通常被看作是患者将马上死于坏疽的征兆。因此，尽管王后并没有感到病情比前一天恶化，也没有其他迹象表明她即将死去，但3位外科医生认为她现在只剩几个小时了。国王被叫来向她告别。他伤心欲绝。他承诺永远忠于他深爱的妻子，尽管她劝他在自己死后再娶。乔治二世哭哭啼啼地说了一句史上著名的话："不，我只找情妇。"卡罗琳叹了口气回答说："天哪，那有什么区别！"

外科医生们继续进行工作。当他们切除坏死组织时，又一次忽略了一个有利的迹象，伤口中并没有粪便流出来，这意味着他们切除的不是肠道。外科医生们对患者以及她所爱的人的感情，所表现出的可耻的冷漠，使副大臣赫维勋爵感到越来越不安。就在几个小时前，他们刚刚宣布王后命不久矣，然而现在并非如他们所说，这3个人却表现得好像一切正常。脐疝里的坏死组织对王后没有什么直接影响，在随后的日子里，她还接待了首相和大主教。然而，她确实越来越虚弱了。她仍然吃不下任何食物，不停地呕吐。外科医生们每天给她做手术，处理伤口，切除坏死的组织，把手指插进去，用探针探查，当然没有任何的麻醉。在其中一次手术中，上了年纪的布西耶把蜡烛举得离头太近，他的假发着火了。报纸上刊登出每一个可怕的细节，卡罗琳的事情被公开讨论，用赫维的话说，"就好像她在（皇宫）门前被解剖一样"。

直到11月17日星期四，情况才真正出现恶化，肠子穿孔了。她呕吐加剧，大量的粪便突然从伤口流出。大便从王后的肚子里喷涌而出，浸湿了她的床单，流淌在她卧室的地板上，由于恶臭，房间的窗户大开着。可她又坚持了3天，死于1737年11月20日星期日晚上10点，死在最肮脏、最悲惨的环境里，终年54岁。

根据我们现在的知识，如何解释王后的症状呢？最重要的线索是她病程的异常。一开始，她出现的是小肠阻塞。嵌顿性脐疝中发生了肠绞窄似乎说得通。但是，由于肠道上的破口是在8天后才出现的，

不可能是由绞窄引起的，因为肠绞窄在几小时内即可导致致命的后果。也可能是肠梗阻的时间过长，压力过大，小肠像气球一样炸开。然而，更有可能是这3位外科医生在王后腹部深处翻来找去导致的。他们在每天的手术中，很容易在已经有压力的肠道上钻出一个洞。王后不停地呕吐强烈地暗示着肠道发生了梗阻。她的小肠被紧紧地挤在一起，也许是和大网膜一起被卡在脐孔里，但没有发生绞窄。如果网膜拉扯着肠道，梗阻的位置也可能在腹腔深处。

无论如何，在那个外科医生对病情的影响往往弊大于利的时代，唯一正确的治疗方法就是在不动手术的情况下将疝推回腹腔。兰比不应该等待，而是应该从第一天就坚持检查患者，在没有事先评估病情的情况下不要放血。然后，他应该用手掌轻柔地按压肿块至少半个小时，试着把隆起的脐部肿块，至少是一部分，推回到腹腔。他这样做甚至不需要挽救即将坏死的疝内容物，因为这显然并不威胁王后的生命，只需要解除小肠的梗阻。然而，一旦他下了刀，一切希望都破灭了。

14年后，1751年12月19日，历史在丹麦重演。卡罗琳的女儿路易丝公主嫁给了丹麦国王，成为王后。和她母亲一样，路易丝也很胖。27岁怀孕期间，她也出现了嵌顿性脐疝。外科医生又一次徒劳地试图救她。在与她母亲相同的可怕遭遇中，她失去了年轻的生命以及自己的孩子。

尽管约翰·兰比在他职业生涯的初期遭遇了这样的惨败，他仍然对自己有很高的评价。他在1744年出版的《枪伤治疗方法》一书中，讲述了自己随后几年在英国军队当军医的辉煌时刻。他的英雄事迹之一是治疗了威廉王子——乔治二世国王和已故王后卡罗琳的小儿子，也被称为“屠夫”。1743年，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期间，威廉王子和他的父亲并肩在德廷根战役中与法国人作战。这是英国历史上国王最后一次亲自率领军队上战场。威廉王子被火枪击中，子弹穿透了他的小腿，造成了一个像鸡蛋一样大的伤口。兰比立即拔出刀，冲过去帮助

流血不止的王子。在今天，一个明智的外科医生会解开士兵的裤子评估伤口，用裤腿做一个结实的压力绷带来止血，并尽快使受害者从战斗的混乱中脱离出来。但是兰比用他的刀做了别的事。他在倒下的王子的手臂上开了个口子，给他放血，而且就在战场中央，火枪子弹还在他们的耳边飞过。他放了半升多的血，好像王子腿上的血还没流够似的。在战地医院里，他用面包和牛奶包扎了伤口，又给王子放了两次血。尽管如此，这个年轻人还是活了下来，这使他的外科医生感到极大的光荣和宽慰。后来，兰比就没那么幸运了，因为他的治疗方式实在荒谬可笑。他在为英国首相罗伯特·沃波尔经尿道取出膀胱结石时，造成首相失血过多。当时，除了从已经快要失血而死的患者身上放出更多血以外，他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

22　早回家，快康复

叛逆与革命：巴西尼和李奇登斯坦

医学、解剖学和外科学中使用了大量的人名命名词，这些名字来源于发明或是描述了某种仪器、解剖结构、状况、疾病或手术的人。意大利的名字无疑是最有魅力的：菲诺切托牵开器（肋骨牵开器）、明恩加扎尼试验（一种用于诊断轻度偏瘫的试验）、多纳提缝合（垂直褥式缝合法）、斯科皮纳罗手术（一种减肥手术）、蒙泰贾骨折脱位（尺骨上1/3骨折合并桡骨小头脱位）、奥迪括约肌（由胆总管括约肌、胰管括约肌、壶腹括约肌、中间纤维等四部分构成的结构）、莫尔加尼陷窝（尿道陷窝）、帕基奥尼氏体（蛛网膜粒）、斯卡帕筋膜（下腹部浅筋膜的深层）、瓦尔萨尔瓦动作（患者用中等力度的呼气动作以克服闭嘴、捏鼻、屏气时的气道关闭阻力，像吹气球一样用力，以增加腹压和静脉回流阻力，可用于检查心和外周血管疾病等）和巴西尼疝修补术。正是在意大利——更准确地说，是在帕多瓦——对人体如何行使各项功能的真正洞见有了初步发展。16世纪，一个来自布鲁塞尔名叫安德烈·范·韦泽尔的人打破了千年以来的传统，即不加批判地运用书本上的古老智慧。他开始切割尸体，为自己寻找真相。他的著名作品《人体的构造》（*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出版于1543年，其中范·韦泽尔——他的拉丁语名字安德烈·维萨里更为知名——不仅说明了人体是如何构建的，同时证明了1000多年来，所有古书中的智慧全部大错特错。

200年后，在同一座城市的同一所大学里，乔瓦尼·巴蒂斯塔·莫尔加尼又做了同样的事情，但他着眼的是患病的人体。他第一次描述了患者存活时的病程，待其死后再进行尸检，看看他们出了什么问题。和维萨里一样，他于1761年出版的《疾病的位置与病因》（*De*

Sedibus et causis morborum per em indagatis）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正是由于这两个人的工作，医学才得以在事实而不是传统的基础上发展。

但随后，科学发展的重心转移到了其他国家。意大利受到外国列强的影响，他们干涉意大利内政，并乐于在意大利半岛上进行战争。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意大利从1870年才开始存在，在此之前，它是一个独立王国和共和国的集合体。南部是法兰西帝国的一部分，中部是教皇统治下的教皇国，北部在其他国家的影响下被划分为若干小国。这些独立区域的统一，一部分可归功于土匪、游击队战士朱塞佩·加里波第的努力。加里波第领导了一支由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小型军队，同时与法国人和教皇作战。法国由于在与德国的战争中需要更多军队，很快就撤退了，但教皇于1867年在罗马击败了一小群自由战士，成功地将不可避免的败局推迟了3年。

1861年，教皇庇护九世号召全世界的天主教徒来为教皇国而战。应召前来的人被分配到一支军队，名为教皇义勇军。其中的一个人用刺刀刺伤了加里波第小部队一名士兵的右腹股沟。这位不幸的自由战士是刚毕业的21岁医生埃多阿多·巴西尼（Edoardo Bassini），他作为步兵加入了这群民族主义者。他的叔叔与加里波第并肩作战，成为民族英雄。在英勇的凯罗利兄弟的领导下，巴西尼和这支70人的部队向罗马挺进。他们已经能看到地平线上圣彼得大教堂的圆顶了。1867年10月23日傍晚，在距台伯河几千米远的一座小山上，敌对双方在格洛里别墅的果园里相遇，义勇军有300人，人数占优。这场持续了约1小时的小规模战斗被称为“格洛里别墅冲突”，使得对抗教皇国的战役暂时推迟。

沐浴在秋日的阳光中，年轻的埃多阿多·巴西尼倒在罗马附近的一棵杏树下，腹股沟处的伤口大开着。医生可能用手指检查了他受伤的程度。伤口出血不多，但洞很深，正好穿过了他的腹肌。想必那时他把自己腹壁的各个层次看得清清楚楚，还能摸到每一层。也许正是在

那棵树下，一个让他日后闻名于世的想法诞生了。

巴西尼成为战俘，在士兵的看守下，他接受了帕维亚大学医院前外科教授路易吉·波塔的治疗。右下腹部的伤口开始有粪便漏出，巴西尼患上了危及生命的腹膜炎，但几天后，他退烧了，伤口排出的粪便也减少了。显然刺刀刺穿了他的盲肠，也就是大肠起始处的短小盲端。如果位置再低一点，腿上的大血管被刺穿，他就会在杏树下失血而死。再高一点，大肠受损，他也没法在腹膜炎中存活下来。他极其幸运——他的伤完全恢复，几个月后被释放了。

失去了对战斗的兴致后，巴西尼重拾对外科学的兴趣，并开始深入学习。他拜访了那个时代所有伟大的外科医生：维也纳的西奥多·比尔罗特、柏林的伯恩哈德·冯·兰根贝克和伦敦的约瑟夫·利斯特。回到已经统一的意大利，他成为帕多瓦大学的教授，那曾是莫尔加尼和维萨里所在之处。1887年，对于一个3000多年来外科没能解决的问题——如何治疗腹股沟疝，他提出了基本的方案。

腹股沟疝是人类最常见的疾病之一。死于公元前1157年的法老——拉美西斯五世的木乃伊上，就有明显的腹股沟疝迹象。医学术语中，腹股沟疝（inguinal hernia）的字面意思是“腹股沟的缺口”。25%的男性和3%的女性在一生中会出现腹股沟疝，其原因是双侧下腹壁存在先天的薄弱点。

腹壁由3块肌肉组成，相互叠加，这个结构从一片培根的不同层次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从内到外依次是腹横肌、腹内斜肌和腹外斜肌。在身体的两侧，这3层肌肉各有1个洞，3个洞共同形成1个隧道，称为腹股沟管。

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患疝，因为在出生之前，睾丸在从腹部降到阴囊的过程中已经通过了腹股沟管，这就削弱了它对腹腔内高压的抵抗力。在某些情况下，腹股沟管在出生时就已经非常薄弱，以至于在幼

年时期就会出现腹股沟疝。它也有可能强到足以承受多年的压力，直到很久以后才破裂。这就是腹股沟疝在儿童和老年人中最为常见的原因。

肠管突出的薄弱点称为疝门。腹股沟疝也被称为破裂（rupture），但这个术语存在误导性。腹壁的破裂仅指腹股沟的（疝）门，而这本身并不是问题所在。只有腹腔内容物通过破裂的腹壁突出后才会引起不适或并发症。突出的肠管仍被腹膜包围着，这叫疝囊。疝囊通过疝门（腹股沟管）突出来，从外面可以看到或摸到腹股沟皱褶稍上方的皮下肿块。当患者平躺，疝囊和肠子会回落，肿块消失。与脐疝一样，肠管也可能被卡在疝门发生绞窄。这会导致危及生命的嵌顿性腹股沟疝。

疝

“疝”（hernia）在拉丁语中是破裂（rupter）的意思。虽然“破裂”这个词表示破口或裂缝，但医学术语中裂缝并不是“疝”，而是“缝”（fissure）。“疝”只指有突出物的裂口或裂缝。它用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形。脊柱的一个椎间盘可能裂开，椎间盘的软核（髓核）可从中突出。这就是所谓的椎间盘疝或“椎间盘突出”。如果突出物压迫到从脊髓出发的神经根，就会在神经根相应的支配区域引起放射痛。因此，背部“（椎间盘）疝”的疼痛会扩散到腿部，而颈部“（椎间盘）疝”的疼痛则会扩散到手臂。疝的第二种形式是腹膜通过腹壁的裂口或薄弱点突出。在脐疝，这个薄弱点是脐孔，脐带曾通过此孔。在膈疝，这个点是食道通过膈肌的裂孔。切口疝的薄弱点是旧伤疤，股疝的薄弱点是血管从腹部穿入腿部的孔。腹股沟疝的薄弱点是腹股沟管，男性的睾丸通过腹股沟管向下移动至阴囊。这就是腹股沟疝在男性中更常见的原因。

在巴西尼之前，腹股沟疝的治疗重点是疝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换句话说，是突出的疝囊，而不是疝门。美索不达米亚人、埃及

人和希腊人已经会用桁架将腹股沟疝压入腹内，从罗马时代到中世纪后相当一段时间，也有人用手术方法治疗腹股沟疝。第一种方法是从外部用烙铁灼烧肿块，然而这种不人道的治疗手段效果不甚明确。很有可能仅仅因为阿拉伯外科医生阿尔布卡西斯在1000年前的书中记载了这个方法，才会有人去尝试。第二种方法称得上是真正的手术，在公元前就已经有了。它的做法是在肿块顶部做一个切口，抓住疝囊，扭曲并缝合使其封闭。在14世纪，法国外科医生盖伊·德·乔里亚克喜欢用一根金线来做这个手术，术后睾丸常常会坏死。在腹股沟嵌顿疝的病例中，患者被倒挂起来，在肿块处做切口，这样可以更容易地推回疝内容物。然而如果嵌顿的肠管已经绞窄，患者通常就会死亡。到了19世纪，方法得到了改进，外科医生开始更加注重卫生，对患者使用麻醉。然而，在巴西尼之前，他们仍然局限于移除疝囊，而不治疗疝门。因此，腹股沟疝总是有在短时间内复发的风险。

巴西尼意识到，疝囊不是问题的原因，而是结果。他专注于病因，也就是薄弱点，花了许多年研究腹股沟管的不同层次。巴西尼手术的出发点是在切除疝囊后，恢复腹壁的原始解剖结构。手术不仅要纠正错误，还要恢复正常，这一想法在外科手术中是前所未有的。

但要重构原始的情况，就要确切地知道“情况”是什么。也就是说，不仅要知道身体正常的模样（正常的腹壁解剖结构），还要知道腹股沟疝是如何使之产生变化的。巴西尼在帕多瓦大学提出他的想法，而这里正是维萨里奠定生理解剖基础、莫尔加尼奠定病理解剖基础的大学，这真是个愉快的巧合。1889年，巴西尼将他的方法描述为“nuovo metodo operativo per la cura radicale dell'ernia inguinale”，即一种彻底修复腹股沟疝的新手术方法。

他提出了革命性的想法：切开所有不再符合正常解剖情况的部位，按照正常情况重新缝合，以重建腹壁。当巴西尼躺在杏树下时，他也许领悟到，每一层腹肌都在维持整体的坚固性方面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因此必须单独修复各层腹肌以治疗腹股沟疝。

虽然腹壁可区分为7个不同的层次，但巴西尼发现可以将其归为3个功能单元，它们在腹壁中起到不同的作用，因此在治疗腹股沟疝时，必须用不同的方式处理。首先是保护层，由皮肤、皮下组织和腹外斜肌组成。这一层无助于腹壁的坚固，因为它不能充分抵抗来自腹腔内部的压力。其次是位于保护层下面的肌肉层，包括腹内斜肌、腹横肌和腹横筋膜，或称“第二腹膜”。肌肉层需要独自承受腹部的压力，因此它才是问题的关键。最后在它下面，是由腹膜形成的疝囊。和第一层一样，疝囊对腹壁的强度没有影响。

发生腹股沟疝时，疝囊突出肌肉层形成肿块，仅被保护层覆盖。巴西尼首先切开失去了正常形态的腹壁所有结构（保护层和肌肉层），然后用强力的缝合丝线闭合肌肉层——就像一个胖子，他的肚子已经撑开了衬衫上的纽扣，突出于他的毛衣之下，为了让肚子回去，他就重新系上纽扣，还把衬衫塞进裤子。巴西尼记载了262例患者，他们通过手术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不幸的是，巴西尼疝修补术并不足以治疗严重的疝。在许多情况下，腹股沟疝使得必要的肌肉层非常薄弱，以至于不能再用于重建了（通俗地说，衬衫太小了），必须用其他东西提供额外的支撑。金属丝、橡胶和尼龙都被试用过，但人体不能耐受这些材料，而且它们又很容易断裂。因为太空旅行所用的材料必须符合非常高的要求，这个难题最终迎刃而解。用于载人飞船减速的降落伞是由聚乙烯塑料制成的，它能够承受极大的力量。如果不是在以下两件非常有名的产品中加以使用，这种材料可能只会成为史书上的一笔。

1957年，它被用来制作呼啦圈。1958年，外科医生弗朗西斯·乌瑟用这种材料编织的补片来修补腹股沟疝。疤痕组织使得这种合成材料与周围组织相融合，恢复其原有的坚固性。乌瑟将补片植入腹壁深处，在疝囊与肌肉层之间——就好像这个胖子放弃了衬衫上的纽扣，而穿上了一件结实的汗衫。

巴西尼使外科学有了第二个目标。现在，一种手术不仅要解决问题，还要尽可能恢复原来的情况。治疗腹股沟疝的下一个重大进步再次影响了整个外科学。欧文·李奇登斯坦是一名美国外科医生，在洛杉矶比弗利山庄日落大道拥有一家私人诊所，名为李奇登斯坦疝专科研究所。他用常规巴西尼方法的一种变体为腹股沟疝患者进行手术，但与众不同的是，他的患者只需要局部麻醉，在缝完最后一针后，可以自己从手术台上坐起来，直接回家。这真是一个革命性的概念。当他在1964年提出他的治疗方案时，外科医生们目瞪口呆。在此之前，患者在做完腹股沟疝修补手术后，要在医院的病床上躺上几天，甚至几周。

形象地讲，李奇登斯坦所做的正符合巴西尼的想法：在问题解决后，尽快恢复正常。巴西尼所说的是腹壁的正常，李奇登斯坦则将患者作为一个整体，不要他们躺在医院里等着，而是回到家里，回归日常生活：行走、吃饭、喝水、洗澡、工作等等。腹股沟疝手术后，患者根本没有理由躺在床上。

现在我们知道，很多手术以后，走动会减少并发症。2004年，丹麦外科医生亨里克·克勒特将这一原理应用于大肠手术，世界各地的外科医生再次被震惊。这种加强的康复，克勒特称之为“快通道外科”，包括尽早下床、正常饮食、充分止痛，以及“早回家”——在医院住一两天后马上回家。2004年以前，我们的外科医生还严禁肠道手术的患者在排气前吃一口东西。我们彻底冲洗他们的肠道，静脉注射液体，这样他们就不用喝水了；插上导尿管，这样他们就可以躺在床上，不用起来上厕所了。他们会在医院住上至少两周，而当奇怪的并发症出现时，比如肠道突然停止工作、肺部充满液体、产生褥疮和压疮，或者腿部血栓形成，没有人会感到惊讶。2004年以来，我们不再冲洗肠道，手术后几个小时患者就可以吃一个三明治；通过点滴只提供最小限度的液体，这样他们就会自己感到口渴而想喝水；同时他们还会尽快下床，去上厕所也就不需要导尿管了。从腹股沟疝修补到髋关节置

换，快速康复的概念已经被外科学的所有分支所采用。

腹股沟疝的治疗也因此逐步推进，就差最后一步了。巴西尼被刺刀刺穿了腹壁的所有肌肉。虽然这样一个大伤口的愈合肯定是万分痛苦的，但年轻的巴西尼很清楚，还必须切开所有这些层次，才能进行腹股沟疝手术。否则你要怎么做呢？当然，这不仅是最初巴西尼手术的缺点，而且也是后来使用补片方法的一大缺点：就像被刺刀刺穿一样，手术伤口总是有引起慢性疼痛的风险。大约在巴西尼之后的1个世纪，这个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你需要确保的是补片在腹壁层之间的正确位置：腹膜之上，肌肉层之下。不管你是从前面做出一个大伤口，还是绕道而行，结果都是一样的。多亏了腹腔镜，现在从肚脐开口的微创手术能做到从内侧用补片加固腹壁，而不需要切开所有的7层。微创手术不能采用局部麻醉，但由于快速康复的概念，这不再是一个缺点。全身麻醉后，患者也可以轻松地当天回家。腹股沟疝修补术是目前最常见的外科手术——而使用补片的腹腔镜手术再加上快速康复是最好的方法。

23　死在手术台上

手术的局限性：李·哈维·奥斯瓦尔德

马尔科姆·佩里医生还在值班。两天前，这位年轻的外科医生在达拉斯经历了他短暂职业生涯中最可怕的时刻。他曾努力挽救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生命，但刺客的子弹造成的可怕伤口没有给他丝毫成功的希望。肯尼迪死在他手中，全国的舆论扑面而来。

他没有从聚光灯下退出，没有休假，也没有和同事换班，他只是继续工作。因此两天后，也就是1963年11月24日那个星期天，那个奇怪的小个子男人——据称是那名刺客——被带进同一间急诊室时，仍然是他值班。男子刚中了枪，被救护车送到时已经失去知觉。目击者说他中了一颗子弹。一根呼吸管从口腔插入这名男子的气管，血液和液体被输入他体内。

他胸部左下方可见一处枪伤。他的胸腔里，沿着左肺放了一根胸腔引流管，但是没有血流出来。患者很瘦，在他胸廓的另一侧，即右侧背部，很容易就能摸到皮下有一颗子弹。它正好穿过了上腹部。他的脉搏微弱而快速，每分钟130次，但血压测不出。这名男子很快被转移到手术室，3名外科医生在那里奋力抢救他的生命。

全美国人都坐在电视机前。他们目送已故总统约翰·F.肯尼迪的灵柩被送往华盛顿的国会大厦，他将在那里供公众瞻仰，以便他们向总统告别。画面切换到达拉斯警察局地下的一个车库，刺杀嫌疑人被带向一辆囚车。观众看到这个瘦弱的年轻人，戴着手铐，由两个戴着大牛仔帽的警察押送着。突然，一个男子从一群记者中出现。他接近那个瘦子，将一把手枪抵在他的肋骨上开了一枪。这是历史上第一起电视直播的谋杀案。枪本来瞄准的是他的心脏，但被他避开了，子弹打

中了偏下的位置。由于现场有那么多记者带着相机和摄影机，这次枪击案被从好几个角度记录下来。其中一些现在还可以在视频网站上看到。

开枪的人——杰克·鲁比，立即被记者制伏，被带到了那个年轻人刚腾出的牢房中。在警察局地下车库的喧闹声中，摄影机持续运转着。几分钟后，一辆救护车开了进来，显然已经失去知觉的年轻人被放在担架上。当从晶体管收音机中听到达拉斯枪击事件的消息时，华盛顿国会大厦前的人群中爆发出欢呼声。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中枪了。

奥斯瓦尔德被送往达拉斯帕克兰纪念医院的2号创伤室。每个人都认识这个瘦子的脸，马尔科姆·佩里一定在想：又来了。

择期手术和紧急手术不一样。择期手术可以计划，但不一定非要做；紧急手术的患者则没有退路。这可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其中的区别甚至有点微妙：如果是紧急手术，不管手术的直接风险有多大，总比什么都不做的风险要小；对于择期手术，手术的直接风险总是大于不做。但无论如何，这个差距必须小到可以接受的程度，才有手术的理由。现代外科学中，如果择期手术的并发症发生率不超过10%，死亡率不超过1%，这种风险就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显然，并发症由于手术难度的不同而千差万别。但总的来说，严重的并发症常发生于高难度的手术。当然，严重的并发症也可以发生在不太难的手术中，但并不常见。

术后产生并发症的概率被称为“发病率”，以百分比表示。一般并发症包括伤口感染、出血、膀胱或肺部感染、腿部血栓形成、心脏病发作、褥疮、呕吐、便秘或小肠麻痹。死亡的风险也以百分比表示，称为“死亡率”。你不会仅仅因为一场手术或一种并发症而死。只有在失去控制的情况下，并发症才会危及生命——如治疗不及时，或一个并发症引起另一个，带来连锁反应。

并发症，甚至是致命的并发症，在所有手术中都是可以预测的，因此，患者必须事先知道这些风险。在知情同意的前提下，外科医生和患者在接下来的手术流程上达成一致。关于手术，有4个外科医生必须告知患者，患者必须理解而且他们必须都同意的要点，它们就是：手术指征（手术的原因）、手术的性质和后果、手术的替代方案，以及所有可能的手术并发症。

并发症当然不等同于失误。只有手术医生的行为造成的问题，才能被看作是手术失误。如果手术是常规进行的，也就是“按照标准规则”进行的（换句话说，就应该这么做），问题还是出现了，那就是并发症而不是失误。并发症也不同于副作用。前者是非故意的，而后者是意料之中的。手术的副作用包括疼痛、高热、恶心、疲劳或心理压力。

手术并发症与诸多因素有关——手术医生的技术、手术的难度、手术的方法、患者术前以及术中和术后的护理、意外巧合、运气好坏，以及患者本身。每个患者都不尽相同，他们之间的差异在并发症的发展中非常重要。并发症通常发生在肥胖、吸烟、营养不良或生物学年龄（并非实际年龄）较高的患者，以及有严重的高风险共存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压或哮喘的患者身上。因此，患者自己也可以戒烟、减肥至健康水平、术前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尽量提前治疗其他疾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并发症的风险。

外科医生应该记录下自己手术的并发症。好的并发症记录是一种质量控制。可你不能简单地将不同医院、不同外科医生的结果作比较。毕竟，主要为年老、超重、吸烟的心脏病患者做手术的医生，当然比那些常为年轻或相对健康一些的患者手术的医生更容易遇到并发症。

认为手术并发症主要发生在手术当中其实是一种谬见，它们大多发生在手术后。在手术过程中，外科医生对他的患者有着最大的控制

权，因此也会收获相对好的结果。可以这样说，在这一刻，他完全把风险掌握在自己手中。由于并发症大多发生在术后，所以外科医生需要戴着“四维眼镜”进行手术——第四维是时间。他必须想象，他现在所看到的、解剖的、重建的以及缝合的东西，在1个小时后、1天后或1周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例如，如果一个器官供血充足，那么它不仅应该现在呈现一种健康的粉红色，而且在1个小时或1个星期后仍然会是粉红色的。但如果颜色稍显苍白，外科医生必须能够预测，几小时后它是否会变黑、缺氧。有时在手术过程中，失血看起来很少，但如果没有完全止血，失血量可能会在几小时内累积达到危及生命的程度。当外科医生缝合肠子上的洞时，他的预测需要更加准确。修复好的肠子在当时是密而不漏的，但是，如果缝合处周围的肠壁组织没有得到充足的血供来愈合，手术后几小时或几天内，细胞就会死亡，最终导致肠瘘。

所以，外科医生在手术中比手术后有更多的控制权。如果患者死在手术台上，说明肯定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是外科医生最可怕的噩梦——*mors in tabula*——“死在手术台上”。

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手术记录是公开的。它是沃伦委员会1964年发表的报告的一部分，可以作为“帕克兰纪念医院手术记录——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手术”里的“第392号委员会证物”，在附录8《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帕克兰纪念医院医生医疗报告》中找到。手术由外科医生汤姆·夏尔斯、马尔科姆·佩里和罗伯特·麦克里兰以及住院总医师罗恩·琼斯完成。

他们做了剑突——耻骨剖腹术，沿着中线从胸骨（剑突）到耻骨，用最大的切口打开了腹部。一打开腹腔，他们立即取出3升血液，包括新鲜的血块。患者有出血致死的危险，所以时间至关重要。大部分出血似乎来自身体的右侧。

在右上腹部，从前至后排列着5个重要的结构。首先是肝脏前面

弯曲的大肠，称为结肠右曲。医生们小心翼翼但又尽可能快地将它剥离，以便能看到肝脏和其下的十二指肠。大肠和十二指肠似乎完好无损，肝脏有轻微的损伤。为了进一步检查，他们必须将肝脏移到一边，并剥离十二指肠。再后面是右肾，乍一看受损严重，顶部大量出血。但是，当外科医生们将肾脏剥离后进行更仔细的检查时，他们发现，大部分血液来自腹部更深处的一个大结构——下腔静脉。这是一条拇指粗细的血管，壁很薄，直接连接到右心房。身体所有的血液都会通过右心房，这条大静脉上出现了一个洞，意味着循环系统可能会完全干涸。外科医生们迅速在血管上夹了一个弯钳夹闭这个洞，并用纱布填塞在右上腹背部、肝脏和肾脏之间，暂时止血。

外科医生们很清楚，事情还没有做完，腹膜后腔有一个巨大的血肿（局部的血液聚集）。腹部后的肿块使得肠子都被挤出来了。外科医生们想知道那里出了什么问题，于是决定从左边接近这个区域。

在左上腹部，器官也从前至后排列。首先是在脾脏前弯曲的大肠（脾曲）。外科医生们小心翼翼，以最快速度将其剥离。他们看到了脾脏，就在胃的旁边。脾脏顶部有损伤，而在附近，他们看到膈肌上有一个洞。他们将胃剥离并移到一边，以便观察胰腺，胰腺似乎严重受损。再靠近中心，他们在腹部更深处摸索，寻找主动脉——一条很大的重要动脉。主动脉也被子弹击中了。从上腹部的主动脉分支出来、为小肠供血的肠系膜上动脉，也被切断了。佩里用手指夹住大动脉上的洞，用钳子夹住洞的周围和离断的小肠动脉。现场一片混乱，但失血似乎暂时得到了控制。如果你读了手术报告，你会感到整个手术团队都松了一口气。患者的血压又回升到了可接受的水平。

可他们一定意识到了，奥斯瓦尔德活下去的希望渺茫。下腔静脉（人体最大的静脉）和主动脉（最大的动脉）急性合并损伤的死亡风险极高（超过60%）。预后如此之差，当然是由于这两种损伤会造成大量失血，因为主动脉的压力很高，而下腔静脉与心脏直接相连。这些结构隐藏于深处，难以操作，又有许多器官紧挨着，容易损伤，使

得救治成功的可能性更低了。在战场上，枪伤主要是由高速子弹造成的，大血管严重受伤的受害者很难被活着送到手术台。平民枪伤的情况则不同，它主要是由手枪造成的，就像鲁比对奥斯瓦尔德的攻击一样。

手术的麻醉师是M．T．詹金斯医生。报告中明确指出，整个手术过程没有麻醉。患者从一开始就对疼痛没有反应，因此只给他吸入了纯氧。当时在手术室的外科医生保罗·彼得斯后来接受采访时说，他记得有3名身穿绿色洗手服的男子显然不属于手术团队。奥斯瓦尔德气管里插着呼吸管，说不出话，已经昏迷了好一段时间，正处于生死边缘，还有3个外科医生在他的肚子里“翻箱倒柜”，这3名男子却站在手术台的头端，冲着他的耳朵喊：“是你干的吗？是你干的吗？！”彼得斯据此认为，当局尚未从犯罪嫌疑人那里得到完整的认罪供词。

钳子夹着，失血似乎得到了控制，医生总共为他输入了9升的液体和16个单位的血液（半升为1个单位）。然而，脉搏还是越来越弱，越来越慢，突然之间完全停止了。这种完全没有心跳的现象被称为停搏或（心电图）平线。患者还有别的地方在流血吗？也许在胸部？他的心脏被击中了吗？外科医生们继续战斗，立即开胸，他们在左胸两根肋骨之间做了一个切口，但打开胸腔后并没有发现出血。再打开心包，也没有出血。佩里、麦克里兰和琼斯轮流将奥斯瓦尔德的心脏握在手中，进行开胸按摩，有节奏地挤压它。在他们这样坚持着争取时间时，夏尔斯从身体右侧的皮下取出子弹作为证据。

医生们将钙、肾上腺素和利多卡因直接注入心脏，但没有什么效果。这颗心脏现在已经难以充盈，循环系统的血液几乎流干了。之后，心脏开始颤动，心肌不再有节奏地收缩，而是做出混乱的、不受控制的运动。外科医生们开始除颤，将充电电压逐步提高到了750伏。心脏的颤动停止了，却没有恢复跳动。医生们不想放弃，植入了起搏器，也没能刺激产生强有力的心跳。麻醉师詹金斯确认，患者对刺激失去反应，失去自主呼吸，瞳孔被光线照射时也不再收缩。医生

们停止了努力——奥斯瓦尔德已经死了。他们缝合腹腔和胸腔时发现少了两块纱布。手术持续了85分钟。据估计，死者的失血量约为8.5升（人体血液容量不超过6升）。

奥斯瓦尔德可不是个普通的人。他曾在美国军队服役，还在苏联生活过几年。他是一匹精神失常的独狼？还是说，他的过去暗藏着政府的秘密活动？就在被谋杀之前，他还一直坚称自己是被陷害的。他死时才24岁。

但是想象一下，假如佩里和他的同事们有能力救奥斯瓦尔德一命，为了提高他的生存机会，医生们会让他处于药物诱导的昏迷状态，在这之后他也要在重症监护室里待上几个月，甚至可能还要做更多的手术。他的精神和身体都会崩溃。如果他没有死于某种并发症，最终活着离开了医院，大概还需要1年的恢复期，才能差不多恢复到枪击事件前的身体状态。可这样做有意义吗？他大概还是会被判有罪，处以死刑。

腹膜后腔

肺和心脏都处于一个相对独立的腔内，肺位于左、右胸腔，心脏位于心包内。我们身体中最大的腔是腹腔，其中有胃、小肠、大肠和阑尾、大网膜、肝脏和胆囊、脾脏、子宫和卵巢。躯干部分其余的器官嵌在脂肪或结缔组织中，因此在腔内能够不“松散”。它们包括食道、胸腺、大血管、胰腺、肾脏、肾上腺、前列腺、膀胱和直肠。腹部可分为两部分：前面的腹腔和后面的腹膜后腔。腹膜后腔位于腹部和背部之间，手术很难到达。它在躯干的深处，所有腹腔器官都在它前面。而且，由于腹膜后腔内的器官被脂肪和结缔组织所包围，寻找起来就像在抽奖箱中翻来翻去。腹膜后腔可以从仰卧患者的腹部进入，它是腹腔的“地板”。也可以让患者侧卧，从侧面进入，这就是所谓的“剖腰术”，也就是“侧腹切口”，是到达肾脏和输尿管的经典术式。

24　假体

“美好时代”的奇妙发明：面包师朱尔斯·佩杜

外科手术一直都是手工活，但也越来越依赖科技。今天，即使是日常的手术也离不开科技。一个半世纪前，少数积极得要命的外科医生推动了外科学中的科技革命。

19世纪末，西方文明迎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巨大飞跃。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许多其他革命之后，工业革命成为高潮。这是一个充满新思想、新哲学、新发现和新发明的时期，人们普遍乐观积极。未来是属于科技的，这种新时代的乐观主义在法国最为流行。19世纪出现的新发展，给英国带来了拘谨、灰暗的工业城市，给美国带来了野蛮和无法无天，而在法国，它带来了大胆、享乐和华丽。这是一个美好的时代，这个“美好时代”的中心无疑就是巴黎。巴黎有着壮丽的大街和林荫大道，宫殿般的火车站，还有博物馆、公园和喷泉。这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城市，它是马克西姆餐厅、红磨坊和女神游乐厅的城市，是图卢兹-劳特莱克、萨拉·伯恩哈特和康康舞的城市。在这个著名的城市里，最著名的外科医生名叫朱尔斯-埃米尔·潘。在圣路易医院开创了事业之后，1893年，他在健康路（Rue de la Santé）上成立了自己的医院，起了一个一点都不谦虚的名字：国际医院。

然而，在巴黎过着幸福生活的暴发户，与在贫穷郊区辛勤工作的劳工们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奇怪的是，这种阶级间的差异，在两种影响所有阶层人群的慢性传染病上表现了出来：穷人患结核病，“少数幸运儿”患梅毒。这两种疾病都十分常见，当时的人们仅有40～50岁的预期寿命也与它们有关。出于这个原因，19世纪的大多数人没有机会得那些常见于老人、在20世纪变得很普遍的疾病，例如，骨关节炎（关节的磨损）就不常见——在当时，关节更容易得结核或梅毒。

朱尔斯-埃米尔·潘描述了一个肩关节得了结核病的特殊病例，并提出了一个典型19世纪式的、乐观得要命的解决方案。在一位手巧牙医的帮助下，他用一个新的机械关节替换了肩关节。患者是一名37岁的穷苦面包师，住在郊区，名叫朱尔斯·佩杜，他很有可能在还是个小男孩时就感染了结核，因为从初次结核感染（常始于肺），到发展为身体其他部位（如脊椎或其他骨骼）的二次感染，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潘的肩关节假体是美好时代的法国众多的奇妙发明之一，与世界上最高的人工建筑（古斯塔夫·埃菲尔建造的铁塔）、电影摄制技术（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的电影）和脚踏车（皮埃尔·米修斯发明的自行车）齐名。令人惊讶的是，这个人造肩关节竟然坚持了两年。

结核病就像梅毒和麻风病一样，会逐渐改变身体组织，导致毁容和畸形。它们是慢性感染，通常不会有突然而剧烈的症状，而是会缓慢发展，侵蚀组织。这是因为它们是由特殊的细菌感染引起的——麻风病和肺结核由分枝杆菌引起，梅毒由螺旋体引起——在体内引起的反应不同于其他大多数细菌。

结核杆菌吸引免疫细胞形成小块组织结节，即肉芽肿，细菌逐渐将其破坏。结核细菌的侵袭性并不强，但十分持久，因此从长期来看，其破坏作用要比其他感染严重得多。它们缓慢地扩散到全身，隐匿多年。如果没有抗结核药物——专门对抗结核杆菌的抗生素——它们就永远不会离开被感染的组织。结核病的典型症状是盗汗和消瘦。结核不会对局部组织造成急性而严重的损害，不会产生脓液和发红、疼痛、发热的脓肿，它引起的局部反应要慢得多，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不严重。受结核杆菌感染的组织逐渐被破坏，形成一种类似奶酪的物质。因此，结核性的脓肿被称为“冷脓肿”。

当朱尔斯·佩杜来到潘的医院时，他病得很重，十分消瘦，左上臂有一个巨大的冷脓肿。从外表可能看不出来，但如果握住他的手臂，

就会清楚地摸到皮肤下面有一团液体。肩膀每动一下都会很痛，手会受压肿胀，和上臂一样难以动弹。潘最初认为，拯救他生命的唯一方法是切断关节，将整个手臂从肩关节分离出来。但这位面包师坚决拒绝，宁愿死也不愿独臂活着。毕竟，他需要双臂来维持生计。潘接受了挑战，虽然这与他的判断相悖。他为佩杜做了手术，仅仅进行了冷脓肿的“清理”（nettoyage）。他从肩膀顶部开始，在上臂做了一个长长的切口，暴露出骨头。骨头的上半部分完全受累，包括球形的头部。潘清除了所有形似干酪的骨组织。骨膜（覆盖于骨头表面的膜）、肩关节囊和关节窝似乎尚为完整，留下一个界限分明的空腔。1893年3月11日第一次手术后，患者在几天内恢复了健康，他的手臂保留了下来。

因患梅毒或结核而造成鼻子和下巴畸形的患者，脸上会临时植入铂金，潘对此十分熟悉。他请牙医迈克尔斯为他的患者做一个机械肩关节，尽可能使用惰性材料，还要保证肩关节的功能。迈克尔斯设计了一个精巧的装置，至少在理论上能满足这两个要求。他做了一个橡胶球，在煤油中煮了24小时使之变硬。球的表面有两个凹槽，彼此成直角，有两个铂金环可以在凹槽中移动。水平环用两颗小螺丝固定在肩胛骨的肩关节窝上，这使得手臂能够向内和向外运动（外旋和内旋），垂直环的活动使手臂能够抬起（外展）。第二个环被固定在一根铂金管上，以替代上臂的顶部。

潘在第一次手术后不久就在相同的地方做了切口，给患者植入假体。假体与空腔很契合，他用羊肠线将铂金管紧紧地缝住。他在手臂上留了一个橡胶引流管，再用马鬃线将皮肤缝合起来。在关于患者进展的报告中，他写道：“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12天后，佩杜又能走动了，在“体重”增加了35磅之后出了院。潘并没有具体说明佩杜住院多长时间——几个月，或者半年？他倒是写过，有4次不得不从伤口中引流脓肿。至于手臂的功能怎样，却根本没有提及，可毕竟这才是整个手术的目的。佩杜出院后，潘有一年没有见过他的患者。这件事

本身就不大寻常——著名的外科医生竟然会允许一个普通的面包师带着一只装满铂金的上臂离开（尽管这种稀有的金属在当时并不被认为很值钱）。

为什么他对这个假体如此乐观？路易斯·巴斯德早在30年前就证明了细菌是导致疾病的罪魁祸首，而10年前罗伯特·科赫发现了导致结核病的杆菌。然而，潘对人体抵御外来细菌入侵的机制知之甚少。我们现在知道，只有健康的组织才会产生有效的局部防御反应。无论潘将冷脓肿周围的组织清理得多么彻底，这些外来的材料——橡胶球和铂金管——还是为细菌提供了人体免疫系统无法触及的存活之处。因此，整件事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一年之后就能看出来。

骨关节炎

我们的骨头通常并不相互直接接触。它们在关节里的末端覆盖着一种特殊的组织——软骨。软骨是终极的不黏材料，它比聚四氟乙烯（PTFE，更为人所知的名称是铁氟龙，有史以来最光滑的合成材料）还要光滑许多倍。这使得软骨成为我们身体中几乎不可替代的组织。不幸的是，它也是少数不能愈合的组织之一。软骨细胞在无血液供应的环境下存活，只吸收很少的氧气和营养物质，且代谢率极低。一旦软骨在儿童时期形成，软骨细胞就几乎不再生长或进一步发育，因此，与我们身体的大多数其他组织不同，软骨几乎无法再生。坏死的软骨细胞不会被新的软骨细胞所替代，而且由于没有血管，所以如果软骨受到损伤，也几乎不可能形成瘢痕组织。因此，软骨组织的磨损实际上是不可逆的。它还会导致关节的磨损，也就是骨关节炎。骨关节炎会出现在老年人的负重关节（膝盖、髋部和脚踝），也可能出现在年轻人骨折或其他关节损伤后。骨关节炎的典型症状是关节僵硬，尤其在早晨以及活动开始时疼痛。到了更严重的阶段，它还会导致休息时的关节疼痛和关节功能的进行性丧失。这两个问题只能通过完全或部分关节替换来解决。人工关节常用金属和铁氟龙制造。

1897年，潘发表了一篇关于这次手术的随访报告。佩杜被植入假体约两年后，又回到了医院，因为他出现了瘘管——上臂有一个洞，不停地流脓。潘用X光透视了手臂——这是德国刚刚出现的一项全新发明。他没有写在X光片上看到了什么，但他决定取出假体。他在同样的位置再次将手臂切开，发现假体周围形成了一层骨质。原来冷脓肿的瘢痕组织已经化脓，并已转化为骨组织。这里乱成一团，但看上去似乎强度足够，即使没有假体也可以保持手臂的长度。潘取出了假体，大概它也早已从连接点上脱落了。他把伤口包扎好，患者开始恢复。同样，潘也没有提供关于肩或手臂功能的信息，也没有说明他是否解决了瘘管的问题。尽管如此，他还是自豪地向医学会提交了这个病例的记录。

潘固然严重高估了自己治疗方法的成功，但他确实领先于他的时代，不过他并不是第一个进行关节替换的外科医生。1890年，德国人泰米斯托克利斯·格鲁克已经换了至少14个关节，包括膝、手腕和肘关节，假体全部用象牙制成。他甚至让人按不同的尺寸制作了关节的各个部位，以便在术中找到适合关节两侧的假体，当场将两个象牙部件组装在一起。但格鲁克也不够幸运，他的患者也患有结核，和潘一样，他也不明白，对于假体领域的先驱来说，治疗受细菌感染的关节不是个正确的选择。现在我们知道，人工关节必须在绝对无菌的条件下安装，手术过程中，任何进入假体的细菌都会不可逆转地导致整个假体被感染，假体最终只能被取出。

抗结核药物和抗生素的发现抑制了结核病和梅毒，人们的寿命增长，可以用人工关节治疗的患者出现了。骨关节炎，是由关节长年负荷过重引起的，没有感染，大多发生于晚年。它是关节置换的理想适应证。橡胶和象牙的组合不够坚硬。象牙和木头曾被试用过，但这些天然材料在体内会溶解。铂金变得非常昂贵，钢容易生锈。1938年，钴-铬-钼合金被引入假体手术。钴-铬-钼合金是钴、铬和钼的合金，强度极高，十分耐磨，不会生锈，不会引起过敏反应。现代植入物由钛

或含铁氟龙的复合材料制成。

今天，效仿当年的格鲁克，人工关节的两边都有不同的尺寸，并且在术中进行测量和组装，然后用螺钉或环氧树脂水泥——作为黏合剂使用，随后会变硬——将单独的部件与患者的骨头连接在一起。最常见的置换关节是髋关节、膝关节和肩关节。手术的目的首先是缓解骨关节炎引起的疼痛，其次是阻止关节功能的恶化。

以今天的知识来看，潘的假体手术似乎完全没有意义。第一次手术已经减轻了疼痛，清除了冷脓肿。在这方面，假体很可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相反，这个装置放在手臂的众多肌肉中，至少可以说是不怎么舒服的。第三次手术可见上臂高度骨化，这只能说明佩杜的肩关节几乎完全失去了功能。大概他的胳膊根本动不了，肩关节也完全僵硬。但是即使没有潘的假体，也会如此。总之，这个精巧的装置没有什么好处，但也没什么害处。

潘确实给我们留下了另一项有用的发明。现代手术中用到的几乎所有钳子和持针器，其原型都来自他的设计，这些钳子和持针器包括由拇指和食指把持的两个相对的金属手柄，每个手柄都有一个齿状突起。这些突起可以像棘轮一样相互咬合，保持夹紧。潘也是第一个切除脾脏的外科医生，还差点成功切除一部分胃。在最后一次报道面包师和他的肩关节一年后，潘死于肺炎，终年67岁。朱尔斯·佩杜的结局不得而知。

迈克尔斯和潘的那件“外科杰作”到哪里去了呢？潘最初保留着朱尔斯·佩杜的人造肩关节，但不知为何，最终它落入了一位不知名的美国牙医之手。他把它带回了美国，现在保存在华盛顿特区的史密森尼博物馆。

只要没有细菌进入，人体就能很好地应对外来材料。面包师的故事以及关节假体的历史表明，身体与外来材料的相容建立在没有感染

的基础上。如果细菌附着在体内的异物上，显然免疫系统是无法触及的。因此，只有在绝对无菌的条件下才能安装假体材料。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人工关节，也适用于修复疝的合成补片、金属夹和金属钉、心脏起搏器、人工血管、骨折用的螺钉和金属板、眼睛中的人工晶体、中耳的人工听小骨、脑内引流系统、血管的金属支架、心脏的机械瓣膜和乳房的硅胶植入物。

缝合线是个例外。它们不可能总是留在体内，这就是可吸收线被广泛应用的原因。如果缝线上有细菌，你可以等待，而不用重新切开患者的身体，从深处取出缝线。一旦缝线溶解了，细菌通常也会消失。从罗马时代开始，人们用干燥的绵羊或山羊肠做成线来缝合伤口。潘在他的报告中也提到了羊肠线的使用。

25　胃切除术

“牛仔”与外科医生：特蕾莎·海勒夫人

19世纪初，外科医生罗伯特·利斯顿是伦敦的大英雄。他被人们称为“伦敦西区最快的刀”。在麻醉出现之前的年代，速度是绝对必要的，而这就是他的招牌。观众的眼睛几乎跟不上他的刀和锯。他总是把手术刀放在内侧口袋里，据说有时在手术时，他会把手术刀叼在嘴里，这样方便做下一个切口。按照当时的习惯，他在翻领的纽扣孔里穿了一捆线，随时准备把喷血的血管结扎上。有时他还用牙齿把线扎紧，以便腾出双手。任何事都不能放缓，精确性显然就不那么重要了。他曾经在切除患者的大腿时切掉了睾丸。还有一个臭名昭著的案例，手术时他的刀弹了出来，割伤了助手的手指。大量的血从患者和助手的手上流出，一个观众直接吓死了。患者和助手最后都死于坏疽，这肯定是唯一一次记录在案的死亡率为300%的手术。但利斯顿仍然是一位伟大的外科医生，他的成就令同时代的人羡慕不已。他设计了小型的“牛头”钳，现在仍被用于暂时夹住小血管，还有大型的切骨器，被称为利斯顿氏钳（剪骨钳）。

大约200年后，外科医生们看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手术患者的伤疤时，感到十分震惊。20世纪90年代以前，普通的胆囊手术会在右上腹部留下一个三四十厘米至50厘米长的斜行疤痕，无一例外。有时，上一代的外科医生似乎需要足够大的切口，得能把他们的整个脑袋放进去才行。对于几乎所有的常规腹部手术来说，沿着中线用最大的切口切开腹部——从胸骨一直切到耻骨，是一种惯例而不是例外。

在那个时代，“大名望外科医生做大切口”是一种既骄傲又常见的说法。以我们现有的知识，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是无稽之谈。然而在那个时候，可能会有很多外科医生的想法完全相反：从事微创手术的年

轻一代是“牛仔”，就像我们现在看待做巨大切口的大名望外科医生一样。每个时期的手术室里都有“牛仔”，但在他们那个时代的背景下，他们是英雄。

特蕾莎·海勒夫人在一次切除胃出口（幽门）肿瘤的手术中幸存了下来，比历史上第一个在这一手术后活下来的人多活了3个月。在今天，我们认为这两次手术都是完全失败的。但治疗了海勒后，西奥多·比尔罗特成为英雄，而朱尔斯-埃米尔·潘——他早在两年前就成功实施了这项手术——几乎被遗忘了，他的患者活了不到5天。他们都是19世纪末著名的外科医生。潘曾为一位面包师装上了铂金肩关节假体，他是一位自信的巴黎外科医生，巴黎是世界文化之都，而比尔罗特是一位伟大的维也纳教授，当时维也纳是世界科学之都。

在那个时代，胃出口的肿瘤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现在已不再是这样了，其原因并不完全清楚，但可能与冰箱的发明有关。癌症发生于这一精确部位，取决于一种特定细菌的存在。即使在相对年轻的年纪，因食用受污染食品而引起的一系列胃部感染也可能会导致胃癌。20世纪，食物的生产和保存得到改进，可能降低了这种癌症的发病率，但在19世纪，这仍是一个外科医生无法解决的普遍问题。死于胃出口肿瘤是一种不人道的死法——伴随着持续不断的疼痛、呕吐、口渴和饥饿，患者生不如死。若能成功通过手术来缓解这种痛苦，外科医生将成为国际英雄。

19世纪下半叶，实施这种危险手术的两个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全身麻醉（1846年由威廉·莫顿在波士顿首次提出，见第10章）和抗菌（1865年约瑟夫·利斯特在格拉斯哥提出，见第11章）。对于外科界备受尊敬的教授们来说，要成为第一个成功实施这项手术的人，感觉像是在与时间赛跑。这项手术在医学上被称为胃远端切除术（distal gastrectomy），切除（-ectomy）胃（gastr-）的最后（distal）一部分。潘的患者在1879年4月的手术中幸存了下来，但是尽管外科医生做了很多努力，他还是没能挺过艰难的术后阶段。这是因为，潘没能

给患者提供足够的液体，将液体直接注入静脉的方法——我们现在称之为静脉滴注——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尽管如此，潘还是在《希望报》（*Gazette des hopitaux*）上发表了他“成功”的手术结果，标题是《通过胃切除术切除胃中的肿瘤》（*De l'ablation des tumeurs de l'estomac par gastrectomy*）。注意肿瘤的复数形式，这表明潘相信胃肿瘤已经可以通过手术成功切除。1年半后，波兰外科医生路德维克·赖迪吉尔尝试了这个手术，但是他的患者甚至连第一天都没有挺过去。

这是一次冒险的手术，看似简单直接，但在很多方面都很复杂。可能比当时外科医生意识到的要复杂得多。他们发表的文章显示，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寻找最佳方法，将肿瘤切除之后的两个断端连接在一起，可这并不是手术中最困难的部分——还有3个棘手的问题等待着毫无戒心的外科医生。首先，胃的出口位于腹部许多重要结构的交会处，距离脆弱的胆管、门静脉、十二指肠动脉和胰腺都很近。即使是正常健康的胃，也很难在不损伤周围结构的情况下进行剥离，在这拥挤不堪的环境中，肿瘤又增加了这项工作的复杂程度。其次，胃内容物具有和盐酸一样的酸性，当时还没有有效的药物来中和胃酸。胃和十二指肠连接处极微量的渗漏都会产生腐蚀作用，引起腹膜炎。最后，胃肠道中胃后面的一段——十二指肠——牢牢地附着在腹腔后面。要想不太费力地把十二指肠末端和胃的末端连接在一起，需要相当的幸运。

比尔罗特的患者徘徊在死亡边缘。特蕾莎·海勒当时43岁。几个星期来，她一直吃不下任何食物，只能靠喝几口酸奶度日。在这个消瘦女人的上腹部，约有一个苹果大小的肿瘤清晰可见。手术前，比尔罗特用14升温水冲洗了她的胃部，1881年1月29日，他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的手术。一夜之间，他成为一个英雄，现代的外科医生们仍怀着敬畏和崇敬之心书写或谈论他。这次历史性的胃远端切除术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但并不是因为他的患者在切除肿瘤后存活了下来，更为重

要的是，她在胃肠连接后存活了超过10天，证明了胃肠连接有成功的可能。这是一项真正开拓了外科新领域的成就。

（胃）肠连接，医学上称为（胃）肠吻合术，是指肠与胃或肠的两个部分之间的连接。因此，不能将它与其他伤口等同视之。胃和（或）肠中的不洁内容物必须在连接完成后立即通过消化系统，而不妨碍伤口的愈合。直到手术10天后，才能知道身体是否能忍受这种特殊情况。

为什么是10天？肠吻合术的成功取决于两个阶段。首先，在手术过程中，必须在两个断端之间建立不透水不透气的密封。这确保了有害的胃肠内容物留在消化系统里，不会进入腹腔引起腹膜炎。这完全是手术技巧的问题，要选择正确的线，打正确的结，缝足够的针数（比尔罗特用了50针），确保两端相匹配。良好的肠连接将在几天内维持原样。但接下来还有第二阶段。

患者的组织中，伤口愈合必将代替线的缝合。无论线缝得有多好，如果缝线周围的组织坏死，和伤口一样，缝线就会裂开。但如果组织保持健康，伤口愈合过程将被激活，产生结缔组织使两端之间的连接密封。结缔组织对伤口的密封发生在前10天。一旦这段时间坚持过去，理论上就不会再发生渗漏。就像皮肤上的伤口10天之后就可以拆线一样，小肠连接处的缝线在10天之后也失去了作用。但是当然不能再打开腹部把它们取出来。因此，缝线将一生都留在患者体内，可吸收缝线则会在几个月后完全消失。

在比尔罗特的手术之后，所有的胃肠手术突然成为可能：癌症、传染病、功能障碍和危及生命的梗阻。胃肠手术迅速成为普通外科中最常见的手术，20世纪外科学的发展在之前的几百年都是不可想象的。外科医生这一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从事后来看，必须承认，伟大的西奥多·比尔罗特严重缺乏现

代外科学的眼光。需要批评的是，他关注的是肿瘤而不是患者。潘、赖迪吉尔和比尔罗特的患者都十分消瘦，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使得手术变得容易得多，这种容易不仅表现在技术上（因为几乎没有脂肪组织挡道），也表现在道德上（因为什么都不做会让患者死得更惨）。然而，我们现在知道，营养不良根本不是一个优势，反而是带来术后严重并发症的巨大风险。此外，这是一项复杂的手术，需要采取一些基本的预防措施。例如，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安全，需要良好的视野，也就是说，不仅是肿瘤，肿瘤周围的区域也必须清晰可见。因此，你不仅要花时间剥离肿瘤，还要剥离肿瘤生长的器官以及其他重要的邻近结构。但比尔罗特没有这么做。相反，他在肿瘤上方的皮肤上做了一个水平切口，小到他甚至没看见肿瘤已经扩散到腹部其他部位。特蕾莎在术后3个月就死于肿瘤转移。其次，比尔罗特没有周密设计切除肿瘤后连接两个断端的计划。他自己说，他很幸运，能把胃和十二指肠的两端连接在一起，而没有太大的张力。但如果他做不到呢？他确实考虑到了两端的尺寸不一样。十二指肠的直径约为3厘米，胃的直径超过6厘米。最终，他缝了至少50针才缝合好。

因此，海勒夫人又活了3个月应该被视为奇迹。在随后的几年里，比尔罗特进行了34例类似的手术，成功率不到50%。尽管如此，他仍然举世闻名。在这之后，他滥用自己的地位，在没有有力的论据支持的情况下，声称外科医生不应该尝试心脏手术，甚至不应该对静脉曲张进行手术。比尔罗特的手术方式，被称为比尔罗特I式吻合术，很快被一个更好的、名为比尔罗特II式吻合术的手术替代。比尔罗特II式吻合术也是一种胃远端切除术，但其中有不再需要把两端拉到一起的技巧。这个解决方案不是由比尔罗特自己，而是由他的助手维克多·冯·哈克设计的。后来，法国外科医生塞萨尔·鲁（Cesar Roux）解决了比尔罗特II式吻合术的一些缺点，在肠道中加入第二个连接，形成了一个“Y”形交叉。因此，今天仍在常规使用的胃远端切除手术有一个奇怪的全称，“鲁氏-Y形比尔罗特II式吻合术”。

吻合器

1907年，匈牙利外科医生休默·赫尔特发明了一种解决肠道连接（吻合）问题的方法。肠道必须一针一针地缝合，这意味着整个连接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每一针的可靠性。赫尔特认为，可以通过一次性自动完成吻合，达到更好的密封效果。他制造了一种沉重的吻合器，可以同时将一整排吻合钉钉入肠道。另一位匈牙利人阿拉达·冯·佩茨改进了这一概念，他生产的体积较小的版本，在20世纪20年代得到使用，但只用于特殊情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欧国家，外科吻合器被弃用。然而，东欧国家的外科医生仍在继续使用吻合器，它在苏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西欧的外科医生不知道还有同行仍在使用它，东欧的外科医生则不知道西方同行们并不知情。20世纪60年代，一位美国外科医生访问莫斯科，在一家商店的橱窗里看到一台苏联吻合器，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买下来带回了家。他将它展示给一位企业家，企业家将其改装后，以AutoSuture为品牌名大规模生产。他们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成功，从那时起，几乎所有的胃肠手术都离不开吻合器。

虽然比尔罗特做了些革命性的事，而且在随后的几年里，清晰地展示出了系统性的外科专业技能，但他仍然没有脱离当时流行的短而快的手术传统。总而言之，与其说比尔罗特开创了现代外科学——他确实为此做出了很多贡献——不如说他标志着"旧"外科学的结束。如果说像潘和比尔罗特这样的伟人是19世纪末的"牛仔"——一个带来了肩关节假体，另一个以胃部手术为代表作——另外两个男人则代表了20世纪早期精准外科的新标准：欧洲的西奥多·科克尔和美国的威廉·霍尔斯特德。

西奥多·科克尔对于现代外科学之重要性，从如此之多以他名字命名的外科术语中就可见一斑。科克尔切口有3种：第一种是右上腹部的斜形切口，用于到达胆囊；第二种位于大腿侧面，用于髋关节手

术；第三种用于切除甲状腺肿——增大的甲状腺。另外还有两种科克尔手法（操作）：一种用于复位脱臼的肩膀，另一种用于释放腹部十二指肠的弯曲（将十二指肠右侧腹膜切开），后者甚至成为一个动词：kocherise。科克尔综合征是由甲状腺激素缺乏引起的儿童肌肉紊乱；科克尔点是头骨上的一个位置，在此钻洞可从大脑中排出脑脊液。阑尾炎患者的疼痛从腹部中心向右下腹部转移被称为“科克尔征”。手术中，一张科克尔手术桌可以被推到患者的腿上，科克尔氏钳是普通外科中最著名的止血钳，科克尔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外科医生。2009年，甚至有一个月球上的陨石坑以他的名字命名。

科克尔对外科学最重要的贡献是甲状腺手术。正常情况下，甲状腺是位于颈前部的一个小器官，它利用食物中的碘来产生一种调节代谢的激素。当碘缺乏时，甲状腺会慢慢增大，以保持产生足量的激素。若干年后，它可能会增长到巨大的体积。甲状腺增大在医学术语中被称为甲状腺肿大。幸运的是，如今这种病已经不多见了，因为面包师在面包中额外添加了碘盐，但在过去，甲状腺肿大在碘缺乏地区特别常见。由于碘主要存在于海水中，碘缺乏通常在远离大海的国家和山区居民中普遍存在。这样看来，科克尔是瑞士人并非巧合。甲状腺严重肿大最终会阻塞气管，因此有时甲状腺手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比尔罗特定居维也纳之前，在瑞士当过教授。他曾尝试过切除甲状腺肿，但几乎40%的患者都死了，所以他不再做这种手术。后来，科克尔进行了尝试，到了1895年，他精确的手术方法使死亡率降低到了1%以下。

在美国蛮荒的西部，威廉·霍尔斯特德曾是外科医生中的“牛仔”。他把自己的血输给妹妹，使她免于在分娩过程中流血过多而死。29岁那年，他才当了一年的外科医生，就做了美国最早的胆囊癌手术之一——患者是自己的母亲。他吸食可卡因，后来又对吗啡上瘾。他把自己的衬衫寄到巴黎的一家洗衣店，表面上是因为洗衣店洗得更好，但

更有可能是在走私毒品。他有一篇关于可卡因作为局部麻醉剂在医学上应用的文章。在写这篇文章时，他显然受到了这种药物的影响，因为开头就是一个长达118个单词、令人费解的句子。在欧洲见到西奥多·科克尔后，他放弃了“牛仔”生活，成为美国现代外科训练和外科科学研究的创始人。他发展了各种手术方法，包括改良的肠吻合术，并确立了癌症手术的基本原则。有两种手术以他的名字命名：一种是乳腺癌手术，另一种是腹股沟疝手术。他发明了蚊式动脉钳，就像科克尔氏钳一样，地球上的每个外科医生每天都要使用，也是威廉·霍尔斯特德将橡胶手套引入了外科手术。1922年，他死于自己学生为他做的胆囊手术。

在两段肠管的连接问题被解决之后，20世纪早期，亚历克西斯·卡雷尔证明了血管可以被重新连接，继续让血液畅通无阻地流过。这使得血管手术成为可能，成为接下来移植手术革命的先决条件。1954年，约瑟夫·默里在同卵双胞胎之间成功完成了首例肾脏移植手术。13年后，克里斯蒂安·巴纳德在开普敦的格鲁特·舒尔医院完成了首例心脏移植手术。最后，1982年，迈克尔·哈里森在一名孕妇的子宫里对一名胎儿进行了开放手术，证明即使是未出生的孩子也能耐受手术，并继续发育成足月胎儿。目前唯一不能通过手术修复的结构是脊髓和视神经。我们身体中所有其他的组织似乎都能承受外科医生的“攻击”。

26　肛瘘

大手术：国王路易十四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太阳王）机智过人、能说会道、擅长舞蹈、善于交际、自信勇敢、身材高大、强壮健美，身体极其健康。他爱骑马、爱打猎、爱发动战争，而且，用詹姆斯·布朗的话来说，就像一台性爱机器。太阳王结过数次婚，有许多长期情妇，还有数不清的露水情缘。他在16岁时感染了淋病，有一位人妻曾与国王偷情，据说她愤怒的丈夫去妓院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把梅毒传给国王——但没能成功。

17世纪下半叶，路易十四统治了欧洲的政治舞台。1713年，随着《乌得勒支和约》的签订，他的作用达到了顶峰（或者说是低谷），欧洲的旧势力关系将永远消失，新的势力关系取而代之。从那时起，3个语言区（法语、德语和英语）定下了基调，荷兰和西班牙只能充当后卫。路易十四统治了72年，他的意志就是法律。他曾发表过著名的言论：L'état，c'est moi——“朕即国家”。他是一个极端保守的暴君，造成数十万士兵和持不同政见者死亡。但他彻底变革了音乐、建筑、文学和美术，使自己置身于巴洛克时期伟大的创造性思维之中。他的影响延伸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医学分支：产科。据说，路易十四用他不可预知的奇思妙想，彻底改变了生育的方式，尽管这倒不一定是他的本来意图。在那个时代，为了借助重力帮助分娩，女性生孩子时本能地蹲着。但路易十四看不清楚他的情妇露易丝·德拉·瓦列埃为他分娩私生子的情形，所以，露易丝不得不仰面躺着，张开两腿，以便让国王看得清楚些——国王甚至比那个可怜的女人自己还清楚。尽管平躺着分娩既困难又痛苦，却流行了起来。现在的女性仍然以这种方式分娩。

他不是一个寻常的人，或许仅仅因为他的寿命不寻常地长，而当时长寿的人很少。他的儿子路易、孙子路易和曾孙路易都死在他前面。1715年，路易十四在自己77岁生日的前4天死于坏疽。他的腿坏死了，很可能是因为老年病——动脉粥样硬化。他的臣民通常活不到40岁，所以大概没人了解这种病，人们早在动脉开始硬化之前就死了。从治疗方法来看，国王的医生们束手无策。他们用勃艮第葡萄酒和驴奶交替着泡他那条发黑的腿。外科医生马雷查尔建议截肢，但是国王厌倦了活着，也厌倦了统治，于是拒绝了。在极度的痛苦中，他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

年轻的路易十四差点死在9岁那年，倒不是因为他染上的天花，而是因为医生给他放血，导致他失去知觉。直到他最喜爱的宠物——一匹小白马，被拽上楼牵到他床边，他认出了它，才缓过神来。从那之后，私人医生对他的健康进行了密切监测，并每天在健康日报（*Journal de Santé*）上记录他的身体状况。59年来，他的医生瓦劳特、达奎恩和法贡接力记录着他的生活。于是我们得以知道，在1658年竞选时，路易发了很久的烧，人们担心他得了疟疾。这么多年来，他洗了至少一次澡。因为便秘，他几乎每个星期都要灌一次肠。他近视，经常头晕目眩，还受着痛风或是骨关节炎的困扰。25岁那年，他得了麻疹，之后，他变得肥胖，生了寄生虫，还反复出现胃痛。遗憾的是，他生命的最后4年里没有任何记录。

太阳王还有另外两段痛苦经历值得一提。无论是从字面还是比喻意义上来说，路易都喜欢生活中甜美的事物。在欧洲，糖还较为新奇，它让许多人，尤其是那些买得起甜食的贵族，烂了牙齿。路易的嘴里满是坏牙，他经常召见一名拔牙师到凡尔赛宫为他拔除牙齿。到了40岁时，国王几乎没剩几颗牙了。在许多画像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脸颊和嘴巴看上去像一个老妇人。

有一次，出了件大事。拔牙师不光拔出了他的一颗烂牙，牙上面还带着一块国王的上颌骨，连着一部分上腭。这名不幸的牙医后来不

知怎样了，但国王患上了严重的感染和上颌骨脓肿。当然，坏掉的那颗牙本身也会导致脓肿，感染的骨头可能会随着牙齿一起脱落。如果真的是这样，那牙医也无能为力。无论如何，路易的情况很糟糕，性命堪忧。几名外科医生被召来，最后，他们进一步掰开国王的上颌，让脓液流出来，然后用烙铁灼烧脓肿剩余的空腔——国王一直坐在椅子上，没有麻醉。

其中一名医生站在国王身后，用双手紧紧抓住他的头，也许是用右手按住前额，左手按住下颌，把他的头压在椅背上，这样能强迫他把嘴巴张开。第二名外科医生也许站在一边，双手把上唇拉起，确保上颌的视野良好。第三个医生在壁炉旁，给烙铁加热。以国王危险又受限制的姿势，当他看到发红的烙铁接近自己，肯定吓得要死。嘴里的热气、难闻的烟味和剧痛一定让他喘不过气，但路易勇敢地忍受了这种折磨，很快康复了。然而，口腔和鼻腔之间的上颚留下了一个洞，这使得他在喝汤或酒时，汤或酒会从鼻子里流出来。他吃饭的时候，从走廊外面都可以听到声音。

国王有个习惯，就是坐在他的便桶（chaise percée）上接待客人。因此，在会见他人或与谋臣议事时，路易可能在当众排便。宫廷里有一个小贵族，他唯一的任务就是擦拭国王的肛门——国王从不自己擦。究竟是由于这些不寻常的厕所仪式、过多的骑马、特殊的性癖好、2000多次记录在案的灌肠和结肠冲洗，还是因为肠子里有寄生虫，我们不得而知，但在1686年1月15日，路易的肛门附近肿了起来。2月18日，肿胀被证实为脓肿，后于5月2日破裂，形成瘘管，尽管进行了热敷和灌肠，但伤口并没有闭合。

“瘘管”（fistula）一词在拉丁语中是“筒、管子”或“长笛”的意思。肛瘘即肛周瘘，意思是“肛门区域的瘘”。拉丁语中相应的医学术语是fistula ani，字面意思是“肛门的瘘管”。它本质上是一个小通道，一个连接于肠道和皮肤之间中空的隧道，就像被小动物从直肠啃到外面。但它不是由小动物，而是由细菌引起的。

肛瘘通常始于直肠黏膜上的一个小伤口，位于肛门之内。粪便中数不清的细菌会导致伤口感染。感染可能发展为脓肿，与其他的脓肿一样，其中的脓液不断形成并压迫周围的区域。在直肠周围，靠近肠道的组织比远处的组织要致密得多。因此，直肠附近的脓肿往往会朝远离肠道的方向移动，它钻过较软的组织，最终在皮肤下面形成脓肿。

肛周脓肿的脓液越多，产生的压力就越大。患者会发生严重的疼痛和发烧，这就是路易在那一年的3月或4月所经历的。最终，皮肤承受不住巨大的压力以致破裂，释放出所有恶臭的脓液，这是5月初发生在国王身上的事。之后，压力消失，发热退去，疼痛停止，但是直肠黏膜的小伤口到皮肤之间的通道几乎不会自行愈合，而是留下一个持续存在的瘘管。

为什么肛周脓肿会留下一个无法自行愈合的隧道，原因还不完全清楚。也许是与直肠中持续存在的大量细菌或是黏膜中不断产生的黏液有关。瘘管可以潜伏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引起任何症状或不适，但其中随时可能充满脓液，形成新的脓肿。这意味着一旦你遭受过肛周脓肿的折磨，复发的可能性就很大。在某些情况下，瘘管的隧道会变得很宽，以至于肠内的气体甚至粪便都可以通过它排出，这当然会很恼人，因为你无法控制。大概国王如此不舒服的原因就是这个，因为瘘管未必会产生很多其他症状。

在治疗肛瘘时，区分两种类型是很重要的。如果直肠内的伤口位置很低，靠近肛门，瘘管的隧道就会从肛门括约肌下方通出来。假设你把一根细棒伸入隧道，从外面皮肤上的洞穿过里面黏膜上的洞，然后从里到外把隧道整个切开。这样，你就打开了整个隧道，两端瘘口的两个小伤口就变成了一个大的“常规”伤口。一个开放性的伤口是可以愈合的，因为瘘管已经不复存在了。不将伤口缝合，而是让其开放，每天用大量的水冲洗6次，然后等待。6个星期后，就能达到二期愈合。这种手术被称为瘘管切开术，或者更形象地被称为“敞开”手

术。用于寻找瘘管的细棒被称为探针（probe），因为它能“探”穿瘘管。

然而，如果直肠内伤口的位置较高，从肛门向里看，瘘管隧道可能横贯于肛门括约肌上方，甚至可以穿过它。如果此时进行瘘管切开术，不仅会切开瘘管，还会切开肛门括约肌，这当然是必须避免的，因为如果肛门括约肌受损，就无法控制肠道的运动了。

路易十四的瘘管显然令他十分不适，最后他召见了一位外科医生来做瘘管切开术。然而，外科医生查尔斯-弗朗索瓦·菲利克斯·德塔西以前从未做过这种手术。他向国王请求6个月的准备时间，并在75名“普通”患者身上进行了练习，然后在1686年11月18日早晨7点，切开了路易的瘘管。国王俯卧在床上，两腿张开，肚子下面垫着一个垫子。他的妻子曼特农夫人、皇太子、忏悔神父弗朗索瓦·德·拉雪兹、医师安托万·达奎恩，以及他的首相德·卢浮侯爵也都在场，首相握着他的手。

外科医生为这次手术制作了两种器械，一种是巨大的肛门牵引器，另一种是精巧的、镰刀形的刀——后面带有半圆形探针的手术刀。这使他能够在一次弧形运动中探查和切开瘘管。为此，他把切开瘘管所需要的两种工具——探针和刀，合并在同一个器械里。德塔西先是掰开了国王坚实的臀部，因为路易一点也不瘦。这使他能够检查外部伤口的准确位置——距离肛门有多远，是在肛门的前面还是后面，是在左边还是右边。然后，他把手指伸进国王的肛门里，去摸里面的开口，如果能摸到的话。到目前为止，国王不会感到疼痛，只会感到不安和尴尬。然后，外科医生会要求患者躺好，同时插入牵引器，慢慢地拧开。如果运气够好，光线充足，直肠内部的开口现在应该是看得见的了。旁观者大概已经越过外科医生的肩膀看了一眼。

痔疮

肛门及其周围可能会出很多问题。处理这类问题的医学分支被称为肛肠病学。肛肠外科的治疗范围包括肛周瘘管和脓肿、肛门疣以及肿瘤、肛裂、脱垂、肛门失禁和痔疮。痔疮是肛周3条静脉的静脉曲张。当一个人仰卧抬腿，这3条静脉分别位于5点钟、7点钟和11点钟的位置，也就是左后、右后和右前。痔疮基本上不会引起任何问题，除了瘙痒和少量失血。但是，如果曲张静脉的血流受阻，就会产生突然而剧烈的疼痛。比如，在飞机上坐得太久后就有可能发生。据说拿破仑·波拿巴就是因为这个输掉了滑铁卢战役。如果症状演变成慢性的，就可能需要进行痔疮切除术了，还可以用胶圈扎住痔疮（胶圈套扎法）、注射（硬化剂）使其收缩（硬化剂注射法），或是用电凝灼烧痔疮。在中世纪，这个手术是用一根灼热的铜棒穿过一根放在桩上的冷铅管来完成的。报纸在痔疮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你带着报纸、漫画、智能手机或笔记本电脑去厕所，肛门静脉的高压就会持续过久，所以尽量不要久坐！

现在，外科医生不得不警告国王，接下来会很疼，但他还必须再躺一会儿。德塔西将他的“瘘管探针兼手术刀”插入外部的开口，轻柔但坚定地向里推，直到它从内部开口伸出来，这个过程是痛苦的。每个人的额头上都冒出了汗珠，希望这不会持续太久。当德塔西看到探针从内部开口出来时，他知道，至少对他来说，最难的部分已经过去了。但是，对这位不幸的患者来说，最糟糕的时刻还没有到来。外科医生猛地一拉，把刀从瘘管里拔了出来。国王象征性地咬紧了牙关，但没有叫出声，瘘管被切开了。德塔西迅速地从肛门里取出牵引器，用一团绷带止住出血。患者会感到有一小股血顺着腿流下来，但也很快就停止了。

1个月后，国王下了床，3个月后又回到了马背上。他并不为自己的肛门问题感到羞耻，整个法国都知道这件事，在等待的几个星期里，他们和他们的君主一样焦虑不安。幸运的是，国王活了下来，证明这次手术是成功的。在凡尔赛宫的宫廷里，为了模仿勇敢的国王，

在裤子里缠绷带甚至一度成为时尚。瘘管切开术被称为La Grande Opération（大手术）或La Royale（皇家手术）。传言说，至少有30个朝臣要求菲利克斯·德塔西给他们做同样的手术，但都失望而归，因为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真的患有瘘管。1687年1月，宫廷作曲家让·巴蒂斯特·卢利为纪念国王的康复而演奏了一曲华丽的《感恩赞》（就是这时他用指挥棒击中了自己的大脚趾）。

从手术的良好结果以及后来没有提到国王患有失禁来看，他所患的一定是“低位”瘘管，他的肛门括约肌逃过一劫。菲利克斯·德塔西很幸运，只需要做一个简单的瘘管切开术。但是高位瘘管要如何治疗呢？

希波克拉底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公元前5世纪，他第一个提到了挂线法——只用一根简单的线。这名希腊医生描述了一种易弯曲的锡探针，末端带有针眼。他把一根由几股亚麻织成的线穿过针眼，线的周围缠上马毛。首先，他用食指伸入患者的肛门，然后将探针插入瘘管的外部开口，将探针穿过瘘管隧道，直到他的食指摸到探针进入了直肠，然后将探针弯折，把它从肛门拉出来。这根线穿过瘘管进入直肠，又从肛门出来，再将其两端系在一起。

穿过瘘管的线起的第一个作用是保持隧道畅通。这样，里面形成的任何脓液都可以顺着线流出去，阻止了脓肿的发展或复发。然后，再把线绑得更紧一点，在接下来的几天或几周内，它就会慢慢地穿过肛门括约肌组织。这个过程很缓慢，让被线切开的肌肉纤维有时间再次愈合。这是一种慢动作的瘘管切开术，避免了伤害肛门括约肌。希波克拉底的线能起到切断作用主要归功于亚麻，但亚麻容易过早断裂。这就是还要用马毛的原因，你可以用它来穿一根新的亚麻线，而不需要再用锡探针。

今天，人们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治疗高位肛瘘。例如，用各

种材料将其填满，或者用黏膜把它们封闭起来。但最常用的方法仍然是希波克拉底经典的挂线法，用一根线缓慢把组织切开。现在的合成材料和弹性材料代替了亚麻和马毛，但效果是一样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结果都令人满意。

因此，菲利克斯·德塔西显然不是从希波克拉底的书中学到手术方法的，因为他在治疗国王的瘘管时用的是刀而不是线。可能他在成功的英国瘘管外科医生——特伦特河畔纽瓦克地区的约翰·阿德恩的作品中读过这种方法。阿德恩在1376年写了一本关于瘘管的小册子，里面有他的手术方法和自己制作的器械的插图。阿德恩治疗所有的瘘管都用直接的瘘管切开术，没有什么特别的。然而，他比他的同事们取得了更好的成绩。他的名声可能来自他温和的术后护理，使得切开的瘘口愈合得比同行们所做手术的愈合效果要好得多。他用布而不是烙铁来止血，用清水而不是腐蚀性药膏或灌肠剂清洗伤口。路易十四也从这种温和的方式当中获益。

阿德恩在“百年战争”期间曾是一名军医，当时他看到许多骑士患有瘘管。他们穿着厚重的盔甲，在马鞍上颠簸着，劳累、恐惧和炎热使汗水从他们的背上流下来，流进了他们的臀缝。持续的刺激导致尾骨附近出现脓肿，脓肿破裂后留下一个洞，看起来像肛周瘘。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14世纪，约翰·阿德恩发现在马鞍上颠簸的骑士会有这种情况，600年后的另一场战争中，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屁股颠簸的士兵身上。但他们不是骑马的骑士，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坐吉普车的士兵。吉普车是为崎岖的地形设计的，但座位很硬，没有减震器。成千上万的美国士兵在医院花上好几周，接受臀部脓肿的治疗。

这种感染被称为藏毛囊肿，它的起源略高于肛周脓肿，并不始于直肠，病因还不完全清楚，但它总是发生在同一个部位——我们以前有尾巴的地方。在我们曾经有尾巴的地方，出生后会留下一小块区

域，此处皮下组织供血不足，且毛发在皮下生长的可能性更大。有些人这个部位的皮肤上有一个小坑，皮下的毛发会引发充满脓液的感染，特别是当该区域持续受到刺激时，就像吉普车里的士兵们一样。因此，感染的藏毛囊肿也被称为“吉普座”或“吉普乘员”病。

约翰·阿德恩没有注意到，骑士们所患的脓肿和真正的肛周瘘管不同，而且直到17世纪也没有做出这种区分。但国王路易患的并不是藏毛囊肿。藏毛囊肿不是一个开放的隧道（瘘管），而是一个盲端（窦），菲利克斯·德塔西永远无法通过一个盲端拉出他特别设计的“瘘管探针兼手术刀”。这两种症状在男性中比女性更多见，肛周瘘大多发生在比藏毛囊肿稍晚一些的年龄——30～50岁。路易患病时是48岁。肛周瘘有时可由克罗恩病（肠道炎症）引起，但病因大多不清楚。就路易而言，凡尔赛宫不卫生的环境可能是原因之一。由于缺乏净水和冰箱，住在宫廷里的人与其他人一样，经常因为食物中毒而腹泻。而且，太阳王也不经常洗澡，他身上总是臭气熏天。有一次，一位大使来拜访他，他非常友好地亲自打开一扇窗户，这样客人就不会被他身上的气味所冒犯。

外科医生菲利克斯·德塔西自从为国王做过手术后，再也没有拿起刀，据称是因为压力过大，但大概和他从手术中获得的丰厚养老金、乡间别墅和头衔的关系更大。他的“瘘管探针兼手术刀”现在可以在巴黎医药学历史博物馆看到。

在那个时代，外科不被认为是一个光荣的职业，但这种情况即将发生转变。整个欧洲都听说了皇家的瘘管切开术。威廉·莎士比亚写了一出喜剧《皆大欢喜》，其中法国国王的瘘管病扮演了重要角色。取笑路易瘘管的歌曲和笑话纷纷出现。每个人都在谈论它。瘘管切开术的成功，暴露出只会用泻药、洗剂、药水和放血的医生的医术不够精湛。在皇家手术后的1个世纪里，外科医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

27　电

600伏特：阿提斯动物园的电鳗

外科医生每天都要用到电。根据电压、导电性和频率的不同，电可以是无害的、有用的、碍事的、危险的或致命的。2013年3月1日，在阿姆斯特丹进行了一次非同寻常的手术，清楚地显示出电的危险。然而，这次手术不是由外科医生进行的，手术室也不在医院。地点是阿提斯动物园，做手术的是兽医玛诺·沃尔特斯，他为各种动物进行了手术。

当然，外科医生的工作对象仅限于哺乳动物，更具体地说，仅限于一种灵长类动物，但能在人类身上进行的大多数手术也可以在其他动物身上进行，外科学的发展也有助于推进兽医医学。阉割和绝育手术是兽医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但他们也为狗做剖宫产手术，为牛做胃部手术，为大腹便便的猪做腹壁整形，为马修补腹部疝，为猎豹治疗骨折，为河马矫正牙齿。

有些外科医生在老鼠小小的胃和肠子上做手术，是为了科学研究，但是，如果能给火烈鸟做食管手术，给长颈鹿做颈动脉血管成形术，给乌龟的肺做手术，给考拉做阑尾切除术（它们的阑尾有2米长），或给老虎的甲状腺做手术，想必会很有意思。给鲸鱼做心脏直视手术（它的心脏大到人可以站进去），或是给大象做鼻子矫正手术会是什么感受呢？

阿提斯动物园的这场手术同样奇特，而且要进行手术的动物也很危险。沃尔特斯对一条电鳗（Electrophorus electricus）进行了手术。这条在动物园水族馆里畅游多年的动物，腹部出现了肿块。电鳗是一种身长约1.5米的鱼类，有电击的能力，这使得它们比水下带电

的插座还要危险。

动物会发电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不断地在其内部和外部之间创造一个电场。我们身体产生的电压非常微弱，但这个强度也足以被轻易测量。大脑的电脉冲可以用脑电图（EEG）来测量，心脏的电脉冲则可用心电图（ECG）测量。神经细胞利用电荷传递信号。我们的大脑是一个靠电力驱动的巨大调控中心。产生和维持这些电能需要大量的能源。人体所需的约1/5的氧气进入大脑，为我们提供必要的电力。

电鳗用来发电的器官独一无二。这些器官并非单独地产生电荷，而是串联在一起，因此电荷的能量是累积的。这使得电鳗能够产生非常高的电压。由于电鳗需要大量的氧气来产生这些电，远远多于鱼类能通过鳃从水中获取的量，所以它们必须定期浮出水面，从空气中吸入额外的氧气。

电鳗有3个发电的器官，这3个器官都在尾巴上，尾巴几乎占了整条鱼的长度。萨克斯器官（the Sachs'organ）发出微弱的电脉冲，电鳗用这种电脉冲作为一种雷达来探测周围的环境（它的眼睛非常小）。电脉冲定位猎物后，狩猎者器官（the Hunter's organ）会放电，使猎物瘫痪。第三个器官——“主要”器官（“main”organ），是电鳗处于危险时使用的。它能产生600伏特的电量，可以使附近包括人类在内的任何动物都无法动弹。

这条电鳗的腹部已经肿了数个星期，这使它的头一直向上翘着。电鳗的腹部通常很小，位于头部和巨大的电尾巴之间，几乎难以被注意到。起初，动物园的兽医认为它吃得过多或是便秘，但减少食物摄入、使用泻药之后并没有好转。抗生素也没有效果，所以大概不是感染，这条鱼好像得了癌症。它的痛苦显然在迅速增加，兽医们决定对它进行检查，看看能否做些什么。这意味着要把电鳗从鱼缸里取出来，拍一张X光片，并进行活组织检查——手术切除一小块肿块，然

后在显微镜下检查。显然，电鳗会把这些举动认为是一种威胁，还会用600伏的电来对付饲养员。这一切会使它筋疲力尽并需要额外的氧气。总而言之，不管是对人类，还是对这条电鳗自身来说，这都是一项冒险的事业。因此，这场手术必须要认真准备。

这并不是第一次在电鳗身上进行手术。阿提斯动物园联系了在2010年做过同样手术的芝加哥兽医。准备工作已做好，一份日志被整理出来。要知道，电鳗只在它想放电的时候才会放电，无意识时则不会。也就是说，如果它睡着了，就不会放电。这有两个好处：第一，一旦电鳗被麻醉，手术时就可以不用担心被电击了；第二，在水中用电压表就可以轻易地测量睡眠深度。电荷越弱，麻醉剂的效果就越好。

手术在动物园水族馆园史大厅后面的画廊里进行。每个人都戴着特殊的电工手套，负责捕捉和移动这条电鳗的两名饲养员甚至穿着橡胶潜水衣，手术台是用一块PVC排水管做成的，可以把电鳗放在里面做X光和活组织检查。工作人员用网把它转移到一个装满水的塑料水箱里，泵入额外的空气。用一个简易电压表测量电击强度的同时在水中加入麻醉剂（三卡因），经过了大约1个小时，电击的强度减弱了，鱼的活动也减少了。

一旦它完全睡着，就被抬出水面，放在沟状的手术台上。电压表显示没有更多的电荷产生。它的嘴不断地被用三卡因溶液冲洗。现在，肿块的大小清晰可见，肿起的腹部里可以摸到一些硬块。拍完了X光片，沃尔特斯戴着橡胶手套，在肿瘤上方的皮肤上做了一个小切口。电鳗没有鳞片，而是有着和真正的鳗鱼很相似的皮肤，这使得沃尔特斯的工作非常容易。他从腹部取出一小块组织，用可吸收的线缝合了伤口。对于鱼，使用的缝线不能溶解得太快。温血动物的伤口会在两周内愈合，但鱼作为冷血动物，新陈代谢要慢得多，所以缝线必须要能够保持6～8周，以确保伤口愈合良好。小手术完成后，它被放在装满淡水的水箱里等待醒来。不一会儿，它又开始活动，放出的前

几次电击就显示出高压。

然而大约1个小时后，它明显不对劲了。电击不再有规律，也不那么活跃了。突然间，它放出了一次高压电，就完全停止了活动，它死了。它仿佛以放电的形式呼出了最后一口气。是麻醉和手术让它过于紧张，还是恶性肿瘤令它难以承受？

沃尔特斯对它的尸体进行了解剖。肿瘤很大，已经扩散到了肝脏和脾脏，后来的显微镜检查显示，它得的是转移性胰腺癌。这就解释了肿瘤的生长为何会如此快速。无论如何，这条鱼的前景预期都不会很好，或许，由于死在麻醉后，它还免受了许多痛苦。

缝合

缝合用一种叫作持针器的特殊工具来完成，缝针被紧紧夹在其中。右利手的外科医生用右手拇指和无名指握住持针器。他的左手拿着镊状的手术镊提起组织，并从持针器接过缝针。缝针是弯曲的，所以在缝合时可以尽可能少地影响组织。针是一次性的，缝线已经接在了上面。针和线采用双层消毒包装，不接触内层就可以打开外层，手术医生或他的助手可以在不接触外层的情况下拿到内部包装。这样可以确保外科医生拿针时不会被细菌污染。缝针有锐针、钝针、切割针、大针和小针。缝线分为可吸收缝线和不可吸收缝线，有的是一根线，有的由几根线编织而成。所有这些不同线和针的组合都是单独包装的，且线的粗细和强度有所不同。线的强度用数字表示。1号较粗，2号更粗，一直到5号。0号线比较细，但是大多数线更细。它们由一系列的零表示。2个0（00号）比0号线还细。3个0（000号）是皮肤缝合线的正常粗细。血管是用非常细的6——0线缝合的，而12——0线（比人的头发还细）则用于显微外科手术。

沃尔特斯及其团队不得不顾及的电力是不可预测的。外科医生（给人做手术的人）在日常工作中也必须注意电的危险，但幸好，手

术室中的电是可以调节和控制的。在手术过程中，电力无处不在。麻醉师的呼吸机，还有监测心跳、氧气水平和血压的仪器，都靠电力运转。手术台需要用电来移动，灯光当然是用电的，腔镜手术的设备离不开电力，移动X光机产生几千伏的电荷，手术室里记录和检索医疗数据的电脑，还有观看手术和X光片的视频显示器——这些都是电力驱动的。还有一些手术方法需要用电，离患者和术者近到甚至超出你的想象。例如，在现代外科手术中，几乎所有手术都离不开电凝。电凝用的是一种电刀——从手术刀和烙铁的结合进化而来。在电凝过程中，患者是“带电的”，但这很安全。

在石器时代，外科医生用的是石头，吾珥的亚伯拉罕用石刀割去包皮，希腊人用的是青铜手术刀，罗马人用的是铁，而我们用的是钢。在过去的100年里，由于技术的发展，新型的刀具已经被发明出来。压电（由于潜艇声呐系统而为人所知）在手术中被应用在一种特殊的仪器上（指超声刀，常用于腔镜手术），通过振动进行解剖和止血。在辐射（核能）的力量被发掘后不久，利用伽马射线、名为伽马刀的工具开始用于外科手术。可用微波（例如用于烹饪）发展后，这项技术也很快被应用于外科学，激光亦是如此。但最成功的工具仍然是简单的电刀，它是在电被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电灯泡）后就被引入外科学的。

早在1875年，人们就进行了利用电灯丝烧灼来阻止手术出血的实验（名为电灼术，electrocauterisation，源自拉丁语cauterium，意思是烙铁）。然而，灯丝的热量过高，烧灼到的周围组织面积比预期要大得多。这种方法既缓慢又不精确，而且还很危险。

法国物理学家雅克-阿尔森·达尔松瓦尔更进了一步。他知道，电在电阻最大时主要产热。人体足够大，导电时电阻很小，电也可以在金属手术刀上自由传导。因此，电阻最大的点是手术刀和身体接触之处，更具体地说，是电刀尖端周围组织的小区域，正是手术所需要产生热量的地方。而且，只有当手术刀与组织接触时热量才会产生。

达尔松瓦尔提出了一个想法，如果能量以交流电而不是直流电的形式传递，那么对身体有害的电流能量就可以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我们墙壁上的插座中就是交流电（AC）。从原则上来看，它是致命的，对神经、心脏和肌肉有麻痹作用。但是这位法国物理学家发现，如果交流电的频率足够高，达到10000赫兹以上，它的不良影响就会消失。

电刀与发电机用电线相连，为了完成电路循环，必须用第二根电线将发电机与患者连接，此时，患者会成为电路的一部分。如今，这第二根电线变成了贴在患者大腿上的一次性导电胶垫，通常称为“患者板”。因此，外科医生在开始动手术之前，一定会问手术团队“板子接好了没有”。

热可以将血液及周围组织中的蛋白质从液体转化为固体从而止血，就像煮熟后的蛋白会凝结一样。蛋白质的这种特性被称为凝固，如果用的是电，就叫作电凝。如果向一小片组织施加更多的热量来提高温度，细胞中的所有水分就会突然蒸发，导致它们在蛋白质凝固之前就发生爆炸，这个效果就不是止血，而是将组织切开。

20世纪20年代，美国工程师威廉·博威进一步发展了电凝原理。他发明了一种发电机，可以更好地调节组织中的能量水平。他通过把交流电的频率提高到30万赫兹达到了这个目的。这种发电机以脉冲形式提供电流，也就是所谓的调制交流电。此外，它还可以调节电压。通过减少每分钟脉冲数来抵消较高的电压，总能量水平就不会升得过高。这使得热能的效果可以在凝固和切割之间调整，而保持电流在安全范围内。在今天的外科手术中，这一原则也没有改变，在许多国家，电外科设备仍然以其发明者的名字——“博威”命名。

1926年10月1日，神经外科的先驱哈维·库欣在波士顿将博威的仪器引入了外科学。库欣专注于研究人体中不能简单地通过施加压力、缝合或打结来止血的一个器官：大脑。

大脑和大多数头部肿瘤都由众多小血管提供充足的血液。因此，切除脑肿瘤是非常血腥的手术，库欣为此制定了一系列预防措施。他用小银夹夹住小血管止血，术后银夹可以留在组织里。库欣还养成了分次切除脑肿瘤的习惯。如果患者因为严重失血而被迫停止手术，他将在几天或几周后等患者血液水平恢复以后继续手术，这就是所谓的分段法。在大手术中，他会在必要时让一名志愿者到手术室为患者当场献血。大多数情况下，志愿者是医学院的学生，他们将得到近距离观察开创性脑部手术的机会。

库欣在一份医学杂志上描述了他第一次使用电凝的手术，以宣传这种止血新方法的重要性。不过，他绝不是第一个应用这种新技术的人，有几位外科医生在他之前就进行过这种手术，但库欣在神经外科中将电凝技术运用得非常成功，而且库欣本人也更有知名度。他在1926年发表了这一令人震惊的结果，对这种方法的推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要使电凝技术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必须先解决一个严重的问题。尽管波士顿已经使用交流电提供街道和房屋的照明，但库欣工作的布里格姆医院使用的仍然是直流电。因此，为了库欣的开创性手术，手术室必须特地从大街上接一根电线，引入交流电。

当天，库欣用威廉·博威的发电机为一名颅骨恶性肿瘤（颅外肉瘤）患者做了手术。3天前，由于患者失血过多，他不得不中止了手术。库欣没有花大力气去理解电凝装置背后的物理原理，他说：“不了解内燃机原理的人也能学会驾驶机动车。”所以他让博威亲自到手术室去。如果库欣要调节用于止血的电流大小，博威可以摆弄旋钮，改变电压大小和脉冲频率。库欣重新打开第一次手术的伤口，继续一块一块地切除肿瘤。这一次，他用的不是手术刀和剪刀，而是电凝法。他烧灼肿瘤时产生的烟味道很难闻，旁观席上的观众都感到恶心。等待献血的医学生晕倒了，从椅子上摔了下来，但库欣很快意识到：这种方法效果十分惊人。

在下一场手术中，库欣要从一个12岁女孩的头骨上取一个类似的肿瘤，在博威的帮助下，他一次性就成功地把肿瘤完全切除了。两位患者都恢复得很好，没有出现并发症，库欣在随后的所有手术中继续使用博威的设备，这些设备甚至让他能够进行以前不敢做的手术。他在给一位同事的信中写道:“我成功地在大脑中做到了从未想过可能做到的事。”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学科的外科医生纷纷开始效仿他。

起初，偶尔还是会出点小问题。在一次颅骨手术中，一簇蓝色火焰从患者打开的额窦中喷射出来，患者作为麻醉剂吸入的可燃乙醚通过手术切口逸出，被电凝产生的火花点燃了。在那之后，库欣的手术都是直肠麻醉，而不是吸入麻醉。还有一次，库欣的手臂无意中靠在一个金属伤口牵开器上，受到了电击。这启发他使用了一段时间的木制器械和手术台，直到博威通过调整发电机的设置找到了更好的解决方案。

如今，人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来保护患者和手术团队免受电击。手术团队戴着医用橡胶手套，患者、手术台以及所有用电设备都是接地的。整个手术室是一个法拉第笼：墙壁和门里有铜线网络，以确保来自外部的电荷（如雷击或电网过载）都不能进入房间扰乱手术。此外，现代手术室与外部世界是隔绝的，也就是说，没有一根导电线可以直接接入手术室，手术室使用的电力都是通过变压器提供的，计算机网络中的数据则通过光纤电缆传输。

博威的电凝装置在近一个世纪里几乎没有改变过。它经过了改进，变得更加安全，它所使用的环境也必须符合比库欣的先驱时代更严格的要求。然而，尽管现在人们认为电凝是完全安全的，但在患者身上施加的电荷与电鳗产生的电击并无差别——都能达到几百伏。

后记

十大未来的外科医生

任何一个乐天的人，去想象未来的外科医生能做出什么古怪而奇妙的事情，实际上都是在指出当今外科医生的不足。科幻作为一种文艺题材已经存在了200多年，在这段时间里，作家们常常试图想象，在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时代，医生或外科医生能做些什么。他们的描写有些展现出惊人的洞见，而另一些则幼稚得可笑。以下是科幻艺术作品经典中的十大外科医生。

10．维克多·弗兰肯斯坦

维克多·弗兰肯斯坦是一个有着疯狂野心的终极DIY外科医生。在玛丽·雪莱1818年创作的小说中，这位疯狂的医生从尸体碎片中拼凑出一个新的生物，并用科学赋予其生命。令他大为吃惊的是，他的患者是一个有自己思想的智慧生物。维克多成了这个魔鬼意志的奴隶，这使他付出了健康、婚姻，乃至生命的代价。

在过去的50年里，外科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幸好没有像维克多·弗兰肯斯坦那样面临恶果。患者和外科医生之间的双向交流都有所增加。在20世纪，患者还像温顺的绵羊一样被带进手术室，至于他们的问题出在哪儿，医生们要做什么，通通不需要向他们做出明确解释。如果他们患的是癌症，也只是简单讲几句，而且如果有好几种可选择的治疗方案，往往是由专家来决定采取何种行动，不需要与患者商量。

幸好，现在患者们变得更愿意发声，他们自己组成互助小组，并

要求对手术结果获取更多的了解。现代患者在同意动手术前，会向外科医生提出大量问题，这么做是对的。当然，有时这对外科医生来说并不容易，但是，即使患者的意见或要求可能会偶尔对医生的自控力提出挑战，也永远不至于让医生付出健康、婚姻或生命的代价。另外，如今的外科医生也会尽可能多地解释病情和治疗方案，以保护自己。当然，这可能会吓到患者，毕竟没有人乐意看到一长串可能的风险、并发症和副作用，但这已经成为现代医患关系的一个固定特征。这种改良的交流方式也存在缺点，现代患者不再像过去那样信任他们的医生。他们更频繁地寻求第二意见，导致了“医疗购物”和医疗服务的过度消费。

9．迈尔斯·本内尔

迈尔斯·本内尔医生是个讲了真话的人，可没人把他的话当真。在杰克·芬尼1954年创作的小说《天外魔花》（*The Body Snatchers*）中，本内尔的患者一个个变成了外星蔬菜，但没有人相信他——除了他后来的精神科医生。

今天，外科医生有义务向卫生检查机构报告异常病例和其他疫情，还必须要对此进行调查，分析正常情况应该如何，以及通常做法为什么不再适用于异常情况。随后要制订行动计划，其中包含一些需要改进的要点，还要在一段特定时间后加以评估。患者如对治疗方法或医护人员的处理方式不满意，可向医院的投诉专员或部门提出投诉。现如今，无论医生或患者的投诉看上去多么奇怪，都会被认真对待。

8．布莱尔博士

在1982年约翰·卡朋特执导的电影《怪形》中，一名叫布莱尔的

外科医生在工作时被感染，变成了怪物。一个外星生命来到南极的一个科学研究站，取代研究人员的位置。每次有人被杀之后，布莱尔都要对那具畸形的尸体进行尸检，最后自己也感染了病毒（当时他没有戴口罩），然后他退出了团队，变成了怪形。

外科医生一直在用刀、针和其他锋利的工具工作，这些都可能会伤到自己。患者的体液也会溅到医生的眼睛里，或者流到小伤口里。因此，外科医生非常注意避免感染。他们接触任何东西都戴手套，他们都接种过乙肝疫苗，手术时他们还戴着外科口罩、眼镜和帽子来保护自己。尽管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疾病还是会传染给外科医生，可能是通过针头或手术刀尖在薄橡胶手套上戳的一个小孔，或者一滴液体进入了眼睛。患者必须允许被检测艾滋病毒和丙肝。如果艾滋病检查呈阳性，外科医生必须服用一个月的抗反转录病毒药物以减少感染的风险，并且只进行安全的性行为以防止进一步传染。艾滋病和其他病毒感染是外科医生的职业风险。

7．海伦娜·拉塞尔

站在20世纪70年代的角度来看，海伦娜·拉塞尔是一名并不遥远时空的未来医生。她是BBC电视剧《太空：1999》中的一个角色，该剧于1975——1977年播出。正如片名所示，该剧的背景设定在1999年。月球被撞出了绕地轨道，对于月球基地阿尔法的月球殖民者来说，未来难以预测。他们的外科医生是一位女性——在20世纪70年代，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未来主义色彩的选择。

外科并没有什么不适合女性的地方。女人和男人一样能处理好体力活、责任、工作节奏和夜班，她们拥有与男性相当的技术洞察力。从本质上讲，女性并不比男性缺乏技术头脑，有时她们在交流方面可能比男性优秀得多。女性外科医生目前仍然是少数，但随着女性外科医生的比例迅速增加，在不远的将来，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改变。然

而，真到了1999年，女性外科医生仍然相对稀少——在荷兰不超过1/8，在英国只有3%的高级外科顾问医生是女性。

6．穿白衣的男人们

在史蒂文·斯皮尔伯格1982年的电影《E.T.外星人》中，来自秘密政府组织的匿名医生们毫不留情地对可爱的外星人E.T.进行了研究。没有得到同意，他们就占领了小艾略特的家，还把客厅改造成了手术室。他们不愿意先花时间听患者、艾略特和家人的讲述，所以他们并不理解E.T.唯一的问题是他想家了，于是他们把一切搞得一团糟。

外科学的前沿一直在被推进。这常常引发一个问题：这些进展是否都是必要的？近几十年来，人们越来越多地听到这样的格言:“不仅要追求人类最高的目标，还要追求人类最渴望的目标”，或是“不仅要给生命以时光，还要给时光以生命”。做出一个是否要进行手术的正确决定，意味着要在患者的利益（包括寿命和生活质量）与手术风险之间取得良好的平衡。在这个决定上，患者和外科医生都有发言权。根据患者本人的意愿以及疾病的性质和预后，他们会得到一系列治疗方案。完全不受限制的治疗意味着尽一切努力去治愈，并挽救患者的生命。具体的治疗限度双方是可以达成共识的，例如，除了复苏之外，一切必要的治疗都应该做。选择最低限度的治疗则意味着不再采取任何挽救患者生命的措施，只去做使生命的终结尽可能舒适的事。

女性

尽管如今，外科由男性和女性共同从事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在过去的200年里，这一职业一直由男性主导，似乎女性挥舞外科手术刀很是新鲜。一直以来都有令人尊敬的女性外科医生。大约在公元1000年，（男性）外科医生阿布·卡西姆·哈拉夫·伊本·阿巴斯·扎哈拉维，也就是科尔多瓦的阿尔布卡西斯写道，膀胱结石的女性患者最好由女性

外科医生治疗。12世纪的法国文献中也出现了对女性外科医生技能的描述。早在16世纪的意大利，妇女就可经训练成为外科医生。在法国，外科医生的遗孀甚至被允许接替她亡故丈夫的工作。14世纪在萨勒诺毕业的3000多名外科医生当中，有18名是女性。同一世纪，英国王室宫廷里的外科医生也是一位女性。然而，在中世纪之后，两种显著的态度变化导致了外科行业中的女性几乎完全消失：16世纪的猎杀女巫行动以及19世纪过分保守的风气，这种风气至少盛行至1968年。在荷兰，1945——1990年，新注册外科医生中女性的比例约为3%，而在1990——2000年，这一比例升至12%。2010年，荷兰25%的外科医生和33%正接受培训的外科医生是女性。2016年，英国11.1%的高级外科顾问医生是女性。

5．3位低温冬眠中的医生

在斯坦利·库布里克1968年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3位医生在宇宙飞船“发现号”上酣睡着度过了他们的旅程。在任务开始时，他们进入低温休眠状态，本应在“发现号”到达目的地木星时被叫醒。然而，在他们毫无防备地熟睡时，飞船上的电脑“哈尔9000”劫持了飞船。“信息技术部”完全接管了3位医生的任务，并结束了他们的生命。

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泡沫时期，计算机化医疗已经起步。只要是不想被绝望甩在身后的人，都必须顺应潮流、接受这些发展，外科医生也是如此。手写的医疗记录、处方和转诊信正在成为历史。每一家现代医院都有电子病历，所有的治疗、入院、结果和并发症都以数字化登记。医务秘书的数量因此减少了，结果外科医生却发现自己要做的工作更多了。电子信件和文件听上去不错，但是没有输入就没有输出。计算机化并没能阻止外科医生和其他医学专家要应付的管理工作的激增。（不幸的是）目前还没有计算机完全替代人类医生工作的

问题。

4．莱纳德·麦考伊

由吉恩·罗登伯里创作，1966——1969年播出的《星际迷航》（第一部）中，莱纳德·麦考伊是那艘安静的飞船“企业号”上的医生。作为一个生活在23世纪的人，麦考伊相当守旧。他不想与搭档斯波克的技术和冰冷逻辑扯上任何关系。对他来说，循证外科之类的东西毫无意义，他需要的只是良好的休息、规律和清洁。他的患者躺在整洁的四人医务室里酣睡。在麦考伊的领导下，“企业号”上的术后护理没有快捷通道可言。

在我们看来，卧床休息与术后护理密不可分。20世纪60年代，谁能想到在术后如此重要的康复阶段，躺在床上反而弊大于利呢？麦考伊确实有一个智能手机大小的小设备，在患者身上来回移动它就能获得详细的诊断结果。他的治疗也是未来派的，他能让所有被外星人袭击的船员立刻康复，不留下任何残疾或伤疤。在实施了这种高科技治疗后，他的策略却没有任何未来感：还是像17世纪的大医院一样，只是让患者躺在床上，等着他们康复。

3．机器人外科医生

乔治·卢卡斯1980年的史诗电影《星球大战：帝国反击战》中，年轻的英雄卢克·天行者在正义（原力）与邪恶（黑暗力量）的战争中失去了右手。之后，一个无名机器人把一只机械手臂装进了他的身体里。与此同时，卢克意识到，用激光剑砍断自己手的恶人达斯·维德，实际上是自己的父亲。按照惯例，这样一个不完美的传奇故事总是要有一个幸福的结局，如同神仙下凡一般，机器人用仿生手替代了失去的肢体。虽然在这个“未来”里，卢克·天行者作为患者得偿所愿，但似

乎已经完全不需要外科医生了。

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外科学取得了惊人的技术进步。手术越来越复杂，切口越来越小。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快速进展中，机器人并没有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某些腹部手术可以用机器人来做，但不能预先编程，外科医生必须实时操纵它。此外，机器人手术没有提供新的选择：同样的手术没有机器人也能做。然而，其他技术，例如与导航和虚拟现实有关的技术，在改进手术中起到了更为有趣的作用。从这方面看来，像《黑客帝国》（莉莉与拉娜·沃卓斯基姐妹，1999年）和《全面回忆》（保罗·范霍文，1990年）这样的电影比《星球大战》更真实地描绘了外科手术的未来。

2．艾什医生

在雷德利·斯科特1979年的电影《异形》中，艾什是“诺斯特罗莫号”宇宙飞船上的医生。一个恐怖的外星生物从一名船员的胸腔里跳出来，出现在飞船上，艾什医生却阻挠其他船员摧毁它。船员们杀死了艾什医生，发现他不是人类，而是一个盲目遵循预先编程指令的机械机器人。操作这艘宇宙飞船的公司向机器人下达了搜寻外星生命的密令。因此，可以说艾什是一位严格遵守董事会指示的医生，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同事的性命。

医学专家们自己来决定医疗服务的质量，他们和患者一起决定要做什么和怎么做，这符合医院的利益，但医院董事会还有其他利益。他们要支付工资，购买医疗用品，管理医院大楼，当然，所有这些都不能花太多钱。尽管有时用更少的钱也能提供等量的服务，但训练不足的员工、便宜的材料和不足的设施自然会对医疗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在医院的所有专家中，外科医生可能是最依赖训练有素的员工、高质量材料和最新设备的。这也使得他们最依赖医院董事会的政策。因此，他们应该要跟进政策的制定。不幸的是，在所有医学专家中，

外科医生的时间最少。一般来说，卫生保健决策——不管是国家还是每家医院——掌握在管理者和非手术医生手中，外科医生只得旁观。

1．彼得·杜瓦尔

彼得·杜瓦尔是理查德·弗莱舍1966年电影《神奇旅程》中“海神号”潜艇上英俊的外科医生。一位来自东欧的天才科学家叛逃到西方，撞到了自己的头部，出现脑出血，只有微创手术才能清除他大脑中的血块。这部科幻电影中，“微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一艘核潜艇，包括船员在内，被用一种极先进的技术缩小到了红细胞大小，注射进他的脖子。潜艇迷失了方向，不得不走一条更刺激的路线，通过心脏和内耳到达大脑。糟糕的是，带上一位内科医生随行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随着剧情的进展，内科医生迈克尔斯博士被发现是一名间谍，正在破坏团队善意的计划，不过他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被一个白细胞吞噬掉了。外科医生彼得·杜瓦尔穿上他的硬汉潜水衣，在美丽的拉奎尔·薇芝的陪伴下，用一门激光大炮轰击血块。

只有外科医生才能写出这样的剧本！遗憾的是，直到现在，治疗血块也不是由外科医生开着微型潜艇来进行的，而要通过非外科医学专家的药物手段。当然这也是微创，只是没那么有趣。

微创治疗是近期未来外科学的核心概念。手术变得越来越小，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少，因此患者的不适和不便也减少了。此外，要做的手术也变少了，因为一些疾病可以很容易地用药物或非手术方法治疗。但外科医生永远不会完全消失，也不会被机器人或计算机技术所取代。人类总是需要一个拿着刀拯救生命、修复损伤、祛除癌症、减轻痛苦的医生。

术语表

腹部（**Abdomen**）

俗称肚子。外科学中，希腊语“laparos”一词指腹部，如剖腹手术（laparotomy）：即切开腹腔。

脓肿（**Abscess**）

脓液积聚在有压力的身体组织间。想要防止恶化就必须将成熟的脓肿切开，拉丁语中有这样一句格言——“有脓液，清理它（ubi pus，ibi evacua）”表达了这条外科学的经验法则。切开脓肿并排出脓液是一种外科手术。脓液积聚在已有的空腔中称为蓄脓。见脓液（Pus）、切开/切口（Incision）、引流（Drain）。

急性的（**Acute**）

突然的或立即的（不要与“紧急”混淆），与慢性的、持续性的、非突发的相对。超急性（hyperacute）的意思是非常突然。亚急性（subacute）的意思是迅速，但非突然。

截肢（**Amputation**）

部分或完全切除肢体。来源于拉丁语“修剪”（amputare）。

麻醉学（**Anaesthesia**）

涉及手术患者的局部、区域或全身麻醉的医学专业。麻醉医生是有资格进行麻醉的医学专家。

病史（**Anamnesis**）

字面意思是“来自记忆”。询问患者症状的性质、严重程度、发展情况和持续时间。如果医生从其他人那里得知患者的症状，就称为“由他人陈述的病史（hetero-anamnesis）”。病史是对患者进行检查的首要部分，随后是体格检查，必要时还要进行辅助检查。见症状（Symptom）。

解剖（**Anatomy**）

字面意思是“通过切割来发现”，是对生物体宏观结构的描述。偏离正常人体的解剖结构可能是由自然差异（解剖变异）或疾病及异常（病理解剖）引起的。

消毒（**Antisepsis**），消毒剂（**Antiseptic**）

用消毒剂除去皮肤、黏膜或伤口上的细菌。最早的消毒剂是葡萄酒和干邑白兰地。后来人们开始使用苯酚，但它对人体组织的危害太大。今天，人们使用含有碘或氯的化学物质。只用肥皂和水洗手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消毒，这就是外科医生经常洗手的原因。不要与无菌（asepsis/aseptic）混淆。

动脉硬化（**Arteriosclerosis**）

动脉的炎症性疾病。动脉内壁胆固醇积聚，引起炎症，碳酸钙可以沉积在产生的疤痕组织中，最终将导致动脉狭窄（stenosis），可逐渐或突然完全阻塞（occlusion）。

动脉（**Artery**）

在高压（血压）作用下从心脏运送血液的血管。在解剖书中，动脉以红色显示，因为富含氧气的血液是鲜红色的。肺动脉是个例外，因为它从心脏输送缺氧的静脉血到肺部。

人工通气（**Artificial ventilation**）

用人工方法控制患者的呼吸，包括在嘴和鼻子上戴上面罩，经嘴或鼻子插入一根呼吸管到气管（插管），或在脖子前方开口，直接插入气管（气管切开术）。通气可由手持气囊或机械呼吸机提供。最简单的通气方式是人工呼吸（口对口）。

无菌（**Asepsis，aseptic**）

不要与消毒/消毒剂（antisepsis/antiseptic）混淆。见无菌的（Sterile）。

助手/辅助人员（**Assistant**）

医疗助手是卫生专业人员，支持医生和其他卫生专业人员的工作。在手术过程中，（主刀）外科医生团队中的其他成员被称为外科

助手，可能包括外科医生和辅助医疗人员。

动脉硬化（**Atherosclerosis**）

见动脉硬化（Arteriosclerosis）。

尸检（**Autopsy**）

对尸体进行的检查。见尸检（Obduction）。

活组织检查（**Biopsy**）

切除一部分组织，目的是进一步检查，如镜检。切除活检（excisional biopsy）是指切除所有受影响的组织。切开活检（incisional biopsy）则只切除部分受影响的组织，其余的留在原位。另见切除（Excision）、切开（Incision）。

动脉阻塞（**Blocked arteries**）

见动脉硬化（Arteriosclerosis）。

放血（**Bloodletting**）

放出血液。一直使用到19世纪，用来治疗各种各样的症状，其益处完全基于迷信。见放血刀（Fleam）。

恶病质（**Cachexia**）

严重的营养不良，消瘦。

癌（**Cancer**）

体内的细胞脱离了正常的控制机制，以人体为代价，独立地增殖并播散而导致的一种恶性疾病。恶性肿瘤是具有侵袭性的，也就是说，它会主动冲破身体的屏障。皮肤、黏膜或腺体组织的癌变称为癌，血细胞的癌变称为白血病，所有其他组织的癌变称为肉瘤。

心脏外科（**Cardiosurgery**）

心脏的手术。不要与心脏病学（cardiology）混淆，心脏病学是不用手术方法治疗心脏疾病的医学分支。

外科医生（**Chirurgeon**）

见外科医生（Surgeon）。

慢性的（**Chronic**）

持续性的，非突发性的。见急性的（Acute）。

循环系统（**Circulatory system**）

在压力（血压）和心脏的驱动下，血液在血管中循环的系统。休

克是循环系统的衰竭。

割礼/包皮环切（**Circumcision**）

字面意思是“切开一圈”。完全的包皮环切是从阴茎上将包皮完全切除。参见切除（Excision）、切开（Incision）。

并发症（**Complication**）

疾病或手术不希望出现（并且是意料之外）的有害后果。不要与副作用混淆，副作用也是治疗过程中不希望出现的结果，但并不是意外的。并发症是手术或非手术治疗所固有的，因此通常不能归咎于人为错误。见发病率（Morbidity）。

保守的（**Conservative**）

不用外科手术干预，或以任何其他方式直接进入身体的治疗方法。例如药物。见观望的（Expectative）、侵入性的（Invasive）。

治愈性的（**Curative**）

治疗的目的是彻底治愈一种疾病，即使这可能会降低生活质量。与姑息疗法相对，姑息疗法的治疗目标不是完全康复。见姑息性的（Palliative）。

治愈（**Cure**）

完全恢复健康，不在身体上留下疤痕。见治疗/疗伤（Healing）。

诊断（**Diagnosis**）

辨认出患者身上的问题：疾病的本质、原因和严重程度。

脱位（**Dislocation**）

关节中的骨头错位，也称为脱臼（luxation）。骨折脱位是骨折和脱位的结合。见复位（Reposition）。

离断（**Divide**）

用外科方法切开或烧开某种结构或器官。肠管可用手术吻合器离断。血管可通过切断并结扎来离断。见结扎（Ligature）。

引流管（**Drain**）

插入身体开口，用以引流的管子或长条，如从胸腔中引流出空气（胸腔引流），或从脓肿中引流出脓液。多由橡胶或硅胶制成。导尿管是一种特殊的引流管，经尿道插入膀胱。

引流（**Drain**）

引流出液体，尤指在脓肿上做切口使脓液流出。这一手术方法被称为“切开引流”，简写为I＆D。有时会在切口处或第二个切口处（对

口切开）留下一根引流管，来引流脓肿中残留的脓液或以后可能形成的脓液。见脓肿（Abscess）。

困难（**Dys-，dis-**）

用以表示“不正常”或“困难”的前缀。Dysphagia指吞咽困难。Dyspareunia的意思是性交困难，指与性交相关的躯体问题。

外（**Ec-，ex-**）

表示“外”的前缀。例如，肿瘤切除术（tumourectomy）意思是切掉肿瘤。见切除（Excision）。

择期的（**Elective**）

非必需的，可选的。择期手术是指有合理替代选项的手术。它可以被计划，但也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延期，必要时还可以不进行。

栓塞（**Embolism**）

物质随血液流动，并且会造成循环系统损伤。比如，下肢血栓的血块可使部分肺（的血供）阻塞（肺栓塞）。骨折后，骨髓中的脂肪组织也可能引起栓塞。颈部手术时，颈动脉中的空气（空气栓塞）可能导致脑梗死。

胚胎的（**Embryological**）

与出生前机体的发展相关的。一旦胚胎发育为完全可识别的动物，就称为胎儿。

临终护理（**End-of-life care**）

对于致死性的疾病，停止一切与其对抗的治疗，尽力使患者舒适地走向生命尽头。见姑息性的（Palliative）。

灌肠（**Enema**）

从肛门冲洗肠道。尽管从古至今，灌肠在各种各样的疾病中得到了广泛而积极的应用，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它是有效的，过度灌肠还会产生副作用，可能很轻微，也可能很严重。

循证的（**Evidence-based**）

根据医学文献中发表的结果做出决策和行动。与“专家意见”——根据该领域中一位专家的看法来决策及行动——相对应。证据有不同等级的可靠程度。从总数越多的患者中得到的某一结论，其可靠性越高。证据可用于国家指南，为治疗者提供框架。

切除/切掉（**Excision**）

完全切下以去除某物。另见切开/切口（Incision）、割礼/包皮环切（Circumcision）、活组织检查（Biopsy）、切除（Resection）。

观望的（**Expectative**）

边观察边等待，（暂）不给予治疗，密切监测患者。见保守的（Conservative）、侵入性的（Invasive）。

暴露（**Exposure**）

游离（必要时剥离）某结构或不正常的组织，包括其紧邻的周边组织，以获得清晰的手术视野，看清全貌及其与周边的联系。

快通道（**Fast track**）

一种形式的术后护理，目的是尽快恢复患者的正常功能。包括吃饭、喝水、下床、走动、拔掉插管和导管。

瘘（**Fistula**）

通过一条身体组织中的隧道连接的两个小伤口，可以连接两个空腔，也可以将空腔与外部相连。例如，肛瘘将直肠里的伤口与皮肤上的伤口相连。拉丁语中指筒、管子或长笛。

放血刀（**Fleam**）

放血专用的特殊刀具，如用于在肘部褶皱处做一切口。这种特殊的刀刃被设计成不会切得过深。见放血（Bloodletting）。

波动感（**Fluctuation**）

挤压充满液体的肿块一侧，其另一侧向外突出的效应。此种情况不会出现在固体的肿块中，因此检查波动感可用于鉴别肿块的内部是液体还是固体。例如，成熟的脓肿里面是液体，而非脓肿的肿块是固体。见脓液（Pus）、切开/切口（Incision）、引流（Drain）。

骨折（**Fracture**）

骨头断掉。

坏疽（**Gangrene**）

活组织，如伤口周围的皮肤、脚趾或整个肢体死亡。坏死的肢体（或部分肢体）会干燥缩小，导致黑色干性坏死，这会被身体排斥，而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死亡的组织也可能腐烂，产生液体和脓液后进入血液。因此，湿性坏疽比干性坏疽更危险。坏疽可由动脉阻塞或伤口感染侵袭性细菌引起。有些细菌会产生气体，加剧坏疽的蔓延，这被称为气性坏疽。

痛风（**Gout**）

由于尿酸结晶积聚在关节处而引起的炎性疾病。典型的症状是大脚趾疼痛、红肿。

妇产科医生（**Gynaecologist**）

涉及产科学和女性生殖系统外科治疗的医学专家。

血尿（**Haematuria**）

尿中带血。

治疗/疗伤（**Healing**）

“治疗”（healing）和“治愈”（curing）是表示“令人好转”的两种形式，但与治愈（curing）不同的是，治疗（healing）会在身体上留下痕迹（疤痕）。见治愈（Cure）、外科医生（Surgeon）、外科学（Surgery）。

半（**Hemi-**）

表示“一半”的前缀，主要用于表示左半或右半。偏瘫（hemiparesis）的意思是身体的左半边或右半边瘫痪。半结肠切除术（hemicolectomy）是手术切除（-ectomy）一半（hemi-）的结肠（colon）。不要与前缀heama-及haemo-混淆，二者表示与血有关。

疝（**Hernia**）

正常情况下本应提供强度支撑的组织发生破裂，使其他结构通过疝而突出。脊柱某一椎间盘的破裂会导致颈部或背部的（椎间盘）疝，而腹壁破裂会导致腹壁疝。

顺势疗法（**Homeopathy**）

一种江湖医术，如放血。见放血（Bloodletting）。

特发性的（**Idiopathic**）

没有明确可识别的病因。不要与“e.c.i.，待查”（e causa ignota）混淆，拉丁语中的“原因未知”。

小肠梗阻（**Ileus**）

肠内容物通过小肠时停滞，导致呕吐和腹部胀起。机械性小肠梗阻，是由缩窄、肿瘤或肠内的阻塞（如毛球）引起的。麻痹性小肠梗阻是肠道的自然运动（蠕动）停止，导致肠道内容物停滞。不要把小肠梗阻与结肠梗阻混淆，后者阻断的是粪便在大肠中通过。

发病率（**Incidence**）

用以表示某种疾病在某特定人群中出现频率的数据，通常以每十万人每年出现的新病例数来表达。不要与患病率（prevalence）混淆。见患病率（Prevalence）。

切开/切口（**Incision**）

字面意思是“切开进入”。表示用手术刀切开的动作。切开进入腹腔也叫“section”，如“剖宫产”（caesarean section）。见切除（Excision）、割礼/包皮环切（Circumcision）、活组织检查（Biopsy）、引流（Drain）。

失禁（**Incontinence**）

不能控制粪便或尿。

指征（**Indication**）

外科学中指进行某项手术的原因。

梗死（**Infarction**）

由于为某器官供应富氧血液的动脉（或动脉分支）阻塞，引起器官全部或部分坏死。大脑的部分梗死是脑卒中。肢体或部分肢体的梗死是坏疽。见缺血（Ischaemia）。

感染（**Infection**）

见炎症（Inflammation）。

炎症（**Inflammation**）

身体组织中的一种反应，其特征是炎细胞的活化以及受累区域的疼痛、发红、肿胀、发热和功能丧失。感染是由病毒或其他活病原体，如细菌、酵母、真菌或寄生虫引起的炎症。大多数感染会引起炎症，但并非所有炎症都是由感染引起的。

间歇性跛行（**Intermittent claudication**）

腿部供血动脉缩窄，因而造成走路时小腿肌肉缺氧，引起疼痛，在休息时疼痛立即停止。见缺血（Ischaemia）。

侵入性的（**Invasive**）

通过手术、导管等直接进入体内的治疗方式，如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与药物和其他非侵入性的治疗手段相对。微创治疗（minimally invasive，侵入性最小化）的目的是尽量避免手术的缺点。见观望的（Expectative）、保守的（Conservative）。

缺血（**Ischaemia**）

由于富氧血液供应不足，导致器官或肢体的全部或部分缺氧，例如动脉狭窄。疼痛、功能丧失等症状，在器官或肢体被更多地使用时，就会出现或恶化，因为这增加了对氧气的需求。极度的缺血会导致不可逆的梗死和组织坏死。见间歇性跛行（Intermittent claudication）。

剖腹手术（**Laparotomy**）

做切口切开腹部。与腹腔镜——腹腔的微创手术相对。见切（-tomy）、腹部（Abdomen）。

学习曲线（**Learning curve**）

作为外科医生、团队或医院在特定的手术上获得更多的经验，减少并发症和患者的死亡风险（发病率和死亡率）。最终，发病率和死亡率降低直至更多的经验获取不再有效果。学习曲线就此“完成”或“获得”。一个典型的学习曲线需要一百多个患者来完成。

结扎（**Ligature**）

用线将出血的血管扎起来。结扎有着固定的程序。首先，外科医生用钳子夹住流血的伤口。当出血完全停止时，助手将一根线穿过夹子下方的组织，在上面打一个结。这个过程需要沟通。助手在完成时，会说“好了”，然后外科医生小心地松开钳子。如果这个结看上去控制住了出血，助手就会说“谢谢”，然后外科医生把钳子完全放开，交还给洗手护士。之后，洗手护士递给外科医生一把剪刀，他再剪断线的两端。

截石位（**Lithotomy position**）

仰卧位，双腿向上。能够提供会阴的清晰视野。肛门、阴道、阴囊和阴茎手术的首选体位。自路易十四以来，也是分娩的首选体位。

取石术（**Lithotomy**）

从膀胱中取出石头的手术（字面意思是切开取石）。进行这项手术的人以前被称为取石匠。

局部的（**Local**）

解剖学上不能称为“区域”的身体部位，如前额、小指、肚脐或胰腺。见区域的（Regional）。

脱臼（**Luxation**）

脱位。见脱位（Dislocation）、复位（Reposition）。

淋巴（**Lymph**）

组织液。通过血液运输的细胞间的透明液体。特殊的小淋巴管单独清除多余的淋巴液。来自小肠的淋巴液，即乳糜，还含有来自食物中的脂肪，因此呈乳白色。见淋巴结（Lymph nodes）。

淋巴结（**Lymph nodes**）

不超过半厘米的结节，淋巴管在此聚集。人体淋巴管的巨大网络上，成群的淋巴结形成淋巴站。见淋巴（Lymph）、转移（Metastasis）、根治性的（Radical）。

宏观的（**Macroscopic**）

肉眼可见的，对应于“微观的，显微镜可见的（microscopic）”，指太过微小而肉眼看不见的。

医疗差错（**Medical error**）

见并发症（Complication）。

肠系膜（**Mesentery**）

整个小肠与腹腔后部的联结，血管经此处走行进出肠道。它的形状像一个扇子，所以连接肠的那侧有6米长，但与腹壁相连的地方只有30厘米。它与腹腔后部的连接处到肠道的距离也是30厘米。当腹腔

被切开时，这个长度足以让肠子从腹腔流到手术台上。

转移（**Metastasis**）

字面意思是“移位”。当癌细胞从肿瘤中脱落，并在身体其他部位形成新的肿瘤时。转移可以是直接的，越过空腔或平面的边缘，也可以通过血管到达身体更远的部位。例如，通过门静脉到达肝脏，通过动脉到达骨或大脑，或通过淋巴管到达淋巴结。

发病率（**Morbidity**）

来自拉丁语morbus，意思是疾病。外科学中用于描述并发症的发生率。用某种手术中发生某种并发症的百分比来表示。见并发症（Complication）。

死亡率（**Mortality**）

死亡的风险，来自拉丁语mors，意思是死亡。外科手术中由于疾病或手术本身而导致的死亡，用患者死于某种疾病或手术的百分比来表示。

麻醉（**Narcosis**）

昏迷状态。见麻醉学（Anaesthesia）。

坏死（**Necrosis**）

死亡的组织。切除坏死组织的手术叫作坏死切除术（necrotectomy）。

持针器（**Needle-holder**）

用于夹紧缝针并引导其穿过组织的手术器械。

神经系统（**Nervous system**）

大脑、脊髓和神经的总称。

尸检（**Obduction**）

同autopsy。

肥胖（**Obesity**）

与同性别、同种族、同年龄、同身高的人相比，过高的体重会带来健康风险。在西方世界，如果成年人的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体重（单位为千克）/身高（单位为米）的平方——高于25，就被认为是肥胖。亚洲人的BMI肥胖下限较低。

闭塞（**Occlusion**）

肠管、血管或任何其他中空结构的阻塞。动脉阻塞可引起梗死或坏疽。见动脉硬化（Arteriosclerosis）。

手术记录（**Operative report**）

患者病历中记录手术过程的文件。每次手术都需要一个记录，详细描述整个过程，从患者在手术台上的体位到皮肤的消毒，再到最后的缝合和敷料的使用。记录还应注明患者姓名、手术医生、助手和麻醉医生的姓名，以及手术的日期、指征和性质。

骨科/骨外科（**Orthopaedics**）

其字面意思是“让孩子变直”。骨科学最初是一门主要给儿童配上支架、夹板、鞋垫和矫形鞋，来矫正骨骼畸形的学科。虽然以前的骨科并不涉及外科手术，但现在它已经成为一门专门“切割”的学科，在身体的肌肉骨骼结构上进行手术。目前骨科医生的主要工作是用假体替换关节。

治疗结果（**Outcome**）

由医生、团队或护理机构在治疗某种疾病方面取得的总结果，包括短期和长期的负面后果，如发病率和死亡率。一个常用于衡量结局的指标是5年生存率，即术后5年仍然存活的患者的百分比。

姑息性的（**Palliative**）

在不治愈病因的情况下减轻痛苦。姑息治疗的目的是延长疾病终末期患者的生命，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但没有完全治愈的希望。与治愈性治疗相对。见临终护理（End-of-life care）、治愈性的（Curative）。

病理的（**Pathological**）

偏离正常、健康的状况。病理学（pathology）的意思是“对疾病的研究”，但也用来描述实验室或医院中使用显微镜进行组织检查和尸检的部门。

一期愈合（**Per primam**）

第一种情况。一期愈合是伤口愈合的第一种方式。见伤口愈合（Wound healing）。

二期愈合（**Per secundam**）

第二种情况。二期愈合是伤口愈合的第二种方式。见伤口愈合（Wound healing）。

肛周的（**Perianal**）

肛门周围，在肛门附近或与肛门有关的。

会阴（**Perineum**）

我们出生的开口的周围区域。臀部和下腹之间的区域。包括盆底，有肛门、阴道、阴囊和阴茎。

腹膜（**Peritoneum**）

腹腔的内衬。腹膜的感染被称为腹膜炎（peritonitis）。

pH值

液体酸度的化学表达：pH＝7为中性，pH值越低酸性越强，越高则碱性越强。人体的最佳pH值为7.4。

产后的（**Post-natal**）

分娩后。产后抑郁（post-natal depression）是一种精神疾病，是抑郁症的一种形式，出现于女性分娩以后。

患病率（**Prevalence**）

某一特定时刻，人群中某一特定疾病的病例数。患病率主要以每千名患者中的病例数来表示。见发病率（Incidence）。

一期（**Primary**）

见一期愈合（Per primam）。

不伤害原则（**Primum non nocere**）

医学的基本原则，字面意思是“首先不去伤害”。至少，不要把事情弄得更糟。有时，外科医生不得不去做手术，暂时让情况变糟，为的是让病情最终得到改善。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考虑长期的利弊。因此，决定是否进行手术不能总是基于不伤害原则。根据“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原则，外科医生可以更好地开展工作。

探针（**Probe**）

用来探测伤口或瘘管深度的杆状器械。

预后（**Prognosis**）

前景。它包括：一种疾病的结局如何，结局是好是坏的概率，康复所需的时间，可预期的症状及并发症。

假体（**Prosthesis**）

用人造的东西暂时或永久地替换身体的一部分，如，义肢、假牙、人造血管、耳朵里的人工听骨、人工髋关节或肩关节。

泻药（**Purgative**）

用于引起腹泻的泻剂，如蓖麻油。

脓液（**Pus**）

由感染产生的液体，包括死亡的炎症细胞（白细胞）、细菌、组织和组织液。不同的病原体引起的脓液也不同，具有独特的气味、颜色和质地。典型的皮下脓肿（疖）含有油腻感的淡黄色脓液，略带奶酪味。肛门周围的脓肿有强烈的粪臭味。牙齿脓肿的气味最为难闻。见脓肿（Abscess）、引流（Drain）。

根治性的（**Radical**）

字面意思是“连根拔起”。外科学中常与切除连用。不仅切除器官或器官的一部分，还要切除对应的淋巴结。根治性切除也称为根除（extirpation），字面意思相同。见完全（Total）、转移（Metastasis）、淋巴结（Lymph nodes）。

区域的（**Regional**）

与身体的某一区域有关的，区域要有独立的动静脉从机体进出，运送血液。如上腹部、颈部或小腿。见局部的（Local）。

复位（**Reposition**）

用于移位骨折的外科动作，将骨折的骨头推或拉回原位。脱位的关节也可以复位。肩膀脱臼可以用希波克拉底法（一只脚放在腋窝上，拉动外展的手臂）进行复位，也可以用科克尔手法。见脱位（Dislocation）。

切除（**Resection**）

字面意思是“切掉”或“拿走”。在实际中，相当于excision。

复苏（**Resuscitate/resuscitation**）

字面意思是“复活”或“使恢复生命”。紧急情况下，使受害者或患

者存活所需要的一切行动。

危险因素（**Risk factor**）

能够造成疾病或并发症风险的情况。例如，营养不良、肥胖、糖尿病和吸烟是伤口愈合不良的4个重要危险因素。

手术刀（**Scalpel**）

手术用刀。从前是一体式的，刀刃和刀柄连在一起。现代外科中，几乎完全由可以安装一次性刀片的单独刀柄所取代。见放血刀（Fleam）。

疤痕（**Scar**）

见伤口（Wound）、伤口愈合（Wound healing）、治疗/疗伤（Healing）。

阴囊（**Scrotum**）

容有睾丸的囊。

二期（**Secondary**）

见二期愈合（Per secundam）。

休克（**Shock**）

见循环系统（Circulatory system）。

副作用（**Side effect**）

见并发症（Complication）。

体征（**Sign**）

见症状（Symptom）。

窦（**Sinus**）

向外开口的空腔。与瘘管不同，瘘管连接的是两个开口。

狭窄（**Stenosis**）

肠、血管或任何其他中空结构的狭窄。动脉狭窄会在身体运动时出现症状。见动脉硬化（Arteriosclerosis）。

不育的/无菌的（**Sterile**）

1．不能生育后代。2．完全没有任何病原体，也称为无菌的（aseptic）。不要和消毒剂（antiseptic）混淆。手术器械、手术衣和手套用伽马射线或高压蒸汽灭菌。

孔/造口/开口（**Stoma**）

主要指位于腹部皮肤上的肠道出口。还有一个更好的名字是人工肛门（anus praeternaturalis），字面意思是“超越自然的肛门”。在小肠造口称为回肠造口术或空肠造口术，大肠造口术称为结肠造口术。

脑卒中（**Stroke**）

由于出血或脑梗死而导致部分大脑功能丧失。正式的医学术语是脑血管意外（cerebrovascular accident，CVA）。见梗死（Infarction）。

皮下组织（**Subcutaneous tissue**）

也被称为subcutis或hypodermis。指皮肤下面的一层脂肪和结缔组织。女性肥胖的典型表现是皮下层厚度的增加（而男性肥胖的典型表现是腹内肠道周围的脂肪组织堆积）。浅表血管、感觉神经和淋巴管贯穿于皮下。

外科医生（**Surgeon**）

字面意思是“用手工作的人”，古英语中称为chirurgeon。有资格通过手术治疗患者的医学专家，他们处理只能够用手术治疗的疾病和障碍。外科专业被称为“切割”的学科。

外科学（**Surgery**）

“手工活”，来自希腊语手工（kheir）和工作（ergon）。它也是

治疗的艺术。历史上，外科学与医学是严格分离的，医学只处理不用手就能治疗的疾病。现代医学中，外科医生当然也是医生，且非外科医生也会用手工作。然而，治病（curing）与疗伤（healing）之间的差异使得两种方法（切割和非切割）之间仍存在差异。见治疗/疗伤（Healing）。

症状（**Symptom**）

患者注意到的身体正常功能的变化。因此，症状不能由医生来观察，只能由患者告诉他们。询问症状的性质、程度和发展是医生检查患者的第一步。这一步被称为病史（问诊）。医生在患者身上观察到的或引出的任何异常都不是症状，而是体征。对体征进行识别是第二步，称为体格或临床检查。

梅毒（**Syphilis**）

通过性传播的慢性感染。由梅毒螺旋体（Treponema pallidum）引起，会导致组织的破坏，如脸部，最终将侵犯中枢神经系统。这种消耗性疾病在19世纪普遍存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抗生素才得到有效治疗。

开胸术（**Thoracotomy**）

切开胸腔。还有一种进入胸腔的方法是胸腔镜，即胸腔微创手术。见切（-tomy）、胸（Thorax）。

血栓形成（**Thrombosis**）

血管中形成血凝块。静脉中血栓形成（venous thrombosis）导致组织液积聚，阻碍其流动。动脉血栓形成可导致坏疽或梗死。

组织（**Tissue**）

一组具有相同功能的细胞。每个组织具有特定的结构、功能和特性，通常有独立的血管提供氧气和营养。身体部位通常由不同种类的组织组成，如皮肤、皮下组织、结缔组织、肌肉组织、神经组织、腺体组织、骨骼和软骨。

切（**-tomy**）

后缀。剖腹手术（laparotomy）要剖开腹部，开胸术（thoracotomy）要切开胸部，开颅术（craniotomy）要切开头部。后缀-ectomy意为“切除”。肿瘤切除术（tumourectomy）要切除肿瘤。甲状旁腺切除术（parathyroidectomy）要切除甲状旁腺。

完全（**Total**）

外科学中，意味着包括最外侧的边缘。见根治性的（Radical）。

止血带（**Tourniquet**）

紧绑在肢体上的带子。如果它产生的压力高于血压，肢体的所有出血都将停止。如果它的压力低，血液就会被阻滞在肢体中，止血带可以用来促进血液从静脉中流出。见放血（Bloodletting）。

移植（**Transplantation**）

将组织完全从体内分离而转移。见移位（Transposition）。

移位（**Transposition**）

转移组织而不完全分离的外科方法。见移植（Transplantation）。

创伤（**Trauma**）

由外部冲撞造成的伤害或伤口（来自古希腊语）。外科学中通常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车祸、跌倒、被打、弹伤、刀或拳伤都属于创伤。创伤性的（traumatic）意为“造成伤害或伤口的”。手术用的镊子尖端很小，可以牢牢地夹住组织而不会造成瘀伤或挤压，因此被称为“无创伤镊”。创伤学是研究创伤引起伤害的外科学分支。

三联征（**Triad**）

3种症状或体征的固定组合，可以预测某种诊断。例如，一个糟糕外科医生的三联征，一是把并发症归咎于环境，而不是他自己（缺乏）的才华，二是认为自己的经验优先于科学证据，三是不尊重他的手术团队。

肿瘤（**Tumour**）

字面意思是增长或肿块。理论上可以指任何肿块，但现在实际上只用于异常的组织生长。可以是良性的（非恶性的）或恶性的（癌性的）。肿瘤切除术（tumourectomy）即切除肿瘤。见癌

（Cancer）、切除（Resection）、切除（Excision）、完全（Total）、根治性的（Radical）。

导尿管（**Urinary catheter**）

见引流（Drain）。

泌尿外科医生（**Urologist**）

专门从事肾脏、泌尿道、膀胱和男性生殖器外科手术的医学专家。

静脉（**Vein**）

输送血液到心脏的血管。形容词形式是venous（静脉的）。在解剖书中，静脉用蓝色表示。缺氧的血液是暗红色的，透过静脉的薄壁看上去呈蓝色。静脉中有静脉瓣，阻止血液向下回流。肺静脉是一种特殊的血管，它也将血液输送到心脏，但因其中的血液来自肺部，所以富含氧气。门静脉将血液从肠道输送到肝脏，而不是心脏。

白细胞（**White blood cell**）

又称leucocytes，活跃于血液内及血管外的不同细胞的统称，它们可以移动到身体的任何组织中。

伤口（**Wound**）

身体屏障的裂缝。皮肤上的开口通常被称为伤口，黏膜上的开口称为溃疡。伤口有边缘和创面。伤口的愈合取决于伤口中细菌的存在、坏死组织的数量、伤口边缘和创面的血液供应以及患者的营养状况。愈合后伤口会留下疤痕，因为连接伤口需要额外的结缔组织。

伤口愈合（Wound healing）

伤口的恢复过程，会留下疤痕。伤口的一期愈合是指结缔组织连接伤口。只有当伤口干净、伤口边缘对合良好达数天、创面和边缘有足够血液供应时，才会出现此种愈合。伤口的二期愈合是伤口最初呈开放状态，并将逐渐被新的组织——肉芽组织填满。皮肤或黏膜会在新组织上生长闭合。见伤口（Wound）。

X射线图像增强器（X-ray image intensifier）

透视。用X射线成像在监视器上实时显示骨折情况的方法。X光机可以在手术中使用。手术室里的人必须穿上铅衣，以保护自己免受辐射。

(1) 英文名为*Falling in Love Again*（*Can't Help It*）。



未读 Club

为读者提供有温度、有质量、有趣味的
泛阅读服务



专属社群 独家福利
精品共读 活动特权

手机扫码
加入未读 Club 会员计划

A DR

WHAT WE
DID IN B

目录

版权信息
引言
第一章　裸床
　　躺下的冲动
　　和祖先同床
　　睡在地上
　　睡在高处
　　欧洲的风尚
第二章　穿越时间的睡眠
　　“嘀嗒嘀嗒”
　　工业化睡眠
第三章　“大爆炸”
　　仰睡
　　神圣与亵渎
第四章　去叫接生婆
　　公元前的一次分娩
　　魔法与医学
　　帐篷和分娩椅
　　在床上分娩
　　产床与疾病
　　现代的分娩
第五章　死亡与来世
　　仪式和灵魂
　　奢华的临终之床
　　围在床边
　　临终遗言
　　每个人的临终之床
第六章　陌生的床伴
　　旅途中的床伴
　　家庭安排
　　枕边话
　　陪婴儿睡
　　臭虫和其他床上动物
　　“消失”的床伴
第七章　移动的床

旅行床
流动的行军床
“野蛮”的假日
移动的家具
睡觉用的“网”
铁路床和公路床
第八章　君主之床
国王的床
庄严的床
起床仪式与就寝仪式
床上会议室
第九章　私人避难所
寻求隐私
分割住宅
独立的卧室
分开的床
关于卧室的建议
床的养护
第十章　未来之床
回到未来
改变空间
呼呼大睡
未来的床与梦
参考书目
致谢
返回总目录

版权信息

床的人类史：从卧室窥见人类变迁

What We Did in Bed: A Horizontal History

作者：[英] 布莱恩·费根（Brian Fagan）[英] 纳迪亚·杜兰尼（Nadia Durrani）

译者：吴亚敏

出品方：未读·思想家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9 Nadia Durrani and Brian Fagan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Yale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20 by United Sky (Beijing) New MediaCo.,Ltd. (It's an adapted edition.)
All Rights Resreved

献给马特



《我的床》，翠西·艾敏，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1999年展出

引言

喜剧演员格劳乔·马克斯曾开玩笑说："任何不能在床上做的事，根本不值得去做。"也许他说的没错，因为几乎人类做过的一切事，确实都曾发生在床上。对古埃及人而言，床是连接今生与来世的重要纽带；在莎士比亚时代，床是欢愉的社交场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温斯顿·丘吉尔曾在床上治理国政。

然而，在今天，这张"床"已经被人们推进了阴暗的角落。睡眠理疗师告诉我们，床应该且只能用来睡觉或者亲热。也许，正是由于如今床所具备的这种"私密"属性，多数现代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往往都忽略了它的真实作用。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人专门作文或著书来探索床的历史，探讨床在我们人类的生活中扮演的不同角色。无论如何，我们人类一生中仍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它有各种令人回味的故事值得我们讲述。我们的祖先在床上所做的事涵盖了从受孕到死亡的一切。考虑到写这样一本书会出现的无限可能性，我们决定以"床"为线索，扩展出一系列主题，摘选发生在床上的动人故事，讲述成一段全新的、横向的历史。

性、生、死、食、治、谋、恐、梦—卧室这座剧场为艺术家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在中世纪的欧洲，有一种艺术主题曾反复出现：三位智者赤身卧躺在同一张床上，接受上天的祝福。18世纪，许多文雅的男性艺术家更喜欢将创作焦点转向那些疲倦地躺在凌乱床单中的赤裸女性，她们或许正无助地面对狂暴的敌人或野兽的侵袭，就像亨利·富塞利的《梦魇》（1781年）中的少女。1787年，法国艺术家雅克-路易·大卫描绘了苏格拉底临终之际的场景，画中那位70岁的哲学家肌肉饱满、生气勃勃—他是法国大革命前夕坚定地反抗不公正权威的典型化身。再后来，还有关于无人空床的图像，比如为我们所熟知的梵高的《在阿尔的艺术家卧室》（1888年）中那张覆盖着猩红色被子的木床，以及罗伯特·劳森伯格的《床》（1955年）—他在自己的被子上涂上了指甲油、牙膏和颜料。更近一些的作品是装置艺术家盐田千春创作的以床为主题的复杂而近乎超凡脱俗的《在沉睡间》（2002年）。作品中，身着白色睡衣的女人们在医院的病床上沉睡着，女性疾病的象征、虚弱的表现和神话的理念在这里被糅合在一起。

在与床有关的作品中，最著名的或许是英国艺术家翠西·艾敏的《我的床》（1998年）。借助某个瞬间的灵感，艾敏将她自己与男伴

分手后的床铺真实地展示出来。这张凌乱的床上随意地扔着沾染经血的内衣、空酒瓶、烟头和用过的安全套。《我的床》招致了各种非议，不仅因为人们质疑它能否算作真正的“艺术品”，还因为在当今时代，“床”被视作极度私密的地方，不应该在文明社会中讨论，更不应该暴露出来。但这种观点也是最近才出现的。历史学家卡罗尔·沙玛斯曾戏谑地把近代早期形容为“床的时代”，那时的床一般都被陈列在主要的房间中，以便所有人都能看到，因为它可能是这家人最值钱、最值得炫耀的家当。但是，我们对床的痴迷，还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

我们不知道人类祖先最早使用的床是什么样的。他们生活在四处游荡着饥肠辘辘的捕食者的非洲腹地，起先睡在树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学会躲进足以遮风挡雨的岩石下面或是可以当作开放式营地的洞穴里，在明亮的火堆前缩紧身体，相互依偎而眠。可我们的祖先如何在夜里保护自己免受野兽伤害呢？他们学会了用火。火不仅提供了温暖和熟食，还保护了他们休息的场所，让他们能在夜里安心聚集，酣睡无忧。在大型猛兽夜夜捕食的原始世界中，火给予了他们光明和安慰。我们可以想象，一支狩猎队围坐在燃烧的火堆边，火焰在黑暗中舞动。有时候，野兽的眼睛会在幽暗中闪烁，它们伺机而动，追寻着猎物，或是捡食人类丢弃在远离火堆处的残羹剩饭。当夜幕降临，人类的生活范围就仅限于火堆旁和作为庇护所的岩石下了。

已知最古老的“床”是从南非的一个洞穴中发掘出来的。7.7万年前，一批现代人（morden humans）在洞穴的地面上挖出了这些床。碰巧，在古日耳曼语词根中，“床（bed）”的意思正是“从土地中挖掘出的休息之地”。这个定义简直再贴切不过了，不仅因为它形象地描述出最早的床是被挖出来的，还因为它点明了床的性质—一个一直用来休息的地方，尽管它的实际用途要广泛得多。

在温暖舒适的现代房屋里，我们早已忘记人类的祖先在自然环境中是多么脆弱，但对于人们睡觉的方式和场所而言，感到温暖、得到保护总是至关重要的。在0摄氏度以下的气候中，比如冰河时代晚期或是200年前加拿大的北极圈内地带，人们会在气温骤降、白昼缩短的日子里把自己裹进厚厚的皮毛，在床上缩成一团。4000多年前的冬天，在加拿大巴芬岛的冰屋里睡觉的人们必须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熬过几个月的漫长极夜。他们挤在一起，蜷缩在又厚又暖和的麝牛皮下面，食物和燃料就放在他们伸手可得的地方。

直到今天，世界上仍然有数以百万计的人睡觉时裹着毯子和毛皮，或干脆和衣睡在土地、水泥地或是木地板上。但随着五千年前人类文明的兴起，床的高度，尤其是精英阶层的床的高度逐渐上升。在

古埃及，干燥的气候使当时的床榻得以留存。在大约公元前14世纪中叶的图坦卡蒙时代，床的基本设计（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已经比较完善了，尽管放置枕头的那一端稍高一些，并且还配有防止熟睡者从床上滑落的护板。这种睡觉平台的式样似乎比较单一，但随着我们深入挖掘，会发现更多的款式：箱床、吊床、低矮的水床和高出地面16英尺[1]的床。尽管如此，在过去的五千年里，床那矩形的基本设计却几乎没什么变化，就连床垫也都差不多。鲜草、干草还有麦秸秆，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塞进麻袋或布袋里当作床垫的基本材料。比较富裕的人睡着多层床垫，避免臭虫叮咬，也能减轻填料刮擦引起的瘙痒感。助眠技术的伟大发展是21世纪的产物，说到底无非是为了对抗失眠症而衍生出的骗局和拙劣的医术。

有大量的研究围绕睡眠及其发展史展开，特别是一种被称为“分段式睡眠”的方法，似乎早在电灯把夜晚变成白天之前就已被广泛应用。比方说，人们先睡大约4个小时，然后醒过来，花点儿时间亲热，分析一下刚才做的梦、祈祷、做家务、见朋友，或者干些不正经的勾当，之后再躺回床上接着睡上4个小时。在17世纪的伦敦，凌晨3点的街头还回荡着商贩的叫卖声，这说明当时一定会有心甘情愿光顾的客人。想想看，或许正是我们现代人想要否认这种“自然”的睡眠节奏，才导致我们如今要依赖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安眠药才能安然入睡。那么，我们能不能简单地通过了解过往的生活来解决眼前的失眠问题呢？

除了睡觉以外，在床上还有很多事情可做。即使是在不同的文化习俗中，床也总是进行性活动的平台，但和什么人睡、什么时候睡、怎么睡，就因社会环境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尽管英国王子们可能会感到畏缩，但王室成员的房事往往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埃及法老和中国皇帝的性活动都有官员专门进行记录。皇宫之外的性活动更加自由一些，但是对任何离经叛道的行为都戴着有色眼镜的教会，自然会对其加以谴责。

我们往往也会忽略在鲜有文字记载的时代谈话是多么重要，因为那时每件事都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代代流传的。黑暗的冬夜是长辈和萨满巫师讲述故事、吟诵圣歌、祈求超自然奥秘的时间。他们讲的故事可能耳熟能详，一遍遍地被人们复述，但也解释了宇宙的诞生、人类的起源，还有人与玄妙未知和自然界的强大力量之间的联系。我们花在床上的时间是一种黏着剂，把人类紧紧粘在一起，让我们懂得爱，懂得学习。一个人睡觉和消磨时间的地方，就是他生活的中心。

在人类的绝大部分历史中，我们所谓的隐私是不存在的。很多人会与别人同床共枕，因为这样可以为彼此提供安全保障。孩子、父母

甚至整个家庭或血缘群体，都会彼此倚靠着睡在一起。有关床的社会规范十分灵活，并且不断演变，今夜同床而眠的伙伴有可能在明晚就换成了另一个人。19世纪，在欧洲和美国，无论是在陆上旅行还是在海上旅行的途中与陌生人同床共枕仍屡见不鲜，而直到今天，这种情况在某些国家仍非常普遍。旅店为旅客提供单独的床位，或是按住宿者的人头收费。这种安排床位的方式不大容易让人安然入睡。16世纪的英国诗人安德鲁·巴克利就曾对此抱怨说："有些人翻来覆去，有些人喋喋不休，还有些人喝得醉醺醺的，带着满身酒气爬上床铺。"卧室作为一种独立的房间，曾是王室和贵族的身份象征，但即使在那时，卧室也经常发挥公共舞台的作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床上治理国政。最近二百年，我们这些老百姓才用墙把卧室隔出来，让它变成完全私密的空间。然而，这种隐私也将由能使人与网络无缝连接的、未来主义的"互联床"打破。直到工业革命时代，甚至还要再晚些，床都是兼具实用意义与象征意义的场所，可以说，它是我们生活舞台的支柱。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舞台啊！人的一生往往都始于床，又终于床。王室成员的出生和死亡总是伴随着很高的风险，特别是在继承权存疑的情况下，因此这些人的预期寿命往往都不长，甚至会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暴毙。古代中国和印度的皇帝都在戒备森严的状态下入睡，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和埃及法老也是如此。这些地位显赫的人物的生死，都要有目击者在场为其见证。英国王室成员分娩时，内政大臣必须在场，直到1948年查尔斯王子出生这个规定才被废止。1688年，多达42位各界名流聚集在圣詹姆斯宫，见证詹姆斯二世的儿子诞生。剑桥的一位历史学家将这个事件称为历史上第一场围绕王室成员降生的"媒体马戏团"表演。

临终之床也往往有着重大的象征意义，比如葬礼上使用的长榻。人们在哈萨克斯坦的贝雷尔发掘出一座公元前200年的蒙古式墓葬，墓室中一张高高的、精致的木床上安放着两具塞西亚贵族的尸体。在墓室之外，11匹陪葬的战马躺卧在用桦树皮做的"床"上，马鞍和马具完好无损。这种墓葬的意象，与古代游牧民族的信仰密切相关：他们崇拜天穹之上那些骑着战马的神明，它们象征着仰赖于强壮善跑的马匹以生存与领导的世界。在来世，如果这些贵族没有了他们的战马，就意味着失去了所有的权力。直到维多利亚时代，亲友环绕在临终之床周围的告别依然是一种隆重的仪式，尽管现在的人已经不赞成在卧室中进行社交活动了。男女分手时的分居往往是激烈、狂热的，尤其对现代城市的中产阶级而言更是如此。对他们来说，自己的卧室成了私人的避难所，这种观念已经席卷了西方社会。几个世纪以来，床的基本制作技术也首次发生了变化，床开始变得更精致、更复杂。1826

年，人们开始使用金属螺旋弹簧取代传统的皮带或绳索。工业革命带来的以机器纺织的棉质床上用品填补了维多利亚时代那些制作精良的衣柜里的大部分空间。在那个环境普遍潮湿、充斥着对随之而来的结核病的恐惧的时代，人们需要小心翼翼地让这些被褥保持干爽。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主妇曾抱怨说，仆人们从来没有把床整理好：他们的第一个想法永远是把整张床罩上，搞得“又闷又不透气，让人难受”。现代实验表明，当时的仆人至少要花半个小时才能把一张床整理好。直到20世纪70年代，床上用品领域才发生了迄今为止最伟大的革命：羽绒被问世了，这使人们不再需要无休止地换洗毛毯、上下层床单以及其他床上用品。

今天，顶尖水准的床是一面反映我们日益提高的工艺技术以及习惯多任务处理的后工业社会的镜子。它配备了USB端口和其他设备，以便床上的人时刻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与此同时，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和居高不下的房价正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人居住在托管公寓、狭小的单室公寓和拥挤不堪的高层建筑中。床，要么被折叠到墙上，要么就重新出现在家中的公共空间里。

现在，这本书揭开了盖在床上的被子—人类科技中最基本的部分。它揭示了作为最容易被忽视的人类造物之一，床的那段让人感到陌生的、时而滑稽的，却总是非常引人入胜的历史。从淘气的床伴在中世纪房屋的大厅里的嬉戏到国家元首的睡眠习惯，我们调查了发生在那块小小的探索之地上的复杂变化，以及人们在那里做过的一切。

第一章

裸床

“在几乎所有的社会历史和传记中，缺少了三分之一的故事。”20世纪60年代，建筑画家、家具专家劳伦斯·赖特如此写道。当时的他在反思，人们在对过去的认知中存在着一个床形的缺口。（1）这个问题在大多数的考古学研究中同样无法避免，但对于我们这些考古学家来说，如果有人继续挖掘、寻找，“床”这种人造物依然是展开这段“横向历史”最合乎逻辑的起点。

躺下的冲动

确定人类第一次使用床的时间节点，取决于我们对床如何定义。我们的远古祖先可能睡在比地面高很多的地方，就像我们那些尚存的灵长类亲戚一样，也有可能睡在成捆的树枝或草堆上。他们不得不这样睡：我们人类的东非家园中四处游荡着危险的野兽，它们无时无刻不考虑着如何拿我们饱餐一顿。在没有能提供保护的火和足以防身的狩猎武器的几百万年里，我们的祖先就依靠着睡在半空中来繁衍生息。因为在睡觉以及哺育后代的时候最容易受到伤害，所以他们在具有良好柔韧性的树枝上寻找休息的地方，可能还用草或树叶修筑了“巢穴”，当然，这些修建在树上的“床”早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了。

与我们关系最亲近的“亲戚”黑猩猩，让我们深刻理解了如何才能徒手做出一张床。在乌干达西部的托罗-塞姆利基（Toro-Semliki）保护区，黑猩猩会用乌干达铁木（一种枝干粗大且间距宽阔的树）的树枝做床。它们把嫩枝条编织在一起，做成结实耐用的床。（2）其他地区的黑猩猩也会仔细地选择它们的筑窝材料，而且每天都要做一张新床。这代表它们的床是一次性的，特别干净，床上的排泄物和细菌数量比现在人类床上的少得多。（3）可以肯定，我们人类遥远的祖先也是这样做的。在高于地面的地方，他们也一定筑了用于睡觉、在白天炎热的时候休息以及繁殖的“窝”。我想现在已经没有谁能受得了在树上的窝里睡觉了。

大约20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驯服了火—尽管这个时间仍有争议。火提供了温暖，让人类可以煮熟食物，最重要的是，能保护人们

不受野兽的袭击。自从有了火，我们的祖先就开始睡在地面上，睡在露天营地里的、垂悬的岩石下的，或洞穴中的火堆周围。火让人们更乐于分享食物，它诱人的温暖使人们紧紧地挤在一起，帮助人们在小团体中建立密切的关系。家庭基础和家庭关系变得更加重要，而男女之间的关系也一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火堆旁边，身体夜复一夜地亲密接触，有助于将性关系从偶然的邂逅转变为与分享睡眠场所的同一伴侣进行的习惯性行为。配对结合可能是在人类进化历程中较晚出现的特征，而思考诸如“火”与“床”之类的人类技术在这一特征出现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有趣的体验。这张“床”，也许只是一堆草、一张兽皮，却能成为人类生活的中心，不仅是睡觉的地方，还是人们共同生活或是梳妆打扮的重要地点。

对我们人类最早期行为的描述，大多只是有根据的猜测。只有当考古学家确实发现了最古老的床时，我们才能获得一些具体的证据，以证明我们过去常常做些什么。这些床来自南非乌通加提河（Uthongathi River）畔悬崖上的斯布度（Sibudu）石洞，就在德班以北40千米处，距印度洋15千米。（4）在77000年前到38000年前之间的这段时期，不仅在身体结构上，毫无疑问，在智力上也与我们相差无几的现代人和智人（homo sapiens）至少造访过这里15次，并在此睡觉休息。如今在河边依然生得茂密的杂草、莎草和灯芯草，对我们讲述着关于定期造访这里的小心翼翼的睡眠者的故事。绝大多数在能够遮风挡雨的洞穴里或是充当庇护所的岩石下睡觉的人很难让自己的睡眠场所保持干净，不受昆虫滋扰，但斯布度人却可以，他们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们用一种叫作“加密卡亚木”（Cryptocraya woodii）的月桂树的叶子保护自己，这种带有香气的树叶含有几种化学成分，能够驱赶、杀死蚊子和其他害虫。在这里睡觉的人也会定期焚烧寝具以清除昆虫和垃圾，然后再铺上新鲜的杂草与灯芯草，制成新的床。他们似乎偏爱特大号的床，大多数的床上用品至少覆盖着3平方米的土地。这可不仅仅是睡觉的地方。人们会准备好食物，懒洋洋地躺在草床上时再把它们吃下去—人们似乎喜欢把各种活动放到一起进行。

50000年前，我们现代人类的“表亲”尼安德特人，在西班牙北部桑坦德西南部的埃斯奎卢（Esquilleu）洞穴里也是睡在草堆上。又过了23000年，我们的直系祖先智人占领了一个用于狩猎和捕鱼的营地，就在今天的加利利海边，即著名的奥哈罗（Ohalo）II遗址。（5）由于水位下降，原本被水淹没的营地暴露出来，一座椭圆形小屋重现于世。小屋的地面用湖边柔软而纤细的草茎精心铺设。采集者用锋利的石器切割草茎，把它们紧实地铺在地上，再铺上一层致密的黏土对其进行保护，从而制成一张简单而轻薄的垫子。柔软的草层是睡觉的好地方。睡觉的人像铺瓷砖那样，把一束束的草排列到墙边，只

在中间留出一片空地安置取暖的火堆。奥哈罗人的床上用品相当精致。小屋中央的火堆周围和小屋入口处也铺有几层简单的草垫，用来准备食物和制造工具。虽然这里不是史前版本的会提供早餐的旅店，但也是能让人们非常重视夜间的安稳舒适的地方。在这里，睡觉的区域也是被单独隔离开的，就像现代的猎人营地一样。

几千年来，人们在睡觉时一直紧挨在一起，靠火源取暖，在越来越恶劣的严寒气候中把自己藏在层层兽皮下御寒。取暖和获得保护是人们睡觉时的原始需求，当时并没有什么隐私的概念：性交、怀孕、生子、哺乳、生病、死亡，一切都发生在自己亲人的眼皮底下。只有少数几处遗迹能让我们意识到这种事实的存在，比如海因兹洞穴（Hinds Cave），它位于得克萨斯州东部佩科斯河（Pecos River）支流的河谷中。（6）早在公元前7000年，就有人类初次踏足这座洞穴。这座3米深的干燥洞穴是考古学的宝库，从植物到垫子、从篮子到床具，这里保存着当时的人在生活中会用到的一切。考察洞穴的小组由10～15个人组成，他们以与数千年前的人们相同的方式使用了这里。在洞穴的深处以及洞壁的某个凹陷处，仍保留着铺着草皮的“睡坑”和火炉的遗迹。两个睡眠区之间还有个很大的粪坑。造访这里的原始人挖出一些浅坑，在里面铺上叶子茂密的小树枝，做出简单的床，之后他们会在上面铺上一层填充良好的编制草席碎片，或者是废弃的凉鞋，再铺上柔软的草和睡垫。他们一定要把这些长约0.9米、宽仅0.6米的简陋浅坑布置成温暖舒适的卧室。它们是专门用来睡觉的地方，不做其他用途。这些“床”的主人一定都是蜷着身体睡在里面的，这样做或许是为了维持体温。

和祖先同床

让我们把画面快进到公元前3200年，来到苏格兰奥克尼群岛（Orkney Islands）的奥斯凯尔湾南岸，这里常年气候恶劣、风雨交加。1850年，一场暴风雨带来了罕见的涨潮和狂风，刮走了一座名叫斯凯拉布拉（Skerrabra，现在写作“Skara Brae”）的山丘上的草皮，就此揭开了远古石质建筑的真容。这块地的所有者威廉·瓦特在这里挖出了4座住宅之后就没再继续下去，直到1925年，又一场暴风雨摧毁了其中几座住宅，当地人开始建造防波堤来保护这些建筑，却在施工过程中发现了更多的房屋。1928—1930年，当时最杰出的考古学家之一，爱丁堡大学的维尔·戈登·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才把这些建筑从它们的沙质茧壳中拽了出来。

尽管不知疲倦的柴尔德在古代欧洲社会方面有着丰富过人的知识，却从没见过其他任何一处像斯卡拉布雷（Skara Brae）这样的地

方。(7)他发现了8座保存完好的民居，彼此间由低矮的、有遮蔽的走廊连接。住宅的墙壁仍然屹立不倒，走廊顶部同样完好如初。最重要的是，每座住宅内部的石质设施也都保存了下来。每座房子都具备一个大大的方形房间，中央放置一个火炉，两边各有两张床，与门相对的墙边还有带架子的梳妆台。多亏了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法，我们才能得知，斯卡拉布雷在公元前3200—前2200年这10个世纪中，有6个世纪都是有人居住的。这里是一处石器时代农民的聚居地。英国的“床”的历史，第一次触及如此遥远的年代。

这些石质建筑反映了奥克尼社会的深刻变化。直到大约300年前，奥克尼人（Orcadians）一直住在内部被划分成许多小隔间的木质结构房屋中。耐人寻味的是，这种室内设计与他们坟墓的设计如出一辙。很难解释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在他们努力耕耘着的世界，他们或许仍想与故去的先辈保持清晰的联系。这些都是近亲的定居点，很可能是围绕着小型亲属群体组织起来的，土地的所有权对住在这里的人来说肯定至关重要，而祖辈的权力在他们的生活中发挥着基本的作用。

然而，当他们开始建造石质建筑，生与死的平衡似乎也发生了意义非凡的改变。与木质结构房屋不同，斯卡拉布雷的石质房屋和同时代其他定居点的一样，结实稳固，经久耐用。人们住在祖传下来的坚固耐用的老房子里，有时还会将其扩建，再把自己的祖先都迁葬在附近。这里的农民，或许几代人都被捆绑在自己的农地和牧场上。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石工建筑，都要求有许多人习惯性地在一起工作和生活。

在斯卡拉布雷的8号小屋里，正对着门的地方有个带架子的石质梳妆台。房屋中央是火堆，两个石质“箱床”从墙壁上凸出来，从两侧将其围住。在这里所有的房屋中，放在右边的床都比左边的床大，所以许多人推测大床是给男人睡的，小床是给女人睡的，但还有其他可能的分配方式，比如与年龄有关：在另一栋房子里，一张靠近门的床被检测出磷含量较高，这说明可能有尿床的婴儿或幼儿睡在这里，但这也只是一种猜测罢了。



位于苏格兰奥克尼群岛的斯卡拉布雷的史前住宅，其中左右两侧都有被围起来的疑似“床”的石质设施

大床总是放在右边，而左边的床总是比较小。但是，与斯布度和奥哈罗遗址中的睡眠空间不同的是，斯卡拉布雷的床都很小，能提供的活动范围显然更有限。屋里的空间仅能容纳一个成年人和一个孩子，尤其当床上铺满兽皮时就更显拥挤。虽然人可能觉得空间局促，难以入睡，但在这种寒冷多风的气候中还是保暖更要紧。在漫长而黑暗的冬天，每个人都会花很多时间把自己裹在毯子和毛皮里，在炉火边或躺或坐。人们会聚在被炉火照亮的中心区域讲故事、聊天、互开玩笑、看护病人、用餐。也许，考虑到床的狭窄和与如今全然不同的隐私观念，他们还会交媾。夜里，他们可能会缩回自己舒适的“箱床”里独处。有些“箱床”周围的墙上有一些凹洞，这表明“箱床”周围应该挂有遮挡物，可能是为了保暖，也可能是为了阻隔苏格兰群岛夏季的阳光。

但是，在附近的7号小屋里，情况又有所不同。这所房子与它的邻居完全隔离，只能通过旁边的一条过道进入。两具女性遗体在小屋里被发现，她们躺在右手边床下靠墙的石头坟墓里。她们共享一具石棺，上面的装饰早在石屋建成之前就已雕刻完成。也许当地人的葬礼属于某种奠基仪式的一部分—7号小屋的门只能从外面锁上，大概是为了把死者留在里面。考古学家一直对7号小屋的意义感到困惑。这间被隔离的屋子是不是死者下葬前停尸的地方？是不是一间产房，把分娩仪式与日常生活分隔开来？还是说，这些丧葬仪式再次反映出人们对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生命延续性的关注？在农业社会，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一种无尽的循环，关乎人类的生存。这可能也具有一种象征意义，暗示着人们的出生、成长、成年、死亡。这不

可忽视地提醒着他们，在他们祖先的时代，生命就是这样的，而对未出世的孩子来说，生命仍将如此循环，不会改变。

然而，曾酣睡于此的人早已逝去，曾为他们提供温暖、舒适的皮革、纺织品和草垫也已成为转瞬即逝的过去。我们怎么能断定眼前看到的这些东西就一定是床呢？即使在保存完好的斯卡拉布雷遗址，柴尔德也只能根据他的所知来做出猜测，而最新的考古发现告诉我们，他几乎完全正确。巴恩豪斯（Barnhouse）是一座与斯卡拉布雷遗址同时代的村庄，坐落于奥克尼主岛上“斯坦尼斯立石”（Stones of Stenness）以北，由约15栋独立建筑组成。村庄遗址中同样保存着石质家具，包括更多的“箱床”，其中一座房屋中甚至存有6个可用作“床”的浅坑。（8）

奥克尼人的家具能幸存至今，就因为它们是用石头做的。如果是用木桩支撑的木床，命运又会如何？在大多数情况下，当然会消失。然而，只有在极为偶然的情况下，再加上考古专家娴熟的挖掘技巧，才能使褪了色的木床的桩洞形状从浅色土壤中显露出来。床，或者至少是支撑它们的木桩，才能奇迹般地出现在我们眼前。在英国的另一端，著名的巨石阵东北方向3千米处，杜灵顿垣墙（Durrington Walls）矗立在白垩土上。考古学家迈克·帕克·皮尔森（Mike Parker Pearson）和他的同事们都是解释土壤细微变色原理的行家。（9）他们依靠刷子和小铲子，成功辨别出小屋墙壁上的木桩孔，还有因水平放置木板或原木而留在白垩土中的浅沟槽。这些都属于横梁槽，它们为保持“箱床”和储物箱的稳固而设计。皮尔森立刻联想到了斯卡拉布雷的床，只不过这里的“箱床”都是木质的。还有更多这样的例子。在一条从杜灵顿垣墙通往附近河流的大道旁，有一栋很大的方形房子，入口朝南，抹着石膏地板。靠西墙的是一张“箱床”的床基，对面的墙边是另一张床。在另外3间房子中同样陈设着围绕房间正中的火炉而建的“箱床”。杜灵顿垣墙下的“床”，如今成了埋在白垩土中的缥缈幽灵。

在杜灵顿垣墙和奥克尼人的村庄，床都是人们睡觉的场所，也起到了保暖的作用，但从奥克尼的发现来看，即使是这些简单的睡觉场所，也都作为连续性的象征而充满了深刻的意义。在地中海中部的戈佐岛和马耳他岛上发现的同时代的床，也同样饱含着深远的象征意义。此外，在这些床的设计中还包含一个关键性的创新—床腿。

和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初期一样，在公元前3500年至前2500年，戈佐岛和马耳他岛上的小规模农耕社会已经拥有了以墓地和神庙为中心的成熟的建造传统。人们生活在小型的农业群体中，由散布在两个岛屿上的公共墓地和祭祀场所维系起来。这些群体都是相

对孤立的，只有驾驶简陋的船只通过危险的航路才能抵达。这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似乎催生出一种以宗教场所为中心的极其宏大的宇宙视野。

在戈佐岛和马耳他岛上，古代神庙的建筑设计都非常复杂。其狭窄的入口通往前院，信徒可以在此观看祭祀仪式。精心设计的建筑把人的目光从入口处的走廊引向祭坛以及展示模型、雕塑等祭祀用品的地方。神庙内部由椭圆形的房间和走廊组成，但似乎很少有人进入被栅栏围住的内部区域。隐藏在隔间中的设计与其艺术表现背后的仪式性隐喻令我们难以理解。地下埋葬场所，或者称其为地下墓室，集中反映了神庙的艺术形式，它们的构造就像迷宫一样，并且严格限制出入。正是在这些使不同群体的人聚集在一起为死者举行下葬仪式的地方，我们出乎意料地找到了与床有关的证据。

地下墓穴的丰富壁绘描绘了男性和女性在长榻与床上或坐或躺的场景。（10）有7张这样的床被表现为雕塑形式，其中一半表现的是葬礼的场景，仿佛把死亡视作长眠。这些人都穿着长裙，这或许是一种地位的象征。在马耳他的哈尔·萨夫列尼（Hal Saflieni）的地下墓穴，一个以熟睡中的妇人为原型的雕塑被发现了。她侧躺着，双腿伸直，头靠在一条胳膊上，似乎睡得正香。考古学家卡洛琳·马龙（Caroline Malone）认为，这种姿势可能反映了一种人在梦境般的体验，也许“她”正在多层宇宙中，在生者、死者和超自然的世界之间穿行。在戈佐岛上的布罗克托夫（Brochtorff），一对雕刻人物直直地坐在床上，怀中抱着一个小人儿（也许是个孩子）以及一个祭品杯。这对庄严的人物坐在一张饰有曲线图案的床上，被安置在许多装着红色赭石的小杯之间。马龙推测，这些器皿及其周围许多被红色赭石环绕的骸骨，可能反映了从生到死的永恒循环。还有两个关于床上人物的雕刻，是在马耳他塔尔欣（Tarxien）的另一处遗址外的两个垃圾堆里发现的。它们的躯干，或者只是头部，是可以被挪动的。其中一座雕像双腿丰满，伸向床边，而下面的小人儿们则从床柱之间向外张望。也许这些层次分明的造型代表着某位世世代代保护着生者与死者的古代神明。床的支柱与绑带相交缠，把这里变成一个碟形的、舒适的休息场所，其上铺着几层编织好后绑在床框上的芦苇或稻草。这些床的床腿似乎都又短又粗。



在马耳他哈尔·萨夫列尼地宫发现的“沉睡的妇人”石雕（约公元前3000年）

这些神庙及其地下墓穴的设计，似乎反映出当时人们的一种想象：他们把现实世界和超自然世界看作从死者所在的地下世界向天堂延伸的多层宇宙。在马耳他的古老世界里，万物并不都是平和安详的，但是，许多遗留下来的形象，包括哈尔·萨夫列尼的“沉睡的妇人”，都代表着一种平静舒适的存在。在这里，床的功能远远超出了日常活动的场所，它们是把生者与逝去的祖先维系在一起的宇宙的台阶。

睡在地上

尽管早期考古证据就已经表明当时的床具备床腿，但大多数人依然睡在地上。时至今日，世界各地甚至还有很多人，尤其是那些生存艰难的农民和穷苦人，根本无从选择，只能睡在地上。睡在高于地面的床上是早期社会的一种等级象征。如果你是古埃及法老时代的平民，几乎可以肯定，你一定睡在地上，可能垫着一张草席，也可能最多只有一张麦秆或羊毛填充的粗糙垫子把你和坚硬的地面隔开。对于睡惯了现代床垫的人来说，这种睡眠条件简直是一种挑战，但我听说这样似乎对身体有些好处。

理疗师迈克尔·泰特利（Michael Tetley）一生都在研究人类以外的灵长类动物以及那些睡在地上的人类。1953—1954年，他负责指挥一个非洲士兵排。士兵们教他怎样不用枕头侧卧在地上睡觉，这样耳朵就可以贴近地面，时刻侦测预示着危险的声音。他发现山地大猩猩、黑猩猩和长臂猿都侧身而睡，并且不准备任何可充当枕头的东西。许多人也是如此，他们用一条胳膊当枕头，移动肩膀，这样他们

的脖子也能得到有效的支撑。

泰特利将所有安全且无床的睡眠方式整理编目，其中一些在此之前并无他人记录。对于习惯用这些姿势睡觉的人来说，这显然是很舒适的。（11）没有人会回避现实的问题，泰特利甚至记录了男人们在野外露宿时为了避免下体遭虫咬伤而采用的各种睡觉姿势。然而，很少有人会选择在开阔的野外裸睡：我们总觉得自己太容易受伤，尤其在会出现各种小虫子的情况下，不管是我们想象出来的还是其他真实存在的虫子，都可能会咬破我们的皮肤、钻入其中，趁机在我们的各种器官里巡游一番。

对一些人而言，在地上睡觉比在床上睡觉更好：这是一种有意为之的文化和审美选择，与财富或地位无关。早在公元前13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中国就已经出现了“高台”形式的床，但在亚洲，人们睡在地上依然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直到今天，日本人仍习惯睡在地板上。大约从8世纪开始，他们会用折叠垫或将近一人大小的草席铺满房间，并称其为“榻榻米”（源于日语动词Tatamu，即“折叠”）。作为床上用品和坐具，榻榻米的标准化程度很高，以至于被用于编制住房统计数据：榻榻米的数量可以用来计算房间的面积。日式床垫是一种填充了棉絮的垫子，铺在榻榻米之上，从17世纪开始被人们使用。它最大的好处在于轻便，在如今拥挤不堪的城市公寓里，人们可以将日式床垫折叠起来，为其他日常活动节省空间。

在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王宫里，高床是闻所未闻的东西。即使贵为苏丹本人，也只是睡在一个铺着地毯和垫子的低矮平台上，“床”不过是地面上稍微隆起的部分。你可以睡在任何能铺得下床上用品的地方。一些虔诚的托钵僧也更喜欢睡在地上，因为他们相信，睡在坚硬的地面上能让他们具备安贫乐道的美德。然而，一旦人们开始睡在床上，将自己抬离地面，睡眠的状态就会发生动态的变化，此时枕头就成了必需品，而睡眠者也更容易受到腰痛的影响。因此，在社会声望问题发挥作用之前，睡在地面上或者其他坚硬的表面上并不一定是坏事。带腿的床几乎总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这往往是为了迎合富人或贵族才出现的说法。

睡在高处

鉴于社会不平等是文明的标志之一，所以毫不意外，不平等的出现会促使人们更加关注具备床腿的高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古代苏美尔人将木制床架固定在床腿上。早期的埃及床不过是些有脚的木框，皮革、布条或精心编制的芦苇席覆盖其上，成了供人睡觉的平

台。许多这种具备高度的床两端的床腿高低不等，高的一端是床头，人们有时还会在较低的那头放置脚凳。

干旱的气候对我们这些“床铺挖掘者”来说十分友好，因为干燥的条件能让木器千年不朽。埃及沙漠里干燥的空气使一些壮观的床保存至今。古埃及宰相梅汝卡（Mereruka）生活在第六王朝早期（约公元前2300年），服侍于泰提王。作为仅次于统治者的二号人物，他肩负的责任重大，日常工作甚至包括“监督抄写王室起居录（12）”。梅汝卡后来娶了泰提王的女儿塞斯赫特·瓦泰克赫托尔（Sesheshet Watetkhethor），成了王朝驸马。这对夫妇死后被合葬在下埃及塞加拉（Saqqara）的一处有33个房间的神庙里，墓室墙壁上的绘画和雕刻让我们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的床产生了生动的印象。

这座神庙里有5个房间属于梅汝卡的妻子瓦泰克赫托尔公主。在其中一个场景中，宰相坐在婚床床头，他的手肘显然靠在头枕上，而瓦泰克赫托尔正跪在他的脚边弹奏竖琴。贡品、储存罐以及各式箱笼整整齐齐地堆放在下面。坟墓里的另一张登记簿表明这里有张狮腿大床。两个仆人正在为床铺上亚麻布，而5个被称为“亚麻布监督”的侍从双手交叉，在一旁等待。梅汝卡拉着妻子的手走到床边，男女仆从跟在后面。在下一幅画面中，床单已经铺好，头枕也已就位。这幅壁画暗示着这对夫妇即将交媾。梅汝卡被称为“在铺好的床上的他”，而瓦泰克赫托尔则被称为“倚靠头枕的她”。这个场景就像古埃及艺术家在墓壁上涂绘时感受到的那样充满欲望。出生和重生都围绕着贵族和皇室的床。由石头、黏土或木头制成的头枕，与日出和轮回联系在一起，为生者和死者服务。

因贵为法老的女婿，梅汝卡拥有质量最好的床。再回溯300年，大约在公元前2580年至前2575年，赫特菲瑞斯女王带着她华丽的家具去往来世，其中就包括一张床腿裹覆着黄金的带有顶篷的床。床的木材早已腐烂，埃及学家乔治·赖纳（George Reiner）以拼装坍塌的金箔的方式复原了这张床的结构。又过了几个世纪，少年法老图坦卡蒙带着6张猫腿床走向永恒。这些床由乌木制成，覆盖着厚厚的黄金叶，颇为壮观。（13）黄金叶上的刮痕表明这张床曾经被使用过。3张装饰着各式兽首雕像的预制殡葬床就放在他的墓室前厅里，其中一张以狮头为装饰，这就是将法老的尸体制成木乃伊时所用的“狮床”。另一张床用河马头装饰，很可能是为献给分娩与生育女神塔沃瑞特（Taweret）而准备的。还有一张床用牝牛头装饰，它可能进一步唤起了牝牛女神梅赫特-韦赖特（Mehetweret）与轮回和创世的观念之间的联系。



图坦卡蒙法老陵墓前厅里的殡葬床，摄于1922年

法老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包括他的房事，都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因此，他们生活中的每一分钟都受到严格管理，井井有条。法老的生活，正如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西库鲁斯（Diodorus Siculus）在公元前1世纪描写的那样："不仅是接受觐见、处理政务，就连散步、洗澡、和妻子睡觉的时间都有规定，简而言之，他生活中的每一个动作都有严格的时间安排。"（14）而在几个世纪前，像梅汝卡这样的高级官员也是如此。梅汝卡的墓壁图刻表明，即使是在妻子陪伴下走向床边的时候，他也无法逃避自己的职责。

在古代晚期，床也是神话故事中永恒的主题。希腊和罗马文学中大量存在关于床所具备的能够提供慰藉和庇护功能的描述。在希腊和罗马，富人的床和埃及人的床类似，都以窄长方形为基础式样，但床腿更长，甚至可以兼作桌子使用。这种床没有脚踏板，但床头板能够支持人们斜靠在上面。著名的希腊沙发"克丽奈"（kliné）最早源于餐椅，但很快就演变成常见的病榻，它以交织的亚麻或皮带支撑起床垫。罗马语中有个常见的单词"lectus"（床），可以衍生出多种含义，也反映出了床的多种用途：人们睡在"lectus cubicularis"上（这是卧室床，"cubiculum"指卧室）；在"lectus genialis"（婚床）上共度良宵；"lectus discubitorius"是吃饭用的桌床，一般放在人的左侧，以便右手自由活动，这种床桌通常由三个人使用，最尊贵的客人居于中间位置；"lecti"不单是用于读书和工作的椅子，也是供病人使用的轮椅，还是用来捆住精神病人的床；"lectus funebris"用来将死者送往火葬的柴堆。（15）

床也是中国古代富人们的社交平台。东晋画家顾恺之（约公元

348—409年）是中国水墨画的鼻祖之一，他的绢本绘画《女史箴图》中有9个场景现存于世。画中有场景描绘了皇帝和嫔妃之间充满猜忌的对视画面—无声的对白往往会加剧猜疑。他们坐在一张挂着由四根床柱支撑着的华美帷幔的床上，这在没有隐私可言的皇宫里为他们提供了某种程度的私密空间。

这些床可能很硬，这在今天的中国也是一个常见的偏好，但富人与贵胄喜欢用精美的织物将他们的床围起来。中国人在纺织领域掌握着非凡的技术，他们常常在奢华的床帷上绣上吉祥的象征，比如飞天的神话形象等。随着时间推移，枕头取代了过去的头枕。枕头的好处是，除了用于睡觉之外，还能支撑使用者以某个角度斜躺着进行社交活动，并保持他们悉心梳理的头发整齐如初。

几千年来，床的基本设计几乎没什么变化。在大多数地方，睡得离地面越近，就代表这个人越穷。贵族和富人睡在高高的床上，裹着舒适的织物。将自己睡觉的位置抬离地面，用帷幔把自己的床围起来，无论是为了驱赶蚊虫或是抵御寒冷，这都是社会地位的象征。穷人没有选择，只能睡在地上。而那些更富有的希腊罗马人，尤其是罗马人，会睡在床面倾斜的窄床上，头所在的一端略高一些。他们靠着头枕，就像几千年前的法老一样。

欧洲的风尚

贵族、富人和平民之间的差异一直延续到中世纪的欧洲。对农民，也就是对大多数人来说，睡觉实际上就是简单地用毛毯或外套把自己包裹起来。近代早期的床发展出了多种形式，从简易的稻草堆到铺在凸起的平台上的填满稻草的麻袋，再到可以收入墙中的“箱床”和配有轮子的“轮床”。到12世纪，床变得越来越宽，甚至可达4米，并逐渐成为更坚固的家具。它离地面足够高，为在床下储物留出了空间。这张床上会铺一张塞满稻草的垫子，再上面是一条亚麻或羊毛的褥垫，然后是羽毛床垫，最后才罩上一张床单。

现代床的基本要素在中世纪晚期就已经具备了。这个时代的超级富豪们留下来的床上用品，比如精细无比的“特里斯坦被子”（Tristan Quilt），如今被收藏在伦敦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里。这条被子大约是1360—1400年在西西里岛缝制的，选用亚麻布面料，内里用棉絮填充，被面上至少有14处关于当时流行的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Isolde）的传说场景。博物馆的索引卡告诉我们，这条被子“满载着生动的战斗场景、船舰以及城堡的图案，在烛光下看上去肯定令人印象特别深刻”。（16）确实如此，但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条被子显

得既笨重又粗糙。

除了被子和铺在床上的毯子外，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睡觉时头可能枕在一个长度可横跨整张床的长枕上，垫子和枕头可以让人舒服地坐起来，甚至可以半坐半卧地睡觉。为什么他们会让身体以倾斜的角度，有时甚至保持挺立的状态睡觉呢？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这可能与床垫的斜度有关，也可能出于一种恐惧—平躺的姿势与死亡有着广泛的联系。17世纪的荷兰艺术家伦勃朗·凡·莱因（Rembrandt van Rijn）可能就以一种近乎垂直的姿势睡在他位于阿姆斯特丹的房子里的一张狭窄的“箱床”上。那时候有些男人认为，用枕头显得太过娘娘腔了，所以选择把头放在木枕上休息的人出人意料地多。虽然睡在木头上听起来并不吸引人，但使用硬邦邦的头枕并不是什么稀罕事：早期的中国人、古埃及人、努比亚人、希腊人，还有后来的日本人和非洲人的头枕通常都是用坚硬的材料制成的，而头枕中间的凹陷可以用来放置头发。

中世纪欧洲上流社会的床往往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它们通常是由直接悬挂在天花板上的帷帐包围起来的。在一个不推崇呼吸清新空气的时代，床帐既能保暖，又能带来额外的好处—抵御深夜来犯的魔鬼、巫婆和幽灵。大约在1290年，富商约翰·丰坦（John Fontin）为他在英格兰南安普敦的豪宅定制了这样一张带有帷帐的床。如今，你还能看到这张床的复制品被塞在某个房间的角落里，用厚重的床帐团团围住。到15世纪末，意大利人又想出一种新办法来抵御严寒和恶魔—他们睡在四柱床上，这样帷帐就可以直接挂在床框的帷柱上。

这些床很快就成了英国都铎王朝时期富人的最爱。在16—18世纪，四柱床在更为豪华光鲜的欧洲房屋中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就像许多早期床的结构一样，这种床通常以绳索和帆布为支撑，并具有床架，这意味着它类似于吊床。尽管人们会定期收紧绳索，可睡眠者还是经常会滑向床中央。因此，人们，尤其是英国豪宅的导游，经常说英国有句古老的睡前问候语就源于这种富人家习惯在睡前拉紧绳子的行为：“晚安，睡个好觉。”（Night night, sleep tight.）这说法有待商榷，因为这句问候语在20世纪才流行起来，而这种说法最早的出处是在1860年。

不管这句话的渊源如何，拉紧床绳肯定是当时的人每天必做的事。同样，很少会有富人在这种床里躺平了睡，他们通常采用半坐姿。在接下来的200年里，富人们争先恐后地把四柱床做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华丽，直到这张床几乎填满整个房间。在近代的欧洲，床往往是最受欢迎也是最贵的家具，它是一个家庭最重要的投资项目，家里有一张额外的床是极大的奢侈。17世纪，伦敦作家塞缪尔·佩皮斯

（Samuel Pepys）在日记中写道："我很自豪，因为我有一张多余的床供给留宿的朋友。"（17）

美洲殖民者的生活却很朴素。大多数早期殖民者的床折射出他们遗留的东西：在荷式风格或英式风格的床上，层层叠叠的厚被褥可以抵御寒冷和潮湿。那些来自荷兰的殖民者非常喜欢17世纪时在他们的家乡随处可见的橱柜床或"箱床"。这些床通常不是独立的家具，而是直接嵌入房间墙壁中的木板。

进入19世纪之后，现代化用品和卫生设施逐渐在西方普及。英国传奇纺织品设计师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用轻薄的棉布，而不是厚重的羊毛、锦缎或不耐用的丝绸，设计出干净而典雅的床帐。（18）莫里斯本人很留恋他的旧床，经常睡在家里那张17世纪的四柱床上，但用女儿设计的新床帐把它围了起来。他为床帐写了一首诗，诗的结尾是"一觉解千愁"。

因为人们不得不在外面工作越来越长的时间，所以特别需要好好休息。伴随着工业化，许多家庭扔掉了塞满了羊毛、苔藓和破布的旧床垫。工厂制造的金属弹簧铁架床成为一时风尚。这种床最理想的状态是配备一张耐用的马鬃床垫、一张羽毛床垫、几层床单被面、三四条毯子、一条羽绒被以及几个枕头和枕套。一些中上层家庭的生活标准可能很高，有些家政手册还提倡每天翻一次床垫，换两次枕套。在这种情况下，仆人自然就变得不可或缺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陈旧的雇佣制度和仆人阶级才逐渐在西方消失。一旦女佣供不应求，整理凌乱的床铺就成了一件让人头疼的琐事。20世纪70年代，瑞典羽绒被在设计师特伦斯·康兰（Terence Conran）的推广下逐渐普及，那些追求时髦的家庭终于如释重负。从此，铺好一张有腿的床只需要3秒，这简直闻所未闻。我们现在的床不仅非常容易整理，还可以从全球各地的工厂以非常低廉的价格买到。虽然床是我们最常使用的家具，但现代人却对它缄口不言，床就此被"隐藏了起来"。（19）然而，我们的床依然揭示出"我们是谁""我们如何生活""我们在想什么"以及"我们永远拥有什么"的答案。

第二章

穿越时间的睡眠

威尔士作家威廉·沃恩（William Vaughan）在1612年出版的手册《健康指南》（*Approved Directions for Health*）中说，睡眠能“强健所有精神，抚慰我们的身体，让我们保持悠然安详……驱散忧愁，平息心中的怒气”。（20）当时还有这样一句意大利谚语：“床是治病良药。”它们呼应了一种公认的医学观点，即良好的睡眠对健康至关重要。根据东英格兰的一种说法，睡眠对某些人来说是一种“遗忘世界”的方式。许多人相信，即使睡在坟墓旁边，睡眠也是一种财富。悲观主义者威廉·菲斯顿（William Phiston/Fiston）在《彬彬有礼的学校》（*Schoole of Good Manners*，1609年）一书中，把黑夜描述为“恐怖、黑暗和痛苦”的象征，称他的床是自己坟墓的原型。（21）

在那个无数人对黑暗深怀恐惧的世界里，良好的睡眠是精神健康的守护者，而睡觉的床则是人们改善身体和精神状况的场所。在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睡觉时会用熟悉的东西包围着自己。睡前，他们会凝视绣在床品上的宗教形象，祈祷，念诵经文。他们每天晚上睡觉前都向上帝告解，如果能双膝下跪就再好不过了。而在如今这样忙碌的世俗社会，我们对睡眠的精神恐惧已经消退。今天，大多数人觉得，睡眠仅仅是一种消除疲劳的方式。我们在睡觉时做的梦，如果醒来还能记得，往往也只是留给自己的小秘密。

古埃及人特别重视梦境，他们相信神会通过梦向他们传递指导性的信息。诱导或“孵化”这类幻象的最好方法是前往圣所或神殿，在那里睡一夜，做个特殊的“梦”。现在仍有些专门释梦的书籍流传下来，其中一本大约是在公元前1275年由来自德尔麦迪那（Deir el-Medina）的抄书吏昆希尔科普舍夫（Qenhirkopeshef）编撰的，那里是在帝王谷修筑陵墓的工匠居住的小型村庄。这本书为100多种梦境提供了解释，作者把这些梦归为吉祥之梦或不祥之梦。吉祥之梦如：“如果你看到自己在埋葬一个老人，那就很好，代表繁荣。”不祥之梦如：“如果一个男人梦见自己和女人交欢，那是不吉利的，因为这代表哀悼。”埃及人几乎总是把做春梦看作坏事，尤其是对妇女来说，她们即便梦见自己和丈夫同房也属于凶兆。具有正面意义的女性春梦仅占少数，而且往往与动物有关，比如《卡尔茨堡纸草书XIII》（*Papyrus Carlsberg XIII*）中记载的这种愉快的梦：“如果她梦到和一

只朱鹭亲热，她（将）获得一栋设施齐全的房子。”（22）那名抄书吏作者，用象形文字“ad”（一张有腿的床）代表睡眠，再加上词语“rswt”（一只睁开的眼睛）表示梦境。如果直译，“rswt”的意思就是“醒来”。因此，梦的象形文字就是一张床与一只睁开的眼睛的结合。这个符号概括了埃及人对梦的看法：它是睡眠中一种清醒的状态—不仅是一种与神明交流、与来世沟通的方式，还是一种疗愈和引导自己生命的方式。

在希腊人的统治下，祭祀睡眠的神殿依然存在。和埃及人一样，多数希腊人认为神会通过梦来传递信息，指引人类。务实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论睡眠中的预兆》（*On Divination in Sleep*）一文中对这种观念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梦更可能是人类基于过去的经验和思想产生的简单影像。尽管如此，梦的预言潜力在人们的信仰中依然十分强大：耶稣就在梦中预见过自己被背叛。罗马皇帝卡利古拉曾梦见自己站在众神之王朱庇特的宝座前，随后重返人间。他认为这是死亡的预兆。第二天，他就被刺杀了。

1590年，马德里姑娘卢克雷西亚·德·莱昂（Lucrecia de León）被捕入狱，因为西班牙当局说她的梦境引起了“丑闻和动乱”。根据几位神父多年来的记录，卢克雷西亚做过大约4000个预知梦，梦中场景包括西班牙被英国和土耳其军队击败以及世界末日。在这之中，只有一个重要的梦成为现实：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覆灭。就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警告她：“梦就只是梦而已，如果你相信这些梦是真的，我会大义灭亲。”最后，她被处以100鞭刑，并在女修道院里服务了两年。

有些梦在某些层面上看是神圣的，而放在婚姻中就不太和谐了。1666年，伦敦大瘟疫肆虐，日记作家塞缪尔·佩皮斯将自己在幻想中与卡斯尔梅因夫人共度良宵这件事记录为“有生之年最美的梦”。佩皮斯的妻子伊丽莎白·德·圣米歇尔开始对他疑心重重，甚至在他睡觉时检查他是否有勃起的迹象。然后，他们的婚姻又受到佩皮斯现实中的行为干扰，比如他和受雇前来帮助伊丽莎白的女人德布·威利特之间的风流韵事。伊丽莎白在年仅29岁时死于伤寒，据说，这对当时36岁的佩皮斯造成很大的打击，从此他再也没有写过日记。

对梦境的记录，在18世纪的英国上流社会达到了令人目眩的高度。一个伦敦商人靠着他的“夜间记录器”发了财：一片羊皮纸，上面有水平指针，声称可以通过烛光记录梦境。（23）19世纪，一群新锐思想家重新认识到梦境对生命的引导意义，其中为首的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1900年出版的《梦的解析》中，他认为梦是被压抑的欲望、恐惧和愿望的象征性表现，而这些欲望、恐惧和愿望往往太过痛苦，无法直接被体验或记忆，因此通过“审查机制”（psychic

censorship）升华到我们的潜意识中。（24）在他的分析中，他回顾了以弗所的占卜者阿特米多勒斯（Artemidorus）的作品。这位占卜者在公元2世纪翻译了无数埃及人梦中的象征符号，例如：右手代表父亲、儿子或朋友；（不吉利的）左手代表母亲、妻子或情妇。卡尔·荣格也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即梦揭示了人们内心生活的秘密，并向做梦者展示出其个性中隐藏的一面。与他们同时代的学者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更喜欢把梦看作解决问题的工具，还进一步提出：你做的梦越多（或记住的梦越多），你现实中面临的问题就越多。

现代的睡眠研究者吉姆·霍恩（Jim Horne）提醒我们，梦不过是一些应该被遗忘的B级影片："梦只是一部我们把最近在清醒时遇到的、想到的东西东拼西凑成的超现实作品。"（25）一些科学家推测，睡眠中的做梦阶段有助于人的身心恢复，也能巩固记忆。尽管如此，对一些人来说，梦境那自古流传的重要性是难以动摇的。凯利·布尔克利（Kelly Bulkeley）是一位宗教心理学家、"睡眠与梦"数据库的主管，也是"IDreamOfTrump.net" 等梦境分析网站的顾问，他认为理解梦境的含义对理解生活的意义至关重要。

就像古埃及人所说，梦似乎偶尔能够激发灵感。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声称，1619年的某个晚上他做了一连串的梦，由此发现了新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尽管我们也必须知道，阿拉伯博物学家海什木（Ibn al-Haythan）早他5个世纪就提出了该科学方法论。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是DNA结构的共同发现者之一，他在梦中看到了一段螺旋形楼梯，这就是双螺旋结构的线索，尽管这可能是在他看到罗莎琳德·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的X射线衍射图揭示的结构之后发生的事情。玛丽·雪莱说《弗兰肯斯坦》的创作灵感来自一段梦境。沮丧的漫画家埃尔热梦见了在西藏冒险的丁丁。乐手保罗·麦卡特尼在梦中构思出《昨日》（*Yesterday*）的旋律，虽然最初他只认为那是他童年记忆中的一首老歌。《终结者》系列的创意也是在导演詹姆斯·卡梅隆生病发高烧时，伴随着梦境一起来到他脑海中的。

在许多西方以外的社会，有大量的文学作品围绕梦境而展开。澳大利亚的原住民更喜欢睡得离亲人近一些，因为一个人的睡眠方式会影响他联系梦境的精神能力。（26）有些号称拥有"超能力"的人声称自己能进入强大的超自然领域，去往普通人无法抵达的地方。他们是通过睡在有特殊意义的地方，或是降临在他们的睡眠中的神启得到这种力量的。睡眠剥夺（Sleep deprivation）是一种在美洲原住民群体中进行精神启示和赋予权力的方法。在这种状态下，以独立视野进行探索的人会以一种灵魂出窍般的姿态开始他们的旅程。巫师可以闭上眼睛，让意识走得很远，把自己的肉体甩在身后。这些旅程与它们的

实践者同在，是由文化知识、个人体验以及情感联系组成的矩阵的一部分，这个矩阵融合成了违背自然法则的经验。梦中的幻象，在许多西方以外的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即使它并不总是那么引人注意。

“嘀嗒嘀嗒”

当然，做梦是我们漫长的睡眠过程的一部分。所有生物都有一个内在的“生物钟”—或者称它为“生理节律”—在每天运行着。人类的眼球后面有2万个不可见的神经细胞，记录包括光线在内的环境信号，以保持我们的生物钟时间准确。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精神病专家托马斯·韦尔（Thomas Wehr）将一组志愿者安置在一个试图模拟自然界、每天有14小时都保持黑暗的环境中，为期一个月。（27）到第4周时，志愿者们能够保持每天平均8小时处于睡眠状态，但睡眠并非完整而连贯的。相反，志愿者们往往会在夜里躺在床上时保持一两个小时的清醒状态，然后在黑暗引发褪黑激素激增后迅速入睡。在经过三五个小时的睡眠之后，志愿者会醒来一两个小时，然后再睡三五个小时。韦尔把睡眠的间隔期描述为“非焦虑清醒”（non-anxious wakefulness），这近似于“冥想状态”，有着单独的内分泌规律，包括泌乳素水平升高，这是一种与哺乳期和性高潮相关的减压激素。韦尔认为，实验表明，这种“双相”睡眠模式是人类天生具有的夜间活动节律。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历史学家A. 罗杰·埃克奇（A. Roger Ekirch）对韦尔的研究结果感到震惊，他开始收集有关双相睡眠的历史文献。（28）李维的《罗马史》和维吉尔的《埃涅伊德》（*Aeneid*）都以拉丁语著于公元前1世纪，其中记录了不少关于双相睡眠和多相睡眠的内容。到了中世纪，根据乔叟等作家的记载，英国人常常在傍晚就早早开始“初段睡眠”，然后醒来，可能吃点东西，再享受回笼觉，而这种二次睡眠可能要到凌晨时分才会开始。在睡眠的间隙—英语国家似乎称之为“守夜”（watch/watching），人们可能会回忆他们梦见了什么、彼此交谈、吸烟、吃东西或行房（犹太典籍认为这时候有利于生育）。其他一些人则把这段时间虔诚地奉献给神灵。

许多宗教把清晨看作对精神世界而言意义非凡的时刻。例如，早在6世纪，本笃会的创始人、努尔西亚的圣本笃（Saint Benedict of Nursia）就要求他的修士在午夜过后起床吟诵圣咏。到了中世纪中期，天主教徒通常在清晨安静的时间里祈祷。这些虔诚的祈祷还有利

于增强对抗魔鬼的能力，因为在西方的民间传说中，巫术和黑魔法在凌晨时分魔力最盛。1484—1750年，大约有20万西欧妇女因被判定为女巫而惨遭杀害：她们的罪行之一就是在深夜无缘无故地外出游荡。所谓的“女巫时刻”（witching hour）首次出现在文献中是在1883年，指的是从午夜时分到凌晨4点之间的夜间时刻。显然，这在当时是限制女性自由活动的一种极佳的方式。有更多证据表明，男人会在“守夜”时进行一些不法的勾当。1680年，安东尼·霍内克尔（Anthony Horneck）牧师哀叹当时的贼匪都在半夜起来抢劫杀人。一个世纪后，1775年，J. 克莱顿（J. Clayton）牧师出版了毫无幽默性可言的《给穷人的友好建议》（*Friendly Advice to the Poor*），其中就“午夜狂欢的危险”向人们做出了警告。

对于其他人，尤其是对普通城市居民来说，半夜醒来更多是为了养活自己。17世纪早期的作曲家奥兰多·吉本斯（Orlando Gibbons）为一首名叫《伦敦的呐喊》（*The Cries of London*）的街头歌曲填了词。这首歌以一个商人打开店门，高唱“上帝保佑你早安，我的客人，凌晨三点，一个晴朗的早晨”为开头。很快，商人加入了一群人的合唱队伍，唱出他们所有的在售商品，假装听众都是他们的顾客。这座城市凌晨3点就开始生机勃勃了。

如果多相睡眠曾是如此普遍的现象，那么为什么我们都忘了这回事呢？为什么没有更多的研究资料可供参考呢？也许是因为双相睡眠在那些时代太常见了，以至于没有人会专门研究它。17世纪伟大的作家，如乔治·威瑟（George Wither）和约翰·洛克（John Locke），都把多相睡眠视作普遍的日常现象。洛克在1690年写道，“所有人的睡眠都有间隔”，却没有进一步论述。此外，在17世纪末，留下日记或其他可能与个人睡眠模式相关的记录的人数大幅增加—早些时候，日记这种东西还是很少见的。到那时候，人造光和夜生活早已成为富人的时尚—他们是留下各种生活记录的主要人群。因此，有一种结论是，多相睡眠与缺少人造光的时代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因为这种光线模糊了日与夜之间的界限。

人类学的研究能够解释这场争论吗？20世纪，人们对于提夫人、查加人和吉威人[2]三个非洲民族进行了研究。他们既没有工业，也没有电灯，仍生存在农业社会中。在这三个群体中，双相睡眠是很普遍的现象。（29）直到1969年，生活在尼日利亚中部的自给自足的提夫人，依然遵循“初段睡眠”“二次睡眠”这种传统的睡眠节奏。此外，一个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睡眠障碍中心的杰罗姆·西格尔（Jerome Siegel）领导的团队，对生活在坦桑尼亚、纳米比亚和玻利维亚的三个互不干扰的狩猎-采集型社会部落进行了研究。在不同的情况下，研

究人员几乎都找不到当地部落成员夜间发生多相睡眠的证据，但有证据表明，他们在白天，尤其是夏季，会出现午睡的情况。他们还发现，这些部落成员平均每晚只睡6小时左右，少于现代西医一般推荐的8~9个小时。但是，这并没有对他们的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如产生肥胖、糖尿病或情绪混乱等后果，而科学家经常把这些问题与睡眠不足联系起来。西格尔的研究团队据此认为，连续睡眠约6个小时似乎代表了“人类的核心睡眠模式，这极有可能是前现代时期智人的特征（30）”。

任何现代人类群体，无论多么与世隔绝，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通往过去的入口。没有任何一个接受过研究的人类群体能活在隔绝于工业世界的原始且未经开发的史前时代。人类学领域的先驱有时也会研究对西方人或现代科技闻所未闻的群落，但这些人除了偶尔提到谁跟谁睡了、什么时候睡了以外，从没有提及任何睡眠问题。而且，他们认为睡觉这事太平凡了，根本就不值一提。出生于波兰的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年）曾在太平洋西南部的特罗布里恩群岛（Trobriand Islanders）的居民中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在他的日记中常出现的一句话是“去睡了”。但在他睡觉时，岛民们却毫无睡意，仍在谈天说地。这又是一个人类学家与其研究对象之间的睡眠观点存在差异的经典案例。虽然马林诺夫斯基忠实地描述了他们睡觉的小屋的样子，但几乎没有写到他们的床和睡眠习惯。他注意到，睡眠是危险的时刻，因为可能会被敌人突袭，也极易受到巫术的伤害。其他早期的人类学家，如曾研究尼罗河流域努尔人牧民的阿尔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 ，1881—1955年），也做过类似的观察。

归根结底，每个社会都以不同的方式教导年轻人应该如何睡觉，因为睡眠既是一种生理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此外，智人非常擅长适应环境。我们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处理任何事情，我们不能认为所有人类都是按照同样的方式睡觉的。虽然在针对非工业社会的少数人类学研究中，双相睡眠似乎是占主导地位的睡眠模式，但它也很可能不是唯一的睡眠方式。尽管如此，我们对双相睡眠模式的倾向，或许能够解释现代人正在面临的一些睡眠问题为何存在。

工业化睡眠

在我们这个被日程表支配的现代世界里，一个完整的产业应运而生，它致力于帮助我们入睡，又让我们按时醒来。第一种现代安眠药是在1903年研制成功的，这是一种合成的巴比妥酸盐，通称“佛罗拿”（Veronal）。到1930年，美国人每年服用巴比妥类药物的数量超

过10亿剂。2013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出具的一份报告称，有900万美国人（占美国成年人总人数的4%）使用处方安眠药。据估计，2014年，全球范围内在辅助睡眠上的总支出约为580亿美元，预计到2023年将增至1000亿美元以上。令人痛苦的是，这些药片往往只能延长20分钟的睡眠时间，而且还有很多副作用，小到提高跌倒的频率，大到提升痴呆的风险。

然而，为不良的睡眠状况施加补救措施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罗马皇帝瓦莱里安（Publius Licinius Valerianus，公元253—260年在位）是由缬草（Valerian，以他的名字命名）制成的混合药物的拥护者。鸦片是另一种长期流行的药物。古埃及的医学莎草书建议人们把鸦片、薰衣草和洋甘菊混合起来使用。16世纪，一名法国医生建议人们让吸血水蛭在自己耳朵后面吸出一个洞，再塞进一粒鸦片助眠。那个年代，大多数富有的失眠症患者更喜欢选择一种更加省事的方法，即饮用将鸦片和经过稀释的酒精混合制成的鸦片酊。在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助眠剂是一种酒精、糖和鸦片的混合物，被称为鸦片酒（或鸦片酊），这种类吗啡混合物通常比杜松子酒或葡萄酒更便宜。酒精本身也能用于助眠：很多德国人睡前会喝一小口含酒精的“睡眠饮料”。

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睡眠辅助物的种类也呈指数级增长。人类进化论者可能会把这些药片看作人类适应力的另一种表现：我们需要它，因为工业资本主义把我们塞进了一张严格的时间表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必须按时起床上班，这往往需要走出家门，还必须遵循固定的工作时间。用记者阿丽安娜·赫芬顿（Arianna Huffington）的话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睡眠“成了另一种被尽可能开发的商品（31）”。这种文化灌输在儿童时期就开始了：5岁的孩子被迫按时起床上学，如果迟到就得接受处罚。作为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的托马斯·杰斐逊不是一个坚定的工业化拥护者，他认为，教育普及是民主共和国必备的关键条件，但正如现实中那样，这也方便下一代为时刻承受工作场所残酷的时间表压迫做好准备。

这种灌输意味着如果我们在凌晨醒来，遵从自然的双相睡眠模式，可能会立刻陷入恐惧：该怎么面对这马上就要到来的一天呢？我们中的数十亿人选择吃下安眠药，剩下的那些会继续焦虑不安。然而，在怀表、工厂花名册和火车时刻表出现之前，睡眠是没有时间表的。唯一的结果仅仅是，上床的时间越晚，醒来的时间就越晚，二次睡眠的时间也会随之向后推。例如，在乔叟的作品《侍从的故事》（*The Squire's Tale*）中，鞑靼国王的女儿卡纳西（Canacee）在“黄昏后不久”就入睡了，之后在初段睡眠后的清晨醒来，而她的旅伴们则

熬到很晚，然后一觉睡到天亮。

工业时代带来了一种新的诱惑：夜晚摇身一变成了灯火通明的游乐场。这并不是说照明设备是种新兴事物。在罗马帝国的以弗所和安提阿已经出现了街道照明设施。公元9世纪，西班牙南部的科尔多瓦也装上了一些照明设施，但这种照明设备直到工业革命时代才开始普及。价格低廉的煤气灯和电灯的推广意味着到19世纪后期，晚睡不再是有钱人的特权。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睡眠研究员马修·沃克（Matthew Walker）认为，由明亮的夜晚导致的对睡眠的抗拒，正在使我们发胖、生病和抑郁。（32）

过去，黑暗笼罩着夜晚。作为考古学家，有些工作会把我们引向极其偏远的地区，让我们进入没有电力的世界体验一番。当我们在也门红海平原的一个偏僻地区挖掘某个考古点时，典型的夜晚场景往往是这样的：我们围坐在篝火旁直到夜幕降临（在冬天天黑得很早），然后我们会意识到夜晚实在太黑暗了，于是打开手电筒；大批飞虫以末日降临之势被灯光吸引过来；关掉手电筒；想起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得在凌晨5点钟跟太阳一同起床；回到安全的帐篷里睡觉。在我们的现代世界里，夜晚带来的压迫感有时会被遗忘。在英语中，黑暗曾经有个专属的称呼—“夜季”（night season）。即使是在中世纪欧洲的大城镇里，旅行者也会雇请灯夫来为他们领路。在伦敦，这些人被称为“接引伙计”（link boys）。他们手持熊熊燃烧的火把照亮道路，扮演引路人的角色。（33）

直到1667年，在法国路易十四的统治下情况才开始改变。他的王室政府开始在巴黎的街道上安装油灯，到1670年，共安装了3000盏；到1730年，这个数目又翻了一番。17世纪末，已经有超过50个欧洲城市仿效了巴黎。1807年，伦敦的蓓尔美尔街（Pall Mall）成为第一条被煤气灯照亮的城市街道。到1823年，近4万盏街灯照亮了总长约320千米的伦敦街道。

公共照明彻底改变了城市生活。灯火通明的街道保护了那些过去在黑暗中走出家门就会成为潜伏的强盗的猎物的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发展迅速的城市里，各种社会阶级都可以尽情地享受夜生活，进行社交活动直到深夜。喧闹的夜晚狂欢者也引发了他们自己的问题，因为深夜的酒店和酒吧往往会成为激起公众愤怒的焦点。出于这个原因，以及更多其他的原因，伦敦在19世纪上半叶出台了最早的职业警察制度。渐渐地，睡眠时间变得更安全，人们也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尽管我们现代人有很多睡眠问题，但安全感确实有利于睡眠，这就是为什么睡眠研究人员发现宠物猫和家养马在屋子里或是在马厩里受到保护时的睡眠时间会更长。（34）也许，我们这些现代人所承受

的睡眠损失，可以用那些被遗忘的收获补偿。

避免睡觉实际上能提高工作效率，这是什么观念？许多领袖人物声称他们几乎不需要睡眠，其中包括玛格丽特·撒切尔、比尔·克林顿等人。我可以再次引用阿丽安娜·赫芬顿的话："晚上不睡觉成了……一种力量的象征，一种衡量男子气概的方式以及最大限度的效率。"然而，这种"男子气概"并不完全是现代的特质，因为世界上每个单一文明（或每个留下书面记录的文明）都是父权制的，即由男性统治。"男子气概"最早可以追溯到美索不达米亚古文明。

历史上一些伟大的军事将领也因身为短眠者而受到钦佩，包括亚历山大、汉尼拔和拿破仑。温斯顿·丘吉尔也许是最著名的短眠领导人，人们相信他只需午睡片刻就能维持精力—此后，一些科学家认定午睡是人类固有的生理节奏的一部分。丘吉尔建议说："有时你必须在午餐和晚餐之间睡一会儿，没有折中的办法。""脱衣服睡觉去吧，我总是这样。不要觉得你会因为在白天睡觉而少做工作……你能干完更多的事情，而且事半功倍……当战争打响，我就必须在白天睡觉，因为那是我唯一能履行职责的办法。"（35）正是这种习惯使他很晚才睡，而且只睡大约4个小时，他的属下因此深感困扰。丘吉尔不仅在床上睡觉，还在床上做出重大决策，接见将军和大臣，规划出击败了希特勒的战略。

其他精力充沛的名人也有自称为短眠者的。据不可靠消息，莱昂纳多·达·芬奇在创作《蒙娜丽莎》时一天只睡两个小时，而且他把睡眠拆碎，每隔四小时就打一刻钟的盹儿。本杰明·富兰克林发明了一句让人扫兴的短语："早睡早起身体好，让人更富更聪明。"但是，据他本人的日记记载，他其实睡得挺多，一般是从晚上10点一直睡到早上5点。伏尔泰每晚睡4个小时，但毫无疑问，这是他每天喝40杯咖啡养成的习惯。随着工业时代到来，咖啡消费量的大幅增长绝非巧合。

大多数人如果没有足够的睡眠就会很难受。例如，众所周知，只需少量睡眠的温斯顿·丘吉尔深受抑郁症"黑狗"之苦。然而，虽然这种情况非常罕见，但确实有极少数人平均每晚只睡大约5个小时，却没有对健康造成任何不良影响。这些被称为"天生短眠者"的精英往往生性积极乐观。相比之下，长时间的睡眠往往与心情低落有关。托马斯·爱迪生就是历史上的天生短眠者之一，相较于其他人而言，双相睡眠对他来说更加没有必要。据说他经常睡在办公室里的一张简易小床上，或者干脆睡在办公桌旁边的地板上，每晚只需睡4个小时。他瞧不起那些需要更多睡眠的人，年过八旬后，他还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说："未来的人类会在床上花更少的时间……在古代，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100万年后，人类根本不用睡觉。说真的，睡

觉这件事很荒唐，是一种坏习惯……世界上没有比睡得太多更影响人的工作效率的事情了。”（36）

可以预见，在我们这个被时钟驱使的时代，早起被吹嘘成人们追求名声、获取财富的关键。1859年，“青年早起协会”成立，其成员声称，他们的成功归功于清晨。他们的观念在今天一场名为“奇迹早晨”（Miracle Morning）的网络运动中得到了回应，这场运动的领导者是热情洋溢的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作家哈尔·埃尔罗德（Hal Elrod），他倡导粉丝们在早晨5点起床，感受非凡的创造力。为了以此进行研究，我们亲身实践了他的提议：确实有效。我们从未感到自己的工作效率如此之高，但这只是在实践的第一周。在那之后，我们就感到了疲惫。我们不再参加夜晚的狂欢，因为床在呼唤我们。如今，我们成了《闲人》（*The Idler*）杂志的编辑汤姆·霍奇金森（Tom Hodgkinson）的信徒，他写了几本关于懒散生活的书，他的人生哲学提倡人们在床上多躺一会儿，多享受生活。

但是，我们到底应该在床上躺多久呢？2002年，斯克里普斯睡眠研究中心（Scripps Sleep Center）的丹·克里普克（Dan Kripke）领导了一个涉及超过100万北美人的大型研究项目，目的是确定人的最佳睡眠量。他的报告显示，每天睡7个小时左右的人死亡率最低（这是当时美国人睡眠时间的平均值）。（37）到2017年，英国睡眠委员会的《大英就寝时间报告》显示，74%的英国人睡眠时间不足7小时，12%的英国人睡眠时间低于5小时，30%的人说自己“大多数晚上的睡眠质量都很差”。我们很难找到能解决这一切的办法，但我们也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一种重返前工业化时代的方法—为自己而工作，掌握自己的睡眠时间。那些意识到自己的自然睡眠模式是双相睡眠的人可以放心地在晚上醒来，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是伸手倒出安眠药，或是在闹钟的每一声“嘀嗒嘀嗒”中胆战心惊。毕竟，我们可以在床上做很多事情。

第三章

“大爆炸”

公元64年，罗马皇帝尼禄与他的第五位配偶结了婚。尼禄扮演了一位羞答答的新娘，而他的“丈夫”是获得自由的奴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也可能是多利福罗斯（Doryphorus），文献对此存疑。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场丑态百出的婚礼。古罗马史学家塔西佗愤怒地写道：“尼禄，那个以每一种合法的或不合法的放纵行为玷污自己的人，从不放过任何可憎的机会来让自己堕落。就在几天前，他屈尊和那个名叫毕达哥拉斯的污秽之人结婚，婚礼仪式甚至样样俱全。新娘的面纱遮住了皇帝的脸，人们看到了主婚人、嫁妆、长榻（床）和婚礼上的火炬。”（38）

在古罗马时代，婚姻的作用是传宗接代，延续男人的血脉。妻子产下的最好是男孩，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在军队或海外领土的管理部门中服役。同许多其他社会一样，对希腊和罗马社会中的显赫家庭来说，他们的子嗣也是政治游戏中的棋子。对男人而言，与配偶行房是一项应尽的义务，而对他们的妻子来说生育子嗣也是一样。夫妻双方的生殖能力确保了世袭制度的传承，整个帝国的延续都依赖于生育。哲学家穆索尼乌斯·鲁弗斯（Musonius Rufus）在被尼禄放逐之前，一直在讲授斯多葛派哲学。他也认为，人类之所以有生殖器，要结婚，唯一目的就是传宗接代，确保人类的繁衍生存。（39）

自30多万年前第一批智人出现以来，人类的性行为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尽管存在个体差异，但是，我们与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家、埃及法老或维多利亚时代的贵妇一样，都有生理冲动。人类处理这种冲动的方式千差万别，从克制内敛到堕落放荡，还有兼于两者之间的一切。谁可以和谁睡，为什么睡，怎么睡，这些问题的答案因社会背景的不同存在很大的差异。人类的床，目睹了许许多多滑稽古怪的事情。

仰睡

在第一章我们提到，埃及宰相梅汝卡的墓室中的壁画描绘了他牵着妻子的手走向婚床的情景。（40）接下来肯定是一番云雨，但这种行为的目的是让妻子受孕。在一个突发疾病随时可能夺走统治者生命

的时代，性对于法老和高级官员们来说是一种极其严肃的消遣。如果没有继承人，危机会接踵而至。宫廷是一片充斥着阴谋、算计和反抗的泥沼，是官吏的邀功争宠之所，各路阴谋家都在法老的传宗接代这件大事上下了大注。埃及的墓室艺术家从没有在作品中暗示过性，除非是以最正式的方式，这是对埋葬在那些宏伟陵墓里的人的威严和崇高的体现。目前我们只发现了唯一一处以象形文字描述夫妻生活的例子，它在贝尼哈桑（Beni Hasan）的一个埃及中王国时期的陵墓中，但已因好奇的游客们长期以来的触摸而被抹去。然而，在许多墙头涂鸦以及一张被称为《图灵情欲莎草书》（*Turin Erotic Papyrus*）的古老莎草纸上，有许多关于性行为的非正式表述，似乎描绘了某家拥有各种性道具的妓院中的场景，这些性道具中甚至包括一辆二轮战车。

与其他前工业文明（或至少是那些有文字记载且该种文字已被破译的文明）一样，埃及的社会组织也以男性为中心。由于财产和土地要从父亲传给儿子，所以男性血统的纯正必须得到保障。生子是由女人完成的，这一事实对于各种秩序的稳定而言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威胁。因此，必须控制女人，必须控制她们的性行为，而“婚床”就是一种重要的控制手段。

对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来说，婚姻是一种商业交易。（41）在他们的语言中，“爱”的意思是“划分土地”。一对夫妇在结婚前要草拟合同，双方的家庭需要分别支付嫁妆和彩礼。婚礼和婚宴结束后，新娘会立刻跟随她的丈夫搬到公婆家中。随后，在对新娘是处女以及她会顺利怀孕的期待中，新郎会和新娘同房。如果这些步骤中的任何一个被忽略或是没能顺利执行，这段婚姻可能就会被判无效。

希腊人和罗马人在婚床上正式确立了男性与女性的角色。中上层阶级的父亲会以一家之主的身份为女儿精心安排婚姻，或为其正式任命监护人。色诺芬在他的著作《经济论》中写到实用主义者伊斯霍玛霍斯（Ischomachus）对他14岁的新娘说：“我们不难找到其他人和我们同床，但是，我为我自己考虑过，你的父母也为你考虑过，谁才是我们能得到的、对家庭和孩子而言最好的伴侣。我选择了你，而看起来你的父母也把我看作最佳人选。”（42）

即使是罗马女孩的童贞，也只有三分之一属于她自己，剩下的三分之二则属于父母。她的父母会把她交给未来的女婿，附带适当的嫁妆。罗马妻子的责任重大，一踏进丈夫家的门就要立即履行职责。人们期望她忠贞不渝、洁身自好、生儿育女、承担家务，还要会纺线织布。生育力强、擅长持家的女人会受到极大的尊敬。“玛德罗娜”（madrona）这个词指的是一夫一妻制中的妻子，她的根本任务就是生孩子，而且最好是男孩，这样他们长大就可以在罗马帝国的军

队中服役，或是在民政机构任职，并保证家族血统延续不衰。公元前1世纪的诗人卡图卢斯（Catullus）在一首婚礼诗中写到，新婚之夜应该孕育士兵，保家卫国。而与他同时代的普罗佩提乌斯（Propertius）却愤世嫉俗，养大儿子后断然拒绝让他们成为士兵。

在奥古斯都皇帝统治的时代，妇女的法律地位与儿童和奴隶一样。她们从属于她们的父亲、兄弟和丈夫。性和生育是妻子的责任。她们究竟喜欢不喜欢这种职责仍是个谜，但在通常情况下，尤其是对那些厌倦了反复怀孕的女性来说，这一定是她们仰卧在床时会在内心思考的关于罗马的问题。性是罗马宗教的核心，也是国家的中心。律师兼政治家西塞罗曾写到所有生物共同具有的生殖本能，夫妻间的结合是“公民政府的基础，是孕育国家的温床（43）”。尽管儿女都受制于罗马帝国的父权制，受制于他们的父亲作为家族首领所享有的权力，但早期的罗马帝国确实还存在一些受过教育的“不受约束的”妇女。她们虽无权投票，也不能从政（除了担任神职“维斯塔贞女”），却可以发挥，也确实发挥了她们的影响力。西塞罗才刚和他激进的妻子特伦蒂亚离婚，就有人问他是否会再婚。他回答说，他不能同时应付哲学和妻子两大难题。但是他很快就收回了这句话，因为他必须还清前妻的嫁妆，而唯一能让他负担得起的办法就是再娶一个。

西塞罗和他的妻子，就像大多数富裕家庭的夫妻一样，很可能共用一间卧室。这些卧室通常是方形的，在房子的一楼或二楼，面向开放的庭院。窗户很小，不一定是为了保护隐私，而是因为罗马的房屋结构一般都很简单，有着石质门楣或是高度适当的砖拱。房间里最重要的家具是床，这是房子里唯一相对隐蔽的地方，用于睡觉和行房。多数优质的床都是用木头做的，而更昂贵的那些会饰以金属制品。这些床一般都采用轻型结构，这意味着它们几乎没法保留下来。今天，我们主要从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和庞贝的雕带，以及其他地方的绘画或浮雕中了解这些床。这种罗马床通常有三条边，是一个有腿的矩形盒子，第四条边则是开放式的，便于人们爬上床。有些床会将其一端设置成倾斜的结构，用来支撑枕头。“莱克顿”（lectum）是一种式样相对简单的家具，但在富裕家庭中却得到了相当的重视。它由传统的古希腊床和长榻发展而来，式样与其大同小异。

欧洲中世纪的妇女地位差别很大。有些地位较高，比如阿基坦的埃莉诺（Eleanor of Aquitaine，1122—1204年），富有而有权势，又如修道院院长和宗教团体的管理者这样大权在握的女性。尽管存在许多细微差别，但实际上还是丈夫掌握着婚姻中的控制权，这在上流社会的家庭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在都铎王朝时代，英国女孩在成为丈夫的“财产”之前一直是自己父亲的“财产”。某天清晨，威廉·罗珀爵士

去拜访政治家托马斯·莫尔爵士，希望能娶他的一个女儿为妻。莫尔把他带进自己的卧房，他的两个女儿正在一张矮床上酣睡。他一把掀开被单，两个姑娘躺在床上，罩衫卷到腋下。当她们矜持地扭转身体时，威廉爵士说："好，前后我都看到了。"他轻拍其中一个的屁股，宣布她已经属于自己了。但是，那两个姑娘对这件事的态度并没有被记录下来。（44）

在莫尔的时代，来自上流社会的新婚夫妇的圆房过程是宫廷里的一种公开仪式。在包办婚姻的时代，这种婚姻往往具有重大的外交意义，它的圆满象征着坚不可摧的政治联盟。婚宴结束后，侍女们会脱掉新娘的衣服，把她放在床上。其后，新郎会在随从，有时还有乐师的陪同下穿着睡衣进入卧室，牧师会对他们的婚姻进行祝福。床帐被拉开，某些情况下，这些见证人要等到目睹这对夫妇赤裸的腿相碰触之后才会离去，而旁观者往往会逗留更久，直到耳中出现某些颇具暗示性的声音。第二天早上，沾着血渍的床单可能会被展示出来，作为婚姻圆满的证明。

封建时代的人希望新娘保持贞洁，但并不是每次都能如他们所愿。令人信服的"出血"方法有很多，包括偷偷用一小块浸透血液的海绵擦拭下体。在后来的19世纪，欧洲和美国的妓女都想通过证明自己的清白来赚更多的钱（也暗示自己没有性病）。她们会使用吸血水蛭甚至玻璃碎片来制造血渍弄脏床单。

根据传统的观念，最般配的伴侣往往在年龄、社会地位和拥有的财富上都大致相似，称得上门当户对。然而，有时候二婚的伴侣年龄会相差较大。1514年，52岁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再婚，对象是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年仅18岁的妹妹玛丽。婚后三个月路易就去世了，显然是在床上劳累过度。毕竟，与性的吸引力或浪漫的爱情比起来，让王朝世代延续重要得多，因此很可能很少有王室夫妇如此热衷于房事。贵族和皇室的婚姻是很早就计划好的：英国亚瑟王子（公元1486—1502年）与西班牙阿拉贡的凯瑟琳订婚时只有2岁，而女方只有3岁。在17世纪的英国，"床"这个词与"婚姻"的概念紧密联系，因此构成了其法律定义的一部分。床也是用来描述婚姻状况的简略表达方式。如果婚姻中的一方犯了通奸罪，就会被认为"玷污了伴侣的床"，而被冒犯的一方则可以"把对方踢下床"。

* * *

古代中国的婚姻通常是经过正式安排的，就像房地产交易一样：中间人负责确定双方的财产往来和交往细节，新郎只有在谈判结束后才能去拜见新娘的父母，拜见过后，新娘会和他一起回家，而婚宴几

乎就在当晚举行。婚宴结束后，这对夫妇会进入“洞房”完成结婚仪式。第二天早上，人们同样希望能看到新娘拿出带血的床单。一旦结婚，就有很多女人除了吃饭和睡觉的时间之外，基本见不到她们的丈夫。（45），[3]

床帐似乎对大户人家的妻子有着特殊的重大意义，象征着她们与丈夫之间那条维系终生的纽带。富人们花钱买来绣有仙人图案的昂贵丝绸床帐，用它们创造一间“房中房”，既能驱虫御寒，又能在供几个人睡觉的大房间里提供一定程度的私密性。在《女史箴图》中就出现了带床帐的床—一张由四根床柱支撑着轻薄床帐的四脚平台。

中国古代的朝臣和法老王朝的官吏一样，都严格管理着皇帝的性生活，并将其记录在《起居注》上。宫中的嫔妃向皇帝争宠是家常便饭，而她们与皇帝的接触需要太监加以安排。一旦皇帝决定临幸某个嫔妃，她就会被赤裸地裹在金色丝绸里，抬进皇帝的寝宫，放在龙床上。除了选择嫔妃侍寝，皇帝在农历的每月十五还得和皇后独处一晚。即便在那时，宫里的方士和御医也会告诉他该何时同房，以求皇后诞下龙子。这种规定严格的同房次数之多令人印象深刻。

* * *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表面上是体面优雅、举止端正的典范，实际上却充满了几百年的成见和禁忌。那时的性是被禁止谈论的话题，这件事纯粹是为了生孩子，而且被严格地限制在自家的卧室中进行。女性永远被期望能保持贞洁。基督教的最终典范是复制出“处女生子”的圣母马丽亚。如果被发现仅仅为了享乐而私通，那会是名誉上极大的污点。对私通的惩罚是十分严厉的，而且会在大庭广众下施行。“私生子”的耻辱仍然非常真实。清教徒的教义在英国和大部分欧洲社会引发了共鸣。

在维多利亚时代，男同性恋被认为是一种疾病，而女同性恋甚至被斥为荒唐之事，被当作不可能存在的事情。性教育在那时闻所未闻。维多利亚时代的虚构形象“格伦迪太太”（Mrs. Grundy）的诞生更是强调了传统观念，卧室仍然被认为是毫无乐趣的生育场所。（46）

然而，尽管在世界上的多数文明中都能发现父权制的确立，但在一些文化中，女性在床上的地位是高于，至少是等于男性的。大约一个世纪前，作为他那具有开拓性意义的人类学研究的一部分，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对特罗布里恩群岛的岛民的性生活进行了研究。这里是一个母系社会，像美国印第安部落的霍皮人（Hopi）和易洛魁人

（Iroquois）一样，他们把孩子和财富留在母亲的家族里。（47）他们鼓励妇女在追求或拒绝情人时要有主见，掌握支配权。他们没有正式的结婚仪式，相反，年轻夫妇会直接同床而眠。如果他们想结婚，女孩就会收下男方送的礼物（山药是最受欢迎的），她的父母也会认可这段婚姻。离婚也很容易，由双方共同商定即可。如果男人想和女人复合，他会用更多的山药和其他礼物讨好她，但回不回去则由女方说了算。孩子被认为是魔法的产物，受孕是某个祖先的灵魂进入了女人的身体，这种观念尤为常见。孩子出生后，母亲的兄弟会把家中收获的山药送给她，这样孩子就等于是被自己母系家族的作物养大的。从七八岁起，男孩和女孩就开始玩性游戏，以此作为和同龄朋友一起了解生活的一种方式。实际的性行为大约在四五年后开始。大多数村庄里都有一间被称为“布库马图拉”（bukumatula）的特殊小屋，里面的床（没有太多相关的细节描述）专供婚外性行为使用。但是，不是所有的自由恋爱都是混乱无序的。马林诺夫斯基谨慎地描述了这种邂逅的规则，包括偷看其他情侣亲热在当地也属于不礼貌的行为。

神圣与亵渎

美索不达米亚早期的经典文学作品《吉尔伽美什史诗》（*The Epic of Gilgamesh*）将性活动描述为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的一大乐趣。生育和智慧之神恩利尔（Enlil）与女神宁利尔（Ninlil）的新婚之夜极尽缱绻：“洞房里，撒满鲜花的床，香气就如雪松林一样令人心旷神怡。恩利尔，生育和智慧之神，与妻子云雨交欢，欲仙欲死。”（48）虽然婚姻是由家族安排的，美索不达米亚人依然欣赏浪漫的爱情，留下了许多关于人们坠入爱河的颂歌。比如《睡吧！我想把我的宝贝拥入怀中》（*Sleep Begone! I Want to Hold My Darling in My Arms*）就是一首以爱情为主题的诗歌。

美索不达米亚人显然享受交欢，但他们的性行为并不总发生在床上。约在公元前2000年大量生产的苏美尔陶板上的绘画栩栩如生，其中有些陶版画展现了当时男女之间发生在各种场合的各式各样的性姿势。据某位专家说，这些陶板是当时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无论是男人、女人还是小孩都可以观看。

尽管法老治下的埃及人品德端正，但他们仍有许多短语和词语来描述性行为，包括委婉的“与之共眠”，比较热烈的“一起享乐的人”，甚至还有“但愿他被驴睡！”这样的诅咒。对于展示男性器官，他们也不像今天的人那样避讳，而是将其当作生育力的象征。19世纪的考古学家在挖掘尼罗河三角洲的港口瑙克拉提斯（Naukratis）遗址时，惊奇地发现了数百个色情小雕像，其中许多都有硕大的阴茎。人们认为

这些小雕像不适合展出，于是将其深藏在博物馆的储藏室里。那次考古的发现还包括一个幼年荷鲁斯的石灰石小雕像，他的阴茎如此硕大，就像一柄遮在他头上的巨大香蕉阳伞。后来，在古埃及晚期（公元前664—前332年）的一些其他城镇遗址（尤其是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那些）出土了许多类似的“瑙克拉提斯小雕像”—这是考古人员使用的委婉称呼。几乎可以肯定，这些雕像被用于某些庆祝丰收的仪式，比如庆祝尼罗河泛滥的“醉酒节”（Festival of Drunkenness）。



庞贝妓院墙上的一幅情色壁画

古罗马的著作中也大量涉及对床笫之欢的描写。有一则关于爱神丘比特和灵魂女神普赛克（Psyche）的著名神话，讲述了普赛克对自己的床的迷恋、对夜晚的爱以及对白天的恐惧。她已与丘比特订婚，却被禁止看见他的脸。她精心打扮，为新婚之夜做好准备，躺在一张铺裹着精美面料的床上等待自己的新婚丈夫。从此之后，每天晚上她都会与丈夫共赴巫山，极尽缱绻之乐。她发誓绝不在白天与自己的爱人相见，目睹他的面容。然而，一天早上，她屈服于诱惑，背弃了誓言，丘比特因此弃她而去，永不复返。即使是在包办婚姻中，人们有时也能从墓志铭中了解到存在其中的伟大奉献精神。屠夫卢修斯·奥里利乌斯·赫米亚（Lucius Aurelius Hermia）和他的妻子奥雷利亚·腓利美提姆（Aurelia Philematium）都是希腊血统的自由奴隶，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他们在腓利美提姆7岁时相遇，一起生活了33年。出于一些偶然因素，他们的碑铭得以保存，如今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里。在墓志铭中丈夫写道：“今生离我而去的伴侣，身体纯洁，灵魂可爱。她是我生命中的唯一。”而妻子写道：“唉，我失去的那个人，对我来说，真的，真的不只像父亲一样。”（49）

中国人对发生在卧室里的性行为非常理智，几乎是教条式的，指

导他们的是特定的期望和特殊的指示。东晋时期的道教哲学家葛洪在公元4世纪写道："夫阴阳之术，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虚耗而已。"（50）2000多年来，道家的"道法自然"学说支配着中国的思想与社会。道教的基本哲学思想是人类与天地万物共荣共存，从而获得长寿和幸福。人人都必须追求一种和谐的互动："阴"是一种被动的力量；"阳"是一种能动的力量，一阴一阳之谓道。

只要有能平躺之处，就会有性行为的发生。中国的床原本是让人们坐下或睡觉的垫子。公元200年左右，佛教的传入让"睡觉的平台"在中国流行起来，因为人们相信佛陀就坐在高台之上。这种平台很快就得到了追捧，成为贵客和高官的专属座位。床变得更加精致了，填料优良的垫子为它提高了舒适度。考虑到中国的冬天非常寒冷，睡眠者也很看重床的温暖程度。在史前时代，人们常常在泥土地上烧一堆火，扫去灰烬，在余温尚存的地面上铺好席子。到公元前100年，中国的许多家庭里都会有一种名为"炕"的高台，台下建有火炉。女眷们的白天大多是在炕上度过的。在炕上可以进行各种活动，包括性行为。

* * *

信奉印度教的印度人也认为性是一种神圣的宗教职责，是一种可以提升自己的"业"，让自己的灵魂在轮回转世时能够上升到更高层次的愉悦方式。《爱经》（*Karmasutra*）约编著于公元前600年，在当时的印度，商人阶层的重要性逐渐提高，他们的财富也日益累积，这让他们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认知随之加深，并开始在宗教以及社会领域内寻求正当的行为方式。"业"是一种个人的追求，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事物，通常带有严酷的现实主义色彩。这本最著名的性手册出现的时机，正是印度教徒意识到"性"不仅仅是调情和性交技巧的时刻。（51）16世纪的阿拉伯人也有一本类似的书，名为《灵魂娱乐的芳香花园》（*The Perfumed Garden for the Soul's Recreation*），作者纳夫扎伊酋长（Sheikh Nefzawi）在书中一本正经地研究了所有标准的性交姿势，结果总计只有11种。

在中世纪的欧洲，普通人一般睡在公共空间，比如在地板上或土地上，但这不一定会影响性行为的体验或频率。教会法庭的记录打开了一扇通往中世纪的窗户，让我们看到了不同的世界。那时，教会负责用条律规范个人道德。当时，大量性活动发生在露天场合，可能是在茂盛的草地上，也可能是在某些会让人感到舒适的地方。只有享有特权的人才能共享一张高于地面的床。神话中，8世纪的英雄人物贝奥武夫（Beowulf）在拜访丹麦国王赫罗斯加（Hrothgar）的"米德大

厅”（great mead-hall）时脱下头盔，放下武器，爬上了那张大床。“枕头得以一睹其主的容颜”，因为他在睡觉时也被战士们环绕在中间。中世纪的艺术家总是把沉睡的人画成半坐姿势，露出面庞，有时还会裸露上身。这使他们能够展现出画中人的容貌，也反映出当时的睡眠习惯。

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势力很大，根据当时文献中的大量记载，有在忏悔室里勾引女性的品行不端的牧师，有在他们的小屋里硬邦邦的床上或者其他地方秘密幽会的修道士和修女，还有包养情妇、引诱侍女的贵族。一项基于英格兰东部的教会档案的题为《下流的修女与滥交的修道士》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参与这种活动的很大一部分是教会外部人员，这些出格行为是正常的人欲，而不属于任何异常行为。（52）

英国都铎时代的人对性的看法十分矛盾，他们强调女性的享受是怀孕的必要条件，但又主张女性不应表现出享受来。对女人来说，唯一允许的受孕姿势是仰面躺着，因为他们认为其他任何姿势都有可能造成胎儿畸形。

虽然历史上出现在卧房中的道具五花八门，创意频出，但简陋的床总是被当作这种活动的舞台，因为早在床被抬高到床腿上之前，它就已经被用于性行为和性幻想了。然而，尽管床确实具备分娩的功能，但直到近代，人们才让它成为婴儿降生的场所。

第四章

去叫接生婆

在第三章的“大爆炸”发生9个月后，一些女性发现自己正面临一场更剧烈的“生活大爆炸”—分娩。在现代的西方社会，大多数产妇都背躺在医院的钢架产床上分娩。这些产床经过消毒，铺着塑料床垫，有时还配备了监护仪，时刻准备为产妇注射止痛剂。虽然这些技术显然非常现代，但就历史阶段而言，此时床的作用同样出人意料地新颖。

公元前的一次分娩

大约2万年前，居住在意大利奥斯图尼（Ostuni）附近的一群游猎—采集部族成员和其他原始人的行为截然不同：他们会埋葬死者。这些被埋葬的人中包括一个十几岁，也可能稍年长些的女人，原本戴在她胳膊上的手镯如今只剩下几百枚被穿了孔的贝壳，而装饰着她的头的珠子数量更多。她朝左躺着，右臂搭在腹部上。考古学家清理掉她骨盆周围的泥土之后发现，一具几乎完全成形的极其细小的骨骼被夹在她的双腿之间。毫无疑问，那些埋葬她的人试图在这场通往地狱的分娩中帮助她。可他们救不了她，只能把她埋葬在土里，让她安静地长眠，并用华丽的饰品将她装扮起来。（53）

大约2万年后，我们中的一些人被告知，这种苦难是夏娃违背神的旨意带来的恶果。“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子女必多多受苦。”亚伯拉罕信奉的神这样说。（54）在现实中，进化似乎是所有人类的更高利益，而作为交换，受苦的则是女性和那些被夹在两腿之间的婴儿。大约600万年前，当我们的祖先开始用两条腿直立行走时，人类的产道就变窄了。与此同时，人类颅骨的尺寸也随着脑容量的扩增而逐渐增大，因此在现代人中，每1000个婴儿中就有一个因头部过大而难以通过产道。然而，我们已经利用了这些带来麻烦的方面—我们的大脑袋和灵巧的双手多亏了直立行走才得以解放—来接生。与大多数其他动物不同的是，几乎每个正在分娩的人类女性都有人帮助。有时这种帮助可以演变成一个巨大的产业。

在人类历史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床本身不是分娩的场所，而是用于产妇分娩后恢复身体的平台。在位于现代土耳其加泰土丘

（Çatalhöyük）的早期农业聚居地的一个谷仓里，人们挖掘出一个可追溯到公元前5800年左右的陶土泥塑，那是一个胖女人的形象，或许是一种生育的象征。这个泥塑是人类分娩最古老的表现之一，它高约16.5厘米（头部已丢失），坐在一把猫头扶手椅上，好像正在分娩，因此被称为“加泰土丘女性坐像”（Seated Woman of Çatalhöyük）。那里没有床，只有一把椅子。（55）分娩椅，特别是矮凳子，同样出现在了公元前20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我们从当时的文字记录中得知，妇女只有在分娩后才会躺到床上，与外界隔离，专心休养30天。对当时的富人而言，“床”是指在高于地面的木架上铺着编织床垫的平台，也许还有亚麻床单、羊毛毯和厚厚的垫子。对中等阶层来说，他们可能睡在铺着芦苇垫子的用泥砖垒成的平台上。而穷人只能躺在地面的芦席上入眠。

像这样单独隔离，卧床休养一段时间是个不错的办法，因为这样有助于减少外人带来的产后感染。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41%的现代新生儿死亡发生在出生后的28天内，75%发生在出生后的第一周。（56）但当时的美索不达米亚人还不认识细菌，他们决定隔离产妇的原因是认为女性的身体不洁。据说是产妇（而不是外来的访客）因为被分娩和血液污染而处于不洁的状态，只有通过隔离并举行仪式才能让她再次洁净。

在古埃及，床在产后的休息、清洁和恢复中扮演着相似的角色。只有公元前7世纪的一份被称为《布鲁克林纸莎草》（*Papyrus Brooklyn*，47.218.2）的文献描述了一个劳累的女人躺在床上或芦苇席上分娩（记录有些模糊）的场景。在所有其他情况下，妇女会站着、跪着、蹲着，使用“分娩砖”或坐在凳子上生孩子，甚至连分娩的象形符号也是一个跪着的女人，孩子的头和手臂从她的身体中露出来。还有一份珍贵的文献是在当今尼罗河畔的卢克索（Luxor）的德尔麦迪那工匠村被发现的，也为这个理论提供了一些证据。文献讲述了一个正在分娩的妇女跪在地上，一个接生婆抱住她抬起的手臂，另一个接生婆从她的子宫里接住或拽出婴儿。这正是我们在上埃及伊斯纳（Esna）的神殿浮雕上看到的画面—赤裸的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七世（Cleopatra VII，公元前69—前30年）跪在地上，双手高抬，一个接生婆从背后支撑着她，另一个跪在她面前，抱着女王产下的巨大（为了体现其尊贵地位而被描绘成幼儿般大小）婴儿。这种场景至少可以追溯到女王哈特谢普苏特（Hatshepsut，公元前15世纪中叶）的时代，她的母亲、图特摩斯一世（Thutmose I）的妻子阿莫斯王后（Queen Ahmes）也被这样描述过。

虽然女人不一定要以她的床作为分娩的平台，但还是有些人可能

会回到卧室里生孩子（《布鲁克林纸莎草》上记录了两则保护卧室的咒语），其他女人可能会在屋顶上，或是屋后的临时场所中分娩—甚至有些母亲在覆满藤蔓的乔木上分娩。最主要的是，产妇都希望能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中生产，但这在狭小、拥挤的城市住宅里很难实现。

就像对待性交、睡觉、吃饭和制作木乃伊一样，埃及人顽固地不愿记录分娩的细节。可能他们觉得生孩子这件事还不够有趣，也可能其中的技术细节都是由接生婆（女性文盲）口口相传的。现存的少数描述分娩的文献之一，《韦斯特卡纸莎草》（*Westcar Papyrus*），是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冒险家亨利·韦斯特卡（Henry Westcar）在某种“神秘情形”下发现的。它是在公元前16—前18世纪由一位无名抄书吏编写的，共讲述了5个故事，最后一个故事描述了一个名叫“莱德杰特”（Reddjedet）的虚拟人物的分娩过程。（57）

这则故事一开头就阴森森的：“莱德杰特感到阵痛，她的分娩有些困难。”因此，她的丈夫、太阳神“拉”的大祭司祈祷获得五位女神—伊西斯、梅斯赫奈特、赫克奈特、奈芙蒂斯和克奴姆的帮助。女神们化身为翩翩起舞的姑娘，把自己和产妇一起关在房间里。随后，莱德杰特生下了三胞胎男孩，这三个儿子滑进了负责接生的伊西斯的怀里。作为新王朝的储君，孩子们的四肢奇迹般地被神的肤色—金色覆盖，他们头戴着饰有宝石的头巾，这是神的发饰。作者还告诉我们，这位女王在分娩后是怎样被隔离起来，又是怎样得到一些女性的帮助的，其中包括她那最终出于某些原因而被鳄鱼吃掉的女仆。尽管莱德杰特的故事提供了一些关于分娩过程和产后仪式的有用信息，但它没有明确指出床在其中的作用。可能在地上铺张席子更常见，而且这种做法也更方便。

一旦开始分娩，接生婆就会吟唱祷歌、点燃树脂，并为产妇提供啤酒。酒精能稍微缓解疼痛，也能使产妇更接近保护她们的女神—“醉酒女神”哈托尔（Hathor）。有时，接生婆会使用刻有保护符号的、边缘被磨损了的河马牙魔杖进行一种如今失传已久的仪式。（58）婴儿出生后，接生婆会用坚硬的芦苇或一种特殊的、通常是鱼形的黑曜石匕首割断脐带。由于胎盘被认为代表人的生命力，所以会被保存下来，晒干，并且常常会被掩埋，有时人们甚至会把它埋在自家房子的门口。直到20世纪初，这种仪式仍在埃及的部分地区进行着。

医学和魔法总是密切相关的。在古代妇科文献中，有关如何处理子宫脱垂的医学建议总是和防止流产的魔法咒语一起出现。和美索不达米亚人一样，埃及妇女在分娩后也会被监禁起来，虽然在期限上更为仁慈，只有两周。我们考古发现，从公元前1800年开始就出现了装

饰着分娩保护神喜神贝斯（Bes）和塔沃里特（Taweret）形象的头枕，它们大概在守护着产妇的身体。我们还发现，从公元前1450年（大约在图坦卡蒙时代之前一个世纪）开始，就出现了表现母亲处于产后被隔离状态的泥塑与石像—一个裸女头戴华丽的假发、佩戴珠宝，躺在床上，身侧常常有一个孩子。德尔麦迪那村的文献还记载，孩子的父亲享有陪产假，还会买一些特殊用品给妻子助产，其中包括一种以侏儒神喜神贝斯的形象为床腿的特制床。但半个月期限一满，产妇和婴儿就会离开床，重新回到社会中，而家人们会适时为他们举行庆祝活动。

魔法与医学

随着时间推移，医学知识也积累得越来越多。公元前6世纪，印度医生苏胥如塔（Sushruta）[4]留下了详细得令人震惊的科学记录，其中包括关于正常的妊娠和分娩以及病理性（异常）分娩的内容。（59）他的一些发现可能对希腊人产生了影响。然而，魔法在希腊医学中仍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甚至公元前5世纪最初版本的“希波克拉底誓词”也包含一些咒语。当然，也有许多实用主义的体现。古希腊和罗马的医学规定，如果胎儿被认定死亡或被卡住，那就必须把他取出来，并试着保全母亲的生命。

我们已经从庞贝的“外科医生之家”等遗址中发现了一些令人震惊的产科器械藏品，比如钩形刀，用来肢解被卡住的胎儿。在公元1世纪或2世纪，以弗所的医生索兰纳斯建议，为了避免伤害产妇，应该只在婴儿露出产妇体外之后对其进行肢解。（60）人们会劈开畸胎的头，或者用一种带齿的弯钳（颅骨钳）把它压碎。这可能不会引起太多人的愤怒。索兰纳斯说，在孩子被分娩出来之后，孩子的祖母或姨妈会用一根指头蘸着唾液为孩子挡住“邪恶之眼”，再把孩子交给母亲。之后，孩子的父亲会被带到床边，决定孩子的生死。正如雅典喜剧诗人波斯迪普斯（Posidippus）在公元前3世纪所写的：“每个人，即便是穷人，也会生一个儿子。即便是富人，也会生一个女儿。”（61）当时，父母不想要的婴儿可能会被遗弃，例如被放置在皮塔斯神庙（Temple of Pietas）中，而畸形的“怪物”婴儿则会直接被溺死或闷死。亚里士多德甚至在《政治学》中提倡立法，将抚养残疾儿童规定为犯罪行为。当时，如果生出畸形儿，人们往往只归咎于母亲，认为她在产前看到了不好的东西。人们建议孕妇经常想着精美的雕塑，确保产下的孩子身材匀称，而举例来说，如果她们看到了猴子，则会生下长臂多毛的后代。

与之前和之后所有重要的文明一样，希腊和罗马社会通过男人来

追踪血统。但是，孩子是女人生的，她们有能力破坏男人的制度。如果想让父权制度稳固，女人的服从必不可少。有效的巩固措施恰恰包括一些由来已久且备受推崇的偏见，比如，主张产后的女人受到污染，是不洁的，并声称生孩子实际上都是男人的功劳。希腊人和罗马人都认为女人只是帮助男人生孩子的空容器，而她们并没有真正投入过什么—除非她们自己在妊娠过程中出了问题，比如盯着猴子看得太多。

虽然这些都是男性主导下的制度，但确实对女性的健康给予了一些照顾。在以弗所的名医索兰纳斯所著的20本医学书中有一本是关于妇科的。他的原作已经全部遗失了，但其内容在后世的著作中被广泛引用。索兰纳斯提出接生婆的手必须干净，并推广他的妊娠芳香疗法，包括让产妇吸入苹果或泥土的气味（这能让人们意识到在现代我们对香味的观念产生了怎样的变化）。他规定产妇分娩后必须卧床三周。城里的产妇会躺回她的床上，至少是躺回“克丽奈”上，也就是希腊人熟悉的那种四条腿的长方形床，其中有两条床腿比较高，用来支撑扶手或床头板。很多花瓶上绘有“克丽奈”的图像：编织床垫上覆盖着一些织物，靠垫紧挨头枕放着。富裕家庭的女人可以享受铺着层层精致编织物并堆满枕头的床。一些刚生下孩子的新手母亲会雇用奶妈，尽管塔西佗在书中称赞日耳曼妇女能照顾自己的孩子，并将这种行为视作有道德的体现，却遭到那些请得起奶妈的人唾弃。在母亲卧床休息期间，当新生儿度过危险期之后，家人就会给孩子取名，女孩在第8天命名，而男孩则在第9天。当时的女人若想不卧床休息几乎是不可能的，不管我们是否相信斯特拉博（Strabo）在《地理学》一书中的说法：伊比利亚妇女分娩时反而是她的丈夫卧床，她甚至还需要照顾这个男人。

帐篷和分娩椅

古代的中国发展出了另一套复杂的分娩仪式，并涉及一系列高度复杂的规定。（62）关于床的用法也有很多繁文缛节，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孕期的最后一个月要给孕妇搭一顶帐篷，或单独为她安排一间小屋，专供她的分娩，绝不仅仅是简单地在她床的周围围上普通床帐。

生产用的帐篷或小屋会搭建在室外或房子里的某个房间内，形状很像古埃及的凉亭。搭产篷时必须万分小心，一篇医学文献[5]告诫说：“无论何时，在搭建产篷时……严禁搭在刚收割的麦秆上，也不能搭在树下，这些都是不吉利的！”（63）出生星盘不仅指明了分娩屋的朝向，还规定了出生后胎盘应该埋在哪里。公元10世纪以后，这

种布局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以至于产妇房中普遍悬挂着“出生图”。一篇中国古代的文章记载，产妇一旦开始分娩，家人就得“把床和桌子挪开，把草分散着铺在地上，绑好绳子，捆住木头的两端，让木头悬成一根横杠……让产妇斜靠在木头上（64）”。再提一次，蹲在地上分娩似乎是贯穿历史的惯例。正如5世纪的名医陈延之所写：“古时的妇女坐在铺着稻草的地上生产，那模样就像在等死。”（65）据推测，这些稻草是提前就在地上铺好的。

接生婆会从背后托住产妇的腰部，这可能是20世纪以前在中国最常见的分娩姿势。产妇只在筋疲力尽时才会躺在地上或床上。一篇文章建议道，如果在生产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接生者应该首先“让产妇躺到床上”，这意味着，当生产过程一切顺利时，产妇并不会用到床。这种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因为某些床的高度：在公元3世纪后，精英阶层的床有时会高出地面很多。据说南朝时的一个母亲为了堕胎而让自己从床上摔了下来，这说明她的床一定很高。这种对高床的偏爱可能与2世纪传入中国的佛教有关。这种新信仰中的佛陀形象一般都坐在高耸的平台上，而不只是坐在垫子上，这导致高台在当时成为一种时尚，成为彰显贵宾、官员或贵族的尊贵身份的特殊席位。这种席位很快就演变出了更适合休息的加长版，再后来就被改良成了高于地面的“床”。

古代中国人认为，生孩子是女人的事，应该由接生婆负责接生。但是，如果孩子的父亲按规矩尽力帮忙，应对得当，那么能够顺利分娩就得归功于他。为了使胎盘和胎儿能如魔法般同时被分娩出来，尽责的丈夫会做一些在我们看来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用贴身衣服盖住井口。为了确保生产顺利，丈夫会给妻子喂食自己将指甲磨碎并烧焦的产物。虽然古怪，但严格遵循这些惯例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陈延之说，孕妇生孩子就像在地上等死，一旦孩子顺利降生，亲戚们就会带着猪肝来贺喜。根据经济条件的不同，产妇可能还会收到羊肉、麋鹿肉或其他鹿肉。古代中医称产后三天为“生死攸关的三天”，建议产妇“躺在被高高地架起来的床上，仰卧，提膝”，以便“观察”。产妇“受污染的状况”意味着她必须在卧室里待上一个月。在中国还有产后100天禁止同房的禁忌，以免产妇“五劳七伤”。这些古代文献没有明确指责说，生产不顺利是产妇的责任，但经常指出这些女人的身体不洁净，必须采取许多措施以防打破禁忌或冒犯上苍。（66）

在整个欧洲同样出现了很多与分娩有关的禁忌。在英国都铎时代，孕妇在临盆的那个月要待在卧室里。接生几个星期，她要在床单上洒圣水、关紧窗户、堵住所有钥匙孔，还得在白天拉合窗帘。当时的人认为，难产可能是潜伏的恶魔造成的，或是产妇因疏忽而触犯了

某些禁忌，比如注视月亮。人们可能会用民间土方治疗她，比如在她的肚子上撒蚂蚁卵的粉末。以前，人们往往是根据疾病和疗法之间的表面联系来治病的，这就是为什么说“吃皱褶多的核桃能补脑”—吃核桃确实补脑，不过完全是由于科学上的巧合。（67）

一旦分娩开始，那就是只有女人参与的事了。甚至在古英语中，“助产士”（midwife）的意思就是“与女人在一起”（with woman）。男人扮演的角色是“告知”，比如叫接生婆来并通知产妇的女性亲友。这些人应该是产妇的“干姐妹”或“闺密”，她们的作用也许是陪产妇聊天，让她心情平静。她们可能还会举行一些古老的仪式，比如摘下戒指或解开腰带—这些物件都被认为是对“窒息”的模仿，因此可能会伤害婴儿。或者，她们会带来一些护身符，诸如玛瑙贝之类，因为它们的形状看起来像女性器官，所以被认为能带来好运。

随着分娩的进行，产妇可能会在一张便携的木框小板床上休息，这张床可以移动到产妇所在的任何地方。她也可能会蹲在被称为“呻吟椅”（groaning chair），由接生婆提供的用于分娩的凳子上。新教改革后，欧洲孕妇在分娩时发出呻吟声的情况并没有减轻，反而愈演愈烈，因为当时止疼行为被认定是非法的。1591年，一名接生婆因为使用鸦片帮助产妇减轻分娩的疼痛而被活活烧死。许多古老的天主教止痛法—使用护符、圣像、秘药和咒语，也都因为被认定是迷信而被禁止了。但是，1559年，信奉天主教的苏格兰女王玛丽一世登基后，许多“违禁品”重新出现，这暗示着这些东西可能一直都未真正消失。（68）但现在，至少在公开场合，大多数产妇还是不得不依靠草药、祈祷和闺密们的闲聊来止疼。

虽然许多母亲有专供分娩使用的特殊生产麻布（通常是产妇出嫁时带来的祖传家当），但血淋淋的分娩行为通常发生在破布或老旧的柔软麻布上。富人可能会在主卧室里生产，而少数人会去一个更加私密的地方，也许是在中央火炉的附近。分娩结束后，接生婆会负责把婴儿清洗干净。人们可能会用酒来清洗新生的王子，在他的皮肤上涂黄油，并在他的肚脐上撒芦荟粉和阿拉伯乳香或埃塞俄比亚乳香的混合物。

在都铎时代，无论刚产下孩子的女人身份如何，都被称为“新手”（green woman），也同样被认为是不洁的，因为她们的身体受到了性交和分娩的污染。她们在产后的隔离期间不能看天，不能看地，甚至不能看别人的眼睛，性行为更是被严格禁止的。为了重塑自己的社会与道德身份，母亲在孩子满月后得去教堂举行一些仪式。她会蒙上面纱，从卧室被带到教堂的门口，就像当初结婚时那样，她将被赋予近乎童贞的（洁净）状态。如果她身体不适，不能前往教堂，

牧师也可以去往她的家中举行这些仪式。

女人们深知生育的危险。当时的孕妇经常让人画下自己的肖像留给后代，以防万一。在15世纪的佛罗伦萨，大多数女性在得知自己怀孕后马上就会立下遗嘱，哪怕是最为富有的女王与皇后也不能幸免，事实上，她们比大多数人都更容易在分娩中遭遇不测。当一位未来的君主出生时，可能会有多达70人挤在皇家寝室里，这增加了产妇患上“产褥热”（childbed fever，即产后发热）的风险，这种疾病通常是通过手上或罩衫上的细菌传播的。亨利八世的两任妻子，珍·西摩（Jane Seymour）和凯瑟琳·帕尔（Katherine Parr，她在下一段婚姻中才产下子嗣[6]），都是因为分娩后，焦虑的王室成员挤进了她们的卧室而感染产褥热，最终丧命。我们很难确定那个年代孕产妇的死亡率，但对16世纪伦敦阿尔德盖特（Aldgate）地区的案例研究表明，当时每100例妊娠中就有2.35例死亡。（69）考虑到当时的妇女可能拥有7个以上的孩子，这意味着大约每7位母亲中就有1位最终死于分娩。

在美洲的英国殖民地，参与分娩的人数可能也相当多。包括接生婆、产妇的婆婆和几个邻居在内，一个清教徒产妇的卧房里可能会出现十几个人。根据家庭财富和环境的差别，生育的首选场所是主人的卧室或厨房，很可能是在一张稻草床上，而在分娩结束后这张床就会被烧掉。然而，在1760年左右，美国上流社会的妇女开始要求请来产科医生帮助她们分娩。

在床上分娩

分娩的场所转移到了床上，这一习俗的转变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法国，现代产科手术出现的时候。现代的产科医生会要求产妇仰面躺在床上，这样他就能确实“站在”她面前使用医疗设备（这里我们都使用男性第三人称代词“他”和“他的”，因为最早的产科医生都是男性）。

直到18世纪，产科医生依然被视为一种粗鄙的职业，社会地位与木匠、鞋匠一样低微。在进入这个传统意义上的女性领域时，这些男人发现自己要和女性接生婆激烈竞争。为了获得优势，产科医生发展了一种新的以疾病为导向的分娩观。分娩一直被看作危险的事情，但从未被视为一种混乱。然而，新的产科医生开始说服女性，告诉她们怀孕是一种病，她们应该像病人那样躺在床上。这样一来，他们使用医疗器械为产妇进行接生就不但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了。产妇被动地躺在床上，而医生则运用他的医疗技能主动为她接生。

这种新观念迅速扎根了。1598年，法国产科医生中的先驱，雅克·吉尔默（Jacques Guillemeau，1550—1613年）在颇具影响力的文章《分娩，或快乐分娩》（*Childbirth, or The Happie Deliverie of Women*）中写到，斜倚在床上是让女性感到舒适，并能快速分娩的最佳姿势。路易十四时代的外科医生弗朗索瓦·莫里索（François Mauriceau）在1668年出版了《妊娠、分娩以及育后的妇女疾病》（*The Diseases of Women with Child and in Child-Bed*）。这本书反映了当时流行的观点，即把妊娠视为一种疾病，需要由男人来治愈，而床则被视为诊疗台。"床必须做成这样，"莫里索写道，"准备分娩的女人应该仰面躺在床上，头和胸部微微挺起，如此她既非躺着，也非坐着，因为以这种姿势她能呼吸得最顺畅，而且比起以其他姿势躺着或是直接陷在床里，这样还能让她保有更多体力来忍受疼痛。"（70）



一位正在分娩的18世纪产妇

床终于被确定为正确的分娩设施。但是，还有一些奇怪的因素促使怀孕的女人选择仰卧生产。莫里索的国王路易十四显然很喜欢看女人分娩。传统的分娩凳会遮挡视线，无法展现分娩过程，让他感到非常失望，据说他还为此推广了新的斜躺分娩姿势。路易十四是否真的推动了这次变革我们不得而知，但考虑到这位"太阳王"在当时近乎于神的地位，这个传言完全可能是真的。不管出于哪一种原因，到了17世纪末，对除了某些地区的农妇而言，床已经成为法国最常见的分娩场所了。

在17世纪早期，妇产科技术的发展还包括钱伯伦家族发明的产钳。虽然当时的产钳没有现代的骨盆曲线，但经过钱伯伦家族改良的产钳有了贴合婴儿头部曲线的设计。他们的接生方法一直是家族机密，绝不外传，直到17世纪90年代，钱伯伦家族的后裔休·钱伯伦

（Hugh Chamberlen）才透露了真相。然而，在这种产钳还不为世人所知的时候，那种在床单或毯子下接生的技能在人们看来一定如魔法般不可思议。起先人们对这种接生工具持怀疑态度，而接生婆们也开始进行反击，认为那些外科医生对于这种工具实在是过度热衷。但到了最后，接生婆们看上去还是停留在了一个迷信且一去不复返的时代。1899年，约瑟夫·玻利瓦尔·德莱（Joseph Bolivar DeLee）开设了芝加哥产科医院，他辩称分娩是一种医疗过程，不需要接生婆。他还提倡在分娩过程中使用产床、止痛药和产钳。

产床与疾病

尽管德莱坚持认为医院里的产床具有优势，然而，这样的产床也并不令人感到满意。18世纪的巴黎，最早的产科医院—巴黎主宫医院（the Hôtel-Dieu）设有1200个床位，以及一个很大的产房。但床位供不应求的情况还是非常严重，产妇们往往不得不共用一张产床，有时还得并排躺着一起分娩。这家医院频繁发生产褥热，死亡率高达2%~8%，大约是在院外分娩的死亡率的10倍。产妇会突然发烧，或者腹部突发疼痛、肿胀和失血，并在几天内死亡。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引起了产后败血症，但有些人认为，这是因为母乳出现了问题。1746年，主宫医院首次记录了一起产褥热病例，并延续了这一假设。医院的工作人员解剖了死去的产妇，看到了他们本认为是“凝固的乳汁”的东西附着在她们的肠道和其他部位，但那些其实不是乳汁，而是脓。

其他医生则有些不同的想法，尽管问题总在产妇自己身上，也许她在妊娠初期穿了紧身衬裙，或者她的阴道分泌物使她自己中了毒。没人猜测这是医生的过错—医生为一个又一个病人诊断，不知不觉地让自己的工具或手携带了病菌。直到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发起了一场激情十足却徒劳无功的运动：他让维也纳总医院第一妇产科门诊部的医生和医学生在为病人检查前先洗手。通常医生会在解剖完尸体后直接去检查室。尽管塞麦尔维斯门诊的死亡率因此大幅下降，却无法让他的同事信服。医生兼诗人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在美国领导了一场运动，敦促医生在给卧床不起的妇女看病之前先洗手，阻止疾病传播，但这场运动也阻碍重重，没几个医生听得进去。费城杰斐逊医学院的查尔斯·梅格斯（Charles Meigs）断言，医生都是绅士，而“绅士的手都是干净的（71）”。

19世纪的英国人将对避免性暗示的痴迷延伸到了产科。1837年，当维多利亚女王加冕，男性医生可以出现在女性分娩的场合，但人们认为他们不应该直视病人，只能触摸她们—有时只是隔着许多层

床单盲目地触摸婴儿。后来，在有男性医生在场的情况下，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最常见的姿势是向左侧躺，膝盖弯曲并提到腹部。这种扭曲的姿势使医生和病人都无法看到对方的脸。在贵族家庭中甚至流行一种时尚，也就是使用专为分娩而设计的便携床。人们认为，把产床从婚床中分离出来，在另一张床上生孩子，会减少分娩中暗示的性含义。

然而，很快这张无性含义的、经过消毒的、用金属框架制造并铺着硬质床单的医院病床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女性。医学发生了彻底的改变。19世纪60年代，约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开创的外科消毒法成为医学史上的重大突破之一。它确保了无菌手术的进行，而且让被重复使用的血迹斑斑的床单彻底消失。这是继1847年詹姆斯·辛普森（James Simpson）首次使用氯仿之后的又一进步。据说，辛普森以自己为对象做了一夜的实验后，发现了氯仿的神奇麻醉功效。1853年，维多利亚女王在第8次分娩时使用了氯仿，她形容这种药物能带来“难以言表的愉悦”。此后，使用氯仿进行全身麻醉的止痛方法以迅猛之势在产科中普及开来。

现代的分娩

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在美国，在医院里分娩的情况已经要比在院外生产更普遍了。婴儿在出生的几分钟内就会被带到大型的新生儿病房，然后被放进一张干净的、金属框架的婴儿床中。之后，婴儿会被带回母亲身边，以一种近似流水线的方式每三到四个小时喂食一次—据说，这个可行性很强的提议归功于卓越的婴儿配方奶粉的开发。

尽管科学一直在进步，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每200个孕妇里仍会有一个不幸死于分娩。20世纪40年代，由于抗生素的应用与普及，孕妇死亡率才开始骤降。我们智人的大脑和灵巧的双手达成了不可思议的成就—人类好像终于战胜了自然。到20世纪末，分娩这个行为几乎完全从家里搬到了医院的产床上。这种变化的意义十分深远：1900年，大约5%的美国妇女选择在医院分娩；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的一些大城市，这一比例已经达到约65%；1955年上升到了95%；而在2020年左右，美国妇女在医院分娩的比例预计接近99%。

怀孕的“病人”现在要接受一系列的检查，在美国和英国，大约三分之一的新妈妈都要接受剖宫产手术，将婴儿取出。老普林尼声称，恺撒大帝的一位祖先就是这样诞生的。事实上，“剖宫产”这个名词可能来自拉丁语的“切割”（caedere），或者来自罗马法中的《恺撒利亚法》（*Lex Caesarea*）。该法规定，对于死于妊娠晚期的妇女，应当

将其腹中胎儿取出。这是禁止母亲怀着婴儿下葬的一种文化禁忌。在消毒和麻醉技术出现之前，剖宫产几乎就等同于宣告母亲的死亡。但在今天，产科的床已成为我们大多数人人生中的第一张床。

大约8万名被认为是高危妊娠的北美女性被指导在分娩前卧床数周。有些人认为，这只不过是一场“卧床休息骗局”，长时间的休息并不会改变最终的结果，实际上倒可能会损害女性的精神健康。（72）至于仰卧分娩，最近的一项荟萃分析显示，当女性采取所谓的替代姿势，如蹲或站时，她们在医院里的分娩时间往往更短，也较少出现需要剖宫产和硬膜外镇痛的情况。196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前工业社会中，只有18%的女性选择平躺着分娩，正如我们看到的，这可能也反映了西方社会的历史实践。而接生婆们仍在反击：英国皇家助产士学会（the Royal College of Midwives）2010年的年度报告题为《把她从床上放下来》（*Get her off the bed*）。

当我们提及新生活有何不同时，这张床已经从主动恢复的地方变成了被动分娩的地方，这种转变与从全为女性的接生婆到以男性为主的产科医生（现在85%的产科医生是男性）的转变是同时发生的。和我们之前经历过的每一个父权社会一样，我们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把分娩的成功归功于男性。不过，另一个变化是，床再也不是让女性受到污染的区域。现在我们已经征服了许多分娩疾病，已经很少有产妇在床上以“不干净”的状态坐月子。相反，如今很多女性被要求模仿那些在分娩仅仅几天之后就穿着牛仔裤活蹦乱跳的媒体名人。这对女性的心理健康来说可能没多少好处。

20世纪70年代初，女权主义者认为与生育有关的护理不必那么神秘，妇女的生活也无须那么医学化。他们辩称，分娩并不是一种疾病，大多数分娩不需要住院。他们支持非专业的接生婆行当的复兴。他们提倡在家分娩，导致与医疗行业发生剧烈冲突。尽管美国没有任何州禁止在家中分娩，但参与家庭分娩的医生却面临着失去在医院中的特权，甚至还有被吊销行医执照的威胁。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的美国，有接生婆参与的生产过程占比约为8.2%，而在1980年只有1.1%。

然而，人类的分娩从未像今天这样安全，这显然要归功于现代医学。这就是为什么如今99%的西方女性愿意在医院的产床上生孩子：这样做可以免遭奥斯图尼那个年轻女孩的噩运；不会重蹈泰姬陵的主人印度皇妃的覆辙，她死于第14次分娩引发的产褥热；也不会重现1855年因晚期妊娠引起的妊娠剧吐（症状有慢性呕吐、体重减轻和脱水）而去世的夏洛蒂·勃朗特的悲剧。产后的床很危险，是一个能轻易把出生变成死亡的地方。

第五章

死亡与来世

公元450年左右，一个黑发的莫切（Moche）妇女在20多岁的时候就死去了。下葬的时候，她被裹在长达数百米的棉布里，身上盖着一张以藤编织的席子，那很可能是她生前所睡的床。她的遗体保存完好，自然干燥，腹部周围仍有松弛的皮肤褶皱，这表明她至少生过一次孩子。发现她的考古学家推断，她很可能死于产后的并发症。（73）

这座极其罕见的未被挖掘的墓穴，是于2006年在秘鲁北部海岸的埃尔布鲁约（El Brujo）金字塔群的一部分—曾被盗墓贼严重破坏过的“瓦卡考维耶尤”（Hueca Cao Viejo）泥砖金字塔顶部发现的。因此，她被昵称为“卡奥夫人”（the Lady of Cao）。她坟墓中的景象十分奇特，混合着传统的男性和女性的殉葬品，其中有黄金首饰、黄金缝衣针、编织工具、两柄仪式用的权杖以及23支长矛。她究竟是一位有权势的女性领袖，还是一位统治者的妻子呢？是她的丈夫给了她这些武器和装备吗？因为没有文字记载，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位重要人物。在她那条巨大的“睡袋”旁边还躺着其他几具尸体，包括一个17岁到19岁之间的少女。一根绳子依然缠在少女的脖子上，她可能是一名殉葬者，是卡奥夫人通往来世的向导。

但是，既然地位显赫，有奢华的陪葬品，为什么卡奥夫人只是被裹在一张简陋的藤席里下葬呢？也许这张藤席只是出于一种实际作用，用来卷起她那巨大的“殡葬包裹”，但也许更是为了保障她人生最终旅程的安全。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70%的现代西方人更愿意死在自己的床上，而对其中50%的人而言，这一愿望并没有实现，因为他们死在了医院里消过毒的病床上，正如他们出生时那样。死在自己的床上的愿望反映了睡眠、死亡和想象中的来世之间永恒的联系。早在公元前2200年，在世界上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中，吉尔伽美什就唤起了睡眠和死亡之间的联系，他对他已毫无气息的朋友说：“怎么了？睡意紧紧缠住了你，令你眼前一黑，你听不见我的声音了吗？”（74）

每当考古学家发现人类的墓葬时，其中的尸体都倾向于摆出睡眠的姿势：或舒展四肢仰卧，或侧卧，或像胎儿那样四肢蜷缩。如果尸体呈现出毫无仪态可言或令人尴尬的姿势，就表明它是被丢弃的，没

人收尸，是被留给敌人、异端或者非人类生物的。比如，在英格兰南部多塞特郡的里奇韦遗址（Ridgeway Hill）中，有54具被斩首的维京人尸体被丢弃。头朝下地倒葬或坐葬是极为罕见的情况，尽管这确实发生过，例如，9—14世纪，在秘鲁沿海的西坎文化（Sican）的精英阶层中就有这样的葬法。

我们大多数人的内心都保持着这种存在于“睡觉—死亡—来生”之间的联系。我们总是说“安息”或“睡个好觉”。 在《旧约全书》中，“床”有一种说法与腓尼基语和乌加里特语中的“棺材”（mskb）是同一个词，而威尔士语单词“bedd”既指床，又指坟墓。尼罗河畔传统的游牧民族努尔人相信，人在睡觉时，灵魂就在祖先之间游荡，如果身体在灵魂返回之前醒来，那么这个人就会死去。由于我们无法确定这种说法是否真实，所以，相较于其他人类活动，这种无知导致我们围绕死亡举行了更多的仪式。在这出戏剧中，床一直占据着舞台的中心，即使它意味着将一个垂死的君主拖到床上，进行正式的最终告别。

仪式和灵魂

从美索不达米亚人留给我们的关于最古老的葬礼仪式的文字记载来看，临终之床对他们而言具有深远的意义。一旦人们确定某人即将死去，就会将他挪到一张特殊的葬礼床上，而他的家人和朋友则会聚集在床边。床架左边会放置一张空椅子，这是人死后灵魂所坐的地方。这时，他的躯体正在被清洗，被涂上油或香料，他的嘴巴也会被束缚住，保持紧闭的状态。人们焚起香，将尸体安放在葬礼床上，死者身边的殉葬品可能是其生前珍爱的东西，可能是奉献给神的礼物，也可能是食物、饮料或者凉鞋。

凉鞋是灵魂奔赴来世的必需品，尽管由于旅程艰难困苦，超级富豪更喜欢乘坐马车。首先，灵魂必须穿越恶魔肆虐的荒原前往西方。然后，它将被摆渡过地狱之河哈布尔河（River Khubur），并最终在那里受到神的欢迎。神会在一份人类的总名单中勾出它的名字。灵魂一旦身处冥界，就会过上一种沉闷枯燥的生活，偶尔才能吃到亲戚供奉的食物。唯一的例外是胎死腹中的婴儿，据说他们将死后获得的永恒都用在了玩游戏和吃蜂蜜上。

之后一段时间之内，死者留在尘世的朋友和家人将沉浸于哀悼中：即使是对最贫穷的人而言，在毫无依托的情况下死去也是一种极大的耻辱。适当的哀悼行为包括披麻戴孝、大声哭泣以及抓挠自己的身体。人们可能会雇请职业哀悼者（这些人通常都是妓女），并把鼓

敲得嗵嗵响。葬礼要花费大笔钱财，而作为报酬，除了谷物、面包和啤酒，主持葬礼的人还期望得到葬礼上的床、椅子以及死者所穿的衣服。公元前3000年中期，苏美尔城邦拉格什的伊里卡吉纳（Irikagina）采取强硬措施限制了殉葬品的数量。他把啤酒罐从7个减为3个，面包从420个减为80个，每次葬礼只允许使用一张床和一个头枕，并规定葬礼后必须把床搬离坟墓。（75）美索不达米亚式的葬礼不像现在的婚礼那样在商业开发方面显然已经成熟，更何况那时人们相信，如果尸体没有得到妥善埋葬，鬼魂就可能重返世间，纠缠生者。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在战场上，美索不达米亚的胜利者也总是会埋葬敌人的尸体。

伊里卡吉纳禁止把床留在坟墓里的规定暗示着这是人们过去常做的事情。床葬在红海彼岸已经得到确证。早在公元前4000年，古埃及和努比亚（今苏丹）的人们就用木料做出类似家庭用床的担架或尸架以安葬死者。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考古学家乔治·雷斯纳（George Reisner）在努比亚地区库施王国的首都科尔马（Kerma）进行挖掘，发现了许多可追溯到公元前1700年左右的床葬遗迹。（76）最常见的临终之床是木制的，有的床腿形状和牛蹄一样，而且往往配有网状床垫。有些床上有磨损的痕迹，表明它是死者生前一直在睡的床。尽管雷斯纳发现有床的坟墓比没床的坟墓更多，但很可能仍然只有有钱人才能举行这种床葬，因为他们承担得起失去一张床的损失。在现代的苏丹葬礼上，人们仍然用床把死者抬进坟墓，但通常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净化仪式后就会把床带回家去。

临终之床也是古埃及葬礼的一部分。当图坦卡蒙在公元前14世纪末长眠时，他的陵墓还没有完工，但在他的墓室墙壁上已经描绘了为他送葬的行列场景。（77）壁画上，他的木乃伊被安放在一张置于雪橇上的木床中，由12个穿白袍的哀悼者拖着。陵墓的发现者霍华德·卡特（Howard Carter）说，他的床被罩在一座装饰着“花环与花彩”的神龛里。图坦卡蒙的送葬队伍把这具木乃伊从安放国王尸体的神庙抬进他的陵墓。神庙位于沙漠边缘，俯瞰尼罗河，他的尸体很可能就是在这里进行防腐处理的。在他的床后面，一队仆人扛着他来世会需要的所有其他物品，包括盛着他内脏的卡诺皮克罐（canopic）、衣服、食物、珠宝和家具。在这个行列中还有一群哀恸的妇女，其中有些是被雇来的，故意衣着凌乱，披头散发、赤裸胸部，双手乱舞。

送葬的人群抵达陵墓入口之后，木乃伊就将接受最终的葬礼仪式，这通常由死者的长子主持。由于图坦卡蒙在19岁时就去世了，没有子嗣，所以由他的继任者阿伊（Ay）—可能是他的祖父，也可能是一个身份不明的人[7]来执行这些仪式中最神圣的环节：开口仪式。在

这个仪式上，木乃伊被神奇地“复活”，它会接受食物、饮料和光。食物和光在陵墓中是来世所需的两个关键要素。阿伊身穿豹皮长袍，口里念着咒语，用特殊的工具—其中之一是一把用于割断新生儿脐带的鱼尾形刀—触碰木乃伊的眼睛和嘴巴，也许由此会在人类死亡时引出出生和重生的观念。瑞士木乃伊研究项目（Swiss Mummy Project）对51具木乃伊进行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葬礼上进行的触摸仪式似乎需要下很重的手，因为这些研究发现，许多木乃伊的门牙都存在断裂和缺口。（78）

图坦卡蒙被安放在镀金床上的嵌套棺材中，卡特的索引卡描述这是一副“沉重的木制床形棺材”，它是“凹形的，以与其内部人形棺底部的凸起相契合”。（79）外棺顶部饰有两个优雅而精致的狮首，底部有狮尾，四根用于支撑的棺腿被雕刻成狮子的四爪。棺材的底座铺有仿制的织带，看上去像一张编织得很紧密的床垫，其实是由黄金制成的，底面漆成了黑色。这是一张适合国王和上帝使用的床，它被黄金制成的神龛围着。陵墓里被填满了宝物，然后墓门被封死了。

图坦卡蒙法老，生前被奉为人间之神，将与他的众神同胞一起度过来世，尽管他预期的来世生活的细节仍然不为人知。“普通的”埃及人相信，死亡就是去往另一个国家，一片极乐净土，那里的人们会永远健康快乐地生活。古埃及的穷人只会被简单地埋藏在沙漠中，也许会以一两个护身符作为陪葬，而在某些时期，富人的陵墓中可能会出现大量的祭品和家具。例如法老阿蒙霍特普二世（Amenhotep II）、图特摩斯四世（Thutmose IV）、阿蒙霍特普三世（Amenhotep III，公元前15—前14世纪）的陵墓建筑师“卡”（Kha），他的坟墓于100多年前在德尔麦迪那工匠村遗址被发现，此前从未经受打扰。

卡和他的妻子梅尔耶特（Meryet）合葬，除大量珠宝、衣服、家具、食物和卡本人收藏的60条男性三角裤外，两人还各有一张漂亮的床。卡的床是木床，狮子腿装饰，铺有一张编织细密的床垫。这张床并没有被完全放入墓室，搬它进来的人也没有把它搬回家，而是把它留在了墓室外的前厅甬道里。这张床可能不是专为坟墓设计的，而是卡生前用过的。梅尔耶特的床和丈夫的差不多，但比较小，而且被漆成了白色。她的床上有床单、流苏床罩、毛巾和包着两层布的木质头枕。（80）这两张床对主人来说显然意义非凡，人们也可能是以它们为载体把遗体运进坟墓的。

奢华的临终之床

一张好的临终之床，对于表达死者在凡间与在天堂中的地位而言

是种很好的沟通方式。在其他文化中很少有像古希腊那样把这种象征意义发挥到极致的。在古希腊社会，吃饭时斜倚在餐椅或“克丽奈”上是一种极尽风雅的行为，所以，精英阶层用这种床来埋葬死去的亲人是早晚的事。虽然在早期文化的葬礼中就出现了餐椅，公元前2000年的杰里科（Jericho）古墓也证明了这一点，但直到公元前5世纪，“克丽奈”仍是希腊墓葬花瓶上代表临终之床的最常见的图样。（81）

我们几乎没找到完整的以“克丽奈”作为临终之床的考古证据，也许是因为它们的木制框架早已腐烂，或者这样的床通常不会同死者一起下葬。据爱琴海科奥斯岛上的一处5世纪的铭文记载，当葬礼结束后，床和床罩都必须被送回家。但是也有个别人会无视这种规定，比如雅典凯拉米克斯（Kerameikos）公墓中的几座坟墓，里面有明显的豪华木制“克丽奈”的痕迹，其上镶嵌着近东风格的象牙、琥珀和骨饰。在这样的沙发上下葬，人们肯定更会确信死者能够得到享受来世的无尽盛宴的资格。

因此，古希腊人在死亡的意义中对“克丽奈”的偏爱可能与他们对来世的观念的变化有关。（82）在荷马的《奥德赛》中，从公元前8世纪末起，希腊人对来世的看法就和美索不达米亚人不谋而合了：灵魂在冥府——一个被水包围着的暗黑地下世界里过着一种沉闷、一成不变的生活，只有那些身体被埋葬的人才能穿越水面进入那里，而多头的守门犬刻耳柏洛斯（Cerberus）会吃掉任何试图离开的人。在这里，人们不会因为生前行为的优劣得到任何奖惩。到了古代（公元前8—前6世纪），冥府变得更加令人感到愉快，但在古典时期（公元前5—前4世纪），极乐世界（天堂）的概念开始兴起，“克丽奈”随之成为临终之床。

尽管“克丽奈”最初的功能是令人愉快的，但它作为临终之床仍需要参与严肃的仪式。首先，死者的一位六旬以上的女性近亲负责给尸体涂油、清洗和穿衣。然后，尸体会被放到“克丽奈”上，头枕着枕头，脚朝向门。男人举起右手，走向“克丽奈”，而女人则适时地拍打自己的头和胸部。有时，女性音乐家会演奏竖琴、长笛或里拉琴。在古典时代，职业哀悼者不再受到支持，然而，床依然存在。

在伊特鲁里亚人的精英阶层中，将死者以陶制的长餐椅式棺材下葬是一种时尚。伊特鲁里亚艺术的伟大杰作之一——“陶棺上的夫妻像”（The Sarcophagus of the Spouses）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晚期，它描绘了一对已婚夫妇的宴会。这对夫妇有着欢快的脸庞和长长的发辫，整件作品如神迹般以陶土制成。在妻子左手边的是一个小小的圆形物体，也许是一个象征着不朽的石榴。伊特鲁里亚妇女似乎比她们同时代的人享有更多的自由，她舒舒服服地待在丈夫身边，怡然

自得。在古希腊，宴会是专为男人准备的。后来，以“克丽奈”作为临终之床的习俗出现在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到过的任何地方，当然，就像伊特鲁里亚人所做的那样，其中通常会融入一些当地特色。鉴于亚历山大大帝曾远征抵达印度河，我们在巴基斯坦发现了大量辉煌的犍陀罗艺术品，其中展现的场景包括圆寂的佛陀躺在希腊风格或者罗马风格的长榻上，他的追随者都围在这张床边。

在西方，随着罗马的衰落，以“克丽奈”为主角的葬礼基本上已经过时了，尽管在一些16世纪的墓穴中，我们确实发现墓主枕着自己的一只手臂，长眠在“克丽奈”上。然而，这种家具再次流行起来就是在维多利亚时代了。当时的大英帝国所向披靡，英国人把一切古典元素重新带入时尚。志存高远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有时会在客厅里陈放尸体，把死去的亲属安放在古典风格的“克丽奈”—“躺椅”，或者说是“睡椅”上。即使其中暗含的宴会元素已经消失，可相较于男性而言，维多利亚时代的沙发已经更多地与女性联系在一起，但它们在死亡层面上彰显出的奢华概念依然存在。

围在床边

在许多文化中，临终之床本身就是一个完全社会化的地方，朋友、家人和其他相关人士相聚于此，而且人数总是非常多。当一个垂死之人身负要职，例如身为一家之主时，因为涉及职责的转移，在场的见证者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中国的皇帝更希望自己能在公开场合离世，他们希望在死前当众立储，避免争夺皇位引发的动乱，但一般都事与愿违。帝王临终前还常存在一些意外风险。北齐文宣帝高洋（公元526—559年）在临终之际服用了所谓的长生不老药，却因此而丧命。（83）历史不断重演，诸多的中国皇帝和高官死于各种“灵丹妙药”，包括死于公元365年的晋哀帝司马丕，他在服下某种丹药后中毒而亡，时年25岁。与之相比，至少文宣帝是在自知命不久矣的情况下有意识地尝了尝自己炼的丹。

印度大君往往会在临终之床上挑选或收养继承人，这在动荡的邦国里称得上明智之举，因为如果继承人被预先选中，就可能会将王权的交接提前。在人们对王储人选的种种猜测中，临终之床的作用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1603年，伊丽莎白一世卧床离世，享年69岁。当时在场的人相对较少。据她的宫女伊丽莎白·索斯韦尔（Elizabeth Southwell）说，垂死的女王要求看一面“真正的镜子”，可问题随之而来。（84）女王得过天花，皮肤满是疤痕，牙齿也已腐烂，但每幅由宫廷监制的肖像

都把这位“童贞女王”画成貌美无瑕的美人，肤色无可挑剔。出现在镜子里的脸把她吓坏了，因此她把所有曾吹捧她、糊弄她的人统统赶出了房间。

尽管如此，女王去世的那天，围在她身边的一团人依然包括她的宫女、医生、牧师、坎特伯雷大主教和枢密院成员。祈祷声响起，在她弥留之际，有人问她是否同意苏格兰国王詹姆斯成为她的继任者。她甚至无法出声，只能抬起手表示同意。关于女王是否保持童贞、是否生育过的谣言随后甚嚣尘上，因为她曾严格下令，不能依照惯例解剖或检查她的遗体。取而代之的是，她被直接收殓入棺，置于她的床上，由侍女们看守。床上覆盖着黑色的天鹅绒毯，装饰着巨大的华丽鸵羽。按照中世纪的传统，棺材上会竖起一尊栩栩如生的女王木雕。直到新王登基，女王被正式安葬，这尊木雕会一直被保留。

皇室之死的回声响彻整个欧洲。1715年，路易十四在自己的住所去世：他在公众的注目下死在了自己的床上。在法国的宫廷生活中，国王的床至关重要，以至于即使主人没在床上，走进国王卧室的人也得像走向祭坛那样虔诚朝拜。在离世的前两天，路易十四还在床上处理国事，包括册立他的曾孙为储君。他去世时，亲近的随从站在床边，而其他人，包括为他检查生了坏疽的腿的医生、家族成员、侍臣以及其他见证者依次走进他的卧室。

国王驾崩之后，宫殿的各个房间都披上了黑色的帷幔，但与传统不同的是，路易十四并未拥有在往常的葬礼上会出现的塑像。法国有种旧习俗，为已故的国王定制一尊用柳条编织的（英国是用木头）塑像，塑像的面部和双手是取自国王遗体的蜡质倒模。侍者会为这个“国王的分身”穿戴整齐，扶“他”坐到床上接受觐见。“他”坐在那儿，在仆人的侍奉下“吃”一顿饭，好像“他”就是活生生的国王一样。在送葬队伍中，这尊塑像非常显眼，人们会成群结队地跑去围观，但路易十四的父亲路易十三认为这样的行为简直是异端，所以在1622年下令禁止了这种做法。

人们聚集在临终之床周围的习惯不止对王室成员而言很重要。临终之床是一个社交场所，朋友和家人以此为中心聚集在一起，为垂死之人鼓气—也为彼此鼓气。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人死后尸体通常会被擦洗干净、穿戴整齐，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人们会对尸体简单地做一些防腐处理。尸体会被放置在尸架上或是敞开的棺材里，而棺材通常放在逝者生前的床上。人们开始为亡者守灵，因为亲朋好友要确保逝者在下葬前不会感到孤独。在20世纪中叶之前，这项习俗是相当普遍的。

天主教徒认为见证人的一生中最后的时刻极为重要，因为他们相信，这会决定离世之人的命运—这取决于死者选择围绕在床边的是天使还是魔鬼。如果死者平静地离去，就表明是天使取得了胜利。宗教改革后，新教徒坚持认为，人无法在临终之时决定自己的命运，这种宗教立场肯定造成了当时的人们在某种程度上的临终焦虑。尽管如此，伊丽莎白的新教牧师还是煞费苦心地描述了她咽下最后一口气时的场景，说这就像一张直通天堂的车票。“她离去时很安详，”他报告说，“像一只羔羊，像一个成熟的苹果从树上落下般从容。”（85）



一个基督徒在临终之际滔滔不绝地讲话。《约翰·卫斯理牧师的去世》（*The Demise of Reverend John Wesley*）（版画，绘于1840年左右）

在伊斯兰教中，家人和朋友也会聚集在临终之床周围。随着末日临近，他们会鼓励垂死之人以阿拉伯语祈祷，表达自己的信仰。最初的祈祷是重复的“啦啦”声，这是相当令人宽慰的抒情诗。如果濒死之人感到痛苦，人们就会在他耳边小声说出这些圣言，就像对新生儿的耳语。人死后，他们会在葬仪上为遗体清洗、穿戴，然后将其安放在配有棺架的棺材里。他们会尽快举行葬礼，最好是当天，然后就进入哀悼期。卫生要求和尸体腐烂的速度无疑是推动葬礼尽快举行的原因，因为伊斯兰教禁止火葬。长期以来，这种习俗在犹太教中也是一样。

16、17世纪，欧洲的犹太人认为围绕在临终之床旁边是一种戒律、一种善行或一种宗教职责。犹太人群体会尽最大努力确保没有人

会孤独地死去。在理想情况下，临终之人会在10个犹太同胞面前忏悔，仪式包括为自己的家人祝福或祈祷，之后再背诵一套祷词。死者离世后，尸体必须得在24小时内被清理和埋葬。在一段《塔木德》经文中，上帝说道："我曾把我的像摆在你们中间，又因你们的罪而将它掀翻，现在掀翻你们的床吧。"（86）为了遵从这句话，哀悼的犹太人会依照传统掀翻死者的沙发或床，在整个7日丧期内都将它们留在地上。

17世纪的欧洲人描述了非洲黄金海岸的一种与之类似的葬礼哀悼仪式。虽然没有任何一个欧洲人与这些西非人足够亲密，能够完全观察到他们环绕临终之床的场景，但他们回忆了自己目睹的当地人在死者离世后举行的大型聚会，轻蔑地讲述牧师如何与死者对话，问他是怎么死的，以及是否有人导致了他的死亡。事实上，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疑问，所以也许他们的仪式对死者亲属的心理健康有好处。这个社会中的长子通常会把父亲埋在床下或床边，每天早上他都会按照惯例将自己的第一口所吃所喝的任何食物供给他的父亲。英国殖民者认为这是野蛮原始的表现，于是制止了这种做法。

临终遗言

围绕临终之床的人常常向临终之人俯下身，渴望听到他的遗言。这个人会以不朽之言概括自己一生的成就和目标吗？"伯蒂（阿尔伯特的昵称）。"维多利亚女王低声说道；"我对这一切都厌倦了。"丘吉尔说。当一个人即将离世，他的语言已经很难变得深刻，或者说，他已经不关心自己说的话是否包含什么深刻含义了。

西方人对遗言特别感兴趣，这种倾向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之死，这位哲学家的死感人至深。苏格拉底在公元前399年被判有罪，罪名是渎神并教唆雅典青年堕落。他被判饮下毒芹汁。他的年轻弟子柏拉图记录了当时发生的事。事件到达高潮，苏格拉底喝下毒芹汁，躺了下来（大概是躺在床上），为自己盖上床单，让毒素慢慢地从头到脚扩散到全身。就在死前最后一刻，他显然把床单从自己脸上掀开了，提醒一个来为他送行的朋友说："克里同，我还欠阿斯克勒庇俄斯（医药之神）一只公鸡，记得替我还上这笔债。"（87）

我们可能会想，这是多么令人扫兴的结尾，但他的朋友们却对他无比崇敬：苏格拉底至死都保持着守信的美德。对古罗马人来说，"苏格拉底之死"是死亡的终极形式，他们因此开启了关注死者临终遗言的时尚。罗马哲学家塞涅卡因决定效法苏格拉底而自杀，并要求他的秘书在场记录他的遗言。据塔西佗记载，塞涅卡临终时

说："我被禁止向你表达我对你的服务的感激之情。我为你留下了我唯一的，也是最珍贵的财产—我的生活方式。如果你还记得的话，那么，你忠诚的友谊将足以匹配美德之名，这是对它的奖赏。"（88）其他人则认为，他在将死之时为解放者朱庇特（Jupiter the Liberator）举行了一场祭奠仪式。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正如塔西佗所说，塞涅卡的死愚蠢透顶，不仅场面混乱，而且仪式烦琐。喝下毒芹汁通常会导致剧烈抽搐、痉挛和呕吐。更整洁的方式是钉死在十字架上，即使在古希腊时代，这也是一种常见的处死罪犯的方式。

考虑到毒芹汁会引发的问题，苏格拉底的临终遗言和行为很可能也是杜撰出来的。所有那些最好的临终遗言都可能是杜撰出来的。据称，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曾说："我接手的罗马是一座砖瓦之城，我留下的罗马是一座大理石之城。"尽管他的妻子利维亚同样令人生疑地声称，他实际上只是引用了希腊戏剧中的几句台词而已。伊丽莎白一世的遗言同样可能是编造的，她说："我的所有财产只不过是过眼烟云而已。"作家奥斯卡·王尔德身无分文地死在巴黎的一间公寓里，他的"遗言"被人们广泛引用："我和墙纸一较高下，不是它死就是我亡。"但事实上，他在去世之前几周就说过这句话。

既然死者无法回应，就很容易编造出他们的遗言。耶稣会士和其他北美传教士经常讲述"印第安土著"的临终演说，以此推动他们的传教事业。他们口中典型的印第安式临终场景往往是以认识到世界末日已经逼近开始的。如果已经皈依了基督教，印第安人会为上帝祈祷、为朋友和家人的健康祈祷、为仁慈祈祷，或为传教士能继续成功地改变那些身为非基督徒的印第安人的信仰祈祷。他们的遗言总是会以某句恰当的话收尾，比如"上帝，带我走吧！"说这话的时候，他们的双眼会热切地望着天空。

偶尔，一个依然身体健康却即将死去的人会说些不同寻常的话，就像1887年乔治·恩格尔在绞刑架上高呼："为无政府主义欢呼！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书面上的"临终遗言"也允许包含更多的思考。目前最受欢迎的载体是"推特"等社交媒体。在《星际迷航》中扮演"斯波克船长"的伦纳德·尼莫伊（Leonard Nimoy）去世之前在"推特"上发表了最后一条状态："生命就像一座花园，可以拥有完美的瞬间，却无法保留，只有记忆长存。#生生不息，繁荣昌盛（Live Long and Prosper）#（89）。"但有时人生的最后一条"推特"状态也可能令人感到意外，比如瑞瓦·斯蒂坎普（Reeva Steenkamp）的："明天你为你的另一半准备了什么？？？#我开始激动了#情人节。"（90）她那时还不知道她的情人，残奥会短跑冠军奥斯卡·皮斯托瑞斯（Oscar Pistorius）正准备朝她开枪。

每个人的临终之床

托马斯·哈代在《德伯家的苔丝》中写道：“还有另外一个日子……就是她自己死去的日子。那一天悄悄地藏在一年当中的所有日子里，谁也看不见。她年年岁岁都要遇见那一天，那一天却总是不声不响，不留痕迹，但我们又不能说那一天不存在于这一年里。”（91）《圣经》上说，“那一天”通常是在70年后到来。而据出土于叙利亚依玛（Emar）遗址的文字记载，上帝赐予人类最多120年的寿命，确切地说，能在自己年过耄耋时看到家族的第4代成员出生是人类最终的福气，这10年被视为老年的极限。

你我都知道，每个人都难逃一死。据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所说，这种对死亡的认知是我们追求幸福的道路上最大的阻碍。他鼓励他的追随者拥抱死亡，享受生活，还评论说死并不可怕，死亡是毫无感觉的，也不是由神决定的。然而，有多少人听从了他的建议？在现代的西方社会，我们往往会与死亡抗争，或干脆忽视死亡。我们对临终之时的态度就说明了一切。以前，死亡往往发生在公开的场合，而现在却大多藏在医院的床帘后面，甚至完全不愿被人看见。可能是因为我们不擅长应对死亡，也可能因为我们不愿承认死亡的存在，所以我们中的很多人宁可无视般走过，也不愿与丧亲之人交谈。

在北美，甚至有活动推行着一种观念，声称如果我们足够努力积极地思考，就能获得永生。亚利桑那州的“阿尔科”等公司提供冷冻保存遗体服务，这样当未来技术发展到使之成为可能时，人就可以复生。死亡令人无法接受，我们甚至想方设法延续那些已经毫无生活质量可言的人的生命。就在前几年，英国出现了三起引发关注的案例：陷入极度昏迷的婴儿的家长不顾医生的建议，执意要让孩子以这种状态维持生命。家长们发起了一项运动，每次请愿都赢得大量公众的支持，有一次，在任的美国总统甚至出面向教皇求情。

我们不妨回顾历史，看看这类事情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在19世纪的欧洲和北美，一个家庭中至少有一个孩子夭折还是相当普遍的情况，而且，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当时的孕妇在妊娠过程中自杀的概率高达1/7。但这并不能说明当时的人更容易接受亲人的死亡。我们知道，维多利亚女王为她挚爱的阿尔伯特亲王服丧40年。还有，美索不达米亚人相信死于腹中的孩子将永远在天堂玩耍，这种观念显然是想让孩子的父母得到些许安慰。死亡无处不在，而且堂而皇之。哪怕我们不接受死亡，也必须承认它的存在，彼此分担它带来的痛苦。人们之所以聚集在临终之床的周围，是因为死亡是生命中永恒存在的一部分。

英国政府曾在网上公布了一组国家档案，那是逝世的维多利亚女王躺在床上的照片，时人评论说“相当令人震撼”。照片中，逝去的女王双目紧闭，躺在一张铺着白色织物、装饰着鲜花的床上，她挚爱的丈夫的肖像悬挂在她的头顶上方。这张照片，以及在女王死后完成的那幅画像，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称得上令人毛骨悚然，然而在当时，无论是照片还是画像，对人们来说都没有那么大的冲击力。长期以来，在欧洲流行的做法是，当妻子去世时，委托画家画下全家人围在临终之床前的场景。然而这种画在现在看来却是离经叛道的。西方艺术界最后一张关于某人在临终之床上的照片可能来自安迪·沃霍尔的超级明星，于1974年死于淋巴瘤的变性者坎蒂·妲玲（Candy Darling）。在这张照片中，她化着玛丽莲·梦露式的浓妆，年轻的手臂诱惑地举过头顶，仰躺在一张铺着白床单、鲜花环绕的床上。这种临终之时的形象至今仍有争议，也许我们离维多利亚时代越远，争议就越大。

即使按照维多利亚时代的标准来看，维多利亚女王的行为也有些极端：阿尔伯特亲王去世后，她那一身黑袍，不像传统那样只穿一年，而是穿了整整40年。亲王去世后，她从未让别人动过他的卧室：他最后用过的玻璃杯一直放在床头桌上，他的交易日记和钢笔也依然按照他最后一次记录时那样打开着。女王还命人每天都把鲜花送到他的房间里。人们并不觉得这令人不安，或者认为这是精神错乱的表现。他们称赞女王的真挚深情。

然而，这样与死者的定期沟通，无论是维多利亚仪式化地送鲜花到阿尔伯特床边，还是沦为殖民地之前的西非的儿子要为去世的父亲提供自己当天的第一口食物，都在挑战着我们的承受能力。这些行为会让人觉得过火、不舒服，有时甚至会彻底令人反感。例如，当我们观察现代印度尼西亚托拉查人（Torajas）的做法时就会感到不适。我们发现这个民族信奉传统的泛灵论，其中也有些人受到外来文化影响而信奉伊斯兰教或基督教。托拉查人把对现代西方社会的死亡禁忌的挑战推向了极限—他们把死去的亲人放在家里，有时一放就是几年，直到他们赚到的钱足够办一场体面奢侈的葬礼。尸体被放在前厅中一张床上敞开的棺材里，就那样慢慢干枯，被人像对待病人而非死人那样照顾，每天都能“享用”食物、香烟和咖啡。下葬后，尸体也不会就此安宁，人们每隔三年就会举办特殊仪式，把尸体挖出来清洗一番，再重新埋进坟墓里。对托拉查人来说，这种行为再正常不过，而且十分令人感到安慰。（92）

然而，在现代西方，我们很多人从来没有见过尸体，甚至一想起会看到尸体就感到厌恶。2016年，歌手大卫·鲍伊出演了他的遗作

《拉撒路》（*Lazarus*）的音乐视频。视频中，垂死的鲍伊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伸手去拿一个相机。这段视频在网上惨遭一片恶评，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导演后来只能辩解说这段视频“与鲍伊生病无关”，强调他被确诊为绝症晚期是在拍摄之后的事情。如今，人们对临终之床的刻画只出现在虚构作品中了。

无论是最好的还是最烂的恐怖电影中都有对临终之床的表现。由于这对现在的西方主流社会而言是一种禁忌，所以这类电影总是被归为限制级，人们认为它们不入流、离经叛道，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以这种场景为特色的恐怖电影，有被称为“史上最恐怖的恐怖片”的《驱魔人》（*The Exorcist*，1973年），其中最糟糕的场景是呕吐的特写、恶魔附身以及在床上扭头的女孩；比较差的低成本电影，包括《死亡之床：食人床》（*Death Bed: The Bed That Eats*，1977年），在这部电影中，恶魔创造了一张床以引诱他爱上的女孩；描述床下怪物的电影《床下》（*Under the Bed*，2012年），它以床下的杀人怪物为卖点，随后又拍了第二、第三部。此外，《当你熟睡》（*Sleep Tight*，2011年）和《死亡之床》（*Death Bed*，2002年）这两部电影同样能激发我们对死亡、睡眠和床的恐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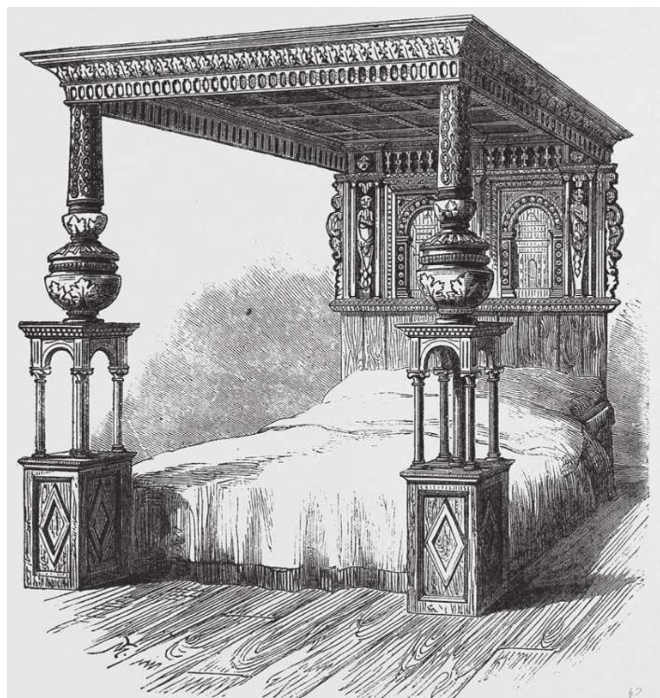
我们是怎么用恐怖片吓自己的？我们明明已经在对抗死亡的路上走了很远。医院的病床配有消过毒的床单和隔帘，它是挽救生命的地方，也是我们中的一半人将要死去的地方，尽管许多人肯定希望自己能死在别处。也许这会是一种宣泄和帮助，能呼吁人们恢复传统，聚集到临终之床周围，宽恕一切，做最后的告别。然后，我们把死者安放在床上，让在场的人都能看到并接受这个事实。葬礼举行，鼓号响起，亲人们捶胸顿足，朋友间彼此安慰，盛大的宴会开场。人类首先是一种善于交际的动物。

第六章

陌生的床伴

来自德意志中部的安哈尔特-科滕（Anhalt-Köthen）公国的路德维希王子是个游遍英国的普通旅行者，他唯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把自己的日记写成了令人厌烦的诗歌体。1596年，他曾留宿伦敦北部赫特福德郡韦尔小镇的白鹿旅店（the White Hart Inn）。韦尔是中世纪的朝圣者和旅行者的主要歇脚点，当地旅店为了各自的生意激烈竞争。为了吸引冒险的游客，其中一位旅店店主，很可能就是白鹿旅店老板本人，突然冒出了个绝妙的想法：定制一张四柱床。他称之为“巨床”（the Great Bed），并对外宣传说这张床能同时睡下12个旅行者。路德维希王子对这张大床的尺寸感到惊奇，成为第一个为这家飞快蹿红的旅店留下文字记载的住客：“它可以让4对夫妇并排且舒适地躺在一起，却避免了彼此触碰的尴尬。”（93）

这张巨床是荷兰建筑师、画家、工程师和花园设计师汉斯·福德曼·德·弗里斯（Hans Vredeman de Vries）设计的，大小约为现代双人床的两倍，长宽均超过3米，高2.5米，重约640千克。当地的工匠用橡木做了40个部件，组合成了这张床，再把几根木头粘在一起，制成巨大的床柱。他们在床上雕刻了复杂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图案，排列在最初色彩鲜艳的嵌板上，可如今颜色几乎都已剥落光了。这张床一经制成，立即受到了游客的欢迎，部分人是出于好奇，部分人是因为有个作家把它形容为“欢愉之床”。有些游客在床上乱刻自己的名字缩写，或者用印泥在床柱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韦尔的“巨床”，展出于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这张床的名气如此之大，以至于出现在了莎士比亚的名剧《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1602年）中。在剧中，托比·培尔契爵士告诉安德鲁·埃古契克爵士，他要给奥西诺公爵的侍童西萨里奥下一封决斗书，但这封书信里谎话连篇：“在纸上写满谎言，尽管你的纸大得可以用来铺满英格兰韦尔的那张床。”（94）本·琼森在1609年创作的戏剧《沉默的女人》（*The Silent Woman*）中也提到了这张床。一个世纪后，乔治·法夸尔在《征兵官》（*The Recruiting Officer*，1706年）中提到了某张床，说它“比韦尔的巨床还要大上一半”。这种文学中的引喻一直延续到了现代，2001年，安德鲁·莫辛（Andrew Motion）在诗中写道，这张巨床“把睡在床上的人，像飓风席卷树叶一般抖落出去（95）”。

一些慕名而来的住客显然是为了恶作剧。据1765年7月4日的《伦敦纪事报》（*The London Chronicle*）刊载（毫无疑问是杜撰的）：1689年，有26个屠夫和他们的妻子，共计52人，在这张床上共度了一夜。韦尔的骄傲和喜悦成了对公众不必要的放纵言行的隐喻。1856年，刚担任圣职、自命不凡的布里斯托尔主教坐在一张教堂长椅上。那张长椅精雕细刻、配有篷盖，看上去就像一张四柱床。人

们不由得把这长椅与那张“韦尔的巨床”进行了讽刺性的比较。

作为人们持久好奇心的象征，这张巨床围绕着韦尔，从一家旅馆转移到另一家旅馆，直到19世纪末，它才成为附近的霍德斯顿—一个深受铁路旅客欢迎的周末旅游胜地的固定“景点”。1931年，它差一点儿就去了美国，但是伦敦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以4000英镑的价格买下了它。这是一次成功的收购，因为这张床成了这座博物馆最受欢迎的展品之一。从此它一直被收藏在那里，除了2012年，由英国彩票委员会出资229200英镑，让它被转移进韦尔的小型博物馆里展出一年。那些负责人用了6天才把这张床拆开，又花了9天才把它运送到目的地。

据知，最后一个在这张大床上待过的人是女演员伊丽莎白·赫莉（Elizabeth Hurley）。2015年，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鸡尾酒会上，她跨过护栏，在“巨床”上摆出一副“诱惑”的姿势。警报立刻响起，接着就有人“护送”她离开了博物馆。英国的街头小报几乎为此疯狂。当然，这件事隐含的意思是，“为如此多的人专门设计的床只能表达出情色含义”。尽管一些曾睡在这张床上的人承认，它确实有一点儿情色意味，但也有很多人不敢苟同。在柏拉图式的社交中与人分享一张床曾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观念，几乎每个可能存在的群体在过去的某个时间点都有共睡一张床的经历：家人、朋友、主仆，还有陌生人。有时性元素也会参与其中，但这种安排往往是出于实际考虑的结果：床位的成本、在没有电的时代御寒的必要性，以及床伴提供的安全感。

旅途中的床伴

“韦尔的巨床”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因为它的尺寸（大床是财富和奢侈的象征），而不是因为与陌生人同床的行为。夜宿旅店的旅行者经常和不认识的人同床共枕。在亚洲和其他地方，特别是在蒙古国的农村，这种社交睡眠很受欢迎，而且延续至今。

直到20世纪，中国和蒙古国的炕，这种铺有席子的可加热的砖石平台在路边的旅店中还是非常常见的。炕的最早形式出现于公元前5000年左右，那时人们在睡前会燃起火堆，加热黏土地面。早在公元前4世纪，人们就开始使用更加复杂的炕了。加热这种炕靠的是相邻房间里烹饪用的炉火或是地板下的火炉。一张典型的炕面积会占房间的三分之一，甚至是房间的一半，其温度可以维持一整晚。炕不仅用来睡觉，还用于吃饭和社交。后来，很多炕附带了隔栏，上层社会的人有时候也会分开睡觉。而在今天，夜间飞行可能是西方旅行者能够

例行公事般地睡在陌生人旁边的唯一机会。出门在外得遵守某些潜规则般的社交礼仪，比如别越过自己座位的扶手，不要碰到别人，还有保持安静。这些规则与中世纪时一本法国人专为讥讽英国游客而编撰的书中提到的差不多，这本书的内容还包括“你把床单和被子都拉走了”“你除了胡乱折腾什么都不会”“你是个有病的床伴”等对陌生床伴的抱怨和指责。（96）古代的炕和现代的飞机座席一样，能在夜间提供的睡眠质量取决于旅客的财力大小。在条件差一些的小旅店里，所谓的“床”可能只是一条用绳子水平悬到齐胸高的简陋长木凳。住店的人必须一起挤坐在长凳上，把胳膊吊到绳子上，趴下身子低着头睡觉。在过去那些诸如朝圣之类的热门活动中，旅店床位总是供不应求，这时候富人照样占据优势。如果某个旅行者财力充足，他就可以把任何人赶下床，不管那人有多聪明，多神圣，病得多厉害或者是不是孕妇。玛丽和约瑟夫带着他们的孩子不得不挤在旅馆的马厩中过夜的故事是出了名的，和他们一起的还有一大群游客，那些人大概也不得不在那里睡觉。

基督教艺术揭示了我们对分享一张床的看法和早期观点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对为耶稣送来礼物的东方三博士的形象刻画中体现得尤其明显。据《马太福音》记载，三位博士做了一个梦，梦到上帝警告他们不要信任希律王。“东方三博士的梦”是中世纪晚期艺术中最受欢迎的形象之一，三位博士总是一起挤在床上，有时赤身裸体，但总是戴着他们的头冠。

这些旅行中的男人睡在一起的行为与性的话题毫无关系。在1851年出版的小说《白鲸记》（*Moby-Dick*）中，赫尔曼·梅尔维尔记述了年轻水手以实玛丽被迫和“首席鱼叉手”在旅馆里共睡一张床的桥段。“有足够的空间让两个人在床上折腾，这是一张十足的大床。”旅馆老板这样保证。但是，以实玛丽在等待鱼叉手到来时无法入睡，抱怨他的床垫里肯定塞满了玉米芯或者碎陶片。最后，那个叫魁魁格的男人终于来了：“天哪！这看上去像什么呀！这么一张脸！……是的，正如我所想的那样，他是个糟糕的床伴，他和人打架。”然而，他的床伴在被要求分享床铺时拿出了烟斗，转身侧躺着，好像在说：“我不会碰你的腿一下。”以实玛丽好不容易才睡着，第二天醒过来时，发现魁魁格的双手正搂着他，他感到“一生中从没有睡得那么香甜过（97）”。

当法官和律师们与亚伯拉罕·林肯一起开设巡回法院时，他们常常两人睡一张床，8个人睡一个房间。一些评论家注意到，多年来林肯一直跟约书亚·斯皮德（Joshua Speed）分享他的床。有些人认为，在当时“许可”这种睡眠安排的情况下，林肯只是享受与斯皮德之间亲密

的柏拉图式关系。他不大可能每天晚上都纵情狂欢。在过去，旅行者们不以性为目的而同睡一张床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0世纪初，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的母亲在北卡罗来纳州开的寄宿公寓每晚总是很早就人满为患，四处旅行的推销员早已习惯与别人挤在一张床上。

这样的睡眠安排并不总是顺利的。美国国父约翰·亚当斯在自传中详细叙述了他与本杰明·富兰克林在旅途中共度的一个灾难性的夜晚。那是1776年9月，在13个美洲殖民地宣布脱离英国独立后不久。这两个人是大陆国会派出的代表团成员，正要去参加革命战争的议和会谈。途中，他们在新泽西的一家旅馆住了一晚。因为没办法两人各自拥有一个房间，他们只好“在一间比床大不了多少，没有烟囱，只有一扇小窗户”的房间里共睡一张床。（98）正是这“一扇小窗户”让他们无所适从，因为亚当斯“体弱多病，害怕晚上的寒气”，所以马上去关窗户。但富兰克林想透透气，就对亚当斯一通演讲，宣扬他的“感冒理论”，还说如果不开窗透气他就会窒息。最后，亚当斯赢得了“窗户之战”，但那场关乎和平的会谈却以失败告终。

家庭安排

琼·利德洛夫（Jean Liedloff）以她在1975年出版的畅销书《富足的人生原动力：找回失落的爱与幸福》（*The Continuum Concept: In Search of Happiness Lost*）而闻名。早年，她迷恋泰山和丛林，后来又对亚马孙地区的儿童保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去过南美洲5次，并与委内瑞拉雨林中的印第安土著叶夸纳人（Yequana）住在一起。尽管她详细地介绍了他们生活中的许多方面，但她提供的关于成人睡眠习惯的唯一一则信息却来自一个括号里面的附加声明：叶夸纳人“[有] 在半夜，大家都睡着时讲笑话的习惯。虽然有些人在大声打鼾，但也会立即醒来，大笑，然后在几秒钟内再次睡着，又开始打鼾……他们不觉得醒着比睡着更难受，他们醒来时已经彻底警觉，就像所有印第安人能同时听到远处一群野猪的嚎叫声一样。尽管他们是睡着的，而我醒着，可我听着周围丛林里的声音，却什么也没注意到（99）”。在丛林里，在荒野里，在寒冷中，或者在没有电和灯的地方与时代，和自己的兄弟同伴在一起睡觉是一种既安全又温暖，还很实用的方式。

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家约翰·怀廷（John Whiting）观察到，有三分之二经他考察过的社会群体中的母亲会与婴儿一起睡觉，尽管这些不同的社会成员各自的睡眠习惯之间也有很大差异。在印度的贫民区，一家老小有可能都睡在同一个房间的地板上。在西喀麦隆的恩索人（Nso）农家里，母亲会睡在床上，让所有孩子都排在她身后，

最小的孩子离她最近。她总是面对着门，保护孩子们不受可能会伤害他们或把他们带走的恶灵的侵犯，而父亲的床在其他的地方。（100）怀廷还发现，气候和床伴之间存在着常识一般的关联。单人床更多出现在温暖的环境中，例如亚马孙原住民睡在单独的吊床上，而在冬季气温低于10℃的地区，整个家庭的成员共用床铺的情况更为常见。

在生活空间缺少分隔的地方，例如，在欧洲青铜时代的圆形房屋或铁器时代的长屋里，人们不可避免地睡在一起。如今，居住在无墙帐篷或蒙古包中的人，如蒙古、中亚、伊朗、土耳其、西非和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民族，也还保留着这样的睡眠习惯。（101）有一种生活方式，最初是由公元前800年左右的斯基泰人（Scythian）流传下来的，他们跟随自己的部落四处漂泊，沿途支起帐篷。他们使用的床各不相同，但相较于正式的家具而言，大多数人更喜欢编织的、直接铺在地面上的被褥和垫子。垫子在不用的时候更易于运输和储存，而需要使用时只要把它们排在一起，或者随便铺在地上就行了。只有新婚夫妇才会为自己设置一道假墙，或是用一条挂在绳子上的布帘来保护一些隐私。但等到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以后，这对夫妇就会和其他家庭成员睡在一起：祖父母带着孙子孙女睡，父亲带孩子一起睡，而母亲则陪着小婴儿睡。

有句前现代的意大利谚语建议睡眠者："在一张狭小的床上，要让自己占中间。"英语中有个短语，"像猪一样过"（to pig），意思是"与一个或多个床伴一起睡觉"。而"床夫"（faggots）是一句英国东部的俚语，指"不守规矩的床伴"，这个词最初的含义是一种传统地方菜，做法是把大块的肉简单地放到汤里炖。根据怀廷对土著民族的研究，欧洲的大家庭往往会根据年龄和性别来划分床上的位置。女儿们可能睡在母亲旁边，儿子们睡在父亲身边；大女儿睡在离门最远的靠墙处，客人和陌生人都会被安排睡在床边。大家共用床上用品，虽然枕头一般是女性专用的，用枕头的男人都是娘娘腔。有个16世纪的评论员写到，是男人就应该用"好圆木"当枕头。穷人只能简单地在地上铺上干草，再铺上毯子，一起躺在上面睡觉。

在中世纪的庄园里，也许只有领主和领主夫人会回自己的房间里睡，而其他工作人员通常会一起睡在大厅里。大多数仆人睡在简陋的小床上，其中大多其实都是木箱，有些靠短床腿支撑，便于在各个房间之间搬动。其他家庭成员、仆人和来访者，都可以根据需要使用这些床。仆人、兄弟、姐妹和来访者通常都睡在同一个房间里，有时分床，有时同床。这种灵活的睡眠安排一直延续到18世纪，在那个时代留下来的一张库存清单上，不仅列有"轮床"，还有"带书架的床架""折叠式床架""书桌床"和"抽屉式床架"等。（102）1756年，艾萨克·韦尔

（Isaac Ware）在其关于建筑学的书中提到，对于伦敦的房屋来说，这些床架既方便又实用，因为无论客人何时来访，都可以轻易把它们组装起来。

枕边话

人类在睡眠和黑暗中的脆弱本性，意味着同床共枕为人们提供了违反社会规范的机会。（103）主人或女主人与他们的仆人之间的等级关系可能会因此松动。1836年，陷入困境的作家艾萨克·海勒（Isaac Heller）因在纽约用斧头杀害亲人而被公开处以绞刑。他在自己的书《艾萨克·海勒的人生和忏悔》（*The Life and Confession of Isaac Heller*）中言无不尽，自述时常在晚上感到惶恐不安，必须睡在自己农场的黑人劳工身边以寻求安全感。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可能会利用黑夜来表达自己，正如1768年康涅狄格州的约翰·艾略特在日记中的抱怨，他回忆起妻子的“枕边呵斥”，描述她是如何“把前两任妻子、前两个孩子的陈年旧账一翻再翻”，让他们两个人都彻夜难眠的。（104）

同床共枕还允许某些禁忌的性关系的发生，包括未婚的仆人之间、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关系等。女主人有时会和女仆同睡一张床，以保护她们免受男性家庭成员不必要的骚扰。无论主人在床上做什么，仆人必须睡在主人的床腿旁边。16世纪的美国新英格兰人阿比盖尔·威利如果不想接受丈夫求欢，就会让孩子挤在两人的中间。

然而，茫茫黑夜也能促成深厚的亲密关系。一些欧洲地区允许未婚的少男少女一起睡觉，以此来判断彼此的性格是否合适。在这种被称为“捆绑法”（bundling）的方法中，未婚男女共睡的床中间会放置一块隔板，绝对不允许性行为的发生。如今欧洲一些极端保守团体仍在实践这种做法，他们允许夫妇隔离起来同床而睡，但要求他们和衣而眠，身体不能接触，并且彻夜长谈。

和别人同床共枕有助于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并在天黑后带来无拘无束地聊天的乐趣。塞缪尔·佩皮斯非常热衷于这项活动—他不仅喜欢和女人一起睡，还喜欢和纯精神交流的友人一起睡。他的日记经常以“接着，上床睡觉”作结尾，而且他会在日记中根据床伴的谈话技巧和行为举止为他们排名。他最喜欢的床伴有商人托马斯·希尔，因为他能“对男人一生中遇到的大部分事情高谈阔论”，还有约翰·布里斯班，“一个头脑清醒、知识渊博的学者”，以及“快乐的”克里德先生，因为他提供了“令人满意的陪伴”。（105）

在许多社会中，同床共眠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日本人称之为“陪睡”（添い寝）。他们重视一起睡觉所带来的温暖、舒适的体验和安全感（安心感）。陪睡行为在有未成年孩子的家庭中特别常见。日语中的“安心感”被贴切地形容为一种安全的亲密关系[（106）]，在婴儿与父母同睡的家庭中尤为常见。观察、凝视、识别熟悉的面孔—这些都增强了婴儿的安全感，让他们能够睡得更好。被陪伴的婴儿在彼此交融中接受看护者的触摸、哺乳与呼吸，这种状态甚至会一直持续到大家都醒来。

人们认为日式床垫比传统高于地面的床适合陪睡。它有这样几个优点：随着孩子逐年长大，可以提供更多的睡眠空间；比床更舒适；当家庭人口增加时更容易添置。日式床垫可以让人感受到家庭中的和睦与温情，而传统的双人床是有界限的，具有排他性，是为特定的关系而专门设计的。在白天，日式床垫可以折叠起来，放在任何地方，也不需要为不同的家庭成员或客人提供单独的房间。“陪睡”是一种相互依赖的观念，远远超出了床或日式床垫的作用范围。日下部金兵卫的摄影作品《卧室里的姑娘们》约摄于1880年，画面中的两个日本姑娘可能是亲属关系，也可能不是。她们盖着绣花被一起睡在日式床垫上，床边放着一本书，彩绘屏风在她们身后展开。两个姑娘闭着眼睛，面对镜头躺着，幸福地满足于彼此的陪伴。



摄影作品《卧室里的姑娘们》（*Girls in Bed Room*），两个日本姑娘睡在一张垫子上。摄影：日下部金兵卫（Kusakabe Kimbei）

陪婴儿睡

然而，陪伴婴儿睡觉可能又是另一回事了，甚至可能会是一出悲剧。“当孩子睡着时/在夜里，我会夺取他的呼吸。”在本·琼森1609年出版的《女王的面具》（*The Masque of Queenes*）一书中，一个女巫如此说道。（107）

“婴儿猝死综合征”，简称SIDS（旧称为“Cot Death”，即婴儿猝死），是我们对1岁以下儿童出于不明原因而突然死亡的症状的命名，这种死亡大多发生在午夜到上午9点之间。过去，睡着的父母无意间压在婴儿身上使其窒息，是造成这种死亡的主要原因。《旧约全书》中有一段话谈及：“这妇人的孩子死在夜里，因为她睡着时压到了他。”古希腊以弗所的医生索兰纳斯说，为了避免婴儿窒息，婴儿不应与照料他们的人一起睡，而是应当睡在母亲或奶妈床边的婴儿床上。（108）事实上，导致“婴儿猝死综合征”的原因可能涉及许多因素，包括感染、遗传疾病、接触烟草的烟雾以及被褥裹缠过紧导致窒息等—尽管事实证明，让婴儿仰面躺在床上可降低死亡率，然而，在我们为试图防范“婴儿猝死综合征”而做的努力中，“床”所扮演的角色，要么是最凶恶的恶魔，要么是最伟大的救世主，这取决于人们和婴儿同床时在床上的位置。

美国儿科学会建议“分床不分房”，指出同床而睡会使“婴儿猝死综合征”的风险增加50%。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的报告称，和不到三个月的哺乳期婴儿同睡一张床会使“婴儿猝死综合征”的风险提高5倍，即使他们的父母不吸烟、不饮酒也不服用任何药物。官方的信息很清楚：和孩子同床会杀死你的孩子。（109）

与此相反，生物人类学家詹姆斯·麦肯纳（James McKenna）对母子同床而睡的情况进行了调查，认为这不仅是安全的，而且也是出于“生物必要性”的行为，因为这有益于儿童和母亲的健康。他引用了三项流行病学研究，这些研究表明，同床而睡能使婴儿死亡率降低一半。（110）如今，大多数非西方世界的人都认为，母亲的床对新生儿而言是最好的睡眠场所：它提供了舒适的环境，也更方便母亲给孩子喂食，而且正如佩皮斯所知道的那样，共眠可以成为加深亲情的纽带。然而，对非西方社会的母亲来说，即使同眠也仍未导致婴儿死亡率降低，可难道这就是不与孩子同床而眠的理由吗？较高的死亡率可能与贫穷有关，而不一定是同床导致的。他们说，唯一公平的比较是，在富裕且高度工业化的日本，几乎所有婴儿都与他们的父母同床而睡，通常男孩会保持这种睡眠状态直到10岁。而日本是世界上婴儿死亡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围绕床的辩论没完没了，婴儿们却都睡得很好。尽管如此，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床都是为婴儿设计的：吊床、吊篮、篮筐和婴儿

床。这些床可以移动到看护人身边，以便他们在白天照看昏昏沉睡的孩子。公元79年的夏天，当维苏威火山喷发，掩埋了富有的罗马海滨小镇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时，一个婴儿就被留在了这样一个摇篮里。他是在一所房子的客厅里被发现的，如鸟类般细小的骨架躺在一个似乎塞满了树叶的垫子上。欧洲人的插图手稿展示了摇篮在13世纪掀起的热潮。那时的婴儿总是会被裹在布带里，双臂放在身体两侧，有时还会被绑在摇篮里。这样的捆绑起到了预防佝偻病（或者只是人们相信会起到预防作用）与防止婴儿哭泣的双重作用。只要伸出一只脚，任何一个家庭成员都可以一边忙着手头的工作，一边轻松地晃动摇篮。上流社会的家庭有时甚至会雇用专业摇篮手或保姆，专门为自家的孩子摇摇篮。（111）

王室的婴儿通常有两个摇篮，一个是白天用的，另一个较小，是晚上用的，无论哪个摇篮都用金银饰品和鲜艳的纺织品装饰着。大多数摇篮的两侧都很结实，也许还配有小小的顶篷或摇篮罩，可以用毯子或布帘遮起来，非常适于保暖，也可以隔绝外界的有害空气。摇篮两侧的插槽便于人们把它从一个房间移动到另一个房间。

到18世纪末，因为人们对四肢自由活动以及呼吸新鲜空气越发推崇，襁褓和摇篮已经成为过去。19世纪初，固定的婴儿床（在英国称为“cot”，即童床）开始取代摇篮，这在富裕家庭中更为常见。这种婴儿床的床侧被设计得很高，而且一般都配有喷涂了油漆的金属板条。床的一侧往往可以放低，以便人们把孩子从他的小睡笼中抱起来。婴儿床的出现和婴儿每天被放到托儿所里与父母分隔一整天的新模式是紧密结合的—这样他们也得被分隔一整晚了。虽然维多利亚时代中产家庭的孩子不再和父母同床，但他们依然会和其他孩子一起睡。后来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道德观：较为年长的孩子只能和同性兄弟姐妹睡觉。这代表，哪怕再小的房子也要隔出三间卧室：一间给父母，一间给女孩，一间给男孩。

在历史上，这种分床而眠的行为其实是非常现代的做法，甚至在18世纪的英国，大多数房间的功能都随着时段的改变而变化。虽然我们有时会发现，古代的床大多是用布帘或帷幔围起来的，但这不一定是出于保护隐私，也不一定是为了防范潜在的床伴；正相反，床帷发挥了其他实际的作用，包括保暖以及防止蚊虫叮咬等。

斯卡拉布雷那些史前的床周围的柱子上可能曾有可拆卸的篷盖，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在苏格兰的严冬中，人们必须想法保暖。与此同时，人们在埃及王后海特菲莉斯一世（Hetepheres I）的陵墓中发现了装饰奢华的床，年代大约是公元前2580—前2575年。它被巨大的顶篷包围着，也许这种设计就是为了抵御蚊虫。这顶顶篷的骨架是用

镀金木杆组成的可拆卸的长方形框架，上面可能原本搭着一块亚麻布做蚊帐。无需使用的时候，蚊帐会被存放在用不太贵重的宝石装饰的盒子里。

几个世纪后，中国画家顾恺之在《女史箴图》里描绘了一张气派的中国式的华盖床：一张矗立着四根床柱的床，床柱上铺搭的织物可能用于阻挡蚊虫。就像埃及王后的床一样，帷幔围绕着这张中国床，就像在房间里又套了一个房间。中国古代的床中有些足够轻便，可以搬出门外，这时，充当床幔的丝织品就足以让主人炫耀，还可以保护睡眠者免受日晒。

臭虫和其他床上动物

有着帷幔的床（有时候会被安装在墙上）通常也有一个额外的用途：允许人类和其他动物共享房间。只要人类生活在房子里，就会和身边的动物共享空间，但我们很少思考其中的含义。18世纪80年代，一个到过赫布里底群岛（Hebrides）的游客称，尽管当地人定期从房子里收集奶牛的尿液，但每年只会清理一次粪便。自古以来，王家的宠物狗一直出现在王宫内外，至今仍以王宫为家。中世纪的骑士们的雕像躺在大教堂里，他们的脚边总是趴着一条忠诚的猎犬。13世纪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一是位和蔼可亲的君主，他拥有一条备受宠爱的格雷伊猎犬，名叫“米斯托丁”。它不仅有自己的床，还有为它特制的防感冒睡衣。17世纪，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钟爱猎犬，而他的后代查理二世所养的西班牙猎犬也是名闻遐迩。今天，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身边也有几条著名的柯基，它们可不是睡在女王的床上，而是住在白金汉宫一间专门修建的犬屋里。

18世纪的凡尔赛宫遍地是狗。猎犬被关在外面的狗舍里，但其他大部分狗都和主人同睡一张床，或者睡在为它们特制的垫子上。拿破仑的第一任妻子约瑟芬皇后晚上睡觉时从不远离她的狗。那些狗会睡在羊绒披肩或昂贵的地毯上。为了掩盖它们排泄物的气味，她会在床的周围撒满玫瑰花瓣。

关于干净的标准，过去的人有着不同的看法。穆斯林被要求用流动的水进行常规的仪式性沐浴，而不是在被认为不洁的静水中坐浴。相比之下，17世纪末之前，西方的上层阶级基本就不怎么洗澡。精英阶层家庭的孩子可能要到两三岁才能洗上人生中的第一次澡。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生于1601年，据报告称，根据精心制定并经宫廷御医批准的特殊王室日程，他在7岁生日前不久才洗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澡。当时的人认为体液具有保护作用，而用过多的水洗澡才是有害的。

但是，大约在15世纪，出于卫生和道德的考量，一些欧洲批评家开始谴责多人同睡一床的行为。虱子可能是我们最怕的动物“床伴”，因为它们代表着沉重的社交耻辱。虱子是一种很难解决的日常问题，唯一的办法是定期梳头、洗头并清洁胡须。人们精心设计出的细齿梳可以清除虱子卵及成虫，一时间成为必不可少的个人用品。当考古学家打捞出沉没的英国都铎时代战舰“玛丽罗斯号”（the Mary Rose）时，他们发现船上每个溺水而死的水手身上竟然都带着一把梳子。

温带臭虫（Cimex lectularius），这种常见的臭虫以吸食人类血液为生。（112）它的分类名称由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创造，意思是“床虱”。臭虫可能起源于中东洞穴中的蝙蝠身上的寄生虫，当人类开始在那里定居时，它们的寄生宿主也发生了变化。根据化石推测，臭虫问题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以前，但随着城市范围的扩大和人口的日益密集，它们才慢慢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领地。臭虫最早被发现于阿蒙霍特普四世的首都阿玛尔纳（El-Amarna），位于底比斯的下游，可追溯到公元前14世纪。早在公元前400年，臭虫就已经困扰着希腊人；而在公元8世纪的唐朝，中国文人也对臭虫抱有诸多怨言。

各种关于臭虫的神话层出不穷。老普林尼在发表于公元77年左右的《自然史》中表示臭虫有药用价值，而且这种观念延续了好几百年。到了18世纪，法国医生让-艾蒂安·盖塔尔（Jean-Étienne Guettard）建议用臭虫治疗癔病。而林奈宣称臭虫能治愈耳痛。

科学最终证明臭虫没有任何药用价值，而千百年来，如何能彻底消灭它们一直困扰着睡觉的人。人们不断向它们喷洒各种各样的有毒物质等危险品。一些英国人常用的办法是彻底清洗布料，或者把布浸泡在碱液（用灰烬和尿液混合制成的溶液）里，但这些都不太奏效。另一些人选择在房间里铺满桤木叶以及涂了胶水的面包片，以此作为陷阱捕杀臭虫。1746年的一则广告建议把“松节油”涂在床架上以及臭虫繁殖的地方。18世纪的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更喜欢把晒干的菜豆叶当作驱虫剂放在床下。熏蒸、火烧、烟熏甚至使用喷灯、硫黄或者用力擦洗，这些方法都对臭虫毫无作用。直到1939年“滴滴涕”（DDT）杀虫剂问世，臭虫才开始销声匿迹。

“滴滴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广泛使用，效果极好，因此在“婴儿潮”时期出生的孩子都没有被臭虫骚扰的经历。但后来人们发现，这种杀虫剂对动物，尤其是对鸟类危害很大，所以它于1972年被禁止使用。几十年之内，臭虫大军卷土重来。我们又拾起古老的方法来对付这种昆虫：扔掉沾了臭虫的床垫，洗干净亚麻布和衣服，一看到臭虫就把它们捏死之类的。但是，臭虫依然顽强难除，即使在最昂贵的

旅馆和住房里都能找到它们的踪影。臭虫是睡眠者的噩梦，消灭它们，仍然是一个复杂、肮脏、令人浑身发痒的过程。

有动物当床伴也不总是坏事。即使在今天，许多西方人仍会和宠物睡在一起，这种现象在集中供暖出现之前可能更为普遍。奥尔良公爵（路易十四的弟弟）的妻子，巴拉丁公主伊丽莎白·夏洛特曾说，只有她的6条小狗才能真正让她的床暖和起来。

“消失”的床伴

尽管人们同床而睡的行为由来已久，但到19世纪末，在欧美主流国家，这种现象正在逐渐减少。19世纪的美国医生威廉·惠蒂·霍尔（William Whitty Hall）不厌其烦地对人们进行从咳嗽到长寿等与健康问题相关的冗长说教，将共眠行为归为“动物（狼、猪和害虫毒兽）王国中最恶劣、最污秽的事”。他教导他的读者说，文明社会要分床而睡。然而，对许多西方社会以外的人来说，这种隐私概念仍然不是很重要。日语里甚至没有单独的词来表达“隐私”的含义，只能借用源自英语的外来词“プライバシ”（privacy）来表达。

然而，在现代西方，柏拉图式的共眠只发生在少数的非典型情况下，例如乘飞机、蹲监狱、露营或者参加长距离游艇比赛，还发生在寄宿学校、青年旅社以及睡衣派对等场合中。即便如此，人们也很少共睡一床。偶尔，很多人会在同一张床上睡觉，但绝不会在同一时间。一位南非朋友吉泽尔·肖赫（Gizelle Schoch）告诉我们说，她的许多朋友第一次到伦敦时不得不挤在一张床上睡觉：“这座城市物价太高，所以通常别无选择。我记得有一次，在一座仅有4张床的房子里最多挤下了19个人。不过，他们不是全部睡在一起，而是轮流睡在床上。”（113）电影制片人约翰·赫伯特（John Herbert）向我们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他在阿拉伯湾和北海拍摄时的经历，在那里，人们会在石油钻塔和补给船上睡“热床”（hot bed）。每张双层床上每24小时会有3个指定的睡眠者，每8小时轮换一次，这样人们永远不会同时睡在一张床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潜艇上的水手也经常轮流睡“热床”。而在进行必要的军事行动时，这种安排就更加常见了。

其他被迫共用床位的情况只有在人类遭受非人道待遇或忍受有辱人格的行为时才会发生，比如非洲奴隶被塞进殖民者的船舱里，或者人们被关进纳粹集中营里—被拘禁者睡在不低于三层的架子床上，每个床位上都要睡好几个人。

在2008年的电影《枕边人》（*Bedfellows*）中，女主角半夜接到

电话，发现睡在身边的不是她的丈夫，而是噩梦中的鬼怪。据说，这个桥段堪称电影史上最惊悚的两分半。这个片段的恐怖程度大概只有歌手坎耶·维斯特在2016年为歌曲《名人》（*Famous*）拍摄的音乐视频能与之相提并论。视频中出现了12个裸睡的名人形象，显然包括维斯特本人、小布什、金·卡戴珊和艾波·罗斯等。（114）所有人都躺在一张现代床上，一字排开。这样做造成的后果是令人不安的。其中传递出的信息很明确：在现代西方社会，“床伴”的概念对我们来说就是一场噩梦。

第七章

移动的床

君主们花费大量时间旅行。早在皇家专列、豪华轿车和私人飞机出现以前，他们就必须想方设法在臣民面前彰显自己的权势。这样做的风险可能很高，例如，许多人认为，作为一个持续的政治实体，古埃及是一个稳定而和平的王国。在这个平静的王国中，法老象征着秩序与混乱之间的平衡，让种种敌人陷入困境。

事实上，古埃及是一个充满冲突的世界，宫廷中各大派系相互竞争，分庭抗礼。这是一个由城镇、村庄以及强大的信仰之力培育出的一众相互竞争的神灵组成的王国。法老通过监控行政管理、宗教意识形态和军事力量平衡这种各方利益互相对立的场面。这些现实情况使君主和高级官员每天风尘仆仆地去往境内各地主持重大节日的仪式，虔诚地向拉神、阿蒙神和其他神灵献祭。庄严的王室成员脚步不停，船只将他们带往国土的边界。一些法老，如新王国统治者图特摩斯三世（公元前15世纪）和塞提一世（Sethy I，公元前13世纪初）都是雄心勃勃的征服者，另一些法老则满足于管理好他们继承的领土，或被迫抵抗侵略者。无论他们喜好如何，每一位法老都必须远离自己的宫殿，出现在公众面前，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卧室。然而，他们仍不会直接睡在地上，他们有可折叠的旅行床。

旅行床

考古人员在图坦卡蒙（死于公元前14世纪晚期）的陵墓中发现了已知最早的旅行床和三折床的实物。（115）两折床在更早的时代就有了，这并不稀奇，因为两折床更容易制作。图坦卡蒙的旅行床似乎是专门为他做的，折叠成Z字形。这张床似乎经历了反复的实验，因为工匠们在铰链附近钻了一些多出来的孔，却从来没有使用过它们。铜合金上的四条木制狮腿，和三张亚麻编织的垫子一起被固定在木框架上。这是一张精心制作的轻巧小床，研究人员西本直子（Naoko Nishimoto）将这种设计形容为“天生的诗意”。

平民的旅行要简单得多，而且旅行者往往是些流动的季节工人。他们是由劳工和士兵、船工和石工组成的无名军队，为各种公共项目的配套设施工作。他们中有些来自不同村庄的劳工队，在宁静的农耕

季节被征召建造金字塔，而其他人可能一生都在各种不同的工作之间奔波，在艰苦的条件下驯服地劳作。我们很难知道他们睡在哪里、是怎么睡的。开罗附近的吉萨金字塔需要无数工人才能建成，因此在这座伟大的历史丰碑以南，一座专为工人修筑的小镇静立在一堵高达10米的巨大石灰岩墙壁之后。埃及古物学者马克·莱纳（Mark Lehner）发现了一个面积广阔的城市遗址，里面包括作坊、面包房以及用作营房的综合设施。这个综合设施由4块睡觉用的平台组成，面向街道，由细细的木制廊柱支撑着轻型屋顶。综合设施中的每个平台可以容纳多达四五十个工人或警卫一个挨一个地挤着睡。（116）他们可能和衣而眠，或是把自己裹在毯子里。他们的行李很少，从村庄到工地总是一群人结伴而行，基本的生活用品都由工地提供。



图坦卡蒙法老的三折床

古埃及工人睡在地上。时至今日，世界各地数百万的流动工人和旅行者仍然睡在地上。他们对此没有什么异议，因为睡在地上只需要绒布、毯子或者自己的外套。荷马时代的英雄奥德修斯的儿子特勒马克斯拜访墨涅拉俄斯国王的宫殿时就被安顿在门廊里："海伦兴致勃勃地告诉侍女，在门廊的遮蔽处铺好床，让他们自己在床上铺上厚重的紫色铺盖，再铺一些毯子，厚厚的羊毛长袍，还得盖上暖和的被子。"奥德修斯在杀死佩内洛普的追求者之前也曾睡在自己宫殿的地板上："把生牛皮摊在地板上，在上面堆上绵羊毛，然后他舒服地躺了下来，欧律诺墨扔给他一条毯子。"（117）

20世纪的英国探险家威弗瑞·塞西格（Wilfred Thesiger）是个对传统有着神秘献身精神的旅行者。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偏远的地方度过，比如撒哈拉沙漠的提贝斯提山脉（Tibesti Mountains）和阿拉伯传说中的空白之地（Empty Quarter）。塞西格总是轻装旅

行。当他和伊拉克南部沼泽地的阿拉伯人一起生活时，他裹着毯子和外套睡在潮湿的地上，对周围蜂拥而至的昆虫毫不在意。在沙漠中，他感受到自己"与过去和谐相处"，有如在太空和寂静中穿梭，就像"人类在沙漠中旅行了无数世代"般信赖着自己的骆驼和自己的技能。塞西格还在中亚的山区中旅行过。1956年，他遇到了另一个著名的旅行者—艾瑞克·纽比（Eric Newby），以及纽比的一个朋友。他邀请他们与自己住在一起。在看到这两个人把充气床吹得涨起来时，他笨嘴笨舌地说："你们一定是一对同性恋。"（118）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跟着蒙古骆驼车队一起在欧亚大陆旅行。他惊叹于游牧民族对他们的牲口和看似单调的地貌上的生态环境的熟悉程度。除了驮运货物之外，骆驼还为牧人驮运食物和茶。拉铁摩尔后来习惯了在晚上随时拔营而走、吃手上有的任何东西、睡在"我可以躺下来的任何地方"。对穷人和无畏的旅行者来说，他们的床数千年间未曾改变。（119）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床都是一种笨重的家具，这意味着只有富人才可能拥有私人的便携床—无论是因为这种精巧的、可折叠的床代表着法老的荣耀，还是因为即使便携也需要仆人进行搬运。前现代的王室家庭中储存了大量的床，包括用于军事活动的折叠行军床以及用于外交场合的床（这种床的设计显然是为了让人看到并欣赏）。这些床可以折叠，但是它们可能具备精心设计的复杂结构，包括通常在普通床上才有的顶篷、帷幔和其他配件，因此它们也彰显着主人的富有。

著名的金缕地（Field of the Cloth of Gold），也许是可移动的睡眠场所的终极形式。这是一个精心搭建于加来以南的帐篷营地，专供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和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于1520年6月7日至24日进行的会晤使用。在自己的营地里，亨利修起了一座宫殿的复制品。它有砖筑的地基、帆布的装饰以及木结构的墙。两个君主都试图通过壮观的临时建筑、盛宴和比武来使对方相形见绌。帐篷、家具和王室的床都用丝绸和金线织成的织物装饰（"金缕"之名由此而来）。现场的会晤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外交竞赛，君主之间的竞争甚至延伸到了各自奢华的床铺上。（120）

虽然少有这种机会以炫耀王室级别的奢华，但许多富裕的人在旅行时都会带上他们那些精心设计的睡眠场所。英格兰北部斯托克波特的遗产服务公司拥有一张可以追溯到公元1600年左右的移动箱床。这张箱床十分奢侈，里面配有一套用于爬上床的楼梯、两个紧锁的假发盒和一对夫妻的两组雕像，表明这是一件结婚礼物。这样一张床的主人不需要和旅行中的陌生人，或者和他们携带的寄生虫同床共枕。日

记作家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回忆了他与另一个人在瑞士布夫雷（Le Bouveret）的旅馆中共享床铺的时光。由于他“深感疼痛而昏昏欲睡”，所以没有换床单，但他“很快就为自己的急躁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染上了天花（121）”。

流动的行军床

古代的士兵在行军作战时也会睡在地上，他们普遍使用皮革帐篷，装在架子上，用骡子驮运。这种帐篷可以在约2.96平方米的空间里容纳8名士兵休息。百夫长用的帐篷会更大些，他们也会把自己的帐篷当成作战室使用。军官的帐篷更大，甚至要用几头骡子来驮。罗马的要塞和驻防部队组织得更为严密。在兵营里，士兵们住在长长的住宿区里，这里又被分成许多小区域，一个小队共住一个区域，百夫长的帐篷占据住宿区的一端。每个小队中有8个人，每个住宿区里可以睡80个人，普通士兵睡的大概是简单的双层床，而军官的条件会更舒适一些。从恺撒时代（甚至更早）以来，容易打包的战地家具就成了高级军官的累赘之一。这样的辎重使军队不堪重负，导致18世纪和19世纪的军队根本无法快速行军。1858年，英国元帅柯林·坎贝尔（Colin Campbell）在印度殖民地叛乱后离开勒克瑙，据说那时运载他行李的列车长度超过30千米。据《泰晤士报》的威廉·霍华德·拉塞尔说，这位将军的行李包括“从四柱大床到帐篷床—各式的床”，还有足以填满一栋小房子的家具。这种拖泥带水的行动作风在战略规划上十分危险，这是英国人在19世纪末那场要求高机动性的布尔战争（the Boer War）中才学到的教训。



印度拉贾斯坦邦的老人坐在用椰壳纤维编制的“查波伊”上，这是一种有床腿的便携式床



在现代的博物馆中展出的1815年滑铁卢战役前夜拿破仑指挥总部的营地床和他的卧室兼书房

坎贝尔手下的士兵可能会睡在印度轻便床“查波伊”（charpoy）上面，这个词源于波斯语的“chihar-pai”，意为“4英尺”，早在印度兵变之前，他们就已经在使用这种床了。14世纪摩洛哥的旅行者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以极有说服力的语言夸赞“查波伊”说：“印度的床非常轻，一个人就可以携带，每个旅行者都有自己的床，奴隶甚至可以把它顶在头上走路。这种床有四条锥形床腿，床腿间有四根横杠，中间编织着丝绳或棉线。当你躺在床上时不需要任何床垫，因为这张床已经足够有弹性了。”（122）在19世纪末的殖民战争期间，锡克教士兵也把这种床带到了苏丹。

与印度士兵不同，大多数欧洲士兵都睡在地上。行军床只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才存在。乔治·华盛顿的行军装备包括帐篷、餐具和折叠床。他从位于纽约纽堡的指挥总部北上前往军事设施时，使用了一张带有可折叠金属框架和薄床垫的折叠床。而另一张保存在他的弗农山庄里的折叠床，可以用铰链巧妙地连接起来，便于运输。在滑铁卢战役的前夜，威灵顿公爵和拿破仑·波拿巴相距不到6千米，两人都睡在远远谈不上奢华的长榻上。那位“铁公爵”躺在后来被他的传记作者、朋友兼战友—乔治·罗伯特·格雷格（George Robert Gleig）形容为一张“没有床帏，被褪色的绿丝绸罩起来的露营床（123）”上。1852年，在肯特郡的沃尔默城堡里，威灵顿公爵就是躺在这张床上去世的。拿破仑皇帝在一张可折叠的行军床上度过了这场战役的前夜，那张床凭着设计巧妙的球窝式连接处，可沿着长和宽折叠起来。安装在车轮上的六条床腿支撑着床架，而床架上则用青铜钩和铁钩固定着一张薄薄的斜纹布床垫。需要搬运时，这张折叠床就装在一个结实的皮箱里。皇帝和他的高级军官都睡这种床，有的安了床帐，有的没安。拿破仑

非常喜欢这张床，就像威灵顿公爵一样，1821年10月，他在被流放于圣赫勒拿岛期间也在自己的行军床上长眠了。（124）

一些行军床能使用很长时间。在半岛战争期间（1808—1814年），西班牙第42步兵团（“黑卫士”，the Black Watch）的J. 马尔科姆中尉所用的那张床是由轻巧的空心管状金属框架和两块用系带固定的帆布组成的，可以快速折叠成一个箱子。后来马尔科姆的孙子同样进入了“黑卫士”服役，并在1882年参与H.H.基钦纳领导的埃及战役期间睡在这张行军床上。现在这张床被收藏于军团博物馆中。

“野蛮”的假日

露营是为了消遣而不是为了征服。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露营在英国和其他地方流行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1872年成立的“少年军”和1910年罗伯特·巴登-鲍威尔将军发起的“童军运动”引领的，这两个组织都强调户外生活的必要性，以及个性的发展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巴登-鲍威尔是户外活动的狂热粉丝，甚至会在大雪天睡在自家露台的床上。多亏了童子军活动，露营成了人们摆脱城市繁忙日常生活的一种方式。探险家和传教士在偏远地区旅行、在异国他乡搭起帐篷野营的故事激动人心，增添了这项活动的吸引力。露营为人们提供了“野蛮”的假期，还有因户外的风吹日晒变得黝黑的脸和四肢。这种新的热情恰恰与工业化世界里怀旧的幻想不谋而合—对美妙的景色，对令人心旷神怡的乡村，对“初秋的伊甸园”。这是露营床第一次进入主流社会，因为追求伊甸园并不等于一定要睡得不舒服。

《田野与溪流》（*Field and Stream*）杂志的编辑沃伦·米勒（Warren Miller）在1915年出版的《露营技巧》（*Camp Craft*）一书中介绍了各种类型的露营床，包括标准担架床和更精致的、可以折叠成“36英寸×8英寸的小包裹”的小帐篷床。经过户外用品商“阿贝克隆比”公司改良的木棍拼接床，配备了带着小口袋的卡其布和羊毛被，以供木棍穿过，将整张床组装起来。这种床可以收纳成一个重约2.7千克的小包。据米勒所言，女士们和家人一起露营时“不用再忍受硬床垫、绳床等户外装备带来的不适（125）”。

在旅途中，人们会睡在毛毯、外套、席子或地毯上，但无论在什么地方，最合乎逻辑的旅行寝具都是睡袋。在今天，睡袋往往是内置保温隔层的轻薄便携被子。现代的户外用品生产商提供了适合各种温度和天气条件的睡袋，甚至出现了一种附带绝缘头罩的所谓的“木乃伊睡袋”。如果再加上一个露营袋作为防水层，你就拥有了野外露营或荒野徒步旅行必备的所有最基本的装备。先进的技术已经把20世纪

60年代的简易睡袋变成了一个几乎是为野营者量身定做的睡眠场所。

睡袋并不是由某个人发明的。19世纪50年代，德国农民将塞满了枯叶、干草或麦秆的麻布袋当作“睡袋”。19世纪的法国山区巡逻员会把羊毛内衬的羊皮背包卷起来背在身上。1861年，阿尔卑斯山的探险家弗朗西斯·福克斯·塔克特（Francis Fox Tuckett）测试了一种带有防水橡胶底的毛毯睡袋，这种简陋的寝具不过是一个开放式的、人形大小的袋子罢了。威尔士企业家，在纽镇从事羊毛和法兰绒制造的普赖斯·普赖斯-琼斯把睡袋引入了国际市场。他开发出“尤克里西亚”睡袋（Euklisia，源于希腊语的“eu”，即“好”和“klisia”，即“小床、睡觉处”），这是一种近2米长的毛毯，在顶端偏向一侧的位置有一个用来放置充气橡胶枕的口袋。人一躺进去，就可以把毯子裹到身上保暖。（126）

普赖斯-琼斯12岁时跟随纽镇的一位布商当学徒，随后他接手了生意，并意识到了邮件和铁路网络的潜力，于是出版了世界上第一份邮购目录。1877年，在俄土战争期间，他趁机向围攻保加利亚城市普列文的俄罗斯军队出售了6万个“尤克里西亚”睡袋。这座城市陷落之后，俄罗斯人取消了剩下的订单，留给普赖斯1.7 万条尚未交付的睡袋。他将这些睡袋添加到邮购目录中，作为一种廉价的床上用品出售给与穷人打交道的慈善机构。这些睡袋很受欢迎，因此被英国军队采用，也让那些在澳大利亚旅行的人成为它的拥趸。遗憾的是，如今没有一条原始的“尤克里西亚”睡袋被保存下来，但2010年英国广播公司根据原始专利，委托定做了一条这种睡袋的复制品，并把它捐赠给了普赖斯-琼斯家乡的博物馆。

睡袋对极地旅行者具有明显的吸引力。在1888年滑雪穿越格陵兰岛之前，挪威探险家弗里乔夫·南森（Fridtjof Nansen）及其五个朋友与拉普兰人（Laplander）和因纽特人一起生活，以观察他们如何适应极端的寒冷气候。他们寄宿的房主睡在海豹皮做的毯子下，所以南森也向他们学习，缝制了一条可供三个人共眠的睡袋。一年后，一家挪威填料制造公司（G. Fuglesang AS）把南森的睡袋推向商业市场。这些睡袋逐渐演变成“木乃伊式样”，有些睡袋还设计有专门让四肢伸展开的空间。1902年，罗伯特·斯科特船长和他的队员在南极探险时靠驯鹿毛皮睡衣御寒。穿这种睡衣很麻烦，就像在和一条巨蟒搏斗。英国的极地探险队依靠人力运输物品，使得汗水流在衣服里面。留在睡袋里的水分会凝结成冰，让人很难把睡袋卷起来，也很难钻进去，要等到人体散热把冰融化才行。斯科特的竞争对手罗尔德·阿蒙森特别重视因纽特人和拉普兰人的传统保暖方法。他和他的队员效仿这些当地人，穿上宽松的毛皮大衣，既方便穿脱，又有效御寒。他们还几乎完全依靠雪橇犬来运输物资，既安全又快捷。现代的合成纤维不吸

水，即使被完全浸泡也很容易变干，而它的竞争对手虽然更轻便，保暖效果更好，但必须保持干燥。如今的睡袋简直像旅行床一样普及，以至于几乎让我们忘记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只为士兵们分发卷起来的毛毯和防水帐篷垫。

在普赖斯-琼斯申请了“尤克里西亚”睡袋专利的13年之后，马萨诸塞州雷丁市的一家气动床垫和靠垫公司生产了第一张商用充气床垫。这种床垫看起来很像我们的邻居在自家游泳池边懒洋洋地休息时用的那种，但它们最初是作为大西洋轮船上使用的毛发填充床垫的替代品而被研发出来的。充气床垫有许多优点：易于放气、存放，而且至少在理论上能当成救生筏用。在不断扩张却日益拥挤的都市里，充气床垫也是初来乍到的人搬进狭小公寓时的理想选择。这家气垫公司的广告吹嘘说，充气床垫不会滋生臭虫或细菌，也不需要定期翻动，没有气味，更不会发霉或受潮。这种充气床垫还配备了充气袋盖子，易于清洗，可以保护气囊。充气床垫有三种尺寸：1/2、3/4和全尺寸，售价“22美元起”，包括气泵和床垫块。他们甚至还为床垫提供30天试用期，如果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

充气床垫并不是这类产品中的第一种。早在16世纪，法国家具商威廉·德雅尔丹（William Dejardin）就开发出了一种用油蜡帆布制成的充气式“风床”。这个点子仍然存在，但帆布里的气体泄得太快，所以很快这种床就被不断更迭的技术抛诸脑后。三个世纪后，在1849年的淘金热期间，美国拓荒者玛格丽特·弗林克和丈夫从印第安纳州经陆路前往加利福尼亚。她清点了他们放在篷车里的行李和口粮：“我们有一张橡胶床垫，可以充气，也可以灌水，能铺成一张非常舒适的床。白天我们可以把空气或水放空，这样就能节省不少空间。”（127）

今天，你可以买到更高的充气床，它内置气泵和用于快速放气的“嘶嘶”阀，还有在室内使用的独立控制装置以及专为应付恶劣旅行条件的种种更为精心的设计。荷兰设计师加纳普·睿杰森纳（Janjaap Ruijssenaars）做了一个关于“悬浮床”的美妙白日梦，梦到的可能是充气床垫的终极形态：人们睡在距离地面40厘米的床上，安装于床垫底部和地板上相斥的悬浮磁体可以支撑近1吨的重量。但是，它不能被用作旅行床，而且太贵了，预计2019年的售价约为3万美元。

移动的家具

除了旅行，人们还经常在自家附近搬动床铺。在房间成为单一而独立的功能场所之前，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中世纪简陋的小床和

南亚的“查波伊”都可以放在任何有需要的地方，这样的床可能从人们不想再睡在地板上时起就已经出现了。大多数现代的巴基斯坦家庭仍在使用“查波伊”，它用途灵活，功能多样，支撑着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妇女可以倚靠在上面与女性亲友聊天；用鲜花装饰一下，就可以当作婚床使用；可以改造成分娩床；可以悬挂婴儿的摇篮，甚至可以用来烘干衣服或香料。男人可能会把它当成讲台，在公众面前发表演说，或者将其当作理想的非正式交谈场所。就连几个孩子也能轻松地把它搬到屋外的露台或屋顶上。睡在这种床上时一般还要挂一顶蚊帐，但这样并不会让这张床看上去是被某个人独自占有的。巴基斯坦旁遮普邦的贫穷小镇德拉加济汗（Dera Ghazi Khan）的居民已经把“查波伊”的发展推向了极致—他们制造出名为“哈茨”（khatts）的超大版本“查波伊”，每张可以坐24个人，所以被用作聚会场所，是亲朋好友在假日或傍晚聚在一起闲聊的绝佳平台。

在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希腊都出现过常规（单人版本）“查波伊”的衍生产品，但它的基本样式经久不变。这种床非常轻巧，可以用纤维和棉条轻易地编织出来，被广泛应用于苏丹的城镇和乡村以及亚洲各地。中国农村也有许多人睡在编织的绳索床上，这种床基本上只是在木制的框架上绑好紧密编织的绳子，制成一个稍有弹性的坚固平台，用来铺床褥或毯子。简陋的旅店里总是堆放着这种轻巧、便携的床。它们如此轻便，用途如此多样，可能永远不会过时。

睡觉用的“网”

吊床作为一种最简单的床（如果把它算作床的话）起源于美洲。随着西班牙殖民者返回欧洲，这种非凡的艺术品也被带了回去。1492年，哥伦布在日志中提到，每天都有许多印第安人到他的船上交换棉花和吊床—他们称其为“hamaca”，意思是“睡觉用的网”。在被正式载入史册之前，吊床已经在中美洲和南美洲被使用了几个世纪。西班牙语单词“hamaca”是从印第安阿拉瓦克人（Arawak）和泰诺人（Taino）的词语“hamaka”借鉴来的，指的是“布料的弹性”，实际上就是将织物、网或绳索悬挂在两个固定的点之间。吊床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丛林环境中有很大的优势，它们较为轻便，便携性高，几乎可以悬挂在任意两棵树之间的任何地方，而且非常舒适。最重要的是，它们能保护睡觉的人不受蚂蚁、毒蛇和其他昆虫叮咬，更免于传染病的侵害。吊床成了新大陆的持久性象征。1630年，弗拉芒的巴洛克风格雕刻师西奥多·加勒绘制了一幅标志性版画。画中，探险家阿美利哥·韦斯普西正在唤醒一位美丽的原住民妇女，而她在惊讶中从一张吊床中爬起身来。

吊床从来都不是结实耐用的物品，它们很容易制造，也容易丢弃或遗失。这意味着我们对吊床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的历史几乎一无所知，但据说它们在西班牙征服美洲之前将近两个世纪就从加勒比海来到了尤卡坦半岛。据我们所知，吊床在玛雅文化及其神话故事中并不占据什么突出地位。然而，在欧洲人到达美洲之前，吊床早已在亚马孙雨林中被广泛使用。

尽管欧洲人有时会用吊钩挂起棉布充当马车的座位，但在哥伦布把吊床带回欧洲之前，那里还没人知道吊床具有旅行床的功能。它们最初主要用于海上：1590年前后，吊床开始出现在帆船上，1597年被皇家海军引进，供水手使用。在有限的空间里，吊床是一种非常理想的床，它们悬挂着，随着船的晃动而摇摆，非常舒适。水手睡在上面，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就不会有从床上掉下来的危险。吊床可以被紧紧地卷起来，扎好放到一边，也可以堆放在战舰甲板上，用网罩起来，使其在战斗中提供额外的保护。水手睡在各自的吊床上，即使一个紧挨着一个，也能像睡在茧里一样舒适。那些在战斗中阵亡或在海船上丧生的人，会随着重物一起被包裹在自己的吊床里海葬。“二战”期间，丛林作战的需要促使美军在缅甸等地使用带蚊帐的吊床。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新不列颠岛和其他潮湿、昆虫密集的岛屿上也会使用吊床。他们甚至把吊床挂在狭长的壕沟里作为掩护，避免中弹。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军和越共都使用了吊床。吊床甚至在太空中也派得上用场。在阿波罗登月计划中，登月舱里的宇航员们在月球漫步的间歇都会在吊床里休息。

如今，吊床产业非常庞大，尤其在中美洲国家，吊床出现在客厅和露台上的频率就和出现在卧室中一样高。吊床通常是用织布机编织的，是尤卡坦半岛的一种重要工艺品。每年11月的圣萨尔瓦多都会庆祝吊床节，那时，工匠们会数以百计地售出鲜艳多彩的编织吊床。吊床也很适合婴儿，它能适应孩子的脊柱弯曲度，在婴儿紧张乱动时会随之晃动，起到安抚作用，而且还可以被随手安装在任何地方。

铁路床和公路床

我们现在睡在两个世纪前的人们难以想象的床上。几千年来，除非身处军队或舰队中，否则旅行者常常独自上路，或仅有几名旅伴同行。在颠簸的道路上，乘坐驿马车就是一种折磨。在车里，旅客全部挤在一起，就像某位少校在1815年描写的那样：“拼命但徒劳地试图入睡，可脑袋撞在侧板上，而一个打着呼噜的农夫正靠着你的另一个肩膀。”（128）他抱怨说膝盖没地方搁，马车夫的号角不停地发出刺耳的悲鸣，坐在他对面的“老姑娘”还在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后来，铁

路成为紧密连接城市和城镇的大众旅行新方式。坐火车旅行可能要耗费好几天，这代表人们不得不在火车上睡觉。最初，乘客们睡在自己的座位上，那些座位一般都是硬板凳，就舒适性而言没做任何妥协。19世纪30年代，最早的卧铺车厢出现在美国，它的内部配备24张床位，白天可以改成座位，这样就不会再让乘客感到那么不适。

在美国，有一个人的名字成了“文明时代铁路旅行”的代名词—乔治·莫蒂默·普尔曼（George Mortimer Pullman）。（129）普尔曼是一名橱柜制造商和工程师，因为在芝加哥用螺旋千斤顶把建筑抬升到洪水淹不到的高度而声名大噪。他第一次乘火车时觉得非常不舒服，因此决定自己为芝加哥和奥尔顿铁路公司制造卧铺车厢。他用铰链把车厢下端的座位连接起来，用绳子和滑轮把车厢上端铁制的铺位固定在车顶上。新的卧铺车厢并没有成功，所以4年后，普尔曼又设计命名了“先驱号”（the Pioneer）的车型，比之前的车型更宽、更高，内部坐垫下方的橡胶弹簧可以让乘客更舒服。白天，“先驱号”就像一辆复古豪华的客车，但每当夜幕降临，这里就会变成车轮上的双层酒店。“折叠座椅与上层铺位”的组合把普通客车厢变成了卧铺车厢。训练有素的乘务员会来安装私人隔断，然后铺上整洁的床单。这种卧铺车厢的出现说明乘客对舒适度的要求日益提高。普尔曼的卧铺车厢因担任林肯总统的葬礼车厢而获得了巨大的宣传效应，很快就进入了商业服务领域。到了1867年，他在三条铁路线上总共运营着将近50节车厢。在美国铁路发展的高峰期，有许多车次的每节车厢都是普尔曼卧铺车厢，包括20世纪纽约中央铁路公司（New York Central Railroad）的列车。

躺在火车车厢里的卧铺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浪漫。尽管远远谈不上舒适，但在伦敦和苏格兰之间的通宵旅行也有一种在异国冒险般的情调，因此获得了大量旅行者的青睐。英国传统卧铺车厢里的床又窄又短，让高个子的人非常难受。如果乘客的腰围太粗，翻身时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床去。但是它们仍然比法国传统卧铺车厢更舒适一些。在那种传统车厢里，6个陌生人会紧紧地贴在一起睡。今天，这种卧铺车厢在许多国家仍然很常见，特别是在印度，那里的普通卧铺车厢是没有空调的，内部两侧各有3个铺位，面对面的铺位距离较宽。最豪华的是商务车厢，一节全尺寸的商务卧铺车厢会分为8个隔间，其中两个是专为夫妻准备的。车厢还提供非常宽的卧铺和铺有地毯的隔间，床上用品自然也是一应俱全。

在现代，没有什么卧铺车厢能跟“东方快车”相媲美，它是铁路上的奢侈体验的终极典范。1883年，国际卧铺车公司创立了“东方快车”，开创了由巴黎东站出发，最终抵达伊斯坦布尔的特色豪华旅行

线路。随着时间的推移，“东方快车”的行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82年，这项业务转变为私人运营，“东方快车”更名为“威尼斯-辛普伦东方快车”（Venice Simplon Orient-Express），使用的是20世纪20—30年代的经过翻新的车厢。在21世纪初的几十年里，人们可以坐在配有舒适沙发的双人小隔间里旅行，里面还配备普尔曼式的卧床，一张上铺和一张下铺。乘坐这列火车旅行时，你会像是穿越到阿加莎·克里斯蒂那部不朽的侦探小说《东方列车谋杀案》的世界里，但（我们希望）这种情节不会发生在现实生活中。

休闲车（recreational vehicle，简称RV）是铁路上的卧铺车厢理所应当会衍生出的后代。（130）最早的房车于1910年左右出现在加拿大和洛杉矶，基本上只是经过改装的汽车或后面的拖车，毫不夸张地说，它们看上去就像是拖车上的小房子。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休闲车是皮尔斯箭头（PierceArrow）生产的“巡游马车”（Touring Landau）。它的折叠式后座可以展开成一张床，车内还配备马桶和一个能从驾驶座后面拉开的水槽。这辆车的司机会通过电话和乘客们沟通。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露营车开始流行起来，部分原因是国家公园越来越受欢迎。起初，国家公园里的游客大多都在路边搭帐篷；后来，除了行情暴跌的帐篷，一些拖车还配备了旅行用的折叠床。很多游客会把锡罐焊接到散热器上来加热食品。1967年，温尼贝戈公司开始大规模生产配有冰箱、煤油炉甚至特大号床的休闲车。2019年，在美国和加拿大有超过800万个家庭拥有房车，并以此畅享度假时光，还有45万人以房车为家，漫无目的地开车游荡。

假如说睡在车里的旅行奇怪地令人着迷，那么睡在飞机上的体验可就另当别论了。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很熟悉狭窄拥挤的经济舱座位、逼仄的腿部空间和鼾声如雷的邻座。很少有人体验过阿联酋航空公司的空客A-380的头等舱，这种巨型客机配有双人床和独立浴室。更低一级的头等舱（偶尔也包括商务舱）的座位是可以躺平的折叠座椅，它通常足够长，但不太宽，没法舒服地安放胳膊肘。这种躺椅座位和过去的飞机卧铺比起来可差远了，以前波音公司的双层客机“同温层巡航者”（Stratocruisers）和洛克希德公司的客机“星座”（Constellations）都有足够的空间放置上下铺、床垫、床单、阅读灯和窗帘，有时甚至会允许乘客在床上吃早餐。从各种层面上看，这都是在多数商务差旅人士都能买得起机票的年代试图在空中复制铁路卧铺的成功的努力成果。当然，也不是说这样就能让乘客睡得更香。假如你在飞机上的铺位高于或低于你的同舱乘客，就会发现有很多乘客用免费酒把自己灌得醉醺醺的；假如你预订了无烟座位（如果飞机上有的话），那么很快你就会发现整个机舱的空气质量其实都差不多。你会觉得自己好像睡在一场气氛逐渐高涨的派对上。后来，随

着“同温层巡航者”这样的豪华客机被时髦的喷气式客机和大型喷气式客机取代，飞机上的床也彻底消失了。在这些新兴机型上，人们尽可能地在机舱里塞进更多的乘客，以效率取代了豪华。

尽管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试验，我们也并没有让自己的睡眠方式离“睡在地上”或是“睡在狭窄的露营床上”远得太多—我们还是把自己裹在毯子里，让自己睡在袋子里。多亏了太空时代的科技，我们的床上用品可以干得更快，露营床也更加轻巧。但床，无论被改造成何种形式，其本质仍是为卧室而生的造物。

第八章

君主之床

在中世纪的欧洲，几乎每个人都睡在稻草上，可能是裹在外套里直接睡在地上，也可能是睡在铺着皮革或毯子的塞满稻草的麻袋上。他们通常住在与动物共享的公共住宅里，靠着壁炉挤在一起取暖。在这种环境中，人们会用一个塞满稻草的大麻袋“为自己铺床”。在庄园主的家宅中，那些占主要地位的家庭成员可能会睡在侧室。这个房间通常紧挨着主卧室的内墙，或者设置在住宅深处。这种房间的窗户没有玻璃，卧室挡不了风，卫生条件很差。只有最重要的领主才能睡在较高的床上，就像传说中的丹麦国王贝奥武夫，睡在那些跟随他的、蜷伏在大厅里休息的武士之中。除了躺在自己的盔甲上以外，他们可以随便躺在任何东西上睡觉。

与1066年征服英格兰的诺曼人相比，贝奥武夫手下的勇士就像一群野蛮人。诺曼人更喜欢舒适的环境，所以他们建造了房屋供领主居住，里面的卧室是起居室的两倍大。这些房间既是卧室，也是会客厅，无论是贵族还是普通劳工都能在这里受到接见，如果到访者举止得宜，还能得到奖赏。这些就是几个世纪后欧洲王室正式的卧室原型。

国王的床

12世纪，大多数欧洲王室的宅邸被划分为三个部分：小教堂、大厅和统治者的卧房。在英国，管家负责管理卧房，全天候侍奉国王。由于戒备森严，这间卧房是存放贵重物品的安全场所，在当时相当于国库。“更衣室”（wardrobe）由此演变而来。那是储存衣服、洗漱的地方，如果有活水，它也可以算作卫生间，里面会放一个定期清理的便桶。

到了亨利三世时期（公元1216—1272年），英国王室在伦敦威斯敏斯特的主要宫殿里设有一间饰有彩绘的房间，兼具觐见室和卧房的功能。这间房间长24米、宽7.9米、高9.4米，大量涂绘着以邪恶与美德为主题的壁画，以及诸如所罗门王之类的守护神画像，以护佑国王安睡。（131）可悲的是，这间引人注目的房间在1834年被烧毁了，隔壁的大厅幸而尚存。好在，它的内部细节都以文字形式被妥善地记

录下来了。亨利三世毫无节制地把钱花在修饰他和王后的卧房上面，这引起了不堪重负的臣民的不安。他的继任者爱德华一世（公元1272—1307年在位）让伦敦塔里的卧房窗户第一次装上了玻璃，阻止了穿堂而过的大风。到这时，王室的床铺已经变得相当舒适了。24岁的英国诗人杰弗里·乔叟时任国王的贴身侍从。除了承担守卫等职责外，他还每天为国王铺床，并为他提供"大量枕头"和足够柔软的织物，因此国王睡觉时再也不必辗转反侧了。乔叟一直都是王室的宠儿，随着他作为诗人的名气越来越大，他也得到了晋升，担任更重要的职务。1374年，国王每天赏赐他1加仑葡萄酒作为津贴。

在王宫和其他大型宫殿的内务财税清单上，床总是最引人注目的东西。那些漂亮的王室用床装饰华丽，王室成员睡在绣着王室纹章和其他象征符号的精美丝绸床品上。王室的家族文件和遗嘱都表明床是他们最珍贵的个人财产，因此床似乎成了王室的象征，成了一座上演君主制大戏的舞台。统治者坐在床上裁决国家大事—这是一张"国务床"。

法国国王们保持着在床上宣判裁决的悠久传统。路易九世（公元1214—1270年，又称圣路易）时代颁布的一部法典规定：王室的床应当永远是国王进行审判的地方。近500年后，17世纪的法国作家兼医生伯纳德·勒·博维尔·德·丰特奈尔（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评论道："正义之床是正义安眠的地方。"（132）在那个时代，君主的床会放在一个有7级台阶的高台上。床上，国王或坐或躺；床下，高官重臣站，低级官员跪。围绕君主制的森严等级制度随时随地得以体现。

这里是国王展示自己的正式场合，他身着华丽精美的礼服，周围是严格按照等级列队的侍臣和高官，众人各安其位。正规的王室床铺离地面很高，如果君主身体安康，这种安排还算合理，可对体弱病残的君主来说就太不方便了。国王也可能身患绝症，那时他就只能坐在一张简陋的低矮轮床上，而一旦国王行将就木，官员们会急匆匆地把他抬上那张"国务床"，让他在"正式场合"驾崩。刚断气的国王躺在"国土"上（这句话最初的意思是躺在"国务床"上），人们精心为他修剪头发，整理遗容，为接受公众的列队瞻仰做准备。当他的继任者登上王位时，会从毗邻大主教宅邸的一张床上走下，开始他的加冕仪式。这就是君主制的力量，在那个大多数人都是文盲的时代，无论生或死，视觉表象都极为重要。

王室的床常有栏杆加护，普通百姓无法接近，而且总有一名特别指定的警卫在场。王室的床和君主制度都具有一种神圣的特质。除了皇家宠物（其中一些被训练来暖脚）之外，所有的狗都受到严格的隔

离。

在皇家卧室里，带轮子的床很常见，因为国王从来不会自己一个人睡觉，附近总会有仆人相伴。就拿某位女王来说，某个出身良好的侍女会睡在她卧室里的那张轮床上，贵族侍臣也会日夜侍奉在旁。这张简陋的轮床上总是睡着地位显赫的人，其他朝臣只能睡在地板的草褥上。轮床通过床腿下的脚轮移动，这样一来，白天仆人就可以把它推到一边，甚至塞到君主的床下。真正的君主之床的尺寸通常允许国王邀请某位杰出之人来共度一夜，也许这只是一种施以恩赐的方式，在这两人之间只存在柏拉图式的交流。

在王室婚礼上也会公开展示一张经过精心装饰的床，并且十分显眼。各种庆祝仪式和醉酒狂欢围绕着新娘新郎的寝具和新婚之夜进行，无数观众见证着圆房的过程，以证实婚姻的圆满。如果这对新婚夫妇没有履行职责，婚姻关系可能会被立即废除。这张婚床，本身就是为了这种场合而被精心装饰出来的，所以有时候会被制成一个巨大的平台。1430年，为勃艮第的菲利普公爵和葡萄牙的伊莎贝拉特制的婚床仍然保持着“世界上最大的功能床”这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它长5.79米，宽3.8米。（133）

庄严的床

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床被摆放在王宫的中心位置。她在这张床上休息、睡觉，以缓解白天的压力。（134）她有很多张床，每张都精心布置着奢华的织物，装饰着鲜艳的色彩。当她从一座宫殿前往另一座宫殿，或从一栋豪宅前往另一栋豪宅时，她最好的床总是伴她同行。精心上漆并镀金的雕刻木框，银丝和天鹅绒装饰的床幔，以及用富有异国情调的鸵羽装饰的深红色缎面床头板。伊丽莎白睡在金丝镶边并点缀着昂贵纽扣的织锦床幔后面。她的每一张床都是精心制作的，和她睡觉的场所一样，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在白厅，她倚靠在一张由混合木料制成的床上，把自己藏在用印度彩绘丝绸缝制的床幔后面。在里士满宫，她睡在一张船形床上，床边垂着“海水绿”色的床幔。无论女王在哪儿休息，她的床都是“国务床”。无论走到哪里，她都需要私人空间，让自己能享受片刻远离宫廷的休憩时光。觐见厅、军机房或是卧室—这些房间都通往大厅。任何想要进入其中一间房的人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核，这是他们和女王之间亲密程度的测量仪。

伊丽莎白的宫廷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包括上千名仆人和随从。酿酒师、面包师、厨师、裁缝和固定随行人员，要为一支小军队似的朝臣和大使服务。这就像是一个举办巡回活动的大型组织，在白厅、汉

普顿宫、里士满宫和温莎宫四座宫殿之间声势浩大地巡游。三百辆货运马车负责把家具、挂毯、礼服和装饰品从一座宫殿搬到另一座去。宫廷人员还与女王一同前往首都以外的地方进行访问。

要抵达女王的卧室，远离宫廷的喧嚣，就需要跨越定位明确、把控严格的界限。觐见室是王座的所在之处，是一间非常大的接待室。大使、朝臣、主教和求婚者都聚集在那里，希望一睹君主的风采。伊丽莎白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的私人空间里，由146名女王卫士严密守护着。她在这里处理政务、招待客人、闲聊、听音乐，偶尔也跳跳舞。私人空间和卧房都直通觐见室。这里既是宫廷的中心，也是王国里最私密的地方。女王的私人空间和卧房都是女人的领地，不属于男人。

在女王统治的整个期间，只有28名侍女在她的私人空间里服侍过她。她们都是女王陛下的密友，其中一些人还参加了她的加冕典礼。她们为女王洗澡、化妆、梳头发。为她选择合宜的服装和珠宝，再帮她穿戴整齐。她们还监督她的食物和饮料，检查其中是否混入了毒药或者其他有害物质。这些出入她房间的侍女帮她打扫、清洗洁具并整理床铺。这些未婚、出身高贵、身穿白衣的侍女陪伴着女王，同她一起娱乐，特别是还陪她一起跳舞。所有侍女都应该经常在场，因为女王的需求是最高优先事项。即使她们生病或怀孕也会继续照顾她，直到分娩前的最后几周才会休息。孩子出生后，她们会把新生儿交给奶妈，然后几乎立刻就返回女王身边继续履行职责。

伊丽莎白女王生活在受她宠爱的侍女的包围圈里。她们一起睡在床上，或者是黑暗房间里的一张轮床上。在尔虞我诈、暗杀威胁无时不在的宫廷里，这些侍女是她的贴身保镖。她们比任何人都更亲近女王陛下，都更了解她的想法和情绪变化，以至于各国使节和高级官吏都想寻求她们的帮助。枢密院里一位聪明的书记员建议女王的首席秘书说："在接近女王陛下之前，请先结交她身边的一些人，要了解她的性情，你必须获得她们的信任。"（135）

女王生活在严密而无情的监视之下。在一个预期寿命很短，猝死频发的时代，其他国家的使节会定期向国内报告女王的日常行为和健康状况。自青春期以来，她的健康状况一直不佳，她长期消化不良，还总是失眠。当时的人普遍关注她潜在的婚姻伴侣，以及她生育能力是否良好的问题。他们认为女性的性欲比男性强得多，这让人很难相信任何一个女性，尤其是未婚女性愿意保持贞洁。在这个仍然脆弱的新教王国的安全取决于女王的婚姻以及她能否生下王位继承人的时候，外交圈子里却到处流传着她不孕的谣言。她的经期频率在国际报道中是一件值得关注与猜测的大事。

无论女王在哪里居住，是否出访外地，每天早晨她的侍女都会拉开床帐。在打扫和点亮照明设施等例行事务结束前，女王通常会一直待在床上。她会穿着睡衣吃早餐，然后在花园里快步行走，或是坐在窗边看书。盥洗、化妆和穿衣可能要耗费几个小时。当她随意地和侍女们闲聊时，她们会把她装进精致而厚重的礼服里，再从覆着金线刺绣的天鹅绒的保险柜里取出珠宝为她戴上—王室的贵重物品只要放在她的卧室里就万无一失。最后，她们用一只铁鞋拔让她轻松地穿上鞋子。只有到那时，女王才算做好出现在公众眼前的准备。

君主的日常生活无小事，甚至连一日三餐都有详细制定的仪式，因为除了在宴会上，人们认为她在公开场合吃饭是不体面的。当一天结束，她会回到卧室洗漱脱衣。侍女会为她检查床垫和床单，查看是否有虫子和隐藏的匕首，还得检查有没有闯入者躲在房间里。然后，女王爬上床，躺在一层层填充着稻草、棉絮和羽毛的床垫上，当然，最柔软的垫子会铺在最上面。丝绸床单掩上女王的玉臂，都铎的玫瑰覆盖着陛下的御体。窗户是关着的，因为要将女王与夜晚危险的空气隔离。拉紧床帐，女王被深锁在了自己的卧室里。

只有一次，一个男人未经批准就进入了这个专属于女性的世界。这位艾塞克斯伯爵一直都是王室的宠儿，但在1599年，他从爱尔兰匆匆赶来，以风尘仆仆之躯踏入了女王位于萨里郡无双宫的私人领域。他跨过女王卧室的门槛，瞥见了没戴假发、素面朝天、衣衫不整的伊丽莎白。他双膝跪地，乞求女王宽恕，沉默的女王却表现得优雅从容。第二天，这位伯爵就被软禁起来，1601年，他以叛国罪被处死。

即便君主不在，皇家卧室也戒备森严，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在凡尔赛宫，侍从总是坐在国王御床周围的木质栏杆内侧，因为宫廷里的人惧怕巫术。君主的敌人可能会在床上撒附着咒语的粉末，从而危及睡眠者。1600年，一个名叫尼科尔·米尼翁（Nicole Mignon）的女人因毒害亨利四世未遂而被活活烧死。就在这件事发生的3年前，一位巴黎庙街的装潢师因“意图弑君”而被处以绞刑，尸体也被焚烧。

* * *

王室的床是出生、洗礼、婚姻和死亡等仪式的显著象征物。人们精心装扮为贵族孕妇准备的分娩床，为它挂上昂贵的帷幔。这张床的价值比在它上面诞生的婴儿的体重更受公众的关注。就像所有即将临盆的准妈妈一样，这些皇室女性也期望能在卧床时接待自己的朋友，尽管事情有时会走向极端，比如在紧急情况下，孕妇不得不在亲友在场时进行生产。新的王室成员诞生是受到公众高度关注的重要事件，到场者必须遵守郑重制定的各种详尽的礼仪礼节。见证人中必须包括

拥有皇室血脉的王子和公主、国务大臣以及其他高级官员，这样安排是为了杜绝造假行为，虽然这些措施并不总能制止流言蜚语的恶意传播。1688年，国王詹姆斯二世的配偶，信奉天主教的摩德纳的玛丽（Mary of Modena）在许多大臣和侍臣的见证下生下了一个儿子。但是，出于强烈的反天主教情绪和对未来那位信奉天主教的君主的恐惧，谣言很快不胫而走，说一个活生生的男婴被藏在一个长柄暖床器里偷运进卧室，取代了王后诞下的死胎。这些流言最终导致1688年詹姆斯二世被坚定的新教徒威廉二世取代。

卧室的一个主要优点是，即使人们在尊重态度上仅有些细微差别，也能被注意到。1625年，红衣主教黎塞留与英国使节会面，在就国王查理一世和法国的亨利埃塔的婚姻问题进行谈判时，一场荒谬的争论出现了，争论内容居然是每位与会人员要走多少步才能穿过这间卧室。黎塞留以在床上主持聚会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因此改变了外交礼节的规则。

黎塞留担任首席大臣时侍奉的国王路易十三长期患有口吃，性格阴沉，对带鹰出猎的兴趣远胜于执政。这两个人把法国变成了一个绝对的君主制国家，但作为一位国王，路易十三的品位非常简朴。在他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只用两张床，一张是有银饰的黑床，另一张是被漆成紫色和金色的床。与他的父王亨利四世的情妇加布丽耶·德·爱丝瑞斯相比，这当然相形见绌，毕竟仅供加布丽耶在冬天使用的奢华大床就有12张。让-巴蒂斯特·波克兰（Jean-Baptiste Poquelin）是位讽刺剧作家兼演员，他有一个更为人所知的名字—莫里哀。他是在路易十三房间里侍奉的贴身侍从，这本是他父亲购买来的职位，而他继承了下来。他与国王的品位不同，睡在一张奢华的床上。这张床饰有青铜鹰爪，雕花镀金的床头板，还有刺绣织锦床帐。他还有18件精致的睡衣。路易十三的卧室里几乎没有女性出现过的痕迹，因为他和西班牙的安妮的婚姻并不幸福，他们总是睡在各自的房间里。路易十三从来没有情妇。然而，在1638年，在经历了4次胎死腹中的悲剧后，这对夫妇最终有了一个儿子，即未来的路易十四。1641年，他在年仅3岁时登上王位，开始了长达72年的统治。

起床仪式与就寝仪式

路易十四被称为“太阳王”，他坚信国王拥有神圣的权力，这促使他将法国转变为以凡尔赛宫为统治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136）他会把那些想要享受年金和其他特权的贵族“请”到王宫里，让他们日夜侍奉自己。路易十四行事高调，一直受到公众关注。他每日都设宴款待贵族，一掷万金，为他们举行盛大的典礼，操办其他奢侈的娱乐活

动，但也将他们置于严密的监督之下。他的中央集权统治削弱了贵族的权力，减轻了困扰他前任的对长期内战的担忧。最重要的是，他有效地统治了法国，并在床上指挥军事行动。床是他表演的舞台，他为床着迷。

路易十四的财产目录表明，他至少有25张不同式样的床。凡尔赛宫的皇家储藏室里至少有400张床，其中许多以装饰它们的挂毯命名。其中一张名为“维纳斯的凯旋”（Le Triomphe de Venus）的床，消耗了挂毯大师西蒙·德洛贝尔（Simon Delobel）12年的精力。国王经常把床作为礼物送给他的子孙，甚至也送给了他的医生一张。据说他喜欢在床的顶篷下面挂镜子，而不是挂更为寻常的色情画，以刺激那些稍显拘谨的来宾。当他的一个精力充沛的情人在这样一张床上打破了一面镜子，差点让他死于非命时，这种王室实验戛然而止了。

跟随路易十四的领导以及时尚的风潮，床上的装饰品和镀金材料变得越来越精致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国王最终禁止书记官、司法人员、律师、商人、工匠以及他们的妻子拥有任何形式的镀金家具，包括用金或银装饰的床。处罚包括处以罚金和没收违规物品，但似乎没有人能够长期遵守这项规定。

就像在他之前的许多王室成员一样，路易十四也生活在公众面前。他的生活使人联想到埃及法老，日常的每一个细节都受到严格管理，必须有条不紊。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多罗在公元前1世纪记述法老的生活时说：“他们连和妻子上床都有固定的时间。”（137）路易十四也是如此，他在长期统治期间一直在凡尔赛宫的卧室里举行宫廷仪式，他的日常起床仪式和就寝仪式都是组成他的统治的一部分。路易十四的教子，爱说闲话的圣西蒙公爵写道：“有了年历和手表，即使你离这里300英里远，也能说出他（国王）正在做什么。”（138）国王每一天都遵循着的例行程序和宫廷为官员制定的一样严格—官员也需要以此来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路易十四在床上决策、颁布法令，并接见有幸获得特权接近他这半神之躯的人。这些幸运的人不仅包括他的侍臣和王室成员，还包括他为数众多的私生子。对圣西蒙而言，这简直耸人听闻，所以他对此极不赞同。

“太阳王”的起床和就寝就跟太阳本身的运动一样可以预测，他甚至改变了卧室的朝向，以便自己迎接每天的第一缕阳光。他的正式起床时间由卧室里的首席侍从掌控，时间大约是早上8点半，哪怕这时他已经醒来一阵了。首席御医和首席外科医生来对他的身体进行例行检查，之后就会举行私人聚会。这个聚会只允许经过严格挑选的人参加，其中包括在他童年经常吻他、给予他照顾的护士。国王在这些人面前（每隔一天）让仆人为他洗漱、梳头、剃须。卧室和藏衣室的侍

从会为国王穿好衣服，侍奉他喝下早餐里的汤。在盛大的起床仪式中，国王的大管家、亲密的皇室仆人和宫廷的重要成员会见证床帐被拉开的一刻，他们都为能获得站在这里的特权而付出了代价。他们从镀金的栏杆后面望着，那栏杆把床和卧室的其余部分隔开了。这是贵族有机会与君主快速而恭敬地交谈的时刻，是象征着毫无隔阂与亲密无间的时刻。

早晨的时间缓缓流过，卧室变得更加拥挤了。当国王穿上长筒袜和鞋子时，旁观的人群中有他的艺术活动组织者、大臣和秘书。等轮到第五批人进入时，女性才第一次出现在卧室里。第六批人是国王的婚生和非婚生子女及其配偶。这个房间里可能会挤进上百人。



凡尔赛宫中收藏的路易十四的床

与此同时，在皇家卧室旁边的镜厅里已经列起了队伍。上午10点，路易十四在侍臣的陪伴下穿过国王套房。人群经常围着他挤来挤去，给他递上几张纸条，或是想方设法地和他说上几句话。半小时后，他在王宫的小教堂里做弥撒。11点，他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套房，处理五六个大臣带来的政治事务。下午1点，国王独自坐在卧室里一张对着窗户的餐桌旁就餐。从理论上讲，他应该是独自进餐的，但他总是叫王宫里的人看着他吃。下午2点，国王会宣布他第二天的活动计划，接着出去散步、乘马车，或者沉迷于他最喜欢的运动—在公园里打猎，也可能在周围的森林里骑着马闲逛，他会在下午6点前回来。傍晚，除了批阅官方文件外，他还会投身于晚间聚会和娱乐活动。晚上10点，他回到套房，一群人挤在那儿看着他在王室成员的簇拥下享用丰盛的晚宴。饭后，国王回到自己的私人空间，更自在地与密友和家人交谈。晚上11点半，就寝仪式正式开始，流程与早上的起床仪式正好相反。“太阳王”在一天结束时“下山”了，很有象征意义。

在统治法国72年后，“太阳王”在自己的卧室里驾崩。凡尔赛宫不仅是路易十四绝对统治的宣言，也是幅员辽阔、无懈可击、实力强大的王国的权力中心，甚至那些经过精心设计、被修整维护得整齐有致的皇家花园，也同样体现了他总揽大局的无上王权。皇家寝室位于王宫上层，位于这幢巨大建筑物朝东那面墙的中央。这里是整座宫殿最重要的房间，是“太阳王”升起和落下的地方，他的旨意和法令正是以这里为起点，在整个法国散播光芒。

床上会议室

“太阳王”的继任者路易十五只有一张床，而且还废除了他曾祖父传下的大部分卧室仪式。1765年，英国艺术史学家和政治家哈罗德·沃波尔（Harold Walpole）到访了路易十五的王宫。他在报告中说，当他被领进国王的卧房时，国王正在穿衬衫。显然，国王正在“和几个人谈笑风生，他瞪了我这个陌生人几眼，就去做弥撒、吃晚饭、打猎了”。王后也在那个房间里，正坐在梳妆台前，旁边“有两三位老妇人侍候她”。（139）

路易十五十分注重个人隐私，但矛盾的是，他的卧室十分宏伟，根本无法不引人注目。1738年，他修建了一间新卧房，面积更小，朝向南方，所以房间里更容易升温。他的床摆放在凹室里，整间卧房设计精巧，据说风格源自西班牙。一道栏杆（通常有柱子）把床与房间隔开，其实就是把凹室隔成了一间房中房。那里也设有座位，这样路易十五就能举行小型招待会。一个世纪后，这种凹室变得更小、更隐秘，而且使用起来也得更加谨慎。

路易十五最宠爱的情妇是蓬巴杜侯爵夫人，1745—1751年，她住在王宫中央区域的一套四室套房里，路易十五可以从他的私人套房直达侯爵夫人的卧房。路易十五后来的情妇杜巴丽伯爵夫人住在另一套奢华的套房里，他可以通过隐蔽的楼梯进入这间卧房。

如今王室的卧房已经属于正式场合了，这里的床很少用来睡觉，更不常用来同房。更准确地说，人们可以称其为正式的会议室，这是一个做出决断的地方。如何获准进入这个房间才是关键，因为能看到国王穿着内衣，或是在床上与人交谈的样子是一种崇高的荣誉，只授予最积极能干的侍臣和国家官员。这张床本身就是君主制辉煌时代的象征，足以让国王的访客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些床是真正意义上的象征物，比如1714年安妮女王临终时定制的那张床。它高约5.5米，由57个部件组成，用黄色和深红色的天鹅绒帷幔装饰，铺着极尽奢华的丝绸床垫。它造价高昂，总共花费674英镑，这笔钱在当时足够在伦

敦买一幢中等规模的联排别墅。然而，这张床上从没有睡过任何人。1716年，在威尔士亲王登基成为乔治二世之前，人们专门为他打造的一张旅行床同样精美，而且更加实用。它由54个部件组成，附有全套床垫和床帷。到1771年，做工精细的皇家用床就已经司空见惯了，但几乎没有哪张能与乔治三世的妻子夏洛特王后的那张相媲美，那张床是由王后资助的慈善机构—菲比·怀特孤儿学校的姑娘们精心绣制的。

自维多利亚女王于1837年登上英国王位，皇家卧房始终大门紧锁。维多利亚对隐私的强烈重视映射出一个更压抑的时代。那时，卧室和床都被隐藏在远离公众视线的地方。只有少数规矩被保留下来，包括王室成员出生时大臣必须在场，这个规定直到1948年查尔斯王子出生才被废除。

精心装饰的床仍然很时髦，尤其在富人和东方的权贵中非常流行。这或许是因为我们一生中会在床上度过漫长的时间，所以为何不选择在奢华的财富和精美的艺术品上安睡呢？说到这一点，很少有床能比得上现位于巴基斯坦境内的巴哈瓦尔布尔土邦（Bahawalpur）的纳瓦布[8]—萨迪克·穆罕默德·汗·阿巴斯四世（Saddiq Muhammed Khan Abassi IV）的床。1882年，他从巴黎的昆庭公司订购了一张镀银床，这是一个（至今）以镀银器皿和精美的餐具享誉世界的品牌，包括土耳其的苏丹在内的皇室贵族，以及整个欧洲和亚洲的名门望族都是他们的客户。昆庭不仅为爱丽舍宫提供装饰品，还为“东方快车”提供餐具和家具。他们为阿巴斯特别制造了一张“用纯银装饰的深色木床，床的部件镀着金，点缀着字母组合图案……床上装饰着四个真人大小的青铜裸体女像，甚至连肤色都漆得和真人相仿。她们有着自然的头发和会动的眼珠，手持扇子和马尾（140）”。这些装饰品一共用掉290千克白银。这四个“女人”分别代表法国、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女性，头发与皮肤的颜色各具特色，与真人相差无几。雕像由灵巧的机械装置控制，她们可以一边为纳瓦布扇风，一边对他眨眼。这张床内置的八音盒能播放30秒古诺的《浮士德》。纳瓦布死后，这张床也莫名消失了，最后它是在阿巴斯家族位于巴哈瓦尔布尔土邦的萨迪克宫（Sadiq Garh Palace）里被发现的。在最后一位纳瓦布于1966年去世后，巴基斯坦总理下令清点他的所有财产。这张床已经躺在宫殿中的“白银卧室”里很多年了。后来纳瓦布的几个后裔发生遗产纠纷，宫殿和其中物品因此被查封。1992年，这张床再度消失了。

阿巴斯从来没有在他的床上进行过统治，它纯粹保持着私人用途。王室的公开卧房，以及统治者在床上处理政务，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的特色。如今已经没有一位统治者在自己的床上治理国家，他们

都睡在公众视线无法触及的地方。在今天，很少有哪张床具有突出的历史价值，它们仅仅能作为某些事件的背景，而不是统治者拥有的神圣权力的声明。在整个“二战”期间，温斯顿·丘吉尔在他的床上以某种诡异而略显炫耀的姿态治理着英国，有时这会让周围的人感到困惑甚至头疼。英国总参谋长、陆军元帅阿兰布鲁克勋爵当时经常出入丘吉尔的卧室，他在日记里抱怨说，自己总觉得与首相的会面是场挑战。就拿他在1942年1月27日那天目睹的经典场面来说：“这次会面是后来经常出现的同类事件的典型。他卧室里的场面总是一样的，我真希望哪个艺术家能把它画下来。他那件红金相间的便袍本身就很值得一看，只有温斯顿才会想穿它！他看起来就跟中国人似的！稀稀落落的几根红褐色头发总在他的秃顶上飘着，一根大雪茄从他的脸上斜抽出来。床上扔着各种文件和信件，有时早餐托盘还放在床头没被收走。他不断地按床铃呼叫秘书、打字员、速记员或是他的忠仆索耶斯。”

没有历史记录证实丘吉尔真的在床上召集过会议，并以此作为一种控制重要官员的手段。他当然有能力这样做，但很难想象，这若是与路易十四那精心安排的起床仪式和就寝仪式相比，会有多大的差距。（141）

第九章
私人避难所

在见证了床的进化史之后，让我们回到自己的生活，回到自己的床上。如果你和大多数西方人一样，那么你的床也会藏在自己的卧室里，一般是在二楼，或是在房子的最里面。在隐私、性和睡眠等概念的浸染下，可能只有少数经过筛选的人才能进入你的卧室。20世纪90年代末，英国青年艺术家翠西·艾敏向公众展示了她那张凌乱的床，激怒了一些观众。2008年，评论家乔纳森·琼斯刻薄地发问，他想知道除了愿意主动揭露私人创伤之外，这位艺术家还有什么能让她显得重要的地方。然而早在1616年，当莎士比亚把他“第二好的床”遗赠给共度34年的发妻时，他想表达的并不是对妻子的冷落，而是一种温柔，就像当初他们共享的婚床一样。在莎翁的时代，最好的床一般被安放在起居室里供客人欣赏—欣赏能买得起两张床的财富。那么，我们的床到底是怎么变得私密起来的？

寻求隐私

2013年，互联网先驱、谷歌副总裁文顿·瑟夫提出了“隐私是现代的一种反常现象”的理念，紧接着就遭到人们铺天盖地的猛烈抨击。（142）

但如果从历史角度看，他这句话一点儿不错。我们所说的隐私，以及个人的秘密、远离公共领域的理念，其实只有大约150年的历史，尽管它们有着更古老的根源。有趣的是，现代卧室的出现也只能追溯到大约两个世纪以前。在工业革命之前，隐私对任何一个人类社会而言都不是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在金钱、威望、安全性和便利性面前，独处的需求只能远远排在后面。

在史前时代，人们对温暖和保护的需要在很多时候对隐私概念的产生是一种阻碍。人们会躺在火炉边，或是蜷缩在一起，孩子们很可能会看到父母亲热的场面，因为他们挨在一起睡，或者都睡在同一间屋子里。1929年，马林诺夫斯基在关于特罗布里恩群岛岛民性生活的著名研究中指出，当地成年人不会采取特别的预防措施来防止孩子们看到自己进行性活动。（143）如果孩子盯着大人看，大人也只是责备几句，再让他们用垫子把头盖上。在传统的狩猎-采集社会和自给自足

的农业社会中，性行为往往发生在睡眠场所之外的地方，没有旁观者，行动也更加自由。然而，对于在恶劣环境中或在食肉动物的栖息地周围生活的人而言，缺乏隐私只是为生存付出的低廉代价。在北极圈内的传统社会，去野外寻求独处的机会是极其危险，甚至是极度愚蠢的行为。

没人知道“隐私”从何时起成为一种概念。或许它是随着统治者、贵族和其他人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而产生的。古埃及法老睡在高于地面的床上，达官显贵也向其效仿，而其他百姓都睡在席子或地上。古雅典人擅长建筑几何学，有时他们在建筑设计中会强调最大限度地接收光线，但也得尽量减少隐私暴露于公众视野之中的可能。甚至罗马词语“privatus”（英语单词“private”的来源）通常也被简单地用来指代没有公职的公民。它源自“privo”一词，即“我失去、剥夺”但也“我自由、解脱”。后来隐私问题似乎引起了争议，就跟今天一样。有些学者，比如苏格拉底，就不赞成人们为了获得隐私而将自己隔离。据说他曾对这种独处者发表评论，说他们中“没有人能得到应有的荣誉或职务”，甚至也无法获得正义。相对而言，没那么向往平等的罗马人更喜欢炫耀自己的财富，无论是豪华的乡村别墅、精心打理的住所还是城里的豪宅。富人的住宅通常是一座供好奇者参观的博物馆。公元77年，老普林尼写了一篇关于这些富人的文章：“他们不允许任何东西隐藏起来……他们的卧室和私人处所……可以公开谈论所有最私密的话题。”（144）事实上，很多规模较大的罗马住宅里并没有专门的卧室，有的只是空房间，还有可以随便移动的便携床。

罗马人在他们的公共浴室里也毫无隐私可言，而附带的厕所则是让人们并排而坐的公共场所，如今人们的考古成果也只是偶尔能发现罗马人的厕所里有使用过隔板的痕迹。他们在方便时会坐在长凳的U形洞上，事后会用公用的破布或缠在木棍上的海绵擦拭，整个过程中人们都在自由地交谈——厕所是带有社交功能的公共聚会场所。罗马的特权阶层享尽荣华，炫耀着财富，而大多数普通市民都住在拥挤的、往往会偷工减料的公寓里，根本就谈不上什么隐私，也很少有人关心隐私问题。与“公共”妓女发生性关系（对男性而言）并不是一个让人说不出口的秘密，而是一种公开的快乐来源。在庞贝古城发现的一句古罗马涂鸦写道：“洗澡、喝酒和性爱正在腐蚀我们的身体，但洗澡、喝酒和性爱也让生活更有价值。”（145）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人们也不会把隐私问题放在首位。早在公元前5000年，中国的炕，那种铺着席子的可加热砖石平台就已经出现了。炕从来就不是什么私人场所，而是很多人一起睡觉、吃饭和社交的地方。到了公元前1000年，睡在地板上的人才开始爬到床上去睡。那些精雕细琢、镀金镶银的贵族寝室，更多时候充当了家具的陈列室，而不仅仅是用来睡

觉和招待客人的安静场所。有些人还在卧室里留出了专门存放衣物的空间。

然而，人类生活中还存在着某个总是充满着秘密和隔绝的领域：宗教。作为考古学家，我们在几乎每个宗教场所都看到了人们为保持隐私而做的设置：在铁器时代也门神庙的布局中，总是隐藏在神庙深处的三重圣坛；埃及祭司神秘的木乃伊仪式；深藏在人类难以进入的洞穴系统中的大冰期洞穴艺术。神秘带来权力和神赐的错觉。基督教是西方隐私观念发展最强大的催化剂之一。在基督于荒野中独自经历了划时代的40天之后，与世隔绝就成了基督教思想的中心信条。在一个邪恶无处不在的世界里，他们沉迷于关于死亡和罪恶的思考。极端虔诚的信徒脱离了社会，甚至脱离了修道士团体，远离尘世的纷扰，静心冥思关于上帝和人类的问题。公元4世纪的埃及基督教徒圣安东尼说："就像一条游向大海的鱼，我们必须尽快抵达独属自己的领域，如果我们在外面耽搁了，就会丧失内心的警觉。"禁食和禁欲主义成为时尚，最极端的实践者是居住在偏远沙漠洞穴里的埃及隐士。另一位禁欲主义作家，和圣安东尼同时代的约翰·卡西安（John Cassian）对他简朴的饮食做了叙述：干饼，几滴油，偶尔吃点儿蔬菜或小鱼干。一位现代研究员估计，这种饮食每天只能提供大约930卡路里的热量。卡西安写道："身体越消瘦，灵魂就越强大。"如果信徒们严格遵循这种饥饿饮食原则，大约6个月后就能完全实现身与心的纯洁。他们的孤独不是对隐私的追求，而是对在十字架上受苦的基督的一种补偿。正如前文所说，在拉丁语或中世纪世界中并不存在"隐私"这个词，但存在着"失去"和"剥夺"。（146）伊丽莎白女王可能热衷于维护自己的"privy"，但这个词源自古法语单词"privé"，意思是"友好而亲密的地方"。相反，隐私的概念在文艺复兴时期体现出一种更加现代的意义。在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兰会议上宣布的条例强制每个人进行忏悔。在这个规定下，一个人的罪恶意识是一种内在的道德形式，是通过冥想获得的，也只能在对隐私的忏悔中暴露出来。人们开始鼓励阅读，尤其是在印刷机彻底改变了人们的学习方式之后。每个人都在读自己的书，使得整个欧洲掀起了个人主义革命。如荷兰"共同生活兄弟会"（Dutch 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一般的宗教团体自发出版了宗教相关读物并将其广泛传播，提倡人们投身于对基督的奉献。他们的教义敦促艺术家、诗人和神学家放弃世俗事物，把心转向上帝。天主教加尔都西会的教士拥有各自的独处空间，他们生活在一种沉默的规则下，以此鼓励沉思。个人的道德约束逐渐走向精神层面，成为私密的事情，而人在这个过程中也变得更加孤独了。

分割住宅

到16世纪，由火坑和位于房屋中央的砖砌烟囱供热的住宅就已经很普遍了，它们之所以受人喜爱，是因为它们能提供冬季保暖的最佳方式。1732年，罗得岛州的纽波特市就建起了一栋这样的房子，它属于我们的一位编辑，比尔·弗鲁赫特（Bill Frucht）的叔叔。听比尔回忆说，这座房子有两层楼、7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独立的火炉，这些火炉散出来的热气会从房间汇聚到房子核心位置的烟囱里。富人可能会住在私人住宅里，或者拥有单独的房间，但如果把整个家庭的成员，包括仆人都聚集在一起，会更方便、更温暖。这个时候人们拥有的隐私仍然很少。意大利侯爵阿贝尔加迪·卡帕契里（Albergati Capacelli）的仆人侍奉了他11年。侯爵的妻子以侯爵大小便失禁为由提出了诉讼，要求废止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1751年，这位仆人为他的主人出庭做证时说："有三四次吧，我看到侯爵光着屁股从床上爬起来，勃起功能毫无障碍。"（147）

在卡帕契里的时代，床是人们可以好好地躺下来休息和阅读的地方，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仍会有人陪在身旁。床是合乎逻辑的聚会场所，也是客人可以和大多数，甚至所有家庭成员一起过夜的地方。它们就像王室的床，实际上就是公共场所。起初，单人床是在医院里流行起来的。病人长期共用病床，尤其是那些孩子，不管各自的健康状况如何都得紧紧地挤在一起。在这样的条件下，传染病像野火一样蔓延。

家庭生活和隐私问题自18世纪末开始变得突出。那时，男性的娱乐场所已经迁出家门，俱乐部、咖啡馆、杜松子酒馆和街头聚集地成了他们寻欢作乐的地方，而（可敬的）妇女仍甘居幕后。在那个变化急剧、压力日增的世界，各种力量的共同作用把家庭变成了避难与恢复的场所。福音派基督教的兴起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信徒相信家庭的力量足以让一个人在自己的圈子内外维持良好的关系。基督教家庭成为爱和慷慨的缩影，这是对工作场所日益严酷的环境和无情的世界做出的回应。男人回到家中，就是回到一个充满爱和宁静的和谐环境里。这种观念越来越根深蒂固，最终成了世俗的规范。

工业革命把大多数欧洲人变成了城市居民。1800年，英国只有2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一个世纪后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近80%。当时的伦敦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拥有400多万居民。现在，在这座城市里小型梯阶式住宅仍然随处可见，大多数都建于1900年前后的几十年内，为的是在日益喧嚣的城市中寻求独立和隐居。巴黎的故事也差不多。虽然巴黎也经历了漫无目的的扩张，但在1900年大概有2/3的法国工人是在家里工作的。而现在，几乎所有欧洲人都在家门外工作。

工作场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工厂、固定的工作时间和更严格的工作环境已经成为规则。（148）劳工和专业人员都受到外出工作的影响。曾在自己的住所里问诊的医生现在有了独立的诊室。以前的女性可能站在柜台后面帮助丈夫打理生意、记录账目，现在却过着以家庭为中心的独立生活，成了专职的家庭主妇。

随着19世纪缓缓展开，许多欧洲人搬到郊区去住，但仍在市中心工作。这种分离就像一种哲学，一个人被分裂成了两个，一个在工作，另一个在家里，过着两种生活，成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人。1908年，阿诺德·本涅特写了本广受欢迎的自助类小册子，他乐观地将书命名为《如何在一天内生活24小时》（*How to live on twenty-four hours a day*），这个题目点明了这本书的与众不同之处。本涅特认为，普通人在工作日内没有任何自主权，只有在工作之外才能真正地生活。他的主要建议是阅读一些古代哲学书，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看报纸上。艺术评论家兼作家约翰·拉斯金的父亲，将社会的沉闷和“我和我的爱人面对面地围着火炉而坐，通明的炉火照亮了她周围的一切，也照亮了我最出色的儿子”做了比较。（149）个人生活要素的分离同样延伸到了家庭中。需要把家具搬来搬去的多用途房间不复存在（法语中的“家具”，即“meuble”最初的意思是“可以移动的”）。这时，无论是就社会意义而言，还是从主仆间的等级制度来看，每个房间都根据不同的家庭活动而被分隔开。卧室第一次成为寻常设施。

独立的卧室

19世纪，在大多数西方家庭中，成员们睡在固定的卧室里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仆人不再和主人一家一起睡，也不再一起睡在大厅或厨房里。每个人都有了单独的床位。在整个家庭领域，用维多利亚时代的话来说，女人是“家庭幸福的守护天使”。她统治着整个家庭，尽管她的权威来自丈夫。再没有比中产阶级的卧室更能凸显这种信念的地方了。虽然这些房间曾经既是起居室又是休息场所，但现在它们只是单独用于睡觉的地方。维多利亚时代的富人认为，房子里拥有的专用房间越多越好，因为这意味着妻子和丈夫可能拥有各自独立的，也许会相互连通的卧室，而每间卧室都配备一个相邻的更衣室。这样一所房子的女主人可能会躲进她的私人卧室（boudior，源于法语单词“bouder”，即“生闷气”）里，寻求一个庇护之处。

1875年，《建筑师》杂志刊登了一篇权威论文，宣称卧室只能用来睡觉，其他任何用途都是不健康、不道德的，而且违背了生活中每项重要活动都需要在独立房间中进行的原则。当然，公共睡眠在当时不仅违背道德（哪怕在最小的城市公寓里也需要有两间卧室：一间给

父母，一间给孩子），而且还存在健康问题。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19世纪充满了人们对公共卫生状况的焦虑。许多人仍然觉得疾病是由污浊的水或空气自发产生的，这使睡眠问题和人们普遍缺乏运动的身体状况尤其令人担忧。1880年，理查森（B. W. Richardson）医生建议成年人不要和孩子们同床共枕，以免夺走他们“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温暖”。

在越来越商业化的世界里，独立房间的增加也给商品的销售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包括儿童玩具和家具在内的专门针对儿童的大规模营销活动就开始于维多利亚时代。以孩子为目标的营销根源有些肤浅：即使是所谓“男孩要买蓝色的玩具、衣服、家具，而女孩要买粉红色的（因为商家想让父母买双倍的东西）”这种古老惯例也是在“二战”以后才变成普遍规则的。正如1918年的一篇时尚商务文章解释道：“人们普遍接受的规则是，男孩要用粉红色，而女孩要用蓝色。因为粉红色是一种更果断、更强烈的颜色，更适合男孩；而蓝色更精致、更花俏，女孩穿着更漂亮。”（150）

房间功能的分离那时还没有影响到城市贫民的生活。他们挤在肮脏的房间和公寓楼里，仍然在公开场合生活。如果哪个女人生病了，整条街的人都会立刻知道，因为她经常卧病在床，家里的事人们全部看在眼里。隐私引发的争论愈演愈烈。1890年12月，《哈佛法律评论》（*Harvard Law Review*）发表了一篇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撰写的文章（后来布兰代斯成了最高法院的法官），他在文章中就隐私权进行了讨论。他认为，由于“文明的进步”带来的强度和复杂性……独处和隐私对个人而言已经变得更加重要。（151）1868年，法院裁定，隐私权是男人维持对妻子的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所有权的一种方式，其中包括虐待她身体的权利。

在大英帝国称霸全球的一个世纪里，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和家政习惯在遥远的土地上深深地扎下了根—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到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热带地区。殖民者带着他们的家具和房屋装饰理念，还有他们的卧室、床和床上用品一起踏上征途。到19世纪末，中产阶级的隐私观念，尤其是卧室里的隐私观念在美国也已深入人心。两个世纪以前，新英格兰地区的住宅就将一楼大厅用于烹饪、就餐以及其他各种家庭活动。接着是客厅，里面摆放着家里最珍贵的财产：“最好的床”和最精美的餐桌和椅子。这就是丈夫和妻子（家里最重要的人）睡觉的地方。家庭住宅内部空间的划分标准是其所包含内容的意义和价值，而不是进行不同家庭活动的需要。

18世纪，过道和楼梯已经流行起来，在房子里活动变得容易多了。人们通常睡在实际意义上的卧室里，配备床帐、椅子和布料相称

的窗帘。这里只是用来睡觉、安静地休息以及与亲朋好友交往的地方。当家里有人出生或死亡时，人们会聚集起来，这时，卧室就成了正式接待客人的地方。

分开的床

到19世纪，床和床垫与中世纪的干草袋或麦秆袋相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某个人独自睡觉的事几乎还闻所未闻。正如我们看到的，尽管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非常注重隐私，但共享床位的情况却一直持续到19世纪。房子内部的楼梯和走廊的发展是促使人们分床而睡的一个主要因素，因为这允许仆人和其他人在不经过其他房间的情况下进入不同的房间。（152）仆人们曾经睡在主人或者女主人的卧室里，现在他们在楼上或楼下拥有自己的房间，随时等待回应主人按响服务铃的呼唤。

在这些私密的、独特的卧室里，夫妇也开始拥有各自的床。配备两张床是避免“霉味”传染的好方法，也强调了维多利亚时代盛行的谦逊观念，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20世纪。好莱坞在20世纪30年代制定了一份名为《海斯法典》（*Hays Code*）的电影制作守则，守则规定银幕上的夫妻必须分床而睡，如果接吻，其中一方的脚必须时刻踏在地板上。20世纪60年代，西尔斯百货和其他大型百货公司持续向已婚夫妇投放双人床的广告，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种双人床才沦为过时而保守的式样。

最近的研究表明，夫妻分床而睡往往会让双方睡得更好。（153）对那些伴侣不能安静睡觉或睡不踏实的人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托马斯·奥特威（Thomas Otway）在他的戏剧《无神论者》（*The Atheist*，1684年）中描绘的那样，主人公考尔蒂纳的妻子西尔维亚愤懑地抱怨，她将典型的“丈夫”定义为 “笨重而无能，迷迷糊糊却懒得上床，睡觉时翻来覆去、咕咕哝哝、呼噜声不断”的男人。我认为，这段抱怨足以解释为什么今天有三四成的夫妻分床而睡。

关于卧室的建议

对多个专用房间的需求使建筑师对卧室和房子的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感到困惑。19世纪的卧室，特别是夫妻的卧室，通常都位于一楼，并与更加开放的接待室相连。这种设计理念是为了将家庭成员与仆人、成人与儿童、年长的子女与婴儿分隔开。其他家庭成员睡在二楼，仆人睡在更高的阁楼。需要爬的楼梯越多，说明在家庭中的地位

越低。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代人，但最终整个一楼都被用于日常起居，所有的卧室都被安置在楼上，如果空间足够，那么每个房间的门都通向走廊。这样一来，隐私就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但是，如果住在一栋单层的房子里或者一间城市公寓里的话还能怎么做？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选择广受欢迎：如果住房较大，就将一组卧室设在走廊的一侧，另一组卧室把门开向社交性较强的场所；而在比较小的住宅里，就将一间卧室留给父母，另一间留给孩子，仆人们则往往睡在位于地下室的厨房里。

关于卧室布置的自助书籍源源不断地发行，向维多利亚时代的主妇提供她们最需要的建议。1888年，著名艺术家的女儿，犀利而有主见的简·艾伦·潘顿（Jane Ellen Panton）敦促家庭主妇逃离年轻时的“正统卧室”，就像她在19世纪中期使用的那种卧室：“可怕的”壁纸，“满眼都是蓝色玫瑰和黄色百合花图案，更糟糕的是沉闷的褐色和橙色，或是在绿色的涡卷形装饰和绿叶上还叠加着不同的绿色”。（154）维多利亚时代的卧室家具总是十分破旧，因为都是从主卧室淘汰下来的，一旦磨损得更严重，它就会被再次淘汰，搬进保姆或是仆人的房间。

这种置换尤其适用于地毯，它们辗转于许多房间，因此越来越破旧。卧室里的地毯往往是在客厅里长期忠实服务过的废品，最后会变成仆人卧室里的布条。没人认为客人会去检查主人的卧室，所以它看起来如何并不重要。潘顿说：“恐怕我不是一个正统的主妇。”在书中，她向一个自己虚构出来的家庭主妇—新婚的安吉丽娜提出建议说，要买“颜色会让她感到快乐”的物品。她解释说，人很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而且有时候人们会在卧室里生病。在门和壁炉架上喷涂的油漆颜色应该与墙壁相匹配。（155）

大多数房子都有为丈夫和妻子准备的私人卧室，还有留给孩子们的独立卧室。一般来说，富有的夫妻不会想要共睡一张床，他们都有各自独享的卧室。窗帘和百叶窗开始流行起来，在那个时代，卧室仍然承担了浴室的一部分功能，所以这些都是必要的。卧室里需要有盥洗台和镜子，如果再有一张长榻或一把躺椅就更好了。盥洗台要附带毛巾架，有时后面的墙上还会贴着瓷砖，以防梳洗时水珠溅得到处都是。仆人费力地用铜制器皿从厨房打来热水，倒进脸盆和浴桶里。屋子里通常还会有一张摆在正中的餐桌、一张梳妆台、几把椅子和一个小书架。在冲水马桶被广泛使用之前，便壶是卧室中必不可少的东西。直到20世纪初，便桶，也就是装着便壶的椅子或盒子，在卧室中仍是非常常见的设施，这就是室内厕所的雏形。潘顿还推荐了衣柜（如果你能弄到手的话），还有“长椅”，一种可当作长榻或扶手椅的

露营床。如果你感到压力过大，可以躺在上面放松一下。她认为屏风也是必需品，因为它既可以遮掩床铺，也能够阻挡气流。

照明一直是个问题。许多人建议不要在卧室里使用煤气灯，因为会消耗房间里的氧气。潘顿强烈建议在睡觉时点燃一支蜡烛。富裕的家庭会在壁炉架上点燃两支，在梳妆台上再点一支。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放一盒安全火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要想在黑暗中找到火柴非常困难。一如既往，潘顿女士对此也有解决办法：在床上钉一个放火柴的小盒子，涂上油漆，再挂上一张火柴的图片就行了。

还有一个问题：衣服该存放在哪里？首先，我们熟悉的衣架直到20世纪才开始被普遍使用，那时人们将其称为“肩膀”（shoulders）。在那之前，人们只是简单地把衣服挂在衣柜里的挂钩上，或是直接存放在大衣箱里。几乎所有卧室里的家具都具备贮存衣物的空间。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女所穿的笨重长裙向服装收纳发起了一个严峻的挑战。“舞会礼服……和普通的衣服”，潘顿建议使用覆盖着漂亮布料的箱式脚凳和各种小橱柜来收纳，因为这些橱柜可以被随意安置在任何地方，也能存放靴子和鞋子，让它们不会再杂乱地躺在地板上。（156）

在那个时代，一大堆满怀善意的人随时都做好了准备，想为“卧室”下个明确的定义，因为人人都需要睡觉，当然，也有很多人强调卧室的个性。1877年，一位名叫艾拉·丘奇（Ella Church）的专家说，人们一眼就能识别出一位母亲的房间：它有一张超大而且舒适的床、一把安乐椅和一张桌子，这些配置都是为能“安置很多人”而准备的。单身汉的房间里会堆满报纸、烟斗、雪茄和女演员的照片。而老奶奶的卧室里会有一张老式四柱床、高高的书桌和她最中意的舒适椅子。卧室是一个人表达个性和存放财产的地方，“那些多得数不清的小玩意儿，就是我们性格的可靠证明”。但主卧室是个例外，因为虽说它是夫妻共用的，但往往更突出妻子的需要，里面会具备诸如梳妆台和穿衣镜之类的家具。

凸显个性是一回事，保持健康又是另一回事了。许多19世纪中期的美国室内设计师不鼓励使用床帐、壁纸和地毯，因为它们容易积灰，使房间难以清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呼吸新鲜空气，强调室内应该保持空气流通。人们普遍认为，有益于健康的微风更容易吹进朝南的卧室。一些作者甚至建议人们面朝东方睡觉，因为如此一来，身体的方向就能和黄道保持一致了。《妇女之家》杂志和其他一些出版物鼓励人们睡在卧室外带有纱窗的门廊上。人们可以睡在经过特别设计的睡袋里，或者围着窗户搭一顶特殊的户外帐篷，这样睡在里面就能一直呼吸新鲜空气了。门廊朝向卧室一侧的窗户允许睡在帐篷里

的人和卧室里的人交谈。丈夫、妻子和孩子也许会睡在同一道门廊里。

1886年，伦敦梅普尔公司的卧室家具广告。图上展示了白色卧室系列家具和“铁铜合金四柱床架”

卧室家具在19世纪中期变得越来越常见，人们也更愿意花心思在室内装饰上。房间的装饰总是围绕着床，可以是简易床，也可以是精致的四柱床。照明仍然是个问题，主要还是依靠蜡烛，可如果把蜡烛放在床上就非常危险了，尤其是读书时不小心睡着的话。潘顿建议使用蜡烛灯，并在墙上搭一个煤气灯支架，以获得最大限度的照明。她在装饰房间时还喜欢摆放一些室内植物，她建议在夜间睡眠期间至少开一扇小窗。整间卧室应该是“美观、雅致、安静”的，像餐厅和客厅一样精心布置、整洁讲究，一切都应该“恰到好处”。

床的养护

床可以说是19世纪的家庭中最能称得上是劳动密集型家具的家具了。到19世纪60年代，四柱床已经过时了，许多权威人士强烈推荐使用黄铜制的床或铁制的床，因为它们更不容易生虫。木头和金属床架上面覆盖着一层层毯子、被子、床单，以及多层羽毛、马鬃和稻草床垫。潘顿女士尤其讨厌木制床架，因为“某些从中冒出来的神秘小动物会带来大麻烦”。一旦它们出现，就必须把床拆开、刷洗，再重新组装好。（157）如果某张床被传染病患者睡过，那就只能“把它烧掉”。潘顿喜欢铜制或铁制的床架，因为它们“干净、健康”。她自己睡在一张弹簧床垫上，整张床垫完全是编制的。这种床垫比“老式弹簧

床”舒适得多，因为睡在那种床垫上，每次翻身都会“咯吱咯吱”地响，“让人焦躁不安，无法入睡”。维多利亚时代的一本家庭手册上规定，每个家庭中应有一个铁床架、一张能覆盖住金属弹簧的厚厚的棕色床单、三四条毯子、一床羽绒被，还有几个枕头套。这位作者建议每天早上都翻动一次床垫，每天换两次枕套—晚上用色彩艳丽的枕套，白天就换成朴素的枕套。

在维多利亚时代，家政界的最高权威是伊莎贝拉·比顿（Isabella Beeton），她对待卧室清洁更是一丝不苟。她建议在打扫卧室前先搬开天鹅绒椅子，以免它沾染灰尘。“整理床铺时应当考虑到住客的喜好：有些人喜欢中间微微隆起、从床头向床腿倾斜的床；有些人则更喜欢完全平坦的床。”女佣得让床适应睡眠者的品位，摇床、拍床和翻床时都得小心翼翼。如果被子里面的羽绒露了出来，就必须换成新的。而铺床单的漫长过程结束之后，“每条褶皱都应当流畅优美”。（158）整理床铺的事情没完没了，而且这是个需要经过精心安排的过程，以避免任何“不必要的忙乱”。有人觉得，那些不得不听从比顿夫人的指示忙东忙西的女仆实在是太可怜了。

这支名副其实的“仆人大军”，为了清洁、健康和适宜而讲究的礼仪，把维多利亚时代的床变得清新而舒适。如果家里的仆人不多或者根本没有仆人，那么让卧室一尘不染的重担就落在了家庭主妇的肩上。19世纪90年代，伦敦郡议会的首席卫生官员雪莉·福斯特·墨菲（Shirley Forster Murphy）形容说，家中灰尘的主要成分是“伦敦干泥的粉末”，其中包括道路上的残渣和各种腐烂物的颗粒，“马和其他动物的粪便、鱼的内脏、死猫的尸体，还有垃圾桶里各种恶心的东西”。（159）除此之外，伦敦数十万所房屋和商铺几乎都是以煤供热的，从烟囱里飘出来的煤灰随处可见。灰尘和煤烟染黑了一切，细心的住户不得不用定期清洗的布盖住家具。除了弄脏家具以外，空气中的灰尘还会弄脏梳子。人们即使只梳一次头，头发也会变黑。鉴于现今的空气更加清洁，现在的西方人根本无法想象当时的环境究竟有多脏。

通常情况下，床垫是用马鬃填充的，如果没有马鬃，就用牛毛或羊毛。这种床垫总是铺在用稻草填充的垫子上面，以防被铁床架磨损。到19世纪末，许多昂贵的床垫里都有链式弹簧，但即使是这种床垫也需要用毛发衬垫。如果床垫里没有弹簧，就要在上面铺一层床罩，避免沾上四处飞扬的烟尘。就算是闲置的床，人们也会为它铺上一层羽绒被和一层毯子。这些床很贵，而且需要精心保养。

为了防止纤维缠结成块，人们每天都得翻转和摇动床垫。要紧贴着床垫铺一条垫底的床单，煤灰才不会渗透进去，然后是一条下层床

单、一条上层床单、几条毯子（在寒冷的天气里可能多达4条）、一个垫枕和几个普通枕头。枕头用优质的荷兰面料包覆，上面还会套着枕套。清洗这些床上用品是另一项艰巨的任务。几位作家建议每隔一周（用手）洗一次毯子，大约每月清洗一次床单。如果两个人共用一张床，就应该每两周洗一次床单。为了节省劳力，可以把床单交错清洗，先洗底层的，然后把上层的床单铺到底层，这样就又有一条干净的上层床单可用了。

一年两次，分别在春季和秋季，人们要对全部的床上用品进行大清洗—“春季大扫除”（spring cleaning）这个词语因此而来。另一位令人敬畏的家政管理专家玛丽·霍伊斯（Mary Haweis）表示，在一间体面的卧室里，跳蚤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160）床垫和枕头要拿到室外晾晒。在一个讲究的家庭中，如果有可以干重活的仆人，那么他每隔几年就会把被褥和床垫拆开，清洗干净、筛选羽毛、除去灰尘。每周至少要检查一次这些床品中是否存在跳蚤和其他虫子，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如果发现害虫，就得把床拆开用漂白液清洗。整间卧室需要彻底清洗和消毒，所有门窗都得封起来，达到密不通风的程度。如果害虫横行，情况不受控制，这张床就会被放进一个密闭的空房间里，然后房主会燃烧硫黄来消灭害虫。就像《彼得兔》的作者比阿特丽克斯·波特（Beatrix Potter）所说的那样，人们不希望“床上出现太多的自然史”。

除了这些值得关注的问题，那些大大咧咧的男士坚持要在卧室里写作而引发的问题也令人担忧。这样会发生不可避免的意外—墨水溅出来，而且再也擦不掉。犯错的男人会不假思索地抓起毛巾试图擦干净，结果只能是越擦越黑。当时，被称为“时尚室内装饰仲裁者”的霍伊斯夫人坚定地宣称，男士不该用卫生间里的毛巾擦墨水和洒出来的水。她建议在适当的毛巾架上多挂几条抹布。

这些卧室里的麻烦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解决干净？有时情况可能还会变得更糟。1973年，陷入困境的奥地利女作家英格褒·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的床意外失火，她本人也因此身亡。她是药物依赖患者，所以可能是在抽烟时睡着了。然而，根据20世纪初的一位作家推测，“卧室”在几代人之后就会消失，人们只会睡在有着卫生保障的书房或客厅的地板上。目前这种设想还没有实现。无论出现什么干扰，床和在床上发生的一切，总是决定了卧室的用途。

我们今天熟悉的卧室是人们对逃避日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喧嚣世界的渴望的直接产物。今天，可以说卧室是任何房子中最私密的地方（即使是家庭浴室也是半公共性质的，因为会有许多人使用它，甚至包括客人）。我们的卧室以有着床垫和柔软枕头的床为中心，是安享

舒适和宁静的理想场所。私人卧室里的宁静是维多利亚时代留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遗产之一。现在它广泛存在于工业化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中，也存在于世界各地的精英住宅之中。

尽管如此，无论是在装饰品位上还是在地域意识形态上，每种文化都把自己的特色带入了卧室。例如，在中国古代，以风水为参照的室内设计偏好让人联想到古老的“出生图”。在主卧室的布局规划中，床不能正对着卧室的门；床头不可靠墙；床不能以对角方向斜放，因为这样会创造负面气场；床不能摆在重梁之下，因为这会消耗主人的“气”，也就是个人能量；床不能放在窗户下面；床不能摆在靠近厨房或浴室的墙旁。这些观念中有一部分是相当明智的，虽然有时这种哲学玄乎其玄。因此，郑重其事的睡眠者被建议应注意自己的“卦数”。应根据自己的生辰和性别卜卦，然后按照特定的图表来确定床摆在房间里的什么地方吉利，摆在什么地方不吉利。为了更加准确，屋主配偶的“卦数”也应该被算进去。想想看，经过这么多努力，费了这么多心神，房间的主人确实会睡得很香。

不管我们怎样布置，较为僻静的卧室都是最近才出现的，属于我们的私人床也是近期才有的东西。我们在床上度过的时光从未如此安宁。或者，如果我们拒绝接受睡眠治疗师的每一个建议，而是选择以电子手段把整个世界都带上床的话，那就无法安宁了。

第十章

未来之床

床，这件看似平凡无奇的家具，其基本设计几千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它的功能，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改变都是显而易见的，简单朴素的“查波伊”就是有力的证明：它是实用而舒适的睡眠场所，但在不同地区也会体现出非常强烈的地方文化特色—它是搬到阳台上表演热情洋溢的诗朗诵的理想舞台，所以在巴基斯坦非常受欢迎。它还可以被搬上屋顶，让人在夜晚凉爽的习习微风中安眠。当床的主人离开人世，这张“查波伊”会被人们竖起，立在地上，以向逝者表达敬意。（161）

在我们身边所有的生活物品里，床是最常见的一种。在现代西方，床通常是被动的物体，被藏在角落里，不会对任何事情做出评论，但在其上发生的事却很有趣。1969年，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把酒店的床变成了政治舞台——他们举办了一场“卧床展览”以呼吁和平。那时他们刚结婚不久，在世界各地的床上待了整整一周。起先是在阿姆斯特丹的希尔顿酒店，然后是在蒙特利尔的伊丽莎白女王酒店。他们在豪华酒店的床上与访客进行热烈讨论，简直是当代的晨起接见仪式，最终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观众。如果有人还记得路易十四的话，这样的场景一定会让他们感到惊讶—但很可能没人会记得他。



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在蜜月期间躺在他们的“和平床”上

回到未来

未来主义者们已经发表了无数关于床的预言，其中大多数充其量只能算是幻想。正如达·芬奇研究所的托马斯·弗雷（Thomas Frey）所说：“在悬浮床上发生亲密关系会……促使人们更有创造力。”（162）一些决定性的趋势似乎很可能定义床和人之间的关系。也许最不可抗拒的是城市人口不断上升，以及，用委婉的说法，所谓的高密度住房激增这种令人不快的现实。这种住房往往会转化为高楼大厦—看看北京、上海、纽约或旧金山的非凡城市景观，那些地方的房价和房租都是天文数字。人们一辈子都住在小公寓里。成千上万的城市居民睡在客厅里，距厨房仅有几步之遥。狭小的居住空间迫使床和床垫的设计师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到极致。

几个世纪以前在君主的四柱大床下滚动的那种小轮床至今仍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有睡椅，曾因让睡眠者感到非常不适而恶名远播，但现在已经被人们用更好的铰链和床垫改进了许多，睡上去舒服多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折叠床并不新鲜。几十年前，西尔斯·罗巴克公司就已经开始出售“现代”折叠床了，但追根溯源，几乎所有现代的能够节省空间的室内设施都是“墨菲床”的后代。威廉·劳伦斯·墨菲（William Lawrence Murphy）出生在加利福尼亚，是“淘金热”时期某个淘金汉的儿子。（163）他曾驯养马匹，也赶过马车，还在一个拓荒者小镇当过几天治安官。20世纪初，他在旧金山租了一套一室小公寓，房间里几乎全部的空间都被他的床占据了。据说他那时正在追求

一位歌剧演员，但没办法邀请她到自己的公寓，因为人们认为未婚女子进入男人的卧室是不道德的，所以墨菲想要一张可以“隐形”的折叠床。他用一个旧的壁橱门框和几条门铰链做了一个枢轴，把床固定到墙上，让它能够折叠起来，这样在房间里就看不到它了。据墨菲的后代说，后来墨菲和女友结了婚，岳父借钱给他，让他去申请专利，生产他的新产品“墨菲床”（the Murphy-In-A-Dor Bed）。当1906年的地震袭击旧金山时，他的新事业已经走上了正轨。地震期间，折叠起来的墨菲床至少造成一名居民死亡。在人们涌进不断扩大的城市、住房拥挤、床位供不应求的时代，墨菲床作为节省空间的法宝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墨菲床的销售量在20世纪初达到顶峰，直到今天仍由同一家公司持续生产。



纽约一间公寓里的墨菲床

在墨菲床的设计中并没有使用箱式弹簧。床垫就安装在木制床板或金属丝网上面，用皮带固定，这样在把床折叠起来时床垫就不会掉下来。墨菲床最初的式样是垂直折叠到墙上的，但现在人们还可以购买到从侧面折叠的款式和带有折叠架子、桌子或折叠书桌的墨菲床——当床被收进墙壁时，这些架子和桌子就可以展开。有些型号的墨菲床甚至可以变形成沙发或办公设备。

对居住在空间昂贵的共管公寓或独立公寓中的人来说，墨菲床是理想的解决方案，特别是有了垂直电梯等新发明之后，这种床更容易在公寓楼里搬上搬下。当然，稳固的安装是必不可少的，以免床倒塌在安装者身上。1982年，有个醉汉在一张收拢的墨菲床里窒息而死；2005年，两名妇女被困在一张安装不当的墨菲床里，不幸丧命。墨菲床曾在查理·卓别林的电影《凌晨一点》（*One A.M.*，1916年）和“007”系列电影《雷霆谷》（*You Only Live Twice*）里扮演过重要角

色：詹姆斯·邦德被困在一张墨菲床里，然后被子弹射穿了—当然，他才不会真就这样死了。

要解决空间问题还有其他巧妙的办法。有些人把床从公寓的天花板上吊下来，这样也许能提供一种更高级的睡眠体验，并节省地板空间，但必须事先加固天花板，还得注意操作的正确性。还有一个办法：把床变成一间储藏室。这样人就可以睡在一件包含衣橱、书架和娱乐中心等综合功能的家具上面。只有单人床才符合这样的条件，因为必须在床上安装梯子，还得小心别摔下来。但是，未来可能属于“智能家具”。奥利生活公司（Ori Living）是研发智能家具的先驱，只需触碰开关、操作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或通过语音激活，就能让整个房间里的智能家具移动起来。针对居住在高密度城市住宅里的人，这家公司在宣传广告里乐观地承诺了一种“重新设想如何在现有的空间里生活……提高居住空间的宜居性，提升空间利用率”的方式。（164）奥利生活公司为用户提供的材料有：完整的假墙、壁橱、橱柜，还有其他接通电源就可以沿着磁力轨道滑动的家具。这面假墙可以来回推动或合拢，让沙发出现在原本是衣橱的地方。在他们的公寓套房里的床，就像某种发展到顶级的轮床，可以沿着墙滑动，在原本的位置摆上一张餐桌就可以把卧室变成餐厅或者聚会厅。别担心安全问题，奥利生活公司向客户保证，只要受到稍具质量的物体的阻挡，这种家具就会停止移动，而且就算停电，它们也可以轻易地被人力搬动。

改变空间

包括计算机程序员和作家在内的部分群体正逐渐把工作地点转移回家中。在空间紧张且昂贵的地方，那些不愿意或不会使用智能机械的人只能简单地对自己的房间做些调整，比如，他们会把床搭在自己的办公桌上。这样的床被称为“阁楼床”，在孩子们的房间里也很常见，因为他们比自己的父母更容易爬上这种床。

长期居住在狭小空间里的日本人，几百年来一直睡在一种日式被褥上。这是一种薄薄的床垫，白天收纳在柜子里，晚上就摊开铺在地板上。这种被褥是日式床垫的一部分，厚度约10厘米，大约是美式床垫的一半，因为美式床垫里填充着有机棉、乳胶和羊毛，非常厚实。日式被褥是直接铺在地板上的，每天早上都会被收起来。它们的巨大优势是可以腾出地面的空间，还能提供比传统的床更舒适的睡眠体验。使用这种被褥的人每两三周就得把它们翻动一次，这样才能让它均匀地磨损，还得记得在白天把它们收起来，防止底面发霉。人们还可以购买泡沫塑料材质的日式床垫，这在旧金山也很流行。

其他一些人，比如所谓的“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s），往往是年轻、富有并精通科技的西方人，已经开始接受这种移动中的生活了。荷兰建筑设计工作室马基·贝（Makkink and Bey）已经为这个市场设计出了一种概念床。他们在2014年发布的“流浪生活”未来折叠床采用了纯天然材料，包括木材、羊毛和大量白棉花。这张床唤起了以前人们对田园生活的想象与向往，但其中缺少了泥土的元素。床被紧紧地扎成圆形的包裹，主人可以轻松地把它背在身上。所有这些方案的目的都在于让更多的床挤进更狭小的空间。在工业革命开始300年后的今天，数百万人，包括整个家族、夫妇或仅仅是室友关系的那些人，挤住在比祖祖辈辈所拥有的更狭小的空间里。这种近距离接触重新定义了我们自19世纪以来所认识到的“隐私”。床上的隐私权是中产阶级世世代代的特权，如今已不复存在。公寓式住宅，意味着和家人，有时还得和最初只是陌生人的室友住在一起。如何把自己孤立出来？除了戴上降噪耳机，我们还需要更多更巧妙的解决方案。哪怕是住在传统卧室或较大空间里的人有时也渴望享受彻底的独处，但是在一个电视时刻发出响亮而刺耳的噪声、手机随处可见的世界里，这样的机会很难找到。

呼呼大睡

从杂志上和网络上的文章来看，我们西方人近乎疯狂地痴迷于寻找获得良好睡眠的方法。我们寻求神奇的、也许是神话般的连续8小时不受打扰的睡眠。这种追求的大部分探索都是围绕着药物、草药疗法以及种种建议进行的，比如不要在深夜喝酒、不要在午后喝咖啡，或者不要吃得太多，也不要吃得太晚。枕头也经过了重新设计，衍生出诸如“脸枕”（YourFacePillow）这样的产品。这种枕头两边的支撑是为了让人仰面安睡。慢慢发生着变化的床反映出技术的更迭和时尚的变迁。大部分创新都围绕着床垫展开，其中出现了一些非常吸引人的切入点，比如考虑到人们对水床的需求，这件在20世纪60年代非常时髦的产品应运而生。

水床存在的时间比这长得多，一些来源未经证实（很可惜）的资料暗示，水床起源于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但其实是旧金山州立大学工业设计专业的学生查尔斯·霍尔（Charles Hall）和他的朋友一起，为撰写他的硕士论文设计出了充水乙烯基床垫。（165）起初，他在试验中耗费了136千克玉米淀粉凝胶，甚至还用上了果冻，但很遗憾，这些材料最后都被分解了。后来他改用水做试验。毕业后，霍尔将他的水床命名为“欢乐窝”（the Pleasure Pit），并在加州的30家零售店出售。他的早期客户包括摇滚乐队“杰斐逊飞机”和“史默思兄弟”组合。然而，以嬉皮士和生活混乱的单身汉为目标客户的廉价仿制品开

始在市场中泛滥，霍尔难以捍卫自己的专利。其中一种仿制品被称为“湿梦”（Wet Dream），最大的卖点是带有强烈的性暗示意味。《花花公子》的主编休·海夫纳（Hugh Hefner）也定制过一张以塔斯马尼亚负鼠皮毛为表层材质的水床。20世纪80年代，水床已经成为主流，那些时常受到腰酸背痛困扰的人或对传统床垫过敏的人对其青睐有加。水床成了电影和电视节目中最受欢迎的话题，在这些节目中，水床总是会爆开或者突然漏水。

1987年，水床在美国销售的床垫中占比22%，但这种床自身也有严重的缺陷。如果你不介意把软水管接进卧室，那么水床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水床一旦灌满就会有溢出的风险，甚至会在人们睡着时突然泄漏。排空水床里的水需要借助电泵，但早期的电泵非常重。许多在水床上睡觉的人不喜欢那种湿软的感觉。到20世纪90年代，传统的床垫设计师提出创新，让他们的产品更轻、更软，使用体验更佳。面对竞争，水床市场迅速衰落，沦落为缝隙市场。今天，式样更复杂的水床不仅配备“内胆”—类似于巨大的水气球，起到波浪缓冲系统的作用，还可以加强温度控制，保证睡眠者时刻感到温暖。市场上还出售内置环绕声音响、治疗照明灯和提供太空失重体验的床垫的水床。那些热衷于水床的人是非常忠诚的，但现在的大多数人，即使依依不舍也都弃水床而去—有谁想让水管穿过自家卧室的窗户？霍尔本人现在住在华盛顿班布里奇岛，仍睡在水床上。他正在考虑更复杂的设计，想要与一位开家具连锁店的朋友联手，以佛罗里达州为测试市场，逐步东山再起。考虑到新一代人没有经历过20世纪70年代的那场革命，也许水床的时代会再次到来。

主流的床垫制造商仍在竞争激烈却利润丰厚的市场中运作，特别是北美市场。其中一些商家正在向海外扩张，他们认为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市场正在富有的睡眠者中蓬勃发展。他们想的可能没错，毕竟市场的风向变幻无常，即使他们提出的销售策略似乎有些保守。例如，著名的席伊丽床垫的产品线包括“有各种强化功能可供选择的”下垫，顾客可以订购一个只可调节头部位置的下垫，或直接购买“反射4”（Rflexion 4）款式，它为睡眠者的头和脚提供了符合人体力学的完全自由的活动范围。所有的下垫都配有无线遥控器，而“反射”系列还设计有“双重按摩区”。根据席伊丽公司的介绍，他们的顶级产品线“泰普尔”（Tempur-Pedic）床垫是“精心定制”的产品，是将丝绒混纺的垫面和“钻石浮雕”侧嵌板相结合的高端床垫。

人们想知道自己未来会迎来什么样的舒适巅峰。非常高端的床垫已经自成市场。来自瑞典的达克斯娜（Duxiana）床垫内置三重坚固层和腰部支撑系统，使睡眠者可以自行调整下背部的支撑受力。瑞典

的海斯滕公司是一家拥有150多年悠久历史的制床企业，经常为超级富豪提供一般需要手工缝制300多个小时才能制成的高端床垫，这种床垫的最低价格为1.3万美元，最高可达14万美元。床品套组或任何颇具异国情调的床上用品—毛皮、奢华至极的面料、精致的金属配件，任何人们能想到的东西都能以额外收费的方式接受定制。所有产品都是手工制作的，包括那些在我们普通人家的床垫上从不会出现的额外的工艺细节。海斯滕公司的床垫非常耐用，甚至可以世代相传。由加州床垫商克鲁夫特制造的“王宫”（Palais Royal）床垫价格稍低，内含数千个裹在手纺棉花芯里的弹簧，两层马鬃，还有10层以上其他的填充物，包括4.5千克新西兰羊绒。10个工匠花上3天时间才能制作完成这样一张床垫。英国床垫制造商维斯普林（Vispring）生产的是完全定制的床垫，顾客可以自由选择床垫的张力和其他细节，甚至可以要求在面料上加一层小羊驼毛—这将使床垫成本超过7.1万美元。据说这样一张床垫的柔软程度会让睡眠者觉得自己好像躺在云上。

如今，实际优势对人们而言更重于声望和特权。床再也不是用来炫耀的东西，但是那些为睡觉场所一掷千金的人只想把最好的东西放在身边，即使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因此睡得更好也没关系。随着不同的制造商热火朝天地争夺市场份额，人们对完美床垫的追求将有增无减。除了不断升级的内部技术之外，许多对床垫的创新还延伸到了床的附加品范围。越来越普遍的现象是，床正在成为逃避快节奏的现实世界的避风港。如今人们在意的事物中有很大一部分关乎和平与安宁，人们希望能自主选择是与外界保持联系还是一个人躲在自己的世界里。

就连家里的宠物也会因此变得安静。根据美国宠物产品协会统计，美国有近一半的宠物狗（62%的小型犬、41%的中型犬和32%的大型犬）和主人一起睡或睡在主人的床上。和主人一起睡既能带给猫狗安全感，也能让它们感到温暖。对于另外50%不和主人一起睡的狗来说，狗床已经开拓出了庞大的市场。这种床经常在网络购物平台出售，配图往往是一只黄色的拉布拉多犬懒洋洋地窝在舒适的床里。狗床市场中的高端产品会采用记忆泡沫作为填充物，还带有凸出的侧边和可拆洗的织物或垫褥。市面上甚至还出现了一种“洞床”，样子和睡袋差不多，或者就是个简单的垫子。此外，我们不能忘了还有车载狗床。以高端钓鱼装备和户外休闲活动用品为主营产品的户外用品销售商奥维斯公司号称其出售的“狠咬”（ToughChew）牌狗床“可以承受宠物的冲击和撕咬”。这种床具备双层结构，能抵抗动物的咀嚼、撕咬或抓挠。假如你的床被狗狗啃破了，奥维斯公司会为你全额退款。这种床有多种颜色，以采用柔软而坚韧的材料为产品特色，顾客还可以要求在上面绣自家爱犬的名字。

未来的床与梦

也许未来的床会变成像豆荚一样的舱床，当你懒洋洋地躺进被窝时，这张床能满足你的一切需求。这种床其实已经出现了，但还远没有普及。它与所有必要的计算机相连，通过监控睡眠者的舒适度来调节温度、光线，甚至包括外部声音的高低。当然，这种床配有自动按摩系统，可以使床轻轻摇动，缓慢轻柔地将睡眠者唤醒。配备了篷罩的舱床内部还具备多媒体屏幕，这样睡在其中的夫妇不用起床就可以看电视或浏览网页。当睡意来临时，只需按下一个按钮，这块屏幕就会闭合成一个普通的小窗口。

有些睡眠舱包括一套完整的多媒体娱乐系统，包括游戏机和高清投影仪。如你所料，睡眠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调整自己的床，可以随时降下百叶窗，与伴侣共度亲密时刻。人们也可以选择拥有一张生态床，这种床自带各种植物，由发光二极管提供其生长所需的光照。这种生态床不仅内置能够播放助眠音乐的音响，甚至还有独立的发电系统，能将发生在床内外的每一种活动都转化为能量。而“云床”是放松或睡觉的极佳场所，它利用磁力，使上端柔软的床垫悬浮起来。但这种床对许多人来说非常不实用，因为睡在这种床上意味着人们要过上清教徒般的禁欲生活。

舱床总是会让人联想到胶囊酒店—这是在整个酒店行业，尤其是在亚洲国家迅速扩张的一部分。它们既为商务旅行者服务，也迎合了精打细算的游客的需求：他们都需要最基础的设施—一个睡觉的地方、快速的无线网、为电子产品充电的设备，还有一张小桌子（如果有必要的话）。胶囊酒店特别适合年轻的城市旅行者，他们希望住在靠近市中心而且交通便利的地方，但越方便就越昂贵，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胶囊酒店及其简易床位的数量能在亚洲爆炸性增长的原因。许多胶囊酒店都是快速扩张中的连锁店，甚至还有按小时计费的钟点房，颇受机场里那些疲惫不堪的旅客的欢迎。而且，不言而喻的是，这种房间也方便了那些购买性服务的人。

最早的胶囊酒店起源于日本，作为住宿酒店，它几乎没有什么装饰，也不具备可以与同路旅客交流的空间。现在这种概念已经有所转变，胶囊酒店也越来越强调要设计出让员工共同工作的空间，以及供客人交流的区域。旅客甚至可以用社交软件定制自己的高科技睡眠舱。还有一些别出心裁的壁龛式胶囊酒店，比如在京都和东京的书店里的那些，床位设置在书架上，让旅客获得睡在书堆里的体验。其实，床还是和原来的一样，但可定制的睡眠环境越来越丰富，科技日臻成熟，所有人的床不会再千篇一律了。

舱床、篷盖床、磁悬浮床和豪华水床都有一个共同特征—联通性，而这个概念在几年前还不为人所知。有些床垫已经开始附带USB接口和蓝牙功能，床和智能手机实现完全同步也不过是早晚的事，这样人们就能一边准备起床、就寝，一边浏览网页或者上网聊天。也许未来某天，床会自动明白何时该调节温度高低、音量大小和灯光明暗，所有这些都与未来科技相关，人们要做的仅仅是懒洋洋地沉浸在智能力量所创造的舒适环境中。虚拟现实技术会使床垫具备让人们睡在盛开的鲜花丛中、纽约帝国大厦的楼顶上或满月和星空下的能力。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就能买到可以提供为每个睡眠者量身定制的舒适区，并配备单独的暖气和空调的床垫。肯定还会有人开发出全息图像伴侣，他会坐在床边为我们讲着睡前故事。当然，对我们二人而言，能够自动除虫，并且具备自我清洁能力的抗菌床垫更有吸引力。

像我们的祖先一样，未来的人无疑更喜欢躺在舒适的地面上，但未来学家可不会让床留在原地。一些人认为悬浮床就是床的终极形态，他们设想这种床下会有许多束不停喷射的气流，将人推向半空中。睡眠者可以调节气流强度，飘浮在自己的“太空模式”中。悬浮床的枕头会嵌入芯片和传感器，以测量睡眠者的生命体征，追踪其睡眠模式，并提供理想的唤醒时间。那时就连天花板和墙壁也会发光，模拟白天或夜晚的环境。现在的人还在谈论着适配于床用智能手机的耳机和耳塞，还有受语音和传感器控制的加热和制冷装置。鉴于居住密度越来越高，生活空间越来越小，能把客厅变为卧室的自动化家具也会被纳入讨论范围。垂直房间将会更加普遍，人们也许可以像宇航员那样睡在袋子里，但我们该如何创造失重环境，让这样的睡眠体验更舒适呢？

我们中的大多数还躺在我们的祖父母都很了解的老式床垫上，只是我们的床垫可能会比他们的更舒服一些。我们为什么要在这种混合产品中加入智能技术？我们真的希望电子产品除了监测我们的身体状况之外，还会记录我们的音乐品位、阅读偏好和消费习惯吗？对那些沉迷于健康监测手表和卡路里计算应用程序的人来说，答案也许是肯定的。我们很快就能买到一张内置睡眠追踪器的床垫。就理论上而言，我们的床不再会一成不变，而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改良。有些人认为睡眠监测会让人睡得更“智能”—不管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床垫也许会创造最佳的睡眠条件，但它无法解决困扰着人们的睡眠问题。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除了为了保持个人的日程安排而放弃一整天的工作之外，合理饮食，在适当的时间睡觉，定期锻炼，和伴侣享受鱼水之欢，才是提高睡眠质量的最佳良方。

床曾是热闹而充满活力的地方，也是衰落的生命消失于阴影之中

的地方，而现在它可能正在演变成真正的社交场所。美国艺术家劳里·安德森（Laurie Anderson）说：“科技，其实就是让我们围坐在一起讲故事的荧荧篝火。”她起码说对了一部分。可以预想，通过科技，我们能将世界上的任何人或任何想法带回自己的床上—这不是指对我们的祖先而言再正常不过的那种亲密肢体接触。极度亲密，极度疏离，今天的床一如既往地反映着我们的生活。掀开明日之床的床单，我们能够一眼望见世界的未来，它满是细微琐碎的噩梦，也包含着人们那显而易见的梦想—我们渴望着彼此间的联结。

参考书目

为了创作这本书，我们查阅了数以百计的文章、书籍和网站，其中许多是晦涩难懂的。我们只在这里列出了主要参考资料的来源。有心的读者会发现，这里列出的许多参考书目会涉及更专业的文献。除非另有说明，本书所有引用均出自下列出版物：

Baughan, Elizabeth P. 2013. *Couched in Death: Klinai and Identity in Anatolia and Beyond.*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Beard, Mary. *Guardian* article: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09/mar/2/ philosophy.

Bédoyère, Guy de la, ed. 1995. *Diary: John Evelyn.* Woodbridge, UK: Boydell Press.

Beeton, Isabella. 1859–61. *Mrs Beeton's Book of Household Management.* London: Chancellor Press, 1982.

Bhishagratna, Kaviraj Kunjalal, trans. 2006. *The Shushruta Samhita: An English and Translation Based on Original Texts.* New Delhi: Cosmo Publications.

Bianucci, Raffaella, et al. 2015. "Shedding New Light on the 18th Dynasty Mummies of the Royal Architect Kha and His Spouse Merit." PLOS One DOI: 10.1371/journal.pone.0131916.

Blackman, A. V. 1988. *The Story of King Cheops and the Magicians.* Hemet, CA: J. V. Books.

Blakeney, E. H., ed. *Tacitus: The Annals*. Vol. 1:498–502. London: J. M. Dent.

Blundell, Sue. 1995. *Women in Ancient Gree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ooth, Charlotte. 2015. *In Bed with the Ancient Egyptians*.

Amberley, UK: Stroud.

Borel, Brooke. 2015. *Infested: How the Beg Bug Infiltrated Our Bedrooms and Took Over the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utterfield. L. H. 1961. *Diary and Autobiography of John Adams*. Vol. 3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Carlano, Annie, and Bobbie Sumberg. 2006. *Sleeping Around: The Bed from Antiquity to Now*.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Santa Fe: Museum of International Folk Art.

Childe, Vere Gordon. 1983. *Skara Brae*. Rev. ed. London: HM Stationery Office.

Churchill, Winston S. 2013. *Churchill by Himself*. London: Rosetta Books.

Cook, Constance, and Xinhui Luo. 2017. *Birth in Ancient China: A Study of Metaphor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Pre-Imperial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Cooper, Jerold S. 2002. "Virginity in Ancient Mesopotamia." In *Sex and Gender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ed. S. Parpola and R. Whiting. Helsinki: SAA.

Crystal, Paul. 2015. *In Bed with the Romans*. Amberley, UK: Stroud.

Danchev, Alex, and Daniel Todman, eds. 2001. *Field Marshall Lord Alanbrooke: War Diaries, – *.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holson.

Daniélou, Alain. 1993. *The Complete Kama Sutra*.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den Boer, E. 2012. "Spirit Conception: Dreams in Aboriginal Australia." *Dreaming* 22, no. 3: 192–211.

Dodson, Aidan, and Dyan Hilton. 2004. *The Complete Royal Families of Egypt.*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Edwards, Carolyn P., and Marianne Bloch. 2010. "The Whitings'

Concepts of Culture and How They Have Fared in Contemporary Psychology and Anthropology." Faculty Publications,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501. http:// digitalcommons.unl.edu/psychfacpub/501.

Ekirch, Roger A. 2005. *At Day's Close: The Night in Times Past*. New York: Norton.

Elyot, Thomas. 1539. *The Castell of Helth*. London: Thomas Bethelet.

Fagan, Brian. 2004. *Fish on Friday: Feasting, Fasting,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New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Fagles, Robert. 1996. *The Odyssey: Homer*. New York: Viking.

Flanders, Judith. 2003. *Inside the Victorian Home: A Portrait of Domestics Life in Victorian England*. New York: Norton.

Freud, Sigmund, and James Strachey, trans. 2010.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The Complete and Definitive Text*. New York: Basic Books.

Frey, Thomas. 2016. *Epiphany Z: Eight Radical Visions for Transforming Your Future*. Hampton, VA: Morgan James.

Frink, Ledyard, and Margaret A. Frink. 1897. *Journal of a Party of California Gold Seekers*. Oakland, CA: publisher unknown.

George, Andrew. 2016. *The Epic of Gilgamesh*. Rev. ed. New York: Penguin Classics.

Glaskin, Katie, and Richard Chenhall, eds. 2013. *Sleep Around the World: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Gleig, George Robert. 1871. *The Life of Arthur, Duke of Wellington*. London: Longmans, Green, Reader, and Dyer.

Goodman, Ruth. 2017. *How to Be a Tudor*. New York: Liveright.

Greenfield, Rebecca. 2010.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exy, Icky, Practical) Waterbed." *Atlantic*, August 13, 2010.

Grundy, Mrs. 2010. *A History of Four Centuries of Morals in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tended to Illuminate Present Problems*. Reprint. Whitefish, MT: Kessinger.

Handley, Sasha. 2016. *Sleep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Hardy, Thomas. 1998 (1891).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Edited by John Paul Riquelme. New York: Bedford Books.

Haweis, Mary Eliza Joy. 1889. *The Art of Housekeeping*.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Horne, Jim. 2007. Sleepfaring: *The Secrets and Science of a Good Night's Sleep*.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bn Battuta. 1853–58. *The Travels of Ibn Battutah*. Translated by Tim MacintoshSmith. New York: Pan Macmillan.

James, H. E. M. 1888. *The Long White Mountain, or a Journey in Manchuria*. London: Longmans, Green, 1888.

Ker, James. 2009. *The Deaths of Sene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emp, Barry, et al. 2013. "Life, Death and beyond in Akhenaten's Egypt: Excavating the South Tombs Cemetery at Amarna." *Antiquity* 87, no. 335: 64–78.

King, Helen. 2005. *Greek and Roman Medicine*. Bristol, UK: Bristol Classical Press.

Knudsen, Christian D. 2012. "Naughty Nuns and Promiscuous Monks: Monastic Sexual Misconduct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 PhD diss., University of Toronto.

Kripke, D. F, et al. 2002. "Mortality Associated with Sleep Duration and Insomnia." *Arch Gen Psychiatry* 59, no. 2: 131–36.

Lattimore, Owen. 1941. *Mongol Journeys*. London: Jonathan Cape.

Lee, Jen-der, 1996. "Childbirth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67*, no. 3: 533–642. Translated by Sabine Wilms, 2005. Available online at www.brill.nl.

Le Goff, Jacques. 2009. *Saint Louis*.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Lehner, Mark, and Zahi Hawass. 2017. *Giza and the Pyramid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Leidloff, Jean. 1975. *The Continuum Concept: In Search of Happiness Lost*. New York: Da Capo Press.

Leyendecker, Liston Edgington. 1992. *Palace Car Prince: A Biography of George Mortimer Pullman*. Boulder: University Press of Colorado.

Licence, Amy. 2012. *In Bed with the Tudors*. Stroud, UK: Amberley.

Lorenzi, Rossella. 2017. "Fit for a King: Tut's Camping Bed Was an Ancient Marvel." *Live Science*, August 1, 2017. Livescience.com.

Malinowski, Bronislaw. 1929. *The Sexual Life of Savages in North-western Melanesia, British New Guinea*. London: Eugenics.

Malone, C., and S. Stoddart. 2016. "Figurines of Malta."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rehistoric Figurines*, ed. T. Insoll, 729–5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lone, C. A. T. 2008. "Metaphor and Maltese Art: Explorations in the Temple Period." *Journal of Mediterranean Archaeology* 21, no. 1: 81–108.

Marshall, Edward, February 6, 1927. "Edison at 80 views a world he changed." *New York Times* archives.

Mauriceau, Francis. 1668. *The Diseases of Women with Child, and in Child-Bed*. Translated by Hugh Chamberlen. London: T. Cox.

McGinn, Thomas A. J. 2004. *The Economy of Prostitution in the*

Roman Worl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Meigs, Charles. 1854. *On the Nature, Signs and Treatment of Childbed Fevers*. Philadelphia: Blanchard and Lea.

Melville, Herman. 2012 (1851). *Moby-Dick*.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Miller, Warren Hastings. 1915. *Camp Craft*. Reprint. Kolkata: Ananda Quinn.

Mitford, Nancy, and Philip Mansel. 2012. *The Sun King*. New York: NYRB Classics.

Nadel, Dani. 2004. "Continuity and Change: The Ohalo II and the Natufian Dwelling Structures (Jordan Valley, Israel)." In *The Last Hunter-Gatherers in the Near East*, ed. C. Delage, 75–84. Oxford: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Naughan, Elizabeth P. 2013. *Couched in Death*.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Nava, Alessia, et al. 2017. "Virtual Histological Assessment of the Prenatal Life History and Age at Death of the Upper Paleolithic Fetus from Ostuni (Italy)." Nature.com Scientific Reports, 7, Article number: 9527.

Needham, Joseph, and Ho Ping-Yü. (1959). "Elixir Poisoning in Medieval China." *Janus* 48: 221–51. Reprinted in *Clerks and Craftsmen in China and theWest: Lectures and Addresses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16–3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Nunn, John Francis. 2002. *Ancient Egyptian Medicine*.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Olsen, Donald J. 1976. *The Growth of Victorian London*. New York: Penguin.

Ormiston, Rosalind, and Nicholas W. Wells. 2010. *William Morris: Artist, Craftsman, Pioneer*. Rev. ed. London: Flame Tree.

Panton, Jane Ellen. 1888. *From Kitchen to Garrett: Hints for Young Householders.* London: Ward and Downey.

Parker Pearson, Mike. 2012. *Stonehenge: Exploring the Greatest Stone Age Mystery.* London: Simon and Schuster.

Patterson, Anthony. 2013. *Mrs Grundy's Enemies: Censorship, Realist Fic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Sexual Representation.* Bern, Switzerland: Peter Lang.

Pawlik, Kurt, and Mark R Rosenzweig, eds. 2000. *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Psychology.* London: SAGE.

Pepys, Samuel, and Mynors Bright. 1970. *The Diary of Samuel Pepys: A New and Complete Transcrip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histon, William. 1609. *The Schoole of Good Manners, or A New Schoole of Vertue.* London: W. White for William Inoes.

Plato. *Phaedo.* Translated by Benjamin Jowett, 1892. Reissued by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2017.

Pliny the Elder. 2013 (AD 77). *Pliny's Natural History: In Thirty-Seven Books,* ed. Philemon Holland. Seattle: Amazon Digital Services.

Reeves, Nicholas. 1990. *The Complete Tutankhamun.*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Reisner, George. 1923. *Excavations at Kerma.* Cambridge: Peabody Museum, Harvard University).

Reiss, Benjamin. 2017. *Wild Nights: How Taming Sleep Created Our Restless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Richards, Colin, ed. 2005. *Dwelling among the Monuments.* Cambridge: MacDonald Institute. Richards, Colin, and Richard Jones, eds. 2016. *The Development of Neolithic House Societies in Orkney.* Oxford: Oxbow Books.

Richardson, A. E., and H. Donaldson Eberlein. 1925. *The English*

Inn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Batsford.

Richardson, Glen. 2014. *The Field of the Cloth of Go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aint-Simon de Rouvroy, Louis. 1910. *Memoirs of Louis XIV and His Court and of the Regency.* New York: C. F. Collier.

Samson, Donald R. 2012. "The Chimpanzee Nest Quantified: Morphology and Ecology of Arboreal Sleeping Platforms within the Dry Habitat Site of ToroSemiliki Wildlife Reserve, Uganda." *Primates* 53: 357–64.

Shafer, Harry J., and Vaughn M. Bryant Jr. 1977. *Archaeological and Botanical Studies at Hinds Cave, Val Verde County, Texas.*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Anthropological Laboratory, Special Series 1.

Siculus, Diodorus. 2014. *Historical Library*. Translated by Giles Lauren. Seattle: Amazon Digital Services.

Skoggard, Carl A. 2000. "Asleep with Painted Ladies." *Nest* 10: 100–105.

Soranus of Ephesus. 1991. *Soranus' Gynecology.* Translated by Owsei Temki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Speert, Harold. 2004.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A History and Iconography.* 3rd ed. Boca Raton, FL: CRC Press.

Startzman, Ethan. 2014. "A Brief History of Sleeping Bags." ezinearticles.com, January 21, 2014.

Szpakowska, Kasla, and John Baines. 2006. *Through a Glass Darkly: Magic, Dreams, and Prophecy in Ancient Egypt.* Swansea, UK: Classical Press of Wales.

Tahhan, Diana Adis. 2013. "Sensuous Connections in Sleep: Feelings of Security and Interdependency in Japanese Sleep Rituals." In *Sleep around the World: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ed. Katie Glaskin and Richard Chenhall, 61–78.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Tannahill, Reay. 1980. *Sex in History*. New York: Stein and Day.

Tetley, Michael. 2000. "Instinctive Sleeping and Resting Postures: An Anthropological and Zoological Approach to Treatment of Lower Back and Joint Pain."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21: 1616.

Thesiger, Wilfred, and John Lee Anderson. 2008. *The March Arabs.* Reprint. Baltimore: Penguin Classics.

Thoemmes, Megan S., et al. 2018. "Ecology of Sleeping: The Microbial and Arthropod Associates of Chimpanzee Beds." *Royal Society Open Science* 5, no. 5: 180382 DOI: 10.1098/rsos.180382.

Tomalin, Claire. 2007. *Samuel Pepys: The Unequalled Self.* New York: Vintage.

Tosh, John. 1999. A Man's Place: Masculinity and the Middle-Class Home in Victorian Englan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Van Gulik, Robert H. 1994. *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Chinese Sex and Society from ca. B.C. till A.D.* Leiden: Brill.

Van Meilj, Toon. 2013. "Maori Collective Sleeping as Cultural Resistance." In *Sleep around the World: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ed. Katie Glaskin and Richard Chenhall, 133–50.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Vaughan, William. 1609. *Approved Directions for Health, Both Natural and Artificiall.* London: T. Snodham for Roger Jackson.

Wadley, Lyn, et al. 2011. "Middle Stone Age Bedding Construction and Settlement Patterns at Sibudu, South Africa." *Science* 334: 6061.

Walker, Matthew. 2017. *Why We Sleep.*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Warren, Samuel D., and Louis D. Brandeis. 1890. "The Right to Privacy." *Harvard Law Review* 4, no. 5: 193–220.

Wehr, Thomas. 1992. "In Short Photoperiods, Human Sleep Is Biphasic." *Journal of Sleep Research* 1, no. 2: 103–7.

Whitelock, Anna. 2013. *Elizabeth's Bed: An Intimate History of Elizabeth's Court.* New York: Picador.

Whiting, John, and Eleanor Hollenberg Chasdi, eds. 2006. *Culture and Human Development: The Selected Papers of John Whit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ilkinson, Richard. 2017. *Louis XIV.* Abingdon, UK: Routledge.

Worsley, Lucy. 2012. *If Walls Could Talk: An Intimate History of the Home.* New York: Bloomsbury.

Wright, Lawrence. 2004. *Warm and Snug: The History of the Bed.* Stroud, UK: Sutton Books.

Xenophon. 1979. *Xenophon in Seven Volumes.* Vol. 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Yetish, Gandhi, et al. 2015. "Natural Sleep and Its Seasonal Variations in Three Pre-industrial Societies." *Current Biology* 25, no. 21: 2862–68.

致谢

即使在最疯狂的梦想中，我们也从来没有想象过，作为考古学家，我们会写一本关于床的书—这可是我们会在上面度过人生的三分之一的家具！事实上，一旦我们开始动笔，这本书就从对文物的研究，扩展为一部关于“人类在床上做过的一切”的完整历史。

写作过程坎坎坷坷，最终造就一本充满挑战却富有魅力的书。这本书的“播种”源于一次演讲：布莱恩被要求在正处于合并过程中的“舒达”（Serta）和席梦思床垫公司的高层管理小型会议上发表一段关于床的演讲。演讲过后，耶鲁大学的编辑比尔·弗鲁赫特劝说他写一本关于这个话题的书，因此布莱恩·费根博士邀请了朋友兼创作伙伴纳迪亚·杜兰尼，我们二人由此成为共同作者。

对此，我们极为感谢。布莱恩非常感谢蒙特利尔的莫比里斯策略顾问公司（Mobilis Strategic Advisors Inc.）的克里斯·库珀（Chris Cooper）和玛丽·拉森（Mary Larson），最初是他们把他带进“舒达”和席梦思合并项目的顾问团队，为他提供了这次机会，并向他提出了建议。耶鲁大学出版社（Yale University Press）的比尔·弗鲁赫特和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的雪莉·洛温科夫（Shelly Lowenkopf）一直给予我们鼓励。而在最后阶段，我们与文字编辑劳伦斯·肯尼（Lawrence Kenney）的合作充满快乐。我们十分感激许多提出了意见、想法和建议的朋友和同事，因为他们人数众多，我们无法在此一一表达感谢。请接受我们对你们所有人的谢意！我们要特别感谢艾丹·多德森（Aidan Dodson）、约翰·赫伯特（John Herbert）、马修·希利尔（Matthew Hillier）、卡罗琳·马龙（Caroline Malone）、乔治·迈克尔斯（George Michaels）、奥特·佩恩（Ortrun Peyn）、萨米娜·里亚兹（Samina Riaz）、弗农·斯卡伯勒（Vernon Scarborough）和凯瑟琳·夏普（Kathleen Sharp）。

最后，衷心感谢我们的家人，很抱歉在创作这本书的漫长过程中对他们疏于陪伴。没有他们，本书就无法完成。感谢所有人，还有我家的猫—阿提库斯·凯提库斯·凯塔摩尔·慕斯。

[1] 1英尺约等于0.3米。——编者

[2] 提夫人（Tiv），生活在尼日利亚东南部的民族。查加人（Chagga），坦桑尼亚的第三大民族，母语为班图语。吉威人（G/wi），一个由大约2000人组成的非洲闪族人社会，生活在博茨瓦纳的卡拉哈里野生动物保护区及其附近，被称为“丛林人”。——译者

[3] 本段描述与我国真实情况不符，这是外国学者不了解中国文化传统的体现。——编者

[4] 中国古代译作“妙闻”。——编者

[5] 即东汉思想家王充的《论衡·四讳篇》。——编者

[6] 帕尔在亨利八世去世后再婚。——编者

[7] 根据《古埃及百科全书》，阿伊是图坦卡蒙的大臣，法老死后，他娶了法老的遗孀，自己登上了王位。——译者

[8] 纳瓦布，印度莫卧儿帝国时代副王和各省总督的称谓。莫卧儿帝国衰落后，孟加拉、奥德和阿尔科特等地独立的地方统治者亦沿用这一称谓。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纳瓦布成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一些土著封建王公的称号。——译者

(1) Wright, 2004.

(2) Samson, 2012.

(3) Thoemmes et al, 2018.

(4) Wadley et al., 2011.

(5) Nadel, 2004.

(6) Shafer and Bryant, 1977.

(7) Childe, 1983.

(8) Richards, 2005; Richards and Jones, 2016.

(9) Parker Pearson, 2012.

(10) Malone and Stoddart, 2016; Malone, 2008.

(11) Tetley, 2000. A useful general account of ground sleeping: "Instinctive sleeping and resting postures: an anthropological and zoological approach to treatment of lower back and joint pain,"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1119282/.

(12) Dodson and Hilton, 2004.

(13) Reeves, 1990.

(14) Siculus, Historical Library, vol. 1: chapter 70.

(15) Carlano and Sumberg, 2006; Crystal, 2015.

(16) For the Tristan Quilt, see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website: http:// collections.vam.ac.uk/item/098183/the-tristan-quilt-bed-cover-unknown/.

(17) https://www.pepysdiary.com/diary/1666/08/15.

(18) Ormiston and Wells, 2010.

(19) http://www.retailtimes.co.uk/bed-overtakes-sofa-used-piece-furniture-britishhomes-made-com-reports/.

(20) Sir William Vaughan (c. 1575–1641) was a Welsh writer who promoted colonization in Newfoundland. The quotation is from Vaughan, 1609, chapter 3.

(21) Phiston, 1609.

(22) Ibid.

(23) Cited by Ekirch, 2005: 310.

(24) Freud and Strachey, 2010.

(25) Horne, 2007: 165.

(26) Den Boer, 2012.

(27) Wehr, 1992.

(28) Ekirch, 2005. For early modern England, see Handley, 2016.

(29) Glaskin and Chenhall, 2013.

(30) See Yetish et al., 2015.

(31) Huffington , 2017: 76.

(32) Walker, 2017.

(33) Reiss, 2017.

(34) Horne, 207.

(35) Churchill, 2013: 999.

(36) From an interview with Edison by Edward Marshall,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6, 1927.

(37) Kripke et al., 2002.

(38) Tacitus, Annals 15: 37–41. Emperor Nero (AD 37–68) was an extravagant, tyrannical ruler who committed suicide when he learned he had been condemned to death in absentia as a "public enemy".

(39) Crystal, 2015.

(40) Booth, 2015.

(41) Cooper, 2002: 94.

(42) Xenophon, 1979, chapter 7, section 11.

(43) Crystal, 2015: 144.

(44) Wright, 2004: 72.

(45) Tannahill, 1980, chapter 7.

(46) Grundy, 2010. See also Patterson, 2013.

(47) Malinowski, 1929.

(48) George, 2016.

(49) Crystal, 2015: 15. British Museum accession number 1867, 0509.55.

(50) Tannahill, 1980: 164. See also Van Gulik, 1994.

(51) Tannahill, 1980. See chapter 8 for a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See also Daniélou, 1993.

(52) Knudsen, 2012.

(53) Scientific analysis of the teeth of the fetus, performed in 2017, revealed that mother and baby died between the thirty-first and thirty-third gestational weeks and that both suffered severe stress during the last two and a half months of life. See Nava et al., 2017, for the full illustrated report.

(54) Genesis 3:16.

(55) The Seated Woman of Çatalhöyük (with restored head) is on permanent display at the Anatolian Civilizations Museum, Ankara, Turkey (see kultur. gov.tr).

(56) For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current infant mortality rates, see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ttp://www.who.int/gho/child_health/mortality/mortality_ under_five_text/en/.

(57) Papyrus Westcar: www.revolvy.com. For background and discussion, see Booth, 2015, and Blackman, 1988.

(58) Nunn, 2002.

(59) Sushruta or Susruta, called the Father of Surgery, was born around 600 BC in Uttar Pradesh, India. His treatise *The Compendium of Sushruta*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urviving ancient texts on medicine. See Bhishagratna, 2006.

(60) King, 2005; Soranus of Ephesus and Owsei Temkin, 1991.

(61) Posidippus, as quoted by Blundell, 1995: 131. Posidippus was an epigraphic poet of the second century BC.

(62) Cook and Luo, 2017.

(63) From *Ishinpo*, 23.8 a. *Ishinpo*, thirty volumes long and the oldest surviving Japanese medical text, was completed in AD 984 by Ramba Yasuyori. As quoted by Jen-der Lee, 1996: 228.

(64) From Wang Tao, quoting from the work of Cui Zhiti (d. AD 681), who wrote widely on childbirth medicine. As quoted by Jen-der Lee, 1996: 235.

(65) This saying comes from *Ishinpo*, 23.24a, as quoted by Jen-der Lee, 1996: 234.

(66) Licence, 2012: 213.

(67) As detailed by the botanic gardens at Kew, London (kew.org).

(68) Licence, 2012: 213.

(69) From a study by Roger Schofield, 1993. "Did the mothers really die?" in Peter Laslett, ed., *The World We Have Lo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ited by Licence, 2012.

(70) François Mauriceau (1637–1709) was a leading seventeenth-century obstetrician. Quotation in Mauriceau, 1668: 157.

(71) Meigs, 1854: 104. Charles Delucena Meigs (1792–1869) was an American obstetrician who opposed obstetrical anesthesia and believed physicians' hands could not possibly transmit disease.

(72) Kleeman, 2015.

(73) El Brujo is a complex of ceremonial structures built by the Moche state of coastal Peru between AD 1 and 600. The Lady of Cao remains unpublished in detail, except for popular accounts, including a feature by Nadia Durrani in *Current World Archaeology* (2009, issue 35): see https://www.world-archaeology. com/travel/moche-route-the/.

(74) Quotation from Tablet 8 of the Epic of Gilgamesh, fully searchable online at http://www.ancienttexts.org/library/mesopotamian/gilgamesh/tab8.htm. Or see also George, 2016.

(75) Baughan, 2013, chapters 1, 2.

(76) Reisner, 1923.

(77) Kemp et al., 2013.

(78) Bianucci et al., 2015.

(79) Reeves, 1990.

(80) The contents of Kha19s tomb are on display at the refurbished Museo Egizio (Egyptian museum) in Turin, Italy. See https://www.museoegizio.it/en/.

(81) Tomb H18 was published by the archaeologist Kathleen

Kenyon, the excavator of Jericho, in 1960 and is cited by Baughan, 2013.

(82) Baughan, 2013.

(83) Needham and Ping-Yü, 1959, 1970.

(84) Whitelock, 2013: 338ff.

(85) Quoted in ibid., 342.

(86) Ibid.

(87) Plato (born in the mid to late 420s BC) recorded Socrates's death (in 399 BC) in Phaedo, also known to ancient readers as "On the Soul". Text translated by Benjamin Jowett (1892), quotation from 113.

(88) Tacitus was born around AD 56–57, when Nero was emperor. Quotation from *Annals*, book 15: 60–64. See Blakeney, 1908, 1:498–502. For Seneca's death, see Ker, 2009.

(89) Nimoy's tweet can be found here: https://twitter.com/therealnimoy/status/56 9762773204217857?lang=en.

(90) Steenkamp was Pistorius's girlfriend. Pistorius was convicted of murdering her in 2013. Her tweet is here: https://twitter.com/reevasteenkamp?lang=en.

(91) Hardy, 1998: 117.

(92) For footage of the Torajans, see http://www.bbc.co.uk/news/magazine-39603771.

(93) The Great Bed of Ware can be seen at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Room 57. See www.vam.ac.uk. Prince Ludwig I of Anhalt-Köthen (1579–1650) was also an unexceptional princeling who preferre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o making war. Quote from www.greatbedofware.org.uk.

(94) Shakespeare, *Twelfth Night* 3:2.

(95) Quotations from www.greatbedofware.org.uk.

(96) Ekirch, 2005: 279. See also Worsley, 2012.

(97) Melville, 2012: 36.

(98) Butterfield, 1961: 418.

(99) Leidloff, 1975: 17.

(100) John Whiting (1908–91) and his wife, Beatrice Whiting (1914–2004), were leading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ists who pioneered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ld development,first at Yale and then at Harvard. See Edwards and Bloch (2010) for an overview of their work, and Pawlik and Rosenzweig, 2000: 242, for more on the research cited here.

(101) Carlano and Sumburg, 2006: 83.

(102) Handley, 2016.

(103) Ekirch, 2005.

(104) Ibid.

(105) Tomalin, 2007.

(106) Tahhan, 2013.

(107) From *The Works of Benjamin Jonson* (London, 1616), quoted by Ekirch 2005: 292.

(108) Soranus and Temkin, 1991. See also Soranos, *Gynaikia* (P. Burguière, D. Gourévitch, and Y. Malinas, trans. and eds., *Soranus d'Ephèse: maladies des femmes* [Paris 1988], 1:xxxix–xl).

(109) For James McKenna's work, see https://cosleeping.nd.edu.

(110) Ibid.

(111) Carlona and Sumberg, 2006.

(112) Borel, 2015.

(113) Gizelle Schoch, personal communication.

(114) Reiss, 2017.

(115) Lorenzi, 2017.

(116) Lehner and Hawass, 2017.

(117) Quotations from Fagles, 1996: book 4, ll. 332–35, and book 20, l. 410.

(118) Thesiger and Anderson, 2008.

(119) Lattimore, 1941.

(120) Richardson, 2014.

(121) The Englishman John Evelyn was a writer on many topics, including horticulture, theology, and vegetarianism. He kept his *Diary* (some parts are more like a memoir in that they were added much later) from 1640 to 1706. Quotation from Bédoyère, 1995: 63.

(122) Ibn Battuta. 1853–58, 3:380.

(123) George Robert Gleig (1796–1888) was a soldier who became a priest. He wrote numerous books on military topics, including a biography of Wellington. Quotation from Gleig, 1871: 127.

(124) Information on Napoleon's camp bed is from Fondation Napoleon at Napoleon.org. HomeHistory of the Two EmpiresObjectsNapoleon's camp bed.

(125) Quotations in this paragraph from Miller, 1915: 62.

(126) Startzman, 2014.

(127) Frink and Frink, 1897: 7.

(128) Richardson and Eberlein, 1925.

(129) Leyendecker, 1992.

(130) Discussion of RVs is in Jim Morrison, "Commemorating 100 Years of the RV," www.Smithsonianmag.com, August 24, 2010.

(131) Wright, 2004: 29.

(132) Ibid.

(133) Big marital beds: ibid., 73.

(134) Whitelock, 2013.

(135) Ibid., 244.

(136) Mitford and Mansel, 2012.

(137) Siculus, 2014: vol. 1: chapter 70.

(138) The Duke of Saint-Simon (1675–1755) was a soldier, writer, and unrivaled, if unreliable, chronicler of King Louis XIV's court. Saint-Simon's *The Memoirs of Louis XIV* is a major source on Versailles. See https://www.gutenberg.org/files/3875/3875-h/3875-h.htm.

(139) Wright, 2004: 108.

(140) Saddiq Muhammed Khan Abassi IV's bed is known from a watercolor and several 1882 photographs taken by Christofle. See Skoggard, 2000.

(141) Danchev and Todman, 2001: 223.

(142) Comment made at a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workshop on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n 2013.

(143) Malinowski, 1929.

(144) Pliny the Elder, *Natural History*, book 35. Pliny and Holland, 2013.

(145) Pompeii graffiti: McGinn, 2004.

(146) Quotations in this paragraph are from Fagan, 2004: 18–23.

(147) Olsen, 1976.

(148) Tosh, 1999.

(149) Flanders, 2003, introduction and chapter 1.

(150) From the June 1918 edition of *Earnshaw's Infants' Department*, a trade publication.

(151) Warren and Brandeis, 1890: 196.

(152) Flanders, 2003, chapter 1.

(153) Quoted by Ekirch, 2005: 282.

(154) Panton, 1888: 182.

(155) Ibid., 183.

(156) Ibid., 189.

(157) Ibid., 140.

(158) Beeton, 1859–61: 992.

(159) Flanders, 2003: 47.

(160) Haweis, 1889.

(161) Charpoys: www.stringbedco.com.

(162) Frey, 2016: 65.

(163) The best summary of Murphy's life is at https://www.en.wikipedia.org/wiki/ Murphy_bed.

(164) https://oriliving.com.

(165) Greenfield, 2010.



未读 Club

为读者提供有温度、有质量、有趣味的

泛阅读服务



专属社群 独家福利

精品共读 活动特权

手机扫码

加入未读 Club 会员计划

未読 ADR

图说
史前时代到
21世纪

目录

版权信息
引言
大事年表
第一章　史前人类
- 早期人类
- 人类起源和迁移
- 狩猎和采集的生活

第二章　古代世界
- 农业的诞生
- 驯化动物
- 我们如何出行：马
- 防御工事的起源
- 神之城
- 文明的摇篮
- 摇篮之外
- 有组织的宗教
- 改变世界的物品：金属
- 文字的诞生
- 货币

第三章　古典文明
- 帝国崛起，政治发展
- 中国的崛起
- 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的对抗
- 古代的非洲
- 西南亚帝国
- 古希腊世界
- 古罗马
- 我们如何出行：车轮和道路
- 罗马衰亡
- 皇城

第四章　中世纪
- 第二波“蛮族”入侵
- 地中海帝国
- 征服世界之人
- 城市和贸易

中世纪的中国
中世纪的非洲帝国
改变世界的物品：火药
哥伦布抵达前的美洲帝国
中世纪的科技
中世纪的生活百态
封建制度
市场经济的传播
黑死病和社会
大洋洲人的早期思想
波利尼西亚旅人
第五章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探索海洋
我们如何出行：航海
征服美洲
改变世界的物品：糖
奥斯曼帝国
近代的非洲
文艺复兴
近代的日本
满族入关，清朝建立
城市：主导亚洲的等级体系
印度莫卧儿帝国
路德宗教改革
欧洲混战
君主专制
第一次科技革命
启蒙运动
通信的发展
18世纪的世界经济
第六章　革命浪潮和民族觉醒
七年战争（1756—1763年）
美国独立战争
第二次科技革命
18世纪90年代的危机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
殖民地
拉丁美洲为自由而战
美洲奴隶制的终结
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年）

必由之路：美国的扩张
工业革命
改变世界的物品：煤
蒸汽动力
我们如何出行：铁路
通信技术革命
民族主义萌发
英国对印度的统治
清朝衰落
帝国的城市
明治维新
瓜分非洲
西方的挑战
用地图绘制社会
第七章　战争笼罩下的世界
世纪之交
第一次世界大战
东线作战
俄国革命
西班牙大流感
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1919—1938年）
妇女和选举权
中国走向共和
电影
人类对抗疾病
我们如何出行：飞机
经济大萧条
食物
极端主义兴起
中国抗日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
巴巴罗萨计划
改变世界的物品：石油
第八章　现代世界
冷战
冷战中的美苏经济
非殖民化运动
独立后的非洲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崛起
东亚土地改革

- 冷战后的美国
- 现代消费兴起
- 流行文化
- 现代音乐
- 电视普及
- 养活世界
- 现代饮食
- 环保主义
- 世界人口
- 未来的城市
- 现代科技
- 改变世界的物品：计算机芯片
- 我们如何出行：太空

结语

返回总目录

版权信息

被人类改变和改变人类的10万年：图说史前时代到21世纪

A HISTORY OF THE WORLD 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

作者：[英] 杰里米·布莱克（Jeremy Black）

译者：王喆 骆怡然

出品方：未读·思想家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Text Copyright © by Jeremy Black

Copyright © Arcturus Holdings Limited

Picture credits © Library of Congress:pg144–45 and front page

This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8 by Arcturus Publishing Limited 26/27 Bickels Yard, 151–153 Bermondsey Street,London SE1 3H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9 by United Sky (Beijing) New Media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致艾伦·纽曼

本书概念得以成形，得益于我多年讲授世界历史的经验，以及受邀前往斯蒂尔曼学院针对相关话题所做的演讲。同时，我要感谢威廉·吉布森和海科·温宁给予的宝贵建议，感谢约翰·图灵从编辑角度给予的协助。我将本书献给老朋友艾伦·纽曼，以纪念我们五十多年的友谊。

引言

变化和延续是人类生活的主旋律，它们相互交织，一如岁序更替、寒来暑往、世代更迭般永不休止。自古以来，人类的所作所为以及鉴古、崇古的文化心理反映出其对环境具有持续的适应能力。这一点在人类社会的运作机制、社会结构及思维方式等方面都有所体现。

人类需要这种强大的适应力，因为若不借助科技，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并不适合人类生存。人类无法凭借自身能力飞翔，也无法在水下生活，而地球上的大部分区域都被水覆盖着。尽管人类可以驾船出海，靠捕鱼和雨水维持生命，但却难以长期生活在水上。地球上的部分水域常年冰封，一旦冬季来临，结冰范围扩大，人类对此无能为力。在北冰洋水域，这种情况尤为突出。

地球上有不少地方要么极寒，要么极热，要么干旱，要么多山……环境恶劣，不宜居住。南极洲面积广袤，天寒地冻，在近代科学考察站建立之前，杳无人迹。直到1911年，挪威极地探险家罗尔德·阿蒙森抵达，成为第一个到达南极点的人。而在1909年，美国极地探险家罗伯特·皮尔里则是首个成功到达北极点的人。

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土地贫瘠、植被稀少，动物也寥寥无几，捕食者难成规模。以非洲撒哈拉为代表的沙漠地区，不论是降雨还是土壤都十分贫乏，难以维持大量生命。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的大沙漠，比如亚洲的戈壁沙漠、南美洲的阿塔卡马沙漠、澳大利亚腹地的吉布森沙漠和辛普森沙漠，以及美国西南部的一些沙漠等。欧洲大陆是个例外，境内一片沙漠都没有。不过，确实有人能适应恶劣的环境，在沙漠中生活。尽管洛杉矶这座大城市人口较少，而且是借助欧文斯山谷的水源发展起来的，但用水问题仍旧突出。



1911年，罗尔德·阿蒙森成为第一个到达南极点的人。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大规模改变环境的能力非常有限，除了灌溉供水和砍伐树木以外，别无他法。直到19世纪后期，人类发明出具有更大威力的炸药，在阿尔卑斯山开山破石、挖掘隧道，这也是人类大规模改变环境的重要例子。像巴拿马运河那样的伟大工程表明，哪怕进入了现代，人类依然缺乏相应的组织能力。该运河于19世纪80年代动工，最初的建造者是法国人，但直到1914年它才被美国人完工，无数工人在修建过程中因染上疟疾和黄热病而死去。直到现在，人类对气候及天气变化的规律依然一知半解，更别提改变它们了。

另外，人类长期面临着人类的群体性属性制造的挑战。人类必须群居，才可以繁衍并保护后代，因为人类婴儿有很长的脆弱期。同狮子这类较为强大的动物竞争，保护同伴免受其害，需要团队协作。农业、战争，以及后续的发展，都需要更高程度的团队协作。一个发展程度较高的人类群体自然而然会同其他人类群体展开竞争，那种认为人类原本喜爱和平，因生活所迫才好战的观点已被多数人否定。这种观点与其说证据确凿，不如说它是来自《圣经》中伊甸园的遐想以及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乌托邦思想。

继而，这种竞争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塑造了一些规范，指导着人类的设想和行为。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如何才能取悦诸神（或上帝）？如何对待邪神和敌人？这些规范常出现在宗教教义和社会习俗

中，帮助人们认识环境，特别是帮助他们判断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在社会中生存。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从未有定论，不同的解读引申出五花八门的政治观点和做法，从而让这些问题更有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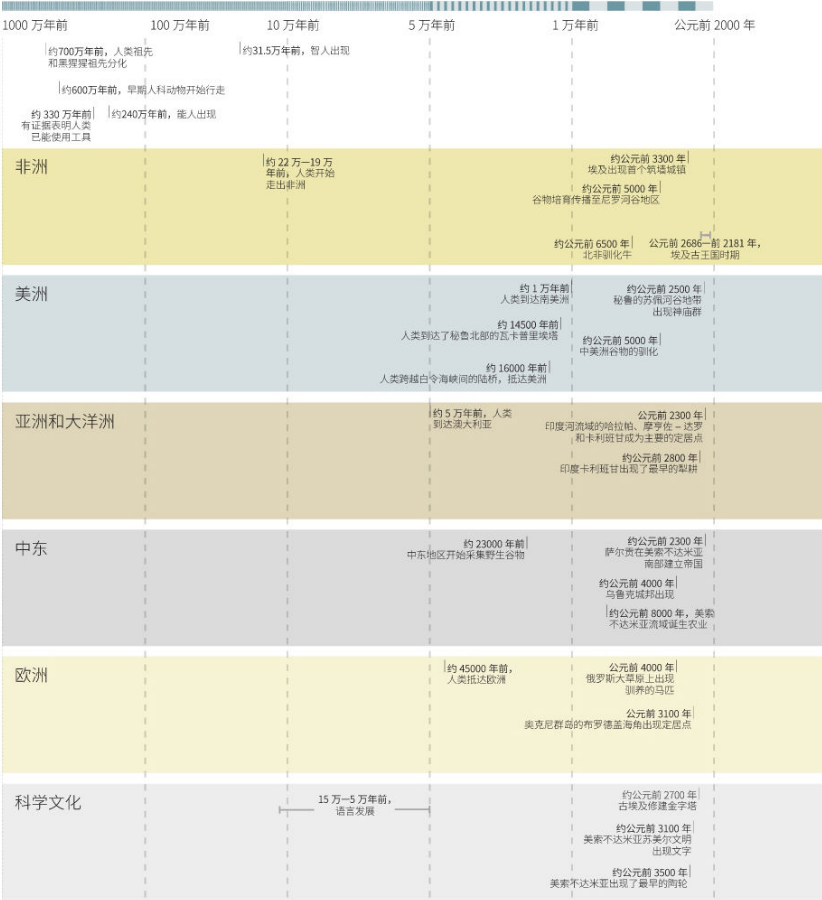
言归正传，我们继续谈“史前历史”（这个名词本身就十分“现代”）。很快，人类便不再受限于去适应环境了，而是开始尝试改变环境，以便满足人类自身的需求，满足人类种植作物和蓄养牲畜的需求。这是一个由资源和空间需求驱动的过程。如何改造环境取决于人类的意识形态，由于信息存储和传输系统的发展（比如文字），这一过程更是加速进行。早期人类族群的迁移活动，比如为追捕猎物进行长途跋涉或季节性迁徙，正是他们渴望获取资源和空间的最好证明。不过，人类不仅改变环境，他们自身也因周遭的环境而改变。比如，生活在日照不足地区的人逐渐演化出浅色皮肤的基因，以帮助人体合成更多的维生素D[1]。因此，在距今大约8000—7000年前，生活在欧洲大陆的人的肤色逐渐变浅，而这一变化最早发生在北欧。

人类并非唯一能适应环境并进行演化的物种，但其在沟通、组织等社会技能上的快速发展，使其在适应环境方面较其他物种表现得尤为出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人类成为最成功的哺乳动物开始，历史便进入了现代。尽管鸟类活动范围较大，而且能迅速结队行动，但人类却掌握了支配它们的能力。人类是杂食动物，不像大多数食肉动物或者食草动物那样，受限于单一的食物来源，因而领地超过其他任何一个物种。从史前部落到现代大都市，人类不断扩张，但人类拥有改变自身命运的能力在历史上却一直被低估了。

本书将讨论人类的相关能力及其后果，如果能引发你思考——不仅思考本书中的内容，还能针对自身经历和身边世界进行思考，那便达到了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如果你不同意本书观点，请先思考一下原因，然后再阐述你的观点，以便促进理解。

大事年表

表中每个阴影框代表 1000 年



公元前 2000 年 | 公元前 1500 年 | 公元前 1000 年 | 公元前 500 年 | 公元元年 | 公元 500 年 | 公元 1000 年

公元前 2040—前 1786 年，埃及中王国时期

公元前 1567—前 1085 年，埃及新王国时期

约公元前800年，炼铁技术首次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出现

639年，阿拉伯人攻占埃及

公元前30年，埃及沦为罗马的行省

公元前 100—公元 600 年，阿克苏姆帝国成为地跨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的贸易强国

公元前 900 年，查文文化诞生于秘鲁

约公元前 200 年，纳斯卡线条被雕刻在秘鲁南部沙漠的表面

986 年 “红发埃里克”开启了维京人在格陵兰的定居之路

公元前 1150 年，奥尔梅克文明兴起

约公元前 450 年 墨西哥瓦哈卡的蒙特阿尔班城兴起

约 400 年，特奥蒂瓦坎城内出现密集的建筑物

约公元元年—公元 600 年，莫切文化兴盛于安第斯山

约 750 年，奇琴伊察成为玛雅的一个重要城市

约公元前 200 年，波利尼西亚人开始在太平洋岛上定居

约 650 年，复活节岛居民开始建造宗教石台

公元前 322 年 旃陀罗笈多·孔雀起兵推翻难陀王朝

公元前 206 年，中国汉朝建立

700 年，新西兰开始有定居点

公元前 261—前 260 年，羯陵伽之战

公元前 1600—前 1046 年，中国商朝

公元前 210—前 209 年，匈奴联盟统一蒙古

公元前 935 年，新亚述帝国建立

公元前 331 年，亚历山大大帝在高加米拉战役中击败波斯帝国

约 420—530 年，波斯境内建筑戈尔甘长城防御工事

公元前 612 年，米底联合巴比伦攻破亚述首都尼尼微

公元前 1500—前 1300 年，米坦尼帝国

公元前 539 年，居鲁士大帝征服巴比伦

公元前 1600—前 1178 年，赫梯帝国

公元前 550 年，居鲁士大帝建立波斯帝国

750 年 阿拔斯王朝推翻倭马亚王朝

公元前 1100 年，希腊迈锡尼文明覆灭

312 年 君士坦丁一世改信基督教

732 年 普瓦提埃之战

793 年，维京掠夺者进攻林迪斯法恩的修道院

公元前 753 年 传说罗慕路斯和雷穆斯两兄弟建立了罗马城

公元前 44 年 恺撒被刺杀

476 年 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任君主被废黜

955 年，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在利奇菲尔德击败马扎尔人

9 年 条顿堡森林战役

843 年 查理曼大帝的孙子们根据《凡尔登条约》瓜分了帝国

公元前 1600 年，迈锡尼成为地中海强国

公元前 480 年，萨拉米斯战役

公元前 432 年，雅典帕特农神庙竣工

约 322 年，中国已有马镫

约 904 年 中国已知使用火药武器最早的记录

约公元前 530—前 400 年，希腊戏剧发展。这个时期的主要剧作家有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德斯和索福克勒斯

大事年表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非洲

- 约 1000 年，大津巴布韦的石墙开始动工
- 约 1100 年，廷巴克图的建设初步成形
- 1250 年，马穆鲁克人推翻埃及的阿尤布王朝
- 1324 年，马里帝国国王曼萨·穆萨前往麦加朝圣
- 1498 年，葡萄牙人开始在莫桑比克进行贸易
- 1517 年，奥斯曼人征服埃及
- 1562 年，塞西－丁吉尔成为埃塞俄比亚的国王
- 1578 年，葡萄牙军队在摩洛哥遭遇失败
- 1591 年，摩洛哥军队在汤迪比战役中打败桑海帝国

美洲

- 约 1000 年，维京人的小型定居点在纽芬兰建立
- 1050 年，密西西比河流域兴建大型土丘
- 约 1200 年，印加人定居在库斯科附近的安第斯山谷
- 1224 年，奇琴伊察城邦被推翻
- 1325 年，特诺奇蒂特兰建立
- 1492 年，哥伦布抵达西印度群岛
- 1519—1521 年，西班牙征服阿兹特克帝国
- 1531—1535 年，西班牙人征服印加帝国
- 1536 年，曼科·印加起兵反抗西班牙军队，并在比尔卡班巴建国继续抵抗
- 1539—1542 年，埃尔南多·德·索托的探险队深入密西西比流域
- 1572 年，印加的最后一任统治者图帕克·阿马鲁去世
- 1607 年，英国人前往弗吉尼亚永久定居
- 1756—1763 年，七年战争
- 1775 年，美国独立战争开始

亚洲和大洋洲

- 1044 年，在蒲甘创建缅甸的首个王国
- 1206 年，蒙古帝国建立
- 1227 年，成吉思汗去世
- 1279 年，忽必烈完成蒙古征服中国的霸业
- 1361 年，帖木儿在中亚建立了帝国
- 1368 年，明朝建立
- 1405—1433 年，郑和率领中国的宝船舰队进行跨越印度洋的探险
- 1467—1477 年，"应仁之乱"，日本进入战国时代
- 1498 年，瓦斯科·达·伽马率先完成从欧洲到印度的海航
- 1526 年，莫卧儿王朝占领德里
- 1603 年，日本进入德川幕府统治时期
- 1639 年，日本将葡萄牙人驱逐出境
- 1644 年，满族入关，征服中原
- 1757 年，英国军队在普拉西战役中获胜，确立东印度公司对孟加拉地区的统治

中东

- 1258 年，蒙古人占领巴格达
- 1260 年，马穆鲁克士兵在叙利亚击败蒙古侵略者
- 1401 年，帖木儿洗劫巴格达
- 1739 年，波斯的纳迪尔沙率军入侵印度北部

欧洲

- 1066 年，征服者威廉入侵英格兰
- 1241 年，蒙古大军入侵东欧
- 1453 年，奥斯曼人攻占君士坦丁堡
- 1529 年，苏丹大帝国攻维也纳
- 1571 年，奥斯曼军队在勒班托海战遭遇惨败
- 1618—1648 年，三十年战争
- 1683 年，奥斯曼帝国第二次围攻维也纳
- 1756—1763 年，七年战争
- 1789 年，法国大革命爆发

科学文化

- 约 1041—1048 年，中国发明活字印刷术
- 1517 年，马丁·路德发布《九十五条论纲》，宗教改革开始
- 1519—1522 年，费迪南·麦哲伦完成了世界上首次环球航行
- 1543 年，哥白尼发表日心说
- 1660 年，英国皇家学会成立
- 1783 年，首次载人热气球飞行实验

公元 1000—2011 年

1800 1840 1880 1920 1960 2000

1918—1919 年，西班牙流感暴发

1929 年，大萧条开始

2011 年 世界人口达到 70 亿

1869 年，苏伊士运河开通

1884 年，柏林会议开启瓜分非洲的狂潮

1954—1962 年，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

1957 年 加纳成为非洲第一个获得独立的殖民地

1967 年 尼日利亚爆发比夫拉战争

1980 年，津巴布韦建立黑人占多数的统治

1994 年 南非取缔种族隔离

1807 年，英国禁止奴隶贸易

1804 年，法属海地获得独立

1821 年，西蒙·玻利瓦尔带领委内瑞拉脱离西班牙的控制，获得独立

1861—1865 年，美国南北战争

1876 年，乔治·卡斯特在小巨角河战役被击溃

1888 年，巴西废除奴隶制

1913 年，墨西哥革命开始

1941 年，珍珠港遭袭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

1788 年，英国在澳大利亚建立首个定居点

1795 年，卡米哈米哈一世统一夏威夷群岛

1840—1842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

1851—1864 年 太平天国运动

1853 年，美国战舰逼迫日本打开国门，与西方进行贸易

1857—1859 年 印度民族大起义

1868 年，明治维新——日本开始迅速推进现代化进程

1893 年，新西兰成为第一个赋予女性选举权的国家

1911 年 辛亥革命

1919 年，中国爆发"五四运动"

1931—1945 年 抗日战争

1947 年，印巴分治

1949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0—1953 年，朝鲜战争

1946—1950 年，中国解放战争

1955—1975 年，越南战争

1979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

1967 年，六日战争

1948 年，以色列建国

1815 年，拿破仑终被打败，在维也纳会议上确定新秩序

1833 年，大英帝国废除奴隶制

1848 年，革命浪潮席卷欧洲

1914—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

1939—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4 年，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

1936 年 西班牙内战爆发

1917 年，俄国革命

1949 年，北约成立

1989 年 柏林墙倒塌

1991 年 苏联解体

1825 年，第一条客运蒸汽铁路试车成功

1844 年，莫尔斯电码首次正式使用

1859 年，查尔斯·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

1869 年，美国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线竣工

1876 年，电话发明

1895 年，无线电报发明

1903 年，莱特兄弟完成首次飞行

1922 年 詹姆斯·乔伊斯发表《尤利西斯》

1928 年，青霉素被发现

1926 年，约翰·罗杰·贝尔德发明电视

1961 年 首次载人航天飞行

1969 年 人类首次登月

1978 年 首例试管婴儿

1979 年，天花被消灭

1971 年，微处理器问世

1989 年 万维网诞生

1996 年 第一只克隆的哺乳动物诞生

第一章　史前人类

1000万年前—公元前1万年

在英格兰德文郡托贝区的尼安德特洞有早期人类生活过，这个洞穴里遍布钟乳石和石笋，十分壮观。早期人类之所以将其当作庇护所，是因为该洞穴洞口朝东，既向阳又不会被潮湿的西南风侵袭。如今，对于游客和艺术家来说，尼安德特洞可谓是观光胜地和灵感源泉；而在漫长的人类史中，该洞穴见证了人类逐渐适应陆地，还有面对陆地上的机遇和考验的艰难历程。

早期人类

早在人类出现以前，地球及大多数生命已存在多时。岩浆冷却形成地壳时，人类尚未出现；两栖动物通过演化离开原始海洋时，人类尚未出现；地质时代[2]历经多次更迭变换，人类仍未出现。哪怕在恐龙雄霸一时，随后消亡之际，人类依然没有作为第一批演化的哺乳动物出现。最早的爬行类动物出现在大约3.1亿年以前，而真正的哺乳动物[3]则在大约2.2亿年前才出现，其外形和老鼠、鼩鼱[4]相似。

人类属灵长目（哺乳纲的一个分支），是一种靠母乳喂养幼崽的恒温动物。类似灵长目的生物最早出现在约6600万年前，大概与恐龙灭绝的时代同期。而最早的猿则在2300万年前才出现。灵长类动物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们的脑容量大、四肢灵巧，还有社会特征。它们最初大多栖息于树上，后来凭借惊人的适应能力转移到陆地上生活。由于陆地上植被众多，早期人类不再靠四肢爬行，开始用两条后腿走路。

同时，汗腺功能的进化使人类在活动后能够迅速地散热，从而提升了他们在陆地上生活的机动性，使其能在不同的气候带生活。[5]人类的大脑皮层面积较大，因而智商较高，这也是其称雄的关键因素之一。另外，高度灵活的双手使得人类不仅能发明工具，还能比其他动物更高效地使用工具。

直立行走是人类演化进程中一次飞跃式的进步。人类的双足狭长，包括大脚趾在内的五根脚趾向前平直伸出，而非弯曲的爪形，这一特征帮助人类维持身体平衡，使之活动更加灵巧。我们可以从非洲出土的化石记录中一窥人类足部的演化历程：在埃塞俄比亚发现的距

今440万年的始祖地猿（Ardipithecus ramidus）化石，是目前已知的最古老且较完整的人族[6]化石，其足部与猿相似；在坦桑尼亚莱托里发现的约370万年前类似现代人类的足迹，被认为来自人科的另一个属——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此外，有新证据表明，非洲以外地区也存在人科物种（此处指人类谱系的早期成员），如在希腊和保加利亚发现的部分化石碎片，经分析后确认是距今720万年的欧兰猿[7]（Graecopithecus），更加佐证了该观点。现代人类正是从这些祖先族群演化而来，最开始是能人（Homo habilis），接着是更具人类特征的直立人（Homo erectus）、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最后是智人（Homo sapiens）。

考古学的新发现和不断提高的遗传分析水平，让人类起源和迁移的学说有所变化，同时也引起了诸多争议。例如，近年来在希腊克里特岛（早期的克里特与欧亚大陆板块相连，尚未分离成地中海上的一座岛屿）发现了类似人类的脚印。2010年后的分析结果向既定观点发起了挑战。足印大约形成于579万年前，比在非洲坦桑尼亚发现的莱托里脚印还要早约200万年。人们早前认为，人类起源于东非并聚居在那里，后来才向外迁徙至欧洲和亚洲。而这一发现对此观点造成了巨大冲击，即便无法全盘推翻，至少促使有关学者重新界定早期人类向欧亚迁徙的时间。

大约400万年前，气候变化导致大片森林消失。为适应陆地生活，用双脚行走成了早期人类的一个特征。为实现直立行走，人类的双腿需要不断演化，包括获取提速能力、增大步幅、提高灵活性以及支撑躯干。约330万年前，人类双臂的主要功能发生变化：由爬行转为使用工具，这一变化对人类的发展极为重要。人类最初使用的工具很简单，手边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当成工具使用，后来才逐渐针对不同用途制作了专门工具。岩石、木材和兽骨是制作工具的基本材料，后来工具材质发生变化：由早期的单一材质逐渐变成复合材质，这一变化不仅使工具更加实用，更展现出了人类优于其他物种的强大适应力。该变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人类可以使用石器制作其他工具，比如质地坚硬的石头既可以用来当锤子砸开坚果（就像铁砧上的锤子），也可用来打制石矛尖，甚至锤炼金属工具。黑猩猩也能使用石器，但仅限于砸开坚果。人类的聪明才智使得工具的使用拥有无限可能性。

人类起源和迁移

在传统意义上，人类学家认为我们所属的物种——现代智人，起

源于非洲（约31.5万年前），并在非洲完成了由早期人类向智人的演化。随后，智人向外迁移，取代了当时生活在非洲大陆外的原始人属物种，如直立人和尼安德特人；部分地区偶有混种繁衍的情况发生。但是不同人属物种间的竞争和冲突究竟有多激烈，我们不得而知。不过，通过DNA的分析比对发现，现代人类的基因中确实存在尼安德特人的DNA，这证明了混种繁衍理论并非无稽之谈。



任何精确绘制的人类迁移地图都易造成误导，因为对于出行只能徒步的早期人类来说，距离远非地图所示的那般轻描淡写。

不过，近来一些发现使得“源出非洲”理论被质疑。现今关于人类起源的问题，学者们各执一词、争论不休：一方支持人类单地起源说；另一方支持更复杂的多地起源说，认为基因流动发生在不同地区的人属物种之间。多地起源说认为，世界各地的早期人类各自演化成今天的现代智人，只是在演化过程中，为适应当地环境而产生了明显的地区性差异。

不论是从非洲还是其他区域中心出发，早期智人在迁移过程中见到的地貌和海岸线与现今的世界大相径庭。当时，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并未脱离东南亚大陆，人类通过两地间的陆地完成跨洋迁移；澳大利亚与位于其东南海域的塔斯马尼亚岛同样如此（当时白令海峡尚未形成，美洲大陆与亚洲大陆之间尚存陆桥）。这一时期的人类还不会造船（约5万年前才掌握该技能），面对洋流和狂风，只能望洋兴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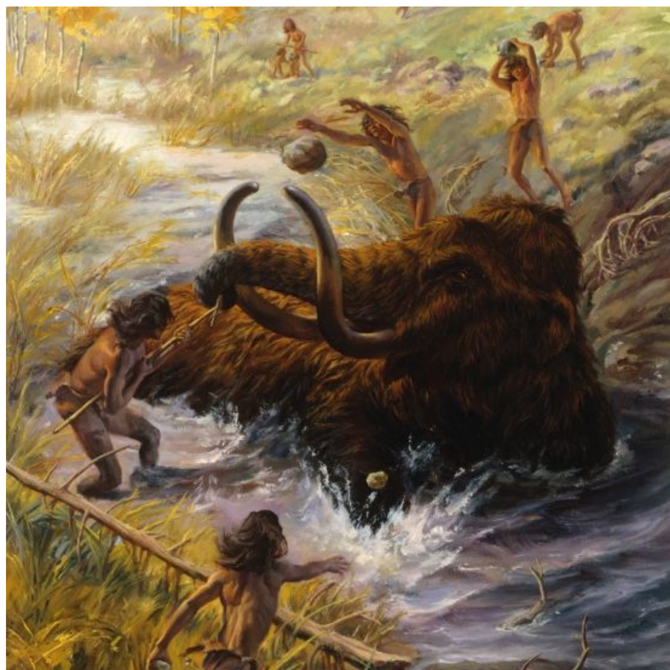
大约5万年前，或许是为了前往澳大利亚，现代智人建造了历史上第一艘船。约4.5万年前，智人到达欧洲。至于人类何时到达美洲，争论尤为激烈。主流观点认为：约3.6万年前智人从亚洲出发，在冰河时代横跨白令海峡的陆桥，首次抵达美洲。但另一种向北迁移的说法却认为，智人是从南美洲迁入北美洲的。不过普遍观点认为，

美洲人类的迁移大致是自北向南行进，约在1.1万年前抵达中美洲，1万年前进入南美洲。

接连的新发现将人类迁移的时间进一步提前，这意味着气候变化或许是促使22万—19万年前人类离开非洲的因素之一。2017年，古生物学家在摩洛哥的岩石中发现了距今约30万年的智人遗骸化石，这比普遍认为的直立人向智人演化的时间早了10万年。此外，相关学者在以色列的米斯利亚洞穴中也发现了距今17.5万年的智人骨碎片化石。同时，洞中其他证据表明当时人类已有控制火种和使用石器的能力。

狩猎和采集的生活

早期人类已是杂食性动物，掌握了狩猎和采集的技能，多样的饮食结构和保障食物来源的技能使他们得以迁至世界各地。随着武器的发展和捕猎技术的改进，他们甚至能追捕乳齿象或者猛犸象这样的大型哺乳动物。公元前10000—前9000年，北美的早期移居者已经能用大型石制矛尖当武器，刺入猛犸象的身体，将其杀死后分食。后来，早期人类还能捕猎其他动物和鱼类以食用。2010年，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发现了一个墓穴，里面有一具女婴遗骸和另一具死亡时间约在公元前9500年的婴儿遗骸，他们身下铺了一层磨尖的鹿角和武器，身上盖着红赭石。在中美洲，树懒、乳齿象和大犰狳也是人类的猎物。在欧洲，猛犸象、乳齿象、剑齿虎、巨鹿和披毛犀等大型哺乳动物在同一时期灭绝了。



语言沟通能力和集体组织能力对捕猎至关重要，也是广义上社会发展的组成部分。火的使用对人类的进步意义重大，因为它可以提供保护，比如在洞穴中，人类可以用火驱赶野兽。不仅如此，人类还懂得保留有用的物品以备后需，并掌握了分工完成任务。打制石片技术[8]日益成熟，其发展随着细石器[9]的出现达到顶峰，燧石制成的细石器可安装在木柄或者骨棒上，用作刀具或者箭头。

公元前10000年左右，末次冰期[10]结束，相较于其他动物，人类由于懂得狩猎而更能应对冰川消退所带来的各种可能性。人类对抗其他食肉动物的能力与日俱增，熊和狼等猛兽渐渐被驱逐到深山丛林中，远离人类的聚居地。

冰河时代末期，全球变暖促使人类进行迁移。由于气候变暖，森林带和野生动物聚集带不断向两极移动，桦树、松树和榛树等耐寒树木被橡树、榆树、栲树和椴树等落叶乔木取代。落叶林中的灌木郁郁葱葱，多样的动植物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在欧洲，马鹿、狍子和野猪向北迁移，这让同样向北迁移的狩猎者有了食物来源。鱼叉和船的发展也帮助了人类获取海味。在一些沿海地区，如日本，对贝类的采集因此增多。为了广泛搜索食物资源，人类几乎踏足全球各地，甚至连沙漠边缘和极地边缘都有人类定居。

人类通过食用猎获的肉类，能够快速获得蛋白质，无须像消化野果、野菜那样费时。或许在8万年前，人类已普遍掌握火的使用方法，用火烹煮食物进一步提高了人类获取能量的效率。尽管生存方式不断进步、生活区域不断扩大，早期人类的数量仍然不多。他们以小群体聚居，掌握了部分生存技能，不过数千年来这些技能的进步意义一直被后人们所考量。

洞穴艺术

显然，狩猎在早期人类社会中至关重要。许多地区的洞穴中都刻有早期人类狩猎场景的岩画，尤其在西班牙。如库瓦德拉维亚[11]洞穴中的岩画描绘了人类持弓箭捕猎牡鹿的场景；阿尔塔米拉洞穴的岩壁上（约公元前34000年）绘有野牛和野猪；库瓦德拉皮莱塔洞穴的岩画中出现了豹群、山羊群和一条大鱼。约公元前6000年，撒哈拉阿杰尔高原[12]居民绘了一幅岩石画，描绘了人类捕猎长颈鹿的场景。考古学家在克什米尔的布扎哈马地区发现了一幅绘于约公元前4300年的岩画，画中描绘了猎人围捕公牛的场景。与此同时，考古学家在早期人类的聚居地还发现了动物骨化石，这些发现都证明了人类已经能使用武器和工具猎杀、切分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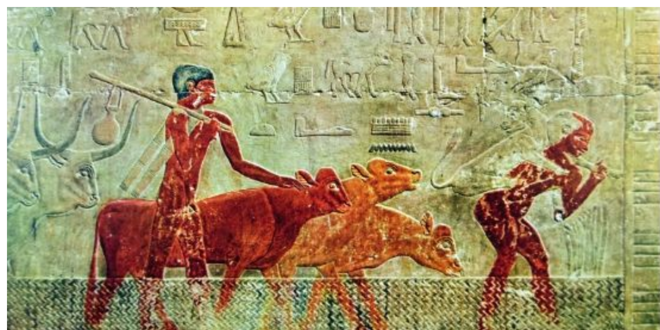
第二章　古代世界

公元前14500—前1000年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与自然环境的互动越发密切。世界上富饶的河谷地带农业繁荣、粮食富余，伟大的文明应运而生。人类驯养动物用于农耕，同时也用作食物和交通工具。人类构筑起信仰体系，用来解释严酷而神秘的周围环境。

农业的诞生

长久以来，人类学习狩猎和采集并以此为生，这一模式在末次冰期结束时开始发生变化。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已经学会收割、研磨以及储藏野生谷物用以果腹。多产的野生谷物随处可见，在气候温暖、土壤肥沃的河谷地带尤是如此，比如非洲的尼罗河谷地、尼日尔河谷地以及中东地区，野生谷物极大地丰富了当地人的食物来源。由此开始到人类有意识地培育作物，再到开始农耕活动，经历了漫长的转变期。公元前9000年，叙利亚北部居民已经开始培育大粒谷物，如二粒小麦和单粒小麦等早期品种。有证据显示，公元前8000年，巴勒斯坦的杰里科也种植过同品种的小麦。到公元前7000年前后，耕种已取代狩猎和采集，成为西南亚人的主要生存方式。其他地区也有农业萌芽，主要集中在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中国北部和公元前5000年的中美洲。



农作物的种植和动物的驯化使社会更复杂化，这反映在艺术作品中，如埃及卢克索一座墓穴中的这幅创作于公元前11世纪的壁画。

在不同地区种植特定的作物是人类因地制宜的一大体现。小麦和大麦最早种植在中东地区，逐渐向外传播，约在公元前5000年传入埃及；小麦主要被种植在中国北部；水稻集中在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和黄河流域；南美洲有玉米、马铃薯、木薯、红辣椒、美洲南瓜和豆类；中美洲有玉米、丝兰和薯蓣；非洲有小米、高粱和薯蓣；新几内亚有芋头。人类能够根据作物对湿度、土地排水能力、温差以及土壤酸度的需求进行相应调整，这充分体现了人类的聪明才智。这些经验不只限于族群内部交流，在族群之间也广为流传。农作物的传播范围极广，如大豆就从中美洲传播到了密西西比河流域和美国的西南部。

作物培育的优势在耕种和粮食储藏上得到了充分体现。野生的单粒小麦的茎秆脆弱易折，很难收割；而人工培育的小麦品种谷粒更大，茎秆也更结实。早期农民选择高产的品种种植，不仅产量远高于野生品种，收成时间也更容易预测。

通过检测留存至今的微量植物花粉，考古学家发现，作物产量的提高和农业工具的发展共同推动了森林砍伐的进程。

人类在农业发展的过程中习得了诸多新技能。除了耕种和收割所需的技能，人类还掌握了一些专业技能，如将谷物研磨成粉并妥善储存，防止因恶劣天气或者动物破坏而造成损失。大约公元前7000年，石磨成了重要的研磨工具，陶器也被广泛用于储藏和烹煮食物。

由于人口增多以及农耕的需要，人类不得不在某地定居，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定居点的雏形。这些聚落非常复杂，不单单是简单的住宅。在新石器时代的欧洲（约公元前4000—前2000年），人类会在定居点建造仪式纪念碑、墓穴和“堤突”营地——某种四面围墙的土垒防御工事。奥克尼群岛上的布罗德盖海角有一处建于约公元前31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内部的大型建筑被一圈巨大的石墙包围，令人惊叹不已。

农业的繁荣促进了人口增长，但也引发了一些后果。农耕的生活方式导致人类并不健康，早期农民的营养摄入可能还比不上靠狩猎采集为生的祖先。而且，由于人口过多、卫生条件简陋，农业聚落内不时暴发各类疾病。不过，农业发展也带来了富余的粮食，这为工匠、战士、祭司和贵族等精英阶层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人类社会因此进一步分化。

驯化动物

人类一边培育作物，一边进行另一项类似的工作——驯化动物。最初，人类是想借此补充打猎和采集之外的食物，但后来发现动物的用途远不止于此。自然环境是导致这一结果的重要因素，不过动物在不同地区的分布以及人类自身演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公元前5500年左右，人类的一次基因突变终结了乳糖不耐症对人体的影响，喝牛奶在一些地区成为常事（但还远谈不上普及，因为乳糖不耐症在远东地区仍广泛存在）。牛奶是人体营养的重要来源之一，自从人类可以饮用牛奶，奶牛、绵羊和山羊不再只是肉畜，价值也随之提升。同时，家畜的皮毛还是制作衣物、鞋袜的重要原材料。

人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善用各种动物。它们不仅是猎物，更是人类的好盟友或者好奴仆，双方都能从中受益。狗就是最好的例子，它们由狼驯化而来，最初并非被当成宠物，而是负责看家护院或者协助打猎。牲畜常被用来干重活，尤其是搬运货物和拉犁耕地，它们帮助人类节省了大量体力。犁取代了手持式的挖掘棒和锄头，被广泛使用，作物因而进一步增产。

大约公元前8500年的中东、公元前6500年的北非，野牛已被成功驯化。公元前7000年前后，更能吃苦耐劳、对环境适应能力更强的山羊成为中东地区的主要家畜。同一时期，另一种健壮的牲畜——猪，被驯化成中国的家畜。虽然牲畜把流感和结核等疾病传染给了人类，但人类通过选择性育种强化了动物的有用特征，这一做法沿用至今。整个欧亚大陆都在养牛，绵羊、山羊和猪的驯化也很普遍；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区，主要家畜是羊驼、豚鼠和大羊驼；在北美洲是狗、蜜蜂和火鸡；在东南亚则有白臀野牛；还有喜马拉雅山区的牦牛以及中亚的双峰骆驼；等等。



印度河流域的卡利班甘这一证据表明，印度的犁耕始于公元前2800年前后。

牛的驯化提升了犁耕的可行性。公元前2800年前后，印度河流域的卡利班甘出现了最早的耕地。比起黏土，在轻质或者薄层的土地上犁耕更轻松，尤其是每年洪水过后，土地会因此变得松软肥沃。而动物的粪便可滋养农田，补充土壤在耕作过程中流失的氮元素。推行犁耕后，作物收成增加，人们开始驯化猫用来对付老鼠，从而保护谷仓里的粮食。

除了对农业助力颇多，动物在文化和宗教领域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动物图案融入艺术创作中，被赋予了宗教象征意义，与特定的神灵联系在一起。埃及现存的艺术品中就有对鳄鱼、猫头鹰和河马等动物的描绘，这种宗教象征反映了人与动物的亲密关系。赫梯是安纳托利亚半岛[13]上的一个古老民族。约公元前1300—前700年，赫梯人在叙利亚西北部修建艾因达拉神庙时，用玄武岩石狮和狮身人面像装饰神庙（但2018年土耳其对叙利亚发动空袭，使其严重损毁）。

我们如何出行：马

早在公元前4000年，在俄罗斯南部马就被驯化了。与此同时，欧洲和中东地区也开始役使阉割后的公牛。事实证明，马的用途比牛更灵活，它们既可拉犁拖车、驮运重物；又因善于奔跑，可载人赶路、传递信息，这在国家治理和战事决策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由于缺乏适宜的环境，马在军事和战术上的运用在许多地区是缺失的（比如美洲和大洋洲等地）。与人类和鸟类不同，马的分布并没有遍及全球。在安第斯山区，大羊驼作为马的替代品承担了部分职能，但它们既不能载人，也不能犁地，难以满足人类的多样化需求，因此实用性有限。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舌蝇分布带，或挪威和喜马拉雅山区，马的优势也难以发挥出来。

在环境适宜的地区，马的使用彻底改变了战争形态，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在埃及、中东和中国，马被用来拉战车，或者驮载弓箭手和重骑兵。人们用辐条轮替代实心轮以减轻车重，并将缰绳连接至马嚼子，以便控制马的行动，这些都大大提升了战车的实用性。

马镫最早出现于中亚，是提升马匹实用性的一项重要发明。公元前4世纪，斯基泰人[14]已经用上了皮环，尽管当时的皮环仅被用来帮助人们上马。金属马镫更加坚固，使得马上作战更稳当，有利于骑兵在颠簸行进中突击、射击或投掷。中国最早刻有马镫的雕像可追溯到公元322年左右。

除了马镫和马鞍，骑兵还用上了锋利的带刃武器和重装盔甲，因此突击、机动作战和射击都不在话下。19世纪，在新技术（如蒸汽火车）使用和推广之前，马一直是人类提高效率的关键要素，而内燃机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马。

防御工事的起源

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就是要时刻保护自己免遭捕食者尖牙利爪的侵害。然而，人类的行为和动物不同，他们对保护的需求常常转变为寻找某个“永久的”住处或“庇护所”。

从这个角度来说，最早的“防御工事”多是些简单的自然地物，人类可以藏身其中或借以增强防御力量，比如洞穴、山脊、茂密的灌木丛和沼泽地，在里面行走的人可以保护自己免遭猛兽袭击。洞穴既能遮风挡雨，又能防止敌人从后方或边路偷袭。在直布罗陀，尼安德特人和早期智人先后都居住过同样的洞穴系统。在非洲，荆棘丛长期被用作栅栏进行防御。

地势平坦的地区由于缺乏足以进行防御的自然地物，所以人工防

御工事就发展起来了。

人类学会用石头和泥土修建屏障强化自然防御。他们用火吓退野兽，并在战斗时用火照明。木栅栏既可以保护牲畜，又能防止它们乱跑。木材短缺时，石头或泥土也可用作建材。除了要抵御狼、熊、虎和狮子等猛兽的侵袭，人类还需要提防伺机抢夺牲畜和土地的同类。事实证明，把牲畜圈养在小棚子或堡垒里比放养在大片庄稼地里更便于保护。此外，谷仓和筒仓作为储存农产品的大型建筑，不仅能抵御虫害和恶劣天气，一旦敌人进犯还可当作防守的堡垒。

公元前4000年前后，随着国家的发展，防御工事也日趋复杂。各国既要保护本国资源，又觊觎他国财产，因而冲突不断，大范围的冲突促使人们筑墙用以保卫家园。不过，农业的繁荣带动了社会和国家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富余资源的积累，这为广泛修建防御工事提供了保障，并推动了军队的建立。

神之城

士兵阶级的出现只是人类向专业化转变的一个方面，这一转变的前提是农耕后富余粮食的积累。人们在闲暇时间进行思考和创造新事物，多样化的生活方式也随之而来。随着农业的发展，村落越来越大，村落发展成早期城镇，如巴勒斯坦的杰里科和土耳其的恰塔霍裕克，之后城镇进一步发展为城市。城市化进程依赖于能够养活大量人口的农业系统。城市最早诞生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其他土地肥沃的河谷地带（详见下节“文明的摇篮”）。那里的城市依靠河水的定期泛滥[15]而生——人们从宗教层面将其解释为神的恩惠。



这幅复原图展示了建于公元前4000年前后的苏美尔乌鲁克古城。塔庙建筑群显示了宗教对于这座城市的重要意义。

城市社会始于公元前4000年前后，宗教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举行公共仪式有利于城市精英建立政治认同，巩固统治权力。最早的城市文明兴起于美索不达米亚：高庙作为塔庙的一部分，被修建在凸起的、由泥砖筑成的层塔之上，是城市的一个制高点，也是古代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祭司们通过占卜了解神的需求，之后在城中的庙宇里下达神意或统治者的要求。身为精英阶层，他们维护统治者的神圣权力，管理着城市的大部分土地、文献和国家档案，并负责记录生产和储藏产品。

早期城市都有自己的守护神。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乌鲁克城邦兴起于公元前4000年前后。附近的圣城尼普尔是恩利尔的圣地，他是苏美尔万神殿中最受尊敬的神。公元前2100年前后，人们为乌尔的统治者建造了第一座神庙。约从公元前2500年起，大型庙宇群就出现在今天秘鲁境内的太平洋沿岸河谷的一些地方，比如苏佩河谷。

贸易的诞生

贸易是许多早期城市财富的重要来源，因而长距离海陆贸易网便建立起来了。地中海的一些港口城市在贸易网中担任重要角色，如建于公元前3000年的比布鲁斯（今黎巴嫩境内），以及腓尼基人的一些定居点，如贝鲁特、提尔、西顿和迦太基。迪尔蒙（今巴林境内）和拉斯鲁艾斯（今阿曼境内）将地中海世界与东方的航海中心连接起来。亚洲的内陆腹地也遍布贸易城市和殖民地，如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兴起于阿姆河畔的城市肖图盖。

在公元前的1000年里，长途贸易通过海路越走越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和印度、中东地区建立起贸易关系。香料是当时最有价值的商品之一，它们从印度尼西亚运出，不远万里抵达罗马帝国。在19世纪大型蒸汽轮船问世之前，这类高货值、小体积的货物一直是贸易首选。早在公元前3000年，商人们已经开始丰富商品的种类。

文明的摇篮

一、古埃及

尼罗河流域肥沃的土壤孕育出世界最早的文明之一。大约公元前3300年，埃及开始在尼罗河沿岸建造城镇、修筑城墙，最早兴建起的城市是涅伽达和尼肯（又名希拉康波里）。城市间的地盘争夺战引发了大量泥砖围墙的修筑。最终，上埃及[16]的统治者那尔迈于公元前3100年统一全国，成为埃及的第一位法老，即埃及的统治者。臣民们视他为天神下凡。他在尼罗河西岸、三角洲以南修建了都城孟斐斯（距离现今的开罗不远），并在四周筑起泥砖城墙用来防御。统一后的埃及经久不衰，依次经历了古王国时期（公元前2686—前2181年）、中王国时期（公元前2040—前1786年）和新王国时期（公元前1567—前1085年）。

金字塔雄伟壮观，令人叹为观止，是埃及现存最伟大的遗产之一。这些建于公元前2700年前后的王室陵墓耗费了大量人力。

埃及的雕刻、墓葬遗骸（主要指木乃伊）和象形文字同样令人惊叹。象形文字是古埃及的文字系统，在庙宇的墙壁、墓穴内部和一些莎草纸[17]稿上都有其作为装饰。



与此同时，随着青铜武器（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普及）、复合弓和战车的使用，埃及国富兵强，政权稳固。公元前15世纪，为了扩张领地，埃及向米坦尼王国发动战争，欲夺取美索不达米亚西部地区的统治权。约公元前1460年，埃及法老图特摩斯三世在美吉多戏剧性地挫败了叙利亚联军，使这场战争达到了高潮。然而，公元前13世纪，赫梯帝国（小亚细亚地区）崛起并向外扩张，面对强大的威胁，埃及不得不放弃部分属地，赫梯帝国因此确立了其在叙利亚地区的统治地位。约公元前1274年，在与赫梯的争霸战中，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在卡迭石之战中险些战败，战事再次达到顶峰。埃及军队还向南攻占了努比亚地区，但埃及南部边境的冲突从未停歇过。

战争之声

阿拜多斯的乌尼（约公元前2375—前2305年），埃及将军，约公元前2350—前2330年在迦南领军作战。他在胜利后创作了一首小诗，描写了他的军队是如何摧毁……

“沙地居民”的土地……

砍倒了无花果树，

斩断了葡萄藤，

纵火烧毁所有房屋，

斩获数万敌军头颅。



图坦卡蒙的石棺做工极为精细考究，展现了古埃及人为将法老送入来世而煞费苦心。

在新王国时期的后期，埃及大势已去，诸多入侵的外族都占领过埃及：公元前671—前663年，埃及被亚述人占领；公元前525年，波

斯帝国皇帝冈比西斯二世攻占埃及；公元前332年，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大帝从波斯人手中夺走埃及；亚历山大死后，其部将在埃及建立了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0年，埃及沦为罗马的领地。此后，埃及不断落入其他帝国政权手中，丧失了独立权。

外交的起源

1887年，埃及出土了一些文件，其中有公元前14世纪中期埃及第十八王朝王室与古代近东[18]国家之间的信件。大国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从中一览无余，不仅外交范围甚广，还涉及一系列复杂的互动和礼节。互赠礼品，以及通过联姻建立家庭、血缘和亲属关系，都是从根源上建交的方式，这看上去似乎双方平等，颇为理想，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所有的秩序均由埃及一方掌控。

二、美索不达米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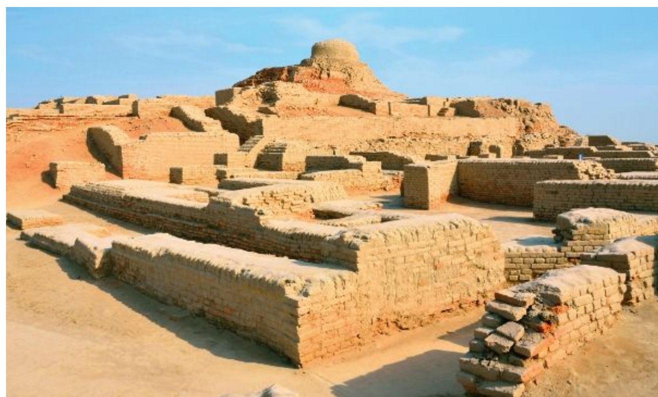
美索不达米亚是早期城市的发源地。约在公元前2300年，萨尔贡一世征服了苏美尔各城邦（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并攻占了今叙利亚、土耳其和伊朗的邻近地区，在此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军事帝国。约公元前2150年，该帝国被邻邦古提王朝攻占，不过古提人的统治非常短暂。随后，乌尔城崛起，在此确立帝国统治。城市四面环墙，并设堡垒防御，城内运河直通幼发拉底河。约公元前2000年，乌尔帝国被埃兰（位于今伊朗西南部的城邦国）推翻。后来，在国王汉谟拉比的领导下，古巴比伦王国在此崛起。此外，汉谟拉比还是历史上一位重要的立法者[19]。和此前两河流域的其他大城市一样，巴比伦是当时学术、文化和政治的中心。公元前1596年，来势汹汹的赫梯人终结了古巴比伦王国的统治。

其他文明也相继绽放于两河流域。公元前935年，新亚述帝国[20]建立于今伊拉克北部，在君主纳西尔帕二世（公元前883—前859年在位）的统治下，亚述发展成首个疆域横跨波斯湾和尼罗河的大帝国。作为率先在军事中系统使用铁器并开创骑兵战术的民族，亚述人是令人敬畏的战士和攻城专家。他们崇拜战神阿舒尔，并致力于让更多人崇拜自己的主神。但他们恐怖的统治方式，如大屠杀、酷刑和流放等暴力手段滋生了仇恨，各地战乱不断导致其最终衰败。攻占埃及大伤国力，随后邻邦米底崛起，联合起义的巴比伦于公元前612年攻破亚述首都尼尼微。至此，亚述帝国迅速走向灭亡。

三、印度河谷

印度河流域富饶多产，城市文明在此孕育，哈拉帕文明（约公元前2350—前1750年）便诞生于此，并向东部和南部扩展。公元前2300年前后，印度河流域那些以墙相隔的聚落相继发展成大城市，如哈拉帕、摩亨佐-达罗和卡利班甘。其中卡利班甘城市面积超过60公顷，约有5万居民，城市基础设施中已有复杂的排污系统，能有效缩减感染疫病致死的人数。疫病一直是古代城市挥之不去的噩梦，许多城市不得不依赖农村人口的不断迁入。

约自公元前1500年起，吠陀时代[21]的雅利安人占领了印度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这一现象或许是导致印度文明衰落的主要原因，尽管环境因素也不容忽视。约公元前1000年，旁遮普地区再次出现了设防的定居点。约从公元前1000年起，冶铁技术开始在印度传播，宗教信仰也有所发展，大约400年后印度教和佛教诞生。



摩亨佐-达罗约建于公元前2300年，是印度河流域最大的聚落之一。

四、中国商朝

商朝依黄河而建，黄河流域肥沃的土地为商朝城市的兴起创造了条件，如殷都（今河南省安阳市）。同时，复杂的文明随之诞生，如文字，它们大多刻于龟甲兽骨上，用以占卜，这表明宗教在商朝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基于农业的繁荣，商朝迈入了青铜时代。此外，商朝人还发明了乐器，观测天文，也会用活人祭祀。

五、秘鲁海岸

与欧亚大陆一样，美洲文明也在蓬勃发展。南美洲的秘鲁海岸就

是重要发源地之一，它汇集了各类作物，尤其是玉米，以及太平洋沿岸丰富的海产品。约公元前14500—前4000年，秘鲁北部的瓦卡普里埃塔被占领，海产品是当时主要的食物来源。因为2012年的考古发现表明，该地在公元前4700年前后才开始种植玉米，倒是牛油果可能存在了1.5万年之久。2016年，这里出土了用靛蓝染色的棉织物，距今约6000年，一同出土的还有编织的篮筐和葫芦饰品。公元前2500年前后，秘鲁中部海岸出现了大型神庙群，其中许多是建于查文文化时期（兴盛于公元前900—前200年）和之后的莫切文明时期（公元元年—公元600年）。

六、中美洲[22]

公元前1150年前后，奥尔梅克文明兴起于墨西哥湾沿岸，一直持续至公元初年，是中美洲已知的最古老文明。奥尔梅克人善于经商，不仅能建造坚固的住宅，制作石雕和陶瓷，还创造了历法和文字体系。自公元前400年起，奥尔梅克文明日渐没落，其他文明方兴未艾，如正在迅速扩张的玛雅文明。早在公元前1000年，玛雅人的影响已不容小觑；还有瓦哈卡山谷的萨巴特克人，也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



奥尔梅克文明兴起于公元前1150年前后，是中美洲已知的最古老文明。

阿登纳文化

尽管在北美洲发现了15000年前的人类遗址以及公元前2500年前后的陶器，但留有土冢和大量土方工程的文明后来才出现在中美洲。疏林时代[23]几乎没留下什么值得考古学家研究的遗迹。

约公元前700—前400年，阿登纳文化兴起于俄亥俄河谷上游，并从那里传播到现今美国的东北部。复杂的土方工程遍布该地，这些可能是当时的集会地或埋葬地。约从公元100年起，霍普韦尔文化取代阿登纳文化兴盛于密西西比河流域，其以极具特色的动物雕刻而闻名。

摇篮之外

青铜时代的地中海文明

文明很快传播到（或独自兴起于）主要发源地以外的一些中心。青铜时代的希腊出现了有组织的社会群体，并在地中海进行广泛的贸易，尤其是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和希腊大陆的迈锡尼文明[24]。公元前1900年前后，克里特岛上开始有组织地大兴土木，修建宫殿，但在公元前1450年前后，这些可能被某次火山爆发而摧毁。克诺索斯宫殿遗址的断壁残垣极具规模，正是当时社会复杂性的体现。公元前1550年前后，迈锡尼的势力如日中天，他们控制着阿尔戈斯和科林斯两大港口之间的主要航路。随着米诺斯文明逐渐式微，克里特岛随后被迈锡尼人掌控。



在迈锡尼古城遗址发现的阿伽门农面具，证明了迈锡尼文明物质丰裕以及艺术技巧精湛。

荷马以希腊的迈锡尼文明为创作背景，在《伊利亚特》中描写了希腊人远征达达尼尔海峡（属于今土耳其）附近的特洛伊城的故事。虽然这部史诗写的是神话故事，但却独树一帜，因为主角不再限于诸神，人类也有了独立戏份，如阿喀琉斯。之后，荷马在《奥德赛》中以希腊战士奥德修斯战后返乡之旅延续了该故事。奥德修斯一路上遇到了各种妖怪，如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和女巫瑟茜。由此可见，希腊人和其他古代民族一样，喜欢在自己构建的世界中加入危险生物。此外，鹰身女妖哈耳庇厄和狮身女怪斯芬克斯也较出名。斯芬克斯会让人猜谜，如若猜不出谜底便将其杀死，最终这个谜题被俄狄浦斯破解。

公元前1100年前后，外族的入侵或许是导致迈锡尼文明覆灭的主要原因，由此进一步引发了地中海东部更大范围内的文明瓦解，包括特洛伊、赫梯帝国、叙利亚和迦南的没落。无名外族入侵（有时被称作“海上民族”）、国内叛乱迭起，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国际贸易和政治危机，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文明瓦解的导火索。此外，文明瓦解的间接原因可能是环境危机和铁制武器的流入。铁器的传播意味着在公元前1100年前后，青铜时代画上句号，铁器时代正式来临。

发现时间

一些关于空间和时间的理念是基于对人、神关系的理解，它们有助于解释天文观测、天文记录和历法体系之间的重要联系。

历法的发展难以考证，但能确定的是它与宗教活动、宗教组织密切相关，比如人们在举行重要仪式时要选择良辰吉日。天文观测和记录结果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算术和写作这两种能力变得非常重要，而月亮和太阳更是观测中的重中之重。日历不仅在国家内部，也在国家之间传播。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历法有罗马的儒略历[25]和中国的农历。

对于注重时间周期理论的群体来说，过去和现在的分离并没什么特别之处，但对参照季节节律发展农林渔业的民族却很重要。对于进行远程海陆贸易的人来说，风起浪涌、冰雪消融、草木初生（供牲畜食用）等这些季节性现象影响他们决定何时出海或远行。

一些最初崇拜过去并从中寻求认同的群体，后来都转而信奉神灵，关注神庙或者神谕。神谕一般由神学家、先知、祭司、圣贤、占卜者和预言家传达；有些群体甚至崇拜邪恶力量和人间使者，如女巫。

“没有建筑”的文明

一提及早期文明，人们总是最先想到一些建筑遗迹或文明古国。那些没留下石质建筑或兴盛于森林深处的文明往往容易被忽视。木材易腐，在热带地区尤甚，但在部分地区，如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森林，一些重要的早期文明以泥坯或土坯结构的形式留存了下来。位于哥斯达黎加圣何塞的博物馆，馆内丰富的考古藏品正是当地灿烂古文明的缩影。在南美洲亚马孙河和奥里诺科河的下游谷地，尽管那里丛林深掩，却发现了早期陶器，这证明了该地存在过高度发达的文明。正如早期智人的扩散，简单的模型和假设远不足以描绘文明传播的复杂过程。若想揭开未知文明的面纱，仍需付出许多努力。

有组织的宗教

世界各地的文化中先后出现了宗教的痕迹，因为人类力求弄清自己在自然界中究竟处于何等地位，并期望借助神力加以改善。古代的许多教派都与安葬仪式、祭奠死者有关，如新石器时代的奥克尼墓穴。人们会参考历法挑选合适的日子举行重要仪式。

古代教派的仪式大多推崇向神灵进献祭品，那有助于部落的团结，比如腓尼基人将儿童献祭给他们的太阳神巴力·汉蒙。古希腊的一些地区也有传达神谕的预言者，如希腊的德尔斐[26]和意大利的库迈[27]，人们因而能了解神灵之意，虔诚供奉。

随着文明日益繁杂，宗教也发展出了多个派系，人们尊奉新的神灵（通常是那些被征服民族的神灵），构建新的信仰体系并举行新的宗教仪式。到公元前5世纪，宗教在全世界已遍地开花：南亚信奉佛教；中国推崇道教；地中海地区有希腊和埃及的教派及犹太教；美洲文化中出现了以仪式为重的教派，如南美的查文教。这一时期的许多宗教当前都已不复存在，也无文献可考证，如伊特鲁里亚、赫梯和腓尼基的宗教。由于所知有限，他们的信仰仍是不解之谜。

改变世界的物品：金属

数百万年来，石头一直是人类制造工具的主要材料。公元前7000—前5000年，情况有了改观。在西亚和欧洲东南部，人们发现通过加热可将金属从矿床中分离出来。熔点较低的软金属最先被使用，铜的熔点低于铁，因此成为第一种被广泛使用的金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混用着不同材质的工具（或武器），起初是燧石工具和铜器，然后是铜器和青铜器，之后是青铜器和铁器。科学家在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发现了一具冰冻遗骸，取名为“奥兹”，其大约生活在公元前3100年。遗骸身上有一把铜斧、一把燧石刀、一张弓和一些燧石箭，他被类似的武器所伤，可能因此而丧命。金属的穿透力强，制成工具后短小精悍，方便使用和携带，因此比石头的用途更广。金属的加工需要多种原材料，因此促进了社会的复杂化，如制造青铜需要铜和锡，而锡则需要通过长途贸易换取。从公元前3100年至前800年，历史迈入青铜时代，铜器时代暂别舞台。青铜是铜的合金，硬度更大，能承受更强的压力而不变形，制成的工具和武器也更实用。随后，铁又取而代之。铁的冶炼和锻造技术从西亚传入欧洲。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第一批铁器的制造可追溯到公元前800年前后。公元前6—前5世纪，尼日利亚的诺克铁器时代文化发展起来。铁质品的优点很多：如铁锹和铁钉让农业和建筑业的操作更灵活，铁皮货车更耐用，铁质武器也更锋利。如果在冶炼时加入碳，便可以造出钢，铁的优良特性被进一步强化。铁匠成了地方经济发展的关键人物。

文字的诞生

随着文明的日趋发展，人类需要能够记录事件、编纂规章、传承宗教传统以及其他知识的方法，于是便产生了文字。最初的文字千奇百怪，世界各地都有用图形表现语言的方法，并形成了象形文字和字母文字两种大相径庭的文字体系。象形文字是一种通过图画表意的文字，如古埃及文字和中国的甲骨文。在公元前3100年前后，苏美尔（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出现了最早的、完整的文字系统，中国则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出现。

货币

古代文明的发展越发依赖贸易，人类需要能够用于表示和储存价值的体系。代币由黄金和白银等贵金属制成，经权力机构确认恒定的重量和价值后，成为金属货币。公元前7世纪，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最早发明了铸币。统治者对铸币的认可大大简化了贸易和税收的流程，尤其是在贸易范围更广、商品种类更多的情况下。如果税收要用在较远的地方，那么以缴粮的形式纳税则毫无补益。流通货币的出现解决了这一难题，这得益于日益成熟的数学体系。后来的大多数文明多采用十进制的货币算法，也有一些民族采用二十进制，如中美洲的玛雅人，还有部分民族采用六十进制，如巴比伦人。



使用金属货币极大地促进了贸易发展，结束了早期以物易物的贸易模式。

第三章　古典文明

公元前1000—公元500年

约公元前的1000年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帝国。这一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源于铸铁技术在农业和武器制造中的运用，使强国得以成功地征服弱国；另一方面，一系列复杂体系或组织的出现帮助帝国巩固了政权：统治者铸造钱币，创造文字，构建有序的宗教信仰，以及采纳实用的为政理念，如中国推崇儒家思想。这些体系各自独立又彼此影响，兼收并蓄，相得益彰。

帝国崛起，政治发展

中国的周朝（公元前1046—前256年）和公元前550年由居鲁士大帝建立的波斯帝国是世界上首批帝国政体。约在公元前550—前250年，又有一些帝国陆续诞生，如亚历山大大帝建立的马其顿帝国、印度的孔雀帝国、中国的秦帝国以及地中海西部的迦太基帝国。而罗马先后灭了迦太基、马其顿及之后建立的帝国，为罗马帝国的崛起铺平了道路。不过，罗马帝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实行共和制度，而非君主制。

帝国要维护统治，必须采取合作和征战并行的策略。合作涉及经济、文化、政治和军事各方面，除了要与本国臣民合作，帝国还必须与境外的“蛮族”融洽相处。相较于官僚体制，对蛮族采用互惠互利、给予身份认同的政治管理策略更有用。中国的朝廷在处理与草原的游牧民族或半游牧民族的关系时，军事、外交双管齐下，比如“羁縻政策”[28]或“放羊式”管理[29]。部落的首领被授予官职，他们一方面隶属于中原朝廷，另一方面仍可按照部落的传统实行自治。



公元前550—前330年，波斯波利斯是波斯帝国的首都。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大帝摧毁了这里的“万国之门”。

中国的崛起

在古代中国，位于西部边陲的周国推翻商朝（公元前1600—前1046年）的统治后，建立了周朝，但最终为秦所灭。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秦国作为当时最富强的诸侯国，横扫诸国。最终秦王嬴政称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史称“秦始皇”。秦朝能统一天下得益于庞大的军队，统治者对农村地区严加管控，征召农民入伍，扩充军队。嬴政的势力甚至远及长江流域以南地区和中国南海，而商周时期，君王的统治范围并未深入中国南方。在西安秦始皇陵的附近，有成千上万尊大型兵马俑陪葬。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横扫诸国，完成统一大业，正式称帝，史称“秦始皇”。

嬴政死后，皇室内部争斗、军队倒戈和平民起义接踵而来。最终，拥有汉王封号的刘邦取得了内战的胜利。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的中国，疆域进一步扩大。公元前101年，汉朝大军向西远征西域，迫使大宛[30]俯首称臣；公元97年，汉朝大军甚至翻越帕米尔高原，抵达了山的另一边。汉朝西征得益于“丝绸之路”的打通，这是多条通往中亚的贸易路线统称。汉朝大军进而开辟南夷，公元前109年，滇王拱手降汉，滇国[31]归顺朝廷。

汉朝开疆拓土，巩固了中原朝廷在南方的势力，人们纷纷南下定居，为中国成为大一统国家奠定了基础。

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的对抗

强盛的匈奴屡屡进犯汉朝北境，这是一个由游牧部落集结而成的联盟，于公元前210—前209年完成统一，成为第一个控制整个蒙古地区的政权。

汉朝末年政权分崩离析，中国正式进入三国时代，而后由西晋终结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公元311年，匈奴大军围攻西晋都城洛阳，朝廷被迫迁都。

到公元500年前后，鲜卑人已盘踞华北大部分地区，建立了北魏王朝（386—534年）。北魏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赢得了包括汉族在内的领地内各族的支持，以及引入中原王朝的管理体制。孝文帝（471—499年在位）开创了民族融合的先例，推出胡人改易汉俗的一系列政策，北魏的统治阶层因此开始汉化。17世纪时满族入关建立清朝，也推行过汉化政策。

北魏人（尤其是军人）抵制汉化，最终演变成暴乱，北魏分裂。直至杨坚出现才再次统一，杨坚就是后来隋朝（581—618年）的开国皇帝隋文帝。

亚洲的宗教信仰

亚洲的宗教信仰形式多样，共同点是都与特定的政治环境相联系，而区别则体现在是否神化帝王或相信泛灵论，以及对祖先崇拜和信奉一神论的程度各异。祭奠祖先在中国备受推崇，尤其是道教。一神论宗教在某些地区经久不衰，如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和以色列的犹太教。宗教让生与死彼此延续，交融共存。

古代的非洲

非洲诸国的建国历程要比中国坎坷得多。尽管贸易路线连通内陆，但由于非洲大陆地域辽阔，各区域环境差异大，导致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公元前1000年前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班图人向南迁移，促进了农业的传播。农耕和铁器的应用使班图人有着远胜于当地以狩猎和采集为生之人（如奥兰治河流域的科伊桑人）的优势。班图人的迁徙从根本上影响了非洲大陆的人文地理，与中国汉朝在亚洲的影响不相上下。这也在时刻提醒我们，早在过去两个世纪的大迁徙之前，人类的迁移范围就已如此之广，且迁徙之路从未间断过。古典时期的人类迁徙和早期的人类迁徙一样，都是一个不断适应环境的过程，并且还伴随着族群的更替。

在班图北部、撒哈拉沙漠的边缘，生活着乍得人、尼罗人等一些鲜为人知的民族。当地也出现了多部落联合的政体，如北非的柏柏尔人。公元1世纪中叶，罗马帝国征服了这些民族，但那只是罗马人将

整个地中海南部海岸据为己有而进行的局部扩张。以莱普蒂斯马格纳（今属利比亚）和蒂斯德鲁斯（今属突尼斯）为例，罗马人在各地留下的大量遗迹足以证明当年帝国的领土之广。

在埃及南部，尼罗河谷、厄立特里亚以及埃塞俄比亚北部也有一些重要国家。公元前100—公元600年，商业强国阿克苏姆与罗马在红海沿岸进行贸易，其重要性堪比库什王国对尼罗河流域的贸易影响。通过这些贸易路线，奴隶被源源不断地运往罗马。阿克苏姆国王下令修建的方尖碑至今仍是一处独一无二的景观。与此同时，新的宗教陆续传入北非，先是基督教，然后是公元7世纪时的伊斯兰教，它们推动了新联盟的建立，但也激发了新的矛盾。



罗马人在今利比亚留下了蔚为壮观的莱普蒂斯马格纳古城遗址。他们曾在公元193—211年迅速扩建该城，这早于其他城市。

北非一直以来是连接撒哈拉沙漠、南部萨赫勒[32]地区以及北面地中海的重要通道，这条要道先后被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占领。7世纪时，宗教冲突以伊斯兰教的胜利而告终，北非被伊斯兰教控制，南欧则由基督教主导。从此，地中海成为横亘两岸的一道鸿沟，文化的传播被迫中断。

西南亚帝国

公元前7世纪末，亚述帝国覆灭，新巴比伦王国取而代之，其最伟大的统治者是尼布甲尼撒二世（公元前605—前562年在位）。巴比伦政权最终在公元前539年被更强大的波斯帝国颠覆。波斯帝国由居鲁士大帝（约公元前550—前529年在位）建立，他先吞并了米底王国，后于公元前547年在安纳托利亚击溃吕底亚，最终攻陷巴比伦城。居鲁士在中亚地区征讨游牧民族马萨格泰人时，不幸阵亡。他的儿子冈比西斯二世继位后，于公元前525年攻占了埃及。波斯帝国在

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2—前486年在位）的统治下，进一步扩张领土：公元前513年，波斯大军入侵斯基泰；公元前492年，又远征马其顿王国。

面对空前辽阔的帝国版图，波斯实行了复杂的管理制度。不过，波斯帝国的长久统治依然得益于其雄厚的军事实力。

四通八达的道路网将波斯辽阔的各领地紧密相连，比如波斯“御道”从爱琴海附近的萨迪斯[33]直通波斯湾附近的苏萨城，将分散的省份重新连接起来。阿契美尼德王朝还在波斯波利斯（位于今伊朗中部）建造了大型的宫殿建筑群。

萨拉米斯海战（公元前480年）

面对波斯的庞大舰队（约800艘），仅有300艘舰船的希腊决定避开开阔水域，诱敌深入狭窄的萨拉米斯海峡，这一策略让波斯舰队的数量优势荡然无存。他们发现，舰船全部挤在一起，队形又被汹涌而来的海浪打乱，舰队几乎寸步难行。眼看对手陷入困境，希腊这才发起进攻，波斯彻底乱了阵脚。最终，波斯海军被击退，损失战船200多艘，而希腊仅损失了40艘。

在征服腓尼基和埃及后，波斯将舰队编成一支强大的海军，宣告了其在爱琴海的统治地位。然而，公元前490年和公元前480—前479年，他们几次起兵进攻希腊都无功而返。公元前490年败于马拉松之战，公元前480年的萨拉米斯海战又是惨败，这两场战役扭转了希腊主要城邦雅典的命运。在萨拉米斯海战中，雅典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们的三桨座战船——一种特别有效的战船。

若亚历山大西征会怎样？

提图斯·李维（公元前59—公元17年）在他影响深远的《罗马自建城以来的历史》（History of Rome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City）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历史假设：如果古代最伟大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当时掉转马头，入侵意大利会怎么样？李维认为，罗马读者们大可放心，因为罗马是战无不胜的。他列举了罗马将才的优秀品质，声称亚历山大在受波斯文化熏陶后开始变得堕落，他还将亚历山大的个人成就与罗马历经百年的辉煌对比了一番。

最终，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大帝终结了波斯帝国的统治。他侵入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领地，分别在公元前333年的伊苏斯战役、公元前331年的高加米拉战役中重创波斯大军。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在巴比伦英年早逝，年仅32岁，此时帝国疆域已扩至埃及和印度河流域，包括今天的土库曼斯坦。如果亚历山大活得再长久些，不知道他是否还能再创辉煌。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征服印度的计划未能实现：公元前326年，他穿过阿富汗进入印度河流域，但在两地都遭到了顽强抵抗；而在比阿斯河时军队发生叛变，反对他向印度北部深入的计划。



亚历山大大帝打下的疆土从埃及一直延伸到印度。

亚历山大死后，帝国迅速土崩瓦解，将军们纷纷拥兵自立、争夺领地，主要政权有安帝哥尼斯人统治的马其顿王国、埃及的托勒密王朝，以及包括叙利亚、伊拉克、波斯和土耳其南部在内的塞琉古王国。这一时期希腊的文化和政治影响广泛，被称为希腊化时代。很快，塞琉古王国失去了大部分领土，而托勒密王朝在埃及的统治一直持续到公元前30年，后被罗马中断。一些独立的希腊化王国也得到了发展，如巴克特里亚（位于今中亚地区）。希腊文化在埃及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并与亚洲文化相互交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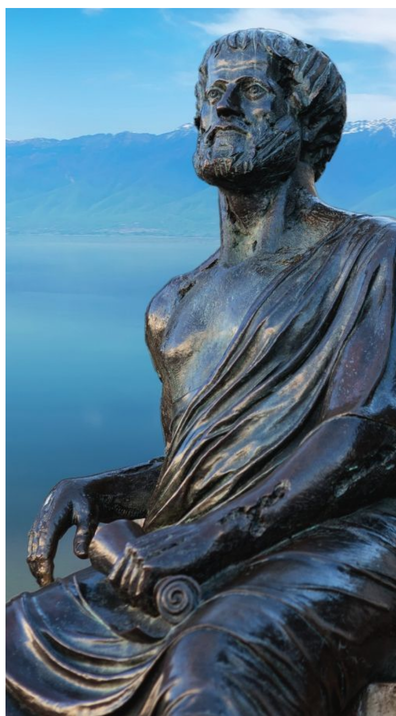
亚历山大死后，孔雀帝国（公元前321—前185年）迅速统治了印度次大陆[34]。公元前321年，旃陀罗笈多·孔雀集结军队推翻印度东北部的难陀王朝，建立了孔雀王朝。随后，在与塞琉古王国（公元前305—前64年）、羯陵伽国的战争中，孔雀王朝都取得了胜利。阿育王是王朝创始人旃陀罗笈多之孙，年少时便率兵攻占了羯陵伽国。他于公元前260年皈依佛教，并尝试以佛教教义治国。他在印度各地修建佛教舍利塔，并将体现佛法精神的法令雕刻在众多石柱上。在他

的影响下，佛教在印度国内盛行并传播到周边地区。

古希腊世界

与盛极一时的亚述或波斯帝国相比，早期希腊（和之后的罗马）的影响力如同米粒之珠，但日后却大放光芒，对西方文明影响深远。希腊和罗马要时刻提防外族入侵，公元前490年和公元前480—前479年，希腊人数次粉碎了波斯人的侵占企图。希腊城邦能够生存，全靠他们训练有素的公民兵军队。重装步兵以方阵队列前进作战，令对手难以招架。

后来，强大的斯巴达和雅典结成城市联盟，但没能合并成一个稳定的帝国。公元前338年，分裂自治的希腊城邦沦为马其顿王国的牺牲品，当时是亚历山大的父亲菲利普二世在位期间。不过，希腊采用的政体模式对后世影响深远，比如公元前508年克里斯提尼改革后建立的雅典民主制，它赋予公民大会至高的决策权。



作为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亚里士多德认为希腊城邦是追求美德的理想之地。

但并非所有的希腊人都有权参与城邦事务的决策。长期以来，斯巴达一直是雅典在希腊城邦中最强大的对手（公元前431—前404年，雅典对斯巴达发动了战争，史称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却以雅典的失败和民主政治的暂时瓦解收场）。斯巴达实行贵族寡头政治，妇女几乎没有政治权利，但她们不以为意。希腊也使用大量奴隶，如驱使奴隶采矿。在雅典附近的劳瑞姆银矿里，大约有35000名奴隶挤在地下的小隧道里工作，狭小逼仄的空间迫使他们只能匍匐前行或跪着劳作。

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曾在《政治学》（Politics）一书中提出，奴隶制是合乎自然的，就像人类役使马一样。对他而言，村庄可被看作一个小社区，牛是穷人的奴隶；而希腊城邦是进步美好的大社区，公共文化和美德盛行。这便是奴隶制的功劳，因为它保证了上层阶级的安逸生活，使其有余力推行更好的统治政策。

古希腊戏剧

戏剧起源于众神的宗教节日，是希腊文化中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古希腊著名的剧作家有被称为“悲剧之父”的埃斯库罗斯（约公元前525—前456年，著有《俄瑞斯忒亚》三部曲和《波斯人》）、欧里庇德斯（约公元前480—前406年，著有《美狄亚》《厄勒克特拉》和《特洛伊妇女》）和索福克勒斯（约公元前497—前406年，著有《安提戈涅》《俄狄浦斯王》和《厄勒克特拉》）。这些剧作家凭借卓越的创作才能塑造了多样的、丰满的人物，标志着西方戏剧的开端。

古罗马

最终，罗马人征服了希腊城邦。传说，罗马最初只是台伯河下游的一个小部落，特洛伊沦陷后，王子埃涅阿斯幸免于难，他的后代罗慕路斯和雷穆斯在公元前753年建立了罗马城。不过据考古发现显示，公元前850年罗马帕拉蒂尼山上已有村庄，这说明早在罗马建城前就存在定居点。罗马的扩张遭到了邻邦拉丁人和伊特鲁里亚人的抵抗。罗马最初的统治者是国王，塔克文家族就在其列，塔克文家族是希腊科林斯人（也可能是伊特鲁里亚人）的后裔。公元前509年，拉丁贵族将塔克文家族最后一任国王驱逐出境，成立共和国。和古代其他城市一样，这个共和国实际上仍是寡头政治。少数掌权的贵族和广

泛平民群体之间矛盾尖锐，罗马共和国也因此历经磨难。

罗马士兵骁勇善战、所向披靡，配备有铁质的短匕首、重标枪和盾牌，主力重装步兵队列训练有素，这确保了罗马军团能快速行进并根据指令随时调整队形，比如陆龟方阵（士兵们高举盾牌形成一个似龟甲的大盾，藏于其中行进可躲避流矢飞弹）。罗马军队擅长围城，并能设计行之有效的复杂方案用于作战；在自然环境或战斗环境中，他们还能通过修建堡垒和筑路等手段进行部署。每逢停军驻扎，士兵们便会轻车熟路地建造营地，通常每隔24千米（15英里）就有一处，这大约是罗马军团平均一天的行军距离。许多营地后来发展为城镇，维也纳便是其中之一。

在意大利北部，伊特鲁里亚人盘踞此处约有五个世纪之久。直到公元前280年前后，罗马在赫拉克利亚和阿斯库路姆发起战争，虽然伤亡惨重，但最终击败了伊庇鲁斯国王皮洛斯，统一了意大利半岛。由于长年征战，罗马的文化、公众记忆、公共场所、宗教信仰、社会和政治制度中都充斥着强烈的军事色彩。罗马统治阶级崇尚武力，在任用和表彰政客时也会参照此标准。

与迦太基的三次布匿战争，罗马大获全胜。迦太基是一个建立在今突尼斯附近的海上帝国，统治着撒丁岛、西西里岛、西班牙部分地区和今突尼斯的大部分地区。这三次战争涉及多个地区，范围极广，意大利本土、西西里岛、西班牙和北非都被卷入了战争。第一次布匿战争 （公元前264—前241年）



罗马军团是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他们装备短剑、标枪和盾牌，训练有素，能够战胜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对手。

是为了争夺西西里岛的控制权，罗马人历经苦战最终获胜，他们从中也认识到提升海军战斗力的必要性。

不久后，罗马和迦太基又为争夺西班牙南部和东部地区而战。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前201年）中，罗马统治者日益膨胀的野心一览无余。迦太基主将汉尼拔（公元前247—前183年）率军穿过法国南部，于公元前218年翻越阿尔卑斯山，抵达意大利并对罗马人发起攻势。汉尼拔率领军队和战象翻越阿尔卑斯山时，仅有一头战象幸存下来，但不久后就死了，后人将这段履险蹈难的旅程视作一场史诗般的战斗。汉尼拔大军压境，罗马岌岌可危。凭借素质过硬的军队和卓越的指挥才能，汉尼拔抢得先机，分别在特雷比亚河（公元前218年）、特拉西梅诺湖（公元前217年）、坎尼（公元前216年）和赫多尼亚（公元前210年）击溃了罗马的主力军。

在这种情况下，汉尼拔彻底失败了，并非因为他在意大利的兵败，而是他无力乘胜扳倒罗马，粉碎其政权。汉尼拔的军队规模小，没有攻城车，而罗马的盟友们立场坚定，无法动摇。公元前204年，战场移至北非，迦太基大军落败。公元前202年，大西庇阿在扎马战役中击败汉尼拔。这场战役的胜利保住了罗马在地中海西部的主导地位。

我们如何出行：车轮和道路

迄今为止，发现得最早的车轮是公元前3500年美索不达米亚的陶轮，用于辅助捏制陶器。公元前3200年前后，车轮被用于交通工具。公元前1200年前后，中国有了使用车轮的记录。借助四轮马车或牛车，只需较少的役畜就能运送大量货物，效率远高于动物单纯的驮运。由于省力，牲畜所需的饲料也相应减少。

路况影响着轮式交通工具的行进，因此罗马人修建了令人惊叹的道路系统，如意大利的亚壁古道和英国的沃特林大道，它们都通往罗马帝国，与从埃及亚历山大港到罗马奥斯蒂亚港的海路互为补充。主道路按统一的模式修建，路面铺设考究，雨雪天可防滑，并设计了弧面和排水沟渠以保证良好的排水。精确的测量工序则保证了道路的平直，特殊的路段还会修建桥梁，这也是道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四通八达的罗马大道实现了军队的快速行进和货物的快速流通，许多路线一直延续至后罗马时代。

罗马共和国之所以能战胜汉尼拔，与其庞大的军队不无关系。意大利各地改为城邦和联盟的组织形式后，这些政体都要向罗马提供兵源。罗马统治者与中国汉朝皇帝的想法不谋而合——农耕人口如同用之不竭的兵力库，他们从中征募成年男性入伍以打造庞大的军队。公元前31年，罗马军队的意大利士兵多达25万，几乎是战争时期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凭借突出的人力优势、丰富的资源、强大的意志力和卓越的组织力，公元前19年，罗马控制了地中海东部、埃及、高卢（今法国）和西班牙；公元100年又控制了英国的大部分地区和巴尔干半岛。在征服高卢的战役中，尤利乌斯·恺撒成了关键人物，尤其在公元前52年，他与强敌维钦托利几经交战，最终获胜。

然而，罗马的扩张在某些地区却停滞不前。公元9年，罗马在德国的条顿堡森林战役中惨败，损失三个军团，从此打消了进军易北河

的念头。公元110年，驻扎在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今伊拉克境内）的罗马军队的阵地陆续失守。接二连三的失败使罗马放弃了扩张，转而开始巩固政权、强化边防。罗马人修建了结实的城墙和堡垒作为基地，进可攻，退可守，并在边境沿线大规模驻军，营地多分布在莱茵河和多瑙河畔，以及亚洲境内。

公元前1世纪，罗马共和国垮台，起因是军事指挥官之间的相互竞争，先是马吕斯和苏拉，后是庞培和恺撒，他们企图使用武力确立统治，消除政治分歧。而像恺撒这样雄心勃勃的政治家一般先伺机去前线指挥军队，然后收集资源用以竞选。恺撒虽然是贵族，却与平民阶层关系密切，他的主要对手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则推崇由贵族统治的共和国体制。在这样的政治分歧中，恺撒践行着自己的政治野心，却在公元前44年3月15日遭到暗杀。随后，罗马掀起了一场内战，公元前42年，拥护恺撒的“后三头同盟”[35]在希腊的腓力比打败了暗杀恺撒的派系。



尤利乌斯·恺撒是位雄心勃勃的统帅。他不仅战功累累，还善用军事资源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之后，“后三头同盟”瓦解。马克·安东尼与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七世情愫互生，结成联盟。公元前31年，著名的阿克提姆海战打响，马克·安东尼在希腊西海岸迎战恺撒的继承人屋大维，却意外败北。获胜后的屋大维逐步将罗马共和国的所有权力握于掌心，被授予“奥古斯都”的头衔，并于公元前27年成为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为了夺取埃及，奥古斯都承诺将会给罗马带来和平。正如他所言，在他的统治期内，罗马比前半个世纪要稳定得多。

罗马时期的地图

罗马人延续了希腊人关于世界的知识。希腊人意识到，已知的世界只是地球的一小部分，广袤的世界仍待探索和测绘。公元前150年，希腊哲学家马洛斯的克拉特斯在罗马制作了一个直径至少3米的大球，上面绘了四块大小相同的大陆，各占球面的四分之一，但彼此被水隔开。世界一定是平衡的，这一认识促使人们长期以来认为一定有广袤的“南方大陆”[36]存在。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约公元90—168年）曾在罗马统治下的亚历山大港工作，他将世界地名汇编成书，并将每个地点都标注了地理坐标。

罗马人精于测量，效率极高，且擅长按比例绘图。罗马帝国的成功征战与其高超的地图绘制能力密切相关，而罗马人敢标榜世界霸主也与他们通晓世界地图不无关系。

一些罗马时期的地图有幸保存了下来。波伊廷格古地图是一幅4世纪罗马公路地图的副本，复制于12世纪。不同于传统地形图，该地图将地域分割为条带状，可用来规划路线。图中绘有山脉，道路的分布以某个城市为中心向外发散，比如塔兰托。另一份地图《拉文纳宇宙志》则没有如此知名，它是一份涵盖罗马帝国5000多个地名的名录，约公元700年前后由拉文纳的一位匿名神职人员拟定。

罗马制度的成功建立在公民观念的基础上。公民身份意味着可以享有许多权利，但这并非真正的平等。自由佃农必须缴税，相对于有权势的地主和佃农主，经济地位较低。由于严格限制，最初只有少数人具有公民身份，直到公元前1世纪才放宽到所有意大利成年男性，并在公元212年扩展到所有非奴隶的男性。

奴隶起义

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奴隶起义频发，最著名的当属斯巴达克斯起义。斯巴达克斯生于色雷斯，擅离军队后被俘而沦为奴隶，成为一名角斗士。公元前73年，他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率领约9万大军，顺着意大利半岛向南推进，沿途捣毁无数庄园。公元前71年，他与马库斯·李锡尼·克拉苏在卢卡尼亚交战，虽然击溃了众多罗马军队，但最终仍落败而亡。克拉苏为阻止其他奴隶反抗，将大批斯巴达克斯的追随者钉在亚壁古道沿途的十字架上。早在公元前135—前132年、公元前104—前100年，西西里岛就爆发过多次奴隶起义，但都被镇压了。公元前132年，仅存的2万名奴隶起义军决定投降，却因罗马统治者的一时之愤而惨遭屠杀。

由于罗马体制中的一些规定，公元1世纪，基督教的出现和传播俨然对罗马的统治构成了威胁。耶稣基督倡导的平等尤其具有颠覆性。由于基督教属于一神论宗教（信仰唯一的神），它也挑战了罗马传统的多神教——以万神殿为代表，里面供奉着奥林匹斯山众神和被视若神祇的君王们。在这种背景下，基督徒在罗马帝国受到迫害甚至殉道就不足为奇了，在罗马皇帝戴克里先（约284—305年在位）的统治期内尤甚。

古典世界的决定性战役

·公元前547年——吕底亚之战

·公元前539年——巴比伦被围

·公元前490年——马拉松战役

·公元前480年——萨拉米斯海战

·公元前331年——高加米拉战役

·公元前280年——赫拉克利亚战役

·公元前279年——阿斯库路姆战役

·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

·公元前261—前260年——羯陵伽之战

·公元前216年——坎尼会战

·公元前202年——扎马会战

·公元前52年——阿莱西亚战役

·公元9年——条顿堡森林战役

·公元410年——亚拉里克一世攻陷罗马城

罗马人在征服之地兴建了与国内相仿的基础设施。他们修筑坚固的道路和引水渠，还有圆形露天竞技场、公共集会场所、剧院、公共浴室和其他公共建筑。许多都保留至今可供游客参观，比如西班牙塞戈维亚的古罗马引水渠。尽管不少罗马城镇以碎瓦颓垣的形式保存了下来，但当时居民的生活、风貌、礼仪，以及这些建筑建成时的耀目光彩却无法存留。

罗马衰亡

对于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历史上一直争议不断。帝国外部“蛮族”的入侵是一个关键因素。早在公元2世纪晚期，就有不少外族对地域辽阔的罗马虎视眈眈，公元167—170年，马科曼尼人和夸迪人就曾入侵意大利北部。到公元250年前后，外族入侵危机升级，罗马为了自保而东西分治，让两边各自为战，这一策略最终导致了帝国东部和西部的永久分裂。公元330年，君士坦丁一世将拜占庭（之后改名为君士坦丁堡，即今天的伊斯坦布尔）定为新首都，权力中心自此转移。公元312年，在急需集中力量一致对外时，他改信基督教的行为引发了巨大的内廷分歧，两派的斗争削弱了帝国的实力。从此，拜占庭成了新派的聚集地，而罗马则是旧派的中心。

罗马帝国的经济危机日益严重，到公元2世纪下半叶，农业生产、工业和贸易每况愈下。帝国财政亏损，货币的重量和贵金属含量都大幅缩水，帝国想要再次获得国内外盟友的支持变得难上加难。而维护帝国统治的开支仍在增长，罗马越来越无力支付。

疾病问题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公元160—180年，瘟疫肆虐全国；公元3世纪时，结核病和天花的势头还未消减，流行性出血热开始泛滥。像罗马、米兰、亚历山大港和君士坦丁堡等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更易出现疫情，它们脆弱而单一的食物供应链也极易受到破坏。由于帝国发达的贸易网络，旅游和移民这样的人口流动使其面临着更大的疾病风险。

较之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人口较少且相对落后，应对“蛮族”入侵的能力较弱，随着内廷两派的猜忌日益加深，局势变得更为严峻。大部分的军队被派往边境，仍未能守住莱茵河和多瑙河的边界，这让意大利压力倍增，一筹莫展。这时的军队规模远小于罗马共和国时期，根本无力阻挡一拨又一拨的“蛮族”入侵。

居于帝国东部的西哥特人是以亚拉里克为首的日耳曼民族，由于受到更东边的匈人的侵扰，他们被迫西行并围攻了罗马城。公元410年，断粮许久的罗马城被迫投降，西哥特人趁机大肆劫掠。此后，意大利先后遭到匈人、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铁蹄践踏。其中的汪达尔人也是日耳曼民族的一支，439年，他们攻占突尼斯，切断了罗马的一个重要粮食来源，为后来的胜利铺平了道路：455年，他们洗劫了罗马；468年，进而控制了西西里岛。

除了外族入侵，罗马帝国还经历了严重的政治动荡。公元394—476年，数次内战使得先后共有14位君王统治过西罗马。军事将领通常掌控大权，包括奥多亚塞在内的几位军事将领都是“蛮族”出身。事实上，罗马和“蛮族”渊源不浅，两者既有对立，也有合作。由于“蛮族”占领了部分行省，切断了其与帝国之间的军事、政治和行政联系，罗马统治者想通过征税进一步抵御的可能性变得渺茫。最终，奥多亚塞于公元476年废黜了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

东罗马帝国幸存了下来（后来被称为拜占庭帝国）。公元3世纪，萨珊王朝征服波斯后，继续向西进犯东罗马的东部边境。拜占庭帝国先是失去了其在印度洋地区的贸易控制权，7世纪时，又被阿拉伯穆斯林侵占了中东和北非大部分地区，但拜占庭帝国仍然坚挺至1453年。1453年，由于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攻占，帝国从此覆灭。



东罗马帝国无暇顾及西边。萨珊波斯人的不断进攻使其无力支援被哥特人和汪达尔人侵扰的西罗马帝国。

罗马在西方思想和行为上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最显著的便是天主教会。后来的国家政体常会参考罗马的体制，如美国的宪法和参议院。

皇城

在中国的周朝，城市的规划讲究“天圆地方”，这一原则由宇宙学、占星术、风水学和命理学融合后衍生而来。在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都城咸阳统一管辖着诸多下级城镇。汉朝也是如此，除了先后建都的长安和洛阳，福州等繁荣的沿海城市也有下级行政中心。

罗马文明本质上是一种城市文明。都城罗马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文明，公元2世纪，其人口或许已达100万。养活如此庞大的人口，完全是经济、管理和物流等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亚历山大港作为重要的中转港，粮食源源不断地从西西里、突尼斯和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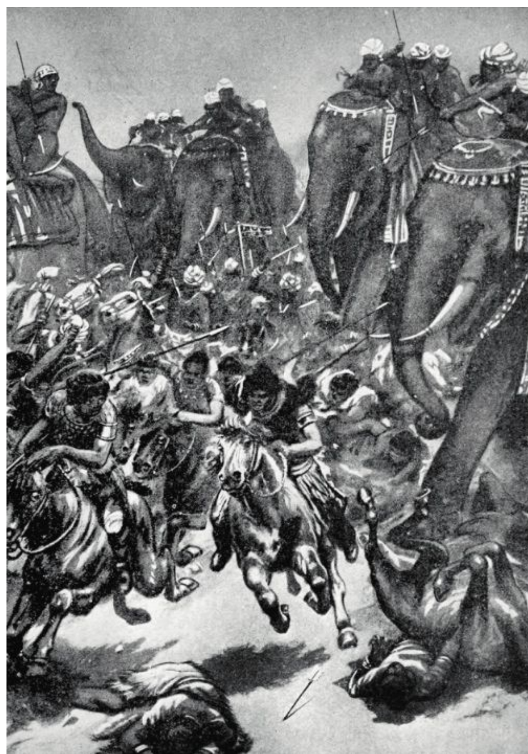
及运输而来。罗马西南部的台伯河沿岸，仓库遍地，也证明了罗马对贸易的重视。

美洲也有大城市。公元前450年前后，萨巴特克人在瓦哈卡山（墨西哥南部）中部建造了城市蒙特阿尔班；公元前250年前后，玛雅诞生了早期最大的城市埃尔米拉多。位于墨西哥中部的特奥蒂瓦坎则是一个网格状城市，城内建有金字塔，公元500年，城里已有12.5万～20万居民。南美洲的蒂瓦纳科位于今玻利维亚的的喀喀湖边，居民多达4万人，是当时宗教活动的中心。

第四章　中世纪

公元500—1500年

自15世纪以来，中世纪早期总是被西方评论家们单独拿出来极力诋毁，好将后来的成就与之撇清关系，如此对待这一千年的人类历史实在太过武断。相反，中世纪是人类文明取得巨大发展的重要时期。中世纪早期被称为“黑暗时代”，当时欧洲遭“蛮族”侵袭，最终形成了许多彼此差异很大的民族和国家。



5世纪末，白匈人数次攻打印度笈多王朝，导致印度次大陆分裂为多个地区政权。

抵御“蛮族”

全长195公里（120英里）的戈尔甘长城是波斯（今伊朗）最

长的防御工事，素有“红蛇”之称，它从里海东部一直延伸到厄尔布尔士山。据说公元5—6世纪，萨珊王朝为了防范白匈人的入侵而修建，可与里海以西的铁门关相提并论。

第二波“蛮族”入侵

公元8—10世纪，“蛮族”再度入侵欧洲，侵略者以阿拉伯人、维京人和马扎尔人为主。马扎尔人入侵并征服了匈牙利平原，之后企图进犯罗马帝国。公元955年，皇帝奥托一世在利奇菲尔德之战中摧毁了马扎尔人的计划。在早些时候，相当于唐朝之后的五代十国，契丹人占领了今天北京周边地区，党项族则割据了宁夏、甘肃一带。唐朝（618—907年）的情况则完全相反，中原决意扩张，足迹直至新疆、塔里木盆地和西藏边陲。

白匈人[37]

印度也遭受了严重的“蛮族”入侵。公元4世纪，笈多王朝统一了印度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但中亚的白匈人（又称嚈哒）的入侵却让王朝岌岌可危。公元484年，白匈人在赫拉特之战中大败萨珊王朝，夺取了该地区的控制权，令萨珊王朝颜面扫地。之后，他们又分别在公元480年、公元500年和公元510年前后屡屡进犯印度，这让笈多王朝遭到重创，为印度的分裂埋下了伏笔。从6世纪中期至13世纪，印度一直处于地方割据、小国林立的局面。

维京人的扩张

8世纪末，由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居住用地紧张（多山地的挪威尤其如此），维京人（或称北欧人）开始从事掠夺活动，其中既有战士，也有商人和殖民者。他们入侵了不列颠群岛和法国，东至俄罗斯，西跨北大西洋，寻找适合贸易和定居的富饶之地。维京船虽然船身扁平且无法遮风挡雨，但由于其配备船帆、桅杆、精准的龙骨和方向舵，成为当时高效的远洋船，可在大西洋自由航行。由于吃水浅，它还能在沿海水域或河流上行进，如英格兰的泰晤士河、法国的塞纳河以及爱尔兰的香农河。大约公元860年，维京人抵达了冰岛，公元986年开始定居格陵兰岛，公元1000年前后，在纽芬兰形成了一个维京人的小定居点。对维京人是否曾定居北美南部仍待考察，尽管美国人向来不愿提及西班牙最先开拓北美一事，后来却声称维京人到达了新英格兰[38]。

维京人在冰岛之外的扩张规模非常小，而未能与格陵兰岛的因纽特人达成合作也是一大失误。在中世纪的鼎盛时期，疾病肆虐、地理位置偏远以及全球气候变冷等问题导致维京人在格陵兰岛寻找定居点的进程于15世纪中叶落下帷幕。而在遥远的纽芬兰，他们的定居点寻找进程也只维持了二三十年。

相比之下，维京人在法国和英国的居住时间更长。公元911年，维京人在法国北部的居住点发展为诺曼底公国，那里的居民后来被叫作诺曼人。公元1066年，“征服者”威廉一世（1066—1087年在位）率军从诺曼底出发，在攻占英格兰后，进而占领了威尔士和爱尔兰的大部分地区。另一支诺曼军队则控制了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在维京人的家乡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丹麦、瑞典和挪威于11世纪崛起成为强国，对不列颠群岛和波罗的海东部地区虎视眈眈。此外，维京人还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改信基督教。但在维京时代早期，他们曾多次袭击修道院等基督教场所，如英格兰东北部的林迪斯法恩修道院，它第一次遭到袭击是在公元793年。

基辅罗斯

9世纪中叶，在基辅（今乌克兰境内）的维京商人建立了基辅罗斯国。得益于商业活动的开展以及与拜占庭帝国的友好关系，基辅罗斯的疆域在10世纪时迅速扩大。自公元988年基辅罗斯国改信希腊东正教后，其与拜占庭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基辅罗斯是俄国的前身，后来的俄国被认为是拜占庭帝国的延续[39]，因此流传着莫斯科大公国是“第三罗马”的说法。弗拉基米尔一世（980—1015年在位）去世后，基辅罗斯国解体，他的三个儿子分别建立了诺夫哥罗德公国、波罗茨克公国和切尔尼戈夫公国。13世纪初，蒙古大军攻占这里，推动了莫斯科夫（今莫斯科）的崛起，即后来的莫斯科大公国。

地中海帝国

经历了分裂以及部分地区沦陷之后，在地中海东部的罗马世界还存留拜占庭帝国一直在抵御着伊斯兰军队的进攻。直到1453年，首都君士坦丁堡被穆罕默德二世领导下的奥斯曼土耳其穆斯林军队攻陷，帝国最终覆灭。而早在7世纪，拜占庭在面对阿拉伯穆斯林军队时，就拱手让出了北非以及如今的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等地。

罗马帝国覆灭后，日耳曼的“蛮族”部落在西欧纷纷建立新王国，彼此兵戎相见，比如意大利的东哥特人和西班牙的西哥特人一直纷争不断。此外，盘踞在西班牙西北部的苏维人、勃艮第人，以及入侵英格兰的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等也都建立了新政权。由法兰克人建立的法兰克王国巩固了对如今法国地区的控制，在当时最具影响力。虽然伊斯兰侵略者在打败西哥特人并攻占西班牙、葡萄牙之后，曾北进袭击法兰克王国，但最终在公元732年的普瓦提埃之战中被法兰克人击败。



查理曼大帝建立的法兰克王国统治着西欧大部分地区，但王国最终却被他的几个孙子一分为三。

从8世纪末至9世纪初，法兰克王国在加洛林王朝的统治下迅速扩大。查理曼（768—814年在位）从伦巴底人手中夺得意大利北部，并打败德国的撒克逊人，吞并了今天的德国和奥地利的大部分领土。公元800年，查理曼由教宗利奥三世加冕称帝，此举不仅延续了罗马帝国的辉煌，巩固了加洛林王朝的权力，更提升了教宗的地位。查理曼大帝统一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定都艾克斯-拉-夏贝尔

（今亚琛）。但在公元843年，他的几个孙子签订了《凡尔登条约》，王国再度分裂[40]。当然，马扎尔人、维京人和阿拉伯人的侵犯也是导致分裂的原因之一。德意志王国一跃成为中流砥柱，国王奥托一世于公元962年加冕称帝，取得了可与拜占庭皇帝齐名的头衔。

普瓦提埃之战（公元732年）

18世纪晚期，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提出，如果阿拉伯人能在普瓦提埃战胜查理曼的法兰克大军，那么整个欧洲基督教世界都将被倾覆。但也有一些现代历史学家认为，阿拉伯人此次远征只是一次惯有的劫掠，军队数量庞大、来势汹汹，一旦获胜便会选择与基督国家加强合作，以维持阿拉伯在法国的强势统治。与许多战役一样，普瓦提埃之战对其中一方（法兰克人）的意义更大。此战失利后，阿拉伯人再也没有进犯过法国。

征服世界之人

从公元5世纪至15世纪，中亚地区一些民族的轻骑兵在侵略战中屡屡获胜，大大消耗了西方罗马帝国[41]的实力。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蒙古人，他们在成吉思汗（约1162—1227年）及其继任者的带领下，从中国挥军一直打到匈牙利。有证据表明，由于草原气温下降影响了牧草的生长，生存危机成了蒙古人加速侵略的催化剂。不过，能适应各种作战环境的能力令众多中心城市纷纷落于蒙古人手中，比如1215年占领北京；1219年攻陷布哈拉；1240年征服基辅；1258年夺取巴格达。他们还在1241年成功入侵波兰和匈牙利。



成吉思汗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陆地帝国的缔造者。

欧洲人从未打败过蒙古人，不过幸运的是，成吉思汗的精力主要放在中国和中亚地区。1241年，当成吉思汗的继任者窝阔台大汗去世的消息传来后，在欧洲征战的蒙古人这才掉转马头。蒙古在其他地区的扩张进程也因失利而中断：一次是1260年攻打叙利亚时，被埃及马穆鲁克人（中亚的奴隶兵出身）击退；另一次是1281年进攻日本时，却因遭遇风暴被日军击退。

蒙古是世界历史上陆地面积最大的帝国，它的建立被认为是持续不断的全球历史的起点。东西方之间的信息、技术和思想交流都得以加强，但这也扩大了14世纪时黑死病的传播范围。当时“丝绸之路”打通诸多城镇，蒙古人吸收各地的文化传统，加强沿线城镇的联系，并进一步将商路延伸至包括黑海沿岸城市在内的西方各地。此举对中国

和波斯（今伊朗）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马可·波罗：报道中国

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称自己于1271年离开威尼斯，1275年抵达蒙古大汗忽必烈在上都的夏宫。他在蒙古国一直生活到1292年，随后被指派护送蒙古公主从中国前往波斯湾的霍尔木兹。虽然马可·波罗所说的话的准确性遭到了质疑，但它无疑丰富了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中国的富饶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这也证明了人类能够在陆路长途旅行的能力。马可·波罗认为自己从威尼斯一路跋涉25000公里才抵达北京，而非11000公里。这也给了人们一种错觉：从欧洲到中国遥远到需要跨越大西洋，以至于后来哥伦布在向西航行时，对发现的新大陆产生了认知偏差[42]。

在这片多元文化交融的土地上，蒙古人并没有建立政府机关或学术机构等官僚体系来辅助统治。他们既没有类似于基督教会的传教和教育组织，也没有像中原王朝那样将儒学引入官僚和文化体系。重视传统和秩序的儒家思想，自汉代以来极大地帮助了中国帝王的统治。

最终，蒙古帝国还是难逃覆灭的命运。它的崩溃沉重地打击了欧亚大陆间的贸易往来和思想交流。从1259年开始，蒙古宗王之间兵戈相向，最终帝国分裂为四大汗国，随后而来的是进一步分裂，与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的马其顿帝国如出一辙。

后来，“跛子”帖木儿（1336—1405年）效仿蒙古国。他建都撒马尔罕，先后攻占赫拉特 （1381年）、德里（1398年）、大马士革（1401年）和巴格达（1401年），领地范围涵盖中亚、伊朗、印度北部和中东。临终之际，帖木儿还在计划入侵中国。他对叛变者实施血腥镇压。1387年，帖木儿在镇压伊斯法罕（波斯）的起义中屠杀了约7万人，死者的头颅几乎可以堆成金字塔。中国、欧洲、南亚和西南亚诸国都无力招架帖木儿帝国这样的游牧势力。不过，1405年帖木儿去世后，帝国最终瓦解。

蒙古帝国的灭亡意味着西方对外扩张的阻碍已被消除，而中亚各国间的紧密联系并未因此中断。大部分国家长期独立于西方的控制和影响，直到19世纪末俄国入侵，这一局面才被打破。



“跛子”帖木儿是成吉思汗的后人，以残暴的统治手段闻名于世。

城市和贸易

公元5—6世纪，虽然城市及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因“蛮族”的入侵而被严重破坏，但随后又逐渐复苏，这在中国尤为明显。公元8世纪，唐朝的都城长安（今西安）已有大约200万人口。对称的城市布局显示了当时中央政府的强大。长安城按照特定的职能区规划，街坊相邻，秩序井然。在中国文化中，空间的布局规划影响社会的发展，东亚各地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它的影响。古代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相当高，唐朝时已有十几个城市的人口超过30万；到了宋朝（960—1279年），贸易中转地杭州拥有100万居民，而伦敦那时仅有1.5万人；11世纪时，开封的商业财富远超欧洲任何一个城市。

亚洲的城市化进程不只在中国。柬埔寨的高棉帝国，建于9世纪的吴哥窟既是首都也是佛教活动中心，城内建有复杂的水道系统用以保存和分流季节性降雨。

贸易对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港口城市的发展促进了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往来。公元1000年前后，印度洋的亚丁、印度南部的库拉姆马里以及马六甲海峡北端的卡塔哈都是当地重要的港口城市。500年后，亚丁、马六甲和文莱依旧是重要的贸易中心。

欧洲也出现了重要的贸易城市。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凭借海事优势和经济网主导着地中海地区的贸易往来。而在波罗的海地区，如吕贝克等汉萨同盟[43]城市也是重要的贸易中心。

中世纪的中国

忽必烈（1260—1294年在位）是成吉思汗之孙，才能卓越。在他的领导下，蒙古人历经磨难，终于在1279年推翻南宋政权，成为首个攻占中国江南地区的游牧民族。

14世纪，由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加剧，加之天灾的影响，蒙古人在中原的统治已是强弩之末。从13世纪50年代初开始，起义愈演愈烈。1356年，一股重要的力量——红巾军，占领了南京，凭借其地理优势控制了长江流域。红巾军领袖朱元璋挥师北上，直捣北京，将蒙古皇帝赶回了草原。朱元璋随即自封为帝，建立明朝。此后，明军又相继击溃了中国西南部和蒙古东部的蒙古人。明朝的统治一直延续至1644年。



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了蒙古的统治，建

立了明朝，称洪武帝。

中国实行等级森严的君主集权制，主张皇权是天命所授、民心所向、现实所趋。中国人借鉴佛教、道教的核心思想，并结合占星术和炼金术，建立了一套形而上的秩序来解释天、地、人三者的相互作用。

中国也是技术发展的中心，如印刷术和火药的发明（见第79页）。11—12世纪，活字印刷术已被广泛应用于印刷。

中世纪的非洲帝国

中世纪时，非洲取得了重大的政治进步。城市的发展成为世俗和精神权威传播的主要动力。639年，阿拉伯人首次攻占埃及，在经历了不寻常的发展之路后，这里成为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的重要领地。在穆斯林的统治下，奴隶兵出身的马穆鲁克人享有重要的军事和政治地位，并于11世纪初发展为颇具影响力的战士阶层。1250年，马穆鲁克人举兵推翻了阿尤布王朝，不久后其势力范围远至叙利亚。

在西非萨赫勒带和东非沿岸，受伊斯兰教和贸易增长的影响，当地的城市迅速发展壮大，如尼日尔河边的廷内、廷巴克图、加奥，尼日利亚北部的卡诺，以及印度洋沿岸的摩加迪休、马林迪、蒙巴萨、基尔瓦和索法拉。这些重要的转运口岸将环境各异的地区连接起来，如尼日尔河接通了横穿撒哈拉沙漠的商路，或者从印度洋出发也可抵达东非内陆，这是一条进行奴隶贸易的重要航线。14世纪初，盛产黄金的马里帝国的皇帝曼萨·穆萨前往麦加朝圣，他在旅途中向全世界显露了西非的富庶，轰动一时，但也招来了贪婪的北非统治者的觊觎。



奴隶兵出身的马穆鲁克人的军事和政治地位逐渐上升。1250年，他们发动起义推翻了阿尤布王朝，随即掌控埃及。

在非洲东南部，大津巴布韦帝国依靠黄金和牲畜贸易壮大起来，其首都大津巴布韦也发展为大城市，它于11—15世纪建成。值得一提的是，该城于11世纪修建的皇家宫殿尤为壮观。然而，在非洲大部分地区，特别是非洲南部，狩猎、游牧或农耕仍是主要的社会形态，并没有催生出任何强大的国家或政体。

由于非洲劳动力短缺，对人力资源的占有变得和控制领地同等重要。这巩固了非洲普遍存在的奴隶制度，而长期存在的奴隶贸易也是重要助力，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奴隶贸易。

改变世界的物品：火药

9世纪时，中国人发明了威力巨大的火药。这是一种可快速燃

烧的高推进剂混合物，在武器方面，它最先被用于火箭和喷火器，之后约在1163年被用于火炮。大约在13世纪中期传入阿拉伯，后由阿拉伯传入欧洲。之后不久，手持火器便出现在了战场上。这些武器射程远、杀伤力大，过去坚不可摧的城墙如今也能被火炮攻破，这引发了战争形态的重大变革。

哥伦布抵达前的美洲帝国

在1492年西班牙探险家抵达之前，美洲已出现地域辽阔的帝国和文明。虽然没有马匹、印刷术和火药，但美洲的人口在1400年已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4%。

15世纪，阿兹特克人在墨西哥中部建立了城邦帝国，秘鲁的印加人则建立了一个更辽阔的帝国，疆域覆盖今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和智利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在北美，密西西比文明影响了落基山以东的大部分地区，农业文明在今天美国的西南部方兴未艾，而北极地区则被图勒的因纽特人掌控。中南美洲的森林地带涌现出大量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定居点。美洲各地普遍崇拜祖先，并且创造了洞穴岩画等形式的古代美洲艺术，比如波多黎各的泰诺人就留下了诸多作品。



印加人的“奇普”是一种结绳记事法，收集归档后由专人负责保管。

在美洲的政权中，印加帝国最为复杂。印加人在15世纪征服了这片土地。他们实行劳役制度，修建了覆盖整个帝国的公路网。国家的统治者被称为“太阳的后裔”。印加人还发明了一种名为“奇普”的结绳记事法，收集归档后由专人保管。档案大多放置于可进出的墓穴内，或许绳结记录与永生、神灵有关。

从1427年开始，阿兹特克帝国自墨西哥山谷向外开疆拓土。在阿兹特克文化中，皇帝是神的化身，战神维齐洛波奇特利被奉为守护神，以活人祭祀神明也是该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尽管阿兹特克人善用结盟来巩固统治，但他们和印加人一样，都极度崇尚武力。

密西西比文明

约1000—1450年，密西西比河流域成为混合众多酋长部落和主要城镇文明的中心，如卡霍基亚和芒德维尔。位于乔治亚州的埃托瓦占地22公顷，小镇的外围筑有一圈防御工事。在16世纪西班牙人到来之前，密西西比文明已经衰落。和早些时候美国西南部的其他文明一样，干旱可能是导致密西西比文明消亡的原因之一。

玛雅文明

关于玛雅文明的记载不多（鼎盛期约为公元290—900年），但能确认的是，玛雅人在危地马拉丛林和尤卡坦半岛建立了城邦，尤卡坦半岛的建筑至今仍令人赞叹不已，尤其是奇琴伊察的阶梯式金字塔。虽然缺乏轮车、驮畜和金属工具，他们已能通过陆路和海路进行盐、黑曜石、宝石、黄金和铜等贸易，贸易带来了权力和财富。他们还创造了象形文字体系，并通过观测天象发明了复杂的历法。运用现代激光技术扫描这些地区后，人们发现玛雅时期的人口足有 1500万，而非之前认为的500万。扫描结果还显示，危地马拉北部的玛雅各城市之间曾筑有堤道网络，这反映出当时发达的贸易水平。不过，玛雅文明衰落的原因至今仍是个谜，或许是干旱范围的扩大导致大量人口最终断了水粮。

中世纪的科技

在中世纪，世界大多数地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不过，现代社会将宗教、文化，以及理性思维和理性追求分门别类、加以区分的观念在当时尚不可行。例如，神学在欧洲被称为“科学的皇后”。在13—14世纪的欧洲，很多关于表象和现实之间关系的讨论仅限于哲学和宗教范畴，并且大多数与基督教愿景的正确性以及《圣经》解读的本质等问题相关。只有少数学者重视客观事实、实验过程和实用学问，英国修士罗杰·培根（约1214—1292年）便是其中一位。他在深入了解基督教上帝创造的宇宙秩序时，感受到了阿拉伯世界的知识进步。



罗杰·培根（约1214—1292年）采用科学的方法理解宇宙秩序。

11—13世纪期间，大学在欧洲各地涌现，如巴黎、博洛尼亚、那不勒斯和牛津等地。这些城市也成了欧洲的思想中心，那里的评论家深受托马斯·阿奎纳（1225—1274年）的影响。阿奎纳将大学里的哲学理论课程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进行整合（有的译自西班牙和西西里流传的阿拉伯语版本，有的译自希腊语），对现有知识的内容、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进行了合理化的构建。

虽然有限的技术能力限制了科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但进步仍在一些地区进行着。对风能和水能的利用比古典时期更为频繁，高炉炼铁的出现以及中国印刷术的发明，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伊斯兰世界的知识

伊斯兰世界地域广袤，远方的信息、思想和技术通过征战、贸易和旅行被源源不断地传送来并加以利用。穆斯林的统治区域一度从印度和中亚地区延伸到非洲西北部和西班牙。中亚的商路联结了东方和中东，直至撒哈拉沙漠的另一边，而阿拉伯商人则利用他们的天文知识，航行于印度洋和地中海。阿拉伯商人借助季风在印度洋上继续东行，8世纪时已能到达广州。伊斯兰世界借鉴希腊的经验推动了地图绘制的进步，特别是埃及。递归或学究式的论证法也被伊斯兰教引进马德拉沙（伊斯兰宗教学校或大学）——源于佛教的毗诃罗[44]。这一论证法最初由佛教学者提出，对未来科学方法的形成至关重要。

中世纪的生活百态

对于个人而言，中世纪的世界充满了敌意和不可预测性。人们无力阻止灾祸的发生，虔诚供奉也于事无补，一场饥荒或瘟疫便可让多年的努力顷刻间化为乌有。争取独立变为兵革之祸，生活拮据转而沦为乞丐，这样的事屡见不鲜，两者的界线轻易便可跨越。面对种种灾难和风险，许多人开始转向信仰宗教，以寻求解脱。

面对庞大的人口，卫生和饮食成了首要难题。恶劣的居住条件导致呼吸道感染高发，人满为患又缺乏沐浴设施，加上人们长时间不换洗衣服导致虱子滋生，这还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臭虫、跳蚤和绦虫等也让中世纪的人们备受煎熬，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

用净水洗澡在中世纪尚未普及，与动物接触以及居所的粪堆都会传播疾病。清洁饮用水的匮乏亟待解决，特别是在沿海地区和没有深井的低地地区，粪便常常会污染水源，这会引发一种致命的疾病——斑疹伤寒。



城市的现实生活往往与当代艺术家描绘的田园诗般的画面相差甚远。

营养不良降低了人体免疫力，大大增加了传染病的患病概率。因为营养不良，人们性致寥寥，能成功怀孕的妇女不多，婴儿的死亡率也很高。食物紧缺，物价又高，大多数人都缺乏均衡的饮食，即便食物充足，也达不到健康饮食的标准。城市贫民的食物问题尤为严峻，他们买不起水果蔬菜，肉更是奢望，而且由于缺乏衣物鞋袜，他们常常衣衫褴褛。农民的饮食也很单调：蔬菜粥或清汤是家常便饭，很少

会有肉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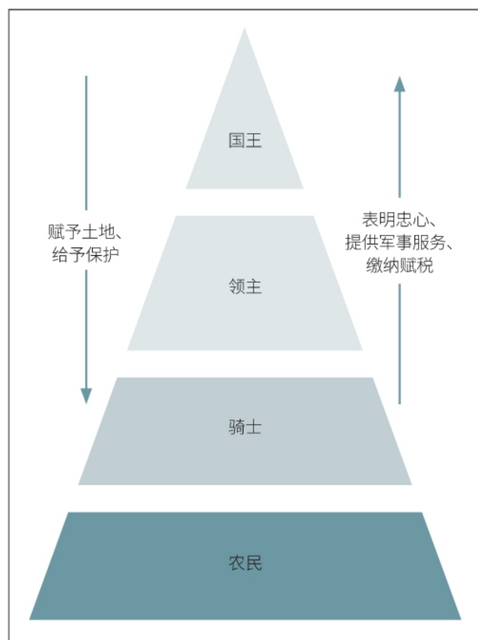
人们的工作环境也很艰苦：经常接触铅和汞等有害物质，建筑工作尤其危险。磨工在粉尘飞扬、嘈杂不堪的磨坊里劳作，常常要忍受虱子、哮喘、疝气和慢性腰背痛的折磨。

为了改善公共卫生条件，当时的人们也做过努力。宗教和市政机构设立医院等公共场所用以隔离感染人群，如果条件允许，还会对病人进行救助。威尼斯政府曾投入大量钱财用于治疗病患，以防威尼斯和亚得里亚海沿岸港口暴发疫情。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不仅禁止带有病原体的船只靠港，还致力改善公众的卫生条件。

15世纪初，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成为医学和解剖学研究中心，主要目标就是解决传染病的问题。由于印刷术的普及，新的医学信息能够被印刷成册，广泛传阅。不过，民间疗法和灵性介入等传统治疗手段在当时依然占据重要地位。在意大利圣吉米尼亚诺的圣奥古斯丁教堂，贝诺佐·戈佐利创作了一幅描绘圣塞巴斯蒂安[45]祈祷场面的壁画，展示了人们以此来守护城市，抵御1464年的瘟疫。在一些特定的社区，对传统治疗手段的笃信成为其礼仪以及社区居民认同感的重要组成部分。

封建制度

11世纪，封建制度是西欧大部分地区主要的政治控制和社会组织形式。本质上，它是一种领主和封臣之间的私人关系，在崇尚忠义的时代被加以巩固。封臣们获得土地，作为回报，他们通常以骑士（重装骑兵）的形式为君主提供军事服务。从现代意义上来看，这种以统治者与封臣商定领土、赋予其统治权和确立严格公民关系的存在，并不是真正的国家。事实上，当时有许多封臣在自己的土地上拥有最高统治权，尽管每个人名义上都要效忠于国王或某个统治者。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这种以土地所有权换取军事服务的制度仍是主要的政治组织形式，直到19世纪，工业化、城市化、征兵制和民族主义的出现才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状况。



君主和附庸的关系是封建制度的核心。社会结构中较低的阶层需要向君主表明忠心并提供军事服务，以换取领主的保护。

城堡

虽然早期城堡一般是简单的土坯或木质结构，但其修建仍需耗费大量人力和时间。若以木材建造，一般会选取土垒加围栏的组合结构或者环形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主要的城堡（如伦敦塔和骑士堡）都用石头进行加固，这样既能防火，城墙也难被攻破。

市场经济的传播

随着中世纪欧洲的贸易量大增，货币的功能开始发生转变，尤其是支付劳动报酬和租金需要大量货币。为了简化借贷的流程，新的金融工具应运而生，比如汇票。这是一种支付凭证，商人在甲国获取汇票后可拿到乙国兑换现金；商人凭汇票还可预支后面的营运资金。

贸易增长和货币的大量使用影响了社会发展的构想和实践。随着商品、服务和土地贸易市场的扩大，印度洋沿岸地区也一并发展起来，这让东亚、东南亚同南亚、西南亚以及东非连成一片，形成了一个增长速度强劲的贸易区。

黑死病和社会

除了运输货物以外，贸易路线也成了疾病传播的管道。14世纪暴发了一场可怕的瘟疫——黑死病，它的传播是各类生物之间广泛接触的体现。它由黑鼠身上受感染的跳蚤以及人类身上携带的虱子进行传播。

鼠疫导致世界人口数量急剧下降，在16世纪以前人口一直维持在相当低的水平。“小冰河期”[46]的到来，造成了气候的持续恶化，使得疫情变得更加糟糕。这导致欧洲多达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劳动力极为短缺。东欧的农奴制由此产生，这是一种将劳动力世世代代束缚在土地上的劳役制度，它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当时农业经济正处于借贷风盛行且低效率的状态，要维持一定数目的劳动力几乎别无他法。农奴制本质上是一种以个人为领主提供服务用以换取土地耕种权的不平等契约制，这使得它能与基督教教义共存，但奴隶制就不是这种契约制。



1381年的英国农民起义，体现了黑死病后农民阶级自治意识的增强。

在西欧，劳动力短缺为农民提供了摆脱农奴制束缚的机会。英国维持劳动纪律的尝试，导致了1381年农民起义的爆发（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农村地区存在更大的压力，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愈加迎合市场需求，这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粮食生产改为养羊。转行的目的不是获取肉类，而是生产服装业所需的羊毛。服装业在意大利北部和比利时（尤其是布鲁日和根特）发展起来，最后是英国。

欧洲教会也受到了中世纪晚期危机的影响。关于教宗选举和权力的争论导致1305—1377年教宗权从罗马转移到阿维尼翁，以及1378—1417年的教会大分裂——发生在西方基督教世界效忠于罗马教宗和阿维尼翁教宗的地区之间。传统的教会权威和服从模式受到冲击，促成了分裂。

大洋洲人的早期思想

澳大利亚的贸易、技术和宗教信仰的发展仍然与欧亚大陆隔绝。这里的原住民通过绘画表现祖先的故事，以及与环境的传统关系，其象征意义往往难以解读。他们在各种介质上进行创作，创作了墓穴装饰、树皮画、岩石画和雕刻等。土著部落及其物质文化的特性鼓励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这些艺术由当地人，也为当地人而创作，因此具有浓重的本土色彩。澳大利亚的岩画和雕刻描绘的多是神话人物，在特定的岩石上创作。它们似在诉说这片庄严神圣的土地可跨越世代而存在。岩层和水洞被视为物理和超自然的实体，而非死气沉沉的存在，因为土著人相信“梦”（祖先）会在其间穿行，过去和现在的时光在这里交织。

在新西兰，毛利人讲故事的传统由来已久，内容基于对地理及地貌的理解。由于口述世界的信息记录、分析和交流都要依靠口口相传，他们取名常常是为了纪念诸如旅行之类的事件。毛利神话大多是关于半人半神英雄毛伊的，据说新西兰的岛屿就因他而生。初代定居者的独木舟在哪里着陆有着特殊意义，因为他们的宗谱要向上追溯到乘舟而来的人。如果声称是毛伊神的后代也有利于部落的征战，因为部落神之间的冲突也是征战的一部分，获胜者会在征服之地统一精神信仰。

波利尼西亚旅人

在新西兰北部，约公元前1000年，南太平洋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

到达了斐济-萨摩亚地区。自公元前200年起，波利尼西亚人划着双壳独木舟陆续在太平洋的众多岛屿上定居下来：大约300年抵达复活节岛，400年迁入夏威夷群岛，1200年定居新西兰。这些成就令人敬畏。波利尼西亚航海者根据星象判断方向，还能看懂由群岛引起的海浪变化。此外，他们还会用枝条（通常是椰叶的中脉）和贝壳制作海图或星图。

第五章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1500—1750年

15—18世纪被称为早期近代。得益于新航路的开辟、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兴起，1800年，西欧的势力已触及每一片有人迹的大陆，但内部无休止的征战却让他们深陷泥淖。在别的地方，印度的莫卧儿王朝和中国的满族各自建立了幅员辽阔的大帝国，而美洲的各大帝国则在列强的炮火和肆虐的疾病中日渐式微。

探索海洋

西汉时期（公元前206—公元25年），中国的舰队抵达了东印度洋。到11世纪时，已能频繁地往返于南海和东南亚之间；而中国早在13世纪以前就有了航海图。

15世纪初，郑和率领船队几度探险印度洋。除了要谋求更大的军事和政治利益，他们还期望借机树立威望、觅得奇珍异宝和技术，其规模和构想堪比现代的太空计划。远航计划将会增加中国的纳贡国，这对中国了解世界局势至关重要。郑和的船队沿印度洋北部海岸航行，远至东非海岸。



郑和舰队的帆船比同期的欧洲船要大得多。

此次远航的政治目的要高于商业目的。但由于蒙古人进犯内陆，加上国内政局有变，以及人口和财政问题日益严重，中国不得不改变

战略，集中精力处理内忧。明朝政府在15世纪30年代下令结束航海，之后再也没有重启该计划，因此中国的地图和书籍中仅有对大洋彼岸情况的少量记录。

15世纪，政治因素还促使葡萄牙及后来的西班牙展开了一系列探险航行。他们不只是为了占领拥有黄金等财宝的富庶之地，还想与伊斯兰世界争夺领地。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向西航行，希望能开辟通往亚洲的新航线，筹集资金重新夺回圣地耶路撒冷。实际上，他最终发现的是西印度群岛。

1488年，葡萄牙航海家巴尔托洛梅乌·缪·迪亚士绕过好望角，沿着一条新航线进入了印度洋，从而避开了穆斯林控制的埃及和红海地区。1498年，同为航海家的瓦斯科·达· 伽马抵达卡利卡特，完成了从欧洲到印度的第一次全海路航行，并用重型加农炮击退了抵抗的印度船队。

葡萄牙人迅速穿越印度洋，到达中国和日本，并在沿线建立了众多军事据点，如1511年征服的马六甲。这些军事据点是之后葡萄牙崛起为新海上商业帝国的关键所在，他们将印度的果阿设为东方领地的首府，还在中国澳门和日本长崎建立了交易站。

1519—1522年，费迪南·麦哲伦完成了世界上首次环球航行。这也是有记载以来，人们首次环绕南美洲南端和横渡太平洋的航行，尽管波利尼西亚人也进行过远洋航行。世界的大小和形状越来越为欧洲人所了解，古代地图和地理学家的权威地位被颠覆，被奉为行事准则的传统惯例也受到了巨大冲击。

西欧诸国凭借其雄厚的国力，一旦战胜新大陆的土著帝国便马上开金采银，增加流动资金，这为与亚洲的贸易提供了资金保障。西班牙坐拥多座矿山，墨西哥的白银和玻利维亚波托西的“银山”都归其所有。虽然西班牙从中获利颇丰，但与其进行贸易的国家才是最大的赢家，尤其是法国和英国。大量的财富使得他们能够承担与亚洲的贸易逆差，从那里进口商品。

我们如何出行：航海

无论是帆船、划桨船，或是集两者于一身的桨帆船，这些大型木船都是当时最昂贵、最强大和最先进的交通工具。建造大型船舶是当时主要的工业活动。15世纪晚期，由于小型帆船的打造技术（将船体木板沿船身边缘连接）开始普及，欧洲船不仅比印

度洋上同类船的船体更坚固，还能搭载较重的枪炮。

索具的发展提升了船的速度、机动性以及利用风向航行的能力。桅杆数量的增多也扩大了索具的选择范围，在某根桅杆损坏的情况下仍能保证航行的安全。12世纪，西方人开始将指南针用于航海。

数学被广泛用于绘制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地图，尤其是1569年“墨卡托投影”[47]的使用。印刷术也普及开来，不仅能印制地图，还能用于知识和技术的系统归纳和传播，如航海专著的出版：爱德华·莱特的《航海术中的某些错误》（Certain Errors in Navigation，1599年）、托马斯·艾迪生的《航海算术》（Arithmetical Navigation，1625年）等。

海盗

海盗活动通常发生在国小力微的地区，比如东南亚海域。海盗们不仅从本地贸易商那里收钱，还会打劫长途贸易商船。为了对付他们的强征强索，各国不得不沿海部署军舰，攻打海盗的陆上基地。英国拥有当时最强大的海上力量，开展了一系列颇有成效的打击行动，如18世纪时清扫加勒比地区的海盗；18世纪50年代击退印度水域的马拉地海盗；19世纪，逐出东南亚和东亚地区的海盗，尤其是加里曼丹岛北部海域。一些知名的海盗后来被民间传奇化，如“黑胡子”爱德华·蒂奇，一位封锁了查尔斯顿、于1718年被杀的英国海盗。

征服美洲

西班牙于1519—1521年击败了墨西哥的阿兹特克帝国，又于1531—1535年征服了秘鲁的印加帝国，建立了世界新秩序。不过，与在欧洲征战时不同，西班牙人并未在新大陆投入大量资源用以保护自身利益。虽然钢制的头盔和剑给他们带来了优势，但西班牙的胜利并不是全靠武装力量。在与阿兹特克人的战斗中，西班牙人许诺当地人，若加入盟军便有机会功成名就，这一策略对当地人卓有成效，如特拉斯卡拉人被成功收买。当地人的投靠反映出阿兹特克统治的弊端，尤其是他们对附庸民族的失败管理。



在当地盟友的帮助下，埃尔南·科尔特斯仅凭500名西班牙士兵就打败了数目庞大的阿兹特克大军。

印加人和阿兹特克人没有枪炮和马匹，战斗方式与公元前1世纪时铁器时代的人无异。他们没有金属武器，仅靠木头和石块作战。面对西班牙人的火器，他们的投石器、木棍和黑曜石剑纷纷败下阵来。1519年，埃尔南·科尔特斯在墨西哥韦拉克鲁斯登陆时，仅有500名西班牙士兵、14门小型火炮和16匹马。弗朗西斯科·皮萨罗攻打印加人时也仅有168名士兵、4门大炮和67匹马。

可怕的不仅是西班牙人，还有他们带来的疾病，尤其是天花。美洲居民从未感染过天花，因此毫无免疫力。天花夺走了约一半阿兹特克人的性命，几乎摧毁了这个民族，加勒比海地区的人口大幅下降。奴隶的流动更是加剧了疫情的扩散，如巴哈马群岛的阿拉瓦克人被带到伊斯帕尼奥拉岛的金矿劳作。

羸弱的统治阶级也是阿兹特克帝国失败的重要原因。惊恐的阿兹特克皇帝蒙特祖玛被科尔特斯迷惑，他担心科尔特斯有可能是神或强大国度的使者，迟迟不愿采取行动。在阿兹特克的文化中，人和神的界限并不明确，两者有重叠的部分。科尔特斯因此顺利进入位于墨西哥中部的阿兹特克首府——特诺奇提特兰，而无须从海岸一路奋战。1520年，蒙特祖玛在一场争端中被杀，他精力充沛的弟弟奎特拉瓦克继位，却于同年死于天花。

当西班牙人到达秘鲁时，印加帝国正陷入阿塔瓦尔帕和他同父异母的弟弟瓦斯卡尔的皇位继承争夺战中，力量已不复往昔，因此内部集团没能及时应对西班牙人的入侵。最终阿塔瓦尔帕被俘，西班牙人利用他扳倒了瓦斯卡尔后，随即将其处死。

西班牙征服美洲之后，改变纷至沓来：殖民者带着牲畜定居于此，基督传教士改变了当地的宗教信仰和仪式；统治者引入了新的管理制度和土地所有制，西班牙人和土著在一定程度上融合——西班牙人认可了当地贵族的存在及其地方文化，土著也接受了西班牙人的统治。如此一来，在遭受极为残酷的破坏之后，一些本土的宗教教派让位于基督教。

在美洲，土著部落被贴上了严酷、原始和未开化的标签，这不仅促使侵略者发动了残酷的全面战争（比如在墨西哥），还坚定了他们消灭其社会特征的决心。当地的宗教场所被大肆破坏，一些难以接受的习俗被根除。虽然基督教信仰的部分内容在西属美洲尚能有所让步，但将基督教奉为唯一宗教这一点却不容辩驳。

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冲突都是宗教使然。尽管奥斯曼帝国、莫卧儿王朝和清王朝都确立了统治，但并不能完全消灭异教的活动。在美洲，西班牙人在消除异教神灵上进行了不懈努力，并通过控制土著劳动力来削弱当地贵族的地位。但由于西班牙人及其后裔从未在数量上超过土著或混血儿，所以还是把大片土地留在了归顺的土著手中。莫卧儿王朝在征服印度北部时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西班牙人将改变宗教信仰视作优越的象征，认为这是发动战争的正当理由，也是维系统治的方式。事实上，西班牙人对当地文化的猛烈攻击远比莫卧儿王朝在印度的行为要严重得多，毁灭式的破坏和疾病一同摧毁了当地社会。这一结果是西班牙借鉴“收服失地运动”全面征服的模式所致。

16世纪，由于欧洲大陆的政治和文化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西班牙开始实行更加严酷的统治。奥斯曼帝国崛起，复兴的伊斯兰势力踏入欧洲基督国家的领土（包括奴役基督徒的国家）。宗教改革后，基督教国家之间因为信仰分歧冲突迭起，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西班牙人。

当地部落对政权的不满导致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的崩溃如大厦之将倾，西班牙人发现巩固其统治并非易事。在秘鲁，西班牙的征服完成后不久就爆发了一场大起义。起初瓦斯卡尔的弟弟曼科·印加佯装是西班牙的傀儡，1536年他从皮萨罗的监禁中成功逃脱，集结了一

支20万人的大军。为了继续抵抗西班牙的统治，他们被迫躲进比尔卡班巴的丛林，一直到1572年曼科的儿子图帕克·阿马鲁去世，这股残余势力才被消灭殆尽。

在北美和南美的其他地方，西班牙人也遭到了当地部落的抵抗。这些部落的地理环境、经济状况、社会形态和政治组织各不相同。一些部落发展程度较高，如哥伦比亚内陆高地被称为“祖母绿之乡”的穆西卡。1536年，贪婪的西班牙人在一次远征中攻占该地，但由于地势险要，当地人的抵抗让西班牙人吃尽了苦头。



1539—1542年，埃尔南多·德·索托远征密西西比地区，给当地居民带去了致命的疾病。

从西班牙殖民地的领地范围和统治手段，可以判断出土著部落抵抗的强弱程度。在没有当地盟友支持的地方，西班牙的统治困难重重，如在智利中部，他们在1598—1604年被迫从中央山谷南部撤退，从那以后，比奥比奥河彼岸的阿劳坎人才得以享有独立和自由。墨西哥北部的奇奇梅克的游牧勇士箭法精湛，西班牙骑兵难以靠近。不过，西班牙人召集了一些土著盟军替自己参战，冲突由此转变为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之间的长期斗争。土著也会抓捕西班牙人的马匹来加强自身的机动性。久而久之，西班牙人最终放弃了奴隶掠夺等激进的政策，转而通过赠送礼物和基督教传教活动来收买对手，以缓解紧张的局势。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还在活动边界划立了“中间地带”，在此区域内双方以协商代替暴力争夺。在墨西哥北部，西班牙政策的转变为定居点的增加和堡垒的修建创造了条件。

有关黄金的传言鼓动着西班牙人从墨西哥向北进入美国内陆。弗

朗西斯科·巴斯克斯·德·科罗纳多最先到达了今美国的新墨西哥州，1540年又从那里进入北美大草原。最终证实传言是假的，那里与墨西哥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此在埃尔南多·德·索托之后再无来者。1539—1542年，索托野蛮地劫掠了密西西比河下游及附近地区。1541年，他在莫比尔（今阿拉巴马州的塞尔玛）击败了乔克托人，由于当地人没有马，西班牙骑兵轻而易举地就控制了这片开阔地带。索托死后，德·莫斯科索于1542—1543年率兵进入今得克萨斯州东部。

远征给殖民地带去了疫病，而当地实行的殖民政策更是让疫情迟迟不见好转。种植园和采矿业是殖民地的主要经济活动，劳动力的严重短缺一度让生产难以运转。西班牙人的解决办法简单而粗暴——去殖民地之外疯狂掠夺。16世纪，他们从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抓来大量土著充当奴隶。

贩卖奴隶的行为增加了部落间的冲突，破坏了社会稳定。之后，西班牙王室立法声明，要将土著视为预备归信基督教的臣民而非奴隶，并致力于减轻牧师的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西班牙辖区对土著劳动力的控制。1542年颁布的《新法律》（Leyes Nuevas）正式废除了土著奴隶制度，但这一法律在秘鲁的西班牙人中引起了躁动，当地许多官员和地主选择置之不理。此外，新推行的劳力分配制度（如将土地和土著家庭分配给殖民者的监护征赋制）和强制移民制度（如部分男性被迫离家工作的重新分配制度），其实还是变相的奴隶制度。

在墨西哥北部及其他边境地区，虽然土著奴隶仍然重要，但运输成本决定了他们更倾向于从大西洋彼岸的西非购买奴隶。起初，非洲奴隶需从西班牙转运才能抵达西属美洲，但从1518年起，名为“阿先托斯”的许可证批准了奴隶可以直接由此运输。运输成本使得非洲黑奴比土著奴隶更昂贵，因此黑奴常被当作家奴，这是一种较高的奴隶身份，也凸显了他们的高成本。

到16世纪中叶，非洲作为奴隶的输送地变得越发重要，其中黑奴的体魄比土著奴隶更强健是原因之一。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被贩运至美洲的黑奴数量猛增，不过他们的成本仍高于当地劳力。当地劳力为了偿还债务也会放弃自由，以提供服务抵债。

莎士比亚笔下的美洲

英国人也建立了殖民地。在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年）

的一生中，在新大陆建立殖民地（尤其是1607年得名于伊丽莎白一世的弗吉尼亚）是英国取得的重大进展。弗吉尼亚和百慕大都曾被认为是戏剧《暴风雨》（该剧于1611年首次在宫廷上演）的灵感源泉。莎士比亚在作品中描述了当时知识的传播，如在《第十二夜》中，玛利娅评论上当的马伏里奥："他满脸堆笑，脸上的皱纹比添了东印度群岛的新地图上的线路还多。"在《亨利八世》中，莎士比亚还写到伦敦人对到来的印第安人的迷恋："女人们为什么围着咱们？难道宫里来了那玩意儿很大的印第安人？"他笔下的英国大众被新奇的事物牢牢吸引。在《暴风雨》中，特林鸠罗看到岛民卡利班向公众展示的场景就像是在英国赚了钱一样：

"在那里，不管哪个放假了、闲着没事干的傻子都会掏出块银洋瞧一瞧；在那里，这个鬼东西能让你发大财；随便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都能让你发财。他们不愿拿出一个铜板给跛脚乞丐，却愿意拿出十个铜板去看一个死了的印第安人。"（《暴风雨》第二幕第二场）

西班牙的势力继续向美洲以外的地区扩展。1565年，西班牙人首先在菲律宾宿务岛建立军事基地，接着是在马尼拉。他们以国王腓力二世（1556—1598年在位）之名命名菲律宾群岛，至此，腓力二世成了统治首个"日不落"帝国的君王。

改变世界的物品：糖

在甜味剂匮乏的时代，糖会让人上瘾。但种植甘蔗是件苦差事，因为甘蔗适宜生长在炎热潮湿的热带地区。1424年，葡萄牙人开始在大西洋的马德拉岛实行种植园奴隶制，因此诱发了大规模的奴隶贸易。依赖奴隶的糖业经济从这里向葡属殖民地巴西蔓延，之后又发展至西印度群岛。大约1600年，巴西已有192家糖厂；而1684年，英国从西班牙手中夺来的牙买加已有246座甘蔗种植园。

奴隶主要来自西非，那里的奴隶贸易规模庞大、根基稳固，早已为伊斯兰世界输送了大量奴隶。新大陆东海岸的人口结构、经济状况、社会和政治面貌皆因非洲的奴隶贸易而改变。大约有1250万奴隶从非洲运往美洲，但因大量奴隶死于途中，最终抵达美洲的仅有约1070万人。他们被迫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主要是在种植园里劳动，生存条件十分恶劣。

糖是种植园的主要利润来源，此处还有烟草、咖啡豆和可可豆等产品。糖作为替代蜂蜜的甜味剂，供不应求，反过来又刺激了对糖业的投资，供求关系的调节使得17世纪时的糖价下跌。加糖的饮品口感更好，在欧洲大受欢迎，比如苦涩的巧克力饮料因加糖后变得香甜而备受青睐，这也增加了巧克力的主要成分可可豆的进口量。由于含咖啡因饮料（包括来自中国的茶）的消费量上升，糖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茶壶在家庭中也逐渐普及。制作果酱、蛋糕、饼干和药品时也会添加糖，这再一次证明了糖的普及程度。

奥斯曼帝国

当欧洲人忙着建立海上帝国时，陆上帝国也在非欧洲世界扩张。奥斯曼原是一个穆斯林土耳其部族，13世纪晚期，他们在安纳托利亚建立了一个公国。由于1204年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拜占庭帝国被攻陷，首都君士坦丁堡元气大伤，奥斯曼人得以在与拜占庭的长期对垒中逐渐扩大了领土范围。1354年，奥斯曼帝国占领了欧洲的加利波利半岛并当作据点；又在 1389年的科索沃战役中大败塞尔维亚人，为其在14—15世纪成功征服巴尔干半岛铺平了道路。奥斯曼帝国不仅受益于拜占庭帝国的衰微，一些基督教国家挑战拜占庭的权威也给他们制造了机会。1402年，帖木儿帝国的入侵一度中断了奥斯曼帝国的扩张，但没有持续很久。1453年，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占领了君士坦丁堡。

奥斯曼人结合了亚洲轻骑兵战术的快捷和步兵团的高效，并辅以火器，实力大增。16世纪早期，以部落起家的奥斯曼已成为一个超级大帝国。1514年，奥斯曼帝国苏丹塞利姆一世（1512—1520年在位）击败了刚刚战胜波斯的萨非王朝军队，于1516—1517年灭了马穆鲁克王朝，控制了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埃及。以埃及为起点，奥斯曼帝国的势力沿着北非海岸直达红海，并进一步延伸至亚丁。

塞利姆之子苏莱曼大帝（1520—1566年在位）在16世纪20年代将目标对准了欧洲大陆：1521年占领贝尔格莱德；1522年攻克罗得岛；1526年挫败匈牙利军队，但在1529年围攻维也纳时以失败告终。此后，苏莱曼将矛头转向萨非王朝，他从萨非人手中夺回伊拉克，欧洲基督徒失去了该地的控制权。不过，1565年的马耳他之战表明基督教世界尚有能力抵御奥斯曼帝国的进犯。

依托首都兼港口城市君士坦丁堡，奥斯曼帝国建立了强大的海军力量，势力远及印度洋和波斯湾，但未涉足辽阔的大西洋海域。1571年，在著名的勒班陀海战中，奥斯曼军队惨败于西班牙和威尼斯的联合舰队。这并非因为他们的海军技术有重大缺陷，而是奥斯曼帝国过于依赖奴隶制度，桨帆战舰由奴隶操纵，精锐步兵团也多由奴隶组成。

17世纪，奥斯曼帝国已有些力不从心。1683年，它对维也纳的二次围攻遭到重创，被赶出了匈牙利。1717年的另一场战役也以失去贝尔格莱德告终。虽然1711年他们在普鲁特河击败了彼得大帝的俄军，1715年从威尼斯夺回了希腊南部地区，并于1739年再次攻占贝尔格莱德，但来自俄国的压力终究还是令奥斯曼帝国无力招架。从1730年年末到1812年，俄国占领了黑海北部海岸，并向多瑙河以南推进。

近代的非洲

16—18世纪，欧洲在非洲的殖民进程并不顺利。行动最多的葡萄牙于1578年在摩洛哥惨败，企图征服莫桑比克扩张内陆的计划也宣告破灭，而在安哥拉的扩张更是举步维艰。相反，非洲的穆斯林势力却是风生水起。1591年，摩洛哥军队穿越撒哈拉沙漠，在汤迪比摧毁了位于尼日尔河谷的桑海帝国。再往东，穆斯林阿达尔苏丹国在奥斯曼帝国的支持下企图征服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王国。不过，自1562年起便统治着埃塞俄比亚的塞西-丁吉尔不仅粉碎了这一企图，还借机扩大了自己的领地。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冲突频繁，获胜方能够俘获大批奴隶。虽然从美洲引进的玉米、红薯和花生养活了不少非洲人，如同土豆被引入欧洲的作用一样，但严重的干旱和饥荒还是会诱发战争。非洲人将俘虏奴隶视为一种削弱对手的方式，因此产生的大量奴隶使得奴隶价格非常低廉，这意味着欧洲人从非洲购买奴隶来满足新大陆的劳力需求变得更加经济实惠。非洲的农业状况进一步降低了奴隶的成本，这里普遍使用锄头耕作，效率低且利润不高，劳动力的价值十分有限。



这个来自尼日尔河谷的战士雕塑可追溯到16世纪，说明青铜技术在当时已传至当地。

17世纪，非洲的战争形态发生了变革，火器的使用逐渐取代了赤身肉搏，军队规模也越来越大。由于美洲种植园经济的繁荣和大西洋经济的一体化，欧洲人的购买力变得十分惊人，比起其强大的军事实力，这才是他们在非洲更易获得战俘奴隶的真正原因。

文艺复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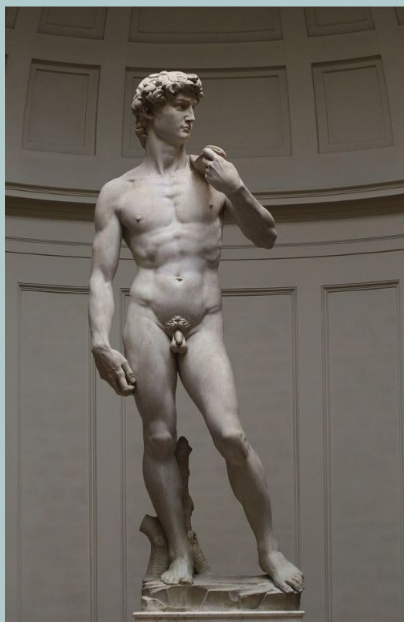
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学术和文化大多局限于修道院和神学问题。研究重点也基本围绕着宗教教义，而绘画、建筑和音乐也主要为教会服务。一场旨在复兴艺术和文化的运动——文艺复兴，始于14世纪的意大利中北部。虽然它未完全改变这一局面，但却提升了社会对世俗问题和人的关注。自13世纪以来，中产阶级的财富与日俱增，尤其在意大利各城，富裕的公民

渴望能为子女（尤其是儿子）提供更好的教育。

亟待拯救的不仅仅是艺术。从14世纪开始，一群意大利学者受诗人彼特拉克启发，提出了一种以古典文学为基础的新式教育，他们称之为“人文主义研究”（studia humanitatis）。后来这些学者被称为人文主义者，虽然他们不反对基督教教义，但神学不在其研究范畴之内。他们把关注点从“人该如何侍奉上帝”转移到“有德行之人该如何做”。

文艺复兴时期也出现了艺术活动的高潮，代表人物有意大利艺术家拉斐尔、米开朗琪罗和列奥纳多·达·芬奇等。基于意大利人取得的技术进步，他们获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比如对透视法的理解和表达，以及对人体的描绘。在这一方面，多纳泰罗的雕塑尤其值得一提，他的代表作《圣乔治像》（约1416—1417年）和青铜雕像《大卫》（约1440—1450年）都被收藏在佛罗伦萨的巴杰罗美术馆。

由于意大利多元化的社会环境，文艺复兴运动异彩纷呈且充满活力。威尼斯、罗马和佛罗伦萨等城市成了文化创意的中心。在15世纪文艺复兴的初期，佛罗伦萨是活动的最前沿阵地，以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的画作为代表。16世纪时阵地转移至罗马和威尼斯，代表画家有乔尔乔内、提香和丁托列托等。此处，佛罗伦萨历史学家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1483—1540年）论及这样一个观点：城邦和领地分立的政治形态造成了意大利社会的多元化和竞争性，从而催生了繁荣的艺术文化。至少对一些城市来说，这种彼此独立的政体为意大利发展独特的城市文化提供了契机。



米开朗琪罗的《大卫》等诸多优秀雕塑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标志性名作。

文艺复兴思想体现了当时的人们试图理解新（复兴）信息，其中大部分是对希腊和罗马古典作品的重新解读，并致力于将其系统化为一种可帮助理解和阐释学问的自然哲学。文艺复兴推进了政府工作的改进，同时也体现了更冷酷的实用主义，以佛罗伦萨人尼科洛·马基雅维利为代表，他在《君主论》（The Prince，1532年）中就君王如何夺取和巩固政权，提出了一系列相当残酷、讽刺又尖锐的建议。新旧观念共存于文艺复兴思潮中，相互交融，比如结合了科学和占星术的研究主要是关注天体的周期及其对人类生活的影响。

文艺复兴运动试图将世界理性化，调和自然科学和基督徒为追寻和平所做的奉献，将理性思辨与宗教、炼金术、魔法相联系。人们认为与秩序相辅相成的和谐本质上是善的，也是一种达到善的手段。艺术便是追求善的过程，精益求精的表现手法能够更好地展现神性和人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艺术和科学紧密结合起来，如对透视法的理解和应用就依赖于数学知识的进步。

尽管文艺复兴起源并兴盛于意大利，但其影响也蔓延至其他地方。在欧洲北部的比利时，思潮在布鲁日、根特等主要城市生

根发芽。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往往是精通多个领域的全才，尤其是列奥纳多·达·芬奇和荷兰学者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1466—1536年），他们成果斐然，堪称代表。

近代的日本

欧洲的海上霸权几乎没有影响到日本。日本的大权基本由幕府将军（政府的首领）独掌，京都的天皇只保留了神圣的身份，几乎没有世俗权力。不过，幕府将军的实权被地方武士和当地军事统领所钳制。幕府将军家族内部的继承争夺引发了“应仁之乱”（1467—1477年），继而日本进入战国时代。武士首领“大名”崛起，其地位取决于持续的军事胜利。大名的代表织田信长于1560—1580年降服了大部分对手，但在1582年因部下谋反被迫自杀。织田信长的家臣丰臣秀吉在1582—1585年击败了主要政敌，自1587—1588年征服了九州岛，并在1590年打败了最后的反抗势力北条氏。1591年年底，日本基本完成统一。



织田信长是日本战国时代有权势的大名，不过最终未能掌控幕府的权力。

征服朝鲜和中国的失败使得丰臣秀吉元气大伤。因中国的介入，丰臣秀吉于1592—1593年和1597—1598年两度入侵朝鲜失利，后于1598年离世。随后，另一位大名德川家康崛起。1600年，德川家康基本扫清了敌对势力，最终在1614—1615年打败了丰臣秀吉之子丰臣秀赖。

由德川家康建立的德川幕府一直延续到1868年。这是一段比较太平的时期，日本无意对外扩张，甚至没有为了加强对北海道北部岛屿的控制而对当地的阿伊努人动武。

和中国人一样，日本人深信居住在国家中心地区的人纯正善良，而住在“穷乡僻壤”的人道德败坏，因而削弱了向这些人学习的可能性和努力的动力。16世纪90年代，中国拒绝了日本要求平等外交的提议，而日本则通过限制其与朝鲜以及被征服的琉球王国的外交挽回了颜面。

与日本通商的欧洲人原本就不多。由于改信基督教的民众引发了一场暴动，虽然最后被镇压，但在1639年葡萄牙商人还是被驱逐出境。1641年，德川幕府只允许荷兰人在长崎的一个港口活动，又大大减少了日本与荷兰的往来。不过，到了18世纪，日本政治经济学家专注搜集中国的相关信息，力求为国谋利的方法，出版和学术活动显著增多。与此同时，由于人口增长且资源有限，特别是土地紧缺，日本局势急速紧张。虽然改革之声此起彼伏，可对于解决问题之道，社会上或多或少弥漫着一丝悲观情绪。

满族入关，清朝建立

14世纪60年代末，元朝被推翻，明朝建立。之后，明朝被满族人推翻，不论是在当时的欧洲还是在亚洲，都没有比这更轰动、更充满戏剧性的事了。满族的先人是金朝的女真族，他们从1126年开始统治中国北方，直到1234年被蒙古人推翻。

女真族的大本营在中国东北东南部的山区，17世纪初，在努尔哈赤（1559—1626年）的领导下，女真族的势力扩张至长城以北。与蒙古首领成吉思汗一样，努尔哈赤也通过一系列组织管理（如设立八旗制度）克服了各部落不愿共事的心理，并使涣散的骑兵战队上下一心。

从1618年起，努尔哈赤多次进犯中原，同时他还效仿中原统治者的施政技巧和行政结构。在这一过程中，满族人萌生了取而代之之

心，并最终取代了明朝。明朝当时正忙于加强专制，驱逐异己，而对外族的入侵疏于防范。

明朝末期政局混乱，特别是1582年后接连几任皇帝昏聩无能，中央政府越发专制，课税越来越重，各省雄心壮志之士纷纷自立。最终，群雄之一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1627—1644年在位）自缢而亡，其统治宣告结束。1644年李自成兵败。满族人借助部分明军之力，迅速占领了北京，并于1645年攻占南京。

满族入关重新定义了忠诚文化，汉族和满族的差异逐渐弱化，民族界限也不再那么分明。满族的长久统治与其包容并举、兼收并蓄的文化政策不无关系，西班牙和英国分别在中南美洲和印度都不同程度地采取过此类策略。1680—1760年，清王朝先后征服了台湾、西藏和新疆，疆域进一步扩大。

城市：主导亚洲的等级体系

在近代早期，世界的大城市都集中在亚洲，这些城市里居住着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由于政治和经济的重大变化，亚洲的城市等级体系也在更新换代。在印度北部，罗第王朝的首都阿格拉始建于1505年，从此逐渐发展为主要城市之一；北京和南京仍然是中国皇帝的政治中心；而在日本，蓬勃发展的江户（今东京）冲击了京都的地位。

然而，先是里斯本和塞维利亚，后是阿姆斯特丹和伦敦，欧洲以这些城市为据点，迅速扩张了海上势力，并获得了与日俱增的全球影响力。一些新城市也成为欧洲的管辖重地和商业中心，如西班牙在1519年建立的哈瓦那和巴拿马；法国、荷兰和英国分别建立了魁北克（1608年）、新阿姆斯特丹（1626年，今纽约）和开普敦（1652年）。

尽管许多城市强烈要求独立自治，但地方政权有效地扼制了这一态势。许多国家是通过强强联合发展起来的，一边是拥有土地的地方统治者或乡村地主，另一边是手握财政资源和商业利益的城市精英。这种模式在西欧很常见，但并不适用于社会地位、种族和宗教差异过大的其他地区。

18世纪，亚洲城市在全球仍占主导地位，但日渐受到欧洲城市的挑战。到1800年时，全世界有19个城市的人口超过30万，其中有5个在欧洲：伦敦（第3位）、君士坦丁堡（第8位）、巴黎

（第9位）、那不勒斯（第14位）和圣彼得堡（第17位）。伦敦有东印度公司和哈德逊湾公司等贸易遍布全球的大企业，逐渐成长为世界大都市。1666年伦敦发生大火，重建后的伦敦宛如新生，给当代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在世界上的某些地区，城市并不重要，比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就鲜有城市，而澳大利亚则一个城市都没有。

印度莫卧儿帝国

近代早期的印度由莫卧儿帝国主宰。1526年，德里的罗第王朝被推翻，新成立的莫卧儿帝国位居印度北部。但在皇帝阿克巴（1542—1605年）的统治下，帝国急剧扩张，疆域在奥朗则布（1658—1707年在位）统治期内达到极盛。虽然莫卧儿王朝征服了印度中部地区，但来自西高止山区的印度教马拉地人奋力抵抗且势头渐长，纵使奥朗则布百般努力，还是无法消灭他们。

莫卧儿帝国建有天文台，尤其是1722—1739年在斋浦尔修建的那五个极其知名，但此时，他们还没有建立类似于西方的科学基础设施。莫卧儿王朝因为固守中亚先祖留下的遗产和遗训，没能合理应对知识、文化和经济层面的变化和挑战。即便如此，印度在科技上仍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对了解自然世界贡献了重要力量，并且对西方的科学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些都为后来英属印度时期的科学成就奠定了基础。



奥朗则布在位期间，莫卧儿帝国的疆域已覆盖印度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却没能彻底粉碎西高止山区马拉地人的抵抗。

1674年，马拉地帝国在德干高原建立。奥朗则布死后，马拉地人屡屡进犯，加之总督们闹独立也愈演愈烈，莫卧儿王朝饱受内忧外患之苦。1739年，波斯的纳迪尔沙率军入侵印度北部；1761年，阿富汗人又席卷而来，莫卧儿的势力被进一步削弱；1803年，英国占领德里，并于1857年废黜了莫卧儿王朝的末代皇帝。

路德宗教改革

欧洲虽然在海外进行经济扩张，但内部却动荡不安。德国修士马丁·路德深谙人们对腐败的天主教会的不满，于1517年起草了《九十五条论纲》，并张贴在维滕贝格的教堂门上，公开表达自己的不满。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迅速从改良罗马天主教演变为建立一个新的宗教系统——新教[48]，以路德宗和加尔文宗为代表。新教徒否认教宗权威，主张从《圣经》而非教会中寻求认可，因而新教看重自己阅读《圣经》（民众的读写能力因此提高）。新教还提倡用民族语言

取代拉丁语出版《圣经》。印刷术的发展保证了路德布道文的印制速度比教会销毁的速度要快，这也是宗教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宗教改革粉碎了原本重要的传统信仰模式，人们无须再为死者举行弥撒，教会、神职人员和圣迹遭到了攻击。新教徒声称，圣迹只发生在《圣经》时代（证实了《圣经》的起源），在那以后便不再出现，而天主教会的观点则是一派胡言。

新教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苏格兰、英格兰、荷兰以及瑞士和德意志的大部分地区被奉为国教。其中，英格兰圣公会自成一派；苏格兰、日内瓦、荷兰和德意志部分地区追随加尔文宗；路德宗则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德意志北部新教的主要形式。



马丁·路德将《九十五条论纲》钉在维滕贝格一间教堂的门上，以此抨击天主教会的腐败，开始新教改革。

面对新教取得的进展，天主教会为求复兴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即始于16世纪中期的反宗教改革运动。1545—1563年，特兰托宗教会议重申了教会的主要教义，建立了新的宗教秩序，并通过改革杜绝了买卖圣职等滥用职权的情况，这些弊端曾一度腐蚀着中世纪各机构。

1614—1648年，焕然一新的天主教打败了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比利时、法国、波兰和德意志大部分地区的新教。

欧洲混战

16世纪，与印度、日本等地一样，战争也是欧洲的主旋律。在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早期，欧洲国家冲突频繁，由此可见，各国已有余力加大对军事活动的投入。随着人口从黑死病中渐渐恢复，欧洲国家在政治团结、行政体系和经济发展方面都有了明显改善。虽然自16世纪20年代以后，新教改革加剧了人口分化，国家的政治统一受到冲击，但16世纪的人口增长确保了更多的人力和财力来源。

日益增强的实力和成熟的政治体系在海上尤为明显。与15世纪相比，欧洲舰队的规模和实力上升了几个层级。海洋实力和海洋战争都需要详细的规划、后勤保障、政治承诺、管理能力、领导才干和大量训练，以及适应技术革新所带来的挑战能力。由于欧洲复杂的军事和政治状况，16—18世纪，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称霸欧洲。通常是那些经验丰富、斗志高昂和部署妥当的军队会赢得战争的胜利，就像三十年战争[49]（1618—1648年）期间，瑞典于1631年在布莱登菲尔德击败奥地利军队一样。如果战争双方势均力敌，那么胜负往往取决于突发状况或其他因素，比如地形、物资供应和两翼骑兵的战况，因为获胜方的骑兵能够自由攻击侧翼或后方的步兵团。围城也是当时战争的常用模式，在攻城战中，花费大力气兴建的防御工事往往抵挡不住先进武器的攻击，尤其是威力强大的火炮。



1631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布莱登菲尔德会战中赢得胜利，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拥有一支纪律严明、经验丰富的军

队。

海陆军的高昂成本常常令参战国难以负担。于是，许多小国会选择雇佣军来满足对高质量士兵的大量需求。16—17世纪的欧洲一片混战，瑞士卫队、德意志雇佣军，以及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武装随从都证明了雇佣兵是非常有利可图的职业。

欧洲混战（1560—1648年）

16世纪至17世纪初，欧洲的“宗教战争”导致了新教和天主教的尖锐对立，并延续至今。两者的对立使得西班牙称霸西欧的梦想破灭，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也无法消灭敌对势力。因此，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仍是“多极的”。此外，西班牙的失败促进了荷兰和英国海洋力量的发展，以及野心的膨胀。

战争对物资以及军事力量的要求与日俱增，从而对参战国的发展产生了越发深远的影响。资本主义划分了国家内部的资源以便政府能够随时调集，一些特定的机构也因此建立，如1694年成立的英格兰银行。

君主专制

欧洲在经历了1560—1660年的纷飞战火后，内部迎来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政权巩固期，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的统治为代表。君主们对权力处处受限的状况越发不满，声称“君权乃上帝而非臣民所授，君王不该臣服于臣民”的要求，因此建立君主专制制度，这在当时非常盛行。

一般认为，专制国家是由政府垄断权力并严格遵循君王意志行事的强大实体。实际上，意见相左的派系、难以把控的官僚机构以及外界要求的适度君主权，都限制着统治者的权力。在欧洲，人们非常排斥专制主义，且形成了对王室行为的既定规范，君权的行使因此大受限制。诸如法国枢机主教黎塞留等位高权重的谋士也有着非凡的影响力，部分原因是面见君主的机会掌控在他们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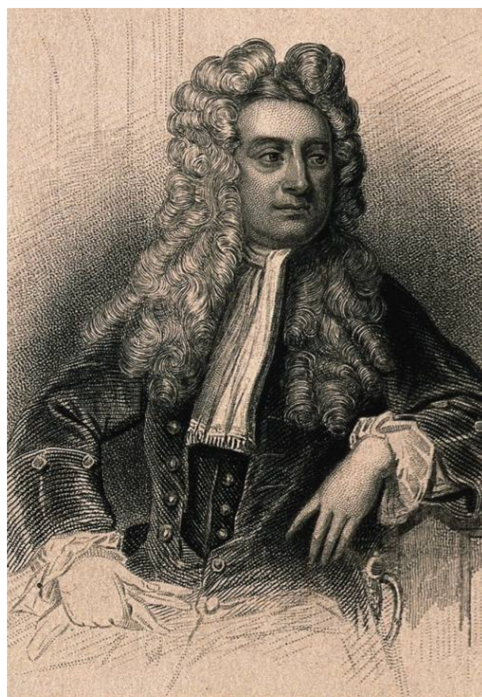
被尊称为“太阳王”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是君主专制的象征。

不同于19世纪的民族主义那样，此时对一个王朝的忠诚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中央政府往往资源匮乏、信息闭塞且沟通不畅。治理和解决征税问题的最佳途径是与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士以及地方当局合作。在专制主义的表象下，路易十四在修建气势磅礴的凡尔赛宫以及扩充军队时，都寻求了地方盟友和地方权势的协助。就连路易十四手下的高官也不得不与地方机构合作，而普鲁士政府的势力范围并没有延伸到贵族阶层。

第一次科技革命

宗教改革抨击了被奉为真理之源及守护者的天主教会，基于实证观察和测量的科学研究受到鼓励，为17世纪的科学革命开辟了道路。英国政府也积极参与进来，如1660年成立英国皇家学会。艾萨克·牛

顿（1643—1727年）的成就代表了西方思想的重大进步。为了建立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明确因果关系，牛顿、罗伯特·波义耳等人提出了科学的反应定律。数学被引入物理系统后，根据科学的观测结果进行假设推断变得可行。对机械秩序的强调则意味着对过程与力的规律性及可预测性的普遍关注。科学革命让这个世界越来越多地被科学术语所解释，而这些科学术语源于西方，并与西方文化的方方面面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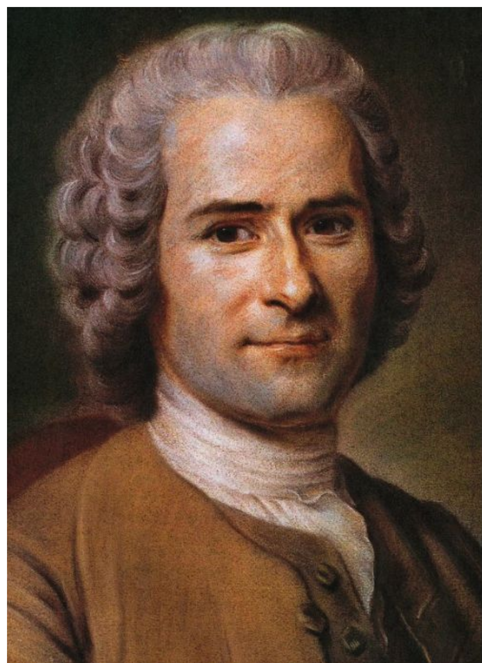
艾萨克·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这是17世纪欧洲科学革命的重要一页。

科技在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鸿沟，镜片的发展就是一个例子。与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相比，西方用玻璃制造镜片的设备和方法更为复杂。在西方，望远镜、显微镜和方便观察的玻璃化学仪器对实验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1610年，伽利略借助望远镜发现了木星的几颗新卫星，大大增进了人们对太阳系的了解。设备和测量的标准化也方便了人们在科学、行政和贸易等领域的生活。

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是一场百花齐放的运动，部分原因是18世纪的欧洲越发看重评判性研究和理性的应用。启蒙思想家认为，摆脱专制统治和传统教义的束缚，以理性的视角看待人、社会和宇宙进而改善人类世界十分必要。以让-雅克·卢梭（1712—1778年）为代表的思想家们批判现存的权威极大地限制了理性探索，但这并非是主流观点。大多数启蒙运动家对于普遍主义和颠覆性的理性理论都持一种基于实际国情和自身地位，并与传统权威相调和的中庸观点，鲜有人挑战基督教教义。

启蒙思想家之间意见相左，因此有了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之分，以及人道主义、自由主义、道德和极权主义等不同维度。除了宣扬宽容和理性的目标一致，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并没有统一的准则，比如有人反对苦修，也有人反对耶稣会。



让-雅克·卢梭是少数真正反对传统权威的启蒙思想家。

国家政策也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年在位）和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1764—1790年在位）都是奉行“开明专制”的君主。他们致力于政府改革，力图改善社会状况并提升国家实力。开明

专制的君主们抨击宗教权威和特权，支持宗教宽容和法律改革。

通信的发展

即使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距离问题也犹如敌人一般，准确的新闻消息就是奢侈品，人们对流言蜚语听之任之，只能靠后续消息来辨别真伪。由于难以预估派送的速度以及是否送达，同一信件经常重复多份从不同路径同时发出。若要从印度到英国，路线一是直接穿行中东；路线二是先穿越红海或波斯湾，然后转为陆路；路线三是从海路出发到好望角绕行。又如从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到伦敦，既可以从陆路穿过维也纳，也可以先走海路，沿亚得里亚海抵达威尼斯后转陆路；或者从地中海航行至马赛后上岸改为陆路；还可以选择全程海路。

从15世纪开始，为了突破限制，邮政速递系统在欧洲发展起来。起初由政府经营，对公众开放。这对依赖消息的商人们来说意义重大，也对后来报业的发展繁荣至关重要。

道路的修建为人们带来了便利，尤其在日本和法国。尽管如此，信件的派送速度仍取决于动物的体力和耐力，在日本、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美洲等地，人力搬运也是重要的途径。降雨会影响路面状况，冰雪融化和暴雨都可能（导致水位暴涨）让人无法涉水或乘渡轮过河，干旱、冰冻和堰坝也会改变河流的状态，而冰雪则令山岭变得难以翻越。

18世纪，由于经度测量的准度提高，船只位置的计算也更准确，加之方向舵的改进，海洋运输取得了显著进步。不过，强风或无风、冰冻以及粗糙的航海图都会影响海上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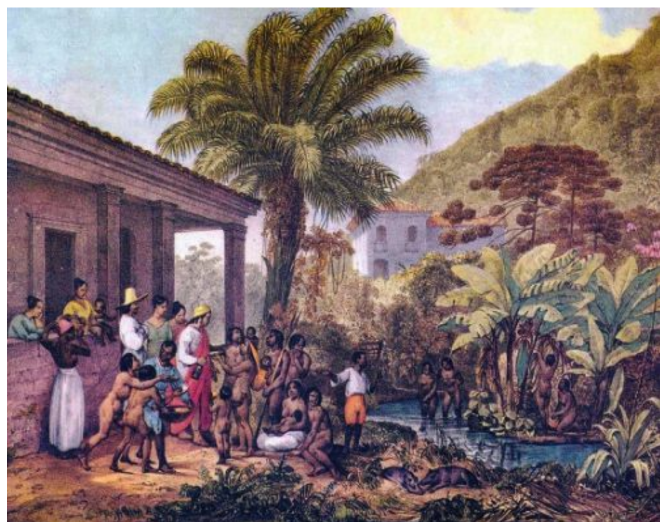
在电报、铁路和轮船出现以前，信息的传递面临着环境的种种挑战。当时的信件和日记中时常会说起信件和信使的进度，以及频发的事故和突发状况，因此也就不足为奇了。

18世纪的世界经济

新大陆的金银矿产尽在欧洲人的掌控中。葡属巴西（主要是米纳斯吉拉斯州）在18世纪发现了大量金矿，英国从这些金矿以及西班牙的银矿中获取了巨额的经济利益。依靠商业实力、稳定的政局、议会颁布的稳定国债，以及贵金属资源，英国政府实现了低利率借款。由

于掌握了丰富的金银资源，西方较其他地区有了明显的优势。亚洲大国通过商品换取黄金，如中国向西方出口茶叶和陶瓷，而源源不断的黄金让西方人能够顺利地进入这些国家，并有足够的财力雇用当地军队，英国和法国在印度也是如此。

凭借海外强权和随后发展的陆地实力，西欧得以深入开发美洲腹地。这里比任何一个非欧洲大国的领土都要广阔，也更有利可图，连疆域覆盖蒙古、西藏、新疆和黑龙江流域的中国都无法比拟。新大陆的腹地为西方提供了许多优势，比如到1800年，原住民已无力威胁西方主要的美洲殖民地，防御他们的成本相对较低。这里也为他们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利益，特别是未被密集耕作的肥沃土地、充足的水源以及相对平坦的地势。（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内陆所没有的。）



18世纪，葡萄牙在巴西东南部的殖民地米纳斯吉拉斯州继续向外扩张。

北美的疾病问题也较少，不像热带地区，比如加勒比海地区和西非的欧洲殖民者，以及在18世纪60年代进入缅甸的中国人就很少患病。黄热病和疟疾是热带地区的痼疾，由于对病因一无所知，尤其是对病媒和传播途径（如疟疾通过蚊子传播）一无所知，因此情况愈加恶化。

从殖民地进口糖、咖啡、大米、可可、靛蓝和棉花等西欧无法生产的商品，利润可观。进口贸易推动了以西方为主导的跨洋贸易体系的建立，并促进了西方金融资本和商业组织的发展。其中，生产信息

和市场信息的交流更为频繁，人们对风险的理解和把控也更精准。全球性贸易的发展指日可待。

中国的人口数量从1650年的1.5亿大幅增长至1800年的3亿左右，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从新大陆引进的红薯和花生，但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大国并没有从中获得可与欧洲匹敌的经济利益。这些大国并不打算横跨大西洋去探索新大陆（即便大西洋比太平洋小得多）。但是，似乎没有理由不让这些人口稠密的大国去亚洲其他地方或更远的大陆进行殖民扩张。然而，中国的明、清两代，以及印度的莫卧儿王朝并不在意这种扩张，构建御敌的安防措施以及应对欧亚大陆内部的侵扰已经牵制了他们的大量精力。西方人对亚洲的跨洋贸易也大大地影响了当地海上基础设施的发展。

第六章 革命浪潮和民族觉醒

1750—1914年

19世纪，欧洲和美国日益成为世界局势的主导力量。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全面发展，西方人自视立于文明之巅。1756—1830年，西方世界天翻地覆：英国一跃成为列强之首。而由于权力和观念与从前不同，冲突之下，欧洲列强在美洲的殖民统治纷纷崩溃。伴随着以工业革命为名的经济格局变化，西方世界的这种转变为其于1920年控制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铺平了道路，唯有日本、埃塞俄比亚和泰国幸免。

七年战争（1756—1763年）

1756—1763年，英国在对法国及其盟国的多次战争中获胜，宣告了其海陆霸主的地位，推动了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从此，英国引领着19世纪的发展方向，如西属美洲的独立、自由贸易和自由经济秩序的建立都深受其影响。

1754年，北美内陆爆发冲突，拉开了七年战争的序幕。英法的冲突因争夺俄亥俄河谷而起。双方于1756年正式宣战，战争全面爆发。起初，战局对法国更有利，但在1758—1760年英国军队攻占新法兰西（今加拿大）后，扭转了局面。英国政府早在1759年英军取得明显的海上优势之前，就决定在北美采取行动了。英军主力部队被派往北美，以便实施积极的进攻策略，这是影响后来北美局势的关键因素之一。坚定的政治立场也尤为重要，即便在1755—1757年屡次败北，英军仍激进向前，而非撤出北美。此外，英军还陆续夺取了法国在加勒比海、印度以及西非的大部分领地。1762年，西班牙作为法国盟军参战，但英国随即攻占了西属殖民地的重要据点哈瓦那和马尼拉。

而在欧洲，1759年，英国海军的多次胜利粉碎了法国的入侵企图，而英国的盟友普鲁士则在国王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的英明领导下击退了强大的法、奥、俄联军。战后签署的和平条约[50]让英国获得了魁北克、佛罗里达和加勒比海的一些岛屿。

美国独立战争

美国独立战争始于1775年，本意是反抗英国议会在北美殖民地实

行的高压统治，特别是税收政策。1776年，战争的诉求变为争取独立。同年3月底，英国军队被全部赶出起义的13个殖民地。

作为海上霸主，英国进行了猛烈的反击。1776年，英军攻占纽约，进而在1778年占领萨凡纳，1780年夺取查尔斯顿。激烈的战事一直持续到1783年，难以预料谁是最后的赢家。英军在长岛战役（1776年）、布兰迪万河战役（1777年）以及卡姆登之战（1780年）中获胜，而美军则取得了萨拉托加大捷（1777年），但是双方都无法彻底击败对手。法国以美国盟友的身份加入战斗，这对局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战争范围自此扩大到全世界。不久，西班牙也加入了法国的行列。1781年，英军在北美约克镇被美法联军击败。1782年，英国国内爆发政治危机，以至于英国最终承认了美国的独立。不过，大部分英属美洲仍在英国的控制下。



1776年，13个北美殖民地签署《独立宣言》，反抗英国的税收暴政。

获得独立的区域越来越大，特别是1783年英国将“旧西北部”[51]（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地区）割让给美国，13个独立殖民地的土地面积大大增加。其实，旧西北部原本没有美国人居住。在未告知也未征得原住民同意的情况下，美国人在这片土地上宣示了主权、挑起斗争并安家落户。他们认为，这些原住民仍处于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若非受到“开化”，根本没有机会分享北美的未来。野心和焦虑共同推动了美国的扩张，但这一进程止步于加拿大。此时，加拿大仍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

第二次科技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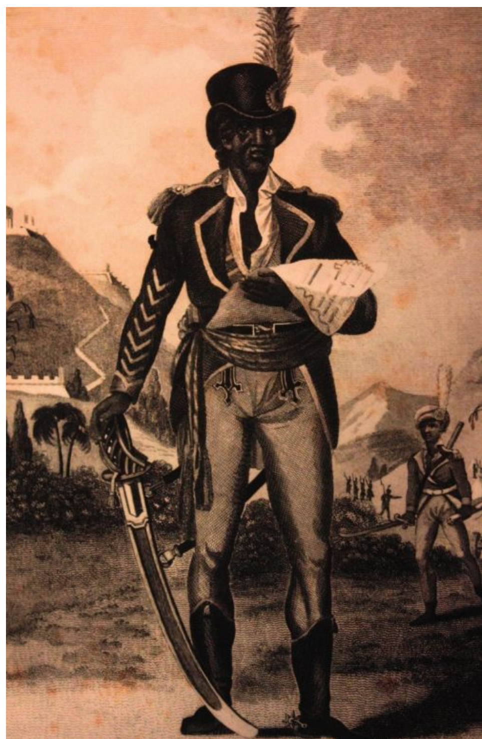
革命并不局限于政治领域。18世纪末，化学领域也取得了巨大进步，从此化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术语和方法论，与炼金术划清了界限。在这一时期，有5种气态元素被发现，约有12种气态化合物得到深入研究。安托万·拉瓦锡对此贡献卓越。1789年，他提出气体的化学反应也遵循质量守恒定律，即化学反应生成的所有化合物的质量总和等于所有反应物的质量总和，气体化学渐成体系。亨利·卡文迪许（1731—1810年）在1766年发现了氢气的特殊性质，并在1781年首次确定了水的成分。19世纪，化学为染料的发展和各类新产品的涌现创造了条件。1800年前后，亚历山德罗·伏特发明了伏打电堆（一种串联的电池组），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电学的认识。

浪漫主义运动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浪漫主义运动席卷了欧洲，它强调艺术应该注重主观精神和情感表达，而不是按照既定的艺术规则进行创作。在音乐、绘画和诗歌等艺术领域，贝多芬、戈雅和华兹华斯等领军人物追求感觉和情绪的艺术表达。如同当时激进的政治运动，浪漫主义在艺术界掀起革命，尽管并非所有艺术家在政治上都是激进派。

18世纪90年代的危机

18世纪90年代，世界危机四伏，各地冲突不断，军事集团之间相互抗衡。1790—1800年这十年间，法国大革命爆发；法属圣多明戈起义成功，并于1804年建立了美洲第一个独立的黑人国家——海地；俄国镇压波兰的独立运动；中国白莲教起义；英国征服迈索尔。即使是那些看上去很成功的政权到1820年也都覆没了，如马拉地人的政权以及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都是如此。到1860年，中国人将会意识到制度的彻底变革迫在眉睫，但在1800年危机尚不明显。



杜桑·卢维杜尔在圣多明戈领导了反对法国统治的奴隶起义，并于1804年建立海地，宣布独立。

1700年，英国和俄国已是强国，到1800年更是难逢敌手。18世纪，英国、俄国和中国是世界主要的军事强国。

与中国和西方列强相比，由于缺乏完善的基层政治体制和稳定的军民关系，奥斯曼、莫卧儿和萨非等帝国的继任国则相对滞后。纵使土耳其的体制使其在帝国扩张时期所向披靡，但帝国雄风却未能长久维持，各省的叛乱更是土耳其治理无方的体现。

统一夏威夷

卡米哈米哈一世统一了夏威夷群岛。他在夏威夷岛的西海岸设立了军事据点，这片海域常有欧洲船只出没，他便趁机抢夺枪弹火炮，并让俘获的欧洲人当火炮手。1791年，他赢得了夏威夷岛的统治权，并于1795年征服了毛伊岛和瓦胡岛。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

欧洲统治者对叛乱已是司空见惯，但1789年法国爆发的起义却尤为激烈。由于法国两党派间信任破裂，协商时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加之1792年法国与邻国开战，革命的势头越发强劲。1792年，法国宣布成立共和国；1793年，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掌权的革命派还下令废除基督教和封建制度。

1793—1794年被称为“恐怖时期”，革命的激烈程度已经白热化，一些反作用也开始显现。1799年，法国将军拿破仑·波拿巴发动政变，并成功掌权。此前，他因在1795—1796年屡次挫败奥地利以及1798年征服埃及而声名大振。拿破仑指挥军队取得了重要的战果，特别是1800年和1805年两度击败奥地利，以及1806年战胜普鲁士。拿破仑的军队机动性强，擅长集中兵力逐一攻破。他在乌尔姆战役（1805年）、奥斯特里茨战役（1805年）和耶拿战役（1806年）中大获全胜。



拿破仑·波拿巴是天资卓越的军事家，但最终因远征俄国而功败垂成。

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成了一个独裁的战争国家。他在国内试图推行改革，颁布了《拿破仑法典》，但几次错误的远征令他功亏一篑。如果说1808年法军入侵西班牙的结果仅是比较棘手的麻烦，那么1812年进攻俄国则很快演变成了一场可怕的灾难。拿破仑一路攻进莫斯科，但俄国的亚历山大一世拒绝和谈。最后，在严寒和俄国军队的双重打击下，法军死伤无数。这次惨败动摇了拿破仑帝国的根基，以至于拿破仑在1813年的莱比锡战役中再度失利。1814年，反法同盟联军攻入法国，拿破仑被迫退位。新国王路易十八即位，波旁王朝复辟。

拿破仑被流放到厄尔巴岛，但在1815年他重回法国，轻而易举便再度掌权。面对强敌的回归，那些坐在维也纳会议[52]（1814—1815年）桌前的欧洲列强并不打算坐以待毙。拿破仑入侵比利时，在滑铁卢战役中被英国（由威灵顿公爵指挥）、荷兰和普鲁士联军彻底击败。此后，拿破仑被流放到遥远的英国属地圣赫勒拿岛，1821年在那里逝世。

殖民地

除了占据殖民地的土地，帝国列强还将本国的部分民众送到殖民地定居。自18世纪中期以来，世界人口大增、交通设施改善，这一进程变得更可行。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中国的汉人早有定居新疆的先例，又如俄国人落户西伯利亚，以及英国人到北美地区（即后来的美国）生活。不过，19世纪出现的蒸汽船能够运载大批量的人，使得移民进程加速，尤其是英国。大批英国人前往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定居，法国也将本国居民送至阿尔及利亚。

侨民在殖民地的待遇与原住民大不相同。定居下来的英国人迅速将殖民地往自治的方向发展，他们在加拿大渥太华仿照伦敦的新议会大厦建造办公大楼，就是这一进程的象征。英国最终给予本国侨民以管辖权，这意味着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南非获得了自治。与之相反，阿尔及利亚一直被视为法国的管辖地，因此需要派代表前往巴黎参加议会。

侨民的自治在原住民稀少的地区最为成功，如澳大利亚。然而，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欧洲移民的后裔人数过少，他们在一些地区的统治根基开始动摇，如曾被法国统治但现已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和已经独立但仍由白种人统治的前英国殖民地南非。

罪犯殖民地

英国在澳大利亚建立居住点始于1788年，最初是为了安置犯人。安排犯人劳动这一旧模式成了发展殖民地的新方法。到19世纪，直接在殖民地修建监狱用来关押本国犯人成了新方式，比如西伯利亚的监狱中就关押着俄国犯人。

拉丁美洲为自由而战

19世纪，欧洲在海外的扩张不总是一帆风顺的。从1800年到1820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拉丁美洲的势力逐渐瓦解。拿破仑于1808年入侵西班牙造成的混乱削弱了西班牙对殖民地的控制。1814年，西班牙费迪南七世试图重建权威，却让形势更加恶化，爆发的起义从墨西哥一直扩散到智利。同美国独立战争一样，拉丁美洲的革命胜利也并非仅靠一己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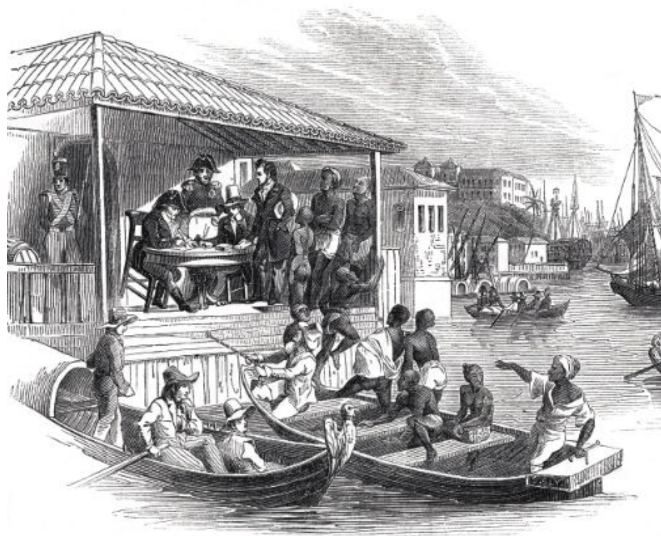
国际力量在这场冲突中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这与北美如出一辙。长期以来，英国一直想对拉丁美洲进行商业渗透，便借机支持其脱离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英国提供志愿军以及外交和海上军事援助的行为让法国打消了支持西班牙的念头。拉美独立以后，西班牙和葡萄牙也没有再进行反攻。此后，英国与拉丁美洲的贸易往来密切，这里也成为英国投资的主要地区，特别是在铁路建设方面。阿根廷几乎成了大英帝国的从属国，直到后来英国的地位被美国所取代。

独立战争瓦解了拉丁美洲的官僚殖民政权，取而代之的是“考迪罗”制度，即地区首领凭借掌控的土地和武装力量建立的一种偏向个人化而非制度化的独裁政权。在拉丁美洲，武力已成为各国内部追求权力的普遍手段，而政权的更迭也往往是通过暴力手段实现的。

美洲奴隶制的终结

1800年，奴隶经济在美洲地区盛行，尤其在巴西、加勒比和美国南部。但由于基督教福音的深入影响，新大陆在19世纪早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废奴主义运动（废除奴隶制）。1807年，英国的奴隶贸易被终止。接着，各地的奴隶制度也陆续被废除：英属殖民地于1833—1838年最先废除，随后是1848年的法属殖民地和1865年的美国，以及1888年的巴西。巴西的奴隶制最为严重，被送往里约热内卢的奴隶数量是美国的十倍。

曾经的奴隶制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英属西印度群岛，许多获得自由的奴隶寻得一方土地，开始了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由于自由劳动力的价格昂贵，且不如奴隶稳定，制糖业的生产状况和盈利大不如前。而依赖奴隶的种植园商品出口量锐减，投资吸引力也随之降低，从英国进口商品也变得难以负担。对奴隶们而言，即便获得了自由，多数人的生活并没有大的起色，他们仍为旧主或新主效力，继续忍受着严苛的待遇。此外，种族歧视仍然严重，在巴西和古巴还形成了“肤色政治”，深色皮肤的人会被区别对待。



印度、中国等地的契约劳工被运往英属西印度群岛和太平洋岛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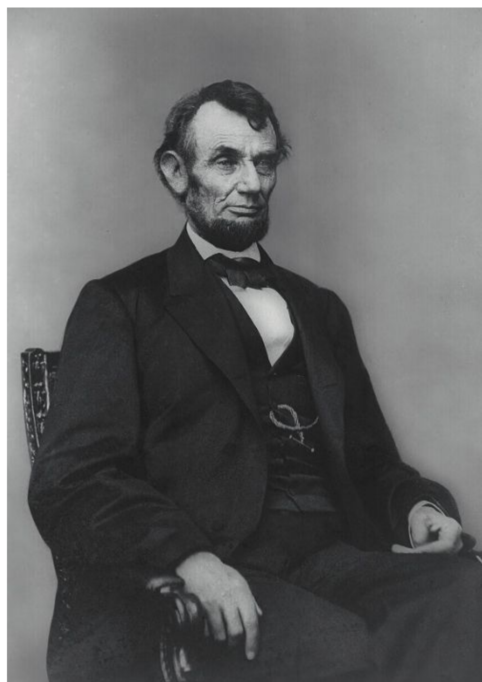
契约劳工

契约劳工在17—18世纪被广泛使用，白人劳工签订契约后被送往北美。随着19世纪经济扩张和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契约劳动制度仍被继续使用。为了获得返程的机会，劳工们接受了苛刻的雇佣条件，一干就是数十年。在奴隶制被废除后的英国殖民地，劳动力主要来自印度，廉价的契约劳工被运往英属西印度群岛，特别是特立尼达、英属圭亚那（今圭亚那）、南非和斐济等地，其他地区也采用了类似的制度。在古巴和秘鲁，签订契约的中国工人被严苛对待，尽管他们是“自由的”，却无法为自己赎身。常有评论家谴责契约劳工“只是换了形式的奴隶贸易”，其中不无道理。

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年）

美国的奴隶制问题非常典型。1860年，亚伯拉罕·林肯当选美国总统，他主张禁止在美国刚成立的新州内实行奴隶制，这引起了南方蓄奴州的不满，导致南方从联邦分裂并成立了美利坚联盟国。林肯和共和党人认为，联邦的统一对美国的生存至关重要，而维护联邦政府对各州的领导权也是美利坚民族存在的关键。但是，国家政党已不再有号召力，美国民主的群众基础也濒临崩塌。关于奴隶制的问题，南

北双方似乎不再满足于一个折中方案。



1860年，亚伯拉罕·林肯当选美国总统，导致美国南部各州的分裂以及南北战争的爆发。

1861年4月，南方军队炮轰了查尔斯顿港的萨姆特要塞的联邦驻军，战争由此爆发。南方军队的持续抵抗让联邦政府想要迅速结束战争的希望落空。1863年，南方联盟在葛底斯堡战败，这是他们向北推进的最后一次战役，获得最终胜利的概率也因这次失败变得渺茫。1864年，林肯在大选中成功连任总统，既巩固了北方的政治团结，也粉碎了南方联盟的一线希望，北方军舰随即封锁了南方。此时，谢尔曼将军从亚特兰大向大西洋进军的战略打击了南方的士气并切断了其物资援助，北方军队成功深入南方。到1864年年底，在以谢尔曼和尤里西斯·格兰特为代表的联邦军队将领的指挥下，胜利近在咫尺。1865年4月和5月，南方军队陆续投降。

1865年，南方将领罗伯特·李率领北弗吉尼亚军队投降。他对手下说，他们只是败给了北方优渥的资源。的确，北方人力充足、税收稳定，不仅工农业繁荣、贸易发达，还有广阔的铁路和航运网络，以及丰富的矿产资源。不过，联邦军队作战效率极高也是胜利的重要原

因，这得益于组织得力的通信和后勤，以及善于总结作战经验。不论是战事范围还是参战人数，这样的战争规模在北美地区前所未有。不少政客为了尽快结束战争曾提议向南方的联盟国略作让步，所以领导人坚定的政治决心也是胜利的重要因素。

必由之路：美国的扩张

怀着对更多土地、矿产资源的渴望，以及美国必胜的信心，美国人将矛头对准了美洲原住民。美军并非战无不胜，最有名的一次败仗是在1876年，乔治·卡斯特因草率出兵最终在小巨角河战役中寡不敌众，被苏族印第安人击败。不过，这样的战斗大多以印第安人的惨败收场。天花夺走了无数印第安人的生命，他们赖以为生的美洲野牛也因干旱而减少，这些都给予印第安人重创。美国政府还下令摧毁他们的田地和村庄，先进的武器、快速的行军，以及正规军的冬季作战能力都是美国胜利的保证。

路易斯安那购地

1803年，拿破仑以1500万美元的价格将法属路易斯安那卖给了美国。一来防止它落入英国人之手，二来也可以为法国在欧洲的军事行动筹集资金。这片土地基本涵盖了现今蒙大拿、南北达科他、明尼苏达、怀俄明、科罗拉多、内布拉斯加、艾奥瓦、堪萨斯、密苏里、俄克拉荷马、阿肯色和路易斯安那等州。实际上，在进行收购时，路易斯安那的大部分领土仍在印第安人的控制之下。

美军强迫原住民迁入保留区（多数荒无人烟），为了促进西部经济融合，还修建了大量住宅，铺设了铁路。英属加拿大没有发生此类暴力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加拿大的殖民进程没有美国快，此外加拿大政府更在意原住民的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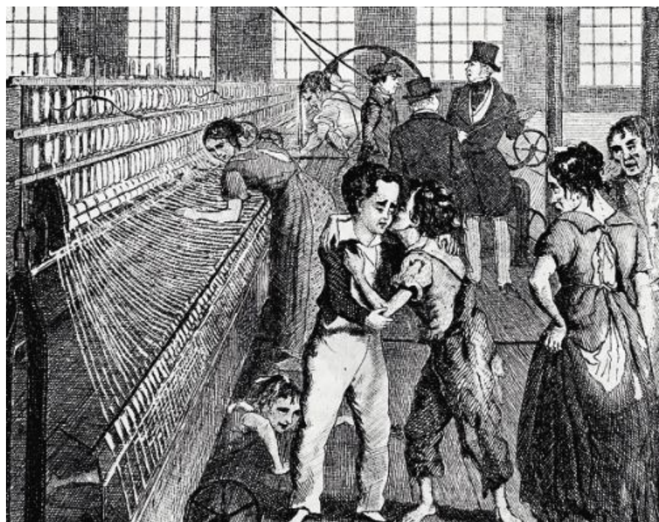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经济的发展也在改变北美内陆。钢犁不仅可以在中西部坚硬的土壤上耕作，还能在加拿大的大草原上耕作。得益于铁路的发展，内陆的谷物和牲畜能被运到遥远的港口和城市。



1876年，由乔治·卡斯特率领的军队在小巨角被击败，这是印第安人最后一次成功抵抗美军。

工业革命

19世纪，发达国家的工业潜力爆发。蒸汽动力的应用推动了制造业和运输业的变革，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一时期被称作“工业革命”，过去的乌托邦思想不再是空想。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工业国家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也在拉大。工人拥有了购买力，这增加了他们对产品和食物的需求，他们居住的城市在19世纪有了明显的发展。英国的纽卡斯尔就是一座依靠煤炭发展起来的工业城市，当地人口数量从1801年的28294人增长到1901年的215328人。工业进步最先发生在纺织业和金属冶炼业，但在19世纪末，机械行业、造船业和化工业逐渐成为工业革命的主导产业。工业化促使更多的商品被生产出来，而那些推进工业化的国家（特别是英国）更是有了深化自由贸易的资本。海外市场的大门被打开，而效率低的生产商则被市场淘汰。



大量拥有新技术的工厂促使英国变成了“世界工厂”，但是危险的工作环境、过长的工作时间和微薄的薪水让工人们处境艰难。

改变世界的物品：煤

煤是一种易于运输、方便控制的燃料，和过去使用的木材和木炭相比，煤的发热效能更高。煤是新时代的象征——蒸汽机的燃料。1786年，当时还不是美国总统的托马斯·杰斐逊造访伦敦，参观了靠蒸汽动力生产的新阿尔比恩面粉厂。英国的煤炭开采量和使用量都高居世界榜首。就煤和褐煤的平均年产量来说，1820—1824年，英国是1800万吨，而欧洲其他工业大国，如法国、德国、比利时和俄国加在一起的总和只有200万吨；1855—1859年，双方煤的产量分别是6800万吨和3200万吨。威廉·科贝特曾这样描写1830年的英格兰北部：

“从利兹到谢菲尔德，一路上除了煤和铁，别无他物……黄色的热浪一刻不停地从熔炉的顶部向外翻腾，没有比这更壮观、更美妙的景象了。”

蒸汽动力

蒸汽机是最能代表新世界的发明，英国人凭借充足的煤炭供应和开创精神对此贡献巨大。托马斯·塞维利在1698年演示的蒸汽泵实用

性很差，与托马斯·纽科门在1712年推出的蒸汽机不可同日而语。詹姆斯·瓦特发明了可分离式蒸汽冷凝器，极大地提高了发动机的燃料利用率。1776年，他的第一台大型蒸汽机组装成功。1779年，伯明翰的纽扣制造商詹姆斯· 皮卡德在纽科门蒸汽机上安装了曲柄和飞轮，以便利用蒸汽动力驱动一台金属粉碎机。瓦特受此启发，对蒸汽机进行了改良，蒸汽机的应用范围变得更加广泛。1790年，他的“维尔维珍”蒸汽机的功率达到了953马力。

改良后的蒸汽机被用于采矿和驱动机械。1800年，英国各地共有2000多种改良蒸汽机，每一种都意味着某个地方正在发生改变。对于那些依赖人力、畜力、水能、风能或木材燃烧的早期技术，蒸汽船、蒸汽磨粉机等设备提高了其经济效率。经济生产、组织机构和工作特性都因蒸汽机的出现而改变，使用蒸汽机必将改变生活的理念深入人心。作为一种可移动的能源，蒸汽机使得工厂搬离了先前的地区（尤其是水流湍急的河边，因为先前的工厂要建水磨），向煤田区集中。

我们如何出行：铁路

铁路的发展和普及是以煤为动力的蒸汽技术和炼铁技术共同推进的结果。19世纪20年代，世界上第一条铁路（从英国斯托克顿到达灵顿）通车，最初用于运输煤炭。铁路改变了贸易性质，对城市和政府的财富有着决定性作用，战争也深受其影响。与运河不同的是，铁路既可运输货物也能搭载乘客。



19世纪，铁路迅速遍布欧洲和美洲，各地的财富、贸易甚至战争都因此而改变。

19世纪，世界大部分地区都在修建铁路。很快，从欧洲开

始，美国、拉丁美洲，以及欧洲殖民地（如印度）也有了大型铁路工程。除了铺设铁轨，铁路工业还包括建造桥梁、车站，以及制造火车头。美国的铁路和随后出现的西伯利亚大铁路都是当时横贯大陆的铁路系统。从此，货物运输变得更加便捷，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各地区之间的差距也逐渐拉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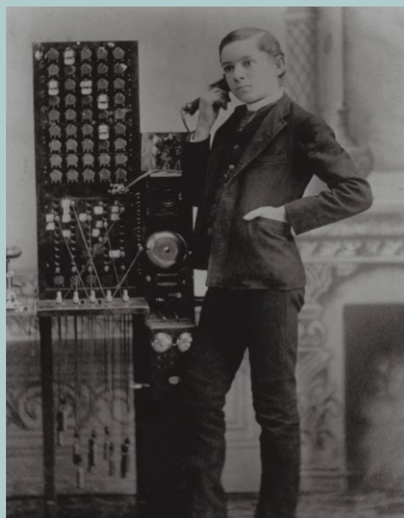
芝加哥、温哥华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城市的发展和重新规划，都得益于修建的铁路系统和从中获取的利润。便利的铁路促进了富人的郊区化，许多新兴的中产阶级纷纷搬到风景优美的郊区生活。为了容纳线路、货场以及城镇中心的火车站，各区都进行了相应的拆除和再规划，城市的街道布局也因修建火车站而大为调整。铁路的发展引起了人们对城市内部交通网的关注，先是出租车和公共汽车的出现，随后一种革命性的新型大众运输系统——地下铁路诞生。

通信技术革命

随着电报这一新技术的出现，美国人塞缪尔·莫尔斯（1791—1872年）发明了一种简单的操作键和配套的代码用于信号传输，这套以点和破折号组成的代码被称为“莫尔斯码”。1838年，他可以用代码在一分钟内传输10个单词。1843年，他说服国会投资建设了一条从华盛顿到巴尔的摩的电报线路。在英国，由于铁路网逐渐扩大，电报最初被私营企业用来发送火车的相关信息；自从电报对公众开放后，其使用范围急剧扩大，经济新闻等各类消息迅速传播。当代有学者认为，当时的全球电报电缆系统堪比今天的互联网，然而，前者在消息的准确性、传输速度以及覆盖范围上存在明显的缺陷。

铁路和轮船的普及推动了邮政系统的迅速发展，人们也越发需要和依赖快捷实惠的通信方式，这促进了电报的发展以及电话的出现。1840年，英国政府取消了早期按件收费的寄件体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成本更低廉、可统一计价的新系统，并配套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邮票——“黑便士邮票”。英国和爱尔兰的信件投递数量从1839年的8250万封，增加到1853年的4.11亿封。这引发了一场追求更快捷、更可靠的通信浪潮。邮政的发展并不仅限于欧洲，印度也出现了与欧洲相当的邮政体系，如印度邮政总局。1876年，欧洲的寄件数量为30亿件，到1928年上升至310亿件。直到1972年，人们使用电话通信的次数才超过信件邮寄的数量。在互联网时代，信件邮寄已被认为是不方便的、过时的通信方式。但在邮政兴起的早期，情况则完全相反。它不仅稳定可靠，

而且无须人们动用个人关系就可达成信息传输的目的。



1910年，电话已在美国普及。

在西方技术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1847—1922年）充分展示了创新带来的无限可能。他发明了铁肺、水翼船、飞机副翼、光电话（通过光信号传递声音）和电话。贝尔还在美国创建了拥有完整配套设施的标准电话系统。19世纪90年代，他的电话专利到期，其他电话公司进入美国市场，并采用了自动电话交换机。由于不再需要人工进行信号交换，电话的使用成本变低；而且比起电报，语音通话更亲切也更方便，电话逐渐普及开来。到1912年，美国已有700万部电话。

民族主义萌发

随着民族意识的增长，19世纪民族主义萌发。不再充当其他价值体系的附庸，实现民族独立的想法在一些地区萌芽。意识形态和知识体系开始改变，而强大的国家、便捷的通信、全国普及的教育体系、日益提升的大众读写能力，以及工业化、城市化和民主化进程的推进，都是民族主义得以发展的先决条件。



由于民族主义的发展，意大利（1860—1861年）和德国（1866年）相继实现了民族独立。

民族主义有一个鲜明特点，即对“祖国”“家园”等概念的信仰日益增长，对其他概念（如地区）则日益淡漠。此外，民族主义为团体动力学提供了新基础，继而发展出男性普选制度。此外，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革命派和民族主义者还实现了征兵制的合法化，目标之一是把军民之间的固有矛盾转化为共同目标。民族主义促进了新政权的形成，尤其以意大利（1860—1861年）和德国（1866年）的民族独立为代表。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击败奥地利这个由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多民族帝国是赢得独立的关键。意大利以撒丁王国为中心组织起来，而德意志则以普鲁士王国为中心，但它们都有了一个新的身份——统一的民族国家。

总体来说，民主理念的发展既推动了民族主义的发展，也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在这一背景下，民族主义引领了反对帝国统治的独立运动，如波兰、芬兰反抗俄国的统治，以及印度和爱尔兰抵抗英国的统治，都是最好的例证。

英国对印度的统治

当民族主义在欧洲各国盛行时，欧洲人对欧洲以外民族的尊重却

未增加。随着莫卧儿帝国的衰落，欧洲人开始入侵印度。英国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等贸易公司都渴望对印度次大陆进行更直接的控制。不过，荷兰人很快便将注意力转向了印尼的香料群岛，将印度拱手让给了英国。1757年，罗伯特·克莱武率领英军在普拉西战役中打败纳瓦布，从此确立了东印度公司对孟加拉地区的统治。迈索尔（1799年）和马拉萨（1803年）的沦陷奏响了英国大范围攻占印度的序曲，英国进而吞并了印度的一些地区。

与他们的对手不同，英国人有足以支撑在全印度范围内开战的军事实力和后勤保障。虽然英国由于指挥不力，1842年冬从阿富汗撤军的途中损失了整个英属印度军团，但仍取得了重大胜利：1818年，英军夺取了马拉地人在印度西部的领土；1826年，攻占了缅甸的若开和丹那沙林；1831年，征服迈索尔；1843年，信德沦陷；1849年，在与锡克人两度鏖战后占领旁遮普。此外，克什米尔在1848年成为英国的附属地。在这些胜利中，印度军队的配合发挥了关键作用。

1858年，英国王室从东印度公司手中接管了印度。1877年，维多利亚女王在德里宫廷加冕为印度女皇。

印度的大部分地区仍处于当地王公的统治之下。他们拥有层层递进的组织架构，通常是英国实行统治的得力帮手。此时，印度已是英国人口最多的殖民地。

印度大起义（1857—1859年）

这是19世纪规模最大的反欧起义。此次起义之所以重大，是因为有许多为英国服役的印度士兵参与。这些士兵之所以暴动，关键原因是不愿去异国服役，而导火线则是英方要求士兵使用新式步枪配备的新型子弹。据说，这种子弹为了保持火药干燥，表面涂有动物油脂，这对信仰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教徒们来说是无法接受的。由于英国获得了多数印度军队和主要王公（尤其是海德拉巴、克什米尔、尼泊尔等地王公）的支持，历经苦战，最终还是镇压了领导不力的起义军。在印度历史上，这次起义有时会被视作印度的第一次独立战争，或简称“大起义”。

清朝衰落

19世纪的中国也经历了相当程度的经济和政治衰退。1850年，中国人口已达4.5亿左右，这个先前的强国没能成功发展工业。相

反，西方成为全球经济的中心，推动着全球化进程并从中获取了丰厚的利润，而那些非西方国家则处境堪忧。

19世纪，中国国力开始衰微，一方面是内部分裂所致，另一方面是因为未能像西方国家那样推行工业改革，建立高效的政治体制。两次鸦片战争（1840—1842年，1856—1860年）让心灰意冷的中国官员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国家已无力与西方列强抗衡。



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是西欧国家第一次对中国发动战争。

19世纪30年代末，越来越多的人吸食鸦片成瘾，中国人越发意识到鸦片是中国社会的祸害。钦差大臣林则徐上奏朝廷要求禁烟，英国商人因此心惊胆战起来。鸦片的利润是英国从亚洲进口茶叶的主要资金来源。林则徐曾给维多利亚女王写信，信中不仅斥责鸦片贸易，还称英国人是“野蛮人”。但此举并未让英国政府有所收敛，于是清朝皇帝下令将英国商人逐出广州，并扣押了他们的鸦片。

迫于中国民众的反抗，英国人封锁了长江流域的主要港口。1842年，英军沿长江抵达南京，中国妥协了，获胜的英国迫使中国签订了《南京条约》，条约规定：割让香港岛给英国；降低英国商品的关税；赔偿1839年被销毁的鸦片，并向英国开放5个港口。这是历史上西欧国家首次对中国发动战争，也是欧洲第一次战胜中国，并获得了中国的部分土地。

帝国的城市

因曾被西方国家统治或受其影响，一些非西方城市的建筑和设施具有明显的西方特色，如火车站、林荫大道、电报大楼和大型酒店等。西方列强不仅改造旧城以显示自身的优越，还按照特

定的发展规划修建新城。1819年，英国把新加坡打造成了一个深水港口城市。1860年，新加坡已有8万人。

1900年，吉隆坡（今马来西亚首都）已从一个供锡矿工人居住的棚户区变成了一个拥有4万人的城市，当地的许多高楼大厦都是仿照英属印度的建筑修建而成。又如印度的加尔各答——英属殖民地的第二大城市，其政府区域则建有高等法院（1872年）等诸多办公建筑。香港自1841年被英国占领后，也发展成了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香港礼宾府于1855年竣工，汇丰银行于1864年成立，并在金融贸易行业扮演着重要角色。

为全面打开中国市场，英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和首相帕麦斯顿刻意制造冲突。很快，香港货轮“亚罗号”在广州被扣，据说这艘载有中国船员的货船上悬挂着英国国旗，这成了发动侵略的完美借口。1856年，英国炮轰广州。1858年1月1日，英法联军占领了这座城市，并伺机进军华北，目标锁定为天津附近的大沽要塞。虽然1859年联军初战败北，但在1860年，一支英法远征军还是成功地攻占了大沽和天津。随后，他们在北京城外击溃清军，攻入了北京城，这让清朝威望尽失。联军还烧毁了中国的圆明园。1860年，战争以《北京条约》的签署宣告结束：中国继割让香港岛后，再次割让九龙半岛给英国，赔偿英法巨额金银，允许信教自由，并进一步开放包括鸦片在内的对外贸易。

与其他欧洲列强一样，英国人也试图将自己的观点、规则以及喜好强加于征服之地。失败和受侮辱强烈冲击着清政府的统治，引发了中国国内的一系列改革，最先开始的是洋务运动。

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太平天国运动是导致清朝国力衰弱的主要原因。其实，在欧洲未进犯的19世纪30年代，清朝的衰颓已初见端倪，腐败成风、税收减少、税农农民造反和中央无力控制地方都是当时的主要问题。1796—1805年，清朝为维持统治付出了惨痛代价，体制弊端暴露无遗。与此同时，战乱不断的西北和西南边境各省也让清政府备受困扰。清政府投入了大量兵力、物力，终于在1873年抚平各方，但此时的清政府已不堪重负，根本无暇顾及沿海和海上问题。

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运动发生于1851—1864年，这是一场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大规模革命运动，破坏力相当巨大，共造成了2000万

~3000万人死亡，远远超过美国内战（1861—1865年）时期的死亡人数。这次运动也属于重大却少被提及的起义之一。坚定的精神信仰是引领斗争和作战的力量之源，因为信仰，太平军在枪林弹雨中冒死前行，即使物资不足仍顽强抵抗；他们无惧死亡，作战时骁勇可怕，但领导层的内讧成了他们的致命弱点。太平军使用长矛、战戟和火绳枪作战，武器装备极为落后。虽然太平天国在1853年攻占了南京，但最终于1864年失守，运动宣告失败。

明治维新

强大的西方工业文明同样冲击着日本。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四艘军舰进入东京湾，要求日本开放贸易。这对从未见过军舰的日本人来说是一个巨大威胁；1854年，美国军舰再度来袭，日本迫于压力只得接受美国的要求，其他列强见状纷纷效仿。

重压之下的日本开始呼吁变革，导致1868—1869年内战的爆发。最终，德川幕府垮台，天皇重掌大权。1877年，天皇成功地镇压了幕府余孽的叛乱。明治天皇在位期间（1867—1912年），日本经历了快速的体制变革、经济转型以及思想开化进程。明治政府废藩置县，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府机构，并引入造船业等新型产业。蒸汽船的数量从1873年的26艘增长到1913年的1514艘。此外，铁路网的修建也被提上日程。为了强化民族认同感，中央政府还确立了全国通用的官方语言，称为“标准语”。

新兴起的日本积极寻求对外扩张，尤其渴望从羸弱的中国身上榨取利益，虽然这个国家曾一度让日本人不敢萌生僭越之心。1894—1895年，中国落败，台湾沦为日本的属地；1904—1905年，日本又战胜了俄国，将朝鲜据为己有，并将势力进一步扩张至中国北方。在争夺中国北方领地时，日本竟戏剧性地挫败了想分一杯羹的欧洲列强。

瓜分非洲

长期以来，欧洲的势力仅盘踞在非洲沿海地区。然而，在19世纪上半叶，欧洲人开始向非洲内陆迈进，如塞内加尔河谷地区和南非。由于柏林会议（1884年）的召开，从19世纪80年代初开始，侵占非洲的步伐大大加快。会议上，争取划分更多的非洲土地和自然资源成了列强之间政治和经济竞争的方式，最终，各国就瓜分一事达成一

致。

侵略者巧妙地利用当地的资源和形势，他们雇用当地士兵作战，或者伺机左右当地的政权斗争，胜利来得不费吹灰之力。欧洲人给内斗中处于劣势的非洲统治者提供援助，英国和法国都通过这种方式控制了西非，英国还控制了南非。



欧洲列强在1884年的柏林会议上划分非洲领土，开始了所谓的“瓜分非洲”的狂潮。

由此可见，欧洲各国能够充分利用以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时，在远征扩张的过程中，列强从管理、政治和公共方面获取的利益已远超19世纪初。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方列强的所作所为和利益驱动源于对国家威望的鼓吹和在政治、经济领域的竞争，以及对领土扩张和种族控制的乐观态度。

利奥波德的私人王国：刚果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1865—1909年在位）精于权术。1885年，他从欧洲列强瓜分非洲的浪潮中获益，成为刚果自由国家的统治者。中非的广袤领土遭到了利奥波德的野蛮式开发，他大力开采橡胶和矿产等自然资源来筹集资金。随着他在殖民地的暴政曝光，国际社会上的谴责与日俱增，最终，这块领地在1908年被移交给比利时政府。

西方的挑战

面对西方的强盛和帝国主义，各个地区反应各异。有的国家渴望探求西方富强之术。1871—1873年，日本派出岩仓使节团前往美国和欧洲，他们带回的经济知识推动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福泽谕吉在其著作《西洋事情》（Conditions in the West，1866年）和《文明论概略》（Outline of a Theory of Civilization，1875年）中赞许西方社会重视学者、鼓励社会流动并予以嘉奖的政策。

19世纪60年代，中国的洋务运动引进西方技术、搜集有助于现代化的信息，试图以此探求西方富强之法。



康有为（1858—1927年），中国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

也有一些地方反对西方的唯物主义、个人主义及其错误的白人优越论。在印度，科学家致力于将科学从帝国的背景中剥离，辅以印度的传统和价值观。本土医学的繁荣推动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复兴运动，民族主义者要求制定对当地居民更有利的公共卫生政策。

用地图绘制社会

西方也出现了呼吁社会改革的声音。19世纪中叶，人们越发关注大城市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社会改革家和活动家认为，文明社会应当

杜绝极端贫困、过度拥挤以及糟糕的卫生条件，因为这会引发疫病，富人和穷人都会被感染。科学地收集数据，发展专题制图协助阐述问题，这些促成了政治、医疗和社会观念等方面的革命。查尔斯·布思在《伦敦居民的生活和工作》（1886—1903年）中绘制了一幅标注社会阶层的伦敦彩色地图，他对底层人民进行了严厉批判：“底层之人……恶毒，形同罪犯……他们过着野蛮人的生活，朝不保夕、困苦不堪，酒是他们仅有的奢侈品。”

绘制海图

探索海洋是人类收集、积累、叙述和使用信息的关键。英国在海军和商业领域中都立足全球寻找机遇，因而信息的获取和利用对英国来说更必要，同时也更容易。在战争中，海图的使用有助于了解海洋的特点，从而把握战机，海图对演化论的提出也有所贡献。1831—1836年，英国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在随“贝格尔号”军舰的航行途中收获颇丰，在太平洋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考察尤其如此。1859年，他出版了《物种起源》，该书观点与《创世记》（Book of Genesis）大相径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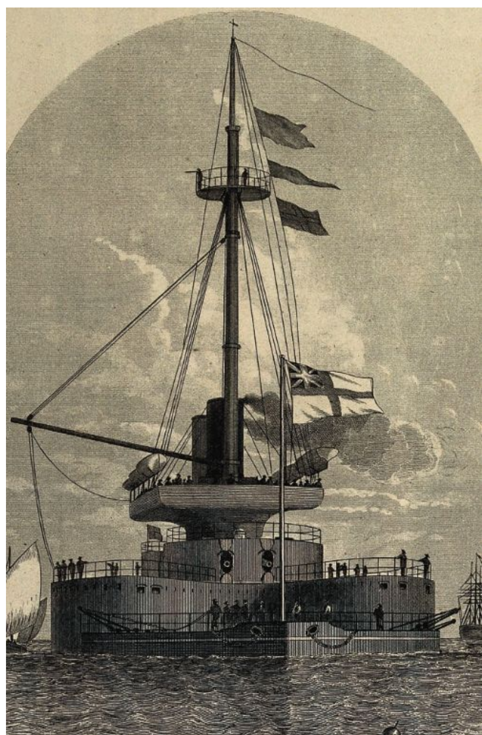
第七章　战争笼罩下的世界

1914—1945年

1914—1945年，世界大战彻底重塑了世界。帝国崩塌，思想颠覆，社会生活和文化理念也为之改变。数千万人死去，对于那些遭受深重苦难的国家来说，战争之殇一直笼罩在人们心头，从未淡去。

世纪之交

20世纪初，国际竞争越发激烈。原本在共识下以保障大国利益为基础、维持国际秩序的审慎政策退出历史舞台，代之则是千方百计寻求本国利益。在这一点上，德国尤为明显。各国抱团谋利，以联盟的形式相互竞争。基于认为目前局势不稳的观念引发了焦虑，由于不稳定将会对工业社会、城市生活和民主政治造成影响，焦虑感进一步加剧。



20世纪初，各国在海军上投入巨资，唯恐落后于竞争对手。

各国在军事上斥以巨资，为军队添置各式海陆新型武器及改良装备，如新型大炮等；改进管理方法和军队体系，并投入演习和实战。

20世纪初，冲突遍及世界各地：如1911年中国的辛亥革命，1910年由政变引发的墨西哥革命，以及美国对尼加拉瓜、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墨西哥等国的干预。

第一次世界大战

起因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参战国对区域政治和外交发展的看法不一致。俄国在德国东部边境的军事准备日益增强，如建设能够提升作战机动性的铁路等，这让德国人非常担忧，认为战争已不可避免。因此他们希望在最适当的时候发动战争，并踌躇满志地回顾了近期所打的胜仗。

奥匈帝国是德国的主要盟友，由于国内战略和政治局势明显恶化，外加俄国的支持，独断的塞尔维亚人威胁到巴尔干地区的稳定，这令奥匈帝国感到担忧。奥匈帝国政府无力左右局势，挫败感与日俱增。因此，与塞尔维亚开战似乎是唯一的选择。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偕夫人苏菲在视察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时，被塞尔维亚青年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刺杀。加夫里洛·普林西普是黑手社的成员，这是一个秘密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组织，致力于推翻哈布斯堡王朝对南斯拉夫领土（包括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的控制。消息传到维也纳时朝野震撼，奥匈帝国感到有必要采取行动了。此次刺杀为打击塞尔维亚制造了理由。

奥匈帝国认为有德国作为后盾就能牵制俄国，于是对塞尔维亚发动了局部战争。德国也决定采取攻势策略，因为有奥匈帝国的盟约和德国公众的支持，任何可能的危机都将不在话下。他们企图先击败法国，进而攻击其盟友俄国。1914年8月，德国以中立国比利时为跳板，发动了战争。由于英国是比利时中立地位的担保国，因此也被卷入战争。

出于军事考虑以及军方领导的要求，各国政府被迫开始行动。德国的作战计划是攻击后立即转移军队。在“一战”的参战国看来，这是一场各国正规军之间的较量，尽管伤亡会很大，但不会持续很久，也不会一发不可收拾。

这场战争并非全因各国领导层治国无方、肆无忌惮而起，各国军方的压力也不容忽视。决策者已将和平与秩序的脆弱性抛之脑后，政客们试图以战争要挟对手并将其置于不利之地，不料却打错了算盘。每个参战国都犯了错：奥匈帝国一心求胜（虽然只是在巴尔干战争上）；德国动机不纯又太过草率，乱打一通后，没能控制维也纳，在面对法俄联军时又不能全身而退；法国强硬且死板；俄国的策略也不合时宜。作为比利时中立地位的担保国，英国传统的地缘政治[53]逻辑让其别无选择，只能参战。

1914年，英国试图通过传统方式来化解国际危机，即欧洲协调机制。自拿破仑战争后开始召开维也纳会议（1814—1815年）以来，该机制一直维持着欧洲的和平。事实上，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1912—1913年）中，它曾成功地阻止奥斯曼土耳其和巴尔干国家联盟之间的斗争演变成更广泛的战争。然而在1914年，奥匈帝国和德国却拒绝继续合作。德国的决定在某种程度上受其在政治和文化上固有的好战特性的影响，这在20世纪初尤为强烈。德国对落后的强烈恐惧，以及担心战机失不再来的念头，助长了他们狂热的民族爱国主义。

德国人考虑问题时将军事因素置于政治因素之上，以至于在1914年和1917年分别把英国和美国送进了对手的阵营。在这两次行动中，德国的决策从军事层面来看完全合乎情理——以比利时为跳板推进战事更加容易，使用潜艇攻击英国商船以打击其贸易也没有问题——但这些却是严重的战略错误，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德国最终的失败。

这场灾难性战争给人留下的印象便是战况胶着，双方在战壕内进行毫无意义的血腥杀戮。这一话题被不断提起，成为公众纪念活动的主题。

实际的战况要复杂得多。从战争整体来看，认为“一战”各方战术僵化、任务执行不力、缺少战略和决定性胜利的看法都是站不住脚的。对于东欧、巴尔干半岛、中东和德属海外殖民地来说，战争带来了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实际上，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分别在1915年和1916年被迫退出战争；1917年，俄国退出，意大利也差点出局。1918年，保加利亚、土耳其、奥匈帝国和德国陆续战败，宣布投降。

欧洲的西部战线尽管看起来陷入胶着，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协约

国掌握了集中火力的战术要领，以前所未有的火力攻入并突破了德军的战壕系统，取得了新的进展。1918年，协约国发现，沿着一条宽广的战线在多处同时发起进攻，并集中后备军队维持攻势，可以有效地阻止德军的封锁，成功实现突破。



英国认为，欧洲协调机制可以阻止战争，就像在伦敦会议（1912—1913年）上结束第一次巴尔干战争那样。

在“一战”开始前的几十年里，协约国就因作战图的注释不准确备受困扰，指挥问题更是积重难返，突出体现在火力分布和机动性差这两个方面，不过技术的发展让协约国克服了这些问题。空中侦察可有效获取敌方的战壕系统地图，然后再进行指挥集中轰炸。最直接的成效便是带来了决定性的军事胜利和政治成果。

西部战线之外的革命运动伴随着冲突四起，各国首都成了革命的摇篮。1916年爱尔兰发生起义，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接管俄国，“一战”临近尾声时，奥匈帝国也发生了民族主义革命。

事实上，德国在1914年就失败了，甚至早于协约国军队在马恩河战役后的反击战以及后来西线的战壕对峙。由于俄国的介入，战线从欧洲西部扩展至东部，而英国参战则注定德国在两线的战争将会更加漫长和艰难。这与普法战争（1870—1871年）完全不同，当时的普鲁士王国（德意志国前身）并没有在两条战线同时作战。

到1914年年底，德国在战前精心策划的作战方案问题频出，明显过于乐观，处处流露的盲目自信将德国置于险境。德国企图再现普法战争的辉煌，让法军像1870年那样在遭遇指挥失败后崩溃而散。然而，剧情并未按照剧本发展，他们的对手竟出乎意料地强硬，德军精疲力竭，伤亡惨重。奥匈帝国也在征战塞尔维亚时惨败，虽然塞尔维亚的军队资源相对匮乏，但指挥却相当得力。此外，奥匈帝国还面临着俄国施加的巨大压力。

从1914年的战役可以看出，德国人打仗讲求出其不意，利用机动部队迅速攻击指定地点，但该策略在法国的防御面前却不奏效，因为法国借助铁路能够迅速调整军队部署，随时调用后备军队。德国人还低估了将防御工事当作进攻据点的功效，所有的德国高级将领都被告知，战壕只有经过筛查后才可绕行。此举忽视了法军会从防线外发起进攻的可能，从而导致1914年德国的战败。当时，德军在巴黎城外遭遇法国第六集团军的伏击，行军被迫中断，马恩河战役打响。

西部战线着重包围歼灭敌军以求全面胜利的速攻阶段于1914年10月告一段落。将领们在整场战争中多次试图再现军队的灵活性，并通过突破敌军前线进行机动战，但事实证明，这一目标难以实现。相反，敌对双方都挖了众多复杂的战壕，西线战争很快陷入僵持中。

经过四年的激烈冲突，战争终于在1918年有了突破性进展。那时，德国士兵给养耗尽，被迫变卖军械，他们未能表现出像法国人一样的决心和坚韧（当然，法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最后阶段的对战中，英军着重提高火炮的威力和精度，从而主导了战局，而且火力分布和指挥也比早些时候更加高效。



堑壕战是西线主要的作战方式，有时也会采用运动战和包围战。

战争出乎意料地提前结束，这让一些新型武器的发展变得不明朗，由英法主导开发的一项新技术——坦克尤其如此。坦克本质上是

一种前线作战工具，但在1918年，它更适合协助将静态战争转为运动战，而非直接发动一场运动战。坦克可在行进中开火，消除了壕沟对进攻方造成的威胁。坦克的火力攻击更精确，能够更有效地进行密集轰炸，西线在发动进攻前往往会先采用这一战术。不过在1918年时，坦克的持久性差、威力弱、防御能力差、行进速度慢、射程近、操控和可靠性差等都是实际作战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尤其在德国迅速发展起来的反坦克技术和武器面前，这些缺点更为凸显。因此，坦克在协助联合武器部队或者支援步兵军团作战时效果最佳。

西线大战

在西线，发生了两次毫无战果的大战：一是德国袭击法国要塞凡尔登；二是英国进攻索姆河。许多人都以这两场战役为例来说明战争的失败和徒劳。凡尔登战役中伤亡人数约有70万，索姆河战役则超过100万。伤亡数量如此之高，却没有任何一方获得新的领地，纯粹是军力的大量消耗。不过，战事也有所推进：法国人在凡尔登挫败了德国人，而索姆河之役令德国人丧失了西线的主动权，以至于1917年他们在西线再未主动发起攻势。

东线作战

由于东欧的作战区域比较分散，单位土地上的军队数量要低于西欧，所以，突破敌方防线并迅速推进也相对容易，1915年德国战胜俄国便是例证。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德国联军于1915年征服塞尔维亚，进而于1916年攻陷罗马尼亚，这说明当时的同盟军在特定情况下能够取得决定性胜利。与此同时，协约国军队也迅速占领了除德属东非以外的所有德国殖民地。但是，征服土耳其却非常棘手。1915年，协约国军队在土耳其中部发动加里波利之战，试图一举歼灭敌军，但以失败告终。而英国最初进军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的计划也宣告失败，直到1918年奥斯曼帝国才被打败。

俄国革命

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屡次败给德国，加上战争给俄国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经济压力，终于，在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发动了一场激动人心的革命运动并成功夺取政权。在1917年的早些时候，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统治被推翻，但取而代之的共和国政权违背民意，坚持继续参战。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1870—1924年）曾希望将革命推进至德国，从而不必再进行停战谈判，但德军持续向俄国进军迫使他在1918年不得不放弃部分领土以换取和平。随后，布尔什维克政权在1918—1920年的激烈内战中试图夺回曾属于俄国的领土。



1918—1919年的流感造成约5000万~1亿人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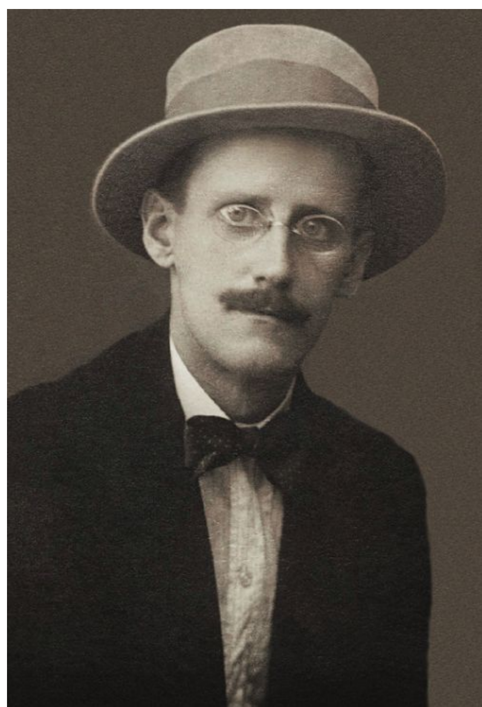
西班牙大流感

　　战争和饥荒曾夺去无数人的生命，1918—1919年，一场肆虐全球的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数甚至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至少有5000万人死去，亚洲人居多，其中印度的死亡人数比例高达6%。最易感染的人群是婴幼儿、青少年、20至40岁的青年、孕妇和老人。鸟类是疫病蔓延的罪魁祸首，但铁路和轮船也加速了它的传播。当时未发现能治愈的方法，直到1943年电子显微镜问世，人们才确定了流感病毒的结构。在1931年以前，人们对病毒学本身知之甚少，而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则始于1936年。这场疫病之所以称为“西班牙流感”，是因为许多西班牙名人也在1918年5月染病。与之相比，1957年的亚洲流感和香港流感（1968—1969年）在全球仅造成约100万人死亡，这表明疫苗接种计划取得了成功。

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1919—1938年）

20世纪初，旧的统治秩序纷纷倾覆，如中国、墨西哥、土耳其、俄国、奥匈帝国和德国这六国，后四国得以建立新秩序是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影响。同时，那些由来已久的保守习俗和价值观普遍受到挑战，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文化和社会变革。妇女解放运动如火如荼、青年群体活力四射、消费主义观念出现、好莱坞电影和爵士乐风靡、现代主义文化和新的心理学思想出现……新鲜事物异彩纷呈。

新事物的发展相互交织。电影主题以性为中心，向大众呈现了不受婚姻和母亲身份限制的女性形象，这种观念的转变在西方日益突出。女性读者对出版业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大量图书和影片都乐于塑造情感独立的女性形象，她们往往从事着有偿工作，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有过之无不及。现代主义向传统的形式发起挑战，它反对现实主义的具象文化，而选择用开创的表现形式震撼读者、观众或听众，从而打破既定的反馈模式。现代主义从新兴的社会科学中汲取灵感，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詹姆斯·弗雷泽爵士的著作，以及他们对既定假设发起的挑战。



詹姆斯·乔伊斯等现代主义作家开创新的表现形式和语言风格，以示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反抗。

在文学领域，意识流的创作手法和对虚构事物的迷恋是现代主义的鲜明特征，这在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1922年）中都有体现。而自由诗则将极为不同的观点和支离破碎的想法糅杂于一体，以T. S. 艾略特的名作《荒原》（1922年）为代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有着行云流水般的结构和情感洋溢的语言，伍尔夫认为，写作应当摒弃“物质”表象，去追求新的审美感知。在她的随笔《班尼特先生和布朗夫人》（1924年）中，她将只做表面文章的假“现实主义”和追寻真现实主义的“现代主义”加以区分。在音乐领域，奥匈帝国作曲家阿诺尔德·勋伯格开创了无调性音乐和序列主义音乐。而绘画领域则诞生了立体主义、表现主义、漩涡主义、超现实主义和达达主义等反对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

然而，大多数公众仍偏爱传统的表现方法。比如在英国，那些“中流”“低俗”风格的作家虽然为现代主义者所不齿，但他们的作品却更畅销。进入20世纪20年代，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增长，廉价书籍唾手可得，休闲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这些作家更是从中大捞一笔。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萨尔瓦多·达利和他的同胞巴勃罗·毕加索的作品在同代人中反响寥寥，最受公众欢迎的新型音乐风格则是爵士乐。

萨尔瓦多·达利（1904—1989年）：打破传统的艺术家

达利出生于加泰罗尼亚的一个富裕家庭，他在马德里学习艺术时尝试过立体主义，后来在巴黎工作期间成了一名超现实主义者。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拒绝为国效命，转而前往纽约平安度过了20世纪中期这段动荡岁月，直到1948年才回西班牙。在佛朗哥执政期间，他选择留在国内并对独裁者予以赞赏的行为，让那些流亡海外的超现实主义者非常不满。虔诚信奉天主教是他的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1982年，他被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封为侯爵。达利剧院博物馆就坐落在他的出生地菲格拉斯的一座旧剧院里，其中的作品充满了超现实主义的魔幻色彩。

装饰艺术兴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法国，混合了20世纪20年代的多种流行风格。此后，它作为一种现代性的视觉展示方法和对抗传统观念的重要手段，越发重要。装饰艺术不拘泥于形式和材料，是一种国际化的风格，美国的摩天大楼就深受其影响，1930年在曼哈顿完工的克莱斯勒大厦就是典型例证。

妇女和选举权

20世纪初发生了一些重要的政治改革，其中扩大选举权尤为值得一提。19世纪，选举权范围的不断扩大仅限于男性。1893年，新西兰成为第一个给予妇女普选权的国家。然而，即便是那些自诩进步的国家，若要达到现代的平等标准，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男女分工”的概念根深蒂固，女性的角色被明确限制在家庭范围内。

由于战争所致，参加劳动的妇女人数急剧增加，这也有效地推动了扩大女性选举权的运动。英国在1918年赋予女性选举权，然后是1920年的美国。不过，在20世纪下半叶以前，选举妇女成为国家议员，以及任命她们担任高级政府职位的情况仍是少数。



20世纪初，英国的妇女参政运动旨在为女性争取选举权。

中国走向共和

东亚在20世纪初也经历了重大的政治变革。面对改革的呼声，清政府由于应对不力而日渐式微，终于一下子倒塌。1911年10月10日，革命派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以求变革。革命呈现燎原之势，孙中山建立共和体制，终于在1912年2月12日，末代清帝溥仪宣布退位。北洋将领袁世凯伺机夺权，就任大总统。虽然1913年的大选结果倾向共和体制，但袁世凯拒绝接受，一心想自登皇位，不料却于1916年逝世。此后，中国形成了多方割据的局面。

五四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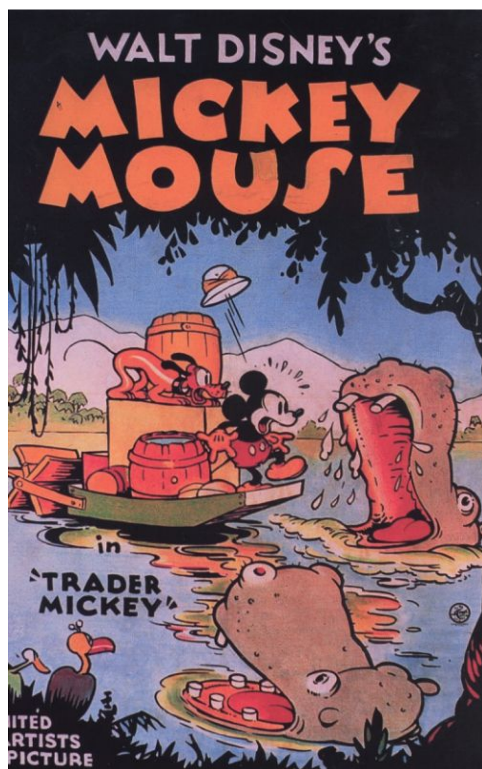
中国的孱弱让日本在中国沿海地区（尤其是山东）的势力迅速膨胀。1919年，巴黎和会宣布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导致北京爆发了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潮——五四运动。这极大地鼓舞了人们抵制外来势力，要求加强现代化建设，尤以城市中的青年学生为代表。

国民党

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国民党经过不懈努力，在广州建立了民族主义政权。苏联为限制英国的在华势力，帮助国民党打造了一支强势军队。1925年，孙中山逝世，但他并未指定继任人选。蒋介石借助军事力量接管了国民党政府，并于1926年挥师北上，发动了旨在消灭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1926—1928年，北伐军先后攻占武汉（1926年）、上海（1927年）、南京（1927年）和北京（1928年）。蒋介石通过集权化管理继续践行孙中山的现代化政策。

电影

在20世纪塑造社会的新兴力量中，电影和电视行业也在其列。论及电影、电视行业的发展速度和影响力，没有哪一个国家能与美国匹敌。美国影片向外界展示着美国社会的富裕及其物质文化，比如：汽车；世界各地的消费观念和文化潮流都受其影响，如女性可在公共场所吸烟，形形色色的美国电影都是如此。一些美国卡通形象也是家喻户晓，如米老鼠（沃尔特·迪士尼1928年设计的）、唐老鸭以及大力水手卜派。其他国家也推出了具有本国特色的电影和电视剧，特别是苏联，但其国际影响力远不如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印度取代美国，成为电影产业最活跃的国家。印度电影之都宝莱坞位于孟买地区，如此命名也是有意取代美国好莱坞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末，宝莱坞每年能出品800多部影片。



像米老鼠这样的美国卡通形象在世界各地家喻户晓。

人类对抗疾病

20世纪，医学变革之迅速、影响之深远前所未有。随着医学常识的增加和普及，人类识别和治疗疾病的能力呈指数性提升。这些进步影响了数十亿人的生活，改善了世界人民的健康状况。以前，若要治愈致命疾病或改善慢性病，必须等到取得重大发现并配合宣传才能实现。1922年，胰岛素的发现大大减轻了糖尿病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人类还取得了医学方面的其他进步，如使用丙种球蛋白预防麻疹、首次将磺胺类药物用于临床（这对兽医学和人类医学同样重要），以及改进输血技术。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在偶然间发现了青霉素——一种可以杀死细菌的霉菌。经分离提取后，它可用作药物，进行大批量生产。这在20世纪40年代掀起了一场抗生素革命，淋病等一些疾病的治疗方法也随之改变。

我们如何出行：飞机

1903年，美国莱特兄弟首次成功试验机身比空气重的载人飞机。很快，空气动力在军事和商业中的应用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这一技术的应用范围也逐渐扩大。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大地加快了空中力量的变革。飞机在战争中的成功运用，大大增加了人们对战斗机研发的资金投入，也促进了飞机在速度和机动性等性能上的改进。空军力量的发展表明了科学研究对军事实力的提升日益重要，风洞[54]的建造就是为了协助科研。无支柱机翼和全金属飞机相继问世，发动机功率增加、体积减小，飞机的爬升速度和飞行速度都得到了提升。1919年，一架改装的英国轰炸机首次完成了不间断飞越大西洋的飞行。

航空服务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迅速发展，航线、机场以及飞机的数量都大幅增加，特别是在美国。旅途所需的时间越来越短，但大多数飞机的航程都很长，因此需要经常加油。直到1939年，第一架能够不间断飞越大西洋的客机才问世。不过，那时的飞机已经明显优于早期的充气飞艇。欧洲列强建立了可通往其海外属地的航空网络。英国有飞往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和南非的航线。法国和比利时也开通了航线以维系在海外属地的控制权。为了增强政治影响力，德国也发展了对拉丁美洲的航空服务，并在当地与美国展开了竞争。



华尔街的股市崩盘引发了一场世界性经济危机，猛烈地冲击了当时的世界秩序。

经济大萧条

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经济和工业因遭到重创而停滞不前。1929年10月，华尔街股价暴跌，纽约股市的投机热潮破灭，严重过

热的美国经济终于崩溃。由于央行缺乏经验，采取了削减货币供应量的措施，导致资产价格泡沫的紧缩变得更加严重，资金的流动大受影响。寻求海外贷款等紧缩性金融管制政策的实行最终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1931年，维也纳的信贷银行倒闭并造成一系列连锁反应，先是德国的银行倒闭，之后其他地区也未能幸免。

1930年，美国通过《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提高本国关税，抑制进口需求。其他国家纷纷效仿，全球兴起一股贸易保护主义之风。到1932年，世界贸易成交量大幅减少。自由贸易曾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重创，战后才渐渐复苏。此时，它则完全消失。

出口工业受到冲击，整个工业社会的失业率大幅上升。1932年，美国的全国失业率上升至近24%，制造业的产能仅占到全部产能的40%。由于工业国家对矿产等原材料的进口减少，商品原产国的经济也受到打击，这让整个发展中世界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如拉丁美洲和大洋洲。而且，原产国更无力负担从工业国进口商品的资金。

大萧条摧毁了自由经济秩序，人们对资本主义体系信心全无。因此，各国政府越来越倾向于从本国（而非国际）的立场来考虑经济问题，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也逐渐增强。

食物

19世纪末，冷藏船载着食物远渡重洋而来，西欧人的生活随之改变。在大多数家庭和餐馆里，餐桌上的食物主要是高碳水化合物，少有新鲜水果。大量的糖被用于热饮、甜点和糖果的制作。乳制品也是日常饮食的重要部分，黄油和猪油则被广泛用于烹饪。穷人主要以面包、奶酪、冷肉等冷餐为食，土豆也是他们的重要食材。传统菜肴仍然很受欢迎，很少有人会考虑替代的菜品。在饱受两次世界大战的摧残，以及20世纪30年代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之后，人们对本土食物越发重视。

极端主义兴起

“一战”后，尤其是1919年《凡尔赛条约》的签订，使得战败国愤恨不已，再加上经济形势严峻，各国政局和意识形态日渐不稳，独裁主义者伺机夺权。1922年，贝尼托·墨索里尼掌控意大利；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掌控德国。“一战”失利后，德国民众愤怒不已，希特勒

的民族主义和种族民粹主义极具诱惑力，而右翼势力正对共产主义的前景担忧不已，希特勒利用这些情绪，成功动摇了德国的民主体制。1934年，希特勒上台兼任总统、总理职位，德国从此成为一个独裁国家。

即使是在和平时期，独裁者仍然按照战时的方式进行统治。在独裁体制内，统治者的权力和思想不受机构和党派的制约，政治决策均按照个人意志行事，没有商量的余地。在德国，希特勒对外交和军事政策专权专断，国际发展所带来的短期机会和焦虑与他那些由来已久的观念发生着碰撞。希特勒与其国内外的政敌在意识形态上冲突不断，他不仅打击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同性恋或任何有独立倾向的人，还疯狂痴迷于反犹太主义，他的狂热政治被一种紧张的气氛所笼罩。



西班牙内战（1936—1939年）通常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兆。

西班牙内战

极端主义的崛起导致西班牙内战全面爆发。1936年，一群自称“民族主义者”的高级军官试图夺取政权。他们反对共和党政府的现代化政策，但由于左翼联盟人民阵线[55]在1936年2月的激烈选举中险胜，他们担心共产党会夺取政权，“民族主义军”的政治观点表明了其反叛的原因。他们声称造反是因为政府已经失控（这正是左右翼间的暴力冲突所致），实际上是在反对共和国本身，以及其代表的民主和自由。虽然“民族主义者”在1936年取得了局部性胜利，但他们并未止步于此，一场更激烈的内战随即打响，直到1939年3月28日他们占

领马德里，内战才宣告结束。

由于西班牙内战造成意识形态严重分裂，它通常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兆。确实，强调宗教信仰的民族主义者斥责共和党人是反基督者的奴仆。不过，这种意识形态并不少见，它贯穿了整个19世纪的西班牙国内纷争。

中国抗日战争

20世纪30年代，民族主义在日本盛行，很多军人都认为战争是“创造力之父”。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的工业中心东北地区。中国丰富的煤炭、铁矿和土地等资源正是日本与美苏抗衡所必需的。日本宣称自己是一个在世界上寻求地位的新帝国，民意变得不再重要，因为军方有着极强的使命感。日本政府提出建立“大东亚新秩序”，意在消灭西方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势力。

1937年，日本得寸进尺，决定发动全面战争，迫使中国臣服。不过，为维护中国主权，蒋介石已做好反击的准备。尽管日本在1937年攻占了北京和上海，于1938年进一步攻下广州和武汉等城市，但一直没能让中国军队放弃抵抗，同时也没能赢得中国人民的支持。

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为了让中国放弃抵抗，日军大肆屠杀平民。大规模的屠杀（如用活人当靶子）和奸淫是日军在长江中下游最令人发指的野蛮行径。然而，暴行没有打垮中国军民的士气，却暴露了日军凶残麻木的本性。近年来，日本试图淡化南京大屠杀的残暴程度，不过他们的说法无法让人信服。直至今日，当中国向世界展示其历史（尤其谈到抵御外侮）时，南京大屠杀一直是重要的主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

德国初期的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许多相关战役的总称，它们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各不相同。同一场战争，意大利和伊朗的视角或许完全不同，日本和牙买加的立场也可能大相径庭。1939年，希特勒入侵波兰，战争由

此开始。英国和法国决定加以阻止，战争进而发展为涉及多国的两大阵营的对垒，即以德国为首的轴心国阵营对抗由英法及其他国家组成的同盟国阵营，1941年，苏联和美国也加入同盟国。由此可见，战争牵扯多方利益，国际判决和和平协定都失去了效力（不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的裁定，还是像1938年慕尼黑会议那样由少数大国谈判后达成的协定）。战争如旋涡一般将一切卷入其中。

值得一提的是，战争让恐慌加速蔓延，但更多的机会得以浮现。德军在战争初期节节胜利，但无意接受和平，就此收手。在迅速征服波兰后，德军采取了进一步的攻势。



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英国和法国被卷入战争。

1940年4月，希特勒迅速攻占丹麦和挪威，并于次月按照计划对法国发起攻势。与此同时，德军成功占领比利时和荷兰，落败的英军被迫撤离欧洲大陆，其大部分军队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成功撤离。希特勒同墨索里尼成功结盟，意大利参战，继而入侵希腊，但没有成功。1941年年初，德国说服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加入轴心国阵营，并顺利攻占南斯拉夫和希腊。

闪电战[56]

“二战”时期，德国凭借高效迅捷的闪电战术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战后却出现了一些有关此战术的错误解读，即认为德国军队战无不胜，最终失败是因为同盟国的军备物资相对充足。事实上，闪电战的实效性，以及坦克和空中支援的重要性都被过分夸大了。它更像是一个加分项，而不是一系列胜利的根本原因。大部分的德国军队并未实现机械化，马匹仍然在德国的后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德国在1940年的战果与其说是机械化的功劳，不如说是德国优质的作战部队和法国糟糕的战略决策。

巴巴罗萨计划

盲目自信的希特勒极度蔑视其他的政治体制，他认为德国必须征服苏联，这样才能为移民争取到“生存空间”，再加上他一直担心斯大林会有所行动，最终在1941年6月，他启动了巴巴罗萨计划。这次进攻是基于对苏联体制即将迅速崩溃的信心，希特勒笃信有关苏联红军规模和调遣计划的（错误）情报。他拒绝接受别人认可的更为客观的外交和战略建议，从而使一场他在其中战无不胜的局部战争演化成无法招架的世界大战。德军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屡屡获胜，但由于战略不当，他们始终没能让苏联溃败或投降。虽然苏联红军在德军的攻势下伤亡惨重，但他们的韧性和战斗力惊人。而德国未能就可行的方案达成一致，导致行动出现了严重错误。此外，有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德国军队是应该先集中火力摧毁苏联军队，还是先巩固征服的领地？如果选择后者，那么先占领哪里？

德国既没能占领莫斯科或列宁格勒，也没能瓦解苏联政权，德军陷入了一场他们赢不了的苦战，大量的军力被消耗。德军于1942年在斯大林格勒和1943年在库尔斯克发起的新攻势均以惨败告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深陷重围的德国军队被迫投降。1943年夏，库尔斯克战役结束，德军停止了对东线进攻。事与愿违的是，德军在苏联的攻势下连连败北，损失惨重，特别是1944年夏天的“巴格拉季昂行动”，苏军击败德国中央集团军后，继续向华沙附近挺进。同年，苏联的其他军队进入巴尔干半岛，迫使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背弃他们的德国同盟，至此，德军被驱逐出希腊。

大西洋海战

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德国想要打垮英国，他们不仅要摧毁其陆地联盟，还需展开海上打击，战舰对垒就是其中一种方式。但德国在战舰数量上远不及对手，因此主要采用了潜艇战术，企图让英军因断粮而投降。1940年，德国因征服挪威和法国得以在公海上建立潜艇基地。

尽管英国损失惨重，最终德国还是被击垮了，这在1943年战争未结束时已有端倪。一方面是反潜技术的发展和有效使用；另一方面是德国在1941年12月对美国宣战，美国的加入让大西洋的制海权向盟军一方倾斜。不过，盟军的长途反潜飞机无法抵达大西洋中部海沟作战。1943年，中立国葡萄牙向盟军开放亚速尔群岛的军事基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大西洋海战的胜利使得盟军能在英国养精蓄锐，为1944年进攻法国做准备。盟军在海战和空战中的胜利，奏响了德国在陆战中彻底失败的序曲。

诺曼底登陆和纳粹德国的覆灭

1944年，德国在西方盟军和苏联的双重攻势下节节败退，年底时，战争已接近尾声。1943年，德国和意大利军队在北非战败，盟军攻入意大利，推翻了墨索里尼政府。1944年6月6日，代号“霸王行动”的诺曼底登陆开始，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栖作战，最终赢得了胜利，这一天也被称作诺曼底登陆日。事已至此，德国显然无望获胜，但希特勒拒绝接受现实。他决定战斗到底。1944年7月，德国的军官曾试图用炸弹暗杀希特勒，但没有成功。

盟军对德国的猛烈轰炸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这不仅重创了德国的工业生产，也借此向德国民众发出警示——持续地抵抗将带来灭顶之灾。

1945年，盟军成功攻入德国，苏联军队占领柏林，希特勒在柏林的废墟中饮弹自尽；与此同时，在莱茵河上奋力突围的英美联军也击溃了意大利北部的德军。1945年5月7日，德国无条件投降，并被盟军划分为多个占领区。

太平洋战争

1940年，德国攻陷法国和荷兰，而在太平洋海域失去主导地位的英国被进一步削弱，导致东亚和东南亚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权力真空。

这点燃了日本南下的野心，从而在南亚遭遇到主要的对手——美国。日军在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尤其是越南）时遭到了美国的抗议。



日本偷袭珍珠港，将美国卷入战争。

1941年12月7日，日本在没有宣战的情况下，对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发动了毁灭性空袭。自1941年年末至1942年年初，日本陆续占领菲律宾、马来西亚、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和缅甸。日本通过击败这些弱小且组织无方的对手获取了大片领土，但这并没有阻止美国人将其击退的决心，即便为之要付出长久的努力。美国无意和解，这使得日本无法制订一个切实的战争计划来巩固战果。

1942年夏，美国海军致使日本舰队在太平洋上举步维艰。中途岛一役，日本海军共有四艘航母被击沉，而航母是当时海军力量的新象征。1943年，在航母的支援下，美国的两栖作战部队在太平洋西南部和中部击退日军，并于1944年年末收复菲律宾。日本海军覆灭。1945年8月，美国认为用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很有必要：一来可以打击日本继续战斗的决心，二来也可免去进攻日本将带来的重大损失。原子弹爆炸后，日本迅速宣布无条件投降。

犹太人大屠杀

希特勒对犹太人深恶痛绝，从而发起了一场旨在消灭所有犹太人及其文化的反犹运动。对犹太人的残忍迫害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德国犹太人的合法权利逐渐被剥夺，尤其是1935年的《纽伦堡法令》的颁布。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后，情况恶化，大批犹太人被德国侵略者杀害。在德国控制下的欧洲，犹太人被押往集中营，并从1941年开始进行大规模屠杀，毒气是常用手段。约有600万犹太人惨遭毒手，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受害者最多，在那里约有150万人被杀。除屠杀之外，犹太人还遭到了抹黑和羞辱。老人和儿童通常会被直接处死，其余的人则充当苦力劳作至死。直到“二战”结束，德国军队才停止对犹太人的屠杀，这印证了种族冲突是纳粹政策的中心。德国的大多数人都知道犹太人遭受到的暴行。

“民主的军火库”：美国后方

1938年，美国的工业产值已占全球的31.4%（相比之下，德国为12.7%，英国为10.7%，苏联为9.0%），这是同盟国工业产值高于轴心国的关键所在。美国无须担心来自轴心国的空袭，因此能集中大量资源制造军备，并向海外战场输送。美国的大批量生产技术得以发展，这在和平时期主要用在汽车制造上，而在战时则贡献了29.7万架飞机和8.6万辆坦克，其他的一些军备及武器系统（比如航空母舰）也在数量上超过了对手。

美国借着战争发了一大笔财。企业的利润提升，工人们充分就业，购买力和到手的薪水一起上涨，政府的税基也日渐增长。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是唯一一位在战争期间面临选举的主要参战国领导人，他已在1932年、1936年和1940年赢得选举，并在1944年轻松连任总统。美国有资源和能力将生产核弹的计划付诸实施，足以证明其经济实力之雄厚，这在当时无出其右。

改变世界的物品：石油

20世纪，煤炭仍是非常重要的能源，但由于车辆、坦克等以石油作为燃料，因此石油的地位显得更突出。美国的霸主地位与其大力发展石油工业不无关系。首先，石油是美国工业生产的主要原料；其次，以埃索石油公司为代表的美国石油公司在沙特阿拉伯等地积极开发石油资源并控制了石油贸易。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对手——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等国的石油资源却很匮乏，石油需求影响着他们的战略决策，比如1942年，德国试图攻占里海的巴库，但以失败告终；1943—1944年，德军投入了大

量军力以保护罗马尼亚在普洛耶什蒂的油田不受同盟军的空袭，因为这是当时欧洲大陆唯一的油田。与之相反，冷战期间的苏联虽然经济萎靡，但仍能持续对美国构成威胁，正是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之一。

到1998年，除木材和沼气外，石油支撑了全球40%的能源消耗，而煤炭和天然气的比例分别为26%和24%，核能和水力发电在当时所占比重还很小。工程和信息技术的重大进步推动了石油资源的开采，钻探可以抵达地表的更深处，人们对油田的了解也越发深入。中东的政治意义因其丰富的石油储量而提升。随着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等石油大国的战略地位增强，大国纷纷寻求与之建立盟友关系，但一些干预行动也不可避免，如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不过，与19世纪煤炭在英国引发的效应不同，石油的原产国并没有兴起工业革命，而石油的开采也未能给迅速增长的人口带来相应的就业机会。

关键战役：中途岛

1942年6月4日，日本海军在中途岛遭美军重创，美军从航空母舰上发起的空袭击沉了四艘日本航母。美国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卓越的指挥能力、善于把握突发机遇的能力，以及美国海军普遍较高的韧性。中途岛战役表明，海战的胜负开始由空中力量主导，不再是战舰对抗。

国内战线与宣传

由于长期的战争，许多国家开始担心民众的士气，这引发了一种更注重社会福利的社会政治，系统的宣传也出现在公众视野。广泛的宣传报道体现了争取民众支持的必要性，极权主义国家也不例外。这也是开展公众再教育的手段之一，宣传内容从饮食习惯（以便使配给制发挥作用）到政治目标都有所涉及。希特勒认为，德国的宣传不仅是为了坚定信念，更是与敌人对抗的一种方式。



德国利用政治宣传鼓舞国民士气，并同敌人开展斗争。

第八章　现代世界

1945年至今

伴随着不同国际阵营、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相互对抗，战争以及可能对人类这一物种造成灭绝性打击的核冲突，世界局势瞬息万变，其影响无人能幸免。人口增长、技术发展以及城市化都是促成变化的关键因素。

冷战

战时联盟在和平年代往往难以维系。西方列强和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分歧难以消除。事实上，双方的分歧在1944年的东欧问题上已昭然若揭，在波兰问题上尤其如此，斯大林一心想吞并波兰。



1945年，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讨论战后的世界格局。

这些分歧导致冷战爆发，但它并不是一场正式的或正面的冲突，而是一段通过长期的军备竞赛和大量的代理人战争实施对抗的敌对时期，直到1989年才结束。代理人战争是大国通过介入别国冲突进行较量的一种方式，这令仇恨滋长、恐惧加深，并造成一种高度戒备的军事状态。冷战双方都对瞬息万变的军事力量、国际关系、政治秩序和意识信念深感不安，一场持续的、耗资巨大的军备竞赛就此展开，这也成了冷战的核心。可以说，军备竞赛就是冷战。双方都声称自己很强大，但又宣布需要额外的优势来确保己方安全。最终，“相互保证毁灭”[57]（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机制的大规模核储备威胁才让形势得以稳定。

苏联最初没有原子弹，但其军队具备占领西欧的能力，西方迫不得已以核武器威胁才得以阻止。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是一项旨在帮助“二战”后各国实现经济复苏的经济援助计划，许多西欧国家欣然接受，但苏联认为这是帝国主义的经济扩张行为，拒绝接受。从此，一道新的屏障横亘于西欧和那些未接受援助的东欧国家之间。苏联在分占德国的问题上拒绝合作，并在东欧强行实施一党政治，尤其在捷克斯洛伐克，这让西欧不得不采取措施。苏联的行为证实了丘吉尔1946年的演说，即从波罗的海一直到亚得里亚海，一道“铁幕”正在落下。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成立，这为西欧提供了一副防卫铠甲。美国放弃了一直奉行的孤立主义，积极促进新联盟的形成，并坚定地站在了西欧这边。1955年，苏联在东欧也成立了自己的军事联盟——华沙条约组织 （简称“华约”）。

欧洲联盟

195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政治结构改革进程的一部分。反民族主义的提出促进了欧洲的一体化进程，西德愿意接受法国提出的“舒曼计划”，这也促使法国同意实施经济共同体的方案。

随着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地理范围不断扩大，新一轮的计划也被提上日程。1992年，《欧洲联盟条约》在马斯特里赫特签署，标志着欧洲联盟的诞生。这个新名词意味着新章程的开启。1999年，欧元作为贸易货币推出，成为欧盟大多数成员国的通用货币。

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眼看中国国民党在国共内战（1946—1950年）中被中国共产党彻底击败，美国遏制中共发展的念头愈加坚定。1950年，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出兵干预朝鲜半岛，朝鲜战争（1950—1953年）就此爆发。“联合国军”一路打入朝鲜，但最终被前来支援的志愿军逼退，战争陷入僵局。之后经过多次谈判，双方终于在1953年签署了停战协议。

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美国的介入，南越（越南共和国）击败了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国）支持的越共。但是，美军能让对手止步，却无法将其击溃，加之国内的反战言论越发激烈，最终美国在1973年退出越南战争。1975年，南越被推翻。这场战争波及了邻国柬埔寨和老

挝。这些冲突加剧了冷战的紧张局势，苏联和中国支持北越，而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韩国则派军援助美国。



这张侦察照片显示，1962年11月8日，苏联在古巴马里埃尔海军港口部署了导弹。

古巴导弹危机（1962年）

20世纪50年代，超级大国之间的核武器竞争趋向白热化，先是比早期核弹危险得多的氢弹问世并被用于部署，随后洲际火箭出现。1957年，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由苏联发射升空，这将美国置于导弹的威胁之下。

20世纪60年代初，美苏都想在日益激烈的核军备竞赛中占得优势。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1961—1963年在任）为此极力扩充核武器以争取战略优势，而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1953—1964年在任）则于1962年决定在古巴部署导弹。此时，反美的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刚刚夺取古巴政权，并在1961年由美国指使的企图推翻他的行动中幸存下来（也就是让美国备受争议的“猪湾事件”）。苏联的导弹距离美国海岸如此近，这让美国如芒在背。

面对导弹的威胁，美国打算对古巴动武，封锁了其领空和领海以

阻止苏联进一步的物资供应，肯尼迪还声称要进行全面的核打击报复。最终，经过复杂的交涉后，苏联同意撤除导弹。但事实证明，对于核武器的使用，从做出决定到箭在弦上，直至危机解除，不同的结果只在一念之间。世界第一次在核灾难的边缘摇摇欲坠。

冷战中的美苏经济

20世纪70年代中期是冷战中相对和平的一个阶段，但对峙在70年代末再度升温，先是美苏插手安哥拉内战、介入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战争，然后是苏联1979年入侵阿富汗。在总统罗纳德·里根（1981—1989年在任）的领导下，美国在冷战中的态度明显强硬起来。在阿富汗、中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美国为反共势力提供武器，并大规模集结美国军队。得益于美国经济的复苏，以及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在债券市场强大的集资能力，美国政府能够充分调用国内资源开展军事建设。然而此时，苏联由于缺乏可支配资金，军事上已无法与之匹敌。在苏联经济停滞不前时，美国经济却在飞速发展，并且没有出现经济“滞胀”。滞胀是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发生导致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曾引起社会的动荡。随着制造的过程日益复杂，美国不再只关注基本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开始重视制造所需的技能和投资，这一转变更加利于经济的发展。美国工人的人均拥有资本量仍然很高，国内经济和市场在放松管制后也变得更加开放，这不仅让高效的经济活动加速扩散，也刺激了资本向各个利润可观的领域流入。



罗纳德·里根手腕强硬，美苏对抗加剧。

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及东欧剧变出乎所有人的意料。1985年，新上任的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改革实现共产主义的现代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的中央集权经济引发了严重问题，而早期试图通过改革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收效甚微。经济困难限制了社会投资和消费性支出，这让民心日渐向非民主体制倾斜。

戈尔巴乔夫依然坚持推进现代化政策，这让亲苏的东欧各国政府无力招架本国民众日益高涨的改革呼声。最终，东欧各国政权在1989年相继垮台，多党政治和自由选举制度登场。1990年，东德和西德实现统一。1991年，随着乌克兰等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苏联最终解体。

非殖民化运动

印巴分治

欧洲的海外帝国也经历着与帝国内部相似的变化。“二战”后的英国一蹶不振，不再热衷于帝国主义，1947年，它宣布放弃对印度的控

制。在与印度教的主要领导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穆斯林联盟领袖穆罕默德·阿里·真纳进行谈判后，时任印度总督的英国人蒙巴顿勋爵同意将英属印度一分为二：以印度教为主的印度和以穆斯林为主的巴基斯坦。但是由于决定太过仓促且计划不周，（短时间内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导致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暴力事件激增，造成大约150万人丧生，1400万人颠沛流离。巴基斯坦的边境地区基本上是伊斯兰教的势力范围，印度也对穆斯林控制的克什米尔部分地区施加了控制。

印度凭借人口和财力的优势，在这片区域作风强势。1965年，印度对巴基斯坦开战，并于1971年击败对手，帮助东巴基斯坦独立，建立孟加拉国。此外，印度于1961年收复葡萄牙在印度的领地，并派军进入斯里兰卡帮助剿灭叛乱分子；同时，还在喜马拉雅地区与中国展开对峙。除了在20世纪70年代的“紧急时期”实行过独裁政治[58]，印度一直处于文官的统治之下，而巴基斯坦则由军方与文官政府交替执政。



穆斯林联盟领袖穆罕默德·阿里·真纳，他建议蒙巴顿勋爵按宗教将印度次大陆分为两个部分，即印度和巴基斯坦。

中东局势

由于厌倦了在巴以之间充当仲裁者，1948年，英国从联合国委任统治的巴勒斯坦撤出。中东因盛产石油而具有特殊的经济意义。1948年，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宣布建立以色列国，但遭到当地阿拉伯穆斯

林的极力反对。双方的战争从1948年一直持续到1949年，以犹太人的胜利告终，大批阿拉伯难民从以色列迁出。自1956年以色列战胜埃及之后，1967年又爆发了六日战争，以色列在战争中占领了埃及、约旦和叙利亚的领土。虽然一部分领土最终被归还，但以色列仍然控制着约旦河西岸，所以管理着大批巴勒斯坦人，这对其稳定构成了威胁。



加纳领导人克瓦米·恩克鲁玛。在他的领导下，加纳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一个获得独立的国家。

非洲殖民地瓦解

20世纪50年代后期，非洲的非殖民化进程开始加速。列强内部对帝国主义的支持呈下降趋势，而殖民地高涨的民族主义运动则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大多数问题是殖民地希望以和谈而非暴力的方式终止帝国的统治。从1957年起，英国陆续允许其非洲殖民地独立，其中加纳最先独立；1960年，除阿尔及利亚以外，法国承认了其大部分非洲属地的独立地位，比利时也放弃了对刚果的统治。

法国在1954—1962年极力维持着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葡萄牙也于1961—1974年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进行了同样的努力，但两国都未能镇压反对的民族主义力量。虽然法军没有失败，他们也无法在这场代价高昂的战斗中歼灭阿尔及利亚的游击队。实际上，法国为赢得当地民众支持而采取的行动常常适得其反。

在非洲南部那些已经独立但仍由白人统治的国家中，起义运动也是如火如荼，如南非和南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这两个国家都由

少数白人统治。直到冷战结束，南非才推翻白人的统治，废除歧视性的种族隔离制度。由此可见，国内的不稳定源于反对种族隔离、美国和欧盟制裁造成的经济负担，以及地位更高的白人的信仰，这些都必须通过改革才能取得进展。1980年，津巴布韦独立，建立了由黑人统治的政府；在1994年的南非普选中，曾经领导解放运动的非洲人国民大会胜出。

独立后的非洲

新国家独立后，挑战也接踵而至。非洲大陆很快变成了两个超级大国的战场。刚果第一任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因被认为支持苏联而遭到刺杀。有时，少数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会演变成战争。在尼日利亚，对伊博族的暴力冲突导致1967年伊梅卡·奥朱古上校宣布在尼日利亚东南部地区成立比亚法拉共和国。这场激烈的内战持续了三年，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是非洲独立后发生的首次战争，接着更多的冲突将纷至沓来。

迅速增长的人口让非洲面临着巨大的资源压力。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在全世界排名第七，预计到2050年将超过美国（目前第三）。土地利用率已从1965年的人均耕地0.5公顷（1.2英亩）降至1995年的0.28公顷（0.7英亩），但这一压力被普遍的城市化所掩盖。尼日利亚的城市人口比例从1963年的五分之一上升到1991年的三分之一以上：自2010年以来，尼日利亚最大的城市拉各斯每年都会增加50万人。在整个非洲，土地的紧缺给农村地区带来了环境压力，也让种族关系变得紧张。由于风蚀和水蚀严重，水土流失成了主要问题。边缘耕地正在退化，特别在纳米比亚、埃塞俄比亚和撒哈拉以南的萨赫勒地区，每一处都面临着沙漠化的威胁。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萨赫勒地区曾发生大范围的干旱，许多毛里塔尼亚人不得不放弃游牧生活，搬到城市居住。

随着人口渐增，对于这片面积辽阔且贫富差距明显的大陆来说，非洲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很难一概而论。除了博茨瓦纳、赞比亚和坦桑尼亚等国处于稳定的发展中，很多地区仍然非常动荡，特别是从马里到南苏丹的萨赫勒地带以及刚果，体制弊端和腐败之风拖垮了许多国家的政治事务。在尼日利亚的拉各斯，交通严重堵塞、贪污腐败盛行和电力供应不足导致政府不得不雇用义务警员帮助维持治安。

严重落后的经济也是非洲的一大问题。到2012年，只有不到六分之一的非洲人在使用互联网。随着中国对非洲的技术援助和经济投资，移动电话正在普及，但当地的经济生产仍以初级产品为主。由于

人口的迅速增长，埃及和南非等国由来已久的失业问题也持续恶化。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崛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并没有给东亚地区带来稳定。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和共产党随即重回敌对状态。在美国军事顾问的帮助下，国民党迅速夺回日占区，并在1946年突袭了共产党军队；1947年，他们短暂夺取了共产党的革命中心延安，不过胜利稍纵即逝。1948—1949年，共产党在淮海、平津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国民党领袖蒋介石被迫撤军至中国台湾岛。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76年，毛泽东逝世，中国的政策发生了巨大转变。20世纪80年代，新领导人邓小平积极推行经济自由化和现代化政策，如实行市场调价、允许私企存在、农民可以保留余粮、吸引外资等，这些都促进了经济的迅速繁荣。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开放的外国市场。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迅猛增长，特别是在南方沿海地区。相比于其他出口国，中国丰富的劳动力极具优势，吸引了大量外来投资。进入2000年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生产国，到2010年时已跃居世界第一。

20世纪90年代末，有关亚洲第一及美国劲敌的舆论焦点开始从日本转向中国。从2000年开始，提升国力成为中国的一项重要政策。

东亚土地改革

在过去，许多国家的土地分配都极不均等，且往往是世袭继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采用的模式再次出现。为了建立新的社会政治，新中国实行了土地改革。

20世纪40年代末，日本也进行了土地改革（虽然是在美国的主持下）。与1910年革命后的墨西哥和1947年独立后的印度一样，这次改革激发了自耕农群体的积极性（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

冷战后的美国

20世纪90年代，美国成为举世瞩目的超级大国。由于美国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例上升，西方世界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日

益扩大。同时，美国在全球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也在1999年上升至17.7%。相比之下，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1994—1995年），亚洲大部分国家在1997—1998年面临着流动性危机，俄罗斯在1998年产生了债务拖欠危机……这些危机反映了外延性投资和流动性大幅增加所造成的压力，并以大范围的金融波动表现出来。但正因能成功度过危机，这证明世界金融体系比20世纪30年代时更强大。美国在这次危机中成为其他国家的商品市场，为顺利度过危机发挥了关键作用。2017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达到创纪录的3750亿美元。

摩天大楼

摩天大楼最初出现在美国（尤其是纽约），它是高地价和快速电梯等现代技术的集中体现。市中心的写字楼和酒店也多建成摩天大楼，以彰显其国际化的风格。它们也代表了一个城市的地位，如在中国香港，高耸入云的汇丰银行、中国银行和渣打银行大楼。

现代消费兴起

从19世纪中叶开始，各地经济都在快速增长，在“二战”后尤其明显。发达国家的多数居民因此拥有了更多可支配的财富和闲暇时间，社会支出模式的形成随之加快。1973年，美国的人均生活水平比1948年上涨了82%。在此期间，美国家庭的收入中值平均每年增长3%；美国企业商业部门每小时的销售量也以每年3%以上的速度上涨。在整个西方，食物、住房和供暖等基本开销仅占平均预算的很小一部分，并且随着越来越多的已婚女性参加工作，劳动参与率的上升让日常开销的预算比例进一步降低。



汽车是典型的消费品。到20世纪末，拥有一辆汽车是每个美国家庭的愿望。

大规模的城市化带动了货币经济的增长，而人们将消费能力作为个人的评判标准更是加速了货币经济的兴起。产品设计和广告宣传可以体现商品的时尚度、成本高低和体面程度，进而影响消费者的选择。广告是为了让产品畅销国内外。

传统的广告方式有户外看板、公交车身、商店橱窗以及“三明治式广告牌”，更新颖的方式陆续出现：彩色摄影、商业电视，以及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互联网。广告往往会在全国投放，以确保产品和活动的名气可覆盖全国而非局限于某地。

销售和广告利于经济的增长，其在国际市场的地位也日益凸显。这在某种程度上归功于外国产品的独特吸引力，以及因全球技术发展而扩大的产品种类和功能，如合成纤维。

在发达国家，人们可能会丢弃仍能正常使用的商品，一些非功能性的产品也开始受到青睐，比如在21世纪初，破洞牛仔裤成为日常服饰。由此增多的垃圾给环境带来了可怕的影响，特别是制造出的大量

塑料产品，导致大量废弃塑料出现在海洋中，但塑料需要很多年才能被降解。

流行文化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青年文化成为时尚、服装和流行音乐的焦点，社会开始强调个体及其塑造个人独特世界的能力。歌曲和电影以性别独立为主题，享乐主义则注重自由意志、自我实现和消费主义。

青年文化、女性主义、毒品和性解放是国际性的主题，新的性别身份以及青年的期望和角色受到关注。与此同时，既存的文化和社会规范使得公众和政府对于离婚、堕胎和同性恋等问题的看法产生了巨大分歧。

艺术作品的创作继续借鉴不同的形式，打破界限，抛弃既定的分类和规范，社会在激进知识分子的影响下开始发生变化。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和法国文学评论家罗兰·巴特是结构主义运动的代表。结构主义将语言视为一套准则，虽然语言本身的价值有限，但它可以指导人们了解任何潜在的真实。这就转向了后现代主义，它在20世纪80年代曾风靡一时。“二战”后，以马丁·海德格尔和让·保罗·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在欧洲风行，这是一场虚无主义的哲学思潮，强调个人在残酷世界中的脆弱和选择的空虚。

美国流行文化对生活方式的影响要大得多。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的影视节目及其衍生产品的影响下，美国被消费社会视为财富和快乐之地，神秘感大增，特别是在西欧、拉丁美洲和日本。美国文化中民主、亲民和易理解的部分在其影视作品和音乐中也有所体现，如伦纳德·伯恩斯坦和阿隆·科普兰的作品就将古典音乐和流行风格进行了完美的融合。

20世纪60年代，一些早期的禁忌受到了社会、文化和知识变革的冲击，有的甚至完全被消除。如20世纪50年代末，口服避孕药诞生并迅速传播，这让性行为与生育的分离变得前所未有的简单。

现代音乐

消费选择与一系列的社会发展息息相关，比如青年消费群体的出现。当时，大多数青年都希望（并做到了）塑造自身形象，拒绝成为长辈的翻版，拒绝听从父母的意见。流行音乐的发展尤其能体现这一

点，流行乐是一种以年轻人为焦点的音乐类型，20世纪50年代的“摇滚乐”和60年代的“流行乐”都是如此。美国的猫王、英国的披头士乐队等明星成为反抗传统规范的代表人物。这类音乐通常没有复杂的技巧，能够通过新科技产品（如晶体管收音机）收听。



20世纪50年代，以猫王为代表的摇滚乐兴起。

电视普及

1926年，约翰·罗杰·贝尔德首次公开展示电视技术；1936年，全球首家公共电视广播服务机构在英国成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电视的进一步发展受阻。战后，繁荣的经济和信贷能力的提升确保了西方的电视拥有量迅速上涨。到1959年，75%的英国居民能经常观看电视。1986年，美国已有1.95亿台电视，成为全球的电视文化中心。与此同时，巴西有2600万台，印度有1050万台，印尼有660万台。20世纪90年代，卫星频道进一步补充了日渐增长的地面电视频道。电视取代广播占据了多数人的主要闲暇时间，它塑造观念、引领潮流，既能制造话题也会引发争议；电视机前留下了家庭的温情时光或辩论时刻，成为家庭生活的一大特色。电视是推动“消费社会”形成的变革之力，也是播报世界各地信息的“世界之窗”。电视也日益成为大众品位

的反映。

此外，卫星电视还具有跨国影响力，可以打击信息的垄断。宗教激进主义者就极力阻止或限制有关西方生活信息的播报，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甚至禁止人们使用电视。

养活世界

全球人口的急剧增多意味着对粮食的需求也空前增长，这一需求基本得到了满足。事实上，那些因粮食供应不足而暴发的饥荒，主要是由战争、计划经济中激进的农业政策或极端的环境造成的。在发达国家，高消费使得肥胖成为影响健康的严重问题，这是其他地区没有的。

绿色革命

世界多数地区的农业增长都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由于“绿色革命”，特别是改良作物的广泛种植、化肥和杀虫剂的大面积使用、机械化的普及以及灌溉用水的增加，人均粮食产量从1961年的135千克增加到1989年的161千克。

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机械化不仅促进了巴西农业的增产，还带动了当地社会和地理上的变化，即小型家庭农场逐渐转型为拥有大型农场的农业综合企业，特别是在亚马孙南部内陆的塞拉多地区。大片的田地更易进行机械化操作，便于机器收割的作物和耕种布局也由此改变。不过，巴西的传统农业还面临着社会成本降低的冲击。

“绿色革命”带来的环境问题也很严重。为了追求产量而单一地栽培高产品种，既减少了生物的多样性，也为特定的害虫提供了食物来源。而农耕本身又会造成土壤侵蚀和土壤贫化。

工业化养殖

随着收入的提升，人们对肉的需求也在增加，每英亩的肉产量开始受到关注。肉的来源从放牧养殖的肉牛转向全年可供的集中饲养型动物，尤其是猪和鸡。“工业化养殖”由此诞生，牲畜全年被高密度地饲养在厂房中。

现代饮食

20世纪50年代，经济回暖带动了各方面的繁荣，比如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的消费增加，这两类营养是西方饮食的主要成分。发达国家的营养水平明显提高，北美、西欧和大洋洲的每日人均热量摄入极高。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这些地区的国民饮食日趋受到新食材和外来菜肴的影响。意大利、中国和印度的餐馆开到了国外，而麦当劳等美国的快餐连锁店也无处不在。

人们想要品尝新式菜肴，而各种烹饪信息更是俯拾皆是，家庭不再固守一本祖传食谱或老旧的烹饪书籍。相反，他们购买新食谱并咨询烹饪工艺，关于烹饪的电视节目也格外受欢迎。冷藏技术延长了食物的保存期限，人们的饮食习惯也随之改变。对于消费者而言，食材可以全年供应，不再受季节限制。此外，随着低温冰箱和微波炉的出现，方便食品兴起并成为新菜品市场的主力军。

相比之下，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以及拉丁美洲部分地区每日的热量摄入仍然很低。有些地区还会发生饥荒，比如埃塞俄比亚。传统的食物和烹饪方法在这些地区仍然相当重要。此外，由文化差异造成的饮食禁忌也难以改变。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北美和西欧的餐桌上出现了意大利、中国和印度等国的菜品。

环保主义

20世纪50年代，有人提出地球是一个有机运作的生物圈，它通过自然的反馈机制来维持生命，这一观点冲击了将地球视作待改造和使用的土地或商品的想法。目前，人类活动正影响着地球的环境系统，如大气污染。人们已经能够追踪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的传播途径并形成报告。美国生态学家蕾切尔·卡逊在著作《寂静的春天》（1962年）中强调了农药对环境造成的危害，尤其是“滴滴涕”[59]。

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都给环境带来了压力。由于森林或化石燃料（尤其是煤）的燃烧，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增加；而工业生产排放的硫和氮也让酸沉降[60]变得严重。此外，酸雨不仅破坏了林地，还污染了河流和湖泊。

污染的辐射范围非常广，即便是远离污染源的地方仍会被波及，不论是在污染源国（特别是高原地区），还是在其他国家。

污染通过各个途径侵袭着世界。车辆排放的大量尾气影响了空气质量。消费社会产生的垃圾越来越多，很多都难以通过生物进行降解，有些甚至是有毒的。海洋中的塑料垃圾经藻类和鱼类进入人类的食物链。

滥伐森林

据卫星数据显示，森林消减的速度在20世纪大大加快。1970—1995年，全球约有10%的天然森林消失。换一个角度来看，1960—1990年，发展中国家失去了大约4.5亿公顷森林。

温带地区开始种植大量新树苗，如加拿大和斯堪的纳维亚；而热带地区则截然相反，人们对占有土地和开发森林的欲望更胜一筹。在文莱，人们为了获取棕榈油，大片森林被砍伐以种植棕榈。而在20世纪的前四十年里，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经历了超快速的人口增长，远超农业生产的速度，这不仅导致人均占地面积缩小，还造成了滥砍滥伐森林和土壤贫瘠。这一过程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发生过。



由于新技术的发展和世界人口的快速增长，20世纪森林消减的速度大大加快。

水坝

水坝是人类意识形态和政治活动的产物，可以通过控制水流解决消耗用水或水力发电的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们认为安全的水力发电比核能更适合作为化石燃料的替代品。遍布世界各地的水坝是大势所趋，各处的大型水利工程便是例证，如田纳西河谷和整个美国西部的大坝，其中以胡佛水坝最引人注目；还有苏联的顿河大坝、澳大利亚的雪山工程、埃及的阿斯旺大坝、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之间的卡里巴水坝和中国的长江三峡大坝。许多水坝仍在建设中，如埃塞俄比亚在青尼罗河上修建大型水坝，而下游的埃及和苏丹对各自将获得的水量一直存在争议。

气候变化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森林作为大型碳汇[61]的能力下降。自工业革命以来，煤炭和石油等化石燃料的使用大幅增加，燃烧产生的大量二氧化碳排放到大气中，导致温室气体越积越多。

这些积聚在大气中的气体阻止了地球热量的散发，导致极地冰川的消融和毁灭性的气候变化。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地表温度稳步上升：从1975年到20世纪末，温度上升了约0.5摄氏度。

气候变化加重了人们对现代化的忧虑，也给国际外交带来了考验。美国、中国、印度和欧盟曾试图就限制碳排放达成协议，但在经过激烈的辩论后仍未能达成。2001年，美国以偏袒发展中国家为由拒绝签署1997年制定的《京都议定书》。2017年，美国又拒绝签署2015年在巴黎达成的气候变化协议。

世界人口

人口迁移

在20世纪至21世纪期间，人口迁移率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呈上升趋势。拉力因素包括经济机遇的出现和运输路线的改善；推力因素则有武装冲突、政治斗争、种族或宗教迫害、人口增长导致的贫困，以及干旱和洪水等自然灾害。移民的模式多样而复杂，大部分是境内移民，以从农村迁移至城市或者机会更好的地区为主，比如中国的沿海城市、印度和日本的大城市，以及美国的阳光地带[62]。在日本，人口主要从农村迁往东京和大阪。



1948年，“帝国疾风号”抵达伦敦，标志着移民新

时代的开始。

跨国移民引发了更多争议，比如外来务工人员，不论是前往法国的葡萄牙人、奔赴德国的土耳其人，还是前往海湾地区的印度人，他们带来的问题远少于那些为躲避迫害而逃离家园的人。而对于后一类移民，截然不同的文化会带来诸多问题，不论问题是真实存在或只是恐惧使然，都让这类移民更具争议性。

自2010年以来，从中美洲向美国移民，以及从中东或非洲向欧洲移民在政治层面上变得格外敏感。有评论员指出，这将使本国居民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威胁，并将随当前世界人口快速增长带来诸多问题。据估算，世界人口将会继续保持增长的趋势，尽管一些国家（尤其是日本）的人口在减少（或许中国到2030年也会这样）。

人们曾设想到2050年人口最多不会超过95亿，因为妇女在接受教育后会控制家庭的规模。但事实证明这一想法并不准确，许多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仍然很高，特别是在宗教群体内。人口问题仍然是世界各地经济规划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未来的城市

截至2012年，全球70亿人中有一半以上居住在城市。联合国据此推测，到2030年，全球城市居民将超过50亿。还有人推测，到2050年，全球将有四分之三的人居住在城市，其中增长最明显的是亚洲和非洲。确实，目前全球有34个人口总数超过1000万的特大城市。在2015年全球最大的20个城市中，亚洲占据了14个席位，而且排名前八位的城市均属亚洲。

对新城市的需求是研究更多、更好的可持续城市发展形式的主要推力——仅在中国，就需要数百个城市来容纳境内移民。批量兴建的城市高层建筑占地不多且成本较低，是重要的解决方案之一。上海有1000多幢30层以上的建筑，这是一个城市能在短时间内从地方城镇摇身一变成为繁华的国际大都市的最佳例证。正如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伦敦，以及20世纪的纽约一样，上海是21世纪现代化和变革的标志。不过，大批的老上海建筑被迫拆除，数十万人需要重新安置，这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非常普遍。随着人口增长，环境问题随之而来且越发严重，这些都让城市生活面临的挑战急剧增加。

医疗卫生和发展中国家

20世纪下半叶，随着药物种类的完善，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重大发展。由于对疾病控制的认识更加深刻，以及更有效的医疗保健政策、儿童免疫计划和全面营养计划的实施，公共卫生得到了改善。“绿色革命”让印度和中国的粮食产量大幅增加，减轻了饥荒的影响。

世界卫生组织（简称WHO，成立于1948年）针对麻疹和结核病等疾病推行了全球免疫计划。1948—1966年，该组织负责结核病疫苗接种共1.8亿次。



世界卫生组织自1948年成立以来，开展了许多全球免疫活动。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预期寿命大幅提升，这主要得益于婴儿死亡率的下降，特别是在中国和印度，大幅下降的婴儿死亡率带来了显著变化，到1999年，两国的预期寿命分别上升至70岁和63岁。在过去的75年里，人口的迅速增长是影响世界历史的

主要因素之一。

汽车

在发展中国家，汽车制造业广泛发展，人们的汽车拥有量显著提升。而在发达国家，随着战时紧缩政策和管制措施的结束，汽车拥有率在20世纪50年代也有所上升，汽车业的发展带动了经济增长。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日本、巴西和韩国先后拥有了强大的制造产能。到1990年，全球已有近6亿辆汽车，在随后的十年中，中国的汽车拥有量也在突飞猛进。1956年，太平洋的复活节岛上只有一辆吉普车，但在2000年，该岛的汽车拥有量已超过3000辆（相当于该岛的人口总数）。

公路

为提升车速而修建的长距离、多车道公路最早出现于1935年的德国，“二战”后数量愈加增多。最重要的当属20世纪50年代发展的美国州际公路系统，它取代了长途客运铁路服务，并形成了一定区域内可免费行驶的全国公路网。1958年，英国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开通；四年后，横贯加拿大的公路也开通了。

汽车是人类世界特有的景观之一。城市污染也因此加剧，以北京、开罗和新德里为例，城市的空气质量变得非常糟糕，而艾略特在诗作《荒原》中提及的“喇叭和马达的声音”更是响个不停。交通高峰期的洛杉矶堪称最拥堵的城市，2017年，这里的司机全年在拥堵高峰时段的人均等待时长为102个小时。

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大部分人的私人出行更加便捷（但并非一概而论），居住密度随之下降，休闲活动的发展也受到影响。拥有汽车给许多人带来一种自由的感觉（也许是错觉），以及更多的机会和选择。根据居民的财富水平、前景、机会和年龄来划分群体的现象越发明显。贫民群体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缺乏流动性。

改变世界的物品：计算机芯片

由于计算机的体积急剧缩小，它成为世界各地办公场所和家庭中的一大特色。电子元件的微型化使得人们能在极小的硅片上建立完整的电子电路，这是一种有效且低廉的信息存储方式。

1958年，集成电路诞生；1966年，第一台手持计算机问世；1971年，英特尔公司推出了第一台微处理器芯片“Intel 4004”。该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曾在1965年预测，由于单个集成电路的晶体管数量每隔12—24个月就会翻一番，芯片的性能将会迎来巨大变革。

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产品的便携化成了技术发展的附属产物，移动电话、笔记本电脑和微型磁盘系统等产品因其小巧的外观，日益受到大众的欢迎。无键盘掌上电脑也应运而生。与此同时，办公电脑和个人电脑的增多促进了电子邮件和互联网的使用。由于计算技术的改进，不同的机器之间可通过程序运行进行协作，这确保了互相连通的计算机能够协作如一，功能更强，无须一台真正的超级计算机。光纤电缆等一系列技术提升了电缆系统的容量，电话和计算机通过电缆传输的信息量也随之增长。

机器人

到1999年年底，全世界已有75万台机器人被用于协助生产。它们在汽车制造业的应用最为普遍，其中以日本最突出，美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紧随其后。在机器人数量最多的20个国家中，非洲、拉丁美洲和南亚没有一个国家上榜。与计算机一样，本身性能的优化以及生产系统的改善不仅降低了机器人的成本，也提高了其生产力。

我们如何出行：太空

从1903年莱特兄弟第一架飞机试飞成功到1957年苏联的“斯普特尼克一号”卫星升空，这一飞跃式的发展恰好体现了变化越来越快的本质。1969年7月20日，在轨道卫星成功绘制月面图后，人类第一次踏上了月球。这也是美国载人飞船“阿波罗11号”的任务之一，它由巨大的运载火箭“土星5号”发射至太空，6亿人通过电视直播观看了登月过程。1968年12月，执行“阿波罗8号”任务的宇航员们是首批看到地球从月球上升起的人类。

无人驾驶也有着重大意义。1975年，两艘“海盗号”探测器为寻找生命登陆火星，但没有任何发现。1977年，美国发射的“旅行者号”探测器从外行星传回图片。壮观的图像被转化为无线电信号并以光速发回地球，比如1989年采集到的海王星图像。1990年，哈勃太空望远镜搭载升空，天文学家得以接收到关于遥远星系的更优质图像。自20世纪90年代人类发现第一颗太阳系外行星之

后，又有数千颗外行星相继被发现。

人类探索月球、行星和恒星的能力大幅提升，但许多小说和电影中描绘的革命性发现并未出现，如电影《2001太空漫游》（1968年）和《异形》（1979年）。《星际迷航》和《星球大战》等系列电影大受欢迎，体现了人们对外星人的浓厚兴趣，以及将其等同于人类来看待的意愿。

理解物质

借助当前和未来的技术，尤其是“虚拟现实”技术，一些逼真的表象被创造出来并不难。这些技术能在多大程度上模糊人类对真实和“虚构”或“幻想”景象的感知差异，我们尚不清楚。通过研究物质和宇宙的特质，进而探索时空的相互关系，即空间中的时间流动和时间中的空间存在，一种不同的时空观由此产生，这基于先进的天文学知识、大型强子对撞机（一种先进的粒子加速器）和量子理论的共同支持。量子理论认为，即使相距很远，粒子们也可以“知道”对方的运动轨迹。这为复杂的信息系统带来了一些新设想，比如，信号的传递速度也许可以快于光速（之前人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回到过去也并非是妄想了。由此可见，理论的发展影响了人们对宇宙的理解，并为时空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尽管存在争议，但这些想法似乎把时间和空间重新连接了起来[63]。

结语

人类的未来似乎由两大趋势决定：人口的迅速增长和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地球的生态系统受到了人类活动的广泛影响，这一时代被称作“人类世”。这是一场全球变革，变化在世界范围内同时发生，各个地区之间的关系也将受到影响。

过去一再重演，引领我们走到当下，并为未来设定了环境、标准和动力。一代人认为时髦的东西通常很快就会过时（但并不总是这样）。“现代性”一词倾向于假定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变得越来越现代），并将其视为研究的中心主题和组织原则。现代化进程会破坏过去的多样性，并否定变化过程中的各种可能性。由于这一进程本质上过度关注当下，目的性也过于明确，很可能会误入歧途。近年来，宗教在一些国家可能处于文化的边缘地带，如在中国、西欧和大洋洲。但在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非洲和美洲，宗教却在恢复和发展中，往往伴随着新派别的诞生。与1900年或者更早的时代相比，我们是否应该重视环境恶化和道德沦丧的问题？是否应该正视大多数帝国衰落的原因？是否应该打破一些保守的社会风俗，尤其是女性问题？

现代化可以通过一系列重大变革来实现，比如普及大众读写能力和推进城市化进程。变革主要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而在近代早期的西方，印刷术预示了这些进步出现的必然性，因为与在中国和日本不同，印刷术推动了西方的宗教变革、政治运动以及先进科学知识的广泛传播。正因为如此，现代化始于近代早期的西方，并在19世纪进一步深化，主要归功于工业发展带来的大规模城市化。到20世纪末，全球大部分人都受到了现代化的影响。

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现代化在逐步推进，但地区差异依然触目惊心。印度的经济增长非常迅速，但这个国家仍有大量文盲，实行种姓制度，并极度歧视女性。



印刷术的普及提高了大众的读写能力，并为宗教变革、政治运动和先进科学知识的传播提供了动力。

从19世纪开始，曾经仅存于小说世界里的奇幻经历渐渐步入现实，比如太空旅行。小说情节仍然会引起人们的焦虑，但也蕴藏着时代的希望。创造新人造生命体的想法越发迫切。除了《大都会》（1927年）和《终结者》（1984年）等影片中的类人角色，还有《2001太空漫游》（1968年）中从人类手中夺取控制权的超级智能计算机，这些都成了人类的麻烦。进入2010年以来，人工智能的崛起成为许多人焦虑的根源，社交媒体上也充斥着人们对人工智能会破坏稳定的担忧。

罗纳德·里根在谈及1989年东欧剧变时曾评论：“技术进步将使国家越来越难以掌控民众接收到的信息。”不过，也正是由于技术进步，既有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忠诚与协调能够与迅速发展的联系和需求共存。

如果能通过植入、克隆或仍在发展中的技术实现机械与人体相结合，那么未来人类将拥有处理更多信息的能力，尽管这听起来很困难。20世纪提及的一些构想可能会实现，不过是以一种不同的形式。研究表明，人类的神经系统已经发生改变，大脑迅速适应了电子时代，就像曾经很快适应了印刷浪潮一样。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人类环境的变化都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压力。人类必须学会适应，因为人口增长导致对资源和机会的需求也是压力之一，特别是这些机会和需求将出现在不同的地缘政治中。

人类将不得不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气候变化也会带来重大挑战。不论是个人还是群体，全世界都将面临这一考验。获取充足的资源将会成为主要难题，但正确管理生态系统也同样重要，如此一来，对资源的索求才不至于酿成灾难。这必须在个人欲望和集体规范的取舍中找到平衡，但那绝非易事。理解、决策和执行等方面都可能出现问题。面对近在眼前且必将发生的重大问题，我们希望人类的聪明才智可以应对。

国际合作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几乎没什么实质性帮助。自1945年起，人类在全球或地区层面寻求合作的尝试从未停止过，议题之广前所未有。不过，到目前为止，这项工作收效甚微。现状能否改变并不明朗，且难以预测。人类或许能把现存的问题解决掉，但也有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

[1] 人体所需维生素D的合成需要紫外线的刺激，浅白肤色更易于吸收微弱的紫外线，促进其合成。

[2] 地质时代，地质学专业术语，分为太古代、元古代、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五个时期。

[3] 最早的哺乳动物由似哺乳爬行动物中的兽孔目演化而来。

[4] 鼩鼱一种体形小巧、外貌有点像长鼻鼠的哺乳纲动物。

[5] 根据耐力跑捕食的狩猎假说，早期人类的速度不及其他动物，汗腺的发展允许人类凭耐力追逐无汗腺或汗腺不发达的猎物至其筋疲力尽，从而获取猎物。

[6] 人族，动物分类学的专有名词。根据动物分类学，人科分为猩猩亚科和人亚科，人族属人亚科类下，包括黑猩猩亚族和人亚族。下文提到的人属（Homo）为人亚族类下。

[7] 欧兰猿是在希腊发现的史前人科物种，属于人科下的猩猩亚科。它可能是人类和其他大猿的共同祖先，对此学界尚未有定论。

[8] 一种石器打制技术，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指从石块上打下石片并将其加工成一定形状的石器。

[9] 细石器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多数是为装备骨、木等复合工具的石刃而专门制作的。

[10] 该时期为冰河期内最后一次出现大规模冰盖扩张或者消退现象的时期。

[11] 位于西班牙卡斯蒂利亚-拉曼恰自治区的阿尔瓦塞特省。

[12] 阿杰尔高原，即阿杰尔的塔西利，意为“有河流经过的高原”，是撒哈拉沙漠边缘的一处高原。

[13] 安纳托利亚半岛，又名小亚细亚，是亚洲西南部的一个半岛。

[14] 斯基泰人，是公元前8—前3世纪生活在中亚和南俄草原上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族的游牧民族，擅长养马。

[15] 河水的泛滥为土地带来一层肥沃的淤泥，是精耕农业得以发展的

基础。

[16] 上埃及（Upper Egypt），指埃及南部地区，包括开罗南郊以南直到苏丹边境的尼罗河谷地，主要是农业区。埃及在地理上分为南部的上埃及（即河谷地区）和北部的下埃及（即三角洲地区）。

[17] 莎草纸，是古埃及人广泛采用的书写介质，它用当时盛产于尼罗河三角洲的纸莎草的茎制成。古埃及人创制了大量的纸草文献。

[18] 近东，早期近代西方地理学者以“近东”指邻近欧洲的“东方”，泛指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包括非洲东北部和亚洲西南部，有时还包括巴尔干半岛。目前在国际上“近东”一词已比较少用，一般用在文明史上。

[19] 汉谟拉比颁布了《汉谟拉比法典》，在现代被誉为古代立法者。《汉谟拉比法典》是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民法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具有系统的法典，刻写于一块黑色的玄武岩上。

[20] 新亚述帝国，也称亚述帝国，是亚述历史的第三个时期，前两个阶段为早期亚述时期和中期亚述时期。

[21] 吠陀时代，雅利安人侵入印度后的史料主要保存在《吠陀》中，以及解释《吠陀》的《梵书》《森林书》《奥义书》和两部史诗中，故被称为吠陀时代。

[22] 中美洲，指包括墨西哥、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伯利兹等这些现代国家在内的区域。

[23] 疏林时代，也叫伍德兰期，指称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11世纪之间美国中东部地区前哥伦布时期的古代印第安人文化。

[24] 迈锡尼文明（公元前1600—前1100年）是希腊青铜时代晚期的文明，它由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迈锡尼城而得名。

[25] 儒略历是由罗马共和国独裁官尤利乌斯·恺撒采纳数学家兼天文学家索西琴尼的计算后，于公元前45年1月1日起执行的取代旧罗马历法的一种历法。

[26] 德尔斐是一处重要的“泛希腊圣地”，即所有古希腊城邦共同的圣地。这里主要供奉着“德尔斐的阿波罗”，著名的德尔斐神谕就在这里颁布。

[27] 库迈是古希腊在意大利本土的第一个殖民地。

[28] 羁縻政策，指一边用军事和政治手段加以控制，一边以经济利益给予抚慰的地方统治政策，始于秦汉。

[29] “放羊式”管理，指权力下放的管理方法。

[30] 大宛，古代中亚国名，位于帕米尔高原的西麓，今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一带。

[31] 滇国（公元前278—前109年），是中国西南边疆古代少数民族的部落，疆域主要在以滇池为中心的云南中部及东部地区。

[32] 萨赫勒是非洲北部撒哈拉沙漠和中部苏丹草原地区之间的一条长超过3,800千米的地带，从西部大西洋伸延到东部非洲之角。

[33] 萨迪斯，吕底亚王国的首都。

[34] 印度次大陆，包括印度和南亚在内的地区。由于其受喜马拉雅山的阻隔，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但面积又小于通常意义上的洲，所以称为次大陆。因为印度和巴基斯坦是南亚的主要大国，也被称为南亚次大陆或印巴次大陆。

[35] 指屋大维、马克·安东尼和雷必达三人，史称“后三头同盟”。

[36] 南方大陆，最早由亚里士多德提出，并由托勒密进一步扩展，他相信印度洋就位于南方大陆的附近，因为这样才能与北半球的大陆达成平衡。

[37] 白匈人，一般指嚈哒，是古代生活在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

[38] 新英格兰，位于美国本土的东北部地区，濒临大西洋、毗邻加拿大的区域。

[39] 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灭亡后，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迎娶了拜占庭帝国末代皇帝的侄女索菲娅公主，宣布成为东正教的保护人。

[40] 法兰克王国被一分为三，查理曼的三个孙子各自为王。东法兰克王国成了以后的德意志，西法兰克王国成了以后的法兰西，东、西之间的地区则成了以后的意大利。

[41] 此处指神圣罗马帝国，即德意志第一帝国（962—1806年），1157年改名为神圣罗马帝国，前身是东法兰克王国。

[42] 哥伦布错将发现的美洲大陆当成了印度。

[43] 汉萨同盟是德意志北部城市之间形成的商业、政治联盟，于13世纪逐渐形成，14世纪达到兴盛，加盟城市最多时达到160个。

[44] 毗诃罗即僧院、精舍之意。梵语原义指散步或场所，后来转为指佛教或耆那教僧侣的住处。

[45] 圣塞巴斯蒂安（256—288年），天主教圣徒，在公元3世纪基督教遭迫害时期，被罗马皇帝戴克里先杀害，后被尊为圣人。

[46] “小冰河期”指的是相对而言较冷的时期，始于13世纪，在17世纪达到巅峰。地球气温大幅度下降，使全球粮食大幅度减产，但比主要毁灭大量动植物生命的冰期要暖和。

[47] 墨卡托投影，是一种正轴等角圆柱投影，由荷兰地图学家墨卡托于1569年创立，在地图投影方法中影响最大。

[48] 新教，亦称基督新教，与天主教、东正教并称为基督教三大流派。

[49] 三十年战争，是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成的一次大规模的欧洲国家混战，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全欧洲大战。这场战争是欧洲各国争夺利益、树立霸权的矛盾以及宗教纠纷激化的产物。

[50] 此处指英国胜利后，与法国和西班牙等国签署了《巴黎条约》。

[51] 旧西北部，指美国独立以前的西北领地，包括今美国中西部。美国地理上的西北部一般称为太平洋西北地区。

[52] 维也纳会议是一次欧洲列强的外交会议，目的在于重新划分拿破仑战败后的欧洲政治地图。

[53] 地缘政治，是政治地理学说中的一种理论，将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

[54] 风洞，即风洞实验室，是以人工的方式产生并且控制气流，用来模拟飞行器或实体周围气体的流动情况，是进行空气动力实验最常用、最有效的工具之一。

[55] 人民阵线，是欧洲反法西斯政党联盟。在西班牙，是由西班牙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工人党、工人联盟、巴斯克人、加泰罗尼亚人和无政府主义分子等组成的。

[56] 闪电战，是一种充分利用飞机、坦克和机械化部队的快捷优势，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制敌取胜的战术。此战术对后勤依赖性非常高，一旦汽油和弹药及粮食供应不上，就会遭遇失败。

[57] 相互保证毁灭，是指对立的两方中如果有一方全面使用核武器，则两方都会被毁灭，被称为“恐怖平衡”。

[58] 指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出任印度总理期间。

[59] 滴滴涕，即二氯二苯三氯乙烷（Dichlorodiphenyltrichloroethane，俗称DDT），是世界上最知名的杀虫剂，一度被视为灵药，但由于它对环境造成的长久性污染，一直备受争议，目前已被禁用。

[60] 酸沉降，指大气中的酸性物质以降水的形式或者在气流作用下迁移到地面的过程，包括“湿沉降”和“干沉降”，酸雨就属于湿沉降。

[61] 碳汇，是指通过植树造林、森林管理和植被恢复等措施减少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过程、活动或机制。

[62] 美国的阳光地带，这一概念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一般指北纬30°以南的地区，大致范围是：西起太平洋沿岸的加利福尼亚州，东到大西洋沿岸的北卡罗来纳州，北至密西西比河中游，南到墨西哥沿岸的一个区域。早期因其低廉的房价、丰富的能源和农业资源吸引了大量的人口迁入，从而形成了美国三大工业区之一的南方工业区。

[63] 在牛顿的时空观中，时间和空间是彼此独立且绝对的存在；爱因斯坦彻底革新了人类的时空观，指出时间和空间的三个维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时空并非绝对的，是可以弯曲的。



未读 Club

为读者提供有温度、有质量、有趣味的
泛阅读服务



专属社群 独家福利
精品共读 活动特权

手机扫码
加入未读 Club 会员计划


花

目录

版权信息
引言
第一章　树木的日本史
一　森林孕育出的日本古代文化
日本的文明与森林一起开始
巨柱中所包含的绳纹人的思想
植栽神话与森林保护
二　巨大的木造建筑与工匠的技艺
巨大的木造建筑：出云大社与法隆寺
对树木了如指掌的工匠的技艺
热爱四季树木的日本人
三　树木奇谈与松国日本
被巨树救下一命的圣德太子
良辨杉与暗杀实朝事件中的银杏
松树和日本人以及行道树
第二章　虫子的日本史
一　喜爱虫子的国家——日本
被神武天皇称为蜻蜓之国的日本
捕虫与“物哀”
卖虫为生的江户人
二　万古不变的虫与蝴蝶的梦
令古代人为之疯狂的常世虫
蝴蝶的图案与蝴蝶的家纹
庄周梦蝶与蝴蝶舞
大紫蛱蝶与冻蝶
三　养蚕与养蜂的历史
支撑日本经济的蚕与生丝
讲述养蚕起源的金色姬与蚕神
蜜蜂与养蜂的历史
关于昆虫的谚语
四　昆虫以外的虫子
日本人心中的“虫”
为何蜘蛛会被讨厌？
蛇与蜈蚣的竞争
第三章　花的日本史

一　樱花与梅花的国度——日本
作为国花的樱花是日本的固有品种吗？
木花之开耶姬与衣通郎姬
俘获万叶人之心的梅花与菅原道真
花盗人与吉野樱
二　花的精神与赏花之宴
从《风姿花传》看花之心
花道的精神与其历史
五节供与花
“醍醐花见”与“长屋花见”
三　四季的花历
一月之花·水仙的故事
春之花·太田道灌与山吹之里
百花之王牡丹与小野小町的芍药
初夏之花·梅雨之花
盛夏之花与黑百合传说
晚夏之花与秋之七种
菊花以及晚秋初冬之花
第四章　鸟的日本史
一　“记纪”神话与鸟儿
岁月与时间的见证者——野鸟
国生神话与鹡鸰
天若日子的悲剧与白鸟传说
救了神武东征的乌鸦与鵄
二　莺与杜鹃鸟的传说
黄莺报春
中国古代传说中的杜鹃鸟
往来于冥界的古恋鸟
三　鸟的智慧与传说中的鸟
会模仿的鸟与会唱歌的鸟
《伊势物语》与都鸟
影响战役的鸟与怪鸟“鵺”
四　鹤与雀的日本史
花鸟画中被奉为神鸟的仙鹤
既是害鸟又是益鸟的麻雀与民间故事《舌切雀》
麻雀的谚语和鸟啼叫声的比喻
第五章　风与云的日本史
一　四季的风
菅原道真的悲剧与各式各样的春风
熏风送香的初夏之风与带来灾害的山背风以及风祭

思物的秋风以及折木断草的秋季寒风
各种寒冷的风
二　神风与风土
保护日本不受蒙古军队侵略的超大型台风
从“神风护国”到以神风特攻队自我毁灭
季风孕育的季风型风土与风景
关于风的种种
三　四季的云和出云的神话
云蒸霞蔚的春季云彩与“鸟昙”和“鰊昙”
夏、秋、冬的云
八云耸立的出云国神话以及云龙、云水
第六章　太阳和月亮、星星的日本史
一　太阳神话和名月观赏
“记纪”神话中的太阳神天照大神
神武东征神话与天日矛传说
月满月缺与赏月
辉夜姬与望月的忧愁心
二　七夕传说与北斗星
夜空中闪耀的星座与星星的传说
七夕的牵牛星与织女星
北斗七星、不动之星——北极星、妙见信仰
“夜这星”与“西乡星”
第七章　雨和雪的日本史
一　四季的雨和梅雨
从早春之雨到五月雨
不信祈雨的平清盛与虎雨
晴天娃娃、蓑笠与秋冬之雨
利用梅雨作战的织田信长
二　美丽的雪与恐怖的雪
雪赐予人类的恩惠及雪的名称
研究雪片的大名与记录雪国生活的文人
雪童子与雪女
翻越阿尔卑斯雪山的战国武将与八甲田山的死亡行军
第八章　鱼贝类的日本史
一　富饶的大海与绳纹人
资源丰富的海涂
死海化的谏早湾
从鸟滨贝冢看绳纹人与渔捞
污染的河川与被现代人“杀死”的大海
二　神话中的鱼

文献中最早出现的鱼贝类——水母
女性的象征——赤贝与蛤蜊、鲈鱼
被天宇受卖割嘴的海参
以鲇鱼占卜的神功皇后
三　江户的垂钓与观赏鱼
以垂钓为乐趣始于江户时期
《生类怜悯令》
女性的垂钓
金鱼传自中国、锦鲤为纯日本产
四　鱼的岁时记
点缀早春夜晚海面的“白鱼渔”
江户人热衷的“初鲣”与“土用鳗”
鰯是紫式部的最爱？
冒死吃河豚
五　大型鱼的日本史
鲸鱼的味道
欧美的捕鲸史与《白鲸》
日本的鲸鱼捕捞
第九章　动物的日本史
一　改变历史的马
迁入古代日本的骑马民族
“记纪”中的马与“田畑荒”的传承
拒绝了“去势文化”的日本人
日本没有马车的原因
二　自太古时期起就是人类朋友的狗
两万年前就开始与人类生活的狗
“记纪”神话中的狗
对狗来说很残忍的“犬追物”与斗狗
《生类怜悯令》及与狗有关的谚语等
三　猫与老鼠的日本史
猫传入日本始自奈良时代
化猫骚动记与招财猫
在西洋被嫌弃在日本却被视为能带来财富的老鼠
《鼠净土》与义贼鼠小僧
四　山里的野兽
既是食物、药材也是信仰对象的猴子
与猴子有关的民间传说
熊肉料理
与人关系最亲密的鹿
五　虚构的动物

有害却被人们喜爱的河童
腾空呼风唤雨的龙
对日本人来说最可怕的鬼
后记
文库版后记
返回总目录

版权信息

花鸟风月日本史
KACHO FUGETSU NO NIHONSHI
作者：[日] 高桥千剑破（Takahashi Chihaya）
译者：曹倩
出品方：未读·文艺家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Copyright © 2011 TAKAHASHI CHIHAYA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AWADE SHOBO SHINSHA Ltd. Publishers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0 by United Sky

(Beijing) New Media Co., Ltd.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WADE SHOBO SHINSHA Ltd. Publisher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pei.

引言

日本的文化传统，正是根源于“花鸟风月”四个字所象征的、在四季中交织的美丽自然。

日本是世上为数不多一年四季自然变化极为丰富的国家。不变的山川草木根据季节的变化展现出千姿百态。风，吹来季节的变化；雨雪，滋润着大地。日本人在这般美丽富饶的自然环境中创造了历史，也孕育出文化。自古以来，不论是物语、诗歌这样的文学作品，还是绘画、雕刻等美术作品，都会约定俗成般地展现花鸟风月。但是，这一传统如今似乎渐渐被遗忘了。甚至在文学的世界中，这种传统也只是好不容易才在俳句的季语中保住了命脉。

日常生活中，我已很久没有走过土路了。

而小时候，路大多是土路。

以前，冬天走在路上时，会故意去踩路边的霜柱。上学途中，还会把路面上的那层冰跺出裂纹。

春天到来，冰霜融化后，道路很是泥泞，木屐的屐齿里往往满是泥巴，所以走路时还要拿根小棍，时不时把木屐底的泥巴清理一下。有时为了把木屐底下的泥弄掉，还会去踢路边的小石子，结果有一次竟把木屐给踢坏了。但是，春天走在路上，实在是心旷神怡，能闻到春的味道，嗅到细嫩青草的气息。

尽管款冬花已经发芽，但偶尔吹来的风还是会让人感受到尚未消散的冬意，而这时婆婆纳开始开出蓝色的小花。艾草遍地发芽，笔头菜也开始露头。渐渐地，终于能在路边看到野芝麻、荠菜、堇菜，还有连钱草和野豌豆了。田埂的蒲公英开了花，田地里满是紫云英。曾经这样的风景随处可见，而如今在城市近郊，这般春日景致都消失无踪了。

夏日里我经常光脚出门。路边总能看到盛放的牵牛花和虎杖花。还有车前草，不论怎么踩来踩去，它就是能霸道地趴在地上继续生

长。我偶尔会走上大马路，至今还能记起柏油路面滚烫难耐、自己寸步难行的感觉。

如果是光脚走路，还是土路走起来最舒服。这样想来，从人类诞生于这个地球直至今日，赤脚行走的时间要长得多。

秋天，狗尾草和狼尾草可谓野蛮生长，而日语里别名“赤饭”（アカマンマ）的一种药草——马蓼，亦俯拾皆是。地榆之类的植物更是像地毯般铺满附近的堤坝。野生的菊科小花肆意地在田间地头绽放。但如今，五颜六色的野花海洋和大片的芒草旷野，在大都市中早已成为遥远的记忆。

我现在住在埼玉县浦和市（现埼玉市）郊外的见沼田圃附近，在广阔的田野间纵横交错的田间路，如今基本上被铺修成柏油路，以前能钓到小鲫鱼或小麦穗鱼的见沼水沟，现在已用水泥重新砌筑，成了一条“没有生命”的水渠。斜坡林地的面积也在急剧减少。

如今，春夏秋冬依然轮回交替，但我们对于季节变换的感受却越来越迟钝。一整年下来，店里都可以售卖同样种类的蔬菜，就连鱼的售卖，也由于冷冻技术的提高，季节感越发淡薄。也就是说，我们正在抹消“时令”。

住在城市里的现代人丧失了季节感，忘却了美好的花鸟风月。曾经每一个日本人都理所当然地了解、熟悉的知识和感受，却正被现在的我们丢弃。

虽然如何应对高科技文明以及完全掌握电脑的使用，都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但是，希望大家不要忘记日本人应该延续下去的、跨越千年孕育出的花鸟风月精神和文化上的感性，因为这也是留给未来日本的一份重要遗产。

日本的环境现已遭到破坏，毫无疑问，我们身边日常的自然环境正走向恶化。而更可怕的是，我们正渐渐丢掉积累了上千年的文化感悟力。

大自然比它看上去的更加坚强。不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会努力不断地顺应环境的变化。当然，很多动植物因环境恶化而失去了它们的家园，在城市里再也看不到它们的身影了。另外，在城市里找到新的居所，开始繁衍生息的鸟类与昆虫也不在少数。从整体来看，日本在世界上仍可谓为数不多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的国家。

但是，现在有多少人通过鸟儿的啼鸣感受季节，有多少人喜爱昆虫的鸣叫呢？又有多少人在风中捕捉四季的气息，通过雨的种类感受时节呢？

顺便一提，我们日常生活中看到的鸟大多是候鸟或漂鸟。什么时节什么样的鸟会飞来，它们何时会发出啼鸣声，又如何鸣叫——这些恐怕在以前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而我相信直到不久前，很多人也是知道的。这里的“很多人”不是指野鸟或自然爱好者，而是指普通人。

喜欢昆虫的鸣叫声可以说是日本人独有的情感。欧洲人在多数情况下将虫子的叫声视作噪声。过去的日本人会在秋季的漫漫长夜中欣赏昆虫的鸣叫声，有人甚至会为了听蟋蟀的叫声，专门跑去荒山野岭。一直以来，这些感受大自然之声的行为在很多日本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但如今，又有多少人能够区分出不同昆虫的鸣叫声呢？

日本亦是风之国。表示“风”的日语说法远超百个。“东风”化雪迎春，“野分”乃二百十日至二百二十日前后吹来的秋季大风[1]，“木枯”则为从晚秋吹到初冬的北风。虽然现在人们应该也都知道这些，但已经很少有城市里的人会通过肌肤感受吹来的风，判断季节的变换了吧。

表示雨的日语说法也有上百个。日本亦可谓雨之国。不同时节会下起不同类型的雨：冰雨、春雨、菜种梅雨、五月雨、梅雨、骤雨、夕立、霖雨、时雨等，数不胜数。

如果我们丧失曾经每一个日本人都拥有的感性和知识，那么我们今后会难以理解自己国家的古典和文艺。

日本是少数一直在追求与大自然共生共息的国家，至少一百年前仍是这样。日本人不仅从海洋和群山中获得了山珍海味作为食粮，同时也养育着这些自然界的美味食物。曾经的日本人在捕鱼时只捕捞所需的量，采摘山中美味时也绝不过度，若要伐木，必会种上新苗。

如今，我们必须学习先人的这种智慧，一切还来得及。现在的我们应该重新回顾历史，向祖先学习如何与大自然友好共生，如何在大自然中培养丰富的文化感性。

那么，接下来，请谅解我多少带些独断和偏见的言论，让我们一起出发，踏上探寻“日本人如何与自然相处”之答案的内心旅程吧。这趟文字旅程有您相伴，本人不胜荣幸。

第一章

树木的日本史

一　森林孕育出的日本古代文化

日本的文明与森林一起开始

由于石器时代、绳纹式土器时代、弥生式土器时代这样的时代划分，以及青铜器文明、铁器文明等术语，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忽略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在古代人所使用的道具或器具中，木器远比石器或土器多得多。木文化、木文明才是古代日本的载体，而且这种文化与文明一直延续至今。

古代遗留下的物件中甚少出现木制品或木器。这是因为比起石器、土器和青铜器等器具，木器作为遗留物难以保存。木头会在土中变成腐殖质，最终成为土壤的一部分。因此，木器出土比例少并不代表古代人不使用木器，这点自不必多说。

可以说，如果没有树木给予的恩惠，日本文化便无法成立。不谈树木，日本的历史也就无从谈起。

日本是一个森林之国。

日本作为岛国，四面环海，所以乍看之下宛如一个海洋之国，但其实日本文化的源头并非海洋文化，而是树木文化。在遥远的古代，日本列岛的居民大多住在森林里。住在海边、以海为生的人其实也受惠于树木。山林中繁茂的树木和海洋密切相关，这点尽人皆知。山里的树木若遭到破坏，海洋也会随之失去活力，海藻无法生长，鱼贝类也会减少。海洋是依靠森林呼吸的。

日本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树木再生率极高的国家。草木葳蕤生长的初夏，梅雨到来，充分滋润着大地。秋季，果实成熟前，又会再次迎来秋霖的洗礼。冬季，群山被厚厚的积雪覆盖，雪慢慢渗透到土壤中，成为地下水，最终汇入河川，唤醒春芽。日本的气候与风土温暖湿润，极其适合树木的生长和再生。

尽管随着土地开发不断推进，现在平原地区基本已城市化，但综览世界，日本仍是一个水资源丰富、草木欣荣的国家。坐飞机时从高

空俯瞰日本，就会发现它是个绿意盎然的岛国。

绳纹时代，日本列岛的森林覆盖率远高于现在。据称自绳纹时代中期开始，随着气候变暖，西日本以橡树、米槠等常绿阔叶树为主，照叶树林带的范围逐渐扩大；而从北陆、日本中部地区到东北地区，则多为枹树和栗子树等构成的落叶阔叶林。

绳纹时代的日本人与森林共生，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孕育出了日本文化的源头。

青森市发现的三内丸山遗迹，展现了约五千五百年前至四千年前的一千五百年间绳纹时代人类的生活形态，可谓划时代的重大遗迹。在这个约三十五公顷的巨大遗迹内出土了体积庞大的遗物，还找到了巨大的柱根和诸多工具类的木制品。整个三内丸山遗迹让我们得以管窥绳纹时代的人类生活及文化，也大幅刷新了人们对绳纹时代的认知观念。

根据1992年—1995年间的发掘调查结果，三内丸山遗迹共发现了约五百八十栋竖穴式建筑遗迹、约一百栋掘地立柱式建筑、约一百个土坑以及近千座坟墓等。除了绳纹时代的土器、陶俑和石器，还出土了约四万箱骨角器、动物遗体以及木制品等。然而这些被挖掘出来的遗迹并非全部，仍有很多遗迹和遗物埋藏在地下，尚未被发现。

根据发掘出的居住遗迹的构成来看，很可能在某个时期，有多达五百人生活于此，无论怎么看，这都是一个小型的城市遗迹。无论经历了何种兴盛衰败，在一千五百年的漫长岁月中，绳纹人一直在这里群居着。所以绳纹人并不如人们之前所说，是为了获得食物而具有流动性的原始狩猎采集群体。通过这个遗迹，我们能清楚地了解到，绳纹人用树木搭建房屋的建筑技术和加工技术其实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他们拥有优秀的技艺，或者更准确地说，拥有优秀的文化。

巨柱中所包含的绳纹人的思想

人们在三内丸山遗迹的台地边缘发现了一个直径2米、深2米的巨大柱洞。列成两排的六个柱洞中，有四处留下了直径约1米的木柱根。所采用的树种为栗子树。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柱根周围和底部都被烧焦，这应该是为了防止木材腐朽而故意为之的。每根柱子之间的距离都是4.2米，由此可知，绳纹人很可能已经知道如何运用长度单位了。

从直径1米的栗木柱根可以推断，这些巨大的柱子高10米以上，最高可达20米。也就是说，可以猜想，这些柱根是巨大的多层木造高架屋的遗址。在铁器还未出现的那个时代，绳纹人究竟是如何砍伐巨树的呢？由于这些柱子都稍稍向内侧倾斜，大致可以推断上面盖的是屋顶，但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建筑还无从得知，也不清楚这些建筑到底是为何而造的。但毋庸置疑的是，绳纹人在那时已经拥有了一定程度的木材加工技术。

有些说法称这些遗迹或许并不是有屋顶的建筑，而仅仅是祭祀用的朝天柱。位于石川县能登半岛的绳纹遗址“真胁遗迹”中发现了整齐排列的巨大木柱根，这些木柱根是由直径约1米的栗木一切为二得来的，人们猜测这里是祭祀场所的遗迹。如此看来，三内丸山遗迹的柱列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

在长野县的诹访大社，每到猴年和虎年，人们都会举办“御柱祭”这一著名的祭祀活动。在这一传统祭典上， 人们会采伐巨大的木材作为神柱，将神社四角的旧柱子替换掉。

那么，为什么要建造柱子呢？对此，自古以来便众说纷纭且并无定论，最有影响力的说法是：这些柱子是神灵降临时附身的对象，换言之，连接天地的桥梁便是这些柱子。连接河川两岸的桥梁在日语中写作“橋”，将食物与人类连接起来的筷子在日语中叫作“箸”，而连接天与地的柱子在日语中叫作“柱”，有说法认为这三个词其实本是同一语源。[1]它们虽有大小之分，但均用木材制作，且对于日本人来说是无可替代的物品。

特别是柱子，它具有非凡的意义。正是通过柱子的建造，日本的建筑文化才得以开始。而这些柱子作为连接天地的一个象征，在日本人的精神史上同样意义深远。显然，绳纹人对此早已了然于胸。

总之，这些巨大的柱根可谓绳纹人曾拥有高度发达的精神文化的一个证据。

人类的寿命不过数十年，鲜少超过百岁。但树木却可以活数百年，有些树种还能千年不死。甚至有的树能像屋久岛的绳纹杉那般，已拥有数千年的树龄，直至今日依然顽强地活着。屋久岛的杉树中那些树龄在三千年以下的，则不能被称为绳纹杉，只能叫“小杉”。在《日本书纪》中，可以找到推古二十四年（616年）掖玖人（屋久岛居民）归化入大和朝廷的记载，但绳纹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比那时更加遥远的绳纹时代，并且仍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延续着生命。

日本古人将古树视作有精灵寄宿的神树，所以自然可以说，这些巨大的木柱寄托了那时的人们对神灵的信仰。

在三内丸山遗迹的村落遗址周边，有规模极大的栗树林遗迹。专家推测这里是绳纹人栽培、管理过的栗树林的遗迹，并根据栗树果实的DNA鉴定结果确证了这片栗树林并非天然林，而是经过人为地反复栽培，打理而成的人工林。绳纹人精心养护着这些为自己的生存提供食物的树木。除了栗树和胡桃树，这片遗迹中还确证存在着山葡萄、软枣猕猴桃、木莓、接骨木等植物种子。

此外，三内丸山遗迹还出土了许多木制品，比如用来挖掘洞穴的木棒和木板，以及木浆、木盆，甚至还有漆器和用树皮编制的像小挎包一样的东西。除了出土的这些器物以外，毫无疑问，这里使用过大量的其他木制品。对于绳纹人来说，树木不仅是建筑材料或舟、船的板材，同时也是燃料。可想而知，树木给予人的恩惠是无比巨大的。

至今为止，人们对于绳纹人的印象有：制作绳纹土器，堆砌贝冢，在洞窟或竖穴居住，以狩猎或捕鱼为生。他们的头骨或其他骨骼与其后登上历史舞台的弥生人、古坟人的骨骼有着明显的不同，曾经有一段时期，人们并不认为绳纹人是现代日本人的直系祖先。但是，到江户时代为止的日本人的骨骼与明治以后近代至现代的日本人的骨骼也明显不同，由此可知，若文化上出现划时代的改变，生活方式及饮食的变化都会导致体形和骨骼随之发生变化。进入弥生时代，即便随着日本西面的先进文化的传入，外来人口大量涌入日本列岛，也并不意味着绳纹人就消失了。通过不断混血和对新文化的接受，人们的生活形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也造成了身体上的变化。

绳纹人早已在与森林共生的同时过上了群居生活，甚至创造出了可被称作“木器文明”的文化。绳纹人正是现代日本人遥远的祖先，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顺便一提，位于福井县三方町(2)的鸟滨贝冢是具有代表性的绳纹遗迹之一，这里因出土了大量的木制品而闻名，人们在这里确认了以下十六种被用于制作木制品的树木：交让木、米槠、杨桐、楮树、野山茶、栗树、榧子树、橡树、松树、枫树、杉树、桧树、山桑、七叶树、榉树、红楠。

植栽神话与森林保护

根据“记纪”[2]神话，在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二神生下了日本列岛

之后，又生下了海神与川神，随后生育了木神久久能智以及草神野槌（草野姬）。自此，日本列岛开始有了山川草木，这片被称作“苇原中国”的国土也得以成形。也就是说，日本国土诞生的同时，草木也随之生长。在《日本书纪》卷二《神代下》中便有记载：“磐根、木株、草叶，犹能言语。”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即使是在神话世界中，国土的诞生也必须同时伴随着树木的出现，而且那些树木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记纪”向我们展示了古代人与树木间精神交融之深，甚至流传下来了与之相关的神话。

据《日本书纪》的《神代上》，素戋呜尊被放逐出高天原后，和其子五十猛一起带着树木的种子从天而降，并将这些种子播种在各地。而另一处则描述说，素戋呜尊的胡子长成了杉树，他的胸毛成了桧树，臀部的毛变成了土杉，他的眉毛成了樟树，素戋呜尊将杉木和樟木用作造船的板材，将桧木用于建造宫殿，并将土杉作为制作棺材的板材。

虽然不清楚素戋呜尊的植栽神话反映的是哪个时代，但总归应是在弥生时代中的公元元年前后。对弥生人来说，用于建筑、造船甚至制作棺材的木材是必不可缺的。从当时的人们认为这些树木都是上天赐予的宝物这点，我们就能解读出时人对树木的崇敬之情。而这毫无疑问与来自遥远绳纹时代的记忆一脉相承。

根据《万叶集》中记载的藤原宫兴建时工人所唱的歌谣，桧木的原材料是从田上山(3)砍伐得来，并通过河川运送的。

藤原宫建于持统八年（694年），是持统、文武、元明三代天皇所用的大宫殿，位于奈良县橿原市。当时修建这座宫殿，想必需要巨大的桧木材料吧。但是，主要在飞鸟时代发达起来的苏我氏家族和古代天皇家族恐怕已将附近上好的桧木砍伐光了，所以才不得不从远处位于宇治川上流的田上川运送木材。那时，日本人已经开始破坏环境。其后，奈良平城京的建造与京都平安京的建造都大量使用了木材。

虽说如此，但帝都周围并没有变成一片荒凉的秃山。这除了与此地的气候适合树木或其他植物的再生与繁殖有关外，也得益于日本人睿智地保护着森林中的树木，使之得以再生。

山国乡是位于京北地区的一大片山林地带，据说，朝廷从这里采伐了平安迁都所用的木材后，派遣了三十六人定居于此，这三十六人

随后发展出八十八家，他们住在这里管理这片森林，并支援了皇室的经济。这三十六人就好比现在的营林署，八十八家便是营林署职员。砍伐掉树龄达二百年的树木后，即便再种上新的树苗，待其长成之前那般的大树，也需要二百年时间。这对于人类来说，是一项需要延续数代人的工作。但是，日本人千年以来正是如此坚持着对森林的保护和培育。

并不仅是朝廷，寺庙和神社一直以来也承担着管理森林、栽培树木的职责。神社镇守的森林、寺庙后山苍郁的森林又或是院内亭亭玉立的古树，都曾是用来建造或修复寺庙、神社的木材，却并没有被砍伐殆尽，反而酝酿出了寺庙及神社内浓厚的宗教氛围。自绳纹时代以来，古树繁茂的森林对日本人来说，就是与各路神灵相会的场所，也是使内心平静的场所。

伊势神宫的“式年迁宫”每二十年举行一次，每逢迁宫之年，便会依照原型营造新的社殿，并重新架构一座神桥。

正如一千多年前建造的法隆寺一直保存至今一样，从古时起，人们应该就能建造出可以永存的社殿。伊势神宫却偏偏不使用基石，而采用了“掘立柱式”[3]结构、茅草屋顶和桧木原木打造宫殿，并且长期以来每二十年重建一次，这又是为什么呢？

对此，人们的观点各异，其中一种说法认为，这是前人的一种智慧，如此一来就能使建造宫殿的工艺代代相传了。如果重建宫殿的间隔时间超过二十年，便很难让后人继承这项技术。托前人的福，直至今日，我们依然知晓自弥生时代以来的，或是更古老时期的神社建造的样式与方法。

日本的木造建筑技术因圣德太子主持的大规模寺院修建而取得了飞跃。这种技术是由从朝鲜半岛移居至日本的工人团体带来的。

但是，在很久以前，日本人的祖先就已经开始使用巨大的木材建造高层建筑物了。平安时代之前便已存在的出云大社据说是一个高度在45米以上的巨型高层建筑。与圣德太子之后的寺院建筑不同，出云大社是一座或许能上溯至绳纹时代的日本特有的建筑物。

无论如何，由树木孕育出的文化在以建筑为首的方方面面得以绽放，为历史增添了光彩。

二　巨大的木造建筑与工匠的技艺

巨大的木造建筑：出云大社与法隆寺

日本的树木之多，世上少有。一直以来，日本人利用树木建造了各种各样的建筑物。日本传统的建筑物全部是用木材建造的。其木造建筑技术可以说已登峰造极，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早在千年以前，日本的木造建筑技术就已经达到了极高水准。

天禄元年（970年），源为宪创作的《口游》中有一篇关于大屋的文章，其中便有“云太、和二、京三”这样的文字。“大屋”指的就是高层建筑物。其中“云”为首，“和”为次，“京”排第三。这里的“云太”指的是出云国城筑明神的神殿（出云大社本殿），“和二”指的是大和国东大寺的大佛殿，“京三”指的是京都的太极殿。

也就是说，通过《口游》这本书我们能了解到，直到平安时代中期，出云大社都是日本最高的建筑物。至于它到底有多高，因为东大寺大佛殿顶高十五丈（约45米）(4)，所以出云大社的高度一定在其之上。即便假设出云大社高十六丈，那也相当于现在十几层大楼的高度了。

随后，经过镰仓时代的重建，出云大社规模被缩小，而后又经历了数次重建，才呈现出我们如今所见的样貌。

我们现在已无从得知出云大社究竟是何时建造的了。在《古事记》中关于大国主神让国的记载里，出现了“建造的宫殿仿照天神的宫殿，将粗柱笔直地插入地里，千木[4]高耸入云”这样的描写。在《日本书纪》记载神代天孙降临的篇章中，这个宫殿被称为“天日隅宫”。《出云国风土记》中也记载了依照天神的构造建造天日栖宫的故事。此外，《古事记》有关垂仁天皇的部分也出现了出云大神宫、出云的石硐曾宫。这些描写均被认为是指出云大社。

从“记纪”的记载中虽然无法确定出云大社的建造年代，但是在弥生时代，这个巨大的木造建筑应该已经实际存在了。可以说，弥生人使绳纹人连接天地的“柱”之思想更加具体了。

出云大社就先说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说说日本现存的世界上最古

老的木造建筑——法隆寺。

《法隆寺金堂药师如来像光背铭》上记述了该寺乃于推古天皇十五年（607年）由圣德太子完成。先不说这篇铭文是否正确，在《日本书纪》推古十四年的条目中，记载着将播磨国的水田献给“斑鸠寺”的内容，所以这座寺在七世纪初就已建立的说法可信度最高。而“斑鸠寺”（亦称鵤寺、伊可留我寺）正是法隆寺的别名。

但同样在《日本书纪》关于天智天皇九年（670年）四月壬申（30日）的那一条中，却记载着“夜半之后，灾法隆寺，一屋无余，大雨雷阵”，说明法隆寺遭遇了灾害而被损毁。明治二十年代（1888年—1897年）兴起的有关法隆寺是否重建过的争论，正是因这段记载而起。之后在昭和十四年（1939年），人们对若草伽蓝[5]进行了发掘调查，结果证明法隆寺曾被烧毁，其后又在稍偏西北的位置重新建造。根据之后的研究可知，法隆寺重建的年代最早不超过天武、持统朝（673年—697年），最迟不过和铜四年（711年）。即便如此，现存的法隆寺也经历了将近一千三百年的历史，依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木造建筑。

若是直面法隆寺的金堂和五重塔，定会被其厚重的木结构所折服。回廊的圆柱等巧妙设计与精湛工艺令人赞叹不已。基于此，人们能充分、切身地感受到，其木造建筑的技术水准已经达到了顶峰。

据说，即便现在对法隆寺进行拆解维修，用来承接屋面瓦重量的椽子还是有弹性的，令人不得不为“树木”所具有的强韧生命力而惊叹。

对树木了如指掌的工匠的技艺

近代以来，与建筑相关的手艺人（如木匠、水泥匠等）之间盛行“太子讲”。据传圣德太子建造了四十六所寺庙，因此在寺院建筑方面，人们将圣德太子视作工匠之先祖，而“太子讲”正是基于这种思想的讲义。

自古以来，在圣德太子建造的这四十六所寺庙中，有七所非常有名，分别是法隆寺（位于奈良斑鸠町）、四天王寺（位于大阪阿倍野区）、中宫寺（位于奈良斑鸠町）、橘寺（位于奈良明日香村）、池后寺（位于奈良斑鸠町）、葛城寺（位于奈良橿原市）、蜂丘寺（位于京都太秦）。此外，也有以定林寺（位于奈良明日香村）取代蜂丘寺的说法。不论是哪一种说法，均认可圣德太子在建造寺庙方面的伟

大功绩，而这些寺庙所使用的木造建筑技术也毫无疑问为后世所继承。

继承了这些精湛技术的人正是被称为“匠人”的木匠们。宫殿、帝都以及日本各地的寺院和神社都出自这些工匠之手。

日本的木造建筑技术因众多的寺庙、神社而得以传承至今。全国各地保留了传统韵味的大型寺庙、神社周围，几乎都有带“匠”字或“番匠”二字的地名。这些地区曾经是专门修缮寺庙、神社的工匠群居的地方。这些工匠一代一代、孜孜不倦地从事着寺庙、神社的营造与修复，而这门传统的工艺也就这么代代流传了下来。

但最近用钢筋水泥建造的寺庙、神社渐渐增多，木造建筑技术急剧衰落。人们渐渐不再使用木材重建或修缮寺庙、神社，背后的原因是多重的：现在木材的价格过高；木造建筑完全依赖木匠手工打造，所以耗时颇长；漫长的工期直接导致人工费用远远高于钢筋水泥结构所需费用；等等。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一个木匠如果要熟练掌握这项手艺并培养出做工时的直觉，需要从少年时期就开始进行漫长的学习与磨炼，但这样的木匠越来越少了。

然而，日本传统木造建筑的手艺还没有失传。被称为“宫大工”[5]的现代匠人正继承并发扬着这门手艺。

1992年，人们在位于东京深川的深川不动堂寺院内建造完成了稻荷社·吒枳尼天堂。虽只是一间小小的四方佛堂，从开工到竣工却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这间佛堂没有使用一根钉子，完全依靠木材搭建而成，房顶上铺的也是丝柏树的树皮，整间佛堂的建造全部采用日本传统的寺庙、神社的建筑工艺。而这间佛堂正是由负责画图和总指挥的工头（日语中写作“棟梁”），几乎包揽所有木工活儿的木匠（“大工”）和负责虹梁、悬鱼等雕刻的木雕师这三名现代匠人亲手打造完成的。

我有幸在这间佛堂的建造期间采访了这些当世的匠人。他们精湛的手艺和建造智慧令人钦佩不已。

这间佛堂的木材全部选用了匠人们所说的“本桧”（ホンヒ）。“本桧”其实就是尾州桧木（亦称“木曾桧”）。木曾谷在江户时代曾是德川御三家之一的尾张藩的领地，这片地区出产的桧木被认为是全国最上等的，为尾张藩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来源，而尾张藩也对木曾的山林进行了严格的保护与管理。因此，木曾的桧木被称为“尾州桧”或“本桧”并闻名于世。直到现在，这片地区仍在出产优质的桧木。

现代的匠人在采购时，会亲自前往木曾，仔细挑选优质木材。这是因为每一根木头根据其斜面和生长情况的不同，品质和特点有所差异。据说，一棵上等的树木会有好些人竞标，所以想要买到最优质的木材其实并非易事。

支撑整个建筑的是四根圆柱。这四根圆柱近乎完美，却并非使用转动木柱子再用砂纸打磨的方式制作，而是工匠们用刨子亲手刨出来的。首先，工匠们将一个正四角形的柱子用平刨削成八角柱，再制作成十六角柱，最后削磨成三十二角柱。进行到这一步，柱子其实已经近乎圆柱了。然后，匠人们会根据柱子的直径计算出圆周的曲线，并按照这个曲线制作出一个圆刨，最后用这个圆刨将柱子的表面打磨圆滑。

据说，现在所使用的台刨是室町时代的发明。在那之前，工匠们都是使用手斧和枪刨削磨出圆柱。法隆寺里柱身呈凸肚状的柱子据说也是这样制作的。其后虽然有人想出了通过转动木柱子来制作圆柱的方法，但木匠们还是继续使用着自己的刨子。与结合木头上的纹路用刨子打磨出来的圆柱不同，若是转动木头来打磨，会将纹路的美感全部破坏掉。木匠们能够一眼分辨出哪根圆柱是靠转动木材制作出来的，哪根是用刨子刨出来的。

吒枳尼天堂里除了四根圆柱外，在正面以外的其他三面还安装了板壁。八寸（约25厘米）宽的桧木板沿着左右两边柱子的沟槽一块一块地嵌进去。横板上下的接缝处事先做好了榫头和榫眼，能够让两块板子完美地拼接在一起。当然，木板的拼接完全不使用钉子。这样一来，接缝处也就很难产生缝隙了。

木头在干燥环境下会收缩，而在湿气重的环境下又会膨胀。几乎所有日本传统木造建筑板壁构造中的横板都会在干燥时沿着左右的沟槽向下降，而木材膨胀起来时又会向上移动，这种充分考虑了木材的“缩”与“胀”的工艺能够很好地防止两块木板的接缝处产生缝隙或者木板出现断裂等问题。毋庸赘述，在传统木造建筑的其他拼接部分，自然也有精心设计的可以让木材“缩”与“胀”的空间。

木造建筑是有生命的，就像人类呼吸一般，会伸展、收缩，会“胖”起来也会“瘦”下去，木材会随着气候环境的改变微妙地重复着这些变化。那些历史悠久的寺庙、神社至今依然能够完好地保存下来，正是因为匠人们充分理解了木材的特性，并将木材细节上的变化很好地与木造建筑的整体融合，保证了建筑总能处在一个精妙的平衡点。这正是对树木了如指掌的古代匠人钻研出的技艺。

由木匠们打造的这些和式建筑基本不会根据事先画好的图纸按部就班地施工。因为工匠们会通过“视觉”和“直觉”在施工中途进行各种各样的修改与完善。计算出来的均衡并不一定与肉眼看到的平衡一致。一点点的弧度就会让“小”变“大”；一个微妙的角度就能让空间显得更深邃；又或者根据背景中山的形状，将图样左右颠倒后反而看起来更对称，这些人类视觉上的特性才是匠人们最为重视的部分。

只有那些积累了足够的学习与经验的匠人，才能通过自己精湛的技艺，让那些微妙的不平衡变成绝妙的平衡。

现代匠人的这些手艺是千百年来，不，甚至是更久远以来喜爱、依赖树木的日本人的传统。但现在这些传统却渐渐没落了，对此我们还能熟视无睹吗？

热爱四季树木的日本人

日本人不仅会充分利用树木，也非常热爱树木。这里的树木大致可分为常绿阔叶树、落叶阔叶树以及针叶树三类。

绝大部分常绿阔叶树的树叶表面带有光泽。常绿阔叶树也被称为“照叶树”，橡树、米槠、樟树以及山茶树等都属于这一类。这些照叶树林自喜马拉雅南麓至东南亚北部山地，自中国云南地区至华南、江南的山地，自日本西南部至中部地区呈带状分布。

这些地带自古便居住着众多民族，而各个民族在生活上具有诸多共通点，比如摘取橡树和七叶树的果实以及采集蕨菜等植物的方法，去除野草涩味的做法，从漆树中提取树液制作漆器的方法，加工茶叶以供饮用的饮食习惯，从蚕茧中抽取蚕丝织成绢的方法，甚至是在放火烧田后种植谷物类农作物的耕种法，用酒曲酿酒的方法，吃年糕的饮食习惯，等等，都颇为相似。

这种文化被称作“照叶树林文化”。众所周知，“照叶树林文化”也是日本文化的一大起源。

针叶树中除了落叶松等少数种类外，几乎都是常绿树。它们多生长在亚寒带及亚高山带，树木高耸挺拔，适合用作建筑材料。桧木、杉木及松木等用于日本木造建筑的树木都是针叶树。

而落叶阔叶树则为人们提供了可以食用的果实及树种。除可供食用外，大部分落叶树还可以用作建筑或木器的材料，它们杂生的枝干

能够用作燃料，而落叶也可以当作肥料使用。

除了具有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实用价值外，树木在日本人的精神文化史上也占据了重要地位，这便是它的另一种价值——精神价值。落叶阔叶树四季分明的面貌深刻影响了日本人在文化上的感性思考。

春季的崇山峻岭为何如此旖旎多姿！嫩绿的新芽从山脚一直爬上山顶。落叶树林的嫩芽根据树种的不同，颜色也各不相同，既有黄绿色的，也有乳白色的，甚至还有绯红色的。每一种嫩芽的颜色都淡淡的，却富有生机，随着天色、气候的变化，时刻展现着自己独特的风情。

初夏是新绿的季节，嫩芽的浅淡渐渐被油绿统一。夏季的群山统一穿上了绿装。但就算都是绿色，仔细看去也会发现，绿与绿之间存在着微妙的不同，令人百看不厌。

秋季，当树叶即将逝去时，又是多么绚烂夺目啊！红色绸缎般的叶子铺满山野，其绚丽秀美的姿态实在难以名状。

最后，当萧瑟的冬季来临，枯叶从枝头飘落，森林里只剩下了光秃秃的枝干，这般侘寂[6]之美却酝酿出了一番别样风情。枯树忍受着凛冽的寒风，披霜挂雪地静静等待下一个春天。

正如《实语教》所言：“山高故不贵，以有树为贵。”这句话的意思是山不在高，有树则贵。

自古以来，日本人就热爱、欣赏四季流转中的各类树木，并将这份情趣写入诗歌进行咏诵，绘入图画加以临摹。他们还将这种自然之美植入庭园，打造一个看不出人工雕琢痕迹的园池，建造一座假山并搭配天然石，再种上各类草木。这便是日本独树一帜的崇尚自然的庭园美学。日本的庭园明显与偏爱几何学的欧洲庭园大相径庭，又与喜爱搭配奇山异树的中国庭园貌同实异。

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在日本的庭园中，落叶树、常绿树以及各类花草才是主角。

这些花草树木交织出的千变万化的四季景色与自然情趣，正是百看不厌的日式庭园最重要的构成元素。

因此，日本人必须感谢这片拥有常绿阔叶树、落叶阔叶树、针叶树以及其他各种各样树木的国土。同时，保护好培养了日本人文化感

性的自然环境并将它交给下一代，也是当代日本人无论如何都要承担的义务。

三　树木奇谈与松国日本

被巨树救下一命的圣德太子

古木与巨树往往有着生命延续千百年后才沉淀而成的威严与大气。爬满苔藓的交错枝干气势十足，令人叹为观止。不知何时生出的树洞被鸟儿和小动物借去当成了家。一棵古树就这样在漫长的时间中顽强地延续着生命，并养育了包括昆虫和菌类在内的成百上千的生命。从古至今，人们总能从古树上感受到永恒的生命力，所以自然也会希望住在树中的神灵能够庇佑自己。

有关参天大树的传说与奇闻不胜枚举。

据说，六世纪末发生了这样一件与巨树有关的事情。在用明天皇驾崩的587年，围绕对佛教的接受问题，苏我氏与物部氏形成了鲜明的对立立场并引发了战争。圣德太子在这一年虽然仅虚岁十四，但也加入苏我军，上了战场。

战争初期物部军占据优势，以致后来圣德太子被敌军追赶到无处可逃。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的眼前出现了一棵巨大的糙叶树，其树干突然张开了一个大洞，待他钻进去躲藏后，这棵巨树又将洞口封闭，他得以逃过一劫，摆脱危机。之后，圣德太子用这棵糙叶树的树枝雕出了四天王像，并插在苏我军的头盔上以祈祷胜利。最后，苏我军竟真的一扫颓势，取得了战争最后的胜利。

圣德太子为了感谢糙叶树的救命之恩，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寺庙。据说，现在位于大阪府八尾市的大圣胜军寺就是这座传说中的寺庙。寺庙中相传救了圣德太子的那棵巨大的糙叶树至今依然安在。与圣德太子的传说相似，壬申之乱那年（672年），天武天皇（大海人皇子）也曾在命悬一线时躲进了巨大的朴树树洞，才得以死里逃生。

此外，在《源平盛衰记》中还记载了下面这个源赖朝藏身于巨大的卧木中而化险为夷的故事。

治承四年（1180年），源赖朝在石桥山合战中被打败，被敌军追赶，走投无路。正巧眼前有一根巨大的树干倒在地上，源赖朝便钻进去藏身，并一直向八幡大菩萨祈祷。追赶过来的大庭景亲看到这棵巨

大的卧木，心生怀疑，命令部下梶原景时去调查。梶原景时进入卧木的洞中，果然发现了源赖朝，而源赖朝也早已有了自杀的觉悟。但这时，梶原景时突然说道：“我会帮助您。若赖朝殿下日后取胜，请勿忘了我。若今后您不幸被敌人杀害，还望您在九泉之下保我武运昌隆。”梶原出去后便谎称树洞中没有任何人。大庭景亲仍然不信，将大弓插入卧木中乱搅了一通，弓碰到了源赖朝盔甲的袖子发出了声响。这时，一只山鸠从卧木中飞出，又碰巧下起了雷雨。大庭景亲认为，如果源赖朝在树洞中，里面必不会有山鸠，但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用巨石堵住了洞口方才离去。

梶原景时救下源赖朝的这则故事非常有名。《源平盛衰记》的作者引用了圣德太子或天武天皇的故事，并称源赖朝藏身巨木洞中躲过危机这件事应成为广为流传的祥事。

良辨杉与暗杀实朝事件中的银杏

与历史人物有关的树木不胜枚举。接下来再为大家介绍几则故事。

奈良时代的高僧良辨幼时的传说“良辨杉”便是一则广为人知的故事。

良辨两岁时，一只大雕趁其母摘桑不备，将他抓走，随后将他放在了东大寺二月堂的大杉树树梢上。目睹此景的义渊将他救了下来。多年后，良辨成为东大寺的初代“别当”[6]。另一方面，良辨的母亲三十年来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儿子。最终，以当年母亲雕刻的观音像为证，母子二人得以重聚。这则传说记载于《元亨释书》及《本朝高僧传》，此后歌舞伎以“二月堂良辨杉由来”为主题创作了剧目，由此，这则传说得以在世间广为流传。故事中提到的义渊也是一位著名的僧人，除良辨外还曾抚养玄昉和行基等高僧。

尽管源赖朝因巨木得救，但其子镰仓三代将军实朝却因树殒命。建保七年（1219年）正月二十七日，源实朝出席了在镰仓鹤冈八幡宫举行的右大臣拜贺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暮色即将降临之时，源实朝退席。就在这时，藏在石阶旁银杏树后的公晓突然冲出来刺杀了源实朝。

公晓是源实朝的兄长源赖家（二代将军）的儿子，也就是说他是实朝的侄子。这起暗杀事件的背后既有幕府内复杂的权力斗争，也有北条氏的阴谋。源实朝死后，曾经的源氏将军一族血脉断绝，之后北

条氏作为“执权”掌握了幕府政权。

银杏，也称公孙树或鸭脚树，原产地是中国。据称，银杏应该是在平安时代末期或镰仓初期引入日本的。这么算的话，暗杀实朝事件中的那棵银杏的树龄最多不过百年，但即便树龄没有那么大，这棵银杏的树干似乎也足够遮挡住公晓的身体了。

日本各地有许多高大的银杏树。银杏是雌雄异株植物，雌株会在秋天结银杏果。据说，之所以现在经常能在古城遗址看到很多高大的银杏树，是因为当年的武将为应对笼城战而栽种了许多。此外，银杏老树的粗枝下会长出下垂的“树奶”，也就是钟乳状木块，日语称其为“乳柱”，因此，很多地方的老百姓也将银杏供奉为“乳神”。宫城县仙台市银杏町有一棵“苦竹银杏”，也被人们称作“乳银杏”或“姥银杏”，据传这棵银杏与圣武天皇的乳母红百尼的传说有关。

儿岛高德削开樱花树树干在上面刻诗的事迹，也甚是有名。

元弘二年（1332年）三月，后醍醐天皇被流放至隐岐岛，途中曾在美作国的院庄（地名，现冈山县津山市）留宿一晚。这一著名的事迹正是在那晚发生的。备前国的武士儿岛高德悄悄潜入行宫内的庭院，削开一棵樱花树的树干，刻下了“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的诗句。这句话的意思是：上天并没有放弃勾践，现今也并非找不出一个范蠡。高德引用忠臣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的故事，安慰、鼓励了后醍醐天皇。这是《太平记》中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

日本全国有许多与达官、显贵、高僧、武将等相关的植树传说。比如天皇亲手种植松树、高僧的手杖或筷子最后长成了参天大树、武将折下并插在地里的树枝长成了遮天蔽日的巨树，等等。这类传说可谓不计其数。

天皇、皇后和皇太子出行在外时会亲手种树留念，这种做法具体是从何时开始的已无从得知，但绝对是自古沿袭下来的，而这种做法成为如今的惯例，则是从明治进入近代才开始的。不仅是皇室，近年来包括总理大臣在内的身居高官要职之人、外国首相或大使，甚至是运动员和演艺圈人士，均以种树为风尚。这当然是非常值得称赞的事情。几百年后这些树木都将成长为高大挺拔的苍翠绿木，而亲手种下这些树木之人的事迹又有多少能流传到后世呢？

松树和日本人以及行道树

一直以来，喜爱树木的日本人都对松树抱有一种偏爱。

《万叶集》中咏诵树木的诗歌有76首与松树相关，数量之多仅次于描写梅的诗歌，而“梅”往往被归入“花”一类，所以单从树木的范畴来讲，咏诵松树的诗歌最多。咏梅诗数量可观，是因为奈良时代的贵族喜好梅花，他们认为梅花是春季鲜花的代表，当时的日本对梅的痴迷，甚至到了使用单字“花”便是特指梅花的程度。作为花树之代表的樱花逐渐演变为“花”的代名词，则是平安时代中期以后的事情了。

皇宫中的紫宸殿南阶正面东、西两侧种植的“左近樱”与“右近橘”中的“樱”，最开始其实是梅花。改种樱树，据说是在天德三年（959年）九月，皇宫失火烧毁并再次重建之后。从《万叶集》（卷十）中咏诵的“宫中仕宦人，闲暇出宫门。头簪梅花蕊，同迎此地春”[7]这首诗歌，到元久二年（1205年）编纂的《新古今和歌集》（卷二）中“宫中仕宦人，闲暇出宫门。头簪樱花蕊，今日亦逍遥”一诗，也能看出从梅花到樱花的转变。

樱花之美确实令人心动。其花期虽短，但这种大片花朵同时绽放又倏然飘落，花落时不留一丝眷恋的决绝之姿，很快便受到了势力日渐庞大的武士阶级的青睐，并创造出“花と散る”的说法，以盛开的樱花迅速凋落、毫不留恋之姿比喻战场上的英勇赴死。而在春天到来前盛开的梅花，有着樱花所不具备的情调与趣味。梅花散逸出的一缕缕淡淡的芳香沁人心脾。由于黄莺的初啼几乎与梅花的开花期一致，所以在日语中“梅”与“莺”为对语。

但是，比起一直以来作为花树深受日本人喜爱的梅与樱，其实松树更受欢迎。能乐舞台便以松树为背景，绝大多数屏风和隔扇也以松树为图案。“内匠头”浅野长矩拔刀砍向吉良上野介时所在之地——江户城的“松之廊下”，其墙壁上画满了松树。日本南画体系中的风景画以及浮世绘中的风景画，许多都描绘了松树的优美之姿。从葛饰北斋的《富岳三十六景》以及安藤广重的《东海道五十三次》中也能看出描绘松树的画作之多。就连被称作“日本三景”的“松岛”“天桥立”和“安艺之宫岛”三处观光名胜，构成景观主体的树木也都是松树。现在，日本的林荫道上种植着许多松树，家中还会摆放用于借景的“见越松”[8]，正月要在门口装饰由松枝等材料做成的门松，喜庆之事则要用到松、竹、梅等。可以说，日本人已经离不开松树了。

正月里装饰门松的习俗自古便有。门松最初被称作“门木”，用于在门上供奉年神，为年神提供附身之处。最开始不仅是松树，橡树、

山茶树、朴树、栗树、杨桐、榁树、灯台树等都可以充作门木。平安时代后期，人们为了祈求长寿与繁荣，开始以松木为饰。据说这种演变与武士势力的日益强大息息相关，时人逐渐被松树在荒地也能顽强生根并茁壮成长的韧劲与生命力所折服。

《新敕撰和歌集》（卷七）中提及了松树：

初春の花の都に松を植ゑて

民の戸とめる千代ぞしらるる

（在初春的繁华都市种下松树，才知道［之前正月里］百姓家门上挂的是千代木［松树的别名］。）

《徒然草》（十九段）中亦有——

大路のさま、松立てわたして、花やかにうれしげなるこそ、またあはれなれ。

（都城大路亦是家家门前挂门松，那华美喜悦之貌正是其颇具风趣之处。）

由此可见，在镰仓时代，门松便已稀松平常。此外，那时还在松树以外追加了竹子。

虽然松树的典型代表是赤松与黑松，但据说在弥生时代以前，这两个品种的松树数量极少。《魏志·倭人传》中记载的邪马台国国内种植、生长的草木中没有出现松树。之前讲过的素戋呜尊的植栽神话中出现的也是杉树、桧树和樟木，并没有松树。首次记载松树的文献是《古事记》的景行天皇条目，其中写道：倭建命（日本武尊）将太刀忘于一棵松树下，回来时发现太刀没有丢失，于是他便夸奖了松树并吟诵了赞歌。

人们对烧制土器和须惠器的烧窑遗迹中留存下来的木炭进行分析后得知，六世纪之前的窑遗迹中并没有发现松木炭。而七世纪后半叶之后的烧窑，则绝大多数以赤松为燃料。也就是说，从六世纪前后开始，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使用松木；“记纪”约在八世纪编纂成书，此后松木的使用迅速扩展至日本各地。至编纂《万叶集》的八世纪末期，松树已经成为日本人非常熟悉且依赖的树木了。那么为何会有这种演变呢？《森林文化史》的作者、农学博士只木良也分析认为，随着农耕文化的发展，人们不停从农田附近的山林采收本应成为土壤养分的落叶和柴草，因此造成了土壤的贫瘠与土质恶化，而能够在并不肥沃

的土地上种植的代表性树木便是赤松与黑松。

实际上，即便在恶劣的环境下，松树也能茁壮成长。它既可以在岩山石壁上生根发芽，也可以在荒漠沙地中生长。遍布奇岩怪石的山峰上孤独矗立的松树往往为风景画提供了绝妙的素材；而种植在海岸边的松树林又起到了防风防沙的作用，保护着海边的居民。

长期以来，日本人将松木用于方方面面。由于松木的树脂含量高，耐水性也强，自然成了船只、桥墩以及其他土木工程的木桩之首选。因松木材质坚韧，所以也被用作大型木造建筑的梁材。在第二次建造东大寺大佛殿时，人们便从遥远的九州雾岛运来了两根巨大的赤松木。此外，由于松木能够充分燃烧，具有火力旺、燃烧时间长的特点，所以在制铁和烧制陶器时也会选用松木作为燃料。即便是现在，依然有不少窑户和陶艺家使用赤松作为烧制陶器的燃料。将松木劈成细条绑在一起，就制成了“松明”[9]。松木燃烧后的黑灰即“松烟”，用于制作黑色颜料，将松烟混合熔胶制成固体即为墨块。松脂是硬膏与蜡膏的原材料，清漆和松节油都是用松脂制成的，此外，松脂形成的化石即琥珀。

风拂过松树时发出的声响在日语中叫作“松籁”或“松涛”，它为日本人带来了种种文学情趣。正如某人所言——“松国日本”。

神话传说提到的树木中，种类最丰富的也是松树。比如，神祥松、影向松、山神松、天狗松、羽衣松、衣挂松、驹系松、鞍挂松，等等。甚至还有在神社等地种植的枝叶向下生长开来的笠松（伞松），据说神灵会降临在笠松枝叶上。

顺便一提，与树木相关的地名中，带“松”字的占绝大多数。仅仅是市町村(7)的名字就有松山、松本、松浦、松原、松阪、松户、松江等超过五十个。同样，带“松”字的日本姓氏也非常多，如松本、松下、松田、松永、松木、松山、上松、植松、村松、赤松等。

沿着道路，每隔一段固定距离种植一棵同类型树木的做法，据说自奈良时代便已存在。《万叶集》卷十九中，大伴家持的歌内便有“春日折下绿叶饱满的柳枝，一看便不由得思念起京都的大路”。从这句中我们可以看出，那时在京都的大路上便已种植了成排的柳树。此外，据《类聚三代格》的描述，天平宝字三年（759年）普照法师曾上奏称，畿内七道的诸国驿路两侧种有果树。道路两旁一旦有树，人们就可以在树下休息，夏天可以在阴凉处避暑，饥饿时还能以树木

的果实果腹。

而这些道路两旁的树，千百年来一直为旅途中的人提供消除疲劳、放松身心的一片绿荫。此外，这些成排的树还可以区分边界、保护道路，成为过往行人的指向标。

提起行道树，以东海道为首的松树行道树最为著名，除此以外，人们还会栽种杉树、樱花树、银杏树、山毛榉和柳树等诸多品种的树木。据说东京的小金井堤和墨堤的樱花行道树便是江户时代的享保年间（1716年—1736年）德川吉宗命人种下的。虽然有人说德川吉宗此举是为了吸引大量游客来此赏樱，如此人们便可以将河堤踩得结结实实，但该说法不过是民间传说罢了。在此种植樱花行道树主要是为了利用深扎入土壤的树根来保护堤坝。同时，人们对樱花的热爱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日光市的杉树行道树是由担任相模国甘绳藩主的松平正纲、松平正信父子二人自宽永二年（1625年）起的二十年间种下的。据民间说法，由于松平正纲当时只是一名势力相对弱小的大名，无法像其他大名那样向东照宫进献昂贵的东西，所以便在街道上种植了杉树。而种下的杉树苗多达二十万棵，仍然花费了一笔巨额费用。

虽然朴树并非行道树，但每隔一里便在道路两侧堆起土堆并种上朴树用作距离标识的“一里冢”经由德川家康得以制度化。有说法称，“一里冢”起源于天正年间（1573年—1592年），织田信长命人每隔三十六町[8]便堆起“一里冢”并种上朴树的举措，但这种说法是否确切已无从考证。大家都知道丰臣秀吉曾建“一里冢”，但真正将其确立为制度的是德川家康，他在庆长九年（1604年）命人以江户日本桥为基点，在东海道、东山道甚至北陆道堆起了“一里冢”并种上了朴树，随后他还将这种做法推广至全国。

据说，选用朴树是因为朴树之根能深深地扎入土壤并散布开来，如此便能避免土堆瓦解的问题。此外，还有一种说法，当部下询问德川家康要在“一里冢”上植什么树时，他回答：“用剩余的树苗（よのき）即可。”但部下却错听成了朴树（エノキ），于是才导致“一里冢”上种的都是朴树。

日本人与树木的联系还有许多未能提及，在此先告一段落，为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

正如前文所述，树木赋予日本人的恩惠无可替代。不论是作为建筑材料，还是作为生活用品材料，甚至作为燃料，树木都为人们的生

活提供了便利。此外，树木还孕育了日本人文化上的感性。

即便大都市建起了越来越多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日本人对树木的喜爱与执着也不会消失。即便现在可以用新式建材取代和室屋顶和墙壁的传统材质，人们却依然会在其表面仿制木头的纹理，这也正体现了日本人对木质的追求。同理，公园等设施中的水泥柱子和长椅被做成了仿木模样。希望大家想一想，森林或行道树，哪怕只是一棵树、一根木柱、一块木板，曾为我们的内心带来了怎样的宁静。而这正是自森林的居民——绳纹人的时代起，历经漫长的历史所孕育出的日本人之精神。

第二章

虫子的日本史

一　喜爱虫子的国家——日本

被神武天皇称为蜻蜓之国的日本

我们日常生活中能看到的一种较小的生物便是虫子。也正因其体格小，我们极易失去它们。小时候，我们总能在身边找到各种各样的虫子，但如今，它们中的绝大多数从我们的日常生活环境中消失了。

曾经一到秋天就成群结队飞上飞下的红蜻蜓，现在都去哪儿了呢？不仅萤火虫早已甚少见到，就连蝴蝶和飞蛾都越来越罕见了。独角仙和锹甲已然成了百货商场里售卖的商品。街边树上除了外来品种梨蟋的鸣声外，大都市的秋天已听不到什么昆虫叫声了。

我非常怀念中学时期捉蝴蝶以至于忘我的那段时光。那时，我总是拿着捕虫网漫山遍野地跑啊跑、找啊找。随后我又迷上了观察和饲养昆虫，冬天我会从落在朴树根周围的叶片下翻找大紫蛱蝶的幼虫，从日本桤木的树皮里寻找翠灰蝶幼虫，还会在院子里种上马兜铃来饲养麝香凤蝶。渐渐地，我的兴趣完全集中在各种灰蝶上，让我痴迷的最后一种昆虫是翠灰蝶。不过这些都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曾经萤火虫闪闪飞舞、马兜铃遍布的小河河岸，现已用钢筋水泥保护了起来，还围起了铁丝网。以前能钓到小鲫鱼的小河现如今有水无鱼，成了一条排水沟。人类为了方便，大肆“改造”着自然，而这些行径也改变了蝴蝶等各种各样的昆虫生存的环境。

虽然很多人会表示：“不就是小虫子嘛，有什么大不了。”但是，连虫子都无法生存的环境对人类来说绝非有益。花草树木的授粉大多数情况下是由昆虫来完成的。对人类来说或许是害虫的生物，对于维持地球生命来说并不一定毫无用处。

自古以来，日本人就与昆虫关系密切，日本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极其钟爱昆虫的国家。

“日本”这个国家昔日被叫作“秋津岛”“秋津洲”或者“蜻蜓洲”。“秋津”（あきづ）正是蜻蜓的古称。而为何被称为“秋津岛”，《日本书

纪》卷三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据该书记载，神武于橿原即位后第三十一年的初夏：“因登腋上嗛间丘[10]而回望国状曰：‘妍哉乎、国之获矣。虽内木锦之真迮国、犹如蜻蛉之臀呫焉。’”这句话的大意是，神武感叹：“这是个多么壮美的国家啊，虽然国土狭小，却有如蜻蜓在空中交尾一般连绵的山丘。”因此，才出现了“秋津洲”这个称号，也就是说自此“大和国”（日本）才开始被称为“秋津岛”。

日本列岛目前已确认有约二百种蜻蜓。粗钩春蜓、蓝辛灰蜻、麦藁蜻蛉、丝蜻蛉、黑色蟌等都是日本人颇为熟悉的蜻蜓种类。盛夏时节，蜻蜓们开始飞舞交配，到了秋天红蜻蜓集结成群，在天空中展现轻盈的舞姿。自古以来，日本人便视蜻蜓为益虫。在盂兰盆节前后，蜻蜓会突然大量出现，过去人们认为这是祖先的灵魂化作蜻蜓之姿显现，所以绝对不会捕杀它们。正如日本东北地区流传的“蜻蛉长者”的古老故事，日本人认为蜻蜓是为人带来幸福的昆虫。长久以来，不论是视蜻蜓为祖先的化身还是认为蜻蜓可以带来好运，日本人一直颇为珍视这种在夏季至秋季出现，捕食稻田里害虫的昆虫。

1996年，在出云的加茂岩仓遗迹（岛根县大原郡加茂町，今岛根县云南市）发现了三十九个铜铎，震撼了古代史学界。三十九个铜铎中有六个画有图案，其中便有蜻蜓的图案。迄今为止，日本全国共发现了约五十个绘画铜铎，其中也有附蜻蜓图案的铜铎。铜铎的制作时间大致为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一世纪的二百年间，也就是弥生式土器时代。对于以种植农作物为主的农耕民和弥生人来说，能够捕食蝗虫、虫蚋和蚊子等害虫的蜻蜓早就是宝贵的益虫了。

这么说来，古代人是否将所有种类的蜻蜓都称作“秋津”呢？

生活在日本、个体数量最多的蜻蜓要数红蜻蜓。“秋茜”（秋赤蜻）、“夏茜”（夏赤蜻）、“眉立茜”（竖眉赤蜻）等红蜻蜓，在九州等西部地区于六月前后开始出现，而在关东地区则会一直现身至十一月左右。最近在东京周边，到了秋天也依然能看到数不清的红蜻蜓飞来飞去。飞鸟和奈良这些韵味十足的古都与蜻蜓颇为相配。恐怕人们之前所谓的“秋津”正是指红蜻蜓。

弥生人虽习农耕，却颇具战斗性。据《魏志·倭人传》所述，二世纪后半叶倭国处于战乱状态。神武东征，在与长髓彦军队的战斗中取得胜利后，方建立大和政权。若由此观之，蜻蜓中体形最大的无霸勾蜓才最契合人们所说的“秋津”之特质。无霸勾蜓往往一直在低空直线飞行，飞行时翅膀吱吱作响，当它看到小虫子时便会迅速扑过去捉

住，随后便悠然飞走，这副手到擒来的样子不愧为蜻蜓中的王者。

不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自古以来蜻蜓都是日本人熟悉并喜爱的昆虫。但最近三四十年，蜻蜓的数量却急剧减少，造成这一局面的是人类所使用的农药和杀虫剂。杀虫剂不光能杀死害虫，也会消灭益虫。再加上蜻蜓需要在池塘或沼泽产卵，而这些蜻蜓幼虫赖以生存的家园有很多已被污染或者填埋。为了防止孩童不慎落入池中溺水，人们拉起铁丝网并挂上了“禁止游泳”的警示牌，但这些池子却渐渐被垃圾堆满，最终不得不填埋起来。这种情况绝非个例，如同现代人亲手抛弃了自己的历史与文化一般。一年四季绽放在水边的各色花草、聚集在池中的水鸟、在那里生息繁衍的蜻蜓等昆虫，大自然中的这些生命带给了日本人数不尽的精神恩泽。

捕虫与“物哀”

小孩子天生就喜欢昆虫，这或许是祖先的遗传基因所致的吧。我的两个孩子小时候也很热爱昆虫，时而去捉蚂蚱甚至将它们吃掉，时而又去捕捉螳螂，或者追逐着蜻蜓、蝉之类的昆虫四处乱跑。但不知从何时开始，他们开始觉得蚂蚱恶心，绝不再放入口中；在房间里看到小飞蛾、蜘蛛或大蚊子之类，哪怕只有一只，也会大喊大叫，似是被吓得不轻；对蝉和蝴蝶也越来越不感兴趣了。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似乎不经意间封印了日本人基因中喜爱虫子的那部分。如今的日本人不仅仅是生活方式，或许就连精神层面都逐渐欧美化了。

奥本大三郎（法国文学学者，作为昆虫小品文作者名气颇高）说过，欧美的孩童不会痴迷于捉蝉或抓蜻蜓。于他们而言，蝉叫声不过是一种“噪声”，蜻蜓大多被视作不吉利的昆虫而遭到嫌弃。至于对萤火虫的点点荧光大抒感慨，或是对不同虫子的叫声津津乐道，他们也无法理解。

对比来看，日本人从古时就开始接触昆虫、和昆虫一起玩耍并发自内心地喜爱昆虫。小泉八云[9]在庙会目睹了日本人卖虫子的场景并被深深吸引，他惊叹于喜爱昆虫叫声的日本人那种“非常雅致且具有艺术性的美好生活”，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在随笔《虫的音乐家》中曾这样说道：

（西洋人）……若听说有人会珍视各种昆虫的独特叫声，肯定会感到奇怪。然而很难让这些西洋人理解，在某种十分考究并极具艺术性的国民审美生活中，这些鸣虫所处的地位，等同于我们的斑鸫、红梅花雀或是“南丁格尔”（夜莺）、金丝雀等鸣禽般在西欧文化中占据

的重要位置，甚至比起后者有过之而无不及。

小泉八云比本土日本人更深刻地理解了日本文化与日本人的感性。但是对于大多数将虫子的叫声当作噪声的欧美人来说，喜爱那种声音，欣赏各种昆虫，并将其创作成诗歌、物语等文学形式，或是将昆虫作为绘画、雕刻等美术作品的对象，这种日本人特有的文化感性，恐怕他们很难理解吧。日本人甚至会从“病叶”（指受到虫害的叶子）中看到美，并将这种美融入绘画作品或手工艺品中。有一种陶瓷便被称作“虫喰”或者“虫喰手”。这种陶瓷器原本出现于明末时期，其瓶口边缘会有一小块釉质剥落之处。日本的茶道之人将这种残缺之美视作一种别样的风情，珍爱万分，随后便出现了人工特意制作出的“虫喰”陶瓷器。对于日本人欣赏“病叶”和边缘有残缺的茶杯的独特审美，欧美人大概也难以理解吧。

在《万叶集》卷十中已经出现了“庭草骤雨远去，蟋蟀鸣声可闻，原来秋已近。屋外夕阳草丛生，蟋蟀啼鸣却不厌”这类表达喜爱昆虫叫声而咏诵的和歌。据说人们自平安时代才开始将捕捉到的虫子放入虫笼中饲养，以欣赏其鸣叫声。《源氏物语》的《野分卷》中，便有中宫命童女去往庭园，拿虫笼捕虫的描写。过去还有朝廷中人在嵯峨野一带漫步，将捉到的虫子放入虫笼中带回献给天皇和皇后的“虫选”活动。据《古今著闻集》记载，嘉保二年（1095年）八月十二日，有人曾命童仆四处捕虫，将捕到的虫子放入以渐变色的线制作的虫笼中，并用萩草和女郎花等秋季花草装饰，献给了天皇和皇后。随后，宫中一边欣赏着这些虫子的鸣叫声，一边举杯饮酒、朗诵诗歌。据《嬉游笑览》的记载，这种“虫选”活动开始于堀河天皇（1086年—1107年在位）时期。

平安时代，贵族喜爱的昆虫有铃虫、金琵琶、“螽斯”（现在的蟋蟀）、“机织”（现在的蝈蝈）、结草虫等。

自春天到初夏，鸟的啼叫声婉转高亢。这是充满生机的歌声，使人感受到新生命萌生之明快。而昆虫的叫声却是细腻的，令人感到些许“物哀”，这种声音象征着渐渐远去的季节，空寂而萧瑟，轻易地就沁入了满是思绪的人的心脾。小鸟在黎明时开始啼叫，与之相对，虫儿却在傍晚时分鸣叫。

日本人会在某个夜晚，通过不经意间听到的虫音，感受秋天的到来；又会于深秋时节听到虫鸣声时，不由得心生触动，思绪万千。

卖虫为生的江户人

江户时代开始，上流社会爱虫、赏虫的优雅趣味开始渗透到平民百姓之中。随着生活质量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江户时代开始出现代表市民阶层的“町人文化”。江户时代的百姓将平安时代贵族的诸多习惯、仪式和游玩方式吸收进了日常的兴趣与寻乐之中。

欣赏虫鸣的习惯最初在京都、大阪一带风靡，随后京城的朝臣纷纷效仿，江户中期时传至市民中，并广为流行。那时的江户人会专门跑到鸣虫的胜地去一饱“耳”福；还会将捉到的虫子养起来，拿出去跟人比赛，看看谁家的虫子叫声更响亮清脆；又或者是把很多鸣虫放在一起，来一场“大合唱”。

松永贞德的《贞德文集》中也出现了傍晚时分人们出门“虫吹”，捕捉聚在行灯或提灯上的蝈蝈、松虫、蟋蟀的内容。“虫吹”是一种采集昆虫的方法：先要在竹筒的上方盖上一块纱布，然后用竹筒下侧扑捕昆虫，虫子进入竹筒后会沿着筒壁向上爬，人们只需要将虫笼或布袋接在竹筒下方，然后冲着纱布一吹，虫子就掉进虫笼或布袋里了。

据《东都岁时记》记载，江户时期共有道灌山、御茶水、根岸里等十一处聆听虫鸣的著名去处。《江户名所图会》中亦附有《道灌山听虫》一图。这幅图描绘了在山丘上铺上席子，一边赏月一边欣赏虫鸣的三名男性，他们面前备有简单的酒菜。山丘下一个小孩举着虫笼，旁边有一个看似孩子母亲的女人，和女仆一边漫步一边注视着孩子玩耍。整个画面温馨而惬意。

有些人觉得为了听虫鸣而特意出门或者外出捕捉很麻烦，但又希望欣赏昆虫带来的曼妙之音，于是他们便早早下手去购买昆虫。江户中期已出现了以卖虫为生的人。

据明治时期的百科事典《日本社会事汇》记载，将虫子当作商品出售最早出现在宽政年间（1789年—1801年），由一个来自越后地区，名叫忠藏的人开始。忠藏原本是卖“御田”（关东煮）的，住在神田的他当时一面经营着关东煮的小生意，一面时不时去根岸里捉铃虫来消遣。一天，某个人在听到忠藏的鸣虫叫声后，提出要花钱买下那只虫子。忠藏通过这件事发现了商机，于是开始捕捉铃虫拿来售卖。由于生意越做越大，他最后关闭了关东煮店，专门经营起卖虫的生意，还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碰巧这时有人成功地实现了铃虫的人工饲育，这个人便是住在青山的青山下野守家臣桐山。随后，忠藏开始从桐山那儿进购铃虫拿去贩卖。在忠藏的支持下，桐山在树蟋、金琵琶、纺织娘等昆虫的养殖上也取得了成功。

不久便出现了效仿之人，即原本卖日式短袜的安兵卫。安兵卫在

装虫子的容器上下足了功夫，而在此之前人们都是将虫子放在罐子或者箱子中。安兵卫结识了本所的大名龟井家家臣近藤，近藤制作出了如鸟笼般小巧精致的虫笼。他们将虫子放进这种虫笼内进行售卖。于是，卖虫子这门生意愈加兴旺。忠藏最后成了昆虫总批发商，他会从近郊采购各种各样的虫子进行人工繁殖。而另一方面，安兵卫则让学徒们负责虫笼的制作，自己穿着华丽的衣装走街串巷地叫卖。安兵卫与忠藏的合作也让二人大获成功。

继承了忠藏家业的是住在下谷御徒町的山崎清次郎。清次郎集结了三十六名卖虫商人，组建了一个佛典讲会，入会之人均信仰相模大山的石尊并定期前去参拜。他通过这种“虫讲”方式获得了生意伙伴，并在江户将卖虫生意做到了一家独大的地步。可以说清次郎当时已经建立起了一家成熟的垄断企业。但不知是否因其过于高调，在水野忠邦的天保改革中，山崎清次郎被迫解散了与三十六名生意伙伴共建的组织。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门生意也随之消失，只不过卖虫子又重新回到了小商小贩个体经营的模式。一年四季，江户的街角都能看到叫卖虫子的人，鸣虫的吱吱叫声也不绝于耳。虫贩们成功地让鸣虫比野生虫子更早繁殖生长，这时的卖虫生意也不再受限于季节，一年四季都能售卖。记录了江户后期风俗的《守贞谩稿》中写道，不仅仅是鸣虫，吉丁虫、夜蝉等昆虫也被拿来售卖，比起秋天，冬夏售卖虫子的小贩更多。这本书还有一幅插画，描绘了挂着一串虫笼的小摊。当时的虫贩们并没有推着小摊到处叫卖，而是选择在一个固定摊位售卖。

现在，我们几乎已看不到这种售卖虫子的小摊了。最近，夏天的夜晚我看到银座的街角有人在卖风铃和昆虫，让人不由得心生怀念。但是，他们的顾客往往是醉酒之人，这点还是挺令人悲哀的。

小泉八云曾说：“或许直到我们西方的盲目的繁殖主义荒废了它们（昆虫）的乐园，使那里变成不毛之地后，我们才会发现被我们破坏之物本身的魅力，并因此后悔不已。”

二　万古不变的虫与蝴蝶的梦

令古代人为之疯狂的常世虫

皇极天皇三年（644年），东国[11]兴起了一个视昆虫为神灵的奇妙的新兴宗教。

皇极天皇三年正是大化改新的前一年。其时，苏我虾夷、苏我入鹿父子凌驾于天皇之上，掌握政权，君临飞鸟。在那之前的一年，苏我父子二人袭击了圣德太子之子——山背大兄王并令其自杀，随后苏我父子登上了荣华富贵的巅峰。自苏我马子以来，天皇的位置便一直被苏我氏占据，并一直握有国政主导权。但皇极天皇四年（645年），苏我入鹿在宫中的大极殿被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等人暗杀，随后苏我虾夷也自杀身亡，苏我氏的全盛之世就此落下了帷幕。

在京都政局动荡之时，旁边的东国从平民百姓到上层阶级都信奉着昆虫。《日本书纪》中也记载道：

（皇极天皇三年）秋七月，东国不尽河边人大生部多劝祭虫于村里之人曰，此者常世神也。祭此神者，到富与寿。巫觋等遂诈托于神语曰，祭常世神者，贫人到富。老人还少。

这段话的意思是：只要供奉这种叫作“常世神”的虫子，不仅可以获得荣华富贵，还能返老还童。因此，这种奇妙的宗教便迅速发展起来，人们纷纷倾尽家财加入这一宗教，捉到常世虫后好生供养，并载歌载舞地庆祝，以求长生不老。

终于，这个新兴宗教流行至京都，许多人倾家荡产也未获得好处，反而损失严重。于是，秦河胜便逮捕了鼓吹常世神的大生部多并予以惩治，自此，这一奇特宗教的势头便被打压了下去。

当时的京都人作歌曰：“纵闻此为神中神，太秦打惩常世神。”太秦指的便是秦河胜。这句话的意思是，秦河胜被奉为神中之神，责打惩戒了常世神。

六世纪末至七世纪前半叶，秦河胜在现京都市西郊太秦一带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势力，使家族成为外来氏族中权尊势重者。他因扈从圣

德太子而飞黄腾达，也因建造了蜂冈寺（广隆寺）而声名远播。

那么，这个“常世虫”到底是什么样的虫子呢？

此虫者，常生于橘树或曼椒（山椒）。长四寸余，大如指头。色绿而有黑点，其貌似蚕。

——《日本书纪》卷二十四

这么看，毫无疑问“常世虫”就是凤蝶的幼虫了。在我们常见的凤蝶中，柑橘凤蝶、黑凤蝶以及美姝凤蝶等都是以枸橘、蜜柑等柑橘类或山椒等为寄主植物。在此之中，柑橘凤蝶（一种最普通的凤蝶）的幼虫便是绿色的，身上有黑斑纹。

大化改新时，为何人们会将凤蝶的幼虫奉为神灵已不得而知。蝴蝶的幼虫经过反复脱皮蜕变成蛹，最后又变身成美丽的蝴蝶在空中飞舞。或许那时的人们看到蝴蝶死而复生般的神秘之姿，感受到它们最后完美变身、飞向天空所带来的不可思议，于是将死而复生和大富大贵的愿望寄托在了那小小的幼虫身上。

历史学家下出积与认为，常世神与追求长生不老和富贵丰足的道教信仰密切相关。

蝴蝶的图案与蝴蝶的家纹

蝴蝶，因其美丽的身姿以及飞舞时的优雅高贵，自古以来便深受日本人的喜爱与追捧。

又因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飞来飞去吸取花蜜，人们总将它们与花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唐代，蝴蝶与牡丹的组合被赋予了富贵的寓意。这种思想也传入日本，成为王朝文化下象征着富贵之美的图案。直至今日，日本的“花札”（又称花牌）上依然可以看到蝴蝶与牡丹的图案。日语中有一种说法叫“蝶よ花よ（と育てた娘）”，指的就是富贵人家将女儿似蝶似花般捧在掌心疼爱。

作为美术工艺品的蝴蝶图案散见于正仓院的皇室珍藏品中。虽然有很多受到了唐朝审美的影响，但进入平安时期后，这些工艺品渐渐呈现出和风化的倾向。譬如，“和镜”[12]背面便大量采用了蝴蝶形象作为图案。进入十二世纪后，蝴蝶又作为漆工艺品的图案登场，日本国宝“莲唐草莳绘经箱”（藏于奈良国立博物馆）及重要文化财产“花蝶莳绘念珠箱”（藏于金刚峰寺）上都能看到蝴蝶意象。除此之外，蝴

蝶图案还被广泛用于牛车的金属装饰物、铠甲的金属装饰以及公家或武家的服装等。镰仓时代，人们又视蝴蝶为吉祥的象征，因此在日本国宝“笼手”（藏于春日大社）以及同为国宝的“蝶螺钿莳绘手箱”（藏于畠山纪念馆）上的蝴蝶图案，也因其美好的寓意而为大众所知晓。

众所周知，平氏家族的家纹便是“蝶纹”。据《源平盛衰记》所述，源赖朝的铠甲金属装饰上也缀有蝶纹，因此蝶纹并非平氏专用。其后，自称是平氏之后的诸家好用蝶纹，久而久之蝶纹便固定下来成为平氏的家纹。

战国时代，有着称霸天下之雄心壮志的织田信长忽然开始以平氏自称，并开始使用蝶纹。因为基于源平二氏轮流掌政的观念，在作为源氏后裔的足利氏之后，织田信长希望自己能够作为平氏后裔一揽政权。顺便一提，三河土豪出身的松平元康后改名为德川家康，自称源氏。这一做法充分说明了德川家康对织田信长之后的天下垂涎欲滴。

不管历史如何发展，正是织田信长的使用，使蝶纹深受武将的喜爱并被沿用下去。据《宽政重修诸家谱》记载，江户时期的大名、旗本中使用蝶纹的氏家多达二百几十家。蝴蝶意象与图案超过六十种，恐怕是昆虫纹样中应用最为广泛的。

庄周梦蝶与蝴蝶舞

日语中“蝶”这个名称亦可写作“胡蝶”。古时还会写作“蝴蝶”。

《庄子·齐物论》中“庄周梦蝶”的故事，在日本广为流传。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这个故事讲的是庄周做了一个变成蝴蝶的梦，梦醒后，他开始怀疑究竟是自己在梦中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刚才在梦中变成了自己。“庄周梦蝶”的故事比喻梦境与现实交杂在了一起，甚至超越了二者的区别，也喻指人生的虚幻。

日语中有一个说法叫“胡蝶の夢の百年目”[13]，它表达的是人在晚年时回顾自己的人生好似梦一般，又或者是人在临死前才惊觉自己的一生碌碌无为并后悔不已。与之相关的有下面这两句比较著名的诗：

ももとせの花にやどりて過してき

この世はてふの夢にぞ有ける

（宿于百岁花虚度，人生在世如蝶梦。）

——大江匡房

ちる花や胡蝶の夢の百年目

（落花缤纷，蝴蝶之梦，百年已逝。）

——松永贞德

此外，雅乐、舞乐中有一种叫作“胡蝶”的舞曲，也称“胡蝶乐”或“蝶”。这是一种四人“童舞”，四个孩童头戴饰有棣棠花的天冠[(10)]，身穿印有蝴蝶纹样的和服裙与上衣，身后背有仿照蝴蝶翅膀做成的装饰，右手持棣棠花翩翩起舞。扮作蝴蝶的孩童们的舞姿可爱又美好。

据说，这种蝴蝶童舞是在平安时代延喜六年（906年）或延喜八年（908年），宇多上皇在观赏孩童们表演相扑时，由乐人藤原忠房作曲，敦实亲王编舞而成。敦实亲王是宇多上皇的儿子，善雅乐，是一名琵琶高手。据说藤原忠房和敦实亲王还曾联手创作了“延喜乐”，这种舞曲也通过舞者表现了蝴蝶轻盈飞舞的样子，舞者们一边舞动着手臂，一边围成一个圆在台上一圈圈地旋转。

另外，与“胡蝶”相对的舞曲还有“迦陵频”，与蝴蝶童舞一样，由四个孩童来跳。他们头戴天冠，不过背后背的是鸟翅膀。在以前的佛教法会上，蝴蝶童舞与迦陵频经常一起表演。《源氏物语》的“胡蝶”一章中也出现了蝴蝶童舞与迦陵频，这说明作者紫式部曾多次欣赏这种非常可爱的舞蹈。

我们按照时间线往下说，日本的能乐中也有“胡蝶”。如创作了《舟辩庆》《罗生门》《钟卷》等剧目的观世信光（1435年—1516年），也创作了《胡蝶》这部作品。

《胡蝶》的主人公是一只蝴蝶精。剧中作为配角的僧侣到访古都，正值梅花盛开的季节，他久久凝望着梅花。这时一名女性出现并叹息道，自己能与四季开放的花嬉戏玩耍，却独独无法亲近早春盛开的梅花。这名女性便是这部剧目的主人公——蝴蝶精。她希望能够借助僧侣的法力成佛。于是，那天夜晚，这名僧侣为她祈了冥福。之后

他在梦中见到了那只蝴蝶精，托佛祖的福她可以与梅花嬉戏玩耍了，于是高兴地跳起了蝴蝶舞。

在净琉璃《寿之门松》中有这样一句台词："春育花诱人，菜种之味蝶不知，菜种之蝶花不知，彼此互不知……"

这句里的"菜种之味蝶不知，菜种之蝶花不知"意思是，蝴蝶飞到鲜花上吸取花蜜但却不知其叶之味，菜种之蝶（青虫）食叶却不知其花之味。这句话用来形容虽然看似关系密不可分，却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模样。

其实，这里说的"蝶"是纹白蝶。纹白蝶以十字花科的植物为食，以蛹越冬，樱花开花时节开始破茧而出。由于纹白蝶非常喜欢油菜花或卷心菜，美国人也会叫它们"Cabbage White"或"Cabbage Butterfly"。卷心菜里的绿色小虫往往是纹白蝶的幼虫。

话说，过去只要买卷心菜，几乎都能看到里面有绿色的小虫，但最近却不怎么能看到了。据说这不仅仅是因为杀虫剂的使用，人们还会向土中撒药来培育不长虫的卷心菜。这些农药不可能对人体有益。种植蔬菜的农户会单独种植自家吃的蔬菜，这才是以前吃的那种纯天然、会看到有虫子在里面的蔬菜。仔细想来，不仅仅只有纹白蝶遭受了苦难，我们人类也面临着非常可怕的局面。

我小时候非常热衷于捉蝴蝶，并在纹白蝶身上有所发现。当把十只捉来的蝴蝶制作成标本时便会发现，其中每一只身上的纹样都不尽相同。有的白翅膀上有一条黑色纹路，有的则有两条；有的前翅膀上没有纹路，后翅膀上却有；还有的没有花纹甚至花纹出现在底面；等等。这其中有些是与纹白蝶十分相似的黑点纹白蝶，乍一看都是白底的蝴蝶，但却各有特色，妙趣横生。

大紫蛱蝶与冻蝶

日本的国蝶是大紫蛱蝶，但这并不是说大紫蛱蝶自古便是日本蝴蝶之代表。它其实是在1957年被指定为国蝶的。大紫蛱蝶并非日本的固有品种，它分布在朝鲜半岛和中国的部分地区，是日本产的"立羽蝶"（蛱蝶）科近亲中体形最大的，在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数的大型蛱蝶。

每年，大紫蛱蝶都会在夏天展翅飞翔。雄蝶深紫色的鳞翅美艳绝伦；雌蝶比雄蝶大一圈，翅膀呈黑色，而非雄蝶那样惊艳的紫色。

少年时代的我生活在埼玉县的大宫市（现埼玉市大宫区），1945年—1964年那会儿，郊外的杂草树林、河川池塘到处都能看到大紫蛱蝶的美丽身影。

夏天的小树林可以说是喜爱昆虫的男孩们的天堂。特别是麻栎树林。这是因为麻栎分泌出的树液会吸引很多独角仙和锹甲，树上还有黄灰蝶、栅黄灰蝶、长尾蓝灰蝶等不同种类的灰蝶翩翩起舞。灰蝶科中，到底是谁先开始把那些飞舞在麻栎、枹栎、粗齿蒙古栎或日本桤木等树木枝头的黄灰蝶及其相近品种叫作“仄费洛斯”（Zephyrus，古希腊神话中的西风之神）的呢？曾经我也痴迷于捕捉这些种类的蝴蝶。最终，我找到了我的挚爱——翠灰蝶，为了得到一只完好无损的翠灰蝶，我甚至开始尽心尽力地进行养殖。冬天，我会在桤木的树干上找到那小小的、好似宝石一般的翠灰蝶卵，然后连树皮整个削下来带回家。春天，当桤木开始发芽，我就将它们放入饲育箱。渐渐地，翠灰蝶卵长成幼虫，开始吐丝并以叶子为巢穴。然后便会在树下的桤木落叶中变成蛹。如果养在饲育箱里，它们就会在堆起来的叶子中变成那些小小的、圆乎乎的蝶蛹。

雄翠灰蝶那宛若绿色天鹅绒般的翅膀颜色可谓无与伦比。雌蝶的翅膀虽然是焦茶色，但却跟人类的血型一样分A型、B型、AB型和O型。A型的雌蝶在前翅上有橙色的纹样，B型的是蓝色，AB型的则是橙色与蓝色纹样都有，而O型的没有任何纹样。AB型雌蝶的艳丽程度可以说丝毫不输雄蝶。

我们再说回杂树林里的昆虫。麻栎的树液除了会吸引各种甲虫外，还会引来大紫蛱蝶和朱蛱蝶。如果同时出现了朱蛱蝶、独角仙和锹甲的话，那么这根分泌出树液的麻栎树树干就会成为诸种昆虫的战场。捕虫少年们朝着目标大紫蛱蝶用捕虫网动作麻利地一扑，若能捕获一只首尾完好的大紫蛱蝶，那种兴奋真是溢于言表。

大紫蛱蝶以朴树为食，而以朴树为食的蝴蝶种类并不在少数。比如刚才提到的朱蛱蝶，以及胡麻斑蝶和朴喙蝶等。外观近似山毛榉的朴树曾被用作街道上“一里冢”的标识树而大面积种植，但近些年不少朴树都已枯死或被砍伐，已越来越少见了。

冬天，大紫蛱蝶的幼虫与胡麻斑蝶的幼虫一起在枯叶中越冬。我以前经常去捉这些在寒风中的朴树枯叶里紧紧相依、等待春天到来的枯叶色的幼虫。背后有四列角的是大紫蛱蝶，而胡麻斑蝶则有三列，这两种幼虫外表看起来十分相似。

近两年冬天，我在散步的时候看到了朴树，于是便在树根处试着

寻找蝴蝶的幼虫，但没有找到。现在，即使有落叶，基本上也会很快被清扫干净，所以很遗憾，适合幼虫越冬的“家”已经没有了。

这几年，不论是大紫蛱蝶还是胡麻斑蝶又或者是朱蛱蝶，在城市近郊几乎完全看不到了。即便公园里还种着几棵朴树，但落叶总是被清扫得干干净净，所以蝴蝶们的幼虫也无法在此越冬。

另外想补充一点，蝴蝶中也有一些是以成虫形态越冬的。朱蛱蝶就是其中一种。冬天，它们会在老树的树洞等地方静静地冬眠，春天苏醒后便交尾产卵、结束一生。而即便是在寒冷的冬天，某个阳光和煦的日子也会有蝴蝶翩翩飞舞，让人一瞬间错以为春天到来了。这种蝴蝶被称作“冬蝶”或“冻蝶”，但这几年几乎也看不见它们的身影了。

下面和大家分享两首有关冻蝶的俳句：

凍蝶の日ざせばほろほろ飛ぶ形

（寒冬嫣冻蝶，煦日阳光高空照，翩翩起舞姿。）

——白叶女

ささめゆき凍蝶翅を閉ぢなほす

（细雪轻盈落，严冬冻蝶刚展翅，却又催翅合。）

——树实雄

三　养蚕与养蜂的历史

支撑日本经济的蚕与生丝

自古以来，昆虫给予了日本人许许多多的恩惠。如果说到左右了国家经济的昆虫的话，那不必多说，一定是“蚕”了。实际上，蚕甚至支撑了日本的近代化发展。

1858年7月，《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签订，幕府也为一直以来的锁国政策画上了休止符，正式打开国门。同年，日本还与荷兰、俄罗斯、英国以及法国缔结了《修好通商条约》，第二年便开放了长崎、神奈川（横滨）、箱馆（函馆）的各个港口。

那时，欧美各国最期待从日本进口的便是蚕种及生丝。这是因为当时欧洲的两大蚕丝生产国——法国和意大利的蚕丝业正遭受着毁灭性打击。1840年在法国普罗旺斯地区出现的蚕病在1847年传到了意大利的伦巴第大区，1852年蔓延至法、意两国全国，这也导致欧洲的蚕丝业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危机。因此，欧洲业界为了复活养蚕业，急需从中东、近东、中国或日本等地引入未患蚕病的健康蚕。据说，通过引入、饲养来自各国的蚕种，欧洲人发现日本的蚕品质最为优秀。

幕府曾一度禁止蚕种的出口，在欧美各国的强烈要求下最终于文久三年（1863年）解禁，庆应元年（1865年）正式开始允许蚕种出口。德川幕府的最后一段时期，自打开国门后位列出口商品第一的便是生丝与蚕种。即便是在紧随其后的明治时代，它们依旧高居出口商品榜首，蚕种（蚕卵纸）、蚕茧和生丝等蚕丝类的出口额在明治初年（1868年）达到了总出口额的57%。自那以后至昭和初期，与蚕丝相关的出口常年保持在出口商品榜首。其占比在多的时候能达到出口总额的50%，即便是占比较少的昭和初期也能维持在30%以上。

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财务大臣松方正义在农商务省蚕业讲习所演讲时表示：“日本的军舰若都以生丝来换购，那么需要购买军舰时，必须生产出更多的生丝。”

生丝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绢，由桑蚕茧缫丝后获得。而蚕其实就是蚕蛾的幼虫。

发明了养蚕取丝再制作成纺织品这项工艺的是中国人。这项发明具有悠久的历史，据推测在四千至五千年前，新石器时代时便已经有了养蚕技术。此外，在出土的殷商时期甲骨文上便找到了“桑”“蚕”“丝”

“帛”等文字。汉代（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11]）是古代绢织物的成熟期。目前经考证得知，绢织物作为商品通过丝绸之路被带到欧洲可追溯到汉代以前。

古罗马称中国为“赛里斯”（Seres），意思是丝绸之国。那时，一块长达数百米的、用美丽且富有光泽的蚕丝织成的绢布对于西方社会来说是那么神秘而有吸引力。为了获得珍宝般的绢布，从遥远的公元前便开辟出了东西方商品交易的道路——“丝绸之路”。

讲述养蚕起源的金色姬与蚕神

绢究竟在何时传入日本，这点至今没有确切的说法。由于位于北九州的弥生时代前期中叶遗迹中出土的瓮棺内发现了绢布，所以一部分日本人应该是在弥生时代就已经开始使用绢布了。

据《魏志·倭人传》中记载，“妇人被发屈紒，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种禾稻、纻麻，蚕桑、缉绩，出细纻、缣绵”。由此可知，二三世纪的邪马台国就已经开始养蚕了。

在《日本书纪》关于雄略天皇的一章中，记载了下面这样一则故事：

三月辛巳朔丁亥，天皇欲使后妃亲桑以劝蚕事，爰命蜾蠃聚国内蚕。于是蜾蠃，误聚婴儿奉献天皇，天皇大笑，赐婴儿于蜾蠃曰：“汝宜自养。”蜾蠃即养婴儿于宫墙下，仍赐姓为少子部连。

此外，在《万叶集》中也能找到几首养蚕歌：

たらちねの母が飼ふ蚕の繭隠り

いぶせくもあるか、妹に逢はずして

（垂乳母育蚕，宛若藏身于其中；郁郁而寡欢，只因佳人不得见。）

——卷十二

筑波嶺の新桑繭の衣はあれど

君が御衣し、あやに着欲しも

（筑波山上新桑蚕，丝绢织作锦华衣；不及汝衣更欲着，情深意切盼汝知。）

——卷十四

在古代日本，绢被上流社会独占。为了进贡绢，农民被迫从事蚕的养殖，而最终能够穿上华美轻薄的绢布的却只有贵族。

有关养蚕起源的传说之一是在《御伽草子》等文献中记载的“金色姬”。

乘坐着用桑木制成的空舟漂到日本的金色姬，在继母的陷害下四次面临危机而四度长眠。从金色姬的尸体上长出来的便是蚕。蚕经过四次反复的长眠后，从五龄蚕到完全发育成熟，最终吐丝作茧。茨城县筑波町（现筑波市）的蚕影神社就因供奉着被视为养蚕祖神的稚产灵神和金色姬，自古以来颇受养蚕户的信奉。

而日本东北地区的“御蚕样”（养蚕神）之由来也与养蚕活动的起源紧密相关。“御蚕样”是由桑木制成的一对人偶，乃屋内神。在柳田国男的《远野物语》中，有下面这样一则故事。

某女与饲养的马私通，其父大怒，将马吊于桑木杀之。该女搂靠着马头哭泣，见此情景其父更是震怒，遂将马头砍下。随后，马头竟立刻载着该女飞升上天。不久，天上降下白虫与黑虫大肆啃食桑叶。而这些虫子便是当初那匹马与那名女子的化身。最终，马与女子成了一对神仙，即“御蚕样”。虽然有关“御蚕样”还有其他诸多传说，但大部分都基于这则马与女子相恋结婚的养蚕起源故事。即便到了现在，人们依然在蚕种的包装纸或蚕种纸上印上马的图案，这也是对“御蚕样”传说的传承。

如上所述，蚕自古代起便是一种与日本人关系密切的昆虫，蚕的养殖不但支撑了近代日本的经济，还给日本的农村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养蚕业既让很多人成为家缠万贯的富豪，同时也开启了女工的悲惨历史。不论养蚕活动为历史书写下怎样的篇章，它正在成为过去式。化学纤维的发明与发展，使得养蚕业从二十世纪中期前后开始逐渐走向衰败，现在在日本几乎找不到养蚕的农户了。

蚕，是一种从数千年前开始便被人类养殖的昆虫。自然繁殖已然

不可能，而它的成虫蚕蛾也几乎无法在天空中飞翔。今后蚕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

蜜蜂与养蜂的历史

除了蚕，人类自太古时期便开始饲育的昆虫还有蜜蜂。在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洞窟中发现了女性从树洞中采集、收取蜂蜜的壁画，而这壁画距今竟有约一万七千年。但这仅能说明从距今约一万七千年前开始，人类就在采集自然的蜂蜜，并不能直接与养蜂的历史联系在一起。

其实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古埃及人便已开始养蜂了。那时的壁画上面已能看到养蜂的图案，王室墓穴中也出土了装蜂蜜用的壶。

蜜蜂分为女王蜂（蜂王的别名）、工蜂与雄峰，它们各自承担着自己在蜂群中的职责。蜜蜂是一种过着群居生活且分工明确的具有社会性的昆虫。最初发现蜜蜂的社会性并做出了科学性阐释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说的“蜜月”（Honeymoon）起源于古代日耳曼民族的风俗习惯。据说当时的习俗是，新婚夫妇在刚结婚的一个月内要饮用蜂蜜发酵后酿造的蜜酒。蜜酒因营养丰富，被视作能够延长人类寿命的秘药。但因其无比贵重，所以并非日常饮品，只有为孕育新生命做准备的新婚夫妇才被允许在结婚的头一个月饮用。

蜜蜂为人类带来的不仅仅是蜂蜜，蜂王浆与蜜蜡也是蜜蜂的馈赠。

日本有关蜜蜂的最初记载是《日本书纪》“皇极天皇二年”（643年）一章中的“是岁，百济太子余丰，以蜜蜂房四枚，放养于三轮山，而终不蕃息”这一段。意思是将来自百济的蜜蜂放到大和国的三轮山尝试养蜂，但蜜蜂却并不繁殖。专家认为当时这种养蜂行为的目的其实并不是获取蜂蜜，更多的是获得铸造佛像用的蜜蜡。由此可知，蜜蜡可以用来制作蜡烛。

除《日本书纪》“皇极天皇二年”这一章外，直至江户时代，再也无法从日本史的文献中找到有关养蜂的记载了。平安时代编纂的《延喜式》（927年）中有“蜜，甲斐国一升，相模国一升，信浓国二升，能登国一升五合，越中国一升五合，备中国一升，备后国二升。摄津国蜂房二两，伊势国蜂房一斤十二两”这样的记述，但这仅是对进贡

的蜂蜜与采集蜜蜡用的蜂房的记录，这些进贡品究竟是天然的还是人工养蜂获得的，仍然无法确定。由于每个令制国进贡的量很少，可判断这些或许是天然的蜂蜜与蜂房。

《今昔物语集》中记载了一则蜜蜂在铃香山（铃鹿山）刺杀盗贼的故事。

某天，一位商人来到铃鹿山，却遭遇盗贼团伙的袭击，被抢去了价值相当于一百匹马的财物。但这位商人却十分平静地仰望着天空。不久，飞来一只巨大的蜜蜂，紧随其后一大群蜜蜂出现。这群蜜蜂飞到了盗贼安家的山谷，并将盗贼一个不留全部刺杀。这位商人不仅拿回了自己的财物，还连同盗贼的积蓄一并收入囊中，因而变得更加有钱。据说这位商人会在家中酿酒喂给蜜蜂饮用，十分爱护蜜蜂，所以这次刺杀盗贼其实是蜜蜂的报恩。

此外，镰仓时代的《十训抄》中还出现了一则“蜂饲大臣”的故事。这位大臣极好种花，院子里有一个很大的花坛。他还在花坛中养了蜜蜂。而据说这些被大臣驯养的蜜蜂会按其命令刺人。

这些古书中记载的故事虽能看出养蜂的痕迹，但蜂蜜的“蜜”之内涵从未出现一次，几乎都是关于蜜蜂用刺刺人的故事。

首次明确记载了有关以采蜜为目的的养蜂行为的文献是宝永六年（1709年）贝原益轩撰写的《大和本草》。该书记述了养蜂的用处，并推荐农家饲育蜜蜂，也正是从这时起养蜂开始盛行。

最终，纪州的熊野发展成蜂蜜的一大生产地。由于这一地区的蜂蜜品质极佳，其他地区甚至也会打着“熊野蜂蜜”的旗号进行售卖。幕府末期的安政年间（1854年—1860年），养蜂户开始在花开时节用扁担挑起蜂巢箱去往各地叫卖。

这一时期养殖的蜜蜂基本都是日本蜂，明治时期西洋蜂开始被引入日本，于是西洋蜂养殖成了主流。现在日本养殖的蜜蜂基本上都是西洋蜂。因为比起敏感、较难饲育的日本蜂，西洋蜂更容易管理，产蜜量也更大。

日本人与昆虫还有许许多多关联。比如，自古以来日本人就会吃虫子。有些地方至今还会食用蚂蚱、蜜蜂幼虫以及飞蚕等昆虫。战争年代，由于食物匮乏，人们还常以蚕蛹为食。

另外，日本人又长期与害虫进行着斗争。对于日本这个主要种植

稻谷的农耕民族来说，如何才能减少虫害、提高农作物产量，曾经是攸关生死的问题。历史上曾有多次因水稻白背飞虱及水稻粘虫的大量出现导致农作物严重歉收的例子。至今，在日本各地仍保留有“驱虫”或“送虫”的祭祀活动，这些对于农民而言是祈求没有虫害、粮食丰收的重要祭祀活动。

关于昆虫的谚语

日语中有许多关于昆虫的谚语或比喻，这也可谓日本人的生活与昆虫息息相关的证据。

与蜜蜂一样，蚂蚁也是具有社会性的昆虫，它们井然有序地群居在一起。

在日本，蚂蚁随处可见，它们会在土中建造蚁巢或蚁冢。相信大家都目睹过小小的蚂蚁排成一列，忙忙碌碌地往巢穴搬运食物的样子。日语中的“蟻の熊野参り”“蟻の伊勢参り”“蟻の百度参り”这些词都是用来形容很多人摩肩接踵、来来往往的样子。但蚂蚁队伍如果去到国外，似乎意思就大不一样了。比如，“蟻の入唐”这个词就比喻的是非常耗费时间。也有“蟻が塔を組む”或者“蟻集まって樹を揺るがす”这样的说法，它们表达的是：即便是不起眼的工作，只要孜孜不倦地坚持，就会成为伟大的事业；即便是微弱的力量，只要聚集起来，也能发挥极大的作用。这里的蚁塔就是指蚁冢。日语中的“蟻の穴より堤の崩れ”一句其实出自《韩非子》的“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比喻一个不起眼的疏忽也会致命。

日常生活中，蚊子、跳蚤和苍蝇可谓令人困扰不已。

“蚊が餅搗く”这个词描写的就是夏日傍晚成群的蚊子上下飞舞的样子，据说这是下雨的前兆。“蚊の鳴くよう”则形容用无力微弱的声音说话。“蚊の食う程にも思わぬ”比喻不痛不痒之事。“蚊を駆わず”则来自《晋书》中孝子吴猛“恣蚊饱血”的故事。据说吴猛因家贫买不起蚊帐，为了不让蚊子去叮咬父母，所以即便蚊子飞来叮咬自己也不会将其赶走。

此外，“蚤の小便、蚊の涙”比喻的是量极其微少。“蚤の夫婦”则用来形容体形上妻子比丈夫高大的夫妻。“蚤の金玉”“蚤の卵”形容不值一提的小事。“蝿が手を擦るよう”形容搓着手恳求别人的样子。“蝿若衆に蚊坊主”比喻毛头小子和奴才吵闹烦人的样子。而“五月蝿”这个词读作“うるさい”[14]，其实指的是五月雨，也就是梅雨季节时，苍

蝇突然大量增多，令人厌烦。

有关家附近和农田里的虫子的谚语亦不少。

“蜘蛛の家に馬を繋ぐ”指完全靠不住。“蜘蛛の子を散らす”则用来形容人们纷纷落逃的样子。

“蝼蛄の哮けり”与“蟷螂の斧”是一个意思，都是比喻不知道自己力量弱小而向强大的敌人发起挑战。“螻蛄才”比喻虽然多才多艺，但却都是派不上用场的才能。蝼蛄这种小虫子虽然可以飞，可以向上爬，也能在水中游，还可以挖土或者跑跳，但这么多种能力，哪个都派不上大用场。

“尺取虫の屈むは、その伸びんがためなり”这类说法源自“尺蠖之屈，以求信也”（《易经》），其言外之意极为深邃。

人们很熟悉的“夏の虫飛んで火に入る”这个说法之意与汉语的“飞蛾扑火”意思相同。

“蜻蛉の尻を冷やすよう”本是描写蜻蜓在水面产卵的样子，后用来形容慌慌张张不镇定的样子。即便粗糙简陋，依然靠自己的力量盖房子在日语中用了“蓑虫の家造り”这样一个说法来形容。“百足のあだ転び”意思是连看起来有很多脚、根本不会摔倒的蜈蚣都摔倒了，比喻只要不小心就会失败。“百足に草鞋を履かすよう”则用来比喻极其麻烦费神的事情。

除了上述这些，其实日语中还有很多跟昆虫相关的谚语。如果有一天昆虫消失不见了，这些有关昆虫的谚语或比喻是否会变得晦涩难解呢？

四　昆虫以外的虫子

日本人心中的“虫”

“虫”究竟是什么呢？狭义来讲就是指昆虫，我在本书里主要写的也是昆虫的事情。但是在中国和日本，“虫”的范围很广。本草学将除人类、兽类、鸟类和鱼贝类以外的小动物统称为“虫”。此外，在古时候的中国，人们还将老虎称为“大虫”，可见“虫”曾经是动物的统称。随后“虫”的范围渐渐有所限定，带虫字旁的动物往往属于昆虫。在日本，除了昆虫以外，在地面上爬的和钻在土里的其他动物也都被叫作“虫”。

蛇，自然也是一种“虫”，它甚至还有“长虫”这个别称。日本的蝮蛇是栖息在日本本州的蛇中唯一有剧毒的，因此被视为蛇中之王。此外，青蛙、蜥蜴也是“虫”，蚯蚓、水蛭和蛞蝓也是“虫”。虽然贝类在本草学中并未被归为“虫”一类，但从蛤、蚬、螺等贝类的汉字都是虫字旁可以推断，或许它们原本都曾是“虫”的一员。虾与蟹同理。

“虫”中甚至还包括蛔虫等寄生虫，这些肉眼看不见的生物也算“虫”的一种。通过虫牙和虫蛀这类词，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其实是将这些侵入人体的、看不到真面目的细菌当成了虫子。

除了上述这些以外，日本人还将“虫”视作内心的一部分。住在人的体内，支配着人类的感情和身体状况的那个东西，日本人称之为“虫”。日语中有很多相关的说法。比如，如果“虫の居どころが悪い”[15]，人就会发脾气；如果“虫が治まる”[16]，人的心情就会变好。“虫を殺す”这个说法则用来比喻一声不响地忍耐。如果要形容两个人初次见面就很合拍，日语会说成“虫が合う”[17]。“虫がいい”[18]既可以用来形容心情很好或者老好人性格，也可用来形容很任性、厚脸皮的人。而日语中的“虫の知らせ”则指忐忑不安，或对某事的发生有预感。

有意思的是男人出轨也是“虫”造成的。一旦“浮気の虫”（外遇之虫）爬进脑子，那就毫无办法了。由于男女私通是被禁止的，所以男人很难对已为人妇的女子下手，只能对未婚女子或年轻的寡妇下手。这些女子的父母为了防止有“悪い虫”（坏虫子）缠着自己的女儿，拼

了命也要抵制这些用心不良的男人，但往往还是会出现“虫がつく”（指未婚女子有了情人）的结局。然而这都是江户时代的事情了，现如今似乎就连已为人妇的女子也光明正大地搞起了外遇。可以说当今的社会中，“浮気の虫”（外遇之虫）和“悪い虫”（坏虫子）正在大肆繁殖。

接着说日语中有关虫子的说法，比如“虫気づく”，其实指的是感觉快要生产之意。日语在描述阵痛的时候就会使用这样的说法，这是因为日本人认为住在人体内的虫子会掌控人的生产。

为何蜘蛛会被讨厌？

接下来，我们讲讲昆虫以外被视作虫子的小动物。

自古以来，日本人就经常接触蜘蛛，但并不是出于亲近和喜爱，更多的还是忌讳与嫌恶。它那长长的八只脚、浑身毛茸茸的样子看起来十分诡异。古时候的人们认为蜘蛛是妖怪变成的，将其看作恶魔的化身似乎也情有可原。

在《古事记》《日本书纪》以及《风土记》等书中都出现了“土蜘蛛”。这个所谓的“土蜘蛛”其实是对总不归顺大和王权的民族之蔑称。《古事记》中记载着神武天皇在平定倭国时，在忍坂的大室召集了“土云八十建”（意为土人中的八十个勇猛之士）。《日本书纪》中对这些人的描述是“其为人，身短而手足长”。对于这些生活在竖穴式住居中的原住民，想来天皇家族的祖先在确立王权过程中应该是下了一番苦功夫的。最终，大和王权成为大和朝廷，也诞生了天皇家族。但贬低被征服者并将此写入历史书中的这种做法，可以说是古今东西几乎每一个胜利者都使用过的伎俩。

但其实，历史上并没有一个部族被推定为土蜘蛛族，这个部族的特征也并不确定。或许所谓的“土蜘蛛”是在《日本书纪》的编纂过程中被创作出来的概念上的异族。

现存一个被指定为日本重要文化财产的绘卷物——“土蜘蛛草纸”（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据说是镰仓时代后期的作品，上面描绘了源赖光制伏土蜘蛛的故事。

某天，源赖光带领随从渡边纲去往洛外北山的莲台野。在那里他们看见了在空中飞行的骷髅，于是追着骷髅的行迹来到了神乐冈的一间旧屋子。由于天色已晚，他们便在旧屋中留宿，但各种各样的妖怪

一直打扰着源赖光。黎明时分，一个妖艳的美女出现，她将白云像球一样扔向源赖光。源赖光拔剑砍向那团云，但剑却断掉了，剑刃则沾染上了白色的血。天亮后，源赖光与随从沿着白色的血迹找到了一个位于西山深处的洞窟。于是两人将洞窟内的怪物拽出来并制伏了它。这个怪物竟是一个巨大的土蜘蛛，从土蜘蛛的腹部又生出了一千九百九十九个人类的骷髅。

这个故事中出现的土蜘蛛显然就是妖怪的化身。之后蜘蛛也在诸多戏曲、狂言和物语中登场，但大多是以妖怪或恶魔的化身出现，被人们视作忌讳和厌恶之物。

源赖光之父源满仲的爱刀，同时也是源氏家族世代相传的名刀“膝丸”，也被人叫作“蜘蛛切丸”，其名正是源自源赖光的故事；“膝丸”一名则因该刀曾从犯人的头一直砍到膝盖部位而得。这把“蜘蛛切丸”在平治之乱（1159年）时丢失，成了传说中的名刀。

日本有这样一句谚语，“夜のクモはたとえ親に似ていても殺せ”，与之相对的还有一句“朝のクモは鬼に似ていても殺すな”[19]。“早晨的蜘蛛”被认为是好事将至或者是晴天的象征，而夜晚的蜘蛛却被人认为不吉利而遭到嫌弃，理由应该与其习性有关。“鬼蜘蛛”（大腹圆蛛）等蜘蛛白天时躲在屋檐下或树叶间，因不喜阳光而藏身不出，但到了太阳落山时就慢慢悠悠地开始行动，在织好的蜘蛛网上等待猎物上门。这不就好似在黑暗中猖獗横行的恶鬼吗！人们将蜘蛛比作在夜深人静，本该安心睡下之时，妨碍人们睡眠，胡作非为的魑魅魍魉或是邪恶之物，这只能说是蜘蛛的悲惨命运吧。此外，人们往往认为蜘蛛都有毒，这对于它们来说也是一件不幸的事。

实际上，日本原生的蜘蛛中几乎没有带毒的，即便有也是微毒。近几年，外来的毒蜘蛛“红背蜘蛛”颇具关注，但其实它所带的也只是微毒。蜘蛛几乎不会对人类有害，不仅如此，蜘蛛还是能帮助人类捕食蚊子、苍蝇等害虫的益虫。最近几年，利用蜘蛛来驱除树木或蔬菜上的害虫的研究（应用蜘蛛学）也得到了发展。

虽然日本人对蜘蛛十分忌讳，但在欧洲人们却十分珍视蜘蛛。古罗马人相信蜘蛛能够告知人们环境和气候的变化。就连《日本书纪》中也有一首关于衣通姬通过蜘蛛的行动预知了允恭天皇来访的歌谣。蜘蛛能为人们带来神的启示并能显示出某些事情之预兆的观念，看来是全世界共通的。此外，基督教中也有关于蜘蛛的传说。传说在圣家族逃往埃及，藏身于洞窟中时，多亏蜘蛛在入口处织网才使他们躲过了追兵。以英国为首，蜘蛛在欧洲各地都被视为繁荣的象征而备受爱护。特别是红色的小蜘蛛，被称为“Money Spider”，人们视之为发财

的吉兆。

虽然还没到令人作呕的程度，但蜘蛛确实是一种神奇的昆虫。吐丝（虽然说“吐”丝，但其实丝是从丝疣里出来的）之后，小蜘蛛会爬行在丝上，顺着上升气流，乘风飘向空中。大腹圆蛛和黄金蜘蛛等蛛类到底为什么能织出那么完美的圆形网呢？蜘蛛像一个优秀的猎人般完全隐藏好自己，静静地等待着猎物上门，这种捕捉本领也相当令人佩服。江户时代街边那些下三滥的轿夫或马夫被人们称为“云助”，其实正确的汉字写法应该是“蜘蛛助”。这一叫法也是源自蜘蛛张网等待猎物上钩的捕猎行为。据说,当时衙门的人一旦打算对“蜘蛛助”进行取缔或严加管理，他们就会迅速藏匿起来不见踪影。虽然关于“云助”的叫法，也有观点称是因为这些人像浮云般飘忽不定，但对于这个说法，我实在难以苟同。

不管怎么说，蜘蛛在人们心里的形象确实不太好。但古时候，人们并不只是一味地忌讳蜘蛛，反而会将其捕捉来当作玩耍的对象。让两只蜘蛛决斗、一较高下的“斗蜘蛛”便是很久以前从中国传来的一种玩法。阴历五月五，在鹿儿岛县和高知县，人们依然会举办让黄金蜘蛛决斗的“蜘蛛合战”。此外，江户时代还有捕蝇蜘蛛的比赛，看哪一只捉到的苍蝇更多。在井原西鹤的《好色一代男》中出现了描述当时江户流行的“蝇取蛛”的内容。这种“蝇取蛛”也称“座敷鹰”，据说能够很好地捕捉到飞蝇的“蝇取蛛”在当时会以很高的价格被拿来交易。柳亭种彦的《足薪翁记》还记载了优质“蝇取蛛”的拥有者会用饰有“莳绘”（漆工艺之一）的昂贵唐木箱来饲养自己的蜘蛛。

我甚是怀念曾经一到夏天，就用铜丝绕在长竹条尖上，一大早起床就在上面缠上蜘蛛网出去捕蝉的时光。现在，不光蝉很少见了，就连蜘蛛网都不怎么能看到了。对这种环境的变化，我们不应该感到高兴。

蛇与蜈蚣的竞争

前文中，我们稍微提到了蛇也是虫子的认知观念。而蜈蚣则是与蛇对抗的存在。正如人们曾相信有巨蛇一般，一直以来人们也相信存在体形巨大的蜈蚣。

根据《日光山缘起》等书的记载，很久以前日光的男体权现与赤城山山神针对山上的湖水——中禅寺湖的归属起了纷争。男体权现呈一条大蛇之状，而赤城山神则是一只大蜈蚣。这条大蛇与大蜈蚣经过反复的殊死搏斗，最后以大蜈蚣——赤城山神被射中眼睛告败而终。

而男体权现与赤城山神决一死战之地便是日光的战场原。原本这则传说更偏向日光一方，并将作为敌人的赤城山神描述成面目丑陋无比的大蜈蚣妖怪，故事也以男体权现将其打败为结局，因而这则传说对于赤城山来说实在有失颜面。

蜈蚣，在《古事记》中就已登场，那时它的形象便已是恐怖丑恶。《古事记》中记述的是须佐之男将苇原色许男（大国主神）关于室内，用蜈蚣等物责罚他的故事。

但是，赤城神社的鸟居上却雕刻有蜈蚣的图案，可见人们并非总将蜈蚣视作奇怪、丑恶之物。在京都的鞍马山便有将蜈蚣视为毗沙门天的使者而将其供奉起来的民间迷信。战国时代，甲斐武田氏军团中便有一支信玄麾下、被称为“百足众”的军队。据说“百足众”将蜈蚣的图案绘于旗帜上作为标志。这样做或许是出于人们将蜈蚣视为强大勇猛的象征，同时也包含了这支军队行动迅速、神出鬼没之意吧。此外，蜈蚣还被认为是钱神，在赚钱发财方面寓意颇佳。这种说法源自蜈蚣“足”多，而在日语里“御足”（おあし）的读音与钱（お金）的口语说法一样，所以“足”多也就象征着“钱”多。

据说，蜈蚣与蛇的对立自平安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今昔物语集》（据信创作于公元1110年前后）中便出现了下面这样一则故事：

加贺国的七名渔夫漂流到了一个岛屿。岛上出现一名年轻男子，以酒、菜款待了他们。然后，这名年轻男子告诉七名渔夫，明天会有敌人从别的岛屿攻过来，希望他们能帮助自己。第二天，从海上攻来的是一只长达十丈的大蜈蚣。而从这个岛的山上下来迎击的是一条看起来也有十丈长的大蛇。大蛇与大蜈蚣互相缠绕、激烈交战，眼看手多的蜈蚣占了上风时，众渔夫拿箭射向蜈蚣，并用刀砍之，终于击败了大蜈蚣。

创作于十四世纪后半叶的《太平记》记载了俵藤太“蜈蚣退治”的故事。

平安时代中期，有一个叫俵藤太秀乡的勇武之人。某一天，他在打算过濑田大桥时，一条长达二十丈的大蛇横于眼前挡住了去路。但他视若无物般泰然地踩着大蛇的后背走了过去。过桥后，一名男子追来，说道：“我是刚才那条蛇。多年来，因为土地问题，我一直被仇敌所扰。你刚才敢直接踩着我过桥，真是勇猛无畏，我希望拥有这般豪胆的勇士能够帮我讨伐敌人。”俵藤太秀乡答应了大蛇，于是在大蛇的带领下他来到琵琶湖中的龙宫。果不其然，夜已过半时，有一只大蜈蚣从比良山上攻下来。俵藤太秀乡举起刚弓，虽然前两箭没有射

中，但第三支沾了唾沫的箭正好射中大蜈蚣的眉间，于是大蜈蚣被制伏了。俵藤太秀乡得到了以赤铜钟为首的大量财宝，回到了都城，随后将赤铜钟捐给了三井寺。

室町时代的《御伽草子》中的“俵藤太物语”也记载了几乎完全一样的故事。这类故事的共通点是蜈蚣在故事中往往是邪恶一方，而人类往往站在蛇那一边助其讨伐蜈蚣。也确实，比起蛇，蜈蚣在感官上似乎让人更不舒服。

我曾经也有一次被蜈蚣吓坏了。那是我和家人一起去房总半岛的馆山游玩，住在了纲元的民宿中。半夜起来上厕所时，从天花板上掉下来一个东西，落在我脖子上，我用手一拂，它就掉在了我眼前。定睛一看，竟是一只超过十厘米长的大蜈蚣。那大概是只少棘蜈蚣，这种蜈蚣是日本原产的蜈蚣中体形最大的，最长可达十五厘米。现在想想当时看见的那只蜈蚣，仍然觉得惊悚可怕。而如果放到神话传说中，大蜈蚣一般都有十丈长，也就是约三十米，想想都令人寒毛直竖。

平安时代后期创作而成的短篇物语集《堤中纳言物语》有一则“爱虫公主”的小故事。据说，有一位公主十分喜爱人人嫌恶的毛虫或青虫，或许连蜈蚣之类的虫子她也喜欢吧。总之，这位公主喜欢的虫并非那些人们认为可爱的虫。故事中还有另外一位公主十分喜欢蝴蝶，这位公主想必经常跟蝴蝶、萤火虫、蝉之类的虫子玩耍吧。我当然非常想和这位爱蝶的公主交流一下，至于另一位嘛……

回到刚才的话题，除了蜈蚣以外，蛇还有其他天敌，那便是蛞蝓。虽然出自民间传说，但据称在战国时代就已经有了蛇的天敌是蛞蝓的说法。十六世纪九十年代成书的《义残后觉》中便出现了蛞蝓打蛇的故事。顺便一提，蛞蝓的天敌是青蛙，而青蛙的天敌却是蛇。创作于十八世纪初的怪谈集《金玉螺旋袱纱》（『金玉ねぢぶくさ』）中有如下一则怪谈。

在一间宅院的泉水中聚集了许多条蛇，这些蛇会捕捉栖息在池中的青蛙来吃。但不知从何时起，池边开始出现蛇的尸体。宅子主人深感不可思议，于是进行了观察，他看到一只有三条前腿的青蛙出现并不停地叫。青蛙的叫声吸引来了蛇，于是蛇向这只青蛙扑去。但蛇却突然痛苦挣扎而死，而这只青蛙却一边叫着一边离开了。宅子主人仔细看去，发现这只青蛙并非三条腿，而是其中一条前腿上夹着蛞蝓，在蛇扑过来时青蛙便将蛞蝓送进了蛇的口中。

第三章

花的日本史

一　樱花与梅花的国度——日本

作为国花的樱花是日本的固有品种吗？

樱花可谓日本当之无愧的国花，关于这一点自不必赘言。

和煦的春风，盛开的樱花，飘扬的花瓣，背着书包跨入小学校门的孩子——这应是大部分日本人共同的记忆。如今，日本没有一所学校的校园未见证过樱花盛开。近代以来，樱花作为国花被种植在每一所学校内，它代表着众多学童的希望之春，也象征着新学年的开始。直到现在，樱花依然在每一个春季开学之初绽放着希望。

虽然现在的樱花宛如和平之标志，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它却是军国主义的象征。因为那时的人们认为，作为日本男儿，就应该为了国家像樱花那般美丽地绽放，随后完美地凋谢。自孩童时便被植入的这种观念，与以“宁可无畏地赴死也决不屈辱地苟活”为美德的军人精神相结合，将众多受到动员踏入战场的年轻人逼向了死亡。

日本在刚刚战败时，这种风潮迅速发生转变，公园和街边的许多樱花树甚至都被砍倒了，因为这时人们的思想又有了转变，樱花所代表的军国主义、忠君爱国，成了不可取的荒唐之物。可这对于樱花来说是何等无辜的罪名。樱花分明是遭到了人的追捧和利用，却落得了在国家体制刚一转变时就要接受无情的谩骂与亵渎的下场。

但是，樱花并不会就此一蹶不振。现如今，它为日本整个国度施彩着色，展现着自己的柔美。在它身上，那段与战争捆绑在一起的禁忌记忆早已荡然无存。

战前，日本人深信樱花是日本固有的品种，并认为樱花的原产地就是日本，世界各地的樱花都是从日本引进的。之所以会有这种说法，据说是因为在江户时代前期，贝原益轩的《花谱》（1698年）及《大和本草》（1709年）中有“日本之所谓樱者，中华无之”这样的记述。十八世纪前期，新井白石又在《东雅》中对贝原益轩的说法加以补充与强化，该书写道，朱舜水——十七世纪时归化日本的一位明朝儒者——曾回答称中国并无樱花。

再加上十八世纪后期，日本的国学思想抬头，受贝原益轩与新井

白石说法的影响，越来越多人开始认为只有日本有樱花。最终这种思想上升至本居宣长的那句知名的和歌：

しきしまの大和心を人問はゞ

朝日に匂ふ山桜花

（问道敷岛大和心，山樱香阵熏朝霞。）

这种思想逐渐与幕府的尊王攘夷思想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又直接被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所继承。

虽然日本自古便有樱花，但樱花绝非日本的固有品种。其实，樱花主要分布在北半球的温带，中国的四川省和云南省、印度以及喜马拉雅山腹等地区均为樱花的原产地。而经过反复改良，使樱花能够如此娇艳美丽的才是日本人。日本有约一百种野生的樱花，由这些樱花培育出的园艺品种则超过了三百种。

江户后期，由染井村（现东京都丰岛区驹込）的花匠最先开始贩卖的“染井吉野”正是这种人工培育樱花的代表。虽然并没有确切说法显示最初是如何培育出“染井吉野”这一品种的，但人们大多认为“染井吉野”是江户彼岸樱与大岛樱的嫁接品种，也有说法称“染井吉野”其实是两种樱花“自然交配”的产物。

与“樱”相关的英语也值得一提。一般英语中说的“cherry”其实是指结樱桃果实的樱桃树，或者就是樱桃，而作为观赏花的樱花在英语中则被称为“Japanese Cherry”或者“Flower Cherry”。乔治·华盛顿少年时期的那则著名趣事中砍倒的其实是农园的樱桃树。契诃夫的《樱桃园》指的也是结樱桃的果树园。

美国波托马克河沿岸种植的樱花树，源于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时，东京市市长尾崎行雄赠送的两千株染井吉野的树苗。但最初的这两千株树苗却因虫害而全部被烧毁处理掉了，1912年日本又赠予了三千一百株樱花树苗，这些树苗长大后便构成了我们现在所见的波托马克河沿岸的花海风光。

木花之开耶姬与衣通郎姬

樱花自古以来就是日本人非常熟悉与喜爱的花。在《日本书纪》和《古事记》神话中登场的“木花之开耶姬”（《古事记》中写作“木花之佐久夜比卖”），其中的“木花”指的其实就是樱花。虽然有说法称，

原本日本人将樱花称作“Sakuya”，后来叫着叫着变成了“Sakura”，但这种说法无从考证。

木花之开耶姬是大山祇神的女儿，后成为琼琼杵尊之妻，并生下了海幸彦（火阑降命）和山幸彦（彦火火出见尊）。正如其名，木花之开耶姬生得美艳动人，琼琼杵尊见后心动不已，遂向大山祇神提亲，大山祇神于是将木花之开耶姬及她的姐姐磐长姬一起送给了琼琼杵尊。但琼琼杵尊只想要木花之开耶姬一人，于是将相貌丑陋的磐长姬退了回去。其实，大山祇神将两个女儿嫁给琼琼杵尊是有原因的。他希望能将木花之开耶姬般的美貌以及磐长姬般的长寿带给琼琼杵尊的子孙。但因为琼琼杵尊拒绝了磐长姬，所以其子孙——人类的生命才像樱花般短暂而脆弱。

《日本书纪》第十三卷中记述了允恭天皇和衣通郎姬（衣通姬）的恋爱故事，而这个故事中也出现了樱花。衣通郎姬是允恭天皇的皇后忍坂大中姬的妹妹，其美貌世间少有。据说衣通郎姬白嫩的肌肤所散发的光芒甚至能够穿透衣服。

允恭天皇纳衣通郎姬为妃，令其住在藤原，但由于忌惮皇后而无法前往衣通郎姬的住处。终于在皇后生产之后，允恭天皇才得以第一次前去衣通郎姬那儿。那一天，衣通郎姬咏诵了这样一首歌——“我夫子が来可き宵なり笹がねの、蜘蛛の行ひ是宵著しも”，意思是：预感今夜我的丈夫允恭天皇将要到来，细竹根上能清楚看到蜘蛛结的网。听完这首歌后，允恭天皇回应道，“ささらがた錦の紐を解き放けて、数多は寝ずに唯一夜のみ”，意思是：快点解开锦缎的腰带，我不要求有几晚，只求今夜你我能共度良宵。于是二人当晚共度一夜春宵。第二天早晨，允恭天皇望着水井旁的樱花吟诵道，“花細し桜の愛で同愛でば、早くは愛でず我が愛づる子ら”，意思是：精致美丽绽放着的樱花啊，如果这份爱（与对佳人之爱）相同的话，为何没能早点爱她呢，我的爱人衣通郎姬啊！在这首诗中，允恭天皇以樱花比喻衣通郎姬。

不论是木花之开耶姬还是衣通郎姬，在“记纪”中登场的这两位绝世美女都被比喻成了樱花，由此可见，古时候日本人就对樱花有着深厚的感情。而樱花作为观赏对象受到大众的喜爱则是后世之事了。

奈良时代，如果单说“花”，大部分时候指的是梅花。而樱花在平安时代以后才渐渐成为“花”的代名词。《万叶集》中咏梅的诗歌有一百一十八首，数量仅少于咏萩（胡枝子）的一百四十一首。但歌咏樱花的诗只有四十首，仅相当于梅花的三分之一。

俘获万叶人之心的梅花与菅原道真

梅花，可以说完完全全俘获了万叶人的心，但它并未出现在《日本书纪》和《古事记》中。梅花原产自中国，奈良时代传入日本，几乎瞬时就博得了日本人的青睐，究其原因，或许是梅花比樱花开放得更早，而且梅花会用它那淡淡的清香告诉人们春天即将到来吧。

色よりも香こそあはれと思ほゆれ

誰が袖触れし宿の梅ぞも

（国色天香比，天香胜一筹。庭梅香触袖，香袖至今留。）

——无名氏，《古今和歌集》

春の夜の闇はあやなし梅の花

色こそ見えね香やは隠るる

（春夜亦何愚，妄图暗四隅。梅花虽不见，香气岂能无？）

——凡河内躬恒，《古今和歌集》[20]

梅花的绽放与黄莺的初啼成对，或许也为其获得极高人气做出了贡献。虽然即便没有梅花，黄莺依旧会啼叫，但梅花与黄莺的搭配被广泛吟咏于诗歌之中，甚至到了只要有黄莺的叫声就会令人联想到梅花的程度。而几乎整个日本都能听到黄莺的啼叫声。

最初将梅花与黄莺一起吟诵的是《怀风藻》（751年）中，葛野王的《春日玩莺梅》这首诗。该诗也是日本史上第一首描写梅花的诗歌。葛野王是大友皇子（弘文天皇）和十市皇女的长子，生于天智天皇八年（669年），于庆云二年年末（706年）(12)去世。也就是说，《春日玩莺梅》这首诗创作于七世纪后期至八世纪初期，在那之前并没有记述梅花的文献。这首诗的原汉诗版本如下：

聊乘休假景，入苑望青阳。

素梅开素靥，娇莺弄娇声。

对此开怀抱，优足畅愁情。

不知老将至，但事酌春觞。

然而，这首诗中最重要的“素梅开素靥，娇莺弄娇声”一句却并非葛野王原创，有学者指出这一句实则源自南朝陈诗人江总的《梅花落》一诗中的“梅花隐处隐娇莺”一句。但在创作此诗时，葛野王的宅邸是否已种上了梅花，或者黄莺是否在那花枝上鸣叫，迄今为止尚无确切史料证实。

虽然《万叶集》中收录了许多咏梅诗，但天平二年（730年）正月十三日，在大宰帅大伴旅人宅邸举办的梅花诗宴上，参加宴席者每人赋诗一首而集结成的《梅花歌三十二首》也颇为有名。比如以下几首，均广为流传。

春さればまづ咲く宿の梅の花

ひとり見つつや春日暮らさむ

（暖阳春日到，最先梅花开。屋前绽其姿，独待春日沉。）

梅の花散らまく惜しみわが苑の

竹の林に鶯鳴くも

（梅花飘零散落，痛惜岂无声。我苑竹林里，黄莺正乱鸣。）

鶯の声聞くなへに梅の花

吾家の苑に咲きて散る見ゆ

（忽闻黄莺啼，思绪自然随。犹见吾家苑，梅花缤纷落。）

也就是说，从这时起人们已经开始在院中种植梅花，并会举办赏梅宴等活动了。但梅花与樱花不同的是，它并非山里的花树，而是更适合种植在都市、曾由贵族们种植在庭园中的花树。

在第一章《树木的日本史》中我也为各位读者介绍过，御所的紫宸殿南阶正面东、西两侧种植的“左近樱”与“右近橘”中的樱花，其实最开始是梅花。天德三年（959年）九月，被烧毁的皇宫重建时，梅花被换成了樱花。从这时起，樱花也渐渐取代梅花成为“花”之代表。前文提到，《万叶集》中有诗：“宫中仕宦人，闲暇出宫门。头簪梅

花蕊，同迎此地春。”但到了《新古今和歌集》中就变为：“宫中仕宦人，闲暇出宫门。头簪樱花蕊，今日亦逍遥。”诗句的改变很好地印证了人们从推崇梅花到喜爱樱花的转变。但这并不意味着梅花就此被打入“冷宫”。虽然梅花不如樱花那般娇艳，但依然有着根深蒂固的地位，并且广泛渗透进了民间，至今依然流传着许多与梅花有关的传说。在此之中，尤以讲述菅原道真之悲剧的“菅公飞梅”（飞梅传说）最为人熟知。

据说道真好梅，其位于京都西洞院附近的宅邸亦被称为“红梅殿”。因在与藤原时平的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菅原道真被左迁至大宰府。延喜元年二月一日，菅原道真离开红梅殿，该日期换算成格里高利历是公元901年2月27日。当时，庭园里的梅花正开始散发香气，于是菅原道真咏诵了一首流传至今的名诗：“东风吹，梅香满人间，纵然无主，勿忘春来到。[21]”据说，在菅原道真被贬至大宰府后不久，红梅殿的一枝梅花便飞入空中，最后飞落至大宰府生根发芽。

此外，“莺宿梅”（见于《大镜》等）的故事也广为人知。这个故事发生在“菅公飞梅”后大约五十年，由于清凉殿的梅花枯萎，村上天皇想方设法寻找梅之名树，最后找到了西京附近的一个家宅，打算将那里的梅花移植到清凉殿。之后，运到宫中的梅花枝上绑着一张那家少女写下的长条诗笺——“勅なればいともかしこし鶯の、宿はと問はばいかに答へむ”。意思是：“若这是天皇的勅命，那我也没有办法，但当寄宿在这棵梅树上的黄莺飞来，向我询问它的家去了哪里时，我该如何回答呢？”村上天皇看完后，理解了少女的心情，于是将梅树奉还。这名少女便是纪贯之的女儿。后来这名少女被召入宫中，人称“红梅内侍”，而梅花也开始被人们叫作“莺宿梅”。

花盗人与吉野樱

我们再说回樱花。

狂言中有《花盗人》一出剧目。这里的花自然是指樱花。

一名僧人将樱花枝折下欲带走时，被这家的主人捉住并绑在了花树下，于是有了下面这段跟盗花僧人的对话。

僧人引用素性法师的和歌，“但见山樱盛，语人空自夸。愿能亲手折，携赠各还家”，来为自己辩解，称自己折樱花枝实属万不得已。而这家主人立刻以僧正遍昭的和歌回应：“此番折花去，垢污沾于腕。前今后三世，献花心向佛。”借以指责盗花僧人。这名盗花僧

人依旧不服输地以大伴黑主的歌还嘴道："道边樱花树，身卑不宜憩。折樱置薪上，负春行于山。"樱花主人听完后深感有趣，便承诺只要盗花僧人即兴和歌一首便原谅他。于是僧人和道："今春来盗花，被绳捆于树。此景为人见，或称乌帽子。"主人听后觉得甚是有趣，便将绳子解开，还以美酒招待了盗花僧人。

这种折下一枝樱花装点在室内的愿望，实属人之常情。

清少纳言在《枕草子》中写道："撷取盛开的长长樱枝，插入大大的花瓶里，反较在外时更为赏心悦目。"但其实，最为美丽动人的还是许多樱树一同绽放花朵时。日语中有一句俗语，"桜切る馬鹿梅切らぬ馬鹿"，直译过来就是"砍樱花树的是笨蛋，不砍梅花树的也是笨蛋"。这个俗语经常用来比喻尽做多余的事，却把真正该做的事情放在一边这一愚蠢行为。正如这句俗语所言，梅花的树枝越是修剪，越会长出新的嫩枝，开出更多的花，但樱花的树枝一旦剪断或者折断，就会枯腐。

既然说到了跟樱花有关的人物，那就必须要提一提西行这个人。

西行在出家后，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以樱花闻名的吉野一地，带着自己对樱花无与伦比的热爱生活着。他曾咏诵"愿死春花下，如月望日时"；还曾写下了"此身成佛后，行人见吾墓。若欲相吊念，当捧樱来献"的诗句。这句诗里的"佛"其实就是指死后的自己。文治六年（建久元年，公元1190年）二月十六日，正值他曾吟咏的望月（二月十五日）之时，西行去世，享年73岁。这一日期若换算成格里高利历，即1190年3月30日。此时，吉野的山脉已经开始由樱花装点上粉嫩的色彩。

关于西行为何如此执着于樱花，我曾在拙作《推动历史的男人们》（『歴史を動かした男たち』，中公文库）的"西行"篇中陈述了愚见，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看。

此外，吉野山之所以会成为著名的樱花之地，与役小角（役行者）的传说有关。据传闻，吉野山上的金峰山寺之开创者即役小角，而寺内藏王堂中的本尊立像正是役小角本人用山樱雕刻而成。平安时代以来，将樱花树作为神木捐赠树苗的风气已然形成，镰仓时代后这种风气更加盛行，随后吉野山就成为"一目千本"、漫山遍野都开满樱花的名山。

二　花的精神与赏花之宴

从《风姿花传》看花之心

能乐论集《风姿花传》一般也称《花传书》。这本书由能乐大师世阿弥在父亲观阿弥的遗训基础上撰写而成。对于该书书名的由来，世阿弥曾表示："虽说要继承这项技艺之风貌，然而，那些己之力所不能及之处，甚至难以言喻。唯望得其风姿，化为以心传心之花，遂命名《风姿花传》。"

在这本书中，世阿弥将能乐的生命与本质比作了"花"，以此为核心进行论述。书中所述不仅仅是能乐的深层意义，还包括各种艺术论、教育论和训世之道，所以直到今日，这本书仍以自己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众多读者。

我认为在谈论"能"时借用"花"来进行论述，足见日本人对花的情感之深。《风姿花传》中描写的花自然不单指呈盛开姿态的鲜花，还包括更加深奥的风雅之极致，以及花的精神。只有自古以来便将生活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与花紧密联系起来的日本人，才能够真正理解该书论述的观点与精髓。随四季流转而交替盛开的各式花朵既是普遍存在的，又是恒久不变的，它们成为滋养日本人感性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风姿花传》称，（对于能乐艺人而言）一旦超过了特定年龄便会失去的，乃"时机之花"，而直到三十四五岁方才盛开，即便到了四十四五岁依然不会失去的，才是"真之花"。

此外，书中说，"欲知花应先知种。花为心，种为技"。意思是，从七岁开始就要反复学习与练习，只有这样才能打好基础，这才是"花之种"。

书中还说道，"花、趣、珍，三者同心也"。这里的"趣"指的是感到有趣、被吸引的样子；"珍"则是对（表演）给人留下的清新印象的一种赞美之情。

世阿弥认为，一年四季均可盛开的花与杂乱无章地开放的花毫无珍、趣可言。那些随着更迭的四季开开落落的花才称得上珍贵而有趣味，才能称为真正的"花"。

现如今，人们会故意让鲜花反季开放，很多花店一年四季都摆着同样的鲜花。这其实已完全抹杀掉了鲜花的珍与趣。现代日本人只追求颜色与花形之美，根本不理解“花之心”，可以说他们作为日本人已经丧失掉了原有的文化感性，称其为国籍不明的“新人种”也不为过吧。而《风姿花传》通过“花”，传授给了我们各种在世为人之道。

“秘すれば花”（隐秘方成花）也出自《风姿花传》，这是一个非常含蓄、隐晦的说法，意思是决不能卖弄美貌，正如花决不能为了显示自己的美而张扬地开放。在应绽之时、应绽之地，不刻意地自然开放，这才是“花”之珍趣，这种美才会令人印象深刻。

花道的精神与其历史

被通称为《花传书》的，除了能乐的《风姿花传》外，也包括其他书籍。记述花道深奥意义的书籍大多是在近世创作的，比如《仙传抄》《立花大全》《抛入花传书》《池坊专应口传》等。

《风姿花传》借“花”讲述了习得能乐的深奥意义，这本《花传书》更多的是描写如何将花装饰得更加美丽动人、富有情趣。日本人将插花的行为提升到传统艺术之高度，所以需要不断地修炼来求道，最终诞生了“花道”。

能乐与花道虽然是完全不同的艺术形式，但却有共通的精神。《池坊专应口传》中有这样一段话：“将花插入瓶的风俗，自古便有。但仅是赏美丽之花，却无从领略草木之风，只是插之赏之罢了。野山野水边自然而成之姿更加绰约。”其意是，仅仅为了好看而把花美美地装饰起来是不够的，还要在草木的衬托下，使之呈现出宛如处于自然山水中的浑然天成之姿。换言之，让花呈现出处于四季更迭中的最自然、最原始的样貌，才最为理想。

日式房间中的“立花”据说形成于室町时代中末期，伴随着佛教传入的，不仅是用花作为装饰的这种行为，还一并传入了“（佛前）供花”的习俗，据说这便是“立花”的原型。但由于“供花”是将花供奉给佛祖，是一种庄严的宗教行为，所以花本身的美并不是用来供人欣赏的。到了镰仓时代，人们才开始在室内进行插花，用以观赏。直至平安时代，已经出现了将花放在栏杆或窗边等室外的地方进行观赏的相关记录，比如，《枕草子》中的“高栏上搬来一只大的青瓷花瓶，插了许多枝长五尺许的盛开的樱花，花儿直开到高栏边来”这类记述。

镰仓时期，藤原定家在《明月记》中便记录了将各种各样的花插

在花瓶里的“花合”行为。室町初期的《迎阳记》也显示，那时人们曾在舶来的珍贵器皿中插入鲜花进行“花合”。到了室町中期，便出现了“立花”专家。这些“立花”专家会前往将军宅邸或皇宫插花，他们创立了插花的样式与仪式。

安土桃山时代，“立花”渐渐发展成一种艺术，并且几乎可以说发展成熟了。到了江户初期，在喜好“立花”的后水尾天皇的庇护下，池坊专好（二代）大获成功。

“池坊”，原本是因六角堂而闻名的京都顶法寺中一间僧房的名字。室町中期，这间僧房出了一名颇擅长立花的寺僧。而这位寺僧便是著名的连歌师池坊专庆。随后，写下了《口传书》的池坊专应登场，《碧山日录》评论道，“池坊六角堂执行花上手也”，由此以立花为家业的池坊这一流派也确定了自己的地位。

除了“立花”，花道中还有另一派系。室町后期，不同于“立花”，主张不拘泥于仪式、形式颇为自由的“抛入花”登场。安土桃山时代，“抛入花”与茶道相结合，逐渐形成了自成一派的插花形式。在品茗会上自由随性地插花，其过程不受任何形式之约束的这种“茶花”，通过著名茶师千利休获得了极高的地位。到了元禄时代，住在城镇的商人和手艺人间流行起花道与茶道，不拘一格的“抛入花”，也即“茶花”，开始与茶道“解绑”，逐渐成了人们的日常装饰。江户中期以后，形成了如千家流、松月堂古流、古田流、远洲流等诸多花道流派。也就是说，伴随着插花行为的普及，花道也逐渐成形。顺便提一下，插花被广泛作为妇女修德的一项学习内容是在幕府末期。同样是在幕府末期，家元制度[13]的基础也形成了。

正如上文所述，日本人不单单是把花作为美丽的事物用于观赏和装饰，还追求隐藏在“花”深处的“心”，所以日本人才将插花行为升华成一种艺术，进而求道，最终创立了花道。

现在，仍有很多女性会去学习花道。虽然我很想说，花道作为日本的传统文化延续至今，已发展得极为兴盛繁荣，但更多的人与其说是学习花道，不如说只是了解了一点皮毛而已。各种花所代表的意义和“花心”，他们又能理解多少呢？

五节供与花

与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节日活动可以概括为“五节供”（也称五节句，即五个节日之意）。这“五节供”分别如下：

一月七日，人日节供；

三月三日，上巳节供；

五月五日，端午节供；

七月七日，七夕节供；

九月九日，重阳节供。(14)

这些节日原本源自中国，在江户时代由幕府定为一年一度的节日活动，随后广泛普及至民间。上面所说的这“五节供”与古时候宫廷举办的名为“五节会”的皇室活动并不相同。“五节供”在明治六年（1873年）曾一度被废止，但由于仍在民间持续流行，所以发展至今，“五节供”也成为日本人一年中最重要的几个节日。

至于为何这五个节日会与日本人的生活关系如此紧密，其中一个原因便与花相关。一月七日的“人日节供”也被称为“七种（草）节”，人们会在这一天吃七草粥。三月三日的“上巳节供”是桃花的节日，因为阴历的三月三日左右正是桃花绽放的时节。同时它也是日本的女儿节（雏祭），这天人们会摆出日本人偶并装饰上桃花。五月五日的端午节供则是菖蒲节供，这一天的习俗是泡菖蒲澡，饮菖蒲酒，装饰花菖蒲；同天还会挂起鲤鱼旗，摆出武士人偶。与女儿节相对，由于菖蒲与“尚武”在日语中发音相近，所以这一天也被视为男儿节。“花菖蒲”属于菖蒲科的多年草本植物，江户时代，人们培养出了众多菖蒲科的园艺品种。而“菖蒲”其实是芋科植物。《万叶集》中出现的“菖蒲草”则是指野生的鸢尾。

这五个节日中似乎只有七月七日的七夕节供与花无关。在七夕这天，人们会为星星庆祝。虽说如此，但这一天其实与花也有着不解之缘。正如“抚子花竞绽，今日心相通。欲问如何借，彦星高空照”这首诗中所述，平安朝时期，每逢七月七日会举办“竞花”活动，人们互相竞比，看哪朵花开得更为灿烂美艳，这个活动也被称为“抚子合”。

到了室町时期，“竞花”已经固定为七夕的一项娱乐活动，并渐渐地与池坊的七夕立花以及民间的七夕插花联系在了一起。此外，有些地方有在七月七日举办“七日盆”的习俗，当天人们会在亲人的墓地上插上女郎花或桔梗花。还有的地方会在这一天采摘盆栽中的鲜花。

九月九日重阳节供是菊花的节日。直至今日，在九月九日前后，日本各地依然会隆重地举办菊花展、菊人形展以及菊供养等活动。长

崎的“御供日”作为旧历重阳节之祭奠活动远近闻名，据说该活动源自在重阳节这一天与神灵一起吃下祭供食物的古老仪式。而日本的“御节料理”原本也是在节日时供给神灵随后人神共食的料理。

综上所述，日本人非常熟悉的这五个节日，其实也是花的节日。遗憾的是，按照现在的新历，节日与花的时令无法达成一致，这是因为旧历时间往往会与新历错开一个月左右。所以我们在考虑每年的传统节日时，在试图去理解古典诗歌及俳句时，在解读古典文学或历史资料时，都不要忘了将脑中的时间概念转换成旧历时间。

“醍醐花见”与“长屋花见”

前面我们提到的立花与插花，更多的是局限在室内的个人赏花行为。而大家一起前往户外赏花也是日本自古有之的风俗习惯。虽然也存在观梅会或观菊会，但基本上一提到“花见”（赏花），指的就是欣赏樱花了。

原本盛行于平安朝时期的“花见”是贵族的娱乐，宫中会举办观樱宴或外出赏樱的“樱狩”等活动。直至室町时代后期、进入战国时代时，“花见”不再仅仅是贵族的娱乐活动了，从武士到平民百姓的各阶层中，这项活动也逐渐盛行起来。

安土桃山时代，狩野长信在《花下游乐图屏风》中便描绘了人们在盛开的樱花树下撑起帷幔，演奏起雅乐，举办“花见宴”的欢愉景象。

战国时期的大名绝非终日只想着打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热衷于熏陶自身的文化素养。他们热爱风月、吟诗诵歌、欣赏能乐、品味茶道并且经常举办赏花宴会。

这其中属丰臣秀吉的“醍醐花见”最为空前绝后，堪称史上最大规模的赏樱活动。

庆长三年（1598年）阴历三月十五日，位于京都的醍醐寺的群山一带种满了樱花树，丰臣秀吉命令各位大名和奉行依据自己的喜好在山中各处搭盖风格各异的茶屋，然后举办了大规模的赏花活动“醍醐花见”。丰臣秀吉的正妻宁宁带着侧室淀殿及其下约一千三百名侍女参加了这次赏花活动，她们还换装列队游行，换装次数竟多达三次。

这次“醍醐花见”的总奉行是前田玄以，关于举办赏花活动，有过

下述这段对话。

丰臣秀吉问前田玄以京都的经济状况，前田玄以答曰：“大家经常赏花，可见经济应该是不错的。”但丰臣秀吉却否定道：“不对，正是因为经济不景气大家才会去赏花。如果生意兴隆，是不可能有闲工夫赏花的。”随后丰臣秀吉命令前田玄以道：“那我们就在醍醐举办一场盛大的赏花活动，让诸位大名工作起来。这样一来大家都能工作，百姓也就能受惠。”也就是说，彼时的这场赏花活动其实是振兴经济的一项公共事业。

当然这不过是民间流传的一种说法。实际上，“醍醐花见”是由醍醐寺三宝院的僧人义演提议的，目的是安慰在朝鲜侵略战中陷入僵局的丰臣秀吉。

在这场盛大的赏花活动中，丰臣秀吉心情极佳，他前往各个茶屋，欣赏着在纷飞的落樱中身着华服美衣、喜上眉梢的妻妾们。这场极尽奢华的大型赏樱活动宛如在讴歌当世的春之美好，但也好似樱花在即将飘落前呈现出的最美的一瞬，虚无而又缥缈。在“醍醐花见”后不久，丰臣秀吉便一病不起，五个月后的阴历八月十八日，62岁的丰臣秀吉因病去世。

江户时代起，武士和老百姓也开始加入赏花的队列。上野的山自很早开始就已是赏花的胜地了。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将吉野山的樱花树移植到了宽永年间（1624年—1644年）建造的宽永寺。从那之后，上野的山便因花见宴而热闹不已。后来，四代将军德川家纲将墓地建在了宽永寺，所以曾一度禁止赏花期间演奏歌舞音曲。但江户人并没有屈服，幕府也无法全面限制老百姓的娱乐活动，所以后来人们在赏花之时依然热热闹闹、一片欢腾景象。过去，伴随着“暮六”（傍晚六时）的钟声，山门会关闭，来此赏花的人也会被宽永寺的守卫赶走。篝火火光映照下的夜樱美不胜收，正可谓“春宵一刻值千金”。实际情况却是“千金时分至，花山却逐客”。

现在，东京都内很多赏樱的著名景点都是由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在享保年间（1716年—1733年）一手打造的。比如，王子的飞鸟山、品川的御殿山、隅田川堤（墨堤）以及小金井堤等。据说，因为赏樱这项娱乐活动有益身心，所以被视作享保改革的一环，由政府大力推广，这样一来也能分散江户市民对经济不景气的不满与抱怨。

江户人十分热衷于赏樱。那时的富裕阶层会在樱花树下铺上毛毡，饮酒歌舞、极尽享乐，有时还会举办“俳谐”会或“狂歌”会等活动，以此优雅地消遣一日时光。

而另一方面，没有钱的老百姓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赏樱。落语《长屋的花见》就用诙谐幽默的语言讲述了老百姓赏樱的景象，我听过很多遍，依然觉得十分有趣。平民没有毛毡，就以席子代替，喝不起酒就喝茶，吃不起鸡蛋卷就吃腌萝卜，没有鱼糕就用大白萝卜代替。即便如此，寻常百姓依然以茶代酒，乐在其中，以自己的方式享受着花见之宴。樱花带给了所有人喜悦与快乐。

樱花之美，不分贵贱，雅俗共赏。

三　四季的花历

一月之花·水仙的故事

无论是谁，看到娇艳绽放的鲜花，都会乐以忘忧吧。爱花之心可谓人皆有之。但是，或许没有哪个民族能比日本人更爱花。他们并不单单欣赏田野或庭院里盛开的花朵，或者将美丽的花装饰起来，还将四季中各不相同的花与自己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他们不仅仅喜爱花的美丽，还希望更进一步触及花的精神，于是便创立了“花道”，试图让自己的深层心灵更接近花。

花，或许在日本人形成文化感性的过程中，对其中最本质的一部分施加了重要影响。

日本是一个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种类的鲜花装点的国度。姹紫嫣红、美不胜收的春、秋两季自不必说，其他季节中也能看到形形色色、五彩斑斓的花。

接下来让我们根据松田修的《花历》（『花ごよみ』，由现代教养文库·社会思想社出版）来看看近代以前日本人最熟悉的几种花吧。

一月是茶梅（日本称“寒椿”）和皱皮木瓜开花的季节。白雪皑皑的院子里，一枝茶梅迎寒绽放，真是点睛之笔。一月，在南方比较暖和的地方，梅花早早盛开，结香花也在新叶发芽前开出了娇嫩的小黄花。福寿草、水仙及雪割草等也都是在一月开花。

越前海岸有片野生的水仙花海，真是绚烂至极，让人如痴如醉。一月开始，这些野生水仙便坚强地在寒风中绽放，直至三月左右时，整个越前海岸就成了一片白色的花海。据说，此地的水仙是因为受到暖流影响才能在严寒之中绽放。也有人说，越前海岸的这些水仙是中国大陆的水仙球根被海流冲过来后自然生长起来的。

水仙的原产地其实是地中海地区。希腊神话中纳西索斯（Narcissus）的故事闻名于世。无数少女对美少年纳西索斯趋之若鹜，他却似乎沉溺于自身的美貌而冰冷地一一拒绝她们。于是，复仇女神涅墨西斯故意使他爱上了倒映在水中的自己，最终这名美少年溺水而亡。池水边开出的水仙低垂着花头朝向水面，据说那就是纳西索

斯望向水面映照出的自己时的姿态。而表示自恋、自我陶醉的“Narcissism”一词的词源也出自这则神话。

水仙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是唐代以前的事情了，并且早早传入了日本，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这其中也包括像越前海岸那片并非人工种植、随海流漂洋而来并自然长成的水仙。中世纪以来，水仙在日本就已经十分常见了。

室町时代的禅僧一休宗纯的诗集《狂云集》中，便有一首题为《美人阴有水仙花香》的诗。一休宗纯因反映其聪明机智的种种逸事而为人所熟知。另外，他也写下了许多高歌自己与女性的爱欲以及自身疯狂行径的诗。这首《美人阴有水仙花香》的全诗如下：

楚台应望更应攀，半夜玉床愁梦颜。

花绽一茎梅树下，凌波仙子绕腰间。

这首诗的题目可以说非常直白，诗的内容更是不加掩饰。诗中的“楚台”便是女子的身体。“应望更应攀”是指除了欣赏女性的身体，更要爬到上面去。“半夜玉床愁梦颜”一句描写的则是夜晚女子在床上令人神魂颠倒的模样。“花绽”即花朵绽放之意，这里将花比作了女性的身体。而“一茎梅树”是指像梅树干那样的一根茎，也就是指代男性的身体。最后一句“凌波仙子绕腰间”则表现了水仙花在腰间缠绕、撩拨挑逗的样子。

创作这首《美人阴有水仙花香》时，一休已经七十多岁了，当时他正与一名叫森侍者的盲女住在一起，她平时以挨家挨户地奏乐进行乞讨为生。而《狂云集》中还收录了多首赤裸裸地描写一休与这位森姓盲女之爱欲的诗。

春之花·太田道灌与山吹之里

接下来，进入二月，立春也就近了。尽管这时北风仍在吹，甚至雪还在下，但渐渐开始弥漫起春天的气息。一过二月中旬，日本关东地区的梅花就开放了，这时还能听到黄莺的初啼。款冬花发芽，河堤边等田间路旁开始冒出阿拉伯婆婆纳的蓝色小花，渐渐地，蓝色小花从零星点缀在绿草之中，到最后铺满了整块绿地。

阿拉伯婆婆纳在日语中被叫作“大犬的阴囊”（オオイヌノフグリ），这个名字着实不好听。也不知道当初到底是谁给这种在初春的

道边生长的娇嫩可爱的小花起了这么一个名字，或许是因为花落之后那小小的果实看起来有一点点像狗的阴囊吧，但总觉得应该给这种花取一个更好听的名字才对。

二月的花树还有细柱柳（日语中叫“猫柳”）、山茱萸、腊梅和蜡瓣花，等等。珍珠绣线菊这时也会在暖和的地方开出小小的白色花朵。而山茱萸、腊梅和蜡瓣花的花瓣都是淡黄色的，它们的点缀让春意酝酿得更为浓郁。

到了三月，暖和的地方已漫山遍野都是花色花香。堇菜花、蒲公英、野芝麻以及连钱草等活力十足地一下子将花苞全部绽放。除了桃花外，瑞香花、日本辛夷、木兰、郁李、马醉木、连翘、金缕梅以及旌节花等都是这个时候开花。而黄灿灿的油菜花也从此时开始灿烂起来。

四月，是樱花的季节，樱花前线[15]扩展至整个本州。人们此时往往沉醉于赏花之中，很容易因早春的薄寒而染上感冒。在樱花之后，海棠花娇艳登场，然后就是苏木、棣棠花、杜鹃花、木瓜花和麻叶绣线菊等各类春花的斗色争妍。

说到棣堂花（日文为“山吹”），就要提一提太田道灌的著名逸闻——“山吹之里”。

某天，太田道灌放鹰捕鸟的归途中巧遇大雨，遂到附近某农家借蓑衣。而这家的女儿却给了他一枝棣棠花，太田道灌甚为不解。事后，他才了解到这家的女儿其实是借《后拾遗和歌集》中兼明亲王的和歌“七重八重棣棠开，花不结果悲人怀”，来表示自己家穷得连蓑衣都拿不出来。道灌明白其意后深感羞愧，愧汗连一个农家姑娘都具有古歌素养，自己竟因才疏学浅而错怪对方。自此道灌开始发愤图强，力学不倦，最终成为一位知识渊博的武将。

不过，其实八重棣棠本就是不结果的。

有观点认为这个“山吹之里”指现在东京都新宿区山吹町一带，但户冢町的面影桥西畔又立着一块“山吹之里”的石碑。此外，还有人称埼玉县越生町的山吹山才是其宗源。埼玉县的越生曾是道灌的父亲道真的隐居之地，越生的龙稳寺内还有道真、道灌父子的墓碑。

而这则“山吹之里”的故事最初出现在江户时代中期由汤浅常山所写的《常山纪谈》或西村远里所写的《雨中问答》中。“山吹之里”的故事因落语《道灌》而流传开来，而该题材最早的落语则是江户后期

天保四年（1833年）由初代林家正藏所写的《落噺笑富林》中的一篇。到了明治年间，河竹默阿弥创作出脍炙人口的歌舞伎剧目《歌德惠山吹》。对山吹之里到底在哪儿这个问题争论不休，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四月，银线草、及己以及一轮草、鹅掌草、多被银莲花等白色的小花一簇簇、一群群密布在杂木林和山间野地里。粉色的猪牙花像报春使者般，于此时盛开。春兰、金兰、银兰、虾脊兰等兰科植物也加入了争相竞艳的队伍。萎蕤、鸣子百合为杂木林增姿添色。此外，荷包牡丹、樱草、水甘草等也是四月绽放的报春花。

我目前住在浦和市（现埼玉市），这里西郊地区的田岛原是著名的樱草与水甘草自生地，然而，曾经郁郁葱葱的樱草地现在全被开发成了高尔夫球场。曾作为樱草公园被保护起来的土地，现在也几乎另作他用了。水甘草好不容易才得以在田岛原附近的秋濑的杂木林成片生长，每年春天都悄悄地开出蓝色的小花。

百花之王牡丹与小野小町的芍药

四月到五月，是牡丹和芍药开花的季节。这两种花均原产自中国，但由于日本人很早便开始栽种，所以日本人对它们也相当熟悉。“立如芍药，坐如牡丹”，自古便用来形容绝色佳人，可以说是对美人最高的赞赏之词。

牡丹可谓代表中国的一种名花，被誉为“百花之王”的它被视作中国的国花。中国人对牡丹的喜爱始于隋炀帝时期，唐玄宗时，长安彻底兴起了牡丹热。白居易也创作了许多与牡丹有关的诗。这波牡丹热一直持续到宋代，当时的洛阳城四处遍布牡丹花。

一般认为，牡丹花是在奈良时代传入日本的，但真正普及开来是在平安时代。那时，宫廷、贵族的家宅以及寺院等地都喜欢种植牡丹。从那以后直至现代，日本的牡丹热一直低调地延续着，从未衰退。自平安时代以来，牡丹花成为花鸟画中的经典元素，牡丹图案被广泛用于高级日用品的装饰或被雕刻在艺术品上。

在中国唐代，牡丹花被视为富贵的象征，人们将牡丹与唐草这两种图案结合，创造出了牡丹唐草纹，而这种纹样自然也传入了日本。藏于正仓院的皇室物品中也能看到绘有牡丹唐草纹的古物。除牡丹唐草纹外，日本人还将牡丹与其他的图案进行了结合。比如，牡丹与蝴蝶的组合图案便被印在了花牌的图案上并一直沿用至今。而牡丹与狮

子的组合据说始于镰仓时代。渐渐地，这种“唐狮子牡丹”图案被用作刺青，近代以来一些侠客或赌徒便会在背后文此图案。

自很早以前开始，牡丹便被用于家徽设计中，最终成为继菊与葵之后颇具威势的家徽图案，得到了广泛使用。伊达家族的家徽“伊达牡丹”以及锅岛家族的家徽“锅岛牡丹”都为人所熟知。此外，近卫家、九条家、鹰司家等贵族门阀的家徽也采用了牡丹图案。

除了用作器物纹饰、家徽等图案外，牡丹还常常被用于比喻。如“牡丹雪”“牡丹饼”“牡丹枪”“牡丹刷毛”以及“牡丹海老”等[22]。此外，日语中猪肉的隐语也是“牡丹”。顺便一提，马肉的隐语是“樱”，而鹿肉的隐语是“红叶”。近代以来，日本人十分喜欢食用这些动物的肉。

芍药与牡丹一样是在平安时期传入日本的。作为牡丹的姊妹花，在中国，与“百花之王”牡丹相对，芍药被称为“花中宰相”。正如其名，芍药实际上是一种草药，但它与牡丹一样被广泛栽培，用以观赏。

小野小町是平安时代前期的女诗人，是一个拥有诸多传说的、谜一般的女性。据说她还是个美貌倾城的绝世佳人。日本各地都有关于她的传说，其中以秋田县雄胜町小野（现汤泽市）的小町传说最为著名。这里有一片据说是小野小町种植的芍药，直至今天，时节一到，依旧会绽放花朵。菅江真澄曾于天明五年（1785年）到访此地，并在《菅江真澄游览记》中以《小野之乡》为题写了一篇见闻录。据这篇见闻录的描述，小野小町种植的芍药共有九十九株，等到芍药花开，乡里的人便开始插秧，由于折断芍药的枝叶便会下雨，所以人们也管小野小町叫“雨乞（祈雨）小町”。此外，该地竖立的古碑上还刻着“小野小町　大同四年己丑生，昌泰三年庚申年九十二卒行”的文字。

这个传说其实留有几处暗示。首先，芍药的花期与农耕插秧的时期重合，而且还附加了插秧后祈雨的传说。其次，或许正如“立如芍药”这句话所比喻的，自古芍药便是美人的代名词，所以此地的芍药才会与小野小町联系在一起。而“九十九”这个数字，或许是从小野小町与深草少将的“百夜通”传说中联想出来的吧。据这则传说，小野小町对深草少将表示：“若你能连续一百个夜晚来相会，我便会接受你的爱。”但深草少将却在第九十九个夜晚气绝身亡。

这片传说中的芍药其实就生长在现在的奥羽本线横堀站以北1.5公里的地方。在一个叫作小町堂的小佛堂边立着一块刻有“小野小町冢”的墓碑，而这块墓碑周围便种有芍药。虽然还能看到疑似当年菅

江真澄所见的那块石碑，但由于碑文风化，如今已无法辨析上面的文字了。

初夏之花·梅雨之花

五月是欣赏嫩叶与绿叶的季节。杜鹃花快要凋谢之时，紫藤带着它淡紫色的花苞悄然而至。紫藤的原产地是日本，《万叶集》中咏诵紫藤的诗歌共二十七首，这种在晚春和初夏盛开的花朵，自古便承载着日本人的厚爱。随着藤原氏的势力不断强大，紫藤也逐渐被人们视为象征着荣华富贵的花，并被设计成各种各样的图案，用于装饰美术工艺品或服装等，同时也见于众多花鸟画中。此外，藤原氏和其家族分支将紫藤图案用在了家徽上，于是我们得以看到如此多种藤纹。

山楂花以及金雀儿作为点缀庭院的五月花颇为常见。可能很多日本人认为这两种花在日本古已有之，但其实二者皆于江户时代才传入日本。原产地来自中国的山楂树一般约为1.5米高，而西洋产的则能达到约5米高。英文所称的“May Flower”其实指的就是山楂花，可见山楂花在欧美同样被人们视作五月花的代表。金雀儿则是由荷兰的船只带到日本的，据说其名也来自荷兰语。

桐树花也是人们熟知的五月花。虽然花朵均为紫色，但与紫藤不同的是，桐树花由花抽薹。此外，家徽图案中的“五三桐”和“五七桐”赫赫有名。而茶色的桐树果实也经常作为插花素材。作为木材，桐树具有重量轻、不易招虫、耐火性强的特点，所以桐树木材制品广泛出现于日本人的生活当中，如木柜或木屐等日用品，多由桐木制作而成。

铃兰、鸢尾、溪荪和石竹等娇艳的草花将五月的田野与庭园装扮得更为缤纷多彩。

形似瞿麦的石竹原产自中国，平安时代传入日本后便成为宫廷庭园中常见的一种花。《源氏物语》中的“唐瞿麦”指的就是石竹花。有着浓紫色花瓣的溪荪，其花朵中心的黄色部分仔细看来其实呈网眼状。在奥日光战场原曾经有成片绚烂夺目的溪荪，但随着近年气候干燥化的加重，当年那紫色的“溪荪海洋”几乎看不见了。

我家院子里种着鸢尾和铃兰，一到初夏它们便会为院子增添几分独有的生机与雅致。这株鸢尾其实是我以前从奥武藏的山上采摘回来的，直到现在它依然生命力旺盛地生长着，势头甚至压过了铃兰。

六月是梅雨淅淅沥沥的季节，而紫阳花（绣球）倒是与这绵绵丝雨甚是相配。原本北镰仓的明月院为最出名的紫阳花寺，但近几年日本各地的紫阳花寺越来越多。紫阳花蓝色或红紫色的一朵朵小花簇成一颗球状的花团，正如绣球般别致精巧，靠近仔细观赏那一朵朵小花也别有趣味。而山野间野生的白色或淡蓝色“额紫阳花”则更加耐人寻味。

日本是紫阳花的原产国。江户时代后期，住在长崎的一位荷兰商馆医生西博尔德被紫阳花的魅力深深折服。他有一个日本妻子，叫楠本泷，他对妻子的爱称是“Otakusan”（お滝さん），在他回到欧洲，将紫阳花介绍给欧洲人时，便称这种花为“Otakusan”。

石榴也差不多在这个季节开花。石榴的果实很特别，它的红橙色花朵也颇为鲜艳美丽。杜鹃花悄悄开出了秀丽的白色花朵，绣线菊则绽放出了淡红色的小花。浜茄子是一种开在日本北方地区海岸附近的野玫瑰，也叫浜梨。小时候，到了六月，看到白色或淡红色的忍冬花就禁不住诱惑吸上一口，这些记忆至今依旧鲜明。

此外，六月的草花还有花菖蒲、玉簪、蜀葵、燕子花、红花等。雨过天晴时，路边开放的鸭拓草像楚楚可怜的小女孩般柔弱又动人。开在高原水边的水芭蕉、野慈姑和萍蓬草也是初夏时节应景的花儿。

盛夏之花与黑百合传说

七月中旬到下旬渐渐出梅，也意味着真正的夏天悄然而至。树木茂盛葱郁，野草覆盖山野。这个时节最具代表性的花树有栀子、合欢和夹竹桃，而具有代表性的草花则要数百合了。

栀子花以其纯白的花瓣与怡人的清香在大众心中占有一席之地。日本人对栀子花的热爱古已有之，在奈良时代编纂的《肥前国风土记》中便已出现了栀子花的名字。但之所以日本人自古便熟知栀子花，其实是因为它的果实。即便其果实成熟，它亦不开花，“栀子”之名由此而来。

一直以来，栀子花的果实作为染料和中药沿用至今。

みみなしの山のくちなし得てしがな

思ひの色のしたぞめにせむ

（无耳山得无口花，心事初来无人识。）

——无名氏

这是出现在《古今和歌集》卷十九中的一首和歌。大和三山之一的耳成山又名无口山[23]，山上有许多野生的栀子花。这首和歌字面意思是：采得栀子果，为了将布匹染红，需先用这果实将布料染成黄色。栀子果无毒，不仅用于染布，亦可为食物上色。比如，在为栗子饭、栗金团、泽庵黄萝卜和慈姑上色时，日本人都会用到栀子果。而中药中的山栀子就是栀子果，具有消炎、止血、解热等功效，自古以来也被用作镇静药。

某个雨天的傍晚，在湿漉漉的深绿色中浮现出的淡淡的粉色身影便是合欢花，它那亭亭玉立的姿态自成一格。合欢花在盛开状态下，丝状的雄蕊像散开的毛笔头一般，毛茸茸的十分可爱，就着傍晚时分的朦胧余晖看过去，宛若一盏盏小提灯散发着柔和的粉色光芒。小雨稀稀落落时，那抹寂寞的身影竟有些令人哀怜。

象潟や雨に西施がねぶの花。

（象潟绰约姿，雨里合欢花带愁，婀娜似西施。）

——松尾芭蕉

松尾芭蕉于元禄二年（1689年）的三月二十七日踏上了“奥之细道”之旅。这一年的一月为闰月，因此三月二十七日换算成格里高利历是五月十六日。象潟（秋田县仁贺保市象潟）是松尾芭蕉在奥羽旅途中的最后一个目的地，六月十六日、十七日这两天他都停留在这里。按现在的公历来算，正好是七月结束，进入八月的时候。

松尾芭蕉曾在《奥之细道》中写道：“松岛犹如新人笑，象潟宛如怨妇愁。聊寂又添悲，地势似烦魂。”

他将明艳动人的松岛视作“阳”，而将宛如愁怨般凄绝的象潟之美视作了“阴”，并将开在象潟的合欢花比作了中国春秋末期的美女西施。

围绕西施，流传有许多传说和谜团。她是越国的美女，据说是范蠡的恋人。越王勾践为了拉拢吴王夫差，便将她送给了吴王夫差。因夫差沉迷于西施的美色，最终吴被越灭国。随后西施回到越国，与范蠡乘舟从西湖逃走，从此下落不明。而越王勾践与忠臣范蠡的名字也在《太平记》儿岛高德的故事中，以“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这首十字诗的形式出现。

合欢树上那一片片小叶子会在夜晚来临时相对而合，其名“合欢”也正因这一特点而来。而花瓣则相反，在傍晚叶子闭合时开放，早晨太阳升起时枯萎。但在阴沉多云或下雨的日子，合欢花昼夜都会开花。

百合，能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找到相关记载，是日本颇具代表性的一种草花。百合种类繁多，有山百合、卷丹百合、浙江百合，等等。此外，萱草和黄茅等也属百合纲。

道の辺の草深百合の花咲に

咲まししからに妻といふべしや

（路边草丛，百合花放；只凭付之一笑，即可称妻房？）

这是收录在《万叶集》卷七中的一首古歌。作者应该正处于远离家乡的旅途之中吧，看到繁茂的夏草中一株绽放的百合花，他不禁思念起自己的妻子。与之类似，在《万叶集》卷八中，大伴上郎女吟诵道：

夏の野の繁みに咲ける姫百合の

知らえぬ恋は苦しきものそ

（夏日田野繁草中，姬百合开无人知。君不知吾恋慕心，心中痛苦无人诉。）

百合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女性，尤其是美丽的女性或者女子的爱恋之情。很多日本女性也以百合、早百合、小百合、百合子等作为名字，但其实也有像百合若大臣这样用于男性名字的案例。

在幸若舞曲或说经、净琉璃、歌舞伎等传统表演形式中被广泛演绎的《百合若物》讲述了百合若大臣在得到了神佛的加护后战胜蒙古军，并向叛军复仇的故事。据传，百合若大臣还曾拉动了供奉在宇佐八幡内的铁制硬弓，其故事与八幡信仰也有着深远的关系。有传言称，百合若的名字来自三轮信仰的象征“山百合”，而宇佐八幡的神职大神氏则是三轮氏的一个分支。

山百合有着白色的大花瓣和沁人的芳香，因其高雅的气质而被视作女神或观音的化身。除了最具代表性的白色，百合还有很多颜色，黄色或橙红色的百合较为常见。但在各色百合中，黑百合却是一个另类，与其相关的传说往往有着阴暗悲惨的基调。

八岳的黑百合是传说中的巨人大太法师和八岳女神磐长姬经过一番死斗后，从流淌在地上的血中生长出来的花。立山黑百合的传说则与战国名将佐佐内藏助成政的怨念有关。佐佐内藏助成政十分宠爱一名叫早百合的美丽侍女，在正室设计陷害下，成政怀疑早百合与侍童私通并杀死了二人。得不到成政信任的早百合在死前留下预言称，“立山开出黑色百合花时，便是佐佐家灭门之时”。最终立山开出了黑色的百合花，而佐佐家也遭遇灭门之灾。

《黑百合姬祭文》讲述了认安倍贞任为祖先的矢岛满安（五郎）与其女小百合的故事。为了消除父亲满安的怨恨，小百合在鸟海山闭关，她让山上的鹤间池中盛开的百合花全部变成黑色，由此达成了愿望，使家族再度兴旺起来。

晚夏之花与秋之七种

进入八月后，日历上便能看到“立秋”的字样了，但炎热却丝毫不减，甚至比七月更甚。而一过八月中旬，夜蝉等昆虫开始鸣叫，就一下子开始感受到秋意了。

百日红（紫薇），花如其名，在夏天最炎热时开花，而秋风吹来时依然绽放着粉色的花朵。也是在酷暑之中，凌霄花的橙色、木槿花的白色或桃紫色开始夺人眼目。院子里或田野间，向日葵高傲地仰起头向日而开，在向日葵的根部，凤仙花也将花苞全部打开，而山地的草原上，山鸢尾（日语写作“射干菖蒲”）构成了一片明媚的花海。

百日红的原产地是中国南部，据说很早以前就已传入日本，但具体时间尚未明确。百日红在日语里也可写作“猿滑り”（さるすべり），因其树皮滑溜溜而得名。在日语中“百日红”的正确读法其实是“ヒャクジツコウ”，但“サルスベリ”这个读法却更加广泛。

夏天盛开的花中最大的当属向日葵，它正是秘鲁的国花，原产地是南美或中南美。江户时代前期的宽文年间（1661年—1672年），向日葵传入日本，在日本也写作“日輪草”或“日車”等。

我曾在某个六月下旬前往罗马尼亚旅行，在乘坐大巴时看到了仿佛无穷无尽的向日葵花田，那番景象在日本见所未见。向日葵的种子除了可以榨油，同时也是小鸟最爱吃的食物。到了冬天，我会把向日葵的种子放在院子里的饵料台上，这时远东山雀、金翅雀、锡嘴雀等鸟雀就会纷纷飞来。

汉字“射干”，在日语中是桧扇的意思，山鸢尾（射干菖蒲）的叶子以剑状排开，很像桧扇打开的样子，因而得名。《万叶集》以来，与“黒”“闇”“夜”“夕”“月”“暗き”“今宵”“夢”“寝”等词语相关联的枕词(16)“ぬばたま”（射干玉）便是根据射干菖蒲的种子所创造的词语。人们以黑黑圆圆的射干菖蒲种子来表现黑暗与深夜。杜鹃正因在夜晚啼叫，所以也被称为“射干玉鸟”。此外，乌鸦也因全身黑漆漆的，而被人们称作射干玉鸟。“ぬばたま”也可读作“うばたま”，汉字有时会写成“乌羽玉”，但这样一来是不是就丧失了原有的感觉了呢？

九月，终于迎来了真正的秋天。秋天的各类代表性花朵在田野间肆意绽放。

《万叶集》卷八中山上忆良的《咏秋野花歌二首》颇为有名。

秋の野に咲きたる花を指折り

かき数ふれば七種の花

（秋野花开盛，红黄彩色夸；折来屈指数，七种共鲜花。）

萩の花尾花葛花撫子の花

女郎花また藤袴朝がほの花

（萩花、尾花、葛花、抚子花、女郎花，还有藤袴、朝颜花。）

这两首是山上忆良著名的关于秋天“七草”的咏歌。这“七草”均为日本秋天颇具代表性的野花。但实际上其中只有萩花并非草花，而是灌木。此处的朝颜花并非现在日语中的牵牛花，而应指桔梗。不论是哪一种花，歌中咏诵的这些秋天的花至今在乡野之间依然很常见。但人们仍能从它们身上感受到某种情怀或乡愁，这或许是因为大都市中已经很难再看到这些花了，也或许是因为那是日本人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一份遥远记忆吧。

顺便一提，秋之“七草”是人们十分喜爱的观赏花类，但春之“七草”却并非花，而是指在阴历正月初七当天采摘并用来制作七草粥的嫩菜叶。这七种嫩菜指的是芹菜、荠菜、鼠曲草、繁缕、宝盖草、蔓菁和萝卜。鼠曲草在日语中有个别称——“母子草”，宝盖草又名“田平子”，蔓菁别名“蕪”，而萝卜又名“大根”。

萩花是秋之“七草”中的首位，可谓秋天的代表花类。淡红色或淡紫色的萩花那清纯的模样深深印刻在万叶人的心中。《万叶集》中咏诵萩花的歌比四季中的任何一种草花都要多，共计一百四十一首。但在《万叶集》卷十中也有下面这样一首歌。

人皆は萩を秋といふよし吾は

尾花が末を秋とはいはむ

（人皆者，芽子乎秋云。纵吾等者，乎花之末乎，秋迹者将言。）[24]

尾花，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芒草，与萩花一样蕴含着浓浓的秋意。

在九月花中，我还特别喜欢彼岸花，尽管它并不属于秋天的“七草”，它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曼珠沙华。秋分时节，彼岸花会将河堤或田野洼地染成鲜红色。在日本的寺庙、墓地等场所，也会看到彼岸花，再加上它的球根有毒性，所以也被起了死人花、幽灵花、舍子花、狐花等并不讨喜的别名。但不论怎样，彼岸花都是秋天的田园风景中不可或缺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秋之“七草”中的女郎花也是该季节必不可少的一种花。虽然这个名字究竟缘何而来并不确定，但有一种说法称，由于人们根据颜色，把黄色的小花比作“粟饭”并起了别名“粟花”，所以女郎花（おみなえし）或许是由粟饭的别称“女饭”（おみなめし）谐音而来。《万叶集》中鲜少见到咏诵女郎花的和歌，但自《古今和歌集》以后，将这种花比作女性身姿的咏歌便多了起来。左大臣藤原时平也曾咏诵道：“女郎花开，风吹秋野，花随风动，一心寄何人？”

此外，关于女郎花还有下面这样一则故事。

平城天皇时代，一个名叫小野赖风的男人与一名京城女子结下亲事，但随后便丢下她，一个人回到了故乡。信任赖风的这名女子来到了他居住的近江八幡，却得知他已有妻子。这位深受打击、悲痛厌世的女子脱下金黄色的衣服，放在八幡的河边，然后便投河自尽了。而她的衣服腐毁后，从地里长出了黄色的小花。这种小黄花便是女郎花。

歌谣《女郎花》也是根据这则传说所作。

九月的野花还有诸如金线草、地榆花（日语中也叫吾亦红、吾木

香或我毛香）、秋麒麟草、乌头，等等。开在院子里的秋海棠、秋明菊和芙蓉等花，也是多姿多彩、各有特色。

十月十日前后正逢阴历重阳节。这时日本全国各地都会举办菊祭活动、菊人形展或菊花展。

菊花以及晚秋初冬之花

其实日本的国花除樱花外，还有菊花。

镰仓时代，后鸟羽上皇喜爱菊花图案，因此自那以后天皇家族便较多使用菊花图案。明治四年（1871年），十六瓣的菊花图案被正式定为皇室图案，并禁止皇室以外的人使用。自此，菊花图案往往被视作国粹主义、军国主义的象征，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并不是很好。但菊花自古便是日本人喜爱的一种花，它为秋天添姿增色，如今依然有很多菊花爱好者。

松尾芭蕉在最后的旅途中写下了“奈良秋菊溢香馨，古佛满堂寺庙深”（菊の香や奈良には古き仏達）这首俳句。正如俳句中所描述的，菊花与古都很是相称，它自古便为古都奈良装点色彩。但实际上，奈良时代的日本还没有菊花。《日本书纪》与《古事记》中自然没有菊花，《万叶集》中也没有一首咏诵菊花的和歌。

这或许是因为，到了平安时代菊花才从中国传到日本。自此，菊花俘获了平安贵族的心，除了诗歌咏诵外，菊花还出现在了包括《源氏物语》在内的诸多文学作品中，甚至在重阳节，宫中还会举办菊花宴。在中国，自晋陶渊明独爱菊以来，菊花便被赞颂为君子之花。这或许也是宫廷贵族青睐菊花的原因之一吧。菊花热潮在老百姓中掀起，要等到江户时代以后了。自此，不论是在江户还是在京坂，上至贵族武家，下至平民百姓，全都热衷于栽种菊花。而这波栽种菊花的热潮一直延续至今，经久不衰。

谈及十月花，还有一种不能不提，那便是金桂（日文为“金木犀”）。尽管还有银桂和丹桂，但后两种并不常见。虽然金桂看起来并不那么夺人眼目，但它浓郁的芬芳能立刻唤醒人们对秋天的实感。金桂自江户时代由中国传入日本，在中国被称作桂花。在拥有梦幻般美景的桂林，街边种满了桂花树，九月下旬至十月上旬，满街都飘着醉人的桂花香。

十月花中，仿佛缩小版白侘助的茶花也是我见犹怜。在草花中还

有野菊、龙胆花和日本油点草（日文为“杜鹃草”）等。

野菊是裸菀和野甘菊等各类野生小菊花的总称，开在河边、路旁的野菊总能让人感受到秋之韵。裸菀（日语写作“嫁菜”）的嫩叶其实特别好吃，是颇具代表性的春季山野菜。与它近似的还有一种“婿菜”，但不太美味。杜鹃草因花瓣内侧的斑纹很像杜鹃鸟胸前的斑纹而得名。杜鹃草能顽强地生长于山中，但现在多被种植在院子里。我家院子里也种着杜鹃草，由于从夏天到秋天它都可以作为琉璃蛱蝶幼虫的饲料草，所以我往往任其生长而不将其锄掉。

关于龙胆，在源氏的众多家纹中，有一种是著名的“笹龙胆”，这种家纹将龙胆花的叶子与花设计成了图案，而非采用笹（竹子）叶与龙胆花的搭配。龙胆花的叶子一片片舒展开，确实形似竹叶。

十一月，风紧草木枯。这时山茶花开了。颜色有红、粉、白等，花瓣也分单瓣与多瓣，种类繁多。山茶花能够耐住寒风的吹袭而绽放，为逐渐萧瑟的初冬带来了一丝温暖与生机。日本有一首童谣——“山茶花山茶花开满的路，篝火篝火烧落叶”——正是描写了日本初冬时节的风景，闻之不禁让人涌起袅袅乡愁。

进入十二月，寒风瑟瑟，多是阴天。这时茶梅渐渐绽开自己的花苞，院子里的八角金盘（日语称为“八手”）也开出了小小的白花。

窓の外に白き八つ手の花咲きて

こころ寂しき冬は来にけり

（窗外白八手，心寂冬已来。）

——岛木赤彦

橐吾（石蕗）是一种于晚秋至初冬开放的黄色小花。在温暖地区的海边能看到野生的橐吾。偶尔也会在院子的角落看到它悄悄地亮出一抹黄色。

静かなる月日の庭や石蕗の花

（静谧月日庭，石蕗开黄花。）

——高浜虚子

第四章

鸟的日本史

一　“记纪”神话与鸟儿

岁月与时间的见证者——野鸟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野鸟，但对于对鸟没什么兴趣的人来说，或许能注意到的鸟也就只有乌鸦、麻雀、鸽子和燕子这些了吧。大多数人现在都已弄不清楚什么样的鸟会在什么季节出现，而什么鸟会发出怎样的叫声了。

从绳纹时代开始至今的几千年时间内，日本人一直接受着大自然的馈赠，与自然为友，与自然共生。很久以前，几乎每一个日本人都十分了解鸟的啼叫声以及习性等。到了早春，人们会期待黄莺的初次啼叫；看到燕子飞来时就知道真正的春天要来了；杜鹃鸟会提醒人们初夏的来临，傍晚还会侧耳聆听猫头鹰的叫声；秋天，大雁南飞的景色令日本人陶醉；伯劳鸟（日文称“百舌鸟”）清脆悦耳的叫声仿佛在通知人们，稻田间就要结下金灿灿的麦穗了；冬天，在池塘嬉戏玩耍的野鸭颇具野趣。这些并非多么遥远的记忆，直到近几年仍有许多日本人保有这样的体验与感受。

虽然日本国内记录下的野鸟多达五百几十种，但定居在日本的留鸟，和随着季节在山中和村落、温暖地区和寒冷地区之间短距离迁徙的漂鸟，以及定期迁徙过来的候鸟总计约为三百五十种。我们平时经常看到的野鸟其实多为漂鸟和候鸟。在雁类、鸭类中，除了斑嘴鸭以外都属于候鸟，只在冬天才会飞来日本。并且，除了丹顶鹤以外的鹤类及天鹅都是冬候鸟。经常能在枯地里看到的斑鸫、会飞到院子里的北红尾鸲都是冬季颇具代表性的小鸟。

到了冬季，黄莺会在人类家宅中草木繁茂处过冬，到了春天就会飞回山林里去，属于漂鸟。与之类似的还有赤胸鸫、蒿雀等。此外，燕子与杜鹃类（杜鹃、郭公鸟、棕腹杜鹃、中杜鹃）以及整个夏天在高原的森林或川谷间发出婉转动听的啼鸣声的山中小鸟，几乎都是夏候鸟，它们春来秋去，天气渐冷时便会飞回温暖的南方。鹬科和鸻科中的大部分都是候鸟，只在它们春秋迁徙时才能看到。秋天的时候，雌鸭和雄鸭身上的羽毛颜色看起来差不多，难辨雌雄，但到了冬天，雄鸭便会换上一身艳丽的羽毛，哪只是雄鸭哪只是雌鸭也就一目了然了。

早晨，几乎在夜色消逝的同一时间，小鸟们开始了叽叽喳喳的啼鸣。傍晚时分，以乌鸦为首的鸟儿纷纷成群地飞回巢穴，那略有些嘈杂的景象仿佛是在宣告着一天的结束。暮色渐浓时，经常听到的是猫头鹰的叫声。夜鹰也在黄昏时分鸣叫不息。夜深人静时，便是鹰鸮和红角鸮的独奏会了，而棕腹杜鹃等杜鹃鸟则在破晓前开始清脆高歌。

也就是说，通过看到的鸟以及听到的鸟叫声，我们就能判断季节或一天中所处的时间。野鸟对于日本人来说，曾是日历和时钟般的存在。正因如此，我们在对古典作品进行阅读解析时，一旦诗歌或文学作品中出现了鸟，就能联想到季节或时间。此外，与鸟有关的比喻也不胜枚举。

但这些日本人曾经理所当然般掌握的知识，如今却几乎被遗忘。就连和歌中经常咏诵的杜鹃，若不了解它的习性、叫声以及传说等知识的话，哪怕是日本人也无法真正理解诗歌的深层含义吧。

国生神话与鹡鸰

《古事记》与《日本书纪》记载了许多与鸟有关的故事。由此可知，从遥远的神话时代开始，日本人便与各种鸟类关系密切。

在“记纪”神话中，天地混沌初开后，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二神的结合造就了大八洲国、山川草木，以及地上的统治者——各路众神（人类）。这便是国生神话。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因没能正确交合，第一胎生下了“水蛭子”（指骨骼发育不全的胎儿），其后才顺利产下国土。关于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二神结合的事情，在《日本书纪》中还有另外一则传说，也就是鹡鸰教导男女二神交媾的方法：“遂欲交合，不知其术，时有鹡鸰，飞来摇其首尾。二神见而学之，即得交道。”

“鹡鸰”在日语中也写作“俄尻振”，也就是快速摇动尾巴的意思，这是鹡鸰在古时的名字。除了“俄尻振”外，在日本鹡鸰还有庭叩、石叩、教鸟、嫁教鸟、恋教鸟等名。鹡鸰落在石头上时，会不停地上下摆动尾巴，那副模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男女交媾时的场景，于是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二神最终通过学习鹡鸰，才得以正确地交合。之所以会把鹡鸰叫作教鸟，则来自《日本书纪》的记载。而嫁教鸟的“嫁”（とつぎ）在日语里原本指男女性器相交，即性交之意。

在《猿蓑》中，松尾芭蕉的门人凡兆写过一句俳句——“席不瑕暖人世间，鹡鸰点尾亦无暇”，如果能够理解“鹡鸰点尾”在这里指男女

交媾或恋爱之意的话，这整句的意思也就不言而喻了。此外，大田蜀山人也曾在狂歌咏诵道：“连威风凛凛的神亦不知的道路，不知何时竟被教鸟指引。”鹡鸰正是指引人类走向繁荣的鸟，也是构成了日本国起源的鸟。

我们平时常见的鹡鸰主要是黄鹡鸰、白鹡鸰和背黑鹡鸰这三种。这其中只有背黑鹡鸰是日本固有的品种，然而三者的习性特点却几乎完全一样。那么问题来了，教会太古神灵阴阳相合之术的到底是哪一种呢？

天若日子的悲剧与白鸟传说

在人类的诞生过程中做出巨大贡献的鸟类，在人类死亡之际亦承担起了重要的职责。在“记纪”神话“苇原中国平定”篇中记载的天若日子的悲剧里便出现了许多的鸟。关于这则传说，《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的记述相差无几。

为了平定由大国主神（《日本书纪》中作“大己贵神”）支配、住着众神的苇原中国，天若日子从高天原被派到地上（人间）。但他忘记了自己的使命，而娶大国主神的女儿下照比卖（下照姬）为妻并在苇原中国定居了下来。就这样八年过去了，焦急的天上神派了一只名叫鸣女（在《日本书纪》中为“无名”）的山鸡（日语中为“雉”）作为使者，来到住在人间的天若日子身边。来到人间的雉神鸣女站在天若日子家门前的桂树上，开始啼叫，质问他为何不服从天上神的命令。这时，能够通过鸟的叫声占卜吉凶的天佐具卖（天探女）表示，“此叫声不祥，应射杀之”（这一段记载在《日本书纪》中为天佐具卖仅报告称“奇鸟停在桂树梢”），于是，天若日子便用天神赐予的弓箭将鸣女射杀了。

天若日子射出去的箭穿过树上的鸣女的身体后，一直射到了天上。天上神看到沾满血的箭，大为震惊，表示“如果天若日子有逆反之心，便以这支箭罚之”，于是把这支箭扔回了人间。最终，天若日子被这支箭射穿了身体，一命呜呼。

这个传说与《旧约》中宁录的故事架构大致相同。不信神的宁录向天空射箭，最终却被神扔回来的箭射穿胸口而亡。[17]据说宁录的这则故事不但传到了印度，还传播到古代中国以及东南亚等国，并被带到了日本。

而天若日子之悲剧中的高潮是下面这一部分。

在天若日子死后，他的妻子下照比卖悲痛的哭声随着风一直传到了天上。听到这凄惨的声音后，天若日子的父亲和他的妻子们便来到苇原中国与下照比卖一起哭丧。在《古事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乃作丧屋，以河雁为岐佐理持，鹭鸟为扫持，翠鸟为御食人，雀鸟为捣米女，雉鸟为哭女等，连续举行八日八夜的法事。”意思是说，让大雁为逝者搬运供奉的食物，让白鹭拿扫帚清扫丧屋，让翠鸟负责为逝者制作供奉的食物，让麻雀负责用臼捣谷物，让山鸡负责当哭丧女。这则神话传说中为众鸟安排了不同的职责，举行了八天八夜的葬礼来悼念逝者。

人死后，灵魂会化作鸟儿上天，或者会被鸟带到彼岸——这可以说是古代民族间共通的一种思想。日本的列祖也将死后的灵魂寄托在了鸟身上。

因此，在天若日子的悲剧中登场的鸟儿才格外应景。大雁成群列阵飞行的样子很适合被喻为为死者搬运贡品食物的队列。白鹭在水边静静踱步的样子纯洁而肃静，正符合打扫丧屋之人的形象。翠鸟反复潜入水中捕鱼的习性，当然很适合化身为给逝者制作鱼类料理的御食人。在神话传说中安排麻雀用臼捣谷物，一听便觉得生动形象。而山鸡（雉）之所以会被安排负责哭丧之事，或许是因为其叫声响彻山野吧。顺便一提，“山雉子”在日语中是青蛙的别名，同样得名于其叫声。

这里在记载鸟时并未将鸟拟人化，恰恰相反，将人比作了鸟。因为人们非常熟悉鸟的习性、叫声、姿态等，所以这些比喻极其形象。此外，日本古代坟墓中出土的人形土俑，头上便带着鸟冠状物品。或许这些土俑正是在葬礼仪式上扮成鸟以各司其职吧。

将人的死亡与鸟联系在一起的想法或许与“死者与鸟合为一体一道在天空中翱翔”的鸟葬思想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平安时代，都城的墓地在鸟部野（现鸟边野，位于京都市东山区），这不仅仅是因为这里有很多鸟或者正好位于鸟取部、鸟饲部[(18)]，而且通过这些地名，人们很容易将死者与鸟联系在一起。

据说，海神的女儿丰玉比卖在生产时，便使用鹈鹕的羽毛来搭盖产屋的房顶。但在屋顶尚未盖好时便生产了，自己变成了丑陋的鳄鱼，而生产的丑态又被丈夫火远理命（山幸彦）看到，羞愧难当的丰玉比卖于是回到了海里。她生下的那个孩子便是鹈草葺不合命。

面对即将分别的妻子，丈夫火远理命说道：“岸边之鸟者，于鸭棲之岛，与我共寝之，妹者必无忘，直至世之尽。”意思是：我的妻

子啊，我愿在鸭子飞过大海后到达的岛上与你共眠，只要我还活着，不论是何世我都不会忘记你。鸭子是一种候鸟，秋天从大陆飞越大海来到日本，并找到另一只鸭子结成夫妻，第二年春天再飞回远在大海那边的大陆。

在“记纪”记载的英雄里，有一个死后化身为鸟飞向天空的人物——日本武尊（倭建命）。

日本武尊乃景行天皇的皇子，是盖世无双的武将，他曾远征九州讨伐熊袭，还曾远征东国平定虾夷。十六岁起日本武尊便已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活，到他平定东国归国时已经三十岁了，却在即将抵达故乡前，于伊势国的能褒野（现三重县亀山市）去世。武尊的妻子和孩子从大和国赶来，满怀悲伤地为其建造了陵墓。而他本人却化为一只白鸟，向着天空振翅而去。

《古事记》中，武尊的后妃即便是被小竹叶刮伤脚部，也要哭着去追他幻化而成的那只白鸟。此外，《古事记》还记载道，当化为白鸟的武尊飞到河内国时，在志几（现大阪府柏原市一带）停了下来，在那里建造了自己的陵墓，并以己魂坐镇于此，此陵被称作白鸟御陵。

《日本书纪》记载，从能褒野的陵墓中变为白鸟飞走的日本武尊来到了大和国的琴弹原（现奈良县御所市），在这里建造完陵墓后，白鸟又飞向了河内，来到了古市邑（现大阪府羽曳野市），也在这里建造了陵墓。这三处陵墓被人们称为白鸟陵。

日本武尊的第二个皇子仲哀天皇即位后，为给父亲镇魂，便下诏在陵墓旁边的护陵河中饲养白鸟。所以如今我在皇居的护城河看到放养的白鸟时，总会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白鸟的古名为“鹄”。在“记纪”中虽然日本武尊的神话传说最为精彩，但其实也有其他与白鸟有关的记载。《日本书纪》关于垂仁天皇的一章中便有一则皇子“誉津别王，是生年既卅，常不言，见鹄得言”的故事。天皇大喜，命人捕获此鸟献上，此时一个名叫汤河板举的人为捉此鸟而到访各国，最终在出云国（或作但马国）捉住了此鸟并献给天皇。誉津别命与此鸟整日玩耍，终于能够说话了。于是汤河板举获赏并被赐予“鸟取造”一姓。但在《古事记》中，最终捕获这只白鸟的是一个叫作山边大鶙的人，而捕获的地点位于高志国（越国）。

不论传说的多个版本有何出入，可以看出白鸟自太古时期便飞到

了日本列岛，并与古代天皇家族有着密切的关系。日本全国有数不胜数的与白鸟相关的地名，如以“シラトリ”（白鸟）、“しろとり”（白鸟）、“クグイ”（鹄）、“フクイ”（福井）、“コウ”（鸿）等构成地名。而白鸟神社在日本也有好几处。

一般来说，飞到日本的白鸟主要是大天鹅和小天鹅这两种，由于外形相近，人们往往难以区分，仅把它们都看成天鹅。似乎古时候的人们也是分不清大天鹅与小天鹅的。

救了神武东征的乌鸦与鵄

我们接下来再看看更久以前的传说。在被认为是人皇初代天皇的神武天皇，其东征传说中也有两种鸟登场。

神武天皇本打算从浪速一直向东征服大和，然而在生驹山败给了长髓彦军。神武本是太阳神天照大神的子孙，醒悟到太阳神的子孙向太阳挑战实乃一件错误之事后，神武军便绕道至南熊野。但却在熊野山被艰险山路阻断，一行人进退两难。这时，由天上神派来的八咫乌从天而降，拯救了神武并一路带路将他的军队指引到了大和。

“尺”这个单位相当于中国周朝时期的一寸，“八咫乌”在《日本书纪》中写作“头八咫乌”，即一只头部长达八尺的巨鸦。据说这只八咫乌有三只脚，而这一形象也是基于中国古代传说中“太阳里住着三足乌”而来。

“记纪”中出现的这只八咫乌其实是加茂县主的祖先——加茂建角身的化身。加茂氏（也作贺茂氏、鸭氏）乃古代的一个氏族，有几个世系，但据说山城国葛野的鸭氏才是八咫乌的子孙。此分支的鸭氏供职于主水司的主水部（水部）。主水部是掌管朝廷饮用水的伴部(19)，鸭氏便是负责向大和朝廷进贡干净的水的人员。鸭是日本颇具代表性的水鸟，所以负责掌管水的人为鸭氏也是极其合适的。但到底为什么会从原本的乌鸦变成鸭子呢？

熊野自古便与乌鸦结缘。人们大多认为八咫乌的故事来自这片土地。曾经存在信仰乌鸦（太阳）的一族，他们促成了大和王权的建立。熊野大社发行的“牛玉宝印”上的文字便是根据古时候的乌鸦图案演化而成。牛玉宝印原本是降魔除灾的护符，镰仓时代后成了写誓愿书的用纸。据说，如果在誓愿书中写下谎言或者不遵守誓言，那么熊野就会有三只乌鸦死去，还会发生不祥之事。此外曾有传言，如果将牛玉宝印上画有乌鸦的部分裁下来喝掉，所得之病便会痊愈。

“乌劝请”如今颇为少见，但曾经日本各地都会在正月时举行这项活动，人们会吸引乌鸦，给它们喂食年糕或米团子等食物，通过观察其吃食方式来占卜吉凶或收成的丰收与否。在日本，不只是熊野大社，名古屋的热田神宫以及安艺的严岛神社等许多神社都将乌鸦视作神的使者。

回到神武东征。最终，神武东征队伍迎来了与长髓彦军的最后决战，等待他们的将是一番苦战。此时，一只散发出金色光辉的鵄落在了神武的弓上，长髓彦军被这道光所迷惑，最终大败，神武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制定的、昭和时期在战前为陆军、海军军人颁发的“金鵄勋章”便是基于这则传说而来。

在“记纪”中记载的历代天皇里，与鸟最有缘的当属仁德天皇，其别名为大鷦鷯尊（大雀命）。“大鷦鷯”其实就是指鷦鷯这种小鸟。关于仁德天皇此别名的由来，《日本书纪》中作出了如下记载：

应神天皇与其大臣武内宿祢家中于同一天诞下了男婴。那日，天皇家的产屋中飞来了角鸮（日文称“木菟”），而宿祢家的产屋则飞来了一只鷦鷯。第二天说起此事的天皇与大臣都觉得此乃祥事，遂大喜，并交换鸟名作为男婴的名字。于是，天皇的儿子便叫大鷦鷯尊（后来的仁德帝），而大臣的孩子则取名木菟宿祢。

鷦鷯是日本最小的鸟之一，颜色似味噌般的焦茶色，看起来十分不起眼。但它却是一种叫声悦耳动听的鸟，其啼鸣嘹亮高亢，听得人如痴如醉。从早春到初夏，山谷中鷦鷯的叫声丝毫不输瀑布的流水声，给人以极深刻的印象。

大鷦鷯尊同父异母的弟弟隼别皇子（《古事记》中作“速总别皇子”）的名字也来自鸟。二人还争抢过雌鸟皇女（但究竟为何鸟不得而知）。最终，大鷦鷯尊继承皇位与皇女结为了夫妻，并讨伐了试图篡夺皇位的隼别皇子。

除了鷦鷯外，仁德帝还与其他鸟有些渊源。皇族鹰猎并专门设立了鹰饲部便是自仁德朝开始的。《日本书纪》中有记载称，仁德天皇为了治水而修筑的位于河内的茨田堤有大雁繁殖。而天皇自己选定的陵墓地点，便是第一次去鹰猎的百舌鸟野（现大阪府堺市大仙町）。这一带因附近的百舌鸟古坟群而为人所知，其中最大的、被称为百舌鸟耳原中陵的古墓便是仁德天皇的皇陵。但考古学家并不把这个皇陵叫作仁德天皇陵，而是称其为大仙陵古坟或鷦鷯古坟。

二　莺与杜鹃鸟的传说

黄莺报春

现在我住在埼玉县浦和市（现埼玉市）郊外，家里有一个十坪[20]左右的小院。院子虽小，却经常有各种各样的小鸟飞进来。在院子里我为鸟儿布置了一个喝水的地方和一个饵料台，到了冬天，我会将面包屑、葵花子或者苹果、橘子等食物放到饵料台上，给飞来的鸟儿吃。

一年四季都会来我家院子里玩水的鸟有麻雀、山斑鸠、栗耳短脚鹎和小山雀。到了冬天还会有北红尾鸲、斑鸫、锡嘴雀、绣眼鸟、黄莺、灰喜鹊和灰椋鸟等交替飞来。其中北红尾鸲和斑鸫属于候鸟。夏季它们会在乌苏里江、库页岛、西伯利亚或者堪察加半岛等地繁殖，到了冬天才飞来日本过冬。锡嘴雀和黄莺属于漂鸟，只在冬季飞到暖和地区的人家院子里或杂木林中，等待寒冷的冬天过去，夏天到了再飞回山里。剩下的鸟就都是留鸟了，它们一年四季都会在我家附近繁衍生息。

几千年来鸟类们的生态与习性或许都不曾改变，发生改变的是自然环境。苇原中国、苇原瑞穗国已经消失了。但是在取而代之的高楼大厦中，鸟儿却寻找到一小片人工雕琢出的“自然”，在那里艰难地维持着自己的生存与习性，年复一年。一想到这些鸟儿小小的身躯中也蕴藏着悠久的历史，不由得感慨万分。

我们接下来讲一讲历史中有关鸟的故事。

《万叶集》中有诸多鸟类登场，涉及的诗歌数量上，排名前三的当属时鸟（小杜鹃）的一百五十首、大雁的六十七首与黄莺的五十一首了。这三种鸟代表了春、夏、秋三个季节，《万叶集》以后也常为诗歌所吟咏或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可以说杜鹃鸟、大雁与黄莺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鸟”了。

大概没有人不知道黄莺的叫声。在日语中，黄莺叫声的拟声词为“ホーホケキョ”（ho-hokekyo），写作汉字就是“法、法华经”。因

此，黄莺在日本也被称作“经读鸟”。此外，黄莺还有诸如歌咏鸟、花见鸟、春告鸟等别称。

日本人会通过吹拂而来的风、草木的气息以及梅花的盛开来感受春的到来，但只有听到黄莺的叫声后，才真正觉得春天来临了。

春来ぬと人は言へども鶯の

鳴かぬ限りはあらじとぞ思ふ

（都道春天来，春天真到否？黄莺既未鸣，春意复何有。）

——壬生忠岑，《古今和歌集》

春は名のみの風の寒さや、谷の鶯、歌は思へど、時にあらずと声も立てず

春空名，风仍寒，山谷莺，已思鸣，时不对，声不亢。）

——吉丸一昌，《早春赋》

春立てば花とや見らむ白雪の

かかれる枝に鶯の鳴く

（立春佳日后，白雪也如花。莫怪黄莺雀，飞来枝上夸。）[25]

——素性法师，《古今和歌集》

由此可见，人们盼望着黄莺的初音，即便春天降下淡雪也依然热爱着黄莺的啼叫。

此外，与黄莺有关的民间传说也有很多，“莺内里”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

救下了一只黄莺的男子在一位美丽女子的邀请下，来到原野上的一间房子内接受款待。房子内有分别用四季鲜花装饰的十二间屋。这名男子在此过着如梦般的生活。突然有一天，女子告诉他，绝对不要看第十三间屋，然后便出门离开了。但是，他却没有遵守约定，悄悄地偷看了第十三间屋。他看到里面有一只黄莺在唱诵着《法华经》。当男子突然回过神来时，却发现自己已经一个人站在一片荒芜的原野上了。

因为不遵守约定而失去了美女和家宅的传说，以类似的版本在世界各地流传。日本民间传说中的“仙鹤报恩”也属于这类故事。这类以男性因为没有遵守与女性立下的誓言而变得不幸，或者因为偷窥了本不该看的女性的秘密而失去幸福为主题的故事可以说是全世界共通的，日本的古人将这一思想寄托在了黄莺与仙鹤身上。

莺其实属于其貌不扬的一类小鸟，羽色往往为淡茶偏灰，冬季来临时它们会在灌木丛或低矮繁茂的草木间，叽叽喳喳地一边鸣叫，一边不停地飞来飞去。日本的“莺饼”和“莺豆”让人联想到“莺色”应是那种明亮的青绿色或黄绿色，但其实不然，绣眼鸟才是明亮的黄绿色，而真正的“莺色”在日语中也叫作“莺茶”，是一种在绿色中混杂了茶色和黑色的混合色。

比拼黄莺啼叫音色优劣的“斗莺”是平安时代兴起的一种春二月的娱乐项目，不论是宫内还是民间都很流行，但在民间流行开来是在江户时代以后。江户时期的小贩想尽办法让黄莺发出更为清脆悦耳的叫声，然后再将叫声好听的黄莺以高价售卖。

日语中的“鶯鳴かせたこともある”是一个比喻，指的是盛开的梅花散发出的芳香也曾吸引黄莺飞到枝头啼鸣，用于悲叹曾经年轻貌美的女性如今却年老色衰。这句话的出处歌舞伎《质库魂入替》中的一句台词——“虽已成迟暮的梅干婆，但芳华时也是花容月色，还曾引得黄莺啼叫”。

当日本人想要表达“虽是自己的孩子但却不像自己”时，便会说“鶯の卵の中の時鳥”[26]，而这句话则出自《万叶集》卷九中的“莺之，生卵乃中尔，霍公鸟独所生而。己父尔，似而者不鸣，己母尔，似而者不鸣”。

由此可知，万叶人在那时就已经知道了杜鹃鸟会将卵生在黄莺的鸟巢中。

在这么多种类的鸟中，其实只有杜鹃类的四种鸟完全不会自己孵化鸟卵和抚养幼鸟，它们会选择把卵产在其他鸟类的巢中，让其他鸟替自己抚养幼鸟长大。郭公鸟往往把卵产在大苇莺的鸟巢里，棕腹杜鹃则产在小琉璃（蓝歌鸲）、大琉璃（白腹蓝鹟）或日本歌鸲的巢里，而中杜鹃则多将卵产在冕柳莺的巢里。

与莺有关的语句或比喻在日语中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最后给大家献上一个字谜。

以“莺”作题，解答为“野辺の送り”。解谜的提示是“梅に来て鳴く”（埋めに来て泣く）。[27]

中国古代传说中的杜鹃鸟

如果说黄莺是报春鸟的话，那杜鹃鸟就是报夏鸟了。古时候，人们翘首期盼着杜鹃鸟的初啼，然后便开始插秧和挖山芋。有一首日本人耳熟能详的童谣是这么唱的：

卯の花のにおう垣根に

ほととぎす早も来なきて

しのび音もらす夏は来ぬ

（在卯花散发香味的墙根

杜鹃鸟早早飞来

带来杜鹃初啼的夏天已至）

——选自歌曲《夏已至》（『夏は来ぬ』），佐佐木信纲作词

日语中“忍び音”（しのびね）这个词专用于形容杜鹃的初啼，而“初音”（はつね）则用来形容进入对应季节以后黄莺与杜鹃的初次啼鸣。由此可见这两种鸟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之高。每年春、夏来临之际，人们都翘首期盼它们的悠扬啼鸣。

在《万叶集》卷八中，大伴家持因立夏四月，日复一日未闻霍公鸟（ほととぎす）喧，而作恨歌二首（《大伴家持恨霍公鸟晚喧歌二首》），以表达焦急等待杜鹃初鸣的心情。

わが屋前の花橘をほととぎす

来鳴かず地に散らしてむとか

（杜鹃可憎，不乘时啼；花橘已见凋落，却来鸣不已。）

ほととぎす思はずありき木の暗の

かくなるまでに何か来鳴かむ

（霍公鸟，不念有寸，木晚乃，如此成左右尔，奈何不来喧。）

最终，他盼来了杜鹃的初啼，高兴至极的大伴家持便作了《欢霍公鸟歌一首》。

いづくには鳴きもしにけむほととぎす

吾家の里に今日のみぞ鳴く

（曾于何处啼，杜鹃今日鸣，到我家乡里。）

日语中“ほととぎす”对应的汉字词语非常多，比如“杜鹃”“杜宇”“杜魄”“蜀魄”“帝魂”“望帝”“蜀魂”“蜀鸟”“不如归”等。

这些词语全部源自古蜀王杜宇的传说。并且，杜鹃也作为“子规”“时鸟”而广为人知。除上述以外，杜鹃还拥有“古恋鸟”“恋鸟”“沓手鸟”“魂迎鸟”“田长鸟”“早苗鸟”“呼子鸟”“妹背鸟”等众多别名。

那么，我们就来追溯历史，看看为何杜鹃会变成杜宇的象征。

这里所说的古代蜀国并非《三国志》中刘备、诸葛亮所在的蜀国，而是在那之前两千多年的一个神话传说中的繁荣国度。现存的文献中几乎找不到关于古蜀国的记载，我们仅能根据《太平御览》等古书中引用的《蜀王本纪》的片段或《华阳国志》中“蜀志”的部分来寻找蛛丝马迹，去猜想这个幻想中国度的面貌。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蜀王本纪》等书中关于古蜀国的传说。

蚕丛是蜀国首位称王之人，他推荐国民养蚕，使蜀国得到了发展。据说“蜀”这个字就是仿照甲骨文中的“蚕”字而创。初代蜀王蚕丛长着一双突起的奇怪眼睛，死后葬于石棺之中。在蚕丛死后，人们也开始使用石棺，并将石棺椁称为“纵目人冢”。

继蚕丛之后，当上蜀王的人是柏灌，再之后是鱼凫。鱼凫曾两次迁都，最后在山中狩猎时顿悟成为仙人。

在鱼凫成仙后又度过了漫长的岁月，百姓都追随王变成了仙人，蜀国便渐渐荒废了。突然有一天，一个名叫杜宇的男人从天而降，正巧这时从水井里冒出来一个名叫利的女子，二人结为夫妻，相亲相爱。渐渐地，蜀国这片土地重新兴盛起来，百姓也全都回来了，而杜

宇则成了蜀国的王，号曰望帝。

蜀国三番五次发生洪水灾害，这也令成为望帝的杜宇苦恼不已。后来他听说一个叫鳖灵的人善于治水，便任其为宰相以解决洪水灾害。鳖灵在大洪水来袭时，带领蜀国人民开凿了玉垒山（巫山）的峡道，将洪水引流至泯江（长江），拯救了蜀国。于是，望帝将王位让给鳖灵，自己则隐居西山，而鳖灵便成为开明帝。那时正好是春天，杜鹃在田野中鸣叫。接下来的每一年，从春天至初夏，杜鹃鸟都会在农忙时节飞来啼鸣。于是，人们便认为这杜鹃鸟是曾经教百姓如何耕种的望帝灵魂的化身，现在又回来告诉百姓，到了播种和插秧的时节了。

此外，存有另一个说法。在鳖灵外出治水时，望帝与鳖灵的妻子通奸。因此事愧疚不已的望帝将王位让给鳖灵后自己隐居深山，死后其灵魂化作了杜鹃鸟。甚至还有说法称，在望帝退位隐居时，鳖灵趁机夺走了望帝心爱的妻子。对此悲伤万分的望帝便在死前将自己的悲痛之情寄托在了西山的杜鹃鸟身上。据说，自那以后，蜀国到处都能看到四处飞舞的杜鹃鸟，这些杜鹃鸟即便嘴中吐血也依旧昼夜不停地啼鸣。有意思的是，杜鹃鸟的口腔内部确实是红色的，也确实是一种夜啼达旦的鸟。

从多个版本的传说来看，杜宇与鳖灵是为了争夺一个女人而起了纷争，最终的结果是鳖灵获得了胜利。

这个传说还有下文。自鳖灵以后的第十二代蜀王统治之时，蜀国灭国。这位蜀王贪婪好色，中了秦的计谋而导致蜀被灭国。蜀王轻信谣言，为了让据说能生出黄金的巨大石牛通过，他命人打通了被险峻山谷包围着的通往蜀国的道路（金牛路），于是秦军轻而易举地进攻了蜀国。而保护蜀国的是五位大力士，被人们称为“五丁力士”。秦王用美人计迷惑蜀王，骗他派五丁力士去山里迎接送给蜀王的五位美女，但最终五丁力士死在了山里。于是，秦军便以破竹之势从金牛路进军，一举打败了蜀国。这时，望帝灵魂幻化的杜鹃看到故国的灭亡，悲痛万分，便在桃李花开的季节向月亮悲鸣道：“不如归，不如归。”于是，蜀国人也听到了望帝因亡国而悲鸣。

《万叶集》中咏诵杜鹃的和歌多达一百五十首。在咏鸟歌中，与第二位的咏雁歌（六十七首）和第三位的咏莺歌（五十一首）相比，以压倒性的数量优势位居榜首。

从万叶时代开始，日本人便十分喜爱杜鹃鸟。奈良、平安时代的贵族们在初夏的傍晚会不休不眠地等待杜鹃的初啼。此外，日本人还将农事活动与杜鹃的叫声联系在了一起，当听到杜鹃开始啼鸣后，便会翻耕秧田和插秧。所以他们也将杜鹃称为早苗鸟或田长鸟。

人们普遍认为，很早以前杜宇传说便已由中国传入了日本。于是根据杜宇变成杜鹃后因思念妻子而啼鸣的传说，日本人也管杜鹃鸟叫作古恋鸟。而把杜鹃看作是往来于冥世与人世之鸟的这种思想应该也是基于杜宇传说而来的吧。

《万叶集》卷二中记载了额田王与弓削皇子的赠答歌。公元690年前后，天武天皇的六皇子弓削皇子和皇子的母亲持统天皇一起行至吉野。吉野曾是壬申之乱前，从天智天皇手下逃出来的大海人皇子（后天武天皇）的临时据点，所以也是一个拥有很多回忆的地方。于是，弓削皇子便向额田王赠歌道：“古に恋ふる鳥かも弓弦葉の、御井の上より鳴き渡り行く。”在这首赠歌中，弓削皇子咏诵的是“一只杜鹃飞至古井上，它又带着回忆鸣叫着飞走了”。这时壬申之乱已过去将近二十年，而额田王也差不多六十岁了。中大兄（天智）与大海人（天武）争夺额田王的支持已是三十年前的事，而天智与天武这时也都已不在人世了。于是，额田王回复弓削皇子而歌曰“古に恋ふらむ鳥は霍公鳥、けだしや鳴きしわが念へる如”，意思是“因霍公鸟是恋昔之鸟，或许它刚才也似我怀恋往昔一般，在鸣叫中回忆吧”。这里的霍公鸟指的就是杜鹃鸟。

我们再稍微回顾一下刚才的古蜀国传说。此前说到杜宇深爱的妻子从水井中诞生。而终于当上蜀王的杜宇却要与宰相鳖灵争夺妻子，他的灵魂最终变成了杜鹃。

我认为弓削皇子与额田王显然是知道杜宇与杜鹃鸟的传说的。如果带着这种想法来阅读这两首万叶和歌，则似乎又平添了一层深意。

往来于冥界的古恋鸟

《小仓百人一首》中后德大寺左大臣（藤原实定）的《杜鹃》这首和歌还被制作成了“歌留多”[28]。

ほととぎす鳴きつる方を眺むれば

ただ有明の月ぞ残れる

（清夜子规啼，声声碎耳旁。遍寻空不见，残月晓天长。）

藤原实定的这首和歌原本记载于《千载和歌集》中，题为《晓闻杜鹃有感所咏》（『暁聞郭公といへる心を読侍ける』）。和歌的大意为：听到了期盼已久的一声杜鹃的啼鸣，抬头仰望传来声音的天空，却发现夜色即将褪去，只剩下残月而已。我们结合杜鹃的传说，便能更加深入地去解读这首和歌。藤原实定十八岁时任左中将，二十二岁为中纳言，两年后又升从二位，二十六岁时便已是权大纳言，仕途可谓相当平顺得志。但就在当上大纳言的第二年，藤原实定便辞去了职务。辞官理由不得而知。而在他复官还职前的十二年间，他可谓怀才不遇。这首《杜鹃》便是在他不得志时所创作的。

了解了和歌的创作背景后再来解读，就会发现，藤原实定用杜鹃鸟来比喻自己在回忆往昔的荣华时却惊觉即将天明的情景。而“晓”经常被用来表达对恋情的惜别，所以也能表达“思念着曾经整日相对、情深意切的爱人，不知不觉天就快要亮了”这层意思。这与杜鹃作为“恋鸟”的形象颇为贴合。

战国时代的天正十一年（1583年）四月二十四日，被誉为天下第一美女的织田信长之妹阿市在位于越前北庄城的夫君柴田胜家家中自尽。在自杀的前一天晚上，二人留下下面这两首辞世诗句。

夏の夜の夢路はかなき跡の名を

雲井にあげよ山ほととぎす

（夏梦无常一世名，杜鹃凄鸣上云霄。）

——柴田胜家

さらぬだにうち寝るほどの夏の夜の

別れを誘ふほととぎすかな

（人生苦短，宛若夏夜，杜鹃啼叫，催人离别。）

——阿市

天正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换算成格里高利历相当于1583年6月13日。这时正是夏季的夜晚，天亮之时，丰臣秀吉的军队或许就要发动总攻了，在此之前柴田胜家与阿市应是刚好听到了杜鹃的叫声吧。此外，杜鹃是会缅怀过往而啼叫的鸟，被视作迎魂的冥界之鸟。这样

一想，这两首辞世诗意味颇为深长。当然，这里并不仅是因为夏天，才提起了杜鹃鸟。

以下三句用杜鹃作比喻来形容战国三大英雄的说法也是妇孺皆知。

鳴かぬなら殺してしまえ時鳥　　　　信長

鳴かずとも鳴かして見しょう時鳥　　秀吉

鳴かぬなら鳴くまで待とう時鳥　　　家康

（时鸟不鸣，何如？

信长：杀之！

秀吉：使其鸣。

家康：待其鸣。）

这里的“时鸟”只可能是黄莺或杜鹃，但若是黄莺的话语感欠佳。至于为什么“时鸟”只能是黄莺或杜鹃，这是因为万人期待初啼的就只有这两种鸟了。

杜鹃鸟的口腔内部是红色的，啼叫时嘴里的红色就更加明显了。而由于其叫声嘹亮清脆，在有的人听来或许有些不舒服。所以也就有了“鳴いて血を吐くほととぎす”（杜鹃啼血）这样的说法。

德富芦花的长篇小说《不如归》中，主人公浪子嫁了一个好丈夫，刚刚过上幸福的生活，便因患肺结核被婆家休掉了，去世前浪子伤心欲绝地呐喊道：“太痛苦了！再也不做女人了！”而这部小说的题目也正象征着女主人公的疾病与之后悲惨的经历。

日本还有一个叫作《时鸟与兄弟》的故事。

很久以前，有一对亲密无间的兄弟生活在一起。但哥哥（一说弟弟）某天突然失明了，随后他开始渐渐怀疑起弟弟，猜测弟弟一个人把好的山芋都吃了，而把不好的山芋都给了自己。最终在猜忌心的蒙蔽下，哥哥杀死了弟弟并用菜刀剖腹自杀。直到最后，哥哥才知道原来弟弟一直吃的是不如自己的粗茶淡饭。悔恨万分的哥哥化成时鸟

（杜鹃）后飞走了。而杜鹃因为思念弟弟以及往日兄弟俩亲密无间的日子，每天都哀鸣啼叫八千零八声。日本全国都流传着类似的故事。

此外，还有下面这样一则传说。

杜鹃在前世以做沓（日本古代的鞋物）、卖沓为生。有一天，杜鹃将沓卖给了百舌鸟，但百舌鸟没有付钱。之后每当杜鹃来时，它都藏起来不露面。据说直至今日，杜鹃都在啼叫着要百舌鸟还钱。也因此，杜鹃在日本也被叫作“沓手鸟”。而百舌鸟只有在杜鹃秋天飞回南方时，才会现身，落在枝头啼鸣。

关于杜鹃的叫声，日本人从中听出了各种各样与其音相近的短语，最普遍的说法是，杜鹃之声仿佛在说“テッペン欠けたか”（天边缺角了吗）。而“包丁欠けたか”（菜刀缺口了吗）、“弟腹切っちょ”（弟弟破腹）等说法则是结合了上面所讲的那则传说而来。杜鹃还经常出现在山寺等地方，所以日本有些地方把杜鹃的叫声听成“本尊欠けたか”（主佛有缺口吗）、“本尊買うたか”（买主佛了吗）、“本堂建てたか”（主佛堂建好了吗），等等。到了近代，人们则把杜鹃的叫声以“特许许可局”这种绕口令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江户时代的闲人还创作出与杜鹃有关的一首回文歌。

ほととぎす聞かまし籬杉戸遠

（ほととぎすきかましまがきすぎどとほ。意为：杜鹃的叫声听起来似乎离杉木篱笆门有些远。）

“回文”是指这句话不论是顺着读还是倒过来读，发音都一样。

秋天来临，大雁也飞来了。“雁”在日语里既可读作“かり”，也可读作“かりがね”。而“かりがね”既是大雁的名字，也经常用来形容大雁的叫声。

由于大雁会在秋分时节飞来，春分时节飞走，所以日本人认为大雁的故乡其实是常世国。

大雁会在天空中排出整齐的队伍，这被称为“雁行”。过去，秋风拂面而来，人们抬头望天，看到初雁便知已是初秋时节。芒草、满月与大雁共同酝酿出秋天的风情与味道。但近几年，日本已很难看到大雁的身影了。

在中国，因为大雁有定期迁徙的特点，所以被视作传递远方消息的使者，并因此出现了众多传说。据《汉书》记载，苏武被匈奴囚禁时便将信绑在大雁腿上通知了汉帝。

《万叶集》卷十五中有一句“欲以雁为使，向空远飞去。返都至奈良，代吾捎口信”，这句和歌也为我们讲述了古代日本的“雁使”故事。

三　鸟的智慧与传说中的鸟

会模仿的鸟与会唱歌的鸟

为什么小鸟会啼叫呢？地球上有成千上万种生物，但是会发出诸多复杂声音的寥寥无几。鸟类便是其中之一。

众所周知，一只鸟可以发出很多种叫声。通过叫声，鸟儿互相传递着警戒的信号，发出自己的占地盘宣言；又或者通过啼叫来高唱一曲求爱歌，或是与伙伴、家人进行交流。也就是说，鸟通过发出各种各样的叫声来进行沟通。虽然没有形成文字或符号，但这不正是一种语言吗？

如果将地球上的生物按照智商的高低进行排序，那毫无疑问鸟会排在很靠前的位置。鸟类不仅仅有“语言”，还具有其他的智慧，能够通过学习掌握技能。夜鹭的近亲绿鹭便会“钓鱼”。绿鹭会捕捉苍蝇等昆虫，然后将捉来的小虫子放到河面上吸引小鱼来吃，这样一来它们就容易捉住小鱼了。当尝试多次未果后，绿鹭会选择换一个地方。海鸥则会飞到空中，将坚硬的贝类抛至岩石上，来弄碎外面的硬壳。乌鸦将核桃放到路上，等车压过去后吃核桃仁的画面相信大家都在电视上看到过。外国的一些小鸟还会将小树枝插进树洞，来捉里面的虫子吃。

能够做出上述这些事情的大概只有哺乳类，甚至只有部分灵长类动物。而这些技能一些鸟类也能做到，这足以说明它们也是拥有较高智商的生物。我们都听说过，麻雀或者北红尾鸲等鸟类会与特定之人十分亲近，而乌鸦又会攻击或威吓特定的人。人类很难区分同种类的鸟，但是鸟却能很好地分清我们人类。

还不止这些，鸟甚至能够与我们人类对话。我们都知道鹦鹉或者九官鸟（鹩哥）能够模仿人类说话。但至今我们仍没有研究出为什么它们可以模仿人类的语言，以及到底是如何模仿的。

据说，美国的鸟类研究专家艾琳·佩珀伯格（Irene Pepperberg）通过教一只非洲灰鹦鹉学习人类的语言，让它学会并能够说出四十种物品名称、七种颜色、五种不同的形状以及六个数字，而且通过对这些单词的拼组，这只非洲灰鹦鹉还能够识别出诸如“黄色香蕉”“三角盒

子”等约百种物品。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如果将三把钥匙与好几根发夹混在一起，问它：“有几把钥匙？”这只鹦鹉还能准确回答出“三（把）”。如果将相同形状的红色与黑色木片给它看，然后问它哪里不同，它便会回答“颜色”；而问到哪里相同时也能准确说出“形状”（出自小西正一《小鸟为何会唱歌》，岩波新书出版）。

这说明鹦鹉不仅仅会模仿，还能够在思考后回答问题。此外，经过训练的鹦鹉还可以做到只在早晨说“ 早上好”和只在傍晚说“晚上好”。也就是说像鹦鹉这类很聪明的鸟不仅仅可以单纯地识别物体，它们还拥有颜色、形状、数字和时间等概念。

比较令人意外的是，其实很久以前鹦鹉就已经作为家养鸟来到了日本。《日本书纪》第二十五卷大化三年（647年）一条中，便记载着从新罗进贡来“孔雀一只，鹦鹉一只”。

清少纳言《枕草子》第三十八段写道：“鹦鹉，颇为有趣，会模仿人之言语。”

实际上，不仅仅是鹦鹉和九官鸟，还有不少鸟类都会模仿。百舌鸟可谓鸟如其名，能够模仿各式各样鸟的鸣叫声。此外，松鸦也极善模仿，在初夏的山间，人们经常被它的叫声所欺骗，它甚至可以模仿黄眉姬鹟和白腹蓝鹟的叫声。连乌鸦有时候都会模仿其他鸟的叫声或人类的声音。

我在家附近的一处高地墓园，曾听到一个老人凄凄惨惨地边哭边叫一个女性名字的声音。但周围一个人影都没有，让人毛骨悚然。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只乌鸦在叫。

还有一件亲身经历的事情。虽然已过去很久，但我依然记得自己被九官鸟骗过。昭和五十三年（1978年）的早春，我与作家新田次郎一同前往甲州采访。途中我俩顺便拜访了武田信玄的菩提寺，惠林寺附近的一座老寺——放光寺。在进入僧人的居室之前，我们在门口稍微等了一会儿。等待的时候我们听到了哒、哒、哒的走路声，然后是哗啦一下门被拉开的声音，接着便听到有人说：“有人吗？”再接下来，我们便听到一位中年女性的应答。然而，我们听见了声音，却完全不见人影。更加奇怪的是，非但不见人影，刚才那一串声音又再次传来。最终我们发现，原来刚才听到的那一连串脚步声、开门声甚至是人说话的声音，都是放光寺里饲养的九官鸟发出的。

如此这般，鸟儿会模仿其他鸟类的叫声甚至是学人说话，但人们至今依旧没有研究明白为何鸟会这么做。因为它们的这种模仿行为似

乎并不是为了与同伴交流，看起来也不像是通过模仿行为来保护自己或是进行攻击。所以目前暂且只能认为它们是在玩耍了。

除了人类以外，地球上的其他动物几乎将一生都消耗在捕食进食与繁衍生殖上。会进行玩耍这类行为的只有很少一部分高级生物。众所周知，乌鸦会表现出玩耍的行为，但通过前面几个事例我们也不难看出，其他的鸟其实也具有相当高的智商。

并且，鸟还能够记住它听到的旋律。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通过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将夜莺、鹌鹑和杜鹃的鸣叫声巧妙地表现了出来。除了用乐器表现鸟鸣声外，还有一个反其道而行之的例子。在德国某个乡村，一位年轻人每天都来到恋人家，吹响口哨作为暗号。于是，以这里为地盘的一只乌鸫便记住了年轻人吹的口哨的旋律。最终这只乌鸫将这个旋律传给了其他的乌鸫，大约三年后，村子里所有的乌鸫都会哼叫这个旋律了。

恕我孤陋寡闻，我并没有听说过日本有类似的小鸟记住了音乐旋律的故事。即便存在什么樫鸟会弹琴啊，抑或是乌鸦会模仿笙的音色啊之类的小故事，也不足为奇。如果各位读者看到了这类文献的话，请务必告知我。

《伊势物语》与都鸟

在这一节里，我们再讲一些日本史中关于鸟的话题。

《伊势物语》第九段中有一节非常著名，讲的是在原业平来到东国时，在隅田川畔看到了一只名叫“都鸟”的鸟，格外思念都城的他便咏诵了一首和歌：

名にしおはばいざ言問はむ都鳥

わが思ふ人はありやなしやと

（不负其鸟，容吾一问，吾爱之人，今昔何方？）

在原业平是平安时代前期的一名歌人，天长二年（825年）出生，元庆四年（880年）逝世，享年五十六岁。因其才华横溢、风流倜傥，《伊势物语》等作品中多有他的记载。但关于他的事迹却有很多疑点，就连他前往东国是否为史实都尚未确定。但在原业平与隅田川和都鸟的故事，却因《伊势物语》的记述而和梅若传说一同流传开来。

梅若传说因谣曲《隅田川》而广为人知。

梅若受人贩子诱骗，从都城被带到了武藏国，到了隅田川畔，生病的梅若被人贩子抛弃，咏“寻觅而来一问一答，都鸟你可知，隅田川边露，可不曾消失”歌一首后死去。村子里的人觉得梅若十分可怜，便为其砌冢并葬之。谣曲《隅田川》描写的则是梅若的母亲来到东国的故事。来到隅田川的梅若母亲听说了这里飞翔的鸟叫作都鸟后，想起了在原业平下东国的故事，对其旅途之遥远十分感慨。而当她坐上渡船时，却听说了被人贩子抛弃后死去的少年的故事，方才了解到那是自己的儿子……

那么，这些故事里出现的“都鸟”到底是什么鸟呢？对此出现过各种说法，但现在的定论是都鸟应为红嘴鸥。东京都的都鸟之所以是红嘴鸥，原因也与在原业平及梅若传说有关。

与隅田川东岸的浅草隔川相望的向岛木母寺，便保留有梅若的坟冢，都营地铁的本所吾妻桥站附近则保留着在原业平坟冢。长命寺附近的墨堤有一家始于明治维新时期的樱饼店，颇有名气，叫作“言问团子”，而隅田川上就有一座桥叫作“言问桥”。“言问”这个词，自然是源于上文中在原业平的那首和歌中的“いざ言問はむ……”

曾经的向岛因为墨堤的樱花、向岛百花园而闻名，再加上辖内有一些古老的神社、寺庙，以及田地、芦苇滩等，遂一直是江户百姓出游的一大目的地。曾经的隅田川里有小鱼游动，不同季节的天空中有不同的鸟儿飞翔，有时还能看到朱鹮和鹳。但现在的隅田川已不复当年，河岸周围筑起了水泥，历史遗迹也都被高楼大厦遮挡，几乎失去了存在感。从古至今仍保留下来的，似乎只有冬季还会在隅田川上翱翔的红嘴鸥了。

影响战役的鸟与怪鸟“䲸”

日本历史上发生过诸多战役。与近代的战争不同的是，古时候的战争往往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这其中便有战争的胜败与鸟相关的故事。

后三年之役是处于平安时代后期的十一世纪后半叶，在奥羽一带发生的一场大规模战役。在前九年之役后，占领了奥六郡、出羽山北而成为一大豪族的清原氏发生内讧，时任陆奥守的源义家（八幡太郎）介入了这场内讧，并引发了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最终取胜的清原清衡（后为藤原清衡）便是一手打造了平泉文化的奥州藤原氏的祖

先。

后三年之役的高潮是宽治元年（1087年）十月，义家在得到弟弟义光（新罗三郎）的援助后，率数万大军进攻金泽栅（秋田县横手市金泽）的那一战。而在这场战役中向义家的军队通报了危机并最终引导其走向胜利的便是雁群。这就是《后三年合战绘卷》中描绘的著名的《以雁列之乱知伏兵》故事。该战役于阴历九月打响，这时正是大雁迁徙的季节。义家看到原本整整齐齐列队飞翔的大雁突然乱作一团，由此看破了敌人伏击作战的计谋，最终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处于源平合战时代的治承四年（1180年）十月二十日，为了追讨向关东起兵的源赖朝，以平维胜为总将军的平家大军向富士川西岸出兵，而源赖朝的关东军也来到了富士川附近的贺岛（静冈县富士市），两军对峙，战事一触即发。但在二十日这一晚，平家军却落荒而逃，赖朝军不战而胜。据说，这是因为那晚河畔的池塘里水鸟突然一齐飞走，平家军误将水鸟振翅的声音当成了敌军夜袭之声，于是慌忙撤军，最终在一片混乱之中将胜利拱手让给了敌人。这是一则记载于《山槐记》等书中的著名传说。

通过古书中记载的故事，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古时候富士川周边有着广阔的湿地和一些湖沼。到了冬季，应该有很多鸭类飞来越冬吧。鸭类中有很多都是白天浮在水上休息，夜晚到凌晨成群飞入水田或湿地里寻找食物。试想，如果当年在黎明前的静谧中，突然有上万只鸭子一齐飞起来的话，翅膀拍打的声音该有多么令人震撼，这样看来，平家军将其误以为是敌人而乱作一团也是情有可原的。但也有说法认为，古人大多都很熟悉鸟类的习性，所以这则故事其实是为了渲染平家军的多疑而捏造出来的。

虽然与源平合战并无直接关系，但《平家物语》卷四中源三位赖政（源赖政）射杀怪鸟鵺的故事也是颇负盛名。这个故事发生在二条天皇的御所。源赖政是活跃于源平合战时代的一位武将。

“宫中有怪鸟名鵺，常扰天子圣心”。于是，源赖政奉旨在宫中待命，深夜丑时，他发现一个可疑身影并成功将其射落。这时人们发现这个奇怪的生物“头为猿，躯为狸，尾为蛇，手足为虎，鸣声似鵺”。实际上，这个怪物是虎斑地鸫，日语汉字中的“鵺”或者“鵼”，是虎斑地鸫的别称。在日本，它也叫作黄泉鸟或者地狱鸟，夜里会发出咻咻的啼鸣——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叫声。如果说在深夜的皇宫惊扰到天皇的鸟是虎斑地鸫的话，那源赖政射杀的怪物到底是什么呢？显然，那个怪物应该是人们根据虎斑地鸫的叫声联想出来的虚构生物了。

说起天皇，我们再提一下从后醍醐天皇那里获得了官位的鸟——夜鹭（日文称“五位鷺”）。某天，后醍醐天皇下敕命捕捉一只夜鹭。在捕捉过程中，这只夜鹭毫无逃跑的打算，于是人们轻易地捉住了它。后醍醐天皇认为这只夜鹭是遵照敕命自愿被捕的，对此感到甚是奇妙，于是便赐了五位官职给这只夜鹭。夜鹭昼间经常成群地聚集在寺庙、神社里休息，到了晚上就会飞到附近的池塘或田地里寻找食物。可以推断当年御所内的森林或池塘内应该也有很多夜鹭。

“鹰猎”在日本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据“记纪”的记载，自仁德天皇开始就有鹰猎活动了。之后的嵯峨天皇等人也热衷于鹰猎，渐渐地这项活动在武士间流行开来。以“此时都中流行物”为开篇的《二条河原落书》中，有一节便以讽刺的口吻描写了通过以下克上而发迹的武士也尝试用鹰捕捉猎物，却连小鸟都很难捕到。然而，鹰猎这项活动仍被视作实力强大的武将的印证，所以深受战国大名的喜爱，这股热潮也一直沿袭到了近代大名。除五代纲吉外，历代德川将军皆好鹰猎，特别是初代将军家康和八代将军吉宗。

进行鹰猎活动时大多使用苍鹰、雀鹰、日本松雀鹰、游隼、红隼、金雕以及鹰雕（熊鹰）等。人们训练鹰去捕捉鸟或小型动物，甚至还曾训练百舌鸟去捕捉麻雀。

鹰猎这项活动自古以来便在世界各地盛行，在古埃及、亚述帝国、波斯都曾风靡一时。而日本的鹰猎活动则是从中国传入的。

四　鹤与雀的日本史

花鸟画中被奉为神鸟的仙鹤

鹿儿岛县出水郡的野田川注入八代海的河口附近有一片田园，这里自古便是鹤的越冬地，也被认定为“国家特别天然纪念物”。每年飞来这里越冬的鹤的数量稳定增长，如今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鹤的越冬地。1999年冬天，以白头鹤为首，共有一万几千只鹤飞来这里越冬。

除了丹顶鹤以外，白头鹤及白枕鹤等鹤类都是候鸟，会在金秋十月前后从西伯利亚或乌苏里江流域等繁殖地飞来日本，当春天到来时再飞回北方。只有丹顶鹤属于留鸟，在北海道繁殖。

鹤，自古便被视为吉祥的象征，是花鸟画中颇具代表性的一种鸟。

飞落在冬季枯田里的鹤，身姿优雅而美丽。江户时代，包括丹顶鹤在内的鹤还会飞至江户郊外的农田或湿地。直到明治时期，在日本各地的枯田等场所都经常能看到鹤这种冬候鸟。

飞到收割完的稻田里啄食漏在田里的稻穗的鹤被尊为“榖灵神”。鹤落在农田的现象象征着丰收。在日本各地也都流传着“穗落传说”，大致内容是由鹤带过来的稻穗会拓广耕地，或者地里会长出新品种。这或许是因为鹤的粪便实际上成了肥料，滋养了土壤吧。也就是说，鹤不仅因其优美的姿态被推崇为神鸟，实际上它也确实为农田带去了营养。

鹤在古日语中读作“タヅ”[29]，而不是“ツル”。《万叶集》等古书中并没有关于“ツル”的记载，有的只是“タヅ”。比如，下面这首和歌里的“田鹤”便是以“タヅ”为发音所作。

和歌の浦に潮満ち来れば潟をなみ

葦辺をさして田鶴鳴き渡る

（碧浦满潮来，袭没浅海滩。婀娜芦苇塘，白鹤争相鸣。）

——山部赤人

日语中有个说法“鶴の一声”，形容的是位高权重者一句话就能控制或压制住众人的发言，多用来表示虽然鲜少说话，但一旦说话便很有分量的意思。确实，丹顶鹤等鹤的叫声音量非常大，很有穿透性，但也绝非不易听到，从冬天到春天的这段时间，经常能听到鹤鸣。

刚才说过，鹤被人们视作吉祥鸟。我们经常听到“千年龟、万年鹤”这样的说法，二者均是长寿的象征。鹤与龟也经常作为吉祥物被用在喜事上。

鹤与龟能够活千万年的说法其实出自中国的《淮南子·说林训》。

此外，鹤飞上天空时的悠然姿态是如此高贵而优雅，以至于古代中国人也将鹤视作与神仙有关的仙禽。《神仙传》一书中便记载了化成鹤后返回故乡的仙人苏仙公的故事。

鹤化成美女后与人间的男子坠入爱河的故事自古便有。《异苑》中便有下面这样一则故事。在晋永嘉年中（四世纪初），有个名叫徐奭的年轻男子在田里看到一位美人，美女将他邀至家中并设宴款待，奭遂经日不返。徐奭的哥哥为寻他来到湖边，看到弟弟与一女子对坐，便用藤杖打了该女子。女子变成一只白鹤后飞向天空消失不见了。

类似的故事也出现在了《幽明录》中，并成为日本古代传说《鹤女房》的故事原型。而《鹤女房》的故事又被改编成适合儿童阅读的《鹤的报恩》，变得妇孺皆知。

某天，一名男子救了一只鹤。没多久，一位美丽的女子便出现并住进了贫穷男子的家中，最终二人结为夫妇。这位美丽的女子到了夜晚便会把自己关在织布房织出完美的绫锦。夫妇二人的日子逐渐富裕起来，但女子却日渐消瘦。这名女子要求丈夫绝对不能偷看她在织布房里的样子，但丈夫最终还是偷看了。他看到织布房里有一只鹤，正从自己身上摘下羽毛织成布。

除了被人们视作能够带来幸福的鸟以外，人们还将鹤当作了食用鸟。特别是在江户时代，人们将鹤肉视为珍宝。据《本朝食鉴》的记载，由于鹤自古以来就被视为拥有千年寿命的仙禽，人们便认为食其肉亦可长寿，因此喜食鹤肉。当然，其中也有大型鸟相对容易捕捉，且往往肉质较多这部分原因。

那时人们最爱吃的当属血肉散发着香气的白枕鹤，而较少飞来日本的灰鹤则被人视作极为宝贵的珍品。但据说，丹顶鹤肉质柴硬，并不好吃。

江户时代，宫中每到正月十七便会举办“鹤庖丁”仪式，在天皇的面前将鹤按照它原本的体态进行解剖。此外，在幕府及大名家中，年初或者操办喜事时也会举行“鹤庖丁”仪式，并食用鹤肉。据说，这一仪式源自丰臣秀吉曾在年初向后阳成天皇献鹤之举，其后便演变为宫中及武家的新年惯例。

但据说这个仪式也促使人们大肆捉鹤，并最终导致了鹤的数量一度骤减。享保三年（1718年），幕府取消了向朝廷进贡鹤的规定，并且禁止了在宴席上食用鹤肉的行为。

捕捉鹤主要靠的是鹰猎，而鹰猎又是秋冬季节将军及大名的主要活动。

在冬季以外的季节，人们还会贩卖用盐腌制过的鹤肉制品。撰写于宽永十五年（1638年）的《毛吹草》中便介绍了松前的著名特产“盐鹤”。

有时，我们会看到花鸟画上出现一棵松树上站着一只仙鹤的图案，但其实这种图案是大错特错的。首先，鹤并不会在树上筑巢。人们看到的在树上筑巢的其实是白鹳或者鹭。

体形大小与鹤十分相似的鹳在西方被视作“送子鸟”。日本也有许多鹳，经常能看到它们在松树上或者大寺院的屋顶等地方筑巢。明治时期，浅草寺顶上还曾有鹳的鸟巢。昭和四十六年（1971年），人们在兵库县的松树上最后一次捕到了日本产的野生鹳。那时由于鹳的自然繁殖已然无望，为了人工延续这一物种，只能将它们捕捉。

既是害鸟又是益鸟的麻雀与民间故事《舌切雀》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接触最多的鸟或许便是麻雀了吧。关于麻雀有很多俚语、谚语以及传说，此外麻雀也经常被用在比喻之中。

麻雀虽然被人们当作会吃粮食的害鸟，但其实它也是会吃虫子和杂草的益鸟。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对老鼠和麻雀进行了彻底的驱除。驱除麻雀所采用的方式可以说是只有中国才能施行的人

海战术。那时，农村地区的人全都拿着铁锹或者铁锅之类的工具出门打麻雀，绝不让麻雀出现在树上或家中。它们不论飞到哪里，都会被人驱赶，最终因体力不支而掉落在地上，成了人类的牺牲品。

如此一来，不仅仅是麻雀，几乎所有的野鸟都从中国农村地区消失了。造成的结果却是第二年出现了空前的农作物歉收。害虫大肆繁殖，使得稻子等农作物大面积受害。一只小鸟一天能够吃掉数十只虫子，白头翁之类更是能吃掉多达数百只。自然界正是这样保持着平衡。没有了鸟之后，这种平衡被打破，自然会出现虫害的困扰。

日本其实也将麻雀看成是威胁农民生活的害鸟。农民为了保护农作物不受麻雀啄食，会在田里制作稻草人或者安装驱鸟鸣器。人们在小正月举行的“鸟追”（赶鸟）仪式便是祈祷谷物收成不受麻雀的危害。

另一方面，人们又将啄食谷物的麻雀视作“穀灵神”般的存在，认为麻雀可以帮助人们为农田带来丰收。甚至还有说法称，能让麻雀随心所欲地吃穷人都舍不得吃的大米是一种孝敬父母的行为。

迄今为止，有很多民间故事或传说讲述的都是麻雀为人类带来了富足或幸福。看来，古时候的人们能够充分认识到麻雀虽有害但亦有益。

而日语中所谓的“雀”，据说古时候曾用来泛指所有小鸟。虽然日本人从来没有想过为了提高农业生产而将麻雀“赶尽杀绝”，但到了现代，环境的恶化也造成了小鸟数量的急剧减少，最终导致了虫害的增多。

于是，人们开始大量使用农药来解决虫害问题。虫子对于人类来说或许是有害的存在，但它们也承担着为植物授粉的职责，且是鸟类或者鱼类的食物，对于自然界而言不可欠缺。然而农药却将害虫、益虫全都杀死了。

在我家所在的浦和市（现埼玉市）郊外的见沼田圃附近，有一座被认定为国家特别天然纪念物的“野田鹭山”。自江户时代开始这里便是日本国内屈指可数的鹭鸟群居地，但在昭和三十年代（1956年—1965年），这里却不再是鹭鸟们的天堂了。罪魁祸首便是农药。鹭鸟主要以泥鳅、青蛙或者小鱼等为食，但这些小动物因农药而数量骤减。

夺走了田间地头许多生命的农药对于人类的身体也绝非有益。虽

然，最近人类开始对农药进行严格管控，但曾经逝去的那些小生命已无法挽回。鹭鸟的家园如今也难以重建。

关于麻雀的古代故事中最为有名的当属《舌切雀》。虽然这个故事有各种版本，但最具代表性的应该是下面这个故事梗概：

很久很久以前，某地住着一对正直又温柔的老爷爷和老奶奶。他们俩救了一只受伤的小麻雀并开始喂养它。但小麻雀有一天舔食了隔壁恶婆婆家的糨糊，恶婆婆便将小麻雀的舌头割了下来。小麻雀逃到了山里。温柔的老爷爷和老奶奶来到山里寻找它，它给了他们俩一个装满宝物的藤条箱。回到家以后，恶婆婆看到宝物箱后也去到山里找小麻雀，并贪婪地索要了一个大的藤条箱。但箱子里不是宝物，而是蜜蜂和蛇，于是恶婆婆受到了惨痛的教训。

在《宇治拾遗物语》中，还有个故事，讲述一个老奶奶救了一只断腰的麻雀，麻雀送给老奶奶一粒葫芦种子，这颗种子结成的葫芦中不断长出大米，于是老奶奶过上了富裕的生活。麻雀报恩的故事几乎都以《舌切雀》的故事为原型，或论述大致同一类型的内容。

《御伽草子》中还记载有一则“麻雀出家”的故事。

大和国山里有一只叫作小藤的麻雀。娶妻生子后，孩子却被蛇吃掉了。为了安慰悲伤的小藤夫妇，其他的小鸟为它们咏诵了和歌以示疗慰。小藤夫妇为了悼念死去的孩子决定出家。小藤的妻子在尼崎庵出家，一心向佛终得往生。而小藤在出家后巡游诸国，参拜洛中、洛外诸寺，在北野社遇阵雨，于是便以此为契机在那里搭建草庵，每日修行佛道。

民间还有很多关于麻雀的迷信，比如拿走了麻雀巢家里就会着火呀，如果捕捉麻雀就会变成夜盲症之类。从中我们也能看到人们或许是出于对麻雀的保护才形成了这些说法。在古文献中，我们几乎找不到将麻雀视作不祥之物或是明确表示其为害鸟的内容，由此可见，自古时候起日本人便是喜爱麻雀的。

麻雀的谚语和鸟啼叫声的比喻

歌舞伎中有一种叫作“雀踊”的舞蹈。在五月的曾我祭上，头戴编笠、身穿印有麻雀图案的和服并撩起后襟的人们以俗人装扮，仿照谚语“雀百まで踊り忘れぬ”[30]，大跳“雀舞”。曾我祭是江户时期歌舞伎的一项祭奠活动，每年五月二十八日会在各个歌舞伎剧场演出，表

演的舞蹈华美绮丽。

平安时代，宫中的女官会饲养麻雀，以看自己养大的麻雀蹦蹦跳跳的样子为乐。《枕草子》中便举出了这种养麻雀的消遣方式。

此外，关于麻雀还有很多俚语或谚语，侧面证明了日本人与麻雀的亲密关系。

“欣喜雀躍”这个词用来形容人高兴得小蹦了起来。“雀の糠喜び”意思是看到糠就以为有米因而大喜的麻雀，最终发现只有糠，遂非常失望，经常用来形容本来很期待，却落得空欢喜。有时候也单说“糠喜び”。

“雀の千声鶴の一声”表示的是愚者千声，不如智者一言。“雀の踊った足跡のよう”用来形容字写得不好看，像麻雀跳跃后的足迹般歪歪扭扭。而“雀の涙”则用麻雀的眼泪来比喻只有一点点。此外，日语中还用麻雀来比喻话多的人，正如“京雀”一词。形容一个人经常出入某处，对某事很了解时，也会用“雀”来作比，如“楽屋雀”形容消息灵通的人。

此外，在日语中许多动植物的名字也经常冠以“雀”字。日语里所说的“雀瓜”是山野中很常见的一种瓜科植物。“雀の鉄砲”（看麦娘）是春季田园或田间小道中生长的乔本科一、二年生草。小时候我经常把“雀の鉄砲”的小穗尖摘下来叼在嘴里，哔哔地吹响它来玩。此外，还有诸如“雀の帷子”（苇状羊茅）、“雀茶挽”（雀麦）、“雀の稗”（雀稗）、“雀の豌豆”（小巢菜）、“雀の槍”（球柱草）等带“雀”字的植物。

日语中的“雀鯛”（光鳃鱼）是一种海里的小鱼，分为黄尾雀鲷、霓虹雀鲷、五线雀鲷以及斑鳍雀鲷等。

再如，“雀蜂”是日本产的体形最大的蜂类，攻击性和毒性都是蜂中最强。若被雀蜂刺到，很有可能致死。而“雀蛾”也是一种中大型的蛾，日本共有约七十种此类蛾。

由此可见，“雀”对于日本人来说，已经渗透进生活的点点滴滴。

在民间传说、俚语谚语甚至是比喻之中，还有一种影响力毫不逊色于麻雀的鸟——乌鸦。关于乌鸦，我将另寻机会为大家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一直以来，日本人也将麻雀看作一种食用鸟，人们往往将其羽毛

拔干净后整只烧制，然后从头啃食。直至现今，有的“烧鸟屋”（烤鸡肉店）还会提供烤麻雀这道菜，的确颇为美味。而焙焦麻雀作为一剂民间偏方，被认为对夜盲症及百日咳等病症有一定的疗效。

除了麻雀和乌鸦，从古至今，日本人在生活中密切接触着各种各样的鸟。人们熟悉它们的叫声，也能够区分出其中的许多种类。

最后，我们来看看日本颇具代表性的鸟之叫声吧。

关于黄莺和杜鹃，前文已介绍过，这里就不再赘述。绣眼鸟的叫声被人们听成“长兵卫忠兵卫长中兵卫”，三道眉草鹀的叫声被人们听成“源平杜鹃白杜鹃”，最近还有人解读成了“札幌拉面盐拉面”。冕柳莺的叫声仿佛在说“鹤千代君”或是“烧酒一杯吞”；而云雀的叫声在日本人听来仿佛高利贷一般，当它飞上天空时，嘴里喊着“日一分日一分”，当它在空中飞翔时，喊的是“月二朱月二朱”，而如果它要向下飞时，则变成了“要利息要利息”。猫头鹰的叫声被解读成“五郎助奉公”，黑头蜡嘴雀则啼叫着“菊二十四”或者“月日星”。紫寿带鸟的叫声也被人听成了“月日星”，不过后面还要带着一声“嚯嚯嚯”。灰胸竹鸡的叫声好似在说“来一下来一下”。还有许多类似于上述这些将鸟鸣赋予各种含义的有趣说法，这里请恕我不再一一列举。

第五章

风与云的日本史

一　四季的风

菅原道真的悲剧与各式各样的春风

日本是风之国。

日本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正好处于季风带的国家。所以日本四季都会吹不同的风，这些风不仅影响着日本的农业、渔业和航海等，还与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日本人十分关心风的变化，也对风有着别样的感情。

春季的风分为很多种。如果只指“春风”一词，它一般形容春日阳光下温暖和煦的风。“春風駘蕩”（しゅんぷたいとう）在日语中便是表示春天景色怡人的一个四字词语。

春风中最为人所熟悉的或许当属东风。呼啸凛冽的北风在人们不知不觉间缓下脚步，这时东风随之而来，在东风的吹拂下春天的气息也扑面而来。但东风往往伴随着雨水，尽管此时严寒也逐渐散去，然而海边等地大多十分潮湿。日语有一个说法叫作“東風時化”，意思是东风吹拂时节的暴风雨。“東風時化”往往令渔夫胆战心惊。

那么为何人们一说到东风，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是在说春风呢？这其实是源自下面这首收录在《拾遗和歌集》与《大镜》中、由菅原道真（菅公）创作的和歌。

東風吹かば匂ひおこせよ梅の花

あるじなしとて春を忘るな（花な忘れそ）

（东风吹，梅香满人间，纵然无主，勿忘春来到。）

这首和歌流传之广，甚至到了人们只要一听到东风就会联想到梅花香的程度。但不为人知的是，这首和歌背后却暗藏一场凄惨的悲剧。

昌泰四年（延喜元年，即公元901年）一月二十五日，菅原道真被免除官职，左迁至九州的大宰府。原本在一月七日时，菅原道真与

左大臣兼左大将的藤原时平一起官升从二位，任右大臣兼右大将。但遭藤原时平陷害，菅原道真突然陷入了地狱般的处境。在奉命左迁仅七日后的二月一日，菅原道真便被赶出了一直以来生活的都城，前往大宰府。他连好好收拾行李的时间都没有，便匆忙上路了。他甚至被禁止骑马或使用其他一切交通工具，只能步行至九州。这次调动名曰左迁，实质上是将菅原道真作为罪人流放了。

启程那日，菅原道真的家宅“红梅殿”弥漫着梅花的香气。上面那首和歌其实是其内心悲痛的呐喊。

被流放至九州后，菅原道真再也没能回到都城。生命的最后，他在大宰府破旧不堪的简陋房屋中饱受病痛折磨，最终在无尽的悲叹中苦闷而逝。死后，菅原道真幻化成怨灵，令诸国大旱，都城里瘟疫肆行，以此报复了藤原一族。为了镇住菅原道真的怨灵，人们建造了北野天满宫，该神社也是全日本天满宫的总社。

尽管有着如此悲惨的创作背景，然而极少有人会把这首和歌与菅原道真的悲剧和怨念联系在一起。随后，东风渐渐成为春风的代名词，人们会根据季节，以“梅东风”“樱东风”“云雀东风”来表示不同时节的春风。

此外，春风还有很多种类。

比如，日语中所说的“春一番”（はるいちばん）便是立春后吹来的第一次强劲南风。“春一番”一般出现在关东平原，它会将关东地区亚黏土层上干燥的红土卷起，尘土在强风的肆虐下逐渐汇集成黄沙，并毫不留情地大肆入侵家家户户。不过，一旦“春一番”吹过，紧接着梅花的花苞就鼓起来了，春意也渐渐浓郁。之后吹来的几股强劲南风则被人们称为“春二番”和“春三番”。

春天的强风在日语中也叫“春疾風”。“疾風”读作“はやて”（早手），指的是伴随着寒潮过境突然刮起来的暴风，有时候还会下起暴雨，也被人们称为“しつぷう”或“じんぷう”（阵风）。此外也会把这种风叫作“春荒”或者“春岚”等。

“涅槃西風”（ねはんにし）指的是阴历二月十五日前后吹来的西北季风，也被称为“彼岸西风”或“彼岸荒”。阴历二月十五日是释迦佛入灭之日，这一天寺院会举办涅槃会。而这时候往往也迎来了春分。

阴历二月二十二日，大阪的四天王寺会举办圣灵会。这个仪式上供奉的花其实是用被海浪卷到难波海岸上的贝壳做的。所以此时吹的

西风也被称为“贝寄风”。

貝寄する風の手じなや若の浦

（满岸铺贝壳，此景出自西风手，春意和歌浦。）

——松尾芭蕉

早春来临时漫步在海边，会看到冬天的季风带来的各式各样的贝壳，这些小小的贝壳将海边点缀得浪漫而梦幻。小时候我在海边找到奇特贝壳的那种欣喜若狂，至今仍记忆犹新。但现在，难波的海滨已经看不到这样的景象了。

自阴历二月二十四日起的四天时间，比叡山延历寺的众教徒会以诵读《法华经》八卷来开展法会，即“比良八讲法会”。这时寒气重新袭来，比良山地会刮起强风，这种风也被叫作“比良八讲荒”抑或是“比良八荒”。

春意浓郁起来后，便刮起了“真風”（まじ/まぜとも），这是一种只在濑户内一带到伊豆半岛附近才使用的说法，是一种较弱的偏南季风，也被称为“樱真风”等。而日语中的“油真风”则指的是晚春时节，像流油那般徐缓地吹过海面的南风。

熏风送香的初夏之风与带来灾害的山背风以及风祭

初夏，拂面而来的清爽南风被称作“风熏”“风香”又或是“熏风”。正如其名，这股风拂过新绿的树林，带来阵阵清新的芬芳，让人心情愉悦，真是一种颇为“风雅”的风。在春天和煦的阳光照耀下，微风徐徐，青草摇曳，野田里的小小花朵星星点点，这种景色便是美丽的“风光”了吧。如此想来，“风光”与“风熏”一样都是耐人寻味的语词。

《续拾遗集》中有下面这样一首和歌：

風かをる木のした道は過やらで

花にぞくらす志賀の山越

（风熏木下道边过，花中志贺山越路。）

——藤原良教

在嫩叶发芽的时节，比“熏风”稍烈一些的风叫作“青岚”；而麦秋时节，金灿灿的麦田上拂过的便是“麦岚”，也被称为麦子的秋风。

梅雨刚开始淅淅沥沥下起来的时候，遮住阳光的厚厚云层下吹过的风便是黑南风。到了梅雨最强之时，有时还会刮起强烈的南风，那便是“荒南风”。梅雨过后，盛夏的阳光下便吹来了“白南风”。

夏天的风并不只有南风。对于日本东北地区的农民来说，有一种风真是令人闻“风”丧胆，那便是日语中被叫作“山背”（やませ）的风。这是一种在夏天出现的寒冷东北风，有时也被称作“凶作风”或“饿死风”，因这种风一旦刮起来就连续好几天呼啸不停，所以也被人称为“七日山背”，足见其可怕之处。

对东北地区的农户而言，冻害是一种可怕的灾害。生长在南方的水生植物稻子需要在梅雨时节吸收充足的水分，在梅雨过后接受足够的光照，才会成熟。但一旦七日山背袭来，往往会导致稻田颗粒无收。

据江户时代的记载，造成粮食歉收的原因有旱灾、水灾，以及蝗灾等虫灾，但最主要的便是冻害。冻害来临时，当地百姓可以说束手无策，甚至会造成东北地区全境大范围的稻田被冻死。即便长出了稻穗也无法成熟。随之而来的便是饥荒，那惨状实在难以想象。许多人将草根、树皮都啃食得干干净净，但身体依然不断消瘦衰弱下去，直到活活饿死。这种惨象往往还会伴随着瘟疫病情的蔓延，老人、小孩还有体弱者首先扛不住饥饿与疾病，不断死去，甚至出现过全村人都死光的惨例。天明时期的大饥荒（1782年—1787年），仅日本东北的津轻地区就有二十万人饿死，日本全国总共有上百万人因饥饿而死去。

以北陆地区为中心的日本海一侧海岸，会刮起一种叫“出风”的风。这是一种从陆地吹向海面的东南风，非常适合出船，所以人们管它叫“出风”。但这种风有时候会伴随着焚风现象，越过脊梁山脉从山上吹下来的风在另一面引发降雨后，便会刮起干燥的风，这种风每下降一百米气温会攀升一度，到了地面就会形成高温。一连好几天的这种干燥风被称为“七日出风”，当它吹来时，夜里连露水都不会凝结。因为极度干燥，所以它往往会导致草木枯萎，农作物遭受虫害侵袭，有时甚至会诱发大火。

昭和三十年（1955年），因焚风引发的新潟市大火给1193户居民造成了极大损失。昭和四十一年（1966年），焚风引起的三泽市大火烧毁了817户人家，昭和五十一年（1976年），同样由焚风引发的

酒田市大火则烧毁了1023户。

同样是在夏天，日本海一侧吹起的风则是偏北风，相对比较柔和、凉爽。将北海道、东北地区、北陆地区的物资从日本海经由下关运往上方[31]的北前船便很好地利用了这种风。由春入夏，偏北风能从四月吹到八月，所以深受船夫喜爱。

日本有句老话叫作“老いては子に従え”（老而从子），根据其谐音，后来还出现了“追風は帆に従え”（顺风则随帆）这样一句俚语，真实地体现了船随帆、帆随风的样子。

夏天快要接近尾声时，台风开始迫不及待地昭示自己的存在感了。好不容易顺顺利利地度过了夏天，在即将迎来收获的秋天时，若是被台风、洪灾影响了收成，那对于农民来说真是一大打击。所以为了避免暴风的危害，人们会举办抒发祈愿的风祭活动。这种风祭活动大多在阴历八月一日前后举办，也就是台风来临前后。新潟县弥彦神社的“二百十日风祭”，以及在“二百十日”到来的七天前，兵库县伊和神社举办的“风镇祭”等，都是为免受风灾、水灾而进行的祈祷活动。除了这些大型的风祭活动，日本各地也会举办一些小型的朴素的风祭活动。

村民将举办风祭活动的那一日称为“等风日”，这一天大家都会休息，并且聚在一起吃吃喝喝，祈祷风能够平静地过去。此外，人们还会在神社等地挂上灯笼，这种灯笼被称为“风止笼”，目的是镇住风神。越中八尾的“风盆”是将送风神活动与供奉祖先的“盆踊”仪式结合在一起的一种祭奠活动，是日本著名的夏日祭典。位于奈良县的龙田大社祭风神活动曾经举办于阴历四月和阴历七月，共花四天时间，但现在已经改为在七月的第一个礼拜日举行“风镇祭”。这个祭典原本是在插秧和台风来临前向风神祈求风调雨顺的一项活动。此外，熊本县的阿苏神社也会在四月与七月举办风祭活动。

说个题外话，人们给风神或者风妖取的名字数不胜数，比如“风三郎”（新潟县）、“风又三郎”（东北地区），等等。宫泽贤治还以此为灵感，创作了童话《风之又三郎》。

思物的秋风以及折木断草的秋季寒风

秋天，是风的季节，是一年之中风的种类最多的时节。秋风也吹进了人们心中，引发了人们的种种思绪与情感。

尽管夏季的炎热还迟迟未退，但有时会突然感受到秋风裹身。

秋来ぬと目にはさやかに見えねども

風の音にぞ驚かれぬる

（秋意无从明视，风声一瞬惊我心。）

——藤原敏行，《古今和歌集》

おしなべて物を思はぬ人にさへ

心をつくる秋の初風

（凡物皆无感，亦因初秋风涌情。）

——西行法师，《新古今和歌集》

秋天吹来的第一场风在日语中叫作“初秋风”。正如上文西行法师的这首和歌所言，即便是对四季美景或者花鸟风月均迟钝无感之人，也会因初秋风而涌起思物之情。

初秋时节吹来的北风被称为“雁渡”（かりわたし）。大雁会在秋分时，乘着从东亚大陆吹来的季风来到日本。我很好奇候鸟到底是如何知道风的方向的呢？

秋风在日语里也叫“素风”，意思是没有颜色的风。原本风就是没有颜色的，但人们偏偏要强调秋风无色，其中别有深意。

吹き来れば身にもしみける秋風を

色なきものと思ひけるかな

（秋风吹来身便知，无色之物令君思。）

——纪友则，《古今六帖》

物思へば色なき風もなかりけり

身にしむ秋の心ならひに

（思物忽觉风拂过，秋风亦似有颜色，每逢金秋心随所动。）

——源雅实，《新古今和歌集》

在中国的五行思想中秋为白，无色。所以秋风也被呈现为无色之风。为了表现秋风吹在身上的寂寥感，无色反而更加贴切。

秋风拂过，吹得荻草沙沙作响，而这无色透明的秋风撩动了心弦，竟能让木讷之人像诗人般，内心涌出许多感触。虽说如此，但折木断草，吹落花朵的暴风、台风也是秋风，这种风也被称作“野分”（のわき）。野分吹过的第二天，天气一下子就晴朗、干爽起来了。但台风的“脚印”却将所到之处“踩”得乱七八糟，一片狼藉。关于这番景象，清少纳言的《枕草子》是这样描写的：

风暴掠过的翌日，景象颇为有趣。屏障、篱笆都东倒西歪了，门前栽种的花木看起来也可怜兮兮的。大树倒了好几棵，树枝都被吹断了，固然可惜。它们横七竖八地趴在胡枝子、女郎花上面，实在是遗憾至极。每一个格子里都被吹进了树叶，似乎这些并非粗暴的风所为。

《源氏物语》中也有一卷讲“野分”的，“野分，较历年更加猛烈，狂风大作，天色大变，满园秋花，缤纷满地……”紫式部对野分的这一段描写颇为有名。

说到暴风，还要提一提拯救了国难的神风。这个神风指的是镰仓时代的文永十一年（1274年）和弘安四年（1281年）蒙古两次入侵时，拯救了日本的暴风雨。我总觉得这种暴风是秋季的台风，但文永十一年那次蒙古入侵发生在阴历十一月，那时正是寒冬腊月。而弘安四年那次则是闰七月，差不多是二百十日前后。关于这种神风，我将在本章第二部分“神风与风土”中为大家详细介绍。

各种寒冷的风

从晚秋到初冬吹的风在日语中叫作“木枯”（こがらし），这种风是冬季风的头阵，也是将最后一片红叶从树上吹落，使树木变得光秃秃的风。

此外，这时的风还有“神渡”，也叫作“神立风”。这种风在神无月（阴历十月）吹拂，据说日本各地的神仙都会乘着这股风前往出云，所以只有出云一带管阴历十月叫“神在月”。

接下来，关东地区开始刮起干冷的风。这是从上州、秩父的山上

吹下来的北风，这股风会卷起尘土，仿佛是要告诉人们冬季即将来临，一般白天吹、夜晚停。上州地区流传着一个著名的说法，叫作“かかあ天下と空っ風”[32]。这种干冷的风自山上吹下，所以也写作“颪”（おろし），尤其是在太平洋一侧，冬季从山上刮下来的北风通常都被称作“颪”。此外，这种风还常与山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比如“那须颪”“筑波颪”“赤城颪”“六甲颪”等。

在东日本太平洋一侧扬起的北风叫“西风”（ならい）。从正北面吹来的风为“本西风”，此外还有从东北方、西方、西北方等各个方向吹来的各种“西风”。此外，还有“筑波西风”和“下总西风”等。

风的名字在日本的不同地区叫法也不太一样。比如，在日本的中国地区或畿内，渔夫、船夫会把初冬的东北风叫作“星之入东风”。星为昴，能够清楚看到昴宿的那些冬季，气候也较多变。较之常人，船夫对于风更为敏感。无风则难以开船，但有时大风也会吹翻船只，导致船毁人亡。

正式进入冬天后，风也凛冽起来。在日本，寒风也被称为冻风。当冬天的凛冽寒风吹过防砂用的竹篱笆或电线等物体时，会发出尖细且强弱分明的好似哭声的声音，这种现象在日语中叫作“虎落笛”。“虎落”实际上指的是用削尖的竹子头搭起来的栅栏。风吹过这种竹栅栏时发出的音色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虎落笛”。

寒風やいよいよ冴えて風の声

（寒风吹呀吹，愈发清寒更料峭，风声呼啸过。）

——永井荷风

此外，风还有许多名字或别称。也有诸多用风作比喻的例子或俚语、谚语。自古以来，日本人畏风、敬风、用风、避风，可以说在风中度过一年四季。而风左右历史的例子也不在少数。

二　神风与风土

保护日本不受蒙古军队侵略的超大型台风

元曾两次派军攻打日本，这两次侵略在日本被称为“元寇”或者“蒙古袭来”，在现在的历史用语中叫作“文永·弘安之役”。而“神风”也因两次从蒙古军的攻击中保护了日本而永留史册。

元世祖忽必烈在征服了朝鲜半岛的高丽后，自文永五年（1268年）始，多次派使者来到日本，要求日本向蒙古称臣。但镰仓幕府拒绝了。

公元1271年，元朝建立。1273年，忽必烈重创南宋，于是接下来忽必烈把目标转向了日本。文永十一年（1274年）正月，忽必烈命高丽制造九百艘船，高丽的造船工不得不夜以继日地赶工造船。那一年秋，元与高丽的联合大军成军。

忽必烈的这次进攻也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受到来自外国的军事攻击。文永十一年十月，高丽军攻入对马、壹岐，十月二十日登陆博多湾。这一天博多湾沿岸各地均展开了激烈的交战。日本军本是防卫一方，经过这一天的殊死搏斗总算是撑了下来，到了傍晚元军与高丽军撤船。但对于日本军来说，第二天才是关键一战。

第二天一早，原本将整个湾内挤得满满的他国大船几乎完全不见了踪影。原来前一天夜晚忽然刮起了大风，这场大风将两百多艘船尽数掀翻入海。而剩下的那些船大多也被吹得支离破碎，只得全部撤退。对此，当时的公卿日记《勘仲记》记载道：“凶贼之船数万艘浮于海上，然而瞬间逆风刮起吹回本国。少许船只甚至被刮到了陆上。”而朝鲜方面关于这次大风的记录可见《东国通鉴》，该书记载称“会夜大风雨，战舰触严崖，多败”。由此可见，二十日晚确实突然刮起了狂风。文永十一年的十月二十日相当于现在的十一月二十六日前后。因此，有说法认为击退元军和高丽军的并非台风，而是其他因素。确实，十一月下旬是不可能刮台风的。但伴随着低气压的通过，局部地区突然刮起暴风在如今也不足为奇。通过敌我双方的记录来看，意料之外的大风让众多军船受损确有其事。但从如今的技术角度来看，那些赶工打造的船只或许不过是平衡性极差的小船罢了。在连

防波堤都没有的湾内仅仅是放下船锚的话，大风大浪稍稍兴起，就会将船整个掀翻，这也是说得过去的。

总之，日本躲过了第一次的危机。但七年后，即弘安四年（1281年）的五月到六月，元军再次进攻日本。这次从高丽合浦出发的士兵有四万，船九百艘，再加上从宁波出船的士兵十万及船三千五百艘，比上一次攻打日本的军团要庞大得多。这一次日本依然拼命抵抗，尽管在壹岐惨败，志贺岛也被元军占领，但始终没让元军登上四大岛。

元军能够登陆的地方有限，而且无法利用小船分批运送士兵。所以只要日本能够彻底防守好几个重点，元军就无法轻易上陆。

最终，元军的大船军队从平户出发，一边在博多的海上游弋，一边寻找机会，并多次尝试登陆，但日本军每次都殊死抵抗将其击退。分别处于海洋与陆地的两方军队就这样僵持了整整两个月。然而面对海面上的众多敌军大船，日本方面仍旧束手无策。

接下来事情出现了转机。到了闰七月一日，元军溃败，船只再次全部沉入海里，而这一次同样是因为大风。那一年的闰七月一日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八月下旬，正是台风的季节。这个季节的确会刮起大型台风。《元史·日本列传》中记载道："十万之众，得生还者，仅三人耳。"

这种说法或许过于夸张，但也从侧面证明了这次元军进攻日本的惨败。而对于日本方面来说，是风拯救了国难。

顺便一提，据说这次台风的瞬间最大风速能达到55米至56米，中心气压达921.4毫巴，是从屋久岛经天草刮到博多湾东面海上的超大型台风。这一估算结果是昭和四十四年（1969年），九州大学副教授真锅大觉根据东京国立科学博物馆的屋久杉标本（树龄1600年，直径2米多）年轮中的"台风斑点"计算出来的。也就是说，不论风速具体是多少，至少从屋久杉的年轮来看，也能证明1281年有一场巨大的台风通过了屋久岛。

从"神风护国"到以神风特攻队自我毁灭

在文永、弘安两场战役之后，元并没有放弃攻打日本，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寻找机会蠢蠢欲动。在"弘安之役"的二十年后，也就是正安三年（1301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一艘异国船在甑岛（位于鹿儿岛县）靠岸，随后海上又出现了超过二百艘船。但此时又刮起了

大风，这支船团在不知不觉间不见了踪影。这是记载于《北条九代记》等古书中的一起事件。在这一时期能够向日本派遣大船团的只能是元或其支配下的高丽，别无他国。

正是因为出现了上述这些事情，日本渐渐地兴起了神国思想。这种思想的核心大致是“日本乃神州，受神保护而不灭”，一旦遇到危机便会在神威之下刮起“神风”，于危难之中拯救日本。

“神风”原本指的是伊势之神吹的强风。

神風や天の八重雲吹きかけよ

まがへる道にあとや見ゆると

（神风吹空，八重云起，宛若道上现痕迹。）

——后鸟羽院，《夫木和歌抄》

随后“神风”成了“伊势”“御裳川”以及“五十铃川”等的枕词。而最初将“弘安之役”中的大风称为“神风”的是《增镜》第十卷中记载的如下和歌：

勅として祈るしるしの神風に

寄せ来る浪はかつ砕けつつ

（逢难向天祈，神风似诏至。风吹起大浪，频助退敌军。）

——藤原为氏

弘安四年（1281年）闰七月，在第二次“蒙古袭来”时，为了抵抗敌国，藤原为氏作为宫内的使者被派去伊势神宫，在回京途中听说大风击退了敌国船团，便咏诵此和歌。

但此处对“神风”的颂扬，其实是出于感谢伊势之神的一种朴素的信仰之心。实际上，人们将“神风”看成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将其当作能在危难关头拯救国难的“御威稜”[33]，已是很久之后的事情了。

明治五年（1872年）国家制定的教科书中描述的是“那时，忽然刮起大风，将元军的船吹翻”，也就是说当时并未使用“神风”，而是用了“大风”一词。称其为“神风”则是在昭和九年（1934年），日本教科

书从文言文语体改为口语体时做出的一处调整。此后，“神风”便作为神国思想最后的王牌得到了强化。在昭和十八年（1943年）的教科书中，关于“文永·弘安之役”与“神风”是这样写的：“举国上下遭遇国难，虽胜但皆因御威稜，正是神的保护与全国上下的齐心合力，才创造了奇迹。亲眼看到了神威的国民更加将国家的尊贵铭记于心。击退了世界强国后国民的意志高涨，而将势力扩展至海外的想法也逐渐形成。”

但昭和的“神风”并没有出现。

昭和十九年（1944年）的十月，眼看就要战败的日本海军打算自己刮起这场“神风”，于是组建了“神风特别攻击队”。神风特攻队的飞机上只装了去程的燃料，队员们驾着飞机撞向敌军舰艇。所以神风特攻队其实是一支进行自杀式攻击的敢死队。

这种简单粗暴的攻击方式最终还发展出人肉炸弹“樱花”和人肉鱼雷“回天”。最初神风特工队采取志愿入伍的方式，但随后逐渐变成了强制入伍。

而这种毫无战术可言的攻击方法也绝不可能扭转战局。仿佛是日本强行人为做出了假“神风”而惹怒了真正的神灵一般，最终日本无条件投降，惨烈战败。

约四千四百人为神风特工队战死，其中能够命中敌人军舰的只占16.5%。也就是说约有三千七百个前途光明、未来可期的年轻人因为“神风”而白白牺牲了性命。

随后，“神风”成为鲁莽轻率、不计后果的代名词。随之产生了诸如“神风出租车”“神风驾驶”“神风登山”等词汇。“神风”这个词不再神圣，给人们的印象越发糟糕。

在此再讲一个太平洋战争前关于“神风”的轻松话题。

昭和十二年（1937年）四月，为了庆贺英国国王加冕，由朝日新闻社策划、飞往英国的日本产螺旋桨飞机起飞。那架飞机便叫“神风号”。

在日本时间四月六日的上午2点12分，从东京的立川飞机场起飞的“神风号”于四月十日0时30分降落在伦敦的克罗伊登机场。“神风号”用了94小时18分钟飞完了从东京到伦敦之间的15357公里。除去加油等中途降落、起飞的时间，飞行时间为51小时19分钟，平均时速

300公里，这个速度刷新了当时的世界纪录。

当时这架飞机的驾驶员是饭沼正明与冢越贤尔，这次飞行的成功也并非托“神风”的福，而是有赖于二人优秀的驾驶技术。

季风孕育的季风型风土与风景

那么，到底什么是“风”呢？其实，风不仅仅意味着空气的流动，也与人的气质和土地的景致密切相关。

有一个词叫作“风土”，这个词源自中国，原本指的是季节循环对应的土地的生命力。包括气候、地形、地力等在内，一片土地原有的状态就是其风土。是太阳的光、热，以及雨水创造了土地和土地上的生命。而寄宿在土地上的那些生命又要依靠风的搬运，因此叫作“风土”。

后汉《说文解字》中有“风动虫生”的说法。沉睡的季节在春天再次蠢蠢欲动。虫是小型生物的统称，也象征着生命。而将生命吹入虫中的便是大地上的风。所以原本“風”字里就有一个“虫”字。

《后汉书》中的风土指的是不同土地间的地域差异。即便人类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土地的生命力却各有不同。

公元一世纪末，中国出现了一本记录土地和人的地志《风土记》。而日本在八世纪以后开始模仿中国，编纂《风土记》。

和辻哲郎在其著作《风土》中，相较欧洲的“牧场型风土”、中近东的“沙漠型风土”以及美国的“开拓者型风土”，将日本的风土定位为“季风型风土”。

人们关于眼前呈现的大自然之存在状态的观念便是“风景”。“景”意为“光”，因此“风光”与“风景”是相同的概念。至于为何用“风”与“光”这样两个字，是因为正是依靠光，自然得以映入人们的眼帘，如果没有光，那么一片漆黑下也就看不见什么景观了，而风虽然看不见，但却是运送生命的“搬运工”。正是有了风，叶子才会在枝头沙沙作响，鸟儿才能在天空振翅翱翔，生命才充满了勃勃生机。没有风的大自然只不过是一个静止的画面罢了。

人们将有情趣、韵味的风景称为“风致”，日语中现在还保留着“风致林”或“风致地区”这类说法。

通过阴阳道来为坟墓或其他场所选址的法术被称为“风水”。这一思想传承自中国秦、汉，可谓是一种地相学，人们相信地气带来的影响，所以会仔细观察包括山、丘、水流等在内的地势，再结合阴阳五行说与方位学进行选址，最后才在合适的地点建造都城、宅邸或坟墓。

南宋的大儒学家朱熹也信风水说，据说他根据风水选定了自己的墓地。朱熹被后世尊称为朱子，乃朱子学的始祖。

但现代人多将风水看作一种迷信。由于各地大肆推进大规模的土地开发以及对自然的改造，所以对于现在的日本来说，“风水”并不是不用，而是已经不适用了。以尊重大自然原本的样貌为前提，按照地形等因素考虑如何建造房屋或选定墓地，才是风水的基本思想。

顺便一提，罗盘便是以看风水为目的而发明的。

关于风的种种

带来生命的风有时也会带来疾病。这就是人们将吹过寒风后发冷或发热的症状称为“风邪”（感冒）的原因。因风而得的病统称为“风病”，风邪便是其中之一。破伤风是风邪从伤口侵入人体造成的。而中风、痛风、风疹等疾病名称也带“风”字，是因为这些病原本也是风病的一种。

日本人常说“子供は風の子”（孩子是风之子）。这是因为如果孩子经常在寒风中跑动玩耍的话，反而不太容易得风邪。但这其实已是二十世纪末的说法了，现在人们已经适应了空调带来的冬暖夏凉的生活，稍微受点寒便会感冒。

过去，小孩子经常利用风来玩耍。如今我仍留恋正月时放风筝的美好回忆。

风筝源自中国，但如今世界各地的人都会放各式各样的风筝。风筝在日语中写作“凧”（たこ），这是一个日本汉字；在中国则叫作“纸鸢”或“风筝”，“筝”的原意为笛子等乐器发出的声音。英语中的风筝为“kite”，有“鸢”之意；西班牙语为“cometa”，乃彗星之意；而印度语的风筝原本也有蝴蝶之意，可见风筝的语源都来自天空中的飞行之物。而日本的“凧”是怎么来的呢？据说关西地区会把风筝说成是“烏賊”（いか），所以八条腿的章鱼应该就是语源了。这或许是因为空中的风筝形似有好几条长长的腿的章鱼被放上了天吧。

正月放风筝这种习俗始于江户时期。但实际上，放风筝的时间因地而异，比如长崎是四月，浜松是五月，冲绳则是十月。之所以各地时间不一样，也是由于风的关系。

风车也利用了风，如果没有风，孩子们就会跑起来，自己创造出“风”让风车转起来。纸气球与后来的橡胶气球都是在内部充入空气后形成的球形玩具，日语中的名称为“風船”（ふうせん）。据说，最初在日本贩卖橡胶气球的是横滨的一个中国人，那年是明治元年（1868年）。而日本做出橡胶气球的第一人则是旧开成学校的物理老师市川盛三郎，明治八年（1875年），他将氢气充入红色的橡胶小袋子里并放上了天。

古时候，人们经常利用风。靠风吹帆来作为船之动力的做法历史悠久。虽然风车在世界各地都很常见，但日本原本并没有风车。这是因为日本是水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所以自古使用的都是水车。风会出现刮或不刮以及方向不定等各种不确定因素，但水的流向却是固定的，而且水量也可人为调节。

风可以使火烧得更旺，对于窑业来说必不可缺。日本的“登り窯”（斜坡窑）便是在山体的斜面上，依仗着风能通过之处而造。

总之，日本是一个风之国，这里一年四季吹着不同的风，人们爱风，同时也恐风。风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所以与风有关的谚语或者比喻数不胜数。

三　四季的云和出云的神话

云蒸霞蔚的春季云彩与“鸟昙”和“鰊昙”

春日的天空总让人感觉低低的，似乎很朦胧，眼前常是白蒙蒙的，山林里也时不时雾霭迷蒙。天空中的云往往没有清晰的轮廓，看起来轻而淡。春日的阳光也没有那么强烈，温暖而含蓄，正可谓春光和煦。

和煦的春日，云雀一边鸣叫着一边飞向蓝天，人们循着叫声抬头望去，却发现云雀早已不见了身影，可见所谓“云”之雀确实是一种极善飞翔的鸟。据说，云雀在天空中的飞行时间一般也就六七分钟，高度最多百米左右。之所以人们很容易就看不见它，当然与其体形小巧有关，但或许也有春光朦胧这一原因吧。

春日的夜晚常会让人感到雾霭重重，日语称之为“胧月夜”。

那么，云、雾、霞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在日语中云、雾、霞都可以用“立つ”（生）这个动词来表示其出现，但能用“立ちのぼる”（升起）来形容的只有云和雾，霞不用这个动词表示。而能用“涌く”（涌出）来形容的是云，偶尔也会用来形容雾，但这个动词绝不会用于表示霞。用“たなびく”（叆叇）来形容的是霞，尽管有时也会用来形容云，但绝对不会用在雾上。

云指的是空气中的水蒸气变成细小的粒子或冰片后，集结在一起并飘浮于大气中的现象。云原本是白色的，但在太阳光的照射下会被染上浓淡有异的红色系色彩。而如果云层很厚，将太阳光完全遮住，看起来就变成灰色或黑色了。

雾是地面或水面附近聚集的细小水粒子，这一点与云没有太大区别。所以远在天边、只能抬头仰望的是云，而近在眼前、触手可及的是雾。

霞则用来形容远处的景色朦朦胧胧、氤氲不散的状态，这种现象多出现于春季。半山腰缭绕的薄云在日语中也可以叫作霞。

春なれや名もなき山の薄霞

（疑是春来到，眼前此山虽无名，但有薄霞罩。）

——松尾芭蕉

这是收录于《野曝纪行》中的松尾芭蕉的俳句。贞享二年（1685年）二月中旬，松尾芭蕉从伊贺出发，在前往奈良的山路中途作此俳句。按照现行日历来算，相当于现在的三月中旬前后，虽然整座山尚是一片枯色，但山脚下已有新芽破土而出，而这座山仿佛穿着一层轻薄的春霞衣。这是一首很容易让人联想出大和路[34]早春景象的佳句。

当年松尾芭蕉行至大和路的某座山上时，天上应该是薄薄地挂着一层春云吧。接下来，群山渐渐开始苏醒并露出了笑容。

故郷やどちらを見ても山笑ふ

（环顾故乡景，东西南北皆可见，山亦笑开颜。）

——正冈子规

虽说是春季，但也并非总是明媚的晴天。总会有厚薄不一的云将天空遮住，人们的身体似乎也总觉得疲乏。但是，春天终于不再似冬天那般寒冷，用温暖环抱着我们。这种春日的天气在日语中也叫作“花昙”，或者“养花天”。

这时，大雁、鸭子或斑鸫等冬天的候鸟在南风的护送下大多飞回了北方。所以春季的阴天有时也会被称为“鸟昙”或“鸟云”等。

生活在北海道的日本海一侧的人，会将三月到五月的阴天称为“鰊昙”。这是因为在流冰融化、吹起南风的阴天，会有鰊鱼群游到海岸边。由此，这种天空也叫作“鰊空”。但如今，即便春季的阴天刮起南风，也没有鰊鱼群游来了。曾经沿海地区的“鰊御殿”（渔民的房屋）鳞次栉比，鰊鱼业繁荣兴盛，而彼时距离如今的萧条只相隔半个世纪而已，听起来却仿佛很是遥远。这些宛如滚滚云霞般的比屋连甍又是何时“烟消云散”的呢？据说知晓往昔繁荣景象的老渔夫望着如今的春日阴天，心情也是“阴云不散”。

夏、秋、冬的云

说到夏天的云，相信大家立刻会在脑海中浮现出“入道云”（积乱云）的样子吧，这种现象是由盛夏强烈的阳光引起的猛烈上升气流造成的。

山顶或海上形成的小型积云眼看着膨胀起来，逐渐形成了巨大的积乱云，在数千米的高空延展开来。积乱云重叠在一起的样子被形容成云峰或峰云，日本人还将其拟人化，说这种云仿若“入道”一般。顺带一提，除了云以外，日本人还会将其他事物拟人化，比如利根川（日本第二长河流）在江户方言中便被叫作“坂东太郎”，在上方地区被称为“丹波太郎”，在九州又被叫作“比古太郎”，甚至在其他地方还有诸如“信浓太郎”“石见太郎”“安达太郎”等名字。

积乱云中积蓄着大量的电，云散后常在夕阳时分伴有雷落。因此，入道云也被称为“雷云”或“夕立云”。

村雲のたえまの空に虹たちて

時雨すぎぬるをちの山のは

（瞬时丛云滚滚生，夕阳时雨雷鸣过。山现云间露一端，遂见天虹悬上空。）

——藤原定家

“村云”便是丛云，即瞬时涌出的夕立云。这首和歌描写的是阵雨过后在丛云缝隙间的山一端挂起了一道彩虹的景象。但这首和歌原本收录在《玉叶和歌集》卷六的“冬”部，所以咏诵的对象并非夏季傍晚的阵雨。

夏日黄昏的阵雨往往伴随着轰雷。这时天瞬间就阴了许多，刚觉得风突然刮起来，立刻就看到天空中乌云密布，雷公用力地敲响他的雷鼓，变化速度之快真可谓风驰电掣。不一会儿就哗啦啦地下起了暴雨，雨滴使劲地砸向地面，这阵雨却并不会持续很久。没多久太阳就从云的缝隙间羞涩地露了出来，刚才的昏暗一扫而光，天空立刻晴朗起来，远山上还能看到一道七彩天虹。

云海并非是夏季特有的云，但从山上俯视时看到的一层像海般的云层，确实多见于夏天。最近经常能在飞机上看到云海。万米高空中的飞机均飞行在云海之上。但比起飞机上的所见，靠自己的双脚攀登后在山顶俯视到的云海才是最美的，那种美无与伦比，令人陶醉。

日本有一首歌叫《富士之山》，里面有一句歌词是“（山的）头

顶探出云端，俯瞰四方高山”。这首歌描写的便是在云海之上露出一个山头的遥远的富士山。我在日本北阿尔卑斯山[21]上眺望过好几次类似的美景。最近一次是在1999年秋天，我登上了木曾驹岳。我从驹根高原出发，先乘坐大巴，然后再坐缆车摇摇晃晃地穿过了云层，最后到达了海拔2600米的千畳敷。脚下厚厚的云海将伊那谷完全遮盖住了，只有仙丈岳和北岳等南阿尔卑斯的高山露出了山头。而富士山也在这白浪一般的云海里飘浮着。

我最后一次从富士山顶看云海是1991年8月的事情了。早晨在山顶看到了美丽的日出，还看到了“影富士”。影富士指的是映照在早晨或傍晚的云海上的富士山的影子。而如果想在浮于云上的富士山顶俯瞰四周的群山，实际上不可能做到，因为四周的群山高度都比较低，山顶都在云海之下。

日语里与日出相关的词有“御来光”（ごらいこう），它也可以指佛祖乘云与阳光共现。天空中时而会出现一种奇观，日出时在西侧、夕阳西下时则在东侧：云或雾会成为一块幕布，背对着阳光的身影会被映照成一个巨人，显现在这块云雾幕布上。这个巨人像的头顶往往还有彩虹光环。欧洲人把这种现象叫作“布罗肯幽灵”（Brocken Spectre），而日本人却将这种现象比成了佛祖显灵。这一现象其实并不罕见，自昭和三十三年（1958年）夏天还是高中生的我在岩手山山顶看过一次后，又在北阿尔卑斯以及南阿尔卑斯山看到过好几次。

接下来，夏去秋来，人们开始感到天高气爽，秋色宜人。

秋天的云之代表便是“鰯云”“鲭云”和“鳞云”了，这些都是高高挂在秋日碧空上的卷积云。人们往往先看到一片片的云朵散落在天空，没一会儿再抬头望天，就发现这些云已经连成一片了，那番景象真的好似鱼群一般。如果落日再稍微给云朵染上一丝红色，我就感觉很像鲷鱼的鱼群。

将卷云或卷积云写作“绢积云”据说是自昭和四十年（1965年）开始的。“卷云”这一名称是明治初期根据国际惯用的气象用语“cirrus”翻译而来，“cirrus”这个词在拉丁语里表示“卷”。这种云的特点是纤维状的白云边沿会有一些卷起。但是到了昭和三十年代（1956年—1965年）中期，文部省认为将“卷”字读作“けん”很奇怪，于是气象厅便把汉字改成了“绢”，之后便写作“绢云”了。其实关于改名字这件事，气象厅内部有一个人坚持抗议到了最后，那便是当时的测器课课长，同时也是直木赏作家——新田次郎。

卷云或卷积云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大雨，所以人们也把这种云叫

作“雨知らす”（告知雨）。

冬天的云被称作“寒云”或“冻云”，“蝶蝶云”也在冬天出现。像破碎的棉布一样出现在天空中的白云会随风消失又出现，这就是白色蝶蝶云了。如果出现白色的蝶蝶云，那日往往是晴天，而如果天空中挂着的是偏灰黑的蝶蝶云，便意味着要下雨了。

富士山上挂着的斗笠云同样大多发生在冬季，它是变天的前兆。海边的渔夫一旦看到富士山上的斗笠云，就会急忙收船回岸。不仅仅是富士山，如果在周围无高山的一座独立山峰上看到了斗笠云出现，那么有很大概率天气会变差。

八云耸立的出云国神话以及云龙、云水

虽然“丛云”原意指的是一簇云，但在《源氏物语·野分》这一章中却有“風騒ぎ叢雲迷ふ夕にも”，形容突然聚集在一起的云块。这种云会呼风唤雨，仿佛“風雲急を告げる”[35]一般。三种神器之一的“草薙剑”原本的名字便叫作“天丛云剑”，极具象征性。

据“记纪”的记载，素戋呜尊被逐出高天原后，来到簸川上游并帮助稻田姬击退了八岐大蛇。随后从八岐大蛇的尾巴上冒出了一把精美绝伦的太刀。素戋呜尊将这把太刀献给了天上的天照大神。这便是之后从草原的大火中救出了日本武尊的神剑——草薙剑。

据《日本书纪》的记载，这把剑也被称作“天丛云剑”，意思是这把剑可以呼风唤云。

勇士击退八岐大蛇的故事与希腊神话安德罗墨达（Andromeda）的故事属于同一类型。这则希腊神话讲述的是勇士珀耳修斯拯救了埃塞俄比亚国王之女安德罗墨达的故事。珀耳修斯击退的怪物是一只长有八个头的巨大海龙。故事的最后珀耳修斯迎娶安德罗墨达为妻。

而在日本的古代传说中，素戋呜尊也与稻田姬结为了夫妇。他们将新居建造在出云的须贺，素戋呜尊由此作了一首和歌：

八雲立つ出雲八重垣妻ごみに

八重垣作るその八重垣を

（祥云四起，筑起八重墙，吾妻居于内。筑八重墙垣，叹八重墙垣之壮观。）

这首和歌直译成白话文便是：厚厚的云层涌起，层层叠叠围成了八重厚的垣墙，将刚迎娶的美娇妻围在了里面，这是多么雄伟壮观的八重墙垣啊。所以出云国的国名其实就是云涌出之意。

在中国的传说中，龙会伴着黑云或龙卷云出现并呼风唤雨。由此可见，云与龙可谓密不可分，因此也会将男女间关系亲密比喻为“雲となり竜となる”（为云为龙）。但相扑比赛中横纲在进行“土俵入り”（相扑运动员的入场仪式）时也会摆出“云龙型”，这就与男女关系无关了，这个姿势象征着伴随着云出现的龙，取其本意，表现了横纲的勇猛之姿。

故事的最后，素戋呜尊与稻田姬一手打造了出云国；而珀耳修斯和安德罗墨达则和击退的龙一起穿越云层，成了遥远星空中的星座。

“云从龙，风从虎”这句话出自《易经》，字面意思是云会伴随龙而出，风会随从虎而行，比喻了同类事物气息相合，若君王英明，则手下自会出能臣。

然而伴云之龙与呼风之虎实为对手，双方在雾中交战。

永禄四年（1561年）九月，“越后之龙”上杉谦信与“甲斐之虎”武田信玄在信州川中岛发生激战。早晨，上杉军在浓雾中自妻女山而下，渡过雨宫渡口，突袭了武田信玄的大本营。而此时武田军派了突击队袭击妻女山，因此大本营中处于无兵状态。在战役的开始，乘雾气而来的“龙”也就是上杉军占压倒性优势，但随后“虎”的觉醒唤来了风，雾气散去，武田军一举反攻，最终战事陷入胶着状态，僵持不下。虽然突然从“记纪”的神话世界跳到了战国时代，但这次龙虎之争确实是与云关系紧密的一则史实。

此外，在日本的传统绘画中，云往往超越了距离与时间的概念。在绘卷物、屏风画以及美术工艺品的图案上都能看到不同样貌的云，能将任何时空完美消化并融入其中。相信看过这些图案后，大家会很容易产生共鸣。

“行云流水”比喻的是宛如云的运行、水的流动一般自然流畅、无所拘束的禅之境地。而“云水僧”有时也称为“云水”。

云水僧如云在天、如水在瓶般自由且自然地活着，无固定的居所，他们拜访天下名僧、探求知识、行遍山川，以此修行求道。他们一般头戴蓑笠，身穿黑衣，小腿扎着绑腿带，脚踩草鞋；脖子上挂着一个头陀袋，里面装的是修行旅途中必备的最低限度的物品，比如袈

裟、剃刀以及食器等，有时他们也会在肩上多背一个袋子。自从中国兴起禅宗后，这便是重要的修行方法。但如今最初意义上的云水僧已经几乎看不到了。现在人们往往把在禅寺中修行的年轻僧人称为云水僧，只能偶见“托钵行脚”的僧人。“托钵”即以手承钵，指僧人为了修行生活而化缘乞食或乞财。

云与水、云与雨密不可分。无云则不会降雨，自不会生水。而无水亦无云。所以在干燥的沙漠几乎看不见云。

日本是世界上为数不多水资源丰富的国家，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程度的降雨与降雪。云的种类之多，可谓无奇不有，而变化多端的各类云朵也赋予了四季天空独特的魅力。

但最近，行云流水的大自然却变得有些异常，山间流入大海的潺潺之水断流了，到处都建起了大坝或大堰。比如，大井川因为上游建了好几座大坝，中下游流域几乎只剩石子裸露的干枯河道，宛如一条巨大的河流尸体。而这最终致使雾与云也消失不见了。

静冈县的川根町附近地区，整年都笼罩在雾气之下，所以这里能产出好喝的川根茶。如果阳光强烈，茶叶就会变脆、变硬，也就不好喝了。但如今因为雾气渐少，需要人为地给茶叶遮阳，在茶叶种植上也要多出搭盖遮阳网的费用。

大城市就更惨了，河流与道路都被水泥覆盖，大地的肌肤几乎看不到了。也就是说云和土的接触被阻断了。人们将差别悬殊比作“云泥之差”，云和土的连接依靠的正是从大地的肌肤上生成的水蒸气。

在现代大都市的高楼大厦上，人们也会看到雾蒙蒙的景象，但这绝非自然中的雾或霞，而是雾霾。即便如此，偶尔也能在林立的高楼之间看到绚烂美丽的火烧云，如此，这番景象就更显得弥足珍贵了。

第六章

太阳和月亮、星星的日本史

一　太阳神话和名月观赏

“记纪”神话中的太阳神天照大神

“女性原本是太阳”——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平冢雷鸟在杂志《青鞜》创刊号的卷头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身为高天原的统治者，同时也是皇祖神的天照大神，既是太阳神，也是一名女性。

世界上无论哪个民族都流传着太阳神话并拥有太阳信仰。如果没有了太阳的光和热，那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将不复存在。自太古时代人们便知道是太阳孕育了草木鸟虫、飞禽走兽以及人类的生命。

在日本，太阳神只有“记纪”记载的神话里的天照大神。

据《日本书纪》记载，伊奘诺尊（伊邪那岐）和伊奘冉尊（伊邪那美）二神在生育了大八洲国（日本列岛）并创造了万物后，生下了天下之主，即天上世界（高天原）的统治者、日神——天照大神。

此外，据《古事记》记载，从黄泉国逃回来的伊邪那岐打算将身上的污秽洗净，在洗左眼时生下了天照大神，在洗右眼时生下了月读，在洗鼻子时生下了须佐之男命（素戋呜尊）。

太阳神与月神往往被视为一对，还时常用表里或阴阳等说法来表示，这一点在全世界的神话中是共通的。在“记纪”神话中，日神与月神分别从伊邪那岐的左、右眼诞生。而在《日本书纪》的别传中，甚至有下面这则太阳神和月神因感情不和而互不相见，所以昼夜交替出现的记载：

月读与天照大神同为天上的统治者。某天他们降临到苇原中国去视察保食神。但月读对于保食神将各种食物从嘴里拿出来供给他们一事大为震怒，于是打死了保食神。对此，天照大神十分愤怒，并决定不再与月读见面，于是夜与昼便分开而居了。

天岩户神话作为“记纪”神话中的一个高潮，广为人知。

来到高天原后，素戋呜尊四处惹是生非。天照大神对此气愤不已，遂把自己关进了岩屋里，而整个世界也变得终日无光，甚至无法区别白天和黑夜。高天原的众神于是在天岩户外载歌载舞，希望能将天照大神吸引出来。众神为了让太阳复活，可谓绞尽了脑汁。比如，他们从天香山上挖来榊枝，并在枝头挂上了八坂琼勾玉和八咫镜，又让长鸣鸟啼叫，燃烧篝火让天钿女命跳舞，等等。天钿女命甚至还袒胸露阴地跳了舞，惹得众神大笑。天照大神被外面的动静吸引，将岩屋的门稍微开了一条缝想看个究竟。一直等待着这一刻的手力男神趁机拉开了整个门，把天照大神从里面拽了出来，于是世界又重新寻回了光明。而素戋呜尊则被拔去了手足的指甲，从高天原放逐了出去。

甚至在东南亚和北美等地都有类似的将藏起来的太阳召唤出来的神话。在东南亚的神话故事中，日神、月神被作乱的弟弟吃掉后引发了日食和月食现象。这与描述天照大神和月读的弟弟素戋呜尊因惹是生非而让世界陷入黑暗的“记纪”神话十分相似。

这么说来，天岩户神话或许是一则讲述日食现象的故事。但我认为并非如此。在我看来更有说服力的说法是，这个故事反映了冬至太阳力量衰弱下去时，人们为祈祷太阳复活而创造了日神祭祀的习俗。

三种神器中的两种均在这个神话故事里出现，有观点认为其中的镜子乃太阳，而勾玉为月亮的象征。故事里提到的“长鸣鸟”也就是鸡，暗示了公鸡报晓的行为。

神武东征神话与天日矛传说

上述天岩户神话中，天钿女命露出阴部跳舞其实也有特殊含义。

在古印度神话中，曙光女神乌莎斯朝向东方的天空展露了自己的裸体，为太阳的出现打开了通路。此外，乌莎斯还负责照顾太阳的孩子。

天钿女命在天岩户前露出阴部，吸引太阳神天照大神出现，而在天照大神的孙子琼琼杵尊自天而降时，天钿女命亦在猿田毗古（猿田彦）神前重复了这件事情，为太阳的子孙降临苇原中国开辟了道路。作为太阳的子孙，琼琼杵尊这时还只是个小婴儿。也就是说，天钿女命露出阴部其实是引导太阳的一种行为。原本太阳神多为男性神，如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所以进入露出身体的女神体内也算合情合理，而女神最后怀上婴儿正寓意着生殖与生产。在日本，尽管天照大神是女性神，但天钿女命的行为可视为乌莎斯神话的一种沿袭。

接下来琼琼杵尊的曾孙——神日本磐余彦，即神武天皇东征，建立了最早的大和王权。神武天皇也是古代日本最初的统治者。那时，打算攻入大和的神武军与长髓彦军展开了激烈的交战，神武天皇的兄长五濑命也在交战中丧命，而攻势一直未果。此时，他领悟到“太阳神的子孙向着太阳作战绝非好事”。然后率军迂回到纪伊和熊野，从南方进攻大和，终于将大和占领。

此时，带领神武军的是一只长有三只脚的八咫乌。据中国古代传说记载，太阳里便住着一只三足乌鸦。

据说太阳神天照大神最初被供奉在宫中，崇神天皇时被移至笠缝村，接下来的垂仁天皇时期，倭姬命侍奉太阳神巡幸伊势，并在五十铃川上建了斋宫用以祭祀。

在大和盆地上，太阳于春分和秋分时从三轮山（笠缝）升起，落于二上山。众所周知，三轮山与二上山自古便与日神祭祀相关。此外，供奉着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中的御神体是一面八咫镜，所以毋庸赘言，镜子是太阳的象征。

“记纪”中有关应神天皇的部分记载了新罗王子天之日矛（天日枪）渡来日本的故事。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一位女性在阿具湖边午睡时，太阳光像彩虹一样照在了她的阴部，然后她便生下了一块红色的玉石。后来一名男子看到这块玉石，要了过来，且总将其戴在腰间。有一天，他将食物搭在牛背上向山谷里走去，半路上遇到了天日矛。天日矛本要惩罚他，他只好将身上带的红玉献给了天日矛，才讨到了生路。最后这块红玉石变成了一个美女，天日矛娶她为自己的妻子。

但随后，天日矛变得性格暴躁，责骂了妻子。他的妻子感到很委屈，便逃回了先祖的故乡——日本，并成为难波的比卖许曾神社的阿加流比卖神。天日矛追随着妻子来到了日本，辗转各地后留在了但马国的出石。他与妻子和好后生下了众多子孙，还随身带来了一件“八种神宝”（出云神社的神宝）。

这则故事与“日光感精”的传说类似，太阳让女性受孕的故事在世界各地都很常见，日本也流传着许多相似的故事。比如，让我们将时间拨转到丰臣秀吉那个时代，其母阿仲便因日轮受孕，生下了日吉丸，故事的内容刚好与前文相仿。

月满月缺与赏月

月亮是距离地球最近的天体，与太阳一道，自古以来便为人们所信奉、崇敬并深深地喜爱。不仅仅是神话传说，在诗歌和美术工艺的题材中，月亮的出现远比太阳频繁。究其原因，或许是月有阴晴圆缺，人们可以通过月亮测算月龄或日期；此外，月亮也与潮起、潮落关系密切，而这些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联系使得月亮特别被人们看重。太阴历便是依照月亮的圆缺，将一个月分成二十九天至三十天，并以十二个月为一年的历法，与太阳历相比，一年要短十天左右。因此，差不多每三年会多出一个闰月（同一个月过两次）来调整月历与季节的误差。在思考或研究日本的历史及文化时，太阴历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自明治五年（1872年）十二月三日（这一天被定为明治六年一月一日），日本彻底改用太阳历之前，日本人使用的正是太阴历。

从一个新月（农历的每月初一）到下一个新月为一整个月，自新月后的第三天开始，傍晚时分能在西面天空中看到月亮，所以那一天的月亮也被称为“三日月”（蛾眉月）。每月第一天是从三日月往回推两天，所以也叫“朔日”。自三日月开始，经过包括上弦的“弓张月”（上弦月）在内的十三个夜晚，便到了“十五夜”（阴历每月十五日晚），在日本也叫“望月”，也是自这一天起，月亮又渐渐开始缺下去。在日语中十六日的月亮叫作“十六夜”，十七日的月亮叫作“立待月”，十八日的叫“居待月”，十九日的叫“寝待月”（或卧待月），二十日的叫“更待月”，二十一日以后，天亮后还可见于天空的月亮则叫作“有明月”。此外，在十九夜和二十三夜，人们为了看月出，还会在夜晚聚集起来举办“月待”的活动。于二十三夜时举办的“三夜讲”活动在江户时代时甚是流行，日本各地都还保留有“二十三夜塔”。

新月与满月时往往是大潮之日，潮水的涨落幅度最大。《万叶集》中有一首额田王的和歌，便是咏诵此景：

熟田津に船乗りせむと月待てば

潮もかなひぬ今は漕ぎいでな

（熟田津乘船待月，未涨潮则船不行。）

通过这首和歌，我们也能对古代人的航行方式有一定的了解，那时的人们平时将船停在浅滩之上，待满潮时再划船驶向大海。

近代以前的历史书和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日期因为与月亮的圆缺一致，所以很容易理解。比如，“三日”时傍晚便会出现“三日月”，十五日则是满月之夜。又如，赤穗浪士杀进吉良家的那日为元禄十五年十

二月十四日（1703年1月30日），是望月的前一天，月相接近满月，因此便于夜间行动。顺便一提，江户地区的那一晚其实是晴天。歌舞伎等表演进行至这一场景时会飘起雪花，这纯粹是为了达到舞台效果，并非史实。

在夜晚的照明手段极其匮乏的古代，月光便是夜间行动时最主要的光源。若是阴天或雨天等看不见月亮的夜晚，周围可谓一片漆黑，能够出来活动的估计只有魑魅魍魉了，人类只能睡觉。松尾芭蕉的“名月や池をめぐりて夜もすがら”（月明堪久赏，终夜绕清池）也正因是在月夜才能有此行动。如果是黑漆漆的无月之夜，那估计也只能回家蒙头大睡了。

此外，《百人一首》中还收录了紫式部的一首和歌。

めぐりあひて見しやそれともわかぬまに

雲隠れにし夜半の月かげ（月かな）

（久别偶逢喜在心，端详未尽又分离。一如夜半高空月，甫见急速如密云。）

这首歌原本收录在《新古今和歌集》中，据说本来描写了许久未见的儿时好友来拜访自己，却未能好好叙旧对方便回去了的情景。但整首读下来，给人的感觉似是讲述爱恋的和歌，描写的应是与许久未见的恋人的短暂重逢令女子感到十分不舍与遗憾。过去，男性趁着夜色潜入女方家中的“妻问婚”（访妻婚）时代，月光便是照亮爱恋之路的重要路标。

那么，日本人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赏月的呢？在《源氏物语·须磨》中有一段描述：八月十五日，皎月挂于夜空之时，源氏想起了宫中笙歌乐舞的盛宴，于是吟诵道：“两千里外故人心。”这是一段源氏思念所爱之人的场景。

源氏吟诵的这一句其实出自《和汉朗诵集》中收录的白居易诗作《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直，对月忆元九》中，“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一句。“三五”便是十五，所以该诗描绘的正是十五夜发生的事情。看着刚刚升起的月光，诗人思念着远在两千里外的友人。从《源氏物语》的这些细节中我们也能看出，紫式部确实是一位精通古典汉籍的文人，并且也知晓早在平安时期，日本人就已开始在八月十五日晚赏月并演奏丝竹管弦、摆设酒宴了。

八月也就是“叶月”，别称“月见月”，在中国，阴历八月十五日被称作“中秋”。可以说日本的中秋赏月之风是受到了中国唐代，特别是白居易诗歌的影响。

按照现在的阳历历法来算，中秋差不多在九月中旬。

辉夜姬与望月的忧愁心

平安时代的《竹取物语》因描写了月亮上的另一个世界的故事而广为人知。

一位伐竹翁在竹子中发现了一个小女孩，并为她起名为“辉夜姬”。伐竹翁对辉夜姬疼爱有加，将其抚养长大。后来，辉夜姬长成了一名亭亭玉立的少女。她总是望着月亮陷入沉思。听闻辉夜姬长得美丽动人，五个贵公子前来提亲，但都被辉夜姬拒绝了。因为她是月亮世界的人，一旦长大成人，必须回到月亮上去，这是她的宿命。最终在一个满月的夜晚，辉夜姬升天，回到了月亮上。

日本人认为月亮上有都城和宫殿，里面住着高贵之人，这种思想其实源自中国，与《竹取物语》同一类型的故事广泛分布在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各国。关于《竹取物语》在日本的起源，有诸多研究和考证，但对这些学术上的研究，我们在此不做过多评论。这则让人们对月亮上的另一个世界浮想联翩的童话故事，历经千年的历史，依旧能在孩子们心中培养出对月亮的幻想。但如今人类已经成功登月，将原本在地球上看不到的月亮的另一面展露了出来。月球只是一个没有空气和水，也拒绝生命存在的荒凉而死寂的世界……

虽然科学的发达和文明的进步肯定为人类带来了繁荣与某种意义上的幸福，但我也希望大家能正视一个问题，伴随着科学与文明的发展，我们本应珍重的内心遗产却渐渐地被丢弃和遗忘。

我们再将话题转回月亮本身。月亮上的暗斑自古以来就激发着人们的想象力。在日本，人们将这些暗斑看成是兔子拿着杵在捣年糕。据说，认为月亮上有兔子的这种观念以中国为首，在印度、蒙古、中美洲等地区也存在。日本应该是受到了中国的影响吧。

确实，望着月亮上的暗斑，有时真感觉有点像一只兔子在捣年糕。但独自一人望月时，虽然自己并非辉夜姬，却总会涌起悲伤或忧愁，这种情感绝非欢快喜悦之情。

月見ればちぢに物こそ悲しけれ

我が身ひとつの秋にはあらねど

（仰望明月照四方，心头处处尽忧伤。非缘己因秋来冷，只因秋来天下凉。）

以上是收录于《古今和歌集》和《百人一首》中，出自大江千里的一首和歌。其大意是望着秋天的月亮，心中思绪万千，总是莫名感到忧伤，原因并不在自身，因为秋天并不仅仅造访自己一人。

还有一首同样收录在《古今和歌集》和《百人一首》中的阿倍仲麻吕的和歌。

天の原ふりさけ見れば春日なる

三笠の山に出でし月かも

（辽阔长天玉镜升，仰首遥望动乡情。犹是当年春日月，曾在三笠上顶明。）

阿倍仲麻吕当年作为留学生入唐，在中国加官晋爵、声名远扬，最终却没能回到故土，在异乡逝世。这首绝美的和歌咏诵了诗人仰望夜空，看到月亮散发美丽的光辉，想着眼前看到的这轮明月是否与那年春天在三笠山看到的是同一个。该歌表达了其浓浓的思乡之情。

清少纳言的《枕草子》中也有描写月亮的文字，当时她看到了早晨还挂在东山山顶，但正在渐渐消失的一轮细细的有明月，觉得颇有意境，便将所见之景写了下来。

如此说来，即便人类乘坐宇宙飞船到达了月球表面，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月色与千百年前之所见也并无差异。这么一想，是不是立刻就想找一个山间隐蔽的温泉，一边泡温泉一边欣赏秋夜的美丽月色了呢？

二　七夕传说与北斗星

夜空中闪耀的星座与星星的传说

自太古时代起，我们的祖先就抬头仰望着装点夜空的无数星星。“无数”这个词名副其实。人们在形容数量极多、无法计算时，也往往用星星来比喻，比如“星の数ほど”（如星星的数量那般）、“綺羅星のごとく”（如璀璨的繁星）等说法。

海边的沙子看起来也是不计其数，但其实仍有一定的量，而星星却是真正意义上的“无数”。自伽利略发明望远镜以来，星星的数量就一直在增加。不论人们发明了多么先进的大型望远镜，在遥远的星空那头总会出现更广阔的星空，永远也望不到头。

说到海边的沙子，在奄美大岛和冲绳等地海边，有一种星星形状的沙子，被人们称为“星砂”。实际上它们并非真正的沙，而是附着在珊瑚上面的根足虫类原生动物的壳。在这些“星砂”直径1.5毫米的本体上，还有六根呈放射状分布的刺，使它们的整体形状宛如一颗颗极其微小的星星。

虽然星星是数不清的，但古代人早就注意到它们在夜空中是按一定的法则运行。人们将星辰的位置和运行法则与季节的变化结合，由此确定了方位角。人们还认为星星能够影响森罗万象，左右人的命运，于是衍生出了天文与历法。

此外，人们将星辰的排列与身边的动物或道具等联系在一起，将其图形化，研究出了星座，并为星座谱写了故事，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希腊神话中星星的传说。

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星座原型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就已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由游牧民族迦勒底人创造出来了。在公元前七世纪的亚述，已经有了关于黄道十二星座、北天十二星座、南天十二星座共计三十六个星座的记录。

将这些古代巴比伦帝国的天文知识传入希腊的是腓尼基人。在古希腊大诗人荷马的作品中也出现了大熊星座、猎户座和牧夫座。到了二世纪，人们根据希腊天文学家克罗狄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的著作《天文学大成》确定了三十八个星座。到了今天，人们已经把天空分成了八十八个星座。

如今，作为希腊神话而为人所熟知的星之神话大多是根据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叙事诗《变形记》而来。

但传入日本的星座却与欧洲的完全不是一个体系，而是中国的星座。中国的这套星座体系始于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的春秋时代，成立于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的战国时代，但当时多用以表示王朝制度或官职名，并未普及到百姓阶层。据司马迁《史记·天官书》的记载，那时朝中将星座与官阶对应，北极星为中宫，并将二十八宿以东、西、南、北四方为基准，各分七宿。承袭了《天官书》的《汉书·天文志》中记录有一百一十八个星官与七百八十三颗星。

日本将皇宫里的公卿和“殿上人”[36]称为“星位”或“云上人”，也是受了中国天文星座的影响。

传承自中国的星座在日本一直被使用至近代末期，到了明治以后，却被迅速遗忘。时至今日，日本广泛使用的都是近代以后从西洋传来的星座理论。

七夕的牵牛星与织女星

银河，是宇宙边际的一个涡状星系。在晴朗的夜晚，夜空中会挂着一条浅浅的乳白色带状星群。自古以来，世界各地诸多民族都将银河看作天上的河川。古埃及将银河称为“天上的尼罗河”，古巴比伦则将银河称为“天上的幼发拉底河”。银河在中国又被称为“天河”“天汉”或“银汉”，日本继承了中国的说法，将银河叫作“天之川”。

希腊神话中，当赫拉克勒斯还是婴儿时，由于吸吮母亲赫拉的乳头时过分用力，奶汁溅洒在天空，形成了银河。而这也是英语中“The Milky Way”的由来。在希腊神话中，众神聚集的奥林波斯宫殿也称为“银色之道”。

此外，还有不少民族认为银河是死者的灵魂升入天堂时的通路。瑞典人将银河称为“冬之道”，美国原住民则称其为“灵魂之路”。芬兰人称其为“鸟之道”，他们认为鸟会将死者的灵魂带入天堂。

直到1609年人们才知道，原来银河是由无数星星组成的。伽利略用自己发明的望远镜发现了这一事实。

那么，我们接着回到流传在日本的与银河有关的故事上来。

天の川楫の音聞こゆ彦星と

織女と今夕あふらしも

（桨击银河水，闻声恋意浓，牛郎同织女，今夕喜相逢。）

——《万叶集》卷十

与银河紧密相关的牛郎与织女之七夕传说令万叶人深受感动。仅在《万叶集》卷十的《秋杂歌》这一部分就有九十八首七夕的和歌。若算上其他部分与七夕相关的和歌，总数达到了一百三十二首。

那么，让我们看看起源自中国的七夕传说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故事。

织女乃天帝的女儿，住在天河之东，她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在织布机上劳作，织出锦绣天衣。天帝可怜她独自生活，准许她嫁给天河西边的牛郎。但织女因十分享受与牛郎的快乐生活而荒废了纺织的工作。对此，天帝大为震怒，责令她回到天河东边，只许他们夫妻二人每年七月七日这天相会一次。每年到了相会之日的夜晚，织女都会乘坐华丽的车，渡过由喜鹊架起的鹊桥，去见夫君牛郎。

在中国的传说中，渡过天河的是织女。但在日本的传说中，是牛郎划船渡河去见织女。这是因为古时候，日本有一种“妻问婚”的婚姻形态，便采取了男方夜晚来到女方家度过的形式。

此外，牵牛星在日本被称为“彦星”或“犬饲星”，在西洋的星座中，相当于天鹰星座中的首星，即“天鹰座α”（Altair）。而织女星也被叫作“七夕星”或“织姬星”，在西洋的星座中，是天琴座中的首星“天琴座α”（Vega）。

日语中的“たなばた”（七夕）其实来自“棚機”一词，而这个词的意思便是织布，或织布的女性。

之所以这个词后来写作“七夕”，则与源自中国的乞巧习俗有关。乞巧，意为乞求智巧，即女子向上天祈求，自己的缝纫技术能得到提高。乞巧节于每年牛郎和织女相会的七月七日晚举行，女子会向星星祈祷，希望自己的手艺得到提高，后来人们还会在这一天祈求富贵、长寿等。这种习俗后来传入日本，最终成了在宫中举行的七夕节会。在这一天，日本的王公贵族会以七夕传说为题创作诗歌。

渐渐地七夕与乞巧节的习俗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现今日本的“七夕祭”。

自古以来，日本就将女性织布看作是一件神圣的事情。《古事记》《日本书纪》中便记录有天照大神在“机殿”（亦作斋服殿、忌服屋）织“神御衣”（众神穿着的服装）的故事。

《百人一首》中收录了大伴家持的这样一首和歌：

鵲の渡せる橋におく霜の

白きを見れば夜ぞふけにける

（宫阶若鹊桥，秋霜满地飘茫茫白一片，寒夜正迢迢。）

这首和歌原本收录于《新古今和歌集》的第六卷。此和歌没有题目，所以取名《无题》。虽然这首和歌中的鹊桥毋庸置疑与七夕传说有关，但对这首和歌的解读却是众说纷纭。

有人将其解读为大伴家持将云上人宫殿里的台阶比作了架在天川上的桥，所以称其为“鹊桥”，认为这首和歌咏诵的是冬天宫中的夜景。但也有人认为这是诗人抬头仰望冬季夜空时的有感而发。总之，对于这首和歌的解读，目前尚未达成定论，但如果从鹊桥是男女相会时脚下的那座桥这个角度来解读的话，大伴家持的这首和歌也可能咏诵的是爱情。

不论这座桥是虚构的还是真实存在的，我们都可以从这首和歌中读出男子“想要赶紧见到所爱之人，但却不知何时霜降满地夜更深”的情感，或是女子想着“今晚情郎会为我而来，但等着等着却等来了霜降夜深”的心情，这样的理解不是更为动人且耐人寻味吗？像这首和歌这般，男性诗人咏诵女性感情、思绪的例子并不在少数。

七夕祭至今仍在日本各地盛行。现在我们常见的七月七日当天将长条诗笺挂在竹子上的习俗其实始于江户时代。这是因为江户时代起，七夕开始作为五大节日之一而在民间盛行开来。这一天夜晚，人们会在庭院里摆放好供品，然后在竹叶上绑上五彩的长条诗笺，以祈祷子女的学问或手艺提高。此后，将向星星托愿的和歌或俳句等写在长条诗笺上这种极富情趣的民间习俗便一直流传至今。最后为大家奉上一首正冈子规的俳句：

うれしさや七夕竹の中を行く

（喜又上眉梢，七夕夜五彩竹林中，穿行而过之。）

北斗七星、不动之星——北极星、妙见信仰

在“记纪”神话中，除去有关太阳神天照大神和将月亮神格化的月读尊以外，几乎甚少见到有关星星的记载。“记纪”中仅见“天津瓮星”出场，但却被描写成高天原的一个恶神，在对抗众神之后被诛杀。至今我们依然不明白这个“天津瓮星”到底意味着什么。江户后期的日本国学家平田笃胤在其著作《古史传》中曾表示，“天津瓮星”应为太白或长庚（均为初更时的明星，即金星）神话化后的名字。

此外，日语中极少见到星星的名称，几乎都沿用了源于中国的名称。但其中“昴”（すばる）这一称谓确实是纯粹的日本名称。早在源顺的《和名抄》中就已经记载有“昴星”这个说法了。金牛座中的疏散星团“Pleiades”便是指昴星团了，因为肉眼仅能看到其中六颗星，所以昴星团也被称为“六连星”。

日本人最为熟悉的星星应该是北斗星和北极星（亦作北辰）。

北斗星在日语中也被叫作“北斗七星”“七曜星”或“七つ星”，是闪耀在天空北面的斗形星座。因其在斗身的位置有四颗星，而在斗柄的位置有三颗星，有时也称之为“四三星”。属于濑户内伊予水军之一的能岛家的《日和见样》便记载道，“四三星，以一星（北极星）用，于船中可知方位”，可见对于航海而言，北斗星是可以视作指路针的重要星星。

而在中国，北斗七星按照顺序依次是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古时候，人们会根据斗柄的指向来观测时刻或判定季节。甚至在道教中，北斗星与北极星被视为掌管人类寿夭祸福的神灵，由此逐渐发展出了北辰北斗信仰。这种信仰认为人的命运已被出生那一年的干支所决定，并受北斗中的本命星支配。而斗柄最前端的“摇光”也被称为“破军星”，它的日本名称是“剑先星”。

北辰（北极星）在肉眼看来是一颗不动的恒星。它总是处在天空中的同一个位置，以北斗星为首的星座以它为中心转动。所以北辰自古以来就是人们判断正北方向的一颗重要的星星。但由于天上北极的位置在一点点地发生变动，所以北极星其实在进行不明显的位移。关于这一点，日本的渔夫早已注意到，但人们大多仍将北极星看作是一颗固定不动的星星。

幕府末期，千叶周作在神田玉池开设了剑道场，并成为北辰一刀流的创始人，其流派的名字便源自“永远在北方天空闪耀的星辰”。

北辰和北斗经常被混为一谈。佛教中，妙见菩萨被视为北辰北斗的神佛，日本各地都建有妙见堂。平安时代以后，与北辰北斗信仰融为一体的妙见信仰开始流行。中世纪时，北斗的第七颗星因在道教中被称作“破军星”，所以被人们视为武士的守护神，并被千叶氏、相马氏以及大内氏等地方豪族奉为信仰。妙见信仰随后又与日莲宗相结合，成为江户时期江户地区人民热衷的信仰。

北辰与北斗在西洋的星座中属于小熊座与大熊座，小熊座的α星为北极星，而大熊座的七星即北斗七星。

“夜这星”与“西乡星”

清少纳言在《枕草子》中写道：“星中昴星、彦星、夕星为最佳。夜这星亦有些趣味。”其中昴星和彦星在上一节已经讲过了。这里的“夕星”指的是初更的明星——金星。而“夜这星”即指流星，也可以用来指“妻问婚”中每晚来到女方家中的男性。

英国的语言学家巴塞尔·霍尔·张伯伦为明治时期日本的语言学研究打下了基础，他发现日本人很少为星星起日文名字，并认为这或许与日本是农耕民族，人们白天下地干活，到了晚上就早早入睡，所以以前的人们并不是很关心星星有关。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过去一到晚上，男人就要赶紧前往妻子或恋人家中。

此外，歌舞伎中还有一首叫作《流星》的剧目，这首曲目原名为《夜这星》，于安政六年（1859年）在江户的歌舞伎剧场市村座首次演出。这出曲目分为“日”“月”“星”三部分，“星”便是人们所说的“夜这星”。但到了明治末年，人们认为这个名字有些低俗，便改成了“流星”。剧目讲述了七夕的夜晚，牛郎与织女相会时，流星前来报告了雷夫妇吵架一事。据说故事的原型低俗不堪。

虽说古时候的日本人几乎没怎么创作有关星星的神话或传说，但有关火星的故事却流传下来很多。在《扶桑略记》和《圣德太子传历》中，便出现了与太子有关的“荧惑星”（火星）传说。传言明治时期，火星在整个日本引发了一场大骚动。

明治十年（1877年）九月，火星曾接近地球，那时正是西南战争最为激烈的时候。很多老百姓怀揣着不安与对西乡隆盛或多或少的期

待，紧张地关注着战况。那时不知何人突然开始将又红又亮的火星称为“西乡星”，于是这个名字瞬时便尽人皆知。还有人声称在红色的火光中看到了身穿陆军大将军服的西乡隆盛。同时，距离火星很近的土星被人们比作西乡的参谋桐野利秋，因此把土星叫作“桐野星”。那时的人们以此创作出了多种彩色版画，都成了当时的畅销作品。

最终在西南战争中惨败的西乡隆盛于城山自刎，而桐野利秋则战死沙场。即便打了败仗，西乡隆盛的人气依旧不减，甚至渐渐传出了在城山死去的是替身，真正的西乡隆盛已经逃到了俄罗斯，以待时机东山再起这一不死英雄之传说。

不论传说的真相如何，在日语中确实有很多以星星作比喻的说法。图形中除了星形，连小圆点在日语中也被称为“星”。不仅限于黑、白两色小圆点，许多身上带斑点的鸟、鱼、虫的名字中亦含有“星”字，比如“星鸦”（星鸦）、“星羽白”（红头潜鸭）、“星鲽”（圆斑星鲽）、“星天道虫”（星瓢虫），等等。白色的圆形为白星，在相扑中被认为是象征吉利的胜利之星。虽然在相扑中黑星意味着失败，但靶子的黑色中心圆也叫黑星，所以黑星也有完美命中目标之意。此外，围棋棋盘中也有星，中央的是“天元星”，与周围的八颗星合称为“星目”。

日语中，嫌犯也叫作“星”。若嫌疑人大致有了目标或眉目，便会说“目星”（めぼし），而“星を挙げる”指的是将犯人捉拿归案。

那么，我们再回到夜空的话题来结束这一章吧。在现代社会，由于人工照明过多，已经很难观察到星星了。有时我真希望能在空气清新的山间或海边，抬头静静地仰望繁星一闪一闪发光的夜空。

最后，为大家奉上一首松尾芭蕉的俳句。

荒海や佐渡に横たふ天の川

（荒海掀巨浪，遥望佐渡夜当空，银河横长天。）

第七章

雨和雪的日本史

一　四季的雨和梅雨

从早春之雨到五月雨

日本亦是一个雨之国，不同季节下着不同的雨。

日本是一个四季景致各异的国家，它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美丽的国度，与雨水的恩惠是分不开的。春、夏、秋、冬，形形色色的雨滋润着大地，孕育出了多姿多彩的自然风光。

同时，对于作为农耕民族的日本来说，人们以种稻子为主要农业生产，因此雨水也是必不可缺的。

此外，因左右了战争的胜败而留名青史的雨也不在少数。

日本人将四季之雨写进了诗歌里，画进了绘画中，描写进了各种传说、物语中。表示“雨”的日语语词颇多，不下百个。并且还有很多相关的俚语、谚语、俗语以及比喻等。

春天，一株株小草开出了一个个小花苞，树木开始发出嫩绿的新芽，这时细雨也静静落下。这时候的雨统称为“春雨”，且多数为“地雨”。“地雨”指的是淅淅沥沥下着的雨。而淅淅沥沥的雨如果一会儿下一会儿停，持续好几天的话，就会被称为“霖雨”。持续时间较久的春雨叫作“春霖”，秋天的叫“秋霖”，而“春霖”在日语中也被称为“菜种梅雨”。

此外，春雨还有许多富有春意的名字，比如“木の芽おこし”（字面意思为树发芽）、“木芽雨”、“桜ながし”（樱流）、“花雨”等。

“时雨”原本指初冬时节时断时续的雨，但春天的阵雨也被称为“春时雨”或“春骤雨”。春时雨下起来的时候，往往伴随着春雷的轰鸣，而雨停后经常能看到天边挂起一道彩虹。这时的彩虹不似夏天的彩虹那么持久，颜色淡淡的，往往很快就消失了，但因为这番景象总能让人切实地感受到春天的气息，所以留给人的印象极其深刻。

春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佳人。日语中的“雨を帯びたる桃李”，或“雨を帯びたる桃桜”原本是用来形容桃花、李花或樱花被春雨打湿

后的娇俏可爱模样，后来也用来形容美丽动人的女性。这种说法原本出自《长恨歌》中“梨花一枝春带雨”这句诗，在《宴曲集》这本日本歌谣集中也有“杨贵妃，其容貌如带雨花枝”的描述。此外，人们还将美人忧愁的面庞形容为“雨にしおれし海棠の花”（被雨打蔫的海棠花）。

松尾芭蕉便将中国春秋时代传说中的美女西施比作了雨中的合欢花。

象潟や雨に西施がねぶの花

（象潟湖边雨中合欢，如西施婷立软雨中。）

——《奥之细道》

但这里所写的雨其实并非春雨，而是夏天的雨。

夏天的雨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梅雨。春雨时节与梅雨时节之间的一段时期所降的霖雨在日语中叫作“卯の花腐し”（字面意思为让卯花腐衰）。阴历四月的别称为“卯花月”，这个“卯花腐”指的便是此时降下的连绵不断的雨。

“卯花腐”结束后，会有一段时间的好天气。但在正式进入梅雨季节前，宛如梅雨的前兆一般，又会出现连续好几天的淫雨天，这在日语中被称为“走り梅雨”（字面意思为先锋梅雨）。当打头阵的“走り梅雨”过后，便是正式的梅雨了。

不信祈雨的平清盛与虎雨

梅雨是阴历五月下的持续时间很长的雨，也叫“五月雨”或“梅霖”。作为二十四节气之一的芒种（相当于阳历六月五日前后）是阴历五月的节气，芒种之后的壬日（阳历六月十日后）便入梅了；而阴历五月的另一个节气夏至过了以后，就迎来了阴历六月的第一个节气——小暑（阳历七月七日前后），小暑后的壬日便出梅了。按照现在的日历来看，大约是从立春（二十四节气之初，二月四日前后）开始，到全年的第一百三十五天（六月十一、十二日左右）时入梅，入梅后的约三十天的时间为梅雨天。

气象上的梅雨季每年都有变动，并不固定。此外，梅雨是中国长江中下游流域和日本（北海道除外）特有的霖雨。由于发生在梅子成熟的季节，所以也叫“梅子雨”；而这个季节雨水多、空气潮湿，很容

易滋生霉菌，因此梅雨也被叫作“霉雨”。

梅雨对于大自然的重要性不必多说，对于农作物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进入梅雨季节时正好是插秧的时节，原本就是热带水生植物的稻此时会深深地扎根于土壤，然后在之后的酷暑艳阳中努力地生长，最后结出稻穗。“空梅雨”或者“旱梅雨”指的是雨水少的梅雨季节，这时便无法插秧。即便好不容易插好了秧，在干枯缺水的农田里，稻子也无法扎根，最终稻苗枯死，整片农田颗粒无收。

虽然人们也很担心雨下得过量而引发洪水，但在担心洪水之前，人们更为忧虑的还是不下雨就种不了庄稼。正因如此，祈雨对于农民来说是一项重要的习俗，饱含了人们真诚而迫切的愿望。

祈雨舞作为民俗艺术的一种，在日本各地均有流传，跳祈雨舞的时候往往要伴着太鼓或钲的激烈敲打声。鼓声大作是为了模仿打雷的情景，以此来唤雨。此外，为了祈雨人们还会跳起“念佛舞”等舞蹈，这些舞蹈则是以驱除带来烈日的邪灵为目的。

除了舞蹈外，还有许多其他形式的祈雨仪式。比如，人们会在山上堆好柴火，点燃柴火堆来祈求风调雨顺，这样做是因为人们认为柴火燃烧后升起的烟很像天空中的乌云，而乌云往往会带来雨水。此外，古时候人们认为世界上存在掌管雨水的水神或龙神，所以也会将贡品沉入水神或龙神居住的仙池里，以此来向神仙许愿。请僧人或巫术师作法来祈祷降雨的形式也一度十分盛行。但无论人们采取何种形式求雨，依然无法避免干旱来袭。不过，干旱之后也总会迎来降雨的那一天。

在平安时代末期，就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人，他抓住了自然界的规律而不相信那些民间信仰或迷信之说，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便是平清盛。

某年，插秧时节临近但天公不作美，一直不下雨，老百姓为此十分苦恼。这时，一位名叫澄宪的僧人在祈雨后天降大雨，于是人们纷纷赞扬澄宪。但是平清盛却嘲笑道：“到了五月该下雨的时候，太阳自然就躲起来了，然后就会下雨。病人到了该痊愈的时候病总会好。大家认为降雨是澄宪的功劳，这就与正好快痊愈时为病人看了病的医生被捧成名医一样，太愚蠢了。”

平清盛打破了摄关政治[22]，是掀开了中世纪幕布的先驱者。他以坚定的理性主义和实力至上主义，向以传统和门阀为尊、以贵族为中心的古代社会的惯例发起了挑战并成功登顶。他通过与中国宋朝的

贸易稳定了国家经济，建立了新的首都，并试图创造出新的国家体制，他的诸多思想与理念都领先于那个时代，是名垂青史的一代枭雄。

在久旱之后，人们终于盼来的雨也被称为“喜雨”，这雨是令草木顷刻间焕然一新、重获生机的旱天“慈雨”。

在梅雨中期，阴历五月二十八日下的雨被称为“虎雨”，也叫“虎泪雨”或“曾我雨”等。

建久四年（1193年）五月二十八日，源赖朝在富士山围猎时，曾我十郎祐成与五郎时致兄弟二人趁机讨伐了父亲的敌人工藤祐经，为父报了仇。但兄长十郎却战死，弟弟五郎被捉住后遭斩首。以这一事件为原型创作的剧目广泛出现在能乐、幸若舞、净琉璃、歌舞伎等多种日本传统艺术形式中，这些剧目统称“曾我物”系列。

据说，五月二十八日下的那场雨是大矶的妓女、十郎祐成的情人——虎御前的眼泪。所以在近代之前，“曾我物”的故事广为流传的时期，“虎雨”的名字也是家喻户晓。

在“妻问婚”的时代，一到晚上，男人就要赶紧去往妻子或恋人家中过夜。但若赶上梅雨季节，则往往不遂人愿了，辗转难眠的夏季夜晚实在是不好打发。在《源氏物语》的《帚木》一卷中便描写了夏季夜晚，光源氏与他人东扯西聊、打发时间的场景，被称作“雨夜的品定”。之后，人们便将雨下个不停之时打发时间的杂谈称为“雨夜物语”。

“虎雨”过后，终于要出梅了，但天气时不时仍是淫雨绵绵的模样。这在日语中被称为“送梅雨”或“戾梅雨”。

盛夏的傍晚等时间段所降的“村雨”（阵雨）被称为“夕立”或“白雨”。“村雨”与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的淫雨相对，用来形容短时间内哗哗下起来的骤雨。在日语中也会写作“丛雨”或“群雨”。

此外，不仅仅是夏天，其他季节有时也会出现太阳当空却下着雨的现象。这种天气在日语中被称作“狐の嫁入り”（字面意思为狐狸嫁人，即太阳雨）。而“狐の嫁入り”这个词在日语中也可以指在夜晚的山野远远看到的磷火。

晴天娃娃、蓑笠与秋冬之雨

到了盛夏的季节，有时梅雨却淅淅沥沥、没完没了。如果一直不出梅，那么这一年的稻子很难结出稻穗。这时，人们就会想方设法驱走让雨降下来的恶灵，祈求太阳快快出现。

祈求老天出太阳的习俗延续至今，其中一种做法便是制作“てるてる坊主”（晴天娃娃），在西日本晴天娃娃也被叫作“日和坊主”。这一传统据说始于江户时代，人们用一块白布做出圆圆的头和身子，而眼睛、鼻子和嘴暂时先不画，然后将这个人形小娃娃挂在屋前，祈求雨过天晴。仿佛是祈祷晴天的咒语一样，直至今日孩子们依旧会唱起那句“てるてる坊主、てる坊主、あした天気になあーれ”（大意是：晴天娃娃、晴天娃娃，请让明天是个好天气）。如果天真的放晴了，人们就会给晴天娃娃画上眼睛、鼻子和嘴。

下雨天出门，雨具是必不可少的。在竹子做的骨架上糊上一层油纸的“蛇目伞”或“番伞”于江户时代流行起来。明治初期，“蝙蝠伞”（金属骨架的防雨布伞）传入日本。日本的和伞在昭和三十年代前后突然不再流行，时至今日已变得极为少见，但蝙蝠伞依旧为人们广泛使用。

在十六世纪的战国时代，由葡萄牙人带到日本来的雨衣被叫作“合羽”（かっぱ）。大部分合羽主要用呢子和木棉制成，也有用涂了桐油的和纸制作而成的“纸合羽”。中世纪的贵族会将涂了油层的白绢制成的雨衣套在衣服外面来挡雨。而修行者等则会在雨天穿上被叫作“雨皮”（あまかわ）或“油单”（ゆたん）的油纸做的雨衣。

历史上最大众化的雨具当属古时候老百姓最爱用的蓑笠了。“蓑”是用茅草、苔草或是麦秆、棕榈叶等编成的。干燥的蓑衣十分轻便，而且通风效果极佳。下雨的时候，蓑衣能够充分吸收水分膨胀起来，但雨水却不会渗透到内侧。而“笠”则是用灯芯草或竹叶等编成的戴在头上的防雨或防晒用具，时至今日，“笠”被制作成各种样式，渐渐成为爱美人士的时尚单品。

随着夏天的结束，秋天悄然而至。阴历八月十五日的满月是仲秋时节的代表性景观。这一夜，如果有雾而看不到明亮的满月的话，便称为“无月”。“无月”的这一晚若是下了雨，便叫作“雨月”或“雨夜月”。

进入秋天以后，连绵的阴雨被称为“秋霖”或“秋雨”，甚至有时还叫作“秋霉入”。

“村雨”在上文为大家解释过，指的是骤降的阵雨，如果单说这个

词，一般指的都是秋季的阵雨。

庭草にむらさめ降りて蟋蟀の

鳴く声聞えば秋づきにけり

（骤雨哗哗落庭草，蟋蟀声声啼不停，闻声才觉秋已至。）

——《万叶集》卷十

むらさめの露もまだ乾ぬ槇の葉に

霧立ちのぼる秋の夕暮

（骤雨初歇村似画，蒙蒙夕雾满秋山。）

——寂莲法师，《新古今和歌集》卷五

此后便刮起了秋末冬初的寒风，一丝彻骨的寒冷预示着冬季的来临。从晚秋到初冬会下起“初时雨”，这雨也早早地带来了冬天的冰寒。

“时雨”原本是指冬初时节，突然噼里啪啦下起来的雨，这个说法也经常被用在比喻之中。比如，“时雨心地”这个词既可以用来指看似要下雨的天空的样子，也可以形容快要潸然泪下的心境。“川音时雨”这个词则将河流的流水声比作了下雨的声音。“松风时雨”与“木叶时雨”也同样，是松籁或被风吹得沙沙作响的树叶的别称。类似的还有“蝉时雨”和“虫时雨”这样的说法。此外，日本还有一首叫作《刷刷时雨》（『さんさ時雨』）的民谣，“さんさ”是一个伴奏词，原本是形容下雨声的拟声词。

“时雨”是冬季这个迎来“死亡”的季节降下的雨。它总是不知何时便簌簌地下起来，又在不经意间就停了，可以说是无常之雨。也因此时雨便被人们视作了人生的象征。《新古今和歌集》卷六中，有二条院赞岐的这样一首和歌：

世にふるは苦しきものを槇の屋に

やすくも過ぐる初時雨かな

（世间无常苦痛多，冬夜槙屋思万千，偏巧初时雨纷落。）

由此可见，诗人正是用时雨咏诵了无常的人世。

《新选菟玖波集》中饭尾宗祇的俳句“时光荏苒销，谁不是寄宿于世？若骤雨一般”（世にふるもさらに時雨の宿りかな），便是仿照上面那首二条院赞岐的和歌而作。而后松尾芭蕉在此基础上又创作出了“时光荏苒销，吾亦如宗祇那般，生死漂泊哉”（世にふるもさらに宗祇のやどり哉）一句。此外，他还在《猿笠》的卷头写下了这样一句俳句：

初しぐれ猿も小蓑をほしげなり

（冬初时雨至，小小一件草编蓑，猿猴亦想披。）

在日语中，“时雨月”是阴历十月的别称。元禄七年十月十六日（1694年12月1日），松尾芭蕉辞世，因此人们也把他的忌日称作“时雨忌”。

到了寒冬，依然会下起细雨，这种雨被称为“寒雨”或“冬雨”。自小寒这一天起的第九天下的雨被称为“寒九雨”，被视为丰年的预兆。

利用梅雨作战的织田信长

历史上有不少天气左右了战争胜败的例子。所以，在作战前观测天气是制定战略时极其重要的一环。

永禄三年（1560年）的五月，今川义元率领数万大军攻入尾张。在投降并屈服人下抑或拼死战斗的抉择间，织田信长毅然选择以仅为对方十分之一的兵力去迎战。这场战争便是著名的“桶狭间之战”。

五月十九日，趁着破晓前的昏暗，织田信长从清洲城出征，并在晌午刚过时，打败了在桶狭间北面的田乐狭间布阵的今川义元。这场战争的结局让众多战国大名始料未及。这时的织田信长才二十七岁，一战成名的他日后也重新改写了战国的格局。

“桶狭间之战”的当天是阴历五月十九日，换算成格里高利历相当于六月二十二日，也就是梅雨下得最厉害的时候。所以人们认为正是骤然而至的雨帮助了织田信长成功逆袭。

但是织田信长的这次胜利并非完全听天由命、靠运气取得的最终胜利。

桶狭间是丘陵地带，有许多隘路，今川义元的部队行进困难。而织田信长正是充分利用了复杂的丘陵地形与梅雨气候。在断断续续骤然降落的暴雨掩护下，织田信长抄近道接近了今川义元的大本营，并在雨停之时发起了突袭。而突袭部队的人数多于今川义元大本营守军人数，理所当然会赢得胜利。所以说织田信长在桶狭间之战的胜利并非由于骤雨偶然的相助，而应该是他刻意地充分利用了骤雨才对。

天正三年（1575年）五月二十一日，织田信长又在奥三河的设乐原打败了当时号称战国实力最强的武田胜赖率领的骑兵部队，这便是著名的“长筱之战”。这一天换算成格里高利历是七月十日，也是梅雨的季节。虽说此时有“梅霖”，但还是时不时会放晴。所以织田信长应该是充分考虑了云的走向与地形，参照前人总结的经验，预测到了决战当天不会下雨，是晴天。所以这场战争最后也以织田信长的大获全胜告终。

那么为何这次是靠晴天取胜的呢？因为织田信长率领的是铁炮（火枪）部队，如果下雨，威力就会减半。一旦天气不适合，他的军队便根本无法利用优势。

天正十年六月二日清晨，也就是1582年7月1日，织田信长在本能寺之变中被谋反的明智光秀杀害。在本能寺之变的三天前，明智光秀于耸立在丹波与山城的国境上的爱宕山举办了一场出兵前祈祷胜利的连歌会。

時はいまあめが下知る五月かな

（字面大意：今时今日至，梅雨连绵下不停，此乃五月哉？）

如果只看字面意思，这一俳句讲的是：现在正是梅雨季节，是雨下个不停的五月。但“時”（とき）这个字的发音与“土岐”（明智光秀为土岐氏出身）一样，“あめが下知る”这一句又有“一统天下”之意，所以这句话的谐音暗示了明智光秀意欲取代织田信长的野心。

无论如何，利用梅雨在改变命运的一战中大获全胜的织田信长，最后却在梅雨中惨遭陷害，在自己四十九岁时画上了生命的句号。

二　美丽的雪与恐怖的雪

雪赐予人类的恩惠及雪的名称

日语中有一个词叫“雪月花”，相当于“花鸟风月”，泛指自然界所有的美丽景物。

严冬的雪景有着其他季节所不具备的凛冽之美。而在早春落下的淡雪既让人对残冬感到一丝惋惜，又让人为新季节到来、万物即将复苏而感到一丝喜悦。

あしひきの山道も知らず白橿の

枝もとををに雪の降れれば

（山路难前进，前方并不知。积雪挂满枝，白橿枝头弯。）

——柿本人麻吕，《万叶集》卷十

君がため春の野に出でて若菜つむ

わが衣手に雪は降りつつ

（只为持赠君，郊野采嫩菜。春雪纷纷飘，落满衣袖带。）

——光孝天皇，《古今和歌集》卷一

雪，作为日本的自然景色，可谓必不可少的天之恩赐。对于耕种的农民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恩惠。自古以来，雪就被称为“五谷之精”，乃“丰年之瑞”。冬天的时候，雪厚厚地积在山间，等到春暖花开时就化成清水汇入河川，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水资源。

山上的雪对于动植物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雪具有极佳的隔热性，能够在干燥强劲的冬季寒风中保护植物，还能够防止植物冻结而死。不仅仅是植物，有冬眠习性的动物也会藏在雪下来保存体温，正是因为有了雪，这些动物才能安然地在睡梦中等待来年开春。如果没有雪，日本的大多数动植物都无法抵御冬季的寒风。

描述雪的词汇，在日语中数量极其丰富。

晚秋时节，人们已渐渐感受到了冬天的气息，这时“初雪”也悄然而至。刚刚在地上积起来的薄雪被称为“新雪”。而在雪国，厚厚的积雪到了来年春天都不见融化的迹象时，人们称其为“根雪”。

“细雪”飘着细细小小的雪花；在气温偏高的初春等时期豪爽地降下的大雪是“牡丹雪”；“吹雪”指的是寒风中飞舞的雪花，也叫“风卷”或“风雪”；而“风岚”则指更为猛烈的“吹雪”。

大雪在风中漫天飞舞的景致清雅迷人，于是“吹雪”这个词经常被用在比喻之中。如“樱吹雪”和“纸吹雪”，等等。日语中的“雪を回らす”指的是如风中飘舞的雪花般轻盈柔美的起舞之姿，此外，人们还将曼妙的舞姿以“回雪”这个词来表示。

落到地上后又被风吹入空中的雪被称为“地吹雪”。晴天在雪山顶附近看到的随风飘舞、如烟升起的是“雪烟”。降到地上形色斑驳的雪被称为“斑雪”。树枝上挂的雪渐渐开始消融时形成的纽带状形态被叫作“雪纽”。在门柱或桩子上形成的看似球面的雪则被叫作“冠雪”“绵帽子”或“雪帽子”。

气温较低时落下的雪细细碎碎的，沾在衣服上抖一抖就会掉落，这种雪被称为“粉雪”。粉雪非常适合滑雪，但由于使劲捏也不易成形，所以不适合打雪仗，也做不成雪人。与粉雪相反，湿气较重的雪被称为“湿雪”。如果滑雪时下的是湿雪，那一摔倒就会弄得浑身湿漉漉的，很是恼人。“粗目雪”指的是雪融化过一次后再次冻上形成的粗粒积雪。

“雪模样”或“雪催”在日语里指的是快要下雪的天空或者刚开始降雪时的状态。日语中还有一个词叫“雪声”，虽然下雪本是无声的，但夜晚时分急速落下的雪总给人一种有声音的错觉，这就是“雪声”了。

相反，雪还会将声音吸收掉，被大雪覆盖的村子或镇子总是寂静无声的。雪会净化空气，下过雪的天总是清新而晴朗。如果夜晚下起雪，那雪后的月亮和星星看起来会格外明亮。“萤之光，窗之雪”（蛍の光、窓の雪）形容的是仅依靠一点点的光亮努力学习的样子。

研究雪片的大名与记录雪国生活的文人

“风花”这个词在日语中用来描述天晴时亮晶晶的雪片随风飞舞的

样子。在阳光的映照下，雪花更显得晶莹剔透，而“风花”这个词完美地重现了这一美景，令人仿佛身临其境。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雪花的形状，会发现它们多是六角形的结晶。所以才会有“六华”或是“雪华”这样的词出现。

江户时代，有一位大名被六角形的雪花深深地吸引，他便是下总古河藩主——土井利位。土井利位作为“大阪城代”平定了盐平八郎之乱，随后升任“老中”[37]，与水野忠邦共同推进了“天保改革”。

据悉，土井利位之所以对雪花着迷，是受了“兰学学者”、古河藩家老——鹰见泉石的影响。随后，土井利位痴迷于研究雪片，他利用显微镜观察雪片，并将看到的样子画下来，最后于天保三年（1832年）完成了《雪华图说》一书。这本书中记述了雪片结晶生成的原理、雪花的观察方法以及雪的十四条效用，并绘有七十四种雪花结晶的图案。

江户时期的大名中出了很多学者。他们当中许多人自幼便接受了严格的教育，所以有不少都是知识渊博的有识之士。与土井利位同一时代的人中还有一位肥前平户的藩主——松浦静山。他编写的《甲子夜话》共有二百七十八卷，现已成为研究江户后期的人物、时代面貌、民俗等的珍贵史料。《甲子夜话》续编卷之五十中的第四部分有一条记载了雪片种类和形态的内容，这部分便从土井利位的《雪华图说》中引用了二十七张图片。

《雪华图说》可谓宣告了日本自然科学迎来曙光的一本珍贵书籍。而作为当时一流的文化人，松浦静山也早早就对雪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通过自己的著作进行了记录。

此外，菅江真澄与铃木牧之以异于自然科学领域研究的方式，对雪国生活进行了记录，他们也贡献了地志、民俗方面的宝贵资料。

菅江真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东北地区与北海道的旅途中度过，并为后人留下了《菅江真澄游览记》这部著作。天明四年（1784年）年末至第二年春，菅江真澄在出羽国（现秋田县）生活了一段时间。书中有这样一句描写：“在出羽国，人们刨雪挖洞，称其为雪洞，孩子们整夜都在里面点燃松脂玩耍。”

对于出生在三河国（现爱知县）的菅江真澄来说，雪国的冬天实在是不同寻常。所以他记录下了自己看到的孩子进入雪洞中玩耍的样子，并且在书中称早晨的雪景比黎明下的花朵还要吸引人。擅长绘画

的菅江真澄还将雪国独有的雪橇和樏等工具画了下来，补充在文字后面。除此之外，他还在书中生动地描写了雪国正月的景象与人们的日常生活。

但菅江真澄的著作直到昭和时期才被整理成《菅江真澄游览记》而为世人所知。

铃木牧之的《北越雪谱》于天保八年（1837年）在江户出版。在那之前，对于大多数江户地区的人来说，雪国的生活都是无法想象的。

我生长在埼玉县大宫市（现埼玉市）。我还记得小时候一早起来，看到外面一片银装素裹，自己总是格外兴奋。即便长大了，我依然对这雪景有着无限眷恋，夜晚如果看到雪花在路灯的映照下翩翩起舞，便不自觉地开始期待第二天一早的美景。

但是，住在雪国的人或许并不这么认为。曾经有一位家住新潟县长冈市郊外的长者对憧憬雪国的我说过，对于冬天被大雪封闭在家、外出困难的当地居民来说，生活环境是相当严酷的。

光是将屋顶的积雪扫下来就已经是一项极其耗费体力的事情了。如果不经常打扫屋顶的积雪，房顶就会被压塌。现如今，街道上都安装了融雪设备，郊外的道路也有扫雪车清理，不会过于严重地影响人们的出行。但在数十年前，冬天的交通可是一大难题，住在郊外或山里的人可能两三个月都无法外出，只能孤立无援地等待雪的融化。

《北越雪谱》详细地记录了对于江户地区的人们来说完全无法想象的越后地区人们的生活。书中真实地呈现了当地百姓除雪的辛苦、吹雪的景色、雪崩造成的损失等。此外，在雪中纺织、在雪水中漂洗、最后在雪上晾晒的绉纱的制作过程也记录在内，并且描写了只有雪国的居民才能体会到的春天到来时的喜悦。这些内容若不亲身体会，绝对写不出来。

菅江真澄对于出羽地区正月的记录更多的是从一名旅行者的视角出发，并没有对当地居民因此遇到的不便与苦恼加以记录。铃木牧之原本是越后国的暴雪地带盐泽的一名商人，所以他的作品并非旅途的见闻录，而是以生活在那里的一个居民的身份，基于自己的切身感受，对当地进行了记录与描写。所以当铃木牧之作为一个贩卖绉纱的商人来到江户并走访各地，了解到原来有些地方冬天竟然不下雪时，反而会对此感到颇为震惊吧。

雪童子与雪女

雪国的冬天昏暗而漫长。如果雪一直下个不停，那么人们也几乎不可能外出。所以过去的人们在下雪时，大多靠着火炉，看着燃烧的火苗打发时间。这时，对于小孩子来说，听祖父母给他们讲故事便成了唯一的乐趣。

那么，家里没有孩子的老夫妇是怎么熬过漫长的冬天的呢？新潟县流传着一则关于雪童子的传说。

某地有一对老夫妇，漫长的冬天于他们而言过于无趣，所以他们每天都会将雪做成小孩子的样子来打发时间。某一天夜晚，外面风雪交加，夫妇听到有敲门的声音。二人觉得甚是奇怪："到底是何人在这漫天大雪中到访呢？"他们打开门就看到一个小孩子（童子）伴着飞进屋内的雪花进到了屋里来。定睛一看，这个孩子竟然和他们做的雪童子长得一模一样。老夫妇非常高兴地将他收为养子，但到了化雪的时候，这个雪童子却不见了身影。夫妻二人虽然非常伤心，但因为到了春天，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也就渐渐淡忘了冬天出现的雪童子。然后夏至春去、冬至秋去，又到了漫长而又寂寞的冬天。在吹雪的那天，雪童子又出现了，老夫妇格外惊喜。之后每年一到冬天，雪童子就会来到老夫妇的家中陪伴他们，直到老夫妇去世，雪童子也就不再来拜访了。

在与雪有关的民间故事和传说中，最广为人知的当属雪女的故事了。有些地方也管她叫"雪女郎""雪姬""雪婆"等，各地的版本不尽相同。其中，流传在富士、长野地区的雪女的故事，因与被小泉八云收录在《怪谈》中的《雪女》的故事梗概大致相同，而最是家喻户晓。

进入雪山打猎的猎人父子为了躲避吹雪而来到一间山中小屋，这时一位雪女出现并将父亲杀死，雪女对猎人的儿子说道："这件事你不能告诉任何人，如果说了我也会将你杀死。"然后便消失不见了。猎人的儿子遵守了与雪女的约定，并未将那天的事情告诉任何人。十几年过去了，当初的年轻猎人娶妻生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在一个吹雪的夜晚，他一不留意就将自己曾经看到雪女的事情告诉了妻子。于是，妻子瞬间变成了雪女的模样，打算杀了他。但因为当时有孩子在场，猎人保住了性命，而雪女却消失在了吹雪之中。

雪女故事在青森地区的版本则是：一位美女在下雪的夜晚将婴儿委托给过路之人后，便不见了踪影。在岩手的传说中，一旦与雪女发生了关系，男人一辈子都将不能生育。而在秋田地区的传说中，因吹雪而去世的亡者灵魂会化作雪婆的样子出现，如果人们看到她或议论

她，就会被雪婆杀死。

此外，日本还有一则关于雪女的小笑话。

某个雪夜，一名女子拜访了一户老夫妇，并托付给他们一个女孩。虽然老夫妇十分疼爱这个孩子，但这个孩子无论如何也不肯洗澡。有一天，老夫妇强行让女孩进到浴盆里打算给她洗澡，却突然发现孩子不见了，只剩下一把梳子漂在水面上。

除了上面这些传说外，“雪入道”或“雪坊”等讲述只有一条腿的妖怪童子的故事也在日本各地广泛流传。但不知为何，日本并没有雪男传说，似乎雪更容易让人联想到女性。此外，在雪女传说中总会出现小孩子，这也是这类传说的一个特点吧。顺便一提，现代人所说的喜马拉雅雪人是一种尚未证实的动物。据说雪人全身都是厚厚的体毛，样子颇似人类。喜马拉雅雪人也被人们叫作“夜帝”（Yeti）。

翻越阿尔卑斯雪山的战国武将与八甲田山的死亡行军

严冬的雪山仿若白魔的领地，普通人类难以靠近，猎人也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活动。到了近代，阿尔卑斯登山家的出现，才带起了人们向被厚雪覆盖的高山发起挑战的风潮。

但其实早在战国时代就已经有一位武将翻越了北阿尔卑斯，也就是飞驒山脉。这个人便是越中富山的战国武将——佐佐成政（内藏助）。

成政原本是织田信长的部将。在“本能寺之变”后，他曾对抗丰臣秀吉并在贱岳之战中协助了柴田胜家，柴田胜家被打败后他便服从于丰臣秀吉。但当小牧长久手之战开始后，他又立刻响应织田信雄与德川家康的军队，背叛了丰臣秀吉。然而织田信雄随后与丰臣秀吉讲和，于是德川家康便也撤了军。这时，为了劝说德川家康对抗丰臣秀吉，成政便出发翻越了雪山飞驒山脉。

天正十二年（1584年）十一月下旬，按照现行历法应是一月上旬，正是最寒冷的严冬时节。成政带领着一支部队从越中来到信州，当面劝说德川家康放弃议和。但德川家康不为所动，愿望落空的成政遂再次翻越飞驒山脉回到了越中。

现如今我们已无从得知当年成政走的到底是哪条路线。但人们大多认为他先翻越了立山附近的山顶来到黑部峡谷，最后翻过针木山

顶。严冬时期如果走这条路线的话，要面临诸多艰难险阻。首先，要担心遇到雪崩的风险以及山中的漫天飞雪；其次，严冬时节这里的气温可能低至零下二十摄氏度；再加上这一路必须要渡过黑部溪谷，而从针木山顶下来的路也十分陡峭，实在难以想象当年成政一行人是如何办到的。所以也有人认为成政应该是率军从现在的越中东街道（旧镰仓街道）绕行，途中翻越了安房山顶，然后通过上高地附近来到了松本。但即便是循着这条路线前行，也绝非易事。

佐佐成政是一位因立山黑百合传说而闻名于世的武将。不论他当年走的到底是哪条路线，他都曾于天正十二年年末，从越中经信州到达了远州浜松，又再次折返。毫无疑问，途中他经历了与大雪和恶劣地势环境的较量。

最后，我们再看一件发生于明治时期的事情。

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一月，青森县的八甲田山发生了日本山岳史上最惨痛的一起事故。临近日俄战争爆发，为了在寒冷地区进行雪中训练，青森步兵第五联队的210个人尝试横穿八甲田山进行雪中行军。但最终有199人在这场死亡行军中丧命，近乎全军覆没。

这起事件在当时被报纸等媒体大肆报道，甚至还创作了一首由落合直文作词的军歌《陆奥吹雪》。那时，士兵为了保护长官而一个个死去，而将校为保护部下被冻死的故事也得到了极力宣传。

然而，这场死亡行军出现的原因，明显是人们小看了雪山的严峻而制订了无脑的计划，并强行实施了这次行军。再加上行军过程中，士兵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恶劣气候。

日本气象观测史上的最低气温出现在明治三十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地点是北海道的旭川，这一最低气温达到了零下四十一摄氏度。在这一天前后，寒冷气团从北海道直逼东北地区北部，再加上低气压的通过，八甲田整座山都处于狂风暴雪之中。而第五联队的士兵们在这前所未有的严寒暴雪中一个个倒下，最终几乎全被冻死。

雪景毫无疑问是赏心悦目的，然而一旦小瞧了雪，它就会毫不留情地露出獠牙袭击人类……

第八章

鱼贝类的日本史

一　富饶的大海与绳纹人

资源丰富的海涂

日本是一个四周环海的岛国，平原面积较少，国土面积的七成都是山地。日本列岛其实可以看作是一条耸立在海面上的山脉。日本的山脉被茂密的森林覆盖，自遥远的绳纹时代开始，日本人便依靠森林的恩惠生活并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同时，广泛分布的森林促成了海洋的富饶，一直以来日本人也享受着海洋赐予的种种恩惠。

日本各地分布有无数的贝冢。这些贝冢是距今一万多年前，绳纹人以及弥生人以鱼贝为食留下的遗迹。

而为古代人提供了无限资源的富饶海域便是海涂。

在海湾内侧的河口流域等潮间带，经河流长年累月的搬运，泥沙逐渐增多，于是形成了广阔而平坦的泥滩。退潮时露出海面，涨潮时隐于海水之下的地方便是海涂了。

由山毛榉林等树林滋养出的营养丰富的土壤锁住了落在山间的雪或雨。而雨雪又在山中各处经过过滤变成清水，然后涌出地面成为清流，清流渐渐汇集成河川，冲刷着下游流域的岩石并将泥土带入大海。就这样经过了成千上万年，日本列岛的海湾内侧形成了诸多海涂，而这一片片海涂又孕育了无数的生命。人类也是海涂所养育的其中一种生命。

海涂的泥沙富含营养盐类与有机物，再加上每天两次的退涨潮，这些泥沙有充足的时间暴露在空气中，保证了其中有足够的氧气。正因为具备这种种条件，海涂成了生物生长的一个绝佳环境。沙蚕、螃蟹、小虾、双壳贝等许多小生命都在海涂中栖息。而这些食物链底层的生物又会成为每年春秋两次飞来的鸭、鹭等鸟类的食物。当然，贝类对于人类来说亦是宝贵的食物。另外，当潮水涨起来时，这些食物链底层的生物又会成为海里许多鱼类的腹中餐。鱼不仅仅以海涂上的各种贝类、小虾、小蟹为食，还会在海涂上产卵。海涂的泥滩与藻场都是鱼类最为重要的产卵场所，也是幼鱼成长的地方。

古时候，人们不劳作时，可以直接去海涂上捡拾贝类或捉鱼来维

持生计。

但时至今日，日本的许多海涂已经消失不见了。东京湾的临海地带曾是一大片的海涂，人们在这里捡贝壳、捉鱼，也不过是几十年前的事情，现在却再也看不到那番景象了。

人们将海涂填埋成陆地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海涂具有一直向海里延伸的特性，其底部早晚会陆地化。通过观察贝冢的分布可知，曾经大海一直延伸到了内陆很深的地方。伴随着“海退”——换句话说，随着海涂的扩展——曾经的海洋自然而然地陆地化了，而人类加速了海洋陆地化的进程。日本人填海造田的记录可以追溯到奈良时代，而在填海造田时最先受到影响的永远是海涂。近几年，人类不仅破坏了海涂的底部，连海涂的边缘都全部填埋，这种填海造田行为夺走了整个海涂以及赖以为生的生物的生命。

死海化的谏早湾

平成十年（1998年）五月，我到访了长崎县的谏早湾。直到前一年，这里还曾拥有日本屈指可数的海涂，曾是一片富饶的海域。但是在前一年的四月，谏早湾的海边建起了长达七公里的“谏早湾干拓（填海造田）潮受堤防”，导致了如今海涂大面积死海化。被堤防阻断了海水的谏早湾被灌入了本明川的水，于是形成了现在这个巨大的淡水湖。中央原本是海涂的地方，现在无论涨潮或退潮都是裸露在外面的陆地，而曾经栖息在那里的生物也全都不复存在。

人们为何要做出这样的“暴行”呢？建造堤防的农水省的说法变来变去，让人听到最后也完全不明白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农水省首先解释道，这样做是为了确保农用地面积，但当吸引不到农户过来开垦耕种时，又说这样做是为了防灾，还说有了堤坝就能保护谏早町不受洪水威胁。虽然我实在不知道在海湾的海滩上建堤坝为何就能防洪，但不知从何时起连防灾也不再是主要目的了。再次改变说辞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如果该堤防是为防灾而建，那就不该归农水省管理，而应交给建设省负责。听说，有关部门还计划将填海造田的区域打造成一个大型的观光设施，甚至冠冕堂皇地说将会建立一个自然公园，用作鸟类的庇护所。反正我是不理解为什么要破坏掉日本屈指可数的宝贵自然环境，然后再费时、费力、费财地打造一个人工的自然。不论这个人工的“大自然”建造得多么逼真，与这片海涂一起消失的数以亿计的生命却再也挽救不回来了。

目前确切可知的是，这一系列建设现在已经耗资两千五百亿日

元，投入资金已经比当初的预算多了近一倍，而接下来还将花费数百亿日元完成后续建设。如此说来，这项事业对于与工程相关的政府部门、各承包商以及利益相关人士来说可谓相当有意义呢。

我来到当地以后，乘坐一艘小渔船在已经成为淡水湖的谏早湾上考察了一圈。此外，我也稍微尝了一下湖里的水，确实已经是淡水了。据说在这里撒网还能捕捞到鲤鱼和鲫鱼。随后我登上了已经陆地化的当年那片海涂，眼前的景象令我目瞪口呆。脚下到处是贝壳，仿佛置身贝冢遗迹。我仔细翻看了一下，除了牡蛎壳外，还有玄蛤、蚬、海螺等许多种小贝壳混在里面。再往前看，还能看到无数开裂的白色“石块”散落一地。而这些乍一看是小石块的白色固体全都是被夺走了生命的贝类的空壳。

海涂上的大部分生物都死了，但大弹涂鱼还顽强地活着。它们一会儿在海涂的一小片积水处蹦蹦跳跳，一会儿又在泥滩上爬来爬去。大弹涂鱼的巢穴在地下一米深的地方，里面还残存着一些盐分，所以它们得以苟延残喘。不过，它们终会面临灭绝的命运吧。在临近产卵期时，大弹涂鱼专心致志地忙着划分地盘和进行求爱，似乎并不知道自己命不久矣。又或许正是因为它们知道自己即将面临的命运，所以才如此拼命地繁衍后代。

春天的时候，以鹬为首，众多滨鸟从遥远的南方飞越大海来到这片海涂获取食物、恢复体力，然后再继续飞向堪察加半岛或西伯利亚。到了秋季，它们则在飞回南方的途中，再次来到这片海涂休憩调整。海涂对于候鸟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中继站。但那一年（1998年），当候鸟再次飞来时，恐怕怎么也找不到食物，只能看到一地凌乱的贝壳。

对于鸟类来说，并非“这片海涂不行，就再找新的替代”便能简单地解决问题。候鸟以谏早湾为中继站的习性恐怕是经过了数千年的世代交替才形成的，于它们而言，谏早湾早已编入了自身的DNA。况且其他海涂早已有了其他的候鸟群体。所以原本要在谏早湾停歇的候鸟不得不在体力没有充分恢复的情况下继续踏上旅程，而最终能够飞到北方繁殖地的也只剩下很少一部分了。

海涂上的鱼贝类每年如喷涌而出般不断增殖，当过度增殖时又会被成千上万的候鸟吃掉或者成为人类的食物，生态系统就是这样维持着平衡。虽然过度捕捞等行为确实会造成鱼贝类数量的减少，但造成鱼贝类消失的主要因素还是环境污染与破坏。

曾经，日本人一边受惠于富饶的海涂，一边与海涂上的鱼、贝等

生物和谐共生，并孕育出了历史与文化。如今人们自私地将海涂填埋，靠远洋渔业或进口来维持对海鲜的需求。现代人对吃进嘴里的食物并不会有过多的疑心和担忧，但迟早有一天，人类的破坏行为会激怒大自然，最终倒霉的还是人类自己。

这座堤防的开工仪式于平成元年（1989年）举行，在一年后的平成二年十一月，工程正式开始施工没多久，谏早湾前耸立的云仙普贤岳火山突然喷发，仿佛是大自然对亵渎环境的人类敲响的警钟。

从鸟滨贝冢看绳纹人与渔捞

人们在贝冢里除了找到了诸多贝壳外，还发现了很多鱼骨头。从鱼骨头判断，鱼的种类多达数十种，现在我们常吃的沿岸或近海的鱼几乎全包括在内。具有代表性的有金枪鱼、鲣鱼、青花鱼、鲹鱼、沙丁鱼、真鲷、黑鲷、鲈鱼、鲻鱼、河豚、大马哈鱼和鳟鱼，等等；而淡水鱼则包括鲤鱼、鲫鱼、鲶鱼和鳗鱼等。

从日本各地的贝冢中都发现了河豚的鱼骨，令人十分震撼。分明有那么多新鲜美味的鱼可以食用，为何人类要冒着死亡的危险去吃河豚呢？毋庸置疑，自然是因为河豚鲜美至极的味道了。中国宋代诗人苏轼（苏东坡）的那句“值得一死”颇为著名，而日本人在古老的绳纹时代就已经知道了河豚的美味。古代人应该知道如何料理河豚，尽管如此，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因此而丧命。

弥生人的居住遗迹中曾发现了好几具叠放在一起的大人和小孩的尸体，似乎是因为发生了什么意外而全家死亡，最后这一家老小的尸体被堆放在了一起。由于和人骨一起出土的还有河豚的骨头，人们认为这家人应该是吃了河豚中毒而亡。

位于福井县的鸟滨贝冢（现位于若狭町）是绳纹时代前期的低湿地型贝冢。昭和三十七年至昭和六十年（1962年—1985年），人们在此进行了十次挖掘调查，因发现了迄今为止从未出土过的多种动植物遗迹而引起关注。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跟渔捞有关的一些事情。

首先，鸟滨贝冢出土了大量被认定为一万年前的人类使用的石锤和石制的渔网坠，此外还发掘出由黏土烧制成的土锤。人们在这个贝冢里找到了编织物的碎片，这些碎片很有可能是渔网的一部分。贝冢里还有好几根用兽骨或鹿角做成的鱼叉以及用骨头或鹿角制成的钓钩。这些钓钩长五厘米到十厘米，与现在的钓钩相比要大很多。据推

测，这些大型钓钩应该是用来钓金枪鱼或鲣鱼等大型鱼类的。而最令人吃惊的是圆木舟，据考证，鸟滨贝冢里出土的圆木舟来自五千五百年前，是目前已发现的日本最古老的木舟。

一万多年前就开始在此生活的鸟滨人，或许以渔捞为生的历史便长达数千年吧。他们乘坐木舟出海，撒下渔网捕捞，又或是用鱼叉和鱼钩捕鱼，鸟滨人手中的捕鱼工具可谓五花八门。当时的贝类则几乎无须费力就能捡到。那么，我们来看看在鸟滨贝冢都确认到了哪些鱼类吧。

属于海水域和半海水域鱼的有：金枪鱼类、鲣鱼、青花鱼、中华䲠、鰤鱼、黑鲷、斑石鲷、圆尾绚鹦嘴鱼、鲈鱼、红鳍东方鲀、刺鲀、沙丁鱼、鲱鱼类、大马哈鱼、鲨鱼类、鲟鱼类，等等。属于淡水鱼的则有：鲫鱼、鲤鱼、鯰鱼、鳗鱼、似鲤（ニゴイ）、川鲑（カワムツ）、叉尾黄颡鱼、马口鱼以及其他鲤科的鱼类。此外，人们还在贝冢内找到了鲸类、海豚以及海狮等海兽的骨头。

鸟滨带给人们的并不只有鱼类，还有蟹、虾以及各种贝类，甚至是海藻、莼菜、菱角等。从数千年前或者更远古的时代开始，大海便是日本列岛居民重要的食物采集场所。

今天，日本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鱼贝类消费国。法国人在整个欧洲算是最喜爱吃海鲜料理的国家了，但日本的海鲜消费量是法国的两倍，是美国的五倍。日本一年的渔业总捕获量竟占到了世界总量的六分之一。遗憾的是这些海鲜并非是在日本沿岸捕捞到的，而是搜刮了世界各地的海域才捕到。自遥远的太古时期起，大海、河川、湖沼就为日本人提供了无限的恩惠，但现在海洋、河川、湖泊却有许多处于濒死状态。面对这番局面，有人会说，只要离开日本去别的地方捕鱼就好了。但要知道，这种方案迟早会出现各种问题。

污染的河川与被现代人“杀死”的大海

日本近海是由黑潮暖流与千岛寒流交汇而成的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渔场。日本列岛有大大小小无数的海湾与峡湾，并在海涂和礁石的装点下，展现出不同的面貌。海涂和风平浪静的内湾是鱼类的绝佳产卵地点。但如今，很多海涂被填埋，湾内的海水遭到污染，适合鱼类产卵的地方越来越少。

此外，原本可以净化海水、为海水补充营养的河川也渐渐失去了这一功能。因为越来越多的河川被生活废水和工厂污水污染。但造成

河川污染的并非只是污水，河流中下游流域甚至是上游流域的树木遭到过度砍伐也是主要原因之一。人们将小河的三面铺上水泥，改成排水沟，铺设了越来越完备的下水道系统，也加快了河流的污染。

不仅仅是被树木覆盖的青山，森林、杂木林等都在将雨水和雪水变为地下水这一环节中承担着重要“职责”。雨水和河流水也源源不断地为地下供应着水源。但是现在，通往地下的道路被封堵，雨水只能通过排水沟或河川流向大海，实在令人惋惜不已。

以前，人们只要钻一口井就能得到干净的水源。到处都有清水从地下涌出，而清水汇集在一起就形成了小溪流。一条河流在流向大海之前，会有许多条小溪汇入其中。现在人们已经了解到，正是这些溪水为河流提供氧气、补充营养，并辅助河流净化。小溪虽不起眼，作用却是巨大的。

近几年，人们不断地尝试，让东京都等地过去被称为“野川”（野地里的不知名小河）的小河恢复生命力。为此，人们不再让落在屋顶上的雨水顺着管道流入排水沟，而是让雨水直接落到院子里的泥土中，试图通过这种方法让“水系统”恢复如初，令野川重获生机。最终，人们的努力确实使几条野川恢复了往日模样；虽然效果甚微，但多摩川的水质也确实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人类的努力不过是杯水车薪，最终只有顺应大自然的最古朴、最简单的原理，才是让河川得到净化，让大海恢复生机的最佳办法。

自绳纹时代以来，在日本人的饮食生活中，大马哈鱼和鳟鱼扮演着重要角色。每年秋季，大马哈鱼和鳟鱼为了产卵会洄游，一直游到上游水源附近的山中。因此，不仅仅是住在海边的人，就连住在山里的人都能享受到大海的恩赐。

此外，过去从山阴至北陆、关东、东北等地区的众多河流之中，都有大马哈鱼和鳟鱼的身影。但现在呢？大马哈鱼洄游的河流只剩下北海道和东北地区有限的几条河流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仅仅是河流污染。人类建造了诸如大坝、堤防等太多的“障碍物”，这些都影响了鱼的洄游水路。香鱼亦面临着同样凄惨的下场，如今，天然洄游的香鱼所剩无几。

人们不仅夺走了鱼类在海涂或内湾产卵的场地，连通过洄游产卵的鱼类的河道都被封堵了。对于鱼类来说，在这成千上万年的历史长河中海涂和河川都是它们的故乡，但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它们的故乡突然被我们人类夺走了。

二　神话中的鱼

文献中最早出现的鱼贝类——水母

在《古事记》上卷的《天地之初》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方天地初发之时，于高天原成一神。其名，天之御中主神。次，高御产巢日神。次，神产巢日神。此三柱神者，皆独神成坐而隐身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在天地刚开辟之时，高天原形成了三柱神，分别是天之御中主神、高御产巢日神、神产巢日神。他们是三个独立的神，且从未显露身姿。

而在后面的记载中，《古事记》道：“次国稚如浮脂，而譬犹水母之浮水上者。于时，若苇牙因萌腾之物而成神。”意思是，在国土尚为雏形，仍未固定时，以油脂般的状态浮于水中，像水母一样漂浮在水里。这时如同苇牙破土而出般，神形成了。

由此可知，在日本文献中最初登场的生物是鱼贝类中的水母。这一部分在《日本书纪》中是这样记载的：“开辟之初，洲壤浮漂，譬犹游鱼之浮水上也。”这里面的“游鱼”并非是鱼群，而是指在水中柔软地漂浮的水母。也就是说，当时人们将水母看作一种鱼。

承平年间（931年—938年）编纂的《和名类聚抄》中对鱼的记载曰，“水中连行虫之总名也”。也就是说在水中生活的生物的总称为鱼。

顺便一提，“魚”（鱼）在日语中的音读发音为“ギョ”，训读发音为“ウヲ”“イヲ”或者“ナ”，原本是不读作“サカナ”的。“サカナ”这个发音的语源来自“酒菜”（サカナ）或“酒魚”（サカナ），即配酒来食用的美味，俗称下酒菜。而日语中的“酒肴”或“肴”则是酒菜、酒鱼的总称。

回到水母的话题。自古以来，日本人就常以水母为食。从奈良时代起，水母成了贵族宴会上一道必不可少的菜肴。供天皇食用的水母由备前国进贡。

水母是浮游生物的一种，大小不一、种类繁多。正如日本谚语“前の字のつく海月は食える”（带“前”字的水母可食用）所说，日

本人食用的水母为备前水母、越前水母和肥前水母三种。这三种水母中，越前水母体形最大，其伞的直径可长达一米。为了将水母制成食品，需要将其腌制在盐、硫酸铝钾及橡叶等特定的植物叶子或树液的混合液中。据说整个制作过程需要二十至四十天。

奈良时代的人们当然不会将水母这种软乎乎的动物直接进献到宫里，所以才会花这么大功夫将水母进行腌制。在江户时代初期出版的《料理物语》以及江户时代中期出版的《料理伊吕波庖丁》等书中均有关于水母料理的记载。

此外，日语中也有许多与水母有关的谚语或比喻。

因为水母没有眼睛，所以人们曾认为水母是借用虾的眼睛来活动的。而这也是水母的日语别名为“借眼公”的原因。

“水母に海老の道標”（把虾的路标给水母）是一句俗语，比喻借用他人之力来行事。而“水母は海老を目とする”（水母以虾为眼）或“水母は海老の目を借る”（水母借用虾之眼）往往用来比喻相依为命。

“海老に離れたる水母”（离开虾的水母）这个俗语则用来比喻离开了靠山后束手无策、迷失方向。而如果水母离开了虾，则会完全随风波而动，在水上漂浮，所以衍生出了“水母の風向かい”（水母的风向）这个说法，并经常用以形容与对方作对也是徒劳之意——因为水母根本不可能逆风而行。

在日语中，人们常用“水母の行列”（水母的队列）来形容毫无连贯性，无法整整齐齐的样子。而“水母の骨”（水母的骨头）则用来比喻不可能出现的事物或极为罕见的事物。当形容遇到了罕见的情况，或见到了本不可能见到的事物时，则会用“水母骨に会う”（看见了水母的骨头）来表示。

女性的象征——赤贝与蛤蜊、鲈鱼

在《古事记》提到的鱼中，第二个登场的是在《大国主神》中出现的一条将因幡之白兔扒光了皮的“和迩”。陆上的动物骗水中的动物过河的故事在印度尼西亚及其他东印度诸岛也有流传，在这些地方的传说中，受到欺骗的是栖息在河流或沼泽里的鳄鱼。但《古事记》中的这个“和迩”应该是鲨鱼。鲨鱼是鱼类中体形最大的，日语中写作“鮫”（サメ），而在关西以西的地区则叫作“フカ”，在山阴地区叫

作“ワニ”。此外，人们会将巨大的鲨鱼称作“フカ”。

救下了白兔的大国主大己贵神遭到了八十个兄弟神的陷害，严重烧伤最后死去。而治愈了大己贵神的烧伤并使之起死回生的是天上的神皇产灵尊派来的蚶贝比卖与蛤贝比卖。这两位女性收集了赤贝壳，并将母乳汁涂在大己贵神身上，令他伤愈复活。

这则将赤贝与蛤蜊比作了女性的故事十分具有典型性。神话故事中蚶贝比卖与蛤贝比卖将赤贝壳磨成粉，以蛤蜊汁融之并与母乳汁混合，涂在了大己贵神的身上来治疗烧伤。

贝类自太古时期起，对于日本人来说就是无可替代的食物。此外，经调查研究可知，古时候人们还将贝壳和贝汁入药用来治病。在贝类中尤以赤贝和蛤蜊最为鲜美。而直至今日人们仍将贝肉比作女性的阴部，正是源自《古事记》中这两位女神的出场。

在《大国主神让国》一部分中有这样一段记述：“于海上，栲绳延若千寻，拉尽钓海人获之口大翼厚之鲈至此，堆砌台上，其数之多似使台作弯曲状，如此献天之真鱼咋也！”

这一段讲述了用“延绳钓”的方法钓鲈鱼的故事。“栲绳”指用小构（楮）树皮做的绳子。“口大翼厚之鲈”指的是有着大嘴及完美尾鳍的鲈鱼。大家乱哄哄地将鲈鱼钓了上来，摆放着神的贡品的台子都如竹叶般弯曲了。这鲈鱼被当作“天之真鱼咋”——也就是神圣的鱼料理——献给了神明。

人们在古代遗留下来的贝冢等遗迹中找到了许多鲈鱼的骨头。显而易见，鲈鱼自太古时期起就是人们常吃的一种鱼。处于不同生长时期的鲈鱼，叫法也存在差异。比如，在东京和附近地区，从小鱼苗到长成大鱼，人们分别把不同成长期的鲈鱼叫作“コッパ”（木端）、“セイゴ”（生后）、“フッコ”、“スズキ”（鲈）。而超过二尺（六十厘米）的大鲈鱼则被称为“オオタロウ”（大太郎）。

平曲中有一首以“鲈”为题的曲子。平曲，中世纪歌谣的一种，是以琵琶为伴奏，为《平家物语》谱上曲调来进行演绎的一种艺术形式。《鲈》这首平曲的大致内容如下：

平清盛任职安艺守期间，曾乘舟从伊势来到熊野参拜。那时，一条大鲈鱼飞进了船里，平清盛大喜。正如白鱼飞进周武王的船中一样，这一景象被视作吉兆。于是，尽管在参拜途中应斋戒吃素，但平清盛仍亲自料理了这条鲈鱼享用，他不光自己吃，还款待了其他人。

最终，平清盛以保元·平治之乱的战功升任正三位参议，然后又从参议升至纳言、大臣，并迅速当上了大政大臣。凭借平清盛的出人头地，平家宗门也得以光前裕后。

鲈鱼不管是做成生鱼片还是烤着吃，都颇为美味，在垂钓者之间也有着颇高的人气。最近，日本十分流行用毛钩钓鱼。鲈鱼一旦咬上钩，便会剧烈地挣扎，这时只要稍稍放一些鱼线，鲈鱼便会本能地疯狂扭动，而鱼线就会挂在鲈鱼的鳃上，这时鲈鱼有可能用鳃割断鱼线逃脱，这被称作鲈鱼的“エラ洗い”（洗鳃）。所以，古代人们使用延绳钓等钓法钓鱼时，即便有大鱼上钩，想必在最终钓上来之前也是有一番波折的吧。

被天宇受卖割嘴的海参

《古事记》中关于“迩迩芸命”，也就是天孙琼琼杵尊降临的故事中，还有一段颇为有趣的内容。遵照迩迩芸命的吩咐，送别猿田毗古后踏上返程的天宇受卖（天钿女命）收集了形态各异、五花八门的鱼类，并问它们：“你们会侍奉天神之子迩迩芸命吗？”这时，大部分鱼都回答称“我会的”。只有“海鼠”也就是海参没有作答。于是天宇受卖便质问道：“这嘴是无法回答的嘴吗？”随即用小刀割开了海参的嘴。所以直至今日海参的嘴仍是当初被割裂的样子。

海参也是自古便被人类食用的一种动物，并被纳入古代天皇的膳食。《延喜式》中便出现了在九月的神尝祭上为伊势的大神宫和度会宫提供干海参的记录。

顺便一提，过去日本人将海参称为“コ”，其中生海参叫“ナマコ”（海鼠），用火烤成的鱼干叫“イリコ”（熬海鼠），而晒干的叫作“ホシコ”（干子）。晒干的海参卵巢被视为等同于海参的孩子，所以被称为“コノコ”（海鼠子）。而腌制的咸辣海参肠因为用到的是海参的肠子，所以被称为

“コノワタ”（海鼠肠）。

此外，“海鼠”在日语中也可写作“海参”或“海男子”。人们认为“熬海鼠”或“干子”都是能滋补身体的食物，而这种思想似乎与其形状有关。《五杂组》便称海参“形似男子之势（阴茎），其药性可温补，匹敌人参”。

海幸彦与山幸彦的故事也是妇孺皆知。故事大致讲述的是：火远

里命（山幸彦）弄丢了兄长火照命（海幸彦）的钓针，为了寻找丢失的钓针，山幸彦前往海神之国，后来又与海神的女儿丰玉比卖结为夫妇。这个故事可以说是《古事记》中最具有文学性的抒情物语了。

在海神国幸福地生活了三年的山幸彦每当想起必须要找回兄长的钓针时，就会唉声叹气。于是，丰玉比卖的父亲绵津见神便召集了海里的鱼，询问这根钓针的下落。诸鱼曰："顷者，赤海鲫鱼，于喉鲠，物不得食愁言，故必是取。"于是便从这条"赤海鲫鱼"的喉咙中取回了钩针。这条"赤海鲫鱼"就是赤鲷。一般情况下，如果只是说"海鲫鱼"，往往指的是黑鲷。而在《日本书纪》中吞下钓针的鱼则是"口女"（くちめ），即鲻鱼。

赤鲷、黑鲷以及鲻鱼对于古代日本人而言，均为非常珍贵的鱼，而能够钓这些鱼的钓针也是极其宝贵的物品，这一点我们通过这则山幸彦与海幸彦的故事也能有所了解。

这则物语的故事原型其实是从印度尼西亚或美拉尼西亚一带传入日本的，该故事与日本的龙宫传说以及浦岛传说也有一定的关系。据说类似的故事在中国等地也有流传。

以鲇鱼占卜的神功皇后

在《日本书纪》第三卷《神武天皇》中，有一则神武天皇在吉野川的支流——丹生川以鱼占卜的故事。他预言道："若让此河中的鱼醉酒，如树叶漂浮于河流那般，我就能平定这个国家。"于是便将御神酒的酒壶扔进了河中，接着就看到大大小小的鱼嘴一张一合地浮了上来。

通过鱼来占卜战争胜败的故事还出现在《日本书纪》第九卷《神功皇后》这一部分中。

四月上旬，正是初夏时节，打算出兵新罗的神功皇后来到了火前国（肥前国）松浦的玉岛，于小河畔用膳。这时，神功皇后拿出一根针，弄弯做成钓钩，并将饭粒挂在钓钩上做成钓饵，垂钓来请示神意。她心中默念："如果我所求之事能够成功，河里的鱼啊，就请上钩吧。"而最后真的有条鲇鱼上钩了。那时，神功皇后称此鱼"珍しい"（めずらしい，意为珍奇罕见），随后这片土地也被人们称作"梅豆邏国"（めずらのくに，音近"珍奇"一词）。而"梅豆邏国"此后又被人们叫作"松浦"，那里的女性每年四月上旬都会进行垂钓。

据说，日语将“アユ”（即鲇鱼）对应的汉字写作一个“鱼”字旁和一个“占”组成的“鲇”，抑或写成“年鱼”，是出自《日本书纪》的记录。并且，因为“鲇”的读音使用了“アユ”，所以“ナマズ”对应的汉字便定为“鯰”了。《和名类聚抄》已将“鲇”的发音标作“アユ”，将“鯰”标作“ナマズ”。由此可见，日本人自很久以前便已将二者进行了区分。

鲇鱼是日本颇具代表性的河鱼。因鱼肉不但没有腥味还具有一股独特的风味，也被人们叫作“香鱼”，自古便是人们餐桌上的美食。鲇鱼在每年初夏逆流而上，秋季又顺游而下产卵后死去。这也是人们将鲇鱼称为“年鱼”的原因。

据《延喜式》的记载可知，当时每年都有许多国家进贡鲇鱼。在日本各地出土的木简上关于贡品的记载中也有很多关于鲇鱼的内容。

自平安时代以来，宫廷的庆祝宴席上一定会有一道鲇鱼料理。比如，“押鲇”、“盐鲇”（两者均为盐腌鲇鱼）、“鲇烧物”（烤鲇鱼）、“鲇鮨”（鲇鱼寿司）等。这其中“鲇鮨”也就是鲇鱼寿司的制作使用的是初夏捕获的鲇鱼，人们要先将鲇鱼放入筒中腌制发酵，等到秋天以后再食用。在公家和武家，这种鲇鱼寿司曾是相互馈赠的礼品之一。

在镰仓时代出版的《沙石集》中，记述了有关东北地区的农民捕捞鲇鱼做成寿司的内容。由此可见，自那时起鲇鱼的食用已普及到了各个阶层。

到了近代，江户地区的多摩川是鲇鱼的著名产地，这里每年都会进贡鲇鱼供将军食用。进贡鲇鱼的天领村还因此从幕府那里获得了一定的渔业特权。此外，在各个大名的领地内，如果捕获了鲇鱼，都要献给藩主，有些地方甚至还设置了禁渔区域。而获准捕捞鲇鱼的村子须缴纳“鲇运上”（租税的一种），别的村子的渔业者也需要缴纳一定的捕鱼费用。

自古以来，人们会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捕捞鲇鱼，这些捕鱼方式大多利用了鲇鱼独特的生态习性，并由此逐渐形成各个时节的风物诗，流传至今。

初夏时节，开始逆流而上的鲇鱼仍处于杂食状态，什么都吃，所以正如神功皇后的传说中所述，人们可以用钓饵钓到鲇鱼。但到了梅雨季节，鲇鱼会吃附着在石头上的水垢并渐渐长大，这时用钓饵就钓不到鲇鱼了。于是人们发明了被称为“友釣り”（活饵垂钓）的钓鱼方

式，这种方式充分利用了鲇鱼会对侵入自己地盘的其他鱼发起攻击的特性。此外，还有训练鹈鹕来捕捉鲇鱼的方式，这也是非常独特的一种捕鱼方式。《隋书·倭国传》中已经出现了饲养鹈鹕的记载，由此可见，日本在很久以前便已有了这种捕鱼方式。

初秋时节，鲇鱼开始顺流而下。这时人们会采用“簗”（鱼梁），也就是筑堰拦水的方式来捕捉鲇鱼。十四世纪前后创作的《石山寺缘起》中便有一幅描绘鱼梁架于宇治川的画作。到了江户时代，“簗场料理”一度十分流行，那时日本各地的河川上都架起了鱼梁，人们会将捕获到的鲇鱼当场料理后食用。

现在虽然还能在日本各地看到这些风物诗，但捕捉到的鲇鱼几乎都是人们放养的，野生的鲇鱼已经几乎看不到了。

三　江户的垂钓与观赏鱼

以垂钓为乐趣始于江户时期

鱼，对于日本人来说，自绳纹时代起便是宝贵的食材，也是维持生存的重要食粮之一。日本人不仅仅食用鱼肉，剩下的鱼皮、鱼骨也会物尽其用。比如，人们会将鲨鱼或丝背细鳞鲀（カワハギ）的鱼皮等制作成刷子或用于其他用途；还会将各种鱼的骨头或牙齿等做成针或装饰品；而沙丁鱼干甚至被人们用作肥料。所以，渔捞自古便成为人们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一环。

渐渐地，随着生活的富足，人们开始将垂钓作为兴趣，或者为了观赏而养鱼。甚至还会培育出专门供观赏用的鱼品种。而这些正是我们所说的文化。

随着钓钩的出土，人们已知自绳纹时代起，祖先就开始使用垂钓这种捕鱼方式了。正如前面所讲，从《古事记》的“延绳钓”方法钓鲈鱼的故事、山幸彦弄丢哥哥海幸彦钓钩的故事，均可以看出弥生时代以后垂钓的兴盛。

但垂钓作为一种爱好而广泛兴起，则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了。在平安时代的贵族宅邸，院子的池塘边会建起一个被称为“钓殿”的小亭子，但这个小亭子是供贵族们享受垂钓乐趣的可能性其实不大。人们普遍认为钓殿是受中国影响，模仿“钓鱼台”而建造的亭子。古时候中国的王公贵族会将大池子或湖泊直接用作园池，以架桥连接小岛或岬角，以这种形式打造了诸多的建筑。王公贵族会泛舟湖水上，赏景游玩。“钓鱼台”，正如其名，当初应该也是他们用来享受钓鱼乐趣的地方吧。

虽然不能绝对确定地说平安时期的贵族不以垂钓为乐趣，但从当时的文献以及绘卷等文物中确实找不出平安贵族享受垂钓的证据。

进入江户时代，在宽文年间（1661年—1673年），以江户为中心，武士和老百姓也开始热衷于垂钓。到了元禄时代（1688年—1704年），垂钓变得更为盛行，人们甚至开始研究钓鱼的工具或方法。据说，曾有一位大名在江户本所竖川的河渠岸边立起金色屏风，在金银镶嵌的钓竿上绑上吉原地区（东京都台东区浅草北部，原为妓

院区）妓女的头发作钓丝，钓黑腹鳑（タナゴ）等小鱼为乐。但这则说法其实有些不太可靠。因为即便是在江户时期，也是到了后期才开始出现一些风流人物以女性的头发钓黑腹鳑。

人见必大（1642年—1701年）所著《本朝食鉴》中的《鳞介部》中曾描写了人们钓沙鲮和鰕虎鱼的场景。“在江都的芝浜、品川、中川，到了七八月，客官和商人会乘坐装饰华丽的游船，举办玩水活动，大家比赛垂钓。这也正是武江上的一种优秀的娱乐项目。”而关于钓鰕虎鱼的场景则记述道：“江户的士民、收藏家、好玩之人等皆撑杆驾扁舟，穿戴蓑笠，带一壶茗酒。将钓竿一横，令钓丝垂入水中，比赛钓鱼。此乃江上之闲凉、忘世之乐趣。”

《生类怜悯令》

作为一种嗜好的钓鱼先是在大名或武士之间流行，随后传至富裕的江户市民之间。不，应该说连不富裕的江户人也会抱着既有乐趣又可以钓到鱼的心情，一手拿钓竿、一手拿鱼笼，来到海边或河渠。当时的钓竿基本都是用一整根布袋竹（ほていちく）制成的竹竿。虽然市面上也出现了一些经过精雕细刻的竹钓竿，但由于价格高昂，能拥有这种钓竿的人仅限于大名或富商。

到了江户中期的江户地区，垂钓突然间急速普及，是有原因的。面朝江户湾的港湾得以修建，河口等其他邻水区域的护岸工程也得以推进，因此到处都是可垂钓的地方。再加上为了方便物资的运输，河渠网也得以发展，所以垂钓的场所急剧增多。并且，从这时期开始，“钓舟”出现了。商家通过拼船或租借的方式，吸引想要垂钓的客人。于是，过去只有专业的渔夫才能前去的地方，渐渐发展到平常人也可以带着钓竿去垂钓了。当然垂钓的迅速普及与人们消费的大幅提高是分不开的。

然而，进入元禄时期，江户地区的人便无法再垂钓了，原因是五代将军德川纲吉所颁布的《生类怜悯令》。《生类怜悯令》颁布于贞享四年

（1687年），最初禁止人们虐待猫狗等动物，随后渐渐升级，甚至连对鱼和昆虫的杀生都遭到了禁止。到了元禄六年（1693年），又出台了禁止垂钓和禁用钓舟的法令。那时，江户城中，鱼贝类已经不再是厨房的食材了。江户人不仅仅无法享受垂钓的乐趣，就连食用鱼贝类都受到了限制。这对于经营鱼店的人和靠捕鱼为生的渔夫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打击。

但人们始终无法割舍曾经从垂钓中获得的乐趣。所以那时有不少人偷偷地进行垂钓。在江户时期的随笔《窗之游》（『窓のすさみ』）中有下面这样一段描写：

宝永五年（1708年）七月，“御家人”[38]爱久保弥太夫在钓鱼的时候被人发现并被逮捕。接受调查的弥太夫说道：“我虽知晓禁令的存在，但（钓鱼）是我自年轻时的爱好，刚才我实在忍不住了，才在公务期间违反了禁令。”当被问到是从何处得到的钓钩时，弥太夫回答称：“我自年轻时便擅长此事，（中略）此乃出自我自己之手，世人称之为‘爱久保流’并模仿其制作。”也就是说爱久保弥太夫被抓住后非但不胆怯，反而还炫耀起了自己的钓钩。随后，弥太夫要接受审讯，便被转移到了小传马町。但在等待审讯期间，将军纲吉于宝永六年一月十日（1709年2月19日）去世。《生类怜悯令》随即被废止，而弥太夫也得以释放。

女性的垂钓

禁令一解除，垂钓便再度盛行起来。正如日本的谚语“釣りする馬鹿に見る阿呆”（比起钓鱼的人，在旁边看别人钓鱼的人更闲）所说，到处都能看到垂钓之人。日本还有一个俗语是“釣り好きは子を飢えさす”（爱钓鱼的人让孩子挨饿），正如这个说法所描述，那时沉迷于钓鱼的人甚至都顾不上工作和家庭了。甚至还有说法称“釣りは道楽の行き止まり”（钓鱼是嗜好的尽头）。

那时，日本出版了许多关于钓鱼的书籍或是对钓鱼场所的介绍等。享保八年（1723年），一个名叫津轻采女正的“旗本”（江户幕府时期武士）创作了一本名叫《何羡录》的书，这也是日本最早的钓鱼指南。书中详细介绍了春、秋两季在江户湾钓沙鮻的场所，并将如何看天气以及钓竿、钓钩、钓丝、钓锤等与垂钓相关的内容分三卷进行了整理和汇总，可以说是一本集垂钓秘诀之大成的著作。

自《何羡录》以后，以玄嶺老人的《渔人道知边》（1770年）与里旭的《于加钓手引草：暗之明里》（1788年）为首，又相继出版了从钓鱼入门书籍到钓场指南等在内的各种各样的相关著作。

在这些著作中出现的江户前期的鱼种类也十分丰富。如沙鮻、鰕虎鱼、鲽鱼、小鳞沙鮻（アオギス）、章鱼、狗母鱼（エソ）、牛尾鱼（コチ）、鲹鱼、小银绿鳍鱼（ホウボウ）、箱根三齿雅罗鱼（ウグイ）、小鲷鱼（コダイ）、白姑鱼（イシモチ）、黑鲷、河豚、大泷六线鱼（アイナメ）、小鲈鱼（セイゴ）、褐菖鱼（カサゴ）、鲻

鱼、牙鲆（ヒラメ）、青花鱼、鲈鱼等都有登场。

天保年间（1830年—1844年），鲣鱼、鲯鳅、真鲷等大中型鱼也成了非职业渔夫的垂钓对象。据说为了钓到这些鱼，那时甚至还兴起了大家一起拼船去海上钓鱼的风潮。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女性也开始以垂钓为乐。寺门静轩的《江户繁昌记》（1832年—1836年）中就描写了永代桥下乘坐小舟的女性和孩子因钓鳗鱼而气氛欢跃的情景。此外，歌川丰国（1769年—1825年）创作的锦绘《夕凉永代桥游鱼图》中也描绘了三个俊俏的年轻男子与被推测来自花柳场所的两名女子一起乘坐小舟的情景，其中各有一名男女在垂钓。图中的钓竿上还拴着浮木，似乎是在钓鰕虎鱼。

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性会登船出海钓鱼，所以现在很多船上都设有女性独立的卫生间。但直到昭和三十年代，出海钓鱼的船上都没有厕所，所以女性几乎无法随船出海。

那么，江户时代乘舟去垂钓的女性到底是如何上厕所的呢？虽然我并没有找到这方面相关的史料，但没准那时候的女性就是将和服下摆一撩，在船尾撅起屁股如厕的吧。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江户时代，道路两旁埋有尿桶，而男女都是在那里上厕所的，并且尿桶旁边也没有围挡。当时男人在尿桶边如厕时面朝前，女性则转过身去撅起屁股方便。当时有专门管理这些尿桶的人，他们会将尿液收集起来用作肥料。

说起“便所”，即便是江户地区市中心的长屋，也是男女共用一个厕所，可以说相当开放了。在当时，如果将厕所建造成如现代这般全封闭的空间，那臭味便散不出去了。现在普遍认为，当时的女性在这方面并没有那么强烈的羞耻心，所以敢在公共场所上厕所。顺便一提，当时的“钱汤”（大众浴池）也几乎是男女混浴。以伤风败俗为理由，江户町奉行曾多次发布禁止混浴的禁令，但即便钱汤将入口改为男女分开，但泡澡的池子仍是连着的，所以依然是换汤不换药的男女混浴。

话题似乎有些跑偏了，那让我们最后回到正题。

不论如何，江户时代兴起的钓鱼热潮在之后几乎从未衰退，直到现在仍有许多钓鱼爱好者。虽然这期间钓鱼的工具和垂钓方法有所进步，但通过当时有关书籍的记载可知，垂钓者的心理从古至今始终如一。

金鱼传自中国、锦鲤为纯日本产

鱼，食之为乐，钓之为乐，观之亦为乐。最近，各地都建造了大型水族馆，人们可以在里面观赏到世界各地的鱼。而将鱼饲养起来进行观赏的做法其实古已有之。

在《日本书纪》景行天皇四年这一条中，出现了一则在美浓国的泳宫观赏朝夕池中的鲤鱼的故事。也就是说在奈良时代的养老年间（717年—724年），贵族就已经开始在庭院的池子里饲养鲤鱼以供观赏了。平安时代贵族的庭院也设有泉池，而寺院的庭院中更是开始建造“心”字池，这些池子里饲养的都是鲤鱼或鲫鱼。

实际上，这些池子并非只为了观赏鲤鱼或鲫鱼而建造。那时的人们将池塘作为装点庭院的一个要素，而在池中畅游的鱼自然成了观赏之物。

渐渐地，人们开始培育色彩鲜艳的观赏鱼。金鱼和锦鲤便是这样来的。

金鱼，于三世纪至五世纪期间，在中国南部作为鲫鱼的一个变种出现，后经改良形成了金鱼这一品种。也有说法称金鱼的故乡是中国浙江省杭州的西湖或浙江省嘉兴的南湖。

“和金鱼”（ワキン）这种最常见的红白金鲫因其名称，往往被认为是日本的特产，但其实并非如此。和金鱼、凸眼金鱼、琉金等金鱼品种其实都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不过江户时代以后，由日本改良培育出的金鱼品种也不少。

据《金鱼养玩草》（1748年）或《金鱼名类考》（1796年）记载，金鱼最早是在日本战国时代前期的文亀二年（1502年）正月传入日本的，传入地为日本泉州的堺这一地区。

到了江户时代，金鱼养殖渐渐普及，一般老百姓也开始饲养金鱼。但在江户初期，由于金鱼的价格高昂，能够养得起的只有将军、大名或者富商等权贵。到了江户中期以后，江户地区的老百姓首先开始饲养金鱼，渐渐地金鱼也普及到了寻常百姓家。

延宝年间（1673年—1681年）出现了养殖金鱼用以贩卖的“金鱼屋”。应该也是自这时起，日本各地专门的金鱼养殖业规模越来越大。

大和郡山市至今仍是日本著名的金鱼产地，而这里的金鱼养殖始自享保九年（1724年）。这一年，柳泽吉里从甲斐府中移封到郡山藩做了藩主，他让家臣饲养自己带来的金鱼。而这也被认为是大和郡山市金鱼养殖的开端。柳泽吉里是五代将军纲吉的“侧用人”（将军近侍的最高职）——柳泽吉保的儿子。一名曾是纲吉侧室的女子来到柳泽吉保家成了柳泽夫人，并生下了柳泽吉里。但也有传闻称柳泽吉里是纲吉的儿子。

到了宝历年间（1751年—1764年），江户地区贩卖金鱼的小摊子随处可见。宽延元年（1748年）出版的《金鱼养玩草》是一本饲育金鱼的入门手册，颇受欢迎。到了明和期（1764年—1772年）以后，锦绘中大量出现金鱼的图案。据悉，小商小贩扛着两头挂有金鱼桶的扁担走街串巷卖金鱼也是这时开始出现的。

到了文化、文政时期（1804年—1830年），沿街叫卖金鱼的行当成了江户地区夏季的风物诗。从锦绘中可以看出，这时已经有了装金鱼的透明玻璃——“金鱼钵”。但由于价格较高，只有有钱人能买得起。而卖金鱼根深蒂固地成为民间风物诗则是明治时期以后的事情了，这是因为自那时开始，玻璃金鱼钵才得到普及，价格也降到了老百姓能负担的水平。

我们接下来看看几个跟金鱼有关的谚语。

日语中“金魚に孑孓”（把孑孓放在金鱼旁边）与“猫に鰹節”（把鲣鱼干放在猫旁边，常用来比喻如同让小偷看守仓库一样危险）意思一样，因为孑孓是金鱼最爱吃的东西。而“金魚の糞”（金鱼的粪便）至今依然很常用，经常用来揶揄总是跟在上司后面的跟屁虫。“金魚の刺身”（金鱼做的生鱼片）这个说法则用来形容那些外表看似不错，实则不能吃的东西，此外也常用以形容漂亮的妓女不好对付。而“金魚の小便”（金鱼的小便）则用来表示做了坏事却依然面不改色，也就是“いけしゃあしゃあ”（恬不知耻、若无其事）的诙谐说法。

金鱼来自中国，与之相对的锦鲤则是纯日本产的观赏鱼。在淡水鱼中，像锦鲤这般每一条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图案且色彩如此鲜艳的鱼，恐怕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种了。

锦鲤在日本也被称为“色鲤”或“花鲤”，其来历目前尚无定论。但一般认为自大正三年（1914年）于东京上野公园举办的“东京大正博

览会”上，由新潟县东村展出的“红白”（白色身体上有着红色图案的锦鲤）广受好评后，这个品种才逐渐得以发展。

江户中期，以越后小千谷为中心的旧二十村乡附近雪山的水塘中就饲养了色鲤。据说，人们将突然发生变异的红鲤鱼和浅黄色的鲤鱼一点点地进行改良，才有了现在的锦鲤。天明饥馑时期（1782年—1787年），干旱导致村子里的水都枯竭了，色鲤也相继死去，面临着灭种的危机。当然，也可能当时有人为了充饥偷偷捉走了水塘里的色鲤。于是，村里人将还活着的色鲤全都转移到不会干枯的盐谷千龙池，由此避免了色鲤的灭绝。也因此，直到今日我们还能一睹闻名世界的锦鲤。

很多人可能都知道，来自新潟县的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也曾在自家庭院的池子中养过许多昂贵的锦鲤。看来，锦鲤已成为越后人的骄傲。

金鱼与锦鲤都属于鲤科，但作为观赏鱼在品种改良的过程中，金鱼主要在形体上发生变化，而锦鲤主要在色彩上发生变化。未来究竟还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四　鱼的岁时记

点缀早春夜晚海面的“白鱼渔”

佃岛的“白鱼渔”（捕捞银鱼）是早春的江户风物诗之一。夜晚，从隅田川的河道到佃岛甚至一直延伸到永代海上，都能看到星星点点燃起篝火的捕鱼船。据说，一旦过了春分，银鱼开始怀卵，味道就远不如之前鲜美了。所以渔夫要乘着尚吹着寒风的海浪出海，用捕鱼网捕捞银鱼。江户的青楼女子会在高轮或品川附近的青楼二楼远眺海上那星星点点的“白鱼火”，并以此为乐。

这番将早春的江户之夜装点得颇有情趣的景象一直延续到了明治以后。河竹默阿弥在歌舞伎剧目《三人吉三》的“大川端”这一场中写下了一句著名的台词——“月色亦朦胧，白鱼篝火雾荧荧，初春夜来到”。这句描绘了初春时节，天空微微发白、月色朦胧之景的歌舞伎台词可谓家喻户晓。这里的“大川”其实就是隅田川的通称。

到了江户时代以后，人们才开始食用银鱼，此前的文献与和歌中几乎从未出现过对银鱼的描写。江户时代，佃岛的渔师森一族曾独占银鱼的捕捞，并流传着下面这样一则传说。

随同德川家康入府江户、摄津国佃村（现大阪市西淀川区）的名主森孙右卫门带领着三十余名渔夫移居到了隅田川口的江户湾上的一座小岛（佃岛），并得到了江户河口以及江户湾的渔业权。作为回报，森孙右卫门有义务每天向江户城进贡鱼贝类，并且要不断地汇报出入江户湾的船只以及海边的情况。据称，森一族与德川家康的交往是从天正十年（1582年）本能寺之变后，德川家康通过“伊贺越”[39]摆脱了危机后开始的。

某年冬天，在森一族捕鱼的时候，河口附近有一条雪白的鱼进入渔网中。人们定睛一看，发现鱼的头部有着“葵纹”（德川家康的家纹）般的图案。于是，森一族赶紧将此鱼献给了德川家康。德川家康大喜，赞赏道：“此乃白鱼，我在三河的时候常吃这种美味的鱼。在江户的海里也能捕到此鱼，这是非常好的吉兆啊！”于是便赐予了森一族独占银鱼捕捞的权利。德川家康在世时，人们既不能捕捞银鱼，也不能在岸边进行银鱼买卖，但随后这一禁令被解除。颇喜欢稀奇物

什的江户人立刻就喜欢上了银鱼，人们一度争先恐后地购买之。而从佃岛向将军家进贡银鱼的传统也一直延续了下来，身穿“袆”（江户时代的礼服）的佃岛渔夫会用专门的箱子装好银鱼进行运送。据说，那时运送银鱼的渔夫即便跟大名的队伍抢路也不会受到责罚，可见其地位之高。

但这则故事难免令人感觉森一族有夸夸其谈、自吹自擂的嫌疑。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森一族希望通过这个故事来强调自己的氏族与将军家的关系，也可以看到他们借此将自己的族人独占银鱼捕捞的行为正当化的意图。

顺便一提，森一族确实从将军那里拜领了日本桥小田原町的河岸地，这一地区后来也发展出了十分繁荣昌盛的渔业。

自江户时代以来，深受将军家喜爱，随后又在江户民间引发追捧热潮的银鱼，如今在东京湾却渐渐捕捞不到了。这是因为人们建造起的水泥护岸和被污染的河水，导致隅田川早已不适合银鱼的栖息与繁衍。

最后，将与银鱼有关的两首俳句献给大家。

明ぼのやしら白魚きこと一寸

（黎明天际白，洁白如银之白鱼，仅有一寸长。）

——松尾芭蕉

白魚のどっと生まるるおぼろかな

（小小银白鱼，初夏成群产鱼卵，月色朦胧时。）

——小林一茶

不知曾经描绘了银鱼的松尾芭蕉和小林一茶看到现在的隅田川，又会作何感想呢？

春季的代表性鱼还有“鰊”（にしん），即鲱鱼，在日本也被叫作“春告鱼”。每年一到春天，为了产卵，鲱鱼会成群来到北海道的西海岸，日语中将此称为“鰊群来”。鲱鱼群游来的时候，海面一带会被它们的卵和精子整个染成乳白色。

春天的时候，很多渔民会专程来到北海道出海捕捞鲱鱼。这些颇具“季节性”的渔民主要是来自东北地区的渔夫或农民。但近几年，这些捕鲱鱼的渔民却失去了大展身手的舞台，因为鲱鱼已经不再游到日本近海来了。曾繁荣一时的“鰊御殿”（过去捕捞鲱鱼的渔民建的住宅）也早已人去楼空，只剩下腐朽的建筑了。鲱鱼群今后还会再游来这里吗？

在春季樱花盛开之时捕捉到的真鲷（加吉鱼）也被称作“樱鲷”或“花见鲷”。这一时节，真鲷为了产卵，来到内海的浅海区域。而此时它们因体内荷尔蒙的作用，肉质极其鲜美，肉色也如樱花般娇艳，因此得名“樱鲷”和“花见鲷”。

鲷鱼自古便因其鲜红、绚丽的外表而深受日本人的喜爱。七福神中的惠比寿右手持钓竿，左手抱着表示吉祥的鲷鱼的形象便是最好的印证。

而头尾均保存完好的鲷鱼被视作吉祥之物，并被称作“鱼中之王”，则出现在江户时代以后。因为那时的武家很忌讳切或砍这样的行为，所以才会将一整条鲷鱼呈上宴席。此外，江户时代以后，人们也开始将鲷的发音“タイ”与表示可喜可贺之意的“めでたい”视为谐音，更赋予了鲷鱼吉祥之意。

此外，在日语中与鲷鱼有关的谚语也有很多，比如“腐っても鯛”（就算腐烂了那也是鲷鱼，用来形容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和“海老で鯛を釣る”（用虾钓鲷鱼，常用来表示一本万利或吃小亏占大便宜）都是很常用的谚语。不过，鲷鱼喜欢吃虾是事实，特别是产卵之前，它们会吃掉大量的虾。据说这也是鲷鱼通体呈红色的原因所在。虾被煮熟后会变红，这是因为虾的体内含有一种叫作虾青素（astaxanthin）的色素。因此，鲷鱼的肉质泛红，实际上和它的饮食特性有关。

此外，在日语中带“鲷”字的鱼中仅有三种属于鲷科，分别是真鲷、黄鲷和血鲷，但还有诸如黑鲷、念佛鲷、石鲷等带“鲷”字的，种类竟能超过二百种的鱼，后者不过是模仿“鱼中之王”鲷鱼取了名字罢了。近代以后日本人对鲷鱼的喜爱，从这二百多种鱼的命名中也能略见一二。据说，直到现在，如果人们将西洋产的鱼命名为“某某鲷”，往往会卖得很好。

江户人热衷的“初鲣”与“土用鳗”

目には青葉山ほととぎす初鰹

（青叶映入目，初夏杜鹃鸣翠山，品啖鲣鱼鲜。）

——山口素堂

かまくらを生きて出でけむ初鰹

（镰仓到江户，初鲣运来献德川，鱼儿美名传。）

——松尾芭蕉

江户地区的人究竟是从何时开始对食用“初鲣”（指每年春末夏初北上的鲣鱼）着迷的呢？《庆长见闻集》中便有记载称，“鲣乃胜利之鱼，古文中曾记载有先例，遂众武士出发前的酒肴皆用鲣鱼”。在日本战国时代的小田原北条氏管辖区域，武士迷信鲣鱼能为自己带来胜利，所以非常喜欢食用鲣鱼，这也被认为是人们喜食鲣鱼的开端。

初夏时节，鲣鱼会随着黑潮洄游，当年最早捕获的一批鲣鱼被人们视为珍品。据说，那时的江户人对鲣鱼的热衷甚至到了“即便把妻子当掉”也要换鲣鱼吃的程度。江户的鲣鱼主要是在镰仓和小田原一带钓到的鲣鱼，正如松尾芭蕉在俳句中所写，人们为了保持鲣鱼的新鲜度，需要尽快运输。早晨钓到的鲣鱼，经过快马加鞭地运输，晚上就送到江户了，这种鲣鱼被称为“夜鲣”。而且比起陆路，海路其实更快，所以人们对鲣鱼的喜爱也促生了将生鱼尽快运送到江户的船运业的发展。

“初夏时节捕初鲣，摇船人手如百足[40]”这句川柳描写的便是运送初鲣的渔船。即便如此快马加鞭，心急的江户人还是等不及，甚至有人乘船来到品川岸边，等待运货船的到来。据说当时来到岸边等待的江户人在看到运送鲣鱼的船只靠岸后，不等船夫卸货便立刻扔一两钱到渔船上，让渔船上的人扔一条鲣鱼给自己，然后赶紧拿着买到的最新鲜的鲣鱼跑回去炫耀。那时候还没有芥末，人们大多是蘸着酱油，吃鲣鱼剁碎后的鱼肉。

接下来我们再谈谈另一种夏天必须提到的鱼——“土用鳗”。虽然随着冷冻食品的发展，时至今日人们不再似当初那般热衷于初鲣，但“土用鳗”可是至今仍保持着超高的人气。

鳗鱼的营养价值很高，自古以来，人们在夏天因酷暑闷热而食欲不振时，就会食用鳗鱼。《万叶集》卷十六中，大伴家持曾作和歌曰：

石麻呂にわれもの申す夏瘦せに

よしといふものぞむなぎとりめせ

（告之石麻吕，消夏去暑有良药，且啖武奈伎。）

其中的“武奈伎”（むなぎ）便是鳗鱼的古名，据传该名称是因野生鳗鱼的腹部呈黄色而得。关于“鰻”（ウナギ）的语源，落语给出的说法是：鹈鹕（ウ）虽然很容易就能抓住鳗鱼，但吃的时候却犯了难（なんぎ）。

而日本人在“土用丑日”[41]吃鳗鱼的习惯据说来自江户后期一家鳗鱼店提出的想法。曾有一家鳗鱼店的老板与熟客大田蜀山人（大田南亩）说起如何吸引客人来吃鳗鱼的话题，于是便想出了立一块“今日乃土用丑日”牌板的创意，并大获成功。但也有人称这个创意来自平贺源内提出的“今日是土用丑日，是鳗鱼日”这句标语。不论这个说法到底是谁先提出来的，总之确有其事的是，江户人为了防止夏季倦怠不适而吃鳗鱼，从而使鳗鱼店生意兴隆。

另外，“蒲烧鳗鱼”（烤鳗鱼串）在关西的做法是从鱼腹部剖开，而在东京则是从背部剖开。据说，后者延续了作为武士之乡的江户的习惯，因为武士是很忌讳“剖腹”这件事的。

鰯是紫式部的最爱？

秋高气爽的天空与“鰯云”（鱼鳞状卷积云）可谓相得益彰。由于这种卷积云看起来确实很像“鰯”（沙丁鱼）成群游动的样子，日语才称其为“鰯云”，亦叫“鳞云”或“鲭云”。这种将天空视作大海、将云朵视作鱼群的体悟可以说非常日式了。

由于沙丁鱼古时候被人们定位为下等鱼，因其“いやしい”（低贱卑微），所以取谐音“いやし”（鰯）作为名称。此外还有说法称，因为人们认为沙丁鱼“よわし”（弱小），所以名字才取其谐音“いやし”。沙丁鱼的日文汉字写作一个“鱼”字旁加上一个“弱”也是这个原因。

但其实沙丁鱼是一种富含营养且肉质鲜美的鱼，完全不应受到当初那般轻视。这可能是因为古时很容易捕捞到大量的沙丁鱼，而物以稀为贵，于是沙丁鱼才被人们轻视了吧。尽管看不起沙丁鱼，但古人仍知道沙丁鱼的美味。江户时代编纂的《和训栞》中便记载了下面一

则故事。

某天，紫式部吃了沙丁鱼，自此便再也无法忘怀那份美味。但当时的贵族都将沙丁鱼视为卑贱的鱼，所以紫式部无法公然食用。于是，她便趁着丈夫藤原宣孝外出的时候，偷偷烤了沙丁鱼来吃。但外出归来的丈夫闻到了沙丁鱼的味道，责备了她。于是，紫式部立刻以和歌回应道：

日の本にはやらせ給ふいはしみず

まゐらぬ人はあらじとぞ思ふ

（普天之下，无人不拜石清水［八幡宫］，无人不食味美鱼［沙丁鱼］。）

紫式部的意思是：只要是日本人都会去石清水八幡宫参拜，同理，只要是日本人都会吃沙丁鱼。自那以后，宫中女官便将“紫”用作沙丁鱼的隐语。但《猿源氏草纸》却将这个故事安在了和泉式部身上。不过，不论这件事到底发生在谁身上，故事本身都包含着对不吃沙丁鱼这般美味之鱼的上流阶级的一种嘲讽，同时也对沙丁鱼的美味进行了宣传。此外，也有说法称，之所以将沙丁鱼称为“紫”，是因为沙丁鱼聚集在海面时，原本蓝色的大海会呈现出紫色，即“藍（あい）に勝る”（胜于蓝），这与“鮎（あゆ）に勝る”（胜于鲇）谐音，所以才得此名。

秋刀鱼也是秋季颇为常见的一种鱼，同样颇为美味。而秋刀鱼同沙丁鱼的命运也颇为相似，都曾长期被人们视作下等鱼。据《梅翁随笔》，在明和年（1764年—1772年）之前，几乎没有人吃秋刀鱼。直至安永元年（1772年），有家鱼店大打“价廉且身长为秋刀鱼也”的宣传，这种鱼才开始受到平民阶层的喜爱。但当时很多带有偏见的武家依然不肯吃秋刀鱼。

古典落语《目黑的秋刀鱼》颇为著名。某日，将军外出鹰猎，于目黑一带的一个茶屋休息，在那里他吃到了刚烤好的秋刀鱼，对其味道赞不绝口。回城后将军依然对秋刀鱼的美味念念不忘，于是命人再次做来给他吃，却完全没有之前那般好吃了。想来也肯定不好吃，因为将军的膳食在做好之后要先有人试毒，最后端到他面前的菜肴已不是新鲜出炉了，所以这道烤秋刀鱼想必口味大不如现烤出来的。最后，将军感叹一句：“还是目黑的秋刀鱼好吃！”

关于这位将军的身份，有人称是三代家光，也有人称是八代吉

宗，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这则落语创作于安永以后。《目黑的秋刀鱼》在讽刺将军连现烤好的肥嫩秋刀鱼都吃不到的同时，也对秋刀鱼的美味进行了大肆宣传。

此外，秋天的鱼中还有一种不得不提，那便是“鲑”，即大马哈鱼，在日语中人们也称其为“秋味”，可见其深入人心的程度之甚。从绳纹时代起，大马哈鱼便在日本人的饮食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到了秋天，大马哈鱼会从日本海一侧、东北地区以及北海道地区的河川溯河洄游产卵。

这一节的最后将为大家献上两首与鲑鱼有关的俳句：

初鮭や網代の霧の晴間より

（秋至初鲑洄，网代薄雾现晴天，此景映我心。）

——支孝

鮭に酒換へてうき世をえぞ知らぬ

（鲑鱼与美酒，换来浮世俗尘事，全然皆不知。）

——芜村

冒死吃河豚

到了冬天，吃着河豚什锦火锅，再配上一杯“鳍酒”[42]，真是尺颊生香。

河豚的肝脏和卵巢中含有剧毒（河豚毒素），如不慎误食会致人死亡。但河豚的“白子”（精巢）与其身体的肉质却鲜美无比，正如在本书之前的内容中为大家介绍过的，日本人从绳纹时代起便已开始食用河豚了。

顺便为大家介绍一个关于河豚日语说法的小知识。在关东地区，人们往往称河豚为“フグ”；而在关西则大多没有浊音，称之为“フク”。那么，这一发音为何对应着“河豚”二字呢？

河豚虽是海鱼，但在中国却是逆川而上的鱼。据说，河豚能从长江入海口逆着激流，一直游到上游约一千两百公里的汉口。

中国人自古就视河里捕到的河豚为珍宝。由于是在河里捕到的豚鱼，所以便叫作河豚了。至于为何是豚鱼，据称是因其刚捕捞上来时会发出类似猪叫的声音，再加上河豚鼓起来的样子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猪，因此而得名。

在丑陋外貌下却拥有鲜嫩肉质的河豚，自古被中国人视作美味。其精巢也因味道鲜美而得名“西施乳”。从人们将河豚肉比作春秋时代的美女西施的乳汁，足可以看出中国人对河豚美味的赞美。

在这一点上，日本人也不甘落后。松尾芭蕉便创作了“诶呀并没啥，昨日无所事事过，但啖河豚汤”这首俳句。诗人表示，虽昨天吃了河豚汤，但自己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实则借此表现了自己的得意。

日语中还有一句谚语“河豚食う無分別に河豚食わぬ無分別”，意思是冒死吃河豚的是笨蛋，但因其有毒而不吃河豚的更是傻瓜。

到了冬天，便迎来了吃河豚的季节。人们常说“河豚は食いたし命は惜しし”（想吃河豚又惜命），以此形容想占便宜又怕冒险的意思。江户时代，河豚料理风靡一时。井原西鹤的作品中也屡屡出现描写老百姓品尝河豚汤的情景。

正如贝原益轩所说“谨慎之人不应食（河豚）”，传言武士曾是不吃河豚的。换个角度来看，应是因为当时大家都被河豚的美味深深吸引，常常能看到吃河豚的人，所以贝原益轩才有如此告诫之言吧。而有时人们也把河豚叫作“铁炮”，这是因为一旦“命中”，就小命不保了。

江户时代曾有一种说法称“河豚と間男は食い初むと堪忍ならぬもの”，意思是河豚和情夫都是一旦尝试过就再也忘不掉了。“河豚にも当たれば鯛にも当たる”（吃鱼时有可能吃到有毒的河豚，也可能吃到象征吉祥的鲷鱼），常用来形容祸福难卜。江户时代的老百姓觉得，反正自己不一定那么倒霉，所以也就心安理得地享受起河豚的美味了。

综上所述，至今到了冬季，河豚料理依然具有颇高的人气。和江户时代不同的是，现在人们只要去正规的料理店，就绝对不会出现中毒身亡之事。

不过，“河豚の横飛び”（河豚斜着身子跳）以及“河豚の立泳ぎ”（河豚站着游）都是用来嘲笑身材臃肿、腹部凸出来的女性的说

法，是对女性的蔑称，现在几乎已经不用了。

而冬季的鱼肉火锅中还有两种鱼不得不提，那便是鳕鱼和鮟鱇。对于生活在北国的人来说，鳕鱼是冬季不可或缺的一种鱼，不论是煮着吃还是烤着吃都非常美味。趁着冬日的严寒，人们将鳕鱼用粗绳串起，吊在室外晾晒制作成鳕鱼干，作为能够长期保存的食物而在日本各地得到广泛普及。

鮟鱇可以说是奇丑无比的一种鱼了。体形大的鮟鱇全长能达到一米，全身胶质黏液较多，手感非常滑，很难捉住，所以人们一般会将鮟鱇吊起来再做处理。鮟鱇虽样貌丑陋，却有着鲜美的肉质，除了骨头以外几乎没有不能吃的地方。江户时代以后，鮟鱇成为冬季料理中颇受人们喜爱的一种鱼，《料理物语》中还记载了鮟鱇的料理方法。《古今料理集》记载称，鮟鱇是身份高贵之人才能品尝的珍味。

五　大型鱼的日本史

鲸鱼的味道

日本有一句谚语叫“鯨も白魚も魚”（鲸鱼和白鱼都是鱼），常用来表示不能根据大小来差别对待，也绝不可因为体形小就轻视对方之意，即人不可貌相的比喻说法。古时候，人们将鲸看作鱼的一种，所以“鲸”字使用的也是鱼字旁。

而“勇魚”（いさな）是古时候鲸鱼的日文名字。“勇鱼取”随后也成了大海、海滨以及波涛汹涌的海面一类事物的枕词。在《万叶集》卷二中便有《太后之御歌一首》：“勇鱼取——淡海之海，远离洋面有船划来……”这里的“淡海之海”即琵琶湖，当然这句和歌并不是说琵琶湖里有鲸鱼，而是将“勇鱼取”用作了淡海的枕词。

江户时代后期出现了一本名叫《勇鱼取绘词》的书。书名中的“勇鱼取”指的是捕鲸。该书后面附有小山田与清于文政十二年（1829年）写下的跋文，书中用图解的方式详细描绘了在九州肥前的生月岛上益富又左卫门的捕鲸事业。

首次指出鲸鱼并不属于鱼类的是梶取屋治右卫门（山濑春政）于宝历十年（1760年）出版的著作《鲸志》，在该书中他指出，鲸虽为鱼形，但实为哺乳类动物。这本《鲸志》也是日本历史上首部记述鲸鱼时，绘有十四种鲸鱼的全身图并对其特征进行详细描述的书籍，在博物学史以及生物学史上均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但一般的日本人大多还是将鲸看作鱼类。即便到了现在，贩卖鲸鱼肉或熏制鲸肉的也并非肉铺，而是卖鱼的店铺。

从绳纹时代及弥生时代的贝冢或遗迹中出土了鲸鱼的骨头，这说明自太古时期起，日本人就已经开始食用鲸鱼肉了。不过当时人们吃的鲸鱼肉很可能是误入海湾，在浅海搁浅，失去自由的鲸鱼。但随后，人们开展了乘着小船拿着鱼叉的捕鲸活动。经考证为三世纪末至四世纪的骨器（自静冈县辩天岛贝冢出土）上清楚地刻有捕鲸的绘图。

另外，古代人也将鲸鱼视为神圣之物。这不仅仅是因为鲸鱼体形巨大，还因为其具有洄游习性。当鲸鱼出现的时候，被鲸鱼追赶的小鱼鱼群便会逃至海湾内，对渔民来说也就意味着一次满载而归。因此，鲸鱼也被人们视作渔业丰收的吉兆，被称为“惠比寿神”或“惠比寿鲸”等。在建有神社的海湾渔村，由于鲸鱼的洄游被人们认为是神的旨意，所以那里的人是不会捕鲸或食用鲸鱼肉的。

《古事记》中关于神武天皇的记述中便有“久治良”（读作くじら，即鲸）的登场，由此可见鲸鱼的名称自古便存在。其中有一首“久米歌”[43]讲述了与鲸鱼有关的故事。在位于宇陀高丘上的一个猎场，人们为了捕鹬，设好了陷阱等待猎物上钩，但捉到的却是鲸鱼。不过，这个在山里用捕鸟的陷阱捉到了鲸鱼的故事怎么听都不合理，所以这里所说的“鲸”其实是“鹰（くぢ）ら”，即老鹰。但正因为是在山里捕鸟的时候误打误撞捕到了鲸鱼，才使得这个故事虽有些荒诞，却越发诙谐有趣。对于这首充满幽默的久米歌，也许将其理解为人们捕到的是鲸鱼确实会更合适吧。

据说，日本人开始忌讳食肉，始于佛教思想逐渐兴起的天武朝（673年—686年）。人们虽忌食肉类，当时却一直食用着鲸鱼肉。如今普遍认为正是因为当时受宗教思想的影响，人们难以获取兽肉或牛、马等家养牲口的肉，鲸鱼肉才得到了如此高度的认可。

据室町时代的《四条流庖丁书》中记载，鲤鱼被认为是鱼类中最高贵的，而鲸鱼却是个特例，地位远在鲤鱼之上。

实际上，鲸鱼肉非常好吃。不仅仅是鲸鱼肉，日本人食用过鲸鱼的所有部位。天保三年（1832年）刊行的《鲸肉调味方》中，对鲸鱼从肉到内脏、鱼皮、骨头在内的全身所有部位的味道和烹调方法都进行了记述。

书中所载的鲸鱼最美味的部位是接近尾部的背上的肉，做成刺身来食用，真可谓人间极品。鲸鱼肉可烤制或者做成汤、刺身、拌菜等，食用方法多样。此外，该书还介绍了鲸鱼内脏的食用方式。被称为“尾羽”或“尾羽毛”的鲸鱼尾鳍在售卖时会将黑色的鱼皮连带着白色的脂肪部分一起卖，所谓的“皮鲸”就是指这一部位。将“皮鲸”部位用盐腌制后就做成了“盐鲸”。据说丧事时使用的黑白竖条相间的布幕“鲸幕”，以及里外黑白颜色不一的和服腰带“鲸带”的名字均源于此。而将鲸鱼白色的脂肪层切成薄片后，用热水焯过再过凉水而做成的“晒鲸”，则会以醋或味噌等调料调拌，做成拌菜来吃。

这些日本人曾经非常熟悉的味道，如今却很难吃到了。地球上现

存体形最大的生物——鲸鱼，在二十世纪过半后数量急剧减少。有些种类的鲸鱼甚至面临着灭顶之灾。而让鲸鱼遭受这般灾难的原因正是人类的过度捕捞。以日本为首，包括北欧等国在内的国家，随着捕鲸技术的发达而大肆捕捞鲸鱼，导致了如今的局面。

现在，国际上已禁止鲸鱼捕捞行为。尽管日本等捕鲸国以资源调查的名义获得了某些种类和一定数量的捕鲸资格，但这一行为迟早会被全面禁止。现在，鲸鱼已经成了稀少的高级食材，一般人几乎吃不到了，今后，或许所有人都无法再吃到鲸鱼肉了。

尽管可能再也吃不到鲸鱼肉了，但因此而指责禁止捕鲸的国际条约也无济于事。如果人们只是用渔网或鱼叉去捕洄游过来的鲸鱼，原本没什么问题。最终导致捕鲸行为遭到禁止的其实是开着捕鲸船，在全世界的海域每年捕捉上千头鲸鱼的屠戮行为。

欧美的捕鲸史与《白鲸》

目前尚未有研究表明人类究竟是从何时开始捕鲸的，但挪威新石器时代（公元前二千二百年左右）的壁画上已经出现了鲸鱼的图案，可见当时北欧人已经开始接触鲸鱼了。通过将壁画上的“鲸鱼”与壁画上其他的鱼类进行比较，也有人认为画中的动物其实是海豚，而海豚是齿鲸的一种。

顺便一提，鲸鱼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齿鲸，包括抹香鲸、虎鲸、领航鲸、海豚等；另一类是须鲸，包括长须鲸、露脊鲸、座头鲸以及塞鲸等。

欧洲的捕鲸发祥地应该是挪威，开始时间人们普遍认为是在公元前。到了十二世纪前后，巴斯克人开始将捕鲸作为一项产业。十六世纪，自荷兰率先开始捕鲸后，英国、丹麦、法国以及德国等国家也紧随其后。而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美国也一度兴起了捕鲸热潮。

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的长篇小说《白鲸》出版于美国的捕鲸业在经历了全盛期后逐渐走向衰败前的1851年。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名叫亚哈的船长向夺走了自己一条腿的巨大白鲸莫比·迪克复仇的故事。小说中，亚哈的捕鲸船辗转于全世界的海域，终于找到了白鲸莫比·迪克，经过三天的激烈决斗，最终船倾人亡，幸存者只有水手以实玛利一人。

欧美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的捕鲸行为，除了挪威对小鰛鲸的捕捉

外，并非是为了食用鲸鱼肉，而主要是为了获取鲸油。十八世纪中叶，蜡烛作为美国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其产业的飞速发展便得益于从抹香鲸身上提炼出的鲸蜡。此外，小鳁鲸以及弓头鲸的鲸须也是当时欧美女性着装中不可或缺的束身衣及衬裙的制作材料。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大量需求，也使得捕鲸行业不断地发展。

但到了1859年，美国的宾夕法尼亚钻出了石油，自此曾用作灯油的鲸油价值便明显降低。用来制作紧身衣的鲸须也由合金替代，除去挪威等一部分国家外，欧洲的捕鲸业开始出现衰退。如果当初的石油发现再晚个五十年，或许会有更多的鲸鱼惨遭灭绝。

日本的鲸鱼捕捞

最后，让我们来阅览一下日本的捕鲸史。

前文已为大家介绍过，自古日本人便食用鲸鱼肉，而专业的捕鲸师有组织地进行捕鲸的行为，据说出现在中世纪末的日本战国时代。据《鲸记》中的记载："元龟年中（1570年—1573年），三河国内海（现爱知县知多半岛）之人以七八艘船航至沼崎一带（捕鲸）。其后，又至丹后但马捕鲸。"此外，据《庆长见闻集》中的记载，文禄年间（1592年—1596年）捕鲸自伊势与尾张传至相模的三浦地区。也就是说，当时的三河、尾张、伊势等诸国已经存在捕鲸的方法了。

到了江户时代，人们在纪州的太地浦成立了专门捕鲸的组织——"鲸组"。庆长十一年（1606年），太地的和田忠兵卫赖元在泉州堺的浪人伊右卫门及尾张师崎的传次的帮助下，成立了用鱼叉捕鲸的"刺手组"，这个组织也被认为是"鲸组"的雏形。据传，赖元是镰仓幕府草创期的著名武将和田义盛的后裔。

这种捕鲸方法先以十艘左右的渔船围住鲸鱼，然后用刀刃长三四尺（约为1米）的鱼叉拼尽全力插入鲸鱼体内，最后将其成功捕获，可以说是非常勇猛的、也是极其危险的一种捕猎方式。最初，这种方式应该只能捕捉体形最大为五六米的巨头鲸。但随后这种捕鲸方式从纪州传至九州的肥前和四国的土佐，自明历到万治时期（1655年—1661年），日本各地的鲸组竟有七十三组之多。

而人们最终捕到全长十六七米的抹香鲸和露脊鲸等大型鲸鱼，是在延宝三年（1675年）渔网捕捞法被发明出来后。发明了这种方法的是和田忠兵卫赖元的孙子和田角（亦作觉）右卫门赖治。这种捕鲸法需要人们先布置好捕鲸网，然后将鲸鱼赶到渔网的捕捉范围内，再设

法将好几根鱼叉插入鲸鱼体内，最后由骑在鲸鱼背上的渔夫用长剑给出致命一击。

采用渔网捕捞法的捕鲸船团队不再像之前那样只有十艘左右的小规模了。太地浦的鲸组船队据说由十三艘“势子船”（负责将鲸鱼赶入渔网），两艘“持双船”（负责运送捕到的鲸鱼），九艘“鲸网船”（亦作双海船，负责张开渔网捕鲸），以及樽船、山见船、纳屋船各一艘，共计二十七艘船组成。

人们将捕捉到的鲸鱼用于饮食、灯油等，鲸鱼的内脏除食用外，还加工成药品的原料或肥料，鲸鱼的骨头、牙齿以及鲸须也毫无浪费、物尽其用。

捕鲸为人们带来的利益是巨大的，井原西鹤在《日本永代藏》中便将太地鲸组称为日本第一的富豪。肥前生月岛的益富氏也是著名的捕鲸富豪，近代后期经营着五组鲸组。

现以其中一组鲸组为例，为大家介绍一下其规模之大。在文政十二年（1829年），益富氏旗下的其中一组鲸组便拥有二十艘势子船、六艘持双船、十二艘双海船及其附加船两艘，是一支由四十艘船组成的大型捕鲸团队。而相关从业人员多达五百八十七人，其中包括三十名“羽指”负责出海捕鲸、三名实习人员、四百四十名“加子”负责各项运输工作，以及一百一十四名负责对鲸鱼进行解体和采集鲸油的人员。并且这将近六百人都是所谓的“正式员工”，如果算上临时雇的人手，每次捕鲸需要动员八百余人，足见其规模之庞大。

天明八年（1788年）十二月，前往九州旅行的司马江汉在生月岛亲眼目睹了捕鲸的场景，并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将其详细地记录在《江汉西游日记》中。

并且，司马江汉还登上了势子船，随船出海捕鲸，尽管因晕船受了不少罪，但依然以最直观的方式观察了整个捕鲸过程。在《江汉西游日记》中，司马江汉描述自己看到人们用十七支鱼叉插入鲸鱼体内，又用十七艘船将鲸鱼拉拽，当鲸鱼的挣扎减弱后再以长剑刺入，还在鲸鱼头部的喷水孔用剑钻出洞来，好让网穿过去。此外，一旦鲸鱼彻底死亡，就会沉入海中，所以人们不能完全杀死捕到的鲸鱼，要让其保持奄奄一息的状态并将其拉回岸上。除了捕鲸过程外，司马江汉还对第二天早晨看到的鲸鱼解体以及各部位的利用方法进行了描写。

无论如何，捕鲸这一渔业活动对出海的男人而言极具风险。古时

候的捕鲸法早已不复存在，幸运的是今天我们依然能在和歌山县太地町的町立鲸博物馆等地看到许多描绘江户时代人们捕鲸场景的图片。那一张张图片也为我们生动地讲述着当年鲸鱼与出海的男人激烈决斗的故事。

海豚与鲸鱼一样，与人的关系十分密切。并且，正如前面为大家介绍的，其实海豚就是鲸鱼的一种。

我们平常称为海豚的动物其实是体长三四米的“真海豚”。这类海豚会跟随人类的船只行进，十分愿意与人亲近，并且非常聪明。它们能够通过在水中发出复杂的叫声来与同伴互通信息，甚至有学者认为它们的叫声就相当于具有沟通作用的人类语言。据说海豚的智力介于狗和黑猩猩之间。

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等地中海国家，海豚就是大海的象征，是神灵的随从。北天星空中一个比较小的星座便被称作海豚座。据希腊神话记载，海豚是海神波塞冬的使者，因为找到了逃走的海神爱妻安菲特里忒而被封为一个星座。此外，海豚还是鱼类中速度极快的游泳能手，所以也有一些地方认为海豚是能够将人的灵魂带到冥界的使者。

日本还有一些地方认为海豚是能够带来渔业丰收的神之使者。它们会随着黑潮北上，夏季时还会出现在津轻海峡。春秋时节，它们会从对马海峡附近通过，沿海的渔民认为这意味着神灵或佛祖的到来，所以绝不会去捕捉海豚。

作为强壮有力、速度极快又非常聪明的一种“鱼”，海豚自古时候起便被日本用以起名。苏我入鹿（そがのいるか）便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名字[44]。此外，幸若舞中有一首名为《入鹿》的舞曲，亦称作《镰足》，讲述的是藤原镰足诛杀苏我入鹿的故事。

另外，在日本其他一些地方也盛行着海豚捕捞。三陆、房总、西伊豆、和歌山、名护、五岛等地至今依然捕捞海豚食用。

大海广阔无垠，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源头，至今依然孕育着无数鱼贝类的生命。正如“鯨も白魚も魚”这句谚语，对于海里的任何生命，我们人类都绝不能让它们灭绝。

第九章

第动物的日本史

一　改变历史的马

迁入古代日本的骑马民族

说起与人类历史的关系之密切，几乎没什么动物能与马相提并论。无论东方、西方，都有不少马改变了历史的事例。

拉战车的马的登场可以追溯至公元前两千五百年。苏美尔文化的遗物中已经出现了由四匹马拖拽的战车了。到了公元前一千七百年至公元前一千六百年，赫梯人从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南下，征服美索不达米亚。后又建立了赫梯帝国。大约同一时期，喜克索斯人（Hyksos）入侵埃及，雅利安人攻打印度。在这些军事行动中，马战车都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换言之，这一时期马拉战车改写了世界历史地图。

但真正引发军事革命的却并非马战车，而是骑马。作为能够战胜战车的军事力量，骑马登上历史舞台是在公元前一千三百年前后。

战车在实际操作中会受到一些限制，比如只能在平坦的道路上前进，道路要有一定的宽度，并且方向转换也不容易操作。但骑马就不同了，马匹几乎可以在任何地形上自由地驰骋，方向转换也可谓随心所欲。骑马军团的战斗力比马战车提高了不止一星半点。

曾经，江上波夫提出的“骑马民族王朝征服论”在日本引发热议。这一论调认为，在四世纪、五世纪前后，东北亚的骑马民族南下经过朝鲜半岛入侵日本北九州，最终征服了倭人，建立了大和朝廷。

确实，自绳纹时代到弥生时代，日本列岛上都没有马。尽管多多少少有一些马骨头出土，但实在难以凭借那少量的骨头来证明自古马就是日本列岛上普遍存在的动物。但是，在四世纪的遗迹中，马骨头的出土量却突然大量增加。此外，到了古坟时代后期，各地的古坟中都埋有马形陶俑。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在四世纪、五世纪前后，马在古代日本承担着重要的职责。而饲养及调教马匹应该也是自那时开始兴起的文化吧。当年，能够纵横驰骋、在马背上使用刀枪的骑马军团登上历史舞台时，想必原有的旧势力也不得不投降。

但对于这个“骑马民族王朝征服论”，现在却出现了很多批判性的意见，这些意见对于天皇家族遥远的祖先是骑马民族大多持否定看法。

尽管对于大和王朝是否由骑马民族建立仍争论不休，但毋庸置疑的是，四世纪、五世纪前后，随着大量的马匹传入日本列岛，骑马文化和游牧文化也被带到日本来了。大和王权，也就是古代天皇家的势力为了能够更早地确保马匹数量，还设立了马饲部，并在日本各地设立了官牧对马匹进行管理，因此天皇家一度独占着日本国内大多数的马。由此可见，古代天皇家能够统一日本的背景之一便是马的存在。

那时从东国也就是关东地区到东北地区，都设有很多牧场。因此，日本人的姓氏中也有很多带“牧”字的，诸如牧原、牧野、大牧、小牧、上牧、牧岛、牧村，等等。这些名字都意味着当年那户人家多多少少与牧场有关。

顺便一提，我现在所在的埼玉县浦和市（现埼玉市）的郊外，古时候的名字就叫“大牧”，也许当年这里也是和牧场有关的一片区域吧。

“记纪”中的马与“田畑荒”的传承

《魏志·倭人传》记载：“此地（倭国）无牛、马、虎、豹、羊、鹊。”但从绳纹及弥生的遗迹中出土了马骨头，可见这一时期日本并非完全无马，只不过当时马是非常少见的一种动物罢了。

此外，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也几乎没有马出现。只在关于神代的章节中，出现了素戋呜尊乱发脾气剥了马皮的故事而已。关于素戋呜尊发脾气一事，《日本书纪》记载道：“秋则放天斑驹、使伏田中……又见天照大神方织神衣居齋服殿，则剥天斑驹，穿殿甍而投纳。”这段内容描写了素戋呜尊秋天在农田中放马，损坏了已经成熟的庄稼。并且在天照大神织布的时候，素戋呜尊在屋顶上打了个洞，将剥了皮的马突然扔了进去。因此，受到惊吓并大怒的天照大神才躲到了天岩户中不再出来了。

从这个故事中完全看不出马与人类的亲密关系。其中的马被看作是会毁坏庄稼又或者是被剥了皮后受人们忌讳的存在。

关于马破坏农田让人十分困扰的故事在日本各地都有很多。《古今著闻集》中也有这样一则故事：

宇多天皇在位期间，仁和寺的“御座所”（天皇的居室）挂有著名画家巨势金冈创作的一幅马画。据说那时一到晚上，附近的农田就会被不知名的某种东西啃食破坏。人们始终不知道破坏农田的到底是什么，直到一天有人发现仁和寺御座所的那幅画中的马蹄被泥土弄脏了。人们这才知道原来是这画中的马到了晚上从画里跑出来啃食了农田。于是，人们将画里马的眼睛抠了出来，自此附近的农田再也没有遭到破坏。

建于北武藏山中（现埼玉县都几川町）的古刹——慈光寺，有一座观音堂，作为“坂东三十三灵场”（指关东三十三所名刹的观音灵场）中的第九座观音灵场而远近闻名。这座观音堂的“外阵”[45]屋顶上便挂着一个马的雕刻，这匹马的尾巴被切断，马嘴也被铁锁绑住了。据说这样做是因为这匹马一到夜晚就会跑到附近的农田破坏庄稼，所以愤怒的农民们切断了它的尾巴，将它的嘴绑了起来。

那么，让我们再回到“记纪”神话中来。据《日本书纪》的记载（《古事记》中出现在仲哀天皇一段），神功皇后出兵新罗后，饶恕了降服于自己的新罗王，并让其负责养马。在“应神十五年”那一条目中，也能看到百济王进贡良马的记载。

由此可见，马与养马技术通过新罗被带到日本，随后百济系的技术也传入进来。所以毫无疑问的是，马与马文化是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

在那之后，马便成了对于日本人来说无可替代的存在，并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马在军用、运输和农耕等方方面面为人类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日本古时候的马其实都是矮墩墩的小型马，从出土的弥生时代的马骨可以推测出那时的马一般也就130厘米高，最多不过140厘米。即便是镰仓的材木座中出土的中世纪的马骨，最大的也不过身高140厘米，而小型的只有109厘米。

中世纪以后，人们将马的标准身高定为四尺（约120厘米），将四尺五寸的马称为中马，而超过五尺的马则被叫作大马。

拒绝了“去势文化”的日本人

自平安时代起，马便与武士如影随形，其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显著提高。那时的人认为只有能骑马驰骋之人才配叫作武士，而只有能驯

服烈马之人才会被称赞为勇猛的武士。

在源平合战中，骑马的武士华丽地登上了历史舞台。其中最著名的事迹便是有名马“生喰”和“摺墨”登场、由佐佐木高纲和梶原景季争夺先锋的“宇治川先阵之争”。

当时，源赖朝养了两匹广受好评的名马——生喰和摺墨。黑栗色的生喰高四尺八寸，健硕魁梧，但生性彪悍，不论是人是马都会乱咬一通，正因其不轻易让人靠近，得名“生喰”。而摺墨也是一匹健硕的马，其毛色全黑，遂得此名。

寿永三年（1184年），面对木曾义仲率大军攻打都城，源赖朝将生喰赐予佐佐木四郎高纲，将摺墨赐予梶原源太景季。隔着宇治川与木曾军对峙时，佐佐木高纲和梶原景季却开始争夺起先锋之位。二人为抢头阵先后跃入了因降雨而水位上涨的宇治川的急流之中。最终，驾驭了生喰的佐佐木高纲笔直地强渡宇治川，以微弱的优势先足登岸，打了头阵。随后镰仓军一鼓作气击退了木曾军。这一段也是《平家物语》中的一个著名桥段。

人们往往认为马十分温顺，不会咬人，这种想法可就大错特错了。正如生喰那般，雄性马生性就不听话，也会咬人。创作于十二世纪的《年中行事绘卷》中，便不乏人们从暴躁发狂的马身上摔下来，抑或是拼命想要抓住扬起前蹄的马的场景。《信贵山缘起绘卷》中的一幅绘图呈现了用笼子罩住马嘴，再以竹竿牵之的景象，这便是古时候人们为了不让马咬人而想出的办法。

十六世纪战国时期来到日本的传教士以及幕府末期来到日本的外国人对日本马的评价可以说相当糟糕，基本上都是“暴躁得不得了”“动不动就踹人、咬人”“马与马之间经常打架”这类评价。所以那时的外国人对日本马的记述也是“难以控制，不好驾驭”。

这是因为日本当时并没有对马实施“去势”。雄性马一到了发情期就容易踢人、咬人或者与其他雄性马打架，这是天性。雌性马虽然相对温顺一些，但传统上人们并不会骑雌性马。游牧民为了马的繁殖和马奶，十分重视雌性马的饲育，而雄性马则被用作骑乘。这种传统在当时的日本也得到了传承。

但是雄性马生来性情比较暴躁，特别是发情期内疯狂起来，根本就不适合骑乘，于是人们便想到了去势的办法。去势后的雄性马会变得顺从，但运动能力随之有所减弱。

目前经研究已知，在公元前七百年至公元前六百年前后，斯基泰人（Scythians）骑的马便是“去势马”；而古希腊人也会为雄性马去势。据说，中国秦始皇陵里的兵马俑十分写实逼真，马俑中甚至还分了去势的马和未去势的马。

可以说，去势文化与去势马几乎遍布全世界，古时候就已经传至朝鲜半岛。但是，日本人却没有接受去势文化。这绝非是因为日本人不了解去势文化，反而正是因为了解，才选择了拒绝。这又是为什么呢？

日本几乎将古代中国和朝鲜的文化全盘接受，然后再进行模仿或改造成日式风格，慢慢促成了如今的日本文化。而学习的内容不仅仅是古代中国的朝廷制度、城市建设，甚至还包括风俗习惯等方方面面。但“宫刑”这种刑罚日本却没有接受，所以日本的朝廷中也没有宦官，当然日本也没有“割礼”这种文化。

这或许是因为日本对性器官的态度更多地偏于一种信仰，所以类似于损伤性器官或使其丧失能力的刑罚、习俗、仪式，日本并不具备接受它们的土壤。也因此古时候的日本人并没有对马采取去势的做法。

不过，鉴于此，日本的骑马武士确实相当不容易了。如果这些坐骑能乖乖听话迎战也就罢了，然而经常会出现公马正处于发情期，动不动就不受控制地到处乱跑或者跟别的马打架的情况，所以武士在与敌人交战前，往往先要跟自己的马进行一番苦战。

即便如此，没有马也是打不了仗的。战国武将为了保护良马，可以说是拼尽了全力。东国盛产名马。古时候，自关东地区至东北地区，可谓数一数二的良马产地。到了近代，北海道也发展成了良马的产地。据说这是因为越是寒冷的地区，马蹄越坚硬，腿脚也越是强而有力。近代以前，铁蹄并没有传入日本，所以温暖地区或气候湿润地区的马蹄一般比较软，无法乘载身着盔甲的武士翻山越岭。

日本没有马车的原因

自古以来，马就被视为神圣的动物而受到人们的推崇。人们认为马是神灵的坐骑，因此神社等场所会供奉马匹。“绘马”便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供奉形式。最初，人们将活马视为神马进行供奉，随后变成了供奉刻有马图案的雕刻品或画作。最后，马成了一种民间信仰之对象，人们也开始在各式各样的小型绘马上写下心愿。最近特别流行通

过绘马祈求姻缘或祈愿考试合格等。

从古代至近代，几乎没有比马更优秀的骑乘之物了。靠徒步需要花费三四天的路程，骑马往往只需要一天，这也难怪古代人会将马视作神的坐骑。以希腊神话为首，天马行于空的故事流传于世界各地的神话传说之中。在日本，圣德太子骑上黑驹飞往日本各地的故事声名远扬。此外，《古今著闻集》中记载，成为大宰少贰[23]的藤原广嗣上午在大宰府工作，下午便出现在奈良的朝堂之上处理政务。至于为何藤原广嗣能够这样一天内两地奔波，这是因为他骑乘的骏马奔跑一千五百里恍若一瞬间。

尽管马能载着人跑，但仍需要擅长骑马之人进行驾驭，并非任何人都能骑乘。还有一种做法，即自己坐在马背上让别人牵着马走，这样就可以慢悠悠地前往目的地，但是在行进过程中骑坐在马背上的人必须配合马的步调让身体上下起伏。因此，骑马绝非舒服的代步方式。若要说舒适的代步工具，那必然还是马车更佳。

但是在日本，直到明治之前都没有马车。平安时代，都城的贵族乘坐的几乎都是牛车。马却连货物都不拉运，拉送木材货车的依然是牛。顺便一提，明治时期之前，日本的牛车一直都是二轮车，虽然显然四轮车更平稳一些，但当时的日本是没有四轮车的。

日本的道路大多狭窄、弯曲且坡路频繁。古时候的日本是没有适合马车行驶的道路的。如果需要在短时间内走完一段长距离，便最能体现马车之价值；但如果距离近而缓速行驶，则牛车更为合适。四轮车在狭窄弯曲的道路上很难转变方向，且在坡路上难以保持平衡。

七世纪时，主要的官道各处便已设立驿站，备上马匹，这些驿站也已成为交通、通信的手段。但到了中世纪，这些驿站几乎都被废止，不再使用了，取而代之的是宿站的兴起。当时身为商人的旅行者开始利用宿站出行。到了近代，宿站进一步得到发展，人们又开始利用马匹赶路，但一般的老百姓很少骑马，马匹大多用于货物的搬运或为富裕的旅行者使用。

很有意思的是，当时的马蹄上还穿着草鞋。西博尔德在其著作《江户参府纪行》便记述道：“叶靴（草鞋）在这个国家是皮靴或铁蹄所无法取代之物。”西博尔德看到日本人和马匹都穿着草鞋，一步一步走在弯弯曲曲且因下雨而湿滑的山路上，由此认为草鞋极其适合日本的道路。

关于马的史话，仍有许多没有为大家讲述。此外，日语中有许多

与马有关的谚语，相信每一个日本人都能立刻在脑海中浮现出几个来。但是，到了二十世纪，马却突然间数量骤减，现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很难再见到马了。军事上人们不再需要马的协助；在运送和农耕方面，拖拉机和货车也取代了马的地位。除了赛马以外，几千年来人类与马的历史似乎正在落下帷幕。

二　自太古时期起就是人类朋友的狗

两万年前就开始与人类生活的狗

狗对于人类来说是相伴时间最为久远的家畜，既是朋友，也是与人关系最密切的动物。放眼全世界，只要有人类生活居住的地方就一定有狗的存在。这里所说的狗自然不是狼或野狗，而是家养的狗。

1980年，人们在阿拉斯加的旧克罗河（Old Crow River）附近找到了据推测至少距今两万年前的家犬的骨头。在那之前，世界上最古老的家犬骨头是在旧石器时代的遗迹——伊拉克的帕勒高拉洞穴（Palegawra Cave）遗址内发现的距今约一万两千年前的下颌骨。其后，在美国爱达荷州的贾格尔洞穴中发现了大、小两种家犬的骨头，据推测时间约为距今一万至一万七千年前。但在阿拉斯加找到的家犬骨头比在伊拉克和美国爱达荷州找到的都要久远得多。

据分析，这只狗应该是在人类从亚洲经过白令陆桥前往北美时一起带过去的。也就是说，人类在两万年以前就已经开始和狗相伴生活了。

人们从日本的绳纹遗迹中也找到了许多狗的骨头。有些狗被石镞射穿，也有一些被扔在贝冢中，等等。由此可见当年狗也是人类的狩猎对象和食物。另外，又有很多作为陪葬品的狗遗骨出土，且人们找到了狗形陶俑，由此可以判断在绳纹时期狗就已经作为猎犬或看门犬与人类生活在一起了。

此外，虽然洪积世的地层中也出土了狗科动物的骨头，但似乎却与绳纹时期的狗没什么直接关联。绳纹时期的狗已经存在数种血统，人们大多认为那时的狗经杂交后渐渐形成了日本犬。这一说法尚存在争议，但人们普遍认同日本犬是基于来自南方的小型犬、来自北方的中型与大型犬，以及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中型犬等演变而来。

日本犬的由来也与日本人的起源密切相关，有学者认为或许是先后来到日本列岛的日本人祖先当初从各自的故乡带来了狗。对于这个说法我们至今仍无法断定是否确切，但可以肯定的是，从几万年前开始，人类就已经带着狗在地球上迁徙了。

进入弥生时代，狗与日本人的生活产生了更为密切的联系。

铜铎可谓是弥生时代的代表性青铜器，铜铎上往往雕刻有各式各样的图案与纹样。其中一个画有五条狗围攻一头猪场景的铜铎，自出土后便备受关注。此外，也有许多狗的陶俑出土。弥生时代后期，人们在古坟中发现了须惠器，旁边还有表现了包括狗在内狩猎场面的塑像。

到了弥生时代，狗已经成为人类狩猎时必不可少的重要伙伴。它们对于当时的人类来说既是猎犬又是看家犬，从狗被制作成陶俑也能看出其在祭祀和礼仪等方面也承担着重要的作用。还有很多以狗作为陪葬的例子，可以想象当时的狗已经像如今的宠物一般，成了人类家族的一员，与人类生活在一起了。

或许，这时就已经出现了饲养并训练狗的一群人。最终这些人成为大和政权中的“犬养部”，并且最终发展出了“犬养”氏家族。明治至昭和时期的大政治家——犬养毅的祖先应该便是大和政权时期与军事关系密切的犬养氏族之人。

“记纪”神话中的狗

在“记纪”神话中也有狗登场。

据《日本书纪》的记载，哥哥海幸彦（火酢芹命）在与弟弟山幸彦（彦火火出见命）进行一番斗争后败下阵来，最终选择发誓成为“狗人”顺服于弟弟。原文曰：“火酢芹命苗裔、诸隼人等，至今不离天皇宫墙之傍，代吠狗而奉事者矣。”

于是，海幸彦的子子孙孙——“隼人”便要代代服侍天皇家，不得擅自离宫，并要代替狗，以看家护院为职。这里讲述的便是服从于大和王权的九州势力——隼人，作为守护大和的军事力量，须一直尽职尽忠之事。被征服的一方称为“狗人”，并且必须成为征服者的看家狗。

在《日本书纪》的《垂仁天皇纪》“八十七年”那一项中，还记载了下面这样一则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在丹波国一个叫桑田村的地方，住着一个名叫瓮袭的人。瓮袭家有一条名叫足往的狗。足往杀死了一只名叫牟士那的山兽。在这只野兽的腹内，人们发现了八尺琼勾玉。最终，这块八尺

琼勾玉被进献给了石上神宫。

此外，在该书的《景行天皇纪》中还有一则故事：日本武尊在信浓的山间迷路时，一条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的白狗为其带路，使其平安到达美浓。

在《古事记》的《雄略天皇》文中，记载了河内志几的大县主向雄略天皇赠呈狗以表恭顺之意的故事。

有一天，雄略天皇站在河内的一座山上向下望去，看到了与天皇家宫殿颇有几分相似的大县主家的宅子。怒火中烧的雄略天皇打算烧掉大县主的家宅。惊恐万分的大县主赶紧找来狗，在狗脖子上拴上铃铛并盖上白布，令族人中一个名叫腰佩的人牵着狗绳子，将狗献给雄略天皇，这才平息了雄略天皇的怒火而得以赦免。据说，雄略天皇将这只狗作为彩礼送给了即将成为皇后的若日下部王。

在《日本书纪》中的《武烈天皇纪》“八年春三月”一条中也有狗出现。根据记载，武烈天皇竟让一众女性裸身坐下，让公马和母马在她们面前交配。交配完后，武烈天皇会检查这些女性的阴部，如有湿润者则杀之，只留下下体未湿的女性在宫中做官婢。武烈天皇还命人挖了一个池子，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庭园，并在庭园里安置了各种鸟兽，而自己则骑着马，放狗去追这些鸟兽来享受狩猎的乐趣。

此外，在古代传说中狗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当属《桃太郎》与《花咲爷》（亦作《开花爷爷》）了吧。

《桃太郎》讲述了从桃子中诞生的桃太郎带领着狗、猴子和雉鸡前往鬼岛为民除害，最终击败了恶鬼并带着金银财宝归来的故事。而跟随桃太郎一起前往鬼岛的三种动物当中，狗是最忠诚的。猴子和雉鸡虽然也是日本人非常熟悉的动物，但却是野生的，只有狗是被人类饲养的。人类相当于狗的主人，因此在童话故事中将狗描写成忠实的动物也无可非议。

《桃太郎》中出现的这三种动物又能巧妙地用来比喻军队等组织中的某一类人。比如，狗忠诚而勇敢，即便面对比自己强大的对手依然有勇气对抗。猴子虽然难言其忠诚，却宛如参谋一般，具有相当的智慧和谋略。而雉鸡则可以随心所欲地到处跑动，正适合担任传递命令和收集情报的职位。

《花咲爷》中出场的狗虽然最终凄惨地死去，却为人类带来了财富与幸福。这个故事讲述了一条被善良的老爷爷收养的狗不断为老爷

爷带去幸运的故事。住在隔壁的坏爷爷因为妒忌而强行将狗夺走了，结果幸运丝毫没有降临，反倒是不幸接踵而至，于是坏爷爷便将狗杀死了。善良的老爷爷厚葬了这条狗，而在狗埋葬的地方又长出了一棵树，这棵树继续不断为善良的老爷爷带去财富。坏爷爷见到后便将树砍掉烧成了灰。善良的老爷爷将这些灰撒向枯木后，枯木竟然相继开出了鲜花。

这则故事中的狗即便死后也依然为收养自己的恩人带去财富，即使变成了灰也要开出花来为人们提供梦想与幸福。可以说《花咲爷》是一部为我们讲述日本人与狗在历史长河中的友好关系的童话故事。

但不论是《桃太郎》还是《花咲爷》，其故事原型都有可能来自朝鲜、中国又或是东南亚、太平洋上的诸岛，而流传至今，在日本各地也有着诸多版本。无论原型来自哪里，又或者是哪一个版本，谈论这两个童话故事时，都不能将狗排除在外。

对狗来说很残忍的“犬追物”与斗狗

提到狩猎，必然又与狗有着密切的关系。平安时代，在兵部省管辖下便设有“主鹰司”，主要负责训练猎鹰与猎狗。也就是说，在当时鹰猎活动所用的狗是由政府来饲养的。

《枕草子》中便记载了一则关于一条名叫“翁丸”的狗的故事。由此可见，在当时狗已经成为人们的宠物。到了平安时期，整个都城内野狗横行。城市里的野狗一般都是家养的看门狗或宠物狗的后代。根据记录了十二世纪初宫中典章制度的《禁秘抄》，当时曾举办一种叫作“犬狩”的仪式，在此仪式中，人们会将藏住在宫中各处的野狗找出来，然后用弓箭射杀。此外，在藤原定家的《明月记》（1235年）中也有描述称，狗总会弄脏宫中或贵族的家宅，甚至还会从不知道什么地方叼来人的骨头。

到了镰仓时代，“犬追物”作为一项武士竞技活动逐渐盛行开来，与“笠悬”“流镝马”并称为“马上三物”或“骑射三物”。

“犬追物”这项骑射活动会将狗放在由竹篱笆围起来的猎场中，随后武士骑马追赶之并用弓箭射奔犬。为了不让狗受伤，弓箭的头并不尖锐，并且会为狗套上一个大的鸣镝（日语为“蟇目”［ひきめ］），但这些对于被射中的狗来说，仍然是相当残忍的。

日本南北朝时期著名的二条河源落书中便有一句“弓难引之犬追

物，落马次数更为多”。这句落书讽刺了突然暴富的武士兴致勃勃地以“犬追物”为乐，但是比起射落的箭的数量，人从马上掉下来的次数更多。到了室町时代，“犬追物”更为盛行，规模也较之前更大。每次“犬追物”的竞技，人们会准备一百五十条狗，每次放出十条，射手总计三十六名，每次四人出列比赛谁射到的狗更多。

从日本战国时代开始，“犬追物”的热潮渐渐消退。这是因为当时大小战役越来越多，人们加入到实际的战争中后，也就无暇顾及竞技玩乐了。江户时代的元和八年（1622年），岛津氏令“犬追物”热潮复燃。其后，萨摩岛津家传承了“犬追物”的技艺，在江户时代屡屡掀起热潮。到了明治十二年（1879年），宫城内的吹上御苑曾为天皇进行“犬追物”的表演，而表演结束后，这一竞技活动便失去了热度，不再受到追捧。

据《太平记》，北条高时命人从诸国搜集了上千条狗送到镰仓，每个月都要举行十二次“犬追物”。据说他还会下令一次性放出一百条至二百条狗，让射手与之交战。但是《太平记》归根到底是一部物语性质的书籍，其记载内容的真实性也有待商榷；并且按照当时的条件，能够每个月进行十二次“犬追物”竞技的说法令人生疑。但在《增镜》中同样记载了北条高时喜好斗犬的内容，所以镰仓时代应该已开始盛行斗犬活动了。

顺便一提，著名的土佐斗犬自江户时代后期的天保年间（1830年—1844年）末期至嘉永年间（1848年—1854年）人气颇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斗犬活动被废止，战败时高知县连一头斗犬都找不到了，但在昭和二十六年（1951年）它们再次回到了大众视野中。

此外，纯种的土佐犬在日语中被叫作“シシザキ”，是一种可用于狩猎野猪等活动的中型猎犬。而现在斗犬活动中所用的土佐犬，则是明治时期之后，纯种的土佐犬与虎头狗等品种的混种。

《生类怜悯令》及与狗有关的谚语等

“犬追物”和斗犬于狗而言均属于虐待行为。纵观日本历史，即便狗可以为人类看家护院或者协助狩猎，它们的地位仍然很低。日语会用“犬畜生”（いぬちくしょう）这类说法来比喻卑鄙下流、可耻可怜之人或事物。

但狗也有过一段光辉的历史。这便是江户时代在五代将军纲吉统治下，施行《生类怜悯令》的二十几年时间。

贞享四年（1687年），幕府首次颁布了对狗进行保护的法令——《生类怜悯令》。据说，纲吉在天和二年（1682年）失去了嫡子德松，自那以后便再无儿子出生。对此十分担忧的纲吉生母桂昌院找自己信赖的僧人隆光商量。隆光称这是前世杀生之报应，所以今后切忌杀生，要对生命有怜悯之心，尤其须注意，纲吉是狗年出生，应对狗格外珍重。于是《生类怜悯令》横空出世。

这道法令不断升级，对象除了狗以外还包括了牛、马、猫、猴、鸡、蛇、龟、鼠，甚至是所有的鱼贝类和鸟类。乍一看，《生类怜悯令》仿佛是领先世界的一部动物保护法，其实不然。违反了《生类怜悯令》的人无一例外都受到了惩罚，甚至还有不少人被判处死罪或领受流放荒岛等严厉刑罚。也就是说，这道法令使得动物的性命高于人类的性命。甚至还出现了父母仅仅因踢开了咬住孩子的狗，就被判处流放荒岛的例子。

由此，“犬畜生”变成了“お犬様”（狗大人），而纲吉私下里也被人们叫作“犬公方”[46]。其结果是整个江户城野狗泛滥，人与狗的冲突和矛盾层出不穷，不断激化。为此，幕府不得不在江户城中和近郊的四谷、喜多见、中野建造了野狗收容所。中野的野狗收容所占地面积竟达二十九万余坪（约九十万平方米）。元禄八年（1695年），一期工程即将竣工。收容——不对，应该说是入住的狗数量多达十万条。

这些野狗收容所不光是建造费用，连食料费用也耗资巨大，而幕府却将这些全转嫁到了江户市民和天领(24)领民身上。每一间收容所的狗屋都要从江户市民身上收取金三分，领民则需要交出俸禄米。如此这般，实在无法断言人与狗能保持良好的关系。对于大部分老百姓而言，狗反而成了敌人。虽然纲吉在临死前留下遗言称要继续施行《生类怜悯令》，但六代将军家宣一上任就立刻废止了这一法令。纲吉一死，狗的地位一夜间又回到了从前。

另外，神社、寺庙门前经常能看到一对狛犬。其实它们不是狗，而是狮子。在帝王之墓的左右配上一对狮子作为守卫的做法，以古埃及的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为首，广见于波斯和印度等地。而这种做法随后传入中国，经朝鲜半岛，后作为寺院的守护兽传入日本，据推测，狛犬最晚至七世纪前后传入日本。没有见过狮子的古代日本人将这种兽形雕刻称为“高丽犬”。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与狗有关的谚语。

在形容关系极差的死对头时，日语会说“犬猿の仲”（狗和猴子的

关系，即水火不容之意）。“犬が西向きゃ尾は東”（狗向西边看时其尾巴就会摆向东边）则用来比喻理所当然之事。“犬に論語”（对狗讲《论语》）用来形容对牛弹琴。“犬の糞”（狗的粪便）则有两个意思，一个用来形容随处可见、稀松平常之事物；因为狗的粪便很脏，所以它的另一层意思是指粗俗不雅之物。“犬の遠吠え”（狗离得远远地吼叫）形容胆小之人躲在不会被敌人攻击到的地方抱怨，即虚张声势之意。“犬も食わない”（连狗都不理），这个说法往往用来表示夫妻吵架时连狗都不会上前掺和。“犬の糞に手裏剣”（在狗粪上用手里剑）用来表示在不足挂齿的事物上浪费了更贵重的东西，即杀鸡焉用牛刀之意。“犬も歩けば棒にあたる”（狗走在路上也会被棒子打）这个谚语也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表示出风头容易招灾；另一个表示虽然没有才能和运气，但偶尔也会碰上意想不到的幸运。而日语中“犬猫の夫婦”（狗猫夫妻）则用来形容关系不和睦的夫妻。

除了上述这些表述外，日语中还有许多和狗相关的谚语，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不过这些谚语足以证明狗与人类的关系有多密切。

三　猫与老鼠的日本史

猫传入日本始自奈良时代

猫与人类共同生活的时间仅次于狗。人们从公元前五千年左右的耶利哥城（Jericho）的遗址发现了猫的遗骸。但对于这只猫是人类饲养的还是野生的，尚未有定论。在公元前两千五百年左右的埃及第五王朝时期的绘画中也有带着项圈的猫，从这幅画可知这只猫由当时的埃及人所饲养。

据说在佛教传入日本的时期（六世纪中叶），猫从欧洲经丝绸之路被带入中国，然后再经由朝鲜半岛传入了日本。引入猫的理由是为了保护珍贵的佛教经典不被老鼠破坏。但对于这一说法，尚存在一些争议。而元庆八年（884年）的文献中首次出现了中国的猫传入日本的记载。

据称，猫在古埃及被奉为神兽。但在欧洲等地却被视作具有魔性的动物。比如，欧洲有些迷信称，如果做了有黑猫出现的梦或者早晨出门时看到黑猫横穿道路，就会发生不吉利的事情，或是活了很久的猫会变身成恶魔或魔女而危害人类，等等。

此外，在中国，猫很多时候也被视作是阴险且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动物。杀了黑猫就会遭殃的说法广泛流传，与此相关的奇闻、怪谈盛行。传闻吸收了月光而变成妖精的猫如果是雄猫就会化作男人，如果是雌猫就会化作女人。

在日本，《徒然草》等作品中也记述了一种叫作“猫胯”的猫妖。到了江户时代后期，在大名家中引发骚动的猫妖的故事被创作成人形净琉璃及歌舞伎等艺术形式，获得了极高的人气。

之所以猫会被认为具有魔性又或者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原因在于其外表及习性。猫的眼睛有时会变成细细的一道，有时又会睁圆，在夜晚甚至还会发光。而猫毛产生静电后，全身的毛都会炸起来。并且猫在走路的时候不会发出声音。此外，猫生气时露出牙齿的样子比狗要可怕多了。

在日本，到了奈良时代以后猫才逐渐成为人们的宠物，到了平安

时代，猫已经出现在了贵族的日记和一些物语中了。《枕草子》中有一句“猫最好是背上全是黑的，此外则都是白色”的描写。清少纳言曾在中宫定子身边供职并创作了《枕草子》，其中记载道，一条天皇甚至将自己养的猫封位为从五位以上的女官位阶，并将母猫唤作“命妇夫人”。据说，头背为黑色，腹部为白色的正是这只“命妇夫人”。

另外，在《源氏物语》中也有猫的登场。在《若菜下》这一段中，爱恋女三宫的柏木甚至将女三宫饲养的猫当作她的替身来宠爱。夜晚，柏木让猫睡在自己身旁，白天又是抚摸又是将其抱在怀中。由于猫的身体十分柔软且具有感官刺激性，所以无论古今东西，都有将猫比作女人身体的例子。

金泽文库是镰仓时代北条实时在距离镰仓较远的金泽村（现横滨市金泽区金泽町）建造的大型图书馆。北条实时任幕府的评定众一职，曾辅佐北条经时、北条时赖、北条长时、北条政村、北条时宗五代幕府执权、治政。并且，他还是一个喜爱阅读的好学之人，他收集并珍藏了数量庞大的和汉书籍，并最终创建了金泽文库。

这个金泽文库也被称作“金泽猫”，得此名称是因为这里养了许多猫。据说，为了防止鼠害破坏文库，时人从宋朝引入了许多优秀的捕鼠猫。金泽猫这一名称直到近代还在相模一带广为使用。

化猫骚动记与招财猫

据《和名抄》记载，猫似虎但体形更小巧，常捕鼠为食，和名为“祢古万”。现在日语中的猫读作“ねこ”，但据说在古代叫作“ねこま”，其名的起源尚未得到确认，民间也流传着各种说法，比如因为猫嗜睡，所以才叫“寝子”（亦作寝児，读作ねこ），又或者由于猫从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所以才叫“寝高麗”（ねこま）。

猫会变成鬼怪的观念自古便有。《古今著闻集》（成书于1254年）中便收录了好几则与猫有关的怪谈。如下面这一则：

曾经，观教法印在嵯峨山庄内养了一只猫。那是一只不知来自何处的漂亮的唐猫（指从中国传入日本的价格高昂的猫）。那只猫很擅长接球，于是观教便满心宠溺地抛球与它玩耍。有一次，观教将球替换成了秘藏的名刀让这只猫去接，而猫却叼着名刀跑走了，刀也不知下落。或许是一个魔物化作了这只猫抢走了名刀，然后肆无忌惮地四处进攻吧。细细想来真是可怕。

此外，在藤原定家的日记《明月记》中“天福元年（1233年）八月二日”一条也有下面这段与猫有关的内容。

一名来自南都（奈良）的人声称：“南都出现了一只名叫猫胯的怪兽，一晚上就咬了七八个人，而且死了好几个人。这只怪兽最终被杀死了，而它的眼睛像猫一样，身长如狗一般。”

古时候的人认为，猫上了年纪以后，尾巴就会分成两半，化作猫胯这种怪兽祸害人间。

吉田兼好的《徒然草》（成书于1330年前后）中便有一则故事，讲述了连歌师行至革堂行愿寺附近时，有一条狗扑过来，他却以为是猫胯在袭击自己，遂惹来了一场大骚动。此外，还有一个故事描述了两个人的对话。其中一个人说，“据说深山里有一只叫猫胯的怪兽会吃人”，另一个人听闻此言，说道，“不是在山里，即便在这一带，猫上了年纪后也会化作猫胯取人性命”。

到了江户时代，有关猫的怪谈也渐渐更富有神秘色彩。《耳袋》（1784年—1814年成书）里便有下面这样一则故事：

化作男子母亲模样的猫百般折磨着这名男子，男子万万没想到母亲其实是猫妖变的，于是一直默默忍受着。

但突然有一天，猫妖现了原形。于是这名男子为了替母亲报仇，杀死了猫妖。然而他发现，死在自己手下的是自己的母亲，遂打算自尽。这时他的朋友劝阻了他并解释，“猫和狐狸在化成人后若经过了一定的岁月，那么即便死了也不会立刻换回原形”。最后，果不其然，这名男子看到的正是那只猫妖的尸体，而非自己的母亲。

此外，人形净琉璃和歌舞伎中的“猫骚动物”这一系列也赢得了广泛的人气。

《今川本领猫魔馆》（1740年首次演出）是由三好松洛等人创作的人形净琉璃，这个剧目在骏河今川家的骚动中加入了猫妖怪的戏剧元素。四世鹤屋南北的《独道中五十三驿》（1827年首次演出）则出现了身穿十二单衣的猫妖舔舐行灯油的场景。此外，嘉永六年（1853年）创作出的《花埜嵯峨猫魔稿》讲的是民间流传的“锅岛猫骚动”事件，由于佐贺锅岛藩的抗议，这个剧目并未演出。但“锅岛猫骚动”事件在明治时期以后却以另外的形式收录在实录本《佐贺怪猫传》及讲谈《佐贺夜樱》中，成为脍炙人口的作品。

“锅岛猫骚动”大致讲述了佐贺藩二代藩主锅岛光茂因谁输谁赢的纠纷而杀死了围棋对手龙造寺又七郎。又七郎的母亲悲伤至极而自尽。家里养着的爱猫则舔舐了又七郎母亲的血，变成了一只猫妖找锅岛光茂报了仇。

这么看来，似乎与猫有关的故事总是带着一丝恐怖与不吉利。但下面这则故事则正好相反，很是讨人喜欢。

位于东京世田谷的豪德寺是近江彦根藩井伊家的菩提寺。二代藩主井伊直孝在猫的召唤下进入此寺并将这里作为井伊家的菩提寺，自此豪德寺和井伊家都走向了繁荣。于是，寺院内设了猫冢，开始为人们提供画有招财猫图案的护身符。随后，招财猫的护身符和摆设被人们视为能够使生意繁荣昌盛的吉祥之物，尤其受到花街和餐饮店老板的喜爱。直至今日，还有不少店铺会摆放招财猫以求生意兴隆。

此外，据说雄性三花猫可以预知天气，所以船主会以高价购买此种猫。而在出海的船上养猫也可以防止搬货时跑进来的老鼠偷食船上谷物。

在西洋被嫌弃在日本却被视为能带来财富的老鼠

视猫为天敌的动物便是老鼠了。这里所说的老鼠指的是半寄生在人类社会的家鼠，主要有沟鼠、黑鼠以及鼷鼠三大类。

这些老鼠与人类社会关系密切，实际上它们比猫出现的时间还要早得多。老鼠出没于世界上各个角落，在人类的家宅中自由自在地出入和啃食食品，甚至还会传播鼠疫等传染病病毒。对于人类来说，老鼠基本上是一种有害无益的动物。

在古埃及和古印度，老鼠是夜晚的象征，而在希腊则象征着毁灭与死亡。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往往将老鼠与恶魔或魔女联系起来，老鼠的大量出现便是灾害与传染病暴发的前兆。那时的人们认为，魔女能够变成老鼠的样子或者变出老鼠，那时的魔女审判记录中还流传下来一份据说是魔女口述的变出老鼠的做法。

与鼠害有关的传说众多，其中《哈梅尔的花衣魔笛手》在日本广为人知。这个故事发生在德国一个叫作哈梅尔的小镇，当时小镇的老鼠十分猖獗、无人能灭。某一天，一个身穿斑点衣服的男子出现，他听闻市民想要灭鼠的愿望后开始吹奏笛子，最终将小镇上的老鼠消灭殆尽。但当老鼠全被消灭后，小镇上的市民却违背了当初支付酬劳的

约定并将男子赶出了小镇。十分生气的男子便将小镇里四岁以上的孩子全部带走了。

人们大多认为日本在迈入农耕社会的同时，开始遭受鼠害侵袭。位于静冈市的登吕遗迹是弥生时代村落的遗址，这里的高床式仓库的柱子上部安装有驱鼠器。类似的驱鼠器在其他弥生遗迹中也有发现，由此可见，弥生人当初为了保护粮食不遭老鼠破坏而绞尽了脑汁。

目前已知稻子种植技术在绳纹时代后期就已传入日本，并且在那之前日本人早已开始种植稗子、粟米和栗子等农作物了。所以从遥远的古时候开始，人们肯定就已经为鼠害所深深困扰。

但不可思议的是，日本几乎没有将老鼠与死亡或毁灭联系在一起的传说或强调老鼠破坏能力的说法或故事流传下来。在古代传说《鼠净土》中，老鼠能够为人类带来利益，有时甚至被奉为有预知能力的神兽。

在《古事记》神代卷中便记载了一则老鼠拯救了大穴牟迟神（大国主命）危机的故事。须佐之男命将大国主命引诱到枯草原，准备放火烧死大国主命。当他被熊熊烈火包围，眼看就要丧命的危急时刻，一只老鼠告诉他地下有空洞，于是他躲在地下，逃过了一场杀身之祸。

自古以来，人们就认为老鼠有预知灾害的能力。人们在很长时间内相信，火灾、地震或洪水等灾害发生前，老鼠会成群移动，等到安全了再跑回来。而记录了这些现象的书籍自“记纪”开始到近代的随笔集不胜枚举。直至现在也有不少人相信这种说法，但其实老鼠成群移动预示着灾害发生的说法并未得到证实。大火灾或洪水泛滥的时候，像老鼠这样的小动物消失得无影无踪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当人类重建了受灾区后，它们自然而然就回来了。灾害发生前老鼠会成群避难的说法，或许带有些许杜撰。

在日本，老鼠被人们称为“嫁が君”（よめがきみ），有时也单写一个“嫁”（よめ）字。这是因为老鼠夜间活动，到了晚上能利用“夜目”（よめ）——它们在晚上也能看得见——而得此名。但这不过是民间传说，原本的语源尚未得到证实。

“嫁が君”（よめがきみ，直译为“妻子是你”）一说或许来自中国的传说老鼠嫁女。根据民间传闻，人们会在除夕夜把老鼠“嫁”出去，在馒头上插假花放在床上或空房间内供给老鼠，这样一来就能减少鼠害了。虽然日本也有老鼠嫁女的故事，但却并未形成民间习俗。为了

避免鼠害，在日本各地也确实存在不将其扑灭，而是适当地将食物分给老鼠的习俗。

《鼠净土》与义贼鼠小僧

日本人对于《鼠净土》这个故事可谓耳熟能详，该故事有时也被叫作《老鼠与饭团》或者《老鼠的麻糬》等。这个故事的内容大致是：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善良的老爷爷。有一天，老爷爷一不留神将饭团弄掉了。他赶紧去捡掉下去的饭团，但回过神来却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洞穴，这里便是老鼠在地下的净土。在这里，老鼠唱着歌，捣着年糕。它们看到老爷爷进来，非常欢迎，并给了他很多诸如年糕以及金银宝物的礼物。有一个贪婪的老婆婆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羡慕，于是故意把米团子弄掉，然后擅自闯入了老鼠的净土。看到正在唱歌和捣年糕的老鼠，老婆婆模仿猫的叫声把它们都吓跑了，于是她便被关在地下，再也出不来了。

这个故事中的老鼠显然是能够为人类带来财富的动物。或许，古时候日本人是将老鼠奉为谷灵神的吧。很久以前的日本人会将老鼠喜欢吃的饭团、米团子或年糕等食物摆出来，以此避免更严重的鼠害。此外，那时人们还相信只要有老鼠在便不会遭遇灾害，这大概也是人们对老鼠预知能力的一种朴素信仰。

直到不久之前，人们都还保留着“房间的角落或米仓的老鼠洞是通往净土或黄泉的入口”的信仰。但如今人们的住宅中已经很少有老鼠洞了，而米仓也都用坚固的钢筋水泥制成……

不过，猫就算被人格化，顶多也就是变成了猫妖。而老鼠却会成为英雄的冠名，这个深受老百姓追捧的英雄便是义贼鼠小僧次郎吉。

据传，次郎吉生于宽政八年（1796年）或宽政九年，出生地为江户日本桥。他的本职是土木建筑工人，后来却成了救济贫民的义贼。正如其名“小僧”，他身材小巧、动作敏捷，专门洗劫大名的宅邸。遭其下手的大名共有九十五家，若算上大身旗本，则有一百三十九家受害。他所偷取的金额达一万二千两，若是放到现在，相当于十几亿日元。松浦静山的《甲子夜话》记载道：“（义贼鼠小僧次郎吉）从不伤人，且不取一切器物，仅拿走金银。”次郎吉会将偷来的一部分金子分给贫苦百姓，因此在江户百姓中他的义贼之举广受好评。但到了天保三年（1832年），他潜入松平宫内少辅的宅邸时被捕，在江户市

内被拉着游街后，在小家原被斩首示众。次郎吉被杀时年仅三十六岁。

他的墓地以本所回向院（位于东京两国町）为首共有七处。其墓碑被人们视为能带来赌运和抽签运，甚至还有人认为能治疗痔疾，所以直到今天还有人会破坏他的墓碑带走以求好运降临。

但这位义贼鼠小僧次郎吉并非真实存在的人物，他应是人们在真实存在的盗贼稻叶小僧等人身上寄托了对义贼的期望而虚构出来的人物。而之所以用“鼠”字冠名，则是因其行盗时多在夜晚且神出鬼没。

此外，日语中与猫或老鼠有关的谚语数不胜数。像“窮鼠猫を噛む”（穷鼠咬猫，相当于狗急跳墙）这样既有猫又有鼠的谚语也不在少数。各位读者如果感兴趣的话不妨查查看。

四　山里的野兽

既是食物、药材也是信仰对象的猴子

地球上的生物中与人类最为接近的当属猴子了，但猴子其实是灵长类动物的一种，目前共有十一类约一百七十种灵长类动物生活在地球上。较其他种类而言，生活在最北方的猴子便是日本猕猴了。青森县下北半岛作为猴子在地球上最北的栖息地而闻名于世。

日本的猴子尽管仍以山中野生的居多，但它们曾生活在离村落更近的区域，与人类的关系也远比现在亲近得多。在日语中，猴子可以写作“猿”“猴”或者“猨”等；而“猿”字原本在汉语中指的是长臂猿科的猿猴，汉语的“猴”这个字则表示猴科的长尾猴。《西游记》中出场的孙悟空便属于猴类。日本猕猴虽然没有尾巴，但属于猴科。

原先，日本只有日本猕猴这一个种类的猴子栖息，所以才出现了“猿”“猴”和“猨”这些汉字混用的情况。

绳纹时代的贝冢中出土了许多猴子的骨头，看起来绳纹人应该食用过猴子。据说猴子肉质软嫩鲜美，中世纪以后仍然有人将猴子肉用盐腌制后作药膳。据说猴子肉能治腹泻，并且可以暖身。还有做法会将猴脑放入容器中蒸烧，用来做补脑的药。而晒干的猴脑曾被用作治疗神经痛的药材。

有关猴子作为珍贵药材而受到人们重视的记载，可追溯到古代流传下来的神话故事。比如，下面这则《猿之生肝》便与此有关。

龙宫的公主生病后，为了给爱女治病，龙王命令海月（水母）去取猴子的生肝（活着时摘取的肝脏）。原本海月成功骗了猴子跟自己回去，但在途中不小心将实情说漏了嘴。于是，猴子骗海月称自己忘记带生肝，以回去取为借口趁机逃走了。海月因此受到了龙王的惩罚，被剥去了所有的骨头。

这则故事被记载在佛典以及《今昔物语集》《沙石集》等书中，东南亚地区也广泛流传着类似的故事。这则故事与龙宫传说一样，原为跨海传入日本的神话传说。全世界食用猴子并以之为药的国家并不在少数。

此外，猴子并非只是被人类用作食物或药材。自古时候起，人类便开始饲养猴子，将其作为宠物。人们还曾认为猴子是神的使者，信奉猴子可以除灾除难。

古代的日本人曾认为猴子是太阳神的使者。在“记纪”神话中登场的猿田比谷（猨田彦）便是天之八衢的异形太阳神，在回答了天钿女命的问题后为天孙琼琼杵尊带路。因这次缘分，天钿女命与猨田彦结为夫妇，而他们的子孙也被称为“猿女”（猨女）。

“猿女”随后又成了古代皇宫中的女官，并发展成演奏舞乐的一支氏族。

据说日语“猴”“猿”的发音“さる”是由动词“戯る”（さる）演变而来的，这个动词原本表示装腔作势或喧闹，而猴子会模仿人类做出滑稽可笑的动作，因此根据这个动词的发音得名。在宫廷祭神仪式上演出滑稽舞蹈的演员也被称为“さる”，随后在此基础之上发展出了“猿乐”（散乐）。到了近代，还出现了让猴子自己跳舞的耍猴表演。

而在日语中“猿”的发音“さる”又与动词“去る”（离开）相同，由此还发展出了猴子能够驱灾除难的信仰。“庚申待”（こうしんまち）即修炼者在庚申日彻夜静坐不眠，待庚申之夜，揭三猿之像以祭祀帝释天和青面金刚的仪式，起源于道教避三尸之说。“庚申信仰”如今早已深深扎根民间。

此外，猴子还被视为“厩神”而被饲养在马厩，其缘由是人们认为猴子能够“去”除马匹的灾难，保护马匹不受河童的伤害。日本人认为河童会将马匹拽入河中，但由于河童很讨厌猴子，所以一旦有猴子在，它们就不会出现（有关河童与猿猴的关系，详见下文“虚构的动物”一节）。

与猴子有关的民间传说

有关猴子的民间传说中最广为人知的当属《猿蟹合战》以及《猿婿人》了。

作为日本五大童话故事，《猿蟹合战》其实有多个版本流传于世，但故事梗概大抵如下：

猴子用柿子的种子与螃蟹交换了饭团。螃蟹认真地种下了柿种并将柿子树培育长大。而当柿子树终于结出果实时，猴子却爬上树独享

了甜柿子，并将涩柿子扔在螃蟹身上，砸死了螃蟹。螃蟹的孩子十分悲伤，找来栗子、臼、蜂、牛粪，潜入猴子家成功报了仇。

还有另一个版本的故事，叫作《猿与蟹与柿》。在这个版本中猴子虽然独占了柿子，但是螃蟹用计谋骗取了柿子并躲进了洞穴中。生气的猴子于是用屁股堵住了洞穴口并将尾巴塞进去威胁螃蟹，如果不交出柿子就要往洞穴里排泄。而螃蟹并不屈服，只是死死地抓住猴子尾巴不松手。最终猴子尾巴被夹断，而屁股上的毛也都被螃蟹弄掉了，只剩一个红红的屁股。另外，螃蟹用来夹猴子尾巴的蟹钳上却长出了毛。

除了上面这则《猿与蟹与柿》外，还有诸多民间传说讲述了猴子为何会有红屁股和红脸蛋。《猿婿人》也是这样一则故事。

一位男子在下地干活时因为腰疼而无法好好工作，于是他嘟囔道："如果谁能帮我干活的话，我就把三个女儿中的一个嫁给他。"于是从旁边的树上跳下来一只猴子，帮他干完了农活。虽然让猴子做自己女婿有些为难，但男子认为答应了的事情就应该做到，于是便去跟三个女儿商量。但是大女儿和二女儿都不同意，三女儿则表示自己愿意去，并索要了石臼和水瓮作为嫁妆。三女儿让猴子背上这些嫁妆，自己随之进入了山里。当他们来到深川边的悬崖时，三女儿让猴子爬上悬崖去给自己摘取樱花枝。于是猴子爬上了樱花树，却不幸坠落，掉入河中，由于背着石臼，猴子一直沉到了河底，而三女儿则从山里逃了回来。

这个故事也有好几个版本，无论是哪一个版本，其中的猴子都十分愚蠢。古代人将猴子视作神的使者而推崇信奉，并衍生出了"猿乐"；另外，又会让猴子出现在类似《猿蟹合战》这样的故事中，扮演狡猾奸诈的角色，或是在《猿婿人》中让猴子被人类欺骗，最终被杀死。

除了上述这些故事外，还有许多有关猴子的毁誉参半的故事。这些故事也都从侧面印证了自古以来猴子便与人类的关系十分密切。

猴子的天敌是狗。下面这则传说描述了被人类尊奉为神的猴子在加害了人类后又被狗打败的故事。在《桃太郎传说》中，虽然猴子与狗合作打败了鬼，但在这则故事中二者却上演了互相残杀的一幕，这个故事就是伊那的《早太郎传说》。

远州见付天神（静冈县磐田市）的猿神每年都会要求人类用活人做祭礼。害怕招来灾难的村民每年都会将一名年轻女子献上作为活祭

品。一名旅僧听闻这件事，感到十分悲痛，一天夜里他潜入天神社，听到了怪物在自言自语道：“不要让信浓的早太郎知道。”于是，这名旅僧赶紧奔赴信浓国去寻找这位“早太郎”，发现早太郎是伊那的光前寺（位于长野县驹根市）内养的一条狗的名字。于是旅僧借来了这条狗，替代掉原本要当活贡品的女子放入了天神寺。到了深夜，现身的怪物与早太郎进行了激烈的交战。最终，早太郎取得了胜利，咬死了这个怪物。而这个怪物其实是一只上了年纪的大狒狒。

有些版本称这只怪物是狸猫，但原初版本应该是猴子。狒狒则是阿拉伯狒狒等大型猿猴的总称。

此外，比叡山的日吉神社也将猴子看作神的使者，而在近江坂本的日吉大社（滋贺县大津市）至今都将猴子视为神猿来饲养。位于比叡山京都一侧登山口的赤山明神禅院的屋顶梁柱上摆有一只手持钱币的猴像。而位于东京赤坂的山王社（日枝神社）中，还有一对身着衣冠束带的猴像坐镇神门内侧。

还有一则猴子击败大蜈蚣并救下巨蛇的传说。这个故事里的猴子其实是人类。而此人便是三十六歌仙中的一人，平安初期的猿丸大夫。猿丸大夫作为《百人一首》中“奥山に紅葉踏み分け鳴く鹿の声聞く時ぞ秋は悲しき”（红叶深山有鹿鸣，声来闻者亦悲秋）这首和歌的作者而名声大振，但他究竟是何人、其出生去世的具体年月为何，尚无人知晓，是一个充满未解之谜的人物。

据传，猿丸大夫的本名是小野猿麻吕。从京城逃亡外地的有宇中将成为奥州小野的朝日长者的门客，并娶长者之女为妻后生下马王，而马王与侍女所生之子便是猿麻吕了。中将与妻子死后成为二荒山神，分别作为男体、女体的山神化身。但因山中之湖的纠纷，二荒山神与赤城神展开了争斗，二荒山神化作一条巨蛇，而赤城神则变成了大蜈蚣。战斗中，二荒山神本处于劣势，于是便向脸孔酷似猴子的弓箭名手猿麻吕求助。猿麻吕一直追杀大蜈蚣到利根川岸边，并使其身负重伤，最终凯旋而归。蜈蚣的血将沼泽和山里的树木全都染红了，因此现在此处的沼泽被人们称为赤沼，山被称作赤城山，山脚下的温泉为赤比曾汤，而杀死蜈蚣的那片土地则被命名为宇都宫。

熊肉料理

栖息在日本山林里的野兽中体格最为庞大，力量也最为强壮的当属熊了。

生活在日本本州、四国以及九州的熊是亚洲黑熊。其体长一米二至一米六，体重大约一百二十公斤。居住在日本的另一种熊是栖息在北海道的棕熊，体长两米左右，比亚洲黑熊的体形庞大一些，脾气也很暴躁。有时甚至会攻击牛、马或人类。

在《日本书纪》与《和名抄》中早已出现了有关“羆”（ひぐま，即棕熊）的记载，而出现在文献中的“熊”则几乎都是亚洲黑熊。

亚洲黑熊喜欢居住在深山老林里，特别是落叶阔叶林，是它们的最爱。它们以蚂蚁、蜜蜂和螃蟹等小动物为食，也会吃草木的根茎、嫩芽以及花和果实等。亚洲黑熊擅长爬树，偶尔会在树上睡觉。它们的性情比较温顺，一般只要不是迎头撞上，几乎不会对人类发起攻击。

据说如果被熊攻击，最好的办法是装死。这种说法在中国的文献和《伊索寓言》中都有出现，但其实完全是民间迷信。不仅仅是熊，很多动物都具有足够敏锐的感知能力，装死这类行为是骗不过它们的。装死反而会让熊起疑，它们可能会用一招就能折断牛和马脖子的强壮前臂去捅触装死的人，或者用牙齿去咬，因此装死反倒是极其危险的做法。

日本人将熊作为狩猎的对象。在纪州的熊野等地，人们则将其视作熊野神灵的化身而敬畏着熊。

人们狩猎熊主要是为了取熊胆和食用熊肉。熊胆由带有胆汁的胆囊干燥后制成，虽味道奇苦无比，却具有多种药效。在汉方药中也有熊胆这剂药，真正的熊胆价格十分昂贵。江户时代，甚至有一匁[47]熊胆相当于一匁金子，或者一匁熊胆相当于一俵米的说法。因此有人会熬制树皮以假乱真，冒充熊胆高价在市场上销售，而辨别真假熊胆的方法也传承了下来。

此外，日本人曾经经常食用熊肉。江户时代的宽永二十年（1643年）出版的《料理物语》中便介绍称，熊肉十分适合做汤汁料理和田乐料理[48]。受佛教影响，日本人表面上扬言不吃动物的肉，但实际上除了家养的牛、马外，日本人一直在吃兽类的肉。在《料理物语》中除了熊肉外，还介绍了狸猫、鹿、野猪等共七种兽肉的烹调方法。江户时代，还有专门卖兽肉的肉店和专门制作兽肉的料理店。

而在中国料理中，熊掌被视为山珍野味。据说熊左前肢的掌心肉以蜂蜜入味后鲜香至极。在中国，司马迁的《史记》中便载有楚成王沦为阶下囚，死前还想再吃一次熊掌的内容。在日本，平安初期的

《延喜式》中也已出现了关于熊掌的记录。成书于室町时代初期的《庭训往来》记载有盐腌熊掌。在江户时代中期的《日本山海名产图会》（成书于1799年）中也记录有津轻地区食用熊掌肉，并作成贵人膳食的部分。

除了食肉外，日本人还会将体积巨大的生物名称冠以“熊”字。如体形最大的鹰，日本人便命名为“熊鹰”，大型的蜂则叫作“熊蜂”，日本最大的蝉被称为“熊蝉”，等等。由此可见，自古以来日本人都对熊这种野兽之王怀有崇敬之情。

与人关系最亲密的鹿

鹿是与日本人关系十分密切的一种动物。绳纹遗迹中出土最多的哺乳类动物的骨头当属鹿骨了。其原因在于，首先，鹿的数量很多；其次，它们十分容易捕获；再加上鹿肉也十分美味可口。自太古时期开始日本人就一直食用鹿肉。

《延喜式》中记载了鹿肉干、腌制鹿肉等鹿肉的各种制作方法，书中甚至还记录了鹿内脏的名称。在《今昔物语集》中关于鹿肉，有描述称“煎之美味，烤之亦鲜美”。江户后期的儒学家羽仓简堂在其著作《馔书》中写道，鹿肉以冬天的最为肥嫩鲜美，鹿胸肉为最佳，后肢肉次之。据说，羽仓简堂所处的时期，最盛行的是用鹿肉做寿喜烧口味的火锅料理。

此外，鹿在日语中叫作“シシ”，为了和野猪（イノシシ）区分，也作“カノシシ”。

自古时候起，鹿除了肉可供人食用外，其他利用价值也很高。比如，鹿角和鹿骨可以加工成各式各样的工具，甚至可以制作成捕鱼用的鱼叉、钓针等；鹿的毛皮柔软结实，可以做成去山林打猎时披着的外披或骑马时的护腿。而尚未完全骨质化的袋角即鹿茸，是一剂汉方药材。

鹿经常会出现在村落附近，有些地区的人视鹿为神的使者，因而禁止捕食鹿，在这些受到保护的区域，鹿与村落的人十分亲近，人们也会给这些野生的鹿喂食。如春日大社的神域奈良公园、安艺的严岛神社、宫城的金华山，等等。

另外，日本也曾盛行猎鹿。从中世纪到近代，武士家的围猎捕获的几乎都是鹿。一次围猎能够捉到数百头鹿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即便

如此，鹿的数量并没有减少，大概是因为鹿有着极其旺盛的繁殖能力，而这也得益于良好的自然环境。

然而，自古以来，鹿也是破坏庄稼的代表性动物。为此，人们发明出了各式各样的用来驱赶鹿的器具。

秋天是鹿的繁殖期。从初秋到仲秋，雄鹿呼唤雌鹿的叫声似乎带着一丝丝哀愁，唤得人心潮涌动。

夕されば小倉の山に鳴く鹿は

今宵は鳴かず寝にけらしも

（傍晚时分至，小仓山鹿鸣；今夜却无声，或是已入眠。）

——舒明天皇，《万叶集》卷八

山里は秋こそことにわびしけれ

鹿の鳴く音に目をさましつつ

（山村小木屋，更觉秋寂寥；夜闻鹿鸣鸣，几度梦中醒。）

——壬生忠岑，《古今和歌集》

如上面这两首和歌般，自《万叶集》以来，在红叶中想着伴侣的雄鹿的鸣叫与模样，成了诗歌和绘画的题材。

现如今，猴子、熊、鹿栖息的家园中有很多都遭到了人类的破坏。山里的野兽急剧减少，而与这些山里的野兽在自然中共处才孕育出的日本人的文化感性也正急速消失。

五　虚构的动物

有害却被人们喜爱的河童

说到日本人最熟悉的虚构动物，当属之前提到过的河童了。河童是一种北至青森，南至冲绳，在日本各地的河川和沼泽中均存在的妖怪。

河童的发音“カッパ”原本是日本关东地区的方言，并且人们还会称其为“カワワッパ”“カワッパ”“カワランベ”“カワワラシ”等，不论哪个发音，写作汉字都是“河童”；但也有地方写作“河太郎”（カワタロウ、ガタロウ）或“河児”（カワコ）。无论读音不同还是写法不同，上述说法从意思上都是指河里的儿童。

不同地区的河童，外貌与属性也存在差异，但大致相同的是以下这些特征：有着儿童般的模样；生活在水里；发型是经典的河童头；头上有一个装满水的碟子，如果碟子里的水干了河童就会死去；手脚都是三根指头，且有蹼；身体颜色为绿色、黑绿色或灰色，偶尔会有红色；手臂可以伸缩自如，可以左右横穿；最喜欢吃的食物是黄瓜。

关于河童行为的说法各异，但共通的是一种可怕特性——河童会将马拽入河中，或者将在河边玩耍的小孩或大人的“尻子玉”拔出，使之溺水而亡。“尻子玉”指的是古时候日本人想象出的肛门内的一颗球。据说溺水而亡的人肛门之所以呈打开状态，在古人看来就是因为被河童拔去了“尻子玉”。

河童的“驹引”（拽马）传说广泛分布于日本各地，为避免劫难，人们会在马厩中饲养猴子或在马厩中挂上绘有猴子牵马图案的绘马。据说这是因为猴子与河童交恶，猴子一看到河童就会去捉住它们。至于为何河童喜欢将马拽入河中，则不得而知。此外，还有不少地方传说河童每年会有两次在山和河之间移动。

虽然河童是可怕的妖怪，但相当呆笨，所以也有不少行动失败的故事流传于民间。据说它们喜欢相扑，会向人类挑战，一旦输了就会破坏农田、作恶多端。但是它也会在厕所摸女性屁股或者在拽马失败时被人类抓住并砍去胳膊。为了要回胳膊，河童写下道歉书，或告诉人类灵丹妙药的制作方法作为谢礼，这些道歉书和谢礼在日本各地都

有流传。甚至还有说法称，若是和人类处好了关系，河童还会帮人做农活或者在农田里除草等，这些时候河童的形象就非常惹人喜爱了。

关于河童的起源，在天草地区流传着下面这样的传说：

左甚五郎曾负责监督筑城工程，但因人手不足，眼看着无法在工期内完工。于是他便制作了许多人偶，并将生命吹入人偶中使它们“活”过来充当人手，最终顺利完成了筑城工程。工程结束后，左甚五郎将这些没用了的人偶扔进了河里打算冲走，这些人偶便问道：“今后我们该吃什么活下去呢？”于是，左甚五郎回答道：“吃人的屁股吧。”由此这些人偶生活在河里并最终变成了河童。

关于河童的种种传说，江户时代以降才流传起来。在那之前的文献中几乎完全没有河童的记载。而在江户时代的地志类书籍《和汉三才图会》及《利根川图志》《日本山海明物图会》等书籍中则有许多关于河童的记载，并且在《百鬼夜行》和其他妖怪集，以及诸如《耳袋》等奇谈集中，河童也有登场。

此外，日语中还有许多跟河童有关的谚语。

“河童の川流れ”（直译为河童的河流）指即便是某方面的高手，也会有失败的时候。而“河童の木登り”（河童爬树）则用来比喻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或即便要做也做不来之意。“河童の屁”（河童的屁）或“屁の河童”（屁之河童）都是用来形容不足取、不值一提的事情或者毫不费力之事。这是因为即便在水中放屁，也不过是咕嘟一下冒个气泡而已，毫无气势可言。另有一种说法称“河童の屁”或“屁の河童”其实是“木端の火”（直译为木屑的火，即微弱之意）的误传。

到了近代，柳田国男在《远野物语》中写道：“河中多有河童居住，尤以猿石川居多。”此外像《山岛民谭集》所描写的那般，日本各地都有河童传说流传。在远野地区，至今仍有老人坚称自己在儿时曾在常坚寺后面的足洗川看到过河童。

但今天，日本的河川大多被水泥墙围起，或建起了大坝，又或者被人类污染，河童的传说也随着环境的恶化逐渐消失。池塘和沼泽亦是如此。被人类夺走了生存家园的这种可恨又可爱的小妖怪究竟去哪里了呢？

腾空呼风唤雨的龙

要说到与水不可分离的虚构动物，自然首先会想到龙。这种虚构动物与上一节的河童比起来，体量要庞大得多。西洋称其为“Dragon”，中国称之为“龙”。日本所说的龙便由中国传入。

十二支中的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原本是用来表示方位和时刻的说法，并分别用来对应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这十二种动物，而这些动物中只有龙是虚构出来的。

尽管从来没有人见过龙，但谁都知道龙长什么样子。明明是十二生肖中唯一一个虚构出来的动物，但与另外十一种真实存在的动物摆在一起，竟毫无违和感。至于原因，大概是龙对于日本人来说，古时候曾是非常亲近的动物。在十二生肖中，被用于雕刻、绘画、纺织品等美术工艺中的动物图案，龙压倒性地占了首位。不知不觉中，龙已经以眼瞪八方或威严鸣吼之姿出现在了天花板的图案上，柱子上也雕刻着五彩的龙，屏风画和挂轴上也常见龙的英勇姿态。很多祭奠活动中都会有“龙”出场。此外，龙神传说、龙王与龙宫传说、相传是龙居住的湖泊沼泽或洞窟等，在全日本不胜枚举。此外，带“龙”字的地名也有许多。

但龙却并非日本独有的虚构动物，它的原产地是中国。

龙平时生活在水里，有时会带来降雨，时机一到它就会飞升上天。据悉，这种对龙的想象在中国的新石器时代，也就是五千多年以前就已经形成了。当时的玉器上业已出现龙的形象。甲骨文中也已有了“龙”的古字。

渐渐地，龙在古代中国成为象征新皇帝即位的瑞祥之兆，进而成了天子的象征。比如，龙颜指的是天子的脸，龙驾和龙车都是天子乘坐的车马，龙旗是天子的旗帜。此外，龙也成为皇帝在典礼等仪式上穿着的服饰上的重要图案。

《礼记》中“龙”与“凤”“麟”“龟”并称为四灵。到了汉代逐渐形成了四神的观念，而龙也是四神之一。这四神很早就传入了日本，在日本人的理解中这四神是守护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神兽。即守护东方的青龙、守护南方的朱雀、守护西方的白虎、守护北方的玄武。高松冢古坟和龟虎古坟石室的四面墙壁绘有四神图已广为人知。此外，皇宫中南面的正门被叫作“朱雀门”也源自四神守护四方位的思想。

时代推移到庆应四年（1868年，即明治元年），戊辰年的会津战

争时，会津藩按照年龄编制了“白虎”（十六岁至十七岁）、“朱雀”（十八岁至三十五岁）、“青龙”（三十六岁至四十九岁）、“玄武”（五十岁以上）四支部队。这四支部队与由四个方向进攻而来的西军进行了对抗。而这场战役中白虎队的悲剧可谓家喻户晓。

接下来，我将为大家介绍一下日本人对龙的普遍概念。龙形似巨大的蛇，有着尖锐的爪子和短小的手足，背上覆有八十一枚鳞片；头部有两根好似鹿角的犄角，嘴边有长长的胡须。龙会住在大海或池水等水中，又或是地下；能够掌控水；会随着龙卷风升空并呼云唤雨；人们将龙视为龙神而崇拜、敬畏；若惹得龙神不高兴，就会出现干旱或洪水等灾害。

《今昔物语集》中有这样一则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奈良有一座名为“龙菀寺”的寺庙。不知何时，化作人形的龙来到这间寺庙，与每日诵读法华经的僧人渐渐熟悉起来。随后人们都知道了这件事。某一年，各国大旱，百姓深受其苦。于是，皇帝唤龙菀寺的僧人来到宫中，命令僧人道：“你去命令龙消除干旱！”于是僧人回到寺庙与龙商量此事，龙回答道：“本就是畜生之身的我因自己的恶性而苦恼，托你诵读的法华经，我才能逃离痛苦。所以我要报答你的恩情。”于是，龙在约定好的那一天令天空降下了倾盆大雨，这雨下了整整三天三夜，滋润了干枯的农田。

此外，在《宇治拾遗物语》中还有下面这样一则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奈良有一名叫作惠印的僧人。某天，惠印恶作剧在猿泽池边立了一个写有“某月某日，此池将有龙升空”的牌子。随后，这个原为恶作剧的事情传开，牌子上所写的这一天到来时，许多人都来到猿泽池，打算一睹龙的真容。原本惠印对很多人受骗还感到很开心，但没有想到会来如此多的人，于是自己也开始怀疑，会不会真有龙出现，便也来到猿泽池想一探究竟。但是人们左等右等都没有龙出现的迹象，最终夜色降临，也并没有龙出水升空。

这则故事讲述了一个骗子最终也被自己的恶作剧所骗的故事。芥川龙之介以此为原型创作了《龙》这部短篇小说。但在这本小说中，龙真的浮出水面升上天空，原本打算戏弄众人的惠印愿望落了空。

我现在所在的见沼田圃，原本是江户时代的享保年间（1716年—1736年）开拓的一大片沼泽地。当地古神社保留了湖水信仰，至今仍流传着龙神的传说。

虽然龙的传说在日本各地仍保留下来许多，但如今适合龙栖息的环境已经不多了。那么，被夺走了栖息地的龙现在又藏身于何处呢？

对日本人来说最可怕的鬼

想象出来的动物中最可怕、最优雅，同时也是日本人最为熟悉的应该就是鬼了。带“鬼”字的地名在日本各地均有出现，而这些地区大多与鬼的传说有关。此外，日本人的姓氏中也有许多带“鬼”字的，动植物的名字中冠以“鬼”字的同样不在少数。而有关鬼的祭祀活动或民俗庆典在日本各地依旧兴盛不衰。

自古以来，就有说法（《和名抄》）称日语的“鬼”（オニ）来自“隐”（おぬ）字的发音，后者表示人看不见的隐居。死灵中的恶灵是鬼，怪物、魑魅魍魉也都是鬼，《百鬼夜行》中的“百鬼”是夜间嚣张跋扈的怪物的总称。

据悉，汉字“鬼”在日语中的训读定为“オニ”是平安时代的事情。“鬼”这个字原本是指死者灵魂的汉字。所以“魂”和“魄”这两个字中都有“鬼”字。人死后会入鬼籍等说法也是由此而来。顺便一提，“鬼籍”指的是记录死者戒名（法号）的账簿，也称作“鬼录”或“鬼簿”。

日本的鬼最常见的形象为：外貌虽似人类但身高超八尺（两米四）；肤色为红、绿或黑、黄等，并不统一；骨骼强壮，体毛浓密；头发是卷毛，头上还长着一个或者两个角；身穿虎皮兜裆布，手持大金棒；有一个或两个眼睛；大獠牙从大嘴中露出。

在《今昔物语集》《宇治拾遗物语》《古今著闻集》以及《日本灵异记》等书中都有这样的鬼出现并取人性命。在《出云风土记》中也记载了一个独眼鬼吃了田夫的故事。

此外，“记纪”中也有鬼登场。伊邪那岐被黄泉的恶鬼追赶，并在黄泉比良坂向恶鬼投掷了桃子果实，以此来防御鬼的进攻。古代中国有说法称，桃子可以防止死灵带来的灾祸。

在桃太郎的故事中，桃太郎击退了鬼，而他是从桃子中生出来的，这恐怕也借鉴了桃子可以击退恶灵的特性吧。

而在历史上以击退鬼而闻名的是渡边纲。

渡边纲是嵯峨源氏的子孙，也是平安中期的武士。同时他是源赖光的得力干将，与坂田公时[25]、平贞道、平季武并称赖光四天王。

在《今昔物语集》中，有一则渡边纲打败了本想袭击源赖光的鬼同丸的事迹。此外，《平家物语》中也记载了下面这样一则故事。

某一天，渡边纲在一条堀河的戾桥遇到一位美女并与之一路同行。但到了五条渡这位美女突然变成了鬼。于是，渡边纲用源赖光交给自己保管的名刀“髭切”向鬼砍去，鬼的一条手臂被砍断，然后便飞向了爱宕山。随后，渡边纲听从了阴阳师安倍晴明的忠告进行了斋戒，封印了鬼的手臂。但他耐不住故乡过来的养母的再三恳求，给养母看了鬼的断臂。他刚把断臂拿出来，养母就变成了鬼，夺走断臂后从“破风”（正门屋顶的装饰部件）处飞走了。由于发生了这件事，自此渡边纲便不再建造破风，而改为“东屋造”（棱锥形屋顶建筑）了。名刀“髭切”也改名为“鬼丸”。

之后这则故事发展出了多个版本。《太平记》中渡边纲砍断鬼手臂的地点在大和国宇陀郡的大森。而在能乐《罗生门》这部剧中，渡边纲则是在罗生门砍断的鬼手臂。《御伽草子》中的《罗生门》这个故事中，夺走鬼手臂的人是源赖光，而鬼化作了源赖光的母亲。此外，在能乐《大江山》《御伽草子》中的《酒吞童子》中，则是住在丹波大江山的酒吞童子和其同伙攻击源赖光和渡边纲等四天王。

鬼的概念也与佛教密切相关。“饿鬼”是死者的一种形态，为六道轮回之一，在这一道中鬼终日饥饿，连人的粪便都吃。饿鬼往往看起来十分瘦弱，脖子细到仿佛食物无法通过，却有着与身形完全不相符的鼓起来的大肚子，虽然饿鬼外貌令人作呕，但他们并不吃人。

天邪鬼会践踏、破坏佛像中的四天王像和三门的仁王像等。虽然他在人间作恶多端，但是可以通过佛法将其封印在佛像的台座之中。

另外，还有一些鬼是向佛的。奈良兴福寺的天灯鬼像与龙灯鬼像便是维持佛祖前灯火长明的佛祖的随从。作为地狱狱卒的鬼也要承担起相应的职责。原本地狱的狱卒长着牛头人身，样貌十分怪异，因此也算鬼的一种。

虽然很多鬼都是穿着兜裆布的男性形象，但是在渡边纲砍断鬼手臂的故事中出现的是女鬼，与此类似，有不少女鬼的形象被塑造出来。有说法认为女人上了年纪就会变成鬼，因此在日本各地流传着许多鬼女传说。比如，安达原的鬼婆传说便十分著名。据说鬼婆会让旅行者住下，趁着他们睡着时杀了他们食其肝脏。

みちのくのあだちが原の黒冢に

鬼こもれりと聞くはまことか

（陆奥安达原黑冢，有鬼据守可真否？）

——平兼盛，《大和物语》

《拾遗和歌集》中收录的上面这首和歌随后被改编成了谣曲《安达原》（《黑冢》），到了近代又发展出了《奥州安达原》这一歌舞伎狂言剧目。

关于鬼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童话故事和民间传说除了《桃太郎》外，还有《瘤取爷》《大工与鬼六》等，这些故事中的鬼与其说令人感到恐怖，倒不如说让人倍感亲切。

此外，小孩子玩的捉迷藏在日语中叫作“鬼ごっこ”，而这里的“鬼”也就是恶灵，要去捉逃跑的人。而被捉到的人会被鬼同化。所以为了不被捉到，大家要四散开来到处躲跑。

归根到底，鬼还是与死者有关，对于人类来说，他们更多的是带来灾祸的不明怪物。所以在日本，迎接新年时，要在立春的前一天晚上举行“追傩”（ついな，一种驱鬼仪式），人们口中唱着“福入内，鬼出去”并撒豆子，以此来祈求新的一年全家安康，没有恶灵骚扰。

此外，日本还有天狗、鵺、狐狸妖怪、食梦貘等许多虚构的动物，关于这些，我会另寻机会为大家介绍。

后记

我自大学毕业后进入出版社工作，从事历史杂志与历史图书的编纂工作三十年后，便萌发了想要自己执笔进行创作的念头，并于昭和五十年（1975年）前后开始了历史类随笔和历史文艺评论等写作。但这一时期我其实并没有特别想写的东西。

昭和五十六年（1981年），当时我供职的同人杂志（《文人》第二号）曾刊登了我写的这样一段文字：

我的工作性质使得我有很多机会阅读历史书籍。虽说是阅读，但其实大部分时候都是用偏颇的眼光去看待这些书。从学者、研究者的论文到历史小说以及历史资料等我都经常翻看。

话虽如此，但我的历史知识是浅薄的，既没有独立的历史观，也没有擅长的领域。若要说我不争气我也无可反驳，但我一直认为历史杂志的编辑就应该是这样一种状态。

也就是说，我其实一直刻意让自己不要变成历史方面的专家。虽然这听起来很像是为自己找借口。或许如果我自认是专家的话，那么就会踏入历史学家和历史作家的领域，而我也会将自己的历史观强加于读者身上，那么我编辑的杂志也会变成很有偏向性的东西。

兴趣虽然最开始会有偏移，但最终会缩小范围，拥有自己的特性。

拿我自己举例，我从初中到高中最热衷于捉蝴蝶。刚开始的时候，只要是蝴蝶我就喜欢，更多的是热衷于收集种类更全的蝴蝶。但随后我有了一起捉蝴蝶的小伙伴，然后我们各自也有了自己擅长的领域，于是便开始专注于捕捉某一类的蝴蝶又或者是全心扑在收集蝴蝶卵和幼虫，饲养它们长大，同时进行观察上。

原本只要是跟蝴蝶相关的事物我都感兴趣，但渐渐地我开始有了自己的喜好，最终我找到了自己的挚爱——翠灰蝶。

到了这种程度，基本上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兴趣爱好，而我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蝴蝶方面的专家了。对于那些普通常见的蝴蝶，可以说

我毫不心动。

如果我一直坚持下去的话，或许兴趣的范围会进一步缩小，比如最后我就会写出一篇《论翠灰蝶在生殖中A、B、AB、O型的适合与不适合及RH因子》之类的论文，然后给自己戴上昆虫学家的帽子。

但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随后我渐渐远离了当初热爱的蝴蝶，现在对于蝴蝶的兴趣只停留在少年时代的回想之中。

我想说的是，作为大众历史杂志的编辑，我并不是想告诉大家自己曾经过度追求兴趣，差点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而是想说，对于一个兴趣的深入，会导致更多的兴趣被丢失，这件事很可怕。

但是，一旦我离开了历史杂志编辑的岗位，我认为自己会重新努力寻找自己与历史的关联吧。那时的我将如何缩小我在历史方面的兴趣，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无法想象。

我辞职是在写下这段文字的十五年以后。这期间我对于历史的个人兴趣又分出了好几个领域，并进一步酝酿升华。

我在某一个时期开始发现，历史也好，文化也好，当然是人类创造出来的，而其创造背景中往往都伴随着那个地区的风土与自然。我认为如果抛开自然环境和自然状况，就无法谈历史。我们往往很容易仅仅将目光放在某个人物的行为上，但那时开着什么样的花、有什么样的鸟儿在鸣叫、刮着什么样的风，应该都是与历史密切相关的。毫无疑问，古时候的人比现在的我们拥有丰富得多的自然知识。这样一来，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了解自然，就无法充分理解古时候的人所理解的历史与文化。

比如，我们来翻阅看看《太阁记》。

贱岳之战后，待在越前北庄城的柴田胜家与阿市在决战前夜咏诵了包含杜鹃一词的辞世歌。时间是天正十一年（1583年）四月二十四日，相当于现在的6月13日前后。柴田胜家与阿市那时已经知道，太阳升起时便是丰臣秀吉大军开始猛攻之时。在天亮前，正如暴风雨前的平静，二人肯定听到了杜鹃不断地啼鸣。杜鹃这种鸟整个夏天都会在日本各地啼叫，而且啼鸣声在天亮前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对于如今并不知道杜鹃何时以及如何啼叫的现代人来说，二人所作的辞世歌的背景似乎就很难理解透彻了。此外，杜鹃也被认为是能够搬运死者灵魂的鸟，是能够往返于冥界与人间的鸟。如果能够了解到，传说杜鹃也会因追忆往昔而啼鸣的话，那对于柴田胜家与阿市的辞世歌似乎就

能有更深一层的解析了。

但遗憾的是，大多数现代人已经失去了这种感知。

在我辞职后不久，月刊《MOKU》的山口阳一先生就对我发出了邀约，希望能够连载我现在最想写的东西。我毫不犹豫地决定要写《花鸟风月日本史》。经过三年的连载，最终得以成书问世。也就是说，这本书其实是我第一次独立创作出来的作品，也是经过十五年的沉淀与酝酿后最想动笔写的题目之一。虽然本书中还有许多没有写到的内容，并且里面也包含了自己独断或有失偏颇的观点，但对我来说这是一本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书。我也希望能够得到诸位读者的感想与指正。

在为连载写稿的三年时间里，我的交稿时间总是拖延。在此，我也想向三年来坚持刊登我的文章的山口先生以及《MOKU》编辑部，还有负责将我写的内容制作成书的松泽隆先生表示由衷地感谢。

此外，本书在执笔过程中，也参考了许多史料、事典以及辞典类书籍和参考文献。

关于引用的史料和参考文献等，在正文中均有明确表述。而像《古事记》《风土记》《万叶集》《古今和歌集》《新古今和歌集》《枕草子》《源氏物语》《今昔物语集》《平家物语》以及《太平记》等古典文学的内容则主要以《日本古典文学大系》（岩波书店·旧版）为底本，并适当参照了岩波文库的其他文库化书籍。关于《日本书纪》则是以岩波文库版为底本。此外，有关近代的各种随笔等内容，则主要参考了《日本随笔大成》（吉川弘文馆）、《东洋文库》（平凡社）、岩波文库版各类书籍。事典与辞典类则主要选取使用了《世界大百科事典》（平凡社）、《国史大辞典》（吉川弘文馆）、《日本史大事典》（平凡社）、《日本历史地名大系》（平凡社）、《日本国语大辞典》（小学馆）、《日本大岁时记》（讲谈社）、《谚语大辞典》（小学馆）、《日本奇谈逸话传说大事典》（勉诚社）、《民俗学辞典》（东京堂出版）、《说话文学辞典》（东京堂出版）、《广辞苑》（岩波书店）。

除了上述著作、书籍外，我从当编辑时出版的杂志书《自然与人类的日本史》系列（《鱼的日本史》《花的日本史》《鸟的日本史》《树的日本史》《虫的日本史》）中也获得了不少灵感与帮助。其他的书名恕我不再一一列举，但为了完成这本书，我确实参考了众多前人的研究和论文以及随笔等。在这里我想表达自己深深的谢意。

最后，关于本书中的一些说法我想稍作说明。关于书中的动植物名称，（在日语版本中）原则上各个名称在首次出现时都采用了其汉字形式，第二次以后出现则使用了假名来表示。但对于很多日本人并不熟悉的汉字，则一律采用了假名表示。还有一些汉字表示反而更常见的名称，则一律通篇使用汉字表示。关于神话中的人物名称，由于《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中的名称并不一致，所以书中具有多个名字的人物，会使用括号加注。而“记纪”与《万叶集》等原文本采用万叶假名或汉文体的内容，则并未使用原文，而主要采用了岩波文库等文献所使用的读解版假名，以便更好地理解。其中有些地方也掺杂了我自己的解读。

如果本书能够多多少少唤醒人们对“花鸟风月”——对于日本人来说可称为内心文化遗产——的兴趣的话，那将带给我至高的喜悦。

平成十二年（2000年）十一月

文库版后记

三月十一日的下午，风尚有些寒意，但也渐渐开始感受到初春的气息飘浮在空气中，正好在我对这本书进行校对时，一场九级大地震袭击了东日本。海啸还席卷了东北地区到关东地区的太平洋沿岸城镇，不仅仅是建筑物，连很多人宝贵的性命都被大海夺走了。

家住埼玉市的我虽然很幸运没有受到灾害的袭击，但是看到电视上播出的各地惨状，只能悲痛地闭上眼睛。在各类报道中，总是能听到“预料之外”这样一个词，或许天灾往往就发生在人们预料之外吧。不论科学如何发展和进步，人类始终不可能控制自然现象，也无法规避天变地异。

回顾日本的历史，地震、海啸、火山喷发、台风、大火，等等。迄今为止究竟遭受过多少灾难已无法得知。但每一次，日本人都能够克服困难、重新出发，继续创造新的历史。

灾害带走的不仅仅是人的生命与财产。还有许许多多生物的生命也都被灾难夺走，比如在大自然中生活的动物，牛、马、羊、猪等家畜，猫、狗等宠物，鸡、鸭等家禽以及野鸟和昆虫，也都因各种灾害丧命，甚至是花草树木等植物也遭受了巨大的磨难。

这一次的大地震想必又带走了许许多多的生命。

电视上播出的受灾的海边城镇仿佛拒绝生命存在一般，瓦砾、木屑堆积成山，随着黑浑的海水一股脑涌上来。但人类一定能在那里重新燃起生命之灯，重建美好家园。我相信到那时，草木也将重新发芽，鸟、兽、虫也将再次回归，在新的自然中与人类共生。

无论何时，人类与大自然都是一体的，无法分割开来。大自然为人类提供了无尽的恩惠与安乐，但有时也会露出獠牙向人类发起攻击。再次阅读本书后我有感而发，于是便想以这些感想作为之前后记的补充。

平成二十三年（2011年）三月十二日

(1)　野分（のわき），台风的古称。日本人认为，从二百十日（にひゃくとおか，指从立春开始的第二百一十天，约在9月1日左右）开始至二百二十日，期间常常有台风侵袭，因而往往将二百十日这天视为厄日。——以圆括号加上数字（(1)(2)(3)等）标识的注释为编者注，下同。

(2)　旧地名，位于福井县三方郡内。现已于2005年与远敷郡的上中町合并为若狭町。

(3)　たなかみやま（tanakami-yama），日本古代重要的木材产地。

(4)　按日本“尺贯法”计量体系，1 丈约为3.03米。

(5)　奈良县生驹郡斑鸠町的法隆寺西苑发现的遗迹。人们普遍认为它就是初代法隆寺的遗址。

(6)　侘寂（わびさび），一种讲求古朴、幽玄、静寂、残缺的日本传统美学理念，受禅宗思想影响颇深。

(7)　日本对市、町、村等最底层地方行政单位的统称。

(8)　町（丁），日本传统的“尺贯法”度量体制中的长度单位（亦为面积单位），1里等于36町，1町等于60间，1间等于6尺，1尺为10/33米。因而这里的“一里冢”间隔约为3927.27米。

(9)　希腊裔日籍小说家，原名Patrick Lafcadio Hearn，1896年归化日本。

(10)　骑手或舞乐表演者所戴的一种冠冕。

(11)　该年代划分为作者的个人看法，和我国的年代划分不同。

(12)　庆云二年本为705年，但葛野王去世日期是庆云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为公历的706年1月9日。

(13)　日本传统的艺道流派中常见的一种立派和传承制度。其中，“家元”（いえもと）指流派的创始人、掌门人，具有高超的技艺，同时享有类似一家之长的最高权力，师徒间有明确的等级区分。

(14)　以上节日均采用日本阴历日期，因受中国阴历影响，两种传统历法有许多共通之处。

(15)　桜前線，全称“桜の開花予想の等期日線”，指预测日本各地开花日期的等值线。每年日本气象厅或民间气象预测机构都会提前绘制并发布樱花前线，以便人们安排赏樱活动。

(16)　枕词，即日本古代的歌文（尤其是和歌）中，冠于特定词语前，用于修饰或调整语句的词语。

(17)　《圣经》原文并未记载宁录射箭的事迹，只提及他“是世上英雄之首”，并主持建造了多座大城。实际上，宁录射箭的传说是在后世几大宗教形成过程中逐渐流传开来的，其形象也逐渐被定位为反叛上帝者。

(18)　参见后文中白鸟与垂仁天皇皇子誉津别命的传说。据《日本书纪》，垂仁天皇为汤河板举赐姓“鸟取造”时，也一并设立了鸟取部、鸟养部（鸟饲部）。

(19)　日本律令制体系下，特定部门中的一种下等官职，多掌管杂务。

(20)　根据日本尺贯法计量系统，1坪合3.3057平方米。

(21)　指的是日本的中部山岳，由飞驒山脉（北阿尔卑斯）、木曾山脉（中央阿尔卑斯）与赤石山脉（南阿尔卑斯）组成。19世纪的英国工程师威廉·戈兰德来到飞驒山脉后，以欧洲的阿尔卑斯山为其命名。

(22)　平安时代的藤原北家为了掌权，以摄政或关白的职位辅佐天皇，这种摄政形式即摄关政治。平清盛在当时以非凡的才能和强悍的政治手腕，令伊势平家一系压过了源氏，盛极一时，建立了日本历史上空前的武士家族政权。

(23)　大宰府中的次官。大宰府，即中世纪时设立于日本九州筑前国的地方行政机关，也是古代九州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

(24)　指天皇的直辖领地，此处特指江户幕府的直辖领地。

(25)　一作“坂田金时”。

[1]　日语中，“橋”读作“ハシ”（hashi）；“箸”也读作“ハシ”，与“橋”假名相同但音调不同；“柱”读作“ハシラ”（hashira）。——以方括号加上数字（[1] [2] [3]等）标识的注释为译者注，下同。

[2]　《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的总称。

[3]　柱子直接深埋入土的建造方式。

[4]　ちぎ，屋顶上沿斜面交叉安装的长木板。

[5]　专指修建宫殿等建筑的木匠。

[6]　日本佛寺内的职位，即管辖大寺院的僧官。

[7]　译文取自李芒译本《万叶集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8]　指在屋外隔墙便能看见的松树。

[9]　たいまつ，即火炬。

[10]　今奈良县御所市东北部的国见山。

[11]　当时京都以东诸国的总称。

[12]　日本古代的铜镜。自平安时代起，日本和镜工艺日趋和风化，至江户时期，已发展出独特而鲜明的审美风格。

[13]　直译成中文是“蝴蝶梦的第一百年”。

[14]　与表示烦人、令人讨厌之意的词语“煩い”同音。

[15]　直译：虫子待的地方不好。

[16]　直译：虫子平静下来。

[17]　直译：虫子很合适。

[18]　直译：虫子很好。

[19]　前一句直译为：晚上的蜘蛛即便像父母一样，也要杀之；后一句直译为：早晨的蜘蛛即便像鬼一样，也勿杀之。

[20]　以上两首和歌译文取自杨烈译本《古今和歌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

[21]　東風吹かば匂ひおこせよ梅の花、あるじなしとて春な忘れそ。出自《拾遗和歌集》。

[22]　“牡丹雪”意为鹅毛大雪，将大片的雪花比作牡丹的花瓣；“牡丹饼”是一种日式和果子，因形似盛开的牡丹而得名；“牡丹枪”即前端裹上布或毛的练习用长矛；“牡丹刷毛”是一种粉刷，刷头毛量丰富似绽放的花；“牡丹海老”即牡丹虾，因色泽鲜红而得名。

[23]　日语“无口”发音与“栀子”相同。

[24]　这首歌的大意是：世人都将萩花视作展现秋日风情的典型，此说法亦可，而我则将尾花视作秋天最风情万种的花。

[25]　该诗译文取自杨烈译本《古今和歌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

[26]　直译为“黄莺卵中的杜鹃鸟”。

[27]　“野辺”在日语中亦有火葬场之意。

[28]　又名歌牌，来源于葡语中的“carta”（纸牌）一词。印有《小仓百人一首》的百人一首歌牌自江户时代兴起，颇受欢迎，如今“歌牌”一词大多指的是百人一首歌牌。

[29]　可写作“田鹤”“多豆”“多头”“多津”“多都”等。

[30]　直译为麻雀百岁亦不忘跳舞，意译可作“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31]　かみがた，自江户时代起指京都、大阪一带。如今在广义上指日本本州中西部的京都近畿地区。

[32]　大意为老婆第一，其次是悍风。

[33]　指神或天皇的威望。

[34]　通过大和国的道路，特别是指从京都五条经伏见、木津通向奈良的道路。

[35]　原意是风云急变，后比喻形势紧急。

[36]　古时日本宫廷中准许上殿之人。

[37]　“大阪城代”为江户幕府的职称，是幕府在大阪城的代表；“老中”同为江户幕府设立的职位。

[38]　江户时代直属于将军的下级武士。

[39]　即危机当前，德川家康越过伊贺的山地到达伊势境内，从海路回到三河、远江的这段传奇经历。

[40]　百足即蜈蚣。

[41]　立秋前的十八天中的丑日。

[42]　日本一种特有的酒，将鱼鳍割下，小火烧烤片刻后浸泡在清酒中饮用。

[43]　相传为神武天皇出征时所唱的歌谣。

[44]　“入鹿”（いるか）的发音与“海豚”（イルカ）相同。

[45]　神社正殿或寺院正堂，位于内阵外侧用于参拜神佛的地方。

[46]　公方为近代日本的一种称呼，指统治者。

[47]　匁（もんめ），日本古代计量单位，约等于3.75克；后文的“俵”（ひょう）同样是日本古代的计量单位，约为60千克。

[48]　田乐料理，即用签串起来后，沾上甜味噌酱制成的料理。



未读 Club

为读者提供有温度、有质量、有趣味的
泛阅读服务



专属社群 独家福利
精品共读 活动特权

手机扫码
加入未读 Club 会员计划


法


兰

目录

版权信息
前言
第一章　征伐与封建的古代法国
第二章　浴血而生的高卢人
第三章　艺术与政治交错的中世纪
第四章　太阳王，究竟有多辉煌
第五章　王朝衰落的主因是启蒙运动吗
第六章　大革命和拿破仑的文化政策
第七章　又一个拿破仑
第八章　内部变质的第三共和国
第九章　 战胜国的悲惨世界
第十章　 几乎沦为德国的一个省
第十一章　冷战中的第四共和国
第十二章　戴高乐谱写的黄金十年
第十三章　从蓬皮杜到希拉克
第十四章　经济衰退下的法国去向何方
第十五章　为什么法国人自认为是“例外”
返回总目录

版权信息

重新发现欧洲：法兰西何以成为法兰西

A BRIEF HISTORY OF FRANCE

作者：[英] 塞西尔·詹金斯（Cecil Jenkins）

译者：高银

出品方：未读·思想家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Copyright © Cecil Jenkins 2017

First published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 2017 by Robinson, an imprint of Constable & Robinson. This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ttle, Brown Book Group, London.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0 by United Sky (Beijing) New Media Co., Ltd.

前言

为何要写一部法国史？它向我们讲述了什么？是关于今日之法国，关于欧洲，还是关于我们自己？

毫无疑问，法国是个众生向往之地，它是全世界访问量最大的旅游胜地。诚然，法国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拥有诱人的、完善的基础设施，同时还保留着一种空间感与乡村魅力，毕竟它是西欧最大的国家，有着广袤无垠的平原、森林与高山大川，还有风貌迥异的大西洋与地中海海岸线上那些美丽迷人的海滩。法国领土从欧洲大陆的北部延伸至南部，这使得它的各个地区气候多样，从诺曼底到蔚蓝海岸，从拥有凯尔特传统的布列塔尼地区到有着如画般德国式美景的东部阿尔萨斯大区。然而，抛开这一切不谈，对于许多人来说，吸引他们的是长久以来存在的法国这个“概念”本身。人们透过一面交织着历史积淀、文化内涵与法式生活理念的棱镜，看到了一个近乎传奇的国度。

这面棱镜折射出的光景始于“太阳王”路易十四豪华奢靡的凡尔赛寝宫；源自阴郁灰暗的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The Conciergerie），法国大革命期间许多人最终从这里走上了断头台；源自荣军院内的拿破仑墓，以及由两次世界大战死难者齐整的坟墓所构成的巨大墓园。许多历史遗迹也倒映于镜中——从阿尔勒与奥朗日的罗马纪念碑，到亚眠与沙特尔的中世纪大教堂；从枫丹白露与香波城堡的皇家宫殿，到巴黎诸如玛德莲教堂与军事学院之类的各色建筑。当然，还有巴黎百花齐放的艺术——从神秘的多尔多涅洞穴壁画，到卢浮宫或者不久前开馆的非比寻常的巴黎原始艺术博物馆。法国绘画，尤其是19世纪、20世纪绘画的重要地位，从现代艺术的基本术语中便可窥见一二：印象主义（Impressionism）、新艺术派（art nouveau）、野兽派（Fauvism）与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均为法语词。更近一些的年代，法国拥有欧洲最发达的电影产业，其中不仅形成了电影理论，还产生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新浪潮电影运动导演。例如，让-吕克·戈达尔以及克劳德·夏布洛尔。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法国”这个概念是关于巴黎的错误观念。同样，在人们看来，法国也有别于法式生活方式。后者融优雅与简洁于一体。你可以拥有传统的高级时装，一系列家喻户晓的品牌——从伊夫·圣·洛朗、皮尔·巴尔曼、皮尔·卡丹到克里斯汀·拉克鲁瓦；你也可以

让店员驾轻就熟地用彰显个性的方式抑或是搭配围巾的窍门，为你打造靓丽优雅的造型。法餐也许以其精致考究而闻名于世—此外，它还因莫名其妙地让法国女人保持住了人见人羡的窈窕身材而闻名—但是，通过这个国家超过1000种不同的奶酪，可以看出人们对美食的狂热，这种激情可见于每个法国村落。不论是严肃刻板的爱德华时代的人，还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美国人，对他们来说，光明之城巴黎还是一座爱之城。在这里，他们得以抒发自我的情感。对于当下移居法国的英国人，以及在他们之前就来到法国的那些人来说，法国似乎让他们感到自由。那是一种远离工业社会诸多限制与复杂方面的自由，是一种更“自然”的生活方式。事实上，也可称其为另类文明。这正是法国前总统雅克·希拉克意欲在公众面前塑造的法国形象，它与物质至上的“盎格鲁-撒克逊”社会有着云泥之别。但是，那些英国移民大多是从法国当地人手中购屋置业的，而这些法国人却抛下自己省区的家宅，前往城市寻找工作机会或更便利的设施。如此说来，那些英国人是在追求一种行将消亡的传统生活方式吗？他们是在追逐一个幻象吗？

并不是说“盎格鲁-撒克逊人”与法国人已然读懂了对方。英、法在数百年间都是势均力敌的对手，这也是众所周知的英国人热爱法兰西却不爱法国人的原因。两国在百年战争的王朝斗争中纠缠不清，英国国教改为新教后双方又起宗教冲突，英国干涉法国大革命，漫长的拿破仑战争与激烈的殖民冲突一直持续到1904年《英法协约》的签署，彼此猜疑使英、法两国在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一个“讨厌鬼”。因此，英国人历来认为法国人是浮夸纨绔、胆小懦弱、肮脏邋遢的，而法国人同样欣然将英国人看作是背信弃义、蛮不讲理、傲慢自大的投机取巧者。如果说，双方对彼此的敌意在近些年来有所缓和的话，那么竞争关系依然存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两国在许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

它们不仅都是核大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成员国，而且在人口数量、人口结构、国内生产总值方面神似，更不用说赤字方面的同步了。事实上，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如此接近，以至于长期以来它们都在争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这一名次，甚至达到了喜剧效果—2014年，当英国夺得世界第五大经济体的头衔时，它热烈欢迎想要躲避高额赋税的法国投资者；2016年，在英国脱欧公投后，法国迅速重新攫取了这一称号，并隆重欢迎想要继续处于欧盟保护之下的英国公司和企业。如果说，两国的经济表现是彼此的镜像的话，那么它们都以各自的方式揭示了成功驾驭全球资本主义当下发展阶段的困难。对法国来说，英国推行的经济紧缩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这种政策虽然带来了高就业率，却导致低投资、低生产率、低工资与私人债务的增

加；它还造成了引发脱欧公投的社会不平等与疏离之感，并且搞垮了政策的支持者—卡梅伦首相及其财政大臣。另外，对英国来说，法国强调高社会标准以及对就业者的保护也是自掘坟墓。因为，达到这些要求的代价是债台高筑，以及年轻人尤其是少数族裔的高失业率。它让少数族裔感到愤怒与被排斥，并因此滋生了恐怖主义暴力。

当然，法、美间的关系也见证了两国的差异。不可避免的是，随着与法国竞争的西方大国由英国变成美国，一种相似且暧昧的反美主义胜过了法国人的仇英心理。法国确实支持了美国独立战争，但美国反对法国的殖民目标，也未加入国际联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参与欧洲事务，而且最初支持维希政府而非戴高乐。然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政治与经济上对法国的救助，又强化了法国对美国强大的社会、文化新模式的依赖感。美国与法国自身的体制如此不同。因此，法国人如今不管多么自我申辩式地将美国看作肤浅且物欲横流的新型社会，他们仍觉得美国注定要主宰世界。相比之下，美国人—尤其是在2003年法国拒绝支持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往往觉得法国人自以为是、胆小怕事，不配出现在“法式薯条”一词中，于是美国人多少带着些爱国情结地将其重新命名为“自由薯条”。当然，在这些焦虑情绪与盛行的偏见中，有着爱恨交织的成分。它们可能看起来可笑，却无法促进双方的理解。

但是，其他人透过自己的棱镜看到的这个“法国”究竟是什么呢？法国又有哪些独特之处，有哪些可以让我们称为“法国性”的地方呢？有时，人们认为法国始于15世纪。事实上，我们可以说，法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的起始点是百年战争，正如圣女贞德所言，这场战争使法国陷入与英国的民族冲突之中。但是，这种说法完全遗漏了高卢人栖身的法国，忽视了罗马统治下的法国，未涉及对法语崛起时法国的讨论，也没有讲述拥有伟大的中世纪教堂，或者其他至今仍清晰可见、构成了这个国家方方面面的法国。因此，鉴于“法国”说到底是一个整体，我们会在历史的车轮缓缓驶入现代，一直行至当下之前，先仔细审视一下早期历史对法国的贡献。我们尤其要挖掘出法国的独特之处。因为，没有对特质的鉴别，我们就无法轻易了解一个国家。关键性的概念包括：“法国例外”（French exception）[1]、“世俗共和国”与“社会模式”。

我们要想了解今天的法国，就必须理解其历史沿革。要想了解法国人对共和制社会模式的担忧，就得回溯法国大革命；要想认识教育体系，就得寻访拿破仑；要想体会拉辛戏剧的力量，就得把握路易十四人生中的紧张与矛盾；要想明白法语的发展，就得寻访罗马帝国统治下的高卢地区。法国扣人心弦的历史—在革命与反动、教权主义与

世俗主义、左与右之间摇摆—并非源于喜怒无常的性格，而是根源于法国在欧洲大陆上身处敌人包围之中的地理位置。因此，法国的身份是由一系列的冲突关系—与古罗马、神圣罗马帝国、意大利、梵蒂冈、德国与西班牙的冲突—所决定的，也是由与英国和美国的帝国竞争所决定的。

因此，法国性整体而言是一个历史概念。事实上，法国本身也是如此，因为如今这个规整的“六边形国家”实际上是经历了数百年基本无序的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部大区阿尔萨斯-洛林重归法国版图后，才形成了现在这个形状的。而且，在法国大革命前，这个国家大多数居民说的都是方言。法国的民族情结主要是拿破仑的征兵制度与第三共和国免费教育所灌输的爱国主义情感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在这些变化背后，是意义重大而且时常具有讽刺意味的延续性。例如，尽管法国各政体之间存在明显矛盾，从君主专制政体到法国大革命，到拿破仑帝国，直到如今戴高乐主义的“共和君主制”，但政府的中枢作用岿然不动。这点是法国与英国、美国截然不同之处。

此外，法国历史也是欧洲史与世界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为，法国在重要事件中充当了主角，在世界各处的殖民地中发挥着作用，并且一直在艺术、思想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法国在西方与世界历史上起到了惊人的代表作用。法国主导的重要事件包括：宗教战争、1789年法国大革命、欧洲1848年革命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法国历史源远流长，可上溯至比古希腊、古罗马更久远的法国多尔多涅洞穴壁画创作而成的时期，它是欧洲文明发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且，法国的历史也提醒我们，文明化的过程是要付出代价的：罗马在带来更高水平的社会组织的同时，也带来了对高卢人的杀戮；中世纪教堂的崇高神圣需要超越黑死病侵袭所造成的现世苦难与泯灭良知的残忍；改变世界的《人权宣言》与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恐怖”统治出自同一个历史语境。它提醒着我们，法国与英国在百年前是两个世界大国；它还提醒着我们，世事变化无常。而且，随着这个星球上力量的天平渐渐从西方世界滑向其他地区，法国迫切需要努力地在充满挑战的21世纪保持自己的气度，保护自己的文化。

第一章

征伐与封建的古代法国

早在亚述人与法老们存在之前，
这里已经是人类的首都之一了。

在法国的诸多光辉荣耀中，位于多尔多涅省与比利牛斯山的神秘彩绘洞穴算是其中一个。这些洞穴见证了自冰河时代后半期或曰旧石器时代晚期（大约35000年前）起，人类发展史所经历的革命性巨变。随着尼安德特人的逐渐消失，随后出现的智人开始通过这些惊人的欧洲野牛、猛犸象与野马画像，展现他们的出色技艺。如今，经历了城市化过程的观赏者看到这些画作，不仅感到钦佩，还会苦恼不已。因为，尽管35000年只代表了地质年代中的一瞬间，但我们无法明确地与这些早期祖先产生共鸣，无法理解在这些幽深黑暗的洞穴里发生的事情，这让我们感到不安。

千万年来，许多洞穴对自己幽暗的秘密"守口如瓶"，这一点无疑加重了洞穴的神秘感。1940年，几个男孩在寻找丢失的小狗时，发现了著名的拉斯科洞穴；直到1994年，重要的肖维-蓬达尔克洞穴才被发现；2005年年末，同样位于多尔多涅省的维约纳洞穴（Vilhonneur cave）为世人所知。诚然，旧石器时代的艺术遗迹遍布欧洲大陆，最远可至俄国，同时也见于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其他大洲，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例证出土于法兰克—坎塔布里亚一带（Franco-Cantabrian region）的石灰岩地区，尤其是多尔多涅省、比利牛斯山与西班牙北部的阿尔塔米拉。单是多尔多涅省就有将近200处史前遗址。而且，19世纪史前研究的发展主要归功于在韦泽尔峡谷开展的勘探工作，因此，这门学科主要起源于法国。此外，莱塞济-德泰亚克镇凭借其国家史前博物馆，可以自豪地宣称自己不仅是世界史前时代史之都，而且早在亚述人与法老们存在之前，这里已经是人类的首都之一了。

这些通常由地下水道侵蚀石灰岩所形成的洞穴系统往往分布广泛。例如，法国南部的派许摩尔（Pech Merle）洞穴有2千米长，而有着158幅猛犸象绘画的鲁菲尼亚克（Rouffignac）洞穴则有着至少8千米长的画廊。洞穴入口处见得到日光的部分也许成了当时狩猎采集者的庇护所，显而易见的是，他们没有将漆黑的洞穴深处用作自己的栖身地，其中一个尤为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想被迫与在那里冬眠的

体形庞大的熊类同穴而居。如此看来，这些洞穴画出现的位置就至关重要了：它们不是位于靠近洞口的位置，而是在漆黑的洞穴深处。例如，在法国阿列日省的尼奥（Niaux）洞穴中，岩画就出现在距洞口1千米远的位置。鉴于当时要完成这些画作，人们不得不艰难地借助于燃烧动物油脂所产生的光亮—这也使得这些幽暗的洞穴变得更加令人不安—因此，绘制洞穴画既不是一项休闲娱乐活动，也不是装饰艺术，而是更为重要、更难以理解的事情。

这些岩画不是风景画，画中没有对山丘、树木或植被一类的自然风貌进行描绘。它们也不是日常生活风貌图，不管是集体、个人活动，还是某一事件，均没有出现在画中。事实上，它们几乎全都是独立存在于背景之外的单幅图像。大多数洞穴画都是关于动物的，有时只是黑色轮廓，有时则是使用了红、棕、黄色，偶尔用到白色的彩绘，而且在画作中心点上刷上或是通过空心管吹上了颜色。这些图像，不管是描画了整只动物的，还是只有动物部分躯体的，都雄浑有力、栩栩如生，令人敬畏。它们显示了绘画者运用线条的娴熟，还妙用了岩石表面的凹陷与凸起。而且，最重要的是—正如拉斯科洞穴中的公牛，或是尼奥洞穴中的彩绘欧洲野牛一样—洞穴画中的动物往往都比例失衡，奇大无比。每个洞穴的主题各不相同，描绘的动物包括马、欧洲野牛、猛犸象、鹿、野公牛、狮子、熊与狼，但洞穴画似乎有将掠食性食肉动物置于洞穴最深处的倾向。在本质上，这些洞穴是动物的黑暗宫殿，而洞穴画则是怪诞的旧石器时代动物寓言集。因为，洞穴画中除了动物，别无其他—显然没有几乎不曾入画的人类。

女人同样未在画中呈现，除非是以女性构造的形式，作为象征着女性性器官的符号出现。与此同时，画作通常描绘了一些怀孕的动物，这印证了生殖崇拜的观念。同时代的手工艺品也反映了这种观念，如出土于奥地利的著名雕像《维伦多尔夫的维纳斯》（*Venus of Willendorf*）。男人在洞穴画中也是缺席的，个别情况除外。例如，在派许摩尔洞穴画里，用粗略的线条勾勒出的猎人仰卧着，几支矛从他身上伸出。更神奇的是在拉斯科洞穴画中，简笔画的猎人俯卧着，也许已经死了，但阴茎勃起。在他面前的是一只凶猛的欧洲野牛，他之前也许已经打伤了这头牛，因为牛的内脏正在垂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鉴于这些洞穴画均特别强调猎杀体形较大的食肉动物，而非那些似乎为人类提供日常食物来源的动物，那么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在原始的、神奇的生命意识中，猎人的性冲动与人及野兽共有的死亡融为一体了呢？正如一位知名专家所暗示的那样，这些地方是不是举行集体宗教礼拜的神殿，而这些位于洞穴最深处的圣所是不是只对巫师开放呢？

事实是，虽然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但我们除了知道如何解读某些神秘符号外，对其他的均一无所知：手印或者手的轮廓、有时用手印绘制的成排的点，还有线条、三角形与四边形图案。这些符号是一个表意的宗教崇拜体系中的元素吗？或者说，这些手印只是签名而已，而四边形图案则象征着动物陷阱？是否正如一项美国研究所暗示的那样，红色的赭石点象征着从受伤动物身上流下的血滴，而精明的猎人正沿着这些雪地里的血迹，按图索骥、一路追踪？要想解释清楚并不容易。但是，我们可以明确两点：其一，这些画作既是非写实的，又是功能性的；其二，洞穴画对轮廓的强调，以及将鹿角或动物前腿特别向外扭的独特画法具有标志性，因为这些画作是通过侧面与正面来对动物加以区分的。画中对兽首与蹄子所进行的单独的仔细研究，以及有时对某些重要的动物身体部位所给予的异乎寻常的关注，是出于相同的目的。画中为达到透视与动态效果所使用的一些窍门也是如此。

这些图像表明了猎人需具备的知识，而这是以一种庆贺的方式来展现的。如果洞穴画未对图像进行分类，如果动物是在仓促之中画成，彼此叠落，这是因为猎人对单只动物具体特征的专注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如果生活在冰河时代的狩猎采集者在现实生活中无力驾驭这些危险的大型野兽，以及它们所代表的超乎人类控制的更强大力量的话，那么这些人仍可以通过艺术象征性地控制它们。但是，他们除了以无足轻重的形象出现之外，在洞穴画中基本是缺席的。这本身意味着，狩猎采集者还无法想象自己与大型野兽及不可控力量平等共生的情景。

因为洞穴画家并未描绘自己的形象，所以我们很难看清他们的样子。同样，我们也不易明辨高卢人的形象。由于高卢人的传统基本上是以口头形式流传的，他们也未留下任何重要的书面记录，因此人们通常是透过他者扭曲的棱镜来看待高卢人的—事实上，高卢人这个名字本身也是由罗马人命名的。关于高卢人的最早记述出自尤利乌斯·恺撒自私自利的说法。他在描述高卢战争时，把高卢人说成是容易上当受骗的蛮族，更危险的是他们喜怒无常、难以捉摸。自此以后，在法国动荡历史中的某些时刻，高卢人被迫效力于一些自相矛盾的事业，这些事业都宣称，自己代表了法兰西民族真正意义上的延续—高卢首领维钦托利（Vercingétorix）被强行用于对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政治宣传，又被第三共和国中的反德派政治家、“二战”期间维希卖国政府的亲德发言人，以及战后反德的学校教科书所利用。由于历史学家、小说家与艺术家对高卢人的解读均是如此飘忽不定，所以高卢人的形象依然是模糊不清的。此外，另一个著名的高卢人也被用于传递一种政治信息。

在当下，许多人是通过勒内·戈西尼（René Goscinny）与阿尔伯特·尤德佐（Albert Uderzo）所创作的阿斯泰利克斯（Astérix）系列漫画来审视高卢人的。这让情况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阿斯泰利克斯历险记》如今已被译为近100种语言。你可能天真地认为，漫画吸引人之处在于将儿童喜闻乐见的卡通片的特征—灵巧的绘图、滑稽的场景与激烈的打斗—与对学校历史课程的滑稽模仿相结合，而且大人们也能对其中的暗指心领神会。诚然，在这部描绘罗马占领下高卢地区的漫画中，政治信息也许并不是那么昭然若揭。该漫画基于一个想象中的不可征服的村庄，尽管已被挤压在大海与四个倒霉的罗马军营形成的夹缝中，它依然进行着顽强的抵抗。这四个军营的名字意为鸦片酊（Laudanum）、养鱼缸（Aquarium）之类。事实上，漫画中的这个村庄是疯狂的，但由于疯狂的秘密源于当地祭司调制出的一种神奇药水，这种疯狂也就可以接受了。这位祭司名叫帕诺哈米克斯（Panoramix），鉴于他比其他人更为高瞻远瞩，所以他的名字可以恰如其分地译为“包办好”（Getafix）。正是这种灵丹妙药让我们的主人公阿斯泰利克斯能够短暂地爆发出超人般的力量，以应对各类突发事件。

以勇士的标准来衡量，阿斯泰利克斯也许显得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是他和任何一个奥德修斯式的希腊英雄一样勇敢而狡黠。而且，他还有一个彪悍的同伴，体形庞大、动作笨拙的奥贝利克斯（Obélix）。此人因摄入过量的神奇药水，而尴尬地被超人般的神力所困。有这个巨柱般的男人，以及奥贝利克斯那条充满执念、唤作伊黛菲克斯（Idéfix）的狗—可恰当地译为“教条狗”—相伴，阿斯泰利克斯不仅能挫败尤利乌斯·恺撒的罗马军团，还能征服广阔的外部世界，将美貌的盘尼西亚抛诸脑后，因为他身为勇士的使命容不下山盟海誓。漫画的幽默在于双关，难以置信的情境、年代的错位，以及对于国家与地区刻板印象的夸张呈现。例如，英国人有着恰到好处的沉闷无聊与正式拘谨，食用任何东西时都要配上薄荷酱，还把战车开在道路中错误的一侧。与此同时，一些卡通人物与政治家或电影明星惊人地相似。例如，“劳伦苏利比乌斯”就像极了阿诺德·施瓦辛格。而“疯狂的”罗马人则装腔作势地用拉丁格言交谈—这些格言是他们直接从《小拉鲁斯词典》的经典表达列表中撷取出来的。鉴于这一系列连环漫画明显讽刺了法国人及其他所有人的荒谬怪诞之处，人们需要花些功夫，才能将阿斯泰利克斯看作充满爱国情怀的、戴高乐主义法国的代表，这类人敢于与美国相抗衡，正如20世纪60年代时一些人所做的那样。此外，将这个米老鼠式的身材矮小的英雄比之于庄严肃穆、伟岸超凡的罗马将军，是否会使后者看上去特别可笑，就不得而知了。

那么，关于高卢人，我们切切实实知道些什么呢？首先，他们是至少自公元前600年起就生活在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法国、比利时与意大利北部地区的凯尔特人。在铁器时代，凯尔特人遍布欧洲大陆。事实上，他们在公元前390年曾洗劫了罗马。对这一事件的记忆一直郁积在罗马人心中，并在后来激化了罗马人征服高卢的野心。高卢人是半游牧民族，他们向更加安稳的农业社会慢慢发展着。他们由一系列的部落组成，完全没有固定版图或独立国家的意识。社会秩序由武士贵族阶层、强大的祭司阶层以及从属的平民阶层构成。武士贵族阶层耽于耀武扬威、抢劫掠夺，祭司集牧师、教育者与立法者的职责于一身，而平民则包括了被奴役的战俘。

由于高卢人有相当多的部落，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国王—许多法国城镇名就来源于当地部落名—冲突就不可避免了，尤其是考虑到他们热衷于打猎、痛饮狂欢与进行绚丽多彩的表演的浪漫秉性。高卢文化基本上是口头的，因此传播传统习俗的不仅有祭司，还有吟游诗人。而且，高卢人还将这种传统与无所不在的多神万物有灵论宗教—这种宗教将神性归因于自然风貌—结合在一起，其中涉及了轮回转世与活人献祭。然而，这些“野蛮人”是十分心灵手巧的。他们会做手术，擅长制作金属制品与珠宝首饰，有阳历与阴历。此外，人们还将肥皂、葡萄酒桶与锁子铠甲的发明归功于高卢人。正如最近的考古研究所揭示的，高卢人的建筑不仅限于圆形茅草屋，还包括有瓦顶的优雅房屋和秩序井然的公共广场。

事实上，希腊人先于罗马人来到高卢地区。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希腊人建立了马萨利亚（今马赛）商栈。罗马人正是通过与这个重要的港口联盟才开始参与高卢地区事务的。公元前123年，罗马人修建了阿克韦-塞克斯提亚（今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的堡垒。没几年，他们就控制了罗讷河上游河谷地区，并建立了纳博-马蒂乌斯（今纳博讷）殖民地。但是，罗马人一旦投身于高卢地区，就发现自己不但要应对当地诸部落，还要抵御来自东面的日耳曼入侵，后者对意大利北部构成了潜在威胁。正是发生在公元前58年的一次日耳曼入侵将恺撒带到了高卢地区。恺撒不仅果敢地击退了那次入侵，并挫败了后续日耳曼的一系列入侵企图，还在此期间占领了高卢全部地区。这一做法让高卢诸部落坐立不安，并最终导致由维钦托利（约公元前82—前46年）领导的重要叛乱在公元前52年爆发。维钦托利是阿维尔尼（Arverni）部落首领之子—法国奥弗涅（Auvergne）大区之名即源于这个部落的名字。

维钦托利成功使各自为政的诸部落团结一致，并发动攻击，让恺撒初尝失败滋味。他还顺利地通过焦土政策夺去了恺撒的补给。但

是，维钦托利随后遇到了麻烦：比图里吉人拒绝摧毁他们珍视的筑有防御工事的首都，勉强同意会守卫好自己的都城。他们以不顾后果的勇猛坚决对抗围城达一个月之久。恺撒满怀钦佩地记录下了他们的勇敢，但这并未阻止他屠城—除及时逃出，加入了维钦托利的数百人之外，其余40000名居民均被恺撒屠杀。

同年末，恺撒将维钦托利及其军队困于修筑了防御工事的阿莱西亚城之中，此地位于如今的第戎附近。恺撒为迫使敌人因饥饿而投降，在那里构筑了最为精密的围城工事，防止有人突围。高卢人的粮草只够维持一个月，因此他们对恺撒的围城工事发动了猛烈攻击。为此，恺撒又在沟渠中、堤坝上插满了尖木桩，进一步巩固防御。按照恺撒的说法，为抵御一支由8000名骑兵与25万名步兵构成的援军，他在向外的地方也建起了相似的防御工事。高卢援军赶到，并在城内守军的策应下发起猛攻。但是，事实证明，他们的勇猛、热情难敌罗马体制，援军溃散后落荒而逃。与此同时，饥饿的居民从城中走了出来，自愿为奴，听凭罗马人处置，然而，他们被罗马人放逐在了无人之地，自生自灭。在这种情况下，维钦托利除了将自己的武器扔在这个身披暗红色袍子、可怕的罗马将军脚下外（而不是像大不敬的《阿斯泰利克斯历险记》中所描绘的那样，把武器扔到人脚上，让人吃尽苦头），别无选择。对此，恺撒仅以不带感情的方式记述道：“部落首领们被带上前来，维钦托利被移交过来，他的武器扔在了地上。”恺撒接着说，自己将剩余的俘虏当作战利品分给手下的士兵，一人一个俘虏。

与浪漫传奇所讲述的故事相反，维钦托利的战败对高卢而言也许是件好事。正如伏尔泰所言，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高卢远离了祭司的迷信，成了罗马世界的一部分，而且在接下来的300年间享受了罗马和平的庇护。罗马控制下的高卢地区被划分为4个行省，有了自己的行政组织机构，定都卢格杜努姆（今里昂）。而且，修建的新公路带来了一体化的基础设施。罗马人兴建了城镇，推动了由商人与技工组成的新兴中产阶级的发展。简言之，他们带来了按照当时社会标准而言，可谓象征着现代性与文明的事物—这意味着，随着作为法语之基础的拉丁语的兴起，新秩序带来了社会稳定。然而，如果这一切果真是幸事的话，那也是掩盖在极强伪装之下的幸事。这也许是因为在耗时逾7年的高卢战争中，有多达100万人丧生，还有100万人沦为奴隶。同时，各大部落分崩离析，成百上千的城镇被毁。为获得文明与和平，人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至于维钦托利，他不得不等待恺撒抽空来对付他，因为胜利者还有别的胜仗要打—对阵庞培的战争，还有在埃及与非洲其他地区的战

争。直到5年后，恺撒才有时间重返罗马，然后举行了4场凯旋式，以这些铺张浪费的活动来庆祝自己的胜利。在第一场凯旋式上，维钦托利被人从图利亚努姆监狱漆黑的地牢中带了出来，之前他一直在地牢中慢慢腐烂着。维钦托利戴着镣铐，在游行队伍中跌跌撞撞地走着，两边挤满了欢呼雀跃、讥笑嘲讽的人群。在这次对恺撒实力的展示之后，他重新被关进监狱，后被处决。行刑方式无疑是惯常的扼杀—维钦托利之死与不到两年后恺撒在罗马元老院的遇刺身亡相比，显得有些寂寂无名。

然而，尽管罗马帝国实力强大，但它在混乱的人口迁移面前，在公元后头一个千年内即将出现的世界观的转变面前，也没能永立不倒。人口迁移与世界观的转变所释放出的动乱与暴力最终击溃了罗马，并使西欧陷入了黑暗时代的深渊。

不过，在高卢被征服后的数百年间，只要罗马的好景还在，其控制下的高卢地区就可与帝国其他地方相媲美。高卢南部地区特别值得展示，因为那里有丰富的农产品、手工出口商品以及今天依然见于尼姆、阿尔勒与奥朗日的庄严肃穆的公共建筑物。至于巴黎，尽管直到公元4世纪初它还叫作鲁特西亚（Lutetia），尽管彼时当地居民宁可烧毁城池也不向恺撒投降，但它此后同样发展成了一个秩序井然的罗马城镇。随着时间流逝，那里的居民罗马化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他们渐渐弃用高卢语，改用俗拉丁语或曰拉丁语口语了—除去一些地名外，如今的法语中只有少数几个凯尔特词源的表达—而且他们也乐意捍卫新的社会秩序，抵御来自东部的断断续续的蛮族进攻。

但是，公元257年法兰克人的一次侵入，以及354—355年阿勒曼尼人远赴里昂的另一次进攻，仅仅奏响了日耳曼民族长时期、大规模的系列进攻战的序曲而已。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日耳曼人的进攻始于公元406年的最后一天，他们全线进攻，跨过了上冻的莱茵河冰面。在匈奴自亚洲大举进犯的压力之下，这些民族被驱赶着向东进发。他们不仅威胁到了高卢地区，还危及罗马本身—罗马再遭洗劫，410年西哥特人、455年汪达尔人劫掠了罗马城。高卢联军在一位罗马将军的指挥下，仍然保持了足够的凝聚力。451年，匈奴王阿提拉进犯，在特鲁瓦附近的一场极其血腥的战斗中，他被高卢军打败了。然而，截至5世纪末，随着罗马帝国自身在476年的崩溃，外族不断入侵造成的死亡、毁灭与混乱等影响被加重，高卢-罗马文明几乎遭到彻底摧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唯一一个屹立不倒的机构是基督教教会。事实上，罗马人对被占领地区的宗教习俗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主要是因为其他多神论体系并未构成重大威胁。而且，正如塔西佗所观察到

的，这些多神论体系可被纳入罗马原本的宗教体系之中。但是，一神论的基督教有着本质性的差别。如果说帝国大肆迫害这种正在侵蚀罗马本身的新兴宗教的话，那是因为帝国将其视为对国家的威胁—能够在来世获得平等地位的平民或者奴隶，也许就不太愿意接受现世的社会秩序了。因此，高卢像其他地方一样，也出现了一些著名的殉道士：公元177年，圣白郎弟娜（St Blandine）与另外47人在里昂被喂了狮子；一个世纪之后，圣德尼（St Denis）在经受了骇人听闻的酷刑折磨后被斩首。但是，随着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自己在公元313年接受基督教，迫害活动也就自然而然地中止了。因此，教会成了唯一一个超越了高卢本身而存在的组织，成了保存读写能力与传统习俗的唯一宝库。

自一片混沌中崛起，创造了法兰克王国的人物是克洛维一世（481—511年在位）。他是一支萨利昂法兰克部落的首领，也是以图尔奈地区为中心的墨洛温王朝的国王。尽管克洛维将教会与俗权合在了一起，他却并不是一个圣人。不过，在蒙昧时代，如果他是个圣人，我们也许就不大会听闻他的名字了。公元486年，克洛维在周边地区的萨利昂诸国国王的拥护下，在苏瓦松打败了那里最后一名罗马指挥官，控制了高卢北部地区。随后，他努力刺杀盟友，让自己的处境变得不那么复杂。著名的“苏瓦松花瓶”的故事讲的就是克洛维：当大家要通过抽签来分配从教会劫掠来的财富时，克洛维接受了主教的恳求，决定将一个特别的银质花瓶归还给教会。因此，在他应得的战利品之外，他还让手下把这件银质花瓶也分给他。手下人都同意了，只有一人例外。这个人说，这么做是不公平的，还愤怒地用自己的战斧将花瓶击得粉碎。一年后，克洛维在阅兵时又看到了这个人，于是便提醒该人之前发生的那件事，以及面对教会时应有的尊重—提醒的方式是用斧头劈开了这个人的头。

克洛维对权力有着不懈的追求。他把自己的一个姊妹嫁给了东哥特国王，通过这种政治联姻使东哥特人保持中立。因为没能占领勃艮第，他转而与之结盟，目的是打败托比亚克的阿勒曼尼人，以接管他们在东部的领土。当时发生了著名的克洛维皈依基督教的事件。主教雷米吉乌斯在兰斯对克洛维施洗礼。

克洛维的妻子确实是基督徒。之前有一次，她试着祈求自己的上帝助克洛维赢得了一场战争的胜利，于是克洛维就觉得这魔法是灵验的。但是，他也受到了来自主教雷米吉乌斯的压力。克洛维当初一即位掌权，就收到了主教不揣冒昧地写给他这个异教徒少年的一封“令人震惊的信”。当时的一位历史学家恰如其分地描述说，这封信几乎是用命令的口吻，要求克洛维遵从他的主教们。[2]显然，正如雷米吉

乌斯意识到教会需要得到一个可靠的世俗权威的保护一样，克洛维也认识到获得教会的支持与认可是有利的。当他将阿基坦大部分地区加入到自己征服的区域中之后，当把巴黎定为自己新王国的都城之后，他立马兴建了一座修道院，并满怀感激地接受了来自教会的祝圣。虽然这并未阻止他有计划地屠杀包括其亲属在内的几个法兰克潜在对手，但他在公元511年临终前不久，召开了一次天主教的教会会议。

在克洛维之死所带来的令人不快的后果背后，存在什么谜团吗？不论他道德品质如何，克洛维生前的确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不仅占领了高卢地区，给法兰克人带来统一，还通过自己与教会建立起的统一阵线，促进了法兰克人与罗马控制下的高卢地区在文化上的融合。这种文化融合在他生前已然发生，尤其是通过精英阶层间相互通婚的形式。法兰克人渐渐接受了以拉丁语为行政、文化用语，而这种语言也正向日常拉丁语口语或曰罗曼语转变，尽管法兰克人仍将自己原始的日耳曼语掺杂其中。多种语言的混杂导致了奥依语（the langue d'oïl）的出现，现代法语正是由这种北方方言演变而来的。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南方方言奥克语（the langue d'oc），它有着更深厚的拉丁语基础。奥依与奥克是现代语法中“是的”（oui）一词的两个变体。

因此，克洛维在国家统一方面取得的成就意义重大。但是，他似乎将这一切都毁掉了。他接下来的所作所为拉开了将在接下来的300年间反复出现的一系列续发事件的序幕：克洛维临死时将自己的国土分给了四个儿子，自此开始了分裂—重新统一—进一步分裂的模式。这一模式致使冲突频发，并因此削弱了墨洛温王朝国王们的实力，这些国王要么头脑简单，要么还未成年，以至于他们被称作“无为王”，最终被自己的副手或曰“宫相”取代，这些宫相在公元754年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加洛林王朝。在此之外，上述模式甚至发展到了近乎可笑的程度。一些国王被人起了卡通画般的绰号—矮子丕平、胖子查理、口吃者路易—这快要让我们回到阿斯泰利克斯的世界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统一与分裂交替出现的模式呢？

这一点儿也不神秘。这样讲更多的是因为我们惯于以事后之见，用目的论的眼光，或者说是前后颠倒的方式来看问题，并且无意识地以为，这些统治者都窥见了法国最终的可能性，看到了我们今天所知的这个均衡对称的六边形。因此，我们也许倾向于把所有阻碍了向着现代中央集权国家前进的东西视为衰落或失败。如果克洛维与其他国王遵照了法兰克式的王位继承模式，那是因为他们关心的是个人与家庭权力。然而，他们不得不考虑的外在组织不是国家—当时并不存在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是教会。在当时欧洲的混乱年代里，无人预见也没人觉得有必要非得让法国变成如今这副模样，恰恰相反，当

时存在很多运气的成分—正如查理·马特的经历。

查理·马特（737—741年在位）在许多方面都宛如巨人。因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他被人们称为“铁锤查理”。他是一位足智多谋的宫相，在王位继承战中，查理一路披荆斩棘，到达权力顶峰。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行政官，还是一名极有创造才能的将军。法兰克王国此前分裂成了三个争吵不休的王国，查理·马特在这三个王国中都树立起了威信。从爱德华·吉本到亨利·皮雷纳，各路历史学家均拥立查理·马特为欧洲文明的救世主，他们大加歌颂的成就是，公元732年，查理打败了自西班牙向北进犯的倭马亚军队，取得了图尔战役的大捷。

查理率领30000名士兵，经过精心备战，在由他选定的高地上打得敌军措手不及。结果敌人的骑兵不得不沿着山坡向上进攻，以应对查理集结的方形步兵编队。尽管敌军在其指挥官死后停止攻击，无疑是想节省自己的战利品，但这场战役仍是步兵有效抵御骑兵的极少数成功案例之一。这也许是世界史上决定性的战役之一，因为伊斯兰教的扩张已席卷西班牙，如果查理未能击退这一扩张的话，那么法国与欧洲的历史很可能会因此改写。但是，胜利的取得绝非必然，毕竟查理一方是迎难而上，而且多亏了其非凡的战略技巧，才取得了这次的胜利。

在该事件中，法兰克统治者与教会的关系变得极其紧密，以至于二者结成了同盟。当查理·马特之子矮子丕平罢黜了名义上的国王之后，他让教皇不仅接受了他发动的政变，还为他新建立的加洛林王朝祝圣。而丕平的儿子查理曼大帝（768—814年在位）被人赞为基督教模范统治者、教会的盾与剑。事实上，作为当时欧洲的一位杰出人物，他至少暂时性地终结了黑暗时代。查理曼的杰出体现在许多方面，顺带一提，他与父亲丕平不同，个子奇高。查理曼通过铲除亲属中潜在的竞争对手这一惯常手段，巩固了自己的地位。紧接着，他又入侵了伦巴第、波希米亚与西班牙北部，继续壮大自己的王国。但是，他遭到了摩尔人的反抗—这场战役后来为著名的12世纪编年体史诗《罗兰之歌》所称颂。他还一再尝试让异教的撒克逊人皈依基督教，具体做法是向他们提出一个难以拒绝的提案：要么皈依，要么死。一些人未能领会这项提议的利害关系，于是被处决了—有一次，一天就处死了超过4000人—结果表明，这项措施很有效，尽管在朝臣之中引来了个别人的侧目。

公元799年，天主教教皇利奥三世受到了来自罗马贵族阶层的攻击，因为这些人对他升为教皇一事愤恨不已。他们为了使利奥丧失主教资格，派出一伙人去剜他的双眼、割他的舌头。但是，利奥及时逃走，跑去向查理曼寻求帮助。尽管查理曼对教皇不感兴趣，但他还是

派出了一支代表团，护送利奥返回罗马，重登教皇宝座。此后，查理曼还亲自访问了罗马。在公元800年圣诞节那天的罗马城内，利奥加冕查理曼为皇帝。查理曼宣称自己对这场册封典礼并不知情，但这听起来不大可信。如果说教皇通过巩固自己的地位而获利的话，那么这场盛大的授职仪式也极大地提高了查理曼的地位，他成了日耳曼各部落联盟的首领。如今，查理曼坐镇自己的首都亚琛（或曰艾克斯拉沙佩勒），统治着大一统的法兰克王国。他的疆域从大西洋沿岸延伸到德国的巴伐利亚州，从北海扩展到地中海。而且，查理曼与教会的正式结盟确立了神圣罗马帝国的观念，这种观念将贯穿整个中世纪。正如顽皮、矮小的伏尔泰那颇具代表性的观点所言，这个叫作神圣罗马帝国的集合体也许“既不神圣，也不属于罗马，还不是个帝国”。然而，这一宏图贯穿了受战争蹂躏的中世纪始终，而且强化了统一欧洲的观念。这种观念也为后来的拿破仑与如今的欧盟所秉持，无论变得多么面目全非。

与此同时，查理曼作为一位君主，精力充沛得令人咂舌。他建立了行政中心，招募唯一有文化的群体—神职人员充当公务员。他向王国各地派出了钦差大臣，举办由朝臣、治安官与贵族出席的年度大会，实行司法改革，统一重量单位与例行的通行税。而且，他还就关乎公共秩序的事务给出了自己的判断。他颁布了关于教会组织构造与宗教教育的法令—在时人看来，社会、法律与宗教问题没有本质区别。他还大力提高王宫的文化水平，通过学习拉丁文提升自己的读写能力，为教育年轻的法兰克骑士而创办了一所专门的学校，还邀请英国神学家阿尔昆来亚琛担任他的宗教兼教育顾问。他的的确确带来了加洛林王朝的复兴。诚然，就基本特征—政治组织、永久性军队或者道路基础设施，正是这些基本特征给国家带来了稳定与持续性—而言，他的帝国无法与真正的罗马帝国相媲美。然而，这个强大、坚定的男人所取得的诸多成就仍震古烁今。遗憾的是，这并未阻止他留下的帝国遗产再度走上分崩离析的道路。

尽管查理曼在公元814年去世前曾下令将王国分给自己的三个儿子，但是最后王国完好无损地传给了他的儿子虔诚者路易。这只是因为他的另外两个儿子碰巧死在了父亲前面。但是，当路易一世于公元840年去世时，这次轮到他将王国分给自己的三个儿子了。可以猜到正是他促成了内战的到来。然而，这种王国分裂的惯常局面，这种由统一与分裂交替所导致的具有破坏性的中断，只是问题的一半。问题并不仅仅在于体制过分依赖偶尔才出现的查理·马特、查理曼式的强大领袖；事实是，一位强大领袖在统一并扩大自己的王国上越成功，他就越容易遭遇体制内在的矛盾性。这是因为部落首领实行独裁统治，将自己的王国视为个人财产，为选定的继承人随意分配遗产的时代正

在逐渐衰落，王国越大，面临的困难就越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查理曼如此成功地将王国版图拓展到惊人的程度，也为帝国体系带来了严峻考验并最终导致国家破灭。

查理曼王国的分裂不仅对法国，而且对整个欧洲的未来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顺便一提，路易的两个儿子，即日耳曼人路易与秃头查理，在公元842年签署了《斯特拉斯堡誓言》，宣誓结盟，共同反对他们的长兄洛泰尔一世。这是首部用最初的法语形式写成的官方文件。次年签署的《凡尔登条约》将王国领土一分为三：西法兰克王国大致相当于将来的法国，东法兰克王国等同于讲日耳曼语的莱茵河以东地区，而中法兰克王国则是从荷兰向南延伸至莱茵河，并最终延伸至地中海的狭长区域。这一分割导致后来法国与德国之间出现了毁灭性的紧张局势，二者的争端聚焦于两国间一块模糊不清的缓冲地带的控制权。

与此同时，秃头查理（840—877年在位）的遗产将会成为中世纪时期法兰西王国的基础。但是，由于领土的分割主要是基于行政上的便利，所以秃头查理的王国边境线多少有些人为干涉的痕迹。同时，旧有的分裂—部分统一—进一步分裂的模式依然存在。因此，国王们依然软弱，王国也处于动荡不安中。9世纪与10世纪时阿拉伯自南方发起的攻击加重了局势的动荡。而且，最重要的是，令人胆寒的中世纪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入侵及其对诺曼底的有效殖民，无异于为严峻的态势雪上加霜。

正是出于对权力分化，以及人们普遍感觉到的秩序混乱与安全感缺乏的回应，封建制度得到了发展。当然，在查理曼大帝统治时期，通过其授予土地的行为，封建制度已然存在。土地是当时值钱的重要资产，查理曼将土地授予他的封臣，反过来，他们需宣誓效忠，并作为武士与行政官为他服务。但是，随着城堡—起先只是些简单的木制防御工事—在全国范围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种制度日益在区域与地方层面得到复制。于是，贵族也有了效忠于自己的身份尊贵的封臣，即骑士，或曰骑在马背上、身披铠甲的武士。正是基于这一具有自我意识的时髦阶层的行为准则，才衍生出了骑士精神的说法。而且，贵族与骑士间的相互依赖性自上而下地渗透进各个阶层之中，因为地方上的封臣会效忠于更高阶层的出身名门的封臣；农民则为自己的主人而工作、奋斗，以在必要时换取主人的保护。

事实上，这是一个完善的法律与财产关系体系。它意味着一方以保护与供养，换取另一方的效力与顺从。尽管它回应了当时社会的不稳定问题，却往往会削弱国王们的实力，尤其是因为国王授予封臣的采邑渐渐变成了世代相传的，封臣自身也因此变得更加独立。在越来

越多的地区，实力强大的贵族甚至能够威胁皇权。国王可以通过授予更多的采邑与战利品来换取他们的忠诚，但是这些奖励往往有赖于发动战争才能获得，而战争又会进一步扰乱局势。因此，国王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仰仗软实力，通过传统观念与教会认可所获得的道德权威来统治这些贵族。

这样一来，来自法兰西岛（Île-de-France）的贵族雨果·卡佩（987—996年在位）从摇摇欲坠的加洛林王朝那里接手的并不是一个强大的王国。由于法兰克人、布列塔尼人以及其他族群使用各种各样的语言—从东北部的德语到西南部的巴斯克语，更别提讲罗曼语的地区中，奥依语与奥克语之间的差异了—王国并不具备民族或语言上的一致性。实际上，雨果·卡佩的诏书只在他自己的法兰西岛中部地区与奥尔良地区（Orléanais）有效。如果他冒险越过这些地区，就可能被人绑架并被迫交纳赎金。因为，王国其他地区处于基本独立区域的统治者控制之下，这些统治者包括阿基坦公爵、诺曼底公爵或者是奥弗涅伯爵。另外，王国也没有通用货币与法律体系，当时的社会秩序通常是混乱的。人们不难想见统治这样一个四分五裂的王国需要面对的问题。事实上，雨果在其统治期间不得不进行权力斗争，且在公元993年挫败了一场针对他的阴谋，但他的地位过于薄弱，以至于无法惩罚行凶作恶之人。

即便如此，雨果·卡佩还有一些优势。首先，由于他是由贵族大会选举产生的，因而拥有一些权威。其次，他有来自教会的强大支持。之前，教会将其封为“法兰克人的国王”—事实上，兰斯大主教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他的当选。再次，虽然他从巴黎直接控制的中央地区相对较小，但此地是王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此外，他一登上王位就立自己的儿子为继任者：他佯装自己要发动一场抗击摩尔人入侵西班牙的战役，这样一来就需要在自己不在时，确保有一位国王理政。以上这一切使他强化了自己家族的统治，并建立了一直延续到1328年的卡佩王朝。尽管王室的其他支族后来会接管法国，但卡佩王朝通过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巴黎伯爵，以及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家族世系而一直存在着。

显然，截至第一个千禧年末，还没有出现一个正好类似于我们今天所知的法国那样的王国。除非这些弱小的卡佩国王成功地扭转了自己与他们势力过于强大的封臣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否则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王国。但是，回顾往昔，卡佩王朝的到来也许可被看作是这片土地在不经意间向独立法兰西王国发展的漫长历程的开端。

第二章

浴血而生的高卢人

这是一个充满鲜明对比的时代。
彼时，灵性与极端的残忍共存。

中世纪的世界似乎从未真正远离法国；它仍在许多城镇中流连忘返，而这些地方以大教堂为关键特征，就像沙特尔与桑利斯。在诸如萨拉维小镇与阿维尼翁市这样的城镇中，中世纪景观成了老城区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景观尤其引人注目地存在于筑有防御工事、处在围墙之中的城市里，例如洛什与卡尔卡松。就巴黎自身而言，抛开巴黎圣母院与圣礼拜堂不谈，中世纪的世界还回荡在巴黎的拉丁区之内。这里之所以叫拉丁区，是因为在中世纪时，拉丁语是索邦大学学生的通用语。而且，在此后的数百年间依然如此。诸如“高中毕业会考证书”（baccalauréat，高等学校证书）与“学士学位”（licence，文学士学位）一类的学衔便可追溯至那个年代，一些传统礼节、贵族称号与授衔仪式惯例也是如此。

诚然，中世纪这整个时期在千百年间被行吟诗人、历史小说家，不消说还有好莱坞，浸润在浪漫的柔光之中。它唤起了人们脑海中许多程式化的形象：尊贵的国王与优雅的王后；石头或者彩色玻璃上虔诚的面孔；具有骑士风范的十字军英勇地对抗异教徒；在皇家竞技场上，手持危险的长矛飞奔向对方的重甲骑士们；透过城堡高塔的狭长窗户，贞洁的淑女向下望着郁郁寡欢的情人，情人身着紧身短上衣与紧身裤，两个裤腿颜色不一，他们还穿着长得出奇的尖头鞋。这是一个充满鲜明对比的时代。彼时，灵性与极端的残忍共存。大教堂中流露出对宗教的热忱，试图为短命的人们提供一种确定性。当时的人们受变幻莫测的收成、瘟疫与连绵不绝战争的支配。这样一个时代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呢？

生活质量由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决定，而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又主要取决于封建王国在多大程度上能给人们带来和平与稳定。但是，卡佩王朝的国王们花了超过100年才开始稍微控制住了一个如拼图般混乱的三级王国。构成王国的三级中，皇家属地、法兰西岛与奥尔良地区是第一级；第二级是封地、历年间赏赐给这个或那个国王的儿子们的土地—如果在位者或曰小国君主死后无嗣，那土地就会重新回到

君王手中；第三级就是像吉耶讷与佛兰德这样的大面积省级封邑，这些地方在表面上属于王国，实际上它们却是独立存在的。整个11世纪的历任国王都没能制约住皇家属地内部的无序，他们所面临的难题同样不是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制的法兰西—人们还无暇编织这个梦想—而仅仅是怎么让这个封建制度运作下去。他们并没有一手好牌可打。

当时的国王们通过教会在兰斯为他们举行的加冕仪式获得了认可，树立了道德权威。加之人们认为国王具有神力，可以医治瘰疬或曰“国王的祸害”（king's evil），于是国王的道德权威性进一步加强。对于王国内的所有贵族来说，国王是政治上的宗主，或者说是封建领主。如今，一些封臣在世代相传的地产上，安坐在自己宏伟壮观的新城堡中，好不逍遥。面对这些日益独立的封臣，国王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再者，就像在王位继承战中引发了诸般争端一样，为多个儿子分配封地的惯例也在小贵族间挑起了持续不断的私战，而这些小贵族平常除了摆出一副骑士派头外，也没什么事可干。

因此，11世纪是强盗横行、长期斗争、社会整体处于无序状态的时代。直到最后，全靠教会实行“上帝的休战”（Truce of God）来试图限制流血事件的发生。这一举措规定，在星期三傍晚至星期一清晨之间打斗是有罪的—同样有罪的是牧师、僧侣与女性在一周之内任何一天的打斗行为—但是，实际上教会合法化了一周中其他三天的打斗。此外，教皇乌尔班二世仍谴责了贵族阶级之间的暴力行为，并试图“把强盗变成骑士”。公元1095年，在克莱芒会议上，教皇向信众发布了一个充满激情的号召，呼吁他们向前冲，从异教徒手中夺回圣城耶路撒冷。

这是在接下来的200年间，来自欧洲的8次十字军东征中的第一次。每一次十字军东征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们提供了一项全球性事业，使基督教世界联合起来。而且，它们将破坏力向外疏导，用于打击一个共同的敌人—被妖魔化的异教徒。它们开辟了贸易路线，由此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同时，十字军东征也将新观念引入欧洲文化之中。卡佩王国尤其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威名大振，因为第一次东征是在法兰西境内宣告成立的，而且卡佩王国为这次事业贡献了布永的戈弗雷，以及腓力一世国王（1060—1108年在位）之弟—韦尔芒杜瓦伯爵于格一世等领军人物。并非所有的十字军成员都是骑士—事实上，在40000人左右的十字军中，大多数“拿起十字架”的是农民。他们受到了这场永生难忘的冒险的吸引，而这场冒险又披着末日启示的外衣。诚然，圣战往往就是这样。在圣战中，绝对的信仰必将敌人定为邪恶或者毫无价值之物。对双方来说，这场为期3年的远征都是一次你死我活的较量。教皇乌尔班二世向十字军许诺，所有在这场东征

中战死之人的罪行都将得到赦免。十字军抢劫、屠杀平民，还按当时的通行方式犯下了其他滔天大罪。但是，十字军也巩固了卡佩王朝的统治，它不仅将卡佩王朝与一个高贵的传说联系在了一起，还在更加实际的方面对王国有所助益。

十字军的东征产生了意外结果—削弱了贵族的权力。许多贵族在异国他乡被杀害或丧命，另一些人则因装备私人军队进行为期过长的远征，而倾家荡产。与此同时，为军队提供装备的工匠与商人们却从中获利不少。事实上，一个新的贸易阶级出现了，他们憎恶封建制度的重重限制。工匠们自行组织起来，形成了行会。他们还把自由城镇统一起来，试图逃避缴纳封建税费。因此，君主如今有了一个潜在盟友，即在发展中的城镇里涌现出的新兴商业阶级。利用这一点的第一人是极度肥胖却精力充沛的“胖子”路易六世（ 1108—1137年在位）。他开始给城镇颁布皇家特许状，以在自己试图控制社会普遍的混乱无序状态时，换取来自城镇民兵的支持。20年间，他都主要忙于镇压强盗行为、围攻躲在城堡中的强盗贵族，以及惩治为凶作恶之人。路易六世有儿时的伙伴阿贝·絮热（Abbé Suger）为他建言献策，而且教会与农民也站在他这一边。当他把权杖交给儿子—非常虔诚的路易七世（1137—1180年在位）时，树立国王威信的任务已大体完成。

然而，君主政体的强化开始带来两个更大的问题，它们将在13世纪、14世纪时变得日益紧迫。第一个问题是与梵蒂冈的关系，以及梵蒂冈对法国教会的控制程度。尽管路易七世是虔诚的信徒，但在布尔日大主教的人选上，他拒绝接受教皇提名的候选人，而有自己中意的人选。此事导致教皇颁布了禁行圣事令，并引发了路易七世与香槟伯爵之间的战争。在此期间，路易参与杀害了1000余人，这些人在维特里的教堂里被活活烧死。路易受良心的谴责，想通过进行十字军东征来洗清自己的罪责—但他由妻子阿基坦的埃莉诺，以及妻子的一群贵族侍女陪同征战的行为并不会取悦教皇。

埃莉诺是个美貌、好斗且坚强的女子，而在那个时代，女人往往是从属性角色。这也难怪她会在许多历史题材电影与小说中充当主角了。出身于更为无拘无束、高雅时尚的阿基坦王宫的埃莉诺，在15岁妙龄时嫁给了路易。她觉得自己嫁给了一个僧侣而非国王，而人们也觉得她任性且轻浮。在路易七世与埃莉诺灾难性的十字军东征途中，埃莉诺就战略问题与路易发生了争执，还被怀疑与自己年轻的叔父安条克的雷蒙德有染—雷蒙德战败后，其头颅被砍下装在一个浅盘中，呈给了巴格达的哈里发。最终当夫妻二人回到法国后，由于埃莉诺未曾诞下男婴，二人的婚姻关系解除了—此时，第二个问题出现了。

离婚后，她几乎马上就嫁给了金雀花王朝的年轻成员亨利。亨利在两年之内即将成为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但是，埃莉诺仍保留了自己阿基坦公国领主的头衔。这意味着，安茹王朝—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亨利也是安茹伯爵—如今控制着英格兰、诺曼底，以及向南直至比利牛斯山的整个海岸地区。亨利仍是他的封建领主路易七世的封臣，但是封建制度与实际权力关系之间的不匹配在整个13世纪都挑战着卡佩王朝的国王们—而且，事实上，这种不匹配所引发的王朝冲突用了300年的时间才得以解决。

腓力·奥古斯都（1180—1223年在位）是路易七世的儿子。他是个狡猾、坚决的人。腓力对于正日益凸显的来自安茹王朝的威胁十分警觉，他历时逾三十载，持续对抗连续三任安茹王朝国王：亨利二世、狮心王理查一世与国王约翰一世。最终，他占领了诺曼底、布列塔尼、安茹、曼恩、普瓦图与图赖讷。他通过1214年的布汶战役巩固了对这些占领地的统治—事实上，他将自己的王国建成了欧洲首屈一指的强国。此外，他也在国内进行了相当重要的改革：使行政管理专业化，实现财政稳定，保护城镇中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的利益。他下令铺设巴黎主干道，继续建造巴黎圣母院，并兴建了巴黎大堂的中央市场。他通过授予索邦特许证，认可了其作为中世纪基督教国家智力中心的地位。

1209年，为镇压异端的卡塔尔派或曰阿尔比派（得名于南部城镇阿尔比），教皇英诺森三世呼吁人们进行圣战，对抗当时其他的基督徒。而腓力·奥古斯都狡黠地佯装自己无法响应教皇呼吁，因为无暇率领十字军攻打卡塔尔教派。卡塔尔派爱好和平，但他们持摩尼教观点，强调耶稣的道德教化作用而非耶稣复活。他们还拒绝领受圣餐，这点在教皇看来也是非常关键的。事实上，他们完全否定教会在国务方面的作用，因为他们觉得这过于世俗化了。就这一层面而言，他们也许可被视为早期的新教徒。

教皇的声明促使数以千计的骑士与农民在西蒙·德·蒙德福特（Simon de Montfort）[3]的率领下袭击朗格多克。这些人都受到了教皇确保赦免他们罪行，以及可能从卡塔尔派手中夺取土地的激励。早期发生了一起事件，在十字军屠杀贝济耶居民时，有人问教皇的使者阿纳尔德·阿马尔里克，哪些人可以免死。据说，他的回答是："杀光他们所有人，上帝自会甄别出他的子民。"而西蒙·德·蒙德福特身上交织着虔诚与凶残，他虐待、杀害对手，那些获准活命的人也被他剜出了双目。毫无疑问，这一切自然激起了反抗。战事绵延数十载，直至梵蒂冈派出宗教裁判所进行镇压，才结束了这次事件。当时，整个南方地区也许已有100万人遇害。与此同时，十字军东征已不可避免

地变成了一场征服战—最终，战争的胜利者是老奸巨猾的腓力·奥古斯都与他的继任者们，他们吞并了朗格多克。

但是，人们一般认为，鼎盛的13世纪统治的高潮是路易九世（1226—1270年在位）统治之时。路易九世在死后被尊为“圣路易”，他是法国学童眼中的传奇人物。路易专横的母亲卡斯蒂利亚的布兰卡亲自教育自己的儿子。路易是个苦行僧般的虔诚信徒，对苦行者所穿的粗毛衬衣很是钟爱。他还时常禁食，并通过给贵族洗脚来培养自己的谦逊品格，但这并未阻止他严守自己独立于梵蒂冈的地位。他的做法似乎早早地预演了后来发展起来的专制君主思想—君权神授。而且，他在宗教信仰上所循的严苛的绝对论观点，又让他十分乐意地接受了宗教裁判所用酷刑与没收充公来对抗卡塔尔派的做法，恰如他接受十字军东征中对异教徒的屠杀一般。他自己积极地参与了第七、第八两次十字军东征。前一次，他通过驱逐放高利贷的犹太人，并将他们的土地充公来资助那次十字军东征。他参与的两次东征均遭遇了灾难性的失败。因为，在第七次十字军东征时，他因被捕而不得不让人替他交纳赎金才被放回。而在1270年第八次十字军东征期间，他死于高烧。但是，这两次东征为国王增添了光彩。无论这位国王对宗教有多狂热，他的严厉与正义交织在一起，为王国带来了不小的福祉。

具体而言，他为了实现更加平等的正义而改革了宫廷，并鼓励人们使用古罗马法典；强迫贵族履行他们的义务；改革税收管理制度；在巴黎开设了一间名为“三百人院”（the Quinze-Vingts hospital）的救济院，专门用于免费收治穷人；他还赞助艺术学科的发展，鼓励哥特式大教堂的兴建，并建造了宏伟壮观的圣礼拜堂作为自己的宫廷礼拜堂。

在巩固王国方面，路易九世也同样精明、成功。1259年，为了能结束长期以来对所有权的主张与反诉，他将里摩日、卡奥尔与佩里格割让给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作为交换，亨利需放弃对诺曼底、安茹、曼恩、普瓦图和图赖讷的所有权。他也将自己对鲁西永及巴塞罗那的所有权与阿拉贡国王对普罗旺斯与朗格多克的所有权进行了交换。上述的一切使他被人视为理想的基督教王子。此外，他的王国当时处于相对的和平与繁荣之中，也被看作是最负盛名的基督教国家。

处理与梵蒂冈关系中潜藏的深层问题，以及监督王国步入动荡的14世纪的重任随后落到了路易九世的孙子腓力四世（1285—1314年在位）的肩上。腓力人称“美男子”，因为他脸色冷若冰霜，英俊无比。除了身上的苦行衫外，腓力全身上下毫无圣洁之处。他在许多方面都改变了游戏规则。他通过实行更加普遍的税收政策，以及推行意

在排挤贵族的国家官僚政治，继续像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国家首领，而非封建王国的国王那样去执政。这与军事开销及野心勃勃的重建计划一道，需要更多的资金。因此，他没收了放贷的伦巴第族人的财产，于是轮到犹太人遭殃了；之后又对神职人员征税，并因此受到了来自教皇博尼费斯八世（Pope Boniface VIII）的威胁，说要将他逐出教会。这位教皇认为国王们应对教皇负责。

腓力四世的回应是派出一支外交突击队对教皇动粗，并将教廷转移至阿维尼翁。由此产生的新教皇是俯首帖耳的克雷芒五世。这一举动不仅宣扬了法国教会的独立性，还有助于腓力四世在寻找财富时，得到克雷芒的默许前去摧毁圣殿骑士团中富裕的分支机构。之前，圣殿骑士团的这些人不明智地拒绝资助腓力四世对英作战。腓力通过宗教裁判所，利用残忍的折磨来获取明显捏造的供述，实现了上述对圣殿骑士团财富的吞并。正如一位作家所言，可悲的矛盾之处在于："最可怕的审判者是那些刚直不阿之人。他们对人用刑单纯是出于对上帝的爱。"[4]我们可以从腓力对他儿媳的两个秘密年轻恋人的处置上，管窥其处事风格—他们被当众剥皮、阉割、开膛破肚、斩首，然后从腋下被吊了起来。这种种处置并不赏心悦目，但是在腓力四世统治结束的时候，他已大体上实现了对教会的政治控制，并让封建王国朝着大一统的现代君主政体的方向迈进。

截至1314年腓力四世去世，过去的300年间社会日趋安定。这极大地促进了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诚然，法国依然以农业经济为主。田间劳作十分艰辛，只有公牛可用作耕畜—在新大陆的诸如土豆、玉米与番茄这些植物到来之前—人们仅有十分有限的一些庄稼作物。以谷物为主的饮食是贫乏的，庄稼可能歉收。人们还受到天花或者伤寒的侵袭。即便如此，由于整体上良好的气候环境、伐林栽种、轮作以及粮食产量的增加，情况有了好转，以至于人口增加了两倍，增至大约1500万人。迅速发展起来的城镇生机勃勃，这些城镇是当地的中心，贸易繁荣，市场与集市兴旺，专业工匠、变戏法的人、扒手、妓女与流浪乞丐熙熙攘攘。到13世纪，法国出现了一个正在崛起的、服务于王权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他们充当着行政官与地方官的角色。不管城镇有多么拥挤，无论那里的卫生条件有多糟糕，它们都是未来之所在。

这一时期的文化与教育基本仰赖教会。中世纪两个最大的修道会是本笃会与更加严苛的西多会。它们均兴起于勃艮第。其中，本笃会尤其与教堂在全国的兴建有着很大关系，而且此时还兴起了相当具有影响力的"克吕尼派改革运动"（Cluniae Reforms），这个名字来源于他们在克吕尼的修道院。此项改革运动旨在清除教会的腐败，保护教

会免受世俗干扰。另外，巴黎大学是由巴黎圣母院的教堂学校及与之竞争的学校发展而来，后者包括圣吉纳维夫以及罗贝尔·德·索邦在1257年创立的学院，16世纪中期，这所学院以他的名字命名，即索邦学院。

巴黎成为世界前沿的神学研究中心这一时期，人才辈出，包括多产的圣托马斯·阿奎纳与有着非凡个人魅力的彼得·阿伯拉—他与自己的学生哀绿绮思的凄惨爱情悲剧（哀绿绮思的叔父派人对阿伯拉施以宫刑）无疑引来了各种添油加醋的杜撰，这也许影响了他作为一位学者型思想家的重要地位。就文学而言，虽然当时有歌颂圣母马利亚的虔敬故事与《圣经》题材的半礼拜仪式的戏剧，但是也存在英雄主义的叙事史诗，或者道德说教式叙事诗这些世俗文学形式。《罗兰之歌》就是叙事史诗的代表，而长篇叙事诗《玫瑰传奇》则讲述了爱情是如何教导“情人”成为彬彬有礼之士的，告诫“情人”不要干站着、张大嘴，要时刻侍奉、尊敬女性。让人欣慰的是，这些作品带来了中产阶级文学的腾飞，这类文学的典型是《列那狐的故事》，或者吕特伯夫创作的讽刺诗。

不过，中世纪法国的标志性形象无疑当数哥特式大教堂了。实际上，贯穿于宗教裁判所的残酷暴行与十字军东征的残忍屠杀中的宗教狂热，却在这些恢宏壮阔、彰显勃勃雄心的建筑物中体现了完全相反的一面。由于哥特式风格表现出了对罗马式风格的明显背离，所以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使用“哥特式”这个术语，对他们所认为的粗野风格加以嘲讽。哥特式建筑的圆拱结构可见于图卢兹或者韦兹莱的宗座圣殿（Basilicas）。这种新风格回应了阿贝·絮热的观点，他在圣但尼开创了哥特式风格中的“光的连续性”（lux continua）原则，这要求人们重新理解纵向与横向的线条。而且，最重要的是，为了将石结构建筑物简化为骨骼构架，要敢于大胆尝试尖肋拱顶与棱纹拱顶带来的结构上的可能性。

哥特式风格的发展经历了时间的淬炼。也许是通过13世纪诸如兰斯与亚眠大教堂的修建，哥特式风格才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并变异成了14世纪的艳丽风格。絮热的“光的连续性”是通过新增大片彩色玻璃而实现的，这样一来，教堂建筑如今有了三种互补的声音：教堂中殿高耸入云的新高度，大门、圆柱或内坛围墙上的雕塑，以及彩色玻璃上五彩斑斓的图像。由此孕生出一个全新的玻璃产业，中心位于圣但尼与普瓦捷等地区。这一产业受到了人们想提高半透明度、研发新色彩之欲望的驱使，著名的“沙特尔蓝”便是一例。

就沙特尔大教堂这一具体案例而言，大教堂对城镇居民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首先，作为除城堡之外的唯一石质结构，它是一座极其醒

目的建筑，在博斯的肥沃平原上，从很远的地方都能看见。它是重要的朝圣之地，因为这里藏有“圣衣”。据说这件外衣属于圣母马利亚，它在大火中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由于朝圣者主要在重要节日时前来，那时正好有大型集市，因此他们也带来了好生意。不过，无论如何大教堂的入口总会被当成集市，商贩在这里出售他们的各色商品。毫无疑问，这座献给路易九世的宗座圣殿也象征着王权，在那里的雕像群中，国王和王后的雕像与宗教人物的雕像比肩而立。此外，沙特尔还有一所教堂学校。这是供朝圣者们睡觉的地方，在瘟疫蔓延时也用作医院，还是一个募工的场所—简言之，它就是城镇中心。

此外，沙特尔大教堂还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宗教使命。对于那些目不识丁的信徒而言，他们不懂拉丁文，而这座建筑物本身就是天机。高耸入云的教堂中殿回荡着素歌；法衣华美大气；圣坛上陈列着漂亮的银器；绚丽的彩色玻璃讲述着《圣经》故事中的场景，随着日光的变幻，奇妙地形成了一幅幅动态图像；还有那惊人的“蓝色圣母”玻璃窗上甜美的圣母马利亚与圣婴的画像—对于生命如蜉蝣般短暂易逝，生活在严酷与不确定性之中的人们来说，这个神圣的地方就是天国的大门。更具深刻意义的是，在石雕像群所表现出的现实主义与人文主义情怀中，人们可以看到如自己一般谦逊的面孔；可以感觉到自己同样实现了灵魂的超越。在这种超越中，上帝与人达成了和解—这个关于恐惧与复仇的宗教也关乎慈善与仁爱。

不幸的是，14世纪即将抛出许多挑战，而这些挑战并非教会或封建制度本身所应付得了的。首先是大饥荒。1314—1317年的冬季寒冷潮湿，导致庄稼歉收，粮食收成无法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城镇受到的打击最大，这里的食物短缺，粮价上涨。绝望的人们开始四处游荡，放火、抢劫或者杀害犹太人。接下来是传染病，可能是炭疽。它在1318年杀死了大多数的牲畜，并削弱了人们的免疫力，使人受到麻风病与伤寒等流行病的攻击。所有这一切发生的背景是卡佩王朝王位继承体制的崩溃。这进一步说明，像经营家族事业一样运作政治体系是十分危险的。由于“美男子”腓力的三个儿子均很快离世，他们的在位时间加起来也只有14年而已，因此，1328年，经过由贵族主导的一次非同寻常的选举过程之后，王位被传给了腓力的侄子，瓦卢瓦的腓力（1328—1350年在位）。自此，新的瓦卢瓦王朝诞生了。严格来说，王位应归“美男子”腓力四世的外孙，14岁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所有。但是，让一个法国国王对英国王权俯首称臣是人们无法接受的。尽管爱德华三世确实在新国王腓力六世位于兰斯的加冕仪式上表达了敬意，但双方关系还是恶化了。而且，在各种各样针锋相对的挑衅之后，腓力六世于1337年宣布，爱德华由于反叛，已丧失了阿基坦的领主权，由此引发了百年战争。

这是在扩张过度的封建制度内部爆发的一场王位继承战。而且，就其本身而论，鉴于爱德华得到了来自法国北部与西南部的封臣的支持，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内战。同时，这也是场七零八落、拖拖拉拉的战事。战争以稀里糊涂、断断续续的方式持续了116年。起初，腓力看似能够轻易取胜，因为他领导的王国更加富庶且人口众多。但是，他在斯鲁伊斯海战及后来在陆上展开的克雷西会战（公元1346年）中，都吃了败仗。在克雷西会战中，英国长弓手迅速干掉了行动迟缓的法国重甲骑士。次年，爱德华三世占领了加来，而腓力的实力过于虚弱，以至于无法与爱德华抗衡。而且，当腓力撤退后打算发动反击，入侵英格兰时，却没能筹到钱。如果这还不够糟的话，那么最可怕的灾难已然降临，它有着持久的恶劣影响：黑死病。

黑死病肆虐欧洲，影响远及爱尔兰与瑞典。这场夺去了欧洲约1/3人口的瘟疫，最初于1348年1月自偏东南方向的马赛而来。到6月时，它已向北扩散至巴黎及更远地区。正如编年史家让·德·维奈特（Jean de Venette）所述，它来势如此凶猛，以至于“人们几乎来不及掩埋死者尸体……一个人今天还好好的，第二天就死了，等着下葬”。他将患者的症状描述为腋下或腹股沟突然出现肿块，这似乎佐证了人们通常认为黑死病是淋巴腺鼠疫的观点。无论如何，巴黎一度每日有800人丧生。这是场具有毁灭性的灾难，同时它也很神秘。它席卷全城，然后消失不见，1349年卷土重来，夺去更多人的生命，并于翌年再度消失。它会杀死一座修道院或者村庄中的所有人，但是出于某种难以捉摸的原因，让一人免死。但是，它并不尊重等级制度：它夺命时不分高低贵贱。不管是牧师还是罪人，男人还是女人，青年还是老者，它都照杀不误，甚至连地里的动物也不放过。而且，它无药可解。

切开放脓、放血疗法或是催吐都没有效用。芳香的药草、玫瑰香料与炼金士的药水也无济于事。人们向圣母马利亚苦苦哀求，宰杀撒旦的代理人—猫，杀害麻风病人与乞丐，火烧基督教国家的宿敌犹太人，结果都是徒劳一场。就算应运而生的新品种—高薪的“瘟疫医生”也没能力挽狂澜，阻止这场大屠杀。这些瘟疫医生就像威尼斯狂欢节上的邪恶人物一样，身着防护服，戴着似鸟一般的面具。在近代科学出现前的这个时代—600年后鼠疫杆菌才被发现—这个问题简直难以想象，更别说解决它了。思考黑死病是由地震释放的“浊气”所造成，还是最近一次行星排成一列所带来的后果，并无意义，因为左右着行星运行，控制着地震的，是上帝。在中世纪封闭的绝对主义精神世界中，正如教皇果不其然意识到的那样，黑死病只能是上帝带来的。而且，鉴于上帝是全善的，这可能是上帝对人类罪孽的惩罚。但是，由于教会是个封闭群体，没有谁比教会受到的打击更大了。这是

上帝对教会的审判吗？难怪教会在忏悔方面被新兴的、高度自律的宗教团体鞭笞派（Flagellants）比了下去。鞭笞派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以仪式的形式宣泄着集体的道德狂热，在仪式中猛烈地自我鞭打，以显示自己对自身存在的罪孽的强大承受力。难道说，人们长期宣扬的审判日已经来到了吗？

具有悲剧性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个没有公共卫生设施与自来水，人们极少清洗、更换衣物的社会中，疗法或药物只是在加重病情而已。放血疗法降低了受害者的抵抗力。由于鼠疫杆菌是由与黑鼠有关的跳蚤传播的，那么杀死"邪恶的"猫就适得其反，因为猫本来可以杀死老鼠。如果说犹太人当时受到黑死病的影响较小，那是因为他们的宗教习俗让他们格外注意清洁。至于鞭笞派，他们在城镇中流窜的行为只是在传播疾病而已。在这可怕的境况中，人们把能做的事都做了：祈祷，躲着其他人，把自己锁在房中，逃往乡间或者林中。有些人想在自己大限到来前享乐一番，倾尽所有挥霍在葡萄酒、女人与别的东西上—如果这是世界末日的话，为何不华丽丽地收场？这场灾难让教会名誉扫地，撼动了封建制度的根基，还在陵墓石刻艺术中，在新的艺术形式"死亡之舞"（danse macabre）下与生者共舞的狞笑的骷髅形象中，将死亡誉为了人生的意义之所在。

诚然，黑死病为无休止的王朝间百年战争提供了一个洪亮的背景音。这场战争在一片废墟上混乱地继续着。处境艰难的贵族试图绑架其他贵族，以获取赎金或者攫取他们的土地，而流动的雇佣军队则在战争间歇以掠夺、抢劫、强奸度日。战争开始朝着不利于法国的方向发展。1356年，黑王子爱德华在普瓦捷战役中重创法国。与此同时，瓦卢瓦的腓力的继承人，即轻佻的"好人"约翰二世（1350—1363年在位）被俘后在英格兰享受着皇家的舒适安逸，坐等战斗结束，而他的儿子则四下搜索，筹措巨额赎金—由此引发了一场由艾蒂安·马塞（Étienne Marcel）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巴黎市民起义，以及一场法兰西岛的农民反抗运动。

直到身体虚弱，但睿智而富有教养的"英明的"查理五世（1364—1380年在位）登基，情况才有所好转。查理五世恢复了宫廷的尊荣—他的父亲约翰二世之前过分宣扬自己的同性恋爱人，结果导致对方遇害—还起用了像贝特朗·杜·盖克兰这样的正派将军，而非醉心于荣誉的贵族；他建立了一支由有薪士兵组成的专业化常规军，而且改用突袭后迅速撤离的战术，放弃对阵战。在查理五世于1380年去世时，他已从英国手中收复了除加来与阿基坦外的其他地区，但教会内部的分裂还会持续40年，而且这种分裂意味着如今有两个教皇—一个是由法国支持的阿维尼翁教皇，另一个是由英国支持的罗马教皇。

不过，封建制度过了很久才咽下最后一口气。查理虽然成就卓越，但事实表明，他依然囿于固有思维模式的窠臼之中，因为他将大片采邑赏赐给自己的三个弟弟作为封地。即使不考虑他的儿子查理六世（1380—1422年在位）即位时年仅12岁的情况，分封一事本身仍会导致内部矛盾的爆发。查理六世无心为王，24岁时发了狂。他被自己争吵不断的叔父们，还有他那放荡的妻子伊莎贝拉玩弄于股掌之上。

王宫迅速分化成两派敌对势力：保皇的阿马尼亚克人与主张同英格兰合并的勃艮第人。英格兰国王亨利五世为尽快促成合并，入侵法国，在1415年的阿金库尔战役中摧毁了法国骑士精锐。而且，根据1420年缔结的《特鲁瓦条约》的规定，亨利五世不仅自立为法国王位继承人，还认定法国国王查理六世的儿子查理太子为私生子，从而正式剥夺了他的王位继承权。但是，条约一经签署，查理六世与亨利五世便双双去世。保皇派趁机向他们的新国王—19岁的查理七世（1422—1461年在位）致敬，而勃艮第人则拥立年仅1岁的亨利六世为王。因此，除了两个教皇外，如今又有了两个国王—还有内战。这就是传奇人物圣女贞德入场的背景。

“奥尔良的少女”在她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就是个谜，此后也一直被看作一个神秘的人物—这使她被右派、左派与中间派各个团体用作政治宣传的工具，而最近的一次要数法国政党“国民阵线党”对她的利用了，这一党派每年都在里沃利大街上贞德的镀金雕像前集会。但是，如果将贞德放回她所处的中世纪背景下，她就没有那么神秘了。不过她短暂的19年生命中那些不加掩盖的事实本身就够离奇的了。贞德虽目不识丁，却是个精明的乡下姑娘。她听到许多圣人的声音告诉她，她是被上天选中，将英国人驱逐出法国的人。于是，她穿上男装保护自己，并于1429年一路来到希农面见查理七世。由于英国及其勃艮第盟友控制了几乎整个北方地区，包括巴黎与兰斯在内，国王虽然优柔寡断、满腹狐疑，但如今深陷困境之中。贞德向查理七世传达了她所听到的声音中的一条秘密信息—大概是说查理并不是私生子，尽管连他自己的母亲伊莎贝拉之前也说过他是私生子。神父对贞德进行了仔细的盘问，并验明了她的处子之身。1429年4月，查理七世给贞德拨了一支小分队，前去解奥尔良之围。奥尔良是卢瓦尔河上的一处重要据点，没有它，查理就不能继续在兰斯进行传统的加冕仪式了。

无精打采的英军在他们的防线上留下了一个开口。贞德的小队凭借新到的补给，轻松突围入城。过于慎重的指挥官—奥尔良的约翰（Jean d'Orléans）视贞德为麻烦，把她排除在军事会议之外，还试图阻止她参与军事行动。但是，贞德是难以驯服的。她提振了军队士

气，不让士兵说脏话，对敌人口述了具有挑衅意味的最后通牒。在最后通牒中，她自称“少女贞德，天国国王的使者”。而且，她亲自参与了几次军事行动，在其中一次行动中，她受了轻伤。毫无疑问，旗手贞德—据说她不是用剑战斗—的勇敢与信仰，为围城的解除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只用9天她便取得了胜利。尽管她的“法力”似乎又奏效了一段时间，但次年她便被勃艮第人俘虏，后来卖给了英国人。而且，在索邦神学院神职人员的压力下，贞德作为异教徒在鲁昂受审。她在长时间的审判斗智过程中，表现出众，但最后还是被定了罪，烧死在火刑柱上—1456年，贞德得以沉冤昭雪；1920年，她被封圣。

那么，贞德极其强大的信仰之源何在？第一，她的童年生活是在孚日山脉中亲勃艮第地区的一块罕见的保皇派飞地上度过的。在此期间，她对抢劫者火烧其所居村庄一事记忆犹新。这让她很早就明确了敌人的存在。第二，幻听与幻影在中世纪十分普遍，对目不识丁、精神生活大多靠图像和声音加以引导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因此，这些东西不仅对她，而且对她的讯问者而言，无疑是真实存在的—问题其实是，这些幻听、幻影是来自上帝还是撒旦？很重要的一点是，她最初听到声音时，处于易受影响的青春期。当时，这些声音命令她保持童贞，这样才能接受使命。她就像一个感知神召的女孩一样，成了基督的新妇—这也就解释了她的信仰所具有的精神力量。贞德押上了最大的赌注。事实上，她似乎怀揣着让法国摆脱英国控制，让法国国王成为所有基督教国家的皇帝，从而重获圣地，迎来纯洁、公正的新千年的终极梦想。正是这个梦想让她能够清楚地把握住基本的政治必要性：查理七世唯有通过兰斯的加冕仪式使自己的王位得到认可，才能树立起威信。贞德的审问者正是想要宣布查理七世新获得的宗教地位无效，才会试图证明他是受到了一个异教徒的蛊惑。

如果贞德对于她同时代的人来说是个谜的话，那么正如著名的中世纪史学家科莱特·博纳（Colette Beaune）所指出的，这是因为她跨越了传统角色之间的边界。当时的社会就像如今那些有着更古老传统的社会那样，社会中的人不是作为个体而存在，他们被分成固定的类别：贵族、农民，男人、女人，圣人、罪人。一个女人—还是个农村妇女—可以是修女或先知，却不可能是骑士或武士。贞德模糊了这些二元区分，而且还做得相当成功。这就极大地扰乱了事物的秩序，问题也必然随之而来：她到底是圣女还是巫女？而且，正是这种模棱两可，加上她惊人的成功，铸就了这段传奇。

除此之外，贞德还以另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扰乱了事物的秩序。因为，虽然在这场王朝间的王位继承战中，交战双方都有法国人，但她总是称敌人为英国人。事实上，1456年恢复贞德名誉的审判也认

为，她之前参与的是一场反抗英国的民族解放战争。贞德所象征的是一种新型的爱国主义，一种令法国人意识到自己完全不同于此后的“宿敌”英国的新意识。实际上，一个新的国家从旧有封建秩序的废墟中诞生了。一旦查理七世开始利用自己新获得的胜利，这种新地位就被他正式确立了。他的具体做法是，在1438年迫使梵蒂冈接受高卢主义原则，即让法国教会取得财务与组织上的独立。

但是，爱国主义是一种情感。为了让这种情感产生效果，民族就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起来。如果说法兰西民族诞生于战争的苦难与血泊之中，那么法兰西国家也是如此。因为，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就需要有一支精锐部队。这就需要钱，钱意味着税收，进而又得有中央集权能够征税、收税。这暗示着，人们需要建立类似于现代国家的政府。事实上，这个模式符合知名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所说的“西方社会整体的结构性改革”。而且，正是迫于当下诸种情况所带来的压力，查理七世继而组建了一支装备了炮兵与英式步兵的永久性皇家军队，并且在城镇中产阶级的支持下镇压了一场贵族叛乱—这些贵族想要保持招募个人军队的权力。查理还将皇家垄断权拓展到了赋税征收上，并建立了专门的组织，开展征税工作。就像军队中的改革一样，查理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新的依附于王权的贵族行政阶层。在此基础上，查理单独与勃艮第人达成停火协议。他重获巴黎与阿基坦，把英国人从法国赶走了，只给他们留下加来。而且，查理有效地终止了战争。由于他的继任者路易十一（1461—1483年在位）兼并了勃艮第，废除了属地，法国开始近似我们今天见到的模样了。

因此，到15世纪末，由于法国中央集权制的程度日益加深，且没有类似于英国议会的组织，法国变得更接近现代意义上的君主政体了。导致这种局面的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一众国王所采取的行动，另一部分原因与君主有何作为毫无干系。无论如何，明白无误的是，封建体制旧有的、相互的责任和义务关系已经崩坏，封地也不复存在了，大贵族不再是自己私人领地上的小国君主。社会上出现了新兴的中产阶级。而且，由于黑死病之后出现的劳工短缺，普通人不再安分守己，他们开始索取更高的工薪。美洲的发现，意味着世界比人们之前所想象的更大。中世纪的封闭世界，以及它的虔诚、大屠杀与深深的绝望，仿佛是这个民族的童年时期一般，已逐渐消逝于往昔。

第三章

艺术与政治交错的中世纪

16世纪初，法国国王面朝着的是世界的另一边。他们还在做着在他们看来国王们应该做的事，在意大利追逐军事荣誉的旧梦。

16世纪是个转折点，它标志着向现代性的重要转变。中世纪基督教国家虽然对自身确信无疑，但其整体的延续性被一连串的发现与创新动摇了。这些发现与创新让人们重新认识了一个新欧洲，一个新世界，而且事实上是一种新宇宙观。

随着印刷术的普及，一个根本性的改变是教会与国王都开始失去对知识的控制，不过书籍出版仍需获得皇家正式授权。到1470年，巴黎已有了印刷术；直至1500年，法国已开设了许多印刷厂。到了16世纪末，巴黎出版了25000本书，第戎出版了15000本书，其他地方也有别的印刷厂。这意味着，不仅印刷作品可供更大的读者群阅读，而且人们创造出了机会，使印刷的宣传册与具有煽动性的讽刺文章得以流通。新的传播工具本身所传递的信息是，如今的社会可以进行更加广泛的思想交流。

社会上不断涌现出挑战教会正统信仰的新观念：世界上存在着其他大陆，它们有着不同的文明；地球是圆的；最具破坏性的新奇想法是随着《圣经》由最初的希伯来语被译为各种新版本，在拉丁语版《圣经》中出现了许多错误与前后矛盾之处—同时马丁·路德将《圣经》译成德语，这意味着人们首次能用自己的语言来阅读《圣经》—由此教会的权威受到质疑。继路德在1517年对教皇体制的世俗性以及教会出售赎罪券所涉及的腐败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之后，教会作为一个组织也遭受了严厉的批评。随后兴起的宗教改革将导致基督教世界的严重分歧，西班牙借机成为天主教国家，英国成了新教国家，而法国则开展了自己的宗教战争。

16世纪见证了欧洲新型国家的崛起。在这个过程中，西班牙、英国与法国成了三股彼此竞争的势力。每个国家都是在与另外两个国家的对比中定义自己的民族身份的。法国从意大利文艺复兴中获利，并将产生一些不同寻常的国王，诸如弗朗索瓦一世（1515—1547年在

位）与亨利四世（1589—1610年在位）。对于英格兰来说，如今漫长的玫瑰战争总算结束了，强大的都铎王朝崛起，令人敬畏的统治者是诸如亨利八世（1509—1547年在位）与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年在位）之类的人物。而且，英格兰在与罗马决裂后，将成为法国的一个潜在竞争对手。通过1469年阿拉贡国王费尔南多与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的婚姻，西班牙将成为一个大一统的、强大的天主教国家—他们的忏悔牧师是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首脑、毫不宽容的托尔克马达（Tomás de Torquemada）。西班牙也通过驱逐犹太人，占领格拉纳达以消除异族威胁，维护了自己的身份。

然而，如果西班牙自身统一了，王朝体制长久以来的荒诞之处—家族关系决定广阔、多元的领土之命运—就会在整个欧洲大行其道，引发混乱。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5]的母语虽然是法语，他却在佛兰德长大。1516年，他通过自己的母亲继承了西班牙王位及意大利属地，通过父亲得到了佛兰德与勃艮第，通过祖父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获得了奥地利。而且，在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死后，查理五世被选举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9—1558年在位）—以19岁“高龄”成了日新月异的复杂欧洲名义上的主人。这意味着，三股敌对势力之间的紧张局势—尤其因为三国的长期统治者查理五世、弗朗索瓦一世与亨利八世在16世纪上半叶恰是同辈人—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些国家所构成的新时代已经开始自我宣称为帝国时代了。如此一来，矛盾进一步加深。在徐徐敞开大门的新世界中，欧洲人已开始了他们的环游。英格兰先人一步。1497年，在亨利七世的资助下，威尼斯人约翰·卡伯特登上了加拿大新斯科舍的布雷顿角岛。但是，直到16世纪末，伴随着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与其他人的航行，以及1600年时东印度公司的成立，英国才算真正入局了。实际上，最先领跑的是西班牙与葡萄牙。17世纪开始之前，葡萄牙人已跟随航海家恩里克王子，对马德拉群岛、亚速尔群岛与佛得角群岛进行了殖民。他们还在非洲西海岸上建立了商栈，绕过海角，远抵印度。在此基础上，葡萄牙人迅速建立起了一个包括安哥拉、巴西与莫桑比克在内的庞大海外帝国。这使里斯本成了丝绸、香料与奴隶贸易的第一大港。

说到西班牙，它在1580年时兼并了葡萄牙。16世纪理所当然地成了西班牙的黄金时代，尽管黄金在1588年英国海军对西班牙无敌舰队的重创中失去了光泽。与此同时，来自卡斯蒂利亚王朝的西班牙征服者受到追名逐利、寻找黄金的欲望驱使，在充满异域风情的新大陆开始了新的十字军东征。他们一面让异教徒皈依天主教，一面大量摧残着南美洲土著居民。西班牙议会毁掉了墨西哥的阿兹特克帝国，法兰西斯克·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也用相似手段对付秘鲁印加

人。欧洲如今出口着自己的宗教信仰、暴力，还有它那致命的疾病。当地居民对这些疾病毫无免疫力，结果导致新大陆被欧洲化，成了拉丁美洲。

但是，法国在所有这一切发生时身在何方呢？16世纪初，法国国王面朝着的是世界的另一边。他们还在做着在他们看来国王们应该做的事，在意大利追逐军事荣誉的旧梦。这场梦始于15世纪末人称“和蔼的”查理八世（1483—1498年在位）。他和蔼可亲得有些过分，但脑子不大灵光。查理打着他的祖母安茹王朝的玛丽的旗号，想通过难以令人信服的所有权声明获得那不勒斯王国。1494年，查理八世进军意大利，占领了那不勒斯，但此举引发反法联盟的建立，他被迫无功而返。由于巨额债务的拖累，他无法再度进行尝试。另一个原因是，在昂布瓦斯，他走入一道高度较低的门时，忘记低头，结果撞在了门楣上，整个人陷入昏迷，年仅24岁便去世了。

火炬接下来传到了路易十二（1498—1515年在位）手中。他是位受人爱戴而又迷人的国王，但他在意大利的错误冒险令其明智的国内政策黯然失色。路易十二继续奉行先王的政策，在1499年占领了米兰公国。这让他壮起胆子宣称对那不勒斯的所有权，但不得不在两次惨败后宣布放弃自己的主张。路易十二完全不为失败所动，率领一支盟军占领了威尼斯，但当盟国意识到他想要再夺米兰时，联盟分化，形成了反法神圣联盟，并在拉韦纳大败法军。到1512年时，路易十二已经失势。这并未阻止他翌年再度试图夺取米兰时进一步的失败。这次的结果是，路易十二的边境地区为英国、瑞士与西班牙蹂躏。他通过收买这些国家，以及迎娶亨利八世以美貌著称的18岁妹妹，而化解了危机，据说他在52岁时仍野心过大地想要生下一名男性继承人，以完成自己在意大利的未竟之业，结果却在三个月后驾鹤西去。

这种对意大利的痴迷原因何在？除了基于这样一个由小国与城邦组成的四分五裂的地区易于带来军事荣誉之外，还有别的原因吗？为什么路易十二的继任者—他的女婿弗朗索瓦一世，法国文艺复兴象征性的国王，也遭遇了在意大利身陷困境的命运？事实是，他们都怀抱着成为当代查理曼大帝的梦想，这将是他们成为旧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第一步。然而，这个梦想在由诸国组成的新欧洲已经过时了。弗朗索瓦一世凭借马里尼亚诺战役的胜利，先声夺人，随后他又与教皇达成协定，强化了对法国教会及其财富的控制。由于弗朗索瓦一世威名大振，所以实际上，他显而易见地成了神圣罗马帝国帝位的候选人。但是，年纪更小的查理五世却把奖品从他的眼皮子底下偷走了。查理五世在负责处理梵蒂冈财务的富格尔（Fugger）银行世家等赞助人的帮助下，能够给出更多贿赂。

法国现在处于西班牙、荷兰与勃艮第的夹缝之中，左右为难—勃艮第的领地如今处于查理五世的控制之下，他可以调遣距巴黎100英里[6]内的军队—法国与西班牙就意大利各王国的争端，如今不仅关乎荣耀，更是攸关生死存亡的大事。在1520年那次著名的英法峰会—“金衣会”（Field of the Cloth of Gold）上，弗朗索瓦一世未能获得亨利八世的支持。但他再次尝试占领米兰公国，结果在1525年的帕维亚战役中受伤并被俘。然后，让人感到屈辱的是，他在马德里被查理五世俘虏，直到他付了一笔巨额赎金并割让了领土后才被释放，但后来他又拒绝接受割地条款。法国与西班牙和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竞争，及由此引发的时断时续的非决定性战争，不仅将在未来的20年间主导弗朗索瓦一世的外交政策，还会在他死后持续到1559年和约签署为止。

与此同时，尽管法国在意大利展开的无休止的军事冒险并未实际取得可供夸耀的新领土，但这几乎未影响到弗朗索瓦一世的受欢迎度。这也许是因为战争被视为国王正常的活动，同时也由于弗朗索瓦一世是个富有非凡个人魅力的人物。他不仅高大、帅气，长着英武的长鼻子，还聪明、有教养、热情洋溢，令女士倾倒—他就是具有骑士风范的皇族形象。同时，尽管边境地区遭了殃，但战争实际上有助于促进王国其他地区的内部和平。毕竟，战斗最好发生在别处，尤其是在战争吸引了雇佣兵与数十年间一直侵扰着王国的强盗的注意时。诚然，国内和平有助于经济复苏，而经济的繁荣自15世纪末就已开始了。

尽管法国不时暴发传染病，还有阵阵饥荒，尤其是在16世纪20年代，但由黑死病造成的人口损失到16世纪中期已得到恢复。由于开荒耕作，以及从墨西哥经西班牙引进的荞麦与玉米等新品种谷物的大范围普及，农作物产量大幅提高。尽管法国基本上仍是农业国，但制造业与贸易也随之出现增长。城镇繁荣，鲁昂有印刷厂与织布厂，而里昂除蚕丝业外，在16世纪大部分时期是法国主要的银行业中心。由于法国较晚才开始发展国家贸易，所以它的港口无法媲美里斯本与安特卫普—尽管弗朗索瓦确实向雅克·卡蒂埃（Jacques Cartier）与其他人发出了标准指令，派遣他们前往加拿大寻找黄金、传播天主教信仰—但波尔多港口当时将葡萄酒出口到了英格兰与低地国家。

此外，战争不断向国库索取开支，这再次促进了国家统治的强化。如果说，中央集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的话，那么这是因为要想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里实现中央集权并非易事。在一个巨大的王国中，诸省有自己的习俗与方言，从巴黎到波尔多可能要走上10天。法国没有真正的议会制度与皇权相制衡—法国大革命前的省级“高等法

院”（parlements）是只说不做的清谈会，而三级会议只是贵族阶级、神职人员与平民应国王要求、分别单独召开的会议而已，因此也就几乎从来没有召开过。在这种情况下，国王们正在将法国推向君主专制政体，到下个世纪路易十四时期将会达到顶峰。

但是，弗朗索瓦一世出于增收目的，继续完善着国家机器。他重组国库、审计部门、执行委员会与其他机构，并任命了有才干的中央及省级行政官来管理这些机构。依据具有重要意义的《维莱科特雷法令》，弗朗索瓦规定，法语将取代拉丁语，成为所有公文中的官方语言。他首次下令，详细登记人口出生及血统信息。弗朗索瓦还与教皇签署协定，从中他不仅获得了任命主教的权力，还能处置教会的大部分收入乃至地产。由此，他不仅可以筹集资金，还能奖励那些他希望召为己用之人—尽管他很快就开始通过卖官鬻爵来集资。弗朗索瓦出售王室职位并附上终身任期，由此出现了非传统的贵族阶层，即负责行政管理的“官员贵族”。他还借下了一连串的贷款，不论是通过银行业筹措的，还是通过城镇行政机构举债。通过这些方式，国王利用了王国日益繁荣的经济（事后看来，这种利用是过度的）。

不过，法国长期军事冒险所带来的主要好处在于意大利文艺复兴对法国的影响。数十年间，归国勇士们带回了雕塑、绘画、银器、书籍，以及关于艺术与建筑的新观念。查理八世与路易十二早已从意大利带回了诸多艺术家，而弗朗索瓦一世也紧随其后，引入了艺术领军人物，诸如切利尼、安德列亚·德尔·萨尔托与列奥纳多·达·芬奇，后者把《蒙娜丽莎》等作品带到了法国。弗朗索瓦还雇了意大利代理人为他购买意大利绘画大师的杰作，开始丰富自己的皇家藏品，最终这些收藏品都进了卢浮宫。类似地，他也通过代理人收购稀世图书与手稿，并任命著名的古典主义者、语言学者纪尧姆·比代（Guillaume Budé）出任皇家藏书的图书馆馆长。

比代是一个有着些微新教倾向的人文主义者。在国王的帮助下，他在弗朗索瓦一世至爱的枫丹白露宫建起了皇家图书馆。弗朗索瓦一世下令，在法国每出版一种新书，人们都要向这个图书馆免费捐赠一本。而且，这里的藏书最终也被转移至巴黎，成了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同样重要的是，比代不仅劝谏弗朗索瓦不要听从1533年索邦神学院神学家们禁止印刷业在法国发展的请求，他还成功劝说国王建立独立的学术教育与研究中心，即今天众所周知的法兰西公学院，这让神学家们感到很失望。弗朗索瓦对当时的法国文化生活做出了无法估量的重要贡献。

这位不计较开销的国王，对建筑也满腔热情。由于火炮的发展，老式防御工事风格已无法在围城时保障安全，中世纪城堡即将为更加

开放的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所取代，或是准备好做出相应调整。在巴黎，弗朗索瓦一世重建了卢浮宫，并推动了新市政厅的建造。此前，他就已经将宫廷搬回了巴黎，如今那里日益发展成了中央集权国家的首都。

但是，他最为人所铭记的无疑是对法兰西岛与卢瓦尔河上的城堡的影响。他翻新了昂布瓦斯城堡（Château d'Amboise），他在这座城堡中度过了童年时光。他还为布卢瓦城堡增建了设计精美繁复的楼梯，楼梯上饰有他的名字。在枫丹白露宫建成之前，布卢瓦城堡是他最爱的皇宫。他此前命人用两座由廊桥连接的新建筑，取代了布卢瓦城堡已有的中世纪建筑物。这座由罗素·菲伦蒂诺（Rosso Fiorentino）设计装饰的廊桥在法国开了先河。弗朗索瓦一世引进了许多意大利艺术家，这些人后来成了所谓的"第一代枫丹白露派"。而且，传统的宗教题材让位于古典主义的神秘主题。弗朗索瓦一世将他的首席情妇艾坦斯公爵夫人安妮安顿在了枫丹白露宫，那儿就成了他在远征意大利的间歇最中意的皇宫。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象征着浪漫、代表着当时皇家派头的，可能要数卢瓦尔河谷的城堡了。那里慵懒的风光与不同寻常的光线提升了蓝色石板屋顶的魅力，给城堡带来了特别的美感。

在许多法国人看来，真正的瑰宝是那些规模更小的城堡。阿泽勒丽多城堡位于安德尔河支流的一座小岛上。如此选址是为了让城堡的各面都倒映在水上。阿泽勒丽多城堡将护城河、塔楼及中世纪城堡的其他特征与意大利宫殿的完美对称及恢宏壮观和谐地结合在了一起。而且，它还有着宏伟的楼梯—上面有无处不在的弗朗索瓦蜥蜴徽章，十分明显。接着就是迷人的舍农索城堡。由于弗朗索瓦的财政大臣汤玛斯·波黑尔无力偿还拖欠国王的债务，所以弗朗索瓦从他那里攫取了这座城堡。城堡有横跨谢尔河支流的巨大廊桥，为它增添了别样风采。舍农索城堡的建筑风格也是复合型的，廊桥那简洁的新古典主义风格与屋顶和栏杆等处雕塑所具有的早期装饰特征相得益彰。这里举办了法国首次烟火表演，它也见证了凯瑟琳·德·美第奇与黛安娜·德·普瓦捷—弗朗索瓦那不太迷人的继承人亨利二世（1547—1559年在位）的妻子与情妇—在长期争风吃醋过程中的唇枪舌剑。

然而，这一区域最让人大开眼界的城堡无疑是弗朗索瓦建造的意大利风格的壮丽幻境—香波城堡，建造的部分原因是为靠近他美丽的秘密情妇安妮·德·图里。列奥纳多·达·芬奇也许参与了这座梦幻宫殿的设计，宫殿中的中世纪特征—角上的堡垒塔楼、墙壁与部分护城河—纯粹变成了装饰，成了正在逝去的过往。这是截至目前，卢瓦尔河谷地区最大的城堡。它有440个房间、365个壁炉，更别提那满是马鹿

的大型公园了。最引人注目的是著名的双螺旋楼梯。而且，城堡拥有屋顶上令人大为惊奇的鳞次栉比的烟囱，还有胡椒瓶形状的塔楼、屋顶窗，以及各种各样有趣的特征。这些设计让人想起君士坦丁堡的空中轮廓线—它们是美轮美奂的空中屋宇，是秘密会议、闲言碎语，以及观赏园口活动的绝佳场所。

香波城堡是一座迷人的装饰性建筑与宏伟的狩猎宫殿。但是，这里过于偏远，没有腹地作为支撑，无法满足有时多达10000人的豪华宫廷享乐活动，因此香波城堡鲜有访客。而且，城堡的开窗与凉廊更适合意大利的温暖气候。但是，这里与别处一样，火蜥蜴徽章让人们想起了那个魅力四射的文艺复兴王子本人，而他也迷倒了许多光临此地的贵妇，她们在这里或是枫丹白露的森林中猎鹿，与列奥纳多·达·芬奇畅谈艺术直到晚上。这位寻欢作乐、崇尚人文主义，如偶像般的国王居然吸引了如此多作家与电影制片人的注意，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而且，毫无疑问，他们必将聚焦于弗朗索瓦的风流韵事，而不是他从来都没从马德里被囚的经历中恢复身体健康的可悲事实。他人生的最后几年深受梅毒之苦，他那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已掏空了国库，削弱了国家经济。

“法国是艺术、武器与法律之母”，诗人约阿希姆·杜·贝莱在1555年赞颂文艺复兴的新法国之际，如此歌咏道。诚然，在罗马时，他为他坏脾气的叔父（也就是巴黎主教）充当外交杂役，受尽了折磨。当时，法国正上演好戏，巴黎宫中也存有晋升机会。诚然，这些都发生在宗教战争真正开始前，但贝莱的这番话仍是一份备受瞩目的证词，揭示出一种新的国家定位，更表明了一种信念：法国志在成为新的罗马帝国。文艺复兴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建筑与艺术领域，已经进入了诗歌范畴—这也是弗朗索瓦一世自己有所涉猎的领域。杜·贝莱此前就已发表了惊世之作《保卫与发扬法兰西语言》（*Défense et illustration de la langue française*）。这是一群诗人的宣言，其中包括更著名的人物龙沙。这群诗人后来被称作“七星诗社”，他们有着双重目标：一方面，他们想通过自己对希腊、罗马诗体的掌握，比肩古人；另一方面，他们想在法语中引入主要来源于希腊语、罗马语与拉丁文的新词，来丰富法语，让法语变得与拉丁文一样尊贵。这种精英主义的做法容易招致批评，因为它将法语过分拉丁化了。但它也将法语确立为高雅文化用语，如今法语已成了官方的法定语言。

如果说，“七星诗社”要打一场小仗来确立他们的新方法的话，那么，在教会正遭受各种新思想攻击的背景下，新兴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就要在宗教与智性方法论的领域打一场恶仗。如今，人文主义意味着不可知论或无神论。它是一种在人类理智与科学探索中—而非在天

启与宗教权威处—寻找真理的理性方式。但是，在16世纪的过渡期，其意义并没有那么清晰。从本质上讲，正如人文主义这个术语本身所暗示的，它标志着侧重点的转向：从上帝转向人。即使是在宗教世界观内也是如此。人类不再被看作是被全能的上帝或是被罪恶欺压的存在，而是基于自身经验，可以自由发展思想的主体。在人们看来，上帝依然是宇宙及其法则的创造者，但他已不再观察并审判人类的每一个单独的举动了。社会为乐观畅想人类可能性留出了空间，人们在许多活动领域都感受到了复兴的希望。但是，毫无疑问，这种文艺复兴或曰“重获活性”给教会带来了挑战—而且是在许多方面。

从根本层面上说，这的确是一次挑战。由于基督教原始文本的发掘，教会正统信仰的权威被削弱；而且，哥白尼与其他人的发现揭示了人类理解范围之外的知识—天启正让位于探索。更直接的一点是，文艺复兴带来了政治上的挑战。因为人们不仅对地方层面上，还对罗马本身的世俗性与腐败普遍感到心灰意冷。在罗马，教皇们已在本质上变成政治领袖了。在1492—1521年相继在位的3名教皇中，来自波吉亚家族的亚历山大六世以骄奢淫逸、任人唯亲而臭名昭著，他有4个私生子；“战神”尤利乌斯二世在18岁时就当上了枢机主教，尽管他也生育了孩子，却是个众所周知的同性恋；13岁就当上枢机主教的利奥十世也是个同性恋，他为重建圣彼得大教堂而下令出售赎罪券。

售卖赎罪券的部分收入被用来购买拉斐尔与米开朗琪罗的画作，不过这件事并未给马丁·路德留下深刻印象，让他感到震惊的是购买与出售救赎的行为。马丁·路德的本意是尝试改革教会机构，但最终他否认了教会宣称的通过圣事充当中间人角色的说法。他的理由是，只有通过个人信仰才能靠近上帝。这种观点削弱了教会的整体权威。分裂无疑是必然的，因为人文主义者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排斥正与印刷业的崛起以及民族主义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共同瓦解着天主教世界。而始于1545年的特利腾大公会议（Vatican's Council of Trent）只是确认了这一过程而已，这次会议推行了一些改革，但并未对新教主义做出让步。

当然，正如人们可以在天主教两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身上所看到的那样，在广泛的天主教运动内部也存在着重要分歧。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在做了6年的修士后，成了一名牧师，在巴黎学习神学。这段经历助他写下了强有力的讽刺作品《愚人颂》。在书中，“愚人女神”抨击了神学家、僧侣与其他权威人士，例如，律师的过错是迂腐、愚蠢与做作。他也通过自己新翻译的希腊文《新约》，成了复兴知识、宣扬“基督教哲学”（而非刻板的经院哲学）的核心人物。虽然他在生命垂危之际没请牧师为自己做圣事，但还是希望教会能进行自我改革。

而且，他也不支持日益壮大的宗教改革运动—这并未阻止特利腾大公会议对他的作品加以谴责。

另一方面，同样具有影响力的约翰·加尔文则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他在索邦神学院学习神学时，被逐出了教会，后来成了一名律师，用新的人文主义式的方法直接探查原文，并采用了历史分析与语法分析方法，而不是依赖于二手评论。加尔文在转向新教观点后，被迫逃离巴黎。他在日内瓦度过了人生中的大部分时光，并在那里创立了著名的学院。他开始极力推崇宿命论的悲观主义信条，这显然与教会关于自由意志的观点发生了冲突。此外，在更为朴素的新教教派的发展历史中，他是关键人物之一。

不管这些人有多么与众不同，法国新教团体的兴起无疑在最初被视为一个政治问题。人们通常称这个群体为胡格诺派，其名称源自瑞士德语“同盟者”（Eidgenossen）一词。事实上，尽管弗朗索瓦一世对文艺复兴观点持开明态度，但他早在1534年起就开始反对新教运动的兴起了。当时，他发现有人在他寝宫的门上钉上了攻击弥撒的小册子。鉴于他的官方称号是“最具基督教精神的国王”，是一位君权神授的天主教国王，他觉得这事做得太过火，于是，弗朗索瓦一世开始了对宗教少数派或曰“异教徒”的迫害。他的儿子亨利二世（1547—1559年在位）积极推进了这项政策。亨利是个性格内向的口吃者。他当上国王纯属意外—因为他的兄长去世了。亨利二世利用他那邪恶的“火焰法庭”，给宗教迫害的熊熊烈火上浇了一把油。在“火焰法庭”中，即使人们身处白昼，也需要用火炬照明，因为窗户都被涂黑了。 在此，异教徒获得的审判是折磨、刑讯逼供与终极的火刑柱。

这是后来宗教战争的试演，这场战争将持续到16世纪末。在此期间，获取意大利军事荣誉的旧梦将淹没在法国国内战争的现实之中。诚然，正如此类战争通常会出现的情况，这些战争并不仅仅关乎同一宗教内部出现的自相矛盾的解读，而且宗教特性往往倾向于将对手妖魔化，并将此作为双方实施背叛、暗杀与抢劫的正当理由。宗教战争基本上是来自不同省份的大家族之间彼此拉帮结派、时断时续的男爵内战。出于一些基本的或战术上的原因，教会与国王支持一方，而新兴的新教运动则支持另一方。而且，占据领先地位的天主教吉斯家族与新教波旁家族之间的斗争事实上是一场弱化版的王权斗争。

不消说，在这个由中世纪基督教国家发展而来的四分五裂的欧洲，国际背景至关重要。无人能比亨利二世的妻子凯瑟琳·德·美第奇更好地证明这一点。她出生于佛罗伦萨，是两位不同教皇共同的侄女，最终她成了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丈母娘。人们认为凯瑟琳代表着王权背后的一股冷酷无情、诡计多端的势力，所以她在自己所处的

时代并不受人爱戴。即使是今天，人们对她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但是，凯瑟琳是个聪明的女人。人们必须把她放在当时的背景下审视——需要考虑那个时代的宗教暴力、世袭君主制作为一种政治体系的虚弱，以及社会舆论环境。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一位天主教女王聘请占星家诺查丹玛斯做顾问、当御医，是再体面不过的了。

凯瑟琳在佛罗伦萨出生后没几周，父母就双亡了。她在8岁时被一伙叛军挟持为人质，10岁时在一次围城中被人以死相胁，14岁时嫁给了亨利二世。弗朗索瓦一世亲自对他们的圆房进行了适当指导。但是，她的靠山教皇去世了，这意味着她失去了可以仰赖的政治筹码；她的嫁妆不多，人不漂亮，也没有皇室血脉，甚至被魅力四射的黛安娜·德·普瓦捷排挤出局。慈母般的黛安娜后来成了亨利二世的情妇，深得国王宠爱。对于王后来说，更具威胁的是，尽管她试过医生开出的各种药方——她喝过骡子尿，还把母牛粪涂抹于私处——但婚姻的头11年她均无所出，直到后来她诞下不少皇家子嗣。无论如何，她依然爱着亨利。在亨利被短矛刺穿头部而亡时，她感到悲恸欲绝。但是，很快轮到她把黛安娜·德·普瓦捷挤到一边去了。凯瑟琳安下心来监督她的三个儿子，他们会成为一连串相当不称职的国王。

弗朗索瓦二世（1559—1560年在位）在15岁时登基，并于一年内死于肺结核。他的妻子是未来命途多舛的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玛丽轻易就被强大的吉斯家族操纵了，后者不仅搬入了卢浮宫，还利用自身主导地位攻击新教的波旁家族。凯瑟琳怀疑有着西班牙盟友支持、颐指气使的吉斯公爵的用心，试图修复吉斯家族与波旁家族的关系。但是，由于她如今要忙于支撑10岁幼子查理九世（1560—1574年在位）的王位统治，所以她也自顾不暇。于是，以1562年发生在香槟地区瓦西镇的大屠杀为导火索，宗教战争爆发了。次年，当吉斯公爵遇刺身亡时，凯瑟琳感到很高兴，她终于可以自主地统治国家了，但却无法阻止针锋相对的互相攻击。很快，她就被吞没在政治斗争的洪流之中。而且，在1572年8月发生的令人震惊的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中，她至少充当了共犯。

凯瑟琳策划让她的女儿玛格丽特·德·瓦卢瓦与新教王储亨利·德·波旁-纳瓦尔联姻，然而教皇与主要信奉天主教的巴黎市民并不赞成这桩婚事。一大群来巴黎参加婚礼的新教客人让天主教吉斯派蠢蠢欲动，后者想要将新教领袖一网打尽。尽管新郎最终将幸免于难，但代价是他必须弃绝自己的新教信仰。婚礼后第六天，在圣巴托罗缪之夜，刺杀新教领袖们的计划开始了。它在未来几天将升级成大规模屠杀、抢劫，也许有3000名新教徒在巴黎惨遭谋杀，之后他们的尸体被扔进了塞纳河。大屠杀蔓延到里昂、波尔多、鲁昂及其他城镇，估计共有

25000人丧生。这是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战争的一个关键时刻。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似乎是要强调欧洲范围内冲突的胜利，因而举行了庆典，并铸造了特别纪念币。纪念币上刻着手持利剑重击新教徒的复仇天使。

两年后，查理九世在24岁时死于肺结核。王位落到了凯瑟琳最中意的儿子亨利三世（1574—1589年在位）手中。他很聪明，但其成群的同性恋男宠与荒淫无道的做派招致许多人的反感。凯瑟琳目前面临着双重危机：一方面，她试图支持温和的天主教阵营，来对抗复苏的新教团体；另一方面，她不得不面对一个获得了西班牙支持、由下一任吉斯公爵领导的极其专制的新天主教神圣同盟，这个同盟正在积极策划夺取王位的行动。1584年，当她的小儿子安茹公爵弗朗索瓦去世时，威胁变得富有戏剧性。事实上，亨利三世是同性恋，所以并无子嗣，而最终王位的接班人将是亨利·德·波旁-纳瓦尔，新教领袖本尊—他在此前已背弃了自己被迫改信的承诺。

在接下来5年的混战中，这位新教假定继承人，即未来的亨利四世（1589—1610年在位）即将经历一番艰辛才能继承王位。他首先在战场上打败了亨利三世的军队，随后又成了亨利三世的盟友。起因是亨利三世刺杀亨利·德·波旁-纳瓦尔（亨利四世）的另一个危险敌人吉斯公爵，致使巴黎爆发了反对王权的叛乱—就在此时，由于亨利三世被一名多明我会修士刺杀身亡，王位落到了亨利四世手中。法国人已然群情激愤，亨利四世仍然要面对反对他的天主教神圣同盟，他还要打许多年的仗。然而，亨利四世不仅聪明、坚决，还成熟、理智。他亲眼见过40年的战乱所造成的破坏。他之前已几度因形势需要而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了，如今，这位国王决定通过正式皈依天主教，快刀斩乱麻—他说出了那句具有传奇色彩的妙语：如果争取到巴黎上下一致支持的唯一要求只是一场弥撒的话，那么他会去做的："巴黎值得一场弥撒。"尽管此举让他失去了许多新教徒的支持，但他渐渐通过明智的恩威并济，掌管了整个国家。他把武力、谈判及巨额贿赂结合在一起，还颁布了"南特敕令"，赋予新教徒某种程度的宗教自由。因此，新波旁王朝将做出的政治决定是信奉天主教。即使这种矛盾解决方案在某种程度上是虚假的，但是它也终结了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给一个精疲力竭的国家带来了些许和平。

当时，诸如弗朗索瓦·拉伯雷与米歇尔·德·蒙田这样重要的法国作家，又如何看待这个由教会对信仰与文化实行大一统统治，如今这种统治又遭受攻击的世界呢？教会受到的攻击包括：地球也许只是一颗围绕太阳旋转的行星而已；正如我们今天可能在外太空发现外星人一样，欧洲人当时在遥远的大陆上发现了外来人种，后者有着让人无法

理解、难以接受的异教差异；人文主义的希望渐渐消融在内战之中，而且人们最近觉醒的国家观念导致天主教与新教之间为争夺国家控制权而爆发了残忍的冲突；写作与生活本身类似，都可能是场冒险—拉伯雷看到他的印刷工被活活烧死在火刑柱上，而蒙田的六个孩子中有五个在婴儿期就早夭了。具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夫尔（Lucien Febvre）也许倾向于轻描淡写人们对新知识的好奇心，但他的提醒对我们来说是有用的。他认为，我们不应该用今天的眼光去解读16世纪的作品。因为，16世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充满着宗教气息。当时，人们眼中没有自然与超自然的清晰界限，因此也就没有恰当的哲学与科学语言。我们应该由此意识到"'无信仰'在16世纪所受的限制"。

拉伯雷是一个学识渊博之人，之前做过修士、医生，他还深深扎根于人文主义的传统之中。拉伯雷那打破常规的文学作品通常证实了其人文主义的倾向。他因一个关于"伟大且体形庞大的巨人高康大"的荒诞不经的故事，突获成功，创作了具有惊人创造力与趣味性的大杂烩，融合了卡通式夸张、讽刺、插科打诨、文字游戏、作品模仿、低俗幽默与对教育的反思，并将荒诞不经与喜剧性的精确相结合。例如，当高康大撒尿淹了下面的巴黎人时，"不算女人与小孩，淹死了260418人"。但是，所有这些慷慨激昂的描述并未产生任何明确信息，除了他所虚构的那个群体的格言—"为所欲为"。拉伯雷明显是在鞭挞教会，争取宗教自由。而且，如果他还信仰上帝的话，他认为，"自然与身体本身是善"的观点没给基本的罪恶与救赎思想留下任何空间。仿佛他从内部引爆了中世纪，却看不到中世纪世界以外的任何存在。

至于蒙田，他选择了具有高度个人特质的随笔—该文体为他所开创—这标示着该时期世界观从标准的、有组织的转向了怀疑主义与悲剧主义，而后两种思想又是由长期的宗教战争所致。在如此的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人们必须时刻整装待发"。尽管蒙田也还信仰着上帝，但他自相矛盾地基于人类理智的缺陷来为自己的宗教信仰辩护。而且，他的《论食人族》一文惊人地接近现代文化中的相对论观点。在这篇关于食人部落的著名随笔中，他说道："我们只因这些习俗不同于己，就说它们原始；看来确实如此：当我们寻找真理与理性时，无法超越本国观念与传统去看待问题。"对于一个生活在蒙田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即使只是思考一下欧洲基督教文明可能存在的独断专制，也是危险的，因为那近似于思该时代所不能思。

第四章

太阳王，究竟有多辉煌

路易大帝处在他那美轮美奂的新宫殿的中心，而他的新宫殿就是欧洲文明的枢纽。

对法国人来说，17世纪头顶着光荣与伟大。它是伟大的世纪[7]，是路易十四、路易大帝或者叫太阳王的世纪。太阳王的称号与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有关。路易十四在距巴黎约19千米的凡尔赛建造了一座全新的皇城。道路像阳光一样从规模宏大的凡尔赛城堡向外发散出去，而具有仪式性意义的国王卧室则精确地位于整座建筑的几何中心上。因此，大臣与侍臣的所有活动都是围绕着路易十四而展开的，他就好像是巨大蜂巢中的蜂王一样。诚然，这意味着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他就是天命神授的专制君主。而且，这座雄伟宫殿无处不彰显着光荣与伟大。它那相得益彰、完美融合的建筑与风景，它的镜厅，还有设计规整、向湖面倾斜的花园，均强有力地说明了当时法国君主制的威望。今天，游客也许会注意到凡尔赛没有自来水，也缺乏固定的卫生设施。他们也会呆望一会儿亚森特·里戈（Hyacinthe Rigaud）创作的那幅著名的路易十四全身肖像作品。画中的路易几乎被掩埋在整头假发与白鼬皮衬里的皇袍中，只露出一条穿着白色丝绸长袜的美腿和一双红色高跟鞋。这就是法国在欧洲称王称霸时君临天下的法国国王。正如布莱士·帕斯卡、让·拉辛与莫里哀的肖像画所证明的那样，这也是法国在整个欧洲具有文化优越性的时代。人们可以在这个时代看到什么是智慧、儒雅风度与高级时装。路易大帝处在他那美轮美奂的新宫殿的中心，而他的新宫殿又是欧洲文明的枢纽。

在宗教战争带来毁灭后，在面对如此多无休止的问题时，法国是如何登上这个顶峰的呢？ 1610年，亨利四世被狂热的天主教徒弗朗索瓦·拉瓦莱克（François Ravaillac）谋杀，导致宗教紧张局势延续了下去。而这将再度揭示王朝体制的内生缺陷—亨利的继任者路易十三（1610—1643年在位）在9岁时登基，而他的继任者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则是在5岁时便加冕为王，这会再一次让王位受到难以管教的贵族们的攻击，因此法国将面临一系列复杂的反叛活动。最终反叛行径以1648—1653年的投石党运动告终。而且，法国将被卷进大规模的欧洲国家混战“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此外，法国还与西班牙及哈布斯堡家族起了冲突。两大家族之间的通婚只是

加剧了矛盾而已—这是王朝体制的另一个特征，在这种体制下，国家战争与家族矛盾结合在了一起。那么，面对这些状况，法国是如何在路易十四统治下占据主导地位的呢？原因之一仅仅在于，法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疆域统一而且可能十分富有的国家。当时的法国有2000万人口，多于竞争对手西班牙的800万人口，以及英格兰的500万人口的总和。如果说，在过去的20年间，西班牙多有灾年的话，那么新世纪的头几十年里，至少直到瘟疫在1627—1628年间再度席卷而来之前，法国的情况要好很多。最重要的是，路易十四的权力之路是由一系列有才干的强者所铺就的。亨利四世本人及其首相苏利就是领头的两个。

亨利四世行事风格高效干练，他那“每个劳动者周日的锅里都应有只鸡”的关切颇为新奇。他对和平与宗教宽容的倡导使他被称颂为“贤明王亨利”，不过毋庸置疑的是，他也醉心于风流韵事。他带领着一小队大臣—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当数苏利公爵—通过推动农业与建筑业的发展，开始开拓繁荣盛世。为恢复国家财政，他向那些之前购买了治安官与收税官等官职的人收取年费来筹集资金。这些人只有交纳年费才能保住他们职位的世袭基础。而这项措施也给亨利四世的后继者们留下了隐患，因为由此产生了独立于王权的行政管理阶层。首相苏利用这笔钱稳定货币，实现强有力的财政平衡。与此同时，他还抽干沼泽，建起了榆树林荫道路网，兴建桥梁与水渠。

亨利四世极大地促进了巴黎的发展，具体措施是建成巴黎新桥、规划了68条新街道、建造了富丽堂皇的巴黎皇家宫殿。这座宫殿在法国大革命后被更名为孚日广场。他积极发展工业，尤其是挂毯、丝绸与其他行业。当他建造卢浮宫大画廊时，邀请了一批能工巧匠在那儿开设店铺。他为陆军配备了新式大炮，巩固边防堡垒。亨利还热心地资助远征队建立与远东地区及美洲的贸易关系，尤其是资助了萨缪尔·德·尚普兰的冒险旅行，使其得以在加拿大开辟新法兰西殖民地。对于法国而言，亨利在德拉费罗内里街被一个受蒙蔽的弑君者—这个弑君者按照指定的方式，在受尽折磨后被四马分尸—夺去生命，实在是一件不幸的事，因为亨利与苏利本已为波旁王朝的成功制定了范本，然而，这种优势在亨利四世的妻子玛丽·德·美第奇为她9岁的儿子路易十三摄政时，很大程度上被挥霍掉了。

玛丽的婚姻生活一点儿也不理想，因为亨利娶她只是为了用她的嫁妆还债而已。而且，她还不得不忍受亨利的情妇在王宫中傲慢地摆出一副主人模样。如今亨利去世，玛丽就兴高采烈地把她赶走了。玛丽喜怒无常，既不聪明也无政治意识，而且她跟自己那相当心绪不宁、体弱多病的儿子关系也不好。雪上加霜的是，她很快就受到了义

妹莱奥诺拉·加利盖（Leonora Galigaï）的丈夫康西诺·孔奇尼（Concino Concini）的影响。尽管孔奇尼几乎没打过仗，玛丽还是让这位意大利冒险家做了陆军元帅。苏利被罢黜，他苦心经营的后备队也开始被糟蹋。而且，孔奇尼还开始中饱私囊。皇族成员与大贵族见王权如此被削弱，纷纷揭竿而起。玛丽付出很大代价才收买了他们，她甚至不得不通过召开三级会议来尝试集资—这次尝试只是揭示了三个等级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已，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前，迫于压力，这种情况会再度上演。

同样威胁王国和平的是，玛丽在教皇使节的压力下采取措施反对新教徒，并被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所设想的在欧洲打造天主教一体化王国的梦想所吸引。于是，她让路易十三在14岁时就迎娶了哈布斯堡王朝公主，即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之女，奥地利的安妮。这场婚姻注定是灾难性的，不仅因为后来事实表明路易是同性恋，还因为玛丽拒绝让路易在13岁成年时掌权，这让他感到怒火中烧。

因此，路易十三在1617年15岁时，发动了一场反对自己母亲的宫廷政变，由此掌权。他通过老谋士吕伊纳公爵开展行动，派人刺杀了孔奇尼，莱奥诺拉·加利盖被控施行巫术，被活活烧死，玛丽则被赶至布卢瓦城堡。政变看似结束了法国亲哈布斯堡、亲西班牙的政策，但宗教矛盾依然存在。法国西南部爆发了新教起义，起因是新教徒拒不执行将自己的房产强制性转移给天主教会的政策。此外，1618年，当波希米亚的新教徒起义反抗神圣罗马帝国的政策时，引发了一连串漫长的、零星出现的战争，“三十年战争”由此开始。在这些战争中，德国新教徒转而获得了英国、荷兰、丹麦的支持，最终得到了瑞典的支持。尽管法国等到1635年才开始直接干预，试图抑制西班牙及其帝国的力量，但这种蔓延于整个欧洲的情绪为路易十三控制法国国内形势的尝试提供了背景。他仍不得不与玛丽展开较量，因为玛丽在1619年时从布卢瓦逃跑，并以其名义支持新贵族反叛，叛军首领就是国王的亲弟弟奥尔良公爵。路易十三镇压了这次反叛，并请回玛丽之前的顾问黎塞留，实现了暂时的和解。吕伊纳公爵在1621年去世后，路易越来越依赖黎塞留这位野心勃勃的神职人员了。当时，路易已让他当上了枢机主教，而黎塞留继续步步为营地盘算着，最终在1624年做了路易的首相。

红衣主教黎塞留是法国历史上一位杰出且富有争议的人物。亚历山大·仲马的小说《三个火枪手》使他的形象家喻户晓。在小说中，他是冷酷无情、遮遮掩掩、虚伪狡诈的阴谋家—“红衣主教阁下”。他还有个神秘莫测的同谋，即绰号“灰衣大人”的怪人约瑟夫神父，其名源于他总是穿着灰色的手织圣方济会长袍。黎塞留在自己所处的时代为

千夫所指，而且路易十三也憎恶自己对他的过度依赖，以至于当黎塞留去世时，他难掩心中的喜悦。黎塞留作为一个位高权重之人，对自己的计划守口如瓶。他为人冷若冰霜，并不平易近人。但是，他显然天赋异禀，才思敏捷又注重实际。与他同时代的人将其视为政治家，甚至是军人，而非枢机主教—德·雷斯枢机主教轻蔑地说：“他今生已有足够多的宗教信仰了。”言下之意是他也许来世不会有多少宗教信仰。但是，黎塞留并不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而且，就他的其他特质而言，他能够完美地胜任自己面对的这些充满挑战的工作。无论如何，当时的另一位政治家，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让·科尔伯特将其视为自己的榜样。此外，黎塞留对接下来18年间的法国所做出的至关重要的贡献，在今天也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

黎塞留对自己的处境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明白，自己夹在王室母子的失衡关系中，两头为难。太后与国王既不喜欢也不信任他，但他们都需要他。在更广义的层面上他同样进退维谷：当时，天主教会内部掀起了由耶稣会与其他各种新兴宗教团体主导的强大的反宗教改革运动，参与其中的著名人物有未来被封圣的圣方济各·沙雷氏（saints François de Sales）与文生·德·保禄（Vincent de Paul）。但是，如果这次对天主教正统信仰的主张在宗教层面上算作成功的话，它也许与各国自身利益起了冲突。不论其所效忠的宗教义务是什么，黎塞留枢机主教与他的继任者马扎然枢机主教都有义务追求“国家利益”。

因此，尽管玛丽视黎塞留为亲信，他却让玛丽失望了，因为黎塞留没有坚守玛丽亲天主教、亲西班牙的方针。玛丽感觉受到了背叛，因此试图除掉黎塞留。1630年，在人们后来所谓的“上当受骗者的一天”，玛丽与国王的弟弟奥尔良公爵成功地—或者说他们自以为成功地—说服路易十三，免去了黎塞留的职位。鉴于主教当时通过自己的特务网，对事情的进展了如指掌，他于是镇定自若地在房内踱步，面带微笑地问众人是否在谈论他，接着他就完全逆转了局势。路易十三被说服了，还授予了黎塞留公爵封号，自此以后他的地位就稳固了。玛丽所未能领悟的是，不论黎塞留是不是枢机主教，他都更坚决地争取法国的国家利益，而非扩大西班牙的利益或者实现罗马教会在更广阔欧洲地区的雄心壮志。

事实上，黎塞留在执行一项环环相扣的方案，目的是控制死灰复燃的宗教分裂思想，并通过巩固王权来实现中央集权。一方面，他不得不应对一系列由国王的弟弟、皇族及旧封建贵族相互勾结而发动的亲哈布斯堡、亲天主教的密谋。黎塞留在镇压这些动乱时毫不手软。他摧毁了对手布有防御工事的城堡，禁止决斗，并处决了有头有脸的叛徒，其中包括蒙莫朗西公爵，甚至还包括国王的情人桑马尔斯侯爵

亨利·夸菲耶·德·吕泽。另一方面，黎塞留不得不处理小规模的新教徒造反活动。他以惊人的方式镇压了由英国支持的胡格诺派起义。1627年，他亲自指挥了对胡格诺派根据地拉罗谢尔的围攻战。尽管他剥夺了新教徒的一些政治保护，但是他足够睿智，并没有听从天主教徒关于废除亨利四世颁布的“南特赦令”的要求，而且还保留了新教徒的信仰自由。但是，要想在国家层面上把握好天主教保守主义与新教主义之间的微妙界限，这还不够。他不得不用到“三十年战争”中使用过的技巧。尽管法国之前只是秘密地支持着新教势力，但由于黎塞留想要确保法国永远不会被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所梦想的大一统天主教君主国所吞并，他还是被卷入了1635年讷德林根战役新教徒的失败中。与西班牙的战争将会在1642年黎塞留去世后一拖再拖。

不过，在黎塞留去世之际，他已大致建立起了一套中央国家机器，要求地方及宗教利益服从于国王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他让省级官员服从于国家要员，禁止高等法院谈论国事，并通过对新闻媒体的审查控制舆论。他不仅维护了国家独立，还通过支持艺术事业、创办法兰西学术院、建造如今的巴黎皇家宫殿并收集珍贵的艺术藏品，而提高了法国的威望。简言之，他为路易十四君主专制政体的光辉岁月建立了整体框架体系。只不过，当不满5岁的路易在1643年成为专制君主时，随着另一段具有破坏性的摄政统治的迫近，法国看似又要“重新开始”了。

直到18年后，黎塞留的继任者马扎然枢机主教于1661年去世时，路易十四才得以亲自主政。年轻的路易十四一清二楚地看到了国家治理中的弊政。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路易十三备受冷落的妻子奥地利的安妮出色地完成了摄政的角色。尽管她是一名虔诚的西班牙天主教徒，但安妮还是在黎塞留亲手挑选的继任者马扎然的辅佐下，坚持了黎塞留的独立方针。虽然马扎然贪恋职务之便，但他也有与黎塞留旗鼓相当的外交手腕。正如流言所说，安妮与马扎然之间也许有苟且之事，也许没有，但二人显然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一方面，他们依然在进行代价高昂的三十年战争，被迫以不得人心的赋税来负担军费开支。幸运的是，在1643年位于阿登的罗克鲁瓦战役中，法国取得了关键性胜利。而且，1648年，马扎然签署了有利于法国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reaty of Westphalia*）。

这项和约承认了德国诸邦与荷兰的独立，因而也就结束了神圣罗马帝国的霸主地位。即使与此并无太大关联的法西战争仍在继续，这仍标志着罗马开始衰落。相比之下，法国摆脱了困境，表现良好，不仅获得了阿尔萨斯大部分地区，还组成了梅斯、图勒、凡尔赛三个主教区。但是，法国国内几乎陷入了无政府状态。由于税收负担与巴黎

高等法院的所作所为，马扎然极不得人心。巴黎高等法院是国家法院，而非代议制议会，它领导了一次反叛，结果迫使受惊吓的年轻国王及其母后在1649年1月的一个寒夜中偷偷逃出巴黎。

孔代亲王镇压了这次起义，他是之前带领法国取得罗克鲁瓦战役胜利的英雄。但是，这只是投石党运动的第一阶段而已。投石党（fronde）这个名字事实上来源于儿童游戏，“fronde”一词意为“投石器”。翌年，孔代亲王不但倒戈，领导贵族反叛，甚至还向西班牙寻求支援。他在一系列混乱之后，兵败巴黎城外。于是路易十四与其母后得以在1652年凯旋，回到巴黎，而马扎然则用其一贯的行贿方式，收买了叛军余党。这对于王权来说是段艰难时期，但是，这次混战揭示出的事实是，各个心怀不满的群体并没有采取统一的行动，整个国家迅速陷入了对四处劫掠者的排斥情绪中，最终人们并没有真正反抗日益中央集权的国家。马扎然安排了年轻的法国国王与他的嫡亲表妹、西班牙公主玛丽-泰蕾兹的婚事，并由此结束了与西班牙的战争。此时，法国已准备好迎接路易十四的到来了。

亚森特·里戈肖像画中的路易十四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对于前往凡尔赛参观的21世纪游客而言，他看起来也许有些老派，甚至有点滑稽。他身着精美盛装，戴着假发，穿着白色长筒袜和他自己设计的红色高跟鞋—他也许让人想起积习难改的异装癖爱好者或是年老色衰的应召女郎。然而，路易十四格外钟爱此画，以至于当他因故无法出席理事会会议时，他会让人将此画抬至会议室代表他出席。当然，这只是举国上下绘制的路易的数百幅肖像画中的一幅而已。这些画作通常无一例外地刻画了路易十四骑士般健美的腿，画面中充满了寓意。有人将路易十四比作阿波罗、“好牧人”[8]、信仰守护者、艺术保护者、异端征服者，有人将其比作能治愈淋巴结核的奇迹创造者，还有人将他比作圣路易，或者跨坐在马上，像路易十四本人一样衣着精美的罗马帝国皇帝—更别说向路易致敬的世人了。看上去，从奥古斯都、君士坦丁到克洛维一世或查理曼大帝，几乎没有历史上的英雄能够摆脱与这位太阳王的联系。他居住在金碧辉煌的皇宫中，让人想起了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在《变形记》中提到的太阳宫殿。

接下来要提到的便是细致入微、执行严密的宫廷礼节了。传记作家让-克里斯蒂安·珀蒂菲斯描述了皇家礼仪。国王的“小起床”（petit lever），或曰最早的起床仪式始于早上7点半。此时，御医会在国王的近亲及几位特别尊贵的侍臣面前为国王体检。随后，当国王在便桶上如厕时，一群朝臣会加入进来，聆听国王指示。同时，国王也会让人打理好他的假发与胡须。之后便是“大起床”（grand lever）。此时国王会接见大使、枢机主教及王国其他要人。国王身穿睡衣，吃一顿

清淡的早餐，然后皇太子或是其他家族成员会服侍国王更衣，最后国王开始祈祷。

国王在会议室中就一天的事情发号施令完毕，接着就去小礼拜堂做弥撒了。他与扈从成群结队地穿过凡尔赛宫的大画廊时，那里已挤满了侍臣与迫切想要吸引国王注意的重要访客。如果他们之前已得到允许的话，甚至还能跟国王说上几句话。正午时分，国王在一群有人数限制、站着的侍臣的注视下就餐，不过国王那被称作“先生”（Monsieur）的弟弟[9]，会与国王共进午餐，他会将餐巾呈给国王，然后接受国王的邀请入座。晚餐将是一项纷繁复杂、具有礼仪性的公共事务。皇室成员将在一群选定的受邀宾客的注视下，吃掉金盘子中的食物。在晚宴全过程中，女士是坐着的，而男士则站立。就寝安排就是早晨的翻版，高位者竞相争夺手持双头镀金烛台的殊荣。从早到晚，对于路易十四的妻子而言，即使是通常来说比较私人的环节，也变成了公开的表演。

这场编排严密的“芭蕾舞剧”如实反映了这个宫廷内的礼仪。它融合了秩序、级别与繁复的社会惯例。要想在凡尔赛生存下去，就得学会遵守不计其数的不成文规定—国王路过时要脱帽致敬，只有王子、公主在国王面前才能坐着，以及诸如此类的一些繁文缛节；还得了解在这些规矩以外的神秘的例外情况。而且，这些等级制度上的差异渗透进了社会各阶层的点点滴滴中。在某个层面上，在等级社会中生活是件令人感到安心的事，因为具体的社会等级已被清晰界定，人在不同场合的衣着、言行只需依规行事即可。这个声名远播的权力中心是如此的包罗万象，以至于许多显贵觉得，离开国王就毫无救赎可言。他们无法承担远离社交网、奢华的休闲娱乐、风流艳遇以及错过聘用定金或者肥差所要付出的代价，他们也受不了远离这些事物后的平淡生活。在另一个层面上，人们不得不面对不受重视时感到的心情沮丧，在仆人密切监视下居住在拥挤不堪、臭气熏天环境中的不适，还有嫉妒、恶毒撒泼，以及对自己犯下难以挽回的失礼之罪的担忧。正如伯埃尼伯爵夫人（Comtesse de Boigne）提到的那个富有的年轻军官：他因为无知地参加了错误的舞会而遭到粗暴拒绝，结果受不了别人的嘲讽，最终自杀。又或者，像十年如一日，定期前来乞求获得国王召见，但却从未被选中的那位先生一样。[10]正如帕特里斯·勒孔特在他那部颇有格调的电影《荒谬无稽》（*Ridicule*）中所描绘的那样，凡尔赛就是一场永不停歇的化装舞会。在这里，罪恶能够得到宽恕，但最轻微的失态也会被人口口相传，并招来杀身之祸。因为，在这个巨大的表演剧场中，不仅仅国王是演员，每个人都是。

当然，国王与众人的区别在于，国王也是控制这场化装舞会的司

仪。或者，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国王是导演、明星，还是他自吹自擂的这座剧院的设计师。毫不出人意料的是，凡尔赛宫，这座被另一位作家称为“路易十四的造物”的建筑，引得人们将其与20世纪极权主义国家的个人崇拜相提并论，不过也有人意识到，这种吹捧并不单纯是一种妄自尊大，而“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需求的反应，即使大众并未完全清楚他们到底想要什么”。当然，即使国王是国家的象征，这个反应也过于强烈，因为路易十四事实上已经成了伪宗教崇拜的对象。在路易十四定期接见大使及其他大人物的寝宫中，床被镀金栏杆隔开了，恰如教堂中的圣坛一般。而且，当众臣在国王不在、路过那里时，也要按照规定向空床鞠躬致敬。路易十四自视地位仅次于上帝，实际上将宗教国家化了，他成了自己的教皇。因此，人们在阅读路易十四的《回忆录》（*Mémoires*）—本书比较具有可信度，因为当初并未想过要出版—时，也许会有些吃惊地发现，书中的路易表现出了在那个时代的价值体系范围内的沉着冷静与精明敏锐。路易告诫儿子：“国王的职责基本上就是让常识占上风。”

1661年，当马扎然去世、路易正式掌权时，他已是一个成功的年轻人。打猎、表演、跳舞、音乐、情事，样样精通—而且，他体格也足够强壮，以至于能够经受住当时无知的医疗实践，主要疗法是放血及强烈反对清洗身体。路易少年老成。因为之前他已通过观察，掌握了马扎然的工作要领，经历了王国的混乱无序，听母亲讲过西班牙宫廷隆重的场面，所以他对自己的角色有着清晰的定位。在基本层面上，他确实相信，国王的权力直接来源于上帝。因此，“国王作为专制统治者，自然能够处置所有财产，不论是世俗的还是基督教教会的”，而且被统治者理应绝对服从，因为存在着“将臣民与他们的君主联系起来的神圣羁绊”。但是，由于国王履职要对上帝负责，因此他就必须爱民如子，不分贫富贵贱、公平处事。同时，他不能将自己神圣的职责交付他人，从中脱身，而要直接负起责来—因此，路易变成了自己的首相。他也向儿子强调，身为国王要付出长期的艰辛。在同样信奉高卢主义（gallicanism）[11]、相信国家教会独立于罗马之外的杰出神学家博须埃主教的支持下，路易所做的，是将拥有国王神圣权力的基督教君主政体推向极致。

理所当然地，这种关于王位的正统基督教观点，在路易十四看来，有实践的必要：如果他刚主政就开始修建凡尔赛宫—尽管要用数年时间才能完工—那也是因为凡尔赛距离党派互相倾轧的巴黎有一段安全距离。他在儿时曾逃离巴黎。为避免像投石党运动那样的内乱，他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而且，要想使局面得到控制，他就得与一小群一小群的顾问合作，而这些人将完全依赖于他—所有决定都得经他做出。路易已看出在管控贵族上出现的问题，所以他会让他们待

在王宫里，处于自己的监视之下，把他们的精力引向无伤大雅的纨绔之举或是情场私通。他意识到，人们渴望刺激，既虚伪又看重地位。因此，路易十四建造了一座颇有声望的皇家主题公园，让众人一直忙碌于此。他也观察到，人是可以被收买的，所以就用聘用定金的方法来控制亲王与一些大贵族。如果这些人行为不当，他们就会失去这笔钱。这样的宫廷将会使西班牙与英国的宫廷黯然失色，而且也能满足法国的需要。路易自己心知肚明，如果一个人整天被人阿谀奉承着过活，要想知道谁是真正可以相信的人（如果确实有可以相信的人的话），是件困难的事。但是，这只是更加严重的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已。由于他相信自己是专制君主，同时他也在密切注视着自己构建这一身份，这就给他带来了一场持续不断的身份认同危机。

路易十四轰轰烈烈地开始采取行动了。他罢免并终身监禁了富有、精明的财政大臣尼古拉斯·富凯。所定的罪名有点含糊：以欺诈手段中饱私囊。这立马就让受到惊吓的贵族明白了谁是管事的人，尤其是路易如今还将指控富凯的人擢升为财政大臣，顶替了富凯的空缺。此人正是野心勃勃、精力充沛的科尔伯特（Jean-Baptiste Colbert）。在科尔伯特的帮助下，路易推动了法国的中央集权，并使其成为法兰西国家的标志。路易向各省派出了更多的国家要员，直接任命较大城镇的市长，并清理地方财政。

科尔伯特同样也梦想将法国打造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辉煌的国度，让它同时是新罗马与新雅典。为实现这一目标，他鼓励工业与贸易的发展，创造国有工厂，重组国家财政与宫廷体系，逐渐壮大海军，还成立了东、西印度公司，并支持艺术事业。作为一名“重商主义者”，科尔伯特认为，国家财富依赖于出口商品获得的黄金，以及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所积累的黄金。显然，这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缺陷是必将招致其他国家的报复。当时英国与荷兰正在通过自由贸易扩张，阿姆斯特丹拥有欧洲最大的银行，而法国的方式也许过于保守内向了。也就是在此时，路易十四的外交政策开始与国内需求发生冲突。

1667年，路易十四进攻西属尼德兰，即如今的比利时一带。因为，那里相当于他的妻子玛丽·特蕾莎的继承物，而西班牙一直未支付玛丽的嫁妆。尽管当时，路易已占领了包括里尔在内的一些筑有防御工事的城镇，但当他的举动引发荷兰、英国与瑞典组建起反抗联盟时，他撤军了。5年后路易进攻荷兰，却面对着欧洲联盟的抵抗。战事一拖就是数年，但他最终通过1678年签署的《奈梅亨条约》获胜了。通过该条约，路易取得了勃艮第的弗朗什-孔泰地区，从而巩固了边防。此事提升了他的威望，以至于路易如今认为自己是欧洲乃至全

世界的最高统治者。当他在1681年漫不经心地兼并了斯特拉斯堡时，路易还认为自己无人能及。但是，即使路易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意识到了自己曾穷兵黩武，他也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伟大功绩背后付出的代价。事实上，他的战功毁掉了科尔伯特创造的许多成就，后者在1683年去世。法国依然幅员辽阔、财力雄厚，有着一支强大的陆军与海军，但如今法国也面临着财政赤字，尽管赋税加重，仍要从此靠贷款度日。大多数国有工厂处于颓势，加拿大殖民者遭忽视，东、西印度公司基本上被解散。在一个不断扩展的世界中，法国未能审时度势。不过在当时，路易的声望如日中天。在群星云集的王宫中，一众作家与艺术家对他歌功颂德。

然而，当路易十四新近的一个情妇被爆出与巫术及谋杀有关的丑闻，路易随即在宫中实行了更加严格的行为规范时，当1683年王后去世、路易秘密与虔诚的曼特农夫人结婚时，作家与思想家们开始转向巴黎。他对新教徒态度严厉，不仅因为专制政体要求顺从，还由于路易在对付西班牙时，需要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支持。1685年，他废除了“南特敕令”，由此迫使20万诸如商人与工匠一类具有经济贡献的人开始了流亡生涯，国家也因此变得困顿。此举使新教国家对法国产生敌意。1689年，奥兰治的威廉刚一即位，就将英格兰—它已经是法国公海上的对手—变成了法国强大的敌人。随之而来的是另一场对抗哈布斯堡王朝、荷兰及英国的漫长战争，其中还包括法国入侵英国的企图破灭，以及战争在殖民地的扩散。这场战争持续到1697年才结束。尽管《利斯维克和约》对法国不利，但至少在1700年卡洛斯二世缓慢死亡，引发一团乱麻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前，它提供了一个间歇。也就是在这次间歇期间，1701年，里戈绘制了那幅威严的国王肖像画。

长期存在的“法国例外”论笃信特别的国家命运以及法国的“庄严”使命。这一理论的历史根源，是伟大世纪（grand siècle）时，皇权社会中两个被奉为神圣的惊人观念的结合：一个观念是，法国不仅体现了一国的价值观，而且代表了普世的价值观；另一个观念是，在践行这些价值观时，国家处于中心地位，且包罗万象。这个社会具有自我意识地将自己与古代社会一较高下，让自己在尊贵方面凌驾于罗马之上，并立志建立一个规模宏大、和谐有序的先进文明。这一点见于它的建筑之中。诸如凡尔赛宫与子爵谷城堡一类建筑物，在宏伟方面为欧洲树立了新标准。当时，人们认为，理想的建筑要使建筑物、环境及装饰完美地融合，同时体现出对称性，而花园则让桀骜不驯的自然服从于几何秩序，强调人类理性的控制。此外，在文化领域也能看到法国对普遍秩序的追求。

第一步是使语言本身具有秩序感。17世纪初，诗人马勒布与语法学家沃日拉已致力于基于宫廷用语，改善法语的用法。黎塞留清醒地意识到，提纯后的语言能使人团结一心，于是就将这一过程推向深入。1635年，黎塞留创办了法兰西学术院。该机构着手编纂一本权威词典。稳定语言的工作与规范文学作品构成、确立一种新艺术理论的尝试齐头并进。诚然，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艺术家与作家得到了丰厚的经济资助，以至于他们美化君主制并为王宫增光添彩。彼时还不存在版权一说，作家们严重依赖赞助，不管是以直接补贴的形式，还是以获得任命的形式（例如莫里哀与拉辛）在宫廷中从事一些要求不高的工作。然而，有趣的是，这种文化集中与专制主义居然没有扼杀个体差异，它带来了法国古典主义的盛世。

这方面的突出例证是笛卡儿与帕斯卡尔之间的对比。奇怪的是，笛卡儿的头颅最终被陈放在了巴黎人类博物馆的玻璃展柜中。他无疑是西方哲学史上一个响当当的人物。笛卡儿在很大程度上推翻了传统的经院哲学—这项有风险的事业导致他移居到思想更加自由的阿姆斯特丹—而且，他通过提出认知的方法及对象问题，重新聚焦最基本的原理。即使时至今日，他的结论并不被广泛接受，但这种新认识论方法还是提出了人体与思维关系的基本问题，并衍生出了潜在的能促进自然科学发展的哲学框架。法国人依然认为自己是“笛卡儿的信徒”，认为普遍而言，自己比实证主义的英国人在思维上更加严格缜密，更具有理论基础。

人们不禁会说，与乐观主义、理性主义的笛卡儿不同，帕斯卡尔属于那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人，尽管他的观点可能因罹患痛苦的精神症而受到了影响。帕斯卡尔是一位相当重要的数学家与物理学家，他推动了概率论的发展，发明了数字计算器、液压机与注射器；他也精通法国散文。但是，他在一次几乎致命的事故后改变了信仰，成了苦行的冉森派信徒，信奉宿命论。在未写完的《思想录》中，帕斯卡尔提出了一种观点，即人迷失于不可知宇宙“可怕的无穷空间”之中，无法获得真理、正义与幸福，并完全依赖于一个不可知上帝的恩典。但是，通过他那著名的，但在某些人看来不够高尚的“赌注”，他声称信仰上帝是理性的双向赌注，原因在于赌赢能收获很多，即便赌输也没什么好失去的。

在这个时期的伟大古典主义戏剧家中，喜剧家莫里哀的作品流传最广，这点意义重大。莫里哀不得不调和某种矛盾：尽管他推崇行为的自然天成，他仍然不得不使自己创作的人物符合皇权社会的正统规范。不过，当莫里哀取笑吝啬鬼、疑病症患者与偏执狂时，他是在描绘人所共知、随处可见的性格怪癖。关于高乃依与让·拉辛的悲剧作

品，有人说它们不易被翻译成英语，这不仅是由亚历山大诗体造成的。高乃依笔下的英雄对荣誉的追求，意味着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自己及家族荣誉的义务。这看起来也许有些做作。拉辛精妙的文学作品更贴近生活，但是没有什么情节可言，而且，这种既是诗歌又是戏剧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读者对语言的敏感度。然而，这类悲剧高度的风格化，对人们所认为的最崇高的文学形式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旨在表达人性中永恒且普遍的东西，而不是刻画处于不同历史环境下的有差异的人。正是法国君主制文化想要将自我构建成永恒的、根本性的意愿，导致了这种局面的产生—鉴于莎士比亚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在戏剧中呈现英国的历史人物了，这种局面看来也许有些奇妙—借此，法国人在这个时期创作的关于远古世纪的戏剧中刻画了自我形象。

当然，这一切都笼罩在某种巨大的幻象之中。路易大帝也许会对高乃依的戏剧《西拿》里皇帝奥古斯都的话产生共鸣—“我是自我的主宰者，一如我是宇宙的主人一般。”但是，奥古斯都生活在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中。尽管这一时期的法国学者通晓希腊、拉丁文本，但他们对后世的人类学家与历史学家才能揭示的具体的希腊、罗马文化知之甚少。他们认为自己与希腊人、罗马人无异的假设，富有讽刺性地建立在基督教中上帝赋予人不变人性的观点之上。拉辛悲剧中的宿命感与基督教原罪说相连，而不是与多神论社会中的神祇有关，而高乃依的“荣誉”明显来自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中的贵族社会。所有这一切反映出人们对远古世界无知的挪用，这赋予了路易十四的君主专制政体以虚假的永恒感，正如拉辛的伟大悲剧《费德尔》中所预示的那样。在这出悲剧中，文明本身在面对具有破坏力的人类激情时，看似只是一片被可怖的黑森林环绕的空地而已。

里戈肖像画中君临天下的路易十四对幻觉与现实、本尊与自身的高贵投影之间的差距也略知一二。他的上牙都掉了，英勇的站姿掩饰了他的痛风，红色高跟鞋掩盖了矮小的身材，而且他还身陷两场具有破坏性的战争之间。他无疑也感觉到了拉辛所谓的悲剧中那种“富丽堂皇的悲怆”。

第五章

王朝衰落的主因是启蒙运动吗

“无事。等级分离。”

18世纪的法国是个矛盾体。一方面，凭借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与高雅的文学沙龙，这个富有的强国成了欧洲羡慕的对象，以至于法语成了文化与外交领域的国际通用语。另一方面，法国有着深层次的结构及财政问题。这些问题与社会及宗教矛盾相结合，将使法国走向一场令人震惊的革命，这场革命不仅会给法国本身，也会给欧洲及其他地区带来巨大影响。

在路易十四于1715年去世前，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里，他的统治在许多方面都黯然失色。首先，欧洲现代国家在初期仍然被困在一张王朝皇室关系的大网中，当时始于1702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打响，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1713年《乌特勒支和约》的签订。尽管法国宣称路易十四之孙[12]具有西班牙王位继承权，主要是因为担心西班牙也许会被奥地利的王位觊觎者抢去，从而复兴神圣罗马帝国，但法国这么做也带有建立两个波旁君主国之集合体的动机。这一举动意味着对抗由大多数德国城邦与荷兰及英国组成的联盟，这个联盟不会乐于看到法国与西班牙海外领地结合，也不愿在公海上参与更多竞争。因此，法国不得不四处部署了25万兵力，处于战备状态以便四面交战。结果，法国在布伦海姆与拉米伊惨败于英国马尔伯勒公爵之手，并在1708年试图入侵苏格兰时再度失利。最终，路易十四脱险了，原因是与法国角逐西班牙王位的竞争者查理大公做了皇帝。而且，鉴于双方都不愿回到查理五世时的德意志-西班牙帝国状态，争端遂渐渐平息了。但是，法国失去了加拿大的新斯科舍省与纽芬兰省，这使英国迎来帝国主义势力畅通无阻崛起的伟大时代。

漫长的对外战争从不可能受国人欢迎，以贷款作为补充，并发行迅速贬值的政府债券来缓解财政负担也不会招人待见。当塞文山脉地区受挫的新教徒在1702年发动一场反对天主教的游击战时，法国东南部的派系对抗也拉开了帷幕。3年后，法国军队镇压了这次动乱。但即使这是法国宗教战争中的最后一次小冲突，它也不是事件的终结。部分原因在于，（正如曼特农夫人在她那引人入胜的回忆录中所说的）年老体衰的路易十四为自己荒淫无道的过去赎罪，而变得日益虔

诚。他试图把其他异端的基督徒（即冉森派运动的基要主义天主教徒）也拉进来。路易把他们在波尔—罗亚尔的修道院夷为平地，甚至还违反了自己的高卢主义原则—这一原则是法国教会的重要部分—请教皇颁布训谕《唯一天主子》（*Unigenitus*），谴责冉森派学说。1709年“寒冬”的大饥荒无异于雪上加霜。让本已矛盾重重的法国局势变得更加动荡的，还有一周之内路易的3位继承人均死于麻疹带给世人的震动。硕果仅存的路易曾孙在5岁时登基为路易十五。路易十四担心自己思想自由的侄子奥尔良公爵会影响还是个孩子的路易十五，所以在遗嘱中特别注明由他最宠爱的私生子曼恩公爵担任摄政。但是，路易十四去世后，权力也随他而去。之后不到两日，奥尔良公爵即命巴黎高等法院宣布路易十四的遗嘱无效。

法国在奥尔良公爵摄政时期感到如释重负，因为人们可以休养生息了。如今，王位上坐着一个有着金色头发的小男孩，但大权实则握在一个聪明且思想开明的浪荡子手中。在这个突然放任自流、梦想一夜暴富的社会里，时尚、艺术与宗教领域新出现了一种自由感，画家华托的作品梦幻般地展现了这段奇妙的插曲。但摄政王对巴黎高等法院的管理过于放松了，后者作为司法机关，负责正式登记皇家法令。如果它认为某项法令不符合法律规定或传统习俗，则有权提出“抗议”，将法令驳回，提请国王复审，不过国王可以通过命令或只是莅临巴黎高等法院的方式，迫使法令得以通过。由于巴黎高等法院成员通过买官获得了世袭职位，所以这实际上是一支急于施展政治影响力、维护自身特权的贵族阶级队伍。路易十四之前对巴黎高等法院采取忽视态度，但奥尔良公爵为正式获得路易十四在遗嘱中未注明的全权摄政权，重新正式认可了巴黎高等法院提出“抗议”的权利—这为反对王权提供了一个平台。同样地，鉴于路易特意与来自中产阶级的顾问密切合作，例如科尔伯特，摄政王将他们换下，取而代之的是由王公与老派贵族组成的八个委员会。彼时，当商业及职业中产阶级正在变得日益重要之际，王公贵族却重新掌权。

路易十四的南征北战给法国留下了巨额国债，摄政王为解决这个问题，请来了苏格兰经济理论学家、冒险家约翰·劳。劳开始着手建立由政府支持的中央银行，就像那些已经在伦敦与阿姆斯特丹成功运作的中央银行那般。中央银行不仅能使法国摆脱使用金属货币的沉重，还能通过增加货币供给，刺激贸易发展。劳成立了一家与西印度群岛及北美洲进行垄断贸易的贸易公司后，中央银行繁荣发展起来。几年内，劳不仅控制了利润可观的奴隶与烟草贸易，还负责印刷纸币、征收赋税—事实上，这就垄断了法国的外贸与财政。

这家贸易公司对法国这个奉行传统主义的国家而言是项大胆冒

险，因为法国人依然认为财富在于拥有土地及黄金。但是，它过于成功了：在经典的市场泡沫作用下，公司股价飙升。人们开始渐渐怀疑能否获得足够回报。贵族们又突然要求贸易公司以黄金形式归还他们当初的投资。这种暗中的破坏奏效了，由此引发了典型的市场崩溃，劳不得不逃出法国。贵族当然偏爱旧体制。因为，在旧体制下，他们可以利用自身职务之便，从涉及赋税征收、军火供应与政府借贷的硬通货交易中分一杯羹。所以，这一切的结局实属不幸，这不仅因为国家不得不承担银行的负债，并通过征收更多税赋的方式偿还，还因为人们对纸币的敌意如此强烈，以至于法国直到19世纪才建立起现代银行系统。

路易十五（1715—1774年在位）在摄政王1723年亡故时开始掌权，实行对法国的另一段长期统治。鉴于他没什么声望，客观而言，这个政治体制在冒很大的险：它选定了一个2岁时父母双亡的孩子，并在他5岁时把整个君主专制政体的全副甲胄都压在这孩子身上，而完全不知道他是否具有治国理政的天赋。

路易十五举止优雅而有教养，但是童年的创伤使他感情脆弱、依赖长者—他的女家庭教师、摄政王，还有年长且正直的德·弗勒里红衣主教。后者出任路易十五的第一大臣达17年之久。毫无疑问，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路易对长者的依赖，以及他的性情使然。路易十五仅凭一时高兴，履行着国王的职责，不过他有时做起事来精力充沛。在某种程度上，他用表面的冷漠来掩盖自己的羞怯。他还缺乏自信，不轻易相信大臣们，时不时地陷入忧郁之中。为减轻压力或赶走无聊，路易十五经常打猎。尽管他喜爱身为王后且比他年长的波兰公主玛丽·莱什琴斯卡，但他仍情妇成群，让人不满的是，她们还经常出身于平民或妓女。路易十五在凡尔赛宫花园也有一处繁忙的爱巢。尽管最初他受人爱戴，但这些倾向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他后期不得人心，尤其是他在1744年御驾亲征时带了一名情妇上战场之后。当路易十五因高烧而生命垂危时，他遭遇了一场非军事性伏击。神职人员拒绝为他做临终圣事，除非他在见证者面前忏悔自己过去荒淫无道的生活方式。之后他痊愈了，结果却发现自己那低声下气的悔改居然在法国所有的教堂被人高声宣读。

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在路易十五统治期间，法国经济明显繁荣起来。其中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人口上升到了2600万左右。诚然，瘟疫在1720年袭击马赛后没有再次出现，而且后来爆发的战争都发生在法国国外，这都有助于经济复苏，但主要原因还是法国大多数地区的经济发展。法国的煤矿开采、金属加工与日益机械化的纺织产业均出现显著增长。与此同时，由于诸如马提尼克与瓜德罗普岛这样的殖民

地在奴隶与糖的交易中为法国带来了丰厚利润，法国的对外贸易额增加了两倍。农村生活水平也有提高，但地主、农业大户与神职人员明显比普通农民获利更多。

此外，路易十五的统治对法国的经济生活做出了影响深远且持久的贡献。通过征用劳工的工作，法国开始启用规模相当庞大的道路网。而且，法国国立路桥学校也成立了，这是法国第一所高等专科学校，这类学校将成为法国教育的驱动力。作为推动农业发展运动的一个环节，法国成立了两所兽医学院。巴黎军校也成立了。法国规定，自然资源为国王所有。而在其他方面，王权遇到了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政治反抗。沙龙与咖啡馆里的自由思想家迄今为止并未造成严重威胁。审查警察会定期烧毁持不同政见的出版物，而违法作家则会被投进巴士底狱，刑期为1到2个月。伏尔泰曾在摄政期被关押了11个月，如今，他写作的关于英格兰的反思—《哲学通信》，被没收了。主要的反抗不是来自崛起的中产阶级，而是来自以巴黎高等法院形式出现的世袭贵族阶层。后者渐渐将成员限制为祖辈四位皆为贵族者，以此加倍确保将平民排除在外。巴黎高等法院利用摄政王赋予的政治空间，抓住了教皇训谕《唯一天主子》所引发的宗教矛盾，然后以法国教会的独立，以高卢主义原则之名，为被巴黎大主教逐出教门的冉森教派牧师辩护。国王迫使巴黎高等法院认可教皇训谕，但这只是一连串小冲突中的第一个而已。国王本人优柔寡断、难以捉摸的行为并不能缓和这些冲突。1743年，顾问弗勒里去世后，路易十五决定由自己充当第一大臣的角色。

事实上，王宫如此混乱，以至于主要的稳定因素成了以路易十五情妇身份粉墨登场的蓬皮杜夫人。她出身平民，还有个不太好听的名字—普瓦松小姐（Mademoiselle Poisson），或曰鱼小姐。这不可避免地引来人们的嘲讽，或曰“炖鱼”（poissonades）。然而，她时髦、漂亮、有天赋。她成了路易“完美无瑕的奇迹”，不仅是他在政治上的合伙人，还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他的享乐大臣。蓬皮杜夫人想出各种娱乐活动，让这个羞怯又喜怒无常的君主开心。她是伟大的艺术赞助人，其参与的建筑项目包括巴黎军校、凡尔赛宫小特里亚农宫，以及路易十五广场—如今的协和广场。她尤其钟爱装饰艺术，资助兴办了塞夫勒皇家制瓷厂。而且，与路易不同，蓬皮杜夫人钦佩被称为“哲学家”的新作家。即使在她由于个人健康原因，不再做路易情妇之后，也娴熟地应对着自己面临的微妙处境，但这是个艰难的世界。当蓬皮杜夫人在42岁香消玉殒时，相对于伏尔泰对她的悼念“灵魂有正气，心中有正义”，国王则给出了较为冷漠的评论：“她葬礼那天的天气不好。”她理所当然地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大蓬头样式这种装饰艺

术中的洛可可风格。而且，毫无疑问，她依然活在许多电影与传记中。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发动战争以及寻找支付战争开销资金的老问题。因为对一个像法国这样的大国而言，欧洲各君主国复杂的王朝关系使其很难置身于频繁的王位继承冲突之外。 所以，当波兰国王在1733年去世时，路易十五支持岳父斯坦尼斯瓦夫一世对王位的主张，但被支持另一王位觊觎者的俄国打败了。战斗随后发展成法国试图将俄国的盟友奥地利赶出意大利。后来，斯坦尼斯瓦夫获得了洛林公国，此地最终将被归还给法国。然而，这次事件极大地加重了法国的国债负担。

下一次类似的战争是极其复杂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西班牙站在普鲁士一方，反对英国支持的奥地利，同时，西班牙也把盟友法国拖下了水。重要的是，这演变成了一场法国与英国之间的海战与殖民战。在此期间，法国于1744年派出舰队进攻英格兰，以支持即将发生的詹姆斯党叛乱。但是，在看到更加强大的英军后，法军就临阵脱逃了。法国海军疏于训练、国库破产，确实不是英军对手，而且他们在大西洋上频繁的小冲突中常常失利。在这些战斗中，双方都试图阻止对方的殖民贸易。说到大西洋，英国—也占领了位于加拿大路易斯堡的堡垒—已经掌握了制海权。

但是，法国不但占领了英国在印度的主要商栈马德拉斯（如今的金奈），还在丰特努瓦（如今的比利时）的对英作战中取得了辉煌胜利。一则著名的趣闻就发生在这次战役中。故事是这样的：话说两军抵达战场，双方相距不足30米。两边的军官互相脱帽致意。英国军官具有骑士风度地邀请法国军官先开火。“不，英国的先生们，”英勇的法国军官骄傲地回道，“你们先开枪。”—英国军官优雅地接受了这个邀请，于是就开始摧毁法军前线。这次胜利之后，路易突然变得很受欢迎，这种情况至少持续到了1748年他签署《亚琛条约》之前。在该条约中，法国归还了所有的战争所得。它完全清除了这场战争的痕迹，好像它不曾发生一样。这使得法国人愤怒地质问道：这场凶残又不失礼貌、过分昂贵的战争到底是为了什么？此外，他们也开始质疑关于这些战争的税收体制的公正性。1749年，路易十五试图让神职人员捐款，结果招致神职人员与贵族阶级的猛烈抨击，双方均被这项提议激怒了，他们觉得自己身为特权阶级，居然被要求像平民一样交税，这是不可理喻的事。于是，国王妥协了。

所有这些均强化了巴黎高等法院的力量。他们拒绝登记新税。而且，由于巴黎大主教不允许给垂死之人做临终圣事，除非牧师有文书证明这个人遵循了教皇训谕《唯一天主子》，所以巴黎高等法院顺势

挑起了人们对教会与国王的反对。在这种氛围下，一个精神失常的名叫达米安的人攻击并伤害了国王。正如哲学家、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所描述的那样，刺客所受的惩罚与丰特努瓦战役中骑士般的礼节形成了具有讽刺意味的对比，因为刺客受尽了折磨。达米安的肉被人从骨头上撕裂，伤口上浇上熔铅、沸腾的油与燃烧的树脂组成的混合液体，最后被六马分尸。在此过程中，有人严肃地诘问他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如果这还不足以使路易十五走下坡路的话，一旦法国被卷入七年战争（公元1756—1763年）的泥淖中，更糟的事还在后面。这次冲突殃及四个大陆，因此被称为第一次世界级大战。在欧洲方面，战争主要围绕奥地利与普鲁士对德国控制权的争夺而展开。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它主要体现了法国与英国为建立帝国霸业而展开的斗争，而英法帝业之争则是人们常说的第二次百年战争的一部分。法国在大陆战中并无斩获，还在与英国的海战中损失惨重。这便是英国首相老威廉·皮特义无反顾地驱动战争所带来的结果。法国受限于维护自身欧洲霸主地位的旧思想，再加上缺钱的窘迫，因此忽视了法国殖民地的发展，只把它们当成快速赢利的源泉。如今到了该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即使在战争爆发前，在海上没什么绅士风度可言的英国人也时常掠夺性地猛扑向法国船只，阻止它们为法国殖民地提供补给。英国以挫败法国进一步入侵的企图为部分动机，在基伯龙湾海战中摧毁了法国主要分舰队。在印度，当英国军事家罗伯特·克莱武取得普拉西战役胜利，占领印度本地治里市（Pondicherry）之后，法国拥有的据地只剩下1763年签署的《巴黎条约》中没有防御工事的商栈了。在北美洲，法国被英国以同样的方式彻底消灭，还失去了加拿大，最终把美洲整个东海岸地区都留给了英国。法国还失去了几个西印度群岛，不过被允许保留下了瓜德罗普岛与马提尼克，法国也失去了非洲的塞内加尔。起初，这些重大损失并未引起法国人多大的关注—他们更关心开销—甚至在喜剧寓言《老实人》中，连伏尔泰也不屑地称加拿大只是“几亩雪地而已”。但是，正如法国人后来突然醒悟到的那样，他们被英国这个突然占据支配地位的世界强国甩在了后面。将英国视为法国之“宿敌”的观念变强了。而且，恐英症（Anglophobia）也开始迅速滋生，正如它的对应物恐法症（Francophobia）一样。

这种思想对于复杂的学术界并未造成很大影响，因为在那里有着与恐英症和恐法症完全相反的倾向—像大卫·休谟与爱德华·吉本这样的重要人物，可以在法国沙龙中受人顶礼膜拜，而孟德斯鸠与伏尔泰也时常访问英国。但是，到了百年战争时期，四处掠夺的英国人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种族蔑称—“天杀的”（godons），这是英文“该死

的”（goddam）一词的法语变体。根据博马舍1784年创作的喜剧《费加罗的婚礼》，英国人依然不时地使用这种咒骂语。英国人甚至被称为“像魔鬼一样长着尾巴”（godons coués）。如今两国之间种种明显的区别也滋生了这种刻板印象。虽然法国是君主专制政体，但英国人在杀死自己的国王[13]后开始实行议会体制。法国信奉天主教，而英国尊崇新教。此外，作为一个岛国，英国长期以来一直比法国更支持自由贸易，法国则延续了由科尔伯特制定的贸易保护主义传统。

由于这些差异的存在，以及双方最近都准备了入侵对方的计划，所以人们感到恐惧万分，以至于把对方变成了讨厌鬼的形象，并开始将自己定义成对方的反面。因此，“天杀的”人被看作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一群人。他们的公共生活缺乏明显的社会等级制度，粗俗不堪，满是醉酒的胡闹；他们对食物与时尚一无所知，英国女人长着马脸又男性化，而且他们居然把粗鄙的莎士比亚捧成作家。反过来，外号“青蛙”的法国人装腔作势、沾沾自喜，让人感到滑稽可笑。他们的沙龙礼节有着千篇一律的造作。法国男人是手持小洋伞、娘娘腔的花花公子，法国女人都打扮得花枝招展、恬不知耻。哪个有英国血统的人能耐着性子看完像拉辛作品那样没有活力与情节，还虚假做作的戏剧呢？这只是一系列18世纪版本的偏见而已，并且这些偏见至今依然存在。

如今，路易十五担心起了日益强大的国内反抗势力。因为巴黎高等法院如今强烈希望维护法国教会的独立性，因此要关闭耶稣会，并将耶稣会会士逐出法国。国王与教皇均被迫接受这项决定。路易最初被迫采取行动，他来到巴黎高等法院面前，维护自己作为皇帝的特权。1770年，路易带领由三位能干的大臣组成的工作组，开始采取坚决行动，瓦解巴黎高等法院。这是有风险的，而且他让妓女出身的杜巴丽夫人做自己的情妇，并授予她伯爵夫人封号，此举几乎不可能提高皇室形象。然而，路易的司法大臣莫普大胆废除了巴黎高等法院的世袭权力及种种好处，并起用由国王政府直接任命的法官，重组巴黎高等法院，使人们可以免费获得公正。而财政大臣泰雷则开始通过持续的努力解决巨量国债的问题。当路易十五突然因天花流行病殒命，整个改革计划崩溃之时，泰雷正要开始征收财产税。正如康庞夫人令人动容地描述的那样，路易十五的突然离世让其受到惊吓的20岁孙子，即如今的路易十六，还有路易十六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哭着跪了下来，情绪激动地祈祷说：“噢，上帝，引导我们，保护我们！我们太年轻，还不知道怎么统治国家。”

与此同时，处于启蒙运动时期的法国如今形成了全新的知识氛围。这都有赖于文盲率的降低，书籍、报纸出版的增长，当然还有在

德芳侯爵夫人与热情的朱莉·德·莱斯皮纳斯小姐这些人举办的著名文学沙龙上的思想交流与碰撞。 严肃的思想讨论也从过时的大学正统，向许多新兴的学会或者基于法兰西学术院建立的省级社团转移。卢梭正是为参加第戎学院的征文比赛，而创作了他那篇著名的论人类不平等起源的散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富人也开始兴建图书馆，书商则按日计费出租图书。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下，知识阶层崛起了。通常出身卑微的作家现在不再依靠贵族保护者，可以实实在在地靠自己的作品生活了—狄德罗的父亲是个制刀师傅，卢梭与博马舍都是钟表匠的儿子。如今，他们都是有教养的新群体的发言人。这个群体被排除在政治代表之外，最终他们给君主制带来的挑战比享有特权的巴黎高等法院带来的危机还要大。

知识阶层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内部政治矛盾所引发的。例如，1762年，法国图卢兹市信奉新教的商人让·卡拉斯（Jean Calas）被处决，这使得宗教不容忍问题被夸大了。据称，他被错误指控杀死两个亲生儿子，因为他们想要皈依天主教。尽管他宣称自己是清白的，但荒唐的审判很快将他定罪，并送上了行刑台。出于抗议，伏尔泰开启了关于宽容的著名讨论，并为死去的卡拉斯恢复了名誉。另一个刺激在于，人们日益清醒地认识到外部世界的存在，以及非欧洲民族颇富挑战性的不同习俗—孟德斯鸠在他的《波斯人信札》（1721年）中富有讽刺意味地刻画了法国社会，展示出了文化相对主义。同样地，布甘维尔的《环球纪行》（1771年）提出了“高贵的野蛮人”的观点。

但是，导致思想活跃的主因无疑是新科学观念，而新科学观念又受到了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的经验主义与艾萨克·牛顿的归纳法、力学思想的影响。这些思想为人们认识世界提供了新概念模型。28卷本的皇皇巨著《百科全书》（1751—1772年）旨在成为“所有人类知识的集合”。狄德罗和与他志同道合的哲学家们致力于把所有知识搜集在一起，形成一个连贯的结构。事实上，它是将笛卡儿的理性主义与英国的经济主义相融合，共同服务于世界与社会的新观念。

当时的法国文化并非只有大量的哲学思考而已，还有各种流派的绘画：从布雪与弗拉戈纳尔小心翼翼地刺激感官的场景，到雅克·路易·大卫的新古典主义历史绘画。在戏剧方面，马里沃细腻的喜剧探讨了爱情内在的困惑；还有博马舍的讽刺喜剧，他笔下的主人公费加罗就等级制度的虚伪给自己的贵族主子上了一课，让人印象深刻。小说种类相当丰富，从卢梭的《朱丽：或者新爱洛伊丝》那样的情感小说到享乐小说，后者往往带有拉克洛《危险的关系》中具有女性主义思想的悲剧女主人公。

法国这个时期的“哲学家”并不仅仅局限于狭义的哲学家一词。伏尔泰创作了历史著作、悲剧、喜剧寓言、散文与诗歌。多才多艺的狄德罗让自己富有创意的思想纵情驰骋，朝各个方向发展，从哲学、戏剧、小说到艺术评论。苦恼的天才卢梭创作了社会与政治评论、小说，以及关于戏剧与教育的作品，从社会预言到他异常坦白的《忏悔录》。当然，还有些与自己的信仰不保持一致的哲学家。这些思想家确实常令教会感到愤怒，不论是孟德斯鸠将宗教视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观点，丰特奈尔创作的比较宗教学作品，自然主义者布冯关于地质历史的作品，或是伏尔泰与拉美特利对教会直接的攻击。但是，如果说狄德罗与霍尔巴赫男爵是唯物主义者的话，那伏尔泰就是信仰非个人的上帝的自然神论者，而卢梭则是由天主教徒改宗的新教徒，最后他又宣布放弃天启教，支持自然宗教。事实上，哲学家们对不同问题的看法大相径庭。

由于事后之见的错觉，人们不可避免地倾向于将这些思想家看作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直接原因。但这种观点忽视了整个社会与政治背景，更不要说这些思想家观点的多样性，以及他们作品狭窄的受众面了。然而，他们还是有影响力的。而且，因为他们都是在就自己所处的社会做出反应，所以对某些基本观点有着广泛共识。第一项共识就是，人们需要重新从基本原则出发审视所有事情。因此，他们相信人的理性而非信仰—尽管抛弃了传统信仰的伏尔泰与狄德罗从未神化过理性—而且，他们想借助理性改良社会。这自然而然带来了关于进步的观点。随着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的出版，进步观在18世纪末变得十分明显。而且，它相应地引领了与编年史相对立的批判历史的起源，带来了文化相对论及用比较的方法看待不同社会的观点—尽管当时还没有出现有组织的反对奴隶贸易的情况。

这种相对主义的方法只会导致人们对君权神授的君主专制政体的拒斥。但是，正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表达的那样，社会的普遍偏好是实行权力制衡，例如基于英国模式的君主立宪制。不可避免地，人们抵触的不仅是教会的政治角色，还有原罪观。人们相信人之初，本性天真无邪，同时具有同等的自由权利。因此，社会上出现了从在来世寻求救赎向在今生寻找幸福的转变—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年轻的激进分子圣茹斯特以惊人的简洁表达了这种观点，他说道：“幸福就是欧洲的新观念。”同时，人们的战争观也发生了变化，从之前认为世上的战争与残忍源于人固有的罪恶，到相信它们来自组织混乱的社会。

问题是，处在这个过渡性历史时期的哲学家，其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还停留在预备阶段，尽管他们大体上都认可理性重组将最终带来良

性社会的观点，但他们不能清晰勾画出这样一个社会来。作为这个群体中一个难以预测的个体，卢梭的模棱两可与自相矛盾代表了这种混乱性。他在关于社会契约的讨论，即《社会契约论》一书中，用一句著名宣言开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然而，卢梭最终用各种枷锁囚禁了自己，因为他将自由与公民道德的观点发挥到了极致，以致提出了含混不清的公共意志理论。这种观点认为，必要时公民需要被迫接受后来罗伯斯庇尔与诸如黑格尔一类的思想家所接受的极权主义观点。而且，正如伯特兰·罗素令人难忘地描述的那样，这无异于“服从警察的权利”。让问题更加复杂的是，卢梭有相当不同寻常的一面。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与以往论调相反，卢梭通过忏悔作品中对理智与个体独特性的强调，不仅预料到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还引领了随后出现的浪漫主义思潮。

事实上，鉴于当时的知识氛围，王室需要通过远见与机敏开辟出一条道路来渡过难关。因此，看到路易十六的统治如此紧密地追随着之前60年的模式，以至于展示出日渐滑入失控深渊的体制性缺陷，几乎是件痛苦的事。

路易十六（1774—1792年在位）是个好心好意但有局限性的年轻人。他的兴趣是打猎、制表与地理，对管理国家却一窍不通。恐怕这是因为他极少走出凡尔赛宫，对自己统治的国家知之甚少。路易十六胆小怕事、眼睛近视、身材丰腴，还经常手足无措。而且，直到结婚5年后做了个小手术才圆房的事也很难让他在两个野心勃勃的弟弟，还有他那被宠坏、忘乎所以地轻浮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面前抬得起头来。玛丽的铺张浪费让她很不受欢迎。路易十六意识到了进行一些改革的必要性，但他过于优柔寡断，又容易受到影响而不能坚持到底。

他一开始就犯下了无法挽回的错误—罢免了司法大臣莫普与财政大臣泰雷，结果致使关于巴黎高等法院的改革终止。尽管在莫尔帕伯爵的指导下，路易任命了一些有才干的大臣，但在遇到可预见的来自贵族与神职人员的反抗时，他既无自信也缺乏个人威严，无法力挺这些大臣。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大臣搞垮了路易十六的政权。起先，1775年爆发的美国独立革命提高了路易十六的受欢迎度，因为革命激发了拉法耶特侯爵与其他志愿者的理想主义热情，并为法国提供了向英国雪耻的机会。法国在船只与军队方面向殖民地提供了关键性援助，并且收复了包括塞内加尔在内的几处失地，因而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但是，第一个不利因素便是《独立宣言》的发表，该宣言提出人人生而平等，“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在表现手法上，《独立宣言》明显对君

主专制政体提出了挑战。此外，更直接的不利因素是，战争极大地加重了本已失控的国债。

第一个试图改革的财政大臣是直率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杜尔哥。他在实行谷物自由贸易、开放被关闭的行会使其实行自由竞争之后，试图征收土地税。这将会打击到贵族与神职人员中的地主阶级。此举激怒了巴黎高等法院与王公权贵，然后路易十六便把杜尔哥免职了——当时，杜尔哥直截了当地警告路易："正是懦弱把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下一个尝试财政改革的是胖乎乎的新教徒雅克·内克尔。这位富有的瑞士银行家与慈善家施展了不增税就能资助美洲战争的魔法，他的秘诀是更多的借贷，他也因此提出了一套税收方案。当同样受阻时，内克尔厚颜无耻地发布报告，公布侍臣获得的巨额聘用定金——这件事使他遭到解雇。

内克尔的继承者是卡隆。他通过更多的贷款勉强维持着局面。1786年，卡隆像他之前的历任财政大臣一样，也提出了税收计划。而且，他为了规避来自巴黎高等法院的抵抗，召集了显贵会议（Assembly of Notables）。这是个已沉寂了160年的团体。卡隆遭到了集会者的藐视，并被开除了。于是，接力棒就传到了埃蒂安-夏尔·德布里安手中。德布里安之前是反对改革的，但如今由于法国正在酝酿灾祸，他不得不试着实施改革。德布里安先后解散了显贵会议与巴黎高等法院。在他的改革提案被法国教士会议否决后，他不得不在1788年使出最后一招——提议召开三级会议。由于三级会议的上一次集会是在174年前，而且当时集会的召开也只是进一步激化了三个等级之间的矛盾而已，因此德布里安此举确实看起来是一次孤注一掷的赌博。

为什么神职人员与贵族阶层——分别代表0.05%与1.3%的人口——以看似自杀性的方式行事？诚然，他们并非同质群体，也有自己的内在等级秩序。高级神职人员与生活在普通人身边的教区牧师有别，恰如皇子与宫廷贵族不同，而宫廷贵族又与生活在自己领地上的下层贵族不同一样。而且，理所当然地，之前也有枢机主教与贵族出任大臣职位。教会会议与巴黎高等法院更多地通过它们的等级机构来反对王权。他们的反对只是人们通常认为的因盲目或者贪婪心理作祟吗？他们看到不祥之兆了吗？又或者他们试图把凶兆抹掉？如果提案让他们居然要像平民一样纳税，使他们感觉受辱，是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这将摧毁建构在三个等级基础之上的国之根本？在这个王国中，神职人员用精神为国效力，而贵族则用手中的剑与身居的要职为国尽忠。无论如何，他们显然没能看到的是，自己正在从内部毁掉这个体制。

因此，自此以后，他们与国王都失去了控制权。由于在格勒诺布

尔及其他地方发生的骚乱，以及由庄稼歉收导致的食物短缺，国王不得不同意于1789年5月5日在凡尔赛宫召开三级会议，而且把第三等级的代表人数翻番至600人，而贵族阶级与神职人员的代表各为300人。选举引发了如雪片般的“陈情书”或曰冤情书面申请书，人们要求平等、废除特权。这样看来，第三等级平民在一些普通教区牧师支持下，坚持按人头投票，而不是三个等级分开投票，而且所有人应一同坐在国民议会中投票的这些要求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事实上，这已经将统治权从国王那里转到了人民手中。6月20日，当国王下令封闭国民议会会场，将第三等级拒之门外时，许多人占领了一个室内网球场，并宣誓说不制定出一部宪法就不会离开。

路易十六在经历了3天的犹豫后，威胁着再次命令他们回到各自的阶层中去。路易宣布，“唯朕才为万民之福祉负责”。然而没过几天，路易便屈服了，让他们在7月9日自行成立制宪议会。但是，当人们得知路易试图召集2万人的部队时，巴黎陷入了恐慌。民兵被组织起来，人群突袭巴黎荣军院去寻找武器，又去巴士底狱军火库找火药。尽管巴士底狱长期以来都是不经审判就囚禁人的专制统治的象征，它是“富人的监狱”—它使贵族家族可以把像臭名昭著的萨德侯爵这样的害群之马关起来，而保护他们免受审判—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巴士底狱如今基本是具空壳。那里只有少数几个上了年纪的囚犯和象征性的非战斗军事力量。因此，它陷落了。巴士底狱的管理者洛奈侯爵被一个屠夫的儿子砍下了头，插在长矛上游街。普罗大众登场了—法国大革命开始了。

也许，最能说明王权与即将吞没它的国民能量脱了节的，就是国王7月的日记了。它主要记录了打猎的事，在它一行或者仅仅一个词的日志记录中，也记载了晚祷或政治活动的出勤人数。于是我们看到，7月1日的日志中写道：“无事。等级分离。”他打猎后记录了3天的猎获物，之后3天什么记录也没有，再后来的3天只写了一个词—“无事”。要么他对当时正在发生的事一无所知，要么对他来说，记录当天的狩猎毫无所获更重要，7月14日巴士底狱陷落当天，日记中写着：“无事。”

第六章

大革命和拿破仑的文化政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罗伯斯庇尔试图与暴政相抗争，
最后却被迫变成了自己所厌恶的模样。

有人说，对法国大革命下定论还言之过早。这句话值得商榷，但是也提醒我们，针对这次影响欧洲大部分地区、规模惊人的政治地震，人们长期以来的评价莫衷一是。而且，它的余震不仅体现在1830年、1848年的革命中，还波及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在25年的时间里，法国在历史发展上翻了个跟斗，依次经历了君主专制政体、君主立宪制，然后是各种形式的共和制，再转变为拿破仑统治下的帝国，最后又在1814年回到了波旁王朝的统治。但是，波旁的复辟并不意味着完全回到了之前的状态，因为宪制结构的动荡将会贯穿于19世纪始终，事实上还一直持续到现在。这反映了传统天主教思想与共和世俗主义之间的矛盾，以及通常意义上的政见分歧，这一点在今天依然明显—左派与右派这两个术语即源于1789年的制宪议会。法国大革命是法国及欧洲历史的分水岭。而且，甚至在200年后，丹东或者罗伯斯庇尔的回声也没有完全消逝。

因此，历史学家就法国大革命的性质及重要意义在看法上存在严重分歧，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直到20世纪冷战时期，当马克思主义在法国风头正劲时，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与阿尔伯特·索布尔（Albert Soboul）等历史学家的主流观点是从社会经济学角度，将事件解释成进步的新兴中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一场革命。弗朗索瓦·傅勒与其他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则认为，这种观点过于简单化了，他们强调的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作用。当然了，由于事件涉及的正是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互动，所以论证不应对这两方面顾此失彼。这点同样适用于一组针锋相对的观点：一方将法国大革命视为本质上的法国现象；另一方，例如雅克·戈德肖（Jacques Godechot），则认为它是一系列发生在美洲、英国与全欧洲许多其他国家内的革命骚乱的一部分。双方观点都有道理。因为英国与美国的革命发生在受到保护、与世隔绝的国家，而法国大革命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发生在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由于法国大革命危及整个欧洲的政治传统，它不得不持续应对外界反抗，正如后来俄国与中国革命所面对的情况那样。

客观而言，1989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日激励人们创作的大量书籍显示出了一种趋势，即不再对被忽视领域的研究（如文化、宗教、军事方面以及女性角色）做单一解释。然而，基本问题足够明显：为什么波旁家族实行的君主专制政体失败了？为什么随后的君主立宪制尝试也失败了？为什么共和国无法维持下去？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恐怖统治”是当时形势所迫还是源于大革命自身原因？拿破仑是法国大革命的救世主，还是毁灭者？最后，法国大革命的遗产是什么？

那么，法国的旧制度注定要失败吗？答案似乎明显是肯定的。短期因素确实在1789年动乱中起到了作用。路易十六缺乏控制力—尽管这源于王朝体制的长期缺陷，这一体制会将统治2000万人民的绝对行政权交到一个能力不济之人，甚至是一个5岁孩子的手中—另一个事实是，贵族阶级通过巴黎高等法院与教士会议自掘坟墓。还有由干旱与自1785年开始的歉收所导致的食物短缺及失业，又引发了巴黎人民的焦虑情绪与多省骚乱。以上这些均反映出，君主制长期以来未能从容应对内忧外患。它既不能解决帝国主义扩张后的世界所带来的外部挑战，也无法应对变化中的社会的内部挑战。

正如戈德肖充分论证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事实上是一系列“革命”在政治层面的相交点，而这些革命并不完全为法国所独有：由技术进步带来的一场农业革命，与之相关的人口统计革命，由资本主义兴起导致的经济革命，随着被排斥在权力之外的商业及职业中产阶级的崛起而出现的社会革命，伴随启蒙运动而生的知识革命，其实还有工业革命的开端。君权神授式专制君主政体的中世纪方案，已经不符合国家必须面对的变化中的世界呈现出的现实情况了。更加关乎宏旨的问题是，转向君主立宪制的尝试是否也注定会失败？

哪些人出席了1789—1791年的制宪议会？他们通常—在此只提及那些家喻户晓的人物—要么是像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与米拉波（comte de Mirabeau）这样的贵族，要么是像天文学家巴伊（Jean Sylvain Bailly）与弃医从文的新闻工作者让·保尔·马拉这样的科学家，要么不可避免地，是像丹东（Georges Jacques Danton）或者罗伯斯庇尔这样的律师。他们通常都很年轻：1789年，拉法耶特侯爵年仅32岁，却已经谱写了美国革命的传奇故事；丹东31岁；罗伯斯庇尔30岁。尽管如此，许多人已经创作了关于政治及宪制问题的作品，或者像米拉波与马拉那样，亲眼见证了英国的议会制。因此，即使他们没有行使国家权力的经验，按照当时的标准来看，他们也是完全能够胜任这项工作的一群人。当时一边是国王的少数支持者，另一边是极少数像丹东与罗伯斯庇尔这样的激进分子或曰“爱国者”，居中的温和派占了大多数，他们热衷于实行君主立宪

制。

前景是乐观的，因为其他欧洲国家至今仍然只是在口头上反对法国大革命而已。但是，温和派处于充满不确定性、希望与恐惧交织、密谋流言满天飞的氛围之中，这种新氛围是躁动而狂热的。普罗大众在巴士底狱以引人注目的方式闪亮登场，而且，随着皇家审查制度的疏忽，报纸的数量在巴黎与外省惊人地激增，其中一份报纸就是马拉的《人民之友》。后来，大卫的名画《马拉之死》使马拉名垂千古，此画创作于马拉在浴缸中被谋杀之后。马拉是一名四处游历的御医，曾创作了哲学、科学与政治作品。如今，马拉带着一种复仇心理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他责怪温和派没有砍下他一开始称为“人民之敌”的脑袋。立宪派强烈感到，公众舆论如今头一次在法国成了影响因素—政治团体激增，对公众舆论起到了引导或是分化作用。而且，温和派试图在保皇派与平民主义煽动者之间走中间路线。

多数党领袖中的杰出人物包括在美国独立战争反英军事行动中取胜后载誉凯旋的拉法耶特侯爵。他向制宪议会提交了自己与美国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共同起草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他不仅在辩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成了国民卫队总指挥官。但是，议会中占上风的雄辩家是米拉波。他因为一脸麻子而引人注目。米拉波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他做过士兵、赌徒、浪荡子、特工，还有毫无外交手段的外交官。数次未经审判即遭监禁的经历加深了他对专制政体的仇恨。事实上，他曾因与自己一生的至爱“苏菲”在一起，而被指控犯了诱拐与私奔罪，并被判处死刑。这段经历以及他对英国议会制的仰慕，同样为他创作的各种作品提供了素材。他在这些作品中攻击了过度中央集权的政府、税制及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专制统治。

米拉波采取的实用主义手段，以及他掷地有声的演讲让他广受欢迎。而且，当他在1791年4月，时年51岁去世之际，他是第一个获得遗体被安葬在新改建的巴黎先贤祠这一殊荣的人。后来，当人们在他的私人文件中发现他一直秘密地向国王建言献策时，他的遗体又马上被移了出去。这么做的并不只有他一个人，因为他那相当受人尊重的同僚巴纳夫也在小心翼翼地与玛丽·安托瓦内特保持着联系。训练有素的律师巴纳夫出身富有的新教家族。当然，许多人将他们的这种行为视作背信弃义，但也许这里面掺杂着个人野心的成分，他们主要的动机是试图哄骗国王接受宪制解决方案。

与议会讨论并行不悖的往往是新兴政治社团的激进活动。这些政治社会团体中规模最大的就是雅各宾俱乐部。它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社团之前租用了多明我会修道院大厅，而多明我会修士的第一处活动场地位于圣雅克街，所以他们广为人知的一个称谓便是雅各宾

修士。这个社团一直发展壮大，直到在整个法国有了成千上万的分会与数以万计的成员。起先领导雅各宾派俱乐部的是米拉波与其他温和派，其中也包括了马克西米连·德·罗伯斯庇尔这类激进分子。罗伯斯庇尔的名字代表着法国大革命的最后阶段。他是一名曾就读于著名的巴黎路易勒格朗中学的年轻律师，学习过经典著作—这让他有了一种罗马式的道德感—也受到了启蒙运动哲学家尤其是卢梭的启迪。他彬彬有礼、生活节俭。虽然他总是穿戴整齐，但最初因为声音小、有些害羞，以及表达观点时近乎天真的热切，而不能当好演说家。他强调普选权与平等权利，尽管这些观点今天看来并无惊人之处，但在当时它们迅速让他成为保皇派新闻界特别憎恨的对象。罗伯斯庇尔以清廉自守著称，他相信上帝的存在。在残酷的政治世界里，他是一名理想主义者，一个年轻耿直的纯粹主义者。

与之形成对照的人物是当时担任更加激进的科尔德利俱乐部主席一职的乔治·丹东。科尔德利俱乐部倾向于直接行动，而不是走议会道路。丹东不同于罗伯斯庇尔，他身材高大魁梧，声如洪钟，性格也更加慷慨大方。他天生就是当领导的料。比起罗伯斯庇尔，丹东更腐败，因为他被王室买通，充当了告密者。虽然丹东是个有缺陷、有争议的人物，但毫无疑问他是相信法国大革命的，尽管他变得越来越温和，而罗伯斯庇尔则变得日益严厉。最终，当法国大革命开始吞噬自己的孩子时—正如处于极大历史压力下的革命通常会出现的情况那样—它将最终演变为这两人之间的终极对决。

在1789—1791年这短短两年间，制宪议会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它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后来将成为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基础—完全重铸了个人与政府的关系。尽管这份文件承认上帝的存在，且上帝的定义足够宽泛，以至于能够赋予犹太人与其他少数派以信仰自由，但国王不再是君权神授的统治者，而是凭借主权国家的意志进行统治。三个等级与世袭特权被取消，并且确立了行政权、立法权与司法权三权分立的原则。臣民变成了公民，公民在法律面前享有自由、平等、安全的权利，以及“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权”。简言之，法国是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立法议会制定法律，而国王任命大臣并至少能延迟他所反对的立法的实施。

公民选举权仅限于有产者所有，而有产者只占男性人口的一半多一点而已，不过也远远超过了当时英国选民不到3%的数据。当然，正如一项重要研究所显示的，女性尽管在法国大革命中十分活跃，却依然被认为只属于家庭私人空间，而被完全排除在选举权利之外。[14]但是，这仍是一项相当具有历史意义的和解。它还包括了许多其他措施，例如，开始实行世俗婚姻、认可离婚、将国家合理地分成83

个省份、引入公制，以及压制国内关税壁垒以控制国内市场。

那么，这个本可能和平过渡到现代性的新资产阶级政权，为什么却没能扎下根来呢？一个原因是，议会在教会问题上犯了个战术性错误。许多普通教区牧师支持变革，而且因为法国长期以来都有着独立的高卢主义禀性，所以在削减教皇经费与廉价出售占国土面积大约8%的教会土地时，并不存在实质性的抵抗。事实上，民主式的重组教会也没有遭遇多少真正的抵抗。重组后，一个省有一个主教，大主教负责监督主教省。如今，人们把这些神职人员视为领取薪水的公务员，由信众中较为富有者选举产生。

然而，如果所有这些变革均在新型国家结构内留给了教会一个完整位置的话，那么问题的症结出现在1790年11月，神父们被要求宣誓效忠新宪法。来自城镇的议会成员往往更关注位高权重的神职人员的可耻行径，而不是普通教区神父在农村的重要地位。而且，强调宣誓行为从策略上而言是十分幼稚的。到头来，如果说半数左右的神父宣誓了，而主教与另一半神父拒绝宣誓，这便强化了教皇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对态度。1791年3月，神职人员激烈地谴责这部公民宪法。这不仅导致法国内部的分歧，还将问题上升到了欧洲层面。

另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国王缺乏远见，或者说不那么可靠。国王只在压力驱使下才接受这些事态发展，而且他还总在寻找脱身之策。当他最初拒绝认可这些新权利时，成千上万忍饥挨饿的女人被严重的食物短缺激怒了，而且她们也担心国王会召来军队，所以就一齐走到凡尔赛，迫使国王回到巴黎，待在杜伊勒里宫。当国王在1791年6月想秘密逃走，在边境集结外国及法侨军队时，他作为君主立宪政体首脑的信誉完全丧失了。议会中的温和派担心支持共和制会导致民怨沸腾，而且他们热切希望组织人们投票选出新宪法，于是就对外宣称，路易被绑架了。但是，当拉法耶特侯爵与国民卫队在7月为驱散反对君主制的民众示威而向人群开枪时，再无佯装的可能。

显然，如今在激进派与温和派之间，存在着不祥的对立，而且温和派中的许多人已经离开了雅各宾派俱乐部，正如议会与“无套裤汉”之间存在对立一样。“无套裤汉”是指穿纯棉裤子，而不是代表上层阶级的齐膝短裤的平民。在制宪议会完成自己的使命、解散之前，它的决定并未减轻矛盾冲突，这项决定就是，制宪议会成员没有资格加入1791年10月成立的制宪议会代替性机构—立法议会。这项克己忘我的法规旨在给刚成立的议会以新的民主授权，但是不幸且出人意料的结果是，不仅这个新机构缺乏经验，而且激进主义逐渐转移至更变化无常的政治团体中。

结果，未能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主因在于，这场发生在欧洲大陆上最大国家内部的大革命注定将招致来自欧洲其他君主国的敌视，这一点可见于教皇的介入以及法国边境上的法侨军队上。因此，法国君主立宪制的失败只能理解成一种国际、国内力量共同作用后引发的现象。尽管最初英国对法国大革命表示了些许同情，其他大国在表明自身立场前也观望了一阵，奥地利与普鲁士在1791年8月号召建立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欧洲联盟，但是法国大革命中存在的广泛的欧洲矛盾变得日益含蓄。

这种威胁，以及因不断加深的宗教冲突所引发的人们对保皇派叛国与叛乱的恐惧，使得人人自危，并最终使法国在次年4月发动了一场防御战。这场战争获得了国王的首肯，然而国王注定是要失败的。这场战争激化了议会中剩余的雅各宾派之间的分歧—他们也被称作“山岳派”（Montagnards）与“吉伦特派”（Girondins）。山岳派的名字缘于他们开会时坐在议会中较高的长凳上，而吉伦特派则大多是来自外省的温和派。二者之间的差异颇具历史意义，因为被雅各宾派戏称为“联邦派”的吉伦特派反对基于巴黎的中央集权制，而这种中央集权制早已成了法国政治生活的显著特征。具有十足讽刺意味的是，支持战争的正是温和的吉伦特派，他们怀着理想主义的梦想，打算传播革命原则。而“嗜血的”罗伯斯庇尔却是反战的，他不无先见之明地说，战争只会带来暴政。

这起事件也将导致法国与其他欧洲列强展开一场逾20年的战争。与此同时，战争带来了法国的多次惨败，加重了人们的无端恐惧。拉法耶特侯爵的逃亡，国王对征调外省卫兵、保卫巴黎的提案提出的否决，以及更重要的，来自流亡贵族侵略军指挥官的颇具挑衅性的威胁（他声称要处决任何抵制或不接受君主专制政体复辟的人）—这些均加重了人们的恐惧情绪。毫无疑问，这会反作用于路易十六。他不得不向议会寻求庇护，以躲避由丹东与马拉煽动的民众起义所发起的对杜伊勒里宫的攻击。

此后不久，当凡尔登在9月2日陷落，致使巴黎门户大开之际，人们陷入了恐慌。暴民胡作非为数日，“处决”近1100名囚犯，包括贵族、牧师与妇女。议会未能抵制人们的歇斯底里，直到两周后军队在瓦尔米意外战胜侵略军，情况才得以缓和。德国作家歌德将此事视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因为一支由爱国公民组成的军队打败了专业部队—由此开启了人民民族主义与征兵制的时代。但是，当时路易十六已被囚禁，君主立宪制已经死亡，而且议会正在召开制宪会议以实行共和政体。

如果说君主立宪制在这场法国与欧洲的战争中难以为继的话，那

么共和国有望幸存吗？也许不能，因为共和国对君主制思想提出了更加巨大的挑战，也因为战争有其自身的毁灭性逻辑。在瓦尔米大捷之后，国民公会的扬扬得意必然是具有挑衅意味的。在接下来的6个月中，法国取得了进一步的军事胜利。这让国民公会备受鼓舞，于是就宣布将以叛国罪在1792年12月审判国王。这是他们的使命，目的是帮助所有追求自由的民族，并在黑暗中完成一次飞跃。尽管罗伯斯庇尔指控国王犯了“反人类罪”，马拉也宣称自己“只有在路易脑袋搬家时，才会相信共和国”，但其他人的态度是慎重的。尽管大多数人认为路易犯下了密谋反对共和国的罪行，但在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辩论与持续36个小时的投票之后，人们才最终以380票对310票的裁定判处路易十六死刑。因此，在一个寒冷且有雾的1月的早晨，路易被一驾四轮马车运到了断头台。在那里，这个意外地降生于摇摇欲坠处，善良却软弱、优柔寡断的男人，以他的镇静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有尊严地死去。当有人将他的头颅举起向人群展示时，正如陪伴路易的神父所报告的，现场陷入了一片“可怕的沉默”，直到“群众一致呼喊着共和国万岁，所有人都将帽子抛向了空中”。

如果把国王送上断头台多少吓到了共和国自身的话，这一举动也理所当然地使欧洲大为震惊。如今，法国不仅面临着来自英格兰、俄国、西班牙、奥地利、普鲁士、撒丁岛与那不勒斯的联合入侵，还不得不应对国内多处暴力反叛，尤其是在旺代与布列塔尼。一方面，这代表着取缔奴隶制、引入后基督教历法、使对上帝的狂热崇拜官方化—从政治上而言，对于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农业国，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雄心壮志—另一方面，它要极端严酷地镇压外省反叛、打击政治对手。法国处于令人绝望的困境之中，既要为了生存对抗强大的外部敌人，同时又要打一场激烈的内战。而且，正是当时的种种压力，尤其是食物短缺与阴谋论调引发了巴黎普通市民的恐慌，又最终导致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恐怖统治”。

事实上，“恐怖统治”源于恐惧—对失败后复仇的恐惧、对饥饿的恐惧。这导致1793年4月权力实际被转移到公共安全委员会手中。由丹东与罗伯斯庇尔领导的山岳派越来越多地掌握了公共安全委员会的控制权，他们二人特别实施了打击食品投机商的紧急措施。随着那年秋天情况的急剧恶化，委员会的态度也相应地变得强硬起来，他们毫不留情地采取孤注一掷的方法。10月，委员会不仅把吉伦特派领袖送上了断头台，还上演了一场针对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粗鲁的作秀审判，以这种宏大的方式表现了自己破釜沉舟的决心。寡妇卡佩—这是她如今的官方称呼—被送上了断头台。在断头台上，在死于刃下并被快速掩埋于无名墓中之前，她因不小心踩了行刑者的脚而紧张不安地道歉。当时，共和国已经变成了专政，它最重要的目的是打赢这场绝望

的国内及国外战争。

在短期内，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恐怖统治”是成功的。在旺代与其他地区，委员会开展的无情镇压活动造成高达20万的受害者，而巴黎一地的断头台在15个月中就夺去了近2000人的生命。截至1793年年底，法国国内形势已基本稳定。不仅如此，委员会通过严格控制资源，残酷无情地强制大规模征兵，组建了一支占据人数优势、约有60万人的军队。应该说，由新任命的年轻军官率领的军队，爱国主义热情高涨。法国面对来犯的欧洲列强的进攻时，战争局势也开始扭转。但是，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恐怖统治”有其内在动力。而且，在这充满阶级仇恨、怀疑、谴责与食物短缺的紧张战局下，吉伦特派与山岳派之间的分歧不可避免地在山岳派内部被复制了。罗伯斯庇尔的领导地位日益突显，领导层正带领人们游走在新定义的极端事物之间。

首先要解决的是来自“狂热者”（Enragés）或曰平民主义极左派的威胁，他们想要加强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恐怖”，然而他们在1794年3月也被送上了断头台。矛头随后指向了在另一端的丹东及其追随者们，即所谓的“宽容派”。这些人日益担忧正在崛起的极权主义警察国家，因此基于局势的好转，主张放松“恐怖”政策—他们在4月被处决了。在罗伯斯庇尔看来，对以上两派的沉重打击净化了法国大革命。他坚信，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大革命，即使需要用专制暴政来保护自由，使其免受专制暴政之苦。但是，在战胜了丹东之后，罗伯斯庇尔越来越多地受到他人批评。伴随着6月26日法国在比利时弗勒吕斯的惊人胜利，共和军开始组织起成功的反攻。这也使得罗伯斯庇尔周围的人开始为他们自身的处境感到担忧，他们变得狂热且毫无根据。1个月后的7月27日，轮到国民公会把罗伯斯庇尔送上断头台了。此事象征性地终结了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统治”阶段。

也许，我们可以冷漠地说，法国大革命利用完罗伯斯庇尔后，就把他除掉了。正如一项结构主义风格的比较研究所提出的：真正重要的是法国所面临的客观压力，即在相互竞争的现代国家组成的新欧洲里，实现自身重组、做好自己本分的压力；因此，意识形态差异是次要的。但是，除去在这个过程中被碾碎的个体的命运外，大革命也是一场更大的悲剧。在那般压力作用下的关键时刻，大革命被迫将自身翻了个底儿朝天。罗伯斯庇尔的命运也具有悲剧性讽刺意味。他是一个严格的清教徒、一位攻击无神论的自然神论者。他相信个人财产权、全民获得工作及教育的权利。他没有丹东那么多缺点，也没有丹东那样丰富的经历。他无法意识到，彼时的政治可能性存在诸多限制。他本人并不像某些西蒙·德·蒙德福特式人物那般凶猛。而且，事实上，法国大革命戕害的人也不及宗教裁判所屠杀的清洁派那么多。

但是，这种公开游行是场让人胆战心惊的仪式，受害者不得不在万众瞩目下，走向面善的约瑟夫-伊尼亚斯·吉约丹医生发明的“人道、民主的”杀人机器之刀刃下。令人胆寒的事实是，大革命进行到最后，到了把罗伯斯庇尔本人送上断头台的时候了。他成了众人的最后一根眼中钉。之前，人们虽然没能杀死他，但已经打碎了他的下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罗伯斯庇尔试图与暴政相抗争，最后却被迫变成了自己所厌恶的模样。

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恐怖统治”恢复了中产阶级温和派的卓越地位。他们颁布了新宪法，赋予一个由五人组成的督政府以行政权，另有两个立法机关实行权力的制衡。军队的胜利使人们进一步感到如释重负，法国当时正在向荷兰、德国、瑞士与意大利进发，并在那里建立起兄弟共和国—尽管他们参与劫掠的鲁莽行为将会惹怒这些兄弟共和国。在国内，法国处于奢侈与机会主义并行的时期。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就是督政官中的领军者，生活放荡、腐化堕落的保罗·巴拉斯。尽管政权虚弱，然而，一方面，它成功解除了由崇尚极端平等主义的巴贝夫掀起的新雅各宾派的威胁；另一方面，它镇压了令人忧心的巴黎保皇党反叛。保皇派支持路易十六短命的继承人—名义上的路易十七（1792—1795年在位）。这次叛乱很快就被一个名叫波拿巴的26岁年轻将军镇压下去了。而且，当这位年轻的拿破仑·波拿巴陷入对巴哈斯前任情妇约瑟芬·德·博阿尔内的热恋之中时，巴哈斯把驻意大利法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拿破仑，这几乎可以算得上是给他的结婚礼物了。

我们最好将拿破仑与约瑟芬放在当时动荡不安、充满危险的过渡期背景下审视—约瑟芬此前的丈夫是位将军，在断头台上送了命。她自己之前也被捕过一次，而拿破仑也有相同的遭遇。约瑟芬比拿破仑大6岁，还有两个孩子。她来自马提尼克一个糖料种植园主家庭。她之前的丈夫是臭名昭著的浪荡子博阿尔内，处在这种放任自由环境中的她也做过几个显贵人士的情妇。她在当时是个苗条貌美的时髦女人，虽然牙长得不好，却声音甜美。如果说她奢侈浪费又相当轻浮的话，那么她同样是个和蔼可亲、讨人喜欢、善良可人的女人。而且，也许因为她是情场老手—这是她那浪漫且理想主义的年轻丈夫所不具有的—她并不像拿破仑那样把忠贞看得如此重要。

对于出身科西嘉低层贵族世家的拿破仑来说，法语是他的第二语言，他也就多多少少是个局外人。遵照科西嘉的良好传统，拿破仑与母亲依然关系密切，尽管他的妈妈骂约瑟芬是娼妇，还经常说丧气话。同样地，拿破仑感到自己对整个家族负有责任。虽说他是个不可知论者，但上战场前都要迷信地在胸口画十字。他离开家，先后在布

列讷堡军校与巴黎军校求学的经历，砥砺了他独立自主的品格。在此期间，他不仅展现出极高的智商，还表现出了雄心壮志与令人敬畏的工作能力。对拿破仑来说，他没资格成为贵族骑兵，转而加入了更加现代化的陆军部门—炮兵，是件幸运的事。因为，正是他果敢地运用大炮，才在土伦之围中崭露头角。而且，他早就准备好了，婚礼后数小时内—之前他已经催促登记员加紧完成此事—他就抓住了在意大利的重大机遇。

起初人们觉得，意大利阵线只是法国反奥地利战斗中的次要事件而已。但是，在1796—1799年的战役中，拿破仑凭借包括曼托瓦与米兰在内的一系列胜利，将意大利变成了扭转法国糟糕军事局面的中心战场。虽然士兵们起先怀疑地看着这个瘦小的年轻指挥官，但他英勇地率兵在前线冲锋陷阵，展示出了天分与专注，且从不高人一等地对他们说话，从而迅速成功改变了士兵们的看法。最终，拿破仑入侵奥地利，并参与了《康波福米奥和约》谈判工作。所有这一切—再加上他通过定期的军队公告缔造了自己的传奇—让拿破仑在法国国内极受欢迎。

对巴哈斯来说，拿破仑很快变得太受欢迎了。巴哈斯心知肚明，督政府因为未能给法国带来秩序与统一而不受待见—因此，他很高兴授予拿破仑埃及远征军队的指挥权，赶走了这个潜在的敌人。此处的战略目标是，削弱英国对埃及与印度的帝国主义控制，但由于拿破仑强烈的求知欲，他还带了一队学者与自己一同前往埃及。这些学者整理出了宝藏清单，发现了罗塞塔石碑，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埃及学。但是，这次远征作为一场军事行动，却是个灾难。凭借金字塔大战那场著名的胜利，拿破仑确实拿下了埃及，但是，1798年8月，英国指挥官纳尔逊在阿布基尔海湾摧毁了他的军舰。拿破仑发现，自己只有一支深受瘟疫侵扰的军队，孤立无援。当他听说了新组建的反法同盟带来的威胁时，他交出了军队指挥权，悄悄返回法国。

与此同时，他的个性开始变得刚毅似铁。这不仅是因为他听说约瑟芬在他离开时对他不忠，更是由于纳尔逊拦截了关于这段绯闻的信件，并卑鄙地将它们发布在《伦敦晨报》上，让拿破仑受尽屈辱。尽管拿破仑会一直爱着约瑟芬，甚至是在1810年由于子嗣需要与她离婚之后他也继续爱着她，但他们之间的权力平衡已发生了转移，时不时出轨的将是拿破仑。这个受伤的理想主义者正变得越来越冷酷无情。他返回法国后，没有对弱者与腐败的政客给予什么尊敬。他欣然参与了一场由旧雅各宾派成员埃马纽埃尔·西哀士领导的政变。后者想利用拿破仑与罗歇·迪科组成一个由他自己主导的三人执政府。

事实上，尽管这场密谋成功了，最后成为第一执政的却是拿破

仑。面对着给这个极端分裂、近乎破产的后革命时期国家带来秩序、统一与繁荣的艰巨任务，拿破仑将渐渐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此外，拿破仑在处理内务时，不得不面对着外国敌对势力的外患。在1799—1815年，面对一再组建的第二次到第六次欧洲反法联盟，拿破仑需要保卫自己的国家。此外，他还面对着与之相关的，由英国赞助的国内暗杀的威胁。尤其是在1800年的那次惊人的暗杀：当拿破仑于海顿的清唱剧《创世记》首演之夜离场时，有人想把他炸死。以更多此类暗杀为背景，拿破仑于1804年成了世袭皇帝。他想要通过此举使政权在自己身后千秋万代地存续下去。

拿破仑在应对这场内忧外患时，开始特别依赖在该时代的危险政治中两位永远的幸存者。他既不喜欢也不信任这两个人，但却离不开他们。第一位是他的警务大臣约瑟夫·富歇。此人当过老师，还在督政府执政时出任过大使。他作为一名激进的雅各宾派成员，对于里昂反国民公会的动乱所实行的残酷镇压，连罗伯斯庇尔都感到惊愕万分。富歇粗鲁无礼，不修边幅，也不爱清洁—虽然他也是忠诚的居家好男人、完美的父亲—他是个阴谋大师，通过严密的特务网维持法国国内秩序。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人物是有教养，且非常具有法国旧制度气息的外交大臣塔列朗。他出身于贵族家庭，之前做过主教与流亡者。他已经成了外交上旁敲侧击与高深莫测的典范。塔列朗是追求物质享乐的好色之徒与美食家，他还是拥有自己的波尔多佳酿的葡萄酒鉴赏家。他明显的碌碌无为让拿破仑感到费解，但是，他在英格兰与美国生活过，还似乎到处都有能搭上线的联络人。今天看来，他也许如一块陈放过久的卡芒贝尔奶酪般腐败。但是，就提供服务以换取贿赂而言，他只是在遵照当时的社会惯例而已，而且他的态度与其背景有很大关系。塔列朗虽为长子，但却因畸形足而失去了自己的权利。虽然他是名无神论者，却不得已在35岁时担任欧坦主教一职—这个职务的不便之处是他不得不踏上访问该地的三日旅行—他之前赞同启蒙运动，支持法国大革命。不过，虽然拿破仑对军事荣誉的概念习以为常，塔列朗却觉得战争是令人厌烦、嘈杂、要人命的事。他的价值在于，当法国就欧洲的政治未来与传统强国交战，尤其就帝国主义霸权与英国争锋时，塔列朗是位和平人士。拿破仑也意识到了塔列朗这值得称赞的价值。

1801年6月，拿破仑在马伦哥会战中击败奥地利军队后，与奥地利握手言和。翌年，他又迫使如今已孤立无援的英国接受了和平。拿破仑开始着手改变法国了。他允许流亡者回国，并与布列塔尼地区的朱安党叛军达成协议，朱安党此前是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拿破仑与教

皇签署了和解协议，将教会带回到由政府监督的民族共同体之中。而且，在任命主教方面，拿破仑坚持认为，即使他本人不信上帝，主教们也应该真的信仰上帝。他基于受任命的地方行政官，建立了新的国家行政管理体系，成立了法国最高行政法院。拿破仑通过颁布《民法典》或曰《拿破仑法典》，建立了完善、统一的法律体系，而许多国家后来也采用了《民法典》。拿破仑还重组了司法派系，成立了29个上诉法院与1个高等法院。

除此之外，他建立了法兰西银行，稳定了货币。法郎变得相当坚挺，以至于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它依然保持稳定。拿破仑创立了由公立中学所组成的、受到严格管制的国民中等教育，以及一批具有高度选择性的学院占主导的高等教育体系，这些学院被称作“高等专业学院”（Grandes Écoles）。他还制定了“荣誉军团勋章”制度，奖励军队服役、鼓励人们效忠于共和政府。简言之，在这些作为地基的“大理石块”之上，拿破仑塑造了现代法国持久的立法、行政、司法与教育特征。而且，他采取措施发展农业、拓展工业、推动公共工程建设，包括修建几座人们熟悉的巴黎大桥以及法国证券交易所。如此一来，拿破仑使这项全面改革工作圆满完成了。

接下来，随着战火在1805年再度燃起，情况渐渐变得艰难起来。第一，他几乎一直不懈地在与主要的欧洲列强及英帝国主义这两方交战。第二，他也深受自己喜怒无常的性情之害，因为拿破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过渡期的人物，是对立面的融合。一方面，他是具有非凡天赋的启蒙运动时代的理性主义者、具有现实主义妥协眼光的政治家；另一方面，他是浪漫的理想主义者、军事荣誉的信仰者、梦想实现欧洲统一的远见者、为自己的“命运”着迷的外来者，他被引诱着想要看看自己到底能走多远。第三，理所当然地，他身处乱世之中，英国资助暗杀活动，要取他性命。这就使他想要通过在教皇面前加冕成为世袭皇帝而让政权千秋万代、永续长存。

事实上，这个在1804—1814年存在的帝国，通过它的独裁自由主义，以及对革命观点与君主形式的糅合，在接下来的数年间占据了欧洲军事的支配地位。拿破仑帝国取得的著名军事胜利包括在奥斯特里茨战役（公元1805年）中战胜奥地利与俄国，以及在埃劳战役（1807年）中战胜普鲁士。但是，事情出了问题。当英军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摧毁了拿破仑的军舰后，拿破仑入侵英格兰的计划破产了。而且，他针对英国贸易实施的大陆禁运令导致法国遭到邻国的反对。如果说，拿破仑打造一个世袭帝国尚且有自己的理由的话，那么在创造世袭贵族方面，他就做得过了头。他让弟弟路易登上了荷兰王位，另一个弟弟热罗姆又成了威斯特伐利亚国王，还让他的义子欧仁·德·

博阿尔内做了意大利总督。此外，按照勒费弗尔的说法—他在长篇累牍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之后，在结尾时被迫得出结论，即拿破仑的性情确实是决定性因素—“保卫法国自然疆界的最好方式，也许不是越过疆界，以占领的姿态挑衅式地前进”。

转折点出现在1808年，在他决定强迫西班牙国王退位，由他的哥哥约瑟夫取而代之时。此举引发了一场持续性的动乱，而拿破仑从未完全成功地将其镇压下去。结果，他的军队被削弱了，同时奥地利跃跃欲试，想要再度对法国宣战。对此，拿破仑气势汹汹地做出了回应，在瓦格拉姆战役中力挫奥地利。而且，因为约瑟芬没有生下必不可少的继承人，拿破仑与她离婚后迎娶了18岁的奥地利公主玛丽·路易斯，并与其育有一子。因此，到1810年，即使此时富歇和塔列朗正暗中与拿破仑的敌人密谋，但拿破仑似乎正处于个人权力的巅峰，他的帝国从荷兰一直延伸到意大利。

但是，当沙皇打破禁运条款，再度开展与英国的贸易时，1812年，拿破仑冒险发动了对俄国的侵略战，结果被焦土政策打败，在损失了50万兵力后被迫拖着沉重的脚步撤退。如今，整个欧洲都与他为敌，他不得不在1814年退位。然而此后，他又像玩偶匣中跳出的玩偶一样，从流亡地厄尔巴岛卷土重来，翌年无奈地再度在滑铁卢惨败。拿破仑被流放到了位于南大西洋上遥远的圣赫勒拿岛。1821年，他在那里去世，享年52岁。虽然逮捕拿破仑的英国人并不为他着想，虽然他获得的医疗护理不如人意，但他几乎不可能像一大批阴谋理论家所暗示的那样，是被谋杀的。拿破仑长期以来都有胃病，他明显死于胃癌。

拿破仑既不是英国政治宣传中的妖魔鬼怪，也不是法国大革命的掘墓人。他也许尽己所能地应对了当时法国与欧洲的局势，巩固了中产阶级革命。但是，正如马丁·里昂（Martyn Lyons）所指出的那样，他并不是“任何阶级或社会群体的被动工具”，而是一个独特的、自我支配的个体。事实上，他正是在“命运”的带领下，越过了“巩固那场革命成果”的界限后，才遇到麻烦的。他失去了法国在欧洲的全部收益，输掉了与英国的资本主义竞争。但是，他通过自己的军队传播了革命思想，提出了关于政府形式的重大问题，而且他也建立了现代世俗国家。当波旁王朝在1815年复辟时—按照塔列朗的说法，这个复辟王朝“什么也没学会，什么也没忘记”—它将回到一个与过去不一样的世界之中。

然而，拿破仑在那个世界中徘徊着。正如他自己所意识到的，他的人生是传奇的素材。直到19世纪，他的传奇故事依然存在于他自己的回忆录以及知名作家（例如，拜伦、司汤达与维克多·雨果）的作品

中。拿破仑威名远扬，以至于法国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在1840年将拿破仑皇帝的骨灰运回法国，郑重其事地在巴黎下葬。但是，路易·腓力通过接纳传奇人物实现国家统一的天真尝试，只是为拿破仑的侄子在1852年成为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铺平了道路而已。而且，路易·腓力的做法强调了拿破仑永久的政治遗产，即拿破仑试图缩小左派与右派之间的差距，因而在法国政治中留下了波拿巴主义的调性。这种特性贯穿于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直到戴高乐与萨科奇时仍有体现。

历史并不全是战争，那么被抛弃的约瑟芬怎么样了呢？她把自己变成了一名严肃认真的园艺专家，在马迈松城堡栽种培育了著名的玫瑰花系列品种，为文明更温柔的一面做出了自己真正的贡献。此外，在1814年去世前，约瑟芬也收集了大量艺术品。

第七章
又一个拿破仑

这是浪漫主义的时代……在一个多余的世界里，在一个正统思想开始梦游，仿佛什么都未发生过的世界中，人们的不合时宜感可能会引发对“完整”的模糊渴望。

拿破仑一世传奇的戏剧性结尾伴随着波旁王朝的复辟。然而，法国与欧洲都不可能回到法国大革命前的状态了。在许多人看来，过去的25年不仅贬低了基督教国家具有统一性的旧观念，还贬低了启蒙运动本身具有统一性的观念。如果说拿破仑的战争激起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反抗，那么此时欧洲正在变成民族主义相互竞争的温床—这将成为德国与意大利统一、希腊与比利时独立的一个世纪。就法国本身而言，由于它相当缓慢地朝着工业社会发展，社会上将出现两极分化：一边是民主与社会主义之类的世俗意识形态，另一边是具有保皇倾向的天主教思想。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革命时期，所有的宪政方案均悬而未决，所以法国将再次曲折前进，经历不同的政体，并在19世纪末达到稳定。以上所有因素都为这一时期充入了活力。法国在这一时期将会成为重要革命的中心，也将为社会思想、浪漫主义运动、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当然还有现代艺术做出关键贡献—尤其是印象派绘画，它们将某种法国形象铭刻于世人心中。

无处不在的塔列朗促成了一项协议，使路易十八（1814—1824年在位）被装进“敌人的行李搬运车”并运回了法国。路易十八已经快60岁了，他与外界脱了轨，由于长年流亡意大利、英格兰，还患有肥胖与痛风，他精神不济，渐渐只能坐轮椅了。路易十八宣称，接下来将是他执政的第19个年头，好像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的法兰西帝国不曾存在一样。但是，诸国联盟迫使路易十八接受了一种有限的立宪制政府—主要的限制在于，在法国3000万人口中，只有10万人享有投票权。即便如此，路易那极端保皇的流亡者随从仍然觉得太过分了。这些极端保皇派追随者举止傲慢，目中无人，使得拿破仑有机会突然从厄尔巴岛逃回法国，并最终导致保皇派们再度踏上流亡之路。当他们在滑铁卢战役（1815年）之后回到法国时，怀着迫切的复仇心开始实行“白色恐怖”。在此期间，拿破仑的支持者与新教徒遭到攻击，数百人被杀害。政府随后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即清洗行政部门与军

队，处决拿破仑的几位将军，以及通过法律，禁止煽动性著作与“煽动性呼吁”。路易十八本人却十分担忧这些放肆之举，于是在1816年听取了更加开明的年轻大臣埃利·德卡兹的建议—路易对德卡兹也有情感上的依赖—解散了这个极端保皇的议院，寻找一个更加温和的议院。

通过改划选区的手段，一个更加温和的议院被策划组建起来。接下来的4年，在德卡兹的带领下，这个议院推行了更加开明的政策。审查制度有所放松，选举法更有利于中产阶级，合理的财务管理政策使战败的法国能够偿还拖欠外国列强的战争赔款。但是，保守的奥地利外交大臣克莱门斯·梅特涅对德卡兹领导下法国开明的新方向表示担忧。同样表示担忧的，当然也有极端保皇党，他们得到了新闻界与有影响力的社团（例如“信仰骑士”）的大力支持。他们对君主专制政体有种理想化的看法，这种看法契合了浪漫主义者试图回归更质朴的中世纪世界的观点。而且，他们唯一能接受的举措，便是恢复三个等级的制度且相应地复辟贵族与神职人员特权，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保护教会与天主教世界观的唯一途径。所以，1820年，一个心神不宁的波拿巴主义马具商刺杀了国王的侄子贝里公爵后，他们趁机归罪于德卡兹，逼他辞去相位，然后鸠占鹊巢，在接下来的10年统治着法国。当极端保皇党的领袖阿图瓦伯爵接替路易十八的王位，成为查理十世（1824—1830年在位）时，他们完全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年轻时丑闻缠身、玩弄女人的查理，如今已67岁，变得虔诚而专制，他坚持完全回归中世纪加冕仪式传统，乃至要在成千上万患者身上施展他刚获得的神赐威力—只消他手指一碰，就能治愈淋巴结核。但是，他的施法并没有什么明显效果。

在接下来的几年间，查理十世像传教士般，将王权与教会联系在了一起。他着手将教育归还给教会，对任何渎神行为均施以死刑—此举让中产阶级觉得格外具有威胁性—并通过立法补偿流亡贵族。所有这些措施，激起了来自左派与右派的反对，甚至一些教会人士也表示出不满。当首相维莱尔伯爵试图在1827年举行选举来智取对手时，他发现自己势单力薄，被迫下野。漫长的间隔过后，查理十世任命了极端的保皇党人、神秘的天主教贵族波利尼亚克亲王（the Prince de Polignac）。这位亲王的母亲深受玛丽·安托瓦内特喜爱。亲王本人的鼻子特别长，以至于对任何在法国旧制度之后出现的事物均嗤之以鼻。

任命波利尼亚克被视为一种挑衅行为，于是1830年5月，查理十世解散了内阁，然而到了7月，更多的反对派出现了。查理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教训视而不见。针对农业歉收后出现的经济危机以及异

议不断等恶兆，查理试图实行一场自上而下的政变：他宣布他将实行独裁统治。此愚蠢之举使他直接陷入了一场自下而上的动乱之中。这场被称作“1830年革命”的骚乱最初是由印刷工掀起的，很快其他工人、学生与部队老兵也加入了进来。他们立起了路障、击退了军队的有力进攻，然后占领了卢浮宫与杜伊勒里宫。3日之内，受到惊吓的查理十世就已逃向当时法国国王与贵族通常的藏身之所—英格兰了。

与此同时，一批中产阶级领袖想要建立能够正常运作的君主立宪政体，却因暴动四起的共和国风气而惶恐不安，不过他们已准备好了一条锦囊妙计，来应对可能出现的此类情况。而且，依靠必不可少的塔列朗从中斡旋，他们突然将小路易·腓力公爵搬上了台面，后者出身波旁王朝中更加开明的奥尔良支系。年迈的拉法耶特在巴黎市政厅向世人隆重介绍了路易·腓力，他此时正充满爱国热情地身披着三色旗，就这样，1830—1848年的“七月王朝”诞生了。它常常被称作“资产阶级王朝”，因为它标志着权力从贵族阶层向中上阶层的转移。相应地，这位法国的新君主—他也将是法国最后一位君主—被称作法国人的国王，而不是法国国王。这个称呼是为了强调路易·腓力至高无上的权力来自人民。

路易·腓力本人当然不是什么资产阶级，除去他的贵族血统不谈，他也是王国中最富有的人，但是，他育有8个子女，有着居家男人那种朴素的生活方式。年轻时，在1793年开始流亡之前，他曾与革命军并肩作战。而如今已经57岁、不再年轻的路易·腓力，身上留下了长年客居静谧的英格兰特维克纳姆地区的烙印。与查理十世相比，随和的路易·腓力明显不那么具有对抗性，而且更加聪明。路易·腓力依赖自己的支持者，就像接受一个合理的妥协方案一样。但是，对共和党人、正统王朝拥护者与波拿巴主义者来说，路易·腓力并不是合理的妥协方案。共和党人觉得自己被打劫了；正统王朝拥护者，即从前的保皇党人，视路易·腓力为篡夺者；而波拿巴主义者的反对在1840年拿破仑的骨灰被运回巴黎荣军院之后变得更强烈了。

第一个恶兆就是1831年的里昂丝织工人起义。它因成为法国第一次工人阶级起义而闻名于世。起义者占领了里昂，随后又被军队用大炮残酷镇压，双方均有许多伤亡。在这之后是巴黎的共和党人起义，它被路易·腓力亲自指挥的军队平定了。查理十世的儿媳贝里公爵夫人当时正好怀有私生子，她策划了一场无能得令人发笑的正统王朝拥趸的起义。科西嘉岛共和党人菲埃希在1835年刺杀国王未遂—这是在路易·腓力统治时期七次暗杀企图中的第一次—导致法国实行了一系列遏制措施。这些措施充分维护了法国的社会秩序，使政权能从容应对另一场失败的起义。这次起义是由拿破仑的侄子、未来的拿破仑三世—

路易·拿破仑所领导的。他立刻就被投进了监狱。

当时的法国首相是冥顽不灵、思想保守的弗朗索瓦·基佐（François Guizot）。这位历史学家在7岁时就见证了历史：当时他的父亲被国民公会送上了断头台。这段经历无疑引发了他对民众起义的恐惧，以及对建立在有限选举权基础上的英国君主立宪制的仰慕。他今天为人称颂的事迹有两件：一是让法国人通过工作与节俭走上致富道路，“充实自己”；另一件事就是他在全国建立起国家小学体系，它不是义务制或免费的，但是廉价且日益为人们接受。因为，人们认为，在面对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时，教育是有用的。在这个依然保留了旧体制形式的农业社会里，法国的变化来得并没有英国那么快。虽然法国在1842年通过了一项建立铁路网的野心勃勃的法律，但计划只实施了一部分。法国工业仍屈居农业之后，而且银行体系发展依旧缓慢，以至于法国无法享受到银行体系将巨额资金投入到新风险投资或重要公共工程获得的收益。鉴于此，再加上开始下降的出生率，到19世纪末，法国的相对实力被极大地削弱了。法国已经开始落后了。

虽然路易·腓力成功地避免了法国与其他欧洲列强之间的战争，但这需要以遭受来自英国的大量侮辱为代价。英国不允许新独立的比利时选定一位法国国王，也不让法国插手解决埃及—土耳其争端。因此，路易·腓力虽成功地与英国君主建立了友好关系，但这在法国国内并不受欢迎。他在阿尔及利亚也陷入了困境，那里的一位年轻宗教领袖发动了一场长达7年的圣战。不过，路易·腓力还是在象牙海岸与波利尼西亚岛为缩小版法国殖民帝国稍微增加了一些领地。然而，自1846年起，庄稼歉收、需求下降，引发了失业现象，工厂中出现了蓄意破坏活动，大饭店也遭洗劫，由此引发的经济衰退给路易·腓力的统治带来了沉重打击。所有这一切，加之如某位公爵谋杀了自己妻子这类刺激性的贵族丑闻，毫无疑问激起了来自各方的政治反对，尤其是如今因为国王禁止使用“共和党”这个说法，而被称为“激进派”的共和党人，一直都通过诗人拉马丁与历史学家米什莱雄辩的声音，开展活动，争取扩大选举权。正是国王缺乏远见地禁止了1848年2月22日[15]举办的宴会，导致1848年法国革命爆发。

禁止宴会的举措引发了2月22日学生在先贤祠前的抗议活动。工人们迅速加入其中，抗议队伍由此壮大起来。傍晚时，街头一片混乱。次日，路障被紧急立起，军队介入以恢复社会秩序，然而国民卫队也要求改革，遂倒向了起义者。路易·腓力免去了基佐的职务，但未能找到新首相。当晚，军队向试图围攻外交部的起义者开枪，导致52人死亡。巴黎全市迅速立起了成百上千的路障。路易·腓力得出了显而易见的结论，轻车熟路地回到了英格兰，走上了众多法国国王逃亡的

老路。法国人民只用了3天就结束了法国的君主制。

过去30年的政治变革自然反映出了法国文化中深刻的根本性变化。这是浪漫主义的时代。浪漫主义是一个复杂的欧洲现象，它来自知识分子与艺术家普遍的文明危机感。中世纪时板上钉钉的事情，被启蒙运动推翻了，关于理性与博爱的假定也被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的暴力破坏了。基督教国家的统一体被互相竞争的国家所组成的新欧洲取代，每个国家都试图用具体术语来定义自己的身份—德国是浪漫主义这个术语的发源地，德国浪漫主义者反抗法国新古典主义文化，试图建立回归中世纪的独立日耳曼传统。在这些主要来自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存在着一种广泛共识，即在社会、道德与哲学秩序普遍缺失的状态下，每个人不得不依靠自己。在一个多余的世界里，在一个正统思想开始梦游，仿佛什么都未发生过的世界中，人们的不合时宜感可能会引发对“完整”的模糊渴望（德语的“Sehnsucht”），人们或是像华兹华斯那样回归自然，或是富有想象力地逃往中世纪幻想，或是效仿卢梭，在自我的神秘隐蔽处寻找真理。当然，存在着一种谄媚的悲剧理念：如果诗人被迫生活在社会边缘，那是因为他是一个天才。但是，如果说阿诺德·豪泽尔（Arnold Hauser）的观点—所有“对现实的逃离”都基于“对当下及世界末日的恐惧”—合情合理的话，那么我们也理应赞同雅克·巴尔赞的观点，他认为“问题在于要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建起一个新世界”。而且，许多作家也确实积极投身于公共事务之中。

夏多布里昂的文字可谓诠释“世纪病”的绝妙之音。被市侩的社会边缘化的天才在《勒内》之类的散文作品中表达了他的不满，但是他也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担任了外交大臣一职。拉马丁在他1820年发表的《沉思集》中，以一种更加亲密、个人化的语调，在自然中哀伤地寻找意义与信仰。他对死亡与命运的执念源于不久前死于肺痨的爱人茱莉·查理。这让我们回想起浪漫主义的焦虑不仅来自社会、政治剧变，还来自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人们可以用整整一本书来讲述肆虐于19世纪法国作家群体中的肺结核与性病。然而，这都没能阻止拉马丁追求他的外交生涯，也没能阻止他短暂地成为1848年法国革命后组建的临时政府的首脑。

不过，在忙碌的浪漫主义作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维克多·雨果了。他是由强烈自负心理铸造的伟大天才。让·谷克多对此恶作剧般地开玩笑说道：维克多·雨果是个疯子，他似乎以为自己是维克多·雨果。雨果极其多产，他丰富的想象力与同理心使其能将深刻的个人情感普遍化。他不仅是文学形式的大师，还是一位造诣颇深的艺术家。雨果1830年的歌剧《欧那尼》展现了不可思议的西班牙困局最终被抒

情主义所拯救。这部歌剧中最出名之处是把僵化的新古典主义教条击得粉碎，而且塑造出了浪漫主义英雄的形象。雨果笔下的浪漫主义英雄是黑暗且不可知命运的苦命玩物，被某些致命的内在力量驱使着，走向未知的未来。然而，人们称赞雨果为拿破仑三世的共和党对手，他1885年的葬礼让巴黎为之停摆。重要的浪漫主义者确实积极地入世了。

即便如此，正如人们可能预料到的，正是小说家向我们提供了对他们所处社会的更加全面的描述。而且，正是在此处，浪漫主义开始与现实主义融合在一起。雨果本人通过他的政治小说《悲惨世界》记录了这种过渡。司汤达是外交官、艺术评论家亨利·贝尔（Henri Beyle）的笔名。在他的著名小说《红与黑》中，司汤达以冷漠、讽刺的笔调，向我们描绘了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社会图景。但是，他故事中的主人公于连是出身卑微的浪漫主义局外人。由于拿破仑“向所有人才开放”时代的终结，于连的满腔热情也无处安放。在这个唯等级特权与财富至上的冷若冰霜的社会里，唯一的选择是军队的红色制服或是如今全能的保守主义教会的黑色制服。穿上红色制服，如今再也没什么光荣的战斗可打了。最终，于连拒绝接受这两种选择，决定采取非直接的方式—自杀。

但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小说家是（在某种程度上有“法国狄更斯”之称的）异常多产的奥诺雷·德·巴尔扎克。他常常负债并不舍昼夜地工作。他在大量的系列小说中创造了一个完整的平行世界，最后他将这些小说结集出版，书名是《人间喜剧》。他有着丰富的浪漫主义想象力，周围的世界令他着迷，有时还让他感到恐惧，因为这个世界经历了错位的社会与道德变化。作为一个来自图尔市的乡巴佬，一个在某些方面永远单纯的人，巴尔扎克被巴黎的生活迷得神魂颠倒—在讲述为父爱殉道的小说《高老头》的开篇，他提醒读者，不了解巴黎的人也许看不懂这个故事。巴尔扎克不仅可以通过观察到的细节，还能通过强大的具有放大效应的人物塑造，创造出一种强烈的现实感。例如，巴尔扎克将高老头与反面人物伏脱冷这些角色上升到了伟大文学象征的高度。而且，在通往即将到来的现实主义的路途中，他已经到达了中点。他意识到，人物也许是由社会环境与经济状况所决定的。

然而，要了解实际接触风云变幻的世界时所遇到的困难，也许最好去阅读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作品。卡尔·马克思给圣西门、傅立叶与蒲鲁东起了“空想社会主义者”这个绰号。正如一项关于乌托邦的重要研究所描述的那样，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表层政治没什么兴趣，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去发现人性的内核，以及用现实的硬块—人的理

性、本能、欲望、需求与能力—去搭建新的社会结构”[16]。诚然，他们是处在相互竞争机制之中的不同的人。圣西门有趣且富有魅力，他游历很广，发了财又全都输光了，后来做了当铺职员；傅立叶是个阴沉、痴迷于独来独往的人，他每天都在正午时分，守候着一位百万富翁，等他出现后支持自己的各项计划，其中有个好点子是把柠檬酸加到大海里，把海水变成柠檬水；蒲鲁东是个独立、迷人的无政府主义者，他的名言是：“所有权就是盗窃。”

虽然他们都认为在虚伪的社会里，人们无法成为真正的人，但他们的解决方案大相径庭。圣西门设想了一个理性、合作型的工业秩序，人们将按照一种“新基督教”教义生活—然而他的追随者后来因为建立自由性爱集群而闹出了丑闻，就像20世纪60年代的一些美国案例那样。傅立叶想要根据成员爱好对他们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建立理想社区。蒲鲁东保留了一夫一妻制家庭，但他梦想打造一个由平等的人组成的成熟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政府将变得多余。如果此时此刻他们的观点看起来有些滑稽可笑的话，我们也应该承认，圣西门的追随者在银行业与工程学领域成了有影响力的人，而傅立叶的思想也开花结果了，尤其是在合作运动的发展中—即便这些憧憬不能立即用于1848年革命。

1848年，欧洲多地发生了一系列革命，但其中不包括英国，因为英国通过《1832年改革法案》扩大了选举权，有效抑制了人们的不满情绪。每个国家面对的革命情况各有不同：在普鲁士与奥地利帝国，人们要求召开制宪议会，而在意大利诸邦，宪政目标与人们抵制奥地利影响的诉求结合在了一起。尽管这些事件是由经济危机引发的，尽管在德国与意大利诸邦的革命中，人们的部分动机是想要实现民族统一，但是，整个欧洲大陆上发生的事情广泛地反映了自由主义中产阶级正在维护、推进他们反贵族势力的斗争，而贵族势力则决意把持住手中的权力。人口在增长，城市规模翻了番。人们获得了一些受教育的机会，而且，随着新闻业的兴起，人们对主宰自己生活的力量有了更多的了解。

如果法国是这次欧洲大陆运动的象征性中心的话，这是由于它的革命传统，由于它在社会与宪政发展方面超前于其他大陆国家。事实上，中产阶级革命的实施当然离不开崛起中的工人阶级的支持，但这种联盟并不容易。实际上，1848年革命—尽管它依然是重要的判例案件—是1830年革命的重演，因为开展革命的人，不一定是享受革命成果的人。

与此相对，得意扬扬的共和派理所当然地迅速行动了起来。路易·腓力一走，他们就在巴士底狱广场宣布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成立，并建

立了临时政府，政府人员不仅包括他们自己的领导人（例如拉马丁），也有社会党人路易·布朗，甚至还有一个名叫阿尔贝的工人。接下来他们做了一些伟大的事，也得到了一些沉痛的教训。他们不仅废除了审查制度，还实行普选权，不过仅限于男性，女人依然被视为法律上的附属物。然而，此举极大地扩大了选举权，选民人数从25万上升至900万。在他们看来，障碍在于大多数选民仍生活在保守主义的乡村地区。结果，在4月的选举中，议院人数的1/3竟然都是保皇派，剩余的则是更加温和的共和派。此外，新政府将每天的工作时间减少到了10个小时，废除了殖民地的奴隶制—这项措施很快被随后的执政者撤销了—还成立了新奇的路易·布朗（Louis Blanc）工场，为失业者提供工作。不幸的是，这些工场运转不良，成了社会党人与政府之间争议的焦点。政府关闭这些工场后，引发了工人在巴黎的反叛，史称“六月起义”。

这次起义及随后令人难忘的血腥镇压，导致近千名士兵与5000名反叛者死亡。大约有15000人被捕，其中5000人被驱逐至阿尔及利亚。审查制度恢复了，共和国失去了初期的纯真。也许情况未必这么绝对，因为“意外后果定律”再度袭来：共和国11月颁布的宪法表明，政府决定效仿美国，通过普选选出一位总统。正如议员儒勒·格雷维（Jules Grévy）所指出的，这种看似民主的做法，将为某位平民主义人物的出现和掌权铺平道路。

随后发生的事，便是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参与普选，并以75%的得票率轻松取胜。然而，在1849年立法选举中，共和派再次败给了君主主义者与其他保守主义者，而后者也再度缩小了选举权，并对教会学校予以资助。而且，路易·拿破仑试图修改宪法，以使自己的任期超过4年之限的行动以失败告终，于是不出所料地在1852年发动了政变，结果导致26000名共和派人士被捕，将近10000人被遣返，普选权得到恢复，全民公投展开—法国又拥有了一位皇帝。

与此同时，其他地区的革命早已被轻松地镇压下去，尤其是在德国。将“六月起义”视为阶级战争第一场战役的卡尔·马克思对1848年年底的结果进行了推测，这点很能说明问题。如果马克思觉得空想社会主义者是浪漫多情的，那么他的循环论证则让他自己看起来同样浪漫多情—他也写过浪漫主义诗歌，而且也只有30岁。马克思下结论道：革命不可能在德国发生，因为德国缺少真正的无产阶级。他认为，如果能将德国与法国革命联系上的话，也许还有一线希望。只可惜英国马上就会入侵德国、粉碎革命。这就需要在一场更广泛的冲突中打败英国人。因此，“1849年的工作事项，”马克思写道，“是由法国工人阶级发动的革命、世界大战。”但是，如果连在德国都不能掀起一场

革命的话，要怎样才能发动一场世界大战呢？分离的国际无产阶级打败协调一致的国际资产阶级的想法，依然处于幻想期。进步是缓慢的，而且它不会由世界大战带来。

拿破仑三世（1852—1870年在位）获得了一些负面报道。正如2008年拿破仑三世诞辰200周年纪念活动中发表的一项对他的重新评估所暗示的，由于1870年法国不敌普鲁士，以及法国失去阿尔萨斯-洛林领土时人们感到的震惊，拿破仑三世的成就被冲淡了，更别说维克多·雨果对他的刻薄轻视了（雨果称其为“小拿破仑”）。当然，在法国的城镇里，人们看不到有多少以拿破仑三世之名命名的街道。然而，与拿破仑三世同时代的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对他的评价颇高，而对其他人而言，他更像是一个谜（包括俾斯麦，他称拿破仑三世为“斯芬克斯”）。他确实是个行走的矛盾体—有着强烈的宿命观却不自信，有人情味但却表面冷漠、躲躲闪闪，谨小慎微却有着浪漫主义的鲁莽轻率，聪明却经常看起来缺乏专注力。这些内在矛盾反映了这个男人在政治策略上的模棱两可。正如另一项关于拿破仑三世的评估所详细阐述的那样，他坚持了圣西门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却假装自己是个至高无上的独裁者。

当然，这种模棱两可是他与拿破仑本人所共有的。因为他的政治计划大体上仿效了他叔叔的方案：他的目标是保持法国的国际地位，促进国内进步，与此同时，在秩序与自由结合的氛围中使左派与右派和解。这意味着由人民直接选举出唯一一个行政首脑，因而这种体制能更好地代表民族利益，而非为地方和小团体发声的议会党派之利益。这种波拿巴主义的结合体在某种程度上让人想起“二战”以来的戴高乐主义，它既希望保护倡导自由主义与社会进步的左翼价值观，也想维系遵循秩序与宗教传统的右翼价值观。当时，四分五裂的法国社会正在经历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要做到以上这点，并非易事。

或许带有些讽刺意味的是，拿破仑三世任期中独裁专制的第一阶段比更加自由的第二阶段要更成功。因为，这个全民公决建立的未来的民主帝国，前10年或多或少是个警察国家，拿破仑三世统制经济的现代化版本收获颇丰。在接下来的20年间，铁路网将增加5倍，使法国变得开放，也带动了钢铁产量。而且，法国通过修建桥梁与火车站，推动了建筑业的发展。理所当然地，这将促成海滨度假胜地，例如多维尔与比亚里茨的诞生。纺织业明显受益于快速的机械化，蓬勃发展的纺织业中心包括里尔、鲁贝与鲁昂。拿破仑相信自由贸易—他在1860年与英国缔结条约，推动自由贸易的发展—也在有着贸易保护主义传统的法国推行经济自由主义。几个大型海事贸易公司应运而生，圣纳泽尔的新港口也建了起来。法国创办了重要的银行，例如里

昂信贷银行与法国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而且，工业与金融的相互作用又催生出了新的、有影响力的有产阶级。他们能够支持一些项目的兴建，例如斐迪南·德·雷赛布（Ferdinand de Lesseps）开凿了苏伊士运河。法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年间几乎翻了一番，巴黎证券交易所也因此忙碌起来。

同样是在此时，在令人敬畏的塞纳区行政长官奥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的指挥下，人们系统性地改造了巴黎，主要目的是拆除贫民窟、修建现代排水系统，打造一座有主要直通道路、能促进商业发展、规划合理的首都。因此，古老的中世纪街道让位于宽阔、笔直的林荫道，这也满足了第二个目标，即让巴黎能够动用骑兵与炮兵，对抗可能发生的叛乱。但是，也存在着实实在在美化巴黎的尝试：布洛涅森林与万森讷森林被划分出来，蒙苏里等公园兴建，歌剧院与一系列公共建筑物被搭建起来。由于这一切，以及公寓楼限高6层的严格限制，我们今天所知的、秩序井然的巴黎正浮现出来。诚然，法国工业革命仍落后于英国工业革命，还存在着极大的不平等，正在崛起的无产阶级正被挤到市郊。但是，1855年与1867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向世界庄严宣告了法国的成功，而巴黎就是法国光鲜的脸面。

巴黎确实再次变得宛如欧洲的智力与文化中心。它反映出的事实是，法国的政治矛盾与经济、社会变革一道，使它自身成为当时社会的典型代表。文化方面，“科学至上主义”的特征日益显著，并意图超越传统的形而上学推断，自行建立起以科学为基础的哲学、历史与艺术。领军人物之一是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人们普遍认为他是社会学之父。他认为，历史要服从一般规律，而通过使用科学方法，人们可以认识一般规律。我们今天也许会对他试图建立一种“人性宗教”，奉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这类人为世俗圣人的做法一笑置之，但是，他的实证主义方法深刻影响了重要人物，例如，生理学家克劳德·伯尔纳与生物学家路易斯·巴斯德。

颇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与文化评论家的作品也反映了孔德的理念。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在他关于法国与美国民主制度的研究中，突破了对历史事件的常规描述，将历史带入了哲学领域。儒勒·米什莱书写出了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学童对自己国家认知的法国历史，他不仅尝试还原过去，还运用了他那相当引人入胜的语言。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所写作的关于科学的未来与基督教起源的作品，同样有助于把握当时的知识趋势，正如依波利特·丹纳在他所著的《英国文学史》中，试图将作家置于他们所处的种族、历史与社会背景中一样。

虽然当时毫无疑问存在一种理想主义的、对科学思维的反抗—这体现在勒贡特·德·列尔（Leconte de Lisle）“为艺术而艺术”的高蹈派诗歌，或是夏尔·波德莱尔让人难忘的个性化诗歌中—但艺术与文化的新口号是现实主义。居斯塔夫·库尔贝借助其油画作品，领导了一场对浪漫主义往昔英勇壮举、对理想主义历史画题材的反叛。例如，在《奥尔南的葬礼》中，他不仅描绘了普通人，还大胆地运用了气势宏伟的湿壁画风格。让-弗朗索瓦·米勒在《拾穗者》这类画作中记录了农民的艰苦工作，而奥诺雷·杜米埃（今天最为人所知的是他才华横溢的讽刺石版画）在《三等车厢》这样的作品中，展示了城市贫困的现状。有趣的是，人们认为这些画作具有道德与政治上的颠覆性，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描绘了“下层社会生活”，更微妙的是，它们破坏了人们的固有观念，即艺术应该关乎浪漫化的、更高层面上的真实。当雷诺阿在画作中描绘了折叠起来的报纸时，真有人写信给报社表达自己的义愤。

毫无疑问，一些作家对科学至上主义的热情，带有某种天真的成分，尤其是自然主义作家群中那众所周知的领袖—爱弥尔·左拉。他相当支持画家马奈与塞尚，他还是塞尚的老校友。左拉将他的一组小说《卢贡-马卡尔家族》（1871—1893年）设计为一场规模巨大、精心编排的“科学”实验，而故事情节是遗传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他所描绘的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腐败堕落在人们看来触目惊心。此外，以矿难为题材、具有强烈感染力的代表性小说《萌芽》，不仅得益于他参观矿井时所做的上万页笔记，还归功于他史诗般的想象力。

但是，对于像尚弗勒里（Champfleury）与莫泊桑这样的作家来说，现实主义更多地基于“人的个性是一种功能，而不是说个性乃天赐之物，因而不可变更”这种理念。而且，个性是个体独特的家族出身、社会环境与历史场景共同作用的产物。正是迫于这种对客观性的需求，有“现代小说之父”头衔的居斯塔夫·福楼拜引入了形式的变体。在此之前，小说还一直是一种混杂的文学形式。作家在小说中不仅以叙述者的身份示人，还是评论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与哲学家。作家在小说中无处不在，很像一位在舞台上、在自己塑造的人物间游走的戏剧家。正是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创造了将作家从书页中一笔勾销的技法，才使故事能够自行其是地铺陈开来。他通过赋予小说明显的独立存在或曰自主性，变革了小说这种形式，而这种自主性正是高雅艺术的特征。

福楼拜辛勤劳作换来了“报酬”—他不得不面对当局将自己定性为伤风败俗的荒唐指控。这多少反映出了知识分子与这个帝国政权之间

的分歧。拿破仑三世多多少少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自1859年起，开始使政府自由化—尽管也有部分原因在于，他已失去了越来越有影响力的天主教的支持，因为拿破仑三世参与了重新统一意大利的斗争，这被认为有损梵蒂冈的利益。拿破仑三世允许政治流亡者回国，赋予人民有限的罢工权，而且渐渐给予立法机关更多权力。直到1869年，拿破仑三世政权已经变成了类似于君主立宪制一样的“自由帝国”。尽管这扩大了议会反对的空间，而且当年出现了多起暴力罢工事件，但是拿破仑三世在1870年4月的公民投票中因变革而获得了绝大多数的支持。他因此可以兴高采烈地宣布，法国的前景一片光明。那么，为什么在随后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政权就像纸牌搭的房子一样倒塌了呢？

原因在于，拿破仑三世在傲慢心理的驱使下，意欲扮演更伟大的拿破仑；作为皇帝，他统揽所有外交事务。而且，他过于听从自己那虔诚但在政治上天真懵懂的西班牙妻子欧仁妮的建议。由于在意大利取得的代价高昂的胜利，以及1853—1856年间并不辉煌的克里米亚战争，拿破仑三世已经削弱了法国军队的战斗力。不过，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损兵折将的原因是霍乱，而不像是英国轻骑兵冲锋队那样，犯下了惊人的愚行而导致了伤亡。拿破仑三世为了迫使拒绝偿债的墨西哥新政府偿还贷款，在1862年突袭墨西哥。这一考虑不周的举动进一步削弱了法军的战斗力。他在战争中陷入困境，而且他通过把自己的候选人送上墨西哥王位，试图将墨西哥变成附庸国。结果，法国在1867年被迫屈辱地撤退了。

最终，在1870年，拿破仑三世自投罗网，走进了令人钦佩的普鲁士首相俾斯麦设下的巨大陷阱之中。在这之前，法国因害怕被包围，反对提名普鲁士王国国王威廉一世的亲属成为空降的西班牙王位继承人。事实上，威廉一世已放弃了这次提名，给俾斯麦发电报就是为了说明此事，并授权自己的首相将决定公之于众。但是，俾斯麦狡猾地做了手脚，让它看起来像在说，国王拒绝接见法国大臣，这使得这封著名的“埃姆斯密电”（Ems telegram）看上去像是对法国的公然侮辱。因此，在皇后与公愤的引导下，拿破仑三世对普鲁士宣战。尽管拿破仑三世明显已上了年纪，还患有痛苦的胆结石，他还是御驾亲征了。

教训是惨痛的。法军在墨西哥远征后没有经过重组，动员起来很慢，且总参谋部存在分歧；普军克虏伯钢炮远胜于法军铜炮；普军在人数上远超法军，两军人数之比近乎2：1；而且，敌军战术也更加复杂。古怪的法国元帅弗朗索瓦·巴赞在梅斯被围，试图为他解围的拿破仑三世自己也被困在色当。为避免重大损失，拿破仑三世与他的部队

一起投降了。普法战争的结果如闪电般很快就见分晓，法国不光彩的失败震惊了欧洲，因为，它向世人揭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欧洲大陆上的大国已不再是法国，而是德国了。它也不可避免地让老一套的宪政跷跷板开始运作。因为，来自色当的消息一传到巴黎，共和派议员就宣布成立一个新共和国。但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也许是，在这个四分五裂的社会里，新共和国的开端仍将是血腥的。

第八章

内部变质的第三共和国

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以所有人种为基础、代表着全体人类的共和理念，如今转变成了关乎某个国家或曰“种族”的、反对外来者的排他主义概念。

正如法国人会提醒你的那样，“巴黎不是法国”（n'est pas la France）。即便到了今时今日，巴黎与外省之间在政治上往往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紧张态势。正如许多人依然认为的那样，外省才是真正的法国，或曰“深刻的法国”。巴黎引领了自1789年起的一系列革命，结果却发现，正如共和派1849年时被打败那样，信奉天主教的保守乡村地区并未跟随其后。巴黎与法国其他地区之间关系的决定性时刻将于1871年，在拿破仑三世于色当屈辱投降后的几个月里，出人意料地出现。

在这个新的第三共和国于9月4日宣告成立后的两周内，普鲁士军队便兵临巴黎城下，将其团团围住。但是，政府决定继续战斗，由此还引发了一件趣事：内政部长莱昂·甘必大（Léon Gambetta）乘坐热气球逃出巴黎，前往图尔市，并在那里集结了一支缺乏训练，由60万人组成的新军。但是，巴赞元帅以反对共和政府为主要原因，在梅斯率领他的18万兵士投诚了。由于法军未能打破普军对巴黎的束缚，法国初次提出了媾和倡议，但遭到俾斯麦的拒绝。寒冬腊月里，巴黎人缺薪少煤，不仅遭到轰炸，还沦落到只能吃猫、狗、老鼠，甚至巴黎植物园的两只可爱大象卡斯托尔与波琉刻斯的地步。12月与1月，法军接连败北，迫使政府撤退到波尔多，而对于法国而言，奇耻大辱是普鲁士人如今已在凡尔赛宫安顿下来，之后于1871年1月18日，他们在路易十四的镜厅内宣布新的德意志帝国诞生，日耳曼民族正式成为神圣的统一体。此时，巴黎大部分地区成了一片废墟。

然而，噩梦才刚刚开始。因为，作为必将到来的投降所带来的条件，俾斯麦坚持要求法国选举出新政府。此举表面上是为了使两国的协定具有合法性，但无疑也是因为俾斯麦已预料到了选举结果—保皇派大获全胜，击败了共和派。这加深了在巴黎被围期间自行管理城市的巴黎人的背叛感。他们对停火条款感到愤愤不平，因为条款不仅割让了阿尔萨斯全省和洛林大部分地区，赔款50亿法郎，还包括了首都

裁军，而巴黎的军队之前抵抗住了长期的围城。随着新选举的议会在凡尔赛宫正式就职，人们开始担心王室复辟的问题，而且，由于许多家庭在巴黎被围期间唯一的经济来源—国民卫队的军饷被撤销，反普鲁士、反政府的情绪高涨。因此，3月18日，当政府军进城，拆除蒙马特尔高地上之前在巴黎被围期间用作防御的大炮时，因遭到武装反抗而被迫撤退。战胜国普鲁士如今可以得意扬扬地近距离观察凡尔赛的法国政府与巴黎市政府间在接下来的10周内手足相残的僵局，而巴黎市政府在他们的首都成立了巴黎公社。

巴黎公社主要是人们对这些非比寻常境况的自发反应。虽然巴黎公社没有巧妙的规划，但它的驱动性思想—继续战斗、维护社会公正，反对保皇主义与教权主义的决心—因巴黎之围与政府投降而变得更加坚定。共和党、社会党和无政府主义者在一场非凡的民主自治实验中与国民卫队成员、普通下层中产阶级和巴黎工人阶级并肩作战。整体上来说，进行这场实验的领袖—瓦尔兰、茹尔德、瓦扬，甚至著名的路易斯·米歇尔—都是严谨、温和，且尊重财产权的。他们成立了代议制组织，宣布政教分离，在废弃工厂中建立起了工人掌握控制权的体系，并设想了由与他们公社一样的自治公社所组成的联邦制法国。而且，在几个其他城镇中，确实建立起了类似的公社。但是，它们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毫无疑问，具有浓重保皇派色彩的新共和国终结掉这个来自其首都的、令其蒙羞的反抗组织，只是一个时间早晚问题而已。

怀着将所有这些没完没了的“革命惹祸精”在巴黎彻底清除的强烈愿望，共和国在临近5月底的“血腥一周”突然派出了10万兵力。虽然巴黎公社社员在激烈巷战、处决了将近500名人质，并火烧杜伊勒里宫与巴黎市政厅之后，面临着战败的危险，但真正令《泰晤士报》记者感到震惊的是：“凡尔赛政府军在不人道的复仇心理驱使下，在最后6天里，射击、刀刺囚犯、妇女与儿童，将他们开膛破肚。就我们所知，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之举。”

正如历史学家雅克·鲁热里（Jacques Rougerie）所草拟出的数据，这场有计划、有步骤的杀戮，与大规模的简易处决，最终导致20000至25000位巴黎公社成员死亡，与之相对的是，政府军死亡人数不到1000人。此外，逾43000人被俘，他们中有上万人在接下来的5年多里上了军事法庭。判决结果从处决、终身服苦役，到流放至太平洋上的新喀里多尼亚，或者固定期限监禁不等。新共和国显然发怒了，以至于它使整整一代的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变得脆弱至极。

长久以来，对法国人来说，巴黎公社更像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家族秘密，正如2001年时，巴黎一处小广场最终以巴黎公社命名所引发的

纠纷所显示的那样。巴黎公社所带来的痛苦不仅是由遇害者人数造成的，还因为这场内战对普鲁士人而言是场盛宴，它意味着共和国杀害了共和派。位于拉雪兹神父公墓（Père-Lachaise Cemetery）中的巴黎公社社员墙仍是左派的朝圣之地，因为那是巴黎公社社员做出最后抵抗的地方。左派一直憎恶圣心堂的建造所包含的炫耀胜利之意味。这座巨大的白色巴西利卡（basilica）风格教堂俯瞰巴黎战场遗址—根据1873年政府法令的说法，这是“为了赎巴黎公社社员犯下的罪恶”。更重要的也许是在巴黎公社带来的伤痛之外，围绕在它周围的疯狂谣言与禁忌。巴黎公社真正的政治意义是有待商榷的。如果巴黎公社并不如当时保守派报纸所刻画的“红色幽灵”形象那般嗜血，那么它是如马克思在事后所说的那样，是“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吗？又或者，它是像恩格斯在1891年时所评价的那样，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象？巴黎公社为什么会失败？

事实上，马克思后来改变了他对巴黎公社典范价值的判断。这是必然的，因为这一事件发生的情境是如此特别，以至于无法重现。更重要的是，巴黎公社空想社会主义的“地方自治主义”及其民主共和的多种形式，它对私有财产的尊重及其联邦制思想，与后来的共产主义还有一段距离。如果它后来被法共兼并了—后者每年仍会在五一国际劳动节组织一场前往巴黎公社社员墙的朝圣之旅—这更多的是出于情感与政治宣传的原因，将政党置于可追溯至1789年民族革命的传统之中，而并非因为它符合意识形态的正统性。这是一场国家悲剧，也许是由此产生了革命赞歌《国际歌》，以及那首感人的《樱桃成熟时》。然而关键在于，法国社会党人，例如未来的政党领袖让·饶勒斯，并不认为巴黎公社是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范本。

与其说巴黎公社是1917年俄国革命的先兆，不如说它是始于1789年的一系列革命中的最后一场，是雅各宾派传统的最后一搏。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敏锐提出的观点：“政府实力因经济现代化大增，其政治权威也因男性普选权而得到加强。”巴黎公社失败了，因为在当时欧洲众多的国家之中，乌托邦式的城邦国家不能战胜统一的民族国家—即使后者是一个经受了战败屈辱的国家。

第三共和国出师不利，如今不得不扎下根来。但是，它仍然没有制定宪法，议会也是由保皇派与波拿巴主义者所主导的。长期以来理事的阿道夫·梯也尔，如今通过贷款筹集了足够多的资金偿清赔款，摆脱了德国占领者。但是，当他提议制定共和国宪法时，他便被排挤出局了。在君主主义者的支持下，帕特里斯·麦克马洪（Patrice Mac Mahon）元帅被任命为总统。他是具有爱尔兰血统的贵族，之前镇压了巴黎公社运动。但是，正如梯也尔所指出的那样，有个小问题：王

位只有一个，但王位觊觎者却有两名—波旁家族主支的尚博尔伯爵与旁支的巴黎伯爵。一场漫长、滑稽的皇家芭蕾舞自此拉开帷幕。最后他们决定，鉴于尚博尔伯爵没有子嗣，由他先登基，在他死后再将王位传给巴黎伯爵。只可惜尚博尔伯爵坚持使用波旁王室的白旗，而他的奥尔良派对手则坚持用三色旗。由于象征性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所以最后全盘计划都虎头蛇尾地失败了。最终，在1875年，即使设立了强权总统的新宪法为法国向君主制的转变预留了空间，但是法国仍然在默认状态下成了一个共和国。

共和国马上就会得以巩固，因为在次年的立法选举中，共和派获得了2/3的席位。然而，麦克马洪倒行逆施，任命强硬的保皇派人士—布罗伊公爵为首相。这位公爵主张推行牧师的保守“道德秩序”运动，甚至于禁止在官方文件中使用“共和国”一词。不过，在随后满怀愤懑的选举中，共和派再度获胜。1879年的上议院选举情况类似，麦克马洪不得不向温和派的共和党人儒勒·格雷维做出让步，而总统如今变成了务实的律师莱昂·甘必大。甘必大虽不赞同巴黎公社的暴力行为，但他对被驱逐者实行了大赦。随着政府所在地由凡尔赛宫迁回巴黎，随着《马赛曲》成为法国国歌，看起来，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90年之后，共和国在与王室之间的漫长战争中最终胜出了。

接下来，直到奢华的1889年巴黎世界博览会盛大举行前的10年间，法国确实处于一段团结时期。为了向共和国致敬，道路更名，象征共和国的女性形象“玛丽安娜”的雕塑也被立了起来，而自由女神像则被馈赠给了美国—虽然有些晚—庆祝法国自己革命胜利满百年。更重要的是，法国也出现了立法改革。它们将极大地塑造法国社会，影响至今。共和国开始推行新闻自由、集会自由的“共和自由”，并赋予人们离婚权，实行市长选举。人们也有权组建工会，但前提是它们须保持非政治属性。

最重要的是，教育改革出现了。改革与当时最知名的共和党人朱尔·茹费理有关。鉴于世俗的共和传统与天主教君权传统之间存在激烈斗争，这些教育改革在独特的法国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法国推行免费的初级义务教育，并为男女两性建立了培训教师的师范学校，后来人们还基于宗教信仰自由，在经历了一番艰苦斗争后，废除了所有宗教教育。这是一场根本性的变革。政府通过从教会手中拿走对孩子（尤其是对女孩）进行基础教育的控制权，以共和国的长期影响取代了教会的长期影响，这将会为政府提供持久的公众舆论基础。

在1878年柏林会议上，法国重新被纳入国际联合之中。茹费理通过殖民扩张，着手增强法国实力，提高法国威望。法国的殖民扩张不仅发生在非洲（法属西非、法属赤道非洲、突尼斯与马达加斯加），

还通过占领印度支那半岛，延伸到了亚洲。而且，巴黎又一次近似欧洲的文化中心了，尤其是新涌现出了一批印象派画家，他们创作出了今天依然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艺术品集合。只需看看日历、巧克力盒甚至是T恤衫，我们中的大多数都能认出以下这些：莫奈的《睡莲》或是《圣拉扎尔火车站》；雷诺阿大量的裸体画，或是《煎饼磨坊的舞会》这类作品中欢快的户外跳舞场景；马奈带有挑衅的《草地上的午餐》所描绘的一个坐在两个衣着光鲜的男人之间的裸女，或是他那引人入胜的《女神游乐厅的吧台》；埃德加·德加的芭蕾舞者，或是他那透过锁孔般的视角描绘出的裸女洗浴图；保罗·塞尚的水果静物画，或是笔力遒劲的《圣维克多山》《阿讷西湖》；还有英国画家阿尔弗雷德·西斯莱的《路维希安的雪》，卡米耶·毕沙罗的《蒙马特尔大街》，或是保罗·高更在后印象派时期对具有异域风情的塔希提妇女的研究。这是将巴黎及法国乡村的意象永远留存于全世界的想象之中的一些画作。

那么，这些艺术家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呢？他们的手法又有什么独特之处呢？在19世纪60年代，当他们中的许多人初出茅庐时，发现自己的作品无法得到以法兰西艺术院为代表的官方机构的认可。艺术院是传统绘画标准的捍卫者。而且，在它的新作年度展示会上，被评委会选中的主要是历史题材画作或名人肖像画，同时作品还要具有古典的视角、相对一丝不苟的成品。当年轻画家们发现，他们大多数作品都被一年一度的沙龙画展拒之门外时—毕竟，展览为画家们提供了扬名立万、获得工作委托的机会—他们就团结起来，单独展出自己的作品。他们首次这样联合展出画作是在1874年，后面还会有7场，参展人并不总是同样一批艺术家。这一活动一直持续到1886年。虽然马奈与德加都很有钱，但大多数艺术家却不是这样。而且，直到19世纪80年代，特别是当艺术市场开始向美国买家开放时，他们才真正尝到成功的滋味。

那么，这种风格有何新颖之处呢？与哥特式一样，印象派（Impressionism）这个术语原为带有讽刺意味的侮辱性用语。具体说来，正是克劳德·莫奈的画作《日出·印象》引人做出了如此评价。这类画作确实旨在给人以某种印象，或者说，创造出某个场景在瞬间给人留下的印象（其中常常涉及运动），而非按照一种精心设计好的方式来处理。他们选取的是紧跟时代的主题—要么是城市场景，要么是乡村风光—而且，即使他们要在画室内做最后的加工，他们也会选择先在室外工作，因为他们的关注点是自然光在物体上的移动。这种方式决定了他们的技法：画笔疾飞、浓墨重彩，稍稍混合了新近上市的商用颜料，因而用色大胆，他们还常常通过颜色并置创造透视效果。由于他们感兴趣的是随着时间推移，光所产生的变化，以至于著

名艺术史学家伯纳德·多里瓦（Bernard Dorival）将他们的活动称为对现实有条不紊的科学分析。实际上，尽管他们接触到了当时流行的“科学至上”，但他们用当前的感知理论，“消除视觉上的理智”以远离错误的透视，以及德国物理学家亥姆霍兹的色彩理论来为自己的方法辩护。

然而，这里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悖论。科学暗示着客观性，而他们的方法显然是高度主观的。但是，这是否就认可了反方的指责，即他们的作品是中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呢？这些画作之所以受人欢迎，是不是因为他们非常漂亮，而正如马克思主义评论家T. J. 克拉克所言，印象派是“中产阶级的内部风格”呢？的确，这些画家忽视了1870年的战争与巴黎公社运动。他们对阶级的唯一指涉，就是讽刺地将时髦男人与妓女放在一起，而且除了毕沙罗之外，很少有人描绘贫困的场景—单就主题而言，印象派展现的是反映中产阶级舒适生活的梦幻般的视域。但是，如果这么说，就忽视了更重要的考量，即随着摄影术开始发挥以往绘画记录现实的功能，绘画正在发生本质性变化。它恰好正在变成个人主观性的表达—它是对真实的反映，而不是对真实的客观再现。通过塞尚与后印象派画家们，印象派直接通向了野兽派与立体派。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些画家正在转向一种欧洲数百年间都没有见过的最风格化的艺术。这种艺术最终将带来抽象艺术理念，在抽象艺术中，绘画将成为它自身的主题。

以上所说的这些，与观众人数将近3000万的1889年巴黎世界博览会并没有多大关系。巴黎世界博览会是为纪念法国大革命100周年，为庆祝这个确立已久、文化繁荣的法兰西共和国而举行的活动。参观者从新建成的、令人震撼的埃菲尔铁塔之拱门下鱼贯而入。埃菲尔铁塔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而且它在设计时并不是作为永久性建筑而存在的。他们惊叹于机械馆中的各式发明，他们也喜欢“蛮荒西部秀”与“黑人村庄”。“黑人村庄”里有来自国外的殖民地人民的营地，其中，爪哇音乐家与舞者让德彪西着了迷。游客们无疑也对奥斯曼男爵设计的美丽林荫大道赞许有加，他们还体验了音乐厅与城市中的其他乐事。在离开时，他们也许感觉法国不仅已经恢复了它的从容与声望，还前途大好。

事情并没有那么容易。法国不仅要在日益倾向国家主义的欧洲保护自己的利益，还要通过克服地方性内部分歧来维护国家的统一。事实上，共和国刚刚勉强经受了一场来自平民主义运动的挑战。这是由一名可怕的“骑白马的将军”[17]领导的波拿巴主义，或曰前法西斯主义类型的运动。不过，该事件中的这位将军拥有一个并不吸引人的名字，那就是乔治·布朗热（Georges Boulanger），而且他的马是黑色

的。布朗热是个英俊潇洒、野心勃勃的煽动者，曾任战争部长。由于他改善了部队的状况，并且在一位法国边防战士被当作间谍拘捕、关押在德国时，他对德国发出了沙文主义式的威胁，因而广受民众爱戴。然而，布朗热由此得名“复仇将军”，而德国则动用了预备役军人，于是他被免去大臣职务，派驻到远离危险的克莱蒙费朗去了。

尽管如此，在法国，布朗热已然声名显赫—围绕着儒勒·格雷维总统的女婿贩卖荣誉勋章而展开的丑闻也提升了他的受欢迎度，总统后来被迫下野—如今，他基于自己的“三复”主义（three Rs）提出了一种政治方案：“复仇”1870年的失败、“复议”宪法，以及“复辟”君主制。这个被赞为应运而生的人，在1889年1月被选举为巴黎议员，并被推向了一场政变。可是他临阵退缩，逃跑了。当政府签发拘捕令时，他最终逃到了布鲁塞尔。两年后的布鲁塞尔，布朗热在他情妇的坟前饮弹自尽。令人不安的是，这个我行我素、外强中干、不善言辞的人居然能获得各方的广泛支持，从君主主义者、波拿巴主义者到极“左”分子。

随着1892年巴拿马丑闻的爆发，变化无常的舆论大杂烩将引入一个新的维度。之前开凿了苏伊士运河的斐迪南·德·雷赛布担任运河董事长达13年，该公司旨在通过开凿运河，连通大西洋与太平洋。这项工程吸引了约80万名法国投资人，但是环境所带来的困难重重，导致了大量工人死亡。1892年，一些大臣被指控在工程伊始从德·雷赛布处收受贿赂，而成百上千的议员，其中也包括几位大臣，被控告从巴拿马运河公司收受贿赂并向公众隐瞒损失的惨重程度—这意味着人们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继续着投资。

这确实是一个重磅丑闻，因为它不仅让投资者们亏损了逾10亿法郎，而且还涉及如此多的要人—包括激进党领袖乔治·克里孟梭、亚历山大·埃菲尔与德·雷赛布本人。议会委托社会党领导人让·饶勒斯就此事展开调查，他谴责这是国中之国的交易。这个结论后来也得到了证实，因为基于利益而非道义，那些被告中很多都获得了无罪开释。因此，尽管丑闻并没有威胁到共和国的生死存亡，但从某个角度来看，它更具破坏性，因为它表明政府是腐败的。所有这一切，尤其是代表运河公司行贿的两个男人都是有着德国式名字的犹太人，对极度反犹的新闻工作者爱德华·德律蒙（Édouard Drumont）来说，这无疑成了他最爱的报道素材，他之前已经在1886年出版了《法国犹太人》（*La France juive*）一书。法国正在为更加轰动的“德雷福斯事件”之丑闻做准备。

1894年，人们发现法国的军事机密被人传递给了德国大使馆，而总参谋部上尉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成了怀疑对象，因为他出身阿尔萨

斯一个富裕的犹太裔家庭。德雷福斯在军事法庭上受审时，有人阻止他的辩护律师拿到关键性文件。另外，笔迹鉴定专家也不同意其他人的观点。但是，德雷福斯还是被流放到法属圭亚那外海的魔鬼岛，被单独监禁在一个只有4平方米的小屋里。两年后，英勇却相当单纯的反间谍处处长皮卡尔中校发现，元凶其实是挥霍无度的军官埃斯特拉齐少校。然而总参谋部竟将皮卡尔调往突尼斯作战部队以掩盖此事。当真相泄露，总参谋部不得不审判埃斯特拉齐时，没过两天，埃斯特拉齐就被无罪释放了。

当真相呼之欲出时，为维护军队与总参谋部的声誉，谎言越滚越大。爱弥尔·左拉在《震旦报》上发表了著名的系列指控，标题是《我控诉》，对此，政府以诽谤罪起诉左拉，迫使他流亡一年以躲避牢狱之灾。此外，接下来皮卡尔自己也站在了被告席上，结果发现，控告德雷福斯的文件系亨利少校伪造，而亨利少校在坦白后自杀了。即便当1899年德雷福斯被带回法国接受案件再审时，他仍再次被判有罪，但获得特赦—这是为挽回面子，也是为了在下一次世界博览会，即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前，让这场可耻的失败从世界报纸的报道中消失。又过了6年，德雷福斯才最终被宣布无罪。重获自由后，他恢复了名誉与军籍，与他那反犹的同僚军官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同服役。对埃斯特拉齐的审判则截然不同。军队慎重地给他发放了退休金，他继续在自我流放地—英格兰领取这笔钱，直到1923年去世。

除法国人外，其他人也许会惊诧于这桩可耻事件所引发的充满敌意的仇恨，这也许确实是爱弥尔·左拉神秘之死背后的原因。诚然，1870年战败确实让法国舆论遭受了精神创伤，而且法国也是一个乖张易怒的社会—就在德雷福斯事件登上报纸头条前的数月，共和国总统玛利·弗朗索瓦·萨迪·卡诺（Marie François Sadi Carnot）被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刺杀了。1898年选举反映了舆论的分歧：人们选举出了254位温和派共和党人、80位保皇党人、74位激进社会党人、57位社会党人、15位民族主义者，以及包括德律蒙在内的4位著名反犹人士。就连社会党也被分裂成了两派。但是，在这表面的混乱之下，是法国国情所独有的广泛且严重的民意分歧。反之，在信奉新教、较早前就杀死了国王的英国，广泛的政治分歧有着相当直接的阶级基础。在此基础之上是宗教或反教权思想。后革命时代那多灾多难的一个世纪中，宗教思想与反教权思想愈演愈烈，并趋于两极化。在教会遭到与不可知论相关的社会理论以及达尔文主义的挑战时，德雷福斯事件便成了就民族身份问题所展开的持续冲突的一部分—在20世纪30年代与德国占领时期，这种冲突会一再出现。

事实上，教会本身并未就争端表明官方立场。而且，教皇利奥十

三世比他的前任更清醒地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在不断变化的。因此，他在1892年时建议法国教会接受共和国，试图维护宗教。但是，教会的态度受到新创办的圣母升天会报纸《十字架报》的鼓舞，对教皇的建议不大在意，还与保皇派及军队联合了起来（军队中大部分高级军官接受的教育都来自耶稣会士），共同对抗反教权的共和派、社会党与其他德雷福斯的辩护者们。这带来了两项持久的变化：一是知识分子的参与，尤其是在德雷福斯一方，从左拉到马塞尔·普鲁斯特，知名人士一一参与了进来。这为后来的知识分子树立了榜样，并将成为法国政治生活的显著特征。二是“国家”概念的转变，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以所有人种为基础、代表着全体人类的共和理念，如今转变成了关乎某个国家或曰“种族”的、反对外来者的排他主义概念。因此，民族主义成了一种右翼价值观。1899年，由夏尔·莫拉斯领导的反对共和、民族主义与君主主义的“法兰西运动”（Action Française）就说明了这一点。

作为对“法兰西运动”及当年其他挑衅行为的回应，沙文主义作家、政治家保罗·戴鲁莱德领导了一场未遂的政变，另有人针对总统埃米勒·卢贝发起了身体攻击，还刺杀了德雷福斯的一位律师（以失败告终）。共和派进行了反击，为了阐明自己的目标，他们组建了单独的激进社会党与单独的法国社会党—后者在让·饶勒斯的领导下，已开始远离马克思主义，朝着改革主义、人文主义的方向前进—还组建了左翼集团政府以捍卫共和国。它关闭了圣母升天会及其报纸，并继续完成政教分离。

政府不再付给教会薪水，不论是天主教徒、新教徒，还是犹太人。教会将会失去对教育的控制权，公共区域将不再实行宗教教育。但是，宗教信仰是一种权利，信仰自由受到保护。相当保守的新教皇庇护十世认为，分离是“对上帝的严重污辱”。但是，直到1905年，仿佛是1789年大革命自然而然产生的结果般，法国变成了世俗共和国。

只有在灾难后回顾往事时，人们才怀旧地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那些年称为“美好年代”（La Belle Époque）。通过马塞尔·普鲁斯特有关正在消失的上层阶级的作品《追忆似水年华》，美好年代被铭刻在了法国人的记忆之中。从表面上看，那些年确实是好时光。法国毕竟是当时世界两大帝国主义强国之一，其前进的脚步可见于路易·布莱里奥开创性地飞越英吉利海峡、巴黎—马德里汽车比赛、电话的日益普及，以及电影制片术的发明之中。即使来得有些晚，法国也正在进入工业革命后期。即使法国在其他科学领域被对手远远超越了，但皮埃尔·居里与玛丽·居里仍然赢得了诺贝尔奖。

最重要的是，由于巴黎是举世公认的世界文化与娱乐之都，它仍

可自视为文明的典范。事实上，由于巴黎有轻歌剧、卡巴莱歌舞表演（cabarets）以及繁荣的高级时装店，它是世界娱乐之都。法国吸引着全欧洲的艺术家蜂拥而至，例如俄国画家马克·夏加尔（Marc Chagall）与意大利画家阿曼迪奥·莫迪里阿尼（Amedeo Modigliani）。即便装饰艺术中的新艺术风格持续时间不长，它仍种下了没那么明显却相当重要的文化变革的种子。与革命性的新思想步调一致，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等人提出的种种新思想正在悄然潜入，毕加索、乔治·布拉克—正如毕加索所认为的，像是在岩壁上用绳子系在一起的攀岩者—正试图通过他们的立体主义冒险，将艺术带入未知领域，超越现实所带来的幻觉。

自然，这只影响到了一小群精英分子。因为初等义务教育于1881年时才开始推行，而且并未在所有省份完全实施。约有90%的成年人是文盲，许多人仍只说他们当地的方言。更重要的是，法国面临人口统计上的问题。1789年，法国人口占欧洲总人口的1/4，如今占比不到10%。尤其是在1911年，法国人口还不到4000万，与之相对，德国人口近乎6500万。这明显是件令人担忧的事，因为1870年法国的战败影响巨大，使德国已取代英国成了法国新的“世仇”。当然，欧洲依旧是个动荡且急躁不安的地方。

在爱慕虚荣、飘忽不定的威廉二世皇帝统治下，德国想加入到殖民争夺之中，然而组成奥匈帝国与土耳其帝国的不同民族要求独立的呼声给巴尔干半岛地区造成了压力。1905年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后，殖民问题得到平复，当时德国支持摩洛哥对抗法国。在1911年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中，法国割让了部分法属刚果领地给德国。但在当时，安全感的普遍缺失促使英国与法国在1904年签订《英法协约》，并与俄国结盟，合力对抗德国、奥地利与意大利三国联盟。在巴尔干半岛上，斯拉夫民族与日耳曼民族之间的深层次矛盾导致俄国与德国关系紧张。鉴于这样的同盟阵容再加上巴尔干半岛的动乱局势，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离奇的事确实发生了。一名信奉波斯尼亚民族主义的学生刺杀了奥匈帝国王位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在德国支持下，对塞尔维亚宣战。一周后，俄国动员起来，支持塞尔维亚。德国向俄国、法国宣战，并取道中立国比利时进攻法国。英国不情愿地参战，站在了法国一方。各联盟的连锁反应支配了整体局势，2000万士兵被征召入伍。突然间，战火在欧洲烧了起来。就法国而言，尽管向德国复仇的呼声一直甚嚣尘上，尽管战争长期以来似乎近在咫尺，但大多数法国人并不主战，事态发展速度之快让他们措手不及。此时当然出现了政治宣传故事：男人们扛着装饰着花的步枪，

笑着走上前线，他们迫不及待地要向残忍的德国兵复仇。德军都是胆小鬼，他们瞄不准目标。又或者，按照一位主教的说法，战争是能够净化人灵魂的体验。但是，大多数人只是觉得，由于德国是进攻方，自己除了抵抗外别无选择。社会党领袖让·饶勒斯被一名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刺杀，但这也没能阻止左派分享民族团结的本能反应。至少他们知道，团结将是短暂的。

这次团结并不短暂。因为，德国在1905年时制订的施里芬计划不到两个月就破产了，这基本上决定了战争的进程。之所以要制订施里芬计划，是因为德国担心自己被包围，不得不两线作战，因而他们想通过比利时进攻法国，在一个月内到达皮卡第，从西面攻下巴黎，这样就可以在对付俄国前迅速将法国淘汰出局。这个计划的效果只持续到了9月初，德军当时直接威胁到了巴黎。但在著名的马恩河战役中，约瑟夫·霞飞将军（General Joseph Joffre）发动了一场英勇的防御战。在这场战役中，为把军队运往前线，从巴士到出租车，所有交通工具都被征用了。由此，德国失去了速战速决的机会。

这是英雄主义的终结，是“战争不过是一场生动丰富的表演”这类观念的终结，顺便提一句，也是法国步兵时髦红裤子的终结。穿着红裤子的法军在德国机关枪面前就像砧板上的肉一样，极易受攻击。死亡正在变得不光彩且寂寂无名，或许是被某个看不见的炮手干掉了，而这个炮手可能永远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战斗在海上与非洲继续进行，德国人被赶出他们的殖民地后，非洲成了他们前往的地方，西线在未来3年里变成了一场在荒凉景象中进行的奇怪斗争。人们在战壕里过着半地下式的生活。他们与死尸、老鼠为伍，还得忍受定期的轰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人们能看到机械进步的各类迹象，例如，1916年时，有卡车、侦察机及缓慢行进的坦克，但战争恍如陷入泥浆中的静态搏斗。

他们当然尝试过打破僵局。英法联军在1915年试过两次，但未能突围。在1916年凡尔登战役的10个多月里，德军发射了6000万枚炮弹。在此期间，协约国试图通过索姆河战役中同样失败且代价高昂的攻击分散德军的注意力。还有1917年罗贝尔·尼维尔将军（Gerenal Robert Nivelle）在埃纳省贵妇小径发动的灾难性攻击，这导致法军哗变。4000名士兵在军事法庭上受审，其中有49人被处决。事实上，它还导致左派政党退出了政府。

有“凡尔登英雄”之称的菲利浦·贝当将军（General Philippe Pétain）叫停了无意义的进攻，提高了军队配给量，平定了风波。然而，此时轮到某些事物登场了。美国人出现了。由于德国干预船只在大西洋上的自由航行，并击沉了搭载着128名美国人的未武装的英

国“卢西塔尼亚”号客轮，他们愚蠢地激怒了美国人。从军事层面上讲，尽管有12万美国人战死，美国参战也并未产生直接性的重要影响。进一步而言，俄国在1917年革命后撤出战事，更是使战局得到了一定的平衡。但是，德国意识到，就中期阶段而言，美国参战使天平倒向了不利于自己的一方。而且，柏林如今也出现了革命骚动。德国在1918年做了最后一次大的努力，以期实现突破性进展。在他们的努力被抵挡下来后，德国主动求和。

讽刺的是，自然本身也嘲笑了人类在这场世界大战中的人员伤亡。因为战斗一缓和，就暴发了一场流行性感冒，它夺去了2000万人的生命。即便如此，单是西方列强的伤亡人数就令人深思。统计出的各方阵亡人数分别是法国898100人、英国485000人、德国1483000人，各方大体平衡。但是，如果我们加上在作战中消失的人，或是死于受伤、疾病的人，那么真正的伤亡人数就是：法国1327000人、英国717000人、德国2037000人。然而，这种统计没有考虑到，法国战争伤害了那些不能为民族生计做贡献的人，没有考虑到本已处于人口统计劣势的法国所要面对的难以避免的出生率下降—法国之前需要在每千人中召集更多的男性入伍，也因此在人口比例上损失更大—也没有考虑到与英国、德国相比，战争给法国造成了有形的破坏。除给寡妇与家庭带来的伤痛外，战争那极具破坏力的影响逐渐明晰，这些影响可见于法国每个村庄的战争纪念碑。而且，它将投下大片浓重的阴影。让-雅克·贝克尔（Jean-Jacques Becker）在关于国家对战争态度的研究中得出结论：截至1918年，法国已经穷途末路了。如果法国人在这场战争中忍耐到了极限，他们也许就再也不能忍受另一场战争了，即“在1918年还顽强抵抗的法国，预示着1940年战败的法国”。

第九章

战胜国的悲惨世界

世界的不稳定性正在被升级为一种体系。

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那段飘飘然的岁月里，镜厅是幻象与现实融合的地方。1919年6月28日，《凡尔赛条约》也在这个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场所签署。正是在镜厅，普法战争中让法国遭遇惨败的、刚刚统一的德意志帝国，于1871年1月18日宣告成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仿佛是上述事件所倒映出的镜射般，也是在镜厅，这次轮到德国受辱了—这次的屈辱更让人难以忍受。因为，德国被排斥在和谈之外，甚至没有来自战败国的代表出现在大厅熙熙攘攘的外交使节之中。阳光倾泻在室外激涌的喷泉上，欢聚一堂的人们希望一睹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或是他们自己的“胜利之父”“法兰西之虎”乔治·克里孟梭的风采。当然，他们还想瞥一眼受到惩戒的德国代表。但是，活动几乎刚刚开始就结束了。代表们抵达后，头戴羽饰头盔、身着胸铠、神气活现的骑兵就把他们带到了楼上。代表们按指示来到桌子一头，在意味深长的、持续一两分钟的冷淡而傲慢的沉默后，他们获邀签约。伴随着鸣炮声，代表们被护送了出去。鸣炮声用自己战争般的语言宣布，欧洲已实现了长久和平。与此同时，克里孟梭对代表们的祝贺报以苦笑。

克里孟梭在之前的6个月内主持的和谈工作本身就是一场战争。虽然“四巨头”包括了意大利的维托里奥·埃曼努尔·奥兰多，但核心争论发生在威尔逊、劳合·乔治及克里孟梭之间，后者是唯一既说英语又说法语的人。观点碰撞主要发生在威尔逊与克里孟梭之间，劳合·乔治在某种程度上是二人的调解员。威尔逊的出现本身就代表着欧洲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他带来的是来自宽广的大洋彼岸的方案。威尔逊倾向于从外部看待战争，将其置于世界格局之中。然而，克里孟梭与劳合·乔治二人都是精力充沛的战时领袖，他们都更加直接地见证过大屠杀的影响，自然趋向于从欧洲错综复杂的内部局势中看问题。当然，三个人都不得不考虑选民的情绪。克里孟梭与劳合·乔治清醒地意识到，战争释放出了人们对德国人的仇恨，而威尔逊面临着相反的问题，因为他将跳出自己国家的孤立主义，最终将被自己国家的参议院否决。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谈判结果也依赖于三个主要参与者之间的化学反应。

威尔逊之前是名学者，曾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这位著名的民主党总统有着推动重要立法（例如妇女选举权）的履历。他出生于有着苏格兰-爱尔兰血统、信奉长老会的家庭。他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与国际主义者。威尔逊想要建立国际联盟以保障集体安全，弘扬国际法，并推动各民族人民自决。正是为了实现这一愿景，威尔逊才带着他的“十四点原则”来到巴黎，解决争端，包括裁军、自由贸易、船只在公海上的自由航行权以及所有殖民地的民族自治。

高大、拘谨得有些刻板的威尔逊与矮小、丰满、年长但老于世故、威风凛凛的克里孟梭形成了鲜明对比。克里孟梭有着略带乡土气息的优雅，常戴一双灰色麂皮手套。他与威尔逊迥然不同的观点直接源于自己的生活。他是一名医生与热忱的共和党人。他还是发表了左拉《我控诉》文章的新闻记者。他是一个以带刺的机智著称的严厉的现实主义者—以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及所有人作为揶揄的对象。1870年，身为蒙马特尔市长的克里孟梭经历了普法战争。作为激进共和党领袖时，他被称为“政府毁灭者”。如今，克里孟梭亲自见证了德国入侵中立国比利时、炮轰平民的景象。接着，在他作为战时领袖亲临前线时，克里孟梭还目睹了大屠杀造成的人员伤亡。他想让德国为此付出代价，阻止德国发动第三次战争。克里孟梭觉得，威尔逊的方案太过天真且感情用事。

这些有着天壤之别的观点显然是无法调和的。聪明、直觉敏锐的劳合·乔治实在做不了什么来弥补分歧，这不过是因为他自己也很矛盾。劳合·乔治和克里孟梭一样，在论辩中比威尔逊要更加机敏。劳合·乔治乐于看到德国为战争付出代价，这正是英国舆论想要的结果。但是，他也不想让法国变得过于强大。而且，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的领袖，他对威尔逊的自治观并不感兴趣。他同意摧毁德国海军，但不愿分享船只在公海上的自由航行权。在这些条件限制下，结果只能是延误与妥协。笼统地说，威尔逊成立了他的国际联盟，并为奥匈帝国各族人民争取到了自治。如果协约国接管德国殖民地的话，那么奥匈帝国的这些民族如今就处于国际联盟的托管之下。法国获得了阿尔萨斯-洛林，协约国能够占领德国莱茵兰15年，而且萨尔河流域处于国际控制之下。德国海军将遭裁军，坦克、潜水艇与毒气制造将被禁止。最重要的是，协约国公开宣布，德国对战争负有责任，并要求德国支付赔款，补偿因战争导致的平民伤亡，首付款为50亿美元，余款在30年内结清。

许多关于《凡尔赛条约》的研究往往对此颇有微词。早在1919年时，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便特别点名克里孟梭的做法，批评他试图用自己的赔款计划，“使时光倒流，恢复1870年时的情形”。凯

恩斯代表英国财政部沮丧地签订了《凡尔赛条约》。同年，雅克·班维尔（Jacques Bainville）则认为，凯恩斯低估了法国的损失。他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德国。德国仍拥有欧洲人口最多、最为同质的区域，而从威尔逊的民族自决政策中诞生的弱小国家无法与之抗衡。他也许还补充说道，德国由于历史因素的共同作用，已成为具有潜在爆发力的国家：迟到的文化适应—当法国正在享受它的伟大世纪时，日耳曼的土地正在被三十年战争蹂躏着—之后是迟到的工业化、迟到的统一，以及迟来的对殖民竞赛的参与（带着其普鲁士军事传统）。如今，由于德国民众尚未见到战争带来的破坏，因此就有人可以虚构一种论调：德国并未被打败，而是遭到了背叛—这种谎言与1920年左右的经济衰退一道，加深了纳粹主义的神秘魅力。

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凡尔赛条约》未能调和对立双方的观点，以至于"维护和平的唯一保证就是胜利者保持团结"。但是，英国渐行渐远，美国在共和党主政后，没有认可条约，甚至都没加入国际联盟。因此，留给法国的是重重矛盾和努力后的失败。然而，指责某些人造成了这样的局面也是不现实的。克里孟梭也许过分执着于过去，而威尔逊则过分超前于自己的时代了。但是，他们都尝试过了。条约象征着遭遇创伤后的欧洲的矛盾。当时的欧洲在经历了令人震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仍沉浸在以往的恐惧与仇恨之中。事实上，一开始选定凡尔赛宫镜厅作为条约签署地，在仪式上羞辱战败的德国，这种做法也许就注定了结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镜厅不仅映出了之前的一场战争，还映照着下一场战争。

随着战争结束，法国进入了"疯狂年代"（années folles）。巴黎恢复了文化之都与"同性恋巴黎"的双重身份。作家与艺术家们都从蒙马特尔搬到了蒙帕尔纳斯。可可·香奈尔展示着她的时尚，红磨坊与女神游乐厅打造了明星密斯丹格苔或是美国的约琴芬·贝克。而且，随着收音机与留声唱片机的普及，全国上下如今都能哼唱最新的爵士乐曲调，或是聆听吕西安娜·布瓦耶吟唱《对我细诉爱语》。人们试着去遗忘。

但是，也有些人无法忘却。单是1919年，即《凡尔赛条约》签订的那年，就有几件事值得一提。保罗·瓦勒里发表了关于欧洲危机的文章。自令人瞠目结舌的开篇第一句—"我们的文明如今知道自己是会死的"—开始，他就暗示道，欧洲大陆在道德与智力上进行了自我戕害。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出版了《西方的没落》。这本书让年轻的安德烈·马尔罗发展出了与"人类的死亡"相关联的新观点，即"荒诞"。同样是在1919年，如果我们相信超现实主义运动领袖安德烈·布勒东所讲述的事，那么年轻作家菲利普·苏波会经常溜到公寓大楼，然后问门

房，菲利普·苏波是否住在此地。布勒东告诉我们，如果门房回答，“菲利普·苏波确实住在这里”的话，“苏波也不会感到惊讶，而会跑去敲那位也叫苏波的人的门”。简言之，苏波是在切实贯彻身份感及意义缺失的感觉，这也是马尔罗的荒诞思想所暗示的内容。

恰如浪漫主义运动主要是对革命期动乱的回应一样，一种新的人文景观正在出现，它回应了战争给人带来的惊吓，回应了充满骚乱与技术进步的新世界。一场巨大的波动正在席卷而来：在哲学上，出现了法国的黑格尔，后来是马丁·海德格尔；在音乐上，从伊戈尔·菲德洛维奇·斯特拉文斯基到奥利维埃·梅西安；在造型艺术上，从立体主义到抽象艺术；在思想上，新的驱动力来自战前已为人知的人物，但他们在1918年后才得以施展才华，就像是登上一个精心准备的舞台一样。最具影响力的当数爱因斯坦与他的相对论，弗洛伊德及其对无意识的强调，还有亨利·柏格森及被他上升到比智力更重要层面的直觉。

这些因素渲染了当时的文学。路伊吉·皮兰德娄的戏剧刻画了摇摆不定的人物，它们暗示着人们个性的不连贯性，因此也就不存在前后一致的自我。经常缠绵病榻、在软木贴面的房间里写作的普鲁斯特，试图基于不由自主的记忆，构建个体灵魂的连续性：例如，简单到如一小块蛋糕的味道般的东西（著名的玛德琳蛋糕）就能让回忆如潮水般涌来。因此，我们可以生活在过去与现在的混合体中，超越时间。就好像普鲁斯特在不可知论渐趋流行的时代，正试图寻找基督教灵魂的世俗对等物一般。在另一个层面上，安德烈·纪德对“凭兴趣做事”的强调，以及他通过做出某些“无偿行为”以体现个人不受传统习俗约束的挑衅性观点，让一些读者感到不安。所有这些作家与思想家在破坏理性主义、推翻旧秩序上都起到了作用。世界的不稳定性正在被升级为一种体系。

这种新“世纪病”最显著的表现是超现实主义运动。它接替了达达主义。选择“达达主义”这一名字，是因为它毫无意义，也由此暗示了对概念定义的排斥—然而这与自相矛盾相差并不远。在系统上更加无序的超现实主义，标榜自己是对整个道德、政治、社会与智力秩序的攻击。它的目标是解放无意识—主要是通过自动书写（automatic writing）—因而使“真实的自我”从资产阶级社会假定的“不真实的人”所设置的囚笼中解放出来。这种说法理所当然有赖于两个靠不住的假设：一是存在所谓的“真实的自我”，二是可以实现不受控制的自动书写。此外，这些穿着考究的年轻人打算“震惊资产阶级”这件事听上去也十分滑稽，或者说安德烈·布勒东是可笑的，他成了这场运动名副其实的教皇，自以为是地将反对者驱逐出去。

但是，在运动进行过程中，人们总会开些无伤大雅的无政府主义

玩笑。超现实主义者在公开信中严厉批评欧洲大学主管学术事务的校长们，说他们装模作样地传授知识；抨击精神病院院长，说他们没能认识到只有病人才是神志正常的人。更不要说法国地铁在驱逐了一个向漂亮姑娘暴露自己的男人后，收到了萨尔瓦多·达利的抗议，达利认为，自我暴露是那个男人“纯洁而慷慨的行为”。还有超现实的改善公共历史古迹的建议，以及大量其他的噱头。在此需要补充一点：公正地说，对许多诗人与画家而言，这种经验有助于他们的成长，而且当时的年轻作家就像浪漫主义者一样，对探索自身抱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几位超现实主义者以自杀做了了结。但是，随着政治局势变得日益严峻，超现实主义运动逐渐消失了。此外，阿道夫·希特勒与其他人一道，更加凶猛地攻击着理性主义。

可以说明当时社会政治动荡的一条线索就是人事变动，不仅是政府的人员流动，还有要员的变动。1914年，社会党领袖让·饶勒斯遇刺身亡；1932年，保罗·杜美（Paul Doumer）总统也遭刺杀；更不要说在和平会议召开期间，克里孟梭受伤的事了。还有略带丑闻性质的丧命—1899年，菲利·福尔总统心脏病发作致死，原因是他情妇的过度服侍。在此基础之上，人们还会想到1920年的一桩奇事。某天大清早，一个穿着睡衣、打着赤脚，心智失常的男人在铁路线上游荡，他宣称自己是共和国总统保罗·德沙内尔，这话听上去完全不像是真的，但实际上他的确是德沙内尔总统。

此外，关于未来之动荡的一个更加凶险的征兆同样出现在1920年：法国社会党党员在图尔市的会议上分裂成了两派。这种分裂同样发生在工会组织“法国总工会”（CGT）内部。法国内部的这种分歧时不时会带来巨大痛苦，事实表明，在1939年下一次大战开始前，这种分歧极具破坏性。

十足讽刺的是，战后国家集团政府严厉镇压四处蔓延的罢工，大大削弱了工人运动整体强度，而法国社会党的内部分裂仅发生在短短数月之后。基于战时组成的“神圣国家联盟”，右派与中间派政党联合组建了国家集团政府（National Bloc）。他们将民族主义的说辞与对布尔什维克革命所象征的“红色恐怖”的警示融合在一起，借此取得了政权。政府已扩大了自身与日益兴起的工人阶级之间的鸿沟，后者通过军工生产实现了工业化。如今，政府通过强化保守势力的尝试，加深了人们对左派的敌意。巩固保守势力的举措包括：在教会面前摆出一些姿态，恢复与梵蒂冈的外交关系，并且考虑到全国的低出生率，从法律上严格禁止堕胎与节育。但是，它不可避免地遭遇了两个基本且相互关联的问题—资金与德国。在重建费用方面，法国从德国那儿获取财政补偿时遇到了困难，迫使1922—1924年间的法国总理雷蒙·

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在1923年占领了德国鲁尔区以攫取原材料。但是，这导致当地发生了大罢工。普恩加莱未能获得来自英国与美国的支持—他们觉得这也许会引发一场共产主义革命—于是他被迫撤退，并接受仲裁。这次的挫折导致法郎急剧贬值，进而不仅致使国家集团政府垮台，还导致其继任者—1924—1926年执政的“左翼卡特尔”政府解体。

恰在此时，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崭露了头角。他是一个在当时有着远见卓识的人。这个布列塔尼人曾以律师与新闻记者为业。他是工会运动的坚定支持者，而且在1902年加入议会之前，他也是社会党的领导人物。白里安以试点立法实现政教分离而为人所知，他几乎成了在人员快速流转的法国内阁中永远的常客，通常是担任外交大臣一职，他也当过不下11次的总理。他还是优秀的演说家，对政府机构了如指掌。白里安的出身及其早期经历让他能够体谅普通人，而且他具有稀缺的品质，那就是常识。白里安坚定地支持新组建的国际联盟，对战争怀有深深的厌恶—他在1915年年末至1917年年初担任战时总理的经历加深了他对战争的厌恶—他想要通过在国际联盟框架内的集体安全体系，与德国达成和解。在1921年的第一次尝试失败后，他成功与德国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达成默契。最终促成了1925年《洛迦诺公约》的签署。这项公约也涉及了英国、意大利与比利时，它认可了《凡尔赛条约》划定的边界，规定莱茵兰的非军事化，并允许德国加入国际联盟。1928年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进一步巩固了《洛迦诺公约》的内容，美国也被邀请加入这个15国公约，共同宣布禁止战争。凯洛格和白里安两人因此项公约的签署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18]。截至1930年，白里安仍在提出组建欧洲联盟的议案。

但是，当时的国际舞台已经黯淡了下去。1929年10月，美国股市崩盘。随后发生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已蔓延至欧洲，给德国造成了尤为严重的失业与苦难。法国本身的情况看似好一些。自1926年起担任总理满3年的普恩加莱，为应对经济危机，组建了一个由全国工会构成的联合政府。而且，事实上，他这招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普恩加莱削减开支、提高税收，使法郎贬值以减少国债。因此，他能够用公共住房计划与社会福利体系推动法国的现代化。最初，法国没有像英国、德国那样遭受巨大损失。法国失业率没那么高，而且在1930年时诸如汽车工业、化学制品与电力这些部门依然在强势增长。但是，颇为讽刺的是，这正是因为法国在经济上没有那么发达，与其他国家相比，更加奉行贸易保护主义。于是，当法国在1931年受到经济危机冲击时，遭受的打击更大，法国也需要花更长时间才能恢复过来。工业产量急剧下降，银行系统各领域崩溃，购买力下降，失业率

骤增。所有这一切开始带来严重的政治动荡，复刻了德国与新法西斯主义意大利的情况。

普恩加莱之后的两届政府也试图通过公共建设与财政补贴来应对危机，直到来自激进社会党的爱德华·赫里欧于1932年组建的左翼政府掌权。赫里欧将先后多次担任总理一职。但是，当激进派与社会党无法就一项政策达成共识时，人们的希望破灭了，赫里欧也未能在前人跌倒的地方爬起来。因此，公众的不满变得更甚。伴随着法国国内反议会情绪的高涨，希特勒升任德国总理后外在威胁的迫近，以及1933年时赫里欧脱离了国际联盟，法国—随着人口老龄化与出生率的下降—对未来不再满怀信心。人们已经觉得，克里孟梭与刚去世的白里安的辛苦付之东流了—而且下一场战争的倒计时也已开始了。

在后法国大革命的法国社会中，内部分歧一触即发。快速更迭的政府未能解决经济危机，如今又与日益紧张的国际局势一道，激化了法国政府的两极分化。这倒不是说左派或是右派各自有多强的凝聚力。左派是相信小政府理论的共和派，这些激进派人士在教条上就与社会党人意见不合。在右派这边，学说不及传统与情感那般重要，承担管理一职的，与其说是政党，不如说是少量的组织机构。这些组织在大体上有着相同的武装反抗共和派的愿景，其中就包括夏尔·莫拉斯领导的“法兰西运动”。它倡导以暴力推翻共和国、复辟君主制。此外还有名为“国王的报贩”的青年运动。兜售该组织报纸的街头小贩成了大街上的步兵。尽管教皇在1926年时谴责了这场运动，但它仍然对传统主义观点产生了强烈影响。军事组织“火十字团”更加明确地捍卫欧洲基督教文明。“火十字团”的名称来自十字勋章，它是在敌军炮火前展现英勇气概的军人所获得的荣誉。德·拉·罗克上校领导了这个组织，而它的赞助人是香水商、《费加罗报》的所有者—弗朗索瓦·科蒂。其他多少具有一些准军事组织风格的团体包括：不那么年轻的“爱国青年”，赞助人是香槟公司百万富翁皮埃尔·泰亭哲；名为“弗朗西斯党”的公开的法西斯主义小政党；还有法国团结党。敌人通常把它们混为一谈，说它们是一个由共和党、社会党、共产党、移民，当然还有犹太人组成的巨大阴谋—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如今正逃离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作为难民来到法国。

在今天看来，在那个时期，制造神话的程度以及左派、右派之间的厌恶之情也许看似奇怪，不过并不像希特勒自己的幻想那样荒诞不经。希特勒觉得，犹太人既应为美国的资本主义负责，也要为俄国的共产主义负责。但实际上，正是随着法西斯德国的崛起，人们感受到争取民族身份的斗争已上升到了国际层面，由此才滋生出左、右两派彼此的仇恨，并进一步催生出了恐惧。如果说双方都倾向于用对方的

极端主义派系来定义对方，那是因为他们认为，文明的未来正岌岌可危。而且，只需要一个恰当的象征性事件，例如1934年的斯达维斯基丑闻，就足以引发巴黎自1871年起闻所未闻的暴力。诈骗犯斯达维斯基是一名乌克兰裔犹太人，他之前是一家夜店里外表光鲜的歌手与经理，过去曾多次因诈骗罪被判刑，但自1926年起—据说通过政界的关系—他策划推迟了下一次审判，并使自己得以取保候审不下19次。他在最近一次骗局中，用假珠宝做抵押开办典当业务，还通过出售一文不值的债券赚大钱，并四处买通追根究底的记者与警察。斯达维斯基在他的帮凶—巴约讷市副市长被捕后，担心落网，于是逃跑了。据说，斯达维斯基遭到追捕并尝试自杀。当警察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许多人听到这个消息都语带讥讽，表现出极大的怀疑。因为，他们认为，斯达维斯基是被杀人灭口了，目的是保护那些身居要职的人。而且，事实上，一位大臣、多位检察官与激进派议员，还有一些记者似乎都多多少少参与了这起丑闻。这使得右翼公然宣布，统治法国的是一伙骗子和犹太裔外国人。在1934年1月期间，右翼势力还让他们的军队走上街头，引发了一系列暴力冲突。在这种压力下，在位仅两个月的总理卡米耶·肖当（Camille Chautemps）被迫下野。随后，首相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个又一个，老首相刚登台不久，就被许多新首相相继挤了下去。第一位是另一个激进派人士—爱德华·达拉第，他免去了巴黎警察总监让·恰普的职务。恰普即使看到自己手下的一些军官受伤，仍支持右翼示威者，因而被免职。然而，达拉第此举导致位于波旁宫的议会遭到攻击。在2月6日、7日晚，步行或骑马的武装警察抗击着暴徒一次又一次的冲锋。暴徒人数至少有20000人，他们发起猛攻，试图进入大楼。到早晨时，多达20人遇害，大概有1500人受伤，包括许多警察。如果将这次事件当作一次失败的政变的话，那么这次政变显得非常业余，但这足以说服达拉第辞职，以缓和紧张局势，如今他已被自己的激进社会党中的一部分成员所抛弃—这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首次向暴民做出让步。

动荡继续着。甚至在1934年晚些时候，法国外交部长路易·巴尔杜与同车的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一世在马赛遇刺身亡，他们死于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之手。接替达拉第掌权的加斯东·杜梅格总统试图通过邀请右翼分子进入自己的内阁以平定局势，但是左派对此充满敌意。杜梅格不到11月就下野了。随后是坚持了7个月的皮埃尔-亨利·弗朗丹。费迪南·比松在位仅3天，就为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让路了。在1935年6月掌权的赖伐尔坚持了将近8个月。他试图用通货紧缩政策解决持续的经济萧条，却并没有赢得人心，不过真正导致他在1936年1月下台的原因是，人们认为他默许了墨索里尼在1935年入

侵埃塞俄比亚，这一应对事实上毁掉了无能的国际联盟。

与此同时，根据人们所熟知的法国政治的曲折路径，斯达维斯基危机将会促成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的诞生。这个广泛的左翼联盟始于1936年春。正如一项十分实用的研究所指出的，这是一件非凡之事，是强大的工人运动与左派联合政党选举胜利的结合。正是由于社会底层所施加的压力，以及一系列事件的驱动，激进派、社会党与共产党的领袖们才聚在一起，基于利害关系而实现了联合。共产党与社会党理所当然地互相争夺着左翼选票，而社会党在意识形态上也与激进派不合。激进派加入人民阵线，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当时正失去选民支持。反法西斯知识分子组成的跨党派群体为左翼联盟的形成提供了最初契机。之后，一场盛大的游行将各党派、工会，以及各种反战与人权组织聚拢在一起，推动运动向前发展，并促使各党派达成了选举协议，它们同意在第二轮选举时退出并支持票数领先的左翼候选人，最终人民阵线取得了彻底的胜利。社会党赢得了147个席位，激进派获得106个席位，而共产党得到了72个席位。当然，在社会党领袖、著名知识分子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领导下，这个新成立的人民阵线政府于1936年6月至1937年6月执政期间，绝不会过得惬意舒适。布鲁姆是犹太裔。不论他在多大程度上不再信奉犹太教，迎接他的都是反犹左翼报刊异常恶毒的攻击—他已经被“国王的报贩”运动的年轻激进分子从自己的车里拖出来暴打过一顿了。最重要的是，工人们已通过罢工与占领工厂的方式在欢庆胜利了，这是个棘手的问题。

布鲁姆决定采取严格的宪法手段。因为他明白自己没有多少回旋余地，所以准备快速行动起来。而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占领工厂的工人们并不觉得自己是在发动一场革命。这些工人充分展现了审慎和务实的态度，他们只是试图预先制止厂主闭厂，预防工厂请非罢工者来取代自己的位置而已。布鲁姆通过《马提尼翁协议》结束了罢工。协议规定了加薪、更多的工会权利以及工作场所需履行的集体协议。他引进了每周40小时工作制，以及每年为期2周的带薪休假。这让许多工人第一次有机会去乡下走走，或是去看看大海。尽管女性仍然没有投票权，不过他在自己的内阁中任命了3名女性。他将学校毕业年龄提升到14岁，并委任了一位大臣专事体育运动。这位大臣资助了运动草场与游泳池的兴建。

人民阵线也带来了一些有限的国有化措施，设置了用于科研的中央基金，并成立了一整套机构，包括天体物理学与原子合成研究中心、现代艺术博物馆，以及人类学博物馆。人民阵线关于文化传播的倡议与当时社会上的乐观主义情绪结合在一起，影响了剧院、电影

院，甚至是流行歌曲—查尔斯·德内曾在法共年度大聚会上献唱此类歌曲。这真是一场绚丽盛大的表演。

当然，这种情况不会长久。人民阵线政府的经济措施过于野心勃勃。而且，在短期内，它限制产量的做法让情况变得更糟了。1936年7月，当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开始发动武装暴动反抗西班牙第二共和国、促成了一场欧洲的代理人战争时，国际局势变得更加凶险了。在西班牙内战中，德国与意大利公开以飞机、武器这些战略物资支持佛朗哥，而苏联则为西班牙共和党送去了补给与资金援助。布鲁姆本想帮助西班牙共和党，他也确实通过帮助安德烈·马尔罗组建一支战斗机中队的方式，向西班牙政府提供了非正式的援助。但是，他无法把不牢靠的联盟团结在一起。无论如何，尽管英国外交大臣罗伯特·安东尼·艾登做出了努力—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了哥哥约翰，即将在之后的世界大战中失去一个儿子—英国仍决意采取绥靖政策，并明确表示他们不会支持布鲁姆。因为未能支援西班牙共和党，法共收回了他们的支持，联盟因此瓦解了。

尽管如此，人民阵线依然代表着一段传奇岁月，尤其对于法国左派而言。就像一段论述所言，这并不仅仅是因为“1936年夏改革的规模之大以及人们情绪的高涨”。它还让数百万人开了眼界，给予工人们尊严，向人们宣扬了“他们是自己国家的共同所有人”这一观念。它是对更美好未来的惊鸿一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新共和国之蓝图。

1938年《慕尼黑协定》的签署成了稳步走向战争的决定性时刻，因为它接受了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境内讲德语的地区，即苏台德地区的领土要求，这为他不久后入侵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开辟了道路。如果说，英国首相威尔特·张伯伦天真而得意地挥舞着希特勒的和平保证书的话，那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他在1938—1940年再度担任政府首脑—在回到巴黎，面对着欢呼喝彩的民众时，只感到羞耻，觉得他们是上当受骗的傻瓜。那些实业家打出了“宁要希特勒，不要布鲁姆”的座右铭，他们都很开心，而布鲁姆则声称感到了一种懦夫般的如释重负。当时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7%的人支持《慕尼黑协定》，37%的人反对。然而，随着欧洲“睁着眼睛”继续大踏步走向灾难，人们的悲观情绪加深了。1938年年末的法德互不侵犯条约为纳粹德国吞并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开辟了道路，同时，德国开始提出对波兰的所有权，并于1939年8月缔结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项条约使得出现糟糕局面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它甚至迫使法共的决策出现了180度大转变，再度认定对德作战是资本主义的一反常态，而非爱国之举。到这时，更多群众看出了其中的凶兆。进一步的民调显

示，75%的人如今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等待希特勒采取行动的是一个逆来顺受、严重分裂的国家。

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的态度一针见血地反映出意见分歧。他们中的许多人如今认为，民主政体的缺陷迫使他们在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阵营间做出干净利落的选择。巴勃罗·毕加索的巨型油画《格尔尼卡》讲述了它自己的故事。这幅画的灵感源自西班牙内战期间，巴斯克著名历史重镇的平民遭到德国飞机滥杀无辜式的轰炸这一史实。而马尔罗的小说《希望》（*L'Espoir*）则用饱含同情但最终落入悲观的笔调描述了西班牙内战。这场战争被看作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前奏。

另外，右翼作家与法西斯作家的作品很有市场。例如，皮耶尔·德希厄·拉·侯歇勒（Pierre Drieu la Rochelle）的《吉尔》（*Gilles*）就是与《希望》旗鼓相当的一部小说。还有路易-费迪南·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éline）与罗伯特·巴西拉奇（Robert Brasillach）—所有这些人都支持德国占领。即使在天主教内部，分歧也存在。尽管天主教会普遍支持佛朗哥的反叛，但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与乔治·贝尔纳诺斯（Georges Bernanos）最终都站出来反对动乱。被之前那场战争的记忆所助长、由让·雷诺阿的《大幻影》之类的电影所鼓噪起来的广泛存在的反战主义，似乎为战争增加了宿命论的色彩。这在戏剧中表现明显，作品主题频频涉及古代，好像希腊悲剧中无法逃避的命运切中了当下的要害一样。早在1935年，在让-皮埃尔·吉侯杜那戏谑的戏剧标题《特洛伊战争将不会发生》（*La Guerre de Troie n'aura pas lieu*）里，作为一名外交家的吉侯杜就已经知道，下一场战争极有可能发生。

法国并不像有时人们认为的那样，没有在军事上做好战争准备。除去飞机数量外，法国军力其实与德国军力相当。而且，事实上，自凡尔登战役后，法国自认为拥有“世界领先的军队”。毕竟，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法国都在法德边境上建造严密的防御工事—马其诺防线。与此同时，莱昂·布鲁姆在1936年就开始脚踏实地地开展重整军备的庞大计划了。问题实际上出在其他地方，其中最根本的是法国外交方式与军事姿态之间的矛盾。法国与诸如波兰与俄国等远邦的联盟—更不要说位于近海地区犹豫不决的英国了—暗示着法国能够帮助它们，然而法国采取的防御姿态使这一暗示难以让人信服。另一个问题是马其诺防线。尽管前一场世界大战已经给人们带来了明白无误的教训，但这一防线仍然不仅不完整，还止于比利时边境处。人们认为，德军不可能穿过阿登高地森林茂密的山地发动攻击。事实上，将军们所做的准备全都是针对之前那场战争，而不是现在这场战争，他们对来自夏尔·戴高乐（当时他是隶属于国防委员会的陆军中校）的警告视

若无睹，最终对新出现的德国闪电战束手无策。1939年9月1日，德国基于空中部队与装甲部队的联合袭击，发动了攻打波兰的闪电战。此举终于激怒了法国与英国，两天后，达拉第与张伯伦对德宣战。简言之，法国在面对这个新矛盾时，在外交与策略上均处于劣势。再加上内部分歧与宿命论观点，结果基本在意料之中。在这场“伪战争”中，长期的不作为加剧了宿命论的感觉。

7个月之后，当德军终于在1940年5月10日发动攻击时，效果是惊人的。他们只不过是绕过了马其诺防线，穿过阿登高地，进行了一次装甲突袭，从后方攻击了英法联军。5月底，联军落荒而逃，孤注一掷地撤退到英格兰，最后有将近25万英军与超过10万法军被保住了。嘲讽法国士兵胆小懦弱的言论既无知也不公平—为保护装备不良、战绩不佳的英国远征军，使他们能够落荒而逃，法军英勇战斗，牺牲了很多人。但是，法国的战略位置是无可救药的。在德军的快速进攻前，法国民众已经开始了逃跑，政府也撤退到了波尔多。失败主义派系赢得了内阁支持，不抱幻想的老兵贝当元帅取代了总理保罗·雷诺。贝当请求停战。这只用了不到6周的时间。

如今已经当上将军的戴高乐，刚被任命为国防部副国务秘书。他未能影响内阁的决定，于是逃往伦敦，在英国广播公司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广播，呼吁法国人继续战斗。因为他在法国几乎没有听众，所以到那时为止，他的建议仍无人搭理。但是，他对这次世界大战在较长时期内发展情况的判断，有着惊人的先见之明—他的时代终将来临。

第十章

几乎沦为德国的一个省

“凡尔登英雄”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
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了德国的卫星国。

“我们从未像在德国占领时期那般自由”，让-保罗·萨特如是写道。他的言下之意是，在那种情况下，人们被迫做出了重大决策。但是，萨特本人并未做出任何特别冒险的决定。而且，他的观察对于担心被俘的儿子或是要养活的一家人的法国同胞来说，听起来只是诡辩而已。当国家以骇人的速度被蹂躏，当日常生活一夜之间被改变时，你会做什么呢？当看到训练有素的德军在香榭丽舍大道上游行时，你会做什么呢？当地标性的建筑被征用，上面覆盖着得意地印着纳粹党徽的红旗时，你会做什么呢？当协和广场上为德国车辆竖起新路标时，当德军沿街巡逻或者乘坐法国地铁时，你会做什么呢？

当你担心食物短缺、被迫遵守宵禁、得到严重警告“暗中破坏将被处以死刑”时，当你得知有超过150万法军被囚禁在德国拘留营中时—事实上这些现象让整个法国都沦为了俘虏，你也不会感到自由。因此，至少在最初时，法国人按照英国建议其公民在被占领的海峡群岛上的所作所为行事—他们实行“消极合作”。但是，压力迅速迫使群岛上的英国警察积极合作，将犹太人赶到集中营中，而这种压力带给法国人的影响要大得多。因为，这次令人震惊的失败再次凸显了一个根本性矛盾，一个自1789年来就未解决的、天主教君主主义传统与共和民主传统之间的矛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可能会出现模棱两可的情况，忠诚行为可能变得危险，错误决定意味着某天将遭受灭顶之灾。

而且，停火协议的条款极大地增加了这种模棱两可性。从某个层面上说，这些条款非常严厉：德国强行征收造成严重损害的占领成本；吞并了阿尔萨斯-洛林；接管了人口更多、工业化程度更高的北方地区，以及整个大西洋沿海地区所有的港口，向南直到波尔多。法国获准拥有占国土面积45%、全国人口1/3、经济欠发达的南部，构成未被占领的“自由区”，尽管该区包括了里昂与马赛港。法国因此被一分为二，两部分之间有重兵把守的“分界线”。这项安排认可的事实是，法兰西帝国没有直接受到影响。因此，法国可以保有自己的海

军，前提是它不处于服役状态。但是，这也合了德国人的心意。

1940年6月23日发生的著名历史事件是，希特勒来到法国，在夏悠宫外的海滨大道上做了些胜利庆祝，并留下了影像记录。德国政府部门迅速接管了位于巴黎中部地区的法国重要官方大楼、大饭店与营房。德军地区指挥官被舒舒服服地安顿在位于里沃利路的莫里斯酒店，而盖世太保则怡然地被安置在位于福煦大街与水泵路之间的位置。然而，希特勒急切地想将人力、物力集中起来，以应对即将到来的与英国和苏联之间的冲突，而不是分散资源，用于驻防像法国这样的大国，并维护那里的治安。而且，希特勒也不需要这么做，因为他已经掌握了法国的工业财富，并通过扣押囚犯而挟持了法国。因此，德国可以颇为省事地将大多数维持治安的工作交给法国人自己。德国也把法国当作放纵自我的度假胜地。德国士兵能在休假时到法国，体验巴黎暧昧的乐事。所有这一切无疑提出了一些问题，即这个较小的“自由区”到底有多自由？它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法兰西这个国家？稀奇古怪、各不相同、即将成为维希政权首领的菲利浦·贝当（Philippe Pétain）元帅与皮埃尔·赖伐尔所采取的方式，也没能减轻这种含糊不清。

无子无女、84岁的贝当如今是个祖父般的人物。他留着花白小胡子，微弱的声音像长笛一般，走路时拄拐杖。但是，他那双清澈的蓝眼睛很有名。也许连他自己都没料到他后来的职业生涯。因为在1914年擢升将军的提名遭拒后，他就是个即将退休的58岁步兵上校了。当然，1916年，他成了“凡尔登英雄”。在关键性的凡尔登战役中，贝当使用大炮，最大限度地调动人员与物资，采取防御策略坚守陆地，抵挡持续的攻击。克里孟梭与一些总参谋部的人当时觉得他过于注重防守，但恰是防守策略本身让贝当在部队里受人爱戴，因为士兵们觉得，贝当比那些一门心思进攻的狂热将军要脚踏实地，也更关心他们的安危—正如他在1917年军队哗变后所展示的那样。

贝当虽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但守旧的天主教出身让他有着传统主义思想。而且，与城里人持有的世界主义不同，他喜欢把“土地不会说谎”这句话放在嘴边。贝当虽不是共和国的仰慕者，却也不会大肆宣扬自己的政见。他在1934年担任陆军部长，在1939—1940年出任法国驻（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大使时也做得顺风顺水。贝当清楚地知道，被人民阵线激怒的右翼群体已经说了好几年，想由他担任国家元首，以至于法国战败后，当这些右翼群体要求贝当组建政府时，他能马上从口袋里掏出一份大臣名单来。

与身体虚弱，但衣装整洁、体形修长的老兵形成对比的是53岁的赖伐尔。他看起来像个稀奇古怪、邋邋遢遢、着装风格颇为浮夸的服

务员领班。他有着黝黑的面庞、黑色的眼睛与深色的头发，其中有一缕还垂在前额上。赖伐尔穿深色西服、乳白色衬衫，还系着标志性的白领带，永远叼着他的巴尔托牌香烟。这个形象对他没什么帮助，因为老元帅似乎能让人肃然起敬，而人们会很轻易地讨厌赖伐尔，把他看作是个令人毛骨悚然、像癞蛤蟆一样的野心家。他就像他名字中的回文“Laval”一样，两面三刀的。事实上，赖伐尔在英国报纸上被人画入了讽刺漫画。理所当然，赖伐尔是个更加复杂的人物—他曾说自己有许多分裂的部分—但是，他更加聪明，他的政治生涯也更充实。这位来自奥弗涅的寒门才子，同样自称是个“热爱土地的人”。而且，他确实买下了一个大农场，但是他是通过担任律师而发迹，后来则靠大量的房地产交易与对一家报纸的收购，变得特别富裕。

农村的出身依然在赖伐尔的身上留下了痕迹—他花钱吝啬、迷信，言行粗俗，而且会实实在在地把烟吹到老领导的蓝眼睛里。但是，他也能魅力四射。他有着白手起家者的信念，觉得自己能不打官腔，免去外交上的繁文缛节，就把事儿办好。毕竟，他的职业生涯几乎就是第三帝国动荡不安的例证。赖伐尔担任过各种各样的政府部长职务，并在1931—1935年两次出任总理一职，之后他就被人民阵线发配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去了。因此，赖伐尔在建立维希政权时，将贝当视为合宜的傀儡，而他自己则是策略家。

尽管赖伐尔是个务实解决问题的人，但他有着强大的指导思想。他因静脉曲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免服兵役，他始终厌恶战争，在投奔右翼阵营前一直是反战派。他与白里安一样，希望建立基于法德和解的统一欧洲。而且，他在1939年时就反对战争。但是，既然战败了，他认为法国就得接受纳粹统治欧洲的现实，并试图在这样的背景下保护法国的地位。他强烈反对共产主义与苏联的立场，使这位白手起家的个人主义者与土地所有者的观点得到了强化。当然，他想当然地认为，英国将被打败，德国会赢得战争的胜利。贝当也是这么想的，不过，与赖伐尔的现实政治相对，贝当对于光复法国有着更加梦幻的想法。正如一位贝当的狂热崇拜者在1985年时所说的那样，贝当元帅眼中的法国“直接来自中世纪伟大的天主教保皇传统：这个由独立成员组成的国家，不仅在精神上相亲相爱，而且不同职业之间的人还通力合作”。对赖伐尔来说，这是一个天真的幻想。两人观点上的差异会时不时地造成摩擦。

但是，在停火与废除共和国的问题上，他们的观点是高度一致的。由于赖伐尔的煽动，想要前往法属北非继续战斗的国会议员被阻截了。赖伐尔继续组织将权力移交到贝当手中。1940年7月1日，政府在维希被建立起来。在时髦的温泉小镇维希，人们可以用拴在喷泉

上的破烂锡镴杯，喝到微温、无味的水。政府成立勉强刚过一周，受创的国民议会议员与参议员就在维希赌场里以绝大多数投票结果，选举贝当为政府首脑了。尽管元帅被指控创制了新宪法，但他立马就颁布法令使自己成为新“法兰西政府”首脑，得以大权总揽。议会的参众两院完全失效了，最终被一个由重要人物组成的仅有咨询功能的团体所取代。一个独裁主义、家长作风的政权突然出现了。正如赖伐尔戏谑地对贝当所说的，贝当获得了比路易十四更多的权力。而且，事实上，就像贝当在6月17日电台演讲中所说的那样，他已经“给了法国一个礼物以减轻不幸，那个礼物就是他本人”。他把自己描绘成没有个人野心的老兵形象，他还是为国家作自我牺牲的民族偶像，是还没完全丧失的法国荣耀的担保人。

在未来几年里，可以比肩对路易十四之赞颂的政府政治宣传攻势，将向民众反复灌输这一思想。政治宣传途径包括收音机上的演讲、刊登在政府控制的报纸上的照片，还有前往城镇与学校的参观活动。元帅无处不在：他以半身像的形式出现在公共建筑物中，或是以图像形式出现在各处，从墙贴、日历、硬币到邮票、镇纸与烟灰缸。而且，他忙于厘清1789年法国大革命，目的是为他的“民族革命”打造“新道德秩序”。共和国的国训“自由、平等、博爱”如今被火十字团（Croix-de-Feu）的三重奏—“工作、家庭与祖国”所取代，还必须遵循这个具有救赎意义的顺序。工作意味着健康的农业劳作，与远离城市的堕落相一致，童子军活动与其他青年运动也推进了这项举措。罢工权被取消，工会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由管理层与工人共同组成的企业工会。这么安排是为了打消人们心中任何阶级斗争的想法。相应地，家庭暗指传统的农民单元。这种观念如今因家庭津贴、离婚限制、堕胎非法化，以及对女主内思想的强调而得到了巩固。所有这一切因免费的中等教育及国家教师培训学院的取消，还有重新授予宗教团体教育权，并向天主教学校发放补贴的措施，而被进一步强化了—其中不可避免地包括改写学校教科书以祛除任何共和偏见。

至于“祖国”，因为有必要“还法国于法国人民”，那就意味着采取措施排除吉卜赛人、共产主义者、共济会会员，最重要的是排除犹太人。因此，1940年10月与1941年6月颁布的两项法令禁止犹太人担任公职，从事政府工作，参与诸如银行业务、房地产交易之类的商业活动。1927年后获得法国国籍的人，被撤销了公民身份。贝当之前的门生戴高乐将军也因逃离法国，以擅离职守罪被判死刑。此外，部分法国军舰在靠近阿尔及利亚的米尔斯克比尔港时被击沉的悲惨事件，让法国人的仇英情绪死灰复燃。英国担心，法国军舰也许是受德国之命前来，于是命令法舰驶向法国殖民地或是中立国港口。当法舰指挥官拒绝了英国要求时，英国海军击沉了法舰，或者让大部分法国船只瘫

痪，结果导致近1300人丧生。所有这些均致使法国闭关自守，并促成了贝当在战败后一段时期内非比寻常的受欢迎程度。

为什么元帅扭转法国历史前进方向的大胆尝试，获得了如此广泛的支持呢？正如一位作家所言，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对“上层家长领导”的“倒退性依赖”？因为，贝当的改革措施不仅得到了里昂大主教之类的传统主义者的支持，还得到了许多理想幻灭的共和党人的拥护。里昂大主教认为，元帅的领导是天命使然，而理想幻灭的共和党人感觉，自己被困于民族灾难之中，唯一还屹立不倒的似乎就是这个身体虚弱、胸有成竹的老人了—维希政权的赞歌《元帅，我们在这里！》时刻传递着这则信息，它做出了一句令人头脑发木的断言：“贝当即法国，法国即贝当！”但是，如果说贝当就是法国，法国就是贝当的话，这还是真正的法国吗？又或是说，它只是一个怀旧主题公园—建在保留地上？

1940年6月17日，当戴高乐抵达伦敦时，他遭到了法国大使馆的冷遇。戴高乐感觉“形单影只、完全孤苦无依，就像一个站在海岸上，冒昧要游过大海的人一样”。而且，当丘吉尔使他得以在次日通过电台，发出了他那具有远见卓识的呼吁时—戴高乐在讲话中说，法兰西帝国还在，而且能够与大英帝国形成合力，而英国又有着美国工业力量的支持—他觉得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他先后向两名高级将领韦安德（Weygand）与诺格斯（Noguès）发出呼吁，但遭到断然回绝。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来到英格兰的法国军人中，很少有人支持戴高乐，而伦敦的那些永久性法国居民则满腹狐疑地看着他。这个稀奇古怪、特立独行的高个子，戴着他的洛林十字架徽号，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却要擅自代表法国发言。他究竟是谁？他是什么幻想家、军事冒险家？或是如罗斯福所认为的，是想要成为独裁者的人？美国驻维希大使莱希（Leahy）在罗斯福面前说了不少戴高乐的坏话。如果说，丘吉尔仰慕戴高乐的浪漫姿态，而为他组建起了临时总部的话，此举像英国政府中的一些人或是外交部所认为的那样，是个大错吗？这难道不会损害他们向维希政权施压的能力，至少能够保证法国不会动用海军与殖民力量对付英国？而且，不管怎么说，要是这个不爱交际的人物只是个让人受不了的讨厌鬼呢？

事实上，戴高乐可不是好惹的。他从未去过英格兰，而且尽管他懂英语，却从不愿意说这种语言；他难对付、傲慢且易怒。此外，他也保有法国人对英国的一贯看法，觉得英国是唯利是图的帝国主义强国—这个不可靠的盟友对法国的灾难负有极大责任。如今，戴高乐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英国，他对英国人的真实意图持怀疑态度。因此，不管戴高乐的盟友们觉得他多么讨人厌，不论他们如何存心刁难，他那

趾高气扬的派头不仅仅是性情使然，这也是他为打好自己手中的一手烂牌所采取的战术。如果说，他经常惹得潜在的同情者反感的话，那是因为他过于急切地保护自己的独立，以及他所担任的复兴法国之领袖这一身份。这显然令戴高乐在伦敦处境奇特。难怪经常用有趣的英式法语与戴高乐争吵的丘吉尔居然说，他在战时背负的最重的十字架就是洛林十字架。同样不足为奇的是，英国外交部与美国人居然四下找寻更加意气相投、更有资历的法国名人来取代戴高乐。

戴高乐自己心知肚明，他与盟友之间确实存在着多重利益冲突。他渴望成为整个法兰西帝国的领导人，而丘吉尔则要保卫自己的帝国，并且丘吉尔为实现赢得这场世界大战的首要目标，会毫不心慈手软地将法国在北非或叙利亚的利益挪至次要地位。如果说戴高乐依附丘吉尔，那么丘吉尔则倚靠罗斯福。罗斯福嘲笑丘吉尔对这位假将军的赞助，因其名下并无一兵半卒。事实上，罗斯福不仅疑心戴高乐的帝国主义野心，还怀疑丘吉尔本人的野心。罗斯福希望通过美国驻维希大使馆使维希政府中立，但他对法国人的整体印象不佳，觉得战后和解没有维希政府与戴高乐插足的份儿。罗斯福认为，做决定的4个大国将是美国、英国、苏联与中国。总体情况就是，戴高乐—最初仅仅有着象征性价值，甚至对丘吉尔来说也是如此—就是一条尾巴，却要摇动一只很大的狗。他要以某种方式让自己和他那受辱的国家得到这些重要大国的认真对待。

戴高乐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确保所有志愿者都是在独立的法国国旗下行动，而不是被分配到英国军团中。因此，在他抵达伦敦10日内，戴高乐便说服丘吉尔认可他为“自由法国”的领导人。他在离摩尔街不远的卡尔顿花园安顿好之后，接着将为数不多可以为己所用的军队组织了起来，其中包括仍在英格兰的法国军队、英国当地法国人群体中的志愿者，还有一些海军部队。戴高乐的下一步棋就是限制对伦敦的依赖，让他作为法兰西帝国领导人的身份得到认可，并在海外法国领土上建立司令部。尽管法属北非以纪念米尔斯克比尔港为理由之一，依然支持着维希政府，但是像乍得、喀麦隆与法属赤道非洲这样的中非殖民地都支持戴高乐。于是戴高乐与丘吉尔在1940年9月发动了一场联合远征，以接管法属西非的重要港口达喀尔港。

丘吉尔想阻止德国将达喀尔港作为大西洋战役的基地，戴高乐则认为接管达喀尔港将在整个法属非洲领地上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并为他提供一个新司令部。然而，结果却是一场惨败。尽管最终计划是由丘吉尔提出的，挨批评的却是戴高乐。因为，“自由法国”一方口风不严，让维希政府及时派出了海军增援部队。丘吉尔力挺戴高乐，但是在罗斯福看来，这场灾难毁了戴高乐。维希政府据此大做文章，将

自己描绘成保卫法兰西帝国、对抗叛徒戴高乐的政权。据戴高乐的一位同事所言，戴高乐看到法国人自相残杀的场景，受到了极深的影响，以至于“他再也不是他自己了，再也没有高兴过”。

尽管如此，战争的方向与法国国内局势的发展都渐渐开始以有利于戴高乐的方式运作。对德国的反抗慢慢展开了，最终将有超过200个种类各异的反抗群体，不论它们是受独立思想或戴高乐主义影响，还是来自社会党或是共产党—在希特勒于1941年6月入侵苏联后，信奉共产主义的反抗者就登场了。“抵抗运动”（La Résistance）涵盖了形形色色的人所开展的各式各样的活动—从在墙上写下宣传标语、办小报纸，到向伦敦传递情报，或是进行地下活动。此外，具有相当规模的有组织的团体也在逐渐形成。例如，“社会党行动委员会”（Comité d'Action Socialiste）、“自由射击者”（Francs-Tireurs）、“解放者”（Libération）、“战斗”（Combat）与“国际共产者阵线”（the Communist Front National）。虽然这一变化令人振奋，但也给戴高乐制造了一些麻烦。其中之一就是，这些团体从英国特别行动委员会（SOE）那里获得了资金与武器支持，因此戴高乐本人就被排除在外了。他通过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类似情报机关与援助服务机构来进行反击，但要对付这些独立且具有政治多样性的群体就困难得多。他一直以来都把重点放在建立一支身处法国之外的“独立法国”军队上，希望这支军队可以与同盟国并肩作战。可是，戴高乐并没有制订战后时期的政治计划。

1942年1月，戴高乐派让·穆兰（Jean Moulin）回法国，协调几个非共产主义团体。穆兰之前是沙特尔市所在的厄尔-卢瓦尔省省长[19]，是抵抗运动中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但是，当社会党的工会会员克里斯蒂安·皮诺在3月出现，要求戴高乐声明战后目标时，戴高乐相当茫然。如果说戴高乐鄙视维希政府的话，那他也并不赞赏动荡的第三共和国。在数周的争论不休之后，戴高乐发表了一份宣言，许诺恢复民主自由，实行社会保障制度与中央经济规划，并赋予妇女选举权。当宣言在地下报刊上发表时，它赢得了如潮的好评。这也表明，戴高乐不是什么独裁者，因此增强了让·穆兰的影响力。

由于上述原因，以及“自由法国”军队在1942年6月利比亚的哈肯井之战（the defence of Bir Hakeim）中备受瞩目的表现，英国第八军团得以重组并在北非的阿拉曼打败德军司令埃尔温·隆美尔，情况开始好转。因此，当戴高乐发现自己对同盟国军队于1942年11月入侵法属北非毫不知情时，就更加震惊了。罗斯福已决定扶植自己人—亨利·吉罗（Henri Giraud）将军，以取代戴高乐。吉罗反对德国，但却拥有维希政府的支持。因此，吉罗被美国人从直布罗陀偷运出了法

国，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将军给他的代号是“关键人物”。吉罗还被安排担任北非法军总司令，这支军队的人数是戴高乐5万兵力的近5倍。

这对戴高乐是个沉重打击。对此，他以其特有的干劲予以反抗。他展示了自己对其他支持自己的法属领土的广泛吸引力；他向俄国示好；他反对吉罗的政治路线，使自己的政治路线激进化。由于德国在1942年11月占领了自由区作为对同盟国军队登陆的回应，维希政府看起来越来越无足轻重了。而且，法国国内的反抗日增。由此，戴高乐能够轻易表明，吉罗不像自己一样，在抵抗运动内部有群众基础。尽管后来让·穆兰遭到抓捕并被折磨致死，但他最终成功创建了统一的“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助戴高乐一臂之力。对戴高乐更加有利的是，吉罗是个呆板的人，在政治上十分迟钝，以至于他把美国人也得罪了。戴高乐将自己的司令部迁至阿尔及尔，或多或少地迫使罗斯福与丘吉尔让他与吉罗共同主持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1943年6月，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他们请求戴高乐看在合影的份儿上，至少与吉罗握握手。但是，戴高乐已经开始排挤吉罗了。很显然，到1943年年底，戴高乐已经是“自由法国”的绝对领袖了。他凭借着巨大的决心与日益娴熟的技巧，拿着手中的弱牌与大玩家对阵。但是，游戏还没有结束。

对于维希政府的领导人来说，事情也还没结束，尽管自由区在他们脚下已经消失了，尽管由此产生了法国的真空状态，但维希政府依然正式存在着，而德国也加强了控制。如今，对犹太人的系统性驱逐及其他措施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继驱逐4000名犹太人之后的，是发生在1942年7月，令人震惊的“春风行动”（Spring Breeze Operation）。在这次行动中，法国警察参与围捕12884名犹太人，其中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将近7500人被关押在闷热的冬赛馆长达5天之久。冬赛馆是一个带顶棚的自行车赛车场，里面没有洗手间，只有一个水龙头。有些人被逼得自杀，而那些试图逃跑的人则遭射杀。在新黑衫军“法兰西民兵”（Vichy Milice）的协助下，驱逐出境的工作还在继续。“法兰西民兵”是一个成立于1943年1月的民兵组织，他们与盖世太保狼狈为奸，二者几乎无异。

与此同时，各行各业都在为德国战争而投入地工作。结果截至1944年，包括战俘与被征用的劳力在内的400万法国人—占到了男性劳动力的37%—直接为德国效力。但是，维希政府在1943年2月，针对20岁的法国男青年颁布的《义务劳动服务法》让人们对其日益增加的敌意急剧增长，并导致许多年轻人逃到丛林之中，以逃避征募。虽然人们讨厌赖伐尔，因为他曾公开宣布，希望德国赢得战争胜利，但

许多人仍视贝当为民族英雄，觉得他为了自己的人民而勇敢地自我牺牲。事实上，战后维护贝当的那些评价极大地反映了上述观点。贝当的拥护者视其为“盾牌”，这正是贝当的自我标榜，保护法国免受来自敌人的更大折磨。如果说他偶尔犯错的话，那往往是狡猾的职业政客赖伐尔对他的影响。

然而，如今很难再将元帅看作一个被刻意打造成的、超脱于政治之上的人物了。因为，他最初将民族革命强加在了一个被奴役的国家，强加在一个没有议会来表达民意、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家，这种行为完全就是令人作呕的政治机会主义。由于停火协议的条款不需要修改宪法，所以正如其他被希特勒占领的国家一样，法国政府只能维持基本功能，将任何政治改革推迟至国家光复之时。然而与此相反，正如罗伯特·帕克斯顿（Robert Paxton）所言，维希政府“发起了政治报复与排除异己的党派倡议”。1940年10月24日，贝当在蒙图瓦尔的元首专列上再一次与希特勒会晤，以使他的合作承诺正式化，这也是一项高度政治性的决定。之后，贝当向全国人民宣告：“为了在新欧洲秩序框架下维护法国统一，我十分荣幸地在今天走上了合作的道路。”

但这是一项愚蠢的交易。贝当以为，他能够通过成为希特勒新欧洲秩序的合作伙伴，而为被打败的祖国重新赢得地位，让法国重新回到历史的一边。“就像在两个军人之间那样”，贝当向德国元首做出这项提议，希望德国能释放囚犯，允许自由区与占领区重新统一，使法国再度成为一体。作为一个诱因，他也提议派遣人数减少了的法军参加在非洲的法德对英联合作战。但希特勒更愿意进攻英国，接着是苏联，因此对与他所鄙视的手下败将法国抛出的合伙关系并不感兴趣。他只想通过囚犯挟持法国，与此同时，从法国榨取经济利益。如果他能依靠维希政府抵抗“自由法国”在北非的任何举动的话，那就更好了。所以，他欣然接受了老元帅的合作请求，但并未做出实质性让步。相反地，他向法国施压。戴高乐机智地打着他的一手差牌，而贝当却在一开始就天真地丢掉了手中的王牌，从而失去了讨价还价的能力。“凡尔登英雄”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了德国的卫星国。在蒙图瓦尔之后，往好里说，贝当与赖伐尔已陷入了玩一场不可能取胜的比赛的境地。他们在毫无尊严的依赖中，试图寻找一些独立余地。

贝当与赖伐尔之间，依然剑拔弩张。赖伐尔倾向于走更强硬、更具意识形态意味的合作路线。这类合作团体的代表是像作家罗伯特·巴西拉奇（Robert Brasillach）与德里尤·拉·罗歇尔（Drieu La Rochelle）这样公开的法西斯主义者、报纸《我无处不在》（*Je suis*

partout）以及具有影响力的巴黎电台。这些人觉得，维希政府的民族革命过于软弱、保守，赖伐尔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这导致他在1940年12月时被免职。在短暂的间歇后，反犹、仇英的海军上将弗朗索瓦·达尔朗（François Darlan）取代了他的位置。达尔朗更加支持元帅的观点，他还实行了更具创意的规划方式。正是在达尔朗任内，贝当试图通过“作秀审判”使维希政权合法化。这场被操控的作秀审判将证明第三共和国领袖对法国战败负有责任。希特勒同意了，他想要通过审判证明法国自己对战争负责。但是，它成了一场彻底的失败，因为，莱昂·布鲁姆把审判倒了过来，他抽丝剥茧地说明，法国的失败应归咎于总参谋部人员，而非政治领袖们。盛怒的希特勒中止了审判。布鲁姆与达拉第被移交给德国人，最后被送往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应希特勒的要求，赖伐尔回来参与战争的最后阶段，完成“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据说，贝当的“盾牌”至少保护了许多法国犹太人。但是，当然，他一开始就自行采取了一些针对犹太人的压制性措施。而且，应德国要求，他成立了处理犹太事务的部门，即“犹太事务委员会”（Commissariat Général aux Questions Juives），并为此雇了2500人。最终，这成了所有行动中最具破坏性的一项。维希政府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数据库，这本是德军分内的事，德国人如果不投入巨大人力花费的话，原本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而维希政府却根据警务合作的协议，自愿为德军做这件事。截至1944年7月，将近有8万犹太人被遣返。赖伐尔与贝当都不关心这些犹太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尽管一些民众对此感到不安。劳伦·乔利（Laurent Joly）[20]确实是对的，他在详尽地研究了委员会之后，得出的结论是：“继罗马尼亚之后，维希政府统治下的法国无疑相当自愿地在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中，扮演了最不道德的卫星国角色。”

1944年春，随着解放的迫近，美国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仍将戴高乐排除在外，而戴高乐本人能够感觉到，前面有更大的挑战在等着自己。尽管“自由法国”军队人数在1943年的意大利战役中已上升至12万人，而到1944年进入法国时已超过30万，但相对来说，他们依然微不足道。那么，戴高乐要怎么做才能取得某种与同盟国平起平坐的地位，以确保法国将直接恢复独立统治，而不是处于同盟国的占领之下呢？随着同盟国在西欧的登陆日逼近，他如何才能向美国人表明，法国人民的选择是自己，而不是维希政府呢？而且，也许最大的挑战是，他如何才能让法国国内抵抗运动在重获和平后放下武器，尊重政府权威呢？

德国人自己就解决了维希政府的问题。虽然贝当可悲地尝试进行

仲裁，赖伐尔试图通过在紧急关头拼凑起共和政府来预先制止戴高乐接管，但他们在1944年8月20日被俘后又被挟持到了德国，这让他们进一步名誉扫地。与此同时，让·德·拉特尔·德·塔西尼将军率领的一支自由法国军队在南部入侵时表现突出，菲利普·勒克莱尔将军领导的装甲师在诺曼底强攻中与盟军并肩作战，而马里-皮埃尔·柯尼希将军在布列塔尼十分活跃—显而易见地，他们受到了人民的热烈欢迎。此外，法国国内抵抗组织正在暗中破坏德国的交通运输系统，不断袭击德国纵队，并打了一些实实在在、代价高昂的仗。当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说，诺曼底的抵抗运动相当于15个师的时候，这些军队的集体贡献得到了认可。戴高乐仍然无法进入法国，但他成功地在6月中旬对法国进行了短暂访问。他在巴约受到的热情接待反映了他的受欢迎程度。如今，他应邀前往华盛顿。在那里，无论罗斯福有多不情愿，他还是非正式地承认了戴高乐的临时政府“有资格管理法国”。

但是，当戴高乐在8月20日返回法国时，巴黎反对德国人的起义已经开始了，他发现艾森豪威尔仍然想要绕过巴黎，向莱茵河全速进军。在戴高乐看来，艾森豪威尔的辩解“绕道去法国首都会丧失宝贵时间”有些尴尬。但是，戴高乐决意获得法军夺回巴黎的象征性价值，他还考虑到法军可能被溃退的德军摧毁，而且巴黎提前的起义使人们再度担心被共和党人接管。于是，戴高乐说服艾森豪威尔派遣勒克莱尔将军的装甲师前往巴黎。由此，法军夺回了城市。1944年8月26日，戴高乐沿着香榭丽舍大道凯旋前进。当戴高乐明白无误地表明，抵抗运动如今服从于重组的政府时，他庄严地在巴黎市政厅宣布，首都的解放是由法国人自己实现的，而且只由法国人实现。任何人都有可能对此存在误解，但法国人不会。

这场盛大的欺骗将真实的抵抗运动转变为一种对民族神话的支配，并使得戴高乐能够大胆地夺取控制权。它也使法国在丘吉尔的些许帮助下，于1945年2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以获胜的同盟国成员身份得到认可，并因此享有共同占有德国的权利。这个骄傲、难以相处的男人让一个经历了惨败、受辱的国家奋发自救。或者，正如马尔罗更加鲜明地指出的，戴高乐“将法国的尸体举起来，说服全世界它还活着”。这是一项令人钦佩的成就。

之后就是清算。赖伐尔在一次糟糕的审判后被判死刑，在自杀未遂后被射杀。贝当的死刑被戴高乐减刑为终身监禁，因为戴高乐觉得元帅是老糊涂了。至于通敌叛国的作家们，罗伯特·巴西拉奇被处决了，而德里尤·拉·罗歇尔选择自杀。舞台上的明星，例如萨沙·吉特里、阿尔莱蒂，或是像莫里斯·切瓦力亚这样的歌手，事业都受到了冲击，而路易斯·雷诺的汽车公司则被国有化了。有些人藏匿在法国境

内，或是逃往西班牙。将近10万人被判处各种刑罚，从剥夺公民权利到死刑，但不足800人被处决。理所当然地，法国已经开始对纳粹“合作者”进行不受控制的、非正式的清洗。抵抗运动战士向法兰西民兵组织成员开火，地方团体对明显是叛徒的人处以私刑，并将与德国士兵发生过性关系的女人的头发剪掉，也有些人出于个人原因报复邻居。情况十分不妙。

接着，法国忘却了这一切。对戴高乐而言，他身为执政者，有这么做的理由：他想加快法国的复兴进程。正如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后来所持的观点那样，戴高乐官方的观点是，共和国本身并未参与遣返活动或非法维希政权的其他行动，所以，法国没有留存任何关于德国占领历史的官方记录。这样说是因为，德国占领时期的官方记录会削弱一则有益的神话，即法国举国上下都支持抵抗运动，通敌叛国的只是无论如何迫于德国压力而不得不那么做的反常个体。

这种令人放松的否认状态直到25年后才开始受到罗伯特·帕克斯顿（Robert Paxton）等外国历史学家与影视作品的质疑，例如，影片《悲哀与怜悯》（*Le Chagrin et la pitié*，马塞尔·奥菲尔斯1971年的电视纪录片），以及路易斯·马勒1974年的电影《拉孔布·吕西安》。《悲哀与怜悯》只获准在影院进行有限放映，路易斯·马勒则一直感觉，由于他展示了法奸相对平凡的一面，法国人从未原谅过他。官方对前维希政府要员的宽容，意味着勒内·布斯凯（René Bousquet）、莫里斯·帕庞（Maurice Papon）与保罗·图维耶（Paul Touvier）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需要面对掺假的、几乎是死后才到来的正义审判。当时身为警察局长的布斯凯对1942年的大围捕负有责任，帕庞也参与了对犹太人的遣返，而图维耶作为法兰西民兵组织领袖，犯下了谋杀平民的罪行。图维耶被教会的一个派系藏匿多年，而布斯凯与密特朗、帕庞交好，做过巴黎警察局长，也当过部长。

1995年，希拉克总统确实就政府遣返犹太人道歉，教会也就支持维希政府的行为表示歉意。但是，2007年帕庞去世之际，争端再起。直到2009年2月，政府的直接责任才最终得到法国最高法院—法国最高行政法院的认可。法国否认历史的状态居然持续了半个多世纪，这一点说明了国民心理创伤之深。

第十一章

冷战中的第四共和国

人们一直担心，仅仅某个外交上的失误便会引爆一场热战。

在戴高乐担任总统的战后临时政府之后，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于1947年1月成立。它的名声并不好。事实上，当时它是许多令人厌烦的玩笑所嘲讽的对象。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因之一就是战后实行的按比例投票制度。这一制度分裂了选民，并将联合政府强制性地加之于多个政党身上，而这些政党彼此又觉得实在难以共事。结果自解放后开始，直到这种体制崩溃的1958年，法国出现了不少于26届政府。这种体制走向分崩离析，以致被第五共和国取代，是由于它未能处理好阿尔及利亚危机。这些联合政府在国民议会中定期失败，取而代之的则是人们过于熟悉的另一个联合政府班底。由此引发了断断续续的危机与民众普遍的冷嘲热讽。国家可能整整一个月没有政府，人事一变再变。人们过于熟悉的候选人尝试组建新政府，却未能取得国民议会的同意。这一例行的抢椅子游戏，启发人们创造了一套相当滑稽可笑的专有词汇。每个想要成为总理的人都要依序咨询国民议会，“绕着惯例跑”（tour de piste），却相继失败，因为危机“尚未足够成熟”（la crise n'est pas mûre）—直到最终东拼西凑地达成某种妥协。这并不是最优秀的一种议会民主制。

然而，这仅仅给出了战后法国的一个片面、虚假的画片。首先，它没有考虑到国家在被战争毁灭后再度站起来的困难。不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损害有多大，它只影响了法国北部、东部地区。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战斗本身、盟军数年轰炸、德国复仇、抵抗运动暗中破坏，当然还有战争在1940年开始时造成的破坏，如今损害延伸到了更加广阔的区域。同时，尽管这次战争带来的58万总伤亡人数相对较低，但近半数为平民。卡昂与海峡港口之类的城市被毁，铁路网处于一片废墟之中，工厂彻底废掉，数百万人无家可归。1938年的工业产量已经够低了，而1944年的数据只有它的一半。农产量也低，国家财政受到严重影响，配给制持续到了1949年。此外，在这次全球性冲突之后，法国的虚弱也在法兰西帝国内泛起涟漪。在法属印

度支那半岛，胡志明当时正试图建立越南共和国，而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与突尼斯也发生了相似的独立骚动。事实上，虚弱的法国如今发现，战后世界已与1939年的情形大不相同。

一个根本性的差别就是苏联崛起，在东欧占据了支配地位，与此相应，法共发展成法国第一大党。由于之前右翼政党支持维希政府，如今已是名誉扫地。激进党因为让公众联想到第三共和国的屡次失败，也陷入了衰退，戴高乐被迫与从抵抗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三批人马组建联合政府。这三个团体也是1945年10月选举中明显的优胜者：共产党获得159个席位、人民共和运动（MRP）得到150个席位，而社会党争取到146个席位。虽然教会统治集团之前支持贝当，但许多开明的天主教徒渐渐参与到抵抗运动中，而且人民共和运动—尽管有着相当难以置信的口号“通过法律手段革命”—在接下来的几年间，将发展成颇有影响力的政党。当然，戴高乐心知肚明，这三个政党是极不相称的。不仅因为共产党与社会党之间的竞争关系，也不仅因为这两个党相信世俗教育，而人民共和运动则再次提出了恼人的支持天主教学校的问题，还因为共产党的政策，然而包括共产党领导人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在内的几名法共成员，如今已揽下了重要的部长职务。

从来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谁的多列士，1900年出生在加来海峡省。按照当时的习俗，他从12岁时就开始工作了。他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包括在煤矿上打短工，之后他成了共产党官员。这个聪明又任劳任怨的工人在1925年当上了政务首长。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初次访问苏联。1930年，他已经成了共产党秘书长了。他为人聪明，做事有条不紊，工作勤奋努力，还博览群书。多列士在担任部长时，得到过戴高乐的高度评价，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二人均以自己的方式看到了议会政治之外的东西。而多列士的问题更多地在于他被囚禁在自己的形象里，以至于享受起了与之相伴而生的奢华生活。但是，在战争刚结束的那段时间里，多列士的形象与纪律严明的政党机器都不是缺点，而是优势。

新政府实行了一套完整措施，这将从根本上塑造战后的法国社会。如之前许诺的那般，法国引入了社会保障制度并赋予妇女选举权，成立了法国电力公司、法国燃气与法国航空。并且，政府将法兰西银行、法国商业信贷银行、法国兴业银行，以及30多家保险公司与贝利埃汽车公司收归国有，加上之前已实现国有化的雷诺汽车，法国控制了经济领域的大部分。戴高乐在1946年1月任命让·莫内（Jean Monnet）为国家经济规划委员会负责人，如此一来，法国未来繁荣昌盛的基本机制已经就位。只不过，法国局势中三个急剧的变化开始

让管理这个新共和国变得异常困难。

第一个变化就是，戴高乐与以人民共和运动及社会党为首的党派就新宪法所发生的冲突。身为总统的戴高乐为避免社会动荡，想要建立强大的行政部门，而以人民共和运动及社会党为首的党派，则希望有一个强大的议会来保障民主。当戴高乐意识到，他很可能在针对该问题举行的全民公投中失利时，便突然在1946年1月辞职—他孤注一掷地认为，这一惊世之举会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并将他召回。但是，当他真正被召回时，已过去了12年。第二个，也是更根本性的变化，即1947年4月冷战的开始。冷战毒化了社会氛围，并导致共产党部长纷纷被解职，因为他们拒绝支持由社会党人保尔·拉马迪埃（Paul Ramadier）领导的政府。这个政府于同年11月垮台。

第三个变化是1947年11月由戴高乐创办的法兰西人民联盟（RPR）—这个“法国人民的集会”并不单纯是个政党，而是一场“运动”。因此，正是戴高乐本人加重了社会动荡，因为事到如今，法国的领导者们不得不由一群被挤压成中间派别的人民共和运动、社会党、激进党，加上攻击它们的左派的共产党以及来自右派、日益具有右翼倾向的戴高乐主义者构成。1948—1952年，法国政府更迭了10次，却主要在同一群人中流动，这几乎没有提高政府身为权威的形象。法国是冷战的主战场，而冷战基本上是美国与苏联在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时通过代理在欧洲打的一场仗，后来战场又转到亚洲，演变成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由于双方如今都拥有并可以使用核武器，若在欧洲挑起直接的军事冲突，会唤醒两败俱伤的恐怖幽灵，所以战争主要是以意识形态、政治及经济的形式展开。但是，人们一直担心，仅仅某个外交上的失误便会引爆一场热战。所以，欧洲局势剑拔弩张。法国尤其如此—这种担心让巴黎的一些知识分子一直保持着整装待发的状态。在欧洲，斗争的焦点是分裂的德国，以及德国是否能够获准重新武装的问题，后者对法国来说是个痛苦的问题。

德国占领、抵抗运动、冷战与持续的政治冲突让人应接不暇，更别提集中营的种种惊骇之处了。它们无疑使作家、艺术家，甚至当时流行歌手们的作品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事实上，紧承战后年代的一个标志性形象正是位于巴黎圣日尔曼德佩区的“禁忌”夜总会的歌手—“存在主义的缪斯”朱丽特·格蕾科（Juliette Gréco）。她衣着得体而简朴，穿着黑色紧身毛衣、宽松长裤，吟唱着让-保罗·萨特那首关于行刑者的、令人胆寒的小曲《白色长袍的街道》。包括作家与词典作者雅克·普莱维尔及雷蒙·格诺在内的知识分子们对此喜闻乐见。

与平·克劳斯贝（Bing Crosby）时代的英美流行歌曲相比，法国香颂当然要成熟、复杂得多。而且，它反映了当时更深层次的焦虑与

政治冲突。格蕾科曾目睹母亲与姐姐被驱逐出境，她被法兰西民兵组织殴打后，扔到了大街上，当时她只有15岁。诚然，在当时激昂的社会氛围中，存在主义变成了一种别致时尚的东西—鲍里斯·维昂在《岁月的泡沫》（*L'Écume des jours*）中，将萨特滑稽地刻画成大师“让-索尔·帕特雷”—但是，那是因为那个时代的所遭受的考验已将哲学带入了广阔的世界之中，而且如萨特与阿尔贝·加缪这样的重要人物也创作小说和剧本。这两人以惊人的努力—就像西蒙娜·德·波伏娃写作关于妇女从属地位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第二性》一样—尝试解决世界范围内明显的意识形态冲突，这正是日丹诺夫之前定义过的意识形态冲突。

尽管法国当下正在接收美国马歇尔援助的资金，也在吸纳美国的爵士乐、电影，当然还包括口香糖［广为人知的叫法是“施万古姆”（schwangum）］,但马克思主义已在知识分子与大学中日益流行起来。一方面是因为共产党具有明显的优势；另一方面，更深刻的原因是，战争进一步抛出了关于欧洲文明的问题，而且人们通常渴望着社会大变革，希望出现一种新型的、更具包容性的社会。因此，马克思主义成了一些人的精神家园，成了另一些人迷恋的对象。此前，萨特的《现代杂志》刊登了一篇针对加缪的作品《反抗者》所写的评论文章。二人以各不相同的方式反映了严肃作家在处理20世纪50年代核心问题时的困难。

在某种程度上，萨特的应对方式有些奇特。他的长篇战时作品《存在与虚无》的内容比其标题有趣得多，其中描绘了一个凄凉的存在主义场景：人生活在一个没有神的世界里，失去了生存目标。他可以通过“背信弃义”来隐瞒这一事实，也可以试着给自己的生命以意义，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被迫获得了自由。但是，他的情况更具悲剧意味—他既无法完全理解自己，也不能完全理解别人—萨特往往将人际关系形容成完全无法忍受的，正如他在戏剧《禁闭》中所表现的那样。

显然，从这个极端主观的起点发展到强调历史与社会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但萨特觉得，自己在道义上必须处理当时社会上紧迫的问题。他通过两条不寻常的捷径试图实现转变。第一，萨特认为，在争取个人自由时，他也在含蓄地争取着所有人的自由。第二，当萨特称工人阶级为“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他们“活在马克思主义之中，践行着马克思主义”时，萨特奇怪地将观念与历史事实混为一谈。由于他断言，马克思主义是时代所必需的哲学，他又变成了一个忧心忡忡还有些耽于幻想的旅伴。最终他断言，这一切只是一场梦。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加缪从没做过这种梦，尽管他最初也在小说《局外人》中用荒诞主义的笔触描绘了疏离感。作为《战斗报》主编，加缪在抵抗运动中更活跃。他出身法属阿尔及利亚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更了解普通人的生活。可以说，他的战争寓言《鼠疫》没能抓住重点，因为战争并不是像鼠疫那样客观的存在；他也一直没澄清自己在殖民问题上的立场；而且，他在《反抗者》中坚持反叛而非革命的主张也缺少详细论证。但是，加缪在1960年死于车祸时，已经能察觉到，自己的观念是合理的。

第四共和国呈现出的极大讽刺在于，政治的动荡几乎无关国家重建的宏旨，它也没有阻碍一个相当具有创见的外交政策出现。而且，在这两个领域内均颇有感召力的这位人物是来自科尼亚克白兰地生产商世家的一位落选者—让·莫内。他早早地离开了学校，既没成为伟大作家，也没变成演说家，但是根据一个不算夸大其词的说法，他“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要成功地”“变成了无数国家与政府首脑的至交”。尽管他与戴高乐年龄、出身相仿，尽管他的成就至少也同等重要，二人却有着天壤之别。让·莫内对历史或民族国家的霸主地位一点都不感兴趣。他关心的是以务实的方式把不同民族的人聚集到一起，避免发生毁灭性战争。他与戴高乐旗鼓相当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位游历广泛的世界主义者能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合得来。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让戴高乐对他起疑心了。所以，在1946年1月辞职前，任命莫内负责主持法国重建规划的戴高乐将军，在这件事上的所作所为值得人称赞。

莫内非凡的职业生涯也为自己做了代言。在少年生涯末期，他在英格兰学习了两年商业经营方式后，把自己的科尼亚克白兰地卖到了从苏联到美国的世界各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法国驻伦敦盟军内部海事委员会代表，他创造出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进口商品联营制。1919年，莫内在31岁时成为国际联盟副秘书长。1923年，他离开国际联盟，重组家族产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几年，他参与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在旧金山办银行，协助几个东欧国家恢复经济，还应邀在中国用两年时间重组铁路网。“二战”爆发时，他成了英法委员会领袖，负责协调战争补给，并与丘吉尔亲密无间地合作。在最后时刻，为避免法国投降，莫内向丘吉尔提议组建英法联合。但是，当停火协议签署时，莫内告诉戴高乐他们会产生意见分歧，于是没有加入戴高乐阵营，而是去了华盛顿。在那里，他成了与罗斯福关系密切的顾问。他成功说服罗斯福在《胜利计划》下供应军火。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称，此举将战争缩短了一年。1943年，罗斯福派莫内前往阿尔及尔，与“自由法国”政府共事，培养吉罗，并让吉罗与戴高乐和平共处。

1945年秋的国有化为莫内的经济计划提供了有利背景，但是，他急于避免官僚主义与政府各部委间的地盘争夺战，因此，他将重建任务包装为一项行政工作，并使他的委员会获准以一个由专家组成的独立机构形式存在，这些专家直接向总理汇报工作。他在轻松友好的氛围下，与一小队忠于职守的专家一道，定期与雇主、工会磋商，最终提出了一份五年经济复苏计划。事实上，由于国家破产了，该计划需要1947年的马歇尔计划提供生命线。马歇尔计划附加了具有挑战性的经济条件，但这些条件最终是有益的。美国不仅要求法国保持收支平衡，控制通货膨胀，还坚持让法国实行自由贸易。这实际上是迫使一个相当落后、受保护的经济为美国商品敞开大门。这使得美式生活方式以可口可乐与好莱坞电影等形式被引入，法国遂感受到巨大的文化冲击。虽然如此，一直以来作为法国与乔治·马歇尔之间联络人的莫内有头脑地吸收了美国资金，将其灵活地融入自己的计划之中，并优先考虑了基础产业与基础设施。如果说，最初的成绩有好有坏的话，那么1947—1952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将产量提高到了战前水平，而1952—1957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则开始了经济扩张，这将使战后30年被冠以“黄金三十年”的美名。

但是，德国问题再次崭露头角，一部分原因是，德国与法国就萨尔与鲁尔地区钢铁产量所有权产生了争端，再度唤起了战争的幽灵；另一部分原因是，德国之前被排除在北约组织之外。成立于1949年的北约是为实现西方联盟军队的统一指挥而建。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对一个可能的欧洲问题解决方案做出猜测，1948年海牙大会号召建立一个“欧洲的合众国”—这个术语正是整整100年前维克多·雨果在一个类似的会议上所使用的—动机是立即实现法、德和解，并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打造一个繁荣、自强的欧洲。

莫内的行事方式有他的典型作风，他决定立刻将抽象的观念化为具体的现实，自下而上地一举解决两个问题。他觉得法国外交部长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是理想的合伙人。舒曼之前生活在德国，在那里有亲戚。1950年，莫内与舒曼提出了后来被称之为“舒曼计划”的欧洲煤钢共同市场方案。在当时，煤与钢是经济的两大基础资源。它们将由一个独立的权威机构控制。6个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与卢森堡）加入了这个欧洲煤钢共同体，由莫内担任主席。

杰出的莫内推动了欧洲进一步的融合。正如他的传记作家提醒我们的那样，多年来，无论政府的政治面貌如何，对莫内总是言听计从。随着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冷战蔓延开来。美国向西欧施加了越来越多的压力，要求西欧为自卫做出更多努力。这就提出了不受欢

迎的德国重整军备的问题，更棘手的是，它提出的不仅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问题，还是东方与西方交战的问题。舒曼本人反对德国加入北约并在其庇护下重整军备。但是，莫内再次试图将问题置于更大的背景下加以解决。他提议组建欧洲防卫共同体，如此一来就能够管理一支包括德国军队在内的欧洲联军。这是一项别出心裁的折中方案，它强调了欧洲独立于美国而存在—为此，莫内不得不安抚美国人。安托万·比内（Antoine Pinay）领导下的1952—1953年间的法国政府，于1952年如期签署了条约。比内是个不同寻常的人物，因为这位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之前曾投票支持贝当获得全权。但是，提出这项计划的法国却在让自己的议会批准条约时遇到了麻烦。

这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政治上的缺陷。尽管比内抑制住了通货膨胀，但限制了小店主获得的利润，他们如今在右翼煽动者皮埃尔·布热德（Pierre Poujade）的领导下，组织了一场强大的政治运动。平民主义者布热德时常威胁比内，要“脱掉他的外衣”。法国也存在暴力示威，反抗美国让德国重整军备的施压。政府如此缺乏权威，以至于比内及未来两年间他的两位继任者都不敢冒险将批准条约的议案摆在国民议会面前。1953年的法国总统选举把政府缺乏权威的事实暴露在一片嘲笑声中。因为，当衣着华丽的共和国卫队需要在寒冷的日子里集结在圣克卢桥边，护送新总统进入巴黎时，卫队不得不日复一日地重复这个动作，直到第13次投票选举出了平淡无奇的勒内·科蒂。无论如何，欧洲军队这一议题具有极高的象征意义，它释放出了近乎宗教狂热般的激情。虽然该提案得到了人民共和运动的基督教民主党支持，但戴高乐主义者持反对意见，理由是法国如果没有自己的国家军队，就不再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了。其他党派也存在分歧，许多议员担心，一支欧洲军队势必导致欧洲统一。

雪上加霜的是，该争端与同样具有争议性的殖民问题产生了矛盾。在此之前，1954年5月，法国在奠边府战役中惨败于越南独立同盟。人们对法国能否被视为帝国主义大国的讨论如今被纳入了对其欧洲地位的质疑之中。法国在印度支那半岛表现不佳。而且，随着殖民冲突与冷战的融合，法国战争投入中由美国支援的比例高达80%。[21]《世界报》刊出了长长的法国被俘者名单，使得越盟带来的这场屈辱的军事失败变得更加令人尴尬。名单上有许多有着德国名字的外国军团士兵。事实上，当时的情形如此严峻，以至于科蒂总统不得不请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ndès-France）出任总理。对此，雷蒙德·亚伦（Raymond Aron）给出了尖酸评价：鉴于体制已经如此瘫痪，“使孟戴斯成为一名好总理的种种品质，恰恰让他不太可能成为一名好总理”。这位相当具有个人魅力的不俗角色在抵抗运动中有着杰出表现。他曾任戴高乐政府的部长，并获得了有影响力的《快

报》杂志的支持。但是，他来自小党派激进党，而且被视为卡珊德拉式的灾祸预言家—过于独立，聪明过头，还是犹太人。

孟戴斯以惊人的方式处理着印度支那半岛的问题。他宣布说，如果不能在一个月内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他就辞职。孟戴斯以十足的干劲、耐心与技巧同越盟、苏联和中国谈判，同时继续获取英国与美国的支持。谈判直到最后一刻才能见分晓—不过在这“最后一刻”，时钟不得不被暂停了3个小时—但是，他成功获得了一份可以接受的越南分割方案，从而避免了一场迫在眉睫的军事灾难。即便如此，一些基督教民主党党员还是批评他抛弃了信奉天主教的法国人民；而极右分子则怒斥法兰西帝国被一个犹太人给出卖了；无论如何，民众同意了他的方案。当他继续以同样的方式为突尼斯争取内部自主权时，他在国内的地位变得相当高。但是，这就遗留下了欧洲防卫共同体的问题。仅此一次，他犹豫了。他认为，将批准提案放在国民议会面前争议太大，于是试图修订这个方案，但却失败了。最终，在没有政府大力支持的情况下，他提出了欧洲防卫共同体方案—在令人欢欣鼓舞的《马赛曲》中，他见证了提案被否决的时刻。

方案的反对者做出这个决定，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西德在1955年加入了北约，横竖都开始重整军备了。即便提案遭到了否决，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德国人自己的推动，这个问题仍将再度被纳入更大规模的组织融合中。在1957年的《罗马条约》中，欧洲煤钢共同体被合并到更加复杂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之中。居伊·摩勒（Guy Mollet）的社会党政府不顾法共、戴高乐主义者与布热德主义者的反对，批准了这项条约。因此，通过迂回路线，让·莫内的梦想开始成形。

1956年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转折点。对于新成立的、由社会党领袖居伊·摩勒领导的共和阵线联合政府来说，这是表现不佳的一年。该联合政府组建于1956年1月，即使它将一年一度的带薪休假提高至3周，政权也仅持续了18个月。至于法国与英国试图共同阻止埃及的贾迈勒·纳赛尔上校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则以令人屈辱的惨败告终。从中得到的残酷教训是，英、法已不再是帝国主义超级大国了，它们不能再倚靠以往的炮舰外交了。

新组建的法国政府也许能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更有效地将这个教训为己所用。在巨幅墙贴“反对肮脏的殖民战争，投票支持社会党”的帮助下，法国新政府上台了。阿尔及利亚对独立的要求的确是个棘手问题。与突尼斯、摩洛哥不同，阿尔及利亚自1881年起，就正式成为法国本土的一部分。它有3个外省处于内政部长管辖之下。在将近1000万的阿尔及利亚人口中，100万人是大多有着南欧血统

的“法裔阿尔及利亚人”—或曰“黑脚”，因为早期定居者穿黑靴—他们觉得自己与本土法国人一样都是法国公民。

讽刺的是，正是在法国本土更加自由的氛围中，自20世纪20年代起，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才开始被认真地组织起来。阿尔及利亚的少数族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法国而战，他们中成千上万的人前往法国工作，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因20世纪30年代艰苦的经济状况而被政治化了。法国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在工人领袖梅萨利·哈吉（Messali Hadj）领导下的激进倾向，另一种是在费尔哈特·阿巴斯（Ferhat Abbas）领导下的温和倾向。阿巴斯来自主张消除种族隔离的富有家族。但是，1942年，法军崩溃、美军进入阿尔及利亚，开启了新的局面。1943年，费尔哈特·阿巴斯发表《阿尔及利亚人民宣言》，提出阿尔及利亚应获得完全的内部自治权。这导致他很快就被拘禁了。虽然法国做出了一些让步，但为时过晚，力度过小。1945年，阿尔及利亚爆发了一场偏自发性的起义，结果动乱被残酷地镇压了下去，80多名欧洲裔阿尔及利亚人死亡。这成了一种惯例，1947年法国再次重申了同化原则后，不满情绪加深，并最终在1954年爆发了由新组织起来的民族解放阵线（FLN）发动的大规模游击战。

今天看来也许有些奇怪：在其他时候四分五裂的法国政党，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居然达成了普遍共识。对法国政治家来说，失去阿尔及利亚就像失去阿尔萨斯-洛林一样，是难以接受的。而且，孟戴斯-弗朗斯与未来的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都没有严肃认真地对待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意图，他们认为，问题其实出在经济落后上。当摩勒总理写下如下内容时，他唤起了法国“开化的任务”：

退出对法国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因为这将会剥夺法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将法国贬为一个二流、三流国家。而且，对一个社会主义者来说，退出更是无法接受的。因为，这些国家依靠我们来巩固他们的民主制度、保障其基础设施与经济扩张、发展其教育体系，并培训他们的公职人员。[22]

他接着说，如果法国离开了，美国或是苏联就会介入。这种根深蒂固的看法意味着，这场战争被视为了一场伪内战。由于参战的征召部队总数会达到50万人，所以事实上，这就涉及了整个国家，并把筹码加得过高，以至政府输不起了。

这是悲剧的源头，因为它意味着法国无法在政治上包容民族解放阵线。作为对欧洲人被攻击的回应，1955年2月，孟戴斯-弗朗斯派雅克·苏斯戴尔（Jacques Soustelle）出任阿尔及利亚总督。但是，苏斯戴尔下令即刻处决持有武器的被捕叛军，导致局势恶化。莫内通情达

理，他许诺举行自由选举，随后由被选出的阿尔及利亚民意代表来决定阿尔及利亚的未来，但是，这必须是在法兰西联盟的框架之内，而且只有在当地秩序恢复后才能进行。莫内的提案没怎么考虑到当地的现实情况。当他于1956年2月前往阿尔及尔时，他自己就发现了这个问题。那里的法裔阿尔及利亚人群朝他扔西红柿，因为这些人对必然会有利于大多数阿拉伯人的选举不感兴趣。如今，莫内因为看似屈服于暴民而削弱了自己的地位。他虽然已经任命乔治·卡特鲁将军为常驻公使，但他如今接受了这位与“黑脚”并不投机的温和派人士递交的辞呈。他随后任命社会党议员罗伯特·拉科斯特（Robert Lacoste）取代了卡特鲁将军的位置，并授予拉科斯特全权。

来自多尔多涅的拉科斯特外粗内秀。在议会上，他与海外部长加斯东·德费尔彼此恶语相向的唇枪舌剑，让体面的科蒂总统感到震惊。拉科斯特一上任就宣布，他将“搞死”革命军。尽管他确实提出了社会与经济方案，并试图将政府阿尔及利亚化，但他当下关心的是平定骚乱。为实现这一目标，1957年1月，拉科斯特让雅克·马絮将军全权负责，调遣他的8000名伞兵参加一场残酷的战役，以根除持不同政见者，平定持续了8个月的骚乱。吉洛·彭特克洛以此为主题，拍摄了著名电影《阿尔及利亚之战》。但是，法国人试图将这场战争描绘成仅是一场对抗胡作非为歹徒的内斗，这就显得自相矛盾了，因为人们日益清楚地看到，大众基本上都是支持民族解放阵线的。法国只有通过威逼胁迫，才能取得必要的情报。这使得系统地使用电刑—据说是一种“清洁”的严刑拷打方式，女人和男人一样，也会被施以电刑—成了战争继续的核心。无论是在道义还是在军事上，严刑拷打都疏远了大众，其目的因手段不当而变得无效。

自1957年起，阿尔及利亚危机已演变成一场政权危机，因此政治代价也变高了。描述当地的法国反对者及反抗军遭受拷问折磨的内容一经出版，就引发了左派日益加深的沮丧情绪，导致支持民族解放阵线的秘密团体增加，让人们普遍认为也许无法赢得此次战争。这接着又使军队与右派担心被政府出卖。为了先发制人，反抗军军官以及右翼分子在1958年5月发动大规模罢工，使阿尔及尔停摆。他们占领了总督的宅邸，并建立了由马絮将军领导的公共安全委员会—这便是被称作“复活”的军事行动之初期。这个计划旨在推翻巴黎的政权，并让戴高乐重新掌权。

有人时刻向戴高乐将军汇报密谋，但将军并未直接参与其中，因为他想通过合法手段接管。所以，他的立场尽管可能有些模棱两可，但在官方层面上来说是正确的。而且，无论如何，他不需要等太久。由于法国政府已失去对部队的控制权，同时又面临着入侵威胁，科蒂

总统除了向戴高乐求助外，别无他法。

第十二章

戴高乐谱写的黄金十年

不仅戴高乐变成了法国，
而且法国也变成了戴高乐。

戴高乐同意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位于鲁瓦西的巴黎机场，以及位于香榭丽舍大街西端、耸立着凯旋门的、威风凛凛的环岛，并不是没来由的。自1970年戴高乐去世后，时光荏苒，围绕在他周围的争议逐渐散去，戴高乐以20世纪法国最重要政治家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在人们看来，戴高乐是与路易十四、拿破仑比肩的人物，而且他仍然影响着法国当下政治论战话语。如果说，这明显是他作为一名政治家取得的成就使然，那么也许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便是戴高乐这一概念以及他象征的法国之概念。尽管他看起来可能十分固执、傲慢且独裁，但他也大胆、有远见，而且最重要的—他置身于争斗之外。他并不是一个纯粹追逐权力、孤注一掷的男人；相反，如果他无法在可接受的条件下行使权力的话，他就会做好准备放弃权力。如果说他是一个传统的社会保守主义者，那他也是共和派的，是一个对奖励以及与要职相关的不必要的昂贵饰品不感兴趣的人，之前戴高乐选择只领取上校，而非前总统级别的退休金，所以他去世时一点也不富有。尽管他并不是什么圣人，但他确实给人们留下了孤独、高尚、清廉的形象，甚至有些悲剧色彩。他一直都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尽管如此，在1958年5月狂热的社会氛围中，他通过冷静的深思熟虑与精心安排的模棱两可态度，排除困难、重新掌权。尽管在面对阿尔及尔起义者发出“戴高乐万岁”的呼喊时，他宣布自己已经准备好接管局面了，但当人们对他决意实行独裁表示担忧时，他又宣称自己只会在现政府邀请下掌权。最初，戴高乐担任了总理一职，但他坚持拥有6个月的紧急权力，并举行全民公投以制定一部新宪法。法共、社会党的一个党派，以及由孟戴斯-弗朗斯与弗朗索瓦·密特朗建立的一个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新团体对此表示反对。但是，由于政府未能解决阿尔及利亚危机，如今法国面临着一场由军队主导的内战威胁，人们普遍认为，唯有组建一个在全国享有广泛支持的强大新政府，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戴高乐宣布，那将是他的首要任务，但是他一直以来的心头大事就是获得强大的中央权力，不受他所认为的徒劳无益的党派争端限制。而且，考虑到之前自己试图控制这些党派未果的教

训，他不想错失这第二次大好机会。他的新宪法旨在改变游戏规则。

戴高乐的观点是：

政府需要一个首脑，一个领袖。国家需要在这个人身上看到，到底是谁在处理国家的重要事务、指引它的命运。这样一位为全民服务的行政首长，不应来自议会，因为议会是有着各式各样特殊利益的地方。[23]

有人说这段话听起来有点像路易十四的口吻，但客观而言，戴高乐当时是在提出，他权力的合法性直接来自人民，而不是通过他的家族而来自上帝。因此，他应该由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来任命，而不仅仅被执政党所任命；他应该有权通过全民公投或是广泛的总统选举团，来问询民意；他应该自由地任命自己认为合适的部长；而且，他有权在法国陷入危险时便宜行事。

遵循上述策略，由米歇尔·德勃雷（Michel Debré）仓促起草的宪法一点也不清晰易懂，尤其是在关于总统与总理的相对权力方面，而且自此开始，这部宪法引发了许多问题。但是，它与戴高乐非同寻常的地位相契合，也与议会制的突然崩溃相称，议会制之前就因舆论普遍的两极分化与选举的分裂而陷入瘫痪了。因此，当一个抱有敌意的评论员说，“戴高乐只有在他输掉1969年全民公投辞职那天，才实现了民主的合法性”时，这种说法失之偏颇，不仅因为当时不存在看似合理的选择，还因为戴高乐尽管出身传统主义，却自愿成了共和派。

最终，将近80%的投票支持宪法，支持由戴高乐出任总统。如今，戴高乐的职权远远凌驾于议会之上。议会修改立法的权力受到了极大削减。总统具有任命总理、解散议会的权力，遂能够总揽大权。虽然戴高乐确实任命了许多政党领袖出任部长，但他开始大力地使政府去政治化，以至于任命了许多技术官僚与其他未经选举的人担任公职，其中就包括总理。这种做法将成为第五共和国的一项传统。毋庸置疑，戴高乐被人指责为波拿巴主义，但他依然在民主框架内行事，具体做法是获得由新成立的戴高乐党—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UDR）—领导的议会支持。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在新一轮选举中成为最大群体，使左翼政党遭受惨重打击。戴高乐有了这种程度的合法性，就更像是某种共和君主而非独裁者了，不过后来几年间他权势日隆，以致情况有时看起来颇为诡谲，怪诞之处在于，不仅戴高乐变成了法国，而且法国也变成了戴高乐。

最初，戴高乐对阿尔及利亚危机束手无策。他知道，从上一届政府那里继承来的这个“拖累”不仅正把国家搞得四分五裂，还给国家的

经济造成了沉重负担，同时让法国在外交上名誉扫地。然而，即使在戴高乐主义者内部，人们也意见不一——如果说，安德烈·马尔罗或者埃德蒙·米什莱预见到了独立兴许是必然结果，那么戴高乐自己的总理米歇尔·德勃雷、信息部长雅克·苏斯戴尔则强烈反对独立。因此，戴高乐一再拖延时间。他先是访问了阿尔及利亚，在总督府阳台上对一大片欢呼的人群说，他理解他们的处境——那句德尔斐神谕式的、模棱两可的名言是“我理解你们”（je vous ai compris），它使台下欢呼的“黑脚”们嘴中只留下了苦涩的余味。

戴高乐接着遍访法属非洲，并将新宪法中殖民地自决的条款纳入全民公投，以此试图将问题背景扩大化。新宪法条款规定，殖民地将投票决定究竟是分离出去，还是留在类似于英联邦的法兰西共同体内。因为除几内亚外的所有法属非洲殖民地均决定留在法兰西共同体内，这就为最终解决方案提供了一个框架。与此同时，他授予阿尔及利亚的少数族裔以法国国籍，并在君士坦丁宣布，将对现有方案进行优化，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与工作。但是，这一切都太迟了，且与当地采取的严厉绥靖措施几乎不相容。民族解放阵线开始在法国国内发动恐怖主义袭击。而且，战争不仅导致国内出现分裂，还影响了法国在海外的地位。因此，1959年9月，他向阿尔及利亚提供了之前他给其他法属领地的选择。

可以预见的是，这让人们呼喊着遭到了背叛，并由此引发了一场为期2年的暴力政治斗争。1960年1月，阿尔及尔爆发“街垒周事件”（week of the barricades）。这是“黑脚”针对将煽动骚乱的马絮将军召回巴黎一事发起的抗议。在电视上日益具有影响力的戴高乐已将他的讲话稿背得滚瓜烂熟，穿着军装上镜了，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9天后，抗议就瓦解了。但是，随着战斗的延宕，以及诸如乔治·皮杜尔与雅克·苏斯戴尔这些老战友的倒戈，戴高乐被迫快刀斩乱麻。11月，戴高乐当众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的合法地位，以了结此事。

1961年1月，因这一立场，戴高乐在全民公投中赢得了76%的票数。但是，这激怒了高级军官，他们于4月试图在阿尔及尔发动政变。这场政变由4位将军领导，其中包括曾任部队监察长的拉乌尔·萨朗（Raoul Salan）将军。由于巴黎本身处于伞投的威胁之中，戴高乐再次登上电视解读暴乱，最终通过情绪渲染来呼吁人们帮助他，以此结束了讲话。政变在数日内就失败了。5月，和谈开启，但将断断续续地再持续一年，而且法国本身的暴力事件也没有缓解。因为，秘密军队组织（OAS）如今已经形成，他们的首领是已经成为亡命之徒的萨朗将军与戴高乐之前的亲密同事雅克·苏斯戴尔、乔治·皮杜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皮杜尔成立了“全国抵抗委员会”。这是一个模仿战

时抵抗运动的组织。次年，秘密军队组织在炸弹暴力事件中杀死了近2000人。与此同时，巴黎警察也粗暴地对待阿尔及利亚示威活动，1961年10月，在惊人的大屠杀中，至少有70名示威者在死后或是活着时从桥上被扔进塞纳河。

但是，1962年3月，双方最终在依云镇签署和约，并得到了绝大多数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支持。这并未阻止秘密军队组织分子刺杀戴高乐及其夫人的企图。他们在巴黎近郊的佩蒂特·克拉马尔特环岛用机关枪向戴高乐的车扫射。这是戴高乐职业生涯中近30次遇刺经历中的一次。和约也未阻止民族解放阵线战士对那些之前被吸纳进法军部队的阿尔及利亚人施加残忍的复仇。再加上许多“黑脚”被迫撤退回法国时愤愤不平，阿尔及利亚即将到来的独立遭遇了难产。正如一段生动有趣的描述所言：“这是基于摇摆不定的现实政治路径，所采取的血腥产钳式分娩。”但是，这个长期分裂的国家所能做到的就只有这些了。只有戴高乐才能做到，至少他获得了追求更大计划的自由。

或者说几乎获得了自由。使用“几乎”这个词，是因为戴高乐一直表示，阿尔及利亚危机一旦尘埃落定，这些政党便会立即试图除掉他。如今，他不得不面对另一场实力的较量，这场较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自己引发的。他忠实的总理米歇尔·德勃雷以支持维持阿尔及利亚为法国所有而著名。德勃雷为戴高乐计划的第一阶段提供了便利的政治掩护，但戴高乐如今却让银行家乔治·蓬皮杜取代了德勃雷。戴高乐没按照规定与国民议会及蓬皮杜本人商议此事。蓬皮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一名被选定的政治家，他只是勉强通过了认可自己的选举而已。刚刚过去的佩蒂特·克拉马尔特环岛机关枪刺杀事件在戴高乐脑海中依然鲜活。当他决定通过全国人民，而不是按照规定由广大选举团来选出他最终的继任者们，以巩固自己的总统职位时，戴高乐又引起了争端。这再一次违背了宪法的规定。蓬皮杜因在不信任投票中失利而被迫下野。

戴高乐并未因此而感到烦恼，他解散了国民议会，在全民公投中彻底击败了反对派。在议会中，戴高乐主义者最终赢得了相当可观的大多数席位。戴高乐再度展示了自己的威望与受欢迎度。

“发号施令的不再是莫内先生了。”一天，戴高乐尖锐地对莫内的旧僚艾蒂安·赫希（Étienne Hirsch）如是说道。颇为讽刺的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戴高乐之前将多国组织斥为“清谈会”。可他掌权时居然恰逢莫内的旧梦—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在1958年开始生效。而今，戴高乐意识到，宏大的国家政策需要坚实的经济作为基础。而且，他也认识到了莫内及其规划委员会给法国留下的经济遗产之价值。戴高乐将军自己并不是什么经济学家，但他倾向于夸大其词地认

为，总理蓬皮杜与财政部长安托万·比内是在管理“军需部长的部门”。戴高乐除了就黄金储备与“黄金的普遍性”发表了一些法国重商主义之父科尔伯特式的言论外，也任命了有才能的人，让他们能够大展拳脚。在当时国际经济繁荣的有利背景下，他们确实颇有作为。

尽管戴高乐政权确实为经济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宝贵的政治稳定性，但它在通向繁荣昌盛时，基本上都是走的第四共和国的老路。即使戴高乐满腔热情地接受了的法国核威慑力量，也仅是延续了之前的一项为期五年的核研究计划，以及孟戴斯-弗朗斯扶持的原子弹建造项目。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统制经济强调政府进行中央规划的职能没有改变。这种方式造就了许多野心勃勃，有时野心过大的典型“大工程”。快帆客机与英、法合作制造的协和式飞机便是例证。但是，法国此时却坚决提出实行严格的财务控制，其标志就是用“坚挺的法郎”取代贬值的法郎，新法郎价值100旧法郎。此举是为了向世界宣布，复兴的法国如今有一支纪律严明的财务团队。

复兴的法国确实在这“黄金三十年”的黄金期里出现了。让·富拉斯蒂埃将1946—1975年取名为“黄金三十年”，他宣称：“没有哪个国家像法国一样，如此迅速、干净利落地摆脱了传统的贫困与苦难。”法国的复兴体现在最基础的层面上：人口从4050万增长到5260万，增幅近30%；婴儿死亡率急剧下降，从84.4‰下降到13.8‰。而且，男性生命周期也从61.9岁增长至69.1岁，女性则从67.4岁增长至77岁。这些人口统计学变化主要表明了一波婴儿潮，即一代人口的激增。改善过的医疗设施与慷慨的家庭津贴也对此起到了推动作用。即使55—70岁的一代（third-age generation）如今活得更久了，法国似乎还是突然变成了一个年轻的国家。

诚然，所有这一切依赖于新经济创造的繁荣。这种基本全新的经济基于高生产率。通过将生产从只聘用不足20名工人的旧式半手工艺性质的企业，转向更大、更高效的公司，政府打算从中获取更高的机械化、标准化程度与规模经济所带来的好处，以实现工业的现代化。它鼓励诸如化工、纺织品等领域的公司合并成大集团，从而能够参与国际竞争，提高出口额。同时，政府也发起了“蓝天研究”，并开始推动国防、航空与核能等关键领域的生产。尽管戴高乐对“清谈会”满腹狐疑，但是面对欧洲经济共同体提出的竞争性挑战，法国经济表现良好。因此，法国在对欧洲其他地区出口额增长5倍的同时，依然保持了与最近解放的殖民地之间有利的贸易关系。投资飞速增长，而且经济也每年增长约5%。虽然没有达到日本与西德在其“奇迹年”中的增长率，但却超过了美国，而且几乎是英国的2倍。在国内生产总值上，如今法国得意扬扬地超过了海峡对岸的老对头。

迅猛的经济变化自然而然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农业机械化的成功意味着所需劳动力减少。随着法国变成一个更加工业化、城市化的社会，大批人口离开了农村地区。在就业领域，人员日益明显地转向扩大的服务业，例如，银行、保险、公共管理、交通与旅游等领域。服务业也向女性提供了更好的工作机会，促进了新管理阶层的发展，培养出了更有经验的劳动力。这一现状，结合创下新高的年轻人数量，暗示了教育供给的增加。这既体现在中等教育阶段，也表现在高中毕业会考证书数量的增长，以及大学阶段教育上。高中毕业会考证书数量从1950年的32000份增加到1970年的139500份，而大学生人数则从1960年的20万人增加到1968年的50万人。但是，由于成长中的一代要么太年轻，还无法工作，要么仍在接受教育，所以这个新工业社会不断增长的用工需求只有通过移民才能得到满足。在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末，近400万移民来到了法国。他们大多来自意大利、西班牙，以及非洲北部、中部地区。人口的涌入极大地打开了住房缺口。如今，巴黎与其他城市开始被郊外住宅区（“郊区”）包围，这一区域由没有人情味的高层住宅大厦组成，造就了一个新颖独特的通勤群体。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尤其是随着电视机的普及与大众文化的日益美国化，法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种经济转型在20世纪60年代为戴高乐提供了需要的跳板。有了这块跳板，戴高乐就可以追求自己野心勃勃的外交政策目标了。由于他之前使1940年战败受辱的法国重新振奋起来，所以他如今的目标就是抹去法国在印度支那半岛、苏伊士运河冒险与阿尔及利亚危机这一连串事件上所遭受的屈辱，以恢复法国在列强中应有的地位。“法国人需要为法国感到自豪，”1963年，他对知己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说道，“否则他们将沉湎于平庸与争吵之中。如果法国不再是一个大国，并且展现不出大国风范，那法国将一无是处。”对戴高乐而言，这意味着挑战现存的冷战秩序。作为一名民族主义者，他对联合国评价不高—“那玩意儿”是他对联合国的称呼。戴高乐自视为一名现实主义者，能看清冷战的世界中权力归于何方，他决定改变这种格局。

戴高乐坚持认为，政策必须基于现实，而非表象。他接着对佩雷菲特说道，当下存在着三种国际现实。第一种是扩张主义的美国，它想要保持自己的世界领导地位，并强化在欧洲的霸主地位。第二种是苏联。那么戴高乐眼中的第三种现实又是什么呢？它并不是英国。英国只不过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戴高乐实际上指的是美国人—的特洛伊木马而已。“盎格鲁-撒克逊人”试图通过英国打入欧洲共同体，然后根据自己的利益来管理欧共体。对戴高乐而言，第三种现实应该是法国，因为：

……如今，我们是除美国、苏联外，唯一有国家雄心、能坚持到底，并且有勇气将它公之于众的人。在这三种现实之外，只剩下形形色色、你争我夺、犹豫不决、永远都在模仿别人的国家[24]

因此，20世纪60年代时，戴高乐在外交政策上的决定不仅是“盎格鲁-撒克逊人”通常所认为的那种任性姿态—尽管戴高乐明显乐于激怒他们—还是在经过深思熟虑地计划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戴高乐并不打算靠美国来保卫法国，而且他也相信如今真正的实力来自独立拥有核武器这一事实。所以，戴高乐加速推进已有的核计划，并很快骄傲地拥有自己的打击力量了。这导致法国与美国之间出现了大量争执，法国也退出了北约组织，但仍是更广泛的大西洋联盟的政治成员国。1967年4月，所有美国、加拿大驻法国军事基地都被关闭了。结果是，法国将它新造的导弹尖锐地指向了“各个方位”，指向了世界各地，当然也就指向了冷战双方。戴高乐通过承认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并于1966年对莫斯科进行国事访问，强化了法国的中间地位。在莫斯科时，他表示支持建立一个没有对立集团的欧洲。对于戴高乐构建“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的祈愿，美国人并不高兴。而且，由于戴高乐批评了他们在越南的战争，法国给他们留下了有害的遗赠，所以美国人更不高兴了。

自然，由于戴高乐只能接受一个“民族国家的欧洲”，他不得不想办法解决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问题。他能够看到共同体为法国商品提供了有用的出口市场，而且，如果法国能与当时在外交上弱得多的德国组成联盟，主宰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话，它确实可以作为法国已失去的帝国之替代。戴高乐起先试图通过富歇计划，用简单的政府间组织取代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多国结构。计划失败后，他将责任归于“盎格鲁-撒克逊人”，还阻止了英国在1963年与1967年加入该组织的两次尝试—这也是保护法国落后农业的方便之举。而且，他就农业关税问题威胁说要离开欧洲经济共同体，以试图进一步保护法国农业。再后来，在1965—1966年间，他发起了联合抵制，反对欧洲集会的职责扩大化，这一举动威胁到了个别国家的否决权。他顽固地反对着，因为他觉得只有让法国成为欧洲的主导力量，法国才能成为“第三种现实”，才能成为世界事务的潜在仲裁者。

我们当然可以说，戴高乐很努力地让华丽辞藻变成现实。值得注意的是，不论他的举止多么具有挑衅性，他确实指出了一条有用的、超越了冷战中东、西方冲突的道路。但是，随着他步入古稀之年晚期，戴高乐也许变得相当任性妄为。例如在1967年访问加拿大时，他用那句著名的“自由魁北克万岁”表示对法国分裂分子的支持—他的部长认识到这是重大外交错误。戴高乐立即就被赶出了加拿大。

在1968年的新年致辞中，戴高乐看上去还掌握着相当大的指挥权。他向全国人民保证，法国将通过政府冷静、沉着、高效的运行，继续树立标杆。他一点儿也没有觉察到，由他成功的全民动员所带来的社会与经济变革将迎来一场挑战。仅数月后，这场挑战就会让他和他的政府陷入极度震惊之中。

戴高乐政权的文化政策是经过深思熟虑而制定出的，担任该政权第一任文化部部长的是著名作家安德烈·马尔罗。他在许多方面都很活跃，包括将政府委托工作交给马克·夏加尔之类的艺术家、清洗公共建筑—例如，将冷灰色的协和广场恢复成本来的赭色—以及最重要的，复兴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思想，并在全国建造许多文化宫。政府通过刺激剧院演出与其他文化活动，丰富了外省生活。与此同时，马尔罗也采取措施确保人们能够负担得起这些文化活动，从而参与其中。他还通过减免遗产税，增加国家的艺术珍品储备。他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

然而，这项用意良好的政策依然是自上而下的。它并未真正与社会变化发生联系，尤其是与那批截然不同的年轻60后产生关联。这个群体受到了可怕且严重的“盎格鲁-撒克逊”影响。法国的60后个子更高、身体更健康，有钱购买色彩鲜艳的衣服。他们有自己的亚文化、杂志、广播、电话及语言。当然，还有他们自己的摇滚乐与耶耶风格音乐（yéyé music）。1962年的明星并不是某个伊迪丝·琵雅芙（Édith Piaf）或是吉尔伯特·贝乔（Gilbert Bécaud）式的人物，而是十几岁的弗朗索瓦·哈蒂（Françoise Hardy），她为所有青少年吟唱着《男孩和女孩》（*Tous les garçons et les filles*）。在这个新城市社会中，他们不再受旧有家庭关系与机会缺乏的限制。他们想要拥有道德上的自由，他们想要迷你裙与避孕药—“我们不能用社会保障制度来负担，”戴高乐说道，“他们接下来会向我们要什么？一辆免费的汽车？！”他们只听说过战争，并不惧怕德国人与苏联人。他们仅仅把住房与卫生方面来之不易的改善看作理所当然，尽管这些东西彻底改变了他们父母的生活。他们渴望个性，但自身正生活在市场操纵使个性变得标准化的新社会里。如果说，有些评论家将他们看作是外来物种的话，另一些人则在他们身上觉察到了富贵病，因自由而生的不确定性。

社会上让人感到不确定的事很多，因为法国正在经历自己的文化革命。人们在电影与小说领域都掀起了新浪潮，它们普遍反映了“世界上不存在等待转录的现成客观现实”这一观点。反之，电影与小说是对现实的探寻。像弗朗索瓦·特吕弗、克劳德·夏布洛与让-吕克·戈达尔这样的新浪潮派年轻电影导演认为，电影是导演的个人陈述。他们

抵制电影公司通过蒙太奇、无缝编辑与连接手段摄制影片。他们赞同使用手提摄影机进行户外场地拍摄，并在使用长镜头的同时，变化跳格剪接编辑。长镜头聚焦于人们所看到的东西，而不是“故事”。这些导演很想把传统电影全盘推翻，以展示电影是怎么运作的，他们试图阐明这不是生活，而是电影，认为电影就是对意义的结构性探寻。1959年，他们突然冲上了戛纳电影节舞台：弗朗索瓦·特吕弗的《四百击》讲述了一个小男孩叛逆的故事；在戈达尔的《筋疲力尽》开头，有幸灾乐祸式的傲慢无视；还有阿伦·雷乃创作的让人久久难以忘怀的《广岛之恋》。虽然戈达尔后来爱好某种学究式的社论风格，但这个群体的作品，与夏布洛、阿涅斯·瓦尔达以及其他人的作品一道，标志着国际电影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类似的关注点甚至更强烈地反映在新小说派当中。阿兰·罗布-格里耶与玛格丽特·杜拉斯这两位新小说派作家也活跃在电影界。这些“新小说家”尽管在方法侧重上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旨在创作一种剥离了传统小说特征的反小说。例如，他们的小说没有社会、政治场景设置，也没有人物刻画与线性叙事。因此，这些小说没有将常见的叙述者融入社交界之中，以理解并反映正在发生的事，而是在小说中创设了一个隐含的叙述者或曰视角。例如，在米歇尔·布托尔的《变》（*La Modification*）中，主人公叫“你”，因此，他也许是在对自己讲话，也许不是。这位隐含的叙述者或者说是存在物，好像初遇人类文明般，茫茫然不知所措。面对异质世界，他要么长篇累牍地发表着中立见解，还常将事物表述成几何形状，要么反复与世界展开激烈交锋，像着了魔一般。

读者经常被要求参与到这时常令人感到不安的现象学活动中来。这场现象学的活动可能变成一出本体论的悲剧，即人无法向除自身外的任何事妥协。重要的是，为福楼拜那创作“关于虚无的小说”的旧梦而着迷的罗布-格里耶，遭遇了萨特之前遇到过的同一个问题：客观与主观的冲突。他对一片西红柿或是别物的描述越是细致客观，它看起来越是极度主观。而且，他越是试图将人物心理排除于小说之外，人物心理就会越多地转由潜在的叙述者道出。潜在的叙述者，即叙述者的叙述者—罗布-格里耶。

不消说，电影与小说以更加系统的形式反映着其他领域也在探讨的观点。20世纪60年代的新结构主义学家强化了新小说派作品中一些更加悲观的主题。新结构主义学家之前已经开始将语言学理论运用于不同学科之中。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对弗洛伊德的解读，暗示了理性与自知之明是根本无法获得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寻找存在于所有神话之下的社会等级制度。但是，举例来说，

就算他绝妙地展现了一个印第安部落的身体彩绘是如何与社会等级制度相对应的，这种深层结构也并不被彩绘画家与被画者所理解。认识论学者米歇尔·福柯认为，历史没有连续性。因为，人们把自己紧紧锁在自己的时期内，以至于不存在真正的跨时间交流。这样说来，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已经死了。

至少对于一些结构主义者来说，他们仍然认为具有决定性的深层结构能够被揭示出来。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占支配地位的所谓后结构主义者们更进了一步。自罗兰·巴特起，后结构主义者转向了“作者已死”的观点，意即作者无法控制其作品的意义—事实上，是书写作者，而不是作者写书。至于像吉尔·德勒兹、雅克·德里达与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这些人，他们认为除文本之外别无他物，没有待发现的深层现实与确定真理。这种通过否定理性与左翼政治视为传统根基的已知外部现实，从而跃进后现代相对主义的做法，不可避免地招致了批评—原因不仅在于他们的作品通常看似不必要的难懂。为了将数学或是自然科学的晦涩难懂融入社会科学之中，拉康、德勒兹与其他人大量使用了有时他们自己都不理解的概念。尽管一些批评也许失之偏颇，但显而易见的是，他们的影响已经衰退了。而且，社会逐渐从对宏大理论的普遍追求转向了更加经验主义的方式。然而，这些现象发生在知识上让人感到既兴奋又不安的一段时期。

20世纪60年代的左翼分子更热衷于当时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变体与重新包装。法共内部存在着亨利·列斐伏尔一派与路易·阿尔都塞这样的纯粹主义者之间的理论斗争。列斐伏尔等人基于马克思的早期作品，试图将后者重塑成宽泛的人文主义者。阿尔都塞在对马克思的“科学”解读中，试图捍卫正统学说。但是，那些理想主义的年轻人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国际群体，未来属于中国革命，属于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与越南的抵抗运动。

1968年5月爆发了那场惊人的“五月风暴”，之所以叫“风暴”，是因为没人知道还可以怎么命名，它看似完全是突如其来的，人们并没有看到明显的政治危机。诚然，法国仍时不时地爆发罢工，因为进步没有平等地善待每个领域，但这些纷争都被解决了。3年前，社会党人弗朗索瓦·密特朗在总统选举中的表现比预期要好，但这主要是因为戴高乐没打算参选。正是当年3月中旬《世界报》上的一篇社论，反映出了总统选举中缺乏正经的反对派这一问题。社论宣称，“法国人厌倦了”。尤其是法国的年轻人，他们觉得自己被排除在世界革命潮流之外—社论还辛辣地补充说，学生们提出的南泰尔新郊区校区的男生能自由出入女生宿舍的要求，显示出他们对男性权利的认识相当有限。

然而，那确实是5天后男学生占领女生宿舍事件爆发的导火索。大学当局反应强烈，而学生们则挑衅地扩大了他们的占领区。“五月风暴”开始变得不可避免。南泰尔校区被关闭，但这导致索邦大学被占领，随后全国上下的大学与高中被占领。学术权威感到困惑不解，因为学生的狂欢喧闹让索邦大学部分被捣毁，直到更有组织性的托洛茨基与无政府主义分子登场时，他们才真正对学生抗议做出反应。警察被派来抓人，但是他们的粗暴战术只是增加了人们对学生们的同情而已。巴黎的拉丁区变成了路障林立、铺路石横飞的战场—这给全法国乃至法国以外的地区提供了一场电视盛宴。法共与社会党不情愿地被拖了进来，试图将通常偏于乌托邦式的志向融入工会的要求之中。一场涉及1000万雇员的大罢工开始了，他们占领了工厂，导致法国停摆、政府震惊。

那么，“怎么会这样？”颇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兼政治评论员雷蒙德·亚伦问道，“在没有任何政党或群众运动领袖真正想要掌权的情况下，一场小范围内的学生抗议怎么会转变成一场让政权为之震颤的民族危机呢？”正如他指出的那样，革命如今往往只发生在欠发达的社会里。工会在发达的工业国中已变成一股保守势力。无论如何，法共领袖惊诧于这些解放了的年轻“中产阶级”所持有的漫不经心的态度—左翼家庭内部存在着激烈的代际冲突—不过对戴高乐的反美立场感到相当满意。此外，许多学生抗议者对日常政治嗤之以鼻，斥其为不真实。因此，以早已提出、如今被复兴的超现实主义标语—“禁止是被禁止的”或“梦境即现实”—为口号的这场“革命”，只是针对1789年、1830年、1848年、1871年、1936年与1944年真正的全国骚乱的一出心理戏剧、一场单纯狂欢与一种夸张姿态吗？又或者，它更加宏大，正如安德烈·马尔罗与蓬皮杜总理所说的，它是一场“文明危机”？

无论它是什么，政府似乎都对它束手无策。蓬皮杜试图通过大幅加薪离间工会与学生，但总统的一些官员当时正在退出，法国社会党领袖密特朗愚蠢地在电视上提议由自己代替戴高乐—而戴高乐将军却似乎神秘地消失了。他已经逃离法国了吗？事实上，正如他后来对蓬皮杜说的那样，他在人生中第一次感到完全失去了勇气。不过，他重拾了勇气，并为自己安排了一些表演。他秘密访问德国，与马絮将军进行磋商，并测试军队的忠诚度。戴高乐感到安心了，3日后返回法国，并带着他那一贯的权威作风宣布，他不会辞职，而且法国将举行新一轮选举。一切似乎只是一场夏季风暴，全国人民都松了一口气。支持戴高乐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在香榭丽舍大街上举行。将军在选举中大获全胜，然后一切都神奇地恢复到旧日模样，甚至更严重—与其说这场运动印证着路易十五的不祥预言“我死之后，洪水滔天”，不如说是：“洪水之后……唯我存留！”

但不完全是这样。诚然，学生们没有后续政治计划，他们自己本身正是他们所批判的社会趋势的典型表现。而且，鉴于如今社会学专业的学生找不到工作这一事实，他们的“革命”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奢侈品。“黄金三十年”消逝的微弱迹象已经初现，最终石油危机将为其画上句点。但是，《世界报》没能看到的是，这场枯燥无味的南泰尔校区人口泛滥并不像表面上那般琐碎。相反，这个新问题象征着学生对脆弱的大学体制的厌倦。这个极其专制的体制有着非常令人不快的师生比率，以至于极少有，甚至完全没有师生互动。而且，男女分隔的寝室把学生当成孩子一般对待。他们那不适宜居住的新校区，被抛在城市边缘的一个令人沮丧的贫民窟正中央。新校区本身暗示着快速转型的压力，暗示着普遍而言，世界上存在着贫富鸿沟。

学生们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由于他们轻而易举地使国家陷入瘫痪之中，他们凸显了这个过于依赖戴高乐本人的家长式总统政权有多么空洞。他们展示了该政权并不能使这群新生代融入国家生活。他们暴露出了教育领域，以及工作场所中的独裁组织的致命要害。他们彰显出，除了对媒体旧有的僵化控制外，国家对电视的实际垄断导致了大部分民意与政府相疏离。他们提出了一些新主题，例如环境、个人生活平衡等。不管他们的尝试有多业余，他们都企图更接近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哪怕只有一点点。

刚刚获胜的右翼总统多数派（Gaullist majority）中很大一部分人想让戴高乐压制反对派，而戴高乐也确实视这场风暴为一次变革危机。社会正在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他如今提及了改革“狭隘、过时的组织”之必要，而且他试图实行“参与”政策。能力突出的埃德加·富尔（Edgar Faure）很快赋予大学一些自主权并引进代表委员会组织，开始让教育分权并实现民主化。戴高乐推动了这项改革，使之从心不甘、情不愿的议会那里获得了通过。他试图复制这项改革，来给予地方更大选举权，但却出了错，部分原因在于该提案是附加在参议院改革之上的，而后者冒犯了其中一些群体；还有部分原因是戴高乐似乎坚持发动全民公投来表决这个不太紧急的提案，遂带来了一场没必要的较量。他当然意识到了这并不是个成败在此一举的问题，意识到了他是在赌博。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原因在于，他觉得蓬皮杜对“五月风暴”的处理让他相形见绌。而且，他觉得有必要来验证一下自己的权威。他这么做也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又衰老又疲惫—横幅上最残酷的暗示是把他做成标本放进博物馆。正如一位观察家精明地注意到的，在戴高乐身上，永远存在着悲观、禁欲的传统主义者与果敢的行动派之间的矛盾。这就解释了他性格中的冲突，还有他那反复出现的一阵阵沮丧与绝望。现实主义者戴

高乐对于人民不抱任何幻想，对于管理他那有着“246种不同奶酪的国家”的难度，他也洞若观火。但是，在这个充斥着药片与迷你裙的新社会里，他越来越感到无所适从。即便他为自己的名声所累，在这个不断变化的戴高乐政权中，还有他自己的一席之地吗？

正如他隐隐料到的那样，他输掉了全民公投。之后就立即辞职了，并在次年去世。

第十三章

从蓬皮杜到希拉克

没有哪个西方民主国家的领导像第五共和国的总统们那样，被赋予了如此多的政治权力。

戴高乐可不容易模仿。显然，在没有另一次世界大战，也不存在堪比阿尔及利亚的戏剧性事件造成的民族危机时，没有哪个法国总统能够自称拥有戴高乐那样的历史合法性与威望。这个事实本身更加清楚地揭示了仓促起草的1958年宪法所存在的尖锐矛盾—它不仅是为一场特别的紧急事件而制定，更是为某个人量身定做的—自那以后，如何解读该宪法成了一大问题。

诚然，戴高乐自己在许多方面逾越了他这部宪法所规定的条款。尽管总理应该“决定并实施国家政策”，而总统扮演着仲裁者的角色，但戴高乐在1964年时宣布“国家不可分割的权力完全由总统负责”，被法国社会党领袖弗朗索瓦·密特朗斥之为一场“永久政变”。根据宪法规定，总理“负责国防”，于是戴高乐直接下令说，外交政策与国防是总统的“专属领域”。最终的结果是，议会被“去势”了。议会既无法选择由全国选举产生的总统，也无法选择政府总理或是议会以外的部长。如果议会拒不通过总统提案，它还面临着解体的威胁。简言之，在民主的权力平衡上，法国这种混合的共和宪法存在着确确实实的问题。

事实上，没有哪个西方民主国家的领导像第五共和国的总统们那样，被赋予了如此多的政治权力。共和国总统既不需要对议会负责，也不遵从当地法律。总统具有广泛权力，有着近500个职位的任命权。只要戴高乐掌权，尤其是在国家处于危难之时，这些问题似乎都是次要的。但是，对于戴高乐不太杰出的继承人来说，他的消失让这些问题浮出了水面。一位有着强大政党基础的总理会甘于这种从属位置吗？总统的绝对权力能够保持吗？7年的总统任期难道不是过长了吗？如果一位不受欢迎的总统在5年后的立法选举中看到他的议会支持者被打败，会发生什么呢？戴高乐遇到这样的情况肯定会辞职，但如果一位总统坚持走完他的任期该怎么办呢？甚至于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奇怪的可能，即大权在握的行政总统不得不任命一位充满敌意的总理呢？可以公平地说，鉴于第四共和国未能集全国之力应对一场重要危机，所以法国现行政治体制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它将展现出明显的

优点，但也有自己的缺陷。

戴高乐的继承者们必须在这样的体制内尽其所能地治国理政。而且，他们不得不面对世界经济的不同阶段。这些阶段不仅经历了全球化演变所带来的影响，还被诸如中东战争、石油危机与苏联解体等事件所打断。地位显赫的法国在20世纪60年代基本成功地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了独立，甚至充当了中立的仲裁者。如今，它在追求这些目标时，不得不受扩大的欧洲共同体这样的多国组织与国民经济日益互联互通的现实共同施加的种种限制。

乔治·蓬皮杜自1969年起出任法国总统，直至他1974年去世。他的父亲是一名小学教师。蓬皮杜毕业于享有盛誉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这位趣味高雅的总统有着高深的文学兴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是戴高乐的随从人员。尽管他不是一名职业政客—20世纪50年代，他在罗斯柴尔德银行工作过几年—但是，他保持了与戴高乐的密切联系，以至于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作为他的秘密和平使者与民族解放阵线交涉。由于蓬皮杜也做了戴高乐6年的总理—这算是一个纪录了—他当然掌握了管理这个新共和国的门道。事实上，他也许太懂这些诀窍了，因为他在处理1968年“五月风暴”时，比戴高乐还要泰然自若，并因这种“大逆不道”而被免职。他的目标是继续走戴高乐路线，但要满足1968年“五月风暴”提出的对包容性的需求。

至于他的总理雅克·沙邦-戴尔马（Jacques Chaban-Delmas），他是一位帅气的前抵抗运动将军与波尔多市市长。他提出了“新社会”计划，也确实采取措施使政权现代化、自由化。随着国家放松了对电视、电台的控制，如今出现了听众来电直播节目以及更加均衡的政治辩论。劳工改革包括在职培训、最低工资标准与经济增长挂钩，以及雷诺汽车公司的分红制。与此同时，为回应新兴的女权运动要求，政府出台了法律，赋予女性同等的家长权威。法国还首次建立了环境部，并成立了区域议会。此外，这一时期艺术活动激增，尤其是左翼剧院，讽刺的是，1981年社会党总统上后，左翼剧院就不复存在了。蓬皮杜与其继任者一样，将为世人留下纪念他的一座座丰碑，那就是由内而外焕然一新、五彩斑斓的乔治·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以及因打破了传统天际线而不太受巴黎人欢迎的建筑物—蒙帕尔纳斯大厦。

蓬皮杜在外交政策上最惊人的改变是同意让大英帝国加入扩大的欧洲共同体。像戴高乐一样，他不太相信多国组织。但是，他对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的“向东德开放”表示担忧。而且，他预测，英国的加入将使焦点转向欧洲而非美国，重新平衡欧洲大陆政治并防止法国被孤立。但是，他也采取了更加鲜明的措施，以实现成为独立世界大国

的戴高乐主义志向。他与苏联保持着友好关系，曾与勃列日涅夫会晤。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时，他进一步坚定了戴高乐的亲阿拉伯路线，而不是美国的亲以色列政策。法国通过利比亚间接将武器提供给埃及人，并试图与石油输出国组织达成单独协议，获得石油供给。

但是，1973年的石油危机不仅标志着“黄金三十年”的结束，还预示着世界经济新动乱期的开始，其标志是失败的汇率协调以及肆虐的通货膨胀。油价上涨给法国造成的打击尤为巨大，因为法国超过70%的能源需求都依靠进口石油。与英国或德国不同，法国并未参与北海新油田开发。当结果表明法国不可能获得单独的石油供给政策时，人们清楚地看到，如果没有可替代能源，法国想要成为世界上一股独立力量的这种戴高乐式雄心，实现起来希望渺茫。

法国想使戴高乐的半总统、半议会式混合宪法如过去那样明确，这并非易事。蓬皮杜自己在《难题》（*Le Noeud gordien*）中—就书名的意思而言，第五共和国的总统们名下几乎都该有一两本属于自己的书—“快刀斩乱麻”的尝试颇有些尴尬。“恰好因为我们的体制是混杂的，”他说道，“所以它也许比符合逻辑的体制更灵活。”可能确实如此，但为什么这种体制是必要的呢？这是因为，“你只需要看看法国人的所作所为，就能意识到他们极不服管教的本能”。然而，人的行为也是由其存身的结构所决定的。事实上，蓬皮杜确实通过改善与议会的联系，以及给他的总理沙邦-戴尔马喘息的空间，来试图恢复平衡。但讽刺的是，由此带来的困难会令他备感熟悉。

这是因为，沙邦-戴尔马自身正成为一个问题，令人尴尬的爆料[25]显示，无论沙邦-戴尔马的方式多么合法，他都没有交税。沙邦-戴尔马显然在国民议会中有多数派支持，而且他的自由化“新社会”计划在法国很受欢迎。但是，更具右翼倾向的戴高乐主义者对这些想法表示怀疑。他们感到，沙邦-戴尔马的立场开始变得和总统本人的一样，因为蓬皮杜同样坚信，政府领导不能搞双头政治。问题出现后，蓬皮杜免了沙邦-戴尔马的职，就像当初戴高乐对他所做的那样。蓬皮杜也向总统的神秘光环俯首称臣了—总统被这宗教职责般的重担彻底改变了，他必须独自承担这种责任—以至于他整整一年隐瞒了全国人民一件事：自己当下正罹患一种罕见的淋巴癌，身体日渐衰弱。1974年4月，他因这种淋巴癌死在任上。虽然《世界报》将这称颂为对国家的最大牺牲，但人们也许要质疑，这种行为是否是负责任的。或者，吉斯卡尔·德斯坦的观点是不是更加明智—他说，换作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当场辞职”。

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在1974—

1981年担任法国总统。他是一名独立的共和党人，身后只有议会中人数不多的一群人支持。他之所以能赢得总统职位，是因为戴高乐主义者内部产生了分歧，导致他们的正式候选人—沙邦-戴尔马被更加信奉原旨主义的雅克·希拉克的一群支持者削弱了。在政界外号“推土机”的希拉克只有42岁，他的动作几乎将选举拱手让给了自己真正的对手们：弗朗索瓦·密特朗已经让社会党起死回生，与法国社会党及左翼激进党组成共同阵线。而且，密特朗在第二轮选举中仅落后于吉斯卡尔·德斯坦1.6%的选票。因此，吉斯卡尔·德斯坦的当选可以说是个偶然事件，他打破了戴高乐的谱系，成了一个意外。

吉斯卡尔·德斯坦是查理曼大帝的旁系后裔与顶级税务专家。48岁的他看起来很年轻，精力充沛且聪明智慧，他是名优秀的“网球手”，十分健康。虽然身为贵族，德斯坦却想要引入一种不那么呆板的政治风格与“英式”礼节，替代令人不快的伙伴关系。即使他自己的不拘礼节可能看似有些虚情假意，但他确实试图定下基调。具体做法是：在爱丽舍宫设置开放日，偶尔与被选中的家族聚餐，以及同清扫马路的环卫工共进早餐。虽然他想走中间路线管理国家，以创造一种新型“进步的自由社会”，但是除了要面对人们对他想法的某些抵制外，他的问题还在于，议会中没有来自多数党的天然支持。为了讨好戴高乐主义者，吉斯卡尔·德斯坦任命雅克·希拉克为总理，并充满干劲地着手完成他的任务。

此时，法国实行了许多国内改革，以回应国内不断变化的民意。政府对电视广播完全统一的控制被打破，出现了互相竞争的广播电台与电视频道。法定成年年龄从21岁下降至18岁，这使得将近250万年轻人成为选民并被登记在册。法国实行协议离婚，并使某些情况下的堕胎合法化。为了让所有儿童机会均等，学校实现了标准化。在外交事务上，虽然吉斯卡尔·德斯坦在非洲继续贯彻着法国的新殖民主义政策—他将被指责从中非共和国皇帝博卡萨一世那里收受了许多贵重钻石，但这种指责不合情理—但是，他坚决支持采取措施，强化欧洲共同体。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有意地讨好戴高乐主义者。当德斯坦只邀请了4名戴高乐主义者加入他的内阁，并倾向于任命无政党背景的专家时，戴高乐主义者最初感到大吃一惊。德斯坦也许是想达成更多政治共识，但他在行使总统职权方面堪比戴高乐，即使他认为行使总统职权是非个人的机构行为。他领导的是不对外开放的核心内阁，在不知会希拉克的情况下就任命部长，甚至1976年重组政府时，他也没有与希拉克磋商。因此，某项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如今行使的权力超过了自拿破仑三世起的任何一位法国国家元首”。希拉克忍

受了两年被排挤的生活，然后以非常公开的方式辞职并宣称，他的确“没有被给予完成总理工作的手段”。他接着将戴高乐党重塑成以自己为领导的政党。他通过当选巴黎市市长，获得了新的权力基础。而且，他让自己成为吉斯卡尔·德斯坦的对手，看着他在经济问题上遇到麻烦。

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其他地区，经济问题确实都是个关键的挑战。20世纪70年代初，国民生产每年增速约为7%，每年新增就业岗位有近10万个，但是10年后，国民生产下降，每年消失的岗位有20万。起初，财政部部长让-皮埃尔·富尔卡德（Jean-Pierre Fourcade）试图通过提高税收与利息率平衡经济，与此同时，他还通过提高救济金来缓和政策对穷人的影响。自1976年起，他的继任者雷蒙·巴尔（Raymond Barre）虽然在推动核工业建设时继续采取了统制经济的方式，但使用更加强劲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来降低财政赤字、平抑通货膨胀，撤除了对落后企业实施补贴的缓冲保护，并创造了具有竞争力的现代经济。然而，由此导致的中小企业破产却加重了失业问题。而且，由1979年伊朗革命引发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使情况严重恶化。

当吉斯卡尔·德斯坦在1981年总统任期临近尾声之际，法国的通货膨胀率接近14%，失业人数达到了150万，全国人民情绪低落。虽然他做了各种努力以促成现代化，但是政治评论员、播音员阿兰·杜哈梅尔（Alain Duhamel）仍抱怨道，尽管法国现在是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家，但它那过时、虚伪且半发达的政治体制正在遭受过度中央集权与缺乏权力制衡的侵害。由于左派内部四分五裂，人们认为吉斯卡尔·德斯坦将赢得即将来临的总统选举。

但是，人们忽略了希拉克。他在第一轮选举中表现不佳，排在第一名吉斯卡尔·德斯坦与第二名社会党的弗朗索瓦·密特朗之后，位居第三。即使希拉克曾公开批评德斯坦，但人们依然希望希拉克能忠心耿耿地敦促自己的戴高乐党选民在决胜选举中支持德斯坦，以免左翼政党获胜。希拉克没有做到这一点，结果，让右翼恐慌、左翼欢喜、证券交易所崩溃的是，他将总统职位拱手让给了密特朗。

密特朗在1981—1995年担任总统。人们通常觉得他是个神秘人物。这位明显羞涩的年轻人来自信奉天主教的外省中产阶级家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刚结束法学学习。被俘后他逃跑了，开始为维希政权工作，但是渐渐转向抵抗运动。他抵达伦敦，遇到了戴高乐，但是回到了法国参与国内抵抗运动—如果说，他后来看似有些讳莫如深，甚至可以说是个幻想家的话，或许部分是因为他当时的经历使然。战后，他效力于第四共和国中的11届政府，但在1958年时失

去了自己的职位，并于次年登上了报纸头条。这是因为他宣称，由于自己的殖民主义观点，他遭到了法属阿尔及利亚戴高乐主义支持者的刺杀，幸而躲过了一劫。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奇异的尴尬局面就是一场作秀，而且，一位警察部门资深知情人最近的回忆录倾向于支持这种观点。[26]密特朗在随后一段时间里，在政治荒原中对总统政权进行了尖刻的攻击，并一路密谋重新掌权。

他是“真正的”社会党人吗？当他在1971年登上领导岗位时，像居伊·摩勒一样的人认为，他只是学会了开空头支票而已。诚然，他没多少时间学习社会主义理论，也并不真正理解经济学。但是，他确实支持人们提出的创建一个更加公平社会的需求。而且，他坚持取缔死刑，并为此做好了选举失败的准备。最重要的是，他了解权力并自认为知道夺权的方式。如果他真如戴维·贝尔（David Bell）所言，“是个精于权谋、强硬且一心一意的专业人士，被力比多统治所驱使”的话，这在成功政客中并不鲜见。

密特朗之“谜”并不是他从右派变成左派，不是他对自己有一个成年私生女的事实秘而不宣，也不是他最后很享受总统权力以至于养成了国王般不带现金的习惯。密特朗之“谜”在于他不擅与人亲近、不愿从事团队工作的个性。他不仅对自己的计划守口如瓶，还一人手中同时拿好几副牌，对抗彼此基本不认识的人；密特朗之“谜”在于他像某个不可思议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王子一样，通过复杂的侍臣网络来行使权力，离间这些人，让他们互相猜忌；密特朗之“谜”在于当他明显因癌症而身体衰弱时，仍拒绝下野，因为他认为行使权力使他得以保命。

但是，对左派来说，密特朗在1981年完全掀起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这是他的一位部长皮埃尔·若克斯（Pierre Joxe）起的名字，因为“在密特朗之前，法国左派正如他们自称的那样，只知罕见且短暂的‘实验’，最后也没得到什么好下场”。如今，在密特朗面前清清楚楚地摆着7年任期，他似乎已经打破了近乎永久性的保守主义统治之魔咒，特别是在他立即解散了国民议会并使左派占据了绝大多数席位之后。开始启动的整整一系列措施完全改变了社会氛围—改革监狱体制，分权给地方，对接高等教育与国家的社会、经济需求。最立竿见影的是在全国传播文化与欢乐。新上任的文化部部长是精力充沛的贾克·朗（Jack Lang）。在接下来的12年间，他获得的预算将增加5倍。他同意办独立电台，采取措施支持图书交易，举办一年一度的全国音乐节。在每年的6月21日，户外音乐都会让巴黎生机勃勃。诚然，密特朗在总统任职期间无疑会兴建更多“大工程”，包括卢浮宫玻璃金字塔、引人入胜的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以及考虑不周的密特朗国

家图书馆，还有纪念性建筑，也许还有些“多风的建筑”，比如拉德芳斯区大拱门。

然而，真正的挑战是经济。在皮埃尔·莫鲁瓦总理的领导下，法国的经济方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当时做的每件事都是为了让国家而非市场来控制经济。新计划强调工业与公共事业的现代化。政府为解决失业问题，提高家庭补贴与政府退休金以增加需求，并通过将年假延长至5周，把周工作时间从40小时减至39小时，试图分配可获得的工作。周工作时间缩减1小时只是第一步而已，最终要将其减至35小时，并将领取退休金的年龄变成60岁。事实上，这个大胆的尝试改变了社会，“改变了生活”。

人们认识到，只有法国采取了这项政策。但是，人们以为，当这些变化的效果完全显露出来，当世界经济再度好转时，任何暂时的困难都将被解决。然而，购买力的提高使通货膨胀加剧，而且主要指向了进口商品。因此，赤字变大，政府不得不使法郎贬值，而失业率则继续攀升。企业抱怨政府强行收税让它们为增加的社会福利埋单，失业问题导致人们产生反移民情绪，以及拥护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党人数的增加。政府被迫撤回一项教育提案，因为该提案被视为对天主教学校的攻击。1984年，密特朗改变策略，任命洛朗·法比尤斯为总理。其实，在这之前很久，人们就已清楚地看到“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一尝试在法国失败了。

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时刻，因为它强调了法国如今称之为全球化的东西已经是既定生活事实，而且一个西方国家不能将自己与世界经济的起起落落分离开来。对于法国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不管是通过国防、能源、银行业，还是奢侈品产业，法国如今都已牢牢地并入了欧洲乃至全球经济之中。因此，这对法国的社会党来说是一个关键性时刻，它质疑了社会党的官方理念并强化了社会民主倾向的影响。让社会党左派与共产党错愕的是，38岁的洛朗·法比尤斯此时牢牢抓住平衡预算与经济现代化不放。这需要削减补助，而且政府扶持将逐渐从衰退的煤、钢等产业转向化工、信息技术等较新的领域。这类措施将使社会感到阵痛。

法比尤斯确实降低了通货膨胀，但失业问题看起来药石无灵了，任何方案对它都不起作用。显而易见，左派将输掉1986年的议会选举。密特朗通过调整比例代表制的诡计，提前减少了伤害—意料之外的结果是，国民阵线党获得了35个席位—但是，左派仍然失掉了选举。这就再一次提出了一个关于宪法的大问题。

密特朗没有像人们预料的那样辞职，而是任命希拉克为总理，因

而将第五共和国带入了“同居”时代。在接下来的两年间，他和希拉克用宪法来对付彼此。希拉克援引宪法中他作为总理的权力，让自己的措施得以表决通过，而密特朗则利用自己的总统特权尽可能地阻挠希拉克，同时自身始终做与世无争状。希拉克热衷于罗纳德·里根与撒切尔夫人的政策，如今允诺将践行高效干练的新自由主义。这将涉及60多家公司与银行的私有化和撤销管制，以及取消价格控制、外汇管制与社会党的财产税。他也引入了对移民的控制，以化解国民阵线党带来的威胁，并撤销了密特朗的选举改革。但是，温和的右派觉得他的做法有些极端。1986年，希拉克遭遇了一股罢工抗议潮。接着，1987年10月，股票交易崩溃。在此期间，密特朗精明地打败了希拉克，把自己刻画成危难时刻的国家保护者形象。因此，1988年，密特朗再度登上总统宝座。权力的过山车得以再度开动。

然而，情况已经发生了逆转。密特朗为得到基本够用的多数票，解散了议会。选举只产生了在中间党派分子支持下的少数派社会党政府。鉴于此，密特朗任命了相当能干的规划师米歇尔·罗卡尔担任总理，罗卡尔作为社会党的社会民主领袖，能够促成共识。同时，密特朗也觉得，把自己的头号敌人放在具有挑战性的位置上是省时又省力的做法—他确实将在罗卡尔任职期间暗中破坏。罗卡尔恢复了财产税，为那些打算重新就业的人提供津贴，并严肃认真地试图解决社会保障亏空问题。他也从人们因柏林墙倒塌而出现的情绪变化，以及因第一次海湾战争带来的民族团结中受益。但是，随着经济再度下滑，以及党内就政策问题发生的冲突，密特朗在1991年时草率地将罗卡尔免职并任命了埃迪特·克勒松。

作为法国第一位女总理，聪明、坚强的克勒松有着新奇的价值观。虽然她对罗卡尔持批评态度，但她也提供了一个更加左翼的选择。克勒松是有着人口统计学博士学位的高素质人才，之前她担任过几个部长职务，但是，她遭遇了相当程度的厌女症。因为克勒松是在关系亲密的顾问团的建议下执政，加之她肆意践踏行政机构并且过早下断言，所以她遭受的厌女症就严重了。1992年地方选举一失利，密特朗就免去了她的职位—到那时为止，法国总理的更迭已经开始让人回想起第四共和国的境况了。

权力的旋转木马继续转动着，接下来上台的是作风完全不同的皮埃尔·贝雷戈瓦。这位老牌工人阶级社会党人在15岁时就离开了学校。他之前在爱丽舍宫总统府担任密特朗的秘书长。在1993年议会选举前的短暂间歇，他担任了总理一职。即使没有世界经济的又一次危机与一连串的贪腐丑闻（其中一件丑闻导致贝雷戈瓦自杀），厄运也早已显而易见。密特朗早就把注意力转到在欧盟内建立与德国的强大联盟

上去了，如今年老体衰，明显正在对此失去兴趣。而且，社会党领袖中的现代化主义者与传统主义者之间有着公开的冲突。因此，毫无疑问，当社会党选举失利，只获得了不到20%的选票时，密特朗别无他法，只得再度转向右派。

由于希拉克着眼于总统竞选而想远离风口浪尖，最后由中右翼的爱德华·巴拉迪尔担任总理。这位有着工业背景的人物与戴高乐主义的神秘毫不沾边。他是个让人放心、冷静且有礼貌的人。同时，他也是位精明的谋略家—在这方面，密特朗曾满怀敬意地说他“甚于我”。巴拉迪尔带来了削减预算及国企私有化这些新自由主义强效疗法，其中包括法国巴黎银行与埃尔夫-阿奎坦石油公司的私有化。但是，他利用国家贷款缓解失业问题以安抚工会，最终由于涉及裁员的重组计划，而引发了大规模罢工。而且，1994年末，失业率仍有12.6%。然而，他已让自己成为右派在总统选举中明显的不二之选。但是，人们将再一次忽视雅克·希拉克的存在。

希拉克即将在1995—2007年担任法国总统。他猛烈攻击巴拉迪尔对法郎的支持，平衡了开支，并发出了一种左翼戴高乐主义的呼吁，号召政府大胆采取行动降低税赋，解决失业问题，并弥合破碎的社会。这些论调抓住了选民的心，因此，希拉克在总统选举中击败了社会党的利昂内尔·若斯潘。他旋即任命新自由主义技术官僚阿兰·朱佩为总理。就希拉克而言，他愤世嫉俗吗？外号“推土机”的希拉克也有着“风向标”的称号。是的，但并不是高贵的马基亚维利式的愤世嫉俗。因为事实正如一位传记作家所言：“他没有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也没有连贯的政治计划。”吉斯卡尔·德斯坦觉得希拉克是“一个天生快乐、热情的人”，但对自己的政治角色感到不自在，只有在竞选过程中亲密地拍着选民后背时，他才是他自己。萨科齐对希拉克的看法也与此类似，觉得他“恐惧游行”，因此倾向于顺其自然，保持事物原状。这位平民主义的机会主义者胃口很好，爱喝啤酒。他总是一个被动反应型的谋略家，而非战略家。

即便如此，希拉克也有过自己的光辉岁月，尤其是在1995年7月，他做了一场值得称道的演讲，纪念1942年在巴黎对犹太人那场臭名昭著的围捕。由此，希拉克成了法国历史上第一个承认法兰西政府对犹太人的遣返负有责任的总统。然而，数月内，他的总统生涯就遇到了麻烦。为了能在1999年时在欧盟全境范围内使用欧元，法国需要达到趋同标准的要求。为此，阿兰·朱佩开始对政府财务实行广泛重组。但是，由于这危及工资、津贴与养老金，法国爆发了自1968年以来最大的一场总罢工，国家陷入停摆状态。这对朱佩的受欢迎度可没多少助益。人们觉得他傲慢无礼，怀疑他从住户津贴中不正当地谋

利。因此，为了让朱佩获得更坚实的多数派支持以实行改革，希拉克被说服后解散了国民议会—这导致他在接下来5年里都要面对左翼议会与一名社会党总理，具体来说就是严厉的利昂内尔·若斯潘。

1997年，幸运的若斯潘来得正是时候，因为世界经济正在转入增长期，而且将持续到2001年。这不仅使若斯潘在没有使用朱佩开出的猛药的情况下，就使法国达到了趋同标准，从而风头盖过了希拉克，还允许他采取了大量独特的社会主义措施，其中包括每周35小时工作制，以及为年轻失业者制订的创造就业机会的计划。这项计划使失业率降至10%以下。若斯潘还采取了意义重大的现代化措施，例如，男女同性恋情侣的民事结合，以及推动男女平等的立法。该法律旨在提高被选入政治团体的比例微小的女性人数。

然而到2001年，整体经济将再度下滑。随着企业破产、工作机会转向低工资国家，以及失业问题的再度抬头，希拉克有了迅速在2002年总统选举中攻击若斯潘的机会。但是，公众的希望破灭与适得其反的选举体制共同将这次选举变成了一场令人不安的闹剧。第一轮选举中28.4%的弃权率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值，而候选人来自不下16个政党，其中大多数政党又很小。这些政党包括3个独立的托洛茨基党派，即左派、中间派与信奉基督教的仇视同性恋论坛。其中还有一个叫作“狩猎、捕鱼、自然和传统”的政党，他们狩猎、射击、垂钓。即便是极右派也不团结，因为如今出现了从让-玛丽·勒庞的国民阵线党中脱离出去的一个分支。由于所有这些党派分裂的影响，希拉克只获得了19.88%的选票，而若斯潘的得票率则更低，只有16.18%。得票率滑进第二名、得以进入决胜投票阶段的候选人是勒庞，他取得了16.7%的选票—这使全国人民感到震惊，并迫使成千上万的抗议者走上街头。放弃投票权的人也大批返场，咬牙切齿地进行第二轮投票。他们反复叫喊着“宁肯把选票投给骗子，也不投给法西斯”。于是希拉克以创纪录的82%的得票率赢得了选举。

与此同时，希拉克再度更改宪法。他觉得，在决定要不要给他另一届7年任期时，选民也许会犹豫不决，毕竟第二届任期结束时自己将达到77岁高龄。所以，为了提高选举胜算，希拉克通过全民公投让总统任期向国民议会期限看齐，实行5年制。此外，他通过取得豁免权、不负法律责任，提高了现任总统的权力。这些变化能够缓和人们对第五共和国政治机构有效性的持续担忧吗？

诚然，人们可能会夸大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宪法与组织安排永远不会是完美的—英国用了一个世纪来改革它那中世纪时代的上议院，而美国则在总统与国会陷入僵局时遭殃。而且，如今的国家由城市组成，而非边境社会，美国却囿于保留持枪

的权利。此外，英、美这两个国家遭遇了相似的国际、国内问题，同样需要在日益全球化的经济形势下，直面自由市场与社会保护之间的张力。它们也因此展露出了相似的左派与右派间的波动—而不是像法国一样，在两个极端间急速跳转。事实上，对于有着几乎相同挑战的西方民主政体而言，它们所采取的方法很有可能也十分相似。即使第五共和国的政治体制是紧急状况下的产物，它也存在了半个世纪。讲究逻辑的法国人也许有着不太符合逻辑的宪法，但强大的行政领导确实有它的优势。尤其是，它符合法国长期以来的统制经济政策，且允许领导层迅速做出决策—不管是关于建设核工业，还是实施类似于欧洲之星高铁工程这样的项目。

即便如此，宪法看起来似乎功过相抵了。它制造的问题和它解决的麻烦一样多。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由普选制选出的总统与经国民议会批准任命的总理之间存在着“正统性的冲突”，而国民议会也是由普选选出的。这种说法来自希拉克的传记作家。正是这种矛盾而非简单的个性不和，直接导致蓬皮杜与沙邦-戴尔马、吉斯卡尔·德斯坦与希拉克之间存在着破坏性的矛盾。在“同居”体制下，这种局面显得既荒唐又有害。密特朗暗中拆他的总理希拉克的台，而希拉克又对自己的总理若斯潘做着同样的事。

再者，如果说当初设计体制是为了聚焦民意并减少独立政党数量的话，那它基本上从未达成目的。事实上，考虑到冷战的结束、法共的解体，考虑到左派与右派日益认识到，即使两派侧重有所不同，它们也在同样的全球限制下管理着相同的市场经济这一现实情况，问题往往会自我纠正。但是，正如2002年那场闹剧般的总统选举所展示的那样，二轮选举制产生了过多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候选人。他们参选是为了获得免费的媒体曝光，打造自己的政党形象，为较小规模的比例选举造势。同时，他们也是为了获得讨价还价的能力。即使他们在第二轮选举中追随着两个主要候选人—有些人的追随与党派利益无关—也不存在严格意义上联结为一体的左翼多数派或是右翼多数派。这个体制加深了分裂，也加深了公众的怀疑。

此外，总统职位具备的特殊权力引起了人们的另一个担忧。虽然政治腐败不仅限于法国，但这些年间一连串前所未有的丑闻让体制名誉扫地。许多丑闻涉及戴高乐党，其他的则是关于法国社会党的。有些丑闻是关于政党的大规模非法资金—这个问题也见于其他民主国家—解决措施是为选举经费设置上限。另一些丑闻则是关于政府的秘密行动。正如在绿色和平组织的旗舰“彩虹勇士”沉没事件中，法国情报部门将船弄沉以阻止其干预在穆鲁罗瓦环礁的核试验。又如，法国向安哥拉秘密出售武器以换取石油开采权，而密特朗的儿子让-克里斯托

弗就牵涉其中。许多丑闻源于个人贪欲，尤其是在统制经济下，许多部长与大公司过从甚密。伯纳德·塔皮（Bernard Tapie）的有趣案件就是一例。塔皮还被指控为他的球队马赛足球俱乐部操纵比赛。此外还有罗兰·杜马斯（Roland Dumas）一案，他的情人是一名游说者，也是埃尔夫-阿奎坦石油公司的回扣中转人，以让杜马斯穿贵得离谱的伯尔鲁帝手工鞋而闻名。勇敢的地方法官在调查中遇到了阻挠与恐吓。吉斯卡尔·德斯坦、密特朗等人的名誉都被丑闻玷污了，还有两名部长因丑闻自杀。而且，讽刺周报《鸭鸣报》每期都会爆料。人们只能用让-玛丽·科隆巴尼（Jean-Marie Colombani）与雨果·波特利（Hugues Portelli）的观点来做总结：这一系列的丑闻是由“这种行使权力的方式以及缺乏充足的组织、政治与社会制衡，最重要的是道德上的制衡”所造成的。

自2002年起，总统任期减至5年，且自此以后，总统选举结束后将立即举行立法选举，这两项举措使政府有效地摆脱了“同居”的种种混乱状况。但是，这种简化让总统的权力更大了，当然只是加剧了关于总理职责与选举产生的议会所负的责任这一老问题。

第十四章

经济衰退下的法国去向何方

法国人普遍感到“愁闷”，“衰落主义者”或曰“衰落学家”大谈特谈民族衰落。

法国人常评价本国人是“爱发牢骚者”，或者说是不可救药的抱怨者。无疑，他们这么说的时候当然没把自己算在内。继2002年那场选举发生之后，人们不大可能错失发牢骚的机会。据说，法国人普遍感到“愁闷”。这个术语使用范围如此之广，以至于它都有了近乎临床的特征。“衰落主义者”或曰“衰落学家”大谈特谈民族衰落。这个带有污辱性的外号是颇有派头的外交部部长多米尼克·德·维尔潘（Dominique de Villepin）发明的。诚然，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中，他们的一些担忧的确摆在了同类国家的面前。但是，另一些问题更具针对性。上升的犯罪率是当务之急，明显无法解决的失业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而且，政府内部关系紧张。希拉克不仅发现自己与内政部长、精神饱满的行动派尼古拉·萨科齐之间争来斗去，而且萨科齐与维尔潘之间也存在着严重内斗。在2002年法国国庆日时，一个慌张的右翼分子刺杀希拉克未遂，再加上伊拉克问题在联合国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这将是个有趣的时期。

2002年6月，希拉克任命让-皮埃尔·拉法兰（Jean-Pierre Raffarin）为总理。这个谦逊的人更精于省级政治。萨科齐通过更多的资金与警力，还有对少年犯罪更为严厉的惩罚，继续精力充沛地打击着犯罪。拉法兰与他的劳工部长、亲英派的弗朗索瓦·菲永一道，再度尝试解决失业问题，降低赤字以达到欧元区要求。这意味着极尽政治之可能，撤销若斯潘的劳工保护措施，不替换公共事业领域中的工作岗位，并进一步实行私有化，尤其是法国燃气与法国航空的私有化。虽然他们没有冒险撤销一周35小时工作制，但通过允许延长加班时间并免除小企业的责任，慢慢蚕食着这一制度。

接着，他们试图遏制开支失控的两个主要领域：公共部门的退休金与医疗保健。面对公共部门退休金问题，他们将私营部门服务标准限制性条件提升到了40年的服务标准；在医疗保健问题上，他们提高了保险金分担额，强行征收小额诊疗费—法国人是全世界使用药物最多的人之一—以期限制过多的处方。可以预见的是，所有这些措施均

遭到了工会与大多数民众的抵制。与此同时，人们怀疑政府分散更多权力的尝试只是一个花招而已，真实目的是将政府迄今为止征收的一些税赋的负担分摊到地区头上。这些措施本身见效慢，因此，同样都在2004年举行的地区选举与欧洲议会选举对政府而言都是灾难。

与此同时，希拉克一直忙于确保在国际舞台上法国雄风不减。2001年世贸双子塔遇袭后，他立马表明自己对美国的支持。但是，当美国政府进一步采取行动要攻打伊拉克时，他宣称自己对此事并不信服。诚然，表示反对的不止法国而已—还有德国、俄罗斯与中国。但是，美国人以及部分英国媒体尤其憎恨法国要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否决美国军事行动的威胁。在美国，法式薯条被重新命名为“自由薯条”，像杰·雷诺这样的深夜喜剧演员拿“吃奶酪的投降猴子”开玩笑。在英国，平民主义通俗小报《太阳报》刊登了一幅漫画，画中沿路缘缓慢行驶的萨达姆·侯赛因正在招妓，对象就是头戴金色假发、穿着高跟鞋的希拉克。

甚至自觉严肃的《旁观者》杂志也以同样的思路刊登了一幅漫画。为什么会有如此深的怨恨？为什么会如此不敬，因而招致法国人的抗议？当然，法国与美国长期以来都将彼此视为互相竞争的文明模式，而且美国人往往认为法国人自视过高，他们的这种看法并不总是错误的。但是，根本原因是美国人觉得，这位一直以来的盟友居然如此忘恩负义，让他们感到了深深的失望。因此，大多数美国民众认为，这还是法国那老一套的戴高乐式故作姿态，想要在世界事务中以小搏大，并以给“盎格鲁-撒克逊人”惹麻烦为乐。

希拉克不仅提前宣布要在安理会上行使他的否决权—在会上，维尔潘颇有格调的演讲让人拍手称快，也让人们明白了它要传达的道理—事实上，他还协调了反对力量。据说，这并不单纯是外交上的机会主义，更是出于保护法国在伊拉克的利益这一动机。诚然，作为帝国的一项遗产，法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巨大外交影响确实保持了下来，而且在中东地区有着长期的战略利益。同样地，戴高乐主义的法国有着亲阿拉伯，而非亲以色列的立场。并且，它还为未来的伊朗革命领袖，作为伊朗什叶派阿亚图拉的赛义德·霍梅尼提供了避难。尤其是继1975年希拉克的正式访问后，法国就向伊拉克提供了战斗机与飞鱼反舰导弹，甚至还有伊拉克的奥西拉克核反应堆。在这个核反应堆能投入使用前，以色列在1981年就把它炸掉了。当时法国也正在与其他西方国家争取国防市场与中东石油供给，而美国自己在两伊战争中也支持了萨达姆·侯赛因。然而，希拉克准备与美国进行情报上的合作。在他看来，新保守主义者与布什总统那救世主似的语气让他感到惊恐不安。他觉得，这些人并不真正明白这样一场入侵将造成怎样的骚乱。

因此，他宣布，他没有看到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伊拉克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争辩道，在那种情况下，继续战争将会损害联合国。

即使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他觉得，自己是正确的。希拉克没能成功用他的“多极世界”理念取代由唯一一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局面。像欧洲大部分地区一样，他也将惊诧于法国在2005年5月全民公投中拒斥了欧盟新宪法，毕竟，法国是欧盟的6个创始国之一，还是其中最大的国家。即便没能强制推行法国社会模式的欧洲版，法国也基本成功地在外交上主宰着欧盟。而且，欧盟的制宪委员会由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名正言顺地主持着。此外，法国社会党内部此前的一次象征性表决显示，大多数人都赞同新宪法。同时，人们以为戴高乐党与中间党派也抱有支持的态度。那么，为什么全民公投结果是新宪法遭到了55%的人反对，而支持者只有45%呢？

在左派方面，社会党内2007年总统选举潜在候选人之间的权力斗争不断发酵。这些候选人包括洛朗·法比尤斯、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与塞格琳·罗雅尔。前右翼分子法比尤斯支持名义上的备选方案，如今他出人意料地分离出去，领导一支左翼派系与法共、托洛茨基派一起，投下了反对票。因为，他们觉得欧盟就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计划。在右派一方，反对不仅来自国民阵线党与民族主义团体，还来自戴高乐党自身的一部分。因此，左派对业务外包的恐惧混合着右派对移民的害怕，造就了具有象征性的“波兰管子工”形象。这个外国人被视为抢夺法国工作岗位的一大威胁。诚然，大多数选民并没看懂内容庞杂的宪法提案，他们只是采取了自己的惯常操作—投政府的反对票。在这背后是人们对持续的失业、全球化的影响、认同感与工作机会可能消失等问题的担忧，因为拟定的欧洲扩充会将土耳其包含在内。让人们感到不安的还有，由于德国重新统一、日益独立，现在法国在欧洲的影响力明显变小了。事实上，这种汇聚了极左与极右的民族主义有少许绝望的色彩。它反映出人们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的被贬低感与迷茫感。

被削弱的希拉克任命维尔潘为总理，并给了萨科齐二把手、内政部长的特别地位。这个平衡各方的做法是为了巩固维尔潘的地位，以对抗他那日益强大的劲敌萨科齐。后者已经明确表示，他有意参加2007年总统选举的角逐。这两个同样野心勃勃的人是很有趣的研究案例。富有魅力且有教养的维尔潘之前是名外交家，并且长期担任希拉克的亲密顾问。他不是一名由选举产生的政客，而且他相当鄙视这样的人。因此，有些人形容他是一只“孔雀，一个时刻准备为主人拔刀出鞘的王室保镖”，是“戴高乐主义的堂吉诃德”。另外，传统戴高乐党

的菲利普·塞甘将萨科齐描述为“一位自发的新自由主义者，没有理论、先入之见与禁忌的实用主义者”。萨科齐不是天赋异禀的业余者，而是进取心十足的专业人士。他历经艰难困苦才爬上高位，而且已经通过让自己当选为戴高乐党的主席而忤逆希拉克了。如今，他把这个党重新命名为“人民运动联盟”（UMP）。但是，维尔潘暂时是受人瞩目的焦点。维尔潘重复了他心目中的英雄拿破仑的做法，公开立下100天恢复民众对政府公信力的军令状。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改革税收的提案与降低青年失业率的措施，他确实做到了。因此，到秋季时，他在民意调查中领先于萨科齐—之后就诸事不顺了。

2005年10月，郊区或曰外城住宅区的移民暴乱突然让大众再次普遍感到安全感缺失。围绕巴黎城而建的郊区遍布着实用的苏联式大楼，它们距离城市中心地区如此之远，以至于那里的居民只有通过电视才了解到这些骚乱。骚乱导火索是克利希苏布瓦镇两名青少年的死亡。他们为躲避警察的身份检查而爬进了变电站，结果触电身亡。暴力抗议开始了，而警察又反应过激。不久它就在市郊周围蔓延开来，尤其是在塞纳河畔埃皮奈镇。在那里，暴徒当着一位巡查工程师妻女的面，把他打死了。接着，骚乱又延伸至马赛、里昂、图卢兹与其他城市。在3周内，成千上万的车辆被烧毁，许多公共与商业大楼被人纵火，数以百计的暴乱者被拘捕。他们往往是年轻人，通常是有着北非血统的第二、第三代移民后裔中的未成年人—他们被称为“第二代马格里布裔年轻人”—重要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法国国籍。

一开始，公众的反应是把最初事件当作出了差错的入室小偷小摸，但是暴力升级了。内政部长萨科齐煽风点火地说，暴乱者是社会渣滓，要用高压水管把他们清除干净。而且，他还把骚乱说成有预谋、协调好的。事实上，正如安全部门的一份官方报告得出的结论一样，当地的移民群体并未参与其中，而且骚乱也是自发形成的。如此一来，它就更令人担忧了，尽管人们并不应该为此感到如此震惊，毕竟数年间偶有焚车事件发生。但是，这对法国来说仍然是件惊人的事。当希拉克提及“认同感危机”、削除歧视、创造均等就业机会时，他承认这起骚乱确实令人震惊。电视上，暴徒火烧那些为服务他们而建的学校、青年中心、体育馆，甚至是小企业，此般景象让人们能够估测出他们与社会疏离的程度—他们毁掉了自己的生存环境，因为它象征着那个他们觉得不把自己当成完完全全的公民的法国。事实上，他们提出的问题是，如果共和国宣称的平等与团结不适用于他们的话，那这样的平等与团结是否还是真的？

如果说，萨科齐已经成了选民憎恨的对象的话，右派则日益视其为铁腕人物。如今，在维尔潘绝望地寻找对策，解决由骚乱引发的问

题时，他可以作壁上观。维尔潘提议进一步推进私有化，对服务性行业征税以减少国债。与此同时，他还迫使苏伊士集团与法国燃气合并以阻止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的收购，实行“经济爱国主义”政策。最重要的是，他试图解决青年失业问题。具体做法是实行两年制的“应届毕业生合同”，旨在鼓励企业雇用不到26岁的人。然而，公司聘用职场新手，也许是因为可以在觉得雇员不合适时，不出具任何书面说明也不提供补偿金就把他们辞退，这将导致工会与学生在2006年春发动一场大规模抗议性罢工。维尔潘通过应急程序使自己提出的措施得以通过，也未与工会接触，从而犯下错误，结果希拉克最终被迫要求维尔潘撤回他的措施。此举使二人均名誉受损，维尔潘感到自己被萨科齐暗算，受了奇耻大辱。它也给外界留下了法国陷入瘫痪的印象，因为法国人似乎给自己来了一场小革命，而他们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变，反倒是为了坚守饱受诟病的现状。

恰逢此时，戴高乐党高层之间的权力斗争随着十分混浊不清的“清泉丑闻”的爆发，在2006年5月登上了报纸头条。这个迅速被喻为“法国水门案”的事件要追溯至始于2001年的一项司法调查。该调查针对的是法国向中国台湾售出的6艘护卫舰所涉及的贿赂问题。但是，2004年，承担这项调查任务的两名法官收到了匿名举报人提供的可疑账户名单。这些账户是在卢森堡清泉金融公司的清算银行开设的。据推测，收取了回扣的政治家与实业家的名单中就有萨科齐的名字，而且，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确实榜上有名。虽然这完全超出了当时身为外交部部长的维尔潘的职责范围，但他一得知这个消息，就命令顶级情报高官菲利普·龙多将军秘密打探此事。据说，他还吩咐龙多将军特别留意萨科齐。

这份名单后来被证明是子虚乌有的，而且，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这反映了有人企图通过编造政治丑闻以混淆贿赂问题。但是，据说维尔潘在得知这是假消息后，还将情报压了15个月。结果证实，匿名告密者是欧洲宇航防务集团的让-路易·热尔戈兰，这位航空公司副总裁曾与维尔潘共事多年。萨科齐在盛怒下起诉了主导骗局的“个人或群体”。由于他在2007年总统选举中没有遇到竞争对手，萨科齐作为右翼候选人不战而胜。

2007年选举对于法国政治而言可谓象征着一种彻底的改变，因为一个看似枯竭的体制试图自我更新。最明显的变化也许发生在法国社会党内，人们认为社会党也许会清理门户，并组织起来，让自己的候选人轻易获胜。毕竟，在2004年时，左派在地区选举中轻而易举地就拿下了26个地区中的20个地区，而社会党在欧洲选举中赢得了31个席位，成为欧洲社会党群体中最大的全国代表团。

尽管如此，针对欧洲宪法全民公决的内部分歧—这一分歧导致洛朗·法比尤斯被排除在行政领导层之外—使人们蒙受了创伤。它不仅再度提出了社会党对全球化所持态度这一基本问题，还引发了人们的担忧。人们担心，社会党无法说服自己的欧洲伙伴支持自己在宏观经济规划与创造就业机会上所持的统制经济观点。同时，社会党基本上是一个中产阶级政党。它有七八个可辨认的左派、温和派、右派或是绿色意识形态的部分。因此，担任社会党第一书记的弗朗索瓦·奥朗德想让它们团结一心，并非易事。但是，他改革了政党机器，并通过招聘活动吸纳了近10万名新成员。因为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所以事实上社会党的中产阶级倾向就更明显了。加之人们对老牌领导岗位竞争者—或者说是“大象们”，这是人们对这类人的有趣叫法—在某种程度上的不满，一个惊人的结果产生了，即奥朗德的女友塞格琳·罗雅尔轻松地在党内投票中赢得了60%的选票，而社会民主党的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只获得了21%的选票，左翼民主社会党的洛朗·法比尤斯只有19%的选票。

女总统候选人这一新奇现象只是2002年起发生的诸多变化之一。在第一轮选举中，参与投票的人数占到了85%，为30年来的最高值。由于这次的重点是“有效投票”，所以较小的党派遭到严重挤压。在左派方面，3个托洛茨基政党、曾经强大的法共、法国绿党与有趣的反转基因农作物的候选人若泽·博韦，全部加起来所得选票不足10%。令人吃惊的是，相当平淡无奇的中间派让-弗朗索瓦·贝鲁居然获得了18.57%的选票，毕竟他的党群只占国民议会577个席位中的27个。这说明，有些选民正在左派与右派之间寻找出路。不太令人吃惊的是，国民阵线党得票率下滑到了10.44%，因为萨科齐通过许诺成立“移民与国家认同部”，并在犯罪预防与不愿工作的“行乞者”问题上走强硬路线，而吸走了许多勒庞的选票。

但是，令人相当难以置信的是，处于知天命年纪的罗雅尔、萨科齐与贝鲁不仅将自己打造成新生代，还把自己描绘成是与党派彻底决裂的候选人，甚至是局外人。因为，萨科齐前不久还是财政部部长与内政部部长，而且这两个职务他做得都不是特别好。罗雅尔毕业于享有盛誉的法国国立行政学院，她与维尔潘是同时代的人。她曾任环境部长、教育部次长，以及家族、儿童事务部次长。贝鲁曾任教育部部长一职，并担任了他所属的中间党派的主席达9年之久。这些人几乎不是什么政治新手。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坚称与自己的政党一刀两断，就此“决裂”呢？为什么萨科齐与罗雅尔都暗示说，他们都反对自己的政党呢？

他们是在回应人们的普遍意识，即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人

们觉得，不管是右派还是左派政府，都不能在充斥着合并与外包的全球化新时代里，完全控制国民经济。与之相关的一种认知是，如果说法国从身为欧盟成员国的身份中受益的话，它也受到了这种身份带来的重重制约。塞格琳·罗雅尔的权力基础是她作为普瓦图-夏朗德大区议会主席的身份。这个新奇之处预示着，分权已经开始让权力从中央政府流失走了。在这种情况下，左派与右派间的历史性差异看似不那么重要了，尤其在双方相当绝望地尝试解决相同的基本问题时，彼此间的距离已经拉近了。萨科齐的非意识形态站位，以及罗雅尔强调参与式民主而非议会制民主的新论调，均证明了上述论断。此外，新宪法规定总统与议会任期均为5年，这确保了权力在总统手中的个人化。所有这一切带来的新局面是，选民更愿意将选票投给个人，而非政党。萨科齐与罗雅尔都深谙此道，他们都有自己的专业公关团队。

尽管法国人此前对政治的个人化，还对诸如克林顿、布莱尔与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这些人的个人魅力形象包装嗤之以鼻，但是他们如今发现自己受到了一批用亮光纸印刷的、所谓的“人民”杂志之攻击—“人民”成了名流所拥趸的新名词—这些杂志都起着诱人的名字，例如，《靠近》《盛会》《公众》与《真相》。由此而来的政治个人化把选举变成了类似娱乐界肥皂剧般的东西。在这场肥皂剧中，没有多少关于“塞格”或是“萨科”私生活方面的事是我们所不了解的。我们知道，罗雅尔的女性主义是由她那疏远且专制的父亲造成的，她还起诉过她的父亲。我们知道，她与弗朗索瓦·奥朗德之间关系紧张，而且他的出轨还导致二人分居。我们知道，她感觉自己的社会党同事对她的反对带有性别歧视的意味。但是，我们也知道，她看起来有多么迷人、上相，不论她穿着的是那标志性的白西装还是青绿色的比基尼。身着白西装的她在一些人眼中宛如圣母马利亚，比基尼照则是被偷拍到的，不过她最终同意让照片公之于众。当然，所有这些与24小时的多频道世界是同步的。她看起来既是这种曝光的受害者，也是受益人。

对萨科齐来说更是如此。人们发现，他和妻子西莉亚在一起时容光焕发，当她离开时他就愁容满面；她回来后他又容光焕发，她再次离开时他又愁容满面。萨科齐在与卡拉·布鲁尼在一起时，也是容光焕发的。我们对萨科齐的一切了如指掌。剧作家雅丝曼娜·雷莎（Yasmina Reza）曾与萨科齐一起参加竞选活动。我们从她那里得知，他对自己身材矮小的事感到很苦恼。萨科齐慢跑、骑车，从不喝酒，但会抽雪茄。他喜欢吃甜食和巧克力，自视为右翼分子却不是保守主义者。他品位粗俗，觉得爱情大过天。我们从另一段描述中得知，他认为是“他童年遭受的种种羞辱”塑造了自己。因为，他那轻浮的匈牙利贵族父亲在萨科齐年仅4岁时抛妻弃子，由此降低了萨科齐

至爱的母亲的社会地位。而且，我们在另一段描述中了解到，他对希拉克与戴高乐主义的达官显贵们有着强烈的憎恨：

……他们从未认可我的候选人身份。我的相貌、教育背景与风格都不符合他们的要求。我就是一个局外人。他们永远都不会接受我。但是，我应该感谢他们的帮助：正因为我是一个局外人，我才能摧毁他们。[27]

然而，这个局外人是戴高乐党的主席，而且他第一场婚礼的见证人是法国最富有的两个实业家族的成员。对私生活的强调处处都模糊了政治问题。

萨科齐与罗雅尔都不完全是令人信服的候选人。罗雅尔直接通过她的网站向大量会员与普罗大众发出呼吁。她提倡直接民主，还提出了诸如母性、家庭与民族这些宽泛的概念。这使她看似是个具有吸引力的、与众不同的政治家。但是，传统的左派往往觉得她的竞选活动是平民主义的，甚至是一场基于民意调查的市场营销活动—埃马纽埃尔·陶德冷冷地说，她真正的“一刀两断”切断的是“就意识形态进行讨论的社会党传统”。但是，公平地说，四分五裂的政党本身的路线就没有清晰到可以助她一臂之力。对于经济问题，她从不曾强硬。她赞成建设更好社会的想法，却提不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她也误判了一场重要的电视辩论。当时，她试图令萨科齐感到不安，然而到头来却显得自己喋喋不休、专横跋扈。

诚然，萨科齐与作为政府一员的自己“一刀两断”是有困难的。而且，身为人民运动联盟的主席，他试着让自己看起来凌驾于政治之上，这一尝试也有难度。还有其他矛盾之处。例如，当他自称是经济自由主义者，仰慕美国及布莱尔领导下的英国时，他又在工业与农业问题上发表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论调。虽然萨科齐有喜好卖弄、过分虚饰与爱唱独角戏的问题，但他表现出自己是名相当聪明、有经验且善意十足的政治家。基于这些直截了当的原因，他轻松地以53%比47%的得票率获胜。他是准备更充分、更精明的策略家。而且，他看似更清楚地意识到了民族危机的紧迫性。最重要的是，他似乎懂得权力运作—而且会无所畏惧地行使权力。

萨科齐适时地任命忠诚的弗朗索瓦·菲永（François Fillon）担任权力受到极大缩减的总理一职，随后迅速给自己的总统职务烙上了个人印记。他组建了一个五彩缤纷的内阁，让各式各样的人聚集在自己周围。他们包括非戴高乐党的中间派、有着北非血统的女司法部部长拉希妲·达狄，还有几位社会党人，其中有无国界医生的创始人贝尔纳·库什内，他后来成了外交部部长。社会党人并不高兴。而且，当萨科

齐一意孤行地在2009年任命前总统的作家侄子弗雷德里克·密特朗出任文化部部长时，社会党人就更不高兴了。这一举动给主要的反对党去了势，而且显然在策略上是有效的，尽管这位奉行波拿巴主义的新总统并不真正相信党派。

“如果我不存在的话，他们就得把我造出来”，萨科齐曾对雅丝曼娜·雷莎如是说。确实，萨科齐通过把自己塑造成高效干练、不为意识形态所累，并准备好阻止形势恶化的务实主义者，完美而巧妙地融入了国家局势之中。其中，人们对左派与右派都充满了困惑不解与灰心失望。但是，那些表面上没有意识形态的人有着隐性的意识形态。而且，有趣的是，希拉克批评萨科齐不仅“太过新自由主义、太亲美”，而且还“太过多元文化主义”。

萨科齐早期针对移民做出的严厉评论，或是他在2009年针对佩戴尼卡布面纱行为发起的相当著名的攻击都无法使他成为一名热忱的共和党世俗论者。相反，他在《共和国、宗教与希望》一书中提及后宗教启蒙运动思想的不足之处。而且，他仿佛不知道共和社会模式般，问道：“如果法国教会不关心穷人的话，谁会呢？”2007年12月，萨科齐在罗马发表了一篇演讲，其中援引法国的“基督教根基”，呼吁人们追求“积极的世俗主义”而不是“疲惫、狂热的世俗主义”。而几周后，在沙特阿拉伯，他赞美伊斯兰教并提到“超然的上帝存在于所有人的脑中与心中。上帝是抵御人类愚行的堡垒”。虽然萨科齐本人没有宗教信仰，但他好像把宗教视为一种文化事实。他觉得任意一种宗教都和其他宗教一样好。而且，在尊重本土习俗的前提下，他还准备让法国接纳伊斯兰教。

正如著名学者萨米·泰尔（Sami Naïr）所言，所有这一切代表了“与整个法国共和文化以及民族观的决裂”。这确实是与戴高乐主义的一刀两断。不再有戴高乐主义伟大的雄心壮志，不再像左派一样乐观地觉得自己是身处于一项正在建设的历史工程之中。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萨科齐紧张忙乱的行动主义不仅出于“向曾经诋毁他的人证明自己”这一个人需要，还与常常和激进右派联系在一起的哲学上的悲观主义有关。正如希拉克所认为的那样，新自由主义、亲美的萨科齐为寻求经济方案转向了“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而且，他像新上任的公司总裁一样，丝毫不顾及政治标签地采纳左派与右派的建议。他在35小时工作周的基础上附加了加班奖励，给工人税收减免，也为富人大幅下调了继承税。接着，为帮助低收入者，他用股息税略微抵消了继承税下调的影响。萨科齐试图在教育、法庭与军队中实行裁员计划来削减赤字。他继续推进方案，让运输工人享有特权的特别退休金计划与私人领域的退休金计划保持一致。而且，他引入了一项新规

定，要求罢工期间，运输领域与学校应达到最低服务标准。工会表示抗议，但萨科齐用加薪收买了它们，而且工会也没有得到多少公众支持，这显示出萨科齐事实上在政策实施方面相当灵活，尽管他在宣称改革时十分大胆。

但是，这只是一整套革新中的一部分而已。这些革新是以惊人的速度，有时甚至是以过快的速度引进的。他厘清了宪法，授予国民议会更多正式权力，限制总统任期最长为两个5年，并对总统传统的官方职位任命与赋予特赦的权力加以限制—事实上，萨科齐这么做的目的是使自己作为总统的行事方式合理化、稳定化。他引入了移民选择标准，只允许有助于经济发展的工种进入法国，而且每年要驱逐25000名非法移民。他组织召开了一次煞费苦心的会议，由此产生了一项雄心勃勃的环境行动方案。他的司法部长拉希妲·达狄使他之前许诺的司法改革获得了通过，即关闭许多被认为是供过于求的法院，以及引入惯犯的最低刑期制。但不幸的是—考虑到达狄作为一名少数族裔部长的象征性与重要性—她的专制作风得罪了一众顾问与治安法官。结果，2009年，萨科齐不得不把她调到欧盟议会以缓和局势。

可以预见的是，教育改革方案的通过也非易事。教育部长格扎维埃·达尔科不得不应对反对派对他在小学优先培养读写与计算能力之计划的攻击。同样地，他们也反对达尔科在高中围绕基础科目进行的课程重组。高等教育部长瓦莱丽·佩克雷斯的主要职责是使大学独立。她创建了特别的精英中心，调整了讲师研究员的状况，由此展开了与学生及一些讲师间长期的斗争，因为他们觉得佩克雷斯这是在推行资本主义竞争。应该说，萨科齐的一些轻蔑言论并没让她的工作变得轻松。萨科齐的品位没有达到熟知古典文学的程度，他对法国第一部心理小说《克莱芙王妃》（*La Princesse de Clèves*）大加挞伐。毫无疑问，这增加了该小说的销量，导致公众在巴黎先贤祠外公开朗读这本小说。而且，当学生们在2009年年初开始了长达5个月的罢工时，他们来回奔走时也佩戴着宣示自己忠于贞洁的克莱芙王妃的徽章。萨科齐不善交际，其直截了当的风格，对一些人来说令人惊诧，但是对另一些人来说又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不过，这种风格确实时不时地让他的部长们感到尴尬。

在国际方面，他同样有招人烦、惹人厌的本事—德国、中国、英国，凡是你能说得出的，都厌烦他—但是，他的进取心与取得的效果是毫无疑问的。他一走马上任就开始与哥伦比亚叛军就释放政治家英格丽特·贝当古展开协商，或是与利比亚针对保加利亚护士的引渡，以及利比亚购买法国核电站事宜达成协议。他还访问了英国与美国，强调戴高乐主义与“盎格鲁-撒克逊”以往的争端已经结束了。2008年下

半年，作为欧盟轮值主席，萨科齐精力充沛地展现出他将法国与欧洲坚定地摆在事务中心位置的立场。当时，欧盟不得不应对各种接踵而至的危机，包括：爱尔兰拒绝接受《里斯本条约》、俄罗斯派军格鲁吉亚，还有最重要的全球银行业与经济危机。在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冲突中，萨科齐亲自干预，使双方达成停火协议；他施展巧计获得了来自爱尔兰的第二次投票，目的是捍卫《里斯本条约》；尽管他与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在经济管理问题上存在根本性分歧，但两人一道成功说服欧盟成员国团结一致，再度让它们的银行运转起来。

正如萨科齐所言，他喜欢这份工作，觉得它给人以启示。尽管他视欧洲为民族国家的联合，而不是某种联邦制，但他也看到了把欧洲打造成一支更加强大的世界政治力量的可能性。但是，他还有另一个令人愧疚的发现，即全球金融体系令人震惊的内爆削弱了他最初新自由主义的设想。而且，经济危机给欧洲与全世界的社会和政治都带来了破坏性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法国是幸运的，因为它的经济不像德国那样以出口为导向，也不像美国与英国那么依赖复杂的财政规划。但是，通过热罗姆·凯维埃尔事件，法国迅速拥有了在如今看来堪称全球赌场运作的法国实例。这位年轻商人为了磨炼自己的技艺而不是图谋私利，让法国兴业银行损失了50亿欧元。据说，凯维埃尔以超过该银行的全部市场价值为赌注。2009年6月，在凡尔赛，面对着议会与参议院，萨科齐严肃地宣布，他之前欣赏的英美金融体系是个“死胡同”，而且“危机让法国模式再度流行”。他不加掩饰地告诉他们：“没有什么还像以前一样。”

对萨科齐来说，这个转折点完全改变了政治局面，因为他激进的改革主义方案看似被许多事件宣告无效了。随着银行业危机恶化成世界范围内经济衰退背景下的欧元区危机，他发现自己被迫要解决他的前任们，不管是戴高乐主义者还是社会党人，数十年间苦苦挣扎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在保持法国共和模式的同时，调整经济使其应对全球化世界的种种挑战。他不仅要在条件不那么有利的情况下这么做，还得面对与时俱进的全国人民的幻灭感与左派及右派的怀疑。因此，在2010年新年贺词中，当他重提标准的共和辞令时，他听起来也许更像希拉克而不是萨科齐。他不仅赞扬了社会模式，还使人想起了“法国例外”。他宣布：“法国提出的理念将标志着人们对新世界秩序的追寻：更多平衡、管制、正义与和平。这些理念将树立榜样的重担压在了我们肩上。”

萨科齐以自己一贯的惊人方式，实实在在地尝试着在改革体制时打下法国的烙印，尤其是在随后3月召开的关于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欧盟峰会上，他猛烈攻击信用评级机构、资金与对冲基金所起的作

用。他强烈支持一个新的泛欧洲管理体制。他如今清醒地意识到与德国达成重要关系的必要性，尤其是在欧元区出现根本性疑虑的情况下。人们怀疑，在没有经济与政治联盟的前提下，货币联盟是否可行？欧盟之前是建立在法国与德国合作的基础上的。但是，随着更多国家加入这个体系，英国依旧保持着半独立状态，德国开始转向俄罗斯，寻求能源供给与市场，欧盟内的纽带关系可能会变弱。之前在希腊债务问题上，萨科齐觉得默克尔的态度过于严厉。因此，鉴于萨科齐之前曾就此吵吵嚷嚷地批评了默克尔，他如今决定与这个不浮夸、慎重的前学术科学家保持行动一致。默克尔不仅与萨科齐境遇相反，是个众生仰慕的对象，还与他性格迥异，以至到了近乎可笑的程度——二人如此不同，以至于他们私下还会相互打趣。

萨科齐确实意识到德国经济更加强大。而且，当他与自己的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一道，着手解决法国自己的问题时，也偏向于使用德国的财政紧缩政策。因此，法国宣布，2013年时，要将占国民生产总值8%的预算赤字降至3%——这只是达到法国之前极少关注的标准欧元区规定而已。人们并不清楚法国将如何做到这一点。6月，由于人们较长的寿命当时正在对养老金成本造成压力，政府提出了一项计划来消除差额。一部分措施是渐渐将法定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2岁，另一部分措施是增税。尽管这遭到了社会党与工会的强烈反对，但是法国的预算削减依然没有德国、英国与其他欧盟国家的那么明显。一个原因是，法国人担心（这种担心并非毫无道理），突然采取过于严厉的紧缩措施也许只会延长经济衰退期。显然，鉴于这些计划将不可避免地遭到反对，另一个原因是政治上做了权宜之计。

萨科齐在放弃了自己的新自由主义立场后，考虑到即将到来的2012年总统选举，他在向左向右改弦易辙时比以往更小心了。虽然他之前曾成功地在国家层面上将右派团结在一起，但是，当人民运动联盟政党在2010年3月地区议会选举中遭遇了令人痛心疾首的失败后，该党内部已开始出现低声抱怨了。不仅中间派与左派的联盟“左翼联盟”拿下了除阿尔萨斯外的全部22个本土选区，而且国民阵线党也以7%的得票率卷土重来。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社会党主席玛蒂娜·奥布里——欧盟执委会前主席雅克·德洛尔之女——将会在总统选举中击败萨科齐。甚至更加不吉利的是，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极有可能从华盛顿回国，成为社会党候选人。之前，萨科齐成功让他当上了享有盛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常务董事。此举既能保住法国威望，又轻易地让一个强大的对手离开竞技舞台。然后，还有维尔潘。萨科齐在“清泉事件”中亲自以原告身份出现，结果表明并无助益，因为这使他的总统任期在4个月的审讯之外还卷入了法律纠纷——在审讯中，虽然次要人物被判有罪，但维尔潘被无罪释放了。

所有这些都没能阻止萨科齐以自己强劲的作风在国际舞台上精力充沛地追逐法国的目标。2009年，他把法国重新带回到北约组织之中，从而与戴高乐主义的独立立场决裂。他的理由是，在当今世界，单靠国防根本就算不上是防卫。他继续与英国就快速部署联合部队与核弹头试验达成军事协议。在哲学家与媒体名人伯纳德·亨利·列维的督促下，萨科齐也在争取建立由联合国支持的利比亚禁飞区上，起到了带头作用。建立这个禁飞区是为了使奥马尔·卡扎菲上校不能对自己的人民狂轰滥炸。而且，在2011年担任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时，他极力确保其影响力得到彰显，不管是呼吁更多的市场规范、支持国际货币制度的全面改革、攻击避税天堂，还是就欧洲问题谴责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的思想偏狭。

但是，经济问题依然持续存在。8月，萨科齐为降低赤字，实行了一揽子财政紧缩措施。但是，当信用评级公司穆迪基于法国两家最大的银行深受希腊债务危机影响的事实，对它们进行了降级评价时，萨科齐不得不在11月时宣布再推进一轮削减。由于这也未能阻止法国在1月失去标准普尔公司的AAA顶级信用评级，而这又刚好发生在2012年大选前的几个月，因此对他来说前景惨淡。社会不公加剧，收入占全国前10%的人的生活标准上升，而收入排在全国垫底的30%的人的生活标准则下降了，以至于达到穷人标准的人数如今已升至100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法国1/3的债务是由全球危机造成的，但其余债务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萨科齐在总统任期伊始所推行的遗产税削减与其他减免所导致的。

至少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已不再是威胁了，因为他让自己卷进了相当俗艳的纽约性丑闻之中，从而在选举中被除名。但是，针对移民问题的紧张局势一直在持续。这助长了极右的国民阵线党的气焰，让该党获得了更多支持。国民阵线党如今在玛丽娜·勒庞的领导下，与在她那奉行新法西斯主义的父亲带领时相比，显得更加通情达理。萨科齐与他的内政部长克洛德·盖昂因为发起了关于法国身份的“大辩论”，已经捅了马蜂窝。大选前几周的图卢兹暴行也对他不利。

回顾过去，萨科齐可以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他在特别艰难的时期，在处理一些法国特有问题时，展现出了充沛的精力与实实在在的勇气。但是，由于他和其他领导人一样，已经被这场规模浩大的全球危机削弱了，他那极度活跃的方式也变得没那么可靠了。而且，他也不具有能让人安心的父亲角色所拥有的那种庄严，他不能用命令式的口吻劝告全国人民：他们有必要采取令人痛苦的措施。总统体制本身往往会让政治个人化，对于一个正逐渐具有名人意识的社会而

言，情况尤甚。但是，萨科齐通过把这么多东西统揽一身，还有他那因为举止奢侈而得来的“亮闪闪总统”的绰号，把政治个人化，甚至达到了在传统观点看来，是在用娱乐业的气息亵渎总统公职之神圣的地步。而且，萨科齐也犯了一些政治错误。当他试图推举自己的儿子让·萨科奇获得竞选管理拉德芳斯区公共机构主席的候选人资格时，人们指责他任人唯亲。他的儿子是地方议员，但当时只是一名年仅23岁的法学院二年级学生，而拉德芳斯区是法国主要的商业中心，同时也是欧洲最大的商业中心之一。在以独立著称的《世界报》的出售事件中，萨科齐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从中干预，结果招致公愤。

然而，导致他在2012年5月的总统选举中失利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危机，没有哪个总统能轻易解决这个问题。毫无疑问，人们长期以来投票反对在任者的倾向也促成了这一局面。在第一轮选举中萨科齐获得的27.18%的得票率低于社会党候选人弗朗索瓦·奥朗德的28.63%——后者在党内初选中打败了更具左翼倾向的玛蒂娜·奥布里。玛丽娜·勒庞的国民阵线党获得了17.9%的选票，这种成绩在第一轮总统选举中，对极右候选人来说是创纪录的高票。奥朗德在决胜选举中以51.64%比48.36%的得票率赢得了选举。因此，总统职位及与其挑战被传到了一个自称是“普通人”的总统手中，他与派头十足的萨科齐形成了鲜明对比。

第十五章

为什么法国人自认为是“例外”

> 法国想要成为文明最崇高的一种形式，这种雄心也被视为法国的民族使命。“法国例外”不是一种幻象，但它也不是一种已实现的现实。

那么，法国人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呢？所谓的“法国例外”又是怎样的呢？面对民族身份的泛化，我们宜小心谨慎。法国幅员辽阔，气候、文化多种多样。布列塔尼不同于阿尔萨斯，皮卡第异于普罗旺斯，而巴黎又与所有的外省迥然不同。事实上，伟大的历史学家费尔南·布劳岱尔在他最近的鸿篇巨制《法兰西的特性》（*L'Identité de la France*）结尾处得出的结论是，法国不仅多种多样，而且“它的多样性是显而易见、持久且结构性的”。另外，一些早期的法国历史学家提出了诸如“法国的灵魂”“永远的法国”与“法国特质”这些表达，就好像先前存在着一种典型法国性，可决定社会发展一样，而非与之相反，由社会发展塑造出法国性。这些观点怂恿人们用本质主义的视角看待法国历史，这并无助益。然而，如果说典型的民族精神是依次通过抵御罗马人、圣路易对教会的忠诚、启蒙运动对基督教社会的暗中破坏、试图强行建立新世界的拿破仑征服这些事情表现出来的话，那民族精神肯定有些乱七八糟。

提及“语言的特质”也是无益的，它看似决定了所表达思想的质量。事实上，法语是一种有魅力、古怪且特殊的语言。因为法语包含盎格鲁-撒克逊与诺曼语的双重词汇，所以它比英语有着更受限的主体风格。“吹管”（chalumeau）这样一个词，有“吸管”与“喷灯”两层意思，而语境往往能帮人们避免张冠李戴。法语的“逻辑”与“清晰”是某种特别的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思维方式所造就的逻辑与清晰。正如法式时尚的历史起源是皇家赞助，而非时髦女郎或是设计师们与生俱来天赋的自然迸发。简言之，民族身份并不是被赋予之物，而是历史概念。同样没有助益的还有这样一种情况：“法国例外”已变成如此流行的一个术语，以至于它被用于表明法国在各个领域内的不同之处或曰优越性，关于“道路安全、妇科医学、银行系统、宪法、文化、艾滋病治疗、高等专业学院、射杀候鸟，以及密码学”—更不要说在一项大有裨益的研究中，一位投稿人所列举出的“法国例外”的一些应用了。[28]

然而，关于“法国例外”，存在一个极大的讽刺：“法国例外”是在被宣告灭亡后，才变成人们时常讨论的话题的，尤其是弗朗索瓦·傅勒（François Furet）在与人合著的《居中的共和国：法国例外的终结》（*La République du centre: la fin de l'exception française*）中宣告了“法国例外”结束之后。这本书出版于柏林墙倒塌的前一年—1988年，刚好在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著的《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第一版面世前。该书的观点是，在法共衰弱、传统主义右派接受了共和国，以及法国最近加入统一欧洲后，随着激烈的国内政治冲突渐渐缓和，法国如今能放下自己“夸张的”地缘政治姿态，不再自视与众不同，表现出了其应有的中等国家的面貌。

诚然，正如“同居”新模式一样，这与向沙邦-戴尔马、吉斯卡尔·德斯坦以及其他人的中央集权主义政治靠拢的尝试是一致的，但并不意在取悦所有人。几乎20年后，希拉克在2007年最后一次总统演讲中重申了他对法国例外的信仰。他宣布：“法国不同于其他国家。它有自己特别的担当，这是法国历史以及由法国协助打造的普世价值观的遗赠。”他最后致敬道：“相信我的话，这样的一个法国还将继续使世界惊羡。”

那么，以前是否有过“法国例外”？如果有的话，它依然存在吗？

法国是“例外的”，并不仅仅因为它有一段充斥着暴力的国内史—德国、俄国与西班牙几乎也难逃政治暴力。更休戚相关的是，法国是欧盟中唯一一个仍保有代价高昂的海外省与领土的国家，为的是与其世界强国的自我形象保持一致。法兰西的大政方针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展现了它自17世纪以来始终如一的雄心壮志—17世纪的法国毕竟是欧洲最富庶、人口最多、最强大的国家。“法国例外”是一种悖论，因为法国自身不仅是例外的，还是典范的。法国的例外不仅体现在它在一般意义上不同于其他国家，更由于法国坚持遵循普适的价值观，成了其他国家的典范。这个概念的核心是一种雄心壮志—法国想要成为文明最崇高的一种形式，这种雄心也被视为法国的民族使命。

在“伟大世纪”里，当法国开始自诩为古罗马的现代版时，这个典范社会的模板已被确立。路易十四的宣言“国家就是我”是双向的，因为君权神授的概念不仅确立了国王的地位，还确立了政府的地位，而政府是国王必须与上帝订立契约的地方。而且，专制统治意味着绝对责任，中央政府须挑起重担，控制并协调商业、文化、建筑，以及社会的方方面面，直至语言本身。科尔伯特的统制经济政策、法国试图将艺术创作进行系统编纂的尝试，以及法兰西学术院对语言精确性的追求，都以不同形式暗暗表现出法国想要将文明提升到秩序井然、和谐融洽之境地的意愿。简言之，“法国例外”意味着由中央集权制的国

家所实行的普救论。

诚然，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启蒙运动通过暗中破坏宗教、削弱教会权威，抛出了一个与上述理论相竞争的普救论。在大发现的时代，当欧洲人开始了解散落在地球各处的其他文化时，这种普救论超越了国家本身，而且明显威胁到了宣称君权神授的天主教君主专制政体。在美国，独立战争也在激发人们的激进政治思想，百科全书派当时正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与它那众所周知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建立理论基础。宣言声明，世界各地的所有人都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显然，所有这一切似乎与路易十四的君主国所宣扬的普救论完全相反。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国大革命迫于形势压力及自身内在动力影响，在罗伯斯庇尔的领导下变成了专制政体。这正是它当初所要取代的君主国的镜像。因此，专制国家与普救论的融合再度出现。在这个扩张主义的法国，它认为自己的使命是在全欧洲乃至更远的地方传播自由、平等、博爱思想。

从广义上讲，法国在过去200年间的历史就是这两种普救论的冲突史。在像英国这样后来改信新教，而且更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里，政治上的分裂因素一直以来基本上都来自社会等级。如果说法国的情况让人困惑不解的话，那是因为阶级差异之上叠加着两股无法调和的力量—右边是信奉天主教的保守主义者与君主主义者，左边是共和党人与革命主义者。1848年革命与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中爆发出来的暴力，就像由德雷福斯事件或是人民阵线所释放出的非同寻常的仇恨一样，是普救论这种冲突的附带结果。双方的极端主义者在描述这种冲突时，都对其进行了神话化。冲突更进一步的附带后果是，法国政治中存在部分波拿巴主义。它借助专制平民主义的手段不断出现，试图弥合舆论的历史性鸿沟：作为皇帝的拿破仑安卧于法国大革命基本成就之上；追随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蒙的拿破仑三世玩起了独裁政治的游戏；传统主义军人戴高乐对抗前任导师贝当，并光复了共和国。在危机时刻，所有这些超越了保守派、社会党等的“常规”党派政治。

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国家的这两种极端观点之间的冲突。正如一位评论家提醒我们的，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自1789年起，“每一个政治政体均以政变、革命或战争告终。而且，法国有15部不同的宪法”。但是，贝当与希特勒狼狈为奸，建立起了类似于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政权，他还将法国公民赶到异国他乡去送死。这些做法让天主教保守主义传统名声扫地。自法国解放起，尽管在冷战期间存在着重重压力，存在对宪法运作一直以来的种种疑虑，但人们仍普遍认为法国是一个共和国。而且，在希拉克与戴高乐眼中，这个共和国依然保有着“法国例外”，它有着全

球性使命，以及对强国领导地位的信仰。

当我们在国家发挥着作用的背景下，来看待这些通常令门外汉感到困惑不解的法国生活的方方面面时，事情就会变得清楚得多。因为，“法兰西国家”是一个有着自己的理论逻辑与内在连贯性的概念。正如第五共和国的宪法序言所定义的那样，“法兰西为一不可分的、世俗的、民主的、社会的共和国”。这个宣言中的术语及它们的排列顺序都意义重大。因为，它们定义了现代法国的具体特征。首先，“共和国”这个概念明显意味着，它不认可君主制与贵族统治的国家中内生的世袭特权与阶级体制。人们应该铭记，《人权宣言》是“人权和公民权”的宣言。例如，与1948年之前的英国人不同，法国人不是臣民，而是公民。他们有着同等的权利与责任。这意味着，无论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他们不仅有权被称为“先生”或“女士”—尽管那在当时是一个重大进步—而且他们被定义为一个集体主义社会中的成员。

宪法序言中的第一个术语立马就强化了这种思想：“不可分的”意味着一个中央集权制、非联邦制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个体不是由地区来加以区分的，也不是由奉行的少数族裔文化，或是族群来定义的。个体只是共和国公民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政府迟迟不愿放松控制权的原因。政府的控制是通过将单独的地方权力授予地方行政官，由他们来实现的。直到法国为了使经济发展更均衡，通过了1982年3月的立法，才建立起由选举产生的地区议会。2006年7月的立法又对其进行了补充，赋予地区议会以财政自主权。

相似地，诸如布列塔尼语或欧西坦语（Occitan）这样的地区性或少数民族语言无法获得官方地位。直到2008年7月，它们才最终被认可为“民族遗产的一部分”。尽管法国最近开始以赞许的口吻提及语言的多样性，但那不过是它长期以来与英语争夺世界统治地位的一种战术而已。此外，2009年3月法国成立委员会，考虑如何确定法国民族构成，因为官方人口普查表并未要求人们表明自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因此，政府并不真正知道，法国有多少印度教徒或其他宗教信徒。抛开维希政权的人口普查不谈—这种普查把如此多犹太人送进毒气室，给人留下了糟糕回忆—这反映出法国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拒斥，以及对同化政策的支持。这种观念认为，公民应直接与国家有关，而不是让一些自选的种族、宗教组织或游说团体来代表公民的利益。

这显然直接导向了序言中的第二个术语：“世俗的”。这一点标志着法国与英国、美国间重要的不同。在后两个国家中，宗教也许正在衰退，但是世俗主义从未被奉为宪法中的一条原则。显然，造成这种“例外”的原因是，在政府摆脱天主教会对自己在政治与社会上的控

制之前，二者间存在不同寻常的漫长斗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世俗主义只是一个形式化的概念—恰恰相反，它影响深远。

虽然政府认可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也并不反对宗教，但是它认为，宗教在根本上是件私事。公共领域被视为中立的共和空间，人们在这里作为平等的公民进行着互动。因此，提供宗教教育或是允许人们展示引起分裂的宗教标志就不合时宜了。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已经与其之前的多元文化主义立场保持了一定距离。因此，序言中“世俗的”一词出现在“民主的”之前并非偶然。深层次的信念是，唯有在世俗共和国所提供的中立的公共空间内，人所共有的公民身份才能捍卫民主的自由、平等与博爱。

最后，不可避免的是，一个旨在融合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国会将自己描述成“社会的”。这正是宪法序言中定义里的最后一个术语。有充分证据表明，对于那些在19世纪德国的独裁主义与英国的小政府自由主义之间寻找中间道路的早期法国共和党人来说，在此起到衔接作用的概念是团结。法国正是以这个共和价值观之名，实现了自由与公正之间的和解，它在公民福祉方面往往比其他国家承担了更多责任。希拉克在美国时总会品鉴好吃的汉堡，但他惊奇地发现，在如此富裕的社会里，居然有将近4700万人没有像样的医疗保障。团结是让社会形成合力的纽带—这就是为什么与其他人相比，法国人往往对引起不便的运输工人罢工更加包容的原因。而且，团结并不只是众所周知的“法国社会模式”或曰“福利国家”之基础而已，它也是良善社会宏伟蓝图的一部分，而这张宏伟蓝图还包含了国家经济规划或者是国家对文化的发展，因为它们与“法国例外”相关。“法国例外”认为，共和国在全世界面前有着特殊使命，它要完成法国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所界定的普遍人类权利之事业。

当然，这只是理论。就自身而言，这种理论是令人钦佩的。但是，在千变万化的世界中，理论往往会被现实超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赛义德·布阿马马（Saïd Bouamama）在他的“民族神话解剖”中，轻松地指出了法国立场内在的诸多悖论。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殖民地的“文明使命”。它基于那个时代的欧洲中心论假设，即法国有责任将先进的西方标准加诸非洲或亚洲的“落后”国家身上。就意识形态的正当性来看，这种使命称不上卑劣至极，但它并不符合相关的经济动机或是法国人在殖民地的活动。维持海外帝国也被视为是保持法国世界强国地位之必须。即使是今天，法国付出巨大成本保有4个海外省（马提尼克、瓜德罗普、法属圭亚那、留尼汪）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的潜在战略价值。最重要的是，法国从印度支那半岛与阿尔及利亚的血腥撤退丝毫没有证实“文明使命”的观点。不过，随着法兰西共

同体的发展，更欢乐的时光到来了。对于法兰西共同体成员国及法国而言，在这个“六边形”国家之外说法语的人超过了国内说法语的人，这是有价值的。诚然，殖民主义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一场具有破坏性的殖民危机将在2005年出现—如果连工作都找不到的话，那么被正式赋予平等权利也无法带来任何好处。

共和普救论那似是而非的排外主义色彩，在另一个领域同样存在，这便是性别差异领域。正如女权主义批评家义正词严地提出的：“法国将不同性别、不同种族群体与不同性取向折叠为白种男性异性恋的自我同一性。”因为法国大革命未能通过一项宣示性别平等的宣言，而拿破仑又将女性驱逐至家庭之内，所以直到1881年，法国才建立了第一所女子高中，这一做法甚至遭到了教会的反对。而直到最近的50年内，女性与家族相关的权利才渐渐得到认可。直到1967年，国家想要增加人口时，才废除了禁止避孕的法律，而流产在1975年才合法化。

法国有着强大的女权主义运动，代表作家有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埃莱娜·西苏与莫尼克·威蒂格。她们效仿着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开创性著作《第二性》。考虑到法国知识界的氛围，这种方式与其说是实用主义的，不如说是哲学式与文学式的—或者就像吕西·依利加雷（Luce Irigaray）对母女关系的研究那样，是心理分析式的。但是，一直以来，法国的极右势力都极力反对法律中的变化。国民阵线党为了让女性回归家族，发起了给母亲发工资的运动。更别说针对堕胎诊所的突袭，以及对女用口服避孕丸制药公司的联合抵制了。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

在这个传统的天主教国家里，对女生的教育在德国占领期间受到了严重阻碍，妇女直到1944年才获得选举权。直到最近几年，实现性别平等的进展依然缓慢。尽管女性往往比男性更能胜任工作，更适应工作场所不断变化的技能需求，但她们往往从事着诸如社会服务或是秘书这些薪水不高的工作。她们的工资通常比男人低，在升职方面还面对着“玻璃天花板”。就国民议会而言，她们几乎完全被排除在会议室之外。1995年，国民议会中仅有6%的议员是女性。1999年，在经过了激烈的辩论之后，国民议会通过了代表权均等原则。可是，由于参议院的阻挠，它到10年后才得以实施。好在自2012年内阁实行性别均等，并新任命了一位负责女性权利的部长以来，法国已经在不断尝试将性别平等融入公共政策之中。男女收入差距依然有14.8%，不过明显好于英国的19.1%与德国的22.4%。此外，法国将性别平等的目标写进了宪法，而且规定未能采取正当配额的公司将被罚款。这些配额的实施导致公司董事会中女性人数上升到了40%，而女性在地方

议会中的人数则上升到了48%。社会变化也许并不全面，而且抵制依然存在，但是，前进的方向是明确的。诚然，因为自1998年起，称呼“部长”（la ministre）或“警察”（la gendarme）而不是阳性的“部长”（le ministre）已成为正式且正确的说法，所以“法官夫人”（Madame la Juge）与“女队长”（la Capitaine）就不再觉得语言本身将她们视为无物了。

除了这些近来发生的变化，人们也许看不到法国对性别差异的历史态度有多少“法国例外”的成分，正如在法国的帝国主义历史中也鲜有例外之处一样。“文明使命”让法国以所有人的身份自居，从而导致它紧紧抓住殖民地不放，以至最终酿成苦果；与此类似，权利的男性化话语使法国难以意识到明显的不同等之处。不过，由于法国与帝国主义的英国一样在竞争激烈的同一个世界中运作，由于法国的妇女权利故事大体与那些同法国旗鼓相当的国家一样，所以人们想在法国看到不一样情形的期待就颇有些天真了。“法国例外”是一种观点。在现实世界中，人们最好将它当作一种志向。但是，这种志向在法国政治与社会中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从本质上讲，法国创造典范社会的志向寓于经济统制的计划性协调、公立教育与社会福利之中。法国宣称自己不同寻常，最终依赖这三个领域的彼此作用，以及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成功践行它的共和价值观。

诚然，法国的统制经济既不新颖，也不具有特别的社会主义特色。国家宏观经济规划出现在科尔伯特与拿破仑时期，而在19世纪时，公共资本促进了采矿与重工业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人民阵线政府将铁路与军工业收归国有，这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亟须进行的大规模重建开创了一个先例。莫内的方案虽然只涉及少数行业的国有化，但它通过诸如奖励、有条件贷款、商品价格与外汇管制等手段，带来了经济的理性重组。尤其重要的是，由于战前经济相对落后且分散，为了能获得规模经济、创造出能抵御国际竞争的集团，法国重组并合并了公司。政府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基础设施、交通运输与国防领域进行了更直接的干预。铁路、法国电力公司（EDF）与法国燃气（GDF）被收归国有，而且法国在国防领域也成了领军人物。

虽然这种纯粹的统制经济政策在“黄金三十年”的扩张主义时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在1975年石油危机之后，它不得不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局势。20世纪80年代初，密特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尝试遭遇了不留情面的失败，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了统制经济政策非变不可的急迫性。当时，法国人发现，他们的经济如今已与世界新经济如此紧密地融合在了一起，以至于不可能施行完全独立的政策。显然，强

有力的统制经济方式得依靠经济增长，没有经济增长，政府就不得不撑起失败企业。而且，随着日益壮大的跨国公司及国际信贷的开放，民族国家不再具备相同的控制力。

我们并不能简单地以一种新自由主义正统学说—它决定了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希拉克与巴拉迪尔分别实施的私有化—来阐释以上局面的出现，因为除这种学说外，来自欧盟成员国身份所施加的种种限制也促成了这种局面。法国非但没能让它的欧洲同伴对法式的刺激就业措施发生兴趣，而且委员会的竞争主管机构还取缔了政府发放给企业的补助金（雷诺汽车公司就是个恰当的例子），还取消了政府承包合同中国有企业享受的优惠待遇。然而，狡猾的法国人敏锐地洞悉了这场游戏。正如一位观察家指出的，结果是“私有化进程以统制经济方式展开。国家行为体利用精英网络，确保持有股份最终落入安全之处”。事实上，以“经济爱国主义”之名，国家继续在关键领域掌握核心持股。例如，银行业、能源、交通运输、电信与汽车生产。这与低统制经济相似。

虽然法国经济在许多领域都十分强势，但造福于国家独立的战略性部门实行了计划性融合，并取得了特别好的成效，这点具体体现在世界领先的法国航空领域。法国航空工业不仅将民用、军用相融合，还与核领域结合在一起，并从那里进入太空研究的范畴。其中的技术颇为复杂，需要在这个领域内，由法国的几个世界领先企业展开协同合作—这种协调效果如此强大，以至于人们惊奇地发现，居然还存在着像达索系统（Dassault Systèmes）这样的独立私营集团。这位重要玩家的业务范围覆盖了70多个国家，以幻影、阵风等战斗机而驰名。与此相关，有些集团也强有力地走入了国际领域，包括斯奈克玛公司（SNECMA）、赛峰集团（Safran）与泰雷兹集团（Thales）。斯奈克玛专营飞机发动机、火箭推进与卫星；赛峰以火箭技术与电信闻名；泰雷兹是航空航天信息系统、国防与证券市场领域的领跑者。

法国航空工业无所不包，从运输机、直升机到无人机与军事卫星。欧洲导弹集团是全球第二大导弹生产商，阿莱尼亚宇航公司（Alcatel Alenia Space）、亚利安太空公司（Arianespace）将卫星卖到了国外。至于政府推动的核工业，如今已经部分私有化的法国电力公司是全世界最大的核设施经营者，除了在英国建造核反应堆外，它还与核工业公司阿海珐（Areva）合作，建造核反应堆，开采铀，在40个国家建立了生产中心，在中国、美国都有合伙企业。尽管法国当初发展核能是为了弥补他们在化石燃料方面的匮乏，但是，他们现在很高兴地将它作为清洁能源加以推广，以应对全球变暖的危机，并确保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保证能源供给安全。

更不用说空中客车或是其他成功的活动领域了。它们集中在一起，缔造了法国在世界发达经济体中的高排名—第5名，刚好在英国前面。法国经济有自身问题，尤其是给少数族裔带来了很大压力以及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但是，它的优势远不止出色的基础设施以及旅游业的世界领先地位。近年来，欧洲中央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居然由法国人坐上了第一把交椅，这很能说明问题。

那么，公立教育是如何效力于堪称典范的社会的呢？答案并不那么直截了当，因为法国的革命史导致这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制特别分裂。在该体制下，高等专业学院虽小却享有盛誉，培养出了精英领导的中坚分子来管理国家，而占主体部分的大学则满足了一般大众的需要。从历史上来说，这样的体制一直以来都是大一统式的，第三共和国教育部长那传奇般的故事便可作为说明：教育部长可以看着自己的手表，说出全法国每所学校同龄法国学童在一个具体时间点正在解读西塞罗文章中的哪段话。课程由中央制定，即使是大学也没有自主权。1968年学生起义后，僵化的等级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松动。但是，萨科齐总统提议赋予大学独立地位的议案在2010年时仍遭遇了普遍的反对。

法国出色的幼儿园系统无疑体现了共和价值观。上幼儿园的小孩很多，因为有近1/3的法国儿童自2岁起就开始接受幼儿园教育了。而且，到3岁时，法国将近4/5的儿童已经上了幼儿园。此后，学校就没那么有趣了。教育重点被严格放在了学习，而非体育、人格塑造或是将学校视为一个共同体上。除了近13%的天主教学校或曰“免费学校”外，中学是公办的。政府向非公立学校提供补助，但前提是它们要遵循全国课程大纲。同时，平等性决定了学校应该有复合能力型教学。在幼儿园阶段之后，学生的小学阶段在11岁时结束，并进入中级课程学习。此后是4年初中，课程结束时发放初中毕业文凭。这确保学生可以进入高中。3年高中课程学习后学生可以参加中学毕业会考，简称“会考”，参加考试的年龄通常是18岁。法国高中特别强调数学教育，且最后一年教习哲学的教学方式颇为出名。法国的高中分为三种类型。普通高中的学生是那些打算上大学的人，他们的专业可以分为三个支流：文学、社会经济、科学；技术高中的学生此后会在大学技术学院中修2年课程；而职业高中学生毕业之后则会进行学徒训练。

乍看起来，这个体制是成功的。因为，大多数同年生的人最终都能拿到某种形式的中学文凭。但是，正是在此时，体制失衡、职业指导不足开始造成许多严重问题。由于超过1/4的学生经常会考不及格，结果法国教育体制中堆满了想要重考的学生。大学阶段职业指导

的缺乏也进一步加重了这个缺陷造成的问题。由于公立教育实际上是免费的，所有通过会考的人都能自动升入大学，由于标准大学课程比更短期的技术或职业课程更引人尊重，所以没有职业建议作为指导的学生往往会选择相当不适合自己的课程。结果，接近50%的学生在第一学年结束时会挂科；包括重修生在内，仍然学习该课程的学生中，约有40%的人无法在第二学年结束时获得毕业文凭。因此，整体而言，法国的高等教育辍学率奇高。讽刺的是，这个体制将学生挂科作为一种筛选机制，表面上打着共和制下入学机会平等的旗号，拒绝选拔，实际上用不正当手段进行选拔。这只是大学与高等专业学院之间巨大鸿沟的一个方面而已。

这个独特的两层结构是由法国历史直接造成的。法国大革命前的大学基本上是由教会神职人员主持的，他们不愿意探索现代学科。于是，高等专业学院被建立了起来，以培养全新的行政管理层—巴黎综合理工学院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均可追溯至1794年。后者目前主要培养学者，它的校友中有许多共和国的伟大人物，从路易斯·巴斯德这样的科学家到亨利·柏格森与让-保罗·萨特这样的哲学家。综合理工学院的科学与工程学专业学生是最优秀的一批人，因为在这里，学生要通过全国竞争，在中学毕业会考后接受至少2年的特殊训练以争取严格受限的入学名额。这些课程对学生来说相当具有挑战性，学生勤奋好学的程度令人敬畏。事实上，这些学生在入学时已达到研究生水平，而且将会作为实习公务员获得薪酬。

截至目前，法国共有200多所专门的高等专业学院。它们虽然只招收全国5%的学生，经费却占高等教育预算的30%。尽管这个体制确实培养出了训练有素的人才，但它也有自己的缺陷。它不仅榨取了许多大学的资金与最好的生源，还抢夺了它们的研究项目。法国的研究主要是在高等专业学院或是一些独立的国家研究机构中进行的。这意味着，在学术资源互换的时代，该体制并不符合正常的大学模式。这种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公平的，和其他国家相比较，表现不佳。

居于整个法国高等专业学院结构之冠的是极其挑剔的法国国立行政学院（ENA）。这所只有500多名学生的大学是由戴高乐在1945年创办的，旨在培养共和国顶级决策者。在统制经济时代，学生要接受在当时看来可互换的领域的教育，即政治、外交、国有化的工业与银行业—毕业生被称作“国立行政学院毕业生”，其中不仅包括吉斯卡尔·德斯坦、希拉克、巴拉迪尔、若斯潘，以及更近期的政治家，如弗朗索瓦·奥朗德与塞格琳·罗雅尔，还有欧洲中央银行的让-克罗德·特里谢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帕斯卡尔·拉米。但是，国立行政学院也受到了指责。人们批评它在现代全球化的经济形势下还不切实际地要培养全能

型政界要员，让这些人在没有相关经历的情况下，轻松地从一个部门调到另一个部门。政府对这些批评已有所察觉。尽管政府极不情愿削弱法国高等专业学院的实力，但是它也在渐渐让法国大学向一般的世界模式看齐—只要它试图纠正反常情况就好了，因为集权式精英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与更普适的法国共和平等价值观背道而驰了。

那么“法国例外”中被人讨论得最多的要素，即“社会模式”又如何呢？根据希拉克在2005年法国国庆日采访中的说法，这种模式“有着伟大的雄心，那就是要永远不断地升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我们的民族天赋与必须。我们必须要保有它”。这听起来也许是种奇怪的说法，因为其他西欧国家也有合理的福利体系。而且更奇怪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这种社会模式根本不是法国的独创。它明显是种混合模式。虽然它采纳了德国俾斯麦式社会保险模式的基本元素，例如，与收入相关的福利及通过雇主募集的保险金分担额，但是它也加入了一些从英国的贝弗里奇计划中借鉴来的特征。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发放的标准津贴，以及通过国家税收进行的财务混合。简言之，社会模式是复杂的混合物，它根本就没什么独特之处。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真正的独特之处是法国的社会、道德观，以及这个社会模式运作时所处的共和背景。

然而，如果说法国福利体系复杂的话，不仅因为它首先是一个复合的系统，还因为随着时间流逝，体系规模在不断累加。尤其是在过去的30年间，法国为了像其他欧洲福利体系一样应对新挑战—更高的失业率、延长的寿命、更难取悦的大众，以及更加复杂的治疗代价—已经采取了各种形式的改革。结果，社会模式已完全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种大一统的国家组织，而是由系统与子系统组成的集合体。这个集合体是通过成群股东之间的协议与国家统筹来维系的。简言之，它是一个服务项目的拼凑物，而不像那些对法国人头脑清晰、逻辑性强的名声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人期望看到的那样，是一种完全统一的系统。

法国福利体系的主要分支叫作“普通体制”（Régime Général）。它满足了占据人口80%的有薪工人的需要。但是，也有针对其他工人的小分支。此外，法国一直都有着体量大得惊人的“特殊体制”（Régimes Spéciaux）。直到最近为止，特殊群体计划覆盖了500万人，从公务员到波尔多港口的雇员。由于这些人通常在退休金安排上享有特权，最近几年政府一直都费力地想要把这些群体融入主流福利体系之中。2004年，法国邮政与电信工人被纳入其中；2005年所有公务员的退休金安排被整合到一起；最终，2007年年末，萨科齐总统面对此起彼伏的罢工，将诸如公共交通与能源部门等领域中剩余的

50万人也归到了一处。

普通体制由各种专项资金组成，分别针对健康、家庭与退休问题。因为资金来源于雇主与雇员双方，所以款项由雇主组织与工会组成的联合代表委员会来运作。雇主的贡献包括一大堆额外条目。例如，伤亡事故保险、公共住房、教育、补充性养老计划与个人社会保障附加计划。这显然使雇员的贡献相形见绌。因此，雇员发现，自己在联合委员会中的地位格外强大，与自己的贡献不相称。事实上，工会只代表约8%的劳动力，却主要集中在公共领域。而且，工会牢牢嵌于社会保障体制之中，以至于享受着近乎否决权般的权利。所有雇员人数超过50人的公司都必须组建由工会控制的“公司委员会”，组织诸如体育赛事或是儿童夏令营之类的活动，很显然这种社会模式将雇员放在了体制的中心位置。

这是法国社会模式非凡特质的基础。世界卫生组织经常把法国的医疗体系评为全世界最优。法国有16周孕妇津贴、2周亲子津贴、公共日托机构、家庭津贴，而且少女怀孕比例也非常低，这些都对女性与家庭特别友好。法国有基本国家退休金与“补充养老保险”，在“补充养老保险”之上可叠加公司或个人退休金。在法国，法定退休年龄是62岁，法定工作年限为40年。法国人拥有最好的医疗保健与更长的退休生活，更别说那5周的带薪休假以及保留至今的法定35小时工作周了，法国建立的这种共和社会模式在政治圈各界获得了一致支持。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这种体制虽然令人钦佩，但也代价高昂。

那么，“法国例外”就不是一种幻象，但它也不是一种已实现的现实。而且，近几年，人们明显可以感到，法国公众的不安情绪背后潜伏着一个明显的问题，那就是，如果不能巩固“法国例外”的话，能否至少保住它？在全球化新经济中，法国对自身统制经济的控制会消失吗？法国能改革大学体制而不丢掉高等专业学院本身的高标准吗？鉴于法国自视社会保障是其文明的共和模式之必须，它的经济能强大到足以撑起它的社会保障吗？这些问题是法国领导人在21世纪要面对的。

[1]　例外论，即认为某个国家、地区、社会、民族、组织、社会运动或历史时期，具备特殊的性质，无法被一般性的理论或规则所解释的观点。本书第十五章详述了“法国例外”。——编者

[2]　参见：Edward James, *The Origins of France: From Clovis to the Capetians, 500—1000* (London: Macmillan, 1982), p. 139。 ——作者

[3]　他的儿子同样叫作西蒙·德·蒙德福特，继承了莱切斯特伯爵勋位，并发动了反抗亨利三世的男爵战争。——作者

[4]　参见：Peter de Rosa, *Vicars of Christ* (London: Transworld, 1988), p. 165。——作者

[5]　此处的查理五世并非法国国王查理五世（绰号“英明的”），而是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他是伊莎贝拉一世女王的孙子，于1519—1556年统治西班牙，因而与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处于同一时期。——编者

[6]　1英里＝1.609344千米，100英里＝160.9344千米。——编者

[7]　le grand siècle，在法国文化中特指17世纪，也就是由路易十三、路易十四统治的一个世纪。此时，法国国力空前强大，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艺术蓬勃发展。——编者

[8]　The Good Shepherd，出自《约翰福音》第10章，其中耶稣自比好牧人：“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和合本《圣经》）——编者

[9]　即奥尔良公爵菲利普一世。——编者

[10]　参见：Comtesse de Boigne, *Mémoires* (Paris: Mercure de France, 1971), Vol.I, p. 37。——作者

[11]　是中世纪后期、近代早期兴起的一种思想，也是该时期法国教会的主要特点之一。高卢主义强调对教宗权力的限制，认为国家、国王应对宗教加以管控，君主的世俗权力不应受到干预。——编者

[12]　即安茹公爵腓力。——编者

[13]　即英国历史上唯一被公开处死的国王—查理一世。他在世时与英国国会产生了巨大矛盾，致使内战爆发。内战结束后，查理一世被逮捕，并于1649年被处死。由此，英国君主制崩溃，英格兰共和国成立。——编者

[14]　参见：Dominique Godineau, *Citoyennes tricoteuses: Les femmes du peuple à Pari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Aix-en-Provence: Alinéa, 1988)。——作者

[15]　原书作4月22日，疑误。——译者

[16]　参见：Frank E. Manuel and Fritzie P. Manuel, *Utopian Thought in the Western World* (Oxford: Blackwell, 1979), p. 588。——作者

[17]　西方文化中，身骑白马寓意着身份的高贵和战争的胜利。在古罗马凯旋仪式中，统帅也会乘坐白马拉动的马车来宣扬胜利。——译者

[18]　分别是1929年和1926年诺贝尔和平奖。——译者

[19]　原书作沙特尔市行政长官，疑误。据考证，让·穆兰应为沙特尔市所属的厄尔-卢瓦尔省省长。——译者

[20]　法国历史学家，主要研究领域是维希法国史。——编者

[21]　参见：Gilles Férier, *Les Trois guerres d'Indochine* (Lyon: Presses Universitaires, 1993), p. 22。

[22]　参见：Michel Winock, *L'Agonie de la IVe République* (Paris: Gallimard, 2006), p. 90。——作者

[23]　参见：Charles de Gaulle, *Mémoires*（Paris: Gallimard, La Pléiade, 2000), pp. 825-826。——作者

[24]　参见：Alain Peyrefitte, *C'était de Gaulle* (Paris: Gallimard, 2002), Vol. 1, p. 279。——作者

[25]　1972年，《鸭鸣报》（*Le Canard enchaîné*）爆料称，沙邦-戴尔马在其国民议会主席及总理任期内，没有缴纳过个人所得税。该爆料直接导致戴尔马的民意支持率一落千丈。——编者

[26]　参见：Claude Cancès, *Histoire du 36 Quai des Orfèvres* (Paris: Éditions Jacob-Duvernet, 2010)。——作者

[27]　参见：Michaël Darmon, *La Vraie nature de Nicolas Sarkozy*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2007), pp. 230-231。——作者

[28]　参见：Sue Collard, “The Elusive French Exception”, Emmanuel Godin和Tony Chafer编，*The French Exception* (New York and Oxford: Berghahn), p. 31。——作者



未读 Club

为读者提供有温度、有质量、有趣味的
泛阅读服务



专属社群 独家福利
精品共读 活动特权

手机扫码
加入未读 Club 会员计划

重新发现欧

目录

版权信息
前言
第一章　多元地理塑造了多元的生活
第二章　罗马的统治奠定了物质的基础
第三章　西哥特与摩尔人入侵：埋下反抗之种
第四章　两个西班牙的对峙与破碎的中世纪版图
第五章　地理大发现与黄金世纪的降临
第六章　盛极转衰的帝国统治，塞万提斯早有预言
第七章　王位继承战争与迟滞的工业化进程
第八章　拿破仑战争：被支配的恐惧
第九章　工业革命：西班牙人懒惰被动吗
第十章　君主制的终结与“1898年一代”的改革愿景
第十一章　西班牙内战：双方同样残酷
第十二章　暗潮涌动的佛朗哥统治
第十三章　重获新生：君主立宪的重建与世界参与者
第十四章　结语：一个不断做选择的国家
返回总目录

版权信息

重新发现欧洲：西班牙何以成为西班牙

A BRIEF HISTORY OF SPAIN

作者：[英] 杰里米·布莱克（Jeremy Black）

译者：高银

出品方：未读·思想家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Copyright © Jeremy Black 2019

First published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 2019 by Robinson, an imprint of Constable & Robinson. This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ttle, Brown Book Group, London.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0 by United Sky (Beijing) New Media Co., Ltd.

前言

1787年，当亚瑟·杨格（Arther Young）游览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比利牛斯山时，他发现自己下榻的客栈不尽如人意，床硬，跳蚤、鼠患肆虐。但是，早在1742年，乔治·卡尔顿（George Carleton）便就西班牙之趣味做出了更好的说明。他笔下的马德里是这样的：

美味的水果种类如此之多，我必须承认我从没见过哪儿的水果种类可以与之相比……他们的兔子没有我们英格兰的那么好；他们有许多山鹑，比我们的个儿更大、羽毛更美。因为西班牙没有草场，所以他们几乎不出产牛肉。但是，这里的羊肉很多，味道也极好，因为他们的羊只吃野菜；猪肉也很美味，因为他们的猪只吃栗子与橡子。

西班牙占据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把葡萄牙挤到了边上，这片半岛区域明明是个次大陆，却假装成一个大一统国家。西班牙一度表现为鲜明的西班牙性以及独特环境与特色文化互相作用而组成的复杂混合体。其历史反映了这些混杂元素之间的冲突，除西班牙本国、本地区的过往外，西班牙在世界大格局中的流变同样是其历史的重要主题。事实上，从哥伦布1492年的首次航行开始，西班牙与世界的历史联系就对它的全球影响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直到1898年失去古巴、菲律宾与波多黎各之前，西班牙的殖民地对其国内局势以及它在欧洲的分量，都有着持续性的重大影响。此外，正如本书即将指出的，西班牙的历史远非必然：政治与勇士的作用举足轻重。

这个国家的历史深受“历史战争”的影响——当下的争端与历史遗留问题之间的交锋无休无止。此主题将贯穿本书始终。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有助于解释历史遗迹如今以何种方式呈现，解释为什么这些遗迹留存了下来并且可供人观瞻。人们应从这些“历史战争”出发，来阅读旅行指南与其他资料。这些战争历史悠久，可以追溯至2000年前。它们尤其影响了人们对罗马占领西班牙这件事的解读方式，包括对敌军中出色将领的看法。更近的战争有阿拉伯人征服西班牙，基督教的收复失地运动（Christian Reconquista），16世纪到17世纪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18世纪波旁王朝的中央集权，西班牙对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的反应，1812—1931年君主制短暂废除期间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政权反复交替的局面，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的背景及冲突本身，佛朗哥掌权时期（1939—1975年）以及随后的历史时期。所有这些历史，均为当时的目光所审视、为后世的笔触所描绘，提供

了一个个饱含争议的时代背景。

这个过程还将继续下去。写一部去政治化的西班牙史基本是件不可能的事，因为西班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它的过往历史塑造而成的。例如，收复失地运动推动了西班牙对美洲国家的征服，在那些地区开采金银的活动反倒导致了西班牙国内的经济停滞，而不像如今的中东地区那样，大发石油财并因此实现了经济繁荣。

获邀写一部西班牙简史也给了我一个故地重游的机会，这有赖于诸位东道主以及与我同游之人的帮助。四处讲学让我得以游历巴塞罗那、毕尔巴鄂、卡塔赫纳、罗德里戈城、科伦纳、埃斯科里亚尔、格拉纳达、马德里、马拉加、潘普洛纳、萨拉曼卡、圣塞瓦斯蒂安、圣地亚哥与维多利亚。我想在此感谢诸位学者及其他促成我旅行的人，感谢他们的热情好客。以下诸位对本书较早一稿的评价使我受益匪浅：西蒙·巴顿、西尔维亚·伊斯佩尔特·邦宾、塞尔吉奥·何塞·罗德里格斯·冈萨雷斯、恩里克·加西亚·赫南、理查德·希契科克、尼古拉斯·英曼、理查德·卡甘、马克斯·金、马克·劳伦斯、尼克·利普斯科姆与海科·维尔纳·亨宁。同时，我也与许多人一道缅怀西蒙的溘然早逝，他是我多年的同事与朋友。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带我去阿利坎特，感谢莎拉与我一起在科尔多瓦、马德里、塞维利亚及西班牙北部度假。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好友泰勒·唐宁。

第一章

多元地理塑造了多元的生活

环境以其自身的运作规律与严酷条件
塑造了西班牙历史。

“西班牙的雨大多落在平原上。”呃，不，并不是这样。但是这句因《窈窕淑女》（1956年）而广为人知，后来又被歌唱喜剧二人组夫兰达斯与史旺（Flanders and Swann）拿来调侃了一番的台词，着实把握住了人们理解西班牙环境的必要性。萧伯纳最初的剧本《皮格马利翁》（1913年）里并没有这句话，但它却出现在1938年的电影版中，后来更是在艾伦·杰伊·勒纳（Alan Jay Lerner）填词的1956年音乐剧中走红。在西班牙语里，这句话直译为“塞维利亚的雨是个奇迹”。

事实上，这里所指的并不是一种环境，而是多种环境。因为，西班牙的环境多种多样，对旅人来说可谓复杂多变。然而，最近的几十年间，由于交通运输的发展，尤其是令人震惊的高速铁路干线的修建，环境上的复杂性就显得无关紧要了。其中，让人尤为称奇的是长达1900英里（约3100千米）的西班牙高速铁路（简称AVE）。它连接了马德里、巴塞罗那与塞维利亚，包括从巴塞罗那出发，途经巴伦西亚、格拉纳达，终至塞维利亚的计划扩建的高速线。1992年，西班牙首条高速铁路干线开通，以马德里为起点，以塞维利亚为终点。2015年，该线延伸至加的斯（Cádiz）[1]。2004年，从马德里到马拉加的高速铁路运行时间为2.5小时。2008年开通，由马德里途经萨拉戈萨，终至巴塞罗那的高速线，全长386英里（约621千米），运行时间大致相同。西班牙高速铁路也与法国铁路线连通了起来。此外，西班牙铁路产业享誉全球，铁路网也建到了国门之外，例如，沙特阿拉伯的麦加—麦地那高速铁路。

如今，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已成为基础设施的一大组成部分。国内民航服务同样起到了折叠空间、改变时间、加速地上传输的作用。而且，航空服务在经济领域同样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它能确保深居内陆的马德里的居民可以在清晨吃到空运来的鲜鱼。事实上，马德里居民会告诉你，他们拥有西班牙最好的鱼。

不过，这一切其实是在不久前才出现的。19世纪末，在人们将烈性炸药用于隧道挖掘之前，地形就塑造了西班牙不同地区的鲜明特色，同时也把这个国家弄得四分五裂。山脉拉长了距离，隔断了不同区域，在恶劣天气加剧了种种地势问题时，这种隔断感显得尤为突出。彼时，无论是从国外前往西班牙，还是在西班牙国内旅行，旅人都面临着重重困难。

要到西班牙的话，就得翻过比利牛斯山。这项任务由于冬天的天气与春天的融雪而变得异常困难，因为融雪会使河水猛涨。比利牛斯山脉海拔11168英尺（约3404米），长期以来充当着国境分界线。山脉将过去的某些王国的领土一分为二，譬如阿拉贡王国、纳瓦拉王国。也就是在不久前，一些天然屏障才被清除。例如，东比利牛斯山一段开通了维耶拉隧道（Túnel de Vielha，1948）与卡尔迪隧道（Túnel del Cardí，1984）。在西比利牛斯山，连接法国与西班牙的松波特公路隧道（Somport road tunnel）于2003年开通。比利牛斯山中段尚无隧道。

海上航行的困难直到人们利用蒸汽机克服了常见的海风（或者无风）、洋流与暴风雨的问题之后才得到解决。当时，各种问题在船舶由比斯开湾驶向西班牙的大西洋沿岸地区时尤为明显。

关于西班牙国内的情况，1787年亚瑟·杨格提到了那里“糟糕的公路”。1729年，在从巴黎前往塞维利亚途中，威廉·斯坦霍普（William Stanhope）抱怨说，在西班牙旅行时，只有蹲在马背上才跑得快，但这个姿势可不舒服。而且，就算骑的是骡子，旅行者也得保持这个姿势行进100里格[2]。纳瓦拉自治区的特殊性，甚至说巴斯克地区的特殊性，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源于其地理位置的与世隔绝，尽管在历史上，阿斯图里亚斯与坎塔布里亚更加难以到达。无论铁路如何缩短了马德里与巴塞罗那之间的距离，空间上的间隔都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二者政治上的对立。

人们无法认定西班牙具有单一的地理特征，这倒不是因为它面积太大，但国土面积确实是一个影响因素：西班牙的国土面积远超英格兰。其面积约为194980平方英里（约505000平方千米），是仅次于俄罗斯、乌克兰与法国的欧洲第四大国。西班牙没有一种单一的地理特征，主要是因为它没有可以充当全国中心地带的河谷，遑论能与尼罗河、密西西比河、多瑙河或者长江相提并论的河谷地区了。

相反，西班牙地势以高原为主，梅塞塔高原（the Meseta）将全国的平均海拔拉高至640米。梅塞塔高原占据了西班牙中部的广阔领土，周围大多为山脉所环绕，尤其是西北面的坎塔布里亚山脉、南缘

的莫雷纳山脉，以及东北面的伊比利亚山脉。越过后面两座山，便有较大的河谷了，流经此区域的是瓜达尔基维尔河与埃布罗河，它们分别是安达卢西亚自治区与阿拉贡自治区的重要河流。在这两处河谷之外，巍然耸立着更高的山脉，分别是内华达山脉与比利牛斯山脉。在众多山脉与海岸之间有许多滨海平原。随着重要河流，尤其是埃布罗河与瓜达尔基维尔河，一路奔流入海，这些滨海平原的面积会越来越大，重要性也渐次上升。杜罗河与塔霍河流经葡萄牙，并分别从波尔图与里斯本注入大西洋。

滨海平原在北面的坎塔布里亚山脉与南面的内华达山脉处要狭窄得多。在那里，就算称不上目之所及都是山，至少视野会受到群山的限制。基本上，地中海、大西洋、葡萄牙国界线，以及作为法国与西班牙两国界山的比利牛斯山脉，共同构成了西班牙疆域的边界。

从环境与农业角度来看，西班牙的海岸线在地质上存在巨大差异。此外，就整体而言，地中海要比大西洋更利于船只通航，而且二者的交汇处有些难以航行的水域，尤其是在地中海入海口处有一股强劲的自西而来的洋流，会对即将划向或驶往西方的船只产生巨大阻力。若利用北岸海面的下层逆流，船舶可部分规避这股洋流。当初腓尼基人正是据此成功地从地中海驶向了加迪尔（加的斯）。

西班牙的领地延伸到了海上，其中以巴利阿里群岛与加那利群岛最为突出，还包括位于摩洛哥的沿海飞地休达与梅利利亚。这两块飞地相当于西班牙的直布罗陀。直布罗陀是位于西班牙南端的一块飞地，自1704年起被英国占领，不过西班牙历届政府一直声称自己拥有直布罗陀主权。西班牙帝国在其他地方的势力范围已不复存在，但是，它曾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帝国，不论是从国土面积，还是全球势力范围来看，均是如此。

地质多样性会带来气候上的显著差异，这恰好印证了西班牙的情况。位于梅塞塔高原上的卡斯蒂利亚，冬季严寒，夏季酷热干燥，其严酷的环境不适宜人类生活，也不利于农业发展。与此相对，沿海以及位于西班牙西北部、面向大西洋的加利西亚有几处地中海气候区。法国的布列塔尼地区、英格兰的西南诸郡与加利西亚之间不乏相似之处，这不仅体现在它们以鱼为主的日常饮食上，还包括充沛降雨造就的茂盛林木，以及鲜见于西班牙大多数地区的乳制品生产。而且，在加利西亚，人们喝的是苹果酒而不是葡萄酒，这点也十分引人关注。

西班牙中部的梅塞塔高原，尤其是老卡斯蒂利亚（或曰卡斯蒂利亚北部），大部分位于杜罗河流域。这里以种植业为主，尤以小麦种植居多，人口相对稀少。在与地中海沿岸比较之后，梅塞塔高原形成

这样的局面也就不足为奇了。地中海沿岸地区水量充沛，因此可以形成人口稠密的灌溉区。那里采用密集型农业，种植了从柑橘类水果到水稻的各种作物。西班牙生活的多姿多彩即刻体现在环境的多样性上：从梅塞塔高原上艰苦的农耕田园生活，到巴伦西亚附近的农民于硕果累累的灌溉农田上的劳作，再到坎塔布里亚海岸星罗棋布的以捕鳕鱼为生的村寨。

然而，技术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1605年、1615年分两部出版）中提到的往马德里运送鲜鱼的赶骡人，如今变成了卡车司机。在安达卢西亚大庄园（latifundia）里辛勤劳作的无产劳工（braceros）与在加利西亚的小庄园（minifundia）中劳作的农民之间的差距，如今渐渐被农业机械化消除。但是，农村生活的本质未变，远远未到被大型机械所取代的时刻。环境方面的考量依然十分重要。

食物

食物来源与烹饪法均与环境息息相关。同时，它们也受到历史，尤其是某些传统习俗的影响。其实，猪肉制品位于西班牙特色美食之列，尤其是“塞拉诺火腿”（Jamón Serrano），以及阿斯图里亚斯以猪肉与豆子为主料的法巴达豆煲（fabada）。

在国外，西班牙食物通常被不加区分地看成一个整体。虽然各地也有西班牙餐厅，但在数量上远少于意大利、法国、印度、中国与泰国餐厅。此外，近年来谈到西班牙时，有种新的饮食方式开始崭露头角，那就是西班牙开胃小吃（tapas）。在西班牙，它指的是下酒或者就着饮料享用的少量食物：一种典型的开胃小吃是西班牙蛋饼（Tortilla Española），也叫土豆煎蛋饼。在英国，它通常指在餐馆里吃一道道小菜，如此一来，便能尝到许多种不同口味的食物。

将西班牙食物不加区分地看作一个整体，会弱化食物的区域差异。鉴于篇幅有限，在此只能列出少许美味珍馐。但是，重点是在西班牙全国，在不同地区之内、之间寻求不同美食给人带来的愉悦欢欣。例如，西红柿、辣椒、平锅菜饭（paella）在地中海沿岸地区尤为著名。冷汤（gazpacho）是大多数外国人所知的唯一一道西班牙汤，最宜酷暑时饮用。还有许多其他汤品，大多更适于冬天喝，如扁豆汤（lentejas）与热汤（sopa de cocido）。其他菜与食物也是如此。

葡萄酒之间的区别很大。起泡的加泰罗尼亚卡瓦酒、搭配甜品饮用的安达卢西亚葡萄酒与里奥哈（Rioja）红葡萄酒相差十万

八千里。这些葡萄酒最好在原产地或产地周边地区享用——这正好为旅行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由头。

环境以其自身的运作规律与严酷条件塑造了西班牙历史。比如，私有财产经济——一种以土地分配明显不均为背景，建立在地租、极低的劳务报酬，以及诸如战争和军役之类的政治干预上的经济体系，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各地农民。此外，农民还完全依赖于他们所处的生存环境。

在21世纪的当下，读者大多来自城市，因而难以理解西班牙农民的遭遇。一方面，农民们要承受不幸的自然环境灾害；另一方面，他们还要时刻承受着在恶劣环境中土里刨食的生存压力（考虑到过去使用的农具——犁，“土里刨食”这个说法真是恰如其分）。曾经在一段时间内，电力、内燃机、农作物选种与牲畜培育都没有在农村普及。因此，农业与农村生活也就显得一成不变。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生活中的种种艰辛。事实上，直到20世纪末，这些变化才在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出现。

生活中人们所用的动力主要限于人力与畜力，碾磨机则由风力或水力驱动。家具、器皿与食品既粗糙又简朴，庄稼与牲畜品种的改良全靠一代又一代的苦心经营。不管在哪儿，糟糕的极端天气与病害总会使农作物歉收，甚至颗粒无收，而人、畜的生存都离不开农作物。

传统节日总能让人想起早期的农村生活。这些传统节日凸显了人们对四季和繁殖力的依赖，也反映了该年中饥荒期的存在。

第二章

罗马的统治奠定了物质的基础

这些罗马遗迹界定了后继者的
想象力边界。

最近几十年间，西班牙考古工作有了极大发展。这项持续发展的事业对于了解西班牙古代史与近代史均意义重大。其中多数的考古发现出自西班牙本国人，但是，也有非西班牙籍学者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因此，与1975年佛朗哥的长期统治终结时的情形相比，西班牙的往事如今看起来结构框架要清晰得多。

由出土的西班牙人祖先，即早期智人的遗迹可知，早期人类就已生活在西班牙了。许多地方都有这类考古发现，尤其是在西班牙的阿塔普埃尔卡山（Sierra de Atapuerca）、哈蒂瓦黑洞（Cova Negra）与莱泽克希基（Lezetxik）。人们通常认为，这些人类祖先大约是在85万年前，从非洲途经中东最后到达欧洲的。的确，从非洲到欧洲的路线方便畅通，这对早期定居来说至关重要。随后而来的是尼安德特人。再后来是克罗马农人，也就是现代智人的祖先。斗转星移，克罗马农人成了人类唯一的幸存族群，而西班牙的尼安德特人在公元前27000年就灭绝了。起先，穴居的克罗马农人学会了使用石头与复合型工具，将它们用作武器，并在此基础上熟能生巧。由此，他们得以在广阔的土地上四处移动。如果人们想一览后来的新石器时代的风貌，可以去参观蝙蝠洞（Cueva de los Murciélagos）的多处洞穴。

西班牙壁画中自然颜料的运用技法之纯熟，让人叹为观止。画作中的主角是动物。维嘉洞（Cueva de la Vieja）中的壁画描绘了男人用弓箭猎杀雄鹿的场景；阿尔塔米拉洞（Cueva de Altamira）内的壁画里，有野牛与一头野猪；在小城龙达附近的皮莱塔山洞（Cueva de la Pileta）的壁画中，则出现了许多豹子、山羊，还有一条大鱼。这段西班牙历史不应被人遗忘，这些景点也不该被排除在游客的旅行路线之外。

冰河时代让人感到难以适应。但后来气温升高，为植物生长提供了有利环境，最终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动物繁衍。人类从中受益，人口增长。大型哺乳动物深受气候变化之害，并被人类捕杀殆尽。野

生庄稼经人工培育、繁殖后，谷物种植推广开来。放牧绵羊与山羊的情况也日益普及。

于是，更加静态的生活方式取代了传统的狩猎—采集。终年有人居住的村庄被建造了起来，例如，公元前6000年位于奥尔洞穴（Coveta de l'Or）与内尔哈洞穴（Cueva de Nerja）附近的村落。这些定居地发展起了手工艺与贸易，也具备了建设与维护灌溉系统的人力资源。考古发现日益明确地记录了包括仪式在内的社会活动的存在。

在铜器时代（the Copper Age，公元前4500—前2500年），西班牙南部是重要的铜加工区。设计精美的坟墓中有许多贵重的陪葬品，这意味着社会分层已出现。谷物种植也在扩大。重要的铜器时代考古遗址包括阿尔梅里亚附近的洛斯米利亚雷斯（Los Millares）。人们在参观这处遗址时可以看到断壁残垣、房舍遗迹与重建的穹顶坟墓。现代主义风格的阿尔梅里亚考古博物馆收藏着从该遗址（及其他地方）出土的陶器。马德里巨大的国家考古博物馆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惊人的历史横断面。那里大多数的藏品来自西班牙国内，其中包括在马德里附近出土的有着4000年历史的陶碗。这座博物馆值得游客前往首都去一探究竟。

作为制造青铜的关键原料，锡在青铜器时代（the Bronze Age，公元前2300—前1500年）开始崭露头角。像铜一样，锡在西班牙也有产出。因此，贸易有所增长；西班牙拥有的贵重商品可供出口，由此获得的收入又可用于购买进口商品。与此同时，随着人口的增长，定居地不断扩张。青铜器时代主要的聚居地包括塞罗里欧（Cerro de Real）和纳瓦拉的科尔特斯。安特克拉附近的三座石坟宏伟壮观。在如今科尔多瓦附近的一处青铜器时代定居地，人们当时开采并利用了附近莫雷纳山脉的铜矿与银矿。在巴利阿里群岛，人们还发现了青铜器时代的石碑。

青铜器时代的文明留下了斗争的痕迹，这点尤其以武器与防御工事的形式体现出来，就像阿尔加尔（El Argar）的遗迹那样。青铜器时代，西班牙东南部定居点的显著特征是：定居地由石头砌成，往往建在山顶之上。考古研究发现了修建防御工事的迹象。例如，2012—2013年，人们在拉瓦斯蒂达（La Bastida）[3]地区发现了围在入口通道处的部分砌筑墙，以及五个凸出的方塔。这些坚固的方塔之下还筑有地基，该地基经过精心设计，为的是防止这一惊人的建筑成就滑下峭壁。人们可以从紧靠着的诸栋塔楼中向敌人投掷武器，而正门在特殊防御工事设计的保护下，能使来敌无处遁形。

这里还有一处蓄水池。不论是否筑有防御工事，蓄水池的建造对于定居地来说都是必要的。有了蓄水池，城内的人就更易从容应对围城之困，而入侵者则会选择积极进攻。

大约建于公元前3000年（处于铜器时代）的伊比利亚防御工事区域中，有用来保护墙内成片区域的同心墙；该墙体建筑重在防御，墙上有箭眼。相比之下，作为权力中心的拉瓦斯蒂达建在山区。此处定居地的选择也许具有更加明确的军事目的，重在进行近战。我们无法确定这种与众不同的防御工事风格，尤其是坚固的方塔，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东地中海地区的影响，因为那里的同类建筑诞生的时代更早。

群山之中仍有许多石砌的定居地，特别是所谓的“白色村庄”。这些地点的选址具有明显的军事防御性，可以密切监视从山谷进山的各条通道，而且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理优势。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中世纪时期的西班牙村庄，如佩德拉萨塞拉（Pedraza de la Sierra）。就防御工事而言，能见度、守备与视野都很重要。这对各个层面、任何类型的防御工事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些因素有助于解释某些防御工事的选址，以及基于某一位置的优劣而做出的反应。公元前45年，尤利乌斯·恺撒在西班牙与庞培的两个儿子作战，一位罗马作家如此描述这场战争：

多山的国家适于安营扎寨、筑造防御工事。事实上，几乎整个远西班牙都是土地肥沃、灌溉充足的地区。这使围攻战变成了一项徒劳无功、艰苦困难的任务。鉴于当地人频繁突围，在这里，和别处一样，所有远离城镇的地方都处在塔楼与防御工事的严密把守下。建筑顶上抹了粗灰泥，而不是盖着瓦片，就像在非洲一样。此外，这些地方内部都建有瞭望塔……大部分村镇依地势建于高地之上。因此，谁想进村就得向上爬，这可并非易事。

筑有防御工事的定居地常建在山坡上以警告来敌，此举尤用于警告来自海上的劫掠者不得靠近。这种模式在西班牙南部一直持续到19世纪北非入侵者的危机解除之后。沿海地区也建有山顶瞭望塔。例如，费罗堡的塔楼除了体现出阿拉伯特征外，或许还可溯源至西班牙地中海海岸地区的腓尼基文化。

相应地，海上的往来在铁器时代日益频繁起来。具体表现是：大约在公元前800年，腓尼基商人在加的斯建立了他们的第一个基地，接着在东部更远的地方开拓了定居地，包括马拉加，以及远在阿尔梅里亚附近的比利亚里科斯。无疑，腓尼基人一路向北，最远到了加利西亚。西班牙的贵金属，尤其是铜、锡、金与银是他们的目标，而长

途跋涉的辛苦往往是值得的。作为交换，腓尼基人购进了葡萄酒与纺织物等地中海商品。仰仗着这些矿产资源，西班牙在当时才得以融入更广阔的地中海经济体中。

在位于如今法国马赛的希腊定居地，尤其是在西班牙东北部地区，希腊商人同样有所贡献。在埃姆普列斯（Empúries），人们可以看到希腊遗迹。希腊人还远涉安达卢西亚。贸易成为技术推广以及包括写作在内的文化传播的手段。

考虑到地理与面积的因素，那时的西班牙国内没有一个能够号令天下的政权，这种情况也出现在法国与英伦诸岛。部落王国占据了主流。同时，西班牙内部也有不同的文化群体，不过这些群体之间很可能存在许多重叠部分。伊比利亚文明与西班牙北部独特的凯尔特及巴斯克群体相比，大异其趣，与西班牙东北部的凯尔特伊比利亚人（Celtiberian）相比也别有一番韵味。一方面，这些文化群体存在着诸多差异；另一方面，显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要想对这些文化群体进行分类并加以利用，会面临许多困难。例如，文化群体之间兼具独特性与重合处，将它们拿来对比，会产生许多问题。此外，经年累月的变化使得不同文化间的因果关系成疑。

这些文化留下了些许遗迹，如吉桑多的公牛雕像，还有位于马德里以西的圣马丁-德巴尔代格莱西亚斯的花岗岩雕像。相似的雕像也见于阿维拉省全境。塞维利亚的考古博物馆收藏着塔尔提索斯（Tartessos）文明的金首饰。塔尔提索斯文明的核心区位于韦尔瓦附近，该文明活跃于公元前7世纪—前6世纪，而且与腓尼基文明有关联。

已知的考古记载乃至文字记录均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西班牙与外界的联系，以及外国势力对西班牙的干预，这会导致西班牙本土的发展变化被严重弱化。腓尼基人在今突尼斯附近建立了殖民地，名为迦太基，他们的影响通过此城而非更遥远的腓尼基古国（今黎巴嫩）向外传播。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前241年）主要是迦太基与罗马为争夺西西里岛的控制权而展开的，最终以罗马控制了西西里岛与撒丁岛告终。战败之后，迦太基开始在西班牙南部与东部扩张自己的势力。这次扩张包括矿藏生产的产业化，同时也加剧了迦太基与罗马的矛盾。因此，公元前218年，战争再次爆发，罗马决定遏制迦太基的进一步扩张。同年，迦太基将军汉尼拔不顾罗马反对，占领了西班牙城市萨贡托。迦太基对萨贡托的控制权成为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导火索。在萨贡托城内，男人们突围至死，其他人集体自杀。但是，这座城市却留存了下来，那里的城堡遗迹反映了该地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受的统治。

第二次布匿战争的主战场在意大利与西班牙。公元前218年，汉尼拔挥师越过法国南部，进军意大利。作为回击，罗马人派兵攻打迦太基在西班牙的领地，意图将其收入囊中，让罗马人垂涎的还有那里丰富的矿藏。公元前209年，罗马统帅西庇阿占领了新迦太基城（卡塔赫纳）。古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阿后来记录道，西庇阿“告诉工人，他们当下就是全罗马人的奴隶。但是，如果他们忠心耿耿、勤奋工作，贡献出自己的能工巧技，那么他保证战胜迦太基之后会还他们以自由”。基于相同的原因，犯人中最身强体壮的也成了苦力。

西庇阿乘胜追击，经拜库拉（公元前208年）与伊利帕（公元前206年）两次战役重创迦太基军队。这些胜利使罗马人控制了肥沃的瓜达尔基维尔河谷，这里正是西班牙的农业主产区。公元前206年，加迪尔（Gadir）被攻陷后更名为加迪斯（Gades）。

公元前202年，西庇阿在北非扎马给迦太基以致命一击。在随后签署的和约中，迦太基被迫将其位于西班牙的领地全部割让给了罗马，包括对巴利阿里群岛的主权。然而，罗马直到公元前123年才使巴利阿里群岛俯首称臣。公元前197年，罗马将从迦太基手里获得的领地组建成两个行省：近西班牙和远西班牙。

巴利阿里群岛：与众不同的历史

巴利阿里群岛是西班牙自治区之一，总面积占全国的1%。2016年总人口为1107220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3%。群岛早期历史不详，但据说以希腊为发端。巴利阿里出土了许多青铜器时代的石碑，尤其是在梅诺卡岛上，例如该岛的巨石墓碑。人们不知道这些石碑的用途，但相信它们大多与葬礼仪式有关。位于马翁的梅诺卡岛博物馆便对丧葬文化颇为关注。腓尼基人曾经统治群岛，伊比沙岛的考古博物馆珍藏着他们留下的艺术。博物馆的磨坊山陵园陈列物中包括了腓尼基人的棺椁与女神塔尼特（goddess Tanit）的半身像。位于迦太基的腓尼基殖民地陷落后，巴利阿里群岛被划归罗马所有，但直到公元前123年罗马才征服这里。罗马人在群岛招募男丁入伍，使用的作战武器是投石器。5世纪60年代，汪达尔人占领了巴利阿里群岛。6世纪30年代，这里又被拜占庭帝国攻陷。公元707年，群岛被一支摩尔人舰队征服。9世纪中叶，这里又遭维京人洗劫。902年，科尔多瓦酋长国直接控制了巴利阿里群岛，以遏制那里日益猖獗的海盗劫掠活动。1050年，巴利阿里群岛成为独立王国。12世纪，阿尔摩拉维德（穆拉比特）人与阿尔摩哈德人展开了群岛争夺战。1113—1115年的意大利-加泰罗尼亚圣战（Italian-Catalan crusade）对巴利阿里群岛

影响甚微，但是，1229—1235年，阿拉贡人征服了群岛。在这之后，他们在巴利阿里群岛建起了教堂。例如，伊比沙岛与帕尔马市的大教堂，还有马略卡岛圣母礼拜堂的修道院。位于马略卡岛上的帕尔马市是巴利阿里群岛自治区的首府，那里建筑风格各式各样，但是相对来说摩尔人遗迹较少。

罗马征服

公元前197年，罗马发动的数次有组织的征战并未触及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比如梅塞塔高原以及西班牙的北部与西部。此外，这些地区远离地中海，因此不易遭到来自海上的罗马军队的攻击（如前209年西庇阿发动的攻击）。实际上，像推翻迦太基一样推翻又一个“异族帝国的统治”是一回事，让西班牙国内臣服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迦太基政权主要集中在城市，尤其是港口，这些地方可以围攻，因而更易夺取。与迦太基相比，西班牙其他地区的军事目标可要分散得多。

以上各方面有助于解释为何罗马人经过旷日持久的努力，才征服了西班牙，但还有些更重要的因素，特别是罗马即将开展的一系列其他行动。这也说明，我们有必要始终在更广阔的背景下讨论一国历史。打败迦太基后，罗马又卷入与马其顿帝国的一系列战争之中，最终马其顿失去了希腊，但由于罗马将主要精力投入了马其顿战争，它直到公元前148年才恢复元气。其他的重要战役包括公元前192—前189年与塞琉古王国的安条克国王之间的战争，以及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9—前146年）。

然而，在此期间，罗马对西班牙的征服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随后，公元前139—前133年，尽管遭遇了顽强抵抗，罗马仍成功征服了西班牙大部分地区，包括被罗马人称为卢西塔尼（Lusitani）、加拉西（Gallaeci）与瓦凯伊（Vaccaei）的部落。其中，在公元前147—前139年，罗马遭到卢西塔尼首领维里亚图斯（Viriathus）的反抗。（萨莫拉省有一座不太显眼的维里亚图斯雕像，该省省旗致敬了他的丰功伟绩。此外，2010—2012年电视剧《西班牙传说》也以他的事迹为主线。）罗马人一边征服，一边在占领地设立了定居点，这一举动在前152年罗马对科尔多瓦的征服过程中也有出现。

努曼提亚（Numantia）之围：公元前134—前133年

努曼提亚是铁器时代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的山丘堡垒。它控制

着杜罗河的一处河流桥渡，其遗址位于今卡斯蒂利亚的索里亚市。公元前153年，努曼提亚的凯尔特伊比利亚人赶走了围攻他们的罗马人后，继续反抗，并于前137年击败了一支罗马军队。公元前134—前133年，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小西庇阿）围攻努曼提亚达13个月之久，不巧努曼提亚人又遭饥荒。即使如此，他们仍拒不投降，最终大多数人以自杀收场。后世的西班牙文化讴歌了这种英勇就义的行为。塞万提斯广受好评的诗剧《努曼西亚之围》（大约作于1582年，出版于1585年）便是一例。它将西班牙胜利的宿命看作是努曼提亚之魂浴火重生的结果。剧中，真爱交织着罗马的欲望，努曼提亚所有人的个体牺牲都被看作英勇之举。罗马人重建了努曼提亚城。1860年，人们发掘并鉴定了该城遗址。1882年，此处遗址被认定为国家历史遗迹。索里亚市努曼提亚博物馆内收藏着自努曼提亚出土的陶器。

在随后的一个重要时期内，罗马将注意力转向了其他敌人，探索了其他可能，同时也迫切需要解决自己国内的矛盾。罗马人之间数次内战的战场包括西班牙与意大利。例如，在公元前80—前72年的塞多留战争中，昆塔斯·塞多留（Quintus Sertorius）就获得了一些西班牙当地部落的支持。最终，庞培大帝重建了西班牙的秩序。但是，没过多久，国家又陷入了新一轮的战争，这次与庞培对阵的是尤利乌斯·恺撒。公元前48年庞培死后，他的两个儿子继续在西班牙反抗恺撒。他们召集了三个古罗马军团，控制了几乎整个远西班牙行省，包括科尔多瓦地区。公元前46年年底，恺撒迅速从意大利进军，在战争早期取得了一些胜利。随后，双方会战于孟达（Munda），也就是今安达卢西亚的拉兰特胡埃拉附近。恺撒力挫敌军，科尔多瓦地区就此投降。接着，孟达市被围：

从叛军手中搜来的盾与标枪被围成栅栏，死尸被堆成壁垒。其上，几把剑的剑尖各刺着一颗敌军首级。它们整齐地排列着，面朝城镇的方向。这么做不仅可以用栅栏将敌人围住，还能通过展示军队的骁勇善战，让敌人胆寒。

孟达市投降了。

抛开罗马人的内斗不谈，直到公元前17年，他们才完全控制西班牙的西北部。罗马评论者常常感叹反抗力量的强大，借机赞美自己取得的节节胜利，但同时他们的确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准确的描述。19世纪，西班牙民族主义评论家与艺术家致力于探寻前罗马时期西班牙国家起源的范例，他们对西班牙抵抗罗马的历史产生了兴趣。除顽强抵抗外，当时的西班牙人还要面对许多环境方面的挑战，尤其是山区

作战、恶劣气候应对措施，以及后勤保障。

19世纪，探寻西班牙国家起源的人可以回顾先辈的反抗罗马史。但是，人们通常不这么做。西班牙倾向于认同罗马的影响，因此也就不太关注对罗马人的反抗。相反，他们往往聚焦于中世纪抵御阿拉伯人时所取得的最终胜利。这种抵抗往往被塑造为可歌可泣的基督教精神。

罗马统治下的西班牙

罗马击溃坎塔布里亚诸部落后，西班牙成了罗马经济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贡献是金属矿产与安达卢西亚的农业。金、锡、铜这些金属为罗马帝国国库带来了巨额财富。最近的考古发现极大拓展了我们对罗马制造的认知。2014年，人们在西班牙西北部的拉斯梅德拉斯发现了公元前1世纪时的几座大型金矿。这一发现表明，此地是当时罗马治下开采出的最大金矿。而且，在这里，人们使用了水力系统，将高压水输送到金矿中，用于黄金加工。2017年，考古学家在西班牙南部的慕尼瓜（Munigua）城挖掘出了一个大型铜、铁开采遗址，那里有通风状况良好的地下坑道。如此一来，矿工就能向更深处挖掘、寻找矿藏。这些矿井之前就有人使用，例如迦太基人。但是，罗马人极大地提高了这里的金属产量。最近的考古发掘也证明，4世纪时的科尔多瓦建有一座大型罗马宫殿。

安达卢西亚的农业以葡萄酒与橄榄油生产为主，而科尔多瓦以后者闻名。其他来自西班牙的重要进口商品还包括鱼露（garum）、羊毛与马匹。鱼露由鱼酱发酵制成，罗马人将它作为调味品。人们可以在位于塔里法西北部的巴埃洛克劳狄亚废墟和马拉加毕加索博物馆的地下室中看到鱼露作坊的遗迹。废墟还包括一座教堂、一个广场与一个剧院的遗迹，而毕加索博物馆的地下室中则收藏着腓尼基人防御工事的遗迹。

西班牙的产品之于规模更大的罗马经济的重要性，意味着与之前相比，西班牙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有所提升。罗马人修路最初意在行使权力、展示权威，便于行军征伐、镇压叛乱。这些道路在半岛上纵横交错，道路交会处成了重要的定居地，其中的一个典型便是埃梅里达-奥古斯塔（梅里达），那里的古罗马剧院、古罗马竞技场与狄安娜神庙都留存了下来。相应地，从经济发展的层面来看，特别是在将商品从城市运往港口方面，这些城市变得至关重要。随后，这些商品又会从各个港口，尤其是塔拉戈纳、新迦太基、阿尔穆涅卡尔、马拉加，出口到罗马去，而加迪斯是商品出口到安达卢西亚的重要港口。拉科

鲁尼亚地区的一座灯塔以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赫拉克勒斯命名，这座始建于2世纪的灯塔是仍在使用的历史最悠久的灯塔。灯塔上风很大，从此处看到的海景壮观而美丽。诸如橄榄油、葡萄酒与鱼露之类的西班牙商品不仅被出口到意大利，还被运往包括不列颠在内的罗马帝国的其他地区。

加迪斯

在罗马统治下，加迪斯港口迅速繁荣起来。公元前49年，尤利乌斯·恺撒授予当地居民以罗马公民身份。奥古斯都时期的人口普查表明，这里主要通过贸易与农业土地所有权，获得了巨额财富。罗马人用沟渠引来淡水，维护腓尼基人供奉麦勒卡特神（Melqart）的神殿，后来罗马人将麦勒卡特与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合二为一。与上述措施不同的是，来自加迪斯的女孩会被送到罗马，她们因能歌善舞而受到青睐。5世纪时，该港口被西哥特入侵者破坏。

大城市发挥了省会的功能。科尔多瓦是贝提卡（相当于今天的安达卢西亚省加上埃斯特雷马杜拉南部）的省会；埃梅里达-奥古斯塔是卢西塔尼亚（葡萄牙与梅塞塔高原西部地区）的省会；占据了半岛大部分地区的塔拉格尼西斯以塔拉戈纳作为省会。有些城市曾被用作军事基地，例如，莱昂与阿斯托加。甚至，一个罗马军团的总部后来一直驻扎在西班牙西北部。此举证明西班牙金矿、银矿的重要性。马德里的所在地之前并无城市。尽管寻找光辉历史的人言之凿凿地说，在西班牙于1561年定都马德里后，他们从中找到了蛛丝马迹，表明马德里起源于一个叫作马恩图亚-卡尔佩塔纳（Mantua Carpetana）的城市，但其实这只是无稽之谈而已。

建筑物集中在城市中，科尔多瓦的古罗马广场与竞技场便是如此，但在城市外依然可以看到它们。在罗马，引水渠与桥梁是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引水渠为城市提供了大量水源。建于1世纪的塞哥维亚的引水渠将水从阿塞韦达河（River Acebeda）引入富恩弗里亚山脉（Sierra de Fuenfria），至今仍能正常运作。这条引水渠是双层拱门结构，长度约为118米。在塔拉戈纳附近，人们也能看到为此区引水的双层拱门结构。在如今的科尔多瓦，人们可以步行穿过罗马桥。罗马桥建于罗马统治时期，横跨瓜达尔基维尔河。后来摩尔人重修了这座桥。科尔多瓦还保留着重建的罗马神殿。在阿尔坎塔拉，跨越塔古斯河[4]的大桥经过了大面积修复，但其引人注目的中拱仍是罗马风格的。梅里达的罗马桥梁也算是保住了，尽管只有两座引水渠上

的一些拱门留存了下来。萨拉曼卡的罗马桥横跨托尔梅斯河。在塔拉戈纳，人们可以探访竞技表演场、广场，以及一个壮观的古罗马圆形露天剧场的遗迹。

城市是加速罗马化进程的温室，是政府管理与罗马宗教崇拜的中心，也是以税务、租金与日常花销的形式积蓄起的乡村财富所流向的地方。地主都想住在城里，在那儿穿罗马衣，讲拉丁语。在山区和其他远离城市的地方，罗马化的效果弱得多。而且，这些地方的经济更多关乎生存与农业。也正是这些地区吸引了继罗马之后的“蛮族”入侵者定居。

这就造成了与罗马关系密切的西班牙东部、南部以及产矿区与西班牙其他地区之间在环境、文化与地理上的紧张关系。6世纪，在拜占庭（东罗马帝国）重新夺取西班牙东部与南部的部分地区时，这种矛盾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然而，随后这个地区再次分裂，西班牙南部自13世纪起属于卡斯蒂利亚，而西班牙东部则成为阿拉贡的一部分。看上去，地理因素势必会带来这些变化，但是，要把地理变成地缘政治，少不了人的参与。而且，人的能动性在这一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没有什么事是必然会发生的。

伊塔利卡

位于塞维利亚西北约5英里（约8千米）的伊塔利卡是罗马遗迹保存得最完好的地方之一。公元前206年，西庇阿将罗马老兵安顿于此，并在此建城，以控制瓜达尔基维尔河谷地区。伊塔利卡是在当地的一个伊比利亚村镇的基础上建起来的，它还是罗马皇帝图拉真与哈德良的故乡。这里有一个规模宏大的圆形剧场，足以容纳2.5万人，它展现了这座城市的规模与重要地位，当然，作为罗马帝国最大的圆形剧场之一，它也彰显出帝国的偏爱。在伊塔利卡，人们如今还能看到饰有镶嵌画的房屋废墟。6世纪，在西哥特人统治下，这里仍是一座城市，但日渐破败，走向毁灭。该地的考古挖掘工作始于19世纪20年代，在最近的数十年间，其重要性日渐凸显。

危机四伏

在西班牙人或曰出生于西班牙的罗马人图拉真（98—117年在位）及其继任者哈德良（117—138年在位）的统治下，罗马帝国达到鼎盛。他们的统治反映出西班牙对罗马帝国的贡献，尤其是在军队

人数方面。事实上，图拉真与哈德良的掌权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西班牙的贡献同样体现在其他领域，例如，以卢坎与塞涅卡为首的作家群体。

西班牙受到了罗马帝国整体发展的影响，影响范围包括从政治到疾病传播的方方面面。新兴宗教的传播也是帝国发展的一环。人们普遍信奉密特拉神，其中以埃梅里达-奥古斯塔地区居民为代表。由于公元132年罗马镇压犹太人起义引发了犹太人口的离散，犹太教也得以传播开来。许多犹太人最终在塔拉戈纳、托莱图姆、埃梅里达-奥古斯塔、科尔多瓦与加迪斯定居下来。此外，犹太教又衍生出了基督教这一全新的、与众不同的传播形式，后者的传播超越了种族的限制。

宗教迫害致使基督教殉道士出现。大约在304年，萨拉戈萨教堂的执事圣文生（St Vincent）和他的姊妹在戴克里先皇帝的统治下殉道，同样殉道的还有圣库加法斯（St Cucufas）。尽管圣劳伦斯于258年殉道于罗马，但他实际上出生于西班牙，或者更确切地说，出生于巴伦西亚。

在公元300年前后，西班牙有近20名主教。312年，基督教正式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它迅速传播，并对后来罗马帝国的许多城市施以深刻的影响。塔拉戈纳成为西班牙主教座堂所在辖区，这一地位直至11世纪才被托莱多所取代。

3世纪晚期和4世纪，为抵御“蛮族”侵袭，这些城市均筑有严密的防御工事。在加利西亚自治区的卢戈，如今人们可以沿着保存完好的城墙漫步，这些城墙部分是3世纪罗马古城墙的遗迹。每年，人们都要在卢戈欢庆罗马复兴节。

罗马统治下的西班牙自2世纪70年代开始遭受“蛮族”入侵——来自非洲西北部的柏柏尔部落所实施的抢劫和掠夺。从柏柏尔人的居住地到西班牙的海上航道不仅距离短，而且在洋流的作用下相对易行。到了3世纪60年代，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了。无论是边境自身组织的防御，还是罗马对高卢（法国）的统治，均无法阻止日耳曼部落的军队越过比利牛斯山，洗劫塔拉戈纳。

帝国内部还遭遇了政治、财政与经济上的动荡。而西班牙则暂时落入一个反叛的王国之手，叛军首领是波斯图穆斯，大本营在高卢。随后，奥勒良（270—275年在位）再度统一了罗马帝国，然而，他带来的复兴是有限的。

为了加强管理，戴克里先（284—305年在位）重新界定了省

界，引入联合执政体系，将西班牙与意大利、北非联系起来。但是，变革并未带来持久的和平。相反，它不得不面对自395年起东、西罗马的长久分裂。西班牙位于更易受到攻击的西罗马帝国。409年，一支由阿兰人、苏维汇人与汪达尔人组成的日耳曼邦联军入侵西班牙。罗马对西班牙的影响还在，但已被极大地弱化。至于英格兰，它与罗马在政治与军事上的联系于411—419年被一刀斩断了。

苏维汇人

苏维汇是日耳曼部落的一支，早年曾败于尤利乌斯·恺撒。一些苏维汇人在409年入侵西班牙后定居在加利西亚。他们宣誓效忠于西罗马帝国皇帝霍诺留（393—423年在位），并在410—584年建立了一个从属于罗马的王国。他们的领土范围受到5世纪50年代西哥特人领土扩张的限制。随后，苏维汇人也受到了自身王国分裂的影响。6世纪，他们皈依了基督教，并与西哥特人和当地原住民融合。

但是，罗马的影响力可以说是十分深远的。它让人们体验了基督教、拉丁语、城市结构、国家统一，还留下了许多至今让人印象深刻，且为罗马的后继者树立了榜样的遗迹。这些遗迹界定了罗马后继者的想象力边界。在英国，拉丁语、城镇与基督教都消亡了，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在西班牙。由此可见西班牙罗马化的程度之深。

最近的考古发现帮助我们拓展了对罗马统治下西班牙的理解，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旅游景点，为博物馆贡献了更多的研究材料。今天的考古博物馆收藏了许多惊人且有趣的罗马遗迹：塞维利亚的博物馆里藏有一座安置于古罗马别墅中的雌雄同体铜像，以及一尊密特拉神屠牛的雕塑；阿尔瓦塞特博物馆收藏了由象牙和琥珀制成、具有可活动关节的人偶；而梅里达与塔拉戈纳的博物馆里则收藏着瑰丽堂皇的镶嵌画。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埃姆普列斯遗址，人们能看到一些罗马房屋。除上述城市遗迹外，一些乡村遗址也被发掘了出来。例如，位于塔拉戈纳附近的康斯坦蒂陵墓（Mausoleo de Centecelles），那里有规模宏大的饰有镶嵌画的穹顶。

第三章

西哥特与摩尔人入侵：埋下反抗之种

“上帝在试炼他的子民。”

西哥特人

与西罗马帝国的其他地区一样，西班牙在5世纪早期遭受了“蛮族”入侵。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侵略活动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之所以这样说，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在于，一些“蛮族”最初受雇于罗马帝国，是以援军的身份为其提供军事帮助并因此定居下来的。西哥特人便是如此。罗马人起先利用他们来对抗苏维汇人与阿兰人的入侵，之后西哥特人就被限定在西班牙西部地区活动。

前往北非的汪达尔人也对西班牙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一些报道称，汪达尔人与安达卢西亚这个地名有关，因为安达卢西亚（Andalusia）的变体汪达尔卢西亚（Vandalasia）意为汪达尔人的故乡。但是，这一说法受到了抨击，因为有些人追溯了“安达卢斯”（Andalus）一词的词源，发现它是“大西洋”在某种阿拉伯地区语言中的叫法。

454年，西哥特人进入西班牙，将苏维汇人驱至西班牙西北部。5世纪末，西哥特人占据了西班牙大部分地区以及法国南部。但是，507年，他们被法兰克人打败，因此在法国的势力骤减。这段历史成了比利牛斯山逐渐演变为重要政治边界的过程中的一环。

6世纪中期，西哥特人统治下的西班牙内部动乱不断。利用此大好时机，拜占庭（东罗马帝国）重新征服了西班牙南部海岸的迦太基与巴利阿里群岛——这是罗马光复大业的一部分。最终，拜占庭再度攫取了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及北非部分地区。552—624年，拜占庭帝国建立了西班牙行省。卡塔赫纳的考古工作者曾于1983年挖掘出拜占庭时期的重要城墙，随后人们在那里开设了拜占庭城墙博物馆。

西哥特人统治下的西班牙不会轻易屈服。相反，它迎来了领土与意识形态上的复兴。利奥维吉尔德[5]（569—586年在位）战胜了坎塔布里亚人，废黜了苏维汇人的最后一个国王。作为击退拜占庭帝国的一个环节，利奥维吉尔德收复了科尔多瓦地区。也许是受到了拜占

庭范式的启发，利奥维吉尔德颁布新法典，发行新币，还制定了更为细致的宫廷礼仪。这些措施对于建立一种新型的君主政体来说至关重要。此外，西哥特人保留了罗马的行政机构，继续使用拉丁语。587年，里卡雷德一世（586—601年在位）摒弃了阿里乌斯教的异端邪说，改信天主教，该举有助于将西班牙-罗马的大众与他们的西哥特统治者紧密团结起来。抵抗这一变革的阿里乌斯暴乱被镇压了下去。除宗教信仰外，西哥特人与西班牙-罗马人在服饰与葬礼习俗方面的差异也消失了。自614年起，西哥特人加快了再度征服西班牙的步伐，后来除巴利阿里群岛外，西班牙其他地域均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

奴隶制对于西哥特人来说十分重要，许多奴隶是通过劫掠得来的。西哥特人甚至将奴隶吸纳进军队之中。奴隶身份与非部落成员的身份息息相关。奴隶反抗时有发生。694年，埃吉卡（Egica，687—702年在位）下令，西班牙国内拒不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将会以密谋叛变的嫌疑被贬为奴，但我们不知道这项规定是否得到了全面的贯彻执行。西哥特统治时期留下了许多教堂遗迹，如7世纪班德的圣康巴教堂（Santa Comba de Bande），以及位于帕伦西亚附近的圣胡安包蒂斯塔大教堂；还留下了一些金银首饰。

1939—1975年，在独裁主义的中央集权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统治下，西哥特人备受推崇，因为他们在后罗马时代一统分崩离析的半岛，还使人民皈依了天主教。佛朗哥建造了一座西哥特人博物馆，为他们歌功颂德。佛朗哥死后，西哥特人就完全过时了。

摩尔人的征服

自711年以后，西班牙迅速落入摩尔人之手。这是摩尔人军事力量取得的许多重大胜利之一。在西班牙，基督教对西班牙衰落的解释长期以来具有宗教、天启与道德意味，“上帝在试炼他的子民”“反基督者的到来”均是重要主题。当时有一部颇具影响力的文学作品——《启示录评论》，作者是远在伊比利亚半岛北部列瓦纳的一位名叫贝尔多斯的修道士。西哥特人统治下西班牙的灭亡也成为人们评判的一大主题，因为这里不断上演着劫掠、复仇与背叛的戏码。其中，最后一位西哥特国王罗德里克的一次劫掠在自身的灭亡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人们认为，西哥特王国之所以没能战胜摩尔人，关键在于丧失了道德的力量，反之，这种观点也能解释后来的历代统治者为何取得了成功。事实上，西哥特人的失败是摩尔人的强大与西哥特人自身的劣势，尤其是西哥特人内部的分裂，以及对巴斯克人等其他势力采取的军事征伐共同作用的结果。

711年，摩尔人渡过直布罗陀海峡之后，于同年或次年打败并杀害了罗德里克。随后，他们迅速占领了科尔多瓦、托莱多、梅里达与萨拉戈萨。在横行了大半个西班牙之后，他们继续向前侵略了法国，如探囊取物般攻下了法国南部地区。虽然取得了最初的胜利，但他们在732年或733年兵败图尔，随后被逐出法国。759年，摩尔人又失掉了纳博讷这座大城市。

与此同时，在西班牙国内，坎塔布里亚群山的天险阻碍了摩尔人对西班牙北部的进攻，同时也为基督徒提供了避难所。以这处庇护所为根据地，基督教统治下的中世纪西班牙在与摩尔人的战争中逐步发展壮大起来。此外，这处庇护所也是西班牙北部从高山地区到比利牛斯山南麓地区繁荣发展的基石。在哈卡（Jaca）附近，人们最终建起了阿拉贡地区的第一个省会。同时，由于西班牙北部土地荒凉，所以摩尔人对此地兴趣寥寥。722年，在阿斯图里亚斯的科瓦东加，摩尔人落败了。人们将胜利主要归功于那里立着的一尊圣母马利亚雕像，此前人们常常对着该雕像祈祷。鉴于这种观点的影响，在8世纪余下的时间内，人们又在那儿修建了一座修道院和一个小礼拜堂。后来，建于19世纪的基督教领袖柏拉奇（Pelagius）雕像被放在了胜利十字架下的显眼位置。另一尊雕像为青铜铸造，可追溯至1891年，位于希洪。

西班牙北部的基督教王国企图确立自己与西哥特人的继承关系，并希望借此保持与罗马人的联系。因此，人们把圣迹从托莱多运到了阿斯图里亚斯。阿斯图里亚斯的奥维耶多圣殿是阿方索二世[6]在9世纪为这些圣迹所造的神殿。这种延续性挑战了西哥特人统治下的西班牙与它的摩尔人后继者之间的联系。基督教统治下的西班牙北部地区建有许多修道院，其中有不少保存到了今天，它们与伊斯兰建筑形成了颇具启示意义的对照。位于加泰罗尼亚自治区黎波里（Ripoli）的一处本笃会修道院是众多修道院中最出众的一座。虽然它是12世纪留下的遗迹，但依然摄人心魄。同样令人震惊的还有建于9世纪的圣胡安德拉佩娜修道院，它最终成了阿拉贡与纳瓦拉统治者和贵族的伟人祠，该修道院位于山腰处的显眼位置，满足了罗马式风景的构图需要。同样让人称奇的还有莱尔修道院（Monastery of Leyre），那儿是更早时期的伟人祠。

自9世纪起，兴建的教堂以马蹄形拱门为主要特征。据说，这种形状的拱门早在西哥特时期就已存在。但是，以10世纪初埃斯卡拉达圣米格尔修道院（San Miguel de Escalada）为代表的一类建筑的马蹄形拱门，往往让人联想到科尔多瓦的大清真寺，而大清真寺的建造者也许来自“安达卢斯”（摩尔人统治下的西班牙）。

8世纪末至9世纪初，在查理曼大帝的统治下，法兰克人试图将他们的霸权扩展至比利牛斯山南部地区。但是，他们发现自己很难在那里站稳脚跟，尤其是在778年镇压反抗的战役失败后。对于基督教统治的西班牙地区而言，法兰克的这次兵败至关重要：基督教统治地区得以维持住了诸王国相对独立的分裂状态。安达卢斯的情况与之类似，因为那里的统治集团均难以维持对远疆的长期统治。但是，若法国的前身——法兰克王国并未以巴黎为中心，而是以朗格多克[7]为大本营的话，就能更加持久地对西班牙施加影响，西班牙的历史也会因此改写。

778年的罗兰之死

潘普洛纳失陷后，查理曼大帝撤军。行至纳瓦拉的龙塞斯瓦列斯隘口（Roncevaux Pass）时，后卫部队又败于巴斯克人。该事件成为中世纪文学的重要素材。查理曼大帝的传记作家艾因哈德（Einhard）记述道："那个地方密林深深，正是伏击的绝佳之所……法兰克人因军械沉重、道路崎岖而处于劣势。"11世纪的英雄史诗《罗兰之歌》浓墨重彩地渲染了将士的英勇无畏，深刻影响了后世的评价。

长期战乱使得西班牙北部地区生灵涂炭。尽管围绕着权威确立与权力争夺，基督教小公国彼此冲突不断，但是主要矛盾仍聚焦于它们与安达卢斯地区的不和上。摩尔人的劫掠长期以来困扰着这些小公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从实用层面上来讲，摩尔人通过侵袭，掠取了战利品（尤其是奴隶）。后来，摩尔人的侵袭战也包含了意识形态上的动机，尤其是对不信教者的惩罚。男人决心通过军事行动彰显自己的身份与男子气概，这无疑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因素。

基督教治下的诸公国进行了反击式劫掠，促使摩尔人加强了自己的防御工事。从长远来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马德里的建立。大约在860年，为控制瓜达拉马山脉以南的诸条路线，摩尔人在荒无人烟的马德里建起了一座城堡。

然而，在此期间进行频繁掠夺的一方是摩尔人，无怪乎基督徒沿杜罗河修筑了一条防御阵线。同时，摩尔人的内部分歧，尤其是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在8世纪40年代的内斗削弱了他们的势力。自8世纪50年代以降，阿巴斯王朝与倭马亚王朝之间的争夺，同样瓦解了彼此的力量。

在摩尔人统治的地区，许多西班牙的基督教徒最终接纳了对方的文化与语言，他们由此被称作莫扎勒布人（Mozarabs）。但是，关于西班牙早期受摩尔人文化影响的程度存在争议，而且当时可供朝拜的地方相对罕见。10世纪，大量土著人口移居科尔多瓦。作为省会的科尔多瓦繁荣兴旺、充满活力，实乃众生向往之地。西班牙的财富聚集在南部地区，尤其是瓜达尔基维尔河谷附近，为科尔多瓦这座756年建立起来的省会城市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梅斯基塔

科尔多瓦最摄人心魄之处非大清真寺（梅斯基塔）莫属。它始建于8世纪末，是在拆毁或改造圣文生神殿的基础上建造起来的。而圣文生神殿的旧址则是供奉着两面神雅努斯的罗马神殿。大清真寺的选址既考虑了地理位置，又利用了绵延不绝的墙体筑就的天然屏障以抵御攻击。最初的清真寺于786年完工，随后几经扩建，尤其是在10世纪30年代，阿卜杜·拉赫曼三世主持为清真寺新建了一个塔尖。1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大清真寺扩建得更大了，还加了一个新的米哈拉布（圣龛）。后来，仍然是在10世纪，祷告殿新增了许多隔间，打破了建筑本身的平衡。

相应地，1371年，人们在大清真寺里建了一个小礼拜堂；自1523年起，人们又在大清真寺正中央的位置建了一座大教堂。但是，在梅斯基塔，占主导地位的仍是一直延伸至人们视线边缘的成排立柱。其他的摩尔人遗迹还包括土耳其浴室（公共澡堂）和一辆水车。

10世纪中叶，在阿卜杜·拉赫曼三世（Abd-ar-Rahman III，912—961年在位）及其让人折服的继任者哈里发哈卡姆二世（961—976年在位）执政时，科尔多瓦被视为重要的权力中心。巴格达、拜占庭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一世在此均设有大使馆。此外，未来的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Pope Sylvester II，999—1003年在位）也许在黎波里修道院修行期间（10世纪60年代），参观过处于学术与文化顶峰时期的安达卢斯。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曾是一名修道士，本名是欧里亚克的葛培特。阿拉伯数学知识传播到基督教统治下的欧洲，以及算盘与星盘的引入，均归功于葛培特。后来，由于他与异教之间的所谓联系，他被指控为巫师，并被革出教门。10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科尔多瓦迎来了全盛期。这一时期为游客们留下了许多可供参观的景点，包括阿萨哈拉宫。这座位于科尔多瓦以西的宫殿是行政中心之所在。这座宫殿建于936—976年，部分原料来自罗马，还有一些北非的大理石。1010年，阿萨哈拉宫遭到洗劫，如今这里已是一片废墟，

部分遗迹有待考古发现。

历史学家常用“共存”（convivencia）这个术语来指涉多种族、多宗教的，据说还有“包容性”的安达卢斯文化。那里强悍的犹太教势力对人的精神生活影响深远。托莱多翻译“学校”促进了文化传播。因为哈卡姆二世喜爱书籍，支持科学研究，所以他鼓励将拉丁语与希腊语书籍译为阿拉伯语。

悠久的历史：以阿利坎特与萨拉曼卡为例

许多西班牙城市拥有悠久的历史，可以上溯至罗马时期甚至是更久远的年代。这一段段历史反映出历代征服者如何在前人基础上建设城市，而农业社会又如何依靠相同的发展中心得以延续。作为信息的结点，许多城市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人们在阿利坎特地区定居生活的历史已延续了7000多年。但是，此处第一个有据可考的定居点是在公元前4世纪由迦太基人建立起来的。他们将自己的定居点称为“白色的山峰”（Akra Leuka），随后在这里定居的罗马人将此处唤作“鲁坎提”（Lucentum）。后来这里又处于西哥特人的统治之下。最终，它落入摩尔人手中，也就是在此期间，摩尔人给它起了个颇为现代的名字：阿利坎特，阿拉伯语意为“光之城”。历史提醒人们，政治边界在本质上是游移不定的。1246年，卡斯蒂利亚王国国王阿方索十世攻占了这座城市，但是，1298年，它落入阿拉贡王国，成为巴伦西亚王国的一部分。15世纪、16世纪，阿利坎特风平浪静。1609年，因驱逐摩里斯科人（Morisco），阿利坎特遭到袭击。接着，该地区由于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支持查理三世，再度受创。此后，这座城市从19世纪末西班牙的经济增长中获益。在西班牙内战中，阿利坎特是最后一个陷落的共和国城市。直至1939年4月1日，佛朗哥才攻占阿利坎特。自20世纪60年代起，该城因旅游业迅速发展起来。

另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是萨拉曼卡。在前罗马时代，瓦凯伊或曰维托内斯（Vettones）最早在那里建立了基地。公元前220年，该地被汉尼拔率领的迦太基军队攻陷。之后，这里又落入罗马人手中。因为这座城市有一座桥位于名为“银色大道”（Via de the Plata）的古道上，所以该地成了罗马人的重要交通枢纽。这条南北向的古道连接了梅里达和阿斯托加。继阿兰人与西哥特人的统治之后，萨拉曼卡在712年被攻占。

10世纪，基督教徒又重新在这里定居。尽管皇家特许状直到1218年才颁布，但萨拉曼卡的高等教育早在1130年就兴起了。大

学成了法律研究的主要中心。由于萨拉曼卡古城有两个大教堂与许多重要的17世纪建筑，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8年将其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座城市朝气蓬勃又魅力十足。

第四章
两个西班牙的对峙与破碎的中世纪版图

这些统治者展现出了一种西洋棋般的
权力观与实力排名意识。

曼苏尔（Al-Mansur，977—1002年在位）执政时，西班牙的基督教各公国都城屡遭进攻、洗劫，几乎无一幸免，宗教场所也在劫难逃。位于布尔戈斯东南的圣多明各-德锡洛斯修道院（the monastery of Santo Domingo de Silos）便是一例。曼苏尔也许还火烧了科尔多瓦的图书馆。热爱艺术、科学与书籍，思想开明的哈里发哈卡姆二世被其抛之脑后。然而，曼苏尔去世后，位于科尔多瓦的哈里发辖地分崩离析，陷入内战。之后，群雄并起，独立王国（或曰酋长国）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涌现，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王国将大本营设在了塞维利亚。由此，塞维利亚在西班牙南部声誉日隆，最后甚至取代了科尔多瓦的地位。在别处，酋长国因长期纷争而日渐衰弱。它们不得不向基督教徒大量进贡。这一负担进一步削弱了它们的实力，同时为基督教统治者提供了大兴土木、发动战争的资金。

酋长国的衰弱成就了基督教统治者的节节胜利，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何阿拉伯帝国没有在西班牙获得它在北非与中东取得的那般长久的成功。基督教在西班牙的高歌猛进早已促使（信奉基督教的）阿斯图里亚斯王国在914年将首都从奥维耶多迁至莱昂。与此相对，纳赫拉自920年陷落[8]后，成了纳瓦拉王国的首都。

更富戏剧性的是，在经历了旷日持久的围城之后，莱昂-卡斯蒂利亚王国国王阿方索六世（1065—1109年在位）于1085年攻下了托莱多。这也是基督教进军的结果。摩尔人在托莱多战役中领导不力，算是帮了阿方索六世的忙。作为西哥特人的古都、西班牙主教座堂辖区，托莱多是梅塞塔高原上的重地。与它差不多同时陷落的马德里，当时还未发展成一座城市。在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期间，征服者的合法性部分源于“重新征服”（reconquest）这个概念本身。阿方索六世便由此自称为“全西班牙皇帝”，随后他将都城从莱昂迁至托莱多。

对城市的选址、建造与未来发展而言，防御方面的考量是不可或缺的。阿方索六世的女婿在阿维拉建立了一个边陲小镇，那里坚固的

城墙至今仍是一处引人注目的景点，它完全沐浴在阳光中，是世间最宏伟的一座纪念碑。阿维拉的大教堂建于12世纪，且筑有防御工事。然而，由于许多城镇变得不那么容易遭受摩尔人的攻击，它们中的不少都移址重建了。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纳瓦拉的桑圭萨，人们从地理位置更加安全的山腰向下移居至阿拉贡河大桥附近。

西班牙北部的基督教王国不仅接纳了西哥特人的艺术传统，也受到了摩尔人的影响。影响它们的还有更广泛层面上的欧洲发展变化，尤其是法国与意大利两地的新趋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1世纪，罗马式的建筑与装饰风格，尤其是罗马式大教堂，在加泰罗尼亚以及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之路（routes to Santiago de Compostela）沿线日益流行起来。建于12世纪的萨拉曼卡旧教堂就是罗马式风格的典范，其上雕刻的想象中的动物将这点体现得淋漓尽致。加泰罗尼亚本笃会修道院的回廊上雕刻着144幅罗马式图案，其中刻有用飞鸟构图的美丽字母。后来的教堂体现了从罗马式到哥特式风格的过渡。圣多明各-德锡洛斯修道院美丽的罗马式回廊也刻有精美的图案，尤其是飞鸟图案。此外，基督教管辖的西班牙区域也因欧洲其他地区修道会教团的普及而受到了影响。

为抵制基督教的发展，摩尔人请来了他们所谓的阿尔摩拉维德人[9]，即撒哈拉的柏柏尔人，他们在11世纪60年代曾驰骋摩洛哥。1086年，他们合力在萨格拉哈斯（Sagrajas）打败了阿方索六世，暂时性地终结了基督教的进攻。11世纪90年代初，阿尔摩拉维德人占领了大部分酋长国。1094年，巴达霍斯落入阿尔摩拉维德人之手。但是，1094年，幸运的基督教战士熙德攻占了巴伦西亚，阿尔摩拉维德人遭遇了失败。

熙德与英雄主义

罗德里戈·迪亚兹·德·维瓦尔是一位能力卓越、雄心勃勃的士兵，后来人称熙德。他是卡斯蒂利亚贵族，因同莱昂-卡斯蒂利亚王国国王阿方索六世失和，变成了一名雇佣兵、一个唯利是图的自由职业者。“熙德”这个称呼源于阿拉伯语的“赛义德”（sayyid），即“阁下”，也可能是阿拉伯语“狮子”（asad）一词的变体，正如英格兰“狮心王”理查一世中的“狮子”一词。熙德与基督教徒及摩尔人都交过手，从别人给他的进贡中赚了不少钱。自1094年起至1099年去世，熙德统治了巴伦西亚地区，击退了阿尔摩拉维德的柏柏尔人。他死后，他的寡妻继承了他的位置，但被迫于1102年将巴伦西亚交给了阿尔摩拉维德人。

后来，在12世纪的卡斯蒂利亚诗歌《我的熙德之歌》中，他

被塑造成了一个英雄榜样。这首诗的作者无从稽考。事实上，熙德身上折射出了边境社会的机遇与投机主义。1961年大受好评的电影《万世英雄》由查尔顿·赫斯顿与索菲娅·罗兰饰演主角，讲述了一个充满冲突与背叛的故事，查尔顿把熙德的形象浪漫化了。熙德的身体被固定在鞍座的铁架中，他在死后取得了胜利，被刻画成“最纯洁的骑士”。

类似的权力运作模式也可见于他处，正如在马拉加西北部的群山之中，人们能看到欧麦尔·伊本·哈弗莱（Umar ibn Hafsun，生卒年约为850—917年）的大本营仅存的遗迹伯巴斯特罗教堂（the church of Bobastro）一样。哈弗莱本是一个有着土著血统的盗贼，在皈依基督教之前，他公然反抗科尔多瓦的哈里发并取得了成功。927年，伯巴斯特罗最终陷落。

11世纪90年代末，在地中海的另一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掀起了近两百年的血雨腥风。与此同时，一如这些国家利用圣战冲突获得更广泛的影响力，取得自身合法性那样，西班牙也发动了自己的十字军战争。这是一场交战双方互有进攻的拉锯战。11世纪初，在优素福·伊本·塔什芬（Yusuf ibn Tashfin，约1061—1106年在位）与其子阿里·伊本·优素福（Ali ibn Yusuf，1106—1143年在位）执政期间，阿尔摩拉维德人四处攻占西班牙其他由摩尔人统治的地区。1102年，他们从基督教徒手中重新夺回了巴伦西亚，又在1108年于乌克莱斯打败了阿方索六世，但1109年再次夺取马德里的行动以失败告终。

之后，基督教诸邦重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并迅速发展壮大。在阿方索六世与阿方索七世[10]统治时期，莱昂尤为强大。1126年，阿方索七世继承了大一统的莱昂-卡斯蒂利亚-加利西亚王国的王位，随即起兵抗击了阿拉贡、纳瓦拉及反叛贵族。1135年，他在莱昂的主教座堂内加冕为“全西班牙皇帝”。他把西多会修士引进伊比利亚半岛，并且自1138年起与阿尔摩拉维德人对战。阿方索七世通过征战，将权力不断向南扩展，直至塔霍河流域，并大肆劫掠塔霍河以南地区，直到1157年逝世。1147年，在一次大张旗鼓的军事行动后，他占领了位于地中海沿岸的阿尔梅里亚。

阿方索七世逝世前，将王国一分为二，留给了自己的两个儿子。因此，1157年，卡斯蒂利亚与莱昂被分割开来。1141年，葡萄牙在与阿方索七世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并于1143年取得了完全独立。而早在1134年，纳瓦拉就脱离了阿拉贡。相较之下，阿拉贡与加泰罗尼亚则在1137年合并，并于1148—1149年侵占了埃布罗河下游河谷地区。与此同时，独立的葡萄牙在1147年占领里斯本后迅速扩张。占领

里斯本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英国的十字军。

自12世纪50年代起，西班牙的阿尔摩拉维德人被阿尔摩哈德人所取代。后者给阿方索七世造成了不少困扰，然而，有些摩尔人更愿意向基督教徒寻求帮助，典例便是阿尔巴拉辛酋长国的统治者向纳瓦拉发出了求助信号。1157年，阿尔摩哈德人攻占了阿尔梅里亚。直到1489年，卡斯蒂利亚才重新将其夺回。1177年，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八世（1158—1214年在位）成功拿下了昆卡。但是，1195年，在哈里发雅库布·曼苏尔（1184—1199年在位）执政西班牙的安达卢斯地区时，阿方索八世在卡拉特拉瓦附近的阿拉科斯（Alarcos）被阿尔摩哈德人重挫。

摩尔人统治下的不同时期在建筑与装饰艺术风格上特征迥异。与早期的科尔多瓦哈里发国相比，阿尔摩哈德的建筑风格更加简洁。人们可以在阿尔摩哈德人的首都塞维利亚欣赏到阿尔摩哈德式建筑与装饰，希拉尔达塔便是该风格的典型，它最初是清真寺的宣礼塔。摩洛哥的拉巴特与马拉喀什均有相似建筑。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13世纪初，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再度加快了步伐，恢复了11世纪末时展现出的劲头。1212年，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八世统率卡斯蒂利亚、阿拉贡、纳瓦拉与葡萄牙联军，自托莱多向南进发。阿方索八世占领卡拉特拉瓦之后，通过突袭在7月16日的拉斯纳瓦斯-德托罗萨战役中击溃了哈里发穆罕默德·纳西尔（1199—1213年在位）。这是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中一场关键性的、影响深远的胜利，当时人们也认为这是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仗，并将胜利归因于主的庇佑。

围绕王位继承所引发的争端使阿尔摩哈德帝国冲突不断，并最终崩溃，这为阿方索八世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此刻的胜利相反，莱昂-卡

斯蒂利亚自1157年阿方索七世去世后就处于分离状态。费尔南多三世（1217—1252年在位）于1217年成为卡斯蒂利亚国王后，又于1230年从父亲——莱昂国王阿方索九世（1188—1230年在位）那里继承了莱昂，由此莱昂-卡斯蒂利亚才再次统一。这样的分分合合对于因冲突引发的政治活动而言意义非凡，而这些政治活动至少部分地解释了战争的走向。因此，基督教徒与摩尔人双方不仅是为了控制与反控制才建造防御工事的。

截至1275年，西班牙南部地区大多被铁蹄踏过。1224年，优素福二世去世后，阿尔摩哈德人的内部分歧严重影响了事态发展。因为

随着阿尔摩哈德军队移向摩洛哥，安达卢斯分裂了，卡斯蒂利亚人就能在当地找到同盟了。1230年，阿方索九世击败安达卢斯，攻克了巴达霍斯。于（几个世纪后的）1671年被罗马教皇封为圣徒的费尔南多三世是个精力旺盛的人，他一路高歌猛进，纵横瓜达尔基维尔河谷地区。1227年，他占领了巴埃萨，1236年拿下了科尔多瓦，1238年攻克韦尔瓦，1243年攻克穆尔西亚，1245年攻克卡塔赫纳，1246年拿下哈恩，1248年拿下阿利坎特与塞维利亚。由此，摩尔人被逐出了塞维利亚。

费尔南多三世去世后，他此前占领的一些地区落入了附庸于他的摩尔人总督之手，但他的儿子阿方索十世（1252—1284年在位）攻克了这些地方，将它们重新纳入卡斯蒂利亚王国版图之中，这些地区为：涅夫拉（1262年）、穆尔西亚（1264年），以及阿利坎特（1266年）。唯有格拉纳达王国仍处于摩尔人控制之下。尽管从理论上来说，自1238年起格拉纳达王国便是卡斯蒂利亚的属国，但实际上它已经独立了。

这些被征服的地区出现了基督教化的倾向，这尤其体现在修建教堂与重新命名的行为中，但其他宗教的建筑美学在许多方面仍有所显现。在托莱多与塞维利亚，大教堂就建在原来的清真寺之上。摩尔人遗迹要么被清除，要么被改造，正如哈恩地区原本的11世纪巨型公共浴室被其他建筑物所覆盖。此外，在那些已成为基督教王国一部分的地区，出现了以建筑的形式来庆祝胜利的情况。教堂兴建、扩建成风。莱昂大教堂至今仍是一处重要遗迹。与此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许多重要的过渡性罗马式-哥特风格建筑，例如，卡斯蒂利亚北部阿吉拉尔-德坎波奥的圣母马利亚皇家修道院。

阿方索十世发起了以卡斯蒂利亚语编写西班牙通史的工作，意在将这一成果作为一种构建民族身份的方式，一种纪念其战胜摩尔人的政治工具，以此向大众普及文化。阿方索十世还赞助了天文学与科学事业，创作了法律巨著《法典七章》。同时，他也尝试将卡斯蒂利亚语确立为法律与政府机构的官方语言，还组织专人翻译《旧约》。而此前的费尔南多三世则是修道士的主要资助人，他为他们在安达卢西亚营造了许多房舍。这一时期，西班牙语言发生了重大变化，成百上千的阿拉伯语单词进入了卡斯蒂利亚语，也有许多阿拉伯语作品被译入。

与此同时，阿拉贡王国的“征服者”海梅一世（James I of Aragón，1213—1276年在位）的活跃程度可以说与费尔南多三世不分伯仲。海梅一世先后攻克了马略卡（1229年）、梅诺卡（1232年）、伊维萨岛（1235年），以及巴伦西亚王国（主要是在1238

年），随后又征战穆尔西亚。在此前后，葡萄牙人则向南进军，攻克了阿尔加维。由于地理位置等诸多原因，纳瓦拉未能参与这一领土扩张的进程，相反，它将自己的视线移向了北面，与法国取得了联系，直到1512年战败后又被划入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势力范围。

在旷日持久的战乱后，塔里法于1292年被攻克，而基督教君主则开始将大部分精力转向新征服土地上居民的再安置问题。许多摩尔人已逃离了这些地区，尤其是在1264年大规模反叛之后，摩尔人被视为威胁安全的存在而遭到驱逐，余下的则靠辛勤耕作谋生。事实上，许多摩尔人群体都留了下来，尤其是在被收复的阿拉贡地区，他们被称作穆德哈尔人，享有特许状并获得了法律的认可。现实情况是，当时在许多乡镇里，基督教徒、摩尔人与犹太群体比邻而居，以至于出现了“共存”（convivencia）这个术语。人们将这一进程的推进归功于阿方索十世的政策。

但是，仍有些摩尔人被迫为奴。继阿拉贡王国占领梅诺卡与伊维萨岛之后，大部分摩尔人被卖为奴隶，这既为俘虏摩尔人的人提供了金钱，又给他们腾出了定居的土地。奴隶中不仅有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中在攻陷地被俘获的人，还有通过劫掠，尤其是北非的掠夺所获得的人。此外，加泰罗尼亚商人还从北非进口奴隶。巴塞罗那、巴伦西亚、卡塔赫纳、加的斯与塞维利亚是主要的奴隶市场。如今，城市风貌中的这一面已荡然无存。

伴随着基督教王国向南扩张而出现的基督教徒的再定居现象，通过内部消化的举措，参与了王国持续性的发展壮大过程。迁移与殖民构成了政策的关键要素。这些政策的制定利用了人口增长与农业发展的宏观趋势，但是，随着统治权威的巩固，这些政策必然涉及一些具体的政治内容。这一发展壮大的过程包括乡镇的建立，也包括11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阿维拉、塞哥维亚与萨拉曼卡的建立。同时，作为政府管理中心与经济结点的军事基地纷纷建立。骑士团的成立，尤其是12世纪圣地亚哥、阿尔坎塔拉、卡拉特拉瓦各骑士团的组建，同样是该进程的一部分。1158年，第一个骑士团，即卡拉特拉瓦骑士团建立。骑士团取得了大量地产并在当地定居，起到守卫的作用。他们守护着许多城堡，例如，圣地亚哥骑士团就把守着阿拉孔的城堡。

新成立的修道会同样有助于定居点的建立。举例来说，1144年，西多会修士应阿方索七世之邀，定居于萨拉戈萨与马德里之间的索里亚地区。他们自12世纪60年代起开始建造的圣马里亚德韦尔塔修道院（the monastery of Santa María de Huerta）是气势恢宏的哥特式建筑，修道院的食堂尤为雄伟壮丽。其他重要的西多会遗址包括波夫莱特与桑特斯克雷乌斯（这两地从巴塞罗那出发均可抵达），以及里奥

哈的卡纳斯（Cañas）与图德拉附近的维如埃拉（Veruela）。和基督教统治下的西欧其他地区一样，这里的定居者也遵循了一条普遍规律——他们是受《加冕宪章》的吸引而来。此外，尚武精神也起了一些作用，卡斯蒂利亚王国的“邪恶骑兵”（民兵骑士）便是典型。

重新定居还意味着修建教堂。这既包括把清真寺改造成教堂（一如巴伦西亚圣母马利亚大教堂那般），还涉及建造新教堂。在科尔多瓦，费尔南多三世一共建了14座教堂，其中包括圣米格尔修道院。15世纪，为给圣赫罗尼莫修道院提供建材，人们拆除了附近的阿萨哈拉宫的一部分。

塞维利亚宏伟的大教堂就是建在一座清真寺上的，此处安葬着费尔南多三世。还有些之前被改造成清真寺的教堂又被改了回去，例如托莱多的基督教光明教会。

再征服的过程为西班牙全国各地留下了许多纪念性活动。例如，阿利坎特省的阿尔科伊镇有一年一度的“摩尔人和基督教徒节”，象征着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圣乔治为广大基督教徒请命的情节在该节日的活动中有所体现。阿尔科伊是阿拉贡国王海梅一世于1258年建立的一个乡镇。

政府改革

英格兰并非唯一一个发展了早期议会制度的国家。早期议会制度也以定期集会的形式出现在一些西班牙王国中。在这些集会上，封臣为君主提供建议，大臣之间还有自己的组织结构。这种被称作“科特”（cortes）的贵族会议会宣布税款征收的有效性，表达不满，并提出议题。最早的贵族会议始于1188年的莱昂。这一制度变革在阿拉贡与加泰罗尼亚得到深化，在那些地区产生了专门处理休会期各项事务的常务委员会。

与此同时，为了复兴罗马法，法律编纂与政治管理日益专业化。但是，随之而来的皇家势力与权力的扩大招致了贵族阶层的反抗，这也导致了13世纪60年代—14世纪40年代阿拉贡与巴伦西亚的多次动乱，以及13世纪70年代发生在卡斯蒂利亚的反叛。

定居，需要考虑环境是否适应、经济能否发展以及定居点规模等问题。更靠南的地方有大片人烟稀少的地区，摩尔人也更多。在此，军事修会（military orders）在创造大片地产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而这些土地也大多是为教会与贵族阶级的利益而开拓的。大部

分的基督教农民仍待在偏北的地方。

从长远来看，10—14世纪期间，人口增长与技术进步促进了农业繁荣，而人口的变多也带来了消费市场与劳动力。富人阶层比自耕农更易从兴盛的农业中受益，后者一旦遇到困难，往往会沦为佃农。

空前的繁荣也促进了已有宗教场所的重建与扩展。基于这个原因，建于 9世纪的黎波里修道院在11世纪被一个更大的修道院所取代，而该修道院于12世纪再建时的大门保留了下来。大门上栩栩如生地雕刻着《圣经》所描绘的历史，其中以《出埃及记》《列王记》与《启示录》最为突出，还有许多其他场景，主题即为斗争——这倒与西班牙失地收复运动颇为契合。在描绘《出埃及记》的场景中，摩西双臂高举，确保观看者能目睹画中战场上的军队和摩西一方所取得的胜利。

在伊比利亚半岛，几个王国的统治者之间也会彼此征伐，包括在卡斯蒂利亚、葡萄牙、纳瓦拉与阿拉贡之间时断时续的内战。这些统治者展现出了一种西洋棋般的权力观与实力排名意识。例如，当阿拉贡国王佩德罗四世（1336—1387年在位）试图说服葡萄牙国王放弃与卡斯蒂利亚国王的同盟时说：卡斯蒂利亚国王志在夺取整个半岛的统治权。这事发生在“两佩德罗之战”（1356—1366年）期间，交战双方是卡斯蒂利亚国王佩德罗一世，以及他同父异母的兄长——特拉斯塔马拉公爵恩里克二世（Henry of Trastámara）。这次冲突引发了卡斯蒂利亚内战。在战争中，阿拉贡王国支持恩里克二世夺位，而后者最终于1369年击败并杀死了佩德罗一世，成为新任卡斯蒂利亚国王（1369—1379年在位）。

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外国的干预加剧了西班牙国内的重重矛盾。英格兰弓箭手在阿勒祖巴洛特战役（1385年）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这次战役中，葡萄牙挫败了卡斯蒂利亚的进攻企图。冈特的约翰也掺和进卡斯蒂利亚政治中。他是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的第三子，于1372年迎娶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康斯坦斯。由于康斯坦斯是佩德罗一世之女，冈特的约翰便依据他与康斯坦斯的婚姻关系而索要莱昂-卡斯蒂利亚的王位。1386年，他率兵入侵加利西亚并占领了那里的大部分地区。1387年，在葡萄牙的支持下，他继续前进，但未能与来自特拉斯塔马拉的卡斯蒂利亚国王胡安一世（1379—1390年在位）交锋，因为他的军队遭遇了疾病肆虐与粮草短缺的问题。约翰与他的妻子随后宣布放弃对卡斯蒂利亚王国的所有权，以此换来了金钱与联姻作为补偿。他们的女儿凯瑟琳嫁给了胡安一世的儿子，即王位继承人恩里克，也就是后来的恩里克三世（1390—1406年在位）。

1269年，马林王朝取代了阿尔摩哈德，成为摩洛哥的统治者。1275年，马林人开始攻打基督教统治下的西班牙，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1340年，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十一世（1313—1350年在位）在萨拉多河战役中予以马林人关键性的打击，取得了重要胜利。后来，他在瓜达卢佩建了一座大修道院，感谢圣母瓜达卢佩实现了他战前的祷告。1344年，阿方索十一世占领了位于直布罗陀湾的阿尔赫西拉斯，有力地阻止了来自摩洛哥的进一步干预。

罗伯特·布鲁斯之心

1329年，苏格兰国王罗伯特·布鲁斯在弥留之际，嘱咐詹姆斯·道格拉斯爵士将他的心脏带往圣地，并带上征讨基督之敌的战场。在路上，道格拉斯加入了阿方索十一世对摩尔人特瓦城堡的围攻战。关于此事的描述众说纷纭，但其中最可信的一种说法提到，道格拉斯为鼓舞士气，将陈放着国王心脏的银制骨灰盒扔向前线，自己也冲锋至死。罗伯特·布鲁斯的心脏后来被人带回了苏格兰，安葬在梅尔罗斯修道院中。在特瓦镇镇中心，立有一块苏格兰大理石，以缅怀此事。

在大西洋上，卡斯蒂利亚人自1402年起就开始了对加那利群岛的殖民。卡斯蒂利亚人抓捕土著的关契斯人（Guanches），把他们视为下等人甚至奴隶。然而，卡斯蒂利亚人仍遭遇了顽强的抵抗。直到1496年，土著的反抗最终被完全镇压。

由于黑死病带来的死亡，以及1350年阿方索十一世在直布罗陀围攻战中的兵败而亡，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被束之高阁，人们转而关注一些国内问题。1348—1350年，黑死病致使近三分之一的人丧命。土地荒芜，村舍被废弃，农作物产量下跌。地主想从当时数量稀少的劳动力身上榨取更多的利润，遂导致社会矛盾急剧恶化。为保障自身权益，劳动者团结起来组成了自己的同业公会。养羊需要的人手不多，因此牧羊业得到了发展，并为参与者带来了丰厚回报，受益者主要是大地主。

梅斯塔

13世纪，卡斯蒂利亚王国在梅塞塔成立了一个称为“梅斯塔皇家议会”（Royal Council of the Mesta）的机关，负责处理牲畜养殖规模扩大带来的各种问题。具体说来，牲畜主要指的是羊——它们为人类提供了在当时极为关键的羊毛、羊肉与奶酪。卡

斯蒂利亚地区羊的数量大概从1300年的50万头增加到了1500年的500万头。羊的长途运输引发了地主之间的矛盾。从成片土地的利用角度来说，这是一种十分低效的选择。

这一时期的许多发展都在其后的很长时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包括大学的建立，尤其是在萨拉曼卡（1218年）、莱里达（1300年）、巴利亚多利德（1346年）与韦斯卡（1354年）成立的大学。这些大学培养出一批受过良好教育、身为人文主义者的统治阶层。

黑死病及其引发的社会矛盾导致了人们在宗教上对穆德哈尔人及犹太人更深的敌意。集体屠杀的暴力形式导致许多人死亡，如1355年发生在托莱多以及1391年发生在塞维利亚的屠杀。此外，很多犹太人被迫改信基督教，成了“改宗者”。他们是占大多数的老基督教徒与犹太教中坚力量之间的中间派。宗教裁判所为1492年驱逐犹太人的行为寻求合理性这一事实，西班牙人长期以来对于血统“纯正性”的固执，以及社会上对犹太人普遍的敌意，均反映了西班牙人对“改宗者”的态度。政治也发挥了作用，因为卡斯蒂利亚国王佩德罗一世所遭受的指控之一，就是他偏袒犹太人。生活在安达卢斯的犹太人也遇到了不少麻烦，其中就包括1066年的格拉纳达大屠杀，以及在阿尔摩拉维德人与阿尔摩哈德人治下的数量更多的宗教迫害。

1369—1516年的特拉斯塔马拉王朝[11]统治时期，卡斯蒂利亚动荡不安。1418—1469年，王室内斗，贵族不和，王室与贵族之间亦纠缠不清。当时许多规模宏大的城堡（如阿拉孔城堡）成为冲突上演的地方。据说阿拉孔城堡沾染了一个凶残求婚者的血迹，那人的尸体被混在了砌墙用的灰浆里。彼时，恩里克四世（1454—1474年在位）同父异母的妹妹伊莎贝拉一世宣布了自己对卡斯蒂利亚王国的所有权，而疑似恩里克私生女的胡安娜·拉·贝尔特兰尼哈也宣布自己享有王国继承权，与自己半亲的姑姑围绕王位展开了争夺。恩里克四世在位时，未能限制住贵族的特权。贵族阶层此前不仅得到了阿拉贡王国的支持，甚至在1460年成立了贵族联盟以反对恩里克。1474年，伊莎贝拉宣布自己继承王位，成为王国的统治者，此后，在卡斯蒂利亚王位继承战（1474—1478年）中，伊莎贝拉获得了阿拉贡王国、大多数贵族与神职人员的支持，因为她的丈夫兼远房表弟费尔南多正是阿拉贡王国的王位继承人。另外，嫁给了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的胡安娜得到了葡萄牙以及一些大贵族的支持。然而，托罗之战（1476年）让胡安娜的继位大业分崩离析，她不得不宣布放弃王位继承权。塞维利亚的圣若望皇家修道院正是为了祈祷和感恩托罗之战的胜利，才得以修建。

与此同时，阿拉贡王国将视线移向了地中海的东面。这个王国的版图最终囊括了巴利阿里群岛、西西里岛（1282年）、撒丁岛（1322年）、那不勒斯（1435年），而占领那不勒斯意味着对意大利南部的统治。阿拉贡王国继承了加泰罗尼亚的海洋传统，意图与热那亚、威尼斯的海上力量一争高下。1380年，阿拉贡国王佩德罗四世（1336—1387年在位）对他的继承人说："如果撒丁岛陷落，马略卡失去了来自西西里岛与撒丁岛的食物供给，人口将会减少，进而失守。此外，巴塞罗那的人口也会减少，它不可能在丧失西西里岛与撒丁岛的情况下独活。如果这些岛屿都被攻破的话，巴塞罗那的商业贸易也会中断。"佩德罗四世这番言论是想劝说他的继承人将王朝长期以来为攻克撒丁岛所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延续下去。同时，他也是为了说服儿子在西西里的亲戚中寻一位新娘。

受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的影响，在中世纪后期，西班牙南部的海洋传统已大不如前。虽然立足于西班牙西北部的远洋捕捞活动十分重要，但是，卡斯蒂利亚王国并没有大力支持该区域海上活动的发展。在伊比利亚半岛上，反而是葡萄牙最早开始探索大西洋的潜力。

1458年，阿拉贡王国的遗产被分割。那不勒斯被传给了阿拉贡国王阿方索五世（人称"宽宏的"阿方索）的私生子费兰特（Ferrante）。阿方索五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意大利的强权政治上。虽然王国遭到分割，阿拉贡的统治者仍然关注着意大利的政治，尤其是它与法国的竞争关系。

15世纪，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在巴尔干半岛取得了胜利。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卡斯蒂利亚人在15世纪末又开始了针对各酋长国的进攻。这次军事行为与1479年建立的王朝联盟——以费尔南多与伊莎贝拉为代表的阿拉贡与卡斯蒂利亚两个统治家族的结合——密切相关。该联盟的攻击目标是格拉纳达王国。自1482年起，格拉纳达王国就因内战而国力衰弱，加之没有外援，因此显得易于攻取。由于该王国采取一夫多妻或曰纳妾制，且没有长子继承的规定，遂在王位继承上出现了多名竞争者，他们常以暴力方式解决问题。自1485年龙达陷落起，王国要塞被逐个拔除。最终，1492年年初，格拉纳达城也被攻克了。西班牙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以日耳曼人为主力的炮兵部队。此外，侵略军的规模以及以毁坏庄稼的方式开展的经济战，都是取胜的重要因素。就算格拉纳达王国的城镇挡住了炮击，也抵不过饥荒——这正是1487年马拉加陷落的原因，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格拉纳达王国自身覆灭的缘由。即便如此，西班牙人还是花了近十年的时间才攻占了格拉纳达王国。

1492年1月，费尔南多与伊莎贝拉进入了他们的新城，但仍下令

保障当地宗教的权力、习俗与宗教自由。1494年，鉴于他们的胜利，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授予费尔南多与伊莎贝拉“天主教国王和王后”称号。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生于1431年，本名是罗德里哥·迪波吉亚，曾担任巴伦西亚大主教。

建筑工程，尤其是建造教堂的委托，反映出人们新获得的荣誉感：火焰哥特式（Flamboyant Gothic）或垂直哥特式（Perpendicular Gothic）风格渐渐发展为后来的所谓伊莎贝拉风格（Isabelline style）。后者的装饰颇具想象力。建筑风格上的这种变化可见于阿斯托加、布尔戈斯与塞维利亚的大教堂中，尤其是塞维利亚地区教堂的拱顶。收藏于圣格雷戈里国家博物馆内的巴利亚多利德国家雕塑博物馆正门，正是繁复精巧的伊莎贝拉风格的典型作品。

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

9世纪初，人们发现了使徒圣雅各之墓，地点就在今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据说他曾在西班牙传教，在犹大（朱迪亚）地区被杀。逃走的门徒后来将他葬于西班牙。这处圣地屡现神迹，因此阿斯图里亚斯的历代国王以及后来的莱昂国王积极鼓励人们参与狂热的宗教活动。传言称，圣雅各在战争中显圣，帮助基督教徒打败了摩尔人。844年发生在洛格罗尼奥附近的克拉维霍（Clavijo）之战便是典型案例。自11世纪始，大批朝圣者从国外慕名而来。主要的朝圣路线以法国为起点，因为那里朝圣者很多。朝圣活动持续到了16世纪，在19世纪末还一度复兴。如今已有多条朝圣路线，其中一条以葡萄牙为起点，向北行进。2016年，前往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的朝圣者人数达27.7万。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大教堂大体上采用了罗马式风格，但也有一些哥特式工艺，还有一个华丽的巴洛克立面。邻近的圣马丁·皮纳里奥修道院（the monastery of San Martín Pinario）也值得予以特别关注。无论如何，圣地亚哥地区的历史是完整而难以分割的。朝圣之路沿途经过的主要地区还有埃乌纳特（Eunate）、蓬特拉雷纳、洛斯阿尔科斯与布尔戈斯。埃乌纳特有座精美的罗马式小礼拜堂。在蓬特拉雷纳，人们可以看到一座历史悠久的桥，在圣十字教堂里还有一个Y形的十字架。而洛斯阿尔科斯教堂内部的巴洛克风格精美绝伦。

新世界

自1453年起，卡斯蒂利亚就与西非有了贸易往来。但是，这种贸

易关系在1479年中断了。由于《阿尔卡苏瓦什条约》的签署，卡斯蒂利亚将自己与几内亚以及黄金海岸地区的交易权拱手让给了葡萄牙。这反映出西班牙愿意长期从他人手中购买奴隶。

与此同时，新世界的大门正在向西班牙打开，因为热那亚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1451—1506年）以费尔南多与伊莎贝拉的名义出航，于1492年抵达了西印度群岛。1493年，哥伦布归来时，在巴塞罗那受到了费尔南多与伊莎贝拉的接见。1494年，《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将大西洋上的国家分为葡萄牙区与西班牙区。非洲被划给了葡萄牙，当时被称为美洲诸国的地区则被分给了西班牙。后来划归葡萄牙区的巴西，当时尚未被“发现”。

质疑过去

以佛朗哥式的民族主义观点来阐释西班牙历史，往往会侧重于强调基督教徒的身份与目的。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后民族主义则积极探讨与安达卢斯相关的内容。据说，中世纪的西班牙出现过一种宗教宽容的文化，即基督教徒、犹太人与摩尔人和谐共存，而不是基督教徒一枝独秀。这种共存状态及其影响是否重要，仍存有争议，而且宗教包容的程度往往被夸大了。然而，关于安达卢斯的论点极大地提高了中世纪西班牙在后民族主义历史文化背景中的重要性。事实上，人们所期待的现代公民政治中的所谓融合主义，正是承接自过去的西班牙。

中世纪带来的影响依然具有争议，且变幻无常。曾经，人们往往试图以不同的方式修饰历史，使之看上去更加仁慈温和。1986年4月23日，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对英国上、下两院发表演讲时，采取了有别于之前君主的立场。他赞扬道：“古代科特的贵族议会开欧洲议会之先河。君主须征得议会中公民代表的同意方能征税，以供西班牙土地收复运动中持久战事的需要。”2004年，由社会党主导的阿拉贡政府暗示说，他们准备弃用阿拉贡的纹章盾——上面画了四个割下的人头，因为它看起来实在是麻木不仁。此提案转而招致反对派——保守主义人民党的批评。

第五章

地理大发现与黄金世纪的降临

航海探险成了神学的一种形式。

新大陆

在近代早期，欧洲与美洲的初次接触是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于1492年抵达西印度群岛时。他的航行构成了伊比利亚半岛扩张的一环。该扩张模式的一项重要元素是，非伊比利亚航海家（尤其是意大利航海家）出于经济目的，利用奉行扩张主义的葡萄牙与卡斯蒂利亚君主的支持开展活动。反过来，这些统治者想招募贤能为己所用，来丰富本国资源储备。这种扩张主义具有领土、宗教与经济意义。长期以来，葡萄牙与卡斯蒂利亚君主利用意识形态战争将摩尔人驱逐出了伊比利亚半岛。这项任务明显在1492年随着最后一个摩尔人王国格拉纳达的覆灭而宣告完成。在此之前，他们早已将对抗摩尔人的战火烧到了北非。他们也占领了大西洋东部的许多岛屿——加那利群岛、马德拉群岛、亚速尔群岛、大加那利群岛以及佛得角群岛，它们是通往西印度群岛与南美洲的航线上的重要中途岛。1483年，卡斯蒂利亚人终于征服了大加那利岛，而特内里费里岛也于1496年向卡斯蒂利亚投降。

与葡萄牙在印度洋取得的成功形成对照的是，卡斯蒂利亚王国继哥伦布之后率先开辟了美洲大陆，导致葡萄牙在此只得到了巴西。“发现”巴西只是一次偶然，实际上葡萄牙的初衷是想为当时的印度洋航线找到更好的风向与洋流。此外，葡萄牙没打算在卡斯蒂利亚王国所属区域以北的北美地区建立自己的殖民地，尽管该区涉及葡萄牙的利益，特别是捕鱼业方面的利益。1493年，教皇出面分割了新大陆。随后，1494年，卡斯蒂利亚与葡萄牙双方签署了《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北美、中美与南美的大部分地区被分给了卡斯蒂利亚，或曰西班牙（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王国合并后的叫法）。由于葡萄牙易于遭受外部侵略，所以它没有准备好在这件事上公然挑衅强邻西班牙。1580—1640年的历代西班牙国王同时也是葡萄牙国王，这种共主联邦类似于英格兰与苏格兰在1603—1707年的关系，直到葡萄牙通过一次成功的侵略战，摆脱了西班牙君主的统治。[12]

充满争议的哥伦布

从一开始，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就是一个富有争议的人物。如今人们就其名头所作的文章与哥伦布生前所经历的毁誉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哥伦布的航行历经千辛万苦：1476年，他的船在葡萄牙海岸附近失事；1492年，在驶入巴哈马群岛途中，他遭遇了水手哗变。然而，与西班牙在新大陆的残暴统治相比，这一切都显得无足轻重。就哥伦布本人而言，政治上的钩心斗角并没有导致他被谋杀或遭处决。不过，1500年，哥伦布被革职后沦为阶下囚，被押送回了西班牙。

哥伦布死后，围绕在他身上的争议从未中断过。1506年，哥伦布在巴利亚多利德去世。他的遗体先是被运往塞维利亚，然后被运到圣多明各、哈瓦那，最后又被运回了塞维利亚。哥伦布的遗体之所以被遣返回国，是由于西班牙在1898年美西战争中不敌美国侵略者，失去了对古巴的控制。据说，塞维利亚大教堂内的一处气派的坟墓是哥伦布最终安息之地。然而，问题来了：有人称1795年从圣多明各运往哈瓦那的并非哥伦布遗体。因此，他实际上是被安葬在了多米尼加共和国。

19世纪末，对人或事进行缅怀或纪念的氛围尤为浓重。塞维利亚大教堂中有一座哥伦布纪念碑，这座碑最初本是为纪念风格阴郁的哈瓦那大教堂而建。除此之外，1888年，巴塞罗那万国博览会展出了一座著名的哥伦布纪念碑，其位置就在巴塞罗那市中心兰布拉大道尽头处。该纪念碑缅怀了1493年哥伦布来到巴塞罗那，在那里受到费尔南多与伊莎贝拉接见时的情景。这一纪念碑的复制品在其他地方也能看到。

无论如何，以四海为家的哥伦布如今作为广受争议的美国“文化论战”的一部分，是个很难评判的人物。大约在1451年，哥伦布出生于热那亚共和国。在效力于西班牙之前，他参与了葡萄牙的贸易活动。1992年，在哥伦布1492年横渡大西洋的周年纪念问题上，人们产生了严重分歧，其中尤富争议的一点是：哥伦布横渡大西洋这一事件究竟应不应该被视作剥削、奴隶制与种族灭绝的背景？自此之后，争端从未停止过。2017年，这一争论还导致纽约市警察局为曼哈顿的哥伦布圆环提供了全天候保护。洛杉矶的监事会与市议会决定，将哥伦布纪念日改为“原住民日”，因为有传言称，哥伦布是一个压迫者。巴尔的摩的哥伦布纪念碑也遭到了破坏。

人们指责哥伦布奴役美洲土著，让他们暴露在各种疾病之下，并最终导致了某种形式的种族灭绝。事实上，有人甚至用了“大屠杀”一词。人们在使用此术语的诸多释义时，应慎之又慎，力求精准，以免消解了这个词的威力。围绕哥伦布展开的辩

论被政治化了，而且成了美国这个“大熔炉”社会富有争议的本质的一部分——有人宣称自己的传统遭到了践踏，又有人认为，自1937年起确立的美国法定节日“哥伦布纪念日”令人反感。诚然，人们对历史的描述既不固定也不唯一。事实上，1937年确立哥伦布纪念日，部分原因在于美国民主党人反对共和党在20世纪20年代执政时对美国盎格鲁-撒克逊系白人新教徒身份的强调。从这种强调中我们也能看出美国移民的局限性。

无疑，哥伦布是经得起多重解读的。他所代表的许多东西似乎超越了时代。鉴于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地理大发现”具有重商主义的特征，且在本质上是世俗的，那么关注的焦点自然被放在了经济利益上。更近代的人则探讨了航海家恩里克、哥伦布以及瓦斯科·达·伽马等人的信仰问题。人们强调，这些人想要获得金钱与同盟，以推动对耶路撒冷的再度占领，而对耶路撒冷的再度占领则是为基督重临所做的重要准备。因此，时间与空间均被纳入讨论，航海探险成了神学的一种形式。哥伦布在1502年第四次航行前往加勒比海地区之前，编纂过一本书，名为《预言之书》（*Book of Prophecies*）。在书中他说，世界末日将在155年后到来。

西班牙并没有完全征服加勒比海地区，只占领了一些较大的岛屿，主要是伊斯帕尼奥拉岛、古巴与波多黎各。这些地方看起来易于攻取，适宜定居。这就为其他欧洲列强，尤其是法国、英格兰与荷兰占领其他岛屿留下了机会。同时，这也保证了印第安人在一些岛屿（例如圣文森特岛）上继续处于支配地位。然而，不幸的是，西班牙人带来了欧洲的各种疾病，尤其是天花。肆虐的疾病对土著而言是毁灭性的打击，结果导致西印度群岛的人口结构出现了急剧变化，同时也使印第安人士气大跌。疾病带来的影响是促成殖民者从非洲贩运黑奴的一大因素。

这些岛屿一旦被攻破，马上就变成了西班牙开展活动的重要基地，其中以古巴为甚。古巴是西班牙入侵中美洲的跳板。为了利用好加勒比海地区最大天然港的深水区，西班牙于1519年建立了哈瓦那。更早的一次尝试是于1515年在巴塔巴诺湾口附近建港，然而，那里是蚊虫肆虐的沼泽地，又缺少一个有遮蔽的港湾，因此西班牙最终放弃了那次尝试。

1519年，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率领一支450人的军队，配备14门小加农炮与16匹马，在如今墨西哥海岸的韦拉克鲁斯登陆。他代表费尔南多与伊莎贝拉之外孙——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

（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1519—1556年在位），很快就推翻了阿兹特克帝国[13]的统治。阿兹特克帝国的大本营在中美洲，也就是现在的墨西哥中部地区。作为帝国首领的蒙特祖马二世（Montezuma II）完全被科尔特斯吸引住了。他担心科尔特斯是一个强大的专制政权派来的特使，因此不愿果断地反抗科尔特斯。不过有关他将科尔特斯视作神灵的传言，也不足为信。科尔特斯不费一枪一炮就抵达了阿兹特克帝国的首都特诺奇提特兰（Tenochtitlán）。他在大神庙的庭院中屠杀了阿兹特克贵族，结果导致阿兹特克起义。科尔特斯不得不逃离特诺奇提特兰，同时蒙特祖马二世遇害。然而，面对起义军顽强的抵抗，科尔特斯仍于1521年杀回城中，将其镇压了下去。

在这场战争中，武器的作用至关重要。美洲人既无火器，也无马匹。他们的社会均以木石为用，并无钢铁。印第安人的投石器、木棍与黑曜石大刀绝不是西班牙武器的对手。与印第安人的武器相比，西班牙人的加农炮、明火枪、十字弓，射程远且杀伤力大。在肉搏战中，西班牙人也因可以单手持钢剑而在力量与灵活性上占据上风。金属武器比石器有效得多，而且西班牙人穿着的金属铠甲比印第安人身着的棉甲保护性更佳。阿兹特克人大概无法使用缴获的火器，因为他们既没有火药，也缺乏必要的训练。

但是，西班牙的火器极少而且攻速慢，火器的作用主要在于心理上的威慑。在与西班牙骑兵的对抗中，阿兹特克武士展现出了精湛的技艺，事实证明，他们镶满燧石与黑曜石的木棍格外有效。而玛雅人则很快学会用木桩来惊吓西班牙人的马。同时，西班牙人发现，土著的棉甲很有用，因为棉甲更适宜美洲的气候。但是，西班牙人仍保留了他们的钢盔，因为这是抵御弹弓的有效装备。

从某些方面来说，西班牙征服美洲意义非凡。同时，这次征服也是1515—1530年更广阔空间内领土变化的组成部分。在此期间，叙利亚与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以及匈牙利王国均被奥斯曼人推翻，印度北部的苏丹国洛迪王朝被莫卧儿人颠覆。每一次成功的征服，以其独特的方式达成了惊人的成就。而且，从整体来看，这些征服提醒着人们变革的可能性，尤其提醒着那些在19世纪和20世纪无法动员民众参战、不具备可与列强匹敌之基础的国家：一旦统治者与精英阶级垮台了，国家也将迅速走向灭亡。通过招募当地已有的一些精英并与新的统治者达成谅解，变革得到了部分缓和，换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变革实现了。于是我们能看到，莫卧儿人迅速起用了一些拉其普特人（Rajputs），而奥斯曼人也很快招募了马穆鲁克军队与官员。

16世纪早期与中叶，西班牙人在攻占中美洲、南美洲大部分地区

时，也遵循了上述模式。西班牙人充分利用了墨西哥中部地区已有的矛盾，例如，与特拉斯卡拉人结成同盟。特拉斯卡拉人被阿兹特克的领土包围，因此不得不屈服于阿兹特克人，对此怀恨在心。特拉斯卡拉人与西班牙的其他盟军一道，在1521年西班牙攻克特诺奇提特兰的战役中，贡献了大量兵力。来自印第安人的帮助使西班牙能与占据绝对人数优势的阿兹特克人相抗衡，这一点意义重大。

渐渐地，阿兹特克人学会了改变自己的战术，以对抗西方的武器，尤其是火药。在中美洲，与取得了战斗优势的西班牙结盟意味着胜算更大。此外，许多中美洲人愿意与西班牙人一道对付阿兹特克人的事实，也反映出阿兹特克帝国本质上的缺陷——缺乏同化理论与实践。

以征服阿兹特克作为开端的西班牙领土扩张，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当地人的支持，尤其是西班牙人奔赴远疆作战以及对抗非传统敌人时。1524—1526年，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Pedro de Alvarado）[14]继续采取早前（前西班牙时期）从墨西哥中部展开的领土扩张模式。他率领印第安同盟军入侵危地马拉。但是，过度的暴力及苛刻的贡赋与劳役摧毁了他（和他的盟军）征服危地马拉所获得的成功。为应对持续的反抗，他的哥哥豪尔赫招募了5000—10000名印第安武士加入1527年的危地马拉入侵战。直到1529年，在对当地人进行了大规模屠杀之后，豪尔赫才取得了成功。来自印第安人的支持至关重要。这也许是西班牙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其重要性超过了新型疾病的影响、西班牙的军事技术以及当地人的内部分歧。因为，印第安人的支持给西班牙带来了战斗力、情报、物资运输的途径，以及补给的获取与筹备。

因此，在1540—1542年的米克斯顿之战（Mixtón）中，总督安东尼奥·德·门多萨（Antonio de Mendoza）征用了10000名印第安盟军。此外，当地土著士兵还被用作防军。16世纪90年代前，新加利西亚当地的弓箭手就在为西班牙人守护道路与银矿了。相应地，他们享有财政补贴与法律特权。

在南美洲，1519年建立的巴拿马城成了弗朗西斯克·皮泽诺于1524年、1526年与1531—1532年三次远征秘鲁的大本营。在最后一次远征秘鲁时，皮泽诺于1532年11月迅速攻克了印加帝国，俘虏了印加统治者阿塔瓦尔柏，占领了首都库斯科。但是，接下来皮泽诺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尤其是在1536年，曼可·印加用某种方式将反抗力量凝聚在了一起。然而，西班牙凭借高超的作战水平，仍在战场上取得了巨大胜利。此外，有足够多的当地人支持西班牙侵略者，而且他们的傀儡国王曼可·印加也为西班牙提供了重要战场与诸多政治优势。

印加反抗史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曼可·印加的遇刺身亡奠定了西班牙成功的基础，这证明领导力至关重要。然而，西班牙的征服还是花了7年多的时间。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战争历时弥久表明了西班牙人的目标是征服而非劫掠。军事行动之后，西班牙人通过为新领地命名的方式，象征性地宣示了主权。这一过程伴随着如下行为：殖民者带着他们的农作物与牲畜前来新领地；鼓吹基督教，破坏敌人的宗教仪式；引入了行政机构与任期制度，例如，古典罗马帝国时期基于市镇的统治方式。此外，西班牙对当地精英阶层与本土物质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的接受，以及当地人对西班牙人的适应，均意义重大。

在占领、屠杀之余，人们也许可以描绘一幅更加祥和的西班牙征服图景，其中尤为鲜明的是，基督教在西班牙统治下的美洲所发挥的融合作用。基督教利用了当地的传统与习俗，但也保留了自己的欧洲源头。新领地作为一个思想交融的神圣空间，带给人们一个关键性启示：在征服与被征服的双方达成和解后，还存在一种更为广泛的合作模式，这种模式可被视为西属美洲的政治基石。人们甚至可以以融合与共识为因，推出社会稳定之果。稳定是该地区的重要特征，同时也解释了西班牙统治下当时及后世的美洲社会不如英国统治下的美洲那般活力四射的原因。

然而，这种解释忽视了西班牙人占领美洲的主要过程以及比较的维度。在美洲，印第安人社会往往被定性为粗俗、原始、未开化的。这样一种定性不仅推动了全面战争的爆发，促成了统治者的冷酷无情（就像在墨西哥那样），还促使西班牙人下定决心，要完全抹杀掉印第安社会的鲜明特色。西班牙人还毁坏了印第安人的宗教场所，肃清了他们无法接受的印第安习俗。西班牙评论家对这些习俗评头论足，以彰显其统治的优越性。也许，在西属美洲，基督教徒的敬拜仪式在一定程度上降格了，但是，基督教本身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在肃清印第安本土宗教的运动中，宗教裁判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偶像焚烧便是其中的一项举措。

这与欧亚大陆上大部分地区的情况相异。在欧亚大陆上，虽然存在严重的宗教冲突，但纵使奥斯曼人、莫卧儿人大肆攻城略地，也不曾终结其他人的宗教活动。然而，西班牙人及其后代却从未在数量上超过土著或各种族混合群体的人口。因此，尽管西班牙人不断征讨异教神祇，还控制印第安劳工，打压土著贵族阶层，但是他们还是将成片成片的土地留给了乐于与他们合作的印第安人，尤其是那些愿意与西班牙人一道征伐的印第安人。

其他欧洲人将会效仿西班牙人的做法。布道主义是优越感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旨在让征服变得名正言顺，旨在加强对原住民的控制。最终的结果是，对土著文化的攻击远比人们看到的还要严重。例如，西方和非西方的征服者大肆破坏印度本土文化，最终导致疾病肆虐，社会分裂直至土崩瓦解。土著文化所面临的这种困境，在新大陆被发现之初便已注定。西班牙人所发动的征服战的模式比其他任何地方的都要全面，这种基于基督教命定扩张论的征服模式在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中亦有所体现。然而，我们需要时刻提醒自己，应将西班牙的历史置于更广阔的欧洲发展的框架下看待。西班牙统治的残酷被16世纪的西方历史与公共文化所强化了。这一时期，以奥斯曼帝国为首的复兴运动发起了对基督教国家的攻击，后果之一便是对基督教徒的奴役，这是影响西班牙人对其他宗教之态度的重要因素。宗教改革所引发的基督教世界内部明显增加的宗教暴力，尤其是宗教改革后对异端的通行处理手法（比如将异端描绘成动物，剥夺其人性等），也促使西班牙人对异教的看法发生改变。

极端暴力行为还殃及了来到新大陆的其他西方国家的人，但这些人只占少数。他们之所以被殃及，部分原因正是在于他们人数较少。例如，1565年，一支西班牙军队屠杀了在佛罗里达占据了一席之地的胡格诺派信徒（法国新教徒）。屠杀囚犯，原因之一在于俘虏难以控制、照看，但是，主要原因其实是宗教上的狭隘和自以为是，以及对所谓威胁的有意摧毁。在地中海地区，基督教徒与摩尔人之间有过大规模的相互奴役，也都采取过屠囚的做法。

西班牙人面对着推翻阿兹特克人与印加人统治的后果。但是，在北美洲与南美洲的其他地方，情况则大不相同，因为与入侵者对抗的是各个部落。这并不意味着所有部落高度一致。相反，在环境、经济发展、社会模式与政治组织上，各部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有些部落是高度发达的，例如，居于哥伦比亚中部高地，开采祖母绿的穆伊斯卡人。在1536年西班牙的一次贪婪的远征后，穆伊斯卡部落被攻占。然而，印第安人结合崎岖的地形所展开的反抗，可能令侵略者难以招架。自16世纪80年代起活跃在委内瑞拉、巴拿马与哥伦比亚的贝尔纳多·巴尔加斯·马丘卡（Bernardo Vargas Machuca）记录下了传统印第安武器与战术所造成的威胁，例如，毒箭、自高处滚落的石块、伏击与陷阱。同时，他也记录下了印第安人如何应对西班牙的军事优势及其局限性。例如，印第安人会利用雨水对火药的克制来获益。

在很大程度上，西班牙帝国的目的与天性均暗示了当地人反抗的力度。在缺乏印第安人支持时，西班牙人在美洲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他们在智利中部地区的作战便是如此。1598—1604年，来到智

利的西班牙人被赶出了中央山谷；此后，比奥比奥河成了边境，在该河以外的地区，阿洛柯人是独立自主的。

在墨西哥北部，西班牙人遭遇了来自奇奇梅卡地区游牧战士的抵抗。这些游牧战士在极其不利于西班牙骑兵作战的地形上，将手中弓箭的杀伤力发挥到了极致。相应地，西班牙人集结了印第安同盟军，结果双方之间的战争演变成了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之间长期斗争的一种新形式。西班牙人发现，制服对手并非易事，而且他们从该区银矿上获得的收益被战争耗费了太多。同时，当地人为了获取更大机动性，捕获并使用了西班牙马匹，这对于西班牙人而言也是一大威胁。最终，西班牙人放弃了包括掠夺奴隶在内的激进政策，转而以更加平和的举措来缓和矛盾，例如，用礼物来贿赂对手，用基督教传教活动来软化对手。事实上，文化被控制以及本土独立自主活动遭到破坏并不能涵盖美洲所面临的全部情况。由于边界极为重要，极深的“中间地带”就成了西班牙帝国的一部分。这个“中间地带”与其说是一个分区或一片地带，不如说是长久以来西班牙势力活跃区域的一部分，是其实践活动的一部分。在墨西哥北部，西班牙政策的转向带来了定居点的增加与堡垒的建立，也因此改变了定居地的陆上风貌。

关于金子的传言驱使着西班牙远征队自墨西哥向北进发，前往美国腹地。以弗朗西斯科·巴斯克斯·德·科罗纳多（Francisco Vásquez de Coronado）为首的一批人进入了如今的新墨西哥州，又从那里继续进发，于1540年抵达了美国中部大平原。最终关于金子的传言被证明是讹传。和在墨西哥获得的收益相比，西班牙人在美国的收获简直不值一提。与此相似，1539—1542年，埃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远征队残忍洗劫了密西西比河下游及周边地区之后，就没有后续的行动了。1540年，索托在莫比尔（今亚拉巴马州塞尔马市）战役中打败乔克托族，赢得了胜利。在战斗中，他的骑兵不费吹灰之力就占据了一片开阔地带。索托去世后，路易斯·德·莫斯科索（Luis de Moscoso）率部队在1542—1543年继续前进，行至今天的得克萨斯州东部。这支远征队带来的许多疾病给了当地人致命打击。

获利太少虽然不是西班牙人对墨西哥以北的美国兴趣寥寥的唯一原因，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1598年，西班牙人向北进发，建立了一个他们称之为新墨西哥的根据地。但是，这处位于圣菲的定居点过于边缘化，因为它并不如人们料想的那般可以通向太平洋。再往南一些，由于西班牙人无意中带去的疟疾所引发的灾难，作为玛雅文明之中心的尤卡坦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在1527—1541年被征服，而佩滕省中部的伊察人（Itzás）直到1697年才被打败。

一般说来，西班牙的殖民政策与实际操作，包括对印第安人宗教

仪式的取缔，都影响了当地社会，还限制了流行病肆虐之后人口恢复的可能性。这些现象所引发的问题又因种植园农业与采矿业所带来的商机而进一步恶化，因为种植园农业与采矿业都需要大量劳力。明显的解决策略就是从西班牙控制的领土范围之外获得印第安人奴隶。16世纪，西班牙人对洪都拉斯与尼加拉瓜的印第安人实施了大规模奴役；这种奴役是战争的一个方面。贩卖奴隶所得的收益致使印第安社会动荡不安，因为部落之间为了抓人为奴，而频繁发生冲突。这种情况也发生在西非。其结果是，人被商品化，奴隶贸易极大影响了欧洲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

尽管在美洲大陆，西班牙从奴隶贸易中取得了收益，但由于印第安人的反抗、逃跑，殖民者仍然面对着包括奴隶的可支配性与成本在内的各种问题。此外，在西班牙统治的范围内控制印第安劳工的行为也受到了皇家立法的影响。这是因为皇家立法不得不屈服于神职人员施加的压力——神职人员要求将印第安人看作即将接受基督教的国民，而非奴隶。事实上，新大陆的蓄奴行为在1542年的《新法》（*Leyes Nuevas*）中被正式取缔了。但是，撇开奴隶的造反不谈，这项立法的确推动了西班牙人在秘鲁的事业。官方命令的执行需要时间，还经常被地方官员与地主刻意无视。此外，契约工制度，尤其是监护征赋制（encomienda，即将土地与印第安人家庭分配给殖民者的制度），以及强制性的迁移政策，尤其是分派制（repartimiento），构成了事实上的奴隶制。在分派制下，一部分男性人口不得不离家工作。

在与非洲黑奴抵达的口岸相距较远的边疆地区，印第安人奴隶依然十分重要，例如墨西哥北部地区。然而，可支配性与成本的天平开始倾斜，殖民者倾向于从西非购买奴隶并将他们从大西洋上一路运来。起先，非洲人是经由西班牙被运到西属美洲地区的。但是，自1518年起，出现了将他们直接运往美洲的“席位”，或曰许可证。由于最初获取非洲黑奴的成本要高于使用印第安人奴隶，所以在西属美洲地区，人们常将黑奴用作家奴（这种高价值的奴隶制暗示了黑奴的成本）。

到16世纪中期，情况已发生了改变。非洲所提供的劳动力不再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而正在稳步变成重要的奴隶来源，其中的一大原因是，人们认为非洲黑奴的体力比印第安奴隶要好。非洲黑奴的价格依然比印第安奴隶的要高。有多种控制价格的方式，例如劳务抵债。然而，从大西洋上运来的黑奴人数在17世纪出现了巨大增长。

西班牙文明在估算美洲及美洲印第安人口时遇到了许多问题。收复失地运动与基督教传教活动提供了一个计算框架，但这并不是唯一

的理论框架。此外，古典时期的文献也提供了相关模型，罗马帝国的扩张为后世的西班牙提供了参考。与此同时，西班牙人不得不应对古典时期（西方）作家不甚了解的新大陆，尤其是前所未见的动植物，如牛油果。事实上，在哥伦布时期的世界文化交流中，西班牙起到了关键作用：将玉米、土豆与番茄引入欧洲，同时又将马匹、猪与葡萄酒输入美洲大陆。

新大陆即所罗门王获得大量黄金与象牙的俄斐、他施的说法，尤其是秘鲁即俄斐的观点，遭到了人们的否定。部分原因在于新大陆根本没有大象。古典主义时期作家的一些论断也被证明是假的。例如，亚里士多德曾说，因为热带地区过于炎热，人们无法在那里生活。一般来说，由于古典时期缺乏关于美洲的描述，这就促使人们重新建构权威的实质，将重点放在见证人的实录与同时代人的大胆尝试上——这对于西班牙人理解美洲而言相当重要。此外，西班牙人一方面将印第安文化视为异教的、邪恶的，对其不屑一顾并予以毁灭；另一方面又尝试去适应印第安文化。在基督教之内，印第安宗教崇拜也有了一席之地。

当时也有人尝试去理解印第安文化。方济各会修士贝尔纳迪诺·德·萨阿贡（1499—1590年）本是被派往墨西哥以抵制当地“偶像崇拜”的，但他反倒开始欣赏起阿兹特克文化与纳瓦特尔语，记录了许多文本，还创建了自己的研究方法论。然而，由于异族通婚，种族的划分日益复杂，最终就像在西班牙本土一样，划分出的种族类别越来越多。

西班牙的一些建筑物也参考了新大陆的建筑风格。在龙达市萨尔瓦铁拉侯爵宫殿里，支撑山墙的位置处有两尊雕像，每尊都雕塑着赤身裸体被缚在一起的一对美洲奴隶。

强权西班牙

西班牙很可能从一些非西方的敌人，尤其是阿兹特克人与印加人身上获得了可观的收益。但是，在面对其他对手时，它却失败了，尤其是在面对地中海地区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时。在近代早期的任何时刻，西班牙与同时代的主要世界大国相比，一个重要的区别就在于西班牙独特的全球势力范围以及相应的雄心壮志。这里所说的“全球”是现代意义上的概念。尤其是在腓力二世（Philip II）于1580年获得了葡萄牙王位之后，在世界上的几大霸权国家中，西班牙帝国的势力范围无与伦比，而且它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霸主地位。这样的影响力为西班牙带来了经济利益，同时也使之作为一方霸主，在许多不

同领域内展现实力并达到了无人能及的程度。近代早期西班牙的这番图景，预示着与其大相径庭的19世纪局势中，英国与现代美国的地位。同处于近代早期的中国与印度莫卧儿帝国，既缺乏这种能力，也无雄心。

除了作为一方霸主在不同领域内展现实力外，西班牙还有机会思考如何进行全球合作。但是，全球合作的实用性受到了当时的技术（尤其是信息传递、军队输送）与资源的严重限制。因此，说到底，全球协作的想法足够大胆。这些想法是早已在远东地区摸爬滚打过一段时间的西班牙军人幻想的产物，但遭到了腓力二世及马德里政府的断然拒绝。马德里是在1561年成为西班牙首都的。西班牙进入菲律宾则是在1565年，用现代国家的标准来衡量，西班牙在菲律宾影响甚微，势力范围也很有限。事实上，人们没有理由相信，正常情况下西班牙能够在16世纪30年代成功推翻印加人的统治，更不用提远比印加人强大得多的中国人了。在西班牙推翻印加王国的例子中，印加国内具有毁灭性的内战是西班牙成功入侵的重要背景；17世纪40年代，中国明朝统治者被推翻也属于类似情况。至于西班牙在1519—1521年对阿兹特克政权的颠覆，实际上，当地人的内部分化削弱了他们对外族的抵抗，也为西班牙人提供了帮助。然而，西班牙的评论者可不会特意强调这一点。与之相对，他们会强调文化价值，包括来自宗教的支持。由于骑兵享有的荣耀与社会地位，马匹的重要性也被夸大了。

在主要的世界大国中，当时只有西欧国家，尤其是葡萄牙与西班牙，才有能力同时在两个半球中有所作为。虽然奥斯曼帝国希望将自己的势力投射到遥远的印度洋，但它始终无法与西班牙不断在更大范围内部署力量的努力相提并论。此外，奥斯曼人在兵败印度洋后，也就放弃了在那里部署势力的尝试。最终，两国的势力结构构成了一种距离上的对比：一边是越洋的西班牙帝国，另一边是主要跨越了地中海的奥斯曼帝国。与这种差异紧密相关的是，西班牙帝国严重依赖贵金属，而奥斯曼帝国则更多地依靠土地与贸易。西班牙与美洲的贸易往来受到贸易署（Casa de Contratación）的控制，后者是1503年成立于塞维利亚的一个机构。之后，由于河道堵塞，贸易署在1717年转移到了加的斯。

国内势力

帝国的成功让贵族阶层不得闲暇，且给他们提供了在政府工作的机会。伊莎贝拉的统治带来了稳定的局势。与此同时，矛盾在暗中交织，尤其是当君主想要扩大自己权力之时，斗争也愈加激烈。矛盾之一在于，君主意图将贵族从地方统治者的位置上移除，例如，伊莎贝

拉分别于1492年和1503年，将加的斯与卡塔赫纳从贵族手中夺走，又如，她下令让卡塞雷斯的贵族阶层拆掉自家砌有城垛的堡垒。1500年，拥有西班牙全国80%人口的卡斯蒂利亚主导了这个人口数量为550万的国家。

费尔南多与伊莎贝拉之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之母胡安娜一世（1504—1555年在位），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王朝政治中是个关键人物。凭借王位继承，丧夫后的胡安娜成了西班牙、美洲大陆、那不勒斯与西西里岛名义上的统治者。但是，由于患有精神疾病，她甚至连自家的仆人都管不了。人们对于胡安娜精神状况的担忧多半出于宗教上的考虑：根据当时流行的观点，不宜治理国家的君主一定是触怒了上帝，而且胡安娜与王国之间的联系意味着一方的罪孽将会影响到另一方的救赎。通过女王明显的疯癫，神意昭然若揭。这也就解释了胡安娜与统治权的分离，同时也使剥夺女王统治权的行为合法化了。胡安娜的处境促进了早期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皇权从个人主导转向了团体与家庭式管理。尽管1504年伊莎贝拉一世去世后，胡安娜继承了卡斯蒂利亚王位，但是费尔南多在查理五世成年前一直担任卡斯蒂利亚的摄政王。

卡斯蒂利亚在被纳入查理五世幅员辽阔的帝国版图之后，胡安娜的统治便结束了。这一版图融合在1515—1525年引发了一起政治危机。查理五世使用法语、起用非西班牙裔谋臣、要求征收新税、扰乱现存荫庇关系网的种种做法，导致危机加深。卡斯蒂利亚的城市公社起义（1520—1521年），以及具有更激进社会意识的巴伦西亚神圣联盟（1519—1520年）与马略卡神圣联盟（1522—1523年）均遭到了镇压，例如，1521年比利亚拉尔城市公社起义军便以失败告终。失去贵族的支持是起义军失败的根本原因：在比利亚拉尔，起义军大多失去了来自卡斯蒂利亚贵族的宝贵领导与重要战斗力。这一情况是起义运动日益激进的社会思想以及查理对皇室利益的重新分配这双重作用所造成的结果。贵族被国王拉拢，从而疏远了起义者。胡安娜拒绝帮助城市公社起义军，有助于查理重新树立自己的权威。最终，城市公社起义军的领袖在起义中心之一的塞哥维亚被斩首。起义的其他中心还有托莱多与巴利亚多利德。

此后的社会形势要稳定得多，在很大程度上，这是西班牙将皇权下放给了地方团体与贵族阶层的结果。1556年，查理五世退位，将西班牙的统治权移交给了腓力二世。他的禅让是有意为之，而非被逼无奈。1591年，阿拉贡发动了叛乱，规模不大且很快被平息下去。起义军大多是由卡斯蒂利亚贵族从他们的领地上招募来的。这次起义表明，此种军事资源一直以来都颇为重要，1580年由贵族组建起来的，

助国王攻打葡萄牙的援军正是这种军事资源的典型体现。

帝国的目标

截至1535年，查理五世（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的帝国从新占领的秘鲁一直延伸至德国与奥地利，而西班牙刚刚在1533年占领了位于秘鲁的印加帝国首都库斯科。查理的个人目标对整个帝国的运作方式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与其他王朝一样，对于头衔与荣耀的考量会影响君主的决定，当需要优先处理的几件事产生冲突时，这种考量也有利于解决问题。王朝的目标是世代相传的。例如，16世纪，如果阿拉贡国王费尔南多没有追随祖先的脚步，在意大利西部逐利而为的话，西班牙之后可能仍处于法国的势力范围内。这种可能性在16世纪20年代与17世纪40年代，都有可能化为现实。如果它真的实现了，势必危及西班牙在教皇面前的地位。

在统治意大利方面，费尔南多的外孙查理五世显得更加笃定，他也确实成功统治了意大利。查理的雄心壮志主要在于获取尊贵与荣耀，但不仅限于此。他继承了哈布斯堡、勃艮第、阿拉贡与卡斯蒂利亚四个家族的属地，这对于他征服意大利十分重要。在他做决定时，他的名声是一个极为关键的考量因素，尤其是在解决多个领土间优先级产生冲突的问题时。在这方面，查理延续了其前辈的做法，强调声望与地位。对王朝荣誉与王朝使命的强调导致他在政治文化上大胆激进，毫无温和可言。这一风格也见于那个时期的房屋与教堂，例如，格拉纳达的查理宫殿，以及塞维利亚查理五世宫殿的房间。

作为教会在新大陆的传播者，查理展示出了西班牙君主制在全球的新影响力。教会传播者这一角色始于查理外祖父母统治时期，其具体表现可参见塞维利亚阿尔卡扎尔宫审判院内悬挂的那幅《航海者的圣母》画作。这幅祭坛装饰画（retablo）出自阿莱霍·费尔南德斯之手。画中的圣母用自己的斗篷庇佑着西班牙的征服者与船只，查理也在受保护者之列。1556年，查理退位后于尤斯特修道院中安度晚年，直至1558年去世。他的儿子腓力二世（1556—1598年在位）在马德里附近建造了埃斯科里亚尔王宫，王宫内皇家陵墓入口上方用浮夸的拉丁语铭文称赞查理为“最尊贵的独裁者”。西班牙的影响力跨越大洋，因此命定扩张论与普济主义也变得日益重要。与此同时，有人称腓力二世晚年时期的政策除了具有救世主般的帝国主义色彩外，传统王朝政治的意味似乎更为明显。

西班牙的海上力量并不仅限于越洋方面。虽然为了保存海军实力，国家需要接受诸多限制，但是这些限制并未引起腓力二世足够的

重视。西班牙仍能在大西洋与地中海水域供养大型舰队。各种类型的海洋环境与相应的任务所带来的挑战是巨大的。因此，在腓力二世统治时期，西班牙将舰队调遣至亚速尔群岛、地中海东部、塔古斯河、英吉利海峡、北海，以及更远的水域。对16世纪末的西方列强来说，西班牙的这一部署可谓与众不同。西班牙在资源调动方面的独特之处，既体现在资源挖掘的深度上，也反映在非比寻常的广度上，而且海、陆两方面均有涉及。因此，在多个地域空间内，西班牙都是一股重要的军事力量。但在同时，它也不得不承担大笔开销，且树敌众多。

地中海强国西班牙

西班牙长期以来与摩尔人为敌这一主题，逐渐演变成了西班牙人与奥斯曼人之间的斗争。彼时，这一主题已成为西班牙历史、民族身份与意识形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佛朗哥呼应了这个主题，并将其转化为与现代性之间的矛盾。

继1492年战胜格拉纳达之后，西班牙人自诩为新“上帝选民”，由于地中海的屏障业已清除，他们开始加强对北非的征讨力度。16世纪伊始，奥斯曼人尚未在地中海西部站稳脚跟，反之，他们即将出现在今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的海岸上。另外，西班牙军队久经格拉纳达战火的淬炼，而它的北非对手们却不堪一击、四分五裂。梅利利亚镇在1497年被攻破，米尔斯克比尔是在1505年，奥兰是在1509年。而对布日伊、的黎波里与阿尔及尔的佩尼奥岛（Peñón de Argel）的占领则迫使阿尔及尔于1510年臣服于西班牙。

16世纪20年代，由于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将他的大部分（尽管远非全部）注意力放在了自己身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身份上，所以西班牙在地中海地区的境遇反倒急转直下。这揭开了西班牙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时期陷入长期困顿的一页。查理五世将更多资源用在与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战斗上（比如，发生在意大利地区的战斗），而不是用于与奥斯曼帝国一较高下，这种情况在陆地上尤为明显。

16世纪20年代那十年，正是查理五世在帕维亚力挫弗朗索瓦一世（1525年），并取得一次决定性胜利（1529年）的阶段。与其他战事相比，1529年的胜利更具决定性意义，因为这次取胜带来了更长久的和平。但是，王朝权力模式的特点是：家庭利益和个人意志要与统治疆域内的集体力量形成联动。在对法作战以及其他一些情况中，我们不知道如何更好地去定义“西班牙”，也不知道如何更正确地去看待

西班牙的复合君主制。而这一问题也将会在日后关于西班牙国家地位的讨论中反复出现。例如，西班牙从那不勒斯、西西里岛获取军事支持的能力，以及从热那亚、托斯卡纳与马耳他骑士团等委托人兼同盟国那边获取资源的能力，称得上是“西班牙”的实力吗？这些能够用来解释西班牙的民族身份吗？

尽管查理五世对各类事务的优先级排序值得人们关注，但也应看到，他仍在对抗法国、奥斯曼的战役中部署了联军力量。因此，我们很难界定当时的西班牙。16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西班牙不仅投入了大量的物资与军力用于在地中海地区与法国作战，还要在与奥斯曼人的战争中坚守匈牙利边境。此外，查理五世之所以要与弗朗索瓦一世争夺意大利，是因为想要实现外祖父阿拉贡国王费尔南多与祖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米利安一世的遗愿。

反之，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地区的势力日益强盛。1517年，帝国迅速夺取了埃及。这场完胜尤为重要，因为它极其有力地巩固了奥斯曼海上强国的地位，同时，尤其是在埃及农业和商业的帮助下，奥斯曼帝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得到了保证——这正是奥斯曼人称霸地中海的坚实基础。事实证明，这一基础对于帝国将自己的影响力投射到更西的北非地区意义重大。此外，由于奥斯曼帝国的直接控制取代了当地政权，西班牙人被迫处于守势，打了一场防御战，被动地保住了自己的据点、势力范围以及与意大利之间的海上联系。西班牙在北非的影响力远不及奥斯曼帝国，而且要想保住自己的地位，西班牙还得付出巨大代价。北非巴巴里“海盗”劫掠了西班牙海岸，尤其是南部的海岸。为此，西班牙加强了防御工事。例如，在卡洛斯一世与腓力二世统治时期，直布罗陀海峡修筑了防御工事。1524年，人们在清真寺原址上建造阿尔梅里亚大教堂时，加建了防御工事。

1534年，奥斯曼帝国将突尼斯从支持西班牙的统治者穆莱·哈桑（Mulay Hasan）手中夺了过来，这引发了查理五世在1535年的军事行动。查理为了自己的名声，甘愿以身试险，御驾亲征，如此一来就更容易号召贵族参战。大批西班牙贵族加入到战斗中。这次远征调动了82艘战舰以及3万余名士兵。军饷主要来自从热那亚银行家处获得的贷款，而来自美洲的印加黄金则被用来偿债，西班牙转移资金的能力体现了其军事系统的一个重要方面。远征军在酷热天气下发动进攻，展现出水陆两栖作战的能力，而且，他们还在陆上作战中取得了胜利。戈利塔堡垒位于突尼斯湾入海口处，虽有奥斯曼驻军重兵把守，但仍被西班牙远征军团团围住。一周后，附近的突尼斯被攻陷。遵循西班牙在美洲地区（尤其是中美洲）保留印第安贵族阶层的模式，查理五世在突尼斯任命了一位亲西班牙的摩尔人统治者，而军队

则继续驻扎在戈利塔。一张编织于1554年的法兰德斯壁毯记录下了查理的胜利，这张壁毯悬挂在塞维利亚王宫内哥特风格的卡洛斯五世王宫中。

巴利亚多利德

巴利亚多利德位于西班牙北部（古卡斯蒂利亚）两河交汇处，由一个前罗马与罗马时期的小定居点发展成重要的卡斯蒂利亚权力中心以及商业、制造业城市。1469年，阿拉贡王子费尔南多与卡斯蒂利亚公主伊莎贝拉在此喜结连理，并将巴利亚多利德定为王国的新首都，取代了旧都布尔戈斯。1561年，在腓力二世统治下，马德里取代巴利亚多利德成了首都，不过后者在1601—1606年又短暂地重获首都地位。当时迁都的部分原因在于人们对腓力二世统治的反抗。失去政治权力意味着没落，而没落又限制了城市的发展。巴利亚多利德城中留下了许多建筑杰作，包括马约尔广场（主广场）与未完工的大教堂。巴利亚多利德是西班牙文艺复兴风格雕塑艺术的中心，人们可以在那里看到阿隆索·贝鲁格特（Alonso Berruguete）与胡安·德·朱尼（Juan de Juni）的作品。

正统宗教

西班牙占领格拉纳达后不久便出现了宗教迫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认为正统宗教对政治忠诚与君主权威来说至关重要。1492年，阿拉贡与卡斯蒂利亚的犹太人获命在皈依基督教与被逐出境二者之间择其一。只有三座犹太教堂躲过了这场驱逐犹太人的劫难，其中两座在托莱多，还有一座在科尔多瓦。它们得以幸存的唯一原因就是这三座犹太教堂被改造成了基督教堂。犹太人的墓地也被破坏，被建于其上的其他建筑物覆盖。人们如今还能参观的昔日犹太区有科尔多瓦犹太区、塞维利亚的巴里奥圣克鲁斯，以及卡塞雷斯犹太区。

1502年，卡斯蒂利亚（阿拉贡并非如此）的摩尔人也面临着相同的抉择，但是离开王国的条件让流亡变得异常艰难。1526年，阿拉贡与巴伦西亚也竞相针对摩尔人发布了相似命令。因此，生活在西班牙的摩尔人即穆德哈尔人的身份结束了。16世纪，格拉纳达强迫人们改变宗教信仰，同时也实行了文化控制。1501年，格拉纳达举行了一次大火焚烧阿拉伯语书籍的活动。清真寺要么被毁，要么被改建成教堂，要么是这两种情况的结合。龙达清真寺的宣礼塔被改建成了教堂的钟塔。改建后的教堂仍保留了原清真寺的马蹄形拱门。特鲁埃尔长

期以来是穆德哈尔艺术的中心，那里的清真寺在1502年被关闭。

其他少数民族与非正统宗教团体同样遭受了迫害。罗姆人被放逐到阿尔马登的水银矿上从事强制性劳动，因为白银的生产需要用到水银。还有些人被迫在桨帆船上做苦力。

光改变宗教信仰是不够的。西班牙还通过了纯正血统法规，限制犹太改宗者，使他们不能获得某些特定的荣誉与职务。西班牙国内对摩里斯科人（表面上改变信仰的摩尔人）的严厉态度可以与他们对奥斯曼人的斗争相提并论。1568—1571年，格拉纳达的摩里斯科人起义反抗限制他们语言与传统服饰的禁令。他们从奥斯曼人那里寻求帮助未果，反而遭到残酷镇压。大批起义军被屠杀，部分是被西班牙贵族阶层召集的军队所杀害的。

这种社会动员反映出天主教独裁意识形态规范的强制性。在西班牙乡村地区，人们想要贯彻落实特伦托会议（1545—1563年）制定的改革方案的意愿非常迫切。16世纪六七十年代，这种强烈意愿受到宗教裁判所、宗教法庭的推崇，但各种改革推进的速度与程度仍有差别。持异见者遭到了苛责。例如，1568年，一个名叫卢克雷西娅·德·莱昂的女婴出生于一个平民家庭。自少女时期起，卢克雷西娅就能通过梦境进行预言，支持者认为她是得到天启的先知。她的梦批判了腓力二世的统治。1588年，在三场梦中，卢克雷西娅都看到了一条七首恶龙——代表着七宗罪，它口喷火焰，大火席卷了西班牙。腓力二世命令宗教裁判所以异端邪说与煽动叛乱罪将她逮捕。卢克雷西娅遭受酷刑，之后被关进女修道院。宗教裁判所的主要职责就是确保基督教的正统性。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在阿拉贡王国的土地上，在宗教裁判所授意下频繁开展的信仰行动（火刑）在当时很受欢迎，因为受罚的大多是外来者。巴伦西亚王国的宗教裁判所试图压制基于错误教义的极端暴行，这种做法受到了人们的称许。到了18世纪，宗教裁判所依然展现出了吸纳新成员的惊人能力。与此同时，宗教上的紧张局面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与危机感让人精疲力竭。

在世界范围内，西班牙支持符合天主教利益的事业，尤其是在法国、不列颠群岛与神圣罗马帝国。天主教耶稣会或曰耶稣会士的创始人依纳爵·罗耀拉就是西班牙人。人们可以在吉普斯夸探访他出生时神圣场景的遗迹。

帝国负担重重

在当时，全球范围内，没有哪个国家的成就能与西班牙帝国的相提并论。西班牙活动范围大，引发了许多问题，帝国任重道远。在某种程度上，这就解释了长期以来西班牙对军事外包日益深重的依赖，以及对私有资源与资本的倚重——这么做都是为了维持西班牙的军事活动。和敌人相比，西班牙之所以能够更好地处理大规模、旷日持久的战争所带来的全新挑战，是因为西班牙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新大陆的银矿、信贷、作为复合君主制国家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以及利用“潜移默化的影响”从其他国家吸纳资源的能力。这些优势掩盖了近代早期西班牙的效率低下。

自16世纪70年代中期始，西班牙搁置了自己与奥斯曼帝国的冲突，因为它企图在发生于西欧的法国宗教战争（1562—1598年）中占据主导地位。西班牙重新占领了大部分低地国家，在最开始成功介入宗教战争，力挫英国对西、葡统辖的新大陆地区的进攻，以及对意大利进行了持续统治，这些均表明，西班牙当时即将到达前所未有的权力顶峰。

因此，认为西班牙到16世纪90年代已是强弩之末的观点是错误的。

歌剧的误导：《唐·卡洛斯》

基于弗里德里希·席勒的戏剧《西班牙之子唐·卡洛斯》（1787年），朱塞佩·威尔第创作了歌剧《唐·卡洛斯》（1867年），该歌剧以真实性著称。也许是因为近亲繁殖，卡洛斯性情反复无常，在1562年他从台阶上摔下来之后，其性格问题更为严重了。1568年，作为腓力二世继承人的卡洛斯王子（1545—1568年）在准备逃离王宫时被自己的父亲逮捕，不久后就去世了。

为抨击腓力二世，人们很快开始围绕卡洛斯之死编造各种传闻，将卡洛斯刻画成一个秘密的新教徒与主张荷兰自由的人。此外，他还与自己年轻的继母伊丽莎白·德·瓦卢瓦有染，最后他被毒杀。然而，这些说法都无稽可考。在歌剧中，卡洛斯庄重承诺献身自由事业，还带着一队佛兰德人代表面见腓力二世，然而腓力二世拒绝了他们获得自由的请求。歌剧描绘了马德里的一场对异教徒的公开火刑，处刑时响起了一个天籁般的声音，呼唤着受刑人的灵魂升至天国。宗教法庭的大审判官强烈要求处死奸夫卡洛斯，而查理五世的亡灵却支持卡洛斯。

与此同时，战争的各项成本空前昂贵，并最终引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拖欠贷款的结果包括将负担转移至银行家头上，这还意味着债务的强制重新安排。战争严重扰乱了政府的经济状况、财务系统与贸易。

此外，在腓力二世统治下，西班牙难以将军事成就转变为政治和解。对他而言，向低地国家、不列颠群岛与法国做出妥协太困难了。在他看来，宗教的正统性是由上帝、王朝、政治与他个人共同提出的必然性要求。

与上述情况相反，西、葡共同的天主教信仰帮助腓力二世顺利接管了葡萄牙。一方面，他大肆行贿；另一方面，1580年，他发动了一次成功的陆海侵略战。在此之前，他在巴达霍斯检阅了即将进攻葡萄牙的军队。人们愿意保持各机构权责分明，维持其独特的习俗与特权，这也有助于腓力的接管。1578年，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安在自己发动的愚蠢的摩洛哥侵略战中阵亡。没有了塞巴斯蒂安这个强敌，同时又因腓力二世的母亲是葡萄牙的伊莎贝尔公主，于是他得以顺利地继承了葡萄牙王位，成了葡萄牙国王腓力一世。在这场葡萄牙王位争夺战中，英国支持的候选人安东尼奥缺乏号召力。伊比利亚半岛在1470年由四位统治者分而治之，尽管在1580年，腓力二世作为统治者一统半岛，但并未直接将西班牙与葡萄牙合二为一。这不仅仅是腓力的审慎之举，也反映出影响统治者与精英阶层的的正统主义思想有多么根深蒂固。腓力随后于1582—1583年攻下了亚速尔群岛，但在1588年他的海军败于英格兰。尽管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失败被人视为出于神的干预，但实际上，英国在葡萄牙与加勒比海地区的攻击，对西班牙帝国主体体系的损害并不致命。

然而，英国还是给西班牙带来了不少伤害，其中最突出的是1596年的英荷联合军事行动。由6000名士兵组成的英国与荷兰联军突袭加的斯，那里的西班牙军舰虽有城中火炮支援，但指挥有力的英荷联军仍奋力攻入了西班牙把守之下的泊地，继而成功突围登陆。随后，英荷联军在猛攻下夺取了缺乏防御工事的加的斯。在这场战役中，英国海军炮手的实力发挥了关键作用。联军从城中及商船上获得战利品的愿望，强有力地驱使着士兵与水手们英勇作战。

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

它是西班牙历史之旅必游之地。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是位于马德里西北30英里（合48千米）的一处皇室遗址，靠近埃斯科里亚尔镇。遗址的官方名称是圣洛伦索皇家修道院。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将其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这里曾是皇家宫殿兼修道院，这种结合是出于腓力二世的要求。他选定来自托莱多的胡安·包蒂斯塔（Juan Bautista）担任皇家建筑师，负责整体设计。腓力二世想通过这一地点来展示西班牙作为基督教卫道士的地位。1567年，皇家建筑师去世后，工程交由胡安·德·埃雷拉（Juan de Herrera）负责。此地后来也成了皇陵。1563年建筑奠基，1584年工程完工。

关于建筑的长方形平面设计，众说纷纭。有人说这是为纪念当年在烤架上被活活烤死的圣洛伦索，也有人说这是在模仿所罗门圣殿，因为腓力二世对所罗门极感兴趣。

虽然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主要由灰色花岗岩建造，冷清无趣，但是它十分宏伟壮观，而且还藏有许多艺术杰作。这里的图书馆尤为著名。更符合腓力二世时代人们的品位的是，这座修道院收藏着全世界最多的圣教徒骨殖，共计约7500块。1598年，腓力二世在埃斯科里亚尔去世。

西班牙面临多方面的经济负担，包括黄金生产、赋税与借贷。在黄金生产方面，美洲的地位格外重要，尤其是在今玻利维亚建造的波托西大型白银生产中心。此外，墨西哥也是主要的白银生产中心。在西班牙与西班牙统治下的意大利，尤其是那不勒斯地区，税收负担沉重。事实证明，当时的国际信用制度对西班牙体制的正常运作起到了关键性作用。通过德国与意大利，尤其是奥格斯堡与热那亚的银行家的帮助，西班牙可以发掘出银矿与赋税的潜在财富。事实上，当时一系列区域经济体的合并对帝国的成功而言意义深远。然而，1557年、1596年政府破产，或曰中止债务清偿，使银行家受到了影响。这些情况迫使银行家重新协商贷款。与此同时，债务证券（juros）的出售使更多的人对西班牙政府体制负有责任。

农业与采矿业曾是财富的主要来源，财政与信贷则与贸易相关，对于需要向士兵与承包商支付现金酬劳的统治者来说，信贷与贸易显得尤为关键。但是，西班牙经济并未从黄金的流入中取得巨大收益，因为流入的黄金被用于资助国外其他地方的活动，而非用于西班牙国内。在西班牙工业中，成品的出口这一环节并未得到发展。相反，黄金与羊毛一道作为原材料出口国外。此外，将税收转移给外国银行家的做法削弱了西班牙对征税的控制，同时也降低了征税所能给西班牙国内带来的收益。

回首往事

在这一时期，各机构与团体为宣扬各自的主张，纷纷大量引用历史，特别是延续了中世纪杜撰编年史的惯例。这些作家似乎认为他们的作品可以载入史册。例如，16世纪90年代时备受瞩目的，由朱利安·佩雷斯（Julían Pérez）撰写的虚构编年史明确表示，托莱多的莫扎勒布人持有坚定的基督教立场，同时也使托莱多在西班牙的历史中更加引人关注。

1595—1606年，在格拉纳达附近的洞穴中，《圣山铅书》（*Lead Books of Sacromonte*）得以出土。这些刻在铅板上的文字也是古为今用的伪造。它明显是想展示在腓力二世的统治下，西班牙基督教徒与异教徒可以共同生活。在16世纪的西班牙，舆论对“真正的基督教徒”的强调也许鼓励了人们的造假行为，因为这种伪造可以证明莫扎勒布人与摩里斯科人的特殊处境是合情合理的。

更近些的时代，情况也是如此。佛朗哥政权在回顾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以及费尔南多与伊莎贝拉统治的同时，开始模仿这些君主虔诚的天主教信仰、领土扩张主义与种族主义思想。16世纪看似是个黄金时代。1949年，佛朗哥主持修复了当年查理五世颐养天年的尤斯特修道院。在半岛战争中，这座修道院曾被付之一炬。如今，游客可以参观该修道院，包括其中的查理套间。此外，佛朗哥将埃雷拉式建筑[15]树为标杆。实际上，这种对昔日辉煌的留恋由来已久，关注1898年美西战争中西班牙惨败的人就曾对西班牙的今昔进行了一番对比。

生活的真相

当时的生活状况整体上还是颇为严峻的，而且实际生活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价值观有着云泥之别，就像中世纪实际生活离骑士精神相差十万八千里一样。这种情况在整个欧洲都很普遍。实际上，不单单西班牙如此，当时整个世界都是这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本谈论西班牙的书应该略过这些细节，相反，这些细节对于人们理解过去西班牙的生活来说十分关键。对大多数人而言，卫生与饮食是主要问题。居住条件，尤其是同床共寝的习惯易导致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导致这一问题的直接原因是私人空间的缺乏，而从本质上来讲，原因在于住宅有限。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西班牙，虱虫的滋生与生活环境的拥挤、洗浴设施的不足，以及不换衣服的习惯有关。清洁指的是穿戴干净的衬衫与亚麻衣物，而不是清洗，但是，能同时做到这两点的人只占少数。无论贫富，人类在面对自然界的各种生物时，无论对方是虱子、臭

虫、跳蚤还是绦虫，人几乎毫无招架之力。

清水洗浴的习惯必定受到了很大限制。动物、粪堆距人过近，也带来了问题。与欧洲其他国家一样，西班牙保存而非清除排泄物。人畜粪便被集中起来用作肥料，这是改善土壤地力的重要补给。但是，这种肥料通过污染水源等方式，对人体健康造成了威胁。从无排水设施的厕所与动物棚圈中溢出的污水流过街道，留在地表，渗入地下，透过带孔的墙壁流入室内。斑疹伤寒就是由此引发的。

在这些建于罗马时期的城镇中，街道上没有公共饮水机与公共自来水是一个问题。同时，在西班牙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在没有深水井的沿海地区与低地地区，获取清洁的饮用水也成了问题。河水往往泥泞混浊，而抽出来的水很可能已被污染。这种情况解释了为何在西班牙及欧洲其他区域，发酵饮料的地位如此重要。

这也再次提醒我们，西班牙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欧洲史。与其他地区一样，营养不良会降低人体免疫力，使传染病更易传播。此外，营养不良降低了人们的性欲，限制了人类活动，阻碍妇女成功受孕。而且，长期营养不良，人的性成熟时间会被推迟，最终致使女性不孕。食物短缺与食品价格带来的问题导致大多数人即使在食物充足时也无法均衡膳食。日常饮食对城市贫民来说是个突出问题。他们觉得水果、蔬菜价格昂贵，更别提鱼、肉了。他们常常衣衫褴褛。农民很少吃鱼、食肉。

引发疾病的不仅是营养问题。恶劣天气（以寒冬为典型，但不局限于此）会降低人的抵抗力。缺木少薪，再加上大多数住宅既潮湿寒冷，又拥挤肮脏，使情况进一步恶化。

疫病的持续会使得体弱者特别容易患病。真正的婴儿杀手是产褥热，直到19世纪，人们才了解它的成因。但是，在饥荒与疾病中，政治社会因素也影响深远。生存危机不仅仅是食物供不应求造成的，也有西班牙资源明显分配不均，政府作为有限等方面的原因，无论宗教慈善团体在多大程度上弥补了政府的缺失，都无法抹消其造成的损害。

在个体层面上，人们面对着充满敌意、变化无常的环境，只能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结果，多年的努力可能在顷刻间就被席卷一空。自力更生与灾难缠身，清贫朴素与一贫如洗之间的界线可能会被轻易、快速地跨越，而且屡见不鲜。大多数人几无资产，这种情况直至20世纪下半叶才逐渐消失。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并未记录下当时恶劣的工作环境。例如：捕鱼业充满危险；许多生产工艺品的作坊与工厂，包括绘画、手工艺品与建筑生产所涉及的场所，往往又潮又湿、通风不良、采光不好，要不然就是不安全；工人暴露在有害物质（例如铅和水银）之中，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而且建筑工程也十分危险；磨工在布满灰尘、喧嚣嘈杂的环境中工作，时常受到虱子骚扰，多患哮喘、疝气与慢性背部疾病。人们几乎不懂健康与工作场所安全的概念，因此也就无法理解其中的问题。

农业生产深受恶劣天气与疾病之害。改良作物品种很少，且冬季多雨易致作物病变、肿胀，晚霜又会侵害小麦与其他庄稼。没有杀虫剂，庄稼的保护与食物的储存困难重重。在当时，这些都是严重的问题。鼠患成灾。此外，动物健康也是个大难题。兽医学还处于原始阶段，当时的惯常做法是屠宰患病动物并限制其活动自由。真实的生活常常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中。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西班牙生活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今天依然存在。人们适应了各种环境。例如，在西班牙大部分地区形成了迁移性放牧的主要模式。又如，每年人们都会聚集起来，利用古老的陷阱技术（almadraba）在塔里法与加的斯之间的海滩上捕捞金枪鱼。

文化

在有“黄金世纪”（Siglo de Oro）之称的16世纪，西班牙的光辉伟绩在文化上留下了各种烙印。西班牙文化受到了国外的影响，比如，引入了文艺复兴文化的许多方面。同时，西班牙文化也强调本土风格。例如，秩序井然的塞哥维亚主教座堂建筑群中的简化哥特式风格，以及银匠风格（plateresque）。银匠风格是对西班牙化文艺复兴风格的发展，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此种风格精美繁复，如银器装饰品一般。此外，西班牙本土风格也见于查理五世统治时期。人们能在萨拉曼卡看到一些本土风格的建筑典范，尤其是学校庭院。这种风格与格拉纳达查理五世王宫中那种更为庄重朴素的意大利式文艺复兴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胡安·德·埃雷拉在设计建造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时，推动了西班牙古典主义的发展。

穆德哈尔风格依然占据着重要地位。这种风格体现了人们利用摩尔人艺术装饰的影响。而且，采用这种风格的大多是在基督教徒统治下未改宗的摩尔人。但是，他们按照阿尔摩哈德或纳斯瑞德风格对穆德哈尔风格进行了加工，或者说，他们从内容更为宽泛的阿拉伯风格

中汲取灵感，譬如使用了几何图案与花砖（azulejo）等。这种风格在13世纪的塞维利亚得到了发展。这些釉彩瓷砖最初是仿照罗马马赛克的形式而来。穆德哈尔风格（该术语发明于1859年）在本质上是用摩尔人艺术装饰手段，来美化在较长时间内建成的前后风格迥异的建筑物。游客可以在西班牙各地的修道院与宫殿中看到木质的方格天花板，还可以在塞维利亚的彼拉多官邸中看到同类的瓷砖画花砖。彼拉多官邸是一座文艺复兴时期的宫殿，与意大利的同类建筑截然不同。

由于这些风格依次出现，以及建筑工程耗时过久，导致重要建筑物往往是多种风格的混合体。巴达霍斯地区就出现了这种情况，那里的大教堂是哥特与罗马式风格的典型建筑。

西班牙是外国工匠与艺术家神往的地方，它也为国外的艺术风格提供了展示机会。这些都使西班牙从中受益。例如，埃尔·格列柯（原名多米尼克斯·希奥托科普罗斯，1541—1614年）自1577年起就移居至托莱多，直至去世。意大利的画家以及像埃尔·格列柯这样在意大利工作的人，为西班牙艺术的进化，尤其是风格主义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使风格主义具备了表达精神感受的能力。埃尔·格列柯使用大量的颜色与形状，创造了一种独特风格。同时，他也对建筑与雕塑感兴趣。人们可以在托莱多的老圣多明各修道院看到他的祭坛画。托莱多的埃尔·格列柯故居博物馆内收藏着《托莱多风景》，还有格列柯创作的同时代人以及圣徒的画像。托莱多大教堂收藏了格列柯的重要作品，尤其是《剥去基督的外衣》，画中的基督被剥去了衣服。普拉多博物馆收藏着他的《圣安德鲁与圣弗朗西斯》。

16世纪，祈祷音乐也有了重要发展，其代表是维多利亚（1548—1611年）的作品。抒情诗、流浪汉小说与戏剧事业蒸蒸日上。戏剧方面以剧作家洛佩·德·维加为代表。他的作品有《羊泉村》（创作于1612—1614年，发表于1619年）。剧中，费尔南多与伊莎贝拉赦免了杀死卡拉特拉瓦骑士团指挥官的村民们，因为这位指挥官胡作非为，强取豪夺。这部戏剧是根据1476年一个卡斯蒂利亚村庄发生的真实事件而创作的。

当时的宗教影响力相对明显，正如人们在阿维拉修女圣特蕾莎（1515—1582年）那些充斥着神秘主义的作品中所看到的那样。这位加尔默罗修会修女的主圣殿是位于阿尔瓦-德托梅斯的圣母领报修道院。她就是在那里去世的。特蕾莎的作品包括《灵心城堡》、她的自传，以及《圣德之路》。《灵心城堡》是一部指导人们修养灵性，并最终实现与上帝的神秘结合的书。

英国戏剧中的西班牙

托马斯·基德（1558—1594年）算不上家喻户晓，但他最广为人知的剧作《西班牙悲剧》还是颇有影响力。剧本首次出版是在1592年，后于1594年、1599年、1602年、1610年、1615年（两次）以及1633年在伦敦再版。1593年和1597年，这部剧在伦敦上演，并成为热门剧目，极为有力地塑造了西班牙在英格兰的形象。1601年和1602年，这部戏剧再度被搬上舞台，还被改编为德语版与荷兰语版。这出复仇悲剧讲述了一个寻求正义受挫，最终以谋杀收场的故事。主线情节是葡萄牙对西班牙的一次反叛，以及西班牙皇室的不公不义。剧中国王的侄子洛伦佐是个背信弃义的杀人犯。《西班牙悲剧》中的戏中戏启发了威廉·莎士比亚，他在《哈姆雷特》中也运用了这种手法。《西班牙悲剧》最终以五人死亡收场，加剧了人们对西班牙王宫的敌意。人们觉得在那里欺骗是底色，谋杀也频繁上演。剧中提及了西班牙无敌舰队。

莎士比亚在他创作的戏剧作品中更多地提及法国，而非西班牙，但也会偶尔提到后者。莎士比亚的《爱的徒劳》大约创作于1594年或1595年，当时正值英格兰与西班牙交战之际。剧中刻画了一位名叫唐·亚马多的求婚者，纳瓦拉国王费尔南多是这样评价这位自命不凡的吹牛大王的：

一位举止优雅的西班牙旅人；
集世界各地奇腔异调于一身，
脑中古怪词语取之不尽；
音如和声，舌灿如莲，
自觉婉转，沉醉其间；
善于折中，对错因势而判；
自命不凡的儿男。

在《错中错》里，来自锡拉库扎的德洛米奥以国家为喻，尖酸刻薄地对厨娘内尔评头论足，逐条列记她的缺点，说她“吐出的气热烘烘”如西班牙一般，还说“西印度群岛的奇珍异宝就在她的鼻子里，要派出大批西班牙舰队去装载才行”。

第六章

盛极转衰的帝国统治，塞万提斯早有预言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堂吉诃德》恰恰喻指着西班牙的衰落。

历史学家常将堂吉诃德持矛攻击风车的形象作为不切实际的西班牙为追逐荣誉而不自量力的象征。这个引人注目的形象广为人知，小说一再重印，颇具启发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部小说恰恰喻指着西班牙的衰落（即使还算不上是崩溃）。人们觉得西班牙王国在1598年建立起来的全球霸业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被法国、英格兰与荷兰瓦解了。此外，在广大历史学家口中的“17世纪中叶危机”期间，腓力四世（1621—1665年在位）面临着多次动乱，尤其是1640年葡萄牙与加泰罗尼亚的反叛。葡萄牙起义的结果是取得了独立，而西班牙在付出巨大努力后最终重新占领了加泰罗尼亚。随后，西班牙在路易十四统治的法国面前显然相形见绌。此外，人们觉得西班牙无法解决经济、社会与文化领域的权力斗争与现代化问题。

第八章　堂吉诃德英勇战风车奇幻记及其他

此刻，他们看见田野里有三四十架风车。一见风车，堂吉诃德就对侍从说：“命运的安排真是出乎意料地好。看那儿，桑乔·潘萨兄，那里有三十多个骇人的巨人。我要与他们决斗，一个活口不留。有了这些战利品，我们可就发财了。这是场正义的战斗，将这些怪胎从地球上清除可是为上帝除害。”

“巨人在哪儿？”桑乔·潘萨问。

“就在那儿，”堂吉诃德回道，“就是那些长臂怪，有的臂长近两里格呢。”

“阁下，您看，”桑乔说，“我们见到的并不是什么巨人，那是风车。而且，那些长得像长臂的东西是风车翼，风转动风车翼之后才能推动石磨。”

堂吉诃德说：“看得出来，在历险方面你还是个门外汉。那些就是巨人。你要是怕了，就靠边祈祷去吧，我要同他们决一死战。”

（米格尔·德·塞万提斯《堂吉诃德》，出版于1615年）

堂吉诃德是小说的主人公。这部小说的作者是游历四方的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生卒年大约为1547—1616年），小说于1605年、1615年分两部先后出版。这是西班牙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1575年，塞万提斯被柏柏尔族的海盗船俘虏。1597年，身为税吏的他又因私吞钱财在西班牙锒铛入狱。与这位作家一样，西班牙也面临着许多严重问题。但是，其他国家、社会和作家也有各自的麻烦。比如，如果说西班牙的最后一次大型瘟疫结束于1685年的话，那么法国就是在1720年，意大利是在1743年。如果说西班牙经历了17世纪中叶危机，那么英国与法国也未能幸免，它们都在各自国家的内战中吃尽了苦头。西班牙的第一份报纸是在1618年发行的，不过在1627年，国家颁布法律，规定无政府许可不能私自发行报纸。这种严加管控的趋势在其他地方也能见到。

社会

关于西班牙危机的讨论，更多地聚焦于政治上。因此，从社会制度上切入很有意义。无论是在17世纪之内，还是在此前或之后的历史中，西班牙的社会制度都具有相当的连续性。社会分化为不同等级，过去极大地决定了人们现在的权利、地位与势力、财产，尤其是地产。精英阶层对社会的控制是一项不争的政治事实。人们认为继承与稳定是相互交织的，绅士派头与生俱来，而且明显与身份地位及家世有关。社会变迁的速度处于各种手段的严密控制之下，这些手段包括婚姻策略、继承活动与政府赞助。

社会局势紧张，但这并不是说人们对现存的世袭制等级社会普遍不满，也不是说矛盾仅存在于不同阶级之间——同一阶级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有着千差万别的农民阶级与贵族阶层在法律上通常分属于不同的群体，同时他们也有各自内在的差异性。贵族们为了地方政治权力、社会地位你争我夺，农民在自己的群体内部也会互相倾轧。

相对来说，西班牙的权力与财富集中在少数几个家族手中。社会与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系统在本质上是世袭的；经济的主体是农业；在社会与经济事务，或者至少是结构变化上，变革普遍缓慢；统治者与由贵族主导的政府在根本上无意挑战贵族阶层的利益，或者说他们不愿撇开贵族独自施政；还有那个时期种种不平等的设定。所有这一切集聚在一起，确保了权力与财富依然集中且长期不变。社会在整体上是稳定的，尤其是因为大多数的财富要么来自继承，要么来自婚姻。

限嗣继承使庄园得以完整地留存下来。个别贵族家庭并不是因为本身的阶级属性而失去土地，而主要是因为婚嫁或土地售卖。结果土地所有权又流转到其他贵族或新贵手中。这些情况在欧洲普遍存在。

包括虚构的堂吉诃德在内的大多数西班牙贵族都是贫穷的下级贵族。他们权势不隆，财运不济。但与普罗大众相比，下级贵族在权力与财富上仍具有相对优势。那些拥有权力与财富的人往往生来就是贵族，还享有世袭的家族地位。政府活动要征得有权势的贵族同意。这么做倒不是出于宪法的需要，而是因为政府仰仗贵族，才能在区域内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同时，人们也觉得合作是明智的、必须的，它是合法性与政策落地的基础。成功的政府提案通常是那些得到贵族阶层支持、默许或者至少没有贵族从中作梗的。古老贵族家族的人员增选、非贵族官员册封为贵族，以及在贵族统治中担任重要职务的低阶成员的擢升都有助于维持贵族在中央集权统治中的主导地位。政治组织的议会制会导致延宕，但也确保了贵族在国家统治中有自己的代表，确保贵族拥有非暴力的对抗手段。此外，贵族在地方管理中的主导地位既是君主应对贵族在地区实权的务实之举，也与王国的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规范相一致。

贵族，不管是作为一个整体还是个体，对事物的反应均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包括先例、特权、个人利益、传统与新奇观点的相互作用以及政治环境。历史界定了贵族与众不同的地位：个体意义上的过去是指贵族的出身与家庭地位，而集体意义上的过去则指服侍君主以换取贵族特权的往事。

贵族阶层的典型表现形式是赞助关系与亲缘关系。这两种关系将宫廷贵族与首都以外的贫穷贵族联系了起来。宫中贵族社会地位高，还能直达天听。除了大贵族外，大多数贵族都是彻头彻尾的地方贵族。对政府与政治而言，贵族对地方事务的管理至关重要，而且这种管理具有两种表现形式：由贵族控制相关职位，以及将许多本会外流至公共领域的职责分配给贵族。贵族之间也存在对君主赞助的争夺，这可能引发严重的世仇，正如在16世纪70年代、80年代阿拉贡两位贵族之间的争斗那样，一方是总理大臣钦琼伯爵，另一方是身份最显贵的比亚埃尔莫萨公爵。王宫与地方都卷入了这场争斗之中。

贵族阶层对农民步步紧逼，致使他们负担沉重。与此同时，社会中还存在着中产阶级。在农村，中产阶级包括地主代理人与佃农，二者往往存在共生关系。中产阶级普遍渴望在有产社会里飞黄腾达。

城镇

中产阶级构成了城市人口的主流。大多数城镇没有经历显著的增长，许多是在经济与人口统计上仍处于静止状态的交易中心。然而，它们有助于商业与财政方面的基础设施的成形，在此基础之上，城镇才有了急剧、持续的发展。

然而，城镇彼此也会竞争，竞争削弱了它们整体的政治力量。城镇之间的争夺是围绕经济与其他利益展开的，它们都想与政府建立合作关系。城镇作为国家行政与宗教管理部门的所在地，是生产、贸易与消费的中心。它们与乡村内地形成了既合作共生，又剑拔弩张的关系。城镇为乡村内地的商品提供了市场，但它们又时常想严格控制这种关系，尤其是在提供贷款方面。而且，在税务的责任分配上，双方也存在分歧。

然而，如果将城镇与乡村简单地看作对手的话，是有失偏颇的。我们也不应把这些冲突断然视为城乡对立。城乡二者之间存在着重要联系。农民涌入城镇，不光是去市场上做生意，他们还进城赶集，参加宗教仪式。

西班牙的城镇与西班牙社会一样，在本质上是不公平的，而且这种不公平也具有世袭性。城镇居民中人数最少的那个群体就是大富大贵的人。在经济和政治层面上，组织与管理社会其他人员的能力既是权贵们的权力表现形式，也是他们权力的来源。他们的势力延伸至乡村内地。在那里，这些人凭借自己的权力获得重大的影响力，同时拥有了高度的信誉。这些富人通常拥有地产，如果他们同时还在做生意，那么往往控制着乡村工业。在城镇里，这群人可能是雇主或地主。但是，更普遍的情况是，基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对城市管理部门的控制，这些人享有政治权力。这个群体中的一部分也许还拥有贵族身份，尽管不同贵族的地位千差万别。大多数人的收入来源是贸易、公职，尤其是司法职务，以及将财富用于土地投资或有息贷款所取得的利润。

城镇中规模最大的群体是穷人。他们在政治上无足轻重，通常甚至都不是法律意义上的镇民。他们的贫穷源于大多数工作朝不保夕以及有效的社会福利体系缺失这双重作用。当时，即使在最富饶的城镇中，工作也是极不稳定的。大多数穷人身无长技，薪资低廉，而且许多人从事着季节性的工作，或者偶尔才有活干。不少人是从农村来的移民。贫穷使他们易受食品价格的影响。此外，他们的生活环境通常拥挤不堪。一些能够胜任工作的人也常遭苛责。

在富人与贫民两个群体之间——尽管二者在经济上的差别并非如此绝对——存在着第三方，他们享受着比穷人更加稳定的固定收入。

这个群体中的许多人是工匠。他们的经济利益与社会凝聚力通常是以行会或其他工匠互助会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一直以来，社会经济群体中严格实施的内部通婚（族内婚）的模式，使这些工匠难以跻身于商人与地方行政官等精英团体之列。通常而言，工匠相较于零工、仆役与赤贫者而言，融入社会的程度更高，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行会与互助会中的成员身份。市政府与军事教团排斥工匠：在加利西亚，制革工无法担任公职，不能加入行会、宗教协会，也无望成为神职人员。因为市民身份往往意味着城市群体中成员的正当性，所以这种种排斥的意义格外重大。

政治

这个可怕的社会强迫人们服从种族纯正性的观点，信奉宗教，尤其强迫人遵循基于“血统纯正”的严格法律规定。1609年，构成巴伦西亚劳动力大军的摩里斯科人遭到驱逐。种族与宗教上的这种紧张局势始于源远流长的敌对情绪。这种剑拔弩张的局面与更具体的派系斗争有关。例如，1474年，改宗者（改变信仰的犹太人）与大多数老基督教徒在科尔多瓦的街头巷尾展开激战。这场冲突关乎城市与贵族之间的派系斗争。1609年，人们觉得摩里斯科人可能是潜伏的敌方间谍，他们也许会帮助奥斯曼人和北非的柏柏尔诸国。1680年，新墨西哥州的印第安人起义反抗西班牙压迫，起义领袖之前在西班牙镇压印第安宗教的活动中遭受了迫害。这些人的境遇骇人听闻，时人的记录说明了情况，其中有一幅形象生动的绘画，即维森特·卡尔多卓（Vicente Carducho）的《驱逐摩尔人》。

驱逐摩里斯科人是腓力三世（1598—1621年在位）统治时期的一件大事。那是一段艰苦岁月，其中1599年瘟疫肆行时期尤显艰难。同时，那也是西班牙国力强盛的初期。那个时期留下的一个精彩绝伦的形象就是马德里马约尔广场上国王骑马的雕像。在关于西班牙衰弱的记录中，人们常将原因归咎于腓力三世的统治，尤其是他的管理不善。腓力三世不如腓力二世那般勤于政事，他选择向宠臣寻求帮助。这种做法本身无可厚非，但错在腓力三世信任的宠臣并无治国之才。具体而言，这名宠臣就是勒尔马公爵。1618年，勒尔马公爵之子乌塞达公爵取代了他的地位。

腓力四世（1621—1665年在位）的总理大臣是奥利瓦霍斯（Olivares）公爵。他比勒尔马、乌塞达更有才干，但最终，他也没能平息西班牙国内对于一场旷日持久、花费巨大的战争的不满情绪。西班牙在17世纪20年代基本顺风顺水，但是好景不长，这种情况没能持续下去。

1609年，西班牙与荷兰缔结《十二年停战协定》之后，战争的重担有所减轻。局部斗争依旧存在，例如1614年的于利希-克莱沃争端（the Jülich-Cleves dispute），但无全面冲突。然而，全面冲突在1621年出现，西班牙随即陷入接连不断的争斗之中，直到1668年才平息下来。这不仅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压力，行政管理与政治结构和系统也经受着考验。事实上，西班牙的官僚政治显示出了非凡的灵活性、奉献精神与创造力。私人承包商与公务员展开了富有成效的合作。在战舰物资补给方面，森林立法旨在保障原木库存。人们还努力为水手、士兵提供有营养的食物和完善的医疗。同时，战舰上的指挥官与官僚如有过失，将一律受到严惩。

然而，国家财政问题严重。仲裁人、政治家与那些通过写作号召变革的人一道，聚焦财政问题。他们攻击的对象包括操控货币贬值的行为，以及由此导致的通货膨胀。1603年，西班牙铸造了大量铜币。这不仅干扰了财政，还扰乱了经济大局。1635年爆发的全面冲突直到1659年才结束。法国与西班牙均无法给对方以致命打击，战争处于胶着状态。1636年，法国挺过了一次西班牙入侵，但西班牙军队远征至法国科尔比。

战争造成的财政负担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政治问题。西班牙是西欧地区最大的帝国，但是事实证明，在战争压力面前，西班牙的财政、政治与军事体系也是不平等的。1624年，西班牙试图采用军事联盟，即根据西班牙不同地区的人口数量与面积大小组建军队。但是，这个提案被加泰罗尼亚断然拒绝。而且，1627年，西班牙政府破产。1637年，西班牙试图对葡萄牙增税，结果导致葡萄牙起义。1640年，西班牙支持战争以及试图分摊战争开销的做法引发了危机，最终导致加泰罗尼亚大起义。同年，葡萄牙再度成功发动起义。1641年，安达卢西亚密谋脱离西班牙，当地人不是试图立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Duke of Medina Sidonia）为王，就是企图推翻奥利瓦霍斯的总理之位。1648年，阿拉贡也策划了一次类似的密谋。相比之下，1648—1652年，法国面对的内乱是来自权力中心内部的投石党运动。法国与西班牙都想利用对方国内的动乱趁火打劫。法国派出部队前往加泰罗尼亚，利用当地的起义趁机占领了两国之间的鲁西永省。1642年，法国攻陷了鲁西永省省会佩皮尼昂。这次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安感最终导致腓力四世在1643年与奥利瓦霍斯分道扬镳：公爵极不情愿地离任了。他的外甥卡皮奥侯爵唐·路易·德·哈罗（Don Luis de Haro）接替了总理大臣一职，并一直执政至1661年去世。

事实证明，投石党运动为西班牙收复加泰罗尼亚创造了机会。1652年，加泰罗尼亚首府巴塞罗那陷落。在这之前，西班牙围城长达

14个月，导致本已因瘟疫而虚弱无力的人们又受饥饿之苦。西班牙在敦刻尔克附近的沙丘战役（1658年）中败于法国后，双方签署了《比利牛斯和约》（1659年）。和约规定，法国分得鲁西永与阿图瓦。除此之外，年轻的路易十四还赢得了与腓力四世之女的婚约。此举使路易十四有了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的权力。两国在1667—1668年、1673—1678年、1683—1684年，以及1689—1697年战火纷起。西班牙失去了从勃艮第遗产中获得的重要领地，例如弗朗什-孔泰，法国于1674年占领了这里，并迫使西班牙在1678年将弗朗什-孔泰割让给自己。不过，在1697年的和约中，路易十四将前一年占领的巴塞罗那归还给了西班牙。

西班牙人在与葡萄牙的战争中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葡萄牙在1640—1668年的战争中取得了独立，把握住了西班牙在1640—1652年将注意力转移到加泰罗尼亚的时机。1657—1659年，以及17世纪60年代，尽管双方都调遣了大量军力，但是西班牙仍未能重新占领葡萄牙。17世纪50年代末，双方的战争在本质上还是小规模的突袭与洗劫。1657—1659年，西班牙仍与法国及其新盟友英国对战，但自觉兵力不足。虽然西班牙采取各种方法招兵买马，但政府依赖的是合同制，即个体组成小分队以换取报酬。由于政治与军事危机接连不断，加之战事愈演愈烈、伤亡惨重，这种士兵招募方式不堪重负。合同制募兵的成本迅速上涨，西班牙越来越难派出足够的兵力了。法国则站在葡萄牙一边。

1663年，腓力四世的敌人只剩下葡萄牙了。他不仅集中兵力，还招募了一切能招募的人（甚至连罪犯也不例外），以扩充兵力，对抗葡萄牙。结果却兵败阿梅西亚尔。在那里，查理二世派出的英格兰援军加入了葡萄牙人一边。查理二世的妻子是一位葡萄牙公主。两年后，西班牙兵败比利亚维西奥萨，重新占领葡萄牙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战争给西班牙带来了沉重负担，甚至到了不得不备战以抵御他国入侵的地步。在此前的葡萄牙与西班牙共主联邦时期（1580—1640年），人们没必要考虑边疆的堡垒，因此，到1640年，边境上的大多数堡垒都已年久失修。但是，到1710年，经过30多年的努力，罗德里戈已成为当时西班牙防御工事最为齐备的城镇之一。1688年，在另一地，法国使团感叹潘普洛纳堡垒的坚固与现代性。此外，17世纪最后几十年，已经不存在像17世纪中叶时那般激烈的内乱了。而且，在17世纪上半叶经常表达不同政见的卡斯蒂利亚议会，在1665年已被彻底解散了。于是，西班牙再也无法汇聚不同意见，表达不满了。

探索帝国

新大陆的腹地挑战着西方的理解力。方济会修士与耶稣会修士格外热衷于探索发现。1658—1686年，曼努埃尔·别德马（Manuel Biedma）考察了秘鲁东北部，包括乌卡亚利河流域在内的地区。1663年，安东尼奥·德·蒙特沃德（Antonio de Monteverde）探索了奥里诺科河流域。

人们在下加利福尼亚州海岸上建立布道所后，17世纪90年代与18世纪初，开始寻找从墨西哥到加利福尼亚海湾前端的陆路通道。后来，在上加利福尼亚州海岸建立定居点——1761年建立了圣地亚哥，1770年建立蒙特雷，以及1776年建立旧金山——后，更大规模的寻找陆路通道的探索活动开始了。

为宗教而战

政教联系依然紧密，为耶稣而战的传统依旧根深蒂固。而且，人们改变土著宗教信仰的尝试受挫后，便开始对这些异教思想严加监视，且试图将帝国的扩张正当化。1697年，西班牙军队发起猛攻并侵入玛雅部落伊察人（Itzás）的首都诺加佩滕时，时任尤卡坦临时总督的马丁·德·乌苏亚（Martín de Ursúa）命令手下士兵，在伊察人的神庙中立起旗帜，旗上印有代表西班牙王国及其宗教立场的皇家勋章，并宣布“偶像崇拜已经冒犯了上帝的威严”。乌苏亚感谢上帝带来的胜利，然后与士兵和方济会修士一道捣毁了许多“偶像”。如果这些偶像是金制或银制的，就将其熔毁。在西班牙人看来，宗教战争征讨的敌人劣迹斑斑。他们的罪行包括人祭、食人与杀害神父。5年前，当西班牙人在1680年普韦布洛反叛后收复圣菲时，他们也恢复了天主教对那里的控制。方济会修士赦免了当地人的叛教之罪，并为出生于1680年之后的孩子施洗礼，总督还担任了出身显贵的孩子的教父。在为争夺下加利福尼亚州而引发的第一次冲突中，一队装备精良的西班牙传教人马在1697年洛雷托孔乔之战中击退了印第安人的攻击。

在太平洋另一侧，1668年，西班牙调兵遣将在关岛建了一座布道所。西班牙将列岛重新命名为马里亚纳群岛，以显示其宗教作用。在太平洋上再往南的地方，来自菲律宾的西班牙传教士在1710年抵达帕劳群岛，但那里的敌对情绪使刚刚起步的传教活动戛然而止。

宗教矛盾也是西班牙欧洲政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尤其是到17世纪30年代末，天主教统治下的法国在排挤了新教国家后，成为西班牙的头号敌人。相比之下，在17世纪初与17世纪20年代，荷兰与英国曾是西班牙的主要对手。

宗教对于维护王室的私生活与公共形象而言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履行王室的主要职责，即接受宗教教育、参与宗教仪式、从事宗教赞助活动，西班牙王室于公于私均展现出了虔诚的天主教信仰。腓力三世的三子费尔南多虽从未被任命为神父，却成了托莱多红衣大主教（西班牙大主教）。同时，他也是加泰罗尼亚总督、西班牙统治下的荷兰（比利时）总督。而且，1634年西班牙在讷德林根完胜瑞典人时，他还是西班牙军队总指挥。在腓力二世统治期间，马德里新建了17座修道院，腓力三世时是14座。后来腓力四世又在马德里建了17座修道院。

文化

17世纪经历了从古典主义到埃雷拉风格的转向，后者正是大多数17世纪早期作品的基础。例如，巴伦西亚大教堂中殿所采用的风格，渐渐演变为了以萨拉曼卡耶稣会学院塔楼为典型的，17世纪最后几十年间日益流行起来的更加华丽的意大利式巴洛克风格。西班牙式巴洛克风格被称为丘里格拉式（Churrigueresque），该名称取自建筑师荷西·德·丘里格拉（José de Churriguera，1665—1725年），而他的兄弟也设计了18世纪初的重要作品，如萨拉曼卡主广场等。在绘画方面，17世纪出现了从风格主义向自然主义的表现手法与风格的转变。后一种风格也可见于雕塑之中。

17世纪的艺术家

迭戈·委拉斯凯兹（1599—1660年）出生于塞维利亚，父母是信奉新基督教的葡萄牙人。他接受过正规艺术训练。1617年学徒期满后，迭戈遵照行会规定，通过了考试并获得了独立画师执业资格。他早期的作品大多是宗教题材的，诸如《无原罪受孕》《福音传教士圣约翰》与《基督在马大与马利亚家》。这三幅作品均创作于1618年前后，现藏于伦敦的英国国家美术馆。在此阶段，委拉斯凯兹也创作了波德格涅斯风格（bodegones）作品（或曰风俗画），展现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如《煎蛋的老女人》与《卖水的老人》。《酒神巴克斯的胜利》（1628年）是这种风格的变体。

1623年，委拉斯凯兹被任命为宫廷画师，之后就开始专注于肖像画的创作，尤其是腓力四世及其家人的肖像。他的一些作品是关于王室离宫斯布恩莱蒂罗宫（Palacio del Buen Retiro）的，另一些则描绘了阿尔卡扎尔宫的变化。画作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王室的形象。1623年，后来成为英格兰国王的查理一世来到西班

牙向腓力四世之女求婚未果，在此过程中被西班牙王室的这一形象深深触动。

委拉斯凯兹的《布列塔的投降》（1635年）庆祝了西班牙的胜利。画作记录了1625年西班牙成功包围一个重要的荷兰阵地的事。数次游历意大利使他的画技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尤其是在光线的运用方面。也正是在游览意大利期间，1650年，他绘制了杰出的肖像画《教皇伊诺森西奥十世》。在他著名的宫廷生活画《宫娥》（创作于1656年，收藏于西班牙普拉多美术馆）中，人物经过了精心的布局。

《抓虱子的男孩》并没有选用许多画家最杰出的那批作品的题材，但是画家巴托洛梅·埃斯特班·穆里罗（1618—1682年）的这幅创作于1645年左右的画作，围绕画作名称所代表的主题，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对光线的灵活运用，以及对儿童的同情心。穆里罗是家中最小的儿子，他的父亲是塞维利亚的一名江湖郎中。穆里罗的绘画题材广泛，从肖像画到宗教题材作品不一而足。他还在《吃水果的少年》（大约创作于1650年）等作品中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他的许多宗教题材作品均收藏于普拉多美术馆内，例如《埃斯科里亚尔的圣母纯洁受孕》（大约创作于1660—1665年）。其他作品可以在原址上观赏到，例如塞维利亚大教堂内的《帕多瓦的圣安东尼的愿景》。他在为加的斯嘉布遣会教堂绘制主祭坛画时，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几个月之后就去世了。

弗朗西斯柯·德·苏巴朗（1598—1664年）的画作明显反映了宗教情怀的影响。这位出生于埃斯特雷马杜拉，在塞维利亚受训的画师曾效力于教堂与修道院。他所塑造的富有表现力的宗教形象在光影之间、人世与天堂之间达到了平衡。他为塞维利亚皇家圣保禄修道院绘制了多幅画作，其中的一部分在当地的玛利亚·玛格达琳娜教堂中保存了下来。而且，塞维利亚博物馆中收藏着他的杰作《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典范》。苏巴朗为塞维利亚的拉梅尔塞尔-卡尔萨达的圣何西修道院所绘的作品可见于许多美术馆中，包括普拉多美术馆与位于马德里的皇家圣费尔南多美术学院。各种宗教题材他均有所涉及。1634—1635年，苏巴朗应诏来到马德里，为斯布恩莱蒂罗宫作画。他创作了许多战争题材与描绘神话场景的画作，包括《防御英国的加的斯》与《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磨难》。这两幅作品均收藏于普拉多美术馆内。

赫雷兹修道院主祭坛画的主题是宗教历史。这座修道院建于1370年的一处战场上。在那里，西班牙军队在摩尔人的夜袭中幸免于难，皆因一道奇迹般的亮光让埋伏着的摩尔人无处遁形。画作描绘了那场战争，现藏于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苏巴朗为瓜达卢佩修道院所绘的反映15世纪修道院生活的画作现仍保存在原址

处。17世纪40年代，伴随着西班牙的危机，苏巴朗开始为西班牙裔的美洲赞助人作画，完成他们交付的委托任务。然后，在17世纪50年代与17世纪60年代初，苏巴朗回归宗教题材作品。他始终保持着自己对形式、光线与肌理间相互影响的掌控能力。

西班牙统治下的美洲

由于保留着对西班牙及其殖民地而言至关重要的越洋海上航道，西班牙仍是新大陆的霸主。与此同时，它也面临着诸多挑战。1607年，英国在北美洲东海岸的切萨皮克建立了詹姆斯顿殖民地，这被视为对西班牙权益的侵犯，引来了后者的一再抗议。虽然詹姆斯顿的防御工事是为抵御西班牙进攻而建，但西班牙并未进犯：因为弗吉尼亚州离西班牙权力中心太过遥远了。距离该地最近的西班牙据点位于佛罗里达州大西洋海岸上的圣奥古斯丁市。然而，英国、法国与荷兰也在加勒比海地区与南美洲圭亚那海岸上建立起了自己的殖民地。1655年，英国占领了牙买加，而事实证明，人们对占领古巴与伊斯帕尼奥拉岛普遍过于乐观了。

西班牙不得不采取日益复杂与昂贵的手段来保卫自己的殖民地，包括建造防御工事，（如佛罗里达州圣奥古斯丁市的防御工事），以及强化护航制，以保障贸易安全。自相矛盾的是，西班牙开始因加入了联盟体系而受益，尤其是17世纪70年代与90年代，西班牙加入了反法国联盟。当时，荷兰与英国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攻击法国上，无力顾及西属美洲。另外，17世纪70年代，法国舰队集结起来，支持西西里岛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起义，结果这次尝试失败了。相比之下，18世纪，西班牙建立起的反法同盟关系意味着法国易于受到来自英国的攻击。

第七章

王位继承战争与迟滞的工业化进程

“比利牛斯山成了横亘在西班牙与
文明世界之间最明显的屏障。”

托马斯·佩勒姆在西班牙的旅行教育

1775—1776年，出身名门、意气风发的少年托马斯·佩勒姆（1756—1826年）游历了西班牙。他也就是后来的奇切斯特伯爵二世。在这之后不久，随着美国独立战争的扩大化，英国与西班牙在1779年开战了。彼时，西班牙又成了法国的盟友。佩勒姆在马德里逗留了数月。在那里，他受到了自家亲戚——担任英国驻西班牙大使的格兰瑟姆伯爵二世托马斯的热情款待。从马德里出发，佩勒姆又踏上了前往安达卢西亚的旅程，后经格拉纳达、阿利坎特、巴伦西亚与巴塞罗那前往法国。对任何人而言，这都是场不同凡响的旅行，更不要说一个受惠于格兰瑟姆伯爵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在本无膳宿之处安排客人的食宿方面——的英国人了。佩勒姆通过书信向父母描述了旅途见闻。他决定：“见识一下西班牙南部。不仅因为那里是罗马历史上诸多重大事件的发生地，留有许多奇珍异宝与文物古迹，还因为它同时也是现代西班牙最富饶的商业地区。”有必要为旅行做足准备：

我的床正在修理中。同时，我们还在造一口锅炉，之后会用它来烹制晚餐。锅炉会悬挂在我的轻便马车下面。在这个国家旅行要做好许多预防措施，就好像我将去往阿拉伯半岛一般：里斯本之行教会我预期与现实存在各种不符之处，还告诉我其中的许多不符之处实际上是想象的产物。因为旅行两三天后，你想吃的也许是煮熟的鸡与兔子肉，而不是从法国厨房里端出的各种……蔬菜炖肉。

1776年9月底，佩勒姆开始向科尔多瓦进发。因为担心路上找不到可口的食物，所以他带了许多食物。他还带了一本西班牙语版的《堂吉诃德》以提高自己的西班牙语水平：

我们住宿的旅馆与堂吉诃德在多次冒险旅程中所遇到的一样：现在我写信所在的房间堪称书中所谓的那种城堡——没有窗户，只在墙上留个眼儿，白天好让光照进来，晚上又用一块板子把洞堵住。门普

普通通。房子正中间有根大柱子，撑着屋顶。仆人把我们的盔甲放在柱子周围后去铺床。墙壁裸露，只有某个小贩留下的几幅粗陋版画。

佩勒姆觉得安达卢西亚“让人感到十分愉快”，但是在加的斯耽误了行程。因为强降雨天气导致河流水位暴涨，乘船过河变得困难：如欧洲其他地方一样，那里的桥极少。由于同样的原因，他再次滞留在了洛尔卡，然而直布罗陀与卡塔赫纳附近的道路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佩勒姆性格沉稳，安然接受了西班牙旅行的艰辛：

这真是无法形容，但我决定放空自己，进入到一种清净状态。不问任何问题，无欲无求，尽量不与我的房东来往。不管你给多少钱，他从不满足，而且一有机会就会使诈。我们自己购买食物以及喂给畜生（马匹）的饲料。除了猎物，这里的东西既贵，质量上也根本不及英国的。即便如此，我向您保证，我从未感到过一丁点儿的恼怒与不适。正因为旅馆里有诸多不便，所以我才会更积极地为自己找寻这些便利设施。一旦觅得，这些稀缺之物给我带来的喜悦是双倍的：我永远不会建议一位淑女来西班牙旅行，但是对于一个年轻的旅人来说，这绝对是个不错的开始。

战争与政治

在整个18世纪，执政与施政大多都是战争的产物，或者说是为了在战争中表现得更好而产生的。18世纪伊始，西班牙就陷入了一场凄惨的内战，即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0—1715年，法国波旁王朝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就西班牙王位展开了争夺。尽管这次冲突比起后来数次内战——尤其是1808—1813年内战、1833—1840年内战，以及最著名的1936—1939年内战——可谓小巫见大巫，但其造成的伤害以及因此引发的政治变革（特别是18世纪早期的变革），使得这场王位继承战争意义非凡。

由于卡洛斯二世（1665—1700年在位）的遗嘱与奥地利王室继承西班牙王位的决心，围绕该问题所展开的战争变得不可避免。作为哈布斯堡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卡洛斯二世去世时身后无嗣。他立遗嘱将整个西班牙王权交付给了路易十四的第二个外孙——安茹公爵腓力，也就是后来的腓力五世（1700—1746年在位）。卡洛斯二世的附加条件是：若腓力五世拒绝遗赠，想分割遗产的话，那王位就归腓力的对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的次子查理大公所有。卡洛斯二世这番动作并非意在分割帝国的妥协退让之举，他的真正目的是寻求法国的帮助，维持帝国的正常运作。路易十四不愿将这份厚礼拱手让给奥地利，因此替外孙做主接受了这份遗产，尽管他深知这

将招致战祸。

1701年，利奥波德一世打响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的第一枪。由于与法国的关系明显恶化，英国、荷兰于1702年站到了利奥波德一世这边。在这场战争中，英国与荷兰支持奥地利，打算推举查理大公为查理三世。可是，这个计划在西班牙国内便一败涂地。所幸的是，英国的制海权为有地中海诸省支持的查理大公带来了一线希望。多亏英国帮助，陆海两栖部队在1704年占领了直布罗陀海峡，在1705年夺取了巴塞罗那，在1706年攻陷了阿利坎特、马略卡与伊维萨岛。马德里在1706年与1710年被短时间占据。

但是，卡斯蒂利亚始终忠于安茹公爵腓力，路易十四也派军进行支援。尽管腓力依赖的是法国军队，但他的事业仍被视为一场国家独立战争。1707年法国军队在阿尔曼萨打败了寡不敌众的亲查理军及其盟友，迫使查理大公退回到加泰罗尼亚，然而，腓力无法乘胜追击，一举结束这场在西班牙的战争。1710年，查理大公在占领马德里之前，向阿尔梅纳拉与萨拉戈萨地区进军，击退了腓力。但是，没有多少卡斯蒂利亚人支持查理，查理军队间的交通线变得岌岌可危，于是他选择从马德里撤军。由詹姆斯·斯坦厄普伯爵指挥的军队撤退到布里韦加时，受到了敌方攻击并被迫投降。对手是由法国旺多姆公爵率领的一支人数众多的法西联军。至此，查理失去了卡斯蒂利亚。这样一来，就像当初在1648—1652年那样，查理在西班牙的主要据点加泰罗尼亚已无法有效抵御来自卡斯蒂利亚的进攻了。

地方舆论并非制胜的唯一要素。斗争过程本身就很重要。查理的盟军在重大战役上的接连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法国的干预。而法国军队的出色发挥，部分要归功于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James Fitzjames）的军事指挥才能。他是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与阿拉贝拉·丘吉尔（马尔伯勒公爵一世约翰·丘吉尔的姐姐）的私生子。得益于杰出将才的领导，法国军队展示出前所未有的惊人实力。贝里克公爵运用的军事策略富有成效，而且对于部队的后勤管理也是得心应手。而在奥地利、英国与荷兰联军一方，众所周知，在更为艰苦的后勤条件与政治环境下，没有哪位英国将军具有马尔伯勒公爵那样的才干。支持查理的加泰罗尼亚继续抵抗，但在经历了一系列围城行动后还是被打败了：1711年赫罗纳陷落，1714年巴塞罗那被占领。当时，面对势不可当的法西联军的进攻，巴塞罗那人民热情高涨，誓死抵抗。由劳动者组成的民兵守卫在城墙上，成功抵御了数次攻击。宗教信仰助长了民众的激昂情绪，连圣徒遗物都派上了用场。1715年，来自英国海军的保护罩一旦解除，马略卡就陷落了。

1711年，西班牙盟军因欠饷发生哗变，而在英军这边，阿盖尔公

爵二世约翰·坎贝尔自己的军队也缺少加农炮与火药，于是他在巴塞罗那写道：

艰难之处难以言表。我们终于找到了贷款，这样一来这阵子能使营房里的士兵免受饥饿之苦。在我看来，情况实在是难以为继。自去年起开出的账单到现在都未支付过，此举完全毁掉了女王陛下在这里的信誉。虽然军营里的士兵仍有补给，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我们的敌人已经在行动了……因此，如果仍待在营中，我们就会坐以待毙。除非资金到位，否则去年便驻扎于此的全军上下就没有各种必需品，也就无法集结应战了。在比利亚维西奥萨战役（1710年）中，所有将士都没了帐篷、辎重与装备马车。此外，负责用骡子拉火炮弹药、运送面包的承包商无论如何也不愿再为我们效力，除非我们有钱付给他们。

在后勤与财政方面，西班牙的问题比低地国家——英国曾在此展开军事行动——的问题更严重。这不仅仅是因为相较而言，西班牙贫穷、缺少食物、道路条件差，还由于英国的低地国家（荷兰）盟友有实力供养自己的军队，并为盟军的开销提供部分经济支持。这些问题使一个世纪后惠灵顿公爵的成就显得格外突出，他在保持盟军内部凝聚力、给军队提供给养与打胜仗方面都做得更好。

在这场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战事往往十分残酷。游击战作用显著，所带来的后果也相当骇人听闻。1707年，巴伦西亚小镇哈蒂瓦陷落时，法国人屠杀了幸存者，将教堂之外的建筑全部夷为平地。小镇被更名为圣费利佩。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如今，腓力五世的画像被倒挂在了当地的阿尔莫迪博物馆中。

腓力在战争中获胜，他因而有能力限制地方特权。1707年，阿拉贡与巴伦西亚的政治特权被取消。卡斯蒂利亚法律出台，高等法院也按照卡斯蒂利亚模式建立起来。1707年，卡斯蒂利亚税收体系被引入阿拉贡。截至1713年，阿拉贡已开始为西班牙的财政做出可观贡献了。1715年，当腓力从查理手中夺得马略卡后，他在当地建起了一座高等法院。1718年，马略卡民法被取缔。1716年，《新政敕令》禁止加泰罗尼亚政府、法院使用加泰罗尼亚语。加泰罗尼亚习俗与惯例也被一一取缔，取而代之的是卡斯蒂利亚的法律与常规做法。腓力五世打压了6所传统的加泰罗尼亚大学。1717年，腓力在塞尔韦拉新建了一座支持波旁王朝的大学。1715—1718年，巴塞罗那兴建了一座巨大的堡垒。腓力还遵照法国模式，引入了地方行政长官（中央政府的区域代理人）作为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新纽带。中央政府由议会制管理转变为由部长管理的专门部门。

然而，这些规定在实行过程中，似乎并未作为标准加以推广，反之，地方特色得以保存下来。1711年和1716年，西班牙通过了决定：阿拉贡与巴伦西亚的民事案件（除君主介入外），无须遵照卡斯蒂利亚法律进行判决。《新政敕令》规定，在涉及家庭、财产与个人时，加泰罗尼亚法律依然适用。民法与商法依然只遵照加泰罗尼亚法律，而且直到19世纪早期，加泰罗尼亚刑法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纳瓦拉与巴斯克地区，地方法律与法院依然存在，因为这些地区在之前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支持腓力。此外，通常而言，地方精英有权裁定中央政府的一些方案为非法。正是因为这一权力，此后来自西班牙南部的反对势力阻挠了腓力五世之子卡洛斯三世的农业改革。

政府本身可能就派系林立，党争纷沓。例如，1766—1773年，阿兰达伯爵佩德罗负责主持卡斯蒂利亚议会，他被视为所谓的“阿拉贡党”（Aragonese Party）的首脑。“阿拉贡党”由一群显贵要人组成。他们对当时政府内出现的过度专制倾向充满敌意。1766年，发生在马德里的埃斯基拉切骚乱导致前总理大臣埃斯基拉切侯爵垮台。这次骚乱旨在反抗将西班牙传统长斗篷改短的举措，同时骚乱也受食品价格上涨这一社会背景的影响。这起骚乱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精英阶层中的心生不满者所组织协调的。阿兰达伯爵主持恢复了往日的秩序。弗朗西斯科·戈雅目睹了这一切，旋即以绘画的艺术形式记录下了这次骚乱。

腓力五世将自身的大部分精力投入了战争，至少在1717—1720年，西班牙已分别与奥地利、萨伏依-皮埃蒙特、英国及法国交过手。之后，西班牙在1733—1735年与奥地利作战，自1739年其与英国交战，而它搅入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时间是1741年。此外，腓力五世的军队在1717年入侵萨丁尼亚，1718年入侵西西里岛，并取得了最初的胜利。但是，1719年，这场战争导致西班牙被入侵。结果是，法国占领了丰特拉维亚与圣塞瓦斯蒂安，而英国则攫取了维哥。与此相对，那年西班牙入侵英国的重要尝试却受到了天气的阻挠，在苏格兰登陆的一支人数较少的西班牙军队也吃了败仗。

1729年，一个法国外交官自西班牙发来汇报说，腓力五世一直对战争有种“狂热”。他的主要目标是夺回萨丁尼亚、西西里岛、那不勒斯、旧米兰公国领地、直布罗陀海峡与比利时，这些正是在1713—1714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时从西班牙帝国割让出去的土地。而且，为实现这一目标，腓力重建了西班牙的陆军和海军。1713—1748年，军舰开销上涨了800%。不过，巨额开销带来的压力导致政府分别于1726年和1739年破产。

军队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期间快节奏的战役中受益，也从当时与

法国的联盟中有所收获。此外，结合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影响，新的波旁王朝需要在部队中重建恩庇网络、反思最佳的处事方式，同时王位继承战争也为上述重建与反思提供了契机。步兵所占比例有所上升。1734年，由于西班牙从奥地利手中夺回了那不勒斯，腓力下令在卡斯蒂利亚组建一支多达23,000人的民兵队伍，以解除意大利常规军的兵役。这支民兵的布防范围不包括阿拉贡与纳瓦拉。陆军、海军也建立了更加有效的新型管理结构。海军重建后被整合成三个部门，总部分别设在加的斯、卡塔赫纳与费罗尔。

腓力五世的长子费尔南多六世（1746—1759年在位）更加温和，他促成了一项和约的缔结，使意大利自1752年起处于和平状态。彼时，费尔南多六世同父异母的弟弟卡洛斯是那不勒斯与西西里国王。他的另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腓力是帕尔马公爵。之后，西班牙不再强调对意大利的控制，反之，它意在将自己的海军打造成大西洋上的一股重要军事力量。此外，西班牙还尝试改革国家财政状况与殖民政策。

费尔南多同父异母的弟弟卡洛斯在他之后继承了王位，成为卡洛斯三世（1759—1788年在位）。卡洛斯三世比较好战，在1762—1763年与1779—1783年两度与英国交战。与之前的冲突如出一辙，战争造成了种种压力，并暴露了西班牙的弱点。1762年，英国远征军占领了哈瓦那、马尼拉。两地在随后签署的《1763年和约》中又被归还，然而英国从西班牙手中获得了佛罗里达。此外，失掉哈瓦那对西班牙的声望是一记重击，促使卡洛斯三世大力加强帝国的安保。

1762年，由法国支持的西班牙对葡萄牙的入侵，由于英国的介入而受到阻碍。起初，西班牙在不堪一击、防御不严的葡萄牙要塞地区——例如米兰达、布拉干萨与查韦斯——横行霸道。西班牙的连胜迫使葡萄牙向英国发出了派遣救兵的紧急请求。英军在英吉利海峡遇到逆风，行程有所延误，不过他们最终帮助葡萄牙扭转了局面，此外，西班牙未能利用战争初期的胜利向波尔图进军也是关键的一点。在这场战役的最后一次重要军事行动中，英国军队如狂风暴雨般攻入筑有战壕的西班牙军营，给西班牙以重创。冬雨伊始，和平在即，英军实力强大，面对这些，西班牙与法国撤军了。

1779—1783年，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西班牙与法国以及美国的革命者结盟，在1781年极为成功地包围了彭萨科拉市之后，占领了西佛罗里达州。但是，西班牙长期围攻直布罗陀未果，重新占领牙买加的希望也破灭了。1779年，西班牙与法国联合入侵英格兰南部的计划因拖延、疾病以及英国海军方面的原因而宣告破产。英国海军前后三次解除直布罗陀之围，使此处要塞得以成功抵御围攻。直布罗陀戒

备森严，防御得当，赶走了进攻者。然而，1782年梅诺卡岛却在庞大的法西联军长期围攻、英军解围失败，以及驻地内坏血病肆虐的情况下，投降了。1779年，西班牙在中美洲夺取了圣乔治岛，这里是英国伐木业在伯利兹最重要的港口。由于黄热病造成的巨大人员伤亡，英国在1780—1781年远征尼加拉瓜的计划最终搁浅。1782年，一支西班牙军队占领了巴哈马群岛上重要的新普罗维登斯岛的首都拿骚，但英国在1783年又夺回了该地。在《1783年和约》中，西班牙保住了西佛罗里达州，还重获东佛罗里达州。

1775年、1784年，西班牙发动大规模战争，试图夺取阿尔及尔，结果惨败。这两场战争正逐渐被大众所遗忘，但它们提醒了人们宗教冲突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尽管最终在1830年攻下了阿尔及尔的是法国，但是这场16—18世纪争夺地中海西部控制权的斗争与西班牙的收复失地运动是息息相关的，更进一步而言，与19世纪中期摩洛哥的扩张主义也有联系。在这一背景下，军队的价值格外重要。

1775年，西班牙在攻打阿尔及尔时，派出21000名士兵与一支由44艘军舰、350艘运输船组成的舰队。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军队的征程被耽搁了。登陆战计划不周，乱成一团。海岸上的阿尔及尔炮兵部队用重火力将西班牙军队压制在海滩上，而西班牙的加农炮则因海岸沙地的不便，而迟迟未到。截至下午3时左右，西班牙伤亡人数达到2400人，却无任何斩获。西班牙军队再次集结，重新登陆，但这造成了彻底的恐慌。最终，西班牙失掉了9台加农炮，大约有3000人被俘。1784年，一队阿尔及尔战舰挫败了西班牙人的登岸企图。阿尔及尔甚至能够派遣私掠船攻击地中海北部海岸。与此相对的是，1792年，西班牙人撤出了他们最后的据点—奥兰。后来，1830年被法国攻占的一些地区变更为了阿尔及利亚，而奥兰也在其中。

社会文化背景

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后，社会逐渐恢复元气，进而有了发展。事实上，社会恢复和发展的速度比20世纪40年代西班牙内战后的要快得多。最明显的是在人口增长方面。与此同时，与西班牙历史上的大多数情况一样，这一阶段多样性的特征十分明显。因此，虽然在1770年后西班牙人口增长速度加快，但是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人口的增长主要见于国土边缘与临海省份（例如巴伦西亚），而非相对贫穷的梅塞塔高原农业中心区。在梅塞塔地区，盈余的粮食量依然十分有限。

疾病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此外，疾病种类也增多了。1730年，一

支来自西印度群岛的中队将欧洲首例黄热病带到了加的斯。然而，进步也是有的。自1771年起，国家之友巴斯克学会（the Basqu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Country）就开始为预防天花接种而四处游说。此外，疾病虽然对18世纪90年代的人口增长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未能阻挡整个18世纪的人口增长趋势。而且，在由疾病与粮食歉收所导致的全欧洲范围的生存危机中，尤其是在1740—1742年以及1816年，西班牙成功避免了严重的人口死亡高峰。

与此同时，普遍存在的人口增长迫使家中次子与更加贫穷的佃农放弃了成为自耕农的梦想。例如，在意大利南部，以及加泰罗尼亚、马略卡与西班牙南部，人口普遍增长导致零工人数增多，而零工是劳动人口中最易遭受经济重创的群体。人口增加也导致了农村贫困化程度加深。同样是在意大利南部，人口的增加致使人们更专注于谷物生产，尤其是小麦种植。当时，一般来说，人们没有足够精力用于动物养殖，而动物正是肥料的主要来源，鉴于此，农业生产率进一步受到了影响。人口增长带来的诸多问题普遍存在：在城镇中，随着来自贫困农村地区的人迁入，失业与行乞问题愈演愈烈。去西班牙城市旅行的人常对那里乞丐的数量说长道短，大量的乞丐对北欧人的冒犯尤为严重。

生活的艰辛蔓延到了人与兽的对抗中。这种冲突感不仅来自现实生活中的野兽（尤其是狼），还源于虚构的怪兽。普拉多美术馆收藏着一幅由胡安·安东尼奥·德·弗里亚斯·伊·埃斯卡兰特（1630—1670年）创作的栩栩如生的画作《安德罗墨达与怪物》。1718年，在萨拉戈萨附近，有人声称看到了公牛大小的野兽，头似狼，长尾，还长着三根尖角。女巫与其他魔鬼的仆从是邪恶社会的一部分，这个邪恶社会在黑暗之中尤其吓人。人们可以通过戈雅后期的恐怖画作窥见这些魑魅魍魉。

事实上，在一个本质上动荡不安、充满威胁的世界中，对上帝的信仰是人们寻求稳定的重要方式。那些强调现世稍纵即逝，富人面临着重重精神危机的虔信手册、宗教宣传单与布道在当时十分流行，一再重版。圣骨盒、祈祷文、游行与鸣钟都是人们试图获得上帝青睐的方式。

人们通过因果报应来理解充满敌意的生存环境。大众觉得，善行可以使自己获得赦免，无论这种赦免是以宗教仪式的形式实现，还是通过满足神秘的精神世界需求的方式获得。上帝的世界与魔鬼的世界斗争不断，正如5世纪时圣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所说的那样。上帝的胜利是克劳迪奥·科埃略（1642—1693年）与米盖尔·梅伦德斯（1679—1734年）画作的主题，这些作品现藏于普拉多美术馆。上

帝与魔鬼的冲突极为有力地鼓动了当时修建教堂与信奉宗教的热潮。

尽管一些人相信人类进步的可能性，但当时大多数人生活在动荡不安之中。他们对未来充满恐惧，同时也缺乏雄心壮志。这种普遍的保守主义极大地阻碍了政府的革新计划，同时也使得国家政治看似非常微不足道。相反，对大多数人来说，政治实际上局限于当地的一方水土之中。

农业

农业是经济的支柱，收成是个人与集体财富的关键。生产率低下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而且会给生活水平带来压力。西班牙的应对之策是内部殖民：不管是通过挖水渠、伐树林还是移石块的方式扩大耕地，在本质上都是劳动密集型活动的产物，而且有利于提高生产率，尽管折算到每公顷耕地上，生产率并未提高多少。

相对而言，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农业发展尤为显著。保有土地至关重要，当地许多良田为耕者所有，而他们直接受益于生产率的提高，因此，继承家庭农场的农业人口的代代延续促进了加泰罗尼亚农业的发展。这与西班牙大范围分布的大庄园式农业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加泰罗尼亚，正如在英格兰与低地国家一样，诸如三叶草、油菜籽与芜菁之类的饲料作物广泛传播，有助于消除休耕的影响，提高农村经济体养殖动物的能力。这些动物是重要的肥料来源，同时也是有价值的资本。因为，数百年间，动物都是经济中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在可转换的，或曰“变化的”畜牧业中，土地在草场与耕地之间轮流转变。这种畜牧业形式的普及带来了产量的增加。加泰罗尼亚也产葡萄酒与白兰地。

事实证明，在西班牙，提出经济改革方案容易，执行起来却困难得多。如此一来，西班牙农业依然相当传统，也就不足为奇了。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梅斯塔的羊群在秋天从西班牙中部开阔的夏季草场动身前往低地地区。这场欧洲范围内规模最大的动物迁移，令堂吉诃德迷惑不解。此外，大多数地区的农业发展水平仍只够人们维生而已，农业进步的普及程度十分有限，而且在整合潜在的需求与供应上也做得不够。农业存在许多结构性问题。例如，家畜数量普遍不足，意味着人往往会劳作至精疲力竭；羸弱的牲畜拉着粗制滥造的犁具耕出的苗床效果差强人意；人们不得不亲手拔除杂草；由于农业产量无法满足需求增速，食品价格上涨、营养不良普遍存在。然而，这些问题很少成为画家笔下的主题，现藏于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中的《夏日寓言》便可证明这一点。马利亚诺·萨尔瓦多·马埃里（1739—1819

年）在这幅画中描绘了一幅引人入胜的收获景象。捕鱼业也伴随着许多艰辛的体力劳动。与此同时，比斯开湾海岸上重要的捕鲸业与鳕鱼渔业有助于人们理解包括毕尔巴鄂在内的港口的繁荣。

工业

由于人们主要将钱用于购买食物，所以手工艺品与工业制品的市场就很有限。此外，大多数产业工业化的程度不高。产品通常销往当地市场，人们的创新能力也不足。一般而言，无论是用机器生产还是以手工制作，工场总是很少，专业化程度也很低。人们对于创造发明普遍不感兴趣。在蒸汽动力的使用上，西班牙远不及英格兰，而且也无意像法国那样试图发展蒸汽动力。西班牙缺乏优质煤源，限制了其蒸汽动力的使用。

国内市场疲软、资本不足、交通设施匮乏、技术落后以及外国竞争激烈均束缚了西班牙工业的发展。从法国将棉布出口到西班牙国内与西班牙殖民地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管窥外国贸易竞争之激烈。鉴于此，西班牙政府的主要对策就是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口。因此，1719年，法律规定军服只能用西班牙本国布料制作。1757年，西班牙禁止进口热那亚纸张与丝绸制品。1786年，由于西班牙的进口禁令，法国南部城市尼姆的长筒丝袜产业陷入萧条。西班牙的自由贸易难觅踪迹。《商业与海事的理论与实践》（1724年出版于马德里）一书的作者杰罗尼莫·德·乌斯塔里兹（Gerônimo de Uztâriz）仰慕路易十四的海军国务大臣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因为柯尔贝尔积极倡导国家层面的活动。乌斯塔里兹强调，动用政府力量让西班牙在经济增长竞赛中赶上对手是必要的。他认为海外贸易是国家发展的关键。

坎波马内斯伯爵佩德罗·罗德里格斯（Pedro Rodríguez，1723—1802年）是出生在阿斯图里亚斯的律师和经济学家。18世纪70年代，他大声疾呼国家应支持工业活动。同时，他在1783—1791年负责主持了卡斯蒂利亚议会。他支持国家之友经济学会。

尽管坎波马内斯伯爵的许多计划均以失败告终，不过在18世纪最后几十年间，包买商制度（putting-out system）仍在西班牙推广开来。工人在农舍中开展了一些工业生产。同时，依赖雇工的新型工业生产方式也开始出现。但是，技术转化仍然是选择性的，而且变化发生得很缓慢。在当时的西班牙，不论是基于蒸汽动力、工厂还是其他因素，英国式的工业革命均未发生。尽管如此，加泰罗尼亚白棉布（人称印花布）仍在新大陆开拓出了重要的市场。此外，西班牙在烟草生产上也成了先驱，还建起了壮观的国有烟草工厂，尤其是塞维利

亚的国有烟草工厂。如今，人们在参观塞维利亚大学时，还可以看到已经融为大学一部分的烟草工厂。

基础设施

交通运输与工业发展的情况相似。交通发展有限，但也存在偶发性的改革。交通设施匮乏，极大地放大了空间距离的影响，也给经济带来了沉重负担。事实上，人们对现状的担忧促成了改革计划的提出。腓力五世在位时，开始打造一个星形的马车路网络，从马德里出发，向西班牙的各个海岸辐射开去。修建这些道路是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带来经济效益。政治与经济之间的联系可被视为西班牙政策的一贯特色，这在当今社会也并不鲜见。腓力五世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市场一体化，这个进程在17世纪末已悄然开始。

为发展西班牙中部的工业活动，卡洛斯三世政府计划修建一系列的运河，将中部与大海连接起来，从而克服地理对经济产生的离心作用。18世纪80年代，人们沿着埃布罗河修建了阿拉贡运河，促进了埃布罗河上游河谷地区工业活动的发展。但是，总体而言，交通设施依然匮乏且拖累了经济发展，而且与法国、英国相比，差距尤为明显。西班牙的情形与意大利南部极为相似。

西班牙财政方面的基础设施也十分薄弱。1749年，西班牙政府计划成立一家普通银行，负责全欧洲汇兑许可证交易，但却遇到了麻烦：商人愿意从银行借贷，但不愿为汇兑许可证埋单。此举使普遍存在的西班牙钱币出口困境进一步恶化。西班牙与法国的贸易逆差使得图卢兹等法国城镇成了西班牙货币交易的重要中心。而更为乐观的一方面是，自1770年起，获得皇家领地地理学家头衔的托马斯·洛佩斯·德·瓦加斯·马舒卡（Tomás López de Vargas Machuca）彻底改变了西班牙的地图绘制。

贵族阶层

西班牙依然是一个由贵族统治的社会，但大多数贵族仍一贫如洗。国家采取措施限制贵族人数，导致这一阶层数量锐减，从1768年的722000人下降到1797年的400000人（占总人口的4%）。1773年，贫穷的西班牙下级贵族接到命令从事体力劳动，但这并不是对现存贵族阶层所进行的攻击。除费尔南多六世外，西班牙国王均计划将相当多的人擢升为高级别贵族，同时，很少有人成为新的下级贵族。阿斯图里亚斯作家、政府官员、《农业法报告》（1795年）的作者加斯帕·梅尔乔·德·霍韦亚诺斯（Gaspar Melchor de Jovellanos，1744—

1811年）迫切要求进行农业改革，尤其是拆分大庄园以及进行教堂私有地的世俗化。同时，他希望贵族阶层能够转变为官僚精英。最后一项也是俄国的彼得大帝的目标。

然而，西班牙贵族觉得，他们没有理由改变自己命中注定的角色。贵族特权依然强大。封建领主司法也没有被取缔，一如1790年的葡萄牙。此外，封建制度的重担并不是均衡地分布在每个人身上的。封建社会中巴伦西亚农奴的处境尤为恶劣。与这种不平衡的状况相比，西班牙的其他一些方面可谓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

城镇

较之于贵族，城镇的影响力与特权可能会受到打击。在对巴塞罗那的围攻取得胜利之后，腓力五世没收了该市所有的财政收入并限制了该市特权。直至今日，加泰罗尼亚的分裂分子仍对此事耿耿于怀。对西班牙城镇整体而言，由于腓力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后起用了代表王权的地方行政长官，市政的自主权就减弱了。1766年，控制着洛尔卡许多市政职位的该地精英反对总督贯彻王室改革。为驱逐总督，夺取政权，他们还利用并加深了民众对谷物价格的担忧。对此，政府予以果断而坚决的打压。

城镇力图控制乡村地区的经济，这可能给乡村带来严重问题。1761年，耶稣会修士佩德罗·德·卡拉塔尤德（Pedro de Calatayud）抨击毕尔巴鄂商人在购买羊毛用于出口时，对农村小牧羊主进行了剥削，迫使小牧羊主签下了高利贷合同。事实上，他批评的是所有商人。

在当时的西班牙，全社会都相当抵制政府实行改革计划。1783年，卡洛斯三世发布法令称工匠同样适合担任市政职务，他们的职业是“诚实、高尚的”。国家对传统荣誉等级制度的调整收效甚微，市政府依然由地主操控。1781—1794年，奥尔切的市政部门公然违抗了选举制造商担任公职的圣旨。

相较于16世纪、17世纪，以及随后的19世纪与20世纪，在18世纪，城市社会秩序没有那么动荡不安。然而，1766年马德里的缺粮骚动仍被朝臣利用，他们急于推翻主张改革的大臣。

社会问题

人口增长使诸多社会问题更加严重。收容乞丐与流浪汉的感化院

在1750年后激增。这些感化院的资金源于宗教协会的捐赠。截至1798年，已有25个城镇建有感化院。但是，感化院的数量仍然不足，而且其中的大多数缺乏推进扶贫项目所必需的足量财政资源。

卡洛斯三世急于寻找解决之策。1775年，通过征兵制，他强制规定17—26岁的男性无业游民服兵役。那些在大街上睡觉、被父母斥责为懒散的年轻人以及放着本职工作不做的工匠都在服兵役之列。但是，加泰罗尼亚与巴斯克两省享有地区兵役免除权，因为当地有民兵。与此同时，西班牙还颁布了针对吉卜赛人、流动推销商，以及所有无明显生计者的法令。1774年，卡洛斯三世下令在加利西亚、阿斯图里亚斯建立学校，教人在家纺织亚麻。1786年，一道一般法令规定，西班牙王国内所有城镇与村庄应设立纺织学校。人们并未采用节省人力的机器。

宗教

宗教身份依然至关重要。1732年占领奥兰之后，英国使者汇报说："几乎所有西班牙人都觉得，只要这次战胜了（摩尔人），自己在救赎之路上就成功了一半。"

宗教裁判所针对的是新教徒、所谓的犹太人与秘密的摩尔人。18世纪20年代，在格拉纳达有250人被宗教裁判所判为秘密的摩尔人。然而，腓力五世并未在宗教裁判所遇到经济困难时伸出援手，而且这个机构自18世纪中期起就日益显得冗余。

天主教会影响依然巨大。在卡斯蒂利亚，教会拥有大约七分之一的牧场与农田。农产品价格与农田租金的上涨均使神职人员的财富居高不下。没有什么能够妨碍法国出现的日益加深的宗教宽容与去基督教化在西班牙境内上演。然而，西班牙仍效仿葡萄牙与法国，在1767年驱逐了耶稣会修士，因为正是他们造成了前一年的马德里骚乱。

神职人员担任政府要职的传统由来已久。1700—1751年，负责主持卡斯蒂利亚政府事务的12人中，有9位是神职人员，而阿拉贡与加泰罗尼亚在18世纪都出现过由神职人员担任总督的情况。然而，政府对教会的控制有所加强。教皇本笃十四世于1753年签订的协议使费尔南多六世对教会拥有了更多的控制权。卡洛斯三世迫使教团成员臣服于自己的权威，创办了西班牙宗教委员会，正如1783年的天主教加尔都西会教士那样。西班牙还尝试减少修士人数。僧侣与修士对西班牙来说尤为重要，这是由教区结构的陈腐以及大量堂区在职神职人员的匮乏所造成的。

当时，有人倡导世俗化教育。而且，1766年，坎波马内斯提出了一项大学整体改革计划。除大学内部的多项改革外，西班牙在1771年还发布了一项针对萨拉曼卡大学学科的新方案。政府开始直接干预学校内部管理中的诸多事务。

尽管特伦托会议（1545—1563年）要求每位主教建立一座神学院，但是西班牙的情况仍不尽如人意。然而，在1766年卡洛斯三世发布的改革命令的要求下，西班牙建立了新的神学院，整改了已建成的神学院。虽然在1747年西班牙就有28所神学院，但50年后又新建了18所。

1765年，瑞典使者古斯塔夫·菲利普·克雷伊茨（Gustaf Philip Creutz）观察道："比利牛斯山成了横亘在西班牙与文明世界之间最明显的屏障。从我来到此地起（1763年），我就觉得这里的人仿佛落后了一千年。"这种刻薄的观点几乎完全否定了卡洛斯三世的努力。实际上，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西班牙国内与政府官员相关的世俗知识活动明显增加了，坎波马内斯与霍韦亚诺斯等官员就是例证。然而，西班牙缺乏有教养的大众读者群体，也没有法国那么多的非官方文化机构。此外，与法国、德国的神职人员相比，西班牙教会对新思想满怀敌意。一些西班牙传教士中的领袖仍强烈谴责新思想。

教会对文化事务影响巨大。宗教裁判所积极致力于阻止有伤风化的作品流通，尤其是法国书籍。此外，神职人员成功地在马德里以外地区限制了剧院的扩张。1706年、1731年格拉纳达与塞维利亚地区分别禁止戏剧演出。此外，神职人员在18世纪中叶提出的种种禁令遭到了人们的指责，包括禁止女演员穿裤子的规定。

教会也是主要的艺术赞助者。弗朗西斯科·戈雅（1746—1828年）便因作品《基督在十字架上》（1780年）而进入了圣费尔南多美术学院。如今，这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画作收藏于普拉多美术馆内，尽管根据现代的审美偏好，它不如戈雅的非宗教题材作品那般引人入胜。在当时，宗教主题作品的价值更受人认可。例如，宗教文献的印刷对西班牙出版业而言一直意义重大。坎波马内斯曾试图通过印刷出版来传播新作品，尤其是经济与科技上的进步思想，但是这些出版物的流通范围并不广。任何社会阶层的读者都更爱阅读年鉴。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

戈雅是一名相当活跃的画家，他的创作风格与创作主题的变化巨大，从18世纪60年代的晚期洛可可风格到19世纪初的浪漫主

义风格，后又演变为后期作品中的阴暗沉郁。戈雅的父亲是一位熟练的镀金工。戈雅在萨拉戈萨接受了教育，1774—1792年在马德里为皇宫壁毯绘制大幅油画。自18世纪80年代起，他在肖像画上取得了成功。1786年，他还被任命为宫廷画师。自18世纪90年代中期起，随着社会评论与讽刺画的流行，戈雅的创作内容也变得更加广泛，其画作常常描绘巫术与疯癫状态。与此同时，他依然绘制了不少宗教画与肖像画。1814年，戈雅以1808年5月的起义为主题，绘制了两幅伟大的作品。绘制这两幅画的部分原因是给自己在法国占领西班牙期间的行为进行辩护。如今，它们都被收藏在普拉多美术馆内。他绘制的82幅版画的合集《战争的灾难》（1810—1820年）是半岛战争的产物。由于1823年宪政主义的压迫，戈雅在1824年离开了西班牙，后来死于法国波尔多。他是一个精力充沛、富于创造力的画家。人们可以在普拉多美术馆看到许多戈雅的作品，其他地方，例如桑坦德美术馆，也藏有戈雅的画作。戈雅由早期绘画大师变为现代主义先驱的轨迹格外引人关注。

科学的发展备受阻碍。迭戈·德·托雷斯·比利亚罗埃尔（Diego de Torres Villarroel，1694—1770年）自1726年起担任萨拉曼卡大学的数学教授。1770年，坎波马内斯批评道："他认为他的职责就是编写年鉴与预言。"托雷斯自1719年起就从事年鉴与预言的写作，且对魔法与超自然现象兴趣深厚。他还为星象学的价值辩护。托雷斯将自己的数学与天文学知识用于年鉴写作，同时也用这些知识反驳其他自然科学教育。托雷斯否认现代医学的价值，支持传统学说，认为人体是由四种体液构成的。

相对地，医生加斯帕·卡萨尔（Gaspar Casal，1679—1770年）将现代的、实证的、症状性的疾病概念引入了西班牙。他用这种方法来描述糙皮病，将它与疥疮及麻风病区别开来。此外，成立于1734年的马德里医学院致力于通过观察与经验研究医药、手术。卡洛斯三世在马德里建立了一座皇家植物园，并自1777年起，派遣科学远征队前往西属美洲地区，寻找具有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植物。这是西班牙长期以来试图理解、利用帝国天然产物的过程中的一环。

文化

巴洛克式主题依然具有重要影响力，尤其是在18世纪头几十年里。由于安达卢西亚式巴洛克风格的影响，许多建筑物都有波浪式的立面。人们也可以在其他地方看到建有扭形柱的巴洛克立面，例如巴

伦西亚圣母马利亚大教堂。意大利建筑师贡献突出，如费利佩·尤瓦拉在马德里设计建造了新古典主义皇宫。这座宫殿取代了1734年被焚毁的哈布斯堡王宫。为腓力五世设计的花园，例如拉格兰哈宫花园，同样展示了巴洛克式风格的影响。

18世纪下半叶，西班牙与欧洲其他地区一样，开始重视新古典主义风格。文图拉·罗德里格斯（Ventura Rodríguez）与胡安·德·维拉努埃瓦（Juan de Villanueva）的作品均遵循此风格，尤其是前者设计的潘普洛纳大教堂立面。在绘画领域，西班牙受到了鲜明的意大利风格之影响。此外，如欧洲其他地方一样，西班牙文化中的异国风格被内化为了独特的民族特色。

西班牙统治下的美洲

18世纪频繁的战争未能给西班牙带来多少好处。但至少，西班牙保全了帝国的大部分疆域。事实上，它也因这种整体性而受益。委内瑞拉出口的可可、烟草、棉花、咖啡、糖与靛蓝，拉普拉塔河河口地区出口的兽皮，古巴出口的烟草、糖与兽皮，墨西哥出口的糖、染料、可可，特别是白银，均为帝国带来了丰厚收益。墨西哥银矿的工作环境十分严峻。1717年，加的斯成为与新大陆进行贸易往来的唯一港口，实现了垄断。

此外，拉丁美洲内部的商业网也发达起来，尤其是食品与纺织品交易网络，这也促进了经济专门化。但是，拉丁美洲内部商业的发展会对商品销往西班牙的主流趋势构成挑战。拉丁美洲经济的活力对当地社会结构产生了影响，尤其是促进了地方精英阶层的崛起。他们将在争取独立的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西班牙与世界上其他地区一样，存在着阻碍经济发展的巨大壁垒。其中就包括大众可支配收入匮乏以及环境方面的限制性因素，特别是交通不便，以及固有的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倾向会与社会改革牵引力的缺失相互作用。在交通方面，西班牙境内河流的河面上一般没有架桥，而浅滩与渡轮又易受到春季洪水的影响。

自16世纪起，随着欧洲移民与非洲奴隶来到美洲，加之疾病的影响，印第安人人口规模相对减少。在墨西哥中部，1646年，印第安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87.2%，而西班牙人达到8%，其中既包括西班牙移民，又包括出生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梅斯蒂索人（混血儿）占1.1%，巴多人（完全或部分为黑人）占3.7%。与16世纪60年代相比，除印第安人外，每个人种所占的比例均有所上升，尤其是梅斯蒂

索人。这一趋势延续了下去。到了18世纪40年代中期，印第安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4%，而西班牙人为9%。就墨西哥整体而言，1810年，据推算人口为6121000，其中3676000人为印第安人，西班牙人数量为1107000，梅斯蒂索人数量为704000，巴多人数量是634000。就西属美洲整体而言，1800年，据推算总人口为1690万，其中750万为印第安人，610万是梅斯蒂索人或巴多人，330万为西班牙人。这些数据易受质疑，不仅仅是在计数方面。由于没有考虑跨种族结合的程度与影响，种群分类也存在问题。许多被列为西班牙人的人体内还流淌着一些印第安人的血液。巴多人的情况也是如此。

提到西班牙，特别是在1000—1609年，殖民人口的种族构成变化很大。这对于塑造某些殖民地与领地的特性和文化而言至关重要。例如，相较于中美洲或新格拉纳达（现在的哥伦比亚与厄瓜多尔），墨西哥中部与秘鲁地区的西班牙人所占人口比例更高。在那时，种族构成的动态变化对社会结构与人的观念均产生了影响。对于日益增多的混血儿而言，外貌决定了所受的待遇，这在一些殖民地尤为突出。那些具有欧洲人面孔的人比看起来像非洲人或印第安人的群体更易受到优待。这种现象被称为肤色政治主义，由此衍生出了对一些种族结合的特别产物的称呼，例如，卡斯蒂索人是西班牙男人与梅斯蒂索（西班牙与印第安人混血儿）女人的孩子。

半岛贵族（西班牙本土人）与克里奥尔人（出生在美洲大陆的西班牙人）之间的长期矛盾被卡洛斯三世的改革所激化。改革主要意在加强中央集权，增强安防，增加财政收入。这些改革常常无视克里奥尔人的经济和政治抱负，让半岛贵族担任主要的高级官员职务。政府重组产生了新的领土分区。1739年、1776年，西班牙先后建立了新格拉纳达与拉普拉塔河总督区，其行政中心分别设在波哥大与布宜诺斯艾利斯。新格拉纳达的设立加强了西班牙对南美洲西北部地区的控制。以往，西班牙很难从遥远的行政中心——墨西哥城与利马对这一地区实行有效的管理。拉普拉塔河总督区的设立，反映了该流域日益重要的经济地位。自1778年起，拉普拉塔河流域获准直接与西班牙交易，这也是西班牙针对葡萄牙在巴西的扩张主义所采取的对策。此后，葡萄牙与西班牙经常在该区打打停停。

尽管拉丁美洲独立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源于1808年拿破仑对西班牙的占领，但是分裂主义的情绪早在18世纪时已开始在西属美洲酝酿。菲律宾并未出现这种状况，在那里定居的西班牙人要少得多。菲律宾与其他西属殖民地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气候、菲律宾缺乏黄金，以及帝国将重心放在了美洲大陆多重因素所导致的。

扬帆太平洋

在一百多年有限的探索活动之后，18世纪末，西班牙对太平洋的探索再度兴起。西班牙人对英国、俄国在北美洲西北海岸的行动感到忧心忡忡，而早期试图封锁消息的政策早已失效。1790年，在努特卡湾危机中，英国与西班牙险些兵戎相见，起因是西班牙试图践行之前宣称的对该海岸的贸易垄断权。

法国最初支持西班牙，但由于法国大革命所引发的日益严重的危机，法国撤出了，最终导致西班牙与英国达成和解。西班牙的探索也反映出卡洛斯三世壮大帝国的决心。1775年，布鲁诺·德·埃塞塔在一次航海探索中发现了哥伦比亚河河口。由于河道问题以及当地印第安人的敌意，18世纪90年代，西班牙未能在那里建立定居点，也无法进一步向上游挺进。18世纪90年代初的一些其他远征活动也表明，自大西洋经太平洋通往美洲大陆北部的西北向适航航道尚不存在。

1782—1784年、1790—1793年，亚历杭德罗·马拉斯皮纳（Alejandro Malaspina）两次跨越太平洋，并在太平洋周边地区的更大范围内航行，彰显出了西班牙对航海发现的旺盛精力，但这些活动却因法国大革命戛然而止。亚历杭德罗死于1810年，他的远征大多被人遗忘。同样，18世纪70年代，西班牙修士曾探索了美洲大片地区，即如今的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州与犹他州。

第八章

拿破仑战争：被支配的恐惧

被侵略的厄运，将再一次笼罩西班牙。

1788年，卡洛斯三世去世后，其子卡洛斯四世（1788—1808年在位）继位。没有迹象表明在接下来的40年间西班牙将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变化程度之巨，除710—719年的变革外，无能出其右者。

波旁王朝的秩序与教会不可撼动的地位即将被战争一扫而光，这无异于重写西班牙历史。被侵略的厄运，将再一次笼罩西班牙。这次侵略并不像人们所看到的第一次侵略那样。1793年，西班牙加入了一个强大的反法联盟，与大多数欧洲国家一道对抗法国大革命。但是，这个联盟命途多舛，西班牙与其盟国皆深受其害。起初，西班牙入侵了鲁西永并取得节节胜利，但未能攻陷佩皮尼昂。反倒在1794年，法国将西班牙赶出了鲁西永，并乘势攻入了加泰罗尼亚，取得了黑山战役的胜利。法国乘胜追击，包围了罗塞斯，并于1795年攻陷该城。在比利牛斯山西部，自1794年起，法军捷报频传，先后占领了圣塞瓦斯蒂安（1794年）与毕尔巴鄂（1795年）。法军夺取了食物，又摧毁了工厂。西班牙政府担心巴斯克地区倒戈，害怕当地人会宣誓效忠法国，以换取法国对巴斯克传统法律与天主教信仰的认可。1794年，西班牙也确实就此与法国展开交涉。西班牙接受了《巴塞尔和约》（1795年）中的条款，然后根据《第二次圣伊尔德丰索条约》（1796年）的规定，与法国一道对抗英国。

然而，这次参战使西班牙本土及帝国其他地区暴露于英国海军的威力之下。1797年，西班牙舰队在圣维森特角战役中败北。也是在这次战役中，英国海军将领纳尔逊脱颖而出。与此同时，特立尼达岛不敌英国攻击而陷落。英国对大西洋两岸贸易的封锁严重打击了反英政府的财政，导致后者债台高筑，不断借贷。1802年根据《亚眠条约》的规定，特立尼达岛被割让给英国。然而，和平稍纵即逝。1804年，灾难性的战争再度席卷而来，其中，最为惨烈的当属法国与西班牙的联合舰队在特拉法尔加海角险被英军全歼（1805年）。不过，1807年，英国攻打布宜诺斯艾利斯，最终铩羽而归。

在西班牙国内，尤其是在1803—1804年，农作物歉收导致食品价格上涨，人民营养不良，骚乱四起。1807年，西班牙与法国一道，成功入侵英国的盟友葡萄牙的领土。西班牙王室内部，卡洛斯四世与其子费尔南多之间的嫌隙尽人皆知，通过出版物而广为人知。费尔南多获得了上层贵族与教会的大力支持。王室内斗最终在1808年以“阿兰胡埃斯骚乱”（Tumult of Aranjuez）的形式收场。费尔南多在这次宫廷政变中取代了不受欢迎的卡洛斯四世，成为费尔南多七世。他还驱逐了卡洛斯遭人嫌恶的首相曼努埃尔·戈多伊（Manuel Godoy）。但随后，拿破仑迫使卡洛斯四世与费尔南多七世在巴约讷与他会面，并胁迫二人将王位传给自己。拿破仑又封他的哥哥约瑟夫·波拿巴为西班牙国王约瑟夫一世（1808—1813年在位），结果招致以费尔南多之名发起的起义，其中以马德里的反抗尤为激烈。这就是如今人们所说的西班牙独立战争的开始。

这次起义利用了从自由主义到保守主义的各种信仰与倾向，但其后秉持着一个共同的信念：反对法国势力的干涉。事实上，西班牙民族身份的界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与法国的对抗中逐渐清晰起来的。各省军政府在夺权时都将民愤对准了法国，这提供了一种缓解政治和社会矛盾的方式。如此一来，在不需要做什么便能加入起义军的情况下，起义者要获取支持就变得十分容易了。

反抗法国的起义军既非抢夺财物的强盗，也不仅仅是为君主、教会与国家而战的爱国者，但这两方面的确构成了一定的动机。就像纳瓦拉地区的情况一样，起义军是由拥有土地的农民组成的，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整个社会与他们同仇敌忾。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取消了纳瓦拉的特权，还试图推进社会改革，再加上法国人的巧取豪夺，所有这一切都引起了西班牙社会极大的敌意，而这正是法国侵略者强加在西班牙身上的敌意。与此同时，一如往昔，地理肌理深深印刻在了西班牙政治之中。纳瓦拉北部以拥有土地的农民居多，但是纳瓦拉省南部地区则有更多的零工，社会关系也不那么和谐，人们对教会怨声载道。于是相较纳瓦拉南部，反对拿破仑的声音在纳瓦拉北部地区更加响亮。

此外，时间维度也很重要。随着战事的推进，人们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战斗也日趋艰难。因此，人们对抗战的批评也多了起来。一方面，许多人不愿打仗，逃兵显著增多。在此基础之上，出现了盗匪劫掠与游击活动。事实上，这一时期的骚乱比单纯的反法斗争更加突出。这场骚乱预示着政治、社会体系的部分瓦解。另一方面，这次骚乱既反映了政府的衰弱，又进一步加速了政府的垮台。由此，骚乱确保了在强制力的作用下建立起来的新秩序，反过来又会被这种推动其

产生的强力所克制。由于局面难以预料，实现这个目标并非易事。

起先，1808年7月16日—19日，法国在拜伦战役中吃了败仗，约有1.8万名士兵向西班牙军队投降。之前，西班牙军方在安达卢西亚集结，力挫暴露无遗、指挥不力的法国军队。这是拿破仑军队在战场上的首次失败。随后，西班牙境内的法国军队撤到了埃布罗河附近。

然而，11月，拿破仑率领大部队卷土重来，重新占领了马德里。12月，西班牙对位于巴塞罗那的法军驻地的包围也被解除了。最高中央治理军政府（The Supreme Central and Governing Junta），即反抗法国统治的西班牙政府首脑，先是退至塞维利亚，后来又撤到加的斯——在那里他们能得到英国战舰的策应。西班牙国内的英军则撤退到了拉科鲁尼亚，并从那里撤离。

约翰·摩尔爵士：英勇的失败

如今，比斯开湾最知名的港口就是桑坦德，这是英国从朴茨茅斯至普利茅斯的渡船的目的地。排在桑坦德之后的便是以美术馆闻名于世的毕尔巴鄂。相较之下，19世纪，比斯开湾最著名的港口是科伦纳，1809年那场史诗般的大撤退正是在此地发生。

1808年秋，由约翰·摩尔爵士指挥的驻葡萄牙英军接到命令，驰援刚与法国开战的西班牙政府。11月11日，摩尔的军队进入西班牙，两日后抵达萨拉曼卡。因为没有看到西班牙之前许诺的接应部队，摩尔下令撤退，结果又收到西班牙紧急求救的信号。他不得不仓促命令部队继续前进，以破坏法国的交通线。尽管一支法国骑兵队在萨阿贡被击败，但听闻法军实力后的摩尔仍决定撤退。由于拿破仑坐镇马德里，法军会威胁到摩尔与葡萄牙的联系，于是摩尔被迫向科伦纳港口撤退。在这一过程中，摩尔需要面对冬季恶劣的环境以及势不可当的法军。英军撤退时，先头部队纪律涣散，溃不成军，但是训练有素的后方部队保持了队形并抵挡住了追击的法军。

1809年1月1日，拿破仑放弃了追击，并将后续工作交给了在科伦纳港的登船口追赶上了英军的尼古拉斯·让·德迪乌·苏尔特元帅。1月16日，英军击退法军。苏尔特所率军队人数并没有比摩尔的多多少，而且那里的地形也限制了法国骑兵的发挥。摩尔处于守势，防备着苏尔特的一举一动，从容应对着敌军预备军的拦截。

次日，英军成功撤离。但是，摩尔在之前的战斗中牺牲，这使他成了一位英雄人物。查尔斯·沃尔夫所作的《约翰·摩尔爵士的

葬礼》一诗以“没有一声战鼓”开篇，是19世纪文学与英语教学的经典之作。摩尔被葬于科伦纳。

西班牙陆军与非正规军因装备不良、补给不足、训练不力，屡屡败于法军之手，1809年11月的奥卡尼亚战役便是典型例证。西班牙向马德里进军的意图引发了这次战争。虽然名义上的指挥官是已成为国王的约瑟夫一世，但实际上，指挥着人数较少的法军的是苏尔特元帅。法国仰仗强大的火炮赢得了骑兵战，西班牙步兵被击溃。法军伤亡2000人，西班牙伤亡18000人，14000人被俘。随后，法国借助阿尔瓦-德托梅斯（Alba de Tormes）大捷，入侵安达卢西亚。惠灵顿公爵对西班牙军队的屡次受挫与法军的节节胜利感到失望透顶。法国在1810年占领了安达卢西亚（加的斯除外），1811年攻陷埃斯特雷马杜拉，1811—1812年夺取了加泰罗尼亚与巴伦西亚。法军所到之处生灵涂炭。1812年，位于加泰罗尼亚的蒙塞拉特本笃会修道院被法军洗劫一空。

然而，从驻地情况与伤亡人数上来看，法国承受着与西班牙军队作战的巨大压力：法军在西班牙的伤亡人数超过了大多数拿破仑的战役所造成的死伤。在与法国的正式交锋中，西班牙常常败下阵来，而英军将领则发挥了重要的领导才能。但是，西班牙正规军与游击队的作战使法国无法控制乡村地区。而且，西军极大地破坏了法军的交通与后勤。在1810—1811年的对法作战中，陆海协同作战是西军的一个突出特征。大批西班牙远征军被多次派往安达卢西亚各处海岸，然后向内陆挺进，向法军发起进攻。多亏了西班牙的抵抗，法国才无法将优势兵力集结，进而将矛头对准惠灵顿公爵——一旦法军击溃了西班牙人，他们就能这么做。要不是拿破仑在1812年入侵俄国，这种情况就极有可能发生。

1809—1811年，在进入西班牙之前，惠灵顿公爵率领的英葡联军成功地抵挡了法国的进攻，守卫了葡萄牙。1812年，惠灵顿公爵终于占领了位于西班牙边境上的两处要塞——罗德里戈城与巴达霍斯。在夺取了这两处天堑后，他率军继续向西班牙北部挺进，在萨拉曼卡打败法军后又占领了马德里。同时，英国陆海两栖军队突袭了比斯开湾。然而，惠灵顿公爵面对一大批即将向他袭来的法军，选择在1812年秋撤退，以免出现敌众我寡的局面。

1812年萨拉曼卡战役

西班牙保存最完好的战场位于萨拉曼卡以南，阿拉皮莱斯附

近的群山之中。原因有二：一是此处战场不易到达；二是如今的这一地区与当初的相比，几乎没什么变化。阅读罗里·缪尔（Rory Muir）的《萨拉曼卡：1812年》（2001年出版）是了解这场战役的不二之选。1812年早些时候，惠灵顿公爵攻陷了罗德里戈城与巴达霍斯。随后，他率英、葡、西三国联军入侵西班牙北部，并于7月22日在萨拉曼卡战役中击败法军。法国奥古斯特·马尔蒙元帅喜好大张旗鼓的性格使惠灵顿公爵有机会将法国军队逐个击破。惠灵顿公爵注意到法军扩张过度，战线拉得过长，因此迅速且有效地转守为攻。在他的得力指挥下，联合起来的步兵与骑兵摧毁了三支法国军队，其中有一队法军是被冲锋的英国骑兵的马蹄踏破的。多达52000人的联军中伤亡人数是5173人，其中英国或葡萄牙士兵的伤亡人数为6人；一队西班牙士兵奉命严阵以待，阻断法军逃亡路线，然而并未遇到敌人。法军伤亡人数为13000人，其中有7000人被俘。第51团列兵威廉·惠勒记录下了战场上的艰难处境：

我们接到支援右线的命令后，就开始加速前进。行军速度极快，尘土飞扬，加之白天温度正高，差点把人给闷死。现在大家开始感到严重缺水。水壶里有水的那些人情况也不比没水的好到哪儿去。因为天热再加上水壶剧烈晃动，里面的水已经完全变质了。喝水的人刚喝一口就马上吐出来了。我们前进时，炮火更猛了。大家都完全汗湿了……灰尘实在是大，弄得我们满脸、全身都是，以至于几乎认不出彼此。事实上，我们更像是一群扫烟灰的人或者说是清洁工。当我们终于抵达右线指定位置时，大家都累得要死；我们面前是一座山，敌人已在山上一字排开。他们放了16炮，又投了几枚榴弹炮欢迎我们的到来。

经此一战，法国放弃了安达卢西亚。

1813年，尽管在法军来犯之际，英国两栖部队放弃了对塔拉戈纳的围攻，但惠灵顿公爵再次率军进入西班牙。随后，约瑟夫·波拿巴为阻止英军进犯法国，逃离了马德里。法军主力在纳瓦拉与巴斯克地区对战西班牙游击队，约瑟夫的军队因与法军主力脱节，力量被削弱了。

惠灵顿公爵率领英、葡、西联军取得了决定性的维多利亚战役的胜利（6月21日）。此后，该城中心竖起了一座大型纪念碑以纪念这次胜利。在这场战役中，法军伤亡人数为8000人，他们的火炮悉数被缴或被毁，辎重也被没收。战利品包括约瑟夫收藏的重要画作。惠灵顿公爵乘胜追击，攻下了圣塞瓦斯蒂安与潘普洛纳。除一些要塞外，法国在西班牙的统治已经告终。约瑟夫退位并回到了法国。拿破仑战

争之后，他于1817—1832年流亡美国，后返回欧洲，并于1844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辞世。

虽然冲突仍在继续，但政治变革还是发生了。约瑟夫通过取缔隐修制度与宗教裁判所等举措，试图扮演明君的角色。但是，由于对不受欢迎的法国军队的依赖，约瑟夫的事业受到了损害，他作为共济会总导师的身份也引发了西班牙的众怒。另外，自1810年起，加的斯成为西班牙议会的召集地，成为包括西班牙殖民地民众在内的全体西班牙人主权的象征。1812年，议会发布宪法，将公民放在首位，极大地限制了王权。此外，议会还决定取消封建领主权力，推行免费初等教育。

这段插曲勾画了西班牙历史上一段本可能发生的伟大变革的背景，也极为有力地塑造了人们的观念：战争见证了立宪政体的发展，这一政体的核心在于将西班牙看作一个国家整体，而非强调地方自由权利。此外，立宪政体还为人们评价随后复辟的波旁王朝体制提供了参照系。与此同时，这种评价实则弱化了教会在对抗约瑟夫的无神论世俗支持者时所起的作用。实际上，在全欧洲的反法斗争中，宗教往往相当重要。

一旦战争彻底扫除了法国对西班牙的统治，费尔南多七世便迅速在1813年12月与法国签署了《瓦朗赛条约》并复辟。费尔南多执政至1833年离世。他无意做个英国式的立宪君主，因此在1814年拒绝了议会及其发布的宪法。自由派人士遭到清洗，曾效力于约瑟夫的人被当成罪犯。与卡洛斯四世一样，费尔南多也依赖上层贵族与教会的支持。

经历法国统治

法国的统治是残酷、花销巨大且具有破坏性的。收藏在普拉多美术馆的戈雅油画为人们提供了最鲜活的记忆。但是，能够唤醒人们对这段往事回忆的并不只有这些油画而已。塞维利亚与其他地方的多处教堂遭到破坏、洗劫，其中就有塞维利亚圣母马利亚十字修道院。法国人抢走了塞维利亚慈善医院小教堂里几幅穆里罗的画作，只留下了7幅。1808年，法国在巴塞罗那维持社会秩序的方式就是射杀所有嫌犯，没收富人与教会的财产。他们还以没收与强制性捐赠的方式将地方财富洗劫一空。与此同时，黑市交易繁荣。同年，法国袭取、劫掠了科尔多瓦。1808—1809年，法国围攻萨拉戈萨，激战导致数千平民丧生。1812年，格拉纳达的阿尔罕布拉宫被法军损毁。从宏观上来看，西班牙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均处于重压之下；目无法纪与

腐败堕落的问题日益加深。随时到来的威胁与不可预测性让人们生活在动荡不安之中，而这对法国统治的接受度与合法性均提出了挑战。

西班牙统治下的美洲

费尔南多七世拒绝立宪政体的做法加速了西属美洲统治的瓦解。早些时候，为反抗法国在1808年对西班牙的占领，西班牙统治下的美洲地区出现过独立的情况。例如，1809年与1810年，当地军政府以费尔南多七世之名武装夺权，他们对约瑟夫一世的反抗凸显了皇权的契约精神与民心向背。同时，这也使当地精英阶层获得了梦寐以求的权威性。他们所领导的社会正在发生方方面面的变化，在人口结构、经济与政治上均是如此。这一切让曾经的历史看起来越发有问题。

费尔南多重掌西班牙后，马上想要再度实行对西属美洲地区的控制，于是在1815年派出了一支军队。这次尝试起先是成功的。皇权得以复辟，而且，除遥远的拉普拉塔河流域外，其他地区的独立运动都被镇压下去了。

但是，费尔南多的事业面临着重重困难。拉丁美洲的保皇党内部分歧严重，而他们的分裂又与西班牙国内不连贯的政策所导致的前后矛盾产生了相互作用。民政与军事当局冲突不断，而大主教辖区与外省行政机构之间也经常剑拔弩张。因此，在新格拉纳达（今哥伦比亚），总督与总司令是死对头。此外，资金的短缺迫使保皇军靠没收当地补给与强迫性贷款度日。事实证明，这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让他们对西班牙统治产生了敌对情绪。同时，从西班牙派遣的保皇军也受到疾病，尤其是黄热病与痢疾的重击，因此，他们不得不从当地招募士兵，这又引发了新的政治问题。1815年，新格拉纳达整体上对来自西班牙的皇家军队持欢迎的态度，但是到1819年时，人们普遍支持哥伦比亚独立。

此外，与16世纪初西班牙征服者所拥有的技术相比，此时的西班牙不再具备相当的优势。当地反抗者从美国的军火商那里得到了一些补给。与之相比，西班牙政府为美洲军队配备的武器较少，保皇党使用的武器大多是从当地获得的。若要论及差异的话，反抗者反而在武器方面略占优势。

然而，战争的过程并不会按预先设定的那样发展下去。就像其他许多解放战争一样，殖民者取得的成功比人们普遍期待的要多。这种成功既指当地人对西班牙的普遍支持，也指西班牙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在瓜基（1811年）与锡佩锡佩（1815年）取得的胜利促使西班

牙重新夺取了上秘鲁（玻利维亚），而兰卡瓜大捷（1814年）帮助西班牙收复了智利。在1806年与1812年，西班牙人先后两次镇压了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领导的委内瑞拉起义。革命者并未得到广泛的支持且资金短缺，这些对西班牙来说都是取胜的助力。尽管起义军将领心中洋溢着革命的热情，但是大部分应征入伍的农民并非如此。他们薪水低，补给、装备差，训练不足。

战争的走向摇摆不定。米兰达曾经的下属西蒙·玻利瓦尔逃到了新格拉纳达，招募了一支志愿军，并于1813年进入委内瑞拉。他赢得了许多战役，但委内瑞拉共和国缺乏广泛的支持，部队也缺少资金与武器。玻利瓦尔逃往牙买加，后再度回到委内瑞拉。但是，1816年他从海地开始的远征未能赢得支持，最后也就半途而废了。玻利瓦尔将远征的起点选在海地，是因为法国对海地的殖民统治在1803—1804年结束了。玻利瓦尔的另一次远征于1818年以失败告终。

美洲的西班牙人因西班牙国内的衰弱而受到牵连，还因独立军甘愿通过远征鼓舞其他地方的斗争而遭殃。与美国独立战争相比，拉丁美洲的独立战争战场要大得多（从墨西哥到智利），且缺乏前者所具有的那种军事与政治的协调统一（因为没有类似大陆会议或大陆军的组织）。因此，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的形势瞬息万变，实在难以描述。大型山脉与疾病（如出现在墨西哥东海岸的黄热病）带来的问题，加剧了军事行动的困难。正如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一样，革命军的胜利并非必然，而且在战斗方面他们并非天生就比对手技高一筹。相反，双方都不得不在广阔的空间内去适应冲突带来的各种困难。成功来之不易，或者说，组织起后勤支援并非易事。这些问题使得地方与区域的维度变得至关重要。结果正如在墨西哥出现的情况一样，暴动变得碎片化。参与镇压起义的西班牙军队也是四分五裂。由于缺乏中央监管，西班牙军队的众指挥官试图建立地方权力中心。无论是西班牙军队，还是起义军，都因后勤需要而变得不那么受人欢迎。双方皆征用、掠夺物资以获取给养，给社会造成了巨大伤害。

此外，西班牙国内政策的转向拉开了保皇党与其拉丁美洲支持者之间的距离，使保皇党遭受重创。事实上，改变后的政策最终导致了1823年西班牙内战的爆发。与此同时，独立军的作战能力与指挥才干——特别是1817—1818年何塞·德·圣马丁在智利，以及1813—1825年西蒙·玻利瓦尔在南美洲北部与安第斯山脉的艰苦卓绝的战争中所展现出的指挥领导才能——有效地消磨了日益孤立的保皇军的镇压。

从全球的层面上来看待问题颇为关键。事实上，我们不应将这些独立战争视为欧洲强国的失败。更妥帖的做法是将它们看作西方社会内部权力转移的一个方面，即大英帝国非官方层面的重要扩张。长期

以来，英国都表现出了对拉丁美洲商业渗透的兴趣，显露出支持拉丁美洲独立于西班牙的意愿。英国的志愿者以及外交、海军方面的援助在这场独立战争中作用显著，阻断了法国打着西班牙的旗号介入战争的可能。拉丁美洲国家一独立，就与英国建立起了密切的贸易关系，并成为英国投资的主要地区。而此前这些国家仍是殖民地的时候，殖民国家将它们排除在贸易网络之外，使它们无法与英国直接进行贸易往来。

种族问题也使拉丁美洲独立战争变得复杂。暴动得到了梅斯蒂索人（混血人种）的广泛支持，这被视为对克里奥尔人的威胁。克里奥尔人担心种族战争一触即发，而这种观点又导致古巴、墨西哥与秘鲁的克里奥尔精英站在了西班牙一边。因此，保皇党能够调动当地民兵对抗起义者。相反，在起义军一边，玻利瓦尔处决了著名的梅斯蒂索领袖。据说他这么做不仅是为了宣扬种族战争，也是为了保持对战争的控制权。

保皇党捷报频传，他们通过轻骑兵纵队克敌制胜。1815年，一批活跃的保皇党将领从西班牙来到拉丁美洲，他们在之前抗击法国的暴动冲突中积累了经验。在他们的帮助下，保皇党研发出了镇压起义的新手法。1812年，墨西哥韦拉克鲁斯州附近的帕潘特拉地区曾爆发起义。1818年，保皇军虽然重新占领了那里的城镇，但暴动并未平息，反而演变成了游击战。驻扎在城镇中的保皇军无法控制农村腹地。1820年夏，在新指挥官何塞·林孔的领导下，保皇军调整了过去的做法，改变了战争的节奏。之前，雨季是战争的间歇期，这给了起义军休养生息的机会，而林孔决意取消这种战斗间隙。他在攻打科尤斯基胡伊（Coyusquihui）要塞的战役中，用堡垒将该地区团团围住，不停攻城，打击敌人。同时，保皇军饱受疾病之苦。当年，双方达成和解。

尽管保皇军屡屡得胜，包括1806年、1812年、1816年与1818年在委内瑞拉的胜利，1811年与1815年在玻利维亚的胜利，1814年在智利的成功，以及1815年在墨西哥的告捷，但要想结束这场斗争仍是十分困难的。起义军撤离到更加偏远的地方，在那里继续反抗。保皇军未能想出有效的和解之策，而他们对镇压的偏重最终起到了反效果。在委内瑞拉，平民被迫迁移至临时营地。19世纪90年代，古巴也出现了这种强行安置。在拉丁美洲，革命军指挥官利用双方关系破裂之机的能力，以及迎难而上、持续战斗的能力至关重要。最终，1824年12月9日，在保皇主义的堡垒秘鲁所进行的阿亚库乔战役中，保皇军败下阵来。事实证明，这一战役具有决定性意义。安东尼奥·何塞·苏克雷率领了一支5780人的军队，先打反击战，再调动步兵与骑兵后

备役突破敌军包围，最终打败了总督何塞·德·拉塞尔纳指挥的9300人的部队。在这次战役中，保皇军损失了包括被擒总督在内的多名高级指挥官，保皇党群龙无首。

墨西哥的情形则大不相同。1810年暴动到了1811—1812年以及1815年遭受了沉重打击，而游击战到1820年已基本结束。然而，保皇军的努力被1820年西班牙国内自由派的宪政改革削弱了。这与英国在北美洲的努力被英国政府1782年的改革所破坏一样。克里奥尔保守主义者与西班牙掌权派不愿看到这样的事态发展，但这次宪政改革最终提出了独立宣言。1821年，保皇军总指挥阿古斯丁·德·伊图尔维德试图与叛军达成共识作为解决对策，于是就独立宣言与叛军达成了一致。事实证明，独立宣言具有广泛的认可度。迫于其他地方施加的巨大压力，西班牙在那一年正式承认墨西哥独立。

结果表明，西班牙未能控制住事态的发展。一方面，它要应对西属美洲地区内部持续的反抗；另一方面，因海上霸主英国乐意向叛军提供援助，尤其是英国通过贸易与认可主权的方式对叛军给予帮助，西班牙常常受创。截至1825年年底，西班牙对美洲本土的控制已结束。西班牙殖民帝国的版图已经缩减至只剩一些岛屿：加那利群岛、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以及类似海岛的飞地西属摩洛哥。

19世纪20年代西班牙危机

在西班牙国内，由失去西属美洲地区引发的政治、经济与财政危机加深了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带来的威胁。阴谋与意识形态分歧相伴而生。

1815年，由自由主义军队领袖所策划的政变在加利西亚被挫败，又于1817年在加泰罗尼亚被打压。但是，1820年，一场自由主义革命席卷皇宫，迫使费尔南多七世在1821年认可1812年宪法。保守主义者仍拒绝接受并诉诸暴力。他们在1822年发动了一场失败的政变，在1823年煽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法国军事干预。

1823年，反对派西班牙自由主义军队因缺少补给，领不到薪水，且受到大范围逃兵的影响而撤退了。自主主义者内部四分五裂，预示着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他们反对教会干预政治的措施引起普遍的反感，尤其是在农民中间。此外，自由主义政权因施行现金经济，特别是采取逐项记数的现金支付来代替什一税的做法，在农村地区变得很不受欢迎。这项措施是加重农民经济负担的名目，它导致自

由党政权在1823年迅速垮台。

法军虽受糟糕后勤工作的拖累，但不需要打什么仗。抵抗仍然存在，尤其是在加泰罗尼亚。拿破仑战争仍在那里回荡着：加泰罗尼亚曾被邦·阿德里安·让诺·德·蒙塞（Bon Adrien Jeannot de Moncey）率领的第四兵团占领，此人之前被拿破仑封为元帅。巴塞罗那被困数月后，蒙塞元帅与弗朗西斯科·埃斯波斯·伊·米纳（Francisco Espoz y Mina）交锋，后者在半岛战争中成功地指挥了游击战，并于1812年击败了法国军队。弗朗西斯科·巴列斯特罗斯（Francisco Ballesteros）指挥了纳瓦拉与阿拉贡的自由派反抗军。1810—1812年，他在安达卢西亚的反法军事行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法国将攻势对准了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并于5月23日攻入该城。接着，法军经由科尔多瓦向自由派议会逃窜的目的地——加的斯进军。在半岛战争期间，法军围攻加的斯的行动惨败，部分原因在于当时英国海军的作用。如今，不同之处在于法军从陆上将加的斯团团围住，同时也从海上将它封锁起来。10月1日，加的斯投降。战斗在其他地方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是，法军一一取得了成功，反对派诸将相继投降：加利西亚的巴勃罗·莫里约（Pablo Morillo）于7月10日投降，安达卢西亚的巴列斯特罗斯在8月21日缴械投降。

费尔南多七世重掌绝对权力后，处决、囚禁、清洗了自由派人士。也有像巴列斯特罗斯与莫里约那样选择亡命天涯的自由派。但是，秩序并未因此得到恢复。1827年，发生在加泰罗尼亚群山之间的“愤愤不平者的起义”（Revolt of the Aggrieved）反对那些被视作费尔南多身边佞臣的人。起义得到了被清洗官员的支持，但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至此，加泰罗尼亚再一次成了反抗卡斯蒂利亚王国的主力。

探索西班牙

英国人深受西班牙陆上风光的吸引，前往西班牙旅游的人越来越多。社会风潮有转向一种浪漫主义情怀的趋势。1784年，在这种新情绪的感召下，亨利·里德沉迷于西班牙北部风景：“这次旅行比我预期的更令人愉快。比斯开湾的乡村与群山富有浪漫情怀，风景变化多端，实在悦人耳目。”两年后，身为医生与牧师的约瑟夫·汤森德（1739—1816年）骑马从莱昂奔赴奥维耶多：“越过了人们所能想象到的最原始、最浪漫的乡间。这里有奇山异石、秀木丽水。”他后来又出版了《1786—1787年穿越西班牙之旅》（1791年出版）。这本书吸引了许多空想旅行家。

另一位旅者托马斯·哈代（不是那位小说家）在1786年颇具前瞻性地发现了另一个旅行的理由。他在马拉加写道：“（身体欠佳使我）逃离了我们北方的寒冬，前往地中海岸上寻找夏天……这里南部海岸的气候在欧洲范围内称得上得天独厚。我很奇怪那些被送到法国南部或者里斯本养病，结果冻得直哆嗦的病弱者居然没考虑过到这儿来。”由于自1808年以来英国与法国军队在西班牙的军事投入，这里变得更为外人所知，对他们也就更具有吸引力了。

解读西班牙

约瑟夫·布兰科·怀特（1775—1841年）本名何塞·布兰科·伊·克雷斯波，是一名具有爱尔兰血统的西班牙人。他在成为罗马天主教神父后去了英格兰。在那里，他担任了《埃斯帕西诺》（*El Español*，意为“西班牙人”）月刊的编辑。这本在伦敦出版的西班牙语月刊支持西属美洲的独立事业。他写作了《西班牙来信》（1822年），其中部分内容之前曾发表在《新月刊杂志》上。《西班牙来信》对西班牙的描述有些负面。该书前言提及“西班牙的偏执”以及“由宗教所引发的腐坏，得到了政治改良的滋养”。这本书中更为积极的一面是对公共礼仪的引导。例如：

午饭后睡觉的习惯叫午睡（siesta）。午睡在夏天很普遍，尤其是在安达卢西亚，这儿的酷暑让人无精打采、昏昏欲睡。冬天在午饭后散步十分普遍。许多先生在下午散步前常去咖啡厅——如今这俨然已成为一种时尚。

几乎所有具备一定规模的西班牙城镇都建有公共步道，下午那里聚集了散步的上层阶级人士。

早餐并非家庭中固定的一餐。它通常由巧克力、黄油吐司或者被称为小圆面包的松饼构成。这里多食用爱尔兰盐味黄油；酷热的天气让乳制品成了奢侈享受，它只在北方多山的大片土地上比较普遍。

第九章

工业革命：西班牙人懒惰被动吗

“西班牙的政治冒险……人性的阴暗面。”

对大多数局外人来说，19世纪的西班牙史显得尤为晦涩难懂，明显不合逻辑，尤其是在1825—1898年。卡洛斯战争纷繁复杂，政治叙事无足轻重，而且也很难对其进行清算和概述。西班牙在经济增长、社会转型、政治发展与国际影响上，与其他许多欧洲国家相比，更是相形见绌。但是，这远非全部事实，也没能把握住这个时期对后世的重要意义。事实上，这一时期与此前一段时期之间具有延续性，比如，它延续了自由派人士与保守主义者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1825—1898年与随后即将发生的众多事件关联紧密。19世纪的影响毫无疑问波及了1936—1939年的西班牙独立战争，甚至延伸至佛朗哥执政期（1939—1975年）。

社会经济变革

政治冲突以社会经济变革为背景。虽然西班牙几乎没有经历过法国那种广度与速度的经济发展及社会变革，更别提英国、德国了，但是西班牙发生的实实在在的变化仍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尽管西班牙存在着食物短缺、疾病与大规模的移民出境现象，但它仍拥有了比此前多得多的人口。西班牙人口数量从1830年的1100万左右，上升到1930年的2350万。这是由年龄结构变化导致的。随着婴儿死亡率下降，平均寿命有所上升。因此，尽管年轻人的数量有所增加，但西班牙人的平均年龄更大了。

鉴于长期存在的土壤贫瘠与干旱等问题，养活这么多人对西班牙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政府补偿性投资不足，还要面对来自新大陆的竞争。那里的土壤更加肥沃，铁路、汽船与投资使新大陆的小麦出口变得更为便捷。1891年，西班牙对进口小麦征收高额关税，使地主受益，却沉重打击了城市消费者。这正是英国反对此类关税的原因。土地所有者主要是拥有堪称封建统治权的传统地主，以及走向上层社会的中产阶级。相比之下，农业劳动者干了大部分的工作，所得报酬却少得可怜。事实上，他们还受到了过高的食品价格的冲击。

迟到的工业革命

尽管工业变革此前被长期以来由农业占主导的经济所遮蔽了，但现在它将带来更加翻天覆地的变化。发生变化的主要领域是纺织、冶金、矿物生产与铁路。加泰罗尼亚使用了蒸汽动力驱动纺织制造，从而确保了自19世纪30年代起的纺织业飞速发展。纺织制造业的发展创造了就业机会，产生了可用于投资的资本，还打造了劳力与资本所活跃的重要工业世界。巴斯克地区诸省的冶金业也是如此，尤其是在比斯开省，那里的冶铁工业是炼钢与造船的基础产业。在西班牙其他地方，矿物生产量有了显著增长，铜、水银与锌的产量增长尤为突出。外国资本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在《1855年铁路法案》发布后，正是资本促进了铁路修建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铁路既象征着也实现了整合与汇集。主要的火车站都由壮观的建筑物构成，如马德里火车站。铁路促成了更高整合度的经济。

工业产出、外国贸易以及人均实质性收入均有所上升。然而，西班牙的数据在与英国、法国、德国的相比时，情况并不乐观。这一部分是由投资资本的缺乏造成的，一部分是因为西班牙国内市场相对疲软，还有一部分也许是国内政治动荡所付出的代价。经济增长虽不是导致政治动荡的唯一原因，但也确实产生了影响，因为它加深了发展缓慢、移民外迁严重的中央地区与更具活力的边缘地带之间的差异。加泰罗尼亚的工厂数量全国首屈一指。马德里则把重心放在了车间上。资源也相当重要，尤其是西班牙相对缺乏的煤炭资源。1905年，西班牙煤炭产量为3202000吨，而比利时是21775280吨，英国是236128936吨。

由经济增长——更确切地说是工业化——所引发的社会变革造成了政治上的影响。工会意识增强。乡村地区人口迁移促进了城市化发展，以马德里为典型。住房短缺，意味着棚户区兴起。然而，1900年，仅有2万余人住在城镇，他们占总人口的21%。这个比例远低于法国，更低于英国。因此，与这两个国家相比，西班牙的中产阶级政治文化相对薄弱。

政治冲突

对经济、社会与政治变革的抵制助长了保守主义团体卡洛斯派（Carlists）的气焰。这一团体之所以被称为卡洛斯派，是因为支持唐·卡洛斯（Don Carlos）在其兄费尔南多七世1833年去世后对西班牙王位继承的主张。唐·卡洛斯是卡洛斯四世的次子，也是其假定继承人。卡洛斯派的据点位于西班牙北部农村地区，那里的文化动力来自根深

蒂固的天主教信仰。费尔南多七世死后，他的幼女即继承人伊莎贝拉二世（1833—1868年在位）登基，由其母玛丽娅·克里斯蒂娜摄政。与费尔南多七世不同，他的寡妻转向了温和派，这是一群自由派精英，他们愿意在1834年皇家法令中搁置1812年宪法的一些方面，例如，男性普选权与无限制的议会权威。宗教裁判所受到了打压。1833年，为了结束旧王国时代，西班牙依照法国的模式，以省作为行政区划。事实上，所有的中世纪王国都被细分为省，而每一个省都以与省同名的城市为中心。

这正是宪政自由主义。但是，这并不能使由中产阶级组成的进步派感到心满意足。1836年，他们促成了教会地产的拍卖，不过买下土地的大多是本已大富大贵之人，而非小地主。当初公共用地的拍卖情况大抵相同。教会地产的出售遵循了撤销不动产限嗣继承的法律，致使大多数修道院解散。这正中约瑟夫一世（约瑟夫·波拿巴）下怀。同时，出售教会地产使城市有机会大兴土木，建造新建筑。但是，土地“改革”在农村地区普遍不受欢迎，因为它威胁到现有土地的使用。1837年宪法只把选举权扩大了一点儿，没有做出重大的改革。

第一次卡洛斯战争

这一时期，发生在西班牙的历时最久的一次冲突再次被大多数军事史权威著作所忽视。对这场战争视而不见是错误的，因为它向人们暗示了内战中政治运动的本质。1833—1840年，在第一次卡洛斯战争中，“卡洛斯五世”唐·卡洛斯拒绝接受由年幼的侄女伊莎贝拉二世继承王位，而这正是伊莎贝拉的父亲、卡洛斯的哥哥费尔南多七世的遗愿。卡洛斯拒不接受女君主，对伊莎贝拉的支持者所主张的宪政改革，以及更普遍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均持敌对态度。王朝会受到具体的社会与地理环境的影响。恰如葡萄牙的米格尔主义一样，卡洛斯主义是一场利用了农民对自由派政府不满情绪的保守主义运动。因此，它不仅反映了之前拿破仑时期的紧张局势，还反映了人们对18世纪末启蒙运动时期改革的抵触。

由于政府与军队（这和1936年的情况不同）表示继续忠于伊莎贝拉二世，卡洛斯不得不组建自己的军队。卡洛斯在战场上最初取得的胜利主要归功于托马斯·德·祖马拉卡勒圭（Tomás de Zumalacárregui，1788—1835年）。他是卡洛斯军队在巴斯克-纳瓦拉地区的指挥官。作为一名巴斯克地区的老兵，他曾参与反对拿破仑的斗争。这确实为强调地方自由权利的卡洛斯派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榜样。祖马拉卡勒圭使卡洛斯派的军事行动变得连贯统一起来，这是一直以来的反抗斗争不可或缺的一大要素。为掌

握战争主动权，祖马拉卡勒圭还组建了一支游击队。他们充分利用了困难的地形并取得了成功。这支军队纵横于正规军罕至的西班牙北部山区，这里正是卡洛斯派支持者的聚集地。但是，当这支军队离开群山，想要去占领城市时，就没那么成功了，不过他们仍在1836年短暂攻占了科尔多瓦。包括北部的毕尔巴鄂与潘普洛纳在内的城市主要由自由派控制。常见的老式堡垒散布于大型城镇与交通要道周围。在卡洛斯派的进军之路上，这些地方接连沦为战场。另外，自1834年起，克里斯蒂诺派（人们对伊莎贝拉及其母玛丽娅·克里斯蒂娜的支持者的称号）遵照半岛战争时期法国在阿拉贡修筑的防御工事的样式，沿埃布罗河在巴斯克-纳瓦拉-拉里奥哈地区建起了一系列碉堡，修筑了重要的防御工事。卡洛斯派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久之后，他们就在蜿蜒于密林蔽日的山坡上的前线建起了座座堡垒。1835年、1836年，毕尔巴鄂先后两次遭到卡洛斯派的围攻。作为防守工作的一部分，克里斯蒂诺派在山坡偏远的建筑物上建造了防御工事。

国际时局对伊莎贝拉二世的助益，是战争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而错误地相信游击战策略与战术的人们往往低估了国际环境的重要性。伊莎贝拉二世得到了英国、法国的支持，而且米格尔一世一被打败，葡萄牙也站在了她这边。尽管19世纪30年代的战争无法与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相匹敌，因为在后来的那场战争中，交战双方都得到了竞争对手的武力支援，但事实表明，坚强的国际后盾对伊莎贝拉来说至关重要。伊莎贝拉所获得的支持，加之卡洛斯派执着于传统战争而暴露出的弱点，共同导致了后者最终的失败。1835年，在围攻毕尔巴鄂失败后，祖马拉卡勒圭战死。1837年，在唐·卡洛斯率领下，卡洛斯派向马德里发起进攻，但他们未能推翻伊莎贝拉的政权。

战争中的许多战役都不为人所知，例如拉维加隘口之战（1835年）、德斯卡加之战（1835年）、门迪戈里亚之战（1835年）、埃尔纳尼之战（1836年）、马哈塞特河战役（1836年）、卢查纳战役（1836年）、奇瓦战役（1837年）、纳瓦罗斯村战役（1837年）、阿兰苏埃克之战（1837年）以及莫雷利亚之战（1838年）。对这些战役的忽视歪曲了对这一时期战争的整体性描述。事实上，这些战役及与之相关的军事行动表明了这一时期及其他时期克敌制胜的关键。在战斗中，士气、经验、突袭、地形与人数都非常重要。就算它们不比有效的战术更关键，至少也与后者同等重要。战斗没给人们留下多少进行复杂运作规划的空间，也不能通过严密的编队执行精密的战术。在拉维加隘口战役与德斯卡加战役中，人数较多的政府军在突袭战中被卡洛斯派击溃。突袭同样对阿兰苏埃克战役中卡洛斯派的惨败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一战役标志着1837年他们在西班牙中部地区

军事行动的结束。相比之下，门迪戈里亚的恶战源于祖马拉卡勒圭的继任者比森特·冈萨雷斯·莫雷诺（Vicente González Moren）的决心。他想给政府军以致命打击，但他的选择委实糟糕。卡洛斯派不习惯处于守势。面对政府军进攻的压力，他们最后不得不撤退。卡洛斯派损失了约2000人。这对他们而言是个重大的打击，这也意味着祖马拉卡勒圭之前的节节胜利被中断了。

然而，政府军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其中，欠饷与补给不足的问题尤为严重。与其他内战相同，策略、士气与军事指挥才能均与政治考量相关。例如，卡洛斯派的内部分歧削弱了他们的行动，并最终促使第一次卡洛斯战争走向终结。1839年，卡洛斯派的总司令拉斐尔·马罗托（Rafael Maroto）在与政府军指挥官巴尔多梅罗·埃斯帕特罗将军（General Baldomero Espartero）协商签订《维加拉公约》之前，拘捕、射杀了5名来自敌对派系的将军。那些拒绝接受这项协议的卡洛斯派在拉蒙·卡布雷拉（Ramón Cabrera）的带领下，继续在阿拉贡与加泰罗尼亚进行战斗。失败后，他们在1840年逃亡法国。尽管卡布雷拉返回西班牙，领导卡洛斯派游击队参与了1846—1849年的另一场战斗，但是战场也仅限于加泰罗尼亚地区。

因战胜卡洛斯派而声名远播的将军们在温和派与进步派之间的竞争中越发举足轻重，同时，也使两大阵营的对抗变得更加复杂。战争促进了军队的政治化与政治的军事化。将军们采取了“公告”（pronunciamientos）政策，公布了自己的要求。1836年，富有见地的美国外交家亚瑟·米德尔顿评价道：“首都无疑任由众将处置。只要这些将军手下有四五千人的军队可供驱使，他们就能对首都发号施令。因此，如今看来，问题就是谁将实施专政。”巴尔多梅罗·埃斯帕特罗将军（1793—1879年）身经百战。他参与过自1809年起的反法作战，以及后来对1815—1826年西属美洲动乱的平定，还主导了自1840年起进步派的统治。他在1836年卢查纳战役中，大举击溃了卡洛斯派，名声大振。1841年，他开始摄政，并于当年挫败了一场计划中的政变。

另外，1843年，保守派将军拉蒙·纳瓦埃斯将军（General Ramón Narváez）打败埃斯帕特罗后，推翻了后者的统治。纳瓦埃斯将军经历过卡洛斯战争。在他的带领下，温和派在马德里城外的托雷洪-德阿尔多斯打败敌军残部，并重新掌权。1842—1846年，华盛顿·欧文担任美国驻西班牙大使，他在1844年5月写道：“这个国家令人不快的政治让我感到疲倦，有时还让我觉得沮丧……西班牙的政治冒险……人性的阴暗面。”

温和派限制了选举权，并于1844年成立了国民警卫队，还镇压了古巴的反抗。依据1845年宪法，温和派加强了君权与中央政府的职权。他们还基于卡洛斯三世任用开明大臣的模式，试图通过改革使西班牙走向现代化。改革的许多主题（如教育）并不新鲜。但是，统一的税收制度在当时是一项重要创新。

废除奴隶制

18世纪末与19世纪初，西班牙并没有什么废奴主义运动。自由派议会甚至还于1811年与1813年两度拒绝采取废奴主义措施。1814年，西班牙顶住了来自英国的压力，拒不限制奴隶贸易。1817年，当西班牙就英国施压做出回应时，也没为履行条约做出多少努力。直到19世纪30年代，一场货真价实的废奴主义运动才在西班牙拉开帷幕。对于以单一栽培产糖作物为主的西班牙经济而言，奴隶制依然至关重要。古巴经济依赖于美国的投资市场与技术。1837年，西班牙国内废除奴隶制，波多黎各则是在1873年，古巴是在1886年。自1874年起，在西班牙执政的历届自由派政府均实行了一些重要措施。1890年，他们还在西班牙实行了男性普选制。1862年，第一代罗素伯爵、英国外交大臣约翰以典型的英式自由党风格抨击了当年的情况："对英国人来说，宗教迫害与奴隶贸易都是龌龊的。可是，在西班牙人看来，它们却弥足珍贵。这使西班牙人处境更加糟糕了。"

1854年，社会动荡与军事反抗导致温和派被推翻，埃斯帕特罗与进步派卷土重来。新成立的民主党想要进行更激进的变革，包括普选权与农业方面的改革，结果，他们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是因为变革的呼声引发了食品价格上涨，致使埃斯帕特罗政权在1856年被推翻了。与此相呼应的是莱奥波尔多·奥唐纳将军（General Leopoldo O'Donnell）发布的以武力为支撑的"公告"——这位具有爱尔兰血统的将军呼吁重组政府。

大国西班牙

19世纪40年代，为了快速运输军队，以及在镇压暴乱、平定海盗的远征行动中提供陆海作战支援，西班牙海军开始使用蒸汽动力。相较其他船型，汽轮的优先级更高，因为军队满意它提供的部队机动性。1849年，西班牙派出9000人的援军，与法国军队一道恢复教皇在罗马的统治。尽管西班牙背负着巨额国债，但其军队在莱奥波尔多·奥唐纳将军（1809—1867年）的指挥下，还

是自1859年起参与了一系列帝国大事件。这么做是为了获取公众支持，同时也反映出西班牙想被当作一个大国的心愿，还让人觉得西班牙仍有意参与拉丁美洲事务。奥唐纳将军在1856年、1858—1863年与1864—1866年执掌西班牙大权。他是一个干涉主义者，很喜欢在国际舞台上张牙舞爪。

西班牙加入了法国领导的对越南与墨西哥的军事干涉。同时，为应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扩张主义，1859—1860年，西班牙自行在摩洛哥开战。结果，它在1860年占领了得士安与伊夫尼，并在1861年恢复了对圣多明各（今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控制。然而，西班牙在1843年占领的西非的姆比尼（Rio Muni），以及后来的伊夫尼都没有成为其进一步扩张的大本营。此外，1866年，来自美国的压力迫使西班牙结束了对秘鲁与智利的海上军事行动。同时，由于当地人的反对，西班牙也放弃了控制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尝试。这最终成了一次无益的投入。

奥唐纳的自由联盟政党（Unión Liberal）希望寻求更广泛的支持。但是，1863年，他被排挤出局。随后，伊莎贝拉女王成立了一个保守主义政府，首相最初由米拉弗洛雷斯侯爵担任，随后是纳瓦埃斯。奥唐纳后来再度掌权。1866年，进步派人士胡安·普里姆（Juan Prim）将军试图掌权，但这场革命被奥唐纳镇压了下去。

政府的不受欢迎与经济压力引发了1868年起义，这是又一次的“公告”。弗朗西斯科·塞拉诺（Francisco Serrano）领导的革命军在阿尔科莱阿取得了胜利。不够老练世故的伊莎贝拉二世在耗尽了她的个人与政治资本后被推翻，开始了流亡生涯。这次所谓的光荣革命不仅改组了内阁，还推翻了君主统治。

随后，众所周知的“六年革命岁月”见证了宪政实验、政治分歧、西班牙与古巴的起义，还有包括1870年任首相的普里姆在马德里遇刺在内的一系列刺杀活动，以及对于可行君主的搜寻。塞拉诺作为一名参与过卡洛斯战争的将军，在19世纪40年代初的军事政治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同时，他也是奥唐纳的盟友。1867年奥唐纳死后，他接替了奥唐纳的职务，成为自由联盟政党领袖。1868年，塞拉诺成为革命军指挥官，后来他担任了首相，最后成了摄政王。

19世纪西班牙史：古巴视角

1959年，在古巴掌权的政权隆重地纪念了19世纪两次重要的反西班牙统治的暴动。发生在1868年的第一次暴动与西班牙国内

推翻伊莎贝拉二世统治后所产生的危机有关。西班牙人在试图镇压古巴起义时，发现山地作战困难重重，但是古巴人内部在种族、地理与团体之间的分歧让他们有机可乘。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古巴人内部的各种不和才使得许多人愿意支持西班牙。尤其是自1870年起，古巴白人将起义看作是一场由黑人领导的反奴隶制革命，因而抵触情绪日益强烈。西班牙军队也采取了严厉措施，包括杀害起义军家属，强制命令农村人口搬迁从而开辟出自由开火区，这都使起义者无法获取平民援助。1876年，西班牙内战一结束，25000人的军队就被派往古巴。1878年，西班牙恢复了对古巴的控制。古巴失败的独立战争为暴动地区争取到了奴隶制的部分废除，促使日后奴隶制在古巴全岛范围内逐渐被废止。

1895年左右，暴乱再起。西班牙军队虽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受到了游击战、疾病、恶劣天气与雨季的影响。为此，西班牙军队强迫古巴人民从乡村搬往城市。在那里，人们被围在带刺的铁丝网内。疾病与食物短缺为他们带来了深重的磨难，尤其是黄热病，它夺去了营地中150000至170000名古巴人的生命。1898年，美国成功介入，结束了西班牙在古巴的统治。

宗教改革是一个重要因素。事实证明，革命者反对教权，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寻求扩大宗教自由。这也预示着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在1931—1936年的境况。开明的1869年西班牙宪法倡导宗教自由：它仍认可天主教的国教地位，但容许其他宗教的存在。这一点在许多天主教徒看来是无法接受的。他们同样不认可世俗婚礼与反对教会鸣钟的措施。这些政策明显与西班牙的“深层历史”——西班牙的民族身份与传统——发生了冲突。在城镇中，摧毁修道院为修建新街道让路的行为具有象征性意义，也引来了人们的愤怒。教会利益与宗教问题被高度政治化了。这一状况将在20世纪30年代重现。

在经历了艰难而又漫长的选择之后，1870年11月，意大利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的次子，西班牙萨伏伊王朝的阿玛迪奥被选举为西班牙国王阿玛迪奥一世。时事多艰，阿玛迪奥未能守住自己的王位，尽管他大难不死，挺过了1872年的一次重大的暗杀行动——当时，皇家马车在马德里阿维纳尔路遭遇枪击。时事之艰难还包括军队哗变，这是军队表达政治信仰的标准做法。阿玛迪奥的统治没能像1516年哈布斯堡王朝那样，带来新的盛世。更显而易见的是，它也不像1700年的波旁王朝。

阿玛迪奥发现自己与大臣们合不来，尤其是塞拉诺。于是，1873

年2月，阿玛迪奥退位，一个共和国宣布成立。这与法国的情况一致。1848年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一世被推翻，以及1870年拿破仑三世被打败后，法国先后宣布成立了一系列的共和国。但是，此时西班牙共和国的成立既违背了西班牙历史的规律，也不符合这一时期欧洲统治的本质。阿玛迪奥对国会说，西班牙人民无法管教。他回到了意大利，继续做他的奥斯塔公爵去了。

共和国采取了联邦制，古巴、波多黎各与太平洋群岛也被包含在其版图之内。但是，共和国并未终止社会的无序状态，其中就包括1873年宣告成立的一些自治“区”。这些极端反对中央集权的地方分裂主义者，因内部不和以及对民兵的依赖，实力有所削弱。除卡塔赫纳外，各处的地方分裂主义者都很快被镇压下去了。卡塔赫纳直到1874年经历了陆海围困后才陷落。在巴伦西亚南部的阿尔科伊，1873年爆发了“石油革命”。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起义工人们手举浸着石油的火炬。工人们控制了阿尔科伊，并宣布独立，不过随后就被军队镇压了。这是无政府主义者与掌握军权的西班牙共和党人之间一次重要的关系破裂。

另外，1872年，另一次卡洛斯战争爆发了。如果不将1846—1849年的卡洛斯战争看作一场战争的话，1872年的这场就是第二次卡洛斯战争；如果将其看作一场单独的战争的话，那1872年发生的就是第三次卡洛斯战争。这次的卡洛斯战争远没有第一次严重，因为此时对卡洛斯派的支持仅限于西班牙北部，尤其是纳瓦拉与加泰罗尼亚高地，尽管卡洛斯派在其他地方也制造了麻烦。他们自己也受到了内部不和的影响，还遭遇了主要城镇的抵抗、供应基地的缺乏或行政管理不足，以及外国援助的缺乏与有才干的指挥官的缺失。1874年是战争中关键性的一年，卡洛斯派围攻毕尔巴鄂，但围困最终被解除。1875年，加泰罗尼亚被平定下来。卡洛斯派也被驱逐至纳瓦拉与巴斯克省。据估计，当时卡洛斯派有35000名志愿军，而西班牙军队是155000人。1876年，卡洛斯派的最后一支野战军在蒙特胡拉山被击溃，战争就此结束。如今，当地人仍会在原址举行一年一度的卡洛斯派庆祝活动。

许多人，尤其是军人，将共和主义等同于无政府主义，认为它理所当然会走向政治失败。1874年12月，军事领袖们发动了一场政变。他们先是强制推行保守主义，接着又确立了波旁王朝式的君主政体，具体形式就是拥立伊莎贝拉二世之子阿方索十二世为西班牙国王（1857—1885年，1874—1885年在位）。他曾在英国的桑德赫斯特接受教育。对社会稳定的普遍渴望促使人们对这一解决方案表示支持，并在某种程度上使这一政权维持了较长时间。君主立宪政体似乎

是最佳方案。阿方索十二世参与了1876年对阵卡洛斯派的战斗。这场关键性的战役导致了卡洛斯派最终的失败。在此前的1870年，伊莎贝拉已让位于阿方索。随后，她在享乐与争吵中度过了平淡无奇、波澜不惊的流亡生活，并于1904年在巴黎逝世。

西班牙的形象：卡门

乔治·比才的《卡门》是最受欢迎的歌剧之一。它大体上是基于法国作家普罗斯佩·梅里美1845年的同名小说所作。梅里美在1830年广泛游历了西班牙，他也许就是在那儿听到了这个故事。歌剧故事发生的背景是1820年左右的塞维利亚及其周边山区。第一幕发生在一家18世纪大型烟草工厂外，卡门和许多女工都在那儿卷雪茄烟务工。如今，人们可以参观那家存留至今的工厂以及当地的塞维利亚大学。最后一幕发生在斗牛场外。人们同样可以前往斗牛场参观。歌剧中的西班牙人情感充沛，目无法纪。比才还描绘了小酒馆中的打斗，刻画了走私犯、占卜师，以及平衡这一切的斗牛的声音。小说与歌剧所使用的语言均为法语。它反映了外界所勾勒的西班牙形象，尤其是通过蛇蝎美人卡门这个人物展示的西班牙风貌。《卡门》在英国、美国与俄国的首演都是在1878年。1881年，《卡门》的西班牙首次演出于巴塞罗那举行，取得了巨大成功。

游览西班牙

多亏了画家大卫·罗伯茨在19世纪30年代初的西班牙旅行，英国的艺术家与普罗大众才开始了解西班牙。罗伯茨（1796—1864年）的杰作是《塞维利亚大教堂内部》。1835—1836年，他还绘制了一系列西班牙插图，并于1837年结集出版了《西班牙风景素描》（*Picturesque Sketches in Spain*）一书。他的高端版画选集使西班牙的形象得以流传开来。大卫·威尔基（1785—1841年）也是一位重要的画家。他受到了1827—1828年的西班牙之旅以及在那里看到的画作的影响，因此，其后期作品色调更加浓艳，色彩运用更加大胆，对于历史题材也更为关注。1830年，威尔基受封成为威廉四世国王的宫廷画师。他的西班牙题材画作包括：《萨拉戈萨女仆》《西班牙旅馆》《游击队军事会议》《游击队员告别家人》《游击队员回家团聚》《两名来自托雷多的西班牙修道士》与《哥伦布在拉比达修》。

19世纪中叶，艺术家约翰·伯吉斯（1829—1897年）与约翰·菲利普（1817—1867年）使多姿多彩、充满异域风情的西班牙概念深入

人心。自1858年起，伯吉斯定期前往西班牙旅行。他对西班牙的农民很感兴趣。《好样儿的，斗牛！》（1865年）是他的第一部大作，之后的作品有《西班牙吉卜赛小女孩》（1868年）与《西班牙发放乞讨许可证》（1877年）。有“西班牙菲利普”之称的菲利普在1851年游历西班牙后，创作了许多关于西班牙生活的画作。1856年、1860年，菲利普再访西班牙。他更为人所知的作品包括《塞维利亚写信人》（1859年）、《祈祷》（1859年）、《散步》（1859年）、《穆里罗早期职业生涯》（1864年）与《升天：西班牙守灵》（1864年）。菲利普在画作《监狱窗户》（1857年）中将爱与西班牙的监禁和宗教一起呈现在观众面前。

阿尔罕布里摩风尚（Alhambrismo）在艺术领域一触即发。这是受到了华盛顿·欧文的游记随笔集《阿尔罕布拉》的影响。该书1832年发行的第一版题为《阿尔罕布拉：摩尔人与西班牙人的系列故事与素描》，该书创作于欧文1829年在当地居住期间。欧文（1783—1859年）在1842—1846年是美国驻西班牙大使。1826—1829年，他第一次到访西班牙。1829年，欧文在阿尔罕布拉生活。他是西班牙的重要阐释者，先后写作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传》（1828年）、《攻克格拉纳达》（1829年）与《哥伦布的生平和航行》（1831年）。

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威尔士建筑家欧文·琼斯（1809—1874年）。19世纪30年代初，他细致地研究了阿尔罕布拉宫的装饰。这对他的创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他还写作了《阿尔罕布拉宫的平面、立面、截面与装饰细部》（1836—1845年）一书。该作取得了一项重大技术进展：将彩色石印术用于彩印。琼斯是1851年伦敦万国工业博览会的建筑工程总监之一。他从阿尔罕布拉宫汲取灵感，设计了建筑内部铁制品的配色方案。而且，在伦敦南部的锡德纳姆重新建起水晶宫时，琼斯还在其中的阿尔罕布拉展馆中重建了阿尔罕布拉宫。他的著作《装饰法则》（1856年）也采用了从阿尔罕布拉宫汲取的灵感。阿尔罕布拉宫的风格同样见于琼斯设计的壁纸、纺织品、地毯、马赛克与棋盘格形状的人行道中。

巴塞罗那

18世纪，巴塞罗那人口过度拥挤的问题得到了缓解。因为，人们在城市的中世纪时代原址上，开垦了沼泽地，建了一个叫作“巴塞罗内塔”（La Barceloneta）的住宅开发区。这是旧港沙嘴处的一块三角形土地。工业时代带来了巨大的空间压力。1859年，人们推倒墙壁以促进城市扩张。工程师伊迪芬斯·塞尔达受命

设计城市扩建平面图。他用几何网格模型设计了“埃西安普尔花园城市”（Eixample Garden City），给巴塞罗那人提供了公共交通网络与公共空间。“埃西安普尔”意为“延长”或“扩张”。如今，人们能够轻易辨识出该区域，它就在人口稠密的老城区之外，北邻巴塞罗那大街（如今的对角线大道）漫长的大道。正是在这个现代展区内，加泰罗尼亚新艺术运动建筑师，比如安东尼奥·高迪（1852—1926年），将设计变成了现实，尽管当初设想的绿地空间并未建成。巴塞罗那城中的这一部分依然焕发着来自不同街区的迷人色彩。

新型政治秩序

新首相安东尼奥·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略（Antonio Cánovas del Castillo）的走马上任全凭个人功绩、精力与决心。他想用稳定的政党体系代替军队干预与人民革命导致的社会动荡不安。这种政党体系基于英国模式，由自由党与保守党在叫作“和平流转”（turno pacífico）的体系中自愿轮流掌权，接受另一政党的执政。这种君主立宪政体意在杜绝激进分子。而且，像意大利一样，它通过对选举过程与政治体系的操控，尤其是对现存恩庇网络的利用，而得以实际运转下去。和意大利一样，西班牙的君主也责任重大。持续施行到1923年的1876年宪法建立了国王与议会的共同执政体系。国王有权决定何时更换政府，但必须任命对议会负责的大臣。同英国一样，国王对立法拥有否决权，但一般不会行使这项权利。1881年，当阿方索十二世拒绝通过一项规定大臣在固定任期内可以执政的法律时，安东尼奥·德尔·卡斯蒂略辞职了。自由党领袖普拉克塞德斯·马特奥·萨加斯塔（Práxedes Mateo Sagasta）接替了他的位置。随后，在“和平流转”体系的规定下，卡斯蒂略与普拉克塞德斯轮流掌权，直到前者在1897年被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刺杀身亡为止。

政治稳定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巩固了政治稳定。卡斯蒂利亚薄弱的农业限制了城市扩张的潜能。直到19世纪，技术变革才克服了这个困难。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卡斯蒂利亚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例如，毕尔巴鄂及其周边地区基于铁矿石资源，取得了冶金业的重大发展。

批评

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都给西班牙贴上了消极、被动的标签。这种批评基于长期以来它们对西班牙存有的偏见，而并未虑及种种

艰苦背景，也没考虑到西班牙的改革尝试。鉴于此，伦敦大律师爱德华·奎恩（1794—1828年）在其死后出版的《历史地图集》（1830年）中是这样描述拉丁美洲的：

“这些美丽的国家终于从暴政与西班牙可耻的统治中挣脱出来了。但是，那里的大多数人由于长期以来习惯了压迫，常与偏执、无知为伍，无法享受突降自由的福气，也无法迅速跻身于文明世界稳定群体之伍。”

通过1890年施行的男性普选权，西班牙也尝试扩大民众对政治体系的支持。但是，与意大利一样，全民整体参与度有限，政治常被视为派系活动。与此同时，政治代表了地方利益，而且主要维护了有产阶级的利益。这既促进了稳定，又滋生了自上而下的操控与腐败。这些因素在地方政治中尤为明显。

人们抨击西班牙与意大利在那个时期施行的议会民主制缺乏人民支持，换句话说，缺乏与民众的关联。在某种程度上，后来发展起来的关于民众参与的一系列假定催生了这种批评。在当时，这种参与的基础十分有限。此外，这种支持的缺乏与墨索里尼的崛起或佛朗哥的成功之间并不存在必然性联系，反之，影响民心向背的关键因素是重大事件。在意大利，发挥作用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的失败感与幻灭感；而在西班牙，发挥重要作用的是帝国在殖民地遭遇的失败——在政治、经济与心理上都是如此。

在美国的干预下，古巴与菲律宾的大动乱引发了惊天巨变。在随后的1898年美西战争中，西班牙被彻底打败，而且是迅速地败下阵来。西班牙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海军指挥不力。然而，驻扎在古巴的西班牙军队也失败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未能阻止美国在圣地亚哥附近登陆。西班牙军队状况不佳。数十年间，它经历了高度的政治化，影响了指挥的质量与数量：军官实在太多了。军队决定限制开支，结果导致部队缺乏训练。与美军一样，西班牙军队近期也无战事经验的积累。古巴的气候与地形给美国人带来了不少麻烦。幸运的是，美国人不仅占据重要的人数优势，还有良枪好炮。而西班牙人在作战时打得一团糟；他们退至圣地亚哥附近的防守带内，也不攻击美军的交通线。7月17日，圣地亚哥投降了。根据1898年签订的《巴黎和约》，波多黎各、菲律宾与关岛让给美国，古巴作为美国的附属国宣布独立。1899年，西班牙将位于太平洋上的加罗林群岛与马里亚纳群岛卖给了德国。

在被称为“那场灾难”（El Desastre）的事件[16]中，西班牙的声望荡然无存，人们开始呼唤民族复兴。20世纪到来时，西班牙成了一

个弱国，其政治、文化与思想刚刚开始升温。站在许多人的角度，尤其是站在“1898年的一代人”的角度，他们试图掀起一场根本性的变革，其广度远超战前所涉及的那些方面。“西班牙败于美国”这件事让人们将“真正作为国家的”西班牙与批评家口中没有真正的独立国地位的西班牙进行了对比。对于一些批评家来说，这是君主制与天主教所造成的恶果；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地方主义使国家精力衰竭。有人觉得国家太强大了，又有人觉得它太弱了，或者认为它既强大又羸弱。

西班牙的帝国意识形态在彼时看来成了一种多余，尽管它还试图在摩洛哥坚守其帝国统治。事实上，西班牙也确实在摩洛哥加强了这种意识形态。从某些方面而言，随后的西班牙历史就是它努力适应其后帝国时代身份的过程，是探寻一道问题之答案的过程——如何处理已无明确职责，也失去了获得尊荣的方式的人们（以为西班牙效力的军队与社会群体为典型）。这种转型比1945年后英国的转型更加困难，因为在当时还不存在广泛的全球性殖民地自治化。但是，与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胜而获得了慰藉不同，西班牙并没有获得这种抚慰。事实上，更确切地说，19世纪末，在全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依然十分重要，而帝国主义正是自15世纪以来对西班牙的命运起到关键作用的因素。相形之下，西班牙的失败看起来就更加惊人，来得也比别国要快。

此外，西班牙人对民族复兴的呼吁似乎更有必要。无论是这种呼声，还是更广义的政治活动，都与人们对于过去的某些描述有关。比如，西班牙人倾向于宣称，要回归他们眼中腓力二世统治时期团结稳定的社会中的优良传统。然而，这再次重申了一个长期以来存在的论点：西班牙本质上一直以基督教身份存在。在处境险恶时，这种身份被外在的压迫与内在的挑战抑制住了。事实上，这种说法极为贴合信奉基督教的卡斯蒂利亚人，对于其他西班牙人则不太适用。

普拉萨-多罗公爵

在威廉·施文克·吉尔伯特与亚瑟·沙利文相当成功的轻歌剧《船夫》（1889年）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物是一位西班牙大公。这部歌剧由吉尔伯特作词，刻画了一位骄傲又自负，还破了产的懦夫。他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关注有加：

涉及军事行动，
战争不论大小，
他都在军团后面指挥

（他觉得这样没那么惊心动魄）。
但是，军团逃跑时，
他又是一马当先，啊——
……
在那勇者之师中无人
隐蔽得有他一半好。
战争自始至终他都躲藏着，
……
当他们得知每个人都会吃枪子儿
除非退役时，
……
他递交上辞呈，
全军第一个，啊！

这出歌剧意在嘲讽英国与西班牙的贵族阶层，但是对西班牙大公的揶揄则反映了当时欧洲普遍存在的对西班牙之自负做作的不屑一顾。

第十章

君主制的终结与“1898年一代”的改革愿景

君主在议会政治的垮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却很少有君主意识到，

议会政治早已成为君主立宪制的保障。

1898年西班牙在美西战争中的惨败，导致社会上与政治领域内各种呼唤改革的声音骤起：从对现代性的反抗，到普遍的对历史使命的摒弃，再到要求主张工人权利的民主共和主义的建立。但是，说到对改革的渴求，任何地方也比不上巴塞罗那这样的工业化城市。巴塞罗那的卡萨莫罗纳纺织厂（1911年建立）作为该时期的遗存保留了下来。参观加泰罗尼亚科技博物馆有助于人们理解那个时期，博物馆本身位于塔拉萨的一个现代主义蒸汽机厂（1909年建立）。

地方民族主义也在加泰罗尼亚积聚起了力量。1901年，“地区联盟党”在那里成立。它意在为加泰罗尼亚赢得独立，然后复兴西班牙。1894年，巴斯克民族主义党成立。1879年，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成立。然而，意图推翻资本主义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定下了一个更加暴力的基调。1906年的马德里，发生了一场相当可怕的袭击。在阿方索十三世（1886—1931年在位）与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女维多利亚·尤金尼亚的婚礼当天，24人被炸死。新娘也被溅得一身是血，所幸她与丈夫都没有遇害。

巴塞罗那的暴力倾向十分明显。这里的经济增长提高了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1893年，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在歌剧院演出期间扔了两枚炸弹，导致20人死亡。1909年，为反对政府征召预备役军人去摩洛哥服兵役，工人示威游行演化为暴力行动，随后遭到军队的血腥镇压。早在19世纪90年代，加泰罗尼亚的矿工罢工也是被政府用这种方式镇压下去的。在“悲剧周”（Tragic Week）[17]中，巴塞罗那的教堂被烧毁，最终导致1909年保守党首相安东尼奥·毛拉遭到罢免。

与意大利的乔瓦尼·乔利蒂所做的努力一样，自由党的何赛·卡纳列哈斯（José Canalejas）也试图缓和社会分歧，将矛盾视为“自上而下的革命”的一部分。但是，1912年，他被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刺杀身亡。西班牙的领导层随着这位政坛才俊的陨落而大大受损，这在很大

程度上是因为卡纳列哈斯与毛拉一样是现代主义者。毛拉同样致力于民族复兴大业，不过人们对“民族复兴”这个概念与执行程度的认识千差万别。

由于保守主义者与自由党人之间的分歧，以及新的政治运动，还有共和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与地方主义者所制造的难题，西班牙政治变得更加不稳定，更为艰难。共和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与地方主义者都破坏了西班牙政治体制的合法性，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指责西班牙政治体制为精英主义腐败政治。

西班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年）的中立带来了经济发展的机遇，对加泰罗尼亚的纺织厂和西班牙农业而言更是如此。同时，西班牙木材出口国外，为西线英法联军的战壕提供支柱，同时也造成了森林过度砍伐。西班牙通过火车从陆上把商品运往法国，避开了德国的潜水艇攻击，这一点很重要。此外，从巴塞罗那到马赛的海上航线也基本上是安全的。中立意味着分裂：爱德华多·达托（Eduardo Dato）领导下的保守主义者支持德国，而自由党人，尤其是阿尔瓦罗·德·菲格罗亚（Álvaro de Figueroa）与同盟国更加亲密。爱德华多·达托在1913—1915年及1917年任西班牙首相。

然而，结果表明，出口商品的激增引发了通货膨胀，工人因此要求加薪。1917年大罢工被军方镇压下去了，但军方自身反而受到了民众不满情绪的影响。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是个充满争议的例子，它煽动人们，尤其是巴塞罗那人，以暴力手段进行抗争。在安达卢西亚，没有土地的农民迫切要求改变，许多人因此转向无政府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班牙国内局势日趋紧张。1918—1921年，军队与国民警卫队被大量用于镇压罢工者与无政府主义者，而雇主也组织起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加泰罗尼亚通过罢工要求独立，但受到了西班牙政府的抵制。联合政府无法带来社会稳定，更不要说激起人们的热情了。此外，早期或明或暗的两党统治的约定也开始出现问题。1921年3月，达托首相被3名加泰罗尼亚无政府主义者刺杀身亡。

长久以来的惯例依然在延续。例如，大众展现出的对宗教的忠诚导致在1918—1920年，人们“目睹”了多次基督显形现象。林皮亚斯是圣迹显现的主要场所，这里看来会成为西班牙的卢尔德，朝圣者开始向此处会聚，阿方索十三世与西班牙首相安东尼奥·毛拉也莅临参观。这些宗教幻影既是人们对经济动荡的即时反应，也指明了宗教朝圣之所。它们作为西班牙生活的一方面，不应被删去。教会在20世纪

头几十年里试图使人民“重新成为天主教徒”。但是，天主教激进主义不仅采取了反现代的立场，还不愿接受自由主义，也不能动员除少数工人阶级之外的大众，尤其是城市工人阶级。反之，后来的历史证明，教会的虔敬文化在保守的中产阶级中更加有效。这种差异预示了佛朗哥执政时期的情景。

与此相对，新技术，尤其是电力，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电力的普及影响了基础设施，尤其是马德里的公共交通。1898年，马德里的有轨车通电了。西班牙城市经历了基础设施的扩建，特别是一些主要的公共建筑与游乐园。此外，在中产阶级家庭中，消费品成了舒适生活的具体表现形式。

然而，正如1898年败于美国之手的西班牙那样，事实证明军事失败会给政治带来重创。1921年，在安瓦尔，摩洛哥力挫一支西班牙大军。两年后，巴塞罗那总司令米格尔·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General Miguel Primo de Rivera）发布“公告”。为此，阿方索十三世解散了议会，任命普里莫为军事指挥部首长。这暴露了自由议会实践的缺陷，表明了阿方索对事态的默许。正如前一年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在意大利对贝尼托·墨索里尼的纵容一样，君主在议会政治的垮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却很少有君主意识到，议会政治早已成为君主立宪制的保障。萨拉戈萨与巴伦西亚发动了军事行动，对普里莫表示支持，但是大部分军队并未做出有利于他的举动。当然，这些人也没有阻止他。

普里莫用祖国、教会、王权一类的说辞蛊惑人心，又将这些说法归结于传统的民族主义。他试图通过独裁主义重振西班牙。这种对快速变动形势的应对，尤其是在快速现代化的时代面对大众政治的挑战做出的回应，把握住了人们企求强化国家和家庭二元独裁统治，且有意在一个变化无常的世界中恢复这种独裁统治的心理。西班牙废除了共产党与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禁止罢工，暂时中止了1876年宪法，限制了政治界与新闻界活动，在经济领域采取中央集权的方法，加大公共投资，征收高额进口关税，实行国家垄断。

成功是多方面的。西班牙通过墨索里尼式改革引入了社会福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经济的恢复，西班牙经济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1925—1926年，它与法国一道结束了摩洛哥的里夫战争。西班牙使用了大量的芥子毒气，不加区分地空投在平民与战士身上，导致伤亡惨重。西班牙对胡塞马海湾的陆海两栖进攻也意义重大。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带领一支兵团率先登陆上岸，他记录并发表了第一手的军事行动实况。不过，实际上在应对摩洛哥反抗的过程中，法国的援助比佛朗哥的军事行动更有价值。

事实证明，在西班牙，不论当权派提出何种政治方案，在野党都不会接受。而且，军队内部的不满情绪也日渐增强。这是因为普里莫试图按照功绩而非资历提拔军官，并且要在将多兵少的部队中裁掉一些冗余军官。1926年，一场反对普里莫的政变险些爆发。无论如何，加泰罗尼亚依旧是抵制运动的中心。不论是1919—1929年位于巴塞罗那的，为阿方索十三世而建的佩德拉尔韦斯王宫，还是1929年在巴塞罗那蒙特惠奇山地区举办的世界博览会，抑或是西班牙广场及其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喷泉所留下的一处让人印象深刻的历史遗迹，都无法掩盖当时的困境。更普遍地说，阿方索十三世不仅担心由他任命的大臣越来越不受欢迎，也担忧自己日渐下滑的受欢迎度。他已将人们对他的支持挥霍一空。1930年，预感到另一场政变即将到来的阿方索，将筋疲力尽的普里莫排挤出局。

普里莫的继任者也是一名将军。他叫达马索·贝伦格尔（Dámaso Berenguer），在1919—1922年曾担任西属摩洛哥的最高委员会主席，1923年成了皇室军事首脑。他试图在宪法中寻找解决方案。然而，他意识到，摒弃普里莫不得人心的政策尚不足以帮他在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中赢得支持。他废止了普里莫实行的一些颇具压迫性的措施。与普里莫相比，贝伦格尔政府被称作温和的独裁政府。政治问题妨碍了可行的、深得人心的政府的组建，而固有的分歧又给这一进程带来了困难。此外，1929年的经济衰落及随后的大萧条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给人们以沉重的打击。

1931年2月，贝伦格尔辞职。接替他的是海军上将胡安·鲍蒂斯塔·阿斯纳尔-卡宾纳斯（Juan Bautista Aznar-Cabañas）。与此同时，在政治领域，共和主义日益强大，而政府则被瓜分为专制主义者与君主立宪主义者两派，后者未能与共和党人达成共识。1931年4月，随着共和党派在市政选举中的胜利，阿方索十三世面对着马德里街头聚集的人群，不得不宣布退位。这是一次和平的权力移交。在西班牙历史的关键时刻，皇室开始了流亡生涯。军方并未反对这一事态走向。西班牙旧有秩序的某些方面走到了尽头，军事修会也在当年4月被解散。

损害君主政体的，与其说是不可避免的冲突，不如说是偶发事件与个人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阿方索十三世明显的能力不足是一个重要因素。有人指出，支持君主政体的人很少。就算这种说法正确，人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忽视了一个问题：大多数的宪政体系与政治部署均是应者寥寥。但显然，君主政体确实不太受人欢迎。

第二共和国宣告成立，尼塞托·阿尔卡拉-萨莫拉（Niceto Alcala-Zamora）成为首相。在1931年6月的议会选举中，共和党-社会党联

合政府大获全胜。然而，由大萧条引发的严重经济问题妨碍了社会改革。同时，执政联盟的内部分歧使人们对社会改革的期待落空了。1931年12月发布的新宪法旨在确立民主政体，还承认了女性选举权，并宣布实行完全的宗教自由。此外，薪酬水平也有所上涨。

新成立的共和国并未有效地促进社会稳定。新政府与宪法中的反教权主义，尤其是主张教会与国家分离的倾向，可能会导致宗教体制瓦解，这激怒了虔诚的教徒。事实上，这也导致已被选为总统的阿尔卡拉-萨莫拉辞去了相位。不论是反教权主义，还是势力强大的社会党不愿走宪法程序使政策落地的这一行径，均疏远了右派，迫使右派人士活跃起来，同时也引发了大众的共识：政府对精英阶层经济利益的攻击力有不逮。右派还对政府支持加泰罗尼亚自治的行为感到十分恼火。

1933年，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José Antonio Primo de Rivera，1903—1936年）创立了长枪党（The Falange Party），他是独裁者米格尔·普里莫·德里维拉的长子。长枪党愿意诉诸武力，坚决反对地方分裂主义，并意图重新占有葡萄牙与直布罗陀海峡。1935年，长枪党攻击了犹太人经营的百货商店。

同一时间，天主教牧师施礼华（Josemaría Escrivá de Balaguer）在马德里目睹异象后，创办了旨在促进天主教神圣信仰的主业团。这是当时各种思想涌动、新组织迅速崛起的体现。佛朗哥政权对主业团运动给予了极大帮助。

右派的威胁与日俱增，于是激进左派也向政府施压，呼吁进行更加极端的社会改革。他们想在不寻求天主教支持的情况下发起社会革命。事实表明，农业改革尤具争议性，引发了巨大的分歧，并激化了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与国民警卫队之间的冲突。国民警卫队在20世纪30年代初广泛活跃于西班牙各地。1931年7月，在镇压塞维利亚的无政府主义者罢工时，大炮派上了用场。

1933年11月，由何塞·马利亚·吉尔-罗珀斯（José María Gill-Robles）领导的西班牙右翼自治组织联合会（Confederación Española de Derechas Autónomas，缩写为CEDA）与中间派的激进共和党在大选中获胜，而社会党与左翼共和党落败了。激进共和党组建了新政府，但左翼分子拒绝与之合作。反教权立法被废除，1934年6月的大罢工遭到暴力镇压。1934年10月，西班牙右翼自治组织联合会参与执政。

作为回应，当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宣布独立时，左翼分子发动了

一次大罢工。但是，西班牙政府动用武力保持了对局势的控制。加泰罗尼亚总统刘易斯·孔帕尼斯（Lluis Companys）被判入狱30年。

在阿斯图里亚斯，煤矿工人团结起来，从补给站与兵工厂中夺取武器，打败了当地警察。随之而来的是残忍的军事镇压，镇压行动由佛朗哥策划。空军对起义军控制的城镇与阵地进行了轰炸和低空扫射，打击了缺乏防空力量的守军士气。“自由号”（Libertad）巡洋舰炮轰希洪市。政府派遣了由26000名士兵组成的军队，对抗10000—12000名起义军。虽然起义军拼死抵抗，但是听凭佛朗哥调遣的西班牙外籍军团是一支训练有素、士气高昂的劲旅。在夺回奥维耶多的室内战争[18]中，高昂的士气是必不可少的。叛乱被镇压后，城市也变得千疮百孔。随后就是大肆劫掠与大规模屠囚，大批平民惨遭杀害。

1934年一系列事件所带来的影响在1935年逐渐被人们消化，而局势的紧张则越发明显，以致社会各阶层走向了彼此对立。1936年2月，共和国的一次关键选举验证了西班牙的两极分化。在这种日趋分化与日益暴力化的氛围里，在各种持不同政见的人当中，极少有政客与评论家愿意接受真正的民主：坦然接受有利于对手的结果。反之，暴力变得更加根深蒂固，暴力的威胁也更为普遍。

生活水平

对于大多数西班牙人来说，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他们都生活在贫困之中。通常来说，住房过度拥挤、潮湿且不卫生。工资低廉且不说，政府还要对消费品课税。而且，自19世纪90年代末起，商品价格与各类租金的上涨也使低工资的问题进一步恶化。因此，人们的生活面临巨大的压力。社会福利十分有限，周期性失业或不充分就业的问题严重。始于1929年的全球性大萧条给人们造成了严重打击，这使本已低下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恶化。这种情况在西班牙尤为突出。因为在1910—1919年西班牙经济增长之后，在宽松信贷背景下的20世纪20年代，西班牙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大萧条切掉了这一信贷来源，阻断了投资活动。

光明的世界：索罗拉博物馆

在马德里的一派富丽堂皇之中，参观一座画作均沐浴在光线之中、充满温馨气氛的博物馆，无疑是件美好的事。华金·索罗拉（Joaquín Sorolla）的许多画作就陈列在这座1910年为他而建的令人愉快的房子里。房前是一座遵照格拉纳达样式建造的迷人花园。索罗拉（1863—1923年）出生于巴伦西亚。与其说他属于印

象派，不如说他是个风格多变的画家。索罗拉幼年时父母双亡，他的父亲是一位商人。索罗拉在服兵役并在罗马与巴黎受训前，从普拉多博物馆的画作中得到了启发。他的绘画题材十分广泛，尤其擅长东方主义主题与肖像画。他那幅栩栩如生的《悲伤的遗产》（1899年）描绘了在巴伦西亚（该地区早前受小儿麻痹症侵袭）海边，一群因小儿麻痹症致残的儿童在一名传教士的监督下，在海中沐浴的场景。

索罗拉在巴黎获奖后，受邀分别于1909年、1911年在美国举办画展。他还绘制了一系列的肖像画，其中一张是美国总统塔夫脱。1910—1919年，他的主要作品是以“西班牙诸省”为题的14幅大型壁画。这些画作陈列于西班牙美洲协会曼哈顿总部内。

索罗拉还绘制了印象派风格的海滩场景，画作显示了他在色彩研究方面的高超技艺。绘画作品出色展现了流体的形态与色彩的变化，极富魅力。这种表现力在索罗拉博物馆内存有大量明证，其中包括《海边漫步》（1909年）与《马的海浴》（1909年）。《花园中我的妻子与两个女儿》（1910年）精妙地融合了他对肖像画艺术与光线的研究兴趣。这家颇具魅力的博物馆是博物馆云集、艺术荟萃的马德里城市中一处绝妙的点缀。

第十一章
西班牙内战：双方同样残酷

英国外交官G. H. 汤普森发现，
交战双方“同样残酷，同样恐怖”。

1936年，一群自称“国民军”（Nationalists）的高级军官试图夺权。他们的起义始于7月17日的西属摩洛哥，7月18日至19日扩大到西班牙本土。他们反对左翼共和国政府的现代化改革政策。此前在1936年2月16日的激烈选举中，左翼党派联盟组成的“人民阵线”（Frente Popular）以微弱的优势取胜。国民军因此担心共产主义可能会以人民阵线的形式夺取政权。军队对政治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这些起义发生的原因。国民军宣称政府已失控（实际上，正是右翼与左翼的暴力行为造成了政府的失控），他们实际上反对的是共和国及与之相关的民主与自由。

但是，在1936年，国民军只取得了部分胜利。他们显然未能控制马德里，更不要提巴塞罗那了。此外，他们未曾尝试与政府商定任何协议，这引发了激烈的内战。激战直到1939年3月28日国民军占领马德里时才结束。

西班牙内战通常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内战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相当突出。其中，十分强调宗教的国民军将共和党人刻画成反基督者的仆从。人们在将西班牙内战看作世界大战的先兆时，须慎之又慎，因为意识形态层面的斗争实在是老生常谈的话题：这种意识形态斗争在1808—1813年半岛战争的内战中也发挥了作用，在卡洛斯战争中更是如此。

虽然西班牙内战涉及了海战，但主战场仍在西班牙本土。由于19世纪西班牙帝国失去了大部分海外领土，所以发生在海外的暴动极少，但最初的起义是在西属摩洛哥打响的，在拉腊什市，西班牙共和军进行了一番顽强抵抗后才被国民军打败。

在陆战方面，西班牙内战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西线，也异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初的一些战役。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西线战事相比，西班牙内战没有密集的防御阵地，其前线作为一个高度发达

的体系，由多个部分独立组成。如此一来，交战双方攻破彼此不连贯的前线就变得相对容易。但是，与1939—1941年德国的屡次获胜不同，事实证明，在西班牙内战中很难形成并保持进攻的势头。因此，如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西班牙内战也未能充分把握战机。共和军在布鲁内特（1937年）、贝尔奇特（1937年）、特鲁埃尔（1937—1938年）、埃布罗河河谷（1938年）多次战役的进攻过程都重演了这一情景，国民军在哈拉马战役（1937年）与瓜达拉哈拉战役（1937年）的进攻也是如此。

这种失败是由共和军与国民军的本质所决定的。他们训练不足，补给匮乏，同时作战不精，尤其是计划不周。这种缺陷使战争具有了消耗性。在有些情况下，部队的快速调动并不会带来消耗，如20世纪20年代，俄国与中国在各自的内战中均出现了部队的迅速调遣。然而，与俄国相对平坦、开阔的地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班牙大部分都是山地。在俄国的地形上，前线部队可以快速移动；而在西班牙，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相对来说十分有限。此外，俄国广阔的国土面积本身也意味着部队密度相对较低，队列人数因此比较稀少。如此一来，一旦防线被攻破，就很难重组。

西班牙战争（包括外国给予的援助）的消耗性本质突出了资源的重要性，它还意味着能够更好地调控经济、维持士气、保持政治凝聚力的一方就会增值。在以上三个方面，国民军的做法都更见成效。就战争时机而言，共和党人显得尤为不幸。因为，假如西班牙内战爆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同盟国也许就会向他们伸出援手，以对抗支持国民军的德国。

然而，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时，英国不愿帮助共和党人，法国的军事援助也是小规模的。1937年，美国国会甚至发布命令，禁止向西班牙交战双方出售军火。英国政府不希望看到法国三面都被右翼独裁统治包围，但又不清楚要怎么做才能不使英国的国际地位受损。英国政府不仅是由保守主义者主导的，而且很担心西班牙会成为战争物资的供应者苏联的战略合作伙伴。因此，英国政府试图阻止英国志愿军参战。此举损害了共和党人的利益，因为为他们提供了最多帮助的正是这些志愿军。西班牙内战也激化了英国社会中左翼、右翼意识形态的较量。

在某些地区，国民军最初的起义获得了成功。但是，在其他地方，尤其是马德里、加泰罗尼亚与巴伦西亚，由工人组成的民兵或效忠于政府的常规军守住了共和党的阵地。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是划分立场的重要决定性因素，不过个人主义也同样重要。这涉及军官个体、部队与平民的反应。叛变政府的国民军将领未能令全军上下信服。

1936年7月，在突击卫队试图镇压当地反抗时，内战双方所控制的区域都得到了巩固。这次镇压涉及大规模暴力，不被镇压者所接受的人全遭到了谋杀。在共和党控制区，这场镇压具有准革命的特点，这点在对神职人员的杀害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西班牙内战爆发的头一年里，马德里至少有8000名平民被处决。所有人民阵线团体都参与了杀戮与镇压。长枪党领袖普里莫·德里维拉在阿利坎特被共和党人处决，共和党就这样替佛朗哥解决掉了一个他鄙视的对手。国民军则遵照自己所认为的秩序杀人，而且，他们的做法没共和党人那么杂乱无章。英国外交官G. H. 汤普森发现，交战双方“同样残酷，同样恐怖”。

事实上，双方都犯下了可怕的罪行，执行了恐怖政策，他们针对所谓敌人的暴力行为实则只是获取控制权的方式而已。胜者将有更大的机会通过暴力方式在血泊中建立起新秩序。与葡萄牙和拉丁美洲一样，19世纪的西班牙早早确立了军事暴力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1808年拿破仑占领西班牙引发的社会动荡所造成的。在这一背景之下，20世纪重申了过去的主题与方式。巴尔干半岛也见证了军事暴力场景。1936年国民军在塞维利亚的所作所为亦是如此，战争中出现了为实现具体目标而采取的不计代价且不必要的极度暴力。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指挥的非洲军团尤以暴力著称。而且，在某地被占领后，他们会调动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兵力前往该地继续进行镇压。事实上，这些镇压在战争结束后才发生。

截至1936年7月，西班牙分裂成了两个区域。一边是共和党人控制的首都马德里，这里有占全国大多数的人口与工业，得到了来自海军与大部分空军的支持；另一边是国民军控制的大片农村地区，其支持者是大多数的陆军作战部队。国民军的非洲军团在摩洛哥的军事行动中经受了历练，作战经验尤为丰富。此外，德国介入西班牙内战后所发挥的作用也相当重要。自7月29日起，德国帮助佛朗哥从摩洛哥空运了接近14000名士兵，由此，西班牙海军的封锁被解除了。国民军也在所到之处尽可能地招募预备役，并将右翼民兵纳入部队编制。

随着第二共和国的解体，共和军发现，组织起一支有效的部队变得更难了。部分原因在于政治分歧，但更多的是由于共和军自身，尤其是他们的民兵，缺乏事先策划好的必要的组织与纪律。军中仍效忠于共和军的人受到了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地方及其他民兵志愿军的挑战，军事叛变、工人武装革命及民兵发挥的作用共同导致了这一局面的产生。这些问题破坏了共和军的军事训练，影响了其作战水平。此外，民兵也缺乏武器装备。对此，共和党人倾向于采取一种集权式的做法——将民兵编入正规军。

1937年5月，发生了一起有时被称为“五月事件”（the May Events）的动乱。在该事件过程中，共和党内部的矛盾趋于白热化。共和党阵营内部就无政府主义者的立场问题，在加泰罗尼亚，尤其是巴塞罗那发生了争斗，并致使教堂内部设施被破坏。在这次事件中，无政府主义者遭到共和党人与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联盟的残酷镇压。

共和军因为面临重重困难，尤其是战斗部队的缺乏，而在1936年战争初始阶段便失去了主动权。而且，他们也未能充分利用国民军早期面临的一些问题。反之，佛朗哥指挥非洲军团在安达卢西亚西部横冲直撞，并与较北边的国民军连成一线。8月14日，他们对巴达霍斯城发动了猛烈进攻。由工人组织起来的未受过训练的民兵无力进行有效的抵抗。佛朗哥的胜利使他在军队同僚中获得了压倒性优势。9月21日，他成了国民军大元帅；10月1日，他又升为国家元首。

尽管到1936年11月初，佛朗哥一路打到了马德里附近，但他于11月8日发动的攻击被阻截下来。成功阻挡他的是首都及其周边地区敌军的力量与决心。佛朗哥通过随后的一系列正面进攻夺下了城市的部分地区，但遇到了抵抗，止步于此。11月23日，佛朗哥放弃了攻击。这次挫败导致两方的战斗时间被拉长，战事的激烈程度也普遍加深。以上种种均意味着外国援助对双方来说更具价值了。与此同时，这也迫切地要求西班牙战士具有适应能力。迫于必须面对的压力，交战双方都显示出了对环境的适应性。佛朗哥在向马德里发动进攻时，成功利用之前截获的公用汽车与卡车来运送部队，这种机动性使国民军有机会从侧翼包抄占据人数优势的共和军。

然而，与上述假设相反，9月底，佛朗哥决定先发制人，为受困于托莱多的阿尔卡扎尔（要塞）的国民军解围。共和军趁机临时发动了一场有效的马德里保卫战。凭借军队的人数优势、枪支与装甲部队，共和军成功阻止了国民军的进攻，随后又迫使过度扩张的佛朗哥与他疲惫不堪的部队在11月底放弃了马德里。由于当时苏联飞机参战，共和军掌握了制空权。尽管空军有其局限性，但仍然十分重要，因为飞机是大炮的有力替代品。

尽管佛朗哥未能占领马德里，德国与意大利还是在11月18日认可了佛朗哥政府的地位，此举促使两国为西班牙国民军的胜利贡献力量。在国际社会应对矛盾冲突之时，意识形态问题开始发挥明显作用。11月，希特勒派出12000名士兵以及一些坦克与飞机参战，但他不愿投入更多。12月，墨索里尼同意派遣两个旅的部队。最终，墨索

里尼派出的部队有80000人，而希特勒派出的兵力则不足19000人。德国与意大利对西班牙的共同支援极大地促进了其联盟关系的发展。因此，截至1936年年底，墨索里尼已开始谈及罗马-柏林轴心国了。如今，一些西班牙评论家将这场战争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阶段。

德国与意大利通过在西班牙发起的军事行动来彻底检验它们的武器、战术与军事理论，尤其是在突袭方面的策略。当时对城市的恐怖性爆炸袭击规模骇人，其中最可怕的当属德国与意大利飞机对马德里（1938年）、格尔尼卡（1937年）、巴塞罗那（1938年）与卡塔赫纳（1936年和1939年）的轰炸。这些轰炸的攻击目标都是平民，但受害者远不止于此：对卡塔赫纳与巴塞罗那这两座港口城市的攻击，是国民军意图阻止共和军进口武器所做的一部分尝试。1937年4月26日，德国摧毁了格尔尼卡，目的是击垮巴斯克共和党人的士气，进而削弱他们对国民军进攻的抵抗。德国与西班牙国民军担心国际社会会对他们炮轰格尔尼卡予以强烈谴责，因此拒绝对此负责。当国民军继续向前挺进，在6月占领毕尔巴鄂时，他们炮轰城市的做法或许也影响了对方组织起来的反抗力量。轰炸难民——尤其是那些在1937年2月从马拉加逃出的难民，以及在1938—1939年冬天逃往巴塞罗那的难民——成了意大利人的专长。意大利派出了759架飞机前往西班牙，德国派出了大约700架，而苏联派出的飞机是623架。

天才遇害：洛尔卡的被杀

费德里戈·加西亚·洛尔卡（1898—1936年）是一名杰出的诗人、剧作家。他是“27年一代”——一个深谙现代主义，具有世界性文化倾向的群体的一员。他的作品《吉卜赛谣曲集》（1928年）基于流行的安达卢西亚歌谣创作而成，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他的主要歌剧，诸如《贝尔纳达·阿尔瓦之家》，对业已存在的社会规范表示怀疑。这出戏剧完成于1936年，但是直到1945年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首演。故事讲述了一个只关心公众声誉、传统与贞操的无情女家长的种种压迫人的手段以及对家庭的控制。这出戏剧对西班牙社会持批判态度。洛尔卡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也是个同性恋者。1936年8月，他死于西班牙国民军民兵的枪口下。

瓦尔特·冯·赖歇瑙（Walter von Reichnau）中将曾对1938年的一次纳粹领导会议进行了叙述：

西班牙战争的经历使我们更易抛弃在坦克战方面走过的错误道路。在阿比西尼亚战役中，阿比西尼亚（意大利在1935—1936年占领了那里）不具备任何对抗坦克的手段。这场战役树立了轻型坦克的声望……我们忽视了重型装甲坦克的制造。结果表明，在西班牙战场上，只有装配着装甲钢板的重型坦克才更有用。

一旦失去作战的机动性，国民军在面对人数众多的敌人时就发现了阵地战实际上非常棘手。1936年11月，国民军试图通过从侧面包抄马德里来恢复机动性，结果过度延伸的布局使自己暴露于对方的攻击之下。1937年2月，佛朗哥通过切断马德里到巴伦西亚的这条重要补给线，再次尝试激活部队的机动性。但是，共和军仗着人多势众，在哈拉马战役中挫败了他的企图。

这场战争的本质引起了相当多来自外国的关注。人们将其视为战争变化特征的一个判例案件——以当代人J. F. C. 富勒的说法，它是“埃布罗河上的奥尔德肖特”。他所说的奥尔德肖特在当时意指英军受训之地。当时，富勒是一名退休的英国少将兼报社通讯员。他表现出了对佛朗哥明确的同情，但这无损其军事观察的价值。他在参观过佛朗哥的军队后，于1937年3月向英国军情局发回一份报告，其中指出了佛朗哥军队的各种缺陷：

这绝不是一场伟大的战争，不是堑壕战，甚至也不是游击战……城市战……红色分子的主力在城镇……佛朗哥如果有一支高度组织化的部队与充足的运输工具的话，他本能够拿下马德里。但是，他没有这些东西。例如，贡萨洛·奎波·德利亚诺将军（一位著名的国民军将领）亲口告诉我，当他发动对马拉加的攻击战时，他当时只有28辆卡车……人力远远未被动员起来。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动用全部人力，因为军事组织无法消化更多人。

富勒也关注了作战范围，及其与战争缓慢的节奏之间的关系：

尽管名义上的前线是无边无际的……驻防地极小……完全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线。这不仅是因为前线绝非绵延不绝的，还因为，一般而言，人们很难发现它。在旅途中，据我所知，有时我可能进入了红色分子的领地……通常来说，村庄是天然的屏障，周围一般都有围墙。不管是哪一方占据了这些村镇，也就“占据”了前线中间的缺口。在紧临着马德里西边的地方——当然还有别处——确实有战壕存在。我去过马德里的战壕，它们实在是粗劣不堪……尽管我在此处前线待了一个半小时，但红色分子只发射了两枚炮弹，我只听到几声步枪射击。

富勒对坦克战颇感兴趣，因此对他所看到的场景感到失望：

我没看到几辆坦克：对于佛朗哥一方而言，意大利轻型坦克是无关紧要、漫无目的的机器……只有在没有坦克的情况下，人们才能意识到坦克战术的价值。坦克通常是单独作战的。如果大量使用坦克，那么它们往往会分布在广阔前线上的不同地方。结果是，坦克会遭遇密集的火力攻击……事实上，根本就毫无战术可言，也不存在恰当的训练与维护。佛朗哥军队的一名军官告诉我，到目前为止，单次战役使用过的坦克最多也就15辆！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学习此战中运用坦克或者反坦克的手段。因为，战术的基础是训练，而这次参战的大多是未经训练之人以及极少数的外国雇佣兵。

富勒的观点过于严苛，实际上，在西班牙军队中不乏经验丰富之人。但是，他对步兵的强调也有他的道理，此外，他也正确地指出在时间、训练与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有效地组建起一支庞大军队所面临的重重困难。这些问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在1915—1916年、美国在1918年遇到的问题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与英、美相比，西班牙内战的背景使得国民军和共和军双方面临着更大的困难。这不仅是因为当时资源匮乏、前线铺得过开，也是由于双方都没有形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有效的国家机构。

未能迅速取得胜利的国民军一方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应对策略。彼时，意大利在西班牙投入了5万兵力和一些飞机。意大利提出让国民军效仿他们1936年春征服埃塞俄比亚时的成功模式，采取快速进攻战克敌。具体做法是从马拉加（2月8日攻下）与特鲁埃尔集合兵力，攻击共和政府所在地巴伦西亚。如此一来，就能快速将共和党控制的地带分成若干小区。胜利后，意大利即可重新调遣部队寻求其他机会。正如意大利所预料到的那样，德国也想速战速决，因此，德国也支持这一作战计划。可是，该计划却遭到了佛朗哥的反对。他更想将战略与军事行动纳入一个体系之中，谨慎行事。佛朗哥宣称，他的方法会一点点磨损对方的势力，他想要以此摧毁共和军。

在英国与德国看来，意大利不知该如何使用机动化部队。1937年3月，意大利的这一缺陷暴露了出来。当时，马德里以东的一支向瓜达拉哈拉市进军的意大利军队过于依赖该区仅有的几条道路。他们士气全无，在恶劣的天气中失去了后勤支持。最终，在3月18日共和军的一次成功的反击战中，这支意大利机动化部队被击退了。佛朗哥未能向意大利军队提供必要的支援。他反对意大利军队像占领马拉加、进攻瓜达拉哈拉时那样单打独斗。瓜达拉哈拉进攻战的结果促使佛朗哥下决心放弃对马德里的继续攻击。

佛朗哥继而将注意力转向北方。他占领了坎塔布里亚沿海地区，攫取了当地的工业资源，并于1937年6月19日占领了毕尔巴鄂港口。北方四分五裂、指挥不利的共和军不仅训练不足，而且没有空军力量。共和军为解除北方面临的压力，在中部地区发起反攻，例如，7月6日在马德里以西发动的布鲁内特战役。共和军突破了薄弱的国民军防线，但是佛朗哥派出了包括德国与意大利空军在内的援兵。共和军未能保持住他们的冲劲，这是其军事行动中的一个通病。此番战役，共和军损失更为惨重，布鲁内特战役暴露出了其不足，尤其是各军种之间的不协调，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无法熟练运用已有的大炮与坦克。

战争的棘手迫使佛朗哥在1937年8月迫切寻求意大利援助，阻止苏联将武器运送给共和军。墨索里尼迅速在地中海做出反应，不久后就发动了潜水艇战。

共和军在布鲁内特败北之后，无力阻止国民军在8月26日占领北部海岸上的桑坦德港口，而圣塞瓦斯蒂安也于9月13日陷落。失掉港口降低了共和军获取外国物资的可能性，而且也降低了他们的国际影响力。类似地，8月底，共和军在萨拉戈萨附近发动的攻势再次暴露出了他们在布鲁内特战役中出现的问题。结果是，共和军未能阻止10月国民军在阿斯图里亚斯高歌猛进。10月的这次胜利使国民军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工业区，他们的军队与战舰也不必四处对抗四分五裂的共和军了。正如苏俄内战时的情况一样，前线双方关系立即变得清晰起来。同时，人们也显而易见地看到，胜利实际上是由一点点优势累积起来的。

共和军想要掌握战争主动权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进攻已经削弱了共和军的力量。接下来，他们在1937年12月15日发动了又一次进攻，效果一样，共和军占领了特鲁埃尔。但是，这次胜利并未带来人们所期盼的和谈。国民军有效的反攻使他们在1938年2月22日重新夺回了这座城市。而且，在寒冬的激战中，国民军重创了共和军。

外国评论家一直对西班牙作战的特点与水平持批判态度，这可不是西班牙国内所喜闻乐见的。1938年4月，英国驻法国副武官在参观国民军统治下的西班牙地区后评价道：

即使参观十分短暂，我也已经清楚地看到这次战争的一些独特之处。首先，在这次战争中，大多数的参与者几乎未受过任何训练；其次，相对而言，规模较小的部队要在极长的前线上连成一线；再次，战争中使用了现代化武器，但水平却称不上现代；最后，因暗杀遇害

的人比战死沙场的还要多……考虑到这些独特之处——一些小聪明，而且人们可以用这股聪明劲儿去“证明”任何先入为主的理论——很显然，当我们从这场战争中推演普适性的教训时，一定要慎之又慎……对于任何一个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来说，参观前线全部三处防区后，几乎看不到任何战事，实在是一件惊人的事……看上去，战斗只是间歇性地爆发在前线很小的一部分。在几百英里的前线上，敌人甚至不在步枪射击范围内……双方都没想去打扰对方的生活与供给……当战事打响时，大炮又不够了……很快，一场紧张的战斗平息下来；而且，结果要么是双方在相同的阵地中继续僵持，要么是快速的进攻战。

副武官继而将最近国民军节节胜利的主因归于“他们能够秘密聚集起具有绝对优势的野战炮兵，用于他们选定为突破口的防区”。他注意到，通常而言，战术“主要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理论”，以暗中建造堰坝与战壕为主。他也对国民军的缺陷进行了点评，包括“不完整的、临时成立的组织”，交通运输设备与公路不够完善，以及用“完全随意的方式”进行战争指挥。

这些指责过于严厉了。佛朗哥在特鲁埃尔战役中摧毁了共和军主力。他乘胜追击，横扫阿拉贡地区并一路向地中海攻去。1938年4月15日，佛朗哥军队抵达地中海。国民军在大炮与飞机的数量上具有优势，这使他们获益匪浅。整体而言，不管何时何地，只要国民军有需要，德国与意大利就会向他们提供大炮与飞机。共和军控制下的西班牙地区现在被一分为二，而且他们的士气十分低落。然而，尽管德国催促佛朗哥趁机攻打巴塞罗那，他却并未把握战机。佛朗哥一方面担心法国可能支持共和军，另一方面对于力克对手，他举棋不定。

佛朗哥的耽搁让本已四分五裂的对手有机会重组。事实上，1938年7月，共和军在埃布罗河上的突击反攻战中，明确展示出了他们集结、调遣大批军队的能力。但是，这次军事行动也暗示了突围战存在的问题，因为共和军最初所取得的胜利被国民军的增援部队抑制住了。共和军缺乏从早期成功中获益的技巧。最终，更好的后勤供给与飞机、大炮补给让佛朗哥占据了优势。

这场消耗战持续到11月，双方均损失惨重。对共和军来说，问题更严重，因为他们不太容易获得武器补给，尤其是重炮。相比之下，德国与意大利给国民军提供了大量补给。

1938年12月底，国民军凭借巨大的装备与人员优势对加泰罗尼亚发起进攻。起初，他们的进攻受到了短暂的抵抗。但是，随着共和军前线的崩溃，国民军具备了进行快速进攻的可能性。许多共和军越

过前线，逃往法国。1939年1月26日，巴塞罗那未做多少抵抗就陷落了。2月27日，英国与法国承认国民军政府的合法地位。

3月5日，共和党中央军队指挥官西吉斯蒙德·卡萨多·洛佩斯（Segismundo Casado López）获得了著名的右翼社会主义者胡利安·贝斯特罗（Julián Besteiro）的支持，在衰弱的共和政府内部发动了一场政变。他们宣称胡安·内格宁（Juan Negrln）首相当时正在策划让共产主义者接管事务。这次政变导致马德里上演了数日的战斗。政变领导人决心与佛朗哥谈判到底，但是佛朗哥坚持让他们无条件投降。3月底，国民军在未遇到多少抵抗的情况下，横扫剩下的共和军占领区。马德里于3月28日陷落，宣告了共和国的灭亡。至少有30万西班牙人在这次战争中丧生。许多人逃亡海外，内格宁去了法国，而卡萨多则逃往委内瑞拉。战争造成了许多伤害，其中格尔尼卡的损失格外惨重。西班牙全境的城市与定居地都遭了殃，例如，锡古恩萨主教座堂与托莱多的阿尔卡扎尔宫。

共和党人虽然有国家机器，但他们无法养活人民，无法增加财政收入，也无法抑制通货膨胀。这影响了军队后勤，结果导致部队缺粮。这与苏俄战争形成了鲜明对照，在西班牙内战中，占据中心位置的一方输了，获得更多外援且军事经验丰富的一方赢了。这种对比告诫我们，在分析战胜原因时要格外谨慎。

质疑西班牙内战

鉴于内战双方在战争中都凶残无比，战后，得胜方继续复仇。此外，对佛朗哥政权而言，这场战争的纪念活动至关重要。佛朗哥历时20载，耗资约2亿英镑，在烈士谷建造了一座天主教会巴西利亚教堂，这也是佛朗哥墓地之所在。他还在烈士谷修建了一座修道院，并建有一个高高耸立的十字架。这座建筑极为雄伟，在30英里（约48千米）外都能一眼看到，它旨在纪念西班牙内战中的国民军阵亡者，且代表着“整个国家的赎罪”。佛朗哥宣称：“立起的石块须像历史悠久的纪念碑那样气派宏伟，它要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让人们永远铭记。”一些西班牙共和国政治犯被迫劳动，在严酷的环境中从事建筑工作，最终死于非命。纪念碑于1959年正式落成，这是靠近马德里的纪念性构景工程的一部分。纪念碑的设计旨在复兴腓力二世统治时期胡安·德·埃雷拉的建筑风格，就像在埃斯科里亚尔所见到的那些建筑那样。

佛朗哥禁止人们对西班牙内战置喙。因此，乔治·斯蒂尔所作的《格尔尼卡之树：现代战争实地研究》（1938年出版）的巴斯克语

版，只能由流亡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市的西班牙人于1963年在当地出版。

西班牙在20世纪30年代所经受的创伤依然是一个问题。它仍在严重困扰着人们对于过去的集体描述。那些自认为是战士后裔的人互相指责，尤其是就战争暴行，以及当时的奋斗事业是否正义展开了争辩。左派强调说右派对1936年发动西班牙内战负有责任，但他们基本上忽视了自己在1934年针对共和国发动的失败起义在某种程度上同样挑战了民主体制。而且，就像有些人所提出的，以上的行为均无力阻止法西斯前进的步伐。

相比之下，后佛朗哥主义的研究揭示了佛朗哥政权为追求政治目标，对大规模屠囚害民负有多大的责任。反过来看，这一行径激起了民众的某种反应。与之相似，佛朗哥垮台后，代表不同地区利益、具有强烈分裂主义传统的民族主义者，尤其是加泰罗尼亚人，提出了足以支持他们民族独立的历史依据，而右翼则强调西班牙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悠久历史。两方的拉扯今天依然存在。

1975年佛朗哥死后，人们可以更加自由地讨论西班牙内战了。起先，为促进民族和解，大家将战争抛之脑后。西班牙人民决定超越佛朗哥留下的影响，这成了他们打造新型民主国家的一个方面。由此，《遗忘公约》诞生了。它存在于1976—1982年的中间派政府中，后来1982—1997年的左翼政府与1997—2004年的右翼政府也分别延续了这一政策。基于1977年大赦法（1977 Amnesty Law），西班牙国内无人受到起诉。此外，“胜利日”被更名为“武装部队日”，烈士谷中的陵墓也不用于官方庆典活动。佛朗哥的埃尔帕尔多王宫不再接待游客。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宫殿内有一个壮观的公园，佛朗哥曾在那里打猎。1997—2004年，何塞·玛丽亚·阿斯纳尔政府致力于呈现关于过去的统一视角。小说家与电影制片人也未能好好审视西班牙内战，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20世纪30年代重要事件的纪念日留作私人闲谈，而非公众纪念。

但是，西班牙这座大厦已然出现了不少裂痕。例如，20世纪80年代，西班牙大学中掀起了一场不太显眼的革命，这次革命使反佛朗哥知识分子达成了共识。此外，在同一时期，萨拉曼卡开办了西班牙内战档案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档案馆中陈列的大部分资料最初来自共和党人。它们是在佛朗哥主义者的要求下被汇编的，用于审判共和党领袖。外国档案的解密或者说部分解密也颇具启发意义。冷战结束与苏联解体均意义重大，因为随着苏联的解体，许多斯大林的政策得以阐明。同时，非苏联的材料也开始向公众开放，包括意大利方面的资料。

自20世纪90年代起，要求直面战争真实的压力不断增加。而且，对于内战，西班牙全国上下忧心忡忡的态度，在2001—2009年瓦解了。在某种程度上，政治上的压力导致了瓦解，尤其是那些对原始民族主义孜孜以求的地区（如加泰罗尼亚）所施加的压力。由于加泰罗尼亚直到战争结束，一直在反对佛朗哥的运动中突出作用（许多非加泰罗尼亚人也深度参与其中），人们开始对统一口径后的西班牙历史描述进行广泛的抨击，引发了对西班牙内战的重新思考。

同时，在大众层面上，人们也对《遗忘公约》发起了攻击。这说明，在一个更加民主的社会里，政客们失去了对民众的某些控制。成立于2000年的历史记忆复苏协会（ARMH）意图恢复关于共和党人的历史记忆。2001—2009年发表的多篇小说描述了佛朗哥政权接管期及掌权后对共和党人的大肆屠杀。后来，对现政权的反思发展成了一场受众广泛的文化运动。这类书籍变得流行起来，其中的许多是在地方上出版的。此外，网上出现了大量的对以上问题的讨论。

人们的讨论与外界的压力大多聚焦于西班牙全境数量众多的万人坑上。这些万人坑内埋葬着当时因持不同政见，不被佛朗哥政权所容而惨遭谋杀的人。共和党人的后代要求将他们祖先的遗体挖掘出来，验明身份并重新安葬。压力伴随着基因检测与司法鉴定技术的进步而剧增。由于这些技术的发展，身份识别的可能性变大了。此外，受害者子女的年龄也使问题变得紧迫起来，他们要求政府在自己去世前搞清楚他们父母的身份。受害者的孙辈成了主要的倡议者。第一次遗体挖掘工作始于2000年。到2003年时，政府已经在佛朗哥的集中营里挖掘遗体了。

人们对真相的追寻与对故人的纪念有关，如今出现了介绍受害人遇害方式的纪念匾。法国也出现了相似的事态。在法国，人们用纪念匾强调维希政府对法国犹太人的所作所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类似运动一样，西班牙国内也有人要求政府将财产物归原主，并呼吁政府归还之前被抓走的孩子——西班牙内战后，这些孩子被送到了佛朗哥派的军官家中。这种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也出现在了保守主义独裁军政府统治下的阿根廷。

政治发挥了其作用。阿斯纳尔政府觉得，这种要求政府采取行动的呼声来自左翼阵营，因此拒不屈服于这种压力，尤其不愿启用司法程序调查所有受害者的死因。2004年阿斯纳尔政府垮台后，由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José Luis Rodriguez Zapatero）领导的工人社会党政府在2004—2011年执政。他们不仅急于撤销阿斯纳尔的政策，还试图借此赢得政治资本。人们想要查明国民军镇压反抗、巩固阵地时的大肆屠杀。历史记忆复苏协会获得了专项拨款、政

治支持与法律援助。2007年10月，政府通过了“历史记忆法”（Historical Memory Law）。它认可了西班牙内战双方的受害者，正式谴责了佛朗哥政权，下令将佛朗哥的标志从公共建筑物上移除，为受佛朗哥主义压迫的遇害者遗体挖掘工作提供国家援助，禁止在烈士谷举行政治活动，并授予国际纵队幸存者以西班牙国籍。西班牙人民党投票反对这项立法。他们认为，这项措施弱化了向民主过渡的政治共识，而加泰罗尼亚共和左翼也投了反对票，理由则是这些措施还远远不够。2009年，烈士谷纪念碑景点被关闭了。2010年，那里的天主教巴西利亚教堂也不再用于举行弥撒，直到2011年政府重组后那里又重新开放，可用作弥撒。

左翼阵营所施加的压力引发了右翼的强烈抵制。那些重申旧有的佛朗哥主义观点，并对重新审视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历史之诉求加以攻击的作家，有其忠实的拥趸。2006年，在《世界报》（*El Mundo*）的一项民意调查中，30%的受访者称1936年佛朗哥的崛起是正当的。因此，对西班牙历史的回顾反映出西班牙社会一直处于分裂之中，历史回顾本身也是这种分裂的载体。事实上，问题远不止于此。

此外，内战一直是西班牙政治专业词汇的一部分。2007年，传媒帝国普利沙集团负责人赫苏斯·德波朗科（Jesús de Polanco）指控反对派想要“重回西班牙内战”，因为这些反对派对左翼媒体舆论有所批判。当人们遇到一些看似无法接受的事情时，引证历史总能给人提供便利。这也是西班牙处理自身历史时的普遍性倾向。但是，这种当下与过去的粗略对比往往受到了误导而不够公正，因为现今的西班牙已与20世纪30年代的情形大不相同了：2001—2009年，西班牙已被纳入国际体系（最明显的就是欧盟）之中，这构成了今非昔比的一部分原因。

2010—2019年，激烈的辩论仍在持续。左派批评了代表佛朗哥发声的修正主义。双方都以党派为阵营，叙述了对方在战时犯下的暴行。外国作家的那些让人情绪激动的书名无异于火上浇油，例如“西班牙大屠杀”。这个术语不仅极大地扭曲了西班牙历史，也错误地陈述了希特勒的政策，此术语的使用可以说大大减轻了大屠杀的严重程度。2012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敦促西班牙废除1977年大赦法，因为根据国际人权法，危害人类罪没有诉讼时效。西班牙政府不同意这一观点：自2011年起执政的西班牙人民党保守主义政府限制了政府提供的遗体挖掘援助。

与世界上其他地方普遍存在的情况一样，西班牙的争端很快成了探寻真相与寻求和解的过程的实证，同时也是当下政治局势的例证。由于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探求真相并走向和解所表现出的正面效

应，人们已普遍将这一过程视为规范。但是，出于对政治资本的追求，政治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寻求真相与和解进程的逆流，尽管追求政治资本也可被视为整个真理与和解观念的中心环节。

在西班牙，1998年，当一位法官安排逮捕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将军——1973—1990年智利的独裁者时，政治显而易见地发挥了作用。这一举措当时遭到了阿斯纳尔政府的强烈反对，因为政府急于在西班牙国内实现和解，同时也迫切想要和智利保持友好关系。皮诺切特在左派眼中被视为佛朗哥的接班人。在西班牙国内，不可逮捕佛朗哥政府中的任何成员与反对皮诺切特这两种行为所产生的分歧，得到了公开讨论，这么做的意图是使阿斯纳尔政府难堪。

2014年，西班牙举行的1981年右翼军事政变未遂周年纪念活动使人们看到了纪念西班牙近代史的复杂历程。国民警卫队中校安东尼奥·特赫罗·迪兹未经授权，擅自在国民警卫队营房为其父以及其他密谋者安排了一顿午餐，因而受到免职处罚。他的父亲安东尼奥·特赫罗·莫利纳就是这次未遂政变的首领。在2017—2018年的加泰罗尼亚危机中，分裂主义者反复将西班牙政府的态度、政策与做法同佛朗哥政府相比较。

2015年年底，317条街道仍以佛朗哥的名字命名。一些城市已经改了街名，移走了雕像，但另一些城市则呈现出一番别样的景象。

第十二章

暗潮涌动的佛朗哥统治

佛朗哥之死来得非常慢。
他在去世时手中紧握宗教圣物。

佛朗哥独裁统治

直到1973年佛朗哥任命新首相之前，他作为国家元首，既是国家领导又是政府首脑。这个在西班牙内战时成立的民族主义军事化国家由右翼独裁政权掌政。国家的基础是“组织民主”（organic democracy）理论，据说它并非普选权那种“无组织的民主”，而是代表了社会的真正利益。有人认为，普选权具有内在的自私性，而且明显缺乏对真理的理解。西班牙议会建立于1942年，是一个由政府主导的咨询机构。然而，根据1958年国民运动组织原则法的规定，西班牙是一个传统的天主教君主制国家，同时也采取代议制。此处对君主制的强调反映了君主政体在西班牙，尤其是在军界的强势。但是，当时人们的共识是，在佛朗哥去世后，君主才会复位，而佛朗哥去世远在1975年，这说明人们在这一事件实际发生前很久就做好了恢复君主制的打算。后来，1967年的《组织法》确认了佛朗哥个人的立法权。佛朗哥任命了部长会议（the Council of Minister）的成员，并亲自担任主席。部长会议是重要的国家机构，同时也是个充斥着党派斗争的场所。

相比之下，公众集会与媒体均受到了严密控制。地方分裂主义被视作威胁，这也成为强权政府存在的另一个理由。政府还借此采取措施，实现“权力的统一”。1934年，刘易斯·孔帕尼斯宣布加泰罗尼亚独立，后来他逃往法国避难。1940年，孔帕尼斯被占领法国的德军逮捕并移送给佛朗哥当局。在佛朗哥主义者手中，他受尽虐待，最终被枪决。

1939年，西班牙内战之后，政府处决了大量疑似同情反对派的人士，更不用说那些从事反对活动的人了——三年间至少有2万人丧生——佛朗哥还亲自签署了许多人的死亡判决书。军队与准军事部队成了政权的重要捍卫者。共和党游击队继续反抗活动。例如，他们在阿萨尔基亚与阿勒普耶罗斯山区的抵抗运动直到1942年才结束。虽然随

着时光流逝，国家的恐怖统治不像以前那么血腥残忍，自1942年起受到处决行刑的人数逐渐减少，但是持久的战争状态使平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尤其是在20世纪40年代。例如，被判定为不忠的教师遭拘禁、流亡、处决、解雇，或者被迫接受再教育。人们对被告发的恐惧促进了审查制度的维系。黑市泛滥，普遍贫困，那个时期被称作“饥饿年代”（anos del hambre）。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0年，希特勒动了组建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维希法国之联盟的念头，但是他对维护西班牙与法国利益的责任感十分有限。当时如果西班牙参战，如果德国在西班牙南部建立空军基地的话，本可能攻击直布罗陀海峡，进而摧毁英国在地中海西部开展军事行动的能力。此外，这一联盟还能使德国在西班牙的大西洋与地中海沿岸以及加那利群岛建立潜艇基地。1940年10月23日，希特勒在法国昂代与佛朗哥会晤。

虽然佛朗哥在1939年与德国签署了友好条约，他本人也是希特勒事业的坚定拥护者，但西班牙仍置身于冲突之外。佛朗哥对希特勒的支持在战后被极大地弱化了。佛朗哥主义者后来自称，西班牙在战时的中立归功于佛朗哥勇敢且巧妙地抵抗住了来自希特勒的压力。事实上，佛朗哥坚决反对民主。他和希特勒一样，认为犹太教、共产主义与世界主义是串联在一起的威胁，而且犹太人要为反德国联盟的组建负责。佛朗哥不想让西班牙为犹太人提供庇护。1939年5月11日颁布的一项法令禁止“那些明显具有犹太裔特征的人”进入西班牙。1941年10月23日，另一项法令又禁止犹太人乘坐西班牙船只前往新大陆。极少有犹太人在西班牙得到庇护。

在佛朗哥看来，希特勒必胜。这种可能性显然给他提供了控制直布罗陀海峡、摩洛哥，甚至是英国的传统盟国葡萄牙的机会。西班牙国内存在着夺取这些地区的呼声，来自长枪党的呼声尤为响亮。1940年6月，佛朗哥已经占领了丹吉尔的国际区域。

佛朗哥对法属北非地区，尤其是摩洛哥的领土要求在希特勒看来有些过分了。而且，如此一来可能会削弱维希政府统治下的法国的力量。法兰西帝国及其战舰对德国来说，在政治与军事上都更加重要。而且，西班牙希望获得食物、原材料、制成品与武器的要求，也让人无法接受。对希特勒来说，由于西班牙经济明显较弱，其整体而言无足轻重，能给他提供的好处很少，因此也就不值得为之付出太大努力。事实上，同盟国的海上封锁使西班牙只能依靠同盟国获取燃料与

食物。与墨索里尼结盟带来的许多问题使得希特勒无法承受佛朗哥提出的要求。而且，希特勒认为，佛朗哥所能做的只是分散苏联的作战目标而已。佛朗哥宣称，西班牙已筋疲力尽。无论是与英国交战，还是允许德军通行前去进攻直布罗陀海峡，均会使英国攻击西班牙的海外领地。西班牙自称“不交战”。

然而，佛朗哥却在积极地通敌合作。例如，他为德国侦察机与意大利人体鱼雷部队提供基地，协助德国从事间谍活动，发动宣传攻势，并为U型潜艇补给燃料。佛朗哥除了提供原材料外，还派出了志愿者队伍“蓝色师”前往东线对抗苏联。这被视为是反共产主义的运动。西班牙志愿师之所以被称为“蓝色师”，是因为许多早期志愿军是身着蓝衬衫的长枪党民兵。这不是一支常规军，但是派出这支部队是对苏联介入西班牙内战的回应，尽管佛朗哥并未对苏联宣战。志愿军人数不足，因此截止至1942年年底，甚至连反法西斯主义者也被征召入伍。蓝色师十分骁勇善战。

佛朗哥政权内部四分五裂。政府、军队、长枪党与整个右派阵营内部也是剑拔弩张。1942年，在毕尔巴鄂的贝戈尼亚圣殿事件中，长枪党与卡洛斯派起了冲突，有人投掷了手榴弹。其结果是，长枪党领袖随后受到了惩罚。佛朗哥的妹夫雷蒙·塞拉诺·苏尼尔（Ramón Serrano Suñer）是法西斯主义长枪党的领导人。1940年，他担任西班牙外交部长时，坚决反对同盟国。1942年，他被撤职了。

反过来，当战争局势开始不利于德国时，尤其是在1943年西西里岛陷落，墨索里尼垮台后，佛朗哥政权对同盟国变得更加友好了。1942年11月，同盟国先是占领了维希政府控制下的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随后又在突尼斯击败了轴心国势力。这都使得西班牙似乎更易受到攻击，尽管1942年11月德国占领了维希政府统治下的法国后有更多的德军驻扎在西班牙北部边境上。1943年，葡萄牙也转而支持同盟国，允许它们在亚速尔群岛建立空军基地。鉴于战争形势看似越来越不利于轴心国，佛朗哥政权试图使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具有法西斯主义倾向。例如，对犹太难民变得更具同情心了。

“蓝色师”人数减少，并于1943年撤退了。作为西班牙军团，1500人依然留在那里，但在1944年2月接到命令回国。在美国威胁切断石油供给的压力下，佛朗哥于1944年5月同意交出扣押的全部意大利船只，驱逐所有德国代理人，并大范围切断对德的钨供给。1944年10月，西班牙承认法国的夏尔·戴高乐政府合法。然而，直到1945年4月，西班牙才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而对德的情报援助则持续到了战争结束。此外，德国与维希政府统治下法国的要人在战争结束时得到了西班牙的庇护，有些人还在西班牙的帮助下逃往了南美洲。

与泰国一样，西班牙战时的转变为其战后佯装中立铺平了道路。这种对事实的扭曲促成了冷战期间佛朗哥与美国的军事合作。自1975年起，西班牙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改写明显与政治倾向有关，属于冷战引发的争端。

冷战

如果共和党人当时赢得了西班牙内战，并因此获得了大西洋上的基地，尤其是战舰与空军基地的话，冷战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就会变得困难得多。此前，如果在1936—1939年实现了这场胜利的话，再加上1939—1941年的苏德条约，西班牙在1939—1941年无论如何都会成为德国的盟友。

相较之下，法西斯主义西班牙独裁政权因为其1945年后明确而持续的反共立场，最终被纳入西方联盟之中。起先，西班牙的处境并不容易。1945年年初，英国、美国相继照会佛朗哥，西班牙在战时采取的政策与法西斯主义倾向，意味着它将遭到国际社会的孤立。因此，它未受邀参加1945年的联合国成立大会，并且直到1955年才获准加入联合国。事实上，许多人认为，同盟国会在1945年入侵西班牙。

作为对英、美两国的回应，1945年夏，佛朗哥试图提高西班牙的国际声誉。他宣布成立君主制国家，国内宪法的权力据说也得到了改善。同时，一名同情轴心国的官员被解除外交部长之职。但是，1946年3月，英国、法国与美国宣布，只要佛朗哥继续掌权，它们就无法与西班牙建立友好关系。联合国迫切呼吁西班牙采取更加坚决的行动。然而，当这场危机被化解后，西方国家与佛朗哥政权的共存关系得到了发展。这也使得觊觎西班牙王位的唐·胡安·德·波旁开始与佛朗哥和解。

作为另一个独裁主义右翼专制政权，葡萄牙自始至终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成员国。这主要是因为1943年美国在亚速尔群岛建立了空军基地，此举被视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空军基地的重要性既体现在它可为北约美军（尤其是驻扎在意大利与地中海东部的美军）提供补给，还体现在当苏联攻占大量领土时，它可为美国提供战略纵深。1953年，西班牙与美国签署和约，给予美军在西班牙建立空军基地的权利，但西班牙直到1983年才加入北约，彼时它已然是民主国家了。在1953年和约的规定下，佛朗哥得到了钱财与国际认同，最终得以与艾森豪威尔总统会晤。

然而，人们至今仍忽略了一个事件，那就是贯穿于西班牙内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的，为反抗佛朗哥政权所做出的大量努力。反抗的鼎盛期在1944—1948年，当时有多达10000名游击队员在战斗。除去西班牙内战时期藏身于山间的共和军外，政府还面对着在比利牛斯山脉之中来自法国边境地区的游击队。1944年德国对法国的占领结束后，法国边境反对佛朗哥政权的活动就更加活跃了。1944年10月，2500人穿过阿兰山谷，发动侵略战。西班牙共和国国旗飘扬在被占领区上空，但佛朗哥主义者已做好充足的应对。入侵失败了。1944年9月，西班牙国内掀起了罢工狂潮，但是没有多少人支持这一动乱。当年，美国与英国迫切想要集中精力对付德国，于是它们敦促新组建的法国政府不要让西班牙局势失控。

20世纪40年代末与50年代初，西班牙政府打败了共和军残部。他们采取的措施包括无情追捕共和军，以及对当地支持共和军的任何行为施以严厉惩罚。政府的清剿活动也得到了以下多方面的支持：在反抗者内部，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存在分歧；经历过西班牙内战的痛苦之后，人们对冲突普遍感到精疲力竭；政府通过食物定量配给制左右民众的支持；对佛朗哥主义的支持在靠近比利牛斯山的一些地区，尤其是纳瓦拉尤为强烈；法国对西班牙反抗势力从最初的同情转变为1946年年底的敌对，因为战后法国的联合政府中也有共产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20世纪50年代，法国境内的西班牙共和党活动遭到禁止，活动人员也被逮捕。由于西班牙军队中应征入伍者的可靠性存疑，佛朗哥政府派出国民警卫队抗击敌对势力。国民警卫队在西班牙内战中掌握了适当的战术与军事理论，残忍而勇猛。受捕的反抗人士往往当场被枪杀，约有5000名游击队员遇害。西班牙政府宣布动乱于1951年正式结束，但此后反抗行为仍以较低的水平继续存在。

西班牙仍是极权国家，政府监视着批评者。许多事情还不甚清楚，尤其是秘密警察的档案尚待研究。然而，若要考虑那个时期发生的事，人们一定要了解国家监视与暴力的“暗流”实际上是当时社会显而易见的主流。地方分裂主义受阻。1938年，加泰罗尼亚自治被废除。加泰罗尼亚语成了方言，而加泰罗尼亚人名与民族舞均遭到禁止。

官方所认定的“西属撒哈拉的海外省”，简称西属撒哈拉，在那儿，西班牙仍以其帝国主义势力抵制着当地的独立运动，但最终，它同意当地保持长期的民族自立。此外，西班牙在1958年将边境省份塔尔法亚，1960年将飞地伊夫尼归还给了摩洛哥。自1960年以来，西班牙为使西属几内亚留在其体系之内，曾试行部分的殖民地自治化。1968年，西属几内亚获得独立，成为赤道几内亚。1970年，在如今人称“泽姆拉起义”的事件中，西班牙人镇压了西属撒哈拉的独立游

行。但是，1973年，西班牙同意了在1975年年初举行公民投票。

与之同一时期的1967年直布罗陀公投，虽然显示绝大多数人反对西班牙的统治，但人们却遭到警察与海关人员的骚扰和阻挠，例如，1969年西班牙以关闭边境大门、切断电话线与中断邮政通信的方式对直布罗陀进行封锁。这种骚扰恰恰加深了那里的人对西班牙的敌意。这次封锁对周边一些地区的经济造成了严重打击，封锁直到佛朗哥去世多年后的1985年才结束。

意识形态与政策

持续到1975年佛朗哥去世的独裁统治是法西斯主义的，但是它的核心是以军队为后盾，同时利用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由将军领导的保守主义独裁政府。这一点可见于西班牙内战及随后时期。佛朗哥主义的支持者主要是小自耕农，但也有许多（尽管绝对不是全部）中产阶级。在这种独裁主义中，家庭，尤其是父权家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也提供了一种强大的母性理念，还包括对妇女以及女性独立地位的压迫。这有助于强化天主教会对佛朗哥的支持。长枪党中的女性不愿选择消极的虔诚，她们通过积极的宗教参与，来回应社会需求。1939年，长枪党中的女性成员据称有58万人。与大多“佛朗哥主义”的情况一样，这个团体也是保守主义的，而且领导人出自社会精英阶层。警察会对在车内接吻的情侣进行审问。政府还取缔了独立的工会，取而代之的是国家认可的那些工会。

社会上还有其他的趋势。纳粹德国与法西斯主义意大利影响了佛朗哥的国内政策。这些政策鼓励国家尝试实行现代化、人员流通的独裁统治。这种政策与长枪党内更加激进的人士关联紧密。但是，这一尝试受到了战争、压迫与意识形态所带来的后果的限制，包括人力资本的毁灭与诸多体制因素的限制。

上述政治带来了多种后果。随着混凝土的浇筑，教堂的建造成了新型西班牙构建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也体现了教会对佛朗哥的支持。1940年，在巴塞罗那，高迪当年未完工的圣家堂又开工了。而国家的建造者则想规划出一种新型政治经济体，创造出一个能为天主教复兴与政治稳定提供基础的有效、公平的社会。

但是，计划的实施要比构想困难得多，部分原因来自行政管理上的较量。1956年前建造的用于发电的水坝，工期比预计的要长。而且建成的堤坝不够高，泄洪道也比20世纪30年代的小。1939年马德里被占领后，政府提出了变革城市的计划。但在战后，这些计划因资金

短缺而不了了之。

作为一条独立的线索，基督教民族主义是当时佛朗哥政权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政权遵循的纲领是国家支持的社会保守主义，事实上这是基督教非民主政体的一种。例如，在《普通教育法》（1970年）的规定下，政府将实现免费义务教育视为奋斗目标，但这项规定直到1980年还没落实。当时，社会文化创新的普遍方式是文化庸俗化。

西班牙超现实主义

路易斯·布努埃尔（1900—1938年）是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的一位制片人，也是西班牙超现实主义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他出生于阿拉贡地区特鲁埃尔省卡兰达市，家境优渥。后来，他将家乡描述为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直处于中世纪”的地方。他在马德里大学接受的教育对他而言是一次颠覆。布努埃尔与洛尔卡及萨尔瓦多·达利（1904—1989年）成了至交。他在母亲的资助下，和达利一起拍摄了超现实主义的惊人之作《安德鲁之犬》（1929年）。布努埃尔拒斥天主教教义，并于1931年加入了共产党。他拍摄的电影《拉斯乌尔德斯山谷：没有面包之地》（1933年）描述了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的贫苦农民。这部电影起先批评了西班牙共和国对农村生活的漠视，后被用作反法西斯宣传，从而遭到佛朗哥的禁止。布努埃尔在西班牙内战中支持共和军，后来生活在美国与墨西哥，最后加入墨西哥国籍。

达利生于加泰罗尼亚，家境殷实。当他在马德里学习艺术时，他尝试了立体派。后来，达利成了一名在巴黎工作的超现实主义者。他拒不投身西班牙内战，并在纽约安然度过了20世纪中期的动乱岁月。1948年，达利返回祖国。他愿意在佛朗哥统治时期生活在西班牙，以及他对独裁者的赞美，都触怒了依然流亡在外的人们。达利日益浓重的天主教信仰是他身上的另一个变化。1982年，欣赏达利艺术的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封他为普波尔侯爵。位于达利家乡菲格雷斯的达利戏剧博物馆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魔幻屋，这里曾是一家剧院。

佛朗哥主义建筑

参观现代西班牙的人可以看到许多佛朗哥统治时期流行的建筑物，马德里地区尤甚。这里既有本土的复古风格——表现形式是回溯黄金时代的西班牙，尤其是埃斯科里亚尔的建筑——还有基于意大利与德国模式的法西斯现代主义风格。二者的共同之处就是规模，正如

西班牙空军部、美洲博物馆与博尔哈圣弗朗西斯科教堂所展现的那样。

变革的迹象

通常而言，佛朗哥主义分为压迫与过渡两个时期。以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初为主的过渡期，关联着自由化、经济增长及社会变革这些术语。关于这种解读，可说的地方有很多。例如，《1966年新闻法》的通过使审查制度自由化，但它依然存在缺陷。早期，西班牙曾尝试获得由国家主导的、社团主义的经济增长，尤其由于《1959年国家经济稳定计划》的出台，政府官员在管理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民主精神的缺乏对这一进程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西班牙依然处于国家控制的大背景下。因此，20世纪60年代的工业腾飞在某种程度上有赖于可获得的顺从且廉价的劳动力，其中大部分人是农民工。这些劳力源于西班牙内战及战后影响。

与此同时，采取过于保守的发展方式是错误的。那个时期普遍存在的经济“长期繁荣”在为西班牙提供出口商品市场、投资资本与新技术方面至关重要。汽车文化传播开来。贸易额增加，如此一来，自给自足的经济就既不可取也不必要了。然而，由西班牙政治立场导致的外界对西班牙的孤立大大推迟了经济繁荣的到来。西班牙经济繁荣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出现。

经济增长极大地激化了地方分歧。制造业集中的城市显然是最大赢家，尤其是加泰罗尼亚的制造业。那里的许多商业精英都支持佛朗哥。相比之下，农村内陆地区沿袭了一种长期存在的模式，不管是相对而言还是实际情况都很糟糕。安达卢西亚东部、加利西亚大部分地区与卡斯蒂利亚的梅塞塔高原大部分地区情况尤为严重。为了盈利，农业进行了现代化改革，改革的典型是大量使用拖拉机所带来的机械化。但是，这会导致农村失业人口以及来自内陆地区的大规模农民工的出现，进而使往日的集镇走向衰落。安达卢西亚与梅塞塔高原人口流失严重，人员主要流向了巴塞罗那、马德里与海外。这种趋势在欧洲十分普遍。

对乡村悲惨生活的逃离，逐渐与寻找经济机遇和社会地位的人员流动联系在一起。这种追寻的表现形式包括新住宅区的建立，马德里埃尔皮拉尔区便是例证。马德里人口从1930年的95万上升至1970年的300万。这种上升比例远远超过了西班牙人口的增长比例。在佛朗哥执政时期建造的居住区内，新教堂纷纷拔地而起。

这些变化大大冲击了业已确立的社会、经济模式，给天主教民族主义政权带来了考验。天主教民族主义的保守主义本质与反动立场在20世纪60年代显得越发多余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之前电影院提出的问题，由电视进一步深化。政府对媒体采取控制，但也支持消费主义价值观。尽管罢工在西班牙是非法的，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起，罢工愈演愈烈。警察镇压也未能使罢工停止下来。工人委员会组织了秘密工会，并为其他领域提供了激进主义的活动示例，如学生抗议活动。以上这些活动最终鼓励了人们反对佛朗哥，也理所当然地传播了一系列不同的价值观。在回应人们对公用事业的担忧上，居民协会发挥了作用。

佛朗哥主义虽然对团结统一有着狂热的追求，但不得不开始管理而非指挥西班牙。因为，社会上存在诸多迥然不同的倾向，政府已无法像20世纪40年代甚至50年代那样去强迫人们了。自20世纪60年代末起，学生、工人，以及其他倡议、抗议团体活动让政府在指挥西班牙社会时遭遇了重重困难。此外，许多神职人员也开始表露不满。西班牙全国范围内进步的教区牧师在布道中向教堂会众讲述了他们对体制的批评，而会众中的许多人都是保守主义者。由此引发的教会内部的紧张局势，在许多家庭之中也能见到。

西班牙社会多样性的一个体现就是成立于1959年的“巴斯克祖国和自由”运动（Euskadi Ta Askatasuna，简称“埃塔”，ETA）。“埃塔”旨在为巴斯克文化摇旗呐喊，后来转变成了恐怖组织，并实施了1968年的谋杀行动。第一次暗杀发生于1970年，谋杀对象为圣塞瓦斯蒂安秘密警察组织中刑讯逼供部门的负责人。“埃塔”也曾尝试刺杀佛朗哥，但未成功，这是他们一系列不成功尝试中的一个。

佛朗哥主义历史

正如1922年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所作所为那样，赢得了西班牙内战胜利既而掌权的佛朗哥右翼民族主义独裁政权在纪念战争胜利的同时，又采纳了标志着回归过往伟大辉煌的历史参照点。同时，佛朗哥政权借鉴了中世纪西班牙的收复失地运动来驱除外来的反基督教，具体而言指的是驱逐民族主义的对手——左翼世俗主义共和党。佛朗哥主义对待西班牙历史的方式与后佛朗哥主义和安达卢西亚的交手毫无共同点可言。政府特别强调的是，在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与阿拉贡国王费尔南多的统治下，西班牙最终打败摩尔人，驱逐了犹太人，维护了天主教的纯洁性并获得了新大陆。佛朗哥政权将腓力二世统治下的西班牙塑造成了在宗教上团结一致的国家。相比之下，受18世纪启蒙运动与19世纪自由主义影响的西班牙被忽视了，后者基本没有出

现在学校教育之中。

例如，干沙路·梅嫩德斯·皮达尔（Gonzalo Menéndez Pidal）在1941年出版于马德里的《西班牙历史地图集》基本上没提到19世纪、20世纪。这本书忽略了现代化与国内政治，赞扬了西班牙更为英勇、团结的过去。书中也有较多篇幅谈到收复失地运动，并用了一整页讨论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时期的西班牙工业与商业，另一页涉及四位圣人旅行的地图，还有几页讲到近代早期的文化史。这本书对犹太人与摩里斯科人三缄其口：刻意忽略实乃种族主义的呈现。这本地图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依然非常重要。

与许多利用过去大做文章的案例一样，佛朗哥主义对昔日荣光的向往由来已久。之前，就有人将西班牙过去的辉煌与1898年美西战争进行对比，当时人们关注的焦点是西班牙在美国手中遭遇的那场令人难堪的失败。然而，与大多数古为今用的情况一样，人们谈及历史的口吻及对过去的利用存在重大差异。尤其是在这次佛朗哥对历史的利用中，政府的支持力度很大。虔诚的天主教信仰、领土扩张，以及费尔南多与伊莎贝拉的种族主义显然都是适合佛朗哥效仿的对象。基于鲜明意识形态立场的虚构历史是非常先进的。

正如法西斯主义意大利一样，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排斥自由主义，也利用了一些流行趋势。其中一些趋势相较于其他而言，具有更加丰富的历史想象和更为宏大的主题。佛朗哥厌恶所有他认为导致了西班牙早期软弱并制造了西班牙当下问题的人。在国际关系方面，这种厌恶意味着对法国与英国的仇视，因为这两个国家都削弱了西班牙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的实力。而且，英、法两国均允许民主政体存在，这更是加深了佛朗哥的敌对情绪。在佛朗哥统治时期，现代史往往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的。西班牙过去作为一个伟大的帝国主义强国，远超法国与英国的那段历史得到了强调。在此期间，西班牙政府与非洲研究所合作出版了《西属非洲历史地理地图集》（1955年），彰显了自身的殖民立场。

与此同时，其他观点流行起来、为人所知。加泰罗尼亚历史学家若梅·维森斯·维维斯创作了《西班牙通史地图集》（1944年出版于巴塞罗那）。这本书比皮达尔的那本更加形象生动。迫于佛朗哥政权的威慑力，维森斯不得不小心谨慎地处理书中的政治题材。但是，他的地图集最终还是涉及了西班牙历史上重要的纷争——卡洛斯战争与西班牙内战——而且，他比皮达尔更愿意在欧洲框架下展现西班牙历史。他的地图集并没有收录圣人们旅行的地图。事实表明，维森斯尤为关注社会、经济方面的历史，以及与法国学者的联系。他创办了《现代历史研究》（1951年）杂志。其他历史学家也相继效仿。对历

史唯物主义的兴趣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互为因果。

独裁统治的终结

西班牙独裁统治主要集中在佛朗哥身上，而且在他1975年去世后就开始瓦解。但是，佛朗哥之死来得非常慢。他在去世时手中紧握宗教圣物。西班牙的情况不同于葡萄牙，它要比葡萄牙好些。安东尼奥·萨拉查自1932年起在葡萄牙建立的专制政府在他1970年去世后依然存在，直至1974年政变爆发时才垮台。由这场政变所引发的社会动荡到1976年才结束。

佛朗哥坚决不愿看到在他死后西班牙有任何走向民主政体的转变，他坚决拥护延续性（continusimo）。但是，在“埃塔”组织的“恶魔行动”中，佛朗哥的热心拥护者兼首相、潜在的铁腕继承人——海军上将路易斯·卡雷罗·布兰科于1973年12月在马德里被炸死（一同丧命的还有两名保镖）：安装在路面下的炸弹威力巨大，轿车被弹飞到了空中。作为回应，政府采取了更加严厉的反恐措施，涉案者中有10人被定罪、处决。

佛朗哥坚决反对民主改革，他让上一位西班牙国王的孙子胡安·卡洛斯（1975—2014年在位）发誓捍卫佛朗哥主义民族运动的价值观。佛朗哥宣称，他已确保“一切都受到了限制，好好地受到了限制”。但是，当时人们努力保住佛朗哥性命的做法暗示出西班牙在没有找到接班人时有多么手足无措。此外，政治与经济精英阶层中的要人认为，佛朗哥主义结构体系当时正走向衰退。但是，这种观点并未引起佛朗哥的重视。他也没有认真对待西班牙的城市化与中产阶级化所带来的影响。

旅游业

在佛朗哥统治时期，西班牙成了一个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包装业、喷气式飞机，以及“长期繁荣”时期欧洲北部工人日益增多的可支配财富，共同创造了巨大的需求。宽松的规划管控与低廉的地价极大地促进了一系列旅游胜地的腾飞。有时，这些旅游胜地的前身就是简朴的渔村，一如位于西班牙白色海岸的贝尼多姆市。自20世纪60年代起，西班牙旅游业在气候、沙滩与喷气式飞机和包团旅游所取得的发展的助力下，增势迅猛。旅游人数从1959年的400万上升到1964年的1400万。人数仍在持续上涨。2015年，西班牙成了在欧盟旅游的外国人最倾心的旅行目的地；2.7亿人次在西班牙旅游住宿过夜，这个数字占到欧盟总数的

21.3%。旅游业占西班牙国内生产总值的10%—11%。2016年，西班牙是全世界排名第三的旅游热门国家。2016年，去西班牙短期旅行的游客中规模最大的一类来自英国（1780万人）、法国（1140万人）与德国（1120万人）。此外，还有7560万名国际游客，而2015年的数据是6820万人。旅游业成了重新定义西班牙的方式，因为传统地名变得无关紧要了。1964年，按照海岸重新命名、重新设定西班牙大部分地区的进程开始了，尤其是布拉瓦海岸与阳光海岸。新城市开始变得闻名遐迩，例如，阳光海岸上首屈一指的名胜马尔韦利亚。在马略卡，帕尔马成了重要的度假胜地。加那利群岛也是一个主要的景点。由于1992年奥运会的举办，巴塞罗那作为旅游胜地一跃而起。在此之前，那里一年的访客量不足100万。但是，到2016年，整年的旅游人数已超过800万。

第十三章

重获新生：君主立宪的重建与世界参与者

“各位西班牙人民，佛朗哥去世了。”在佛朗哥去世当天，卡洛斯·阿里亚斯·纳瓦罗首相在国家电视频道“西班牙电视台”上发布的通告，标志着通向新西班牙的旅程拉开了帷幕。

“各位西班牙人民，佛朗哥去世了。”在佛朗哥去世当天，卡洛斯·阿里亚斯·纳瓦罗首相在国家电视频道“西班牙电视台”上发布的通告，标志着通向新西班牙的旅程拉开了帷幕。但是，这其中具体包含着什么，并不明朗。西班牙向民主的过渡绝非必然。而且，有许多力量本会扰乱全盘计划，尤其是来自军队与“埃塔”组织的势力。另外，在佛朗哥死后，一旦西班牙决定由民主政府继任，人们并不确定决定生效后佛朗哥主义旧党派成员是否会配合。人们担心会有另一场政变发生，一如佛朗哥夺权的1936年政变那样。如今看来，政变根本不可能发生。

当西班牙重新引入君主政体时，在一段时间内，权力仍掌握在佛朗哥主义者手中。新君主是胡安·卡洛斯，他的执政期从1975年加冕开始至2014年退位为止。西班牙向民主体制的过渡相对来说是秩序井然的，其中存在着大量的延续性。这种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促成的。因为，美国不想让西班牙经历葡萄牙所遭受的那种社会动荡，从而给左翼的接管提供机会。胡安·卡洛斯在佛朗哥去世两天后加冕。事实证明，他对西班牙的转型至关重要。胡安·卡洛斯是阿方索十三世的孙子，唐·胡安·德·波旁（1913—1993年）的儿子。1947年，佛朗哥曾宣称西班牙是君主政体。但是，1969年，佛朗哥略过了唐·胡安，因为（错误地）担心唐·胡安过于偏向自由主义，而选择支持在他（错误地）看来更愿意维护佛朗哥主义国家的胡安·卡洛斯。而且，佛朗哥也不喜欢唐·胡安的独立姿态。直到胡安·卡洛斯继位两年后，唐·胡安才宣布放弃对王位的继承权。

实际上，新国王是愿意支持西班牙民主化的。他积极促使仰仗他领导的佛朗哥主义者与军队接受新秩序。在佛朗哥的统治下，西班牙没有独立政党，也没有新闻自由。而且，在主宰国家的小团体之外，国家层面上的政治生活几近于无，根本无力开展有组织的变革。因此，在反对派发起运动与政治犯为实现改变而四处奔走的大背景下，

在西班牙人称之为“过渡期”的阶段起到关键作用的正是新国王与一小群佛朗哥主义者。

佛朗哥的最后一位首相卡洛斯·阿里亚斯·纳瓦罗（Carlos Arias Navarro）在西班牙内战时，在马拉加地区为民族主义者效力，是一名定罪率很高的公诉人。这位首相的任期持续到1976年，直到被国王撤换掉才下台。这是因为偏执的阿里亚斯为了维护旧体制，拘捕了民主协作联盟——由被取缔的左翼政党新组建而成的一个党派——的首脑。虽然过渡期相对而言秩序井然，但在20世纪70年代，政治迫害十分猖獗。例如，1977年1月，在阿托查大屠杀中，极右翼刺客枪杀了5名共产主义劳工律师，还有4人受重伤。这些事件在胡安·安东尼奥·巴登（Juan Antonio Bardem）的电影《一月的七天》中有所展现。这位共产主义导演曾拍摄《骑车人之死》（1955年），该片大力抨击了社会的虚伪性。在马德里的安东·马丁广场上，立着一座纪念遇害律师的纪念碑。

胡安·卡洛斯指派阿道弗·苏亚雷斯·冈萨雷斯接替了阿里亚斯的相位。苏亚雷斯是佛朗哥体制中的一员，曾担任佛朗哥主义官方政党的秘书长。但是，他乐于促成改革。

事实上，苏亚雷斯曾告诉佛朗哥，民主化是不可避免的。苏亚雷斯成立了名为民主中间联盟的政党（简称UCD），而且，他提出的普选两院制议会的议案获得了全国公投的机会。1976年12月15日，这项议案获得高票通过。次年春，之前被苏亚雷斯率领的佛朗哥主义民族运动所解散的西班牙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政党、工会，经过他的努力，得以合法化，同时他还赋予了人民罢工权。阿托查大屠杀促成了这次变革。

足球

看到西班牙境内那些似乎还不错的咖啡厅或小餐馆了吗？嗯，你可要注意了。坐在外面也许不错，但通常来讲，店内的电视机，几乎专为满足男人对足球的狂热而设。这种狂热爱好以忠于当地球队为主。最热情的当属皇家马德里的球迷。皇家马德里组建于1902年，当时叫马德里足球俱乐部。白色主场球衣为球队赢得了“白衣军团”的称号。自1947年起，球队主场就是圣地亚哥·伯纳乌球场了。它可容纳多达81000名观众。俱乐部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加强了人们的身份认同感。1920年，阿方索十三世把“皇家”一词加于俱乐部名前。皇家马德里不仅赚得盆满钵满，在西班牙国内与欧洲的球场上也是屡创佳绩。1956—1960年，俱乐部蝉

联欧洲杯冠军。

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简称巴萨，是皇家马德里的劲敌。双方之间的球赛称作“西班牙国家德比”。巴萨成立于1899年。人们认为它对加泰罗尼亚身份的构建至关重要。俱乐部的所有者与运营者也都主张认同加泰罗尼亚身份。与皇家马德里一样，巴萨也十分富有，在西班牙与欧洲屡屡得胜。

1925年，巴塞罗那球场内的观众对西班牙国歌《皇家进行曲》予以嘲讽。1936年，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主席被长枪党人谋杀。而且，在西班牙内战后，人们把巴萨足球队与对佛朗哥的反抗等同了起来，还在皇家马德里与佛朗哥政权之间画上了等号。

自1936年开始举办的西班牙公选，1977年时在6月举行。选举结果是，苏亚雷斯领导的温和党只取得了不到半数的席位。新组建的国会起草了宪法。在1978年12月的公投中，该宪法获得了88%的支持率，从而得以确立。该宪法在西班牙议会君主制的制度化进程中，添加了社会、文化改革的内容；死刑被废除，公投年龄降至18岁，西班牙也不再设立国教了。比例代表制与两院制被视为促进社会缓和的手段，而这正是前佛朗哥主义时期第二共和国所缺乏的。宪法认可地区自治，这是与佛朗哥政府集权化措施的重要分歧。而且，在《自治法》的规定下，这种自治真的在西班牙全境实现了，尽管中央政府仍保留了一些包括外交政策在内的重要权力。宪法也宣告“西班牙作为一个国家的不可分割性”，阻止了分离主义的发展，而且在2017年加泰罗尼亚政治讨论中，国家的不可分割成了一个重要议题。

在1977年选举中成绩不俗的工人社会党放弃了过于激进的主张，这点对于西班牙的成功过渡也意义重大。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因素还有西班牙的极右政党未成气候。1979年，苏亚雷斯取得连任。但是，人们新获得的罢工权与地区自治权加剧了局势紧张，制造了不安。传统主义者并不欢迎《1979年加泰罗尼亚自治法》。1979年，科尔多瓦选举出了一个共产主义议会。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都很高。“埃塔”组织的行动在1978—1980年制造了更多人员伤亡，助长了社会的动荡。以上种种致使1981年1月苏亚雷斯被自己的政党排挤出局。胡安·卡洛斯遵循旧制，在苏亚雷斯辞去相位后授予他世袭公爵爵位，正如阿里亚斯获封世袭侯爵爵位一样。

右翼所怀有的妄想性焦虑，或者说，右翼对民主真真切切的仇恨与对旧有惯例的怀古之情，在佛朗哥主义秩序崩溃时做出了反应。结果就是，1981年2月23日右翼发动政变。国民警卫队中校安东尼奥·特赫罗（Antonio Tejero）率领200名全副武装的警卫队队员占领了西班

牙议会。与此同时，巴伦西亚军区负责人杰米·米兰斯·戴尔·博奇将军（General Jaime Milans del Bosch）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强迫胡安·卡洛斯建立军政府。

这次政变对民主的西班牙而言已到了生死存亡之时。而且，许多人担心西班牙会回到佛朗哥主义时期，或者至少像1923年普里莫夺权时那样，社会动荡不安。但是，胡安·卡洛斯拒绝了密友阿方索·阿玛达将军（可能也参与了密谋）的提议，不同意由阿玛达带头组建“救国政府”。胡安·卡洛斯通过电视发表讲话，申明他对宪法与民主统治的支持。他的立场保证了西班牙大部分军队，尤其是在马德里的军队不会支持政变。政变随后便以失败告终。没有出现伤亡，公众展现出了对民主的支持。军队里的谋反者遭到监禁。

关于这次政变有许多阴谋论调，有人说反对者还筹备了更大的行动计划；有人谈到国王的角色，国王当时也许在坐观政治风向；还有人提及苏亚雷斯的垮台与这次政变之间的关系。但是，关键在于新体制保全了下来。

胡安·卡洛斯并不为自己谋求权力，这是另一个关键之处。除去1923年之前的事情不谈，西班牙在近代并无立宪君主制的传统。事实表明，胡安·卡洛斯作为一位立宪君主是成功的。这提醒人们注意到20世纪末欧洲政体的多样性。与西班牙相比，当希腊的军事统治结束时，君主政体并未恢复。同样地，葡萄牙的君主制复辟无望。

1981年西班牙政变失败有助于进一步打破过去的僵局。四分五裂的军队，尤其是陆军，如今愈加衰弱。而且，军队预算被削减了。军队日趋专业化而非政治化。西班牙作为北约成员国的身份意味着军官的眼界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与“内部敌人”的斗争已不再是西班牙军队的主要目标了。

这种发展变化是西班牙在更长时期内，与20世纪30年代的种种问题渐行渐远，并逐渐断绝与那个年代的联系的重要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佛朗哥政权在最后几年已开始了这种背离。这种背离部分源于佛朗哥立场的强硬及其政策的成功。由于佛朗哥的压迫，工联主义与暴力的反教权主义都停止了。这对西班牙政治产生了影响。二者在20世纪70年代的西班牙都没有卷土重来，一部分原因在于大众普遍厌倦了对立性政治。

更重要的是，陆上人口的快速迁移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变革导致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外，受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影响，到20世纪70年代，天主教会对变革的态度更加开明了，而它刚获

得的民主资质也使其不至于成为政治行动的攻击目标。

由于1981年政变未遂，西班牙可以推动更多社会变革，制定离婚法便是其中一项。另一个变化是，西班牙政治如今更趋近于其他西欧国家。右派逐渐放弃了重回佛朗哥主义的梦想，在民主政治体系内联合起来。他们支持由曼努埃尔·弗拉加（Manuel Fraga）在1976年组建并领导的人民联盟政党（简称AP）。这种支持省去了民主中间联盟的一系列运作，但政变后，改革带来的不安依然让右派感到局势严峻。人民联盟在1989年再度成立时更名为人民党。

对游客而言，这一变化的遗赠便是维亚纳侯爵出售了他们的科尔多瓦宫殿。如今，宫殿已对外开放。人们可以在游览时看到里面悬挂的一幅佛朗哥肖像画。另一个遗赠便是铁路线的关闭，例如“橄榄油火车”铁路线。随着公路文化的兴起，人们兴建了许多优美宜人的徒步旅行路线。

经济问题引发了许多新的困难。20世纪70年代初，严重的经济冲击让佛朗哥政权措手不及。而且，就像东欧政府或者1974—1979年英国工党政府对这种情况的处理方式，佛朗哥政权为赢得民心采取了一些控制局势的做法，结果反而火上浇油。货币管控强化了这种控制，却引发了高通货膨胀率、财政问题与失业率骤增。种种问题让人为西班牙的未来而担忧。1979年再次出现的油价冲击加重了人们的疑虑。

社团主义的应对措施出现了，这便是1977年的《蒙克洛亚协定》及一直延续到1984年的后续协定。在这些文件中，政府把雇主与工会团结起来，双方一致同意采取措施遏制财政问题，改革经济。与此同时，当时大多数欧洲国家也有了新动向，其中就包括英国就社会契约理论所进行的实验。

高尔夫球运动与塞维耶罗（塞维）·巴列斯特罗斯

塞维·巴列斯特罗斯（1957—2011年）出生于坎塔布里亚省。1976—1995年，他是高尔夫球界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他通过莱德杯欧洲队的胜利成为欧洲高尔夫球运动复兴的领军人物。他三次赢得英国公开赛冠军头衔，两度于奥古斯塔名人赛上封王。他也极大地推动了西班牙高尔夫球场作为一个产业的发展。事实上，高尔夫球之旅成了西班牙主题旅游的重要形式，这在南方地区尤甚。阳光海岸以高尔夫球场著名。而且，2017年西班牙有349个高尔夫球场。

尽管有《蒙克洛亚协定》，西班牙的紧张局势依然存在，因为经济问题仍然严峻。由于罢工四起，西班牙共产党也因协定未能缓解困境而表示不满，重重矛盾使社会、政治结构不堪重负。在1981年失败政变的推动下，西班牙在1982年10月经历了一次政治变革，而前一年的法国也发生了这种变革。工人社会党在议会中赢得了绝对多数席位，而西班牙共产党则被击败。右派也发生了变化。分裂的民主中间联盟在选举中被摧毁，而人民联盟只获得了刚过四分之一的选票，成了主要的反对党。

正如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领导的法国社会党一样，在某种程度上，费利佩·冈萨雷斯率领的工人社会党是通过利用平民主义对社会变革的渴望以及人们对资本主义所产生不良后果的普遍担心才取得选举胜利的。而且，就像后来在法国那样，自1982年起，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统治变得更加谨慎、实际了。冈萨雷斯继续采用相对通货紧缩的政策以确保财政平稳。他一直担任西班牙首相一职，直至1996年选举失败才卸任。20世纪80年代，西班牙出现了大幅度经济增长，社会自由度也相当高，不太积极的一面则是政治在某种程度上以政党分肥制的形式运作着。

作为重要国际背景的一个方面，西班牙积极寻求在更广泛国际组织内的成员国身份，并于1986年加入了欧洲共同体（如今的欧盟）。1992年举办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与塞维利亚世界博览会，使西班牙在国际社会上获得了认同。不同于葡萄牙与希腊这两个资深北约成员国，尽管佛朗哥统治时期采取了一些政策，例如1975年的举措，但是西班牙直到1982年才加入北约。1986年，全民公投中57%的赞成票进一步确认了这项决定。大多数前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后来也走上了这条成为北约与欧共体成员国的道路。欧共体为其成员国提供了农业与工业方面更多的外国投资与经济增长机会。

西班牙国内政治的局势则有些不同。因为，与20世纪90年代发生东欧剧变的大部分国家相比，20世纪80年代西班牙的左派拥有更强大的政治实力，也更受欢迎。事实上，1982年，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竞选的主要政纲是退出北约，而且他们也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政纲。冈萨雷斯偏离了这一立场，这对西班牙左派的全面过渡至关重要，同时对于处在紧要关头的欧共体树立威望也意义重大。冈萨雷斯的这种做法之前德国社会民主党采取过，之后英国工党也效仿了这一做法。冈萨雷斯在1982年、1986年与1990年的选举中赢得了绝大多数选票。尽管他在1993年选举中失去了绝对的优势，因而自1994年起不得不仰仗巴斯克与加泰罗尼亚的民族主义者，但他仍给西班牙右派政党带来了一场危机。从某些方面来看，尽管西、英两国国情有异，执政期有

别，但冈萨雷斯仍可算是西班牙版的托尼·布莱尔，而且冈萨雷斯并没有带领西班牙走向战争。但是，他遭遇了1993年经济下行的重击。当时，西班牙无力在货币兑换率机制框架下支撑本国货币。同时，他因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突遭一系列贪腐丑闻曝光而受到冲击。这些工人社会党成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回馈选区内的某些支持者，这一情况在安达卢西亚与塞维利亚尤为严重。

1990—2009年，西班牙在变革处理与危机应对上，比意大利做得更好。20世纪90年代，西班牙经济发展迅速，但是人们没有感到不安。1996年，精疲力竭的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将权力和平移交到何塞·玛丽亚·阿斯纳尔领导的保守派人民党手中。两党均利用了西班牙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恩庇体制，但也试图回应新的社会力量。从更广泛的层面上来看，天主教市民社会的影响下降了，但是并未带来明显的危机感。

西班牙将外交政策的重心放在了欧盟与拉丁美洲上。尽管它仍是北约成员国并继续调遣一些大型战舰，但不再充当主要军事角色。1993年，西班牙由于应征士兵服役无望且国内常规军不足，因此决定不向波斯尼亚的联合国部队贡献一个旅的军队。政治是决定性因素。2003年，西班牙在保守派阿斯纳尔政府的领导下加入了伊拉克战争。尽管西班牙的作用主要是政治上而非军事上的，但此举仍在当时引起了民众的普遍反对。

1996年的选举结束了长达13年的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统治。如今，保守派人民党（简称PP）赢得了37.6%的选票，以及350个席位中的156个，占了大头；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只赢得了14%的选票。人民党由前佛朗哥主义部长曼努埃尔·费拉加成立于1989年。他们在1991年就已接管了马德里市议会。人民党领袖阿斯纳尔在1995年“埃塔”组织的暗杀中大难不死，此时与地区民族党派达成了共识，在议会中获得了181票支持他出任首相。阿斯纳尔政府决心达成成为欧盟成员国的目标，并通过减少开支、削减赤字使自己有别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铺张浪费、腐化堕落的形象。这些措施引发了工会组织的抗议游行。阿斯纳尔政府采取的另一项政策是国有股份的私有化。

支持人民党的地区获得了许多慷慨赠予，尤其是巴伦西亚。政府在那里规划了雄心勃勃的建设方案。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一样，伴随着慷慨赠予而来的便是腐败堕落，腐败主要来自用于政党的政治献金，但也不乏中饱私囊的情况。

在2000年的选举中，阿斯纳尔获得了44.5%的选票，赢得了183个席位，占据了绝对的优势。阿斯纳尔的管理理念，尤其是他使自己

有别于过去意识形态残余的做法，为他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与欧盟大多数国家相比，西班牙的经济发展得很好。积极乐观的情绪带动了建筑业的发展，人们开始大兴土木，并出现了一些大胆的项目。例如，2004年，巴塞罗那为举办世界文化论坛博览会，兴建了迪亚格纳玛区。此前，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也经历了相同的过程，当时建立了滨海开发区奥林匹克港。

然而，到了2002年，西班牙遭受了全球经济衰退的重创。当年，政府试图降低失业救助，由此引发了一场大罢工。伴随经济增长而来的，是宽松货币政策与高失业率导致的通货膨胀，尤其是房价的上涨。尽管失业率在2015年出现了明显好转，但仍然很高。2018年2月，失业率是16.1%，不过西班牙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

阿斯纳尔对2003年海湾战争的支持招致了大量批评。2004年3月11日，西班牙大选前三天，在“马德里3·11列车爆炸案”中，10枚炸弹夺去了191人的生命。尽管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此事与基地恐怖组织有关，政府最初仍将矛头指向了“埃塔”组织。这种指责引来了公众对政府的批评。在随后的选举中，反对派以164票比148票胜出。虽然这场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政府对爆炸案的反应造成了争议，但无论如何，反对派取胜了。

新任首相是工人社会党的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José Luis Rodriguez Zapatero）。后来他又赢得了2008年大选，任期直到2011年才结束。

2004年，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让西班牙军队从伊拉克撤回。2005年，他促成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他还不顾西班牙教会的震怒改革了堕胎法。其他政策还包括提高最低工资及特赦移民等。

拉菲尔·纳达尔：网球明星

1986年，“红土之王”拉菲尔·纳达尔出生于巴利阿里群岛。他是一名伟大的红土球场选手，在2017年重归世界网球排行榜榜首。截至2017年，他在男单决赛中夺得了16个大满贯冠军，赢得了9000万美元奖金。他是一名攻击型运动员，擅长上旋落地击球。2008年，纳达尔在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中经过一场漫长的拉锯战，挫败了罗杰·费德勒。人们普遍认为，这是最惊心动魄的一场温网决赛。同年，纳达尔世界排名跃至第一。2010年，他再次夺得温网冠军头衔，重回王者宝座，成为世界第一。截至本书写作时，在与费德勒的38场比赛中，纳达尔赢了23场，与安迪·穆雷

的24场较量中赢下了17场。

由于西班牙政府机关支持反恐解放团（简称GA）在1983—1987年的“肮脏的战争”中对“埃塔”组织的打击，巴斯克地区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变得更加复杂了。“埃塔”继续胡作非为，杀害更多的人，其中情节特别严重的是，1987年他们炸毁了巴塞罗那的一个购物中心，导致21人丧生。“埃塔”也残杀了新闻工作者。暴力与停火依然交替出现。直到2011年反恐解放团与“埃塔”组织达成永久性停火协议，这场争端才落下帷幕。在持续的争斗过程中，先后有超过800人遇难。法国支持西班牙关闭巴斯克安全区，而且，自2001年起在“反恐战争”期间，全球性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也使西班牙政府受益。德乌斯托大学2017年发起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29%的人对于目前巴斯克自治程度感到满意，38%的人赞成巴斯克地区获得更多自主权，而17%的人支持巴斯克独立。在2016年的区域选举中，主张巴斯克自治区独立的巴斯克地区联合政党得票率为21%。

由于全球财政危机与2008年宽松货币信贷泡沫破裂的双重影响，自2007年起，西班牙经济问题变得日趋严重。大多数资金之前都被用于投机性建筑工程。失业率上升至27%，为欧盟最高。债务攀升。危机过后，房价平均下跌了三分之一，而未完工的建筑工程至今仍遍布于西班牙各地。

人们的危机感致使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在2011年失势，人民党夺走了执政权。自2004年起，马里亚诺·拉霍伊（Mariano Rajoy）就开始领导人民党了。在2011年11月的大选中，人民党大获全胜：占据了议会下议院350个席位中的186个。这是自民主制恢复后，西班牙党派获得席位中最多的一次。2011年12月，人民党政府实行了财政紧缩计划，冻结了公务员工资，停止向年轻人提供房屋补助，冻结了最低工资并提高了所得税，还采取了一些其他措施。

但是，当人民党党派组织的秘密献金，以及党内政客的秘密献金被曝光时，该党地位立即受到了挑战。拉霍伊曾任人民党财务主管，这次更是沦为了丑闻主角。另一件事是，在马德里居所的官员仍在领取住宿最低生活保障。拉霍伊扛住了来自其他政党与民众要求他下台的压力，并将2015年大选一直推迟到12月20日——选举最迟举行日。人民党在一个严重分裂的议会中赢得了最多选票，但是失掉了该党此前187个席位中的64个。

西班牙迅速崛起的新政党“我们能”构成了另一个政治要素。这个成立于2014年3月的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反对财政紧缩与贪污腐败。在

2015年12月20日的选举中，“我们能”政党赢得了20.65%的选票，获得了350个席位中的69个。相比之下，人民党得票率为28.7%，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为22%。面对这一政治僵局，西班牙不得不在2016年6月26日举行另一场大选。在这次选举中，人民党获得了更多席位，但仍未能达到绝对的多数。当大多数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代表在10月29日投下弃权票时，危机才得以缓解，拉霍伊得以连任。

与此同时，移民正慢慢改变着西班牙的特征，尤其是在西班牙南部地区。在那里，大批非洲人想要入境。因此，人们越来越担心来自其他宗教的潜在挑战。2010年，西班牙社会中出现了要求在科尔多瓦主教座堂开展清真礼拜活动，或者把教堂的路标改为教堂-清真寺图标的呼声，因为科尔多瓦主教座堂之前曾是一座大清真寺。这种呼声引发了争端，而争论的主题中飘荡着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的回响。

2017年，西班牙为应对移民问题，强化了位于休达与梅利利亚的两处非洲军事基地的边境围栏与边防站。这两处是非洲与欧盟间唯一的陆地边界。加那利群岛是一处更重要且历史悠久的入境站。想要成为移民的人乘坐拥挤的敞篷船从非洲西北部漂洋过海，寻求庇护，而人贩子则在极不人道的条件下通过贩运赚钱。例如，在2005年8月至2006年8月的1年间，20000名非洲难民抵达加那利群岛，据称有多达3000人在危险的横渡航程中丧命。西班牙海军试图阻截船只，阻拦移民。由于大西洋水域波涛汹涌，通过这条航线移民比从利比亚经地中海到达意大利更加危险。 西班牙还试图依靠摩洛哥来限制移民，因为摩洛哥与休达和梅利利亚接壤。

地方主义依然是个重要议题，直到现在仍是。佛朗哥去世后，地方政治团体，尤其是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团体，在1978年宪法的规定下接受了自治，并未尝试独立，尽管1982年加泰罗尼亚曾抗议西班牙政府限制自治的意图。佐迪·普约尔（Jordi Pujol）创立了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联盟政党“统一与联合”。他在1980—2003年统治加泰罗尼亚。普约尔主张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不是以西班牙国内加泰罗尼亚的身份，而是作为欧洲各地区中的一部分。

阿斯纳尔政府在分裂主义问题上并不乐意配合。但是，积极寻求解决方案的后继者——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在2006年同意与加泰罗尼亚各党派签署《加泰罗尼亚自治法》，扩大加泰罗尼亚的政治权威。这项决议在2006年举行的加泰罗尼亚公投中获得通过。参与投票的选民占了全体选民的49%，投票者中73%的人投了赞成票。但是，人民党反对公投结果，并在西班牙宪法法院上挑战了这项法规。2010年，法院介入，并以6：4的多数票改写并重新阐释了法规，使得法案的实际效力被削弱。这激起巴塞罗那大规模示威游行。逾百万人涌上街

头，手中举着标语：“我们是一个国家。我们决定。”人们觉得法院的介入是一种政治上的偏袒。

加泰罗尼亚的另一大贡献：“牛头犬”餐厅

“牛头犬”是一家位于罗塞斯的餐厅，这里的主厨费兰·阿德里亚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顶尖的厨师之一。阿德里亚出生于1962年。他将自己的料理称为依次进行的“解构主义”。他通过改革已有的烹饪方式及惯常做法，创造出意想不到的味道、温度与质地的对比。由他独创的非比寻常的菜肴包括液体橄榄、米酥什锦饭、白蒜与杏仁冰沙，他还在菜肴中普遍使用烹饪泡沫。餐厅在2011年被关闭，后来又作为创新中心开张。阿德里亚主张，烹饪与艺术是一致的。这是一种富有争议的观点。一直以来，人们都指责他在烹饪中使用添加剂的做法。

争议导致政府面临着人们要求独立的压力，而加泰罗尼亚政府在2012年也支持独立。加泰罗尼亚选举的结果是大多数人要求独立，而且这一结果促成了2013年《加泰罗尼亚独立宣言》的通过。宣言称，加泰罗尼亚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政治未来。西班牙宪法法庭阻挠了2014年的独立公投。但是，在2014年11月9日举行的无法律约束力的“磋商会议”上，35%的选民参与了投票，81%的投票者支持独立。1714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作为一个未果的历史参照点，对其结束之日的纪念活动被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发展成一次谴责“西班牙对抗加泰罗尼亚”的尝试。反过来，在2015年9月的另一次选举上，尽管未赢得大多数选票，支持独立的政党仍获得了大多数席位。而且，新组建的加泰罗尼亚议会也开始采取行动，走向独立。

2017年，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自称有民主授权，可举行独立公投。但是，西班牙宪法法庭判决这项措施为非法，公诉人也下令不择手段展开调查，进行起诉，以证明该措施非法。禁止分裂的西班牙宪法得到了反对更强力的自治权的西班牙首相马里亚诺·拉霍伊的公然支持，得到了多少有些党派倾向的国王费利佩六世（2014年至今）的支持，还得到了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支持。事实上，宪法早就被修订过了，既涵纳了之前针对地区自治的修宪，也考虑了加入欧盟后的变化。

这个问题反映了长期以来加泰罗尼亚人民对自己所拥有的独立身份的强烈感知，也更为具体地反映了他们最近的担忧，尤其是宪法中“地区团结”原则所造成的影响。加泰罗尼亚占西班牙总人口的

16%，占西班牙国内生产总值的19%，总出口额的25.6%，国外投资总额的20.7%；尽管加泰罗尼亚债台高筑，但是不同于巴斯克地区，它当时负担着不成比例的高额赋税，而且从政府开支中得到的补助严重不足。两股民族主义的力量起了冲突。西班牙政府未能兑现阻止公投的诺言。2017年10月1日，尽管存在大规模的恐吓威胁，43%具有投票资格的人仍然投了票。在人们对政府竟粗暴地使用国民警卫队的谴责声中，国民警卫队被撤走了。实践表明，愿意迁至马德里的公司与企业给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的势力造成了确确实实的压力，限制了独立运动获得的支持。2017年10月至12月，逾3000家公司将总部迁出加泰罗尼亚，其中就包括加泰罗尼亚两家最大的银行以及最大的西班牙语出版公司。一些个体经营者也离开了。巴塞罗那酒店的预订数有所下降。

此外，由于人民党发言人反加泰罗尼亚的煽动性言论激起了人们对该地区的敌意，超过20%的西班牙人不再购买加泰罗尼亚产品。例如，人民党发言人宣称，说西班牙语的人会在加泰罗尼亚受到歧视。事实上，西班牙的民族主义是种让国家团结一致的集体协议，它形成于佛朗哥去世之后。西班牙是一个对彼此宪法互相尊重的合成体。

加泰罗尼亚的民族主义明显缺乏国际社会的支持，为此当地蒙受了损失。当地政府试图获得国际认可，也希望欧盟能调解这场西班牙政府的争端。但是，这两点希望都落空了。相反，欧盟明确抛弃了之前的观点，没有以欧洲的身份介入，而是选择支持现状。部分原因是欧盟担心加泰罗尼亚独立会成为欧盟解体的开端。虽然鲜有证据支持此观点，但最终结果是欧盟旗帜鲜明地支持维系现状。

这与法国在17世纪40年代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与英国在1700—1709年赞成加泰罗尼亚自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对比突出了历史中的一些关键时刻与意外事件，可能对政治体制中看似不可避免的部分产生影响。在此，与加泰罗尼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葡萄牙先后截然不同的命运：一面是西班牙屡次尝试接管葡萄牙未果；另一面是1580—1640年，西班牙终于如愿以偿将葡萄牙收入囊中。同时，长期以来，还存在着两种有着更深对立性的观点。一方认为，西班牙的诞生是一些王国、公国与领地联合的结果，之后才有了西班牙这个国家，因此，西班牙具有内在的多元性；另一方则强调西班牙是个单一民族国家。

对西班牙政府而言，他们面临着执政能力上的考验，同时也担心如果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取胜，将会鼓动其他地区争取独立，从而给他们造成相似的压力，尤其是在巴斯克地区与加利西亚，甚至还包括安达卢西亚。2007年，安达卢西亚新自由宪章宣布，安达卢西亚有

着“千年”历史，还有自己的“民族”。全民公投经常能反映联邦制的紧张局势。例如，1986年西班牙公投决定是否继续留在北约，参与投票的人中，有56.85%选择继续留在北约。但是，在巴斯克地区、加那利群岛、加泰罗尼亚与纳瓦拉，大多数人都投了反对票。其中，在巴斯克地区，67.55%的投票者选择退出北约。但是，2017年，巴斯克自治区政府没有支持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巴斯克自治区领导人、巴斯克民族主义党（简称PNV）领袖伊尼戈·乌尔库留（Iñigo Urkullu）宣称，加泰罗尼亚公投既不合法也不具有约束力。乌尔库留成功提高了巴斯克地区的自治权，完善了地区金融体系：与加泰罗尼亚不同，巴斯克承担的税赋并不高于巴斯克地区的花费。巴斯克民族主义党是人民党的重要盟友，前者通过对人民党的支持换取更好的谈判条件。但是，他们既没能说服加泰罗尼亚放弃宣布独立，也没能阻止人民党对加泰罗尼亚政治家采取严厉措施。

2017年10月，针对西班牙政府宣布要对加泰罗尼亚实行直接统治的表态，加泰罗尼亚议会投票支持独立。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采取了坚决且严厉的行动。加泰罗尼亚政府被解散，议会解体。这些都是在为当年12月即将举行的新选举做准备。拉霍伊宣布，他将结束这场“分裂主义的浩劫”。随后，西班牙政府以反叛与煽动造反罪逮捕了加泰罗尼亚政治家，他们甚至不能取保候审。这导致巴塞罗那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游行，毕尔巴鄂相对较小规模的游行也体现了相同的情绪。在12月21日省级选举前夕，国家政府明确表明，若再次出现任何独立投票，都将招致相同的结果。副首相索拉亚·萨恩斯·德圣玛丽亚（Soraya Sáenz de Santamaría）宣称：“分裂主义者如今已经没有领导人了，因为他们已被斩首。”她的意思是这些人遭到了拘禁。她还补充道，人民党将“继续清算独立运动”。在国家政府与分离主义政党共同为加泰罗尼亚举行的省级选举中，加泰罗尼亚共和左翼政党与人民团结党组成的左翼选举联盟以微弱的优势取得了多数席位。希望加泰罗尼亚继续在西班牙保持半自治状态的公民党虽然只赢得了25.3%的选票，获得了37个席位，但它仍是规模最大的党。加泰罗尼亚的分歧依然显著如常。小城镇与乡村地区强烈支持独立，而巴塞罗那的大多数人则支持继续留在西班牙。总体而言，支持独立的政党赢得了48%的选票，而赞成统一的政党获得了52%的选票。人民党见证了迄今为止历史最差战绩，只赢得了135个席位中的3个。

来自过去的回声

2017年9月，在阻止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上，西班牙所付出的努力使人们常常想到过去。抗议者一再谴责他们所看到的佛朗哥时代的复现。相反，政府将后佛朗哥时期的《1978年宪法》作

为论辩的依据。这部宪法在许多方面都意在赢得佛朗哥主义者的支持。

2017年9月20日，加泰罗尼亚政府主席卡莱斯·普伊格德蒙特称西班牙为专制主义国家，并且声明加泰罗尼亚永远不会甘愿“重返至暗时刻”。全国性的反对党“我们能”的党总书记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宣称，回到有“政治犯”的时代是“可耻的”。许多人认为，实施拘捕任务的西班牙国家军队国民警卫队与佛朗哥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同样是在2017年9月20日，相对地，西班牙外交部长阿方索·达斯蒂斯指出，佛朗哥组织过两次公投，并宣称一些分裂主义者使用了纳粹式恐吓方式。一位人民党发言人提及刘易斯·孔帕尼斯的遭遇。后者在1934年宣布加泰罗尼亚独立，结果在1940年被国民警卫队的一支行刑队枪决。孔帕尼斯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影响力十分巨大，那里的许多街道、广场，以及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主赛场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而且，巴塞罗那还立着一座孔帕尼斯纪念碑（1998年）。

更为久远的历史也引发了争议。一些加泰罗尼亚分裂主义者想要移除位于巴塞罗那的哥伦布纪念碑，因为他们觉得这座纪念碑有过于沉重的西班牙色彩。

事实上，当下许多围绕着身份与所谓威胁而涌现出的问题，正是1609年驱逐摩里斯科人后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的复现。同化的可能性及其特质，以及多元文化的前景开始崭露头角。

过去的形象

西班牙历史的呈现极大地受到了政治变革的影响。这并不仅仅是学者研究与出版物内容方面的问题。例如，与之前的作品相比，后佛朗哥时期的西班牙历史地图集在制图法上更具创新性，在设计上也更加大胆。胡安·罗伊格·奥比奥的《西班牙环球历史地图集》囊括了1931年、1933年与1936年西班牙议会选举的信息，还有一页专讲1977年议会选举，里面包括了巴斯克地区与加泰罗尼亚地区议会选举的具体内容。与佛朗哥政权的观点形成对比的是，这本地图集并没有过度集中讲述西班牙历史。相同地，E. 马丁内斯·鲁伊斯、A. 古蒂埃雷斯与E. 迪亚兹·洛翁的《现代历史地图集》（1986年）丝毫没有掩饰17世纪西班牙权力危机的严重程度。

除去对过往历史的一般性处理，还有更具体的历史分期问题，这不仅仅是由西班牙内战造成的。例如，在讨论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时，历史依然是重要话题。当拉霍伊取消了国营电视台斗牛实况转播

禁令时，他引用了历史身份的概念。艺术藏品的归属地也牵连到了政治，例如毕加索的名画《格尔尼卡》所面临的归属地问题。最终的决定是将画作放在马德里的索菲亚王后国家艺术中心博物馆，而不是距离格尔尼卡最近的大型博物馆——位于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美术馆。

后佛朗哥时期

佛朗哥去世后，西班牙经历了十分重要的过渡期。希腊与葡萄牙亦经历过相似的一段时期。西班牙过渡的剧烈程度看似无法与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经历的那些相提并论，但是，如果将2018年西班牙历史、社会情况与40年前进行比较，人们不难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但是，无论如何，贯穿过渡期前后的，是要求自由化的共同声音，而且这一呼声不仅体现在政治方面。东欧亦然。经济自由化也是一大问题，因为欧盟自由贸易威胁着西班牙经济中不具竞争力的部分的存续，这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影响。最重要的例子是对传统农业，尤其是对农民的挑战。

西班牙、葡萄牙与希腊也都经历了大规模的社会、文化自由化。这在政治上意义重大。因为，这些国家早期的保守主义独裁统治均强烈反对这种自由化，他们将自己的反对立场视为对道德价值的弘扬。随后的自由化可被视为重要的政府变革，但是也有人说这种分析夸大了政府行为的重要性。事实上，社会上当时正发生着重大转型，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当时的年轻人正在回应着欧洲其他地方的流行趋势。西班牙的情况尤为突出。佛朗哥政权统治的最后几年，思想已没有那么僵化了，尽管它仍有一个包括风化警察在内的、令人感到压抑的体制存在。

第十四章

结语：一个不断做选择的国家

西班牙人民与政府不断面临着选择。

本书的写作以西班牙的环境为基础背景，环境暗示着西班牙历史中的不可变因素，尤其是地理与气候。然而，实际上，西班牙人民与政府不断面临着选择，因此虚拟陈述（做出假设）就变得合理了。在2004年出版的《1870—2004西班牙虚构史：如果存在，又会怎样？》（*Historia virtual de España, 1870–2004: Qué hubiera pasado si?*）一书中，投稿人各抒己见。他们讨论了许多假设：如果西班牙避免了与美国的1898年战争，结果会怎样？如果西班牙各共和党派在1933年选举中联合起来，结果会怎样？如果西班牙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会怎样？如果卡雷罗·布兰科1973年没有被“埃塔”组织谋杀，结果会怎样？如果西班牙没有参加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结果会怎样？书中有一章专门讨论了如果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因达列西奥·普列托在1936年5月接受了相位，西班牙内战是否可以避免的问题。结论是，西班牙内战极有可能因此被避免。这也引发人们对意外事件与领导能力的关注。

由于西班牙内战及佛朗哥对于西班牙人的想象力与西班牙近代史施加的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上面这本书的大部分章节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二者之一有关。反设事实给人们提供了一种解决这些问题、理解这种影响的方式。1976年，佛朗哥去世后次年，两本书虚构了共和军取得西班牙内战胜利的情节，给人们提供了反设事实。它们是费尔南多·迪亚兹-普拉萨的《胜利大游行》（*El desfile de la Victoria*）与赫苏斯·托巴多的《今天》（*En el día de hoy*）。事实上，内战容易激发人们进行虚拟陈述。

向西班牙历史更深处回望，人们不禁会问：如果在1085年托莱多陷落后不久，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大功告成了，结果会怎样？如果没有16世纪的宗教改革，结果又会如何？

要是荷兰既没造反，腓力二世的西班牙王朝与英格兰的联盟又保持了下去，而且他还在与玛丽一世的婚姻中有了一位继承人，或者玛丽一死，伊丽莎白一世便接受了腓力二世的求婚，二者有继承人的

话，西班牙世界本可能更加强大。随后西班牙如果没有在1640年与葡萄牙发生分歧，而是保持住了王朝的团结统一的话，这本来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国际层面，国内领域也许亦然。腓力二世的长子唐·卡洛斯能给西班牙未来带来的不同可能性代表着另一种虚拟陈述。就18世纪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1700年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存续问题，以及1788年卡洛斯三世拥有有才干的接班人，而不是由昏庸的卡洛斯四世继任这一问题。

随后，如何避免1808年拿破仑对西班牙的接管，或者说如何避免约瑟夫一世（约瑟夫·波拿巴）的胜利，也值得人们去反思。二者都聚焦于国际性的强权政治对西班牙发展的影响。虚拟陈述不仅涉及法国，还可存在于更广阔的国际背景下。例如，19世纪的西班牙史是否最终取决于拿破仑1812年在莫斯科城外的失败？这是否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一个法国王朝在1700年成功地确立了起来，另一个却在1808年失败了？费尔南多七世在1810—1829年对西属美洲自治的要求予以粗暴的对待，这点也值得思考，尤其是在考虑了西班牙与西属美洲所采取的不同政策、两者之间发生的许多事情，以及英国采取的不同立场之后。这种处置不当是王权对西班牙历史造成的诸多不利影响的一个例子。对有些人而言，这个问题可以大而化之为教会及宗教信仰的作用。

19世纪西班牙政治史的后一部分同样被虚拟陈述所贯穿，尤其是第一次卡洛斯战争、1868—1874年的政治危机，以及1898年美西战争的爆发。古巴与加泰罗尼亚的情形迥然不同，加泰罗尼亚不能找到有效的折中对策，也无意维持中央控制。从另一个虚拟陈述的角度来看，加泰罗尼亚依然是西班牙的一部分，而爱尔兰之于英国、匈牙利之于奥地利就不是这样了。

因此，过去90年间的虚拟陈述基于更加深远的传统，这一传统值得人们特别关注。这些虚拟陈述聚焦于西班牙内战，但也包括了“假使没有2004年‘马德里3·11列车爆炸案’，当年的大选结果将会如何”的假设。诚然，人们没必要讨论过去、现在或未来的不可避免性。

2017年加泰罗尼亚危机见证了关于加泰罗尼亚过去的反设事实。与此同时，在批评者看来，那些陈述被狭隘种族主义、历史神秘主义与修辞艺术所歪曲。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的人认为，他们的民族主义利用了历史提供的可能性。在这一历史中，人们需要明白，其他情况本可能发生，它们只是被人为地强行阻挠了。后者显然适用于描述腓力五世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取胜的情形，尽管这一获胜对于当下及将来意味着什么，一点儿也不明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西班牙鲜活历史的一部分，这部分比环境所带来的影响还要强大。

反设事实还激励人们对西班牙与他国的“差异”及失败之处——西班牙直到很晚才实现现代化——展开讨论。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讨论是错位的。因为，它们忽视了一个事实：统一的欧洲道路并不存在。因此，也就不存在西班牙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欧洲路线的所谓讨论。反之，人们应该强调多条途径及其内在的差异性，而西班牙为这种差异性贡献了令人振奋的例子。一种普遍存在的趋势是将西班牙，尤其是西班牙内战，作为简单且统一的欧洲史以及世界史叙事的一部分。相似之处与历史背景反复出现。例如，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与十字军东征，美国独立战争与拉丁美洲独立战争事件本身与历史背景的相似性。这是一种有效的方式，但在所有的例子中，不仅存在着反映西班牙所处情境的具体因素，还需要将这一情况置于一段更长的西班牙历史发展之中来看待。因此，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可以回溯至西班牙8世纪时的历史，而十字军东征却不能。西班牙内战不仅关乎意识形态斗争与20世纪30年代反对民主的行动，而且还与西班牙政治中长期存在的军事干预模式有关。将来的事情也是如此：只有将其置于西班牙过去的模式中，人们才能理解西班牙的未来。

[1] 加的斯，西班牙南部一座历史悠久的滨海城市。早在公元前10世纪左右，腓尼基人便建造了该城，取名加迪尔（Gadir）；在古罗马攻占此地后，该城又改名加迪斯（Gades）。后文提到了这两个旧地名。——编者

[2] 里格（league），过去欧洲的一种陆路长度单位，1里格约等于5.56千米。——编者

[3] 位于穆尔西亚省的托塔纳地区，是欧洲青铜器时代的重要遗址之一。——编者

[4] Tagus，塔霍河的旧称。——编者

[5] Leovigild，西哥特国王，他力求统一伊比利亚半岛，因此四处征战，抗击拜占庭帝国、苏维汇人、巴斯克人等。585年，晚年的利奥维吉尔德最终收服苏维汇人。在其死后，其子里卡雷德一世（Reccared I）继承了西哥特王位。——编者

[6] Alfonso II（759—842年，791—842年在位），阿斯图里亚斯王国国君。阿斯图里亚斯王国是西哥特王国灭亡后，在伊比利亚半岛上兴起的第一个基督教君主制国家。10世纪，经由阿方索三世、弗鲁埃拉二世及阿方索四世多任君主的统治，该王国逐渐与莱昂王国融为一体。——编者

[7] 朗格多克地区位于法国南部，与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接壤，因而与位于法国北部的巴黎相比，更易于到达并控制西班牙。——编者

[8] 纳赫拉原本在安达卢斯的地域范围内。920年，纳瓦拉君主桑乔一世·加尔塞斯（Sancho I Garcés）将领土扩张至纳赫拉。在1054年该地被卡斯蒂利亚王国攻陷前，它一直是纳瓦拉王国的首都。——编者

[9] Almoravid，是西班牙人所称的、1056—1147年统治摩洛哥与西班牙大部分地区的柏柏尔人王朝，在阿拉伯语中又叫作“穆拉比特”。阿尔摩拉维德王朝于1147年被阿尔摩哈德王朝（Almohades，阿拉伯语又称“穆瓦希德王朝”）所灭。——编者

[10] Alfonso VII（1105—1157年）。他于1111年成为加利西亚王国国王，1126年，他的母亲乌拉卡一世去世后，他得以接管莱昂、卡斯蒂利亚等地。1135年他得以加冕为“全西班牙皇帝”。——编者

[11] 由特拉斯塔马拉家族所统治的王朝。其开创者是特拉斯塔马拉公爵恩里克二世（后成为卡斯蒂利亚国王）。特拉斯塔马拉家族经过长时间统治，势力范围从卡斯蒂利亚扩展到阿拉贡、纳瓦拉及那不勒斯等地。16世纪，特拉斯塔马拉王朝被哈布斯堡王朝所取代。——编者

[12] 1580年，葡萄牙王室出现王位继承危机，最终王权旁落于西班牙君主腓力二世之手，由此伊比利亚半岛开始了长达60年的共主联邦时代。1640年葡萄牙贵族发动葡萄牙王政复古战争，将布拉干萨公爵推举为王，终结了共主联邦状态。——编者

[13] 14—16世纪位于墨西哥中部和南部的印第安人国家，是前哥伦布时期美洲地区最发达的文明之一。阿兹特克帝国是以城邦联盟和朝贡体系构建起来的。——编者

[14] 生卒年约为1485—1541年。来自西班牙的征服者，因其手段血腥残忍，得到了“红日”这一绰号。他先后征战于危地马拉、古巴、秘鲁、墨西哥等地，并出任了危地马拉总督一职。——编者

[15] 指16世纪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师胡安·德·埃雷拉发展出的一种建筑风格，以严谨的几何性、无装饰性为典型特征，代表作为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编者

[16] 指的就是西班牙在美西战争中的彻底失利。——编者

[17] 指的是1909年7月26日至8月2日。在此期间，加泰罗尼亚城市工人以巴塞罗那为中心发起暴动，并与军队产生了暴力冲突，导致70多人丧生，数万人受伤，数千人被捕。——编者

[18] room-to-room fighting，根据奥维耶多战役的史实，这里指的是逐个房间剿灭敌人、近身搏斗。——译者



未读 Club

为读者提供有温度、有质量、有趣味的
泛阅读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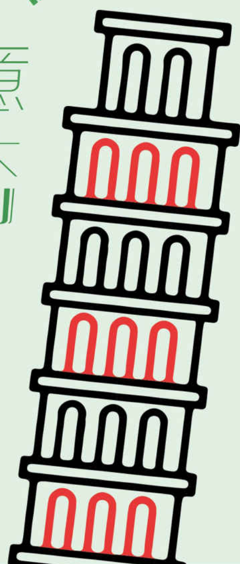
专属社群 独家福利
精品共读 活动特权

手机扫码
加入未读 Club 会员计划

未读 UNREAD

何以成为意大利

重新发现欧洲





A BRIEF HISTORY OF ITALY



[英] 杰里米·布莱克 著

高银 译

不止年代与事件，还有哀伤与荣耀。

全球历史名师带你——用欧洲人的心与眼，亲历欧洲那些年。

JEREMY BLACK

如果你热爱美食、歌剧、时尚与建筑，
这样的意大利，你如何不爱？
中国人对意大利的热情与误解，
在这里都能找到源头。



城邦与政治，商贸与美食，
是什么塑成了今天的意大利？

版权信息

重新发现欧洲：意大利何以成为意大利

A BRIEF HISTORY OF ITALY

作者：［英］杰里米·布莱克 Jeremy Black

译者：高银

出品方：未读·思想家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Copyright © Jeremy Black 2018

First published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 2018 by Robinson, an imprint of Constable & Robinson. This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ttle, Brown Book Group, London.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0 by United Sky (Beijing) New Media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目录

引言
第一章　古典时代的昔日荣光
第二章　群雄并征的中世纪
第三章　文艺复兴与权力政治
第四章　意大利战争与文艺复兴后的衰落
第五章　列强夹缝中的意大利
第六章　旧秩序下的意大利
第七章　拿破仑改写了意大利政治
第八章　拿破仑之后的复兴与统一
第九章　意大利人的大国梦
第十章　从和平到战争，从战争到和平
第十一章　战后意大利的起起落落
第十二章　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和社会难题
第十三章　重新发现意大利：北部
第十四章　重新发现意大利：中部
第十五章　重新发现意大利：南部
第十六章　重新发现意大利：诸多岛屿
结语　意大利往何处去
返回总目录

引言

没到过意大利的人，总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因为他没见过该见的世面。而旅行的伟大目的，就是饱览地中海的海岸风光。

——詹姆斯·鲍斯韦尔《约翰逊传》，1776年4月11日（其实书中主人公约翰逊并未去过意大利）

在前往米兰途中，我们造访了一个相当大的镇子，叫作诺瓦拉……在那儿，我们吃了一顿正宗的意大利早餐，有大个儿的意大利鸽子，有用食用油与帕玛森乳酪调制的动物内脏，有葡萄、无花果，还有种类似布丁的美味意大利粥，它是用印度小麦花混合食用油与奶酪制成的。

——玛格丽特·斯宾塞子爵夫人，1763年

旅行是在时间与空间中进行的。这部简史适用于那些不满足于大多数旅行指南介绍的节略史的读者。但是，写一部意大利的简史，不得不面对一个特殊的问题，即意大利不像法国等其他许多国家那样，有着悠久的统一历史。在历史长河中，意大利大多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意大利的主要区域，常常被更强大的敌对帝国占据，尤其是西班牙与奥地利。此外，现代游客极少会“周游”意大利，因为事实上这个国家可看之处实在太多，一次旅行是玩不完这么多景点的。因此，人们在旅行时，往往集中在某些城市与地区。这恰与意大利以地区为主的历史相契合，或者至少可以说，意大利人亲历的历史大多具有区域性。

为旅行者讲述意大利史时，作者面对的问题是，如果仅以时间先后顺序来记叙，各地区的精彩之处可能会湮没于叙事之中；但若以地区为纲，又难免重复冗余。为此，本书提出三点对策：一是以时间先后顺序谋篇布局，讲述一部涵盖意大利主要发展阶段的意大利史；二

是在必要处概述一些地区；三是本书还在正文中专门辟出方框探讨特定话题。

对我来说，能够记录逾半个多世纪的意大利旅行见闻，实乃一件幸事。我的意大利之行是从20世纪60年代初父母带我在意大利各处游历开始的，而最令我感到愉快的是自1979年起与莎拉一起遍游意大利的经历。我们一起去过阿布鲁齐、博洛尼亚、利帕里群岛、卢卡、摩德纳、那不勒斯、帕尔马、罗马、撒丁岛、西西里岛、都灵、托斯卡纳、翁布里亚、威尼斯与维罗纳。我曾经有幸在伦巴第、那不勒斯与托斯卡纳执教，并从中受益匪浅。其间，我还接触到阿达山谷地区的美味调料、普拉托静谧的修道院与那不勒斯的意大利“新派菜”餐厅。诸如此类的事物对我而言真是一种享受。我还在佛罗伦萨、热那亚、卢卡、摩德纳、那不勒斯、帕尔马、都灵与威尼斯，进行了档案研究。

我由衷地感谢保罗·贝尔纳迪尼、迈克·布尔罗斯、路易吉·洛雷托、西罗·保莱蒂、加布里埃尔·波马、路易莎·夸特梅因、古列尔·桑娜、彼得·怀斯曼与帕特里克·祖特希。感谢他们对早期一份书稿全部及部分内容提出的宝贵建议。本书谬误之处与上述诸公无关，其实他们帮助我订正了一些错漏之处。事实证明，邓肯·普劳德富特堪称出版商之典范。谨以本书献给我的益友与学术界同伴西罗·保莱蒂，纪念我们逾十四载的友谊与学术合作。

第一章　古典时代的昔日荣光

随着罗马帝国的崛起，意大利历史才开始变得与众不同且至关重要。

四分五裂的地形

随着罗马帝国的崛起，意大利历史才开始变得与众不同且至关重要。此前，它只是早期人类经历的一段段稀松平常的史前阶段而已。当时，在意大利全境内，农耕者逐渐取代采猎者，后来建立起来的国家，又被分成不同的部落聚居地。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分裂是由部落族群规模大小不一、实体经济政治集群缺乏所致。

就意大利而言，它的地形极不利于民族团结。这种情况如今依然存在。特别是，意大利多山，平原、河谷又相对较少，其中最重要的是波河河谷与相对平坦的伦巴第平原。波河河谷属亚地中海气候，在寒冷冬季那里雾气弥漫。伦巴第平原以南还有些其他平原，尤其是靠近罗马、如今已大多淹没于城市扩张洪流中的坎帕尼亚，那不勒斯湾的内陆平原坎帕尼亚大区以及阿普利亚（意大利人称之为普利亚）。但它们没有一个比得上伦巴第平原那种规模。

意大利少有的平原与河谷，又常常被令人望而生畏的群山隔断。由于第三纪大陆漂移，阿尔卑斯山脉是意大利“最近”一次撞向欧洲其他地方形成的剧烈地质运动的结果。它把意大利与欧洲大陆分隔开。克劳迪亚·奥古斯塔路，是第一条穿过阿尔卑斯山脉的罗马大道。它修成于公元46—47年，从维罗那到现代奥格斯堡途中经过雷西亚山口。另一条罗马大道，是2世纪时从奥地利穿过布伦纳山口直通意大利的大道。1777年，人们铺设了一条穿过山口的马车道。直到18世纪80年代，在滕达山口连接了尼斯与皮埃蒙特大区的库内奥后，阿尔卑斯山脉西部才出现可供来往车辆通行的关口。但其他大多数地方直到很久以后才通车。

1801—1805年，拿破仑下令在辛普朗山口修建一条连接瑞士与皮埃蒙特大区多莫尔索拉的道路。即便是在当时，每年10月到次年4

月末，关口都会关闭，不通车。1906年，辛普朗隧道开通，使得乘火车旅行成为可能。

继续往南，连绵的亚平宁山脉从内部将意大利分割开来。事实上，这条山脉是一系列复杂山区的集合。由于这种特殊地形的存在，意大利对意大利民族而言，就是彼此隔绝的各个地区。西班牙也是这种情况。但是，因为意大利没有像西班牙那样自15世纪起就是统一国家，所以它也就不存在中央与边疆的紧张局势。后来，西班牙的这种对立很快凸显出来，尤其是在卡斯提尔与加泰罗尼亚、巴斯克三省的竞争中。相反，意大利的此种冲突基本上是在1860—1870年，即意大利统一后的一段时期内才爆发的。

与地形有关的水土流失是个大问题。因此，之前沉积下来的山地土壤被耗尽，水土流向山谷、平原与海洋。实际上，在意大利较早的历史时期中，由于人类的长期定居，当大面积植被遭到砍伐时，水土流失进程加剧。结果，如今意大利大多数高地地区都是不毛之地且长期如此，由此导致的水土流失也经常是严重的。

此外，许多山谷谷陡坡深。在现代筑桥技术出现前，在通常较短的河道与融雪、暴雨产生的水流的共同作用下，山谷难以通行。因此，河谷的情况因季节而异，变化极大。可能出现严重洪涝灾害，就像阿尔诺河洪水那样。它在1740年、1966年两次重创佛罗伦萨。1870年，罗马也暴发了洪灾。1849年，一场疟疾夺走了朱塞佩·加里波第之妻阿妮塔的生命。因此，1875年，他计划让台伯河改道，让它不再流经罗马，并把它改造成适航的水道。但是，这项计划并未付诸实施。洪水也影响了河道及跨河交通运输，扰乱了诸如磨坊一类依靠水力运作的行业，破坏了最富饶的农产区，还导致疟疾的出现。

地形问题极大凸显了距离的影响。按照早期人类的尺度来看，地图上的距离本身是相当遥远的。事实上，时至今日，虽然旅行已经快得多得多，距离却依然很遥远。即使忽略必须在山脉上爬上爬下，或

因绕行而产生的额外距离，忽略与之相关的许多反复出现的困难，从阿尔卑斯山脉到意大利本土的卡拉布里亚大区顶端的旅程也是相当漫长的。当时，如果人们要到地中海地区最大的岛屿西西里岛去的话，还要跨越墨西拿海峡。墨西拿海峡给人带来了一些更严峻的问题。在蒸汽机出现以前，由于逆风或无风，海上航行充满艰辛。无风时，人们要靠划船或是用帆来获取动力。墨西拿海峡位于西西里岛东端与卡拉布里亚大区西部之间。这里也许是关于六头海怪斯库拉与毁坏船只的大漩涡卡律布狄斯的传说的起源。它们最初见于荷马的《奥德赛》中。事实上，墨西拿海峡确实有个天然漩涡。这个传说证明它们给人类带来的恐惧，也说明传说是对地形的铭记方式。同样地，还有位于西西里岛的卡塔尼亚东北部的巨岛。据说，奥德修斯刺瞎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后，率领船队夺路而逃。巨人向船队投掷石块，从而有了这座岛。

距离与地形妨碍了交通联系。罗马人试图通过修路来解决这个问题。罗马大道是1925年开始兴建的，是最早的高速公路。当第一条高速公路建成时，它连通了米兰与瓦雷泽（如今称作A8高速公路）。如果是在地形平坦的地区，问题就会容易得多。因此在16世纪初，一封特快专递可于24小时内将消息从米兰飞快送至威尼斯，甚至能在50小时内跨过亚平宁山脉，将消息从罗马传到威尼斯。但这些时间调度安排并非常态。直到19世纪，随着铁路、汽轮、电报，以及由烈性炸药开辟的隧道的出现，这方面才有了重大进展。此前，旅行与信息传递通常缓慢、不可靠，冬季尤其如此。遇到政治动荡的时期，情况则会更加恶化。

意大利的城市居民普遍将亚平宁山脉看作一道屏障。但它不仅是一道屏障，也是许多人生活的地方。其实，很多农民与牧民在山坡上生活、工作。长期以来，意大利社会存在政治与宗教上的紧张局势。矛盾的起因是城市当局试图控制在他们看来无足轻重、惹是生非的高地。例如，这种对抗体现在对阿尔卑斯山脉西麓韦尔多教派的宗教迫

害上。它也更普遍地体现在16世纪、17世纪的反宗教改革运动，18世纪的“启蒙运动”政府，拿破仑政权，以及1861年新意大利王国的建立。虽然包括皮埃蒙特大区、那不勒斯、摩德纳与意大利在内的地区向统治者们贡献了忠诚可靠的军队，但阿尔卑斯山区与亚平宁山脉北部地区在1943—1945年是反抗纳粹德国与墨索里尼的重要基地。这种基于地形而产生的文化矛盾，如今仍是一大突出特点。

谈到另一个话题，在另一张完全不同的时间表上，由于亚平宁山脉在地质上的特殊性，意大利也面临着剧烈地质活动带来的诸多问题。火山爆发使土壤地力肥沃，但熔岩也会造成巨大破坏。埃特纳火山（这座欧洲海拔最高的火山，据说是因为女神雅典娜把西西里岛压在巨人恩克拉多斯身上形成的）与维苏威火山尤其如此。与诸如斯特隆博利岛之类的火山岛不同，这两座火山都靠近主要居民区。公元79年，著名的维苏威火山爆发，庞贝与赫库兰尼姆两座城市因此遭了殃。1669年，埃特纳火山喷发，进而吞没了卡塔尼亚。该城浴火重生后，人们仿照巴洛克风格重建，让它至今仍然与众不同。

地震一直都是具有毁灭性的，就像1511年、1976年的弗留利地震，1693年、1968年的西西里岛地震，1979年、1997年的翁布里亚地震，1980年的那不勒斯地震，2012年的曼图亚地震，2016年的意大利中部地区的地震一样，不胜枚举。1908年的地震摧毁了墨西拿与雷焦卡拉布里亚，导致8万～10万人丧生。据可靠消息称，死亡人数保守估计是77000人。这场灾难造成的破坏甚至超过了战争的影响，而当时的政府又处置不当。1915年，另一场地震摧毁了罗马以东的意大利中部地区，30500人丧生。

这样的经历与威胁，构成了个人与集体的生活体验，同时也塑造了意大利的文化：宿命论与宗教信仰都得到强化。1756年，撒丁国王、皮埃蒙特统治者卡洛·埃马努埃莱三世及皇族成员出席都灵大教堂庆祝活动，感恩都灵基本毫发无伤地躲过了最近的一场地震。1769年3月有地震预报说，那不勒斯将完全毁于地震之中，这让一些当地人

陷入恐慌，教堂里一时人满为患。

就意大利历史而言，大多数时候，疾病也一样有着严重的破坏力。1423年，威尼斯在利多对面的拿撒勒圣母教堂岛（如今称作老拉扎雷托岛）开设了第一家疫症院，即永久性传染病医院。后来当瘟疫不再肆虐时，它成了穷人的庇护所。随后，1468年，威尼斯开办了第二家疫症院。热那亚及其他地区迅速效仿威尼斯体制。瘟疫持续造成严重影响，直到1743年意大利的最后一场传染病在西西里岛与卡拉布里亚夺去47000条生命才结束。是年，威尼斯派出战舰前往亚得里亚海，阻挡自疫区驶来的船只靠岸。寒冬也阻断了威尼斯与意大利其他地区的贸易往来。国法不分贵贱一视同仁，因此摩德纳公爵弗朗切斯科三世也被迫隔离。1781年，意大利采取大量预防措施，阻止瘟疫继续传播到巴尔干半岛。

意大利的早期人类

人们在意大利早期遗址中发现了尼安德特人的足迹。他们是生活在意大利中西部的齐尔切奥与萨科帕斯托人属的独立分支。其他地区也发现了早期人类遗址，尤其是在卡拉布里亚的格里马尔迪与阿普利亚的罗马内利。人类在西西里岛上居住的痕迹最早可追溯至约公元前13000年。在最后一个冰河时代，意大利位于主要冰盖的南面。大约在公元前8300年，随着冰雪消退到更北的地方，气候改善，保证了落叶树林与充足猎物的出现。这对早期人类来说是有利的环境。

大约在公元前6200年，农业从中东地区传播到意大利南部，当时在那里及西西里岛出现了最早的农村聚落。公元前5000年，意大利其他地区及撒丁岛也有了农业。人们驯化了猪、牛与其他动物，栽培了包括大麦在内的主要农作物，发展了陶器制造工艺。但是，在公元前3—前2世纪，由于没有密集型灌溉农业，意大利人口密度依然相对较低，而且，因为距离遥远与旅行中的诸多不便，早期意大利并未出现

如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伊拉克）及中国那样的中央集权制度。

然而，意大利依然是铜器时代欧洲（约前4500—前2500年）贸易世界的一部分。意大利中部有铜矿，人们还在那里的遗迹中发现了陶瓷制品。在青铜时代早期的欧洲（约前2500—前1500年），意大利与希腊、阿尔卑斯山另一侧的欧洲及西班牙均有贸易往来。撒丁岛将铜出口到希腊，尤其是迈锡尼文明的希腊，又从那里进口陶器。西西里岛已成为重要农产区，它也从希腊进口陶器。在意大利国内，筑有防御工事的定居地发展起来，之后便有了城镇。铸铁技术的兴起紧随其后，这使得武器与工具更加方便耐用。

意大利受到其他更广泛社会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印欧语系人群的涌入。他们的迁移跨越了一段漫长的时期，至少可追溯至公元前2000年。例如，意大利出现了考古学上所谓的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与翁布里亚的“维拉诺瓦文化”这一术语。这样的考古描述，让人很难分辨具体的种族或语言群体。腓尼基字母表的变体传到希腊后，又被引入意大利本土。人们在罗马以东不到24千米的一处遗址，即奥斯特里亚戴尔奥萨，发现了最早的希腊文样本。此处的考古地可追溯至公元前950—前770年。公元前900—前700年，腓尼基人在西西里岛西部建起了商栈，意大利数字系统也受到了希腊极大的影响。

罗马的前辈伊特鲁里亚

说到各部落，公元前800年，伊特鲁里亚人的地位开始变得重要起来。事实上，他们生活在城邦联盟中。到公元前7世纪，他们在半岛中部地区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向北扩展到波河河谷，向南延伸至那不勒斯附近的坎帕尼亚大区。大约在公元前530年时，伊特鲁里亚人的权势达到顶峰。但是，在公元前524年，他们在希腊殖民地库迈城被击退，由此受到打击。在接下来的200年间，伊特鲁里亚人受到北部高卢扩张及当地意大利各民族反抗的影响。尤其是在公元前350年

时，南部罗马人势力扩张，控制了伊特鲁里亚南部。

自此之后，伊特鲁里亚文明在罗马文明面前就始终显得相形见绌了，尽管后者最初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伊特鲁里亚人的智慧，因为他们是令人钦佩的。显然，伊特鲁里亚人会铸铁、建造拱门、绘制肖像画。文字记录的大量匮乏，让伊特鲁里亚人的事迹鲜为人知，但也让人着迷。他们的墓穴依然引人注目且易于参观，正如塔尔奎尼亚与切尔韦泰里的伊特鲁里亚人墓地，还有锡耶纳附近伯吉奥——希维塔特的早期伊特鲁里亚墓群。收藏着伊特鲁里亚遗迹的博物馆也值得一游，尽管参观者也许不能对伊特鲁里亚人产生像对罗马人那般的共鸣，因为人们对后者的了解要多得多。

希腊定居者沿西西里岛（自公元前734年）与意大利南部海岸建起了“大希腊”独立城邦，这些城邦影响并有时挑战了意大利诸部落。这些定居者也许是受到希腊人口过剩及（或）人们寻求新机遇的影响。这些城市中的几处废墟，尤其是阿格里真托、西西里岛上的塞格斯塔与锡拉库扎、萨勒诺海湾的帕埃斯图姆、梅坦蓬托，以及巴斯利卡塔的波利科罗依然壮观无比。波利科罗遗址是其中不大著名的一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巴斯利卡塔并非人们惯常的目的地。毕达哥拉斯在梅坦蓬托创办了一所学校。事实上，与这些定居地相比，罗马与伊特鲁里亚的定居地看起来相当原始，就像北面的马其顿王国与伊庇鲁斯王国在希腊人眼中的那样。

罗马并不是唯一一个崛起的大国。位于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民族被高卢的主要居民称为凯尔特人，罗马人称之为高卢人。

他们向南迁移。事实上，这些民族在公元前390年时洗劫了罗马。在戴奥尼夏一世（公元前405—前367年在位）统治时期，锡拉库扎市于公元前4世纪80年代扩张至意大利南部，在公元前4世纪90年代占领了西西里岛大部分地区。

罗马的崛起

所谓罗马，最初只是位于台伯河下游河谷的一个小定居地，此时伊特鲁里亚即将屈服于崛起的罗马。据称，公元前753年，埃涅阿斯的后裔、特洛伊皇室成员罗慕路斯与雷穆斯在特洛伊陷落后外逃，他们在逃亡时创建了罗马。帕拉丁山上有公元前850年的一处村庄遗迹。有证据表明，这里存在多处早期定居地。塔昆政权统治着罗马，历代塔昆国王本是科林斯人。直到最后一位塔昆国王被拉丁贵族赶走，塔昆政权才被后者建立的共和国所取代。人们通常认为此事发生在公元前509年，但是，这个说法不如公元前507年的说法可信，因为后者是由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根据早期希腊资料而提出的，这些资料往往比较广博。

恰如古代世界其他地方的城市一样，拉丁贵族建立的这个共和国在事实上是由寡头政治集团统治着的。此后，虽然人们获得权力的目的与方式均存在争议，但寡头政治与更加大众化的政治团体间的矛盾，以及寡头政治精英内部的斗争相互作用着。

至关重要的是，罗马人是令人畏惧的武士，而且，意大利的大段历史确实反映出罗马通过战争不断塑造与再塑造着罗马武士。罗马人令人称奇之处，不仅体现在他们的训练有素上，还体现在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的能力，比如能通过筑垒修路，在各种自然、军事环境下调兵遣将，采取军事行动。罗马人的军事训练与严格纪律，让他们能以快得可怕的速度行军；还能摆出各种预先计划好的编队，包括龟甲方阵战术在内；还能开展围攻并在战场上进行复杂、有效的军事调度。格奈乌斯·多米提乌斯·科尔布罗将军（去世于公元67年）曾征战日耳曼，攻克亚美尼亚。他发现，克敌的武器才是最重要的。罗马图拉真纪念圆柱上雕刻着罗马士兵从事挖掘工作的场景。罗马军队接受了训练，善于在每次行军结束时搭建营地。行军营通常间隔24千米，这也符合罗马军团的日均行军速度。营地依标准模式而建。按照今天所谓的标准操作步骤，行军队伍各部分均对自己在搭建营地过程中的职责

心知肚明。营地在队伍前进的路上，保障了罗马人的安全，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交通设施。许多营地成了定居地的前身。

公元前396年，罗马人占领了维爱，它是伊特鲁里亚十二城联盟国之一。罗马在征服了其他民族并使其成为自己的盟友后，通过战争统一了意大利。罗马人抵抗了北方凯尔特人的攻击，在公元前280年，代表希腊诸定居地抵御了古希腊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的入侵。皮洛士也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他的军中配备了战象。这寥寥数语，就能概括数百年间的历史与当时的情况。罗马统一意大利的过程看似顺利，事实上却相当困难。罗马遭遇了极大的阻力。罗马在内陆地区的主要对手是意大利南部的萨莫奈人。公元前343—前341年、公元前328—前304年、公元前298—前290年的数次战争，以及公元前295年罗马人在森提努姆战役中取得的关键性胜利，均表明萨莫奈人是可怕的敌人。由于失败，萨莫奈人被迫成了罗马人的盟友。罗马巩固自身地位的方式是在一些关键位置建立拉丁居民的殖民地（定居地）及修路，尤其是在公元前312年从罗马修建了跨越亚平宁山脉前往卡普亚的阿庇亚古道，并在公元前220年开通了从罗马到亚得里亚海沿岸里米尼的弗拉米尼亚大道。

罗马人战胜萨莫奈人后，给意大利南部的希腊诸城造成了压力，尤其是塔伦特姆（塔兰托）。虽然皮洛士在赫拉克勒亚（公元前280年）与阿斯库伦（公元前279年）取胜，但他在公元前275年战败于马莱文图姆（在这场战役后，此地更名为贝尼温图姆）。随后，皮洛士班师回到伊庇鲁斯。这导致罗马人占领了塔伦特姆（公元前272年），其他希腊城邦向罗马妥协。罗马人建立了更多的拉丁殖民地，并拓展了阿庇亚古道。因此，到公元前250年，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已处于罗马统治下。虽然这个速度比皮埃蒙特人在1859—1870年间征服、统一意大利的速度要慢得多，但罗马人当时并未像皮埃蒙特人那般依靠外界干预、支持。具体而言，法国进行干预，普鲁士则为皮埃蒙特人提供了支持。此外，二者的科技水平也不可同日而语。

连绵的战火导致罗马的文化、大众记忆、公共空间、宗教信仰、社会与政治体制都被打上了军国主义的烙印。诚然，罗马在许多方面都仿佛是意大利版的斯巴达，它推崇军事价值观，并相应地提拔、尊崇政治家。

罗马人在与希腊人的斗争中取胜，随后开始了与迦太基的竞争。迦太基是建立在现代突尼斯周围的腓尼基人定居地。公元前3世纪，它已成为地中海西部重要的海洋与帝国主义强国。公元前410—前405年，迦太基人已入侵西西里岛西部地区，占领了包括阿格里真托在内的大部分希腊城市，并于公元前409年在巴勒莫建立永久性定居地。在撒丁岛南部，尤其是卡拉里斯与塔罗斯，腓尼基人也建立了定居地。

罗马人最终在与迦太基的三次布匿战争中取胜。这些广泛的冲突，让意大利本土、西西里岛、西班牙与北非都卷入战火。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公元前264—前241年），罗马与迦太基的战斗围绕在争夺西西里岛的控制权上。西西里岛作为不同文明的交汇地，当时一再受到战火荼毒。在这场战斗中，罗马人因为没有海军最初深受重创。这促使他们建立起一支足够强大的海军，最终能在距离西西里岛不远的地方击败迦太基舰队。在战斗中，罗马人猛烈撞击敌舰，并用类似木板的“乌鸦吊桥”在两船间架桥，从而快速登上敌船。乌鸦吊桥上的铁钉可以将桥板固定在敌船上。由此，海战变成浮在水面上的陆战。这对罗马十分有利。但是，乌鸦吊桥似乎只是单次战争中的奇迹。它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得到有效利用，但在此后却销声匿迹。这也许是因为它导致了许多罗马船只在暴风雨中的沉没。

海军力量为罗马提供了重要优势，使它战胜西西里。更显而易见的是，罗马得以向北非派遣自己的军队，但是派去北非的罗马远征军最终失败了。部分原因是，迦太基人把大象引进了战场。在与罗马的第一次布匿战争中，迦太基战败，被迫割让西西里岛。自此西西里成了罗马的第一个行省。随后，迦太基遭遇雇佣军反叛。这次叛乱让罗

马人有机会在公元前227年兼并科西嘉岛和撒丁岛。这证明罗马帝国的扩张成功有时是出乎意料的。就像波利比乌斯在《通史》中写道："自罗马人开始对大海感兴趣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开始打撒丁岛的主意了。"他们的眼界开阔起来。

随后，迦太基与罗马开始展开对西班牙东部地区的争夺。这种竞争引发了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前201年），反映出罗马日益膨胀的野心。他们想把势力范围扩展到地中海以外地区。结果表明，与向北越过阿尔卑斯山脉的扩张相比，这次扩张对罗马来说确实意义更加重大。迦太基大将汉尼拔（公元前247—前183年）在西班牙战绩不俗，遂决定攻击罗马在意大利的权力之基，以巩固迦太基取得的成果。为实现这一目标，公元前218年，他完成了率军穿过意大利北部、翻过阿尔卑斯山脉的艰巨任务，攻击了意大利的罗马军队。汉尼拔把战象带过了阿尔卑斯山脉。尽管只有一头大象在横越山脉的过程中活了下来，而且不久后也死了，但是汉尼拔的这种举动让子孙后代觉得这是一场史诗级的战斗。

汉尼拔给罗马带来一场严重危机。在汉尼拔的得力指挥下，他那相当专业的军队控制了战争的走向。罗马主力军在特雷比亚河（公元前218年）、特拉西梅诺湖（公元前217年）、坎尼（公元前216年）与赫多尼亚（公元前210年）的战役中节节溃败。坎尼战役是罗马历史上最大的一场败仗。在这场战役中，迦太基军队攻破了一支罗马军队的侧翼。随后败军被挤压在一起，遭到屠杀。罗马军队伤亡人数近5万。对此感兴趣的旅行者长期以来都急于从这些古战场中寻找古典世界早期给人带来的启示。罗马战败，结果导致包括卡普亚城在内的一些罗马盟友弃之而去。在西西里岛，此前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保持半自治的锡拉库扎支持迦太基人。公元前213—前211年，罗马人最终成功包围了锡拉库扎。

战败也给罗马国内带来巨大政治压力。罗马在孤注一掷地寻求对策之际，数度易帅、改变战略。对罗马人来说，是否应战是个关键的

决定。避免交战的策略被称作费边主义，这来自有着“拖延者”之称的指挥官昆塔斯·费边·马克西。正是他倡导了这种战略。在汉尼拔取得特拉西梅诺湖大捷后，费边被推向前台。他不在平原上与敌军交战，倾向于打山地消耗战。因为，在山地上，与迦太基骑兵对垒时，罗马步兵尤为有用。由于民众不耐烦，罗马放弃了费边的策略，结果导致在坎尼战役中的惨败。罗马吃了败仗后，费边再度被起用。

汉尼拔的失败并非由于他在意大利战场上失利，而是因为他没能将战场上的胜利转化为自己想要的结果，即促成罗马及其属地制的崩溃。汉尼拔军队人数少，还缺乏攻城装备。哈斯德鲁巴的军队自西班牙进发，在梅陶鲁斯河战役（公元前207年）中不敌罗马军队，因而未能与汉尼拔在意大利会师。罗马人也有效阻断了汉尼拔军队的海上补给线。此外，罗马人迅速解放了大量奴隶，让他们加入罗马军队。结果表明，罗马城固若金汤、难以攻破，而且大多数盟友依然坚定地支持着罗马。

击垮迦太基体制的首先是罗马在西班牙的胜利。在关键性的伊里帕战役（公元前206年）中，大西庇阿获胜。公元前204年，战场向北非转移，这也给迦太基体制造成打击。公元前202年，大西庇阿在北非的扎马会战中对阵汉尼拔，取得了一场重要胜利。罗马人已经学会了如何阻挠迦太基人的战象。为应对大西庇阿造成的威胁，汉尼拔不得不重返北非。因为，大西庇阿用行动证明，他比第一次布匿战争中入侵北非的罗马军队要成功得多。自此以后，大西庇阿被奉为“阿非利加征服者”。罗马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胜利让它成功取得在地中海西部，包括西班牙东部与南部地区的主导权。自那时起，罗马就不必再面对像迦太基那样幅员辽阔的对手了，因此也就能调度资源与敌对阵。

罗马共和国军队人数众多。这是因为罗马将意大利各民族人民组织了起来，赋予他们不同的公民身份与盟友身份。所有人都必须在罗马军队中服役，就像中国汉代的全民皆兵的制度。罗马人相信，由成

年农村男子组织起来的庞大军队实力雄厚。这支军队为对阵迦太基提供了巨大的人力资源储备。公元前31年，罗马军队中的意大利人多达25万。达到服兵役年龄的男性人口，几乎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罗马军团的士兵并肩作战，休戚与共。他们用铁制短刺刀、重型标枪与盾牌击败汉尼拔后，又加入了更边远地区的战斗中。罗马军团在人力、资源、意志力与组织上占据优势。因此，截止到公元30年，罗马控制了地中海东部地区、埃及、高卢（法国）与西班牙。随后，他们在公元100年控制了英国大部分地区及巴尔干半岛。尤利乌斯·恺撒在占领高卢地区时发挥了关键作用。最具戏剧性的是，他在公元前52年击败劲敌维钦托利。

公元前55年、公元前54年，恺撒远征不列颠。公元前55年，恺撒在危险的肯特滩头阵地上岿然不动。罗马人在恶战中取得了胜利，但秋分风暴损坏了他们的战船，大规模抵抗也让恺撒不得不与当地部落议和。公元前54年，恺撒率领人数更多的一支军队再度入侵不列颠，他还利用了对手海军力量的薄弱。不列颠国在海军上的弱势，使得他们无法与恺撒争夺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恺撒从滩头阵地向前推进，挫败当地部落首领，强行建立定居地。公元43年，约有4万名罗马士兵在未遭遇抵抗的情况下登陆。不列颠人被打败了，随后罗马帝国皇帝克劳狄一世过来抢走了战果。

但是，由于罗马在公元9年战败，又在110—119年的战斗中（战场位于今伊拉克幼发拉底河以东）表现出耐力不足，罗马最终采取防守政策，筑起了有固定防御工事的边境。罗马人修建的由城墙、堡垒组成的令人敬畏的体系，秉承了进可攻、退可守的设计理念。

与此同时，意大利有了今日的名称。这与早期情况相比有了重大转变。彼时，罗马人称意大利北部为“山南高卢”，即住在阿尔卑斯山脉意大利一侧的高卢之意。它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高卢（即现代的法国）相对。公元前101年，辛布里人在波河与塞西亚河交汇处的韦尔

切利之战中战败。这意味着，意大利北部再也不是凯尔特人的天下了。

罗马共和国的垮台

虽然攻城略地的进程仍在继续，但罗马共和国已经垮台。当时，先是马略与苏拉，接着是庞培与恺撒，这些互相不服气的军事领袖让军队为他们的权力争夺打起了头阵。这是罗马解决国内政治争端的方式。正如后来在18世纪90年代，法国与拿破仑之间的故事那样，历史表明，政治与军事交织是个重要问题。野心勃勃的政客试图在边境获得军权，然后将各种资源用作军需物资。他们也推动了帝国的扩张。这往往是为自身利益而采取的侵略性立场。事实上，19世纪，诸如查尔斯·内皮尔爵士一般以这种方式行事的大英帝国要人，被称作殖民地总督，这种称呼直接与罗马人有关。

盖乌斯·马略（公元前157—前86年）在西班牙、北非及高卢节节胜利。这让他多次被选举为执政官、统帅（公元前104—前101年）。马略实行军队改革，将军队由公民义务转变为半职业群体。士兵因此愿意认同部队、追随将军。马略在罗马政治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在公元前100年至他去世这个阶段。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苏拉（公元前138—前78年）是另一个从将军转身为政治家的人。历史学家普鲁塔克提出，人们通常认为苏拉在担任西里西亚行省地方总督时，在对待周边的帕提亚的过程中，表现出“粗俗且不合时宜的傲慢”。这种做派，在罗马官员与将军之中并不鲜见。苏拉与马略是一对冤家对头。当马略试图挫败他的进军时，苏拉占领了罗马。公元前89—前80年，苏拉在内战中击败了他的对手们。但是，西班牙依然处于马略众门徒的控制下。公元前81—前79年，为了维护罗马元老院寡头政治集团的利益，有些冷酷的独裁者苏拉试图掌权，并为此限制了人民与护民官们的权力。

罗马政局矛盾重重，尤其是寡头政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以及寡头政治执政者与普罗大众之间的紧张局势。但是，这些冲突并不是数百年前内战中的那些观念分歧。与此同时，当人们倾向于从社会分工的结构层面上看待政治时，有必要注意到每个社会群体内部对政策看法的重大分歧。这一点适用于后来意大利历史的许多时期。

正如尤利乌斯·恺撒在高卢取胜并试图在英国克敌，伟大的庞培在西班牙取胜并在地中海地区打击海盗，马库斯·李锡尼·克拉苏试图在叙利亚获胜一样，当时的指挥官们试图利用自己在战场上获得的名气在罗马一展抱负。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过程。军队分裂成不同派系。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分化缘于那些不愿妥协的男人的野心。在他们看来，妥协很可能意味着颜面尽失。军队党派之争让人们彼此间敌意不减，竞争延续了数十年。因为庞培（公元前106—前48年）此前支持苏拉，苏拉就派他去西西里及非洲攻击马略的支持者们。庞培、克拉苏与恺撒结成“前三头同盟”（公元前55年），达成权力共享协议。他们特别就罗马军事活动区域达成了共识。在罗马人民的支持下，这项协议把元老院（寡头政治执政官们）挤到了一边。

但是，这项条约并未维持多久。公元前53年，帕提亚人在卡莱战役中击败了克拉苏，克拉苏阵亡。反过来，庞培以元老院支持者的形象自居。从公元前49年开始，庞培与恺撒对阵。恺撒率军越过卢比孔河（靠近里米尼），从阿尔卑斯山以南的高卢进入意大利。他在意大利的法萨罗之战（公元前48年）中，取得了对庞培作战的关键性胜利。即使在庞培死后，内战仍未结束。因为，庞培两个儿子的支持者们仍在战斗，尤其是在西班牙与北非。最后，他们被打败了。

但是，后来的情况表明新情况是不稳定的（“但是”是一个历史学家喜闻乐见的词）。虽然恺撒本人有着贵族出身，但他却是平民派领袖。在很大程度上，恺撒将自己与平民联系到了一起。但是，他的对手们则是贵族派领袖。其中最著名的是布鲁图斯与卡西乌斯。他们试图强调建立由贵族阶层管理的共和国的重要性。这一分歧导致恺撒于

公元前44年的“弑父日”（3月15日）在罗马遇刺身亡。内战由此爆发。结果，恺撒的支持者们组成了“后三头同盟”。他们在希腊的腓立比战役（公元前42年）中彻底打败了密谋者们。

反过来，“后三头同盟”闹翻了。三人中实力最弱的雷必达遭到排挤，马克·安东尼与埃及统治者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结成同盟。结果，公元前31年，“后三头同盟”中的第三人、恺撒的继承人及养子，也叫作恺撒的盖乌斯·屋大维，在希腊西海岸巨大的亚克兴海战中击败了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屋大维成了这场斗争中最后的胜利者，并获封为“奥古斯都”。这个术语难以定义，最好将它解释为“实施者”或“增加者”。因为该词源于拉丁语动词“提高”，意为实施、增加与使伟大，而“最可敬的”被用于定义本已比周围的人或物要更伟大、更重要的事物。奥古斯都是最高统帅。他一路追击马克·安东尼至埃及。在那里，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双双自尽。埃及即将成为罗马的重要领地，尤其是作为罗马主要的谷物产地。公元前36年，屋大维就已经在西西里岛打败了庞培大帝的一个儿子塞克图斯·庞培。

奥古斯都与帝国的黎明

作为埃及与巴尔干半岛地区的征服者，奥古斯都值得夸耀的功绩是为罗马及意大利本身带来了和平。理所当然地，在他掌权时，社会要比之前的半个世纪稳定得多。奥古斯都实行改革，试图美化罗马。政府体制精密复杂。奥古斯都既无宫殿，也无王宫、皇袍。共和国的机构运作如常，他的官方军事指挥权在空间与时间上都受到了限制。奥古斯都的个人地位与受欢迎度一样独一无二。但是，这并未在任何实际意义上说明他是皇帝。后来的人把奥古斯都称为皇帝的做法，预示着他的继任者们将让罗马体制改头换面。

这些罗马统治者没有实现长久稳定。部分原因是统治家族内部不和，以及奥古斯都的继任者们自身能力不足，尤其是卡利古拉（公元

37—41年在位）。他要么是个疯子，要么就是行为疯癫，以至于被评论家刻画成了这副模样。在卡利古拉的统治下，罗马采用希腊宫廷习俗。最终，卡利古拉遭到刺杀。多重分歧与统治精英阶级的内部矛盾相互作用。这些矛盾包括意识形态差异、亲属恩怨、统治家族内部及与统治家族间盘根错节的关系，以及具体的政治问题。

由于这些缺陷的存在及必要的有效领导的缺乏，奥古斯都此前创造的共和传统、稳定的机构与统一的官方言论难以为继。尼禄（公元54—68年在位）最喜爱的诗人之一卢坎（公元39—65年）出身于富贵之家，曾参与意图谋害皇帝的庇索阴谋案，失败后被迫自杀。卢坎创作的史诗《内战记》记录了恺撒与庞培间的战争。他指责这场内战使罗马无法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卢坎接着说，“如果今天意大利城市中房屋半毁、墙体摇摇欲坠，崩塌的住所让巨石挡在路上的话”，那也是内斗的结果。正如像卢修斯·克洛狄乌斯·马谢尔那样的反叛者所宣称的那样，他们反对的是某个具体的统治者，而非罗马宪法。公元68年，马谢尔起事，试图取代尼禄，结果失败。

长期以来，军事控制都是个问题。政府想垄断军队、巩固中央集权，但边疆军队意图独立。这些部队的指挥官们能发动夺权战争。这一点在公元68—69年时展露无遗。当时，尼禄失势，伴随着他后来的死亡，四位将领揭竿而起。韦帕芗（公元69—79年在位）成了最终的胜利者。他成立了新罗马帝国弗拉维王朝（公元69—96年），对罗马实行着有效的统治。最初支持韦帕芗的是叙利亚的罗马军团，后来多瑙河上的罗马军团也加入了他的阵营。但是，军队拥立、废黜皇帝们的做法如今已根深蒂固。

罗马作为一个偏远帝国的首都，已是多种族的了。罗马军队也是如此。公元1世纪，军队招募的士兵大多来自意大利北部，尤其是波河河谷地区。此后，军团士兵（常规军）不再是意大利籍的了。

罗马人在意大利与在其他地方一样，修建了千篇一律的基础设

施。他们修筑构造坚固的道路、沟渠，建造剧院、坟墓、浴室与其他公共建筑物。虽然石质外壳与碎片无法捕捉到人们围绕这些建筑物展开的日常生活、呈现的活力与举行的仪式，也无法再现这些建筑刚落成、装饰好时的辉煌，但游客仍可见到大部分遗迹。他们能在罗马及其他地区瞻仰自己最爱的罗马遗址。例如，壮观的维罗纳露天剧场是歌剧表演的（热门）场地，卡塞塔的奥普隆蒂斯别墅壁画位于那不勒斯附近，还有最近在那不勒斯出土的大量地下遗迹。远离罗马的遗迹捕捉到了罗马文化及影响力的痕迹。

奴隶制和奴隶起义

人们应该注意到，与罗马帝国和善面同时存在的是它对奴隶制的完全依赖。尽管其他帝国也存在着这种对奴隶制的依赖，但是至少罗马人建立了严格的奴隶制法律，并包括了奴隶个人解放的可能。鉴于罗马社会中大多数工作都是艰难的体力劳动，奴隶制的广泛存在使罗马建起由奴隶处在社会底层、自由民享受公民身份与社会地位的政治结构。在共和国体制下，自由民还享有某种程度的民主。罗马将军们拥有制造奴隶的本领。尤利乌斯·恺撒曾提到自己将成千上万名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凯尔特人贩卖为奴的事迹。公元前168年，卢基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征服了马其顿王国。据说，此前在公元前167年，他洗劫了伊庇鲁斯王国，随后又将那里的15万人贩卖为奴。这些交易给罗马将军们带来了巨额财富。奴隶的主要工作是建造业、划桨帆船、家政与农事。例如，奴隶们在阿普利亚牧羊，他们还充当矿工（尤为残酷的命运）与手艺人。有些奴隶是奴隶的后代，其他则是因战争、占领、贸易或惩罚而沦为奴隶的。奴隶也有公私之分，存在着私人奴隶与国家奴隶的区别。

奴隶起义时有发生，其中最著名的要数色雷斯人斯巴达克斯领导的起义了。他因为当逃兵而沦为奴隶，后来成了一名角斗士。公元前73年，斯巴达克斯领导了一场重要的起义。他集结起来的这支军队人

数众多，大概有9万人。他们沿着整个意大利半岛前进，毁坏大庄园，彻底击败了许多罗马军队。最终，在公元前71年，斯巴达克斯在卢卡尼亚战役中被裁判官克拉苏打败并处死。罗马人将大批斯巴达克斯的追随者钉在十字架上，放在亚壁古道沿线，以儆效尤。这种惩罚更众所周知的受害者是耶稣。另一种惩罚通常适用于战败的首领们。他们作为一次“胜利”中的战利品之一，在罗马的大街小巷被人游街示众。与此同时，获胜的将军接受众人致敬。之后，正如发生在遭扼杀的维钦托利身上的那样，战败的首领们往往惨遭杀害。在很大程度上，暴力是罗马作风的一部分。

时至今日，斯巴达克斯起义仍是现代人眼中古罗马的重要方面，尤其是由于斯坦利·库布里克执导的电影《斯巴达克斯》（1960年）的影响。通过这种戏剧化的方式，罗马为人所知。从这个角度来看，奴隶制是对罗马政体不公不义之处的重要指控。正是这种政体将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这一点是罗马在皈依基督教信仰前，基督徒们反复提及的内容。其他电影也提出了类似的假定与价值观。例如，《宾虚》（1925年、1959年）、《圣徒妖姬》（1954年）与《角斗士》（2000年），还有美国电视连续剧《斯巴达克斯：血与沙》（2010年）。

意大利也爆发了其他奴隶起义，尤其是公元前139—前132年、公元前104—前100年在西西里岛的奴隶起义。但是，这些起义都被镇压了下去。前一次起义导致来自西西里岛的粮食运输量下降，这让罗马人陷入停滞状态。公元前132年，当反叛者投降时，罗马人屠杀了最后剩下的两万名参与叛乱的奴隶以泄愤。西西里也是重要的葡萄酒产区。更普遍的情况是，奴隶谋杀主人的情况让人们对奴隶充满恐惧，结果法律规定，在这样的案件中所有家奴都应被处决。尽管法律试图限制暴行，例如，《佩特罗流斯法》禁止奴隶主将奴隶卖给竞技场与野兽搏斗，但是，社会上仍然存在着对奴隶随心所欲的残暴行为，人们常把奴隶视为动物。角斗士互相厮杀、至死方休的观赏性运

动是这个残酷世界的一部分。当时也存在着对动物的残暴行为，人们屠宰猎物取乐。

罗马体制的影响

奴隶制是罗马生活中内在不平等性最惊人的例证。不平之事每日反复上演，存在于生活的所有细节与思想之中。作为一名罗马公民也许意味着有了某种平等的基础。但是，正如在19世纪时的英国那样，富人与穷人、男人与女人、家长与子女、长子与其他孩子的境遇大不相同。因此，自由佃农虽不是奴隶，但经济状况也不怎么样，还得交租纳税。他们即将变成农奴。相比之下，主要的土地所有者与王国直属封臣的境遇就要好得多。

这导致由基督教提出的平等观点显得特别具有颠覆性。一神论的基督教长期以来受到迫害，基督徒在众人面前殉道。它也挑战了多神论的奥林匹斯众神体系。这种多神论体系使罗马皇帝位列于宗教万神殿之中。那个时期的基督教堂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马赛克画，描绘着《圣经》中的场景。例如，4世纪时阿奎莱亚的巴西利亚教堂。要不是后来重建，人们本能看到更多遗迹。尽管有些农村地区直到6世纪仍信奉罗马异教，但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在4世纪末就皈依基督教了。皇帝崇拜并未阻止人们通过谋杀、密谋与反叛推翻个别皇帝的行为。早期一些皇帝已经落得这种下场了。例如，卡利古拉、克劳狄一世与尼禄。权力最盛的皇帝们是那些在战场取胜后赢得威望的人。这种声誉日后成了让众人对其俯首帖耳的保障。例如，维斯帕西安（公元69—79年在位）、提图斯（公元79—81年在位）、图拉真（公元98—117年在位）、哈德良（117—138年在位）与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193—211年在位）。因此，战败威胁着社会稳定，尤其是当皇帝战死沙场时，正如叛教者尤里安（361—363年在位）在与萨珊王朝的波斯人对阵时战死沙场那样。



罗马地图绘制

罗马人从希腊人那里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希腊人意识到，他们已知的世界只是全球的一小部分而已。这意味着，希腊人懂得探索世界与绘制世界地图的意义。大约在公元15年，斯特拉博在作品中讲述了希腊人对地理的解读，而希腊人的地理观在罗马统治时期又得到罗马人的发展。他在作品中提到来自马洛斯的希腊哲学家克拉底。在公元前150年左右，克拉底在罗马建造过一个大地球仪，直径至少有3米。地球仪上有四个平衡的大陆，分列世界四方，彼此被海水隔开。世界必须保持平衡的观点让人们长期以来认为存在一个巨大的南方大陆。

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约公元90—168年）在罗马统治时，工作于亚历山大城。他起草了一份世界地名索引，其中有预测的地理坐标。托勒密对英国的描绘得益于始于公元43年的罗马征服。

罗马人是多产的测量员。他们能按比例制图，地图对他们来说也是用途广泛。在罗马世界中，地图绘制与帝国的征服、统治息息相关。所谓的世界地图也与世界大国的虚荣做作紧密相连。罗马城大比例平面图《古罗马城图志》重在炫耀，它被刻在墙上，供人观瞻。

罗马人搜集起来的信息反映出罗马军事、政治体制的广度。有效治理国家的基础是理解帝国本身。公元4世纪，弗拉菲乌斯·韦格蒂乌斯创作了《兵法简述》一书。他指出，一位将军必须有“准确编制的图表。这些图表不仅要用步数标明距离远近，还要说明路况好坏，显示出较短路线、住宿情况，以及山川河流的信息”。

《波伊廷格古地图》是在12世纪时对4世纪的罗马陆路交通图进行更新后的版本。它是路线图，而非地形图，因此用了条形结构。这幅地图描绘了山脉，并画出了某些城市周围的道路，如塔兰

托。

另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制图来源是《拉韦纳宇宙志》，内含罗马帝国疆域内逾5000个地方的地名表。这是大约在700年时，由一位姓名不详的神职人员起草的。据说，这位编纂者当时翻阅了各式官方地图。

重大问题

“1764年10月15日，当我坐在古罗马神殿的废墟之中，冥思苦想之际，周围飘荡起晚祷时的唱经声。那是赤脚的天主教会修士在朱庇特神殿做功课。恰逢此时，我第一次有了撰写一部罗马城衰亡史的想法。”

爱德华·吉本在他的《我的作品和生活回忆录》中解释了《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缘起。这部多卷本研究最初面世于1776—1788年，后来成为关于最伟大的后古典时期历史作品。吉本聚焦于罗马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的衰落对欧洲历史学家来说是个重大问题。历史学家至今对罗马衰亡的原因仍然众说纷纭，尤其是内部原因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罗马衰落，“蛮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中断了罗马更伟大的延续性，从而带来灾难性变化这样的问题。

衰落

罗马人不是战无不胜的，他们有着一系列惊人的败绩，尤其是公元前53年克拉苏在卡莱战役中不敌帕提亚人，公元9年瓦卢斯在托伊托堡森林会战中败于日耳曼人之手。在瓦卢斯的这次失败中，罗马人失去了三个军团。这些败绩给罗马的一些扩张企图画上了休止符，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如此。相较之下，自2世纪末，帝国之外“蛮族”的进

攻变得紧张起来。167—170年，马科曼尼人与夸迪人入侵意大利北部。罗马世界是个诱人的目标。3世纪50年代，罗马经历了一场尤为严峻的入侵危机，结果导致帝国领土四分五裂。与此同时，罗马为求自保，在当地寻求解决方案。

然而，侵略战搞得拖拖拉拉。长期以来，罗马人都能化险为夷，从敌人的进攻中缓过劲儿来。皇帝奥勒良（270—275年在位）给罗马带来了某种程度的恢复。多亏了他，罗马城在3世纪70年代新建了多塔楼城墙。戴克里先（284—305年在位）试图让增选的皇帝获得授权、实行领导。他创立了由两位主皇帝与两位副皇帝组成的四帝共治制。但是，这种体制最终导致帝国东西两部分之间永久性的分裂。330年，君士坦丁一世在拜占庭（后来的君士坦丁堡）建立新都，权力中心随之转移。312年，君士坦丁一世皈依基督教，异教遭降级。这种宗教信仰的改变极大地破坏了罗马的延续性，由此导致的分裂也削弱了帝国的实力。彼时，罗马本应集中精力对抗外部威胁。拜占庭成了新都，罗马则是旧城。

结果表明，相对缺钱少人的西罗马帝国不大能够应对“蛮族”进攻，尤其是因为信任缺乏让东罗马不愿向西罗马伸出援手。莱茵河、多瑙河边境失守导致意大利告急，因为大部分军队都忙于应对边境或其他省份的战事。401年，在远东匈奴人的压力下，亚拉里克一世率领西哥特人侵略意大利，并于410年洗劫罗马城。此前，罗马的城墙抵挡住了亚拉里克，但他这次用饥饿迫使罗马人屈服。随后，意大利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入侵者——哥特人、匈奴人与汪达尔人——的肆意蹂躏。汪达尔人属于日耳曼部落，他们在455年洗劫罗马，在468年占领西西里岛。452年，在阿提拉的领导下，匈奴人摧毁了重镇阿奎莱亚。那里的人为了活命，纷纷逃到附近的海滨沼泽地，最终去了威尼斯。

同时，政治也动荡不安。394—476年，西罗马帝国先后出现了19位皇帝。起先掌权的是军事领袖，而且他们中的几个人，包括奥多

亚克在内，还是“蛮族”。此外，中央与此前诸行省在军事、政治、行政方面的联系都中断了。476年，奥多亚克废黜了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罗马皇帝，即罗慕路斯·奥古斯都。皇帝们此前均在拉韦纳避难，因为那里不像罗马一样易受攻击。但是，拉韦纳失守了。“蛮族”给罗马带来的压力并不是由罗马自身的问题所造成的。当时普遍存在着针对安定社会的攻击，这一进程也见于中国汉朝。与此同时，诸如基督教影响这样的一些议题是罗马所独有的。

罗马帝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是，自6世纪始至11世纪末，拜占庭成功获得并保持住了对意大利南方大部分地区的控制。这既延续了罗马帝国的生命，也保住了与希腊的联系，而且，正是与希腊的渊源在此前为罗马文化带来了活力。拜占庭的权力或影响力也见于更北的地方，尤其是拉韦纳与威尼斯。拉韦纳很值得一游，那里有拜占庭式的马赛克画。古代世界的克里姆特保存在世界遗产地内。人们可以在普拉西狄亚陵墓、阿里亚诺洗礼堂、尼奥尼安洗礼堂及大主教博物馆中欣赏到特别壮观的5世纪马赛克画，而6世纪的则存在于圣维塔教堂与圣阿波利纳雷诺沃基督教堂内。意大利全境范围内的大多数地方都有拜占庭——希腊风格的修道院。例如，位于罗马东南郊格洛塔菲拉塔，建于1004年的圣尼络隐修院。

追忆罗马

此外，关于罗马帝国的记忆与形象将在后来意大利的影像中起到关键作用，尤其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影响。这个政治存在居于中心位置。自800年查理曼大帝在罗马建立神圣罗马帝国起，到罗马帝国在1806年灭亡止，它都具有象征意义。罗马的影响更加广泛。诸如拿破仑一世这样的帝国政要利用了罗马帝国的遗赠，或曰他们眼中的帝国遗产。但是，共和国与君主立宪政体表明，他们更愿向罗马共和国学习。因此，当时新成立的美利坚共和国有参议院，而且，法国革命画家在作品中运用了图示法与罗马帝国的形象。例如，曾求学于罗马的

雅克·路易·大卫（1748—1825年）在他的《荷拉斯兄弟之誓》（1784年）与《萨宾妇女的调停》（1799年）中就是这么做的。大卫是拿破仑一世的宫廷画师，拿破仑喜欢有罗马遗风的画作。

19世纪，欧洲人在拓展帝国时以罗马帝国为原型。不论是殖民地总督还是外交官，官员们都倾向于扮演地方长官的角色，把自己看作文明的传播者。这种妄自尊大也见于美国扩张主义之中，尤其是紧随大英帝国试图效仿古典时期的罗马帝国。

意大利复兴运动（意为“再度崛起”）源自罗马复兴思想。演讲、信件与作品中常常提到罗马的荣誉与遗产。因此，毫不意外的是，1932年在贝尼托·墨索里尼领导下掌权的法西斯主义者认为，通过回溯罗马帝国，他们可以让通过血祭获得的民族重生在人们心中激起更大的历史共鸣，唤起人们更强的使命感，同时让民族重生更加合理。这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在语言、思维模式与象征手法中的重要主题。法西斯主义的标志法西斯（意为斧头）直接取自古罗马。1930年，鲁道夫·格拉齐亚尼元帅（1882—1955年）被任命为昔兰尼加（利比亚东部地区）副总督。在“罗马人”征服“蛮族”的最后阶段，他在殖民地实行了非常严厉的“平定”政策。1932年，这种强制推行的和平政策被称作“罗马和平”。

1937—1938年，意大利隆重举行了庆祝罗马帝国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恺撒（出生于公元前63年，公元前27—14年在位）诞辰2000周年的活动。这场庆典始于墨索里尼为一个大型考古展揭幕，终于为修复后的奥古斯都和平祭坛举行落成典礼。建于公元前13年的奥古斯都和平祭坛供奉着和平女神。这个大祭坛是为庆祝奥古斯都在法国与西班牙得胜后带来的和平而建。政府也大力支持学术著作的出版。1935年，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启动了罗马帝国地图绘制的大型项目。考古研究也开展起来，尤其是在利比亚。1911年，意大利征服者们一到的黎波里，就开始了这样的研究。利比亚被描绘成此前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因此按照遗传来说它就是意大利的。

1937—1938年的庆祝活动也是为了纪念1935—1936年对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残酷征服。这次征服让得胜的墨索里尼宣布第二罗马帝国成立。墨索里尼政权通过赞美第一帝国（古典时期的），自我标榜。自吹自擂是墨索里尼特别擅长的手法。吞并与推倒重来是墨索里尼孜孜以求的帝国统治风格。这种风格不同于权力受到限制的意大利君主制与墨索里尼前任首相手中有限的权力。对墨索里尼来说，他的罗马，即“第三罗马”，将成为法西斯主义信仰与活动的中心。

1937年，墨索里尼为考古学展览“罗马奥古斯都展览”揭幕。这是由大众文化部举办，由墨索里尼用专款资助的一项活动。宏大的展览由成组雕像，建筑、工程与军事机器模型，以及帝国的巨幅地图组成。它们都以奥古斯都与古罗马军团为主题。展览会显示了法西斯政权所宣称的意大利复兴的使命，这里也成了官方认可的旅游景点。希特勒两度参观该地。一些电影也是意大利法西斯的政治工具。在电影《阿非利加征服者大西庇阿》（1937年）中，许多士兵充当了临时演员。该片讲述了公元前202年，阿非利加征服者大西庇阿在扎马打败汉尼拔的事迹。这被看作墨索里尼征服阿比西尼亚的前兆。

墨索里尼宣称，“罗马是我们的起点、品格与神话”。为了展示诸如马塞勒斯剧院这样的罗马遗迹，他还亲自参与市中心清理工作。之前，马塞勒斯剧院周围挤满了后来涌现出的建筑物。1926—1932年，人们对剧院展开了挖掘工作。其他地方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1935年，人们在里米尼拆除了由奥古斯都建造的奥古斯都凯旋门周边的后起建筑。

如今，意大利全境内罗马遗迹的范围之广非同凡响。它还包括许多人们不太容易看到，但却更加重要的事物。例如，田制、路线，以及城市、水坝与桥梁。罗马的痕迹也体现在基督教的影响上，这种影响形成于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天主教会位于罗马的事实就完全归因于这一遗产的作用。罗马作为重要朝圣中心的地位也缘于此。在某种意

义上，游客是那些朝圣者的继承人。

第二章　群雄并征的中世纪

对抗与派系斗争的相互作用使积怨备受关注、变得复杂，宿怨不仅继续存在，还愈演愈烈。

虽然拜占庭（东罗马帝国）与“蛮族”觊觎意大利，但罗马人不愿轻易就范，依然试图保持罗马的伟大。说到“蛮族”，488—498年，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打败了另一个“蛮族”奥多亚克，占领意大利本土。随后，他又在493年攻下西西里岛。狄奥多里克尊重罗马遗产，并恢复了古代活动，包括在拉韦纳的传统活动。但是，尽管狄奥多里克的王国实力雄厚，但也未能长存。

535—555年，拜占庭人在查士丁尼一世皇帝（527—565年在位）与他那才华横溢的将军贝利萨留的率领下，攻下意大利本土大部分地区、西西里岛与撒丁岛（以及西班牙东南部与突尼斯）。在一系列绝妙的战役中，汪达尔人就是其中被挫败的一群人。554年，拜占庭人也打败了侵略意大利的法兰克人。但是，拜占庭人未能占领意大利剩下的地区。这开启了一种模式，即任何国家都无法拓展并加强自己对意大利全境的控制。该模式一直持续到1870年才被意大利王国打破，当时它控制了罗马。7世纪60年代，君士坦丁二世曾短暂地将拜占庭政权的首都迁至西西里岛的锡拉库扎。但是，君士坦丁二世遇刺后，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又被迁回拜占庭。

反过来，568年，新兴“蛮族”伦巴第人越过阿尔卑斯山脉来犯。751年，他们已蹂躏了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当时，伦巴第人占领了拜占庭政权的一个中心拉韦纳。但是，再一次地，伦巴第人未完成控制整个意大利半岛的艰巨任务。伦巴第国王的大本营在意大利北部的帕维亚，他只对意大利中部的斯波莱托与南部的贝内文托的伦巴第公国行使着有限的权力。即便在伦巴第人一路高歌猛进之后，西西里岛与半岛最南端（卡拉布里亚与阿普利亚南部）仍处于拜占庭的统治之下。

654年，伦巴第人皈依了基督教。通过这种改变信仰的方式，罗马世界在某些方面的影响得以保持并且加强。

753—756年，在丕平的带领下，法兰克人击败伦巴第人。773—774年，查理曼大帝再次挫败伦巴第人，而且伦巴第人在这次失败后更加一蹶不振。800年，查理曼大帝让教皇利奥三世为他举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加冕仪式。这对他所宣称的继承权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它恢复了在476年时戛然而止的一项传统。意大利的形象得以重建，但这是在外来势力的要求下，遵照异族条件展开的工作。罗马及尽可能多的意大利地区将与法兰克帝国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帝国的真正中心是查理曼大帝的首都艾克斯拉沙佩勒（亚琛）而非罗马。

加冕仪式不仅对法兰克人来说至关重要，对教皇也意义重大。此举确立、展示并提升了教皇作为教会元首的权威。这种权威一再与拜占庭及西派教会的其他高级教士相抗衡。但是，从长远来看，旨在统一教会的教皇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意大利政治权威与权力的分裂。

这种情况本来也许能够带来某种程度的稳定，但查理曼大帝的子孙们自817年起就开始把法兰克帝国搞得四分五裂了。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归查理曼大帝的长子洛泰尔一世所有，成了中法兰克王国。但是，中法兰克王国又分裂了，随后出现了意大利王国。951年，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将查理曼大帝三处遗产中的两处，即德意志王国与意大利王国，再度统一起来。但是，意大利实际上分裂了。因为南方出现了独立国家，尤其是贝内文托、卡普亚、萨勒诺与教皇国。包括阿普利亚、卡拉布里亚与那不勒斯在内的南部大部分地区均处于拜占庭的控制之下，而在827—965年间摩尔人攻克了西西里岛，使它与南方这些地区分离开来。

阿拉伯人征服西西里岛

826—827年，西西里岛内斗，阿拉伯人趁机介入。拜占庭海

军指挥官尤菲米厄斯起义反抗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自立为王。此举遭到一些地区总督的抵制，结果导致尤菲米厄斯向阿拉伯人求援。接着，阿拉伯人就实行了接管。831年，他们占领了巴勒莫后在那里定都，从而取代了锡拉库扎。巴勒莫作为拜占庭帝国的首都直到878年才陷落。902年，陶尔米勒沦陷。965年，靠近墨西拿的最后的拜占庭阵地也失守了。阿拉伯人把柑橘类水果、大米与桑葚带到了西西里岛，并让奴隶在那里种植甘蔗。大量来自北非与西班牙的阿拉伯移民带来一个新的社会、政治精英阶层。但是，这些移民很快就把自己看作西西里人了，而且急于反抗来自北非的命令。许多土著居民改信伊斯兰教，拜占庭文化的一些元素也保留了下来。这里成了一个信奉伊斯兰教、讲阿拉伯语社会的一部分。10世纪末是一段繁荣昌盛、独立自主的时期。但是，种族纠纷，尤其是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新移民与其他人之间的矛盾，以及11世纪的政治分裂为诺曼人的成功干预铺平了道路。

我们无从得知，如果意大利更加统一的话，是否就更有可能抵御摩尔人的进攻。但是，前提是大国能很容易被调动起来，但这又是不可能的。摩尔人在其他地方也有斩获，尤其是在841—871年获得阿普利亚的巴里港，并突袭了意大利海岸线沿岸大部分地区，包括846年对罗马发动的突然攻击。但是，849年，一支伊斯兰大型舰队完败于由那不勒斯、萨勒诺、阿马尔菲、索伦托与加埃塔城组成的联合舰队。在那次胜利后，凡是在意大利建立起来的伊斯兰定居地都处于拜占庭的控制下。后面的这些胜利是最接近于北非摩尔政权的存在，而拜占庭本身不得不集中精力去应对帝国核心区域内的重重挑战。因此，拜占庭帝国的意大利领地就易受到攻击。

由于摩尔社会依赖奴隶制，劫掠奴隶在当时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威胁导致意大利定居地的位置不在沿海平原地带，而像在西西里岛的定居地一样，位于高地之上。那里更易于防守，而且从高地上可以清晰观察到海上的情况。但是，需要在此提出的是，我们应注意到这

种选址背后的原因也许有很多。预防沿海低地多发的各种疾病，如疟疾，也是一个因素。在海岸线上的水体也可能是半咸水。摩尔人是当时的主要威胁。但是，860年，维京掠夺者洗劫了比萨。

5世纪，社会动荡不安，导致意大利许多地方的城市生活分崩离析。但是，一些城市却保全了下来，尤其是罗马、那不勒斯与拉韦纳。在某些地方，社会出现了大发展，尤其是在阿马尔菲。那里有个地方相对不易受到陆路进攻，后来还发展成了重要的海事共和国，在地中海地区势力范围广泛。威尼斯紧随其后。在所有定居地内，教会规定影响了建筑环境。

更普遍地，继5世纪明显的衰落与随后诸多问题的出现之后，城乡均出现人口增长。在很大程度上，社会在早期的衰落与中断后再度焕发生机，尤其是在10—13世纪的复兴。人们建立了修道院。但是，不幸之处同样存在，尤其是农业重振导致更多的森林遭到砍伐，并由此加重了水土流失。

人们在总结“黑暗时代”（中世纪早期）及随后时期的重大发展时，均会捕捉到当时人们想要成大事的追求与地区及当地党派意识间的相互作用。当时，人们对伟大的追求包含着想在更大的统一体内实现团结的愿望。教皇与基督教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更大统一体的存在。但是，从政治层面上来说，意大利因为处在敌对政治体制的断层线上而苦不堪言。这是意大利地理的一方面，而且更具积极意义的是，它也为意大利提供了与其他文明互联互通所带来的种种经济利益与文化优势。意大利北部总是关注着阿尔卑斯山脉的另一侧，又或者说它被阿尔卑斯山脉另一端的人们所窥视着。这在描绘神圣罗马帝国诸皇帝与意大利北部的关系时尤为恰当，尤其是维罗纳的马奇（地区）。作为重要路线的帝国商路穿过了布伦纳山口。相反，西西里与阿普利亚朝着不同方向延伸得很远。西西里既向附近的北非伸展，又向东靠近希腊，而阿普利亚则向希腊发展着。威尼斯与拜占庭隔亚得里亚海相望，它也向北方、西方延伸。

意大利南部

11世纪，诺曼人作为一股新势力来到意大利。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蛮族”入侵的最终阶段，因为诺曼人是维京人的后代，而维京人自911年起就在法国北部的诺曼底定居了下来。起先是一小群一小群的冒险家在意大利作为职业军人为南方连绵不断的战事出力，因此地位变得重要起来。后来，他们夺取了权力。1058年，阿韦尔萨的理查德顺利成为卡普亚王子。最强悍的要数罗伯特·吉斯卡尔（约1051—1085年），他在家中12个儿子中排行第六。吉斯卡尔的父亲是贫穷的诺曼贵族唐克雷德·欧特维尔。欧特维尔家族中有8个儿子都在意大利南部寻找发财机会。正如皮埃蒙特在19世纪50年代所做的那样，还有就是墨索里尼未能成功做到的那样，诺曼人利用其他大国间的斗争坐收渔利，尤其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教皇与拜占庭之间的矛盾。他们都施展手腕、互相倾轧。1059年，教皇尼古拉二世认可吉斯卡尔为阿普利亚公爵，以换取诺曼人与其一致对抗罗马贵族的允诺。当时，尤其是那些有着改革倾向的教皇都在试图摆脱罗马贵族的控制。1060年，吉斯卡尔将拜占庭人赶出了卡拉布里亚。1071年，尽管拜占庭人有威尼斯的支持，吉斯卡尔仍攻克了巴里与布林迪西。这两座城市是拜占庭在意大利残余势力的中心。1077年，萨勒诺的伦巴第公国也失守了。1081年，吉斯卡尔越过亚得里亚海，却在准备攻打君士坦丁堡时去世了。

1038年，拜占庭人征募诺曼人为雇佣兵，试图从摩尔人手中夺回西西里岛，结果失败了。最终，罗伯特·吉斯卡尔的季弟罗杰一世重新占领了穆斯林统治下的西西里。1072年，巴勒莫被攻克。1091年，罗杰完成了对全岛的征服。他的儿子是西西里国王罗杰二世（1105—1154年在位）。罗杰二世在堂弟威廉1127年去世时，掌握了阿普利亚公国的统治权。后来，罗杰二世又继续统一了整个意大利南部。1130年，他利用教皇权力分裂的大好时机，与两位相互竞争教皇宝座中的一位达成协议，获允建立新王国。接着，他在1130年圣诞节那天

被加冕为西西里国王。这是一次诺曼征服。尽管耗时更久，但却丝毫不逊色于1066年征服者威廉对英格兰的诺曼征服。

罗杰的例子说明，在巩固政权时，长期存在着种种问题。但是，罗杰在确立自己的地位时，面临着新王国内部及外部更广泛的极力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此前曾宣称对意大利的所有权，拒绝认可新王国，并在1137年举兵入侵。教皇也反对罗杰的做法，因为之前在1130年为罗杰加冕的教皇阿纳克莱图斯二世后来在教权分裂斗争中失败了。阿纳克莱图斯的行为旋即被他获胜的对手认定为非法。战火在意大利南方持续到1139年，其中的重要事件包括罗杰攻克卡普亚（1134年）、那不勒斯（1138年）与巴里（1139年）。

西西里岛与意大利南部同外界有着明显的文化交流。两地具有深厚的摩尔、拜占庭与北欧特征。这种富有成效的交流见于巴勒莫的建筑与宫廷中，也存在于诸如地图绘制这样的脑力劳动中。罗杰定都巴勒莫。因为与锡拉库扎相比，从巴勒莫更易由海路抵达那不勒斯，而且，罗杰也将西西里治理得特别好。

《罗杰之书》

穆罕默德·伊德里希世界地图是伊斯兰地图绘制史上的卓越成就，它彰显了西西里的国际性。这幅为罗杰二世绘制的地图完工于1154年，被雕刻在一块银碑文上，最终在1160年被毁。穆罕默德·伊德里希也创作了一本地理纲要《远方乐游之书》，它又名《罗杰之书》。这本书中有一幅世界地图与70幅分区地图。他解释说，罗杰希望“能准确知道自己领土的细枝末节，并掌握这些确凿知识”。穆罕默德·伊德里希利用了托勒密的资料。

诸王国的政治斗争

在更北的地方，意大利因为德国神圣罗马帝国与教皇间旷日持久的激烈权力斗争而深受其害。从理论上说，二者本应团结一致、相辅相成，事实上，意大利权力政治分歧严重，意识形态矛盾突出。分歧与矛盾集中在对最高权力的争夺上。教皇自诩为西方基督教王国的主要组织者与未来协调人，而且是高于拜占庭教会的存在。

在叙任权斗争中，野心勃勃、意志坚定的教皇格列高利七世（1073—1085年在位）联合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1084—1106年在位）的对手们，削弱了皇权。亨利被迫表示忏悔，并在1077年亲往卡诺萨请求宽恕。这是历史上著名的一幕，尽管它最终只暂时结束了持续不断的争端。教皇获得了来自大部分群居团体（城镇）的支持，而皇帝们往往得到了贵族阶层的支持，他们也会支持自己选择的对立教皇。有时，米兰作家会直接诉诸罗马共和国的历史，以反对德意志帝国的装腔作势。

但是，反过来，教皇们在教会与地方上都有许多对手。这种斗争与上述意大利南部的斗争同时发生。它提醒我们注意，意大利历史具有同时性。教皇向罗伯特·吉斯卡尔寻求支持。1084年，吉斯卡尔在亨利围攻罗马时去解救教皇。但是，他的军队接着洗劫了这座城市。教皇格列高利被逐出罗马，并于1085年5月在流亡中死在萨勒诺。

对抗继续着，城市因此四分五裂，并与固有的派系斗争交织叠加。对抗与派系斗争的相互作用使积怨备受关注、变得复杂，宿怨不仅继续存在，还愈演愈烈。自13世纪初起，当时与后来的这些派系通常被称为归尔甫党（教皇党）与吉伯林党（皇帝党）。但是，这种与皇帝们及其对手们的联系常常是靠不住的。它是皇帝为了赢得外援而做出的尝试，并非当地分歧的诱因。

皇帝们屡次支持对立教皇与教皇争夺权柄。但是，全民的教皇与统一的天主教理念屹立不倒。每次分裂教权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反过来，当皇帝们在与对手你争我夺之际，教皇乘虚而入，在意大利开

疆拓土。不过，他们因此不得不守住自己的疆域。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争端导致意大利在现代国家内部的城堡数量比在边疆地区及其附近多得多，在与英格兰相比时尤为如此。

在意大利北部有另一位皇帝，那就是腓特列一世·巴巴罗萨（1152—1190年在位）。巴巴罗萨致力于在意大利保持并扩大皇权。1176年，伦巴第同盟城市在莱尼亚诺战役中打败了巴巴罗萨。这个联盟建于1167年，包括科莫、贝加莫、诺瓦拉、韦尔切利、米兰、布雷西亚、亚历山德里亚、皮亚琴察、曼图亚、帕尔马、雷吉奥、摩德纳、费拉拉、波洛格纳、伊莫拉与里米尼。巴巴罗萨（绰号意为“红胡子”）被迫在1183年签订的《康斯坦茨和约》中承认这些城市自治，并将它们的自治权作为帝国主权的一部分。这次斗争中也包含着另一场教皇权力的分裂。

1186年，巴巴罗萨的儿子亨利六世皇帝（1191—1197年在位）迎娶了西西里王国的女继承人。由于西西里王国统治着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岛，亨利六世通过联姻确立了自己在该地区的权威。但是，他英年早逝。如果没有这次的死神光临，意大利历史也许会大不一样。这是意大利历史上许多的可能性之一。这种进程持续到现在。

腓特列二世是亨利六世与西西里的康斯坦斯之子。这位天赋异禀的君主炫耀着自己的雄心壮志，当时人们称之为“世界奇迹”。腓特列在意大利南部长大。1198年，他登上王位成为西西里国王，1220年被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试图巩固自己在意大利的皇权，却在1245年被教皇英森诺四世逐出教会并废黜，而且，腓特列也遭到了来自伦巴第同盟城市的反对。在他度过了人生大部分时光的西西里，腓特列血腥镇压了一场始于1189年的穆斯林起义。这次反叛导致西西里岛的内陆山地成了事实上的独立国。那里的人反对基督徒，并向别处的穆斯林列强寻求帮助。1220—1224年、1244—1246年，腓特列先后两次发动了一系列战役，摧毁西西里的穆斯林群体。虽然腓特列在科特努奥瓦（1237年）打败了对手们，但是他在意大利其他地方的对

手们做得要成功得多，其中就包括在1226年再度复兴的伦巴第联盟。在但丁看来，执政期到1250年才结束的腓特列是最后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皇帝，因为他的继任者们从未去意大利在罗马接受过加冕。在第六次十字军东征中，腓特列占领了耶路撒冷，并于1229年在那里为自己加冕。

腓特列醉心人文学科，热爱精神生活。1224年，他成立了那不勒斯大学。这所大学至今仍然沿用他的名字。在腓特列的多数老师中，有一位通晓包括阿拉伯语在内的六国语言的犹太学者。阿拉伯、希腊与犹太学者会聚到他的宫廷中。在建筑领域，腓特列也是一位至关重要的人物。他推动了阿拉伯与希腊科学向意大利以及更广阔的欧洲地区的传播。同时，他发展了早期意大利口头语言及文学。

腓特列的长子康拉德四世（1250—1254年在位）继续着与教皇的斗争，但他儿子康拉丁（1254—1258年在位）西西里国王的王位被腓特列非婚生的次子曼弗雷德（1258—1266年在位）篡夺了。这使教皇亚历山大四世（1254—1261年在位）进一步推进了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在位）发展起来、长期存在的教皇对皇权的反对，宣布王权被剥夺。法裔教皇乌尔班四世（1261—1264年在位）将王位献给了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路易又将王位传给了他的弟弟，即安茹的查理。1266年，法裔教皇克莱芒四世（1265—1268年在位）加冕查理为西西里国王。同年，作为十字军东征的一部分，查理在贝内文托之战中击败了曼弗雷德（曼弗雷德战死）。在塔利亚科佐之战（1268年）中，查理打败了康拉丁，并在那不勒斯将其处决。康拉丁在集市广场上被斩首后，人们把他安葬在了那不勒斯的圣母圣衣圣殿。这次行刑结束了霍亨斯陶芬国在意大利南部的统治，把西西里王国转移到了安茹王族，即安茹统治者们的手中。他们是法国皇室的一个支系。

这次转移的全面影响只持续到1282年。它提醒我们注意，自罗马灭亡后，意大利历史风云诡谲，由此导致的政治巩固工作也是艰巨

的。随后，在所谓的“西西里晚祷起事”中，西西里因为承受着来自安茹的查理所施加的沉重赋税压力而反叛了，并向阿拉贡家族求助。阿拉贡家族就是西班牙东部的统治者们。“西西里晚祷起事”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起义是在晚祷开始时爆发的。阿拉贡国王佩德罗三世成了西西里国王彼德一世。直到那不勒斯的最后一位安茹统治者乔万娜二世去世时，西西里与那不勒斯依然是彼此独立的。1435年，在阿拉贡的统治下，那不勒斯与西西里合并。14世纪，尤其是在1343年那不勒斯国王罗伯特去世后，政治分裂、法纪崩坏，严重损害了意大利本土南方地区的经济。与此同时，阿拉贡人在经历了14世纪的激烈冲突后，征服了撒丁岛。虽然岛上的撒丁人皈依了基督教，但他们依然大批地遭到阿拉贡人的奴役。

在安茹王族的统治下，那不勒斯教堂建筑朝着独特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宽体教堂的建造。其中几座建在老城中，特别是由罗伯特国王修建的圣基亚拉教堂中的方济会修道院。这些教堂是意大利文化交流的证明，而且这种交流也造就了意大利的多样性。在南方，意大利与其他地中海社会的交流尤为明显。其中，意大利与西班牙、法国南部及更加传统的伙伴希腊之间的联系日益增多。

8世纪，法兰克统治者们已将大部分意大利中部地区分封给了教皇。但是，由于诸教皇无军权以行恫吓、保护之实，事实上，他们很难将自己实行有效控制的区域拓展到紧靠罗马的其他地区。亚平宁山脉东侧的土地实际上是独立的。1115年，虔诚的托斯卡纳女伯爵马蒂尔达在去世时遗赠给教皇的土地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尤其是因为皇帝们拒绝承认捐赠的效力。12世纪40年代与50年代初，牧师布雷西亚的阿诺德对教皇的财富与权力表示不满。他试图建立一个新的罗马共和国，结果失败了。1155年，国王腓特列一世·巴巴罗萨下令处决阿诺德，当时教皇与国王达成了短暂的和解。

中世纪早期，教皇国历经浮沉。在精力充沛、野心勃勃的英诺森三世的统治下，教皇国不仅大力改善了教皇的行政管理，还试图实现

领土主张（与意识形态要求）。英诺森的继任者们继续推进这种尝试，由此导致意大利国内政治矛盾激化。由于国王宣布放弃领土并为教皇“诏书”保驾护航，教皇权威扩展到亚得里亚海，并向北触及波河地区。尽管该区域大部分地区仍处于封臣统治之下，教皇们却开始了对自己领土更加有效的组织，建立起由教会牧师管理的省份。教皇执政水平高于大多数地方亲王，但也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例如，756年，法兰克统治者矮子丕平将斯波莱托公国赠予教皇司提反二世。事实上，斯波莱托公国被分裂成许多自治镇。教皇也遭到来自平民主义的反对，包括罗马本身。1347年，柯拉·迪·黎恩济成功煽动罗马市民起义反抗贵族统治。他在遭到驱逐后于1354年卷土重来，结果死于敌方起义。

虽然围绕着波尼法修八世（1294—1303年在位）存在着种种传闻，但是自格列高利七世（1073—1085年在位）以来的大多数中世纪教皇都是相当有德行的，尤其是在性的方面。像第二位波吉亚教皇亚历山大六世（1492—1503年在位）那样堕落就很不应该。为了使他的一众侄子、私生子与其他家族成员渔利，亚历山大授予他们教会职位与领土，并在意大利权力政治中充当他们的保护伞。诸如英诺森四世（1243—1254年在位）一般的教皇们也参与到这种王朝政治之中。英诺森曾创作过大量晦涩难懂的关于教会法规的论述。1244年，他宣布发动第七次十字军东征。

波尼法修八世试图重申教权高于俗权的观点，结果激怒了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1303年，腓力派人将波尼法修绑架了。拿破仑后来也用了这种手段。波尼法修的继任者是法国人克雷芒五世（1305—1314年在位）。1309年，克雷芒迫于腓力四世的压力，将教皇所在地移至阿维尼翁。直到1377年，教皇权力才重新回到罗马。数月后，充满争议的新教皇选举引发了一场极其严重的新教权分裂。这场分裂直到1415年才结束。1307年左右，但丁开始创作《神曲》。在书中，但丁把法国统治者们称为站在娼妇旁的巨人，而娼妇代表着腐败

的教皇。安茹的查理占领了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岛，反法情绪因此泛滥。东西教会大分裂正是基于这种影响而产生的。这类似于17世纪时人们对西班牙的反抗情绪。

另一方面，天主教会修士新教团的成立彰显了教会的精神活力，尤其是亚西西的方济各创办的方济各会（在1210年获得教皇认可）。与此同时，教会利用这种精神活力，展现出巨大的能量。方济各会修士积极履行牧师职责，而不是遵从隐修制度的避世观。后者曾是基督教活动的重要领域，此前意大利在该领域地位显赫。人们从一些著名的本笃会修道院中可以看出端倪。例如，529年，圣本尼迪克特建立的蒙特卡西诺修道院，以及9世纪时米兰的马焦雷修道院。在贝内文托的德西德里乌斯的统治下，蒙特卡西诺修道院度过了“黄金时代”。自1058年起，维克托三世出任蒙特卡西诺修道院院长。1086—1087年，他升任教皇。修道院、大教堂与其他教堂给意大利留下了数量惊人的罗马式建筑。例如，11世纪时布雷西亚与韦尔切利的旧主教座堂（旧教堂）。

在天主教会修士的努力下，新教堂与其他基督教会建筑物在许多城镇拔地而起。例如，1227—1367年，人们在亚西西为圣方济各建造的圣方济各圣殿，还有1261年落成于维琴察的圣冠教堂。圣冠教堂中收藏着一件圣物，即耶稣受难荆棘王冠。这些教堂及其他此类建筑为艺术活动，尤其是壁画与祭坛装饰品，提供了大量空间及巨大资助。当时重要的画家包括契马布埃（约1240—1302年）及其弟子乔托（约1266—1337年）。二人均推动了人形描绘法的发展，尤其是通过引入特征描述与个人特征绘画的方式，正如乔托在1303—1305年创作于帕多瓦的史格罗维尼礼拜堂的多幅壁画所展示的那样。乔托对亚西西教堂的壁画创作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有些大学存在的时间不长，但意大利创办了多所大学，尤其是博洛尼亚大学（1088年）、维琴察大学（1204年）、阿雷佐大学（1215年）、帕多瓦大学（1222年）、那不勒斯大学（1224年）、罗马大学（1245年）、

锡耶纳大学（1240年）、皮亚琴察大学（1248年）与佩鲁贾大学（1308年）：维琴察大学于1209年关闭，而皮亚琴察大学也是短命的。

当时的社会强调，天主教会修士应与世俗信徒团结一致，正如后来对16世纪反宗教改革的强调一样。由虔诚的俗世信徒组成的兄弟会在社会福利领域起了关键的作用。与此同时，这种世俗虔信可能产生如清洁派（阿尔比派异端）一般离经叛道的边缘群体。清洁派通过传教士由法国传入意大利北部。清洁派教堂与学校建立了起来。

意大利北部继续在名义上效忠于帝国。但是，该地区的许多城市，尤其是米兰，长期以来都享有极大的自治权。这由此还导致一些城市建起了共和市镇。这些地方为获得正统性，回溯过去的独立主张，有些主张甚至还导致人们不失时机地捏造史实。

曼托瓦的起源

大约在1307年，但丁·阿利基（1265—1321年）开始创作《神曲》。他在书中描绘了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家乡的起源。这一描述强调了个体起源神话的活力与神秘学的作用。书中写到，女巫曼托在明乔河河谷的一块沼泽地边走边找，在一处无人居住的地方安顿了下来，“最终，四散的人们聚拢在那个镇上。由于四周都是沼泽，镇子安全稳当。在那里，在尸骨之上，他们建起一座城镇”。事实上，不太具有戏剧性的是，这座城市的定居者是公元前10世纪的伊特鲁里亚人。

佛罗伦萨充分体现了国内城市政治与国际权力政治相互作用的结果。1267年，吉伯林党（皇帝党）遭到驱逐。1289年，他们试图推翻这一结果，却又被打败。但丁参与了坎帕尔迪诺战役。归尔甫党取

胜后，在1284年颁布了一部民主宪法。宪法剥夺了佛罗伦萨所有贵族的权力，但是自1296年起这些人通过加入协会重获特权。但丁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在1300年成为政府成员的。同年，佛罗伦萨的归尔甫党分裂成黑白两派，其中一派寻求教皇波尼法修八世的支持。波尼法修劝说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之弟，瓦卢瓦的查理，掌握控制权。1301年，查理代表归尔甫党黑白两派中的一方介入，结果导致但丁在1302年开始逃亡。最终，但丁寄希望于卢森堡伯爵、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七世（1308—1313年在位）。他介入了意大利争端，两位教皇使节在罗马为他举行加冕仪式。亨利围攻佛罗伦萨，但未能拿下这座城市，后来在比萨死于高烧。

但丁在《论帝制》中称，皇帝与教皇均直接听命于上帝，二者各司其职。因此，教皇不应具有世俗权威。这种观点在教皇的批评者中有一些影响，并得到了尼可罗·马基雅维利（1469—1527年）及其友人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1483—1540年）的发展。尤其是，圭恰迪尼在他的《格言集》中宣称，有必要实行完全的政教分离。但是，这种观点直到18世纪末才得到广泛的政治认同，并在19世纪时获得更多支持。但丁在《神曲·炼狱篇》第六章中悲叹意大利的境遇：

啊，为奴的意大利，悲痛之屋，
暴风雨中没有领航员的船只，
不是诸省女王——而是一家妓院！
……如今战乱让你的人民永无宁日，
虽然生活在一墙之内……
同胞自相残杀，
啊，本应虔敬奉主
让皇帝坐在马鞍上的神职人员，
如果你们听从上帝的指示！
看这牲口如今已变得多么不驯，
因无马刺让它走上正轨，

因你们将马勒紧握手中。

虽然佛罗伦萨仍是共和国，但是在13世纪末，许多其他城市已处于领主家族的控制之下。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内部派系分裂与由此产生的实行更强有力统治的需要共同造成的。为了实行更强有力的统治，人们会赋予一位领导人更大的权力。或者，某人会夺权并使自己的权力世代沿袭下去。例如，自1263年起统治维罗纳城的戴拉·史卡拉家族在14世纪中叶达到权力顶峰。坎格兰德一世·戴拉·史卡拉（1308—1329年在位）不断扩张家族势力，直到他们与维斯孔蒂家族一道，共同统治伦巴第地区为止。他是但丁、乔托与彼特拉克的赞助人。马斯蒂诺二世·戴拉·史卡拉（1329—1351年在位）将家族的控制权扩张到了卢卡，后来又包括帕尔马。但是，马斯蒂诺毁灭性地透支了自己的资源，并最终导致家族在1387年垮台。

对维斯孔蒂家族而言，米兰大主教奥东·维斯孔蒂（1295年逝世）为家族势力打下了基础。自1395年起，维斯孔蒂家族就是世袭的米兰公爵了。阿佐·德·埃斯特（1205—1264年）在费拉拉确立了埃斯特家族的权威。费拉拉的统治者职位在家族中世代相传。埃斯特家族兼并了摩德纳与雷吉欧（1406年）。1328年，贡扎加家族在曼托瓦夺权。那里的总督宫与圣安德烈教堂都是贡扎加家族实力与财富的象征。1472年，卢多维科二世·贡扎加为存放一件金制圣器，委托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建造了圣安德烈教堂。据说，这件金器内盛放着浸染了耶稣鲜血的土壤。

与亲王们的统治一道，其他城市的管理也是个问题。因此，14世纪初，锡耶纳接管了位于托斯卡纳南部的采矿中心，即马萨马里蒂马。到目前为止，威尼斯还未开始在意大利大陆或者说陆地上的扩张。相反，威尼斯致力于拓展位于现代克罗地亚的达尔马提亚海岸地区的领土。人们今天依然可以看到威尼斯对那里及爱琴海地区的影响。1204年，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威尼斯猛攻君士坦丁堡，由此导致拜占庭权力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威尼斯在爱琴海地区的胜利极

大地得益于由它造成的这次拜占庭权力危机。1203年，因为十字军没有足够的钱付给威尼斯，让威尼斯带领他们前往圣地，威尼斯人就让十字军先攻下了达尔马提亚的扎拉港口，接着攻击君士坦丁堡。威尼斯人控制了拜占庭帝国的重要阵地，并于1212年占领了克里特岛。这些战役展示出威尼斯在开展复杂联合军事行动时的专业知识与能力。

直到1339年，威尼斯才改变了在陆地兼并特雷维索尔市的政策。热那亚人与威尼斯人为争夺海上霸权，先后引发了四场战争。这一系列的战争始于1253年，终于1378—1381年的基奥贾战争。运载着弩手的划桨帆船已经取代了13世纪初意大利战舰中那些装备着斜挂大三角帆的船只。突袭、攻占港口和群岛，以及有效运用划桨帆船长途跋涉使这些战争发生了本质性变化，成了一系列联合军事行动。热那亚人为了封锁威尼斯，并以饥饿迫使那里的人投降，在战斗中展现出非凡的勇气。他们在威尼斯核心地区正前方，攻占了与威尼斯对望的群岛，即基奥贾岛。如此一来，热那亚人在潟湖地区的严密封锁中就能为自己的划桨帆船提供给养了。他们也与从东面攻击威尼斯的帕多瓦陆军展开紧密合作。

对此，威尼斯以周密计划与完美执行的结合作为回应。在夜幕的掩护下，装满石头的海船完全封锁了连通基奥贾与亚得里亚海的三条航道。威尼斯划桨帆船与来自大陆的部队声东击西，攻击布伦多拉，旨在从南面保卫基奥贾。结果，卫戍部队孤立无援，最终被迫投降。因此，威尼斯人把热那亚人赶出了亚得里亚海北部地区，而那里是威尼斯向意大利本土扩张的基地。由于热那亚人试图切断从西西里岛向威尼斯的粮食供给，这场冲突显示出后勤及金钱的重要性：热那亚有经济实力继续建造、更换划桨帆船，收买扮演着重要角色的雇佣兵。

意大利北方支离破碎的权力结构与南方（在理论上）更加稳固的状况形成了对比。在北方，“政府”在本质上是控制着周边农村的一座城市或城市群。通常而言，城市管理得到了地方名人的帮助。相反，12—13世纪，在意大利南方地区，统治西西里岛与那不勒斯的王国在

统治范围、权力和结构方面能与欧洲其他地方的发达国家相媲美，例如，法兰西与英格兰。但是，鉴于14世纪英格兰的统治者们在全国范围内展示自己的权威、行使权力，法兰西统治者们的权力受到了挑战。竞争尤其来自但不仅限于勃艮第公爵们及英格兰统治者们的领土主张。相似地，在1282年西西里王国分裂后，那不勒斯王国的本土管理问题日益严重。

在发生于阿维尼翁的教皇“巴比伦之囚”时期，教皇国内的教皇权威与权力遭到极大破坏。然而，英诺森六世（1352—1362年在位）任命精力充沛的吉尔·艾瓦雷兹·卡利罗·德·阿尔沃诺斯为托莱多大主教、枢机主教、教皇使节与意大利代理主教。

14世纪五六十年代，阿尔沃诺斯极大地恢复了教皇权威。1354—1357年，他降服了维泰博大公乔万尼·德·维科、米里尼统治者加莱奥托·马拉泰斯塔、乌尔比诺的蒙特费尔特罗家族、拉韦纳的波伦塔家族、法恩扎的乔万尼·曼弗雷迪，并降服了安科纳市，而且，阿尔沃诺斯也控制着教皇国的行政机构。14世纪60年代，阿尔沃诺斯掌握了博洛尼亚的控制权。但是，他发现要想镇压雇佣兵是件十分困难的事。1366—1367年，阿尔沃诺斯遭遇了坎帕尼亚反叛。

直到教皇马丁五世（1417—1431年）统治时期，教皇国的教皇权威才真正恢复。这位科隆纳家族成员的当选终止了东西教会大分裂。当他成为教皇时，教皇权威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罗马及其周边地区，而“教区牧师”作为事实上的世袭贵族则控制着教皇国大部分地区。1424年，马丁凭借那不勒斯的支持，打败了控制着翁布里亚的雇佣军指挥官布拉乔·达·蒙托内。同年，马丁取得了博洛尼亚的控制权。

意大利北方最强大的国家是在维斯孔蒂家族统治下的米兰，而维斯孔蒂家族中最精悍的人要数吉安·加莱亚佐·维斯孔蒂（1351—1402年）了。1378年，他继承了父亲加莱亚佐二世的王位，并与叔叔贝尔

纳博共同管理着米兰。但是，1385年，他派人把贝尔纳博抓了起来，自己成了唯一的统治者，次年，贝尔纳博遇害。这样的所作所为让意大利国内外都为之哗然，众人知道意大利政坛上出现了一位骇人听闻的人物。

随后，意志坚定、凶残暴虐的吉安·加莱亚佐迅速扩大了他继承来的领土，尤其是通过占领维罗纳与帕多瓦的方式。这也使他成了意大利东北部地区最强大的统治者。维斯孔蒂家族在吞并锡耶纳后，势力范围扩展到了托斯卡纳。他们利用亚平宁山脉以东地区教皇势力的薄弱，暂时占领了博洛尼亚。1387年，吉安·加莱亚佐开始建造米兰大教堂。这座哥特式风格的大型建筑使用了大量大理石，直到1892年才落成。随后，它在1960—1989年又经过修复与加固。1396年，吉安·加莱亚佐开始建造一座陵墓与私人礼拜堂，即切尔托萨（查特豪斯）——迪帕杜拉。但是，这座建筑直到16世纪才完工。因此，它也就显示出向文艺复兴风格的转变。吉安·加莱亚佐在推动永久性外交官体制的建立与发展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一体制得到早期的外交部，也就是衡平法院的大力支持。意大利将在现代外交发展史上扮演重要角色。1395年，吉安·加莱亚佐从皇帝手中购得米兰公爵的称号，巩固了维斯孔蒂家族的势力。但是，权势实质上来自他集结起来的一支大部队。吉安·加莱亚佐自比为尤利乌斯·恺撒，但他的对手们觉得他是个像尼禄一样的暴君。正如通常的情况那般，罗马世界为人们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

社会发展的连续性

与统治者起起浮浮、城市兴衰荣枯同时发生的，是社会在技术限制不断的世界中运行时的连续性。在本章提及的数百年间，经济进程发展缓慢。建筑物自始至终都得到了利用，而且通常是重复使用。7世纪时建造的锡拉库扎大教堂是建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娜神庙基础上的。1281年，马丁四世曾在奥尔维耶托的圣安德烈教堂被册封为教

皇。这座7世纪教堂的原址是一座罗马神庙，而罗马神庙的墙壁又是由伊特鲁里亚人堆砌的。12世纪，人们重建了圣安德烈教堂；15世纪末、20世纪20年代，这里又经历了扩建。

此外，主流意识形态的力量与延续使艺术家们探讨着相同的话题。1336—1341年，博纳米科·布法马可在比萨墓园创作了湿壁画《死亡的胜利》《最后的审判》与《地狱》。人们常常在其他地方借用这些作品中的故事。

与连续性同时存在的是变化。商业贸易拓展到整个地中海及地中海以外的地区。随后，由于以纺织业与冶金业为代表的地方产业的发展，意大利北方成了中世纪晚期欧洲最先进的经济区。相比之下，意大利南方停滞不前，日益成为北方城市的粮食、原材料产地，尤其是热那亚与威尼斯。这导致南方对外贸易受到控制。此外，某些城市内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正如这些城市的相对地位一般。

在各个城市寻求优势的过程中，地缘政治、环境、矛盾与特性相互作用。例如，本来在12世纪时并非处在最前沿的佛罗伦萨在13世纪时形成了重要优势：人口增长与商业、制造业及银行业的重要发展相互作用。到1300年时，佛罗伦萨的人口也许已达到12万。因此，它与热那亚、米兰、威尼斯一道，成了意大利人口最多的四大城市。但是，黑死病（鼠疫）在1347—1348年来袭，此后还周期性复现。这给意大利造成了沉重打击。1348年，近60%的佛罗伦萨人成为瘟疫的受害者。反过来，由于瘟疫给邻近的圣吉米尼亚诺镇居民及该镇经济带来重击，佛罗伦萨在1353年接管了那里。

第三章　文艺复兴与权力政治

这个时期的意大利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文艺复兴了。它确实让人印象深刻，因为它有力地证明，人有能力构想出一个新世界，并向着这一愿景前进。

佛罗伦萨孤儿院的主题是艺术服务于道德世界。这座弃儿（被抛弃的儿童）医院创办于1445年。它的资金来源于富商弗朗西斯科·迪·马可·塔提尼的遗赠与佛罗伦萨丝绸行会的支持。1419年，由建筑师菲利波·布鲁内列设计的佛罗伦萨孤儿院破土动工。布鲁内列也建造了佛罗伦萨大教堂那气势恢宏的穹顶。建筑师旨在通过孤儿院的柱廊表现出对即将在佛罗伦萨开始新生活的孩子们的欢迎。它与建筑物中委托创作的艺术品一道，给人带来满怀希望的愿景。然而，每一个被放在那里接受照料的孩子象征着失败、苦难，以及个人、家族与社会的耻辱。

敌对国家

以佛罗伦萨与威尼斯为首的周边城邦担心维斯孔蒂家族的扩张。1402年，当吉安·加莱亚佐·维斯孔蒂意外去世时，佛罗伦萨与威尼斯趁机侵占米兰，扩大自己的地盘。但是，像比萨与锡耶纳这样在14世纪作为独立共和国幸存下来的较小城邦，日益感到无力自保。它们需要强有力的保护者来捍卫自己的地位。

维斯孔蒂家族势力衰落的主要受益城市是威尼斯。它向意大利本土扩张，推翻了帕多瓦的德·卡拉拉家族，占领了贝卢诺（1404年）、维琴察（1404年）、帕多瓦（1405年）与维罗纳（1405年）。1420年，弗留利与乌迪内也紧随其后。威尼斯在另一次侵略战中拿下了布雷西亚，其中包括在1426年占领了加尔达湖上麦格尼菲尔帕特里亚的34个市镇，1428年攻克贝加莫。威尼斯统治精英未能就是否值得为了这些领土而参战的问题达成共识。但是，到头来，扩张派获胜。起先，佛罗伦萨与罗马对这种扩张持欢迎态度，因为这是限制米兰势力的一种方式。1441年，威尼斯吞并了拉韦纳。但是，在经历了动乱不安的统治后，威尼斯在1509年又失去了拉韦纳。这些占领地给威尼斯带来了包括铁、羊毛生产在内的经济利益与繁荣昌盛，同

时也产生了新的行政职责。贵族阶级管理着威尼斯诸省。

吉安·加莱亚佐·维斯孔蒂的儿子菲利波·玛利亚·维斯孔蒂（1412—1447年在位）恢复了米兰的势力，而且，菲利波的女婿、雇佣兵指挥官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1450—1466年在位）利用自己的军事实力，在伦巴第自立为王，建立起斯福尔扎王朝。与威尼斯联手的斯福尔扎为攫取权力，镇压了短命的安布罗西亚共和国。作为一位卓有成效的统治者，斯福尔扎也控制了热那亚，尽管这并非永久性占有。

在更往南的地方，佛罗伦萨向托斯卡纳进行势力扩张，占领了阿雷佐（1384年）。吉安·加莱亚佐·维斯孔蒂去世后，佛罗伦萨兼并了一度强大独立的比萨共和国（1406年）。彼时，比萨已不再是能与热那亚抗衡的主要海上强国了，尤其是因为亚诺河河道的泥沙淤积。但是，1429年，卢卡击退了佛罗伦萨的进攻，在保罗·圭尼吉亲王的短暂插曲后，保住了那里作为中世纪城邦的地位。

在许多城市内部，由于人们追求各自的派系、政治利益，矛盾丛生。与此同时，情况因城而异，部分原因是城市政治状况不同。威尼斯的控制遏制了维罗纳的暴力冲突，但暴力事件在博洛尼亚频频发生，而佛罗伦萨则居于二者之间。

文艺复兴

与此同时，这个阶段也是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运动对欧洲乃至世界文化都至关重要。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前基督教古典时期思想家、艺术家与作家的成就产生了更加深厚的兴趣，也加深了对它们的了解。数百年间，在西方基督教王国内，教育基本上囿于修道院内，而且主要涉及一些神学问题。人们的智力劳动集中在宗教教义上，绘画、建筑与音乐也主要服务于教会。这种情况持续到文艺复兴时期。但是，教育与艺术也更多地参与到了世俗事务中，并与世俗赞

助人有关。

自13世纪起，尤其随着城市里中等教团财务状况的改善，富人能够为自己的子女，尤其是儿子们，寻求更好的教育机会。教育相当重要。维多里诺·达·费尔特雷（1378—1446年）是一位关键人物。他出身于贝卢诺一户穷苦人家，后来成了伟大的人文主义者，而且，维多里诺也许是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教育家。他受教并执教于帕多瓦。后来，维多里诺移居曼托瓦，在那里创办了一所学校。学校因拥有轻松愉快的氛围被称为“快乐之家”。维多里诺在学校里不仅教授贡扎加家族儿童及其他名门望族的子女，还免费为许多穷孩子提供教育机会，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学校教授希腊语、拉丁文、数学、音乐、艺术、宗教、诗歌与哲学，取消体罚，并特别强调体育活动的重要性。这所学校成为欧洲境内许多其他学校的重要典范。

教育与财富使新兴中产阶级开始雇用艺术家们来装点自己的居所，也有一些中产阶级喜欢花时间阅读、讨论文化话题。数学举足轻重，因为它有助于改进审计工作。复式簿记在意大利兴起。

文学，包括哲学在内，对文艺复兴的“黄金时光”也至关重要。这种活动与教育并未忽视拉丁语，但比过去更依赖于意大利语。与此同时，艺术资助使学者们得以拓展在修道院图书馆内的研究。他们在那里聚焦于拉丁及希腊文本。在此之前，那些都是被人忽视的内容。

自14世纪起，一群意大利学者在诗人彼特拉克的启发下，提出基于古典文学修订新教育大纲的观点。他们称之为“人文学”。这个教育大纲将包括五门重要学科：修辞学、诗歌、语法、历史与伦理学。尽管人文主义者（后来在19世纪时人们对这些学者的称呼）没有激进到拒斥基督教教义的地步，但是神学不在其中。相反，他们将争论的重点从人们如何侍奉上帝转到了品行高尚的人要如何行事上。人文主义成了一场传播更广的文化实践与文化事业。

文艺复兴时期，艺术活动百花齐放。拉斐尔、米开朗基罗与列奥纳多·达·芬奇这些重要人物时至今日依然声名显赫。一个更广大的群体此前将整套重要技能推向前进，他们的成就为文艺复兴美术三杰打下了基础。例如，这可见于人们对透视法的理解与展现，尤其是马萨乔在佛罗伦萨圣母圣衣圣殿中创作的湿壁画（约1425—1428年）上。还有就是人们对人体的描绘，正如多纳泰罗的雕塑作品一般，尤其是他的《圣乔治像》（约1416—1417年）与《大卫》（约1440—1450年）。这两件作品均收藏于佛罗伦萨的巴杰罗美术馆内。建筑也受到了古代的影响，恰如菲利波·布鲁内列斯基为佛罗伦萨大教堂设计的穹顶一般。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穹顶建于1420—1436年，它构成了城市独特的天际线。

文化创造力在许多不同背景下崭露头角，在威尼斯、罗马与佛罗伦萨尤为重要。15世纪，佛罗伦萨的文化创造力尤为引人注目，正如洛伦佐·吉贝尔蒂为洗礼堂设计的铜门所展现的那样。相比之下，16世纪，罗马与威尼斯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尤其是罗马有拉斐尔与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威尼斯有乔尔乔内、提香与丁托列托的杰作。这些人只是许许多多画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而已。

现实背景的重要性有助于造就文艺复兴的多样性，并为其注入活力。佛罗伦萨历史学家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认为，由意大利地区划分带来的多样性与竞争造就了人们的高超技艺。这些分区当然有利于独立，尤其是对一些城市而言，而且，它也为意大利独特城市文化的产生创造了机会。与此同时，城市事实上竞争激烈、高度政治化。到头来，一些结果更有利于艺术成就的取得与智力活动的开展。尤其是，在许多城市里，精英阶层将自己包装成贵族阶级的尝试，事实表明是重要的。

无论是共和制还是宫廷式的城市，都不是艺术活动展开的唯一场所。那不勒斯君主政体下的意大利及意大利南方也同样重要，还有农村与领主地区的赞助人。人们需要针对这些问题展开更多研究。当时

流传下来的一件与众不同的艺术遗产是保拉圣方济教堂。保拉就是这座教堂的所在地，毫无吸引力的布里亚的保拉镇的名字：这位15世纪的圣人建造了这座教堂，用壁画诉说着自己创造的奇迹。

文艺复兴思想既试图理解新（以及复兴的）信息，又想将它系统化，以提供一种能够用于理解、阐释知识的自然哲学。文艺复兴提出了善政的典范，尽管它也展示出不留情面的实用主义，尤其是佛罗伦萨人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1532年）中提出的观点。这部指导人们夺权的指南有些部分写得尖刻、嘲讽而富有洞见。新旧思想并存、相互碰撞，正如人们对科学与占星术的理解一样，尤其是所谓的天体周期运行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这个话题在当时备受关注。

合理解释世界的尝试事实是通过人们对自然界及基督教的研究来促进这两方面的互相理解的。这个目标旨在保障和谐的社会关系，从而带来和平、实现神圣目标。这个目标将脑力劳动与宗教联系在一起，使炼金术与魔法相连。和谐是秩序的对应物。人们认为和谐的本质是善，和谐也是实现善的一种方式。在《地理学七日》（1482年）中，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弗朗切斯科·伯林吉耶里写了一首诗描述世界，并以26幅雕版地图加以说明。他沿用了托勒密在公元2世纪时创作的《地理学指南》中的秩序，也提供了自认为合适的道德规范。他从但丁的《神曲》中汲取灵感，向人们传播基督教道德观。

艺术是其中的一部分。在透视法的发展史上，人们用数学来理顺空间关系。绘画中更准确的精度是显示上帝的安排与人类领域的一部分。艺术家也是数学家，这在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1404—1472年）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伯林吉耶里则为人们提供了佛罗伦萨城内部地理特征的透视图。城市景观反映出人文主义知识的运用，反映出美化后的佛罗伦萨作为新文化先驱的地位，反映出旧城市共和国的复兴，尤其是威尼斯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文艺复兴时期的统治者、建筑师与艺术家们关心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图画从视觉上捕捉整座城市，能够且应该通过新建筑工程改造全城。透视法让人们再度

对远景及与之相关的和谐布局产生兴趣。在文艺复兴时期，乌尔比诺是主要绘画中心之一。当时，那里的人们对创作出形式完美、比例协调且完整统一的实物兴趣深厚。这种兴趣体现在他们对理想化城市的痴迷上，也许其中最著名的要数用透视法描绘的虚拟城市景观了。人们通常认为，这件作品出自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卡之手（约1400—1492年）。

也有人试图建造这样的城市景观：15世纪末，比亚乔·罗塞蒂在费拉拉设计了《埃尔科莱新区》。这是最早明显基于透视法创作的城市设计图之一。罗塞蒂试图在人文主义原则与城市建造需要之间实行平衡。人文主义原则与建筑的外形与体积有关，而建造秩序井然的城市需要综合考虑空地、地方习俗等因素。1459—1462年，埃内亚·皮科洛米尼（后来的教皇庇护二世）下令按照贝尔纳多·罗塞利诺的设计，重建皮恩扎的托斯卡纳村庄。罗塞利诺就采纳了阿尔伯蒂的想法。与贡扎加家族关系密切的萨比奥内塔就是16世纪时基于人文主义原则建造的理想城的典范。韦斯帕夏诺·贡扎加从无到有地建起了萨比奥内塔，旨在将其打造成艺术与文化的新型古典城市。

可以理解的是，这个时期的意大利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文艺复兴了。它确实让人印象深刻，因为它有力地证明，人有能力构想出一个新世界，并向着这一愿景前进。人类具有可塑性，甚至于对一些人来说，人类的可完善性仿佛是一种希望。

然而，正如17世纪“黄金时代的荷兰”一样，这只是社会某一部分的文化。特别需要指出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艺术赞助是奢侈品经济的一部分。它服务于王侯、教会及城市精英。文化展示是彰显政治、社会地位的方式。自15世纪中叶起，这种功能随着市民与公共艺术的衰退，变得日益重要起来。尽管市民与公共艺术在威尼斯依然重要，尽管教会提供了另一种形式的公共艺术，但是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充分利用文化彰显了自身的显赫地位。

许多其他城市也值得关注，包括贡扎加家族统治下的曼托瓦，尤其是在弗朗切斯科·贡扎加的妻子伊莎贝拉·德·埃斯特时期。她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重要文化、政治人物，也是艺术家们最伟大的赞助人之一。在埃斯特家族统治下，费拉拉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重要中心。在蒙特费尔特罗家族统治下的乌尔比诺地位同样显赫。其中，总督宫就是一个非比寻常的地方。费德里科·达·蒙特费尔特罗在曼托瓦师从维多里诺·戴·费尔特雷，并对数学与建筑特别感兴趣。

1464—1465年，两位德国流亡者首次将印刷机引入意大利。事实表明，教皇保罗二世（1464—1471年在位）是个热心的赞助人。印刷工最初使用的是一种类似于手稿体的罗马字体。起先，在重要的出版业中心威尼斯，书籍被卖给一位也阅读手稿的人文主义精英。当时每本书的印刷量仅有近300册。但是，自1475年起，威尼斯的营销、出版、印刷量及定价都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到15世纪80年代已相当确定了。人们强调实用性，用哥特字体为更广阔的市场印刷宗教及法律题材书籍。

权力政治

正如画家安德烈亚·曼特尼亚（1431—1506年）为贡扎加家族创作的作品所展示的那样，艺术与战争并非水火不容。事实上，列奥纳多·达·芬奇当时就得到了包括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与凯萨·波吉耳在内文武双全的国王们的支持。波吉耳聘请列奥纳多担任军事工程师。意大利诸邦你争我夺的雄心导致战火绵延，让人们在当时建起了不起的防御工事。例如，由西吉斯蒙多·马拉泰斯塔在里米尼设计的西斯蒙多城堡，以及费拉拉的埃斯特城堡。

战争的代价把交战双方拉到谈判桌前，正如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土耳其给意大利带来挑战时的情形一样。这种威胁使教皇尼古拉斯五世（1447—1455年在位）试图为意大利带来和平，并随后组

建了反土耳其联盟。根据《洛迪和约》（1454年）的规定，意大利的大国，即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那不勒斯，以及教皇，承认彼此的边界。此举为逾20载的和平打下了基础。米兰王位继承战争结束，佛罗伦萨与威尼斯最近的重要扩张成果也得到了巩固，安茹的勒内在法国及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的支持下，恢复安茹王朝宣称对那不勒斯所有权的尝试也失败了。

直到威尼斯在1480年对费拉拉公爵埃尔科莱一世宣战前，意大利度过了近25年的相对和平期。虽然威尼斯面对着由几乎所有其他意大利国家组成的联盟，但在战争结束时签订的1484年和约中，威尼斯仍小有收获。更不幸的是，威尼斯人之前试图引诱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并许诺助其攻克那不勒斯。

这次尝试预示着1494年法国的入侵，法国入侵又引发了后来的“意大利战争”。这些战争不仅反映出意大利的种种分歧，还揭示了外部统治者新生出的或者说再度复燃的介入意大利的意愿。起先，最重要的外来势力是查理八世。1449—1453年，法国在与英格兰战争中最初的胜利，以及1477年勃艮第公爵，即大胆的查理的垮台，均让查理八世从中受益。因此，正如在通常情况下那样，意大利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是强国竞争的产物。在意大利及别处，这种情况意味着，人们只有在更广阔的背景下讨论问题，才能准确讲述意大利历史。

当米兰公爵卢多维科·斯福尔扎向查理八世求助时，意大利国内各股势力间的平衡被打破了，外部势力重返意大利半岛。斯福尔扎担心，阿拉贡国王费尔南多二世的堂弟那不勒斯的阿方索二世（1494—1495年）正在煽动意大利人结成联盟，一致反抗自己。查理八世迅速做出反应，率领着一支由3万名士兵与150门大炮组成的队伍，在1494年9月初来到意大利。1495年，查理八世在一场战役结束后占领了那不勒斯。那场战役此前导致皮耶罗二世·美第奇在1494年被逐出佛罗伦萨。查理八世坚持安茹王朝对那不勒斯的所有权主张。同时，他还宣称，这是在为前往圣地的十字军东征建立大本营。一些支持法

国及归尔甫党的意大利人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

一方面，查理八世的成功招致意大利国内的反对，因为人们越来越怀疑他攫取整个半岛的野心；另一方面，查理八世的成功也引来两位怀揣雄心壮志的强大统治者的抵制：一位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他统治着奥地利及哈布斯堡王朝的其他领土；另一位是阿拉贡国王费尔南多二世，他统治着阿拉贡、西西里岛与撒丁岛。费尔南多是那不勒斯国王（1458—1494年在位）费兰特（又称费尔南多一世）同父异母的弟弟，是卡斯提尔的伊莎贝拉一世的丈夫。费尔南多二世将意大利的利益与西班牙的资源结合在一起，自1494年起与威尼斯、米兰公爵卢多维科·斯福尔扎及教皇亚历山大六世（1492—1503年在位）一道，组成圣马克联盟。1495年，西班牙军队从西西里岛来到意大利本土南部地区。1495—1496年，法国军队被赶出意大利。这场胜利进一步刺激了费尔南多对意大利南部的兴趣。

现代防御工事

由于大炮在对抗高耸的石墙这种静态目标时变得日益有效，人们不得不重新设计防御工事，以打造更低、更密、更复杂的军事目标。今天，人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些这样的防御物。通常为四边形或五边形的堡垒，成角状沿城墙等距排列。这种堡垒旨在将围城军挡在内墙外，它也为人们提供了炮座，可以让守军从侧翼对进攻者进行有效射击。用土加固的设计可以把炮火对防御工事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倾角有助于干扰炮弹、挫败进攻。在某种程度上，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作品中理想化辐射状城市的平面图与乌托邦政治短文为人们提供了灵感。在此基础上，人们建造出许多新式防御工事，包括在奇维塔韦基亚（1515年）、佛罗伦萨（1534年）、安科纳（1536年）、热那亚（1536—1538年）与都灵（自1564年起）建起的防御工事。

生活的实际情况

当时的生活整体上依然严酷。正如中世纪时的社会现实与骑士风范的理想相去甚远一样，当时的社会也远未实现文艺复兴时期的价值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卫生与饮食是主要问题。居住条件，尤其是同床共枕的习惯，易导致呼吸道感染病多发。这是由住户存量有限带来的个人隐私缺乏所致。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大批出没的虱子与人口密集、洗浴设施不足以及人们不换衣服的习惯有关。当时的人认为，清洁就是穿着干净的衣服与亚麻织品，而不是洗浴。但是，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这两点。无论贫富，人们在面对自然界中从虱子、臭虫、跳蚤到绦虫的种种威胁时，没有多少东西可以自保。近处的动物与粪堆也有害无益。与欧洲其他地区一样，意大利社会也储存粪便，而不是把它处理掉。人畜粪便被堆积起来用作肥料，构成对土壤肥力的重要补充。但是，这种肥料对健康构成了威胁，尤其是它对水源的污染。废水从不排水的厕所与畜栏流到街上、渗入地下，并透过常常多孔的墙壁流入室内。斑疹伤寒就是由此生出的恶果。

在罗马时期的城镇中，公共饮水器与公用水龙头的匮乏是个问题。与此同时，在意大利境内大部分地区，清洁的饮用水也难以获得，尤其是在沿海地区及没有深井的低地。河水常常浑浊不堪，而抽水可能受到污水的影响。与欧洲其他地区一样，这就解释了发酵饮料在意大利的重要性。

同样地，营养不良的问题再次提醒我们，意大利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欧洲史。由于营养不良，人们的免疫力下降，结果导致传染病肆虐。此外，营养不良也降低了人类的性欲、限制了性行为、阻碍成功受孕。从长期来看的话，它还延缓了性成熟，并导致女性不孕。即使当人们有足够多的东西果腹时，食物匮乏与食品价格问题依然让大多数人无法获得均衡的膳食。对城市贫民来说，饮食是个突出的问题。

水果、蔬菜价格昂贵，更别提肉与鱼了，而且，城市贫民也经常衣衫褴褛。农民极少食肉吃鱼。

营养缺乏并不是致病的唯一原因。天气恶劣，尤其是但不仅限于冬天的天气，会削弱人体免疫力。木柴匮乏，以及大多数居住环境潮湿阴冷、拥挤不卫生的情况，无异于雪上加霜。

社会上，体质差的群体依然最易受顽疾攻击。真正的婴儿杀手是产褥热。直到19世纪，人们才了解它的成因。但是，政治社会因素在饥荒与疾病中也意义重大。生存危机不仅是由粮食的供不应求造成的，还由资源分配不公与政府不作为造成。此外，动物健康问题严峻。当时，原始的兽医学让人头痛，因为它的惯常操作是宰杀动物并限制其活动。

就个体层面而言，人们面临着充满敌意与不确定性的环境和无法抵挡、难以和解的力量，还有数年辛苦毁于一旦的命运。自力更生与祸从天降、贫穷与贫困之间的界限能够轻易、快速且频繁地被跨越。大多数人鲜有资产。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并未捕捉到那个时代工作环境的严酷。例如，捕鱼危险重重；许多工艺品作坊与工厂环境潮湿、通风不良、光线昏暗、不太安全。这些地方就包括生产艺术品、手工艺品与建材的作坊。此外，暴露于诸如铅与水银这些有害物质之中是个严重的问题，建筑工作又十分危险。研磨工在尘土飞扬、嘈杂喧闹的环境中工作，经常生虱子、得哮喘、患疝气，并存在慢性背部疾病。人们当时几乎不懂健康与工作安全的概念，通常无法理解相关问题。

农业极易受天气与病害影响。改良的作物品种极少，冬季多雨导致庄稼患病、被泡烂，晚霜攻击着小麦与其他庄稼。让人感到棘手的是当时没有杀虫剂，而且保护作物、储存食物又困难重重。老鼠是个祸害。生活中的诸般情形往往都能置人于死地。

与此同时，人们做出了切实的努力来改善甚至是自己的境遇与外部环境造成的影响。这不仅反映在人们从宗教与世俗方面对生活不幸之人及其他人长期以来的照料上，还体现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知识的追求与运用之中。因此，在威尼斯，人们把大笔钱用在救死扶伤、保卫城市及整个亚得里亚海海岸港口地区免受疾病侵扰上。人们不仅采取措施防止传染病通过船只传播，还注意一般性卫生问题。

为对抗瘟疫，威尼斯率先开发了系统性预防工程。早在13世纪，威尼斯法律就已经规定了适用于医护人员的通用规则，明确了他们在病患护理方面的职责。14世纪，开药方、洗衣服的风尚变得十分流行。人们热衷于打击城市中的庸医与冒牌医生。威尼斯也有一所名为里亚尔托的自然哲学预科学校。学生从这里毕业后将从事医学研究。1485年，医生、药剂师与理发师成了大众卫生事业的主要从业者，负责人们的整体健康。一些医院紧随其后保一方平安：为穷人、临终病人、儿童开设的医院，以及圣乔凡尼保罗医院。

医院很久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例如，仍在运作的圣灵医院在1198年就在罗马服务大众了，而它的前身是为英国朝圣者开设的旅舍。文艺复兴时期更多的医院相继问世，包括建在贝加莫（1449年）、维罗纳（1515年）、布雷西亚（1521年）的医院，而弗朗切斯特·斯福尔扎于1456年在米兰创办了马焦雷医院。

人们追求、传播并运用知识。15世纪初，在某种程度上，为了解决由几种传染病带来的问题，帕多瓦大学大力发展医学与解剖学研究，并成为这些学科的创新中心。1545年，学校建起一座种植药用植物的植物园。印刷术的传播使信息交流变得容易。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医学文章，尤其是在威尼斯。例如，皮埃特罗·达·托西尼西诺所作的《瘟疫指南》被收录进1494年在威尼斯出版的《医学汇编》中。当时，人们还能读到皮埃特罗·托马西的预防医学著作。

然而，祖传秘方，尤其是偏方与精神干预，依然重要。在圣吉米

尼亚诺的圣奥古斯丁教堂中，贝诺佐·哥佐利创作了一幅湿壁画，展示了圣塞巴斯蒂安在1464年瘟疫流行时的干预措施及对城市的保护。诸如此类的看法在当时依然重要，并且是某些群体生活习惯与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第四章　意大利战争与文艺复兴后的衰落

在托斯卡纳的阿尔托帕肖，当时四五岁的孩子就能喂养牲畜。他们将来的生活很可能是贫穷的，肯定不会好过自己的父母。

战火燃起

法国人没打算把1495—1496年的败局当作最终结果。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那就意味着放弃皇家荣耀、损害王室地位。1499年，查理八世的继任者路易十二（1498—1515年在位）入侵米兰公国。他以祖母是维斯孔蒂家族成员为借口而宣称自己拥有公国的所有权。威尼斯人也对米兰公国发动了侵略。八九月间，重要阵地落入法国人之手，热那亚接受了一位法国总督。法国也派出军队前往罗马涅，驰援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子凯萨·波吉耳（约1476—1507年）。在那里，凯萨·波吉耳不仅想要巩固教皇地位，还意图为自己建立新公国，但他最终失败了。

但是，人们对法国统治的不满使卢多维科·斯福尔扎获得了广泛的支持。1500年2月，他重获米兰。反过来，法国展开强力回击，瑞士的支持又消失不见。结果，斯福尔扎的军队溃败了。瑞士雇佣兵是训练有素、富有战斗力的长矛兵。这群人堪称当代重型步兵，是重要军事玩家。但是，他们不打无报酬之仗。卢多维科被俘后让人送到了法国。1508年，他在那里去世。如此一来，路易恢复了对米兰的统治。路易与阿拉贡的费尔南多二世签署了《格拉纳达合约》（1500年），瓜分那不勒斯。1501年，法军攻占那不勒斯市。

但是，新领土的秩序并不稳固。法国与费尔南多在1502年的争端让他们试图占领整个王国，结果在1503年遭到西班牙人的重创。因此，1504年，那不勒斯与费尔南多统治下的阿拉贡王国实行共主联邦，而路易遵照1505年签订的《第二次布卢瓦条约》的规定，放弃了自己对那不勒斯的所有权主张。

欧洲战场上意大利日益被法国或西班牙主宰。它们是唯一有资源维持一场重大军事行动的大国。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以永不停歇的密谋

闻名于世。1508年，他与米兰、奥地利、曼托瓦、萨伏伊——皮埃蒙特、瑞士及法国一道，缔结了康布雷同盟，以攻击并洗劫威尼斯。法国发挥了关键作用，尤其是在阿尼亚德洛（1509年），法军击败了一支人数要少得多的威尼斯军队。战场失利导致威尼斯内陆大部分地区爆发起义，而威尼斯在这场危机中展现出了韧性，重获控制权。

如果可能的话，意大利统治者们会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外国侵略者，并试图利用他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例如，费拉拉的埃斯特家族与法国统一阵线，共同对抗教皇扩张。因此，这些统治者与外来势力间并无内在冲突。后者能找到当地盟友，但这些当地盟友反过来也能影响法国与西班牙的关系。因此，1511年出现了那个时期一贯的让人眼花缭乱的结盟更迭。这种情况在意大利尤为明显。意大利统治者们对这种变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他们自己也因此遭了殃：尤利乌斯三世与西班牙、威尼斯及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建立了神圣同盟，以将法国人赶出意大利。法国在拉韦纳（1512年）击败西班牙。但是，瑞士介入了反法战争，热那亚与米兰的反法活动使西班牙重获主动权。法军撤退后，翻过了阿尔卑斯山脉，西班牙人则蹂躏着托斯卡纳。马斯米利亚诺·斯福尔扎在米兰就职。大国冲突决定了地方政治的走向。

1513年，法军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再举来犯。他们得到了威尼斯人的支持，因为后者对米兰的扩张表示担忧。瑞士驰援斯福尔扎，共同对抗法军，但败于诺瓦拉。法国劫掠了从意大利内陆地区到威尼斯潟湖的湖滨地带，这让人们认识到了战争的代价。

精力充沛的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1515—1547年在位）继位后不久再度对米兰发动侵略战，在马里尼亚诺战役（1515年）中击败瑞士。接下来，法国开始了对米兰的进攻，直到1521年才占领米兰。但是，1519年，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卡洛斯一世是费尔南多二世与伊莎贝拉一世的外孙、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孙子，以及阿拉贡、卡斯提尔、哈布斯堡与勃艮第遗产的

继承人。他似乎印证了法国人关于哈布斯堡王朝霸权最深的恐惧：西班牙、那不勒斯、西西里、撒丁岛、低地国家与奥地利如今都共事一主。1521年，弗朗索瓦对查理宣战，结果失掉了米兰（1521年），又败于比可卡（1522年）。这导致威尼斯投入查理的怀抱（1523年）。1524年年初，威尼斯助查理的军队抵抗住了法国对米兰最近的一次入侵。

是年，法国后来再举进犯并拿下米兰，还与威尼斯、教皇克雷芒七世（1523—1534年在位）结成同盟。但是，西班牙人在帕维亚（1525年）挫败了法军并活捉弗朗索瓦，迫使他接受查理提出的议和条件。这使查理能将米兰公国授予盟友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弗朗索瓦一被释放就拒绝履行条款。他声称，和约是在受到胁迫下签署的。弗朗索瓦同意与克雷芒七世、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威尼斯及佛罗伦萨一道，缔结科尼亚克同盟（1526年）。战火因此再度燃起。人们又一次地体会到当时联盟关系迅速更迭的情形。

1527年，教皇克雷芒与查理五世间的停火协议让后者的军队无仗可打。查理没钱给军队发饷，于是他的部队就行至罗马，在“罗马之劫”中洗劫了这座城市，给罗马以重创。当时，人们把这次劫难比作410年哥特人在罗马陷落时对城市造成的那般浩劫。法国再度进犯意大利，但是包括围攻那不勒斯失利在内的一系列失败导致弗朗索瓦接受了《康布雷条约》（1529年）。此条约又称《夫人和约》，因为萨伏伊——皮埃蒙特的路易莎与哈布斯堡王朝的玛格丽特对和约的缔结功不可没。弗朗索瓦放弃了对意大利的主张，然而尽管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重获米兰统治权，但堡垒驻防的权力仅限查理所有。此前，威尼斯在1495—1509年及1528—1529年控制了阿普利亚的许多港口。最终，这些地方都被归还给了那不勒斯，克雷芒七世则重获拉韦纳与里米尼。

查理五世取得帕维亚大捷，随后还签署了《康布雷条约》。这让意大利人对他另眼相看。他们不再认为查理只是众多强大统治者中一

位强大的意大利统治者了，他们也不再认为查理是法国国王之外的另一位领袖人物了。他们开始觉得，查理是一支主导力量。他能利用国际力量、获得当地支持。在那不勒斯，以查理为代表的西班牙统治似乎稳定了下来。

查理的势力在1529—1530年成功围攻佛罗伦萨的事情上得到了清晰体现。事后，他把亚历山德罗·德·美第奇推上权力宝座，恢复了美第奇家族的势力。他们即将把此事变成佛罗伦萨转型期的重要事件。佛罗伦萨要从一个有着强大共和机构的共和国变成公国，以及后来的大公国。因此，这座城市成了领土国家的首都。由于同样的家族世代掌权，这种转型包含了某种程度的延续性。然而，当时也存在着专制主义的典型保留剧目，从胁迫到共识。例如，对不为所动者的胁迫。宗教认可的权威观念促成了共识的达成。统治者科西莫一世（1537—1574年）就对权威观念表示极大的认可。1537年，当亚历山德罗·德·美第奇公爵遇刺时，佛罗伦萨人试图恢复共和制，但却失败了。反过来，1548年，在查理五世的授意下，谋杀亚历山德罗的元凶，即他的堂弟洛伦齐诺·德·美第奇被处死：共和国流亡者与法国、土耳其均有牵连。正如颠覆活动是追求利益的惯常手段一样，国内政治与国际权力政治息息相关。

1535年，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去世后，战火又起。米兰王位继承因此出现争议。1536年，弗朗索瓦入侵意大利。但是，由于双方均无法取得明显优势，结果不得不宣布休战。1540年，查理将米兰公国授予他的儿子腓力（后来的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此事象征着神圣罗马帝国在意大利的部分帝国（当时的奥地利）遗产转移给了西班牙。1544年，法国再度侵略意大利北部地区。但是，16世纪40年代那场关键战斗发生在阿尔卑斯山脉以北地区。50年代，情况亦然。

战争不仅见证了大国间的冲突，也有相关国家的博弈。因此，16世纪50年代，西班牙对教皇保罗四世（1555—1559年在位）作战，还支持佛罗伦萨攻击并吞并锡耶纳。这是意大利国内分歧与大国矛盾

激烈碰撞的证明。1552年，锡耶纳起义反抗西班牙统治，而且起义者还同法国一道从西班牙人手中夺下了城堡。自16世纪20年代末起，在美第奇家族统治下的佛罗伦萨就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盟友了。反过来，1553—1554年，法国在土耳其舰队的配合下，占领了科西嘉岛：科西嘉岛的统治者热那亚是西班牙的盟友。

查理五世将帝国分给弟弟（新上任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费迪南一世与自己的儿子腓力。费迪南分得遗产中奥地利的部分，腓力则拥有剩余的地区，即西班牙。十分重要的是，腓力的继承物还有包括米兰在内的意大利领土、低地国家，以及美洲大陆的西班牙领土。因此，米兰就永久性地与神圣罗马帝国分开了。1559年，根据《卡托——康布雷西条约》的规定，法兰西国王亨利二世（弗朗索瓦一世次子）接受了一项和约。和约规定，由腓力统治米兰、那不勒斯、西西里岛与撒丁岛。此前，法国把1536年攫取的萨伏伊与皮埃蒙特还给了萨伏伊公国的埃曼纽尔·菲利贝尔公爵（1553—1580年在位）。他是查理五世的外甥，同时也是查理手下一位忠实可靠的常胜将军。埃曼纽尔·菲利贝尔仗着自己是查理的亲戚，财产与权力失而复得。对这位当地将军的奖励催生出一个附庸国。锡耶纳不得不接受佛罗伦萨的统治。1569年，庇护五世授予科西莫一世“托斯卡纳大公”称号。随后，皇帝正式批准了这一称号。哈布斯堡王朝赢得了意大利战争的胜利。尽管1610—1639年冲突不断，但这次胜利直到17世纪40年代时才受到严峻的挑战。

16世纪末，国际竞争依然在意大利发挥着作用。但是，西班牙占据了主导地位。1564年，法国与土耳其为科西嘉岛反抗热那亚统治的起义提供了帮助，而热那亚人则得到了西班牙军队的支持。萨姆皮奥·科尔索率领叛军，将复杂的地形与游击战术相结合，成为己方优势。但是，撇开西班牙军队的专业性不谈，科西嘉人意见不合。这是派系斗争长期作用的产物。到1569年，热那亚的统治被再度确立下来。这些世仇在其他地方也很重要，尤其是在撒丁岛。16世纪60年代，当地

居民在利古里亚海海岸的菲纳莱发动了一场起义，赶走了暴虐的统治者阿方索·德尔·卡雷托。但是，1571年，当腓力二世介入时，他把公国据为己有。在卡萨莱蒙费拉托，西班牙军队帮助那里的统治者，即曼托瓦的古列尔摩公爵（1560—1587年），镇压反叛。反叛是由古列尔摩公爵企图限制税额、实行司法豁免所引发的。科西嘉、菲纳莱与卡萨莱当时都对西班牙权力的维持至关重要。热那亚充当着西班牙帝国的银行；倘若科西嘉落入法国人手中，那将对西班牙军队进入意大利构成威胁；菲纳莱是西班牙军队的登陆港，而卡萨莱则是保护他们的军队向南挺进的堡垒。

并不是所有的反叛都让西班牙有机会一展雄风。1573年，在没有西班牙帮助的情况下，乌尔比诺公爵吉优多巴尔多二世残酷镇压了一次反对征收新税的起义。最后一位费拉拉公爵阿方索二世（1559—1597年在位）之后的继承问题引发争议，结果导致切萨雷·德·埃斯特与教皇竞相集结军队。最终，切萨雷因为没有得到法国的支持而退缩了。教皇克雷芒八世（1592—1605年在位）占领了费拉拉，埃斯特家族则继续保有摩德纳公爵头衔，直至1803年男性继承人绝嗣为止。与此同时，许多城堡开始实行新政治秩序，例如美第奇家族建造的城堡。城市共和主义继续存在于威尼斯、热那亚与卢卡。但是，它并不是意大利北方的主要模式，更别说其他地区了。

反宗教改革

同时，意大利与西班牙一道成为反宗教改革运动的中心。反宗教改革运动，是一场旨在反对新教、复兴天主教的改革运动，它促进了天主教的活跃。新教本身在意大利鲜有人支持，因为在那里包括宗教裁判所在内的教会权威极力维护天主教正统观念。因此，教皇克雷芒八世以散布异端邪说罪将多梅尼科·斯坎代拉，也许名为梅诺丘（1532—1599年）烧死在火刑柱上。这位来自弗留利大区蒙泰雷亚莱的识字的磨坊主因拒斥基督教创世说，坚持泛神论信仰，遭此劫

难。宗教裁判所是为加强教皇统治而建立的机构。它的权威在一些领地，尤其是威尼斯，受到质疑，但在像那不勒斯之类的其他地方则得到了认可。

1545—1563年，罗马教廷的教会议会在采邑主教区首都特伦托召开，而反宗教改革运动也在那里爆发。这场有着独特文化活力的运动特别热衷于建造、装饰教堂。意大利战争过后，教皇国的新使命、重建工作与权力巩固在罗马的象征就是巴洛克风格对城市的重塑。这种情形在西克斯图五世（1585—1590年在位）统治下，显得尤为明显，但并不仅限于他统治的时期。祷告仪式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对圣餐礼的日益强调。因此，教堂内部特征的重要性不同以往。自1599年起，在罗马拉特兰的圣约翰大教堂里，人们更加强调举办圣餐仪式的新圣餐。在更广义上，建筑是功能及社会反映演变的产物。该时期“现代风格”防御工事的发展史，也反映了这一点。“现代风格”这个术语指的是三角堡及其他反大炮的几何部件，后来被称为“意大利的痕迹”。

艺术主题的政治意义可以明显地在意大利全境范围内看到，尤其是在威尼斯。在那里，人们拒斥彰显教皇权威的教堂建筑风格。反之，威尼斯人强调宗教与文化改革，对圣萨尔瓦多教堂进行了重建。与罗马的圣彼得教堂相比，这座教堂显得朴素无华。内陆地区的大教堂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例如布雷西亚的新大教堂（1604年）。因此，它那象征着权势的高度超过了旁边的布罗莱托宫与托雷德——佩戈（人民塔），后者是两座中世纪早期的市民建筑。

在反宗教改革时期，中世纪建筑物的内部往往装饰了湿壁画，建起新圣坛，并绘制了新画作，正如维罗纳大教堂那样。更普遍地，反宗教改革艺术表现出绘画艺术的广度，而且，它利用了许多传统，包括改革热情、人文主义的博学及感官享受。米开朗琪罗·梅里西·达·卡拉瓦乔（1573—1610年）在昔日自然主义与夸张画作的光与影中表现出了这些张力。这在他的《圣保罗的皈依》与《圣彼得被钉十字

架》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两幅作品均藏于罗马的人民圣母圣殿中。他的《七件圣事》见于那不勒斯的仁慈山小教堂内。这是一个成立于1601年的慈善机构，专门向穷人提供贷款。

宗教活动的展开并不限于宗教机构内。米兰在博罗梅奥家族诸位有才能的大主教统治下，作为反宗教改革运动的中心，强调对儿童的教育。查理·博罗梅奥（1538—1584年）在22岁时被伯父庇护四世任命为米兰枢机助祭。他在1570年饥荒与1576年瘟疫暴发时，大力发展济贫事业。1610年，他被封圣，并成为许多画作赞美的对象。

人们普遍认为，慈善活动与正统思想的维护都是重要的。为了使道德生活与精神重生相结合，布道同样重要。从促使现存机构进行教会改革方面来看，反宗教改革运动具有积极意义。教会在社会关怀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将世俗精神与教会官僚主义结合上也至关重要。

但是，十分消极的是，在教会改革的同时，通过与新教在教义上妥协而恢复教会团结的尝试遭到排挤。教会坚持对已有天主教教义的清晰界定。这种僵化与不宽容的做法预示着19世纪及20世纪大部分时期教皇的做法。1564年，庇护四世（1559—1565年在位）颁布了《特伦托会议信纲》，拟订《教廷禁书目录》，博罗梅奥则起草了《罗马要理书》（1566年）。1570年，庇护五世把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逐出教会。此举引发一场新的宗教战争。庇护五世贯彻了特伦托会议的教令，并于1712年被封圣。

但是，教会永远都不是铁板一块。这也造就了反宗教改革运动的易变性，尤其是在地方行动所起的作用上。地方宗教典仪传统得到大力支持，正如在佛罗伦萨的情形那般。作为多样性的例证，反宗教改革运动在某些方面强化了意大利生活中的父权特性，而它也为女性精神与宗教事业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女性在教会中并不是无形的。宗教基金会旨在为不愿成为修女的单身女性提供保护，因为她们在缺

乏足够家庭保护的情况下有道德败坏之虞。

统治者们支持反宗教改革的新规范。16世纪60年代，埃曼纽尔·菲利贝尔把首都从尚贝里迁至都灵。他也把耶稣裹尸布迁到了都灵。这是耶稣死后的一件圣物，王朝为此而声名显赫。人们今天仍然可以在都灵大教堂瞻仰这件圣物。此外，萨伏伊——皮埃蒙特的公爵们试图为圣殿提供赞助。人们认为，那里的众圣是为整个国家服务的，而不是只效力于某个部分。

文艺复兴带来了衰落时代？

意大利战争对标准意大利历史叙事依然重要。这种历史叙事讲述了一群群异族统治之下，意大利相对衰落的“失落世纪”。这段岁月止于19世纪“意大利复兴运动”（民族独立与统一）。理所当然，这几百年间战乱频仍，1494—1559年、1611—1659年、1637—1678年、1689—1697年、1701—1713年、1717—1720年、1733—1735年、1741—1748年，以及1792—1815年的时期对意大利的影响尤为重大。与此同时，威尼斯则卷入了与土耳其人的大规模战争中，以1645—1669年、1684—1699年，以及1715—1718年的战争告终。意大利诸邦失去了它们仅存的海外领地。土耳其人从威尼斯手中夺走了许多地方。1537年，土耳其人占领纳克索斯岛，1570—1571年攻克塞浦路斯，1645—1669年拿下克里特岛。1566年，土耳其人从热那亚手中夺走了希俄斯岛。1768年，热那亚将科西嘉岛卖给了法国。与此同时，自1798年起，法国与英国先后统治着马耳他。马耳他在圣约翰骑士团统治前曾是西西里的附属国。1797年，爱奥尼亚群岛脱离威尼斯，英国通过维也纳会议（1814—1815年）将其据为己有。最终，1863年，英国将爱奥尼亚群岛转交给希腊。

文艺复兴后文化衰落与社会分层的观点与此相关，而这是地中海地区更普遍的相对衰落的一部分，因为贸易与文化交流的重要路线不

再经过并环绕蔚蓝的大海了。正如流传甚广的许多历史解读所说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当时确实如此，而且今天依然真实。尤其是，如果人们自欺欺人地认为，地中海社会在大西洋开发时期和过去一样是主角的话，那就是愚蠢的。事实上，意大利具有欧洲社会普遍的趋势，尤其是16世纪的人口增长、17世纪的相对停滞，与18世纪的复苏。

经济与社会

然而，由于国家与经济体情况各异，这些趋势以各自具体的方式开始起作用。那不勒斯王国仰仗自己的出口能力在16世纪获益颇丰，尤其是丝绸、金属制品、船只、鞋子、葡萄酒与橄榄油的出口。但是，由于在16、17世纪时它不得不通过赋税、贷款与包税的形式为西班牙漫长的战争提供经济支持，那不勒斯王国资产折现力受到影响，经济遭受重创。如果说西班牙为保护费付出了代价的话，它通常要求对方进贡“礼物”。西班牙从那不勒斯王国那里尽可能多地榨取金钱、商品与人员，毫不留情。赠品，即“礼物”，始于1504年。最初是311000达克特，后来成为惯例。1532—1553年，那不勒斯共向西班牙进贡650万达克特。因此，税收上涨。到16世纪60年代，人们每两年要缴纳120万达克特。1607年，那不勒斯背负了800万达克特的债务。此外，16世纪的人口增长意味着土地不再用于种植葡萄与桑树以生产出口商品葡萄酒与丝绸，而是改为粮食生产用地。

在意大利全境范围内，农业是就业与财富的主要来源，是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税收的基础——政府税收、教会税收（什一税）、领主与所有者的税收（租金）——因为税收为大多数其他活动提供了资金支持。土地及其制品打造了社会体系的框架，创造了大部分财富并使其得以保留。农业的影响延伸到城镇。在欧洲地中海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在西西里岛，农业工人生活在城镇中，而不是居住在分散的村落内。部分原因是，农民害怕时常在夜间出没的强盗。

此外，农业、工业与贸易间的联系密切。由于科技知识进步有限，制造业的基础是天然制品。合成产品尤其是织物的时代，尚未到来。主要工业活动是消费品的生产——食品、饮料、服装、鞋子与家具。这些消费品依赖于农村地区的原材料，例如羊毛、兽皮与木材。

由于大多数人生活在农村地区，从事农业活动，这些活动的兴旺发达对于欧洲社会的购买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不足为奇。农村地区的财富为工业商品，以及类似于肉这样的昂贵农业商品，创造了市场。反之，大多数农村（以及城市）人口最普遍的生活状态是贫困，而贫困永远地限制着商品、制成品及服务市场。以谷物为首的农产品在任何程度上的成本上涨都会影响城市居民，降低城镇及大多数农村居民的购买力，限制制成品市场发展。农产品价格波动是常有的事，尤其是出于季节原因，食品价格通常在初夏达到顶峰，因为上一年的收成已耗尽。收成变化决定了额外的价格变化，这种价格变化往往又是十分急剧的。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不确定性。盛行的耕作制度无法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以形成可靠的安全边际来应对粮食歉收。意大利很少有地区能产出足够多的粮食带来商品过剩，以帮助粮食歉收地区渡过难关，而且，缓慢、昂贵的运输也限制了有能力提供过剩粮食的地区所能发挥的作用。

不管是通过砍伐树林、移除石块或是开凿灌溉水渠带来的耕地面积的扩大，基本上都是劳动密集型方式造就的。但是，砍伐树林导致气候更加干燥，从而影响了土壤。疟疾肆虐，问题严重。从托斯卡纳到西西里整个海岸，以及许多农村地区均受到了影响，例如罗马附近的平原。由此导致的高死亡率给农村经济造成重创。这也就解释了除山地村落外如此多的农村地区人烟稀少的原因了。

权力与权威

与国家有大政方针一样，地主与城市寡头政治执政者也有自己的

政策。这些政策在塑造意大利各地区权力体系及特征时起到了关键作用。例如，1526年，贵族阶级的科隆纳家族在占领罗马前胁迫了教皇克雷芒七世。在威尼斯统治内陆地区时，布雷西亚城遵循了更具普遍代表性的模式，即关系亲密的各家族把持着城市最重要的官职不放松。他们显赫的政治地位得益于家族的延续、在地方议会长期供职及社会地位的稳固、财富、职业声望，以及有利的联姻。这五个因素一道与家族发展及血统联系在一起。这些家族的稳定性对政治秩序的维护至关重要。在布雷西亚的精英阶层中，家族关系对联盟与争端都很重要。事实表明，它们也给有效执法及威尼斯的统治带来了巨大挑战。在市政府里有权有势的名门望族试图控制市政的一些方面，让其为自身利益服务，例如司法机关与粮食供给体系。充足的粮食供给一直以来都是提升政府服务能力和获得权力的关键。事实上，这可以回溯到古罗马时期。

社会、政治矛盾存在于权力的表象之后。这些表象利用了权力的战场，而权力的战场又聚焦于艺术资助。权力表象缔造了统治神话。但是，正如在威尼斯内陆地区那样，现实是由地方派系与宽松、灵活的管理相互作用的程度来决定的。例如，1640—1645年，布雷西亚寡头政权与威尼斯政府之间就后者提出的财政需求问题争论不休，结果导致布雷西亚内部富有但被剥夺了公民权的群体发起运动，挑战精英阶层，并提出组建更具广泛代表性的政府。最后，威尼斯政府选择与布雷西亚寡头政权妥协。在这个决定面前，本来就缺乏自信、没有凝聚力与广泛支持的布雷西亚抗议者，变得无能为力了。位于布雷西亚附近，在加达尔湖上麦格尼菲卡的市镇拥有极大的自治权。

因此，正如地方特殊论之前在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的盛行一样，以城市贵族权力为主导的内陆地区的地方特殊论政治体制继续起着支配作用。诚然，尽管贵族旧秩序对创业精神的态度存在着地区性文化差异，但是贵族旧秩序的牢不可破是意大利城乡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不勒斯、西西里、教皇国、帕尔马、摩德纳与萨伏伊——皮埃蒙特

都强调土地占有，并将其看作是贵族阶级的标志。但是，在伦巴第、利古里亚、威尼西亚与托斯卡纳，贵族都有从事贸易、参与工业活动的传统。旧有贵族秩序到19世纪时依然十分重要，而且如今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如此。事实上，尽管君主制已不复存在，但是某种程度的世俗化，以及朱塞佩·迪·兰佩杜萨在他那独具神韵的著名小说《豹》（1962年）中提到贵族阶层的衰落、旧秩序的方方面面及其影响多多少少地留存了下来。这种历史遗留的程度之深让许多意大利人感到不自在，因而他们不愿提及。

当地社会与中央政府间的角力游移不定，由此诞生了多重政治语境。统治者们想让官员充当自己与各地区的中间人，但这些官员要想做出业绩来就得与地方上有权有势的人打成一片。

1527年，佛罗伦萨卫生理事会永久性地建立了起来。它看起来是政府新成立的重要附属机构。尤其是尽管最初它的建立是为对抗瘟疫，但到17世纪早期，它已成为一个更大的公共健康保障机构。理事会派医生研究具体的传染病，并试图利用经过系统收集得到的信息在1622年要求地方当局汇报当地卫生情况。这是当时社会观念的反映。人们认为，开放式厕所、死水与人畜粪便堆积导致空气中出现“瘴气”。由于当时的人不了解传染病，所以他们认为“瘴气”是导致传染病的原因。但是，地方当局与普罗大众都不乐意听取理事会的建议。事实上，在16世纪和17世纪，托斯卡纳并未极大地推动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1575年与1630年袭击意大利的瘟疫给人们带来了痛苦的经历，但大家都束手无策。军队从德国向外移动对1630年瘟疫的扩散起到了关键作用。

正如18世纪末的帕尔马一样，托斯卡纳相对而言是个小国，因此比大国更易进行有效管理。但是，当局对精英阶层的妥协却是关键所在。这一点从1537—1609年间，在前三位美第奇大公统治下，刑法的实施情况上就可见一斑。大公们不愿面对严格执法的高昂代价，也无法约束贫民，因此就觉得妥协政策能确保人们对他们执法权的认

可。当地官员在抓捕逃犯、举报犯罪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地方警力不足、报酬极低，往往还卷入当地错综复杂的家族关系网中。美第奇家族试图通过维护当地精英阶层，打压其竞争对手来获得他们的忠诚。佛罗伦萨以外地区暴力活动的规模与组织似乎远远超过了佛罗伦萨内部的情况，但是暴力活动的发生率也许并非如此。掌权者对城市的治理更见成效。城市暴力犯罪者通常是个人或由至亲组成的小群体，而不是长期以来在较小的城市与乡村地区那些争吵不休的地方望族及有势力的派系。由此产生的体制既不现代，也非“专制主义”。“专制主义”这个术语并不像如今许多强调现代国家与官僚机构兴起的著作所普遍认为的那样。现代与专制主义这两个术语都是对这个时期的误读。

伴随着组织机构的发展，意大利全境范围内暴力活动高发。强盗行为频频牵连社会精英阶层，这在当时依然是西西里社会的标志性特征。16世纪末，威内托与伦巴第的暴力活动呈上升趋势，世仇死灰复燃。长期争斗与强盗行为决定了农村地区住宅的标准模式：一楼无窗且用作谷仓，门用笨重木材与铁皮条制成。由一楼通往楼上住家楼层的楼梯又陡又窄，防御性极强。北方称为“卡希纳”与南方叫作“马塞利亚”的是一种修建有防御工事的小村落，因为这种房屋处于防卫墙的包围与保护中，村庄也只有一处入口。

经济变化给许多农民带来打击，带来了另一种形式的阴郁荒凉。尤其是，由于庄园主与市民获得了土地，许多农民成了临时工。这个过程描绘出了至今以来意大利社会的大体轮廓，而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陆上大规模迁移前的时期尤为重要。

权威与权力也见于更加私密的场景下。一家之主对家族成员的职责延伸到道德与社会领域。按照官方说法，一家之主是“老板”。他为全家人定下规矩。大多数“老板”都超过38岁，而所有不是一家之主的人均为法律意义上的受抚养人。他们被称为“家庭子女”，自己不能承包土地，也不能订立任何形式的契约。在不同的语境与时期，这种称

谓曾有过几种含义。在中世纪，“家庭子女”指的是生活在别人的土地上、必须服从一位共同主人的“不自由”人。这种说法自此开始用来指为一家或某人干活的所有奴仆，而不是当代语境下声名显赫家族的子女之意。

工匠与商人的生活境遇不同于劳作在田间的人们。房屋因社会阶层的不同而异。在农村，人们往往共居一室，技工与商人时常用一楼储存工具与商品、充当作坊，人住在楼上。区域差异也经常是一个影响因素。

人们似乎更偏爱建立核心家庭，但土地匮乏与死亡的影响以及家族式经济体制鼓励了家庭的结合。儿童能从事许多农业、工业活动。在托斯卡纳的阿尔托帕肖，当时四五岁的孩子就能喂养牲畜。他们将来的生活很可能是贫穷的，肯定不会好过自己的父母。

第五章　列强夹缝中的意大利

意大利身份，即仇视西班牙。

列强的玩物

看似无休止的冲突继续影响着意大利。1610年，萨伏伊的卡洛·埃马努埃莱一世（1580—1630年在位）集结了一支军队，支持法国在意大利对抗西班牙的计划。但是，当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在备战时，在巴黎遇刺身亡。亨利之死缓和了这场危机。卡洛·埃马努埃莱后来得到了威尼斯的资助。威尼斯此举意在让伦巴第的西班牙军队不再攻击威尼斯共和国：威尼斯政府正确地指出，当时西班牙正在酝酿着一场推翻共和国的阴谋。

1613年，威尼斯与奥地利之间爆发战争。达尔马提亚的私掠船给威尼斯造成麻烦。这些塞尼的乌斯科克人得到了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庇护。一支威尼斯舰队在私掠船停泊的港口袭击了它们。海战扩大至意大利本土。威尼斯军队在格拉迪斯卡向奥地利军队发起进攻。格拉迪斯卡是一座位于弗留利附近的城市。西班牙军队在米兰整装待发，以助奥地利一臂之力。然而，卡洛·埃马努埃莱一世要求获得蒙费拉托侯爵的身份以继承王位。西班牙反对卡洛·埃马努埃莱一世的扩张野心，结果导致战争在1613年爆发。尽管西班牙占据兵力优势，但是来自米兰的西班牙军队却战败了。暂时幸免于难的卡洛·埃马努埃莱一世积极寻求与威尼斯结盟的机会。威尼斯参议院做出决定，用萨伏伊来分散西班牙的注意力好过威尼斯与西班牙之间的一场酣战。威尼斯暗中资助萨伏伊军队，而不是对西班牙宣战。卡洛·埃马努埃莱一世的战争把西班牙的资源牵制在了意大利。

西班牙（换言之那不勒斯）的舰队出现在亚得里亚海南部地区，不过凭借威尼斯舰队的实力应付这个挑战是绰绰有余。战争陷入僵局，但法国干预的威胁使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1598—1621年在位）在法国、萨伏伊——皮埃蒙特与威尼斯组成的联盟危及其意大利领地前结束了冲突。1617年，列强达成和解。卡洛·埃马努埃莱一世

曾先后三次在1613年、1615年与1617年入侵蒙费拉托，但未能在和约中获得该地。

1625年，法国与卡洛·埃马努埃莱一世试图占领西班牙的盟国热那亚，结果被西班牙人击退，因为西班牙很重视与热那亚的重要战略关系。1627年，贡扎加家族男性直系血脉绝嗣，曼托瓦与蒙费拉托公国继承问题因此出现争议。西班牙再度对某些意大利领地内更广泛地区的战略局势表示关切，并于1628年武力介入。这场冲突后来演变成曼托瓦领土继承战。反过来，法国也派出了一支军队。因此，同样在1629年，支持西班牙的奥地利军队也传播了瘟疫。

这些介入行为提醒我们注意，意大利政治是更广泛地区内战略的一部分。它们是由其他事件决定的。例如，法国击败胡格诺派，奥地利战胜丹麦。1630年，瑞典入侵德国北部后，两国于1631年在意大利北部举行和谈。结果，1635年，战争再度爆发，成为法国与西班牙大规模冲突的一部分。17世纪30年代末，法国对伦巴第的屡次进攻均以失败告终。

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期间，哈布斯堡王朝在德国事业的推进得到了意大利资源的大力支持。教皇保罗五世（1605—1621年在位）保证，在战争期间每月向哈布斯堡王朝提供2万弗罗林币的资金援助。托斯卡纳在战争中供养了一支德国骑兵团。成千上万意大利人则加入了德国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奋勇杀敌。德国哈布斯堡王朝很大一部分兵力与财力均来自意大利。

1642—1661年，新上任的法国宰相马扎然是枢机主教黎塞留的门徒与继承人。他是出生于意大利的枢机主教（原名为朱里欧·莱蒙多·马萨里诺）。在马扎然的统治下，意大利的军事行动对法国来说至关重要。水陆两栖远征军战绩显赫。它们让法国突破了此前不得不越过阿尔卑斯山脉的限制，灵活地在广阔空间内作战。1646年，法国占领了皮翁比诺与厄尔巴岛上的澳特龙哥港。这两个重要的基地控制着海

军活动。但是，法国企图拿下热那亚、菲纳莱与奥尔贝泰洛，进而切断西班牙与意大利间的联系。但是，这次尝试以失败而告终。1647—1648年，法国试图利用那不勒斯与西西里岛的反西班牙叛乱乘虚而入，结果也失败了。

意大利作为更大战略考量的一部分，扮演了重要角色。所谓的“西班牙路线”是西班牙军队从地中海地区出发，途经伦巴第，向北越过阿尔卑斯山脉的交通网。大部分西班牙军队最终来到低地国家，经两条海上航线前往利古里亚的菲纳莱。最长的且不太安全的一条路线始于巴塞罗那，而安全的那条路线起点在那不勒斯。那不勒斯是西班牙王室的重要据点。法军在那不勒斯登陆，向北航行或者是划行。这并不是说法国有任何想要恢复那不勒斯安茹王朝势力的打算，它只说明法国支持该地的叛乱。法军在加埃塔、奥尔贝泰洛、厄尔巴岛或皮翁比诺停留，接着前往菲纳莱。切断海上航线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

托玛索·阿涅罗俗称马萨尼洛。在很大程度上，1647年，他领导的那不勒斯起义是由西班牙政府的财政需求，尤其是对新鲜水果征税引起的。因为西班牙政府急需战备资金。那不勒斯的内部分歧导致马萨尼洛遇害。西班牙人利用这一时机，在1648年再次占领了那不勒斯。该事件为丹尼尔·奥柏的歌剧《波尔蒂契的哑女》（1828年）提供了舞台背景。它也展示了维苏威火山的爆发。

17世纪50年代，西班牙重新取得澳特龙哥港与皮翁比诺，并于1655年在帕维亚击败法国，而且，西班牙蹂躏着亲法的摩德纳公国，以报摩德纳此前背弃西班牙之仇。随着1659年《比利牛斯山条约》的签订，和平降临。西班牙仍主宰着意大利。人们很容易忘记这一点，正如人们极易忽视奥地利在1810—1849年在意大利取得的成功、获得的地位那样。在16—18世纪的意大利历史中，坚忍不拔的西班牙构成了重要的一部分。宗教至关重要。西班牙能在意大利重建势力与权威绝非偶然，新教在那里几乎不存在。但是，西班牙早期在低地国家

并未取得同样的成功，新教在低地国家的势力要强大得多。

意大利仍有较小规模的冲突。1642—1644年，在卡斯特罗战争期间，托斯卡纳、摩德纳、威尼斯与帕尔马联合反对教皇乌尔班八世（1623—1644年在位）。这场战争决定着意大利封地的命运，以及教皇主张的范围。战争导火索是卡斯特罗公国的所有权问题。此地本为法尔内塞领土，但是，巴贝里尼教皇宣称，以卡斯特罗公国所有权来替代未清偿的法尔内塞债务。卡斯特罗公国被认为是潜在的巴贝里尼公国，它能给巴贝里尼家族带来同法尔内塞家族一样的王朝地位。16世纪40年代，法尔内塞家族因获得帕尔马——皮亚琴察的领土而地位显赫。因此，乌尔班八世沿袭了通过教皇职位为家族谋利的做法。在这次事件中，教皇军队遭到重创。这样的分歧有助于人们理解实行统一的意大利政策的难度。此前，1608年，托斯卡纳曾接管了要塞城镇皮蒂利亚诺。那里之前是奥尔西尼家族的封地。

1673年，法国发动了一场重要的反西班牙战争。尽管这次战争的主战场在低地国家，但意大利还是被卷了进来。1674年，墨西拿城在西西里岛发动了一场反对西班牙统治的叛乱。意大利派出一支舰队与军队驰援。1675年，法国人解除围城之困。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荷兰对西班牙的海军援助，叛乱最终被镇压下去。

1681年，当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依靠现金从曼托瓦公爵手中购得强大的卡萨莱堡垒时，他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这桩交易让路易的势力远远超越了后来人们所认为的阿尔卑斯山脉的天然屏障，并为法国在米兰反抗西班牙提供了一个大本营。1689年，法国与西班牙再度开战。萨伏伊——皮埃蒙特的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1675—1730年在位）受够了法国的指手画脚，急于将法国逐出皮内罗洛与卡萨莱。1690年，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加入反对路易的大联盟。1693年，法国在马沙里亚战役中击败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但是，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仍能在长期围城后，占领皮内罗洛，并向法国的多菲内地区发起进攻。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坚决维

护自身利益。他这么做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他听说至少他的一些盟友（奥地利、西班牙、英格兰与荷兰）也许正在与法国秘密议和。于是，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下定决心不让自己成为这种交易的牺牲品。1695年，通过与路易的秘密约定，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确保自己而非联军攻占了被围的卡萨莱。1696年，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背弃盟友，与法国签订《都灵条约》。此举使路易能将兵力调往其他前线地区。法国失去卡萨莱与皮内罗洛后，军队无法在意大利越冬。这对萨伏伊——皮埃蒙特来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二世没有子嗣。1698年，他大限将至，这引发新一轮的国际磋商。意大利领土被当作谈判筹码，而意大利统治者们在谈判中却没有一席之地。根据1698年的瓜分条约，即《海牙条约》的规定：西班牙、撒丁岛、西属美洲与西属荷兰将归巴伐利亚的约瑟夫·斐迪南所有；那不勒斯、西西里岛与要塞（托斯卡纳防守严密的城镇）归路易的继承人，即王太子路易所有；米兰属于卡尔大公。约瑟夫·斐迪南的祖先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人。卡尔大公是奥地利统治者利奥波德一世的次子。但是，1699年，约瑟夫·斐迪南在生了一场急病后去世。一时间，谣言四起。人们说是奥地利投了毒。约瑟夫·斐迪南之死导致1700年新分割条约《伦敦条约》的签订。新约规定，王太子路易除获得第一个条约中所分得的领土外，还加上了洛林与一个独立国。那个国家的公爵分得了米兰，卡尔大公则得到了余下的领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西班牙均不接受这种分割，卡洛斯二世又把他的全部遗产留给了路易十四的次孙，安茹公爵腓力。在当年晚些时候，卡洛斯二世去世时，腓力成了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

与此同时，威尼斯依然在前线上与土耳其人战得正酣。1645年，当土耳其人进攻威尼斯统治下的克里特岛时，双方爆发了一场严重冲突。这次军事行动最终演变成对干地亚的威尼斯堡垒展开的一场漫长且看似棘手的围攻。威尼斯及其盟友（教皇、马耳他与托斯卡纳）越过爱琴海，攻击土耳其的补给线。此举使局势变得极其复杂。在达尔

马提亚，威尼斯与土耳其的战斗从未停止过。1669年，干地亚最终沦陷。在随后的神圣联盟战争（1684—1699年）中，威尼斯与土耳其再度在爱琴海及达尔马提亚交战。在神圣联盟战争中，1699年签署的和约让威尼斯得到了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但是，1715年，威尼斯在与土耳其人的新冲突中，被迫又把伯罗奔尼撒半岛割让给了他们。

威尼斯以自己不同于意大利其他地区而引以为豪，强调自己的独立地位与共和体制。威尼斯介入伯罗奔尼撒半岛，还在爱琴海上作战，这都强调了威尼斯对希腊世界一直兴趣不减的事实。这是一种不同于萨伏伊——皮埃蒙特与米兰的地缘政治。

知识危机

反宗教改革运动让人们明确反对在知识领域的自由尝试。在许多方面，它是一场反文艺复兴运动，虽然这样的描述不合时宜地简化了文艺复兴。意大利名人遭了殃。此前，天文研究激发了人们用数学来认识宇宙及其运作方式的兴趣。这一点在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帕多瓦大学数学教授伽利略·伽利雷（1564—1642年）的著作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数学家伽利略当时还效力于托斯卡纳大公科西莫。他最早的出版物《几何和军事用之比例规的操作》（1606年）专攻军事工程，而非航海。但是，伽利略在书中强调了工具（罗盘）的使用，以及运用数学法则的重要性。因此，伽利略的实证研究聚焦于新发明的望远镜。1608年，荷兰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台望远镜。伽利略又对这种工具进行了极大的改进。他的研究使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观点变得言之有物、有说服力。此外，1609年年末，伽利略在《星空信使》（1610年）中揭示了他用自己发明的20倍望远镜所获得的发现。这本书告诉人们，月球就像地球一样崎岖不平、有山有谷，从而彻底改变了人们对月球的理解。

这种相似性挑战了亚里士多德的论点。他认为，地球与天堂的本质与特质完全不同。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思想家们基于亚里士多德的权威，将月球看作是行星般的存在。在他们看来，月球有着完美的形状与运行轨道，并且恒久不变。然而，地球却易变易腐。因此，地球是救赎与传播宗教讯息的理想场所。伽利略也向人们揭示了木星有着四颗卫星的事实。如此一来，他就向人们说明作为地球卫星的月球并非独一无二。

1613年，人们以《圣经》为依据，对伽利略的天文学观点发起攻击。作为一位有着自我意识的理性主义者与经济主义者，伽利略随即与教会权威起了冲突。部分原因是他在著作《两大世界体系对话》（1625—1629年）中，比较了托勒密与哥白尼的两大体系，并对前者表示赞同。1633年，（成立于1542年的）宗教裁判所谴责了伽利略的观点，因为他认为地球是运动的，还说《圣经》不是科学权威。此外，伽利略的原子论也挑战了天主教变体过程的教义，因此就危及弥撒活动。事物的本质在这两种情况下都至关重要。伽利略被囚家中。在科西莫成为托斯卡纳公爵的过程中，宗教裁判所被引入托斯卡纳。科西莫认为自己等同于教会权威，尤其是教皇权威，而教皇长期以来一直想要将自己的势力向北扩展。由于伽利略被教皇机构宗教裁判所判了刑，他就不必再因宗教问题接受托斯卡纳政府的审判了，而后者的审判可能会要了他的命。因此，管辖权之争在伽利略人生中的这次危机里发挥了重要作用。

伽利略的追随者们十分能干，尤其是阿方索·博雷利与埃万杰利斯塔·托里拆利。但是，他们不得不对哥白尼的问题避而不谈。此外，1657年成立于佛罗伦萨的西芒托学院主要从事“安全的”实验研究。这是由教会压迫造成的。学院在17世纪末变得更加著名。

人们虽然仍然相信神秘力量的存在，但却对它与自然及自然力量的共存有了更复杂的理解。与此同时，与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天主教相关的蒙昧主义出现了几种表现形式。1700年，天主教徒里查

德·科里德在参观罗马托伦蒂诺的圣尼古拉斯教堂时注意到：

“神父（牧师）们把小小的饼做得像法寻铜币一样大，然后把它们摞起来，称之为七个饼；他们为面粉祈神赐福，然后和着圣水做成饼，分给病人吃。如果这些人恢复了健康，他们就说是被饼治愈的；如果这些人死了，他们就说饼拯救了他们的灵魂。”

这样的言论也许看似幽默，但最终的结果是在意大利自由探索精神受到了限制。此外，这在与英格兰及荷兰相比较时显得尤为明显。人们面临着被当作异端惩罚的威胁，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结果是，世俗与教会权威均担心自己有任何程度的僭越，被人指责鼓动异端邪说。因此，长期以来反对教皇主张与哈布斯堡王朝观念及野心的威尼斯，不想变得名誉扫地。

国家

意大利大部分地区都面临着战争与异族统治的双重危险，这使越来越多的意大利贵族阶层开始效力于外来统治者。萨伏伊——皮埃蒙特是个例外。在那里，政府更强调国际竞争，而军国主义对盛行的政治风气而言更加重要。在萨伏伊——皮埃蒙特，常规军使贵族阶级专业化，让他们比意大利其他地方的贵族更好地与政府紧密融合起来。1740年，英国访客约瑟夫·斯宾塞评价道，这个国家的目标是“时刻准备好作战；掂量可能会与之交恶的列强的实力；然后与那个可以给他们在意大利带来最大利益、自身实力增强后最不会侵害他们利益的大国结盟”。

从16世纪到1737年美第奇家族在托斯卡纳的统治结束的漫长时期内，意大利独立领地的数量下降了。1540年，佩鲁贾处于教皇统治之下。1624年，德拉罗韦雷家族将乌尔比诺公国割让给了教皇。无论意大利政府与统治者如何变化，贵族阶层日益与发展中的国家形式与

惩罚模式融为一体。

社会

《工人的疾病》（摩德纳，1700年）是第一本研究工人健康与社会医疗的专著。在这本书中，帕多瓦大学医学教授伯纳迪诺·拉马齐尼揭示了雇佣劳动对健康造成的严重影响。他指出，不寻常的体力劳动强度带来的压力，或是诸如裁缝与织布工这类工种不得不采取的姿势，均会导致机体失调。他论及石匠与矿工罹患的肺结核，镀金工人与印刷工患上的眼疾，裁缝的坐骨神经痛，陶工的无精打采，以及澡堂服务员、化学家、渔夫、烟草商、葡萄酒商与洗衣妇各自的疾病。这是巴洛克时期十分不同寻常的观点。

一般来说，除了这些常见问题，17世纪对整个欧洲来说都是一段特别灰暗的时期。部分原因是“小冰河期”的存在及全球变冷。这也许是由太阳黑子活动所致。结果是，作物生长季节变短，农业生产面临着一场危机。但是，人们很难以可量化的方式评估生活标准。

意大利受创尤为严重，特别是疾病以及战争爆发带来的影响。例如，1656年那不勒斯的瘟疫流行。因此，当时社会上频频出现公众悔罪活动，旨在与上帝和解。在更现实的层面上，1699年，理查德·科里德在米兰注意到，人们为预防瘟疫所做的努力：“他们吃了那么多大蒜预防瘟疫，以至于都可以把人毒死。”

社会的丑陋面是人们视犹太人为眼中钉。因此，1638年，摩德纳的犹太人被围在了贫民窟里。他们至少从1025年起就开始生活在那里了。大斋期布道将基督之死归罪在他们头上。新教徒也不受待见。虽然托斯卡纳的商业政策允许新教徒与犹太人在里窝那经商，但是他们并不受人欢迎。1747年，他们被赶出了热那亚。

那个时期的战争与流行病给经济需求造成打击，导致货币贬值与

极度的通货膨胀，人们债台高筑。这些债务给许多人带来了严重危机，贵族家族被迫出卖自己的庄园。

文化

与此同时，意大利是大胆的巴洛克文化运动与风格中心。这场运动始于罗马。两位关键人物吉安·洛伦佐·贝尼尼（1598—1680年）与弗朗切斯科·博罗米尼（1599—1667年）均在罗马工作。他们雕刻的建筑物有行云流水般的风格，作品引人注目的同时又惹人喜爱。二人打造的建筑常常有着装饰繁复、巴洛克风格的内景，尤其是用大理石、黄金、宝石砌成的圣坛与采用错视画法绘制的天花板画作。不太著名的地方与作品也运用了巴洛克手法。人们遵照巴洛克风格，重建了位于佩鲁贾的14世纪圣多米尼克教堂。12世纪的斯波莱托大教堂也是如此。

歌剧的诞生

克劳迪奥·蒙特威尔地（1567—1643年）出生于克雷莫纳市。1602—1612年，他受雇于曼托瓦公爵。其间，他发明了一种新型娱乐方式——歌剧。代表作有《奥菲欧》（1607年）与《阿丽安娜》（1608年）。在《奥菲欧》中，俄耳甫斯用歌声打动了冥王，获得他的怜悯。在此之前，戏剧史上出现了重要先驱，尤其是戏剧幕间歇与配乐诗体戏剧。意大利自15世纪起就在这两个领域内均占有重要地位。曼托瓦、费拉拉、佛罗伦萨与威尼斯在当时都是重要的音乐创新中心。蒙特威尔地创造了一个音乐统一体。他大量地创作着音乐。自1613年起，蒙特威尔地生活在威尼斯，为公共剧院创作音乐。人们往往认为《波佩阿的加冕》（1642年）是他的杰作。

自1637年起，威尼斯修建了许多歌剧院。事实上，到1700年，威尼斯至少建成了16座歌剧院。因此，剧作家要创作大量歌剧来满足需求。彼尔·弗朗切斯科·卡瓦利是蒙特威尔地的学生。他创作了包括《卡利斯忒》（1651年）在内的近40部歌剧。他和马克·安东尼奥·切斯蒂均为17世纪中叶的重要人物。王公贵族们也建起大型歌剧院，包括帕尔马的歌剧院（1618年）。当时的歌剧通常是盛大的演出，“建筑”舞台为诸如想象中的火灾与洪水这样的场景提供了背景。

教会的文化职责模糊不清。1708年，在乔治·亨德尔的清唱剧《复活》的首场演出中，抹大拿的马利亚是由女高音歌唱家玛格丽塔·杜拉斯坦蒂演唱的。教皇克雷芒十一世（1700—1721年在位）对女歌手获准参与一部神圣作品的演出表示不满，结果歌剧在第二场演出时用一位阉人歌手代替了玛格丽塔。

统治者们试图与教会打成一片。托斯卡纳的科西莫三世（1670—1723年在位）将艺术家送往罗马受训，并托人制作了一个用于盛放圣克雷希头骨的圣骨盒。1717年，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开始在苏佩尔加山上建造一座大型教堂，以纪念1706年他在附近的都灵取得的胜利。之所以选定墙外的地点是因为他当初就是在那儿找到法军阵地最薄弱之处的。教堂在1727年成为圣地，如今它依然占据着都灵的天际线。教堂后面建了一座修道院，当时想用作王陵，让修士们永远为王朝逝者获得救赎而祷告。这种构造类似于西班牙的埃斯科里亚尔、葡萄牙的马夫拉修道院，以及奥地利的克洛斯特新堡。

虽然建造大教堂是皇家赞助教会艺术最明显的例证，而且大教堂被用作举办诸如婚礼之类的大型皇家活动，但是许多君主也是现存机构的慷慨赞助人。例如，君主们委托创作了许多教会音乐。17世纪的情感有一种充满活力、引人注目的宗教狂热。与悲歌剧有相似之处的是意大利作曲家与歌唱家所创造的由古典时期神话、严肃的英雄主义

与庄严音乐组成的世界。

古代或现代、世俗或宗教的意大利文化对外国人的影响可能是深远的。1692—1699年，当吉尔斯·玛丽·奥本诺德（1672—1742年）在法兰西学院的资助下在罗马学习时，他在那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最初的装饰作品是为巴黎圣母院与巴黎圣日耳曼德佩教堂设计圣坛。这些圣坛设计完全依照罗马模式，而他在巴黎皇家宫殿的建筑作品则受到博罗米尼与意大利北部地区建筑的深刻影响。意大利艺术品成了其他地区艺术家与收藏家竞相模仿的对象。1701年，奥地利亲王约翰·冯·列支敦士登请佛罗伦萨青铜铸工马西米利亚诺·索尔达尼为他制作大公爵藏品集的缩小版雕像。

宗教

1714年，枢机主教德·拉·特雷穆瓦耶作为具有敏锐洞察力的法国驻罗马使节，向路易十四进言道，教皇克雷芒十一世与萨伏伊——皮埃蒙特的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间的争端正在危及岛上的天主教信仰。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最近从1713年签订的《乌德勒支和约》中取得西西里岛。拉·特雷穆瓦耶称，在西西里主教辖区内使用教皇禁令会让那些“本来不知道宗教信条”的人完全忘记信条的存在，而且，他宣称，自己之前在那不勒斯以南的主教辖区索伦托曾目睹过同样的过程：人们不再自找麻烦、不做弥撒，也不领圣餐了。这样看来，教会是一道屏障，它让宗教信仰流于形式的平民不至于失去信仰。

但是，事实上，天主教信仰当时在意大利很流行。人们严格奉行着感情外露的巴洛克式虔诚信仰。这种信仰基于当地的圣人及他们的圣殿，在意大利南方尤为明显。自1743年起，多明我会教士与神学家丹尼厄罗·孔奇纳（1687—1756年）认为，威尼斯社会已经去基督教化了。事实上，在意大利全境范围内，弥撒出勤率及圣餐领受率都很高，而且，人们大力支持宗教游行，狂热崇拜圣徒与圣母，资助兄弟

会与朝圣活动，保护圣迹。

意大利身份，即仇视西班牙

17世纪为意大利历史意识贡献了仇视西班牙的情绪。仇视西班牙有历史、主题及地区的多重原因，但共同的理由是西班牙统治是有害的占领。尤其是，它既象征着也进一步导致了意大利无法接受现代性。这些论点在17世纪时已经出现，特别流行于反对西班牙统治的那不勒斯批评家之中。它们将对18世纪反对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们起到关键作用；19世纪，它们对意大利复兴运动及自由主义的意大利也同样意义重大，尤其是在谴责西班牙的盟友，特别是教皇与南方贵族时。此外，20世纪法西斯主义评论员反对与西班牙的联系，因为他们认为这体现了意大利的弱点。意大利因此而受制于人，这也成了意大利虚弱的原因。

这些描述对于人们看待意大利民族都是有用的，但是它们都弱化了西班牙与意大利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它们也忽略了意大利当地人参与这个意大利——西班牙世界的范围与程度。此外，这些描述认为，当时意大利明显有着另一种选择，可是情况并非如此。与之相反的是，意大利在17世纪时除去西班牙之外的替代方案往往是与法国结盟。当时不存在意大利民族国家的原型或前景。但是，在国外，人们对意大利是有所了解的，正如同样四分五裂的德国的情况那样。1700—1709年，英国军队称萨伏伊的尤金亲王为“汝等意大利老亲王”。意大利国内存在着大家普遍接受的共同身份，至少是在受到一些教育的人中间。但是，意大利没有类似于德国宪法所规定的联邦制惯例，尤其是帝国议会、帝国法庭，以及为帝国军队招募士兵的帝国团体的地方体系。

第六章　旧秩序下的意大利

这些地区的国王不是“人民的国王”，人民却是“国王的人民”。

“由于米兰人民生活在奥地利政府的压迫之下，他们对奥地利政府的怨恨与恐惧超过了世人对任何政府的怨恨与恐惧。奥地利政府对米兰人民的压迫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比之前任何一位主子（西班牙是奥地利之前的那位）都让他们感到不堪重负。要是有谁能帮助他们摆脱奥地利，米兰人民自会欣然接受，但是皇帝（查理六世）的3万士兵让他们心生敬畏。”

——1726年，英国访问者约翰·米尔斯关于意大利统治的评论

权力的拉扯

18世纪上半叶的意大利处于战争当中。战争使意大利领土的控制权发生了重要变化，由此导致整个意大利境内的统治权也有了变数。所有这些具有破坏力的战争造成极大的分裂。与此同时，独立国家均试图提升政府权力与效力，尤其是撒丁岛（萨伏伊——皮埃蒙特）与外国列强统治下的意大利领土，例如米兰（伦巴第）。

下文的描述十分详尽。它对于向我们说明统一前意大利政治的本质及当时地缘政治的成因，至关重要。意大利18世纪的战斗始于1701年。当时，法国试图阻止奥地利入侵米兰。因为皇帝利奥波德一世（1658—1705年在位）当时准备接受对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遗产的分割，西属意大利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重要目标，尤其是米兰。1701年，在海牙大同盟体系下，奥地利、法国、英格兰与荷兰一致支持将西属意大利分给利奥波德。相反，路易十四赞成由他的次孙，安茹公爵腓力（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继承整个西班牙王权。路易十四成功地与萨伏伊——皮埃蒙特的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结盟，而后者生活在大国的包围之中。萨伏伊——皮埃蒙特的西面是法国，东面是西属伦巴第，南面是亲西班牙的热那亚。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之前与法国签订的同盟条约将于1703年的最后一天到期失效。他向

利奥波德解释说，当时为避免被法国占领，他除了签约别无选择。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一直就想着条约一到期就改变立场，而且他也确实这么做了，目的是获得英国与荷兰的补贴，以及得到占有米兰部分地区的承诺。

意大利任人鱼肉。1702年，奥地利为赢得巴伐利亚的马克斯·埃马努埃莱（1679—1726年在位）的支持，向对方提出以巴伐利亚交换那不勒斯与西西里的方案。结果马克斯向奥地利催要米兰，而马克斯在1704年也向路易十四提出了这项要求，并且还附加上穿过提洛尔前往米兰的宽阔廊道。

战争解决了争端。1706年，由尤金亲王与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率领的奥地利——皮埃蒙特联军打败了围攻都灵的法军。皮埃蒙特众议院将会一再强调这项重大成就，而这项成就也凸显了统治者与战争之间的联系。法国人战败后撤出意大利。反过来，1707年，奥地利人占领了那不勒斯。1708年，他们在英国海军的支持下夺得撒丁岛。

在战时秘密谈判中，米兰的未来起到了关键作用，而整个意大利则成了外交活动的沃土。1711年，法国人为赢得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的支持，提出把米兰送给他，并封他为伦巴第国王。次年，即1712年，法国又提出除了将巴伐利亚归还给他们的盟友马克斯·埃马努埃莱外，还要把西西里岛分割给他。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那就把撒丁岛给他。法国拒绝了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提出的扩大阿尔卑斯山脉屏障的要求，因为那会让法国的多芬省易受攻击。

到头来，根据1713年签订的《乌德勒支和约》的规定，奥地利统治者、查理六世皇帝（1711—1740年在位）获得了除西西里岛外的西属意大利，而西属意大利则归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所有。萨伏伊家族获得世袭国王头衔，这对意大利的统一来说至关重要。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是安妮女王（1707—1714年在位）的“表妹夫”，因为他的妻子新奥尔良的阿内——玛丽是安妮女王的小姨亨利埃塔的女

儿。安妮女王乐意看到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成为国王，因为英国政府需要一个弱小的盟友来牵制西西里岛。和约也解决了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此前提出的阿尔卑斯山脉边境问题，但最终所得的没有如他当初想要的那般丰厚。不过，和约规定的安排比旧有边境在地理上更具连贯性。哈布斯堡王朝获得的曼托瓦公国得到了承认：此前与波旁王朝结盟的曼托瓦公爵被视为叛徒。他的国家与头衔都遭褫夺，公爵本人也逃往威尼斯避难并在那里去世。

查理六世不想放弃西西里岛，但被迫在1714年接受了和约条款。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1700—1724年在位）未与查理签订任何协议。1714年，他（在第二段婚姻中）迎娶埃丽莎贝塔·法尔内塞也表明对意大利仍感兴趣。埃丽莎贝塔是无子嗣的帕尔马公爵的侄女，而维也纳宣称帕尔马公国是帝国封地。

1717年，战争再度在意大利爆发。在《乌德勒支和约》签订4年后，西班牙成功入侵撒丁岛。1718年，西班牙又向西西里岛发起进攻。1717—1720年、1733—1735年，以及1741—1748年，意大利战事不断。当时的紧张局势一直持续到1748年。就意大利而言，这主要是因为奥地利与西班牙的野心均未得到满足。感到满意的都是诸如威尼斯这样弱小的意大利国家。变化不能给它们带来任何收益。当地世家预料之中的绝嗣所带来的好处加剧了两个大国间的争端。1731年，帕尔马的法尔内塞公爵们的男性继承人绝嗣；1737年，托斯卡纳的美第奇家族大公们的男性继承人也没了后代。腓力五世支持由他与埃丽莎贝塔·法尔内塞的长子，即出生于1716年的唐·卡洛斯三世来继承两地。但是，查理六世试图将这些领地作为帝国封地来实行管辖。

对抗天花

致命的敌人除了其他人类还有许多别的威胁。天花曾是个需要

认真对待的杀手，尤其是对儿童而言。它带来了死亡危机，包括1707年、1719年在米兰，以及1726年在维罗纳的情形。18世纪50年代，天花在意大利暴发；18世纪60年代初，它在威尼西亚出现。天花也不分等级，1777年，它夺去了那不勒斯的费尔南多一世兄长的生命，结果国王让他的孩子们都接受天花预防接种。

疾病难以战胜。人们常以不愿冒险扰乱神意为由，拒绝接受天花接种。这种行为并不总是无知的。1772年，一位英国旅人诺顿·尼科尔斯牧师在罗马写道："这里的天花似瘟疫般肆虐。它带来了一场可怕的浩劫。人们对接种存有很深的偏见。他们荒谬地认为，混乱也许会卷土重来。但是，如果让它自然而然地结束的话，天花就会停止。"事实上，1714年以后，接种在意大利的传播也许与天花的高发病率有关。因为进行过接种的人在没有隔离时会成为传染源。打预防针而非预防接种在击败天花时起到重要作用，但它直到19世纪时才被引进。

那个时期的冲突与外交将导致超过一半的意大利控制权的转移。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在无视当地统治者与居民意愿的情况下发生的。意大利统治者们确实试图通过外交方式表明并捍卫自己的利益，但往往均以失败而告终。1710年，托斯卡纳的科西莫三世为最终重建共和政府寻求支持，后来决定由自己的女儿在他那没有子嗣的儿子们之后继承王位。1713年，佛罗伦萨参议院与二百人会议以法令的形式通过并认可了由科西莫三世之女继位的主张。但是，科西莫三世未能给女儿的顺利继位赢得多少国际保证。1714年，查理六世拒绝了科西莫三世的主张。1716年，科西莫三世选定由摩德纳的埃斯特家族作为女儿的继承人，以期实现领土统一。事实上，如此一来，也许能打造一个强大的意大利国家，成为萨伏伊——皮埃蒙特的代替品，但查理六世不愿接受这个方案。

其他意大利统治者的需求也遭到无视。查理六世拒不承认维托里

奥·阿梅迪奥二世为西西里国王，拒绝保证其领地的完整性。1716年，查理六世为推动一项边界争端，派军前往热那亚共和国的诺维。查理对米兰、曼托瓦与那不勒斯的控制，为这样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基础。

1720年，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被迫以西西里岛交换更加贫穷的撒丁岛。这反映出意大利统治者们面对决策时缺乏回旋余地的被动地位。此前的这项协议结束了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与西班牙在1717—1720年间的战争，而战争起因是西班牙入侵撒丁岛。这一交换对意大利的未来意义深远，因为它使萨伏伊——皮埃蒙特能与对它影响极少的领地相连。相比之下，正如12世纪末及13世纪时，西西里岛与霍亨斯陶芬家族间所展示的那样，西西里岛更加富庶、人口众多，在历史上也更易引起人们的共鸣。那种情况当时也许会对萨伏伊——皮埃蒙特国家及随后的意大利历史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通过加强意大利复兴运动与南方重要地区之间联系的方式。相比之下，南方人认为，意大利复兴运动就是接管。

以西西里岛换取撒丁岛满足了查理六世将西西里岛与那不勒斯王国再度统一在一起的心愿。有意义的抵抗不是来自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而是来自那些想把查理挡在西西里以外的更有实力的统治者。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此前能得到西西里岛，多亏了法国与英国的支持，特别是英国。1713年，一支英国海军中队把他送到了那里。但是，乔治一世（1714—1727年在位）并未贯彻执行安妮女王的托利党大臣们反奥地利的政策。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后，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愤愤不平地抱怨法国未能遏制住奥地利在意大利的扩张。

1718年，西班牙出人意料地进攻西西里岛。大多数西西里人并不支持自己的国王，而西班牙又迅速攻占了岛上的大部分地区。这使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的外交手腕顿时失去了用武之地。2万名西班牙士兵在巴勒莫登陆，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的1万名士兵则散落于西西里岛各部，巴勒莫仅驻兵1400人。影响西班牙命运的不是维托里奥

·阿梅迪奥二世，而是其他列强的军事行动。列强下定决心，只有在它们允许的情况下，《乌德勒支和约》才有发生改变的可能。此前，英国舰队的军备未能阻止西班牙人入侵西西里岛。但是，1718年，英舰在离西西里岛的卡波帕塞罗不远的海面上，摧毁了大部分西班牙舰队。与此同时，查理六世已与英法签订协议，为交换西西里岛与撒丁岛做好准备。一旦帕尔马与托斯卡纳的本地世家绝嗣，查理六世就将为唐·卡洛斯继承两地做好准备。

有时，当地的一些人也起了些作用。就那不勒斯而言，大多数人在1700年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二世去世时还是忠于西班牙的，而且尽管在1701年曾爆发过一场支持奥地利的失败政变，他们还是认可由腓力五世即位的。然而，面对1707年奥地利的征服，人们并没有反抗。与实用主义相对的是人们一直以来无论在哪位国王统治下，都想要为那不勒斯王国及其精英阶层尽可能地争取更多自主权。人们没预料到会有完全的独立，因此当它在1734年悄然到来之际，大家都喜出望外。人们的目标是避免完全、直接地隶属于某个专制君主的统治。

查理六世并不真的想在意大利确立唐·卡洛斯的统治。奥地利拒不屈服于西班牙的压力，这导致西班牙在1729年与英法签署了《塞维利亚条约》，以达成和解。条件是，英法支持西班牙在帕尔马与托斯卡纳驻军。人们也许会觉得不可思议，这样一个明显看来相对无足轻重的议题对当时的意大利与欧洲外交居然如此重要。但是，鉴于西班牙对国际担保缺乏信心，在两地的卫戍就成了确保卡洛斯顺利继位的唯一基础。同时，在欧洲其他国家看来，这些卫戍部队可能是西班牙摧毁现存的意大利体制、开创自己的意大利征服伟业的工具。在腓力五世的统治下，当时的西班牙刚好再度处于上升期。作为英国与奥地利和约的一部分，1731年3月，奥地利同意接受西班牙驻军。一支由英国与西班牙组成的联合舰队护送西班牙军队前往里窝那（来克亨）。卡洛斯也在同样的陪护条件下，紧随其后。由于帕尔马的安东尼公爵在1月去世，而且让欧洲外交家们翘首以盼的安东尼公爵寡妻的孕事

到头来又是空欢喜一场，卡洛斯继位成了新公爵。

法国反对奥地利主导的欧洲新秩序。1733年，法国与西班牙一道攻打奥地利。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的继承人卡洛·埃马努埃莱三世与波旁家族联盟，为他们提供援助。卡洛·埃马努埃莱三世在他的父亲迎娶情妇安娜退位之际，继承了王位。1731年，在安娜的影响下，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试图重掌王位，结果遭逮捕后被投进大狱。安娜被送进一所收容改邪归正的妓女的感化院，后来又被遣往女修道院。在很大程度上，奥地利的困境源于意大利。因为在那里，英国外交未能解决奥地利与卡洛·埃马努埃莱三世间就朗格边境地区最高统治者地位方面存在的分歧，也未能解决奥地利与西班牙就卡洛斯的领地及西班牙军队在意大利规模上的矛盾。在一个等级与认可度是地位与权势重要指标的社会里，这些问题是极其令人恼火的。但是，显而易见的是，腓力及其妻子正伺机恢复西班牙对意大利的影响。

1733年，卡洛斯与卡洛·埃马努埃莱三世签订的《都灵条约》规定，卡洛斯将获得那不勒斯与西西里岛，米兰归卡洛·埃马努埃莱三世所有。那年冬天，法国与撒丁岛军队横行于米兰。次年夏，卡洛斯攻克那不勒斯，意大利南部的奥地利军队败于比通托。这是18世纪最关键的战役之一。尽管萨伏伊——皮埃蒙特也参与其中，但是它带来了在波旁王朝霸权统治下短命且松散的意大利统一。腓力五世将他在那不勒斯与西西里岛的权力割让给了卡洛斯。卡洛斯因此自立为那不勒斯国王。虽然卡洛·埃马努埃莱三世已按照《都灵条约》规定统治米兰，而且他试图占领仍为查理六世所有的曼托瓦，但是腓力两个国家都想要。腓力的妻子认为，帕尔马、托斯卡纳、那不勒斯与西西里岛将来应该由她的儿子们来继承。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要求是谈判筹码。但是，它们也意味着重新分配领土的大胆愿望。这是数百年间意大利历史上外交活动的常规。

1734年，奥地利企图重新占领意大利北方，但是这个计划在帕尔马与瓜斯塔拉遭遇失败。1735年，奥地利人被迫龟缩在曼托瓦的泥沙

堡垒防御工事内，不过撒丁岛与西班牙间的严重分歧助了他们一臂之力。奥地利向英国施压，让后者派出海上援兵，却被英国避开了。然而，法国决定抢在盟友之前与奥地利单独议和，并且愿意在意大利问题上做出妥协。妥协与等价物是那个时期条约必不可少的特征。然而，1738年条约的签订依靠的是撒丁岛的弱点及西班牙无力继续单打独斗的事实。和约使卡洛斯，即如今的那不勒斯国王卡洛七世，获得了那不勒斯、西西里岛与要塞城镇。但是，作为交换，帕尔马归查理六世所有，托斯卡纳重新回到洛林公爵弗兰茨一世手中。作为报答，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岳父，斯坦尼斯洛斯，吞并了洛林。因此，1766年，他就替法国赢得了洛林。正如在《1698—1700年分割条约》中所规定的那样，列强要求意大利给出等价物，弥补其他地方获益的亏空。1737年，吉安·加斯托内去世，弗兰茨一世随即继承了托斯卡纳。因为弗兰茨一世之前在1736年迎娶了查理六世的继承人玛丽娅·特蕾莎。卡洛·埃马努埃莱不得不将米兰归还给奥地利，但他还是获得了米兰的部分地区，尤其是诺瓦拉周围的区域。这就使仍归查理六世所有的领地更易受到攻击。

1740年，查理六世去世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爆发。查理没有儿子，因此就想把自己的全部遗产留给长女玛丽娅·特蕾莎。不过，其他统治者把这看作是获利的良机。可是，英国海军的军事行动影响了波旁家族在意大利的敌对活动。面对遭受轰炸的威胁，那不勒斯国王卡洛七世在1742年宣布中立。此事显示出18世纪最惊人的一场海军力量展示的效果。起先，卡洛·埃马努埃莱表示中立，结果在1742年将矛头指向西班牙。当时，西班牙军队前进到波河河谷。英国向玛丽娅·特蕾莎施压，在1743年签订了《沃姆斯条约》。在条约中，玛丽娅许诺将皮亚琴察与米兰的部分地区割让给卡洛·埃马努埃莱，而英国则要为玛丽娅的盟友们提供慷慨的财政支持，并为卡洛·埃马努埃莱提供海军支援。卡洛·埃马努埃莱此前决定，通过与奥地利、英国结盟而非对抗的方式，在米兰问题上使对方让步。一个月后，《第二次波旁家族盟约》使法国承诺帮助唐·菲利波一世攻克米兰、帕尔马与皮亚琴

察。唐·菲利波一世是腓力五世与埃丽莎贝塔·法尔内塞的次子。1743年，西班牙军队占领了卡洛·埃马努埃莱的萨伏伊公国，并且一直控制着那里，直到战争结束。但是，波旁家族突袭卡洛·埃马努埃莱阿尔卑斯山脉防御工事的计划失败了。意大利战争诡谲多变。1745年，波旁家族与热那亚结盟后，在巴西尼亚纳打败了卡洛·埃马努埃莱，占领了阿斯蒂、卡萨莱与米兰。所有这些都发生在1745年年底前。随后，在圣诞节前，波旁家族又与卡洛·埃马努埃莱签订了停火协议。

法国外交大臣阿尔让松侯爵勒内·路易急于将奥地利人赶出意大利。于是，他提议让卡洛·埃马努埃莱成为伦巴第国王与意大利联邦首领。阿尔让松认为，意大利统治者们反对奥地利专横暴虐的统治、寻求自由，波旁家族应该利用这一点。但是，腓力五世反驳道，联盟并不可行，或者说要花数年时间才能谈妥。它将依赖于波旁家族的武力支持，而且，任何联盟都要由一些实力相近的国家组成，但撒丁岛（萨伏伊——皮埃蒙特）实力过于弱小，这样联盟就无法组建起来。卡洛·埃马努埃莱也不会捍卫计划中的“主权国家共和国”，反而会想方设法掠夺它，他也会掠夺而非帮助唐·菲利波一世。考虑到法国与萨伏伊——皮埃蒙特各自最终在推进并实现意大利统一时所扮演的角色，考虑到事实上其他意大利王朝，尤其是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遭到掠夺的程度，这些论点看起来是有趣的。因为强大的法兰西王国阻止了萨伏伊众议院任何扩大自身实力的企图，而萨伏伊王朝的梦想又是重建勃艮第公国，所以，埃曼纽尔·菲利贝尔此前已将首都从尚贝里迁至都灵。直到维托里奥·阿梅迪奥统治时期，萨伏伊在意大利的扩张政策才开始奏效。维托里奥·阿梅迪奥给他的儿子及继承人卡洛·埃马努埃莱三世的指示是“意大利就像洋蓟一样，得一片一片吃”。腓力五世也深谙此道，他的发妻是维托里奥·阿梅迪奥的女儿，而且他也对萨伏伊王朝与英国间的密切联系表示怀疑。

卡洛·埃马努埃莱决定，不考虑法国的方案。这使阿尔让松的计划变得不切实际了。结果，1746年，奥地利重新占领了阿斯蒂、卡萨莱

与米兰。奥地利——撒丁岛联军在皮亚琴察告捷。这是那个世纪里又一场被大多数人遗忘的关键性战役。但是，奥地利人并没能如愿以偿地把卡洛七世赶出那不勒斯。此外，1746年12月，当一场民众反叛将奥地利人逐出他们此前占领的热那亚时，奥地利人没能再夺回该城。这次反叛导致当地农民掀起党派之争，工人们组成部队。牧师受训参战，妇女在防御工事上忙碌着。这次起义所展现出的狂热往往未能引起它在意大利公共历史上应有的关注。部分原因是，人们把焦点放在了后来发生的全国性意大利复兴运动的叙事上去了。更普遍的情况是，热那亚历史在利古里亚与意大利之外的地方往往被忽视。

多亏了海军，英国人全程参与了这场意大利战争。1742年，英国成功保护了尼斯，随后是卡洛·埃马努埃莱的部分领地。但是，1743年，英国人却失败了。1744年，英军为在罗马以南战斗的奥地利军队提供了补给，同时阻止法国、西班牙从海上向意大利输送军队。1746年，英国帮助奥地利与撒丁岛攻克热那亚、重获尼斯。英国战舰也转移了撒丁岛军队，前去支持科西嘉反抗热那亚统治的叛乱。当热那亚反叛时，英国人通过封锁从旁协助盟友。虽然奥地利并不情愿，但是在最终的《亚琛和约》（1748年）中，卡洛·埃马努埃莱获得了此前他在《沃姆斯条约》分割到的除皮亚琴察以外的土地。唐·菲利波得到了帕尔马、皮亚琴察与瓜斯塔拉，在意大利建起了新波旁领地与波旁王朝，但是其规模无法与那不勒斯及西西里岛相提并论。

正如热那亚在1746—1748年所显示的那样，意大利人受到了权力政治的影响。地方主义往往是他们的应对之策。在西西里岛与那不勒斯，鲜有人支持奥地利或萨伏伊——皮埃蒙特的统治，人们反而相当亲近西班牙，尤其是它的文化。因此，由强大守护神与民众坚定虔诚的宗教信仰构成的世界，继续横扫西班牙与意大利南部，并预示着下一个世纪的情形。

经济与社会

统治的本质，尤其是统治者们的本质，没能给英国旅行者们留下深刻印象。理查德·科里德将1694—1727年的帕尔马公爵弗朗切斯科描绘成严酷之人：“公爵是大地主，所有臣民都是奴隶。他们对公爵言听计从。”对曼托瓦公爵，科里德描述如下：

> 费迪南多·卡洛·贡扎加二世（1665—1707），其貌不扬，就像个英国农民。每天自己驾着一辆小篷车周游城镇，车上带着四把手枪，随行的只有一名男仆；他约有50岁，却是个浪荡子，至少养了80名情妇，而且保证她们生活舒适；这些情妇为他表演歌剧，因为她们都生得健美且能歌善舞；他在镇上约有70个孩子，但没有一个是与公爵夫人所生；他很专制，随随便便就把人投进监狱；他随心所欲地把人吊死，全凭自己高兴去集资；因为没有继承人，他挥霍无度。乔万尼·加斯托内（1723—1737年在位）是美第奇家族的最后一位托斯卡纳大公。威廉·迈尔德梅将他描绘成一个乐于让人看他行房，尤其是鸡奸的人。不过，威廉·迈尔德梅酗酒成性，并不能完成性事。

经济对人口来说更加重要，但很难决定其整体趋势。人口显然增长了，尤其是与17世纪相比，增长显著。同时，人口增长也使机遇与挑战共存。18世纪，威尼斯人口依然保持在137000左右；都灵人口则从44000上升到92000；西西里人口从100万上升至150万；本土的那不勒斯王国人口翻了一番，达到500万。意大利总人口从1300万升至1700万。

最显著的经济相对衰退体现在外国商品与商人打入了地中海市场。例如，1675年，托斯卡纳的里窝那被指定为自由港。这让英国与荷兰商人从中受益。英国人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已作为经纪人活跃于威尼斯。他们对威尼斯与土耳其帝国之间的转口贸易造成了打击。

与此同时，对一些领域的研究已经表明，意大利经济有着极大的韧性与适应性，并取得了增长。例如，对17世纪伦巴第与威内托的研

究，或者是对18世纪威尼斯贸易与威内托工农业的研究均可证明这些。通常情况下，最明显的是意大利情况的多样性。作为地力肥沃、得天独厚的农业区，自18世纪30年代起，伦巴第的水稻种植量就出现了增长。一部分原因是佃农的活动，一部分原因是有充足的当地资本保证必要的灌溉。18世纪下半叶，虽然水稻需要一定程度的灌溉并由此给淡水供给造成压力，但是伦巴第农业出现发展迹象，尤其是大米、丝绸、奶酪与黄油出口量的上涨。当时，威内托农业也有重大发展，那里的玉米种植传播范围广。阿普利亚与卡拉布里亚的橄榄油生产高度产业化，且以出口为导向。葡萄藤是重要的经济作物，它在18世纪传到了弗留利。

但是，总而言之，意大利处境凄凉。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传统方式与粗放耕作的结合，没有农业改良与密集型方式。在伦巴第平原上，动物提供肥料（也因此提高地力）、产出牛奶。这种混合耕作在其他方面无甚建树，而且，人们扩大土豆种植的努力也收效甚微。地形恶劣、土壤剥蚀、供水不足、交通不便与投资匮乏的主要问题在半岛上依然普遍。这与英格兰及荷兰的情况截然不同。在托斯卡纳，犁只能使浅表的土隆起，而真正意义上的土地翻整只能通过铁铲实现。在托斯卡纳的阿尔托帕肖，平均结婚年龄从1700年前的21.5岁上升至1700—1749年的24.17岁。相应地，平均每对夫妻生育的儿童数也下降了。平均结婚年龄上升。这也许是因为收入的减少，而收入的减少又与18世纪初小麦价格的下跌相一致。

饥荒会导致大量死亡。例如，饥荒在1709年造成巴里、佛罗伦萨与巴勒莫死亡率激增，1764年又使那不勒斯王国死亡率骤然上升。那不勒斯的那次饥荒使费迪南多·加利亚尼（1728—1787年在位）在1769年撰文强烈谴责谷物自由贸易。他颇有见地地指出，这是以牺牲农村地区为代价让城市受益。毫无疑问，饥荒反映了社会救济与粮食供给系统的缺陷。1764—1768年的饥荒也许是1767年袭击意大利中部的流行热病暴发的原因。饥荒也会引发暴动，正如1773年巴勒莫与

1790年佛罗伦萨的情况那样。此外，庄稼歉收严重扰乱了经济秩序、威胁国家税收。集中于18世纪下半叶的人口增长让谷物供给成了老大难的问题。

面对灾祸，社会与个人向教会寻求帮助。教皇克雷芒十三（1758—1769年在位）以祈祷仪式来应对18世纪60年代的饥荒。正如1765年与1766年在米兰那样，佛罗伦萨在1765年暂停了一切大众娱乐活动，举行公众祈祷仪式以求风调雨顺重返人间。1769年4月，人们列队举着一幅圣母玛利亚的神像在泰拉奇纳的街道上游行，祈求有个好天气。许多群众参与进来。1755年，威尼斯当局在遭遇饮用水匮乏引发的危机时，发掘出一尊圣母雕像。

产量增加的主因并不是生产率的提高，而是耕地面积的扩大，尤其是自18世纪中期以来。正如在英格兰一样，人们把公共用地围了起来。尽管18世纪下半叶，商业农业在意大利大部分地区普及开来，但是生存农业仍是常态。尤其是在意大利南部地区，粮食生产依然是传统生存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情况在内陆许多地区还是很普遍的。那不勒斯除外，因为它的市场通常是当地的。贵族阶层从上涨的粮价中获益，他们基本上是一群寄生虫，将农村地区的租金用作城市支出。1781—1786年，多梅尼科·卡拉乔洛侯爵担任西西里总督。他将落后的地方农业归咎于贵族阶层很少的投入。与英国贵族阶层对新农业方法的投入相比，整个意大利，尤其是南方地区，在这方面着力较少。

但是，意大利没能像英格兰、加泰罗尼亚与低地国家那样，发展出更加多产的农业经济，并不是因为不努力。18世纪60年代，帕尔马公国才华横溢的法裔首相纪尧姆·蒂罗鼓励人们种植大麻、亚麻、红豆草、土豆、桑树与葡萄藤，改良家畜育种。他还资助出版了一本养蜂的专著。18世纪80年代，卡拉布里亚贵族多梅尼科·格里马尔迪要求国家为橄榄油产业购置新压榨机提供贷款，建议国王任命指导者在农村地区巡回展示压榨机的使用方法。但是，事实表明，将新思想转化

成实际行动是困难的。这些新思想包括许多农业学院或是18世纪60年代帕尔马创业中心所提出的观点。当时，小规模农场主兴趣不足。部分原因是，他们没有像在加泰罗尼亚与低地国家的一些地区那样，通过家庭农场继承获得普遍延续性与控制权。他们也没有如英格兰那般，通过定期续租获得优势。这种情况使贵族阶级的态度变得更加重要。政府从来自农村省份的税收中获得财政收入，却极少采取措施提高这种收入。一般来说，意大利没有致力于改革的社会团体，或者说这种社会团体是有缺陷的。

农村地区家庭生产规模的扩大可算作变化的例证。丝绸制品与羊毛织物依然是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的基本产业。更加普遍的进程是，热那亚商人将城市周围乡村地区的农业工人组织起来，从事天鹅绒生产。农业工人长时间劳作，还必须保证织布机运作良好。这种情况为妇女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

当时还出现了最初的工厂。1769年，伦巴第的科莫镇成立了25家生产羊毛制品的企业，总共雇用了180名工人；科莫还有2000名工人在155家企业中生产其他织物；78名工人工作于4家染坊；80名工人劳作在3家制革厂里；23名工人效力于4家肥皂厂；12名工人受雇于2家制帽厂；20名工人用11台织布机生产棉纺制品；120名工人用2台织布机生产针织长筒袜。1774年，在邻近的洛可镇，500名妇女受雇从事制丝工作。同年，在位于科莫湖的贝拉吉奥镇，有6家肥皂厂，还有7台用于生产针织布的织布机。在上维内托，以家庭为单位的纺织业中的某些领域从“外包”转向了更加集中、基于工厂的机械化生产。

但是，国内市场疲软、资本不足、交通不便，外国竞争激烈以及技术落后制约了大多数意大利产业的发展。1767年，伦巴第仅有1.5%的人口为工业工人。虽然当时的定量数据往往都有缺陷，但这个比例远低于英格兰。一些地区出现了工业扩张，但另一些地区存在着去工业化的趋势，例如博洛尼亚。

为意大利写诗

1729年，约翰·赫维男爵在与年轻朋友史蒂芬·福克斯周游意大利时，写道：

“放眼望向意大利全境，
除了贫困与自大，还能看到什么？
愚蠢迷信的闹剧，
腐朽、贫穷与忧郁；
专制权力的洗劫，
国富民穷；
村无人居、地无人耕，
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贵族可悲地伟大着，
在绘着壁画的穹顶下，在空空如也的国家里，
骄傲得不愿劳作，贫穷得没有饭吃，
做事不择手段，
他们不思进取也就不配享乐。
苦难铸就圣人，
他因无所事事而祈祷，因缺吃少喝而禁食。”

交通设施

18世纪80年代，意大利出现了更多变化。虽然交通设施依然普遍不足，但已有所改善。1748年，500多名劳工受雇修建一条从博洛尼亚到佛罗伦萨的新路。人们希望这条路会促进伦巴第与托斯卡纳间的贸易。18世纪70年代，那不勒斯政府试图通过修路来开放诸省。18世纪80年代，位于更北的阿尔卑斯山脉南麓的腾达山口成了阿尔卑斯山第一个通车的关口，从而改善了从皮埃蒙特到尼斯的陆路运输。腾

达山口的修建历时17载。

然而，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的地形十分不利于道路与水路交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当时，高速公路修建带来了许多大胆的工程方案。状况才由此得以改善。山区地形扩大了人们对耕畜的需求，也限制了运输速度。糟糕的路况使旅程变得漫长且充满变数。一位挑剔的英国评论员在1772年观察到：

> 那不勒斯一直通到巴勒塔的路都是极好的。从那不勒斯到罗马的路况之所以这么好，公众应该对国王陛下感恩戴德，因为这是国王结婚用道；这些地区的国王不是“人民的国王”，人民却是“国王的人民”。

事实上，在意大利南部，路况如此之差以至于人们发现用船运送橄榄油更容易。1766年，托斯卡纳政府的一项调查表明，从陆上将商品由佩夏运往阿尔托帕肖的成本与通过水路将商品从阿尔托帕肖运往里窝那的成本是一样的，而后者的距离是前者的6倍。虽然1777年从米兰经阿达河，再到莱科的小马地山那运河已经开通，但是威尼斯内陆地区以外的意大利北部运河系统并无重大扩展。在那里，从15世纪到18世纪90年代奥地利接管期间，运河网与河道网合二为一。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并不适宜开凿运河，但这并不是唯一的问题，尤其是在意大利北部。

精神生活

当时，出现了知识发展的迹象。但是，它大多依赖于特定的知识传统及具体的政治、文化情况。意大利启蒙运动的中心是那不勒斯、米兰，18世纪末的托斯卡纳、摩德纳与帕尔马。相反，教皇国、热那亚，在最后一位美第奇统治者主宰下的托斯卡纳及萨伏伊——皮埃蒙特不太支持新思想。事实上，1737年，教皇克雷芒十二（1730—

1740年在位）试图阻止人们在佛罗伦萨圣十字教堂为伽利略修建陵墓。1759年，克雷芒十三抨击了法国进步思想的宝库《百科全书》。相反，那不勒斯的修辞学教授詹巴蒂斯塔·维柯（1668—1744年）在他的《新科学》（1725年）中强调指出人类社会的历史进化。时至今日，人们依然认为他是现代意义上历史学科的奠基人。

科学跨度很广，从不可思议之处到理性层面无所不包。博洛尼亚的医学教授马尔切罗·马尔皮基（1628—1694年）是微观解剖学之父。他认为，所有人最初都是白种的，但后来罪人变成了黑人。1737年，伯纳德·阿尔比努斯（1697—1770年）错误地宣称，黑人的胆汁是黑色的。与这些胡说八道相比，令人感到欣慰的是，1760年，前艾米利亚神父、学者拉扎罗·斯帕兰扎尼（1729—1799年）指出，自然发生论所谓的实验证明是错误的。自然发生论认为，无机质能变活。斯帕兰扎尼的论断推动了弗朗切斯科·雷迪伯爵的研究。伯爵曾通过腐肉中苍蝇的诞生，证明自然发生论的谬误。斯帕兰扎尼证实，细菌无法自然产生。因此，自然生产根本就不可能。他还研究了血液循环、心脏在血液循环中的活动，以及消化。在那不勒斯，圣塞维罗亲王雷蒙德·迪·桑格罗进行了遗体防腐处理实验，研究了人体。人们可以在圣塞维罗礼拜堂看到亲王的研究成果。它们与令人惊奇、栩栩如生的雕塑放在一起。1736年出生于都灵的朱塞佩·路易吉·拉格朗日是数学史上的重要人物。

另外一些理论更加重要，但并不总是那么易于付诸实践。1775年，伦巴第官员马尔西奥·兰德里亚尼（1751—1815年）提出了气体测定法（对空气质量的研究）。1776年，他被任命为米兰物理学教授。人们宣称，他的研究有益于公共卫生研究。事实上，当时是不可能测出空气质量的。空气质量与适合呼吸度之间的关系本可通过估算样本中的氧气含量得出，但在当时是不清楚的。因此，气体测定法被舍弃了。

相反，多亏了威尼斯人弗朗切斯科·阿尔加罗蒂伯爵（1712—

1764年）的出版物，艾萨克·牛顿爵士的思想才在意大利传播开来。后来，意大利人推进了关于电现象的讨论。1791年，路易吉·伽伐尼（1737—1798年）发表了他始于1780年观察导电对蛙腿肌肉影响的实验结果。他提出了后来称为伽伐尼电流的“动物电学”理论。该理论称，动物组织本身就带电。1779年，帕维亚大学物理学教授亚历山德罗·伏特（1745—1827年）对这种理论表示反对。1800年，他发明了电池组与干电池。

各个国家对改革措施的接受程度也不同。教皇国的情况极不乐观，当地人受到高文盲率、高乞讨率的影响。这种情况持续到19世纪。但是，其他地方大力改革，尤其是伦巴第、帕尔马以及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托斯卡纳。1771年，蒂罗在帕尔马失势，部分原因是他反对改革。

1771年，谢尔本伯爵二世威廉注意到：“目前，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一群又一群学者也许会向你提供建议，正如之前从一个修道院到另一个修道院人们给你忠告一样。”“学者”通常聚集在文化俱乐部“学院”，他们在那里讨论许多问题。当时，考古学也兴起了，尤其是在托斯卡纳。乔瓦尼·拉米是那里的关键人物。在政治方面，重要群体是围绕着米兰报纸《咖啡》的一群人，其中包括皮耶特罗·维利伯爵及其弟亚历山德罗，还有切萨雷·贝卡利亚侯爵。切萨雷写了一本小册子，谴责严刑拷打与死刑。这导致托斯卡纳大公利奥波德将它们都取缔了，同时这也影响了美国的国父们。文学家包括洛伦佐·达·彭特（1749—1838年）与歌剧剧本作家皮埃特罗·梅塔斯塔齐奥（1698—1782年）。威尼斯律师卡罗·高多尼创作了成功的喜剧，皮埃蒙特伯爵维托里奥·阿尔菲耶里复兴了舞台上的古典悲剧风格。

许多关于意大利史的著作将改革视为一种世俗的进程，但这种做法弱化了教会问题与教会活动的重要性。复杂的局势因国家而异，但主要问题往往是政府决定避免让教会干涉自己的内部事务并打算制约教会的影响。政府希望教会控制人们的善恶观念，这样由天主教徒组

成的政府就可以管好自己。威尼斯与罗马因此在1611年爆发了一场冲突。18世纪，第一次摩擦发生在都灵与罗马之间，争论焦点是西西里岛。当代术语是属地管辖原则。这事关教会与政府的管辖权问题。它的第一位辩护人是那不勒斯律师皮埃特罗·吉安诺尼。1727年，他撰写了一部那不勒斯民法发展史。本书索引中收录了这本书。该书指出，教会法庭权力过重且无法可依。这种方式虽未获得官方认可，但几乎让每位意大利统治者拍手称快。

卢多维科·安东尼奥·穆拉托里（1672—1750年）及其弟子也有权有势。穆拉托里在他的《基督徒的温和信仰》（1747年）中，提倡简单的礼拜仪式与大众教育，反对巴洛克式的虔诚行为。他还批评了教皇权力与隐修制度。聪明的穆拉托里在年轻时是位牧羊人，后来被学校录取，成了牧师，并当上摩德纳公爵的图书馆馆长。他写了一部历史著作，讲述自罗马帝国灭亡至1749年间的历史。穆拉托里想“热忱派”之所想。自1727年起，“热忱派”的一群枢机主教就强烈要求建立更加严肃、真正意义上的基督教教会。

18世纪60年代，改革思想得到反对教皇主张的统治者与大臣的支持，在那不勒斯与帕尔马传播开来。此外，虽然政府限制教皇及修道院权力，奉行宗教宽容政策，压制帮会与教会法庭，下令以后所有教区牧师都要在帕维亚神学院受训，但是，在18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派主教与牧师在伦巴第有很大影响。当时，帕维亚神学院在改革派神职人员的管理下已要进行重组。1784年，米兰统治者、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1765—1790年在位）亲自将金牌授予那里的改革先驱。1765—1790年，约瑟夫的弟弟利奥波德大公统治着托斯卡纳。他支持希皮奥内·利奇的改革，部分原因是利奥波德大公认为这是加强政府对教会控制的方式。希皮奥内是皮斯托亚与普拉托的主教。但是，希皮奥内为了让教区牧师获得更多权力、攻击隐修制度，进行了简化礼拜式活动、重组教会的尝试。这在1787年导致大多数托斯卡纳主教的反对，并引发普拉托叛乱。因此，利奥波德不再支持希皮奥

内进行改革。

长期以来，耶稣会士都被视为教皇代理人。教会中有许多耶稣会的对手，尤其是方济各会修士与多明我会修士。他们赞成对耶稣会士的打压。1764年，法国镇压了耶稣会；1767年，西班牙与那不勒斯竞相效仿；1768年，帕尔马紧随其后。克雷芒十三想保护耶稣会士。但是，他的继任者克雷芒十四（1769—1774年在位）在波旁王朝统治者的恫吓下，于1773年取缔了耶稣会。波旁王朝统治者们手中攥着教皇在法国的飞地阿维尼翁及那不勒斯王国的飞地贝内文托。这次取缔行为表明，教皇的权威已经式微。单独来看，它已经在1742年导致与萨伏伊——皮埃蒙特之间的司法权争端了。此外，世俗权威在1743年控制了托斯卡纳的审查工作，在1768年掌握了伦巴第的审查环节。

艺术

在文化方面，意大利失去了16世纪时的中心地位。但是，它依然至关重要，尤其是在艺术、音乐方面。统治者们依然是重要的赞助人。1714年，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把西西里建筑师菲利波·尤瓦拉（1678—1736年）请到都灵。后者重建了维纳里亚王宫的皮埃蒙特宫殿及里沃利，扩建了都灵皇宫，并于1729—1733年为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在首都外的斯林皮尼吉建了一座享乐宫与狩猎行宫。那不勒斯王室一出现，建筑师路易吉·万维泰利就于1752年在卡塞塔为他们建起了一座相当壮观的新乡村宫殿。

君主们除了建造新宫殿，还重建旧宫殿。这些宫殿的变化常常反映出风格的转变。尤瓦拉为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之母在都灵旧夫人宫正面建了一个精美的立面（1718年）。立面由用作庆典的巨大楼梯组成。出于美化宫殿的目的，统治者们赞助了各种类型的艺术学科，包括像卡塞塔那样的园林景观、绘画，以及精彩的创作。

1737年，第一座皇家歌剧院圣卡罗歌剧院在那不勒斯落成。它能容纳1300多人。1740年，卡洛·埃马努埃莱三世在都灵建成第二座皇家歌剧院，名为皇家剧院，专供王室与特权阶层享用。1778年斯卡拉歌剧院在米兰落成，它当时能容纳3600人。

富裕的贵族也是重要赞助人，尤其是对建筑、绘画与音乐的赞助。赞助人往往决定了艺术作品的主题，并影响其谋篇布局。1734年，尼科洛·洛斯基伯爵委派詹巴蒂斯塔·提埃波罗（1696—1770年）用湿壁画装饰他在维琴察附近的别墅。伯爵让艺术家创作了一系列复杂的说教式寓言画。在威尼斯，所谓的“威尼斯观众”，尤其是乔万尼·卡纳莱托、贝尔纳多·贝洛托、弗朗切斯科·瓜尔迪与乔万尼·帕尼尼，用暗箱与冷色调创作了精美的画作。他们把画作卖给那些想要把意大利印象带回家的人。

艺术往往涉及宗教主题，主要是因为得到了教会的资助。例如，自1728年起生活在意大利，主要是罗马的法国画家皮埃尔·苏贝利亚斯（1699—1749年）的赞助人，全是教皇、枢机主教与宗教教团。他最著名的画作《圣巴西尔的弥撒》就是为教皇指定的圣彼得教堂所作。蓬佩奥·巴托尼（1708—1787年）最为人所知的是为参观罗马的游客，尤其是英国游客，绘制的肖像画。他也创作了许多祭坛画，其中包括为圣彼得教堂创作的《术士西蒙的覆灭》。许多神职人员是伟大的个体赞助人。例如，教皇克雷芒十二与佛罗伦萨大主教朱塞佩·马尔泰利（1722—1741年在位）。

宗教也为艺术提供了赞助与主题，教堂则为许多音乐家提供了训练及工作机会。亚历山大·斯卡拉蒂（1660—1725年）是那不勒斯乐派歌剧创始人之一。1703年，他为罗马蒙特桑托圣母教堂“我们的卡梅尔山夫人节”年度庆典活动创作了音乐作品。1707年，亚历山大成了那里圣母大殿的唱诗班指挥。他的儿子多梅尼科是位有天赋的著名作曲家。多梅尼科与路易吉·博凯里尼一样，都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工作。

风格与技巧也有重大进步。例如，阿尔坎杰罗·科雷利、安东尼奥·维瓦尔第与朱塞佩·塔提尼推动了弦乐器演奏的发展，巴尔托洛奥·克里斯托在1709年左右发明了钢琴。意大利风格与同时代的欧洲音乐密切相关，并对后者产生深刻影响。亨德尔年轻时去过意大利，认识科雷利，还在罗马与亚历山大·斯卡拉蒂同台竞技。亨德尔还为教会及贵族创作了许多歌剧与康塔塔。随后，他将意大利歌剧与许多意大利歌手带到英国。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认真研习了维瓦尔第的音乐。巴赫还模仿了维瓦尔第的几首协奏曲。

意大利与艺术的世界主义

意大利是十七八世纪艺术世界主义的核心。在欧洲贵族阶层中，文化在主题、风格，以及艺术家与表演者的层面上是世界性的。旅行、赞助、文化中间人的作用，以及效仿的过程促进了世界主义的发展。大多数重要的法国艺术家都或多或少地在罗马的法兰西学院学习过，而且他们并不是那里唯一的学生。1728—1741年，纽伦堡画家卡尔·托施（1705—1751年）在意大利进行创作，随后去了伦敦，最后成了哥本哈根宫廷画师。相当多的意大利人为许多王室效力，包括德累斯顿、马德里与慕尼黑王室。詹巴蒂斯塔·提埃波罗在马德里与维尔茨堡作画。意大利在艺术、建筑及音乐领域的影响最大，但在文学领域的影响明显较弱。意大利是艺术家们的重要灵感源泉。它为其他地方的艺术家们提供培训、带去灵感。虽然赞助量有所减少，但它仍是一个能提供大量赞助的富裕社会。

稳定性

变革造成的紧张局势并未引发冲突。与1454年签订《洛迪和约》

一样，1748年《亚琛和约》签订后，意大利经历了长时间的国内外和平与领土稳定。甚至可以说，这种和平稳定比1454年时的情况更好。奥地利与西班牙联盟极大地强化了这种稳定性。因此，皮埃蒙特的扩张主义倾向遭到有效扼制：没有哪个国家会支持萨伏伊——皮埃蒙特吞并热那亚利古里亚海海岸部分地区。1768年，法国从热那亚手中购得科西嘉。虽然萨伏伊——皮埃蒙特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但却无能为力。部分原因是，英国不愿支持萨伏伊——皮埃蒙特。1769年，法国镇压了科西嘉的大规模民变。这为法国后来在意大利的政策带来了某种程度上的延续性。多亏了这笔交易，拿破仑在1769年出生时是法国人，而不是热那亚臣民。当时没有迹象表明大体情况会有所变化。意大利看似是个由独立国家组成的稳定系统。虽然它们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语言与文化，但在政治上毫无相似之处。

第七章　拿破仑改写了意大利政治

拿破仑主宰一切的意愿在意大利展现得淋漓尽致。

1789年对都灵人来说并不是个特别好的年份。次年1月发布的人口数据显示，1789年死亡人数是出生人数的155%，部分原因是麻疹流行。尽管人们从农村地区向城市迁移，但城市人口依然下降了。城中弃儿医院接收了500多名儿童，他们的父母大概已经去世或无力抚养他们长大。政府也同样面对着一些陈旧的问题。虽然政府在1775年颁布了规章制度，但公共财产管理仍有大量弊端。最终，政府不得不成立专门委员会来解决此事。

1789—1792年，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三世（1773—1796年在位）由于担心法国扩张主义复苏，尤其是在萨伏伊，所以特别重视军事问题。相反，这又使热那亚在1790年年初担心自己受到攻击，但是并无来敌。

尽管1790年夏，在都灵附近租种卡里尼昂亲王土地的农民因反对征税而揭竿而起，但是当时少有迹象表明，现有秩序很快将被打乱。政府禁止公众讨论政治，违者将遭逮捕。政府还限制了可流通的报纸量。但是，这些限制并无新意：都灵长期以来都是个监管严格的城市，那里的言论自由向来都受到了限制。所有这些都没能让都灵城乃至意大利整个国家为法国大革命的冲击做好准备。

意大利的形象

意大利最强有力的形象出自安·拉德克利夫（1764—1823年）的笔下。这位成功的英国小说家从未到过意大利。在她那相当成功的小说《奥多芙的神秘》（1794年）中，故事的女主人公去了意大利。小说的续篇《意大利人》（或《忏悔者的黑色忏悔》）（1797年）在英国受到热捧，并被迅速翻译成法语。在续篇中，被捕的艾伦娜看到阴森、强大、令人肃然起敬的意大利风景。

“当热气消退、光线暗淡下去时，马车驶入了布满岩石的峡道。峡道歪歪斜斜，马车似驶过颠倒的凸透镜一般。远处平原广阔、群山连绵，紫色的落日余晖映照满天。顺着这深邃幽暗的地方望去，一条河沿山间悬崖飞流直下，冲击磨损着黑色岩石，下落时水花四溅。继而，清澈的河水流向其他悬崖的边缘，从那里再度以千钧一发之势堕入深渊。刹那间，水花四溅、云雾缥缈，似乎在这孤寂荒野里称霸一方。河床占据了整个峡谷。看起来，它是由强烈地震造成的。河床边上都没有足够的空间可用作道路。因此，路在高高的悬崖间，紧邻河水，恰似悬于空中一般。幽暗、巨大的悬崖既高且深，流水嘶吼着，以惊人的力量一落千丈。二者让山隘妙不可言。

艾伦娜坐在马车里，向山上驶去。她并非漠不关心，而是镇定自若。她在俯瞰那不可遏制的洪流时，体会到某种可怕的快感。但是，当她看到道路延伸向一座小桥，而这桥又横亘在深不见底的鸿沟上，连接了两处相对的悬崖，湍急的河水从悬崖间倾泻而下时，她之前的快感变得强烈，升华成了敬畏之情。保护桥的只有一排细细的扶手。这桥似乎悬于云朵间。艾伦娜在过桥时，几乎忘却了自己的不幸。”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它结束了一段整体来说和平稳定的时期。是年末，法军入侵意大利北部地区。在法国大革命前，意大利已经出现了政治、经济上的紧张局势，但规模不及法国。让人感到不满的，大多是些陈旧的问题。例如，18世纪80年代，时任教皇市博洛尼亚总督的枢机主教邦孔帕尼不受当时贵族的待见。因为他此前引教皇军队入城，还进行了政府改革。在威尼斯统治的伊斯特拉，有个叫作卡波迪斯特里亚的城市。1769—1771年，那里的“人民”在一些持反对意见贵族的支持下，试图在由寡头政治小集团控制的地方议会中获得代表权。威尼斯政府毫不退让，这次尝试遭到抵制后失败了。在皮埃蒙特，根深蒂固的寡头政治也继续保持着相对的同质性。

到处都有各色群体敲响权力的大门。18世纪90年代，其中一些团体愿意向法国寻求援助，但没有多少迹象表明，这些群体数量巨大，或者说他们的反抗表现了激烈的社会紧张局势。18世纪，在皮埃蒙特，有专业技能的平民阶层扩大了自己所拥有的土地，而未引发明显的社会矛盾。1723年，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褫夺了一些不合格贵族的封地，然后将封地与相关贵族头衔一并卖给上层中产阶级，由此产生了一群更有经济头脑的新贵族。但是，1792年，英国驻萨伏伊——皮埃蒙特公使约翰·特雷弗从都灵汇报称：

> 不幸的是，在这个国家里，全社会分裂成两个阶级，即王室贵族与资产阶级，而且，二者间的界限如此令人不快且清晰明确，以至于双方长期以来都小心翼翼，不过仍很容易导致彼此敌视。两个对立阶级间没有中间色调能把它们融为一体。因此，意大利就没有我们生活幸福的英国那样一团和气。

与重重压力共存的是反对激进主义、反对法国的保皇派运动。注意到这一点很重要。18世纪90年代，保皇派运动即将在意大利获得大力支持，尤其是1794年、1799年在那不勒斯的情况。

1792年，法国攻占萨伏伊与尼斯。守军准备不足、人手不够，被驱散后仓皇撤退，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后进入皮埃蒙特。作为回应，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三世雇用了奥地利军队。是年11月，法国吞并萨伏伊。

像热那亚这样的中立国，因为担惊受怕而备感压力。交战国也对它们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要求。意大利统治者向外来势力寻求帮助。1792年，面对法国进攻的威胁，教皇庇护六世（1775—1799年在位）向英国求助，希望英国能震住法国。教皇国不仅请英国公开宣称自己处于英国保护之下，还要求英国派出一支舰队前往地中海地区以证明宣言确有其事。在英国公使看来，托斯卡纳无防卫能力又难以控制，而且，它的统治者费尔南多三世（1790—1801年在位）迫切想

让英国中队来到里窝那。那不勒斯对法国充满敌意，但是在1792年12月，一支规模要大得多的法国舰队来到了那不勒斯城不远处。面对法军兵临城下的威胁，那不勒斯政府同意认可法兰西共和国，并宣布中立。然而，1792—1795年，法国集结军队，在莱茵兰与低地国家采取军事行动。

自1795年起，拿破仑改写了意大利政治。他作为法国的意大利军团总司令驰骋沙场，在1796年形成了独特的军事领导才能：自信、当机立断、快速机动、集中兵力，而且在可能时利用内线。法国在蒙多维（1796年）取得的大捷把萨伏伊——皮埃蒙特踢出了局，在洛迪（1796年）、巴萨诺（1796年）、阿尔科莱（1796年）与里活利（1797年）惊心动魄的胜利碾压了奥地利人。意大利统治者们做出了回应。1796年，托斯卡纳大公费尔南多三世认可了法兰西共和国。

但是，事实表明，法国想要保持胜利是困难的。法国对伦巴第的残酷剥削导致那里在1796年爆发了一场民众起义，起义随后遭到严厉镇压。拿破仑冷漠的报告表明民愤深重：“米兰暴动人群扯下并践踏法兰西三色旗……五六千名农民加入帕维亚暴民群体。”作为回应，法国进行了大屠杀，俘虏大批人质。

拿破仑率领军队行至维也纳边界外112千米的地方，迫使奥地利接受了《莱奥本条约》（1797年）。奥地利同意把米兰割让给新成立的奇斯帕达纳共和国，后者是法国的卫星共和国。作为回报，奥地利将获得威内托，而威尼斯得到的补偿是博洛尼亚、费拉拉与罗马涅。这些领地是1797年早些时候法国从教皇手中夺得的。拿破仑对意大利北部大部分地区进行了改造，将其并入奇斯帕达纳共和国与利古里亚共和国。利古里亚共和国是在热那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奇斯帕达纳共和国在雷吉奥宣告成立，国旗由绿、白、红三色组成。后来，这些颜色成了意大利国旗的颜色。奇斯帕达纳共和国在吞并了伦巴第后，成为奇萨尔皮尼共和国。这个假称的民主国家的原型为后来的共产主义国家所采用。1797年，共和国颁布宪法称，国家主权存在于全

体成年男性手中。但是，投票受到了限制，而且两个议会的立法者与管理共和国的负责人都是由拿破仑任命的。

后来，1797年，根据《坎波福米奥和约》的规定，奥地利同意由法国获得爱奥尼亚群岛与重要的意大利北部军事基地曼托瓦。奥地利则得到了威尼斯、威内托、达尔马提亚与伊斯特拉。威尼斯此前拒绝加入反奥地利联盟。条约将威尼斯共和国割让给奥地利的规定，残忍地打破了它长久以来的独立。法国雅各宾派，尤其是意大利雅各宾派，谴责这是对革命理念的背叛。但是，在大革命时期，情况大多如此。正如1798年2月教皇国被攫取的情况那样，在意大利，军事便利、对战利品的贪欲、战略性机会主义，以及大规模、肆无忌惮的盘剥行为，均使法国采取侵略性军事行动。1797年，教皇警察在一次暴乱中占领了法国公使在罗马的住所：暴民躲在那里。在随后的骚乱中，法国公使的副官莱昂纳尔·迪福将军遇害。但是，考虑到法国人此前意图挑起革命起义，他们的行为就一点儿也不光彩了。拿破仑掌握控制权后，立即宣布成立罗马共和国。教皇庇护六世遭放逐。

1798年，那不勒斯国王费迪南四世（1759—1825年在位）加入反法阵营中。他的妻子是法兰西皇后的妹妹。费迪南的军队曾将法国人赶出罗马，但不久后在12月遭到法军反扑，被迫退了回来。费迪南的军队乘坐霍雷肖·纳尔逊的旗舰撤出那不勒斯，逃往巴勒莫。那不勒斯面临着四方角力，它们是保皇党、前进的法军、意大利雅各宾派与贫民（赞成革命思想但不支持法军的穷人）。1月，意大利雅各宾派与贫民间爆发巷战。在法国人与意大利雅各宾派强制实行管控前，巷战导致逾4000人死亡。

在那不勒斯，法国建立了另一个卫星政权，即帕尔瑟诺佩共和国。但是，在那不勒斯与其他地方，这些新政府不得人心。它们还因与花钱如流水、爱管闲事的占领者法国搅在一起而受到拖累。在那不勒斯，新共和国引入了无神论的庆祝活动，奉行宗教自由，拒绝聘用曾效力于国王的人，但是它没能应对面包及柴火短缺的问题。位于大

多数法国军队以北地区的活动也削弱了共和国。

因此，1799年1月，枢机主教法布里齐奥·迪奥尼吉·鲁福在西西里岛发起的保皇党起义，并未遇到多少抵抗。法布里齐奥组织神圣信仰军。2月8日，他们在卡拉布里亚登陆，向那不勒斯城进发。一支由整整32000人组成的俄国——土耳其远征军及40名战士攻克科孚岛后，抵达意大利亚得里亚海海岸。这支队伍在下阿普利亚地区登陆，然后向北行进，占领了塔兰托与福贾。之后，他们又向西拿下了阿里亚诺、阿韦利诺与诺拉。与此同时，英国与西西里联军威胁到那不勒斯。1799年4月15日，（西西里）那不勒斯保皇党常规军从英国船只上与英军一道登陆，占领了斯塔比亚海堡及其海军兵工厂。第二支英国与西西里联军在那不勒斯以南的萨勒诺登陆（这是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联军登陆地），向那不勒斯挺进。途中，他们攻克的城镇包括维耶特利、卡瓦、希特拉、帕加尼与诺切拉。尽管法军在应对来敌时表现良好，但后来在5月初，英国与西西里联军占领了伊斯基亚岛与普罗奇达岛，完成封锁。6月13日，那不勒斯也陷落了。意大利人不太关注这场有外国介入的解放运动，但它是可以与1943年英美联军的军事行动相提并论的。

贫民起义给那不勒斯的意大利雅各宾派带来打击，许多人惨遭谋杀。6月，随着100多人被处决，新秩序在那不勒斯确立。意大利评论者往往很关注这些处决活动，是因为它们可以让人据此谴责波旁王朝，而且被处决的都是改革者。人们并不太关注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被法国人杀害的成千上万的意大利人。

以党派的方式看待过去的做法具有启发意义。在左派一方，人们认为，1943年的外国干预是有益的。原因是，尽管它是英美的资本主义干预，但它支持“积极”力量，即左派。相反，人们认为，1799年英国与俄国（而不是法国）的介入是反对“积极”力量的，因为在法国支持者与意大利复兴运动间被画了一条线。因此，外国干预也就与1943—1946年诸如行动党这样的左翼群体发生了联系。行动党自称是意大

利雅各宾派思想的继承人，而意大利雅各宾派的思想“优势”因其反对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而被强调，正如加里波第将在1860年所做的那样。

1799年，那不勒斯君主制复辟。反法起义也在包括皮埃蒙特与托斯卡纳在内的其他地区爆发了。后来，1799年，联军将法国人赶出了意大利，其中包括由英国海军对热那亚实施的封锁。

但是，1800年，拿破仑卷土重来，在马伦哥会战中击败奥地利。1801年，法国与奥地利通过协商签订了《吕纳维尔和约》。皮埃蒙特与伦巴第处于法国的控制下，威尼斯与威内托则归奥地利所有。西班牙将路易斯安那转让给法国。作为补偿，帕尔马公爵得到了托斯卡纳。1801年，拿破仑吞并了厄尔巴岛；1802年，他又兼并了皮埃蒙特。

随着第三次联盟战争的扩大，1805年，意大利南部地区战火再起。法军占领了那不勒斯王国部分地区。结果，1805年11月，一支英俄联军赶到，法军被迫撤退。人们制订了保卫那不勒斯王国的诸多计划，但鲜有民众支持，部分原因是俄军的勒索。此外，1805年发生在远处的事件对意大利局势产生重要影响。特拉法尔加海战意味着，在距离那不勒斯不远的地方奉命介入的法国与西班牙联军军舰失败了。但是，拿破仑在如今捷克共和国内的奥斯特里茨村，力挫奥地利与俄国军队，结果导致意大利南部地区的新秩序崩溃。俄国与英国先后撤兵，而国王费迪南未能平息拿破仑的怒火。在各个层面上，意大利人都不得不应付更加强大的外来势力。

相反，1806年，卡拉布里亚成了一场重大起义的战场。事实表明，各地农民对所有军队与大多数政府都充满敌意。但是，意大利保守主义最终在卡拉布里亚被法军压制下去了。他们还残忍地强制推行新秩序，包括调遣一支48000人的军队，以及使用突击卫队作为惩罚手段。针对法国对“武装平民”展现出的“显著严酷”，英国观察家发表

了评论。“武装平民”因“极度缺乏枪支弹药”遭受重创。

1806年，英国对卡拉布里亚的军事干预时间太短，因而未能真正让法国的脚步变慢。但是，国王费迪南此前已在西西里岛避难，并处于英国舰队与守军的保护下。英军指挥官威廉·本廷克勋爵将英国立宪政体引入西西里。相似地，皮埃蒙特的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一世（1802—1821年在位）逃难到了撒丁岛。

法国不再建立共和国了。1806年，拿破仑把那不勒斯托付给自己的哥哥约瑟夫；1808年，当约瑟夫成为西班牙国王时，拿破仑又把那不勒斯送给了自己最小的妹妹卡罗丽娜。与卡罗丽娜共同统治那不勒斯的是她的丈夫约阿希姆·穆拉特。穆拉特还是拿破仑的元帅与骑兵指挥官。1805年，在拿破仑当时还活着的妹妹中，年龄最大的埃莉萨成了卢卡公主；1809年，她又获封为托斯卡纳女大公。拿破仑的另一个妹妹波莉娜成了瓜斯塔拉公爵夫人。拿破仑任命波莉娜的丈夫卡米洛·博尔盖赛王子为意大利北部法国诸省总督。

拿破仑主宰一切的意愿在意大利展现得淋漓尽致。1802年，他在那里自封为意大利共和国（这是对奇萨尔皮尼共和国的重新命名）总统。1805年，他自立为意大利国王，还任命继子欧仁为总督。同年，拿破仑在米兰大教堂用伦巴第铁王冠为自己举行了加冕仪式。1806年，法国打败奥地利后，将威尼斯与威内托并入王国版图；1808年，教皇区紧随其后；1810年，特伦蒂诺也加入了进来。拿破仑提到了意大利王国的意大利民族精神，但却把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并入法国，其中包括1801年兼并的要塞，1802年吞并的皮埃蒙特，以及1805年时夺下的热那亚、帕尔马。利古里亚共和国在君主制的法属意大利显得很多余。1809年，伊特鲁里亚（托斯卡纳）被吞并。1806年，伊斯特拉、达尔马提亚、的里雅斯特与阜姆港被让渡给意大利王国。当时，就像伊利里亚行省一样，它们在1809年成了法国的一部分。

1810年，法国兼并教皇国。1811年，拿破仑之子出生。他被封

为罗马王，成了帝国王位的继承人。教皇庇护七世（1800—1823年在位）被捕后让人遣送到了法国，而且，许多拒绝宣誓效忠的神职人员也遭到逮捕。对传统天主教的攻击包括关闭、毁坏修道院，禁止许多事实上作为世俗主义组成部分的宗教节日与游行活动。在贯彻这种新秩序时，警察派上了用场。但是，由于这些政策，合作的基础遭到破坏，民众陷入恐慌。

拿破仑最后一次前往意大利是在1807年。他加紧了对意大利的文化掠夺，而这场文化掠夺始于法国大革命。许多画作与雕塑为法国攫取，尤其是在意大利北部地区，包括威尼斯在内，还有罗马。其中一些艺术品仍可见于许多法国博物馆之中。此外，意大利还要为法军提供大量男丁。他们中的许多人在1812年入侵俄国时死于非命。

然而，随着战事吃紧，拿破仑并不愿在1813—1814年与奥地利谈判议和，因为他不愿将交出意大利王国的统治权作为签署和约的部分代价，他不愿因此只能控制法国。1814年，战败的拿破仑被流放到厄尔巴岛，该地在他统治时成了公国。1815年，拿破仑重返法国意图夺权，穆拉特前往驰援。两人均遭遇惨败。

意大利解放者的失败

与妻子卡罗丽娜共同治理那不勒斯的约阿希姆·穆拉特曾试图培养一种意大利民族主义精神。1815年3月15日，当穆拉特对奥地利宣战时，他自称意大利解放者。当时，他试图帮助从厄尔巴岛重返法国的拿破仑，并从中获益。1814年，穆拉特背弃了拿破仑，从而保全了那不勒斯王国。但是，当他意识到如今奥地利人乐于看到自己被废黜时，天生野心勃勃的穆拉特不愿听从拿破仑相机而动的建议。3月19日，穆拉特进入教皇国，侵略意大利中部，以进一步向北挺进，攻打奥地利人。他占领了罗马与佛罗伦萨。3月30

日，穆拉特在切塞纳击败意图阻止他前往博洛尼亚的奥地利军队。穆拉特之所以能取得这种程度的胜利是因为许多奥地利军队当时位于阿尔卑斯山脉以北。3月31日，他在里米尼向全体意大利人民发表声明，呼吁他们建立新秩序，为意大利发动一场“独立战争”。

但是，不受欢迎的拿破仑统治与奥地利军队的集结让穆拉特遭了殃。4月16日，奥地利军队占领博洛尼亚；4月21日，他们拿下了切塞纳；5月2日、3日，他们在托伦蒂诺击败穆拉特。战败后，穆拉特的军队因士兵开小差而瓦解。

英国通过海军力量起到重要作用。他们出现在距安科纳与加埃塔不远处的地方，包括西西里岛。随后，一小支英国中队抵达那不勒斯不远处，迫使那不勒斯海军投降。穆拉特的阵地土崩瓦解了。5月20日订立的公约让穆拉特黯然离去。他的地位被西西里国王费迪南四世所取代。5月23日，英国海军与奥地利陆军占领了那不勒斯。

由于穆拉特之前的屡次背叛，拿破仑并不欢迎他。于是，穆拉特先逃到土伦。然后，由于法国王权复辟，他又去了科西嘉。穆拉特在那里集结了一些追随者，躲进无法进入的内陆地区。因为匪首的角色不太光彩，穆拉特试图回到他之前的王国。10月8日，穆拉特适时地向卡拉布里亚发起进攻，但很快就被击败并俘虏。经过法庭审判，费迪南军中的行刑队在10月15日处决了穆拉特。人们可以在皮佐参观穆拉特的囚室与坟墓。蜡像给昏暗的囚室带来了生气。

法兰西时代

在随后关于意大利发展的种种描述中，人们认为拿破仑时期起到了主要作用。尤其是，人们觉得，拿破仑时期带来意大利民族主义的

兴起，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发展。拿破仑为人称道之处是修路、推行宗教自由政策、允许离婚，还进行了一系列行政改革。1809年，托斯卡纳语成为意大利王国规范用语。事实上，1814年，当哈布斯堡王朝重新获得控制权后，他们所实行的制度立刻让人感到，在很大程度上，那是对拿破仑体制的借鉴。随着法国中央集权对教皇国地方机构自主权的清除，教皇权力被削弱。这些举措时常挑战教皇的政治权威。因为当这些地区此前接受教皇作为它们的统治者时，人们订立的协议就包括对教皇古老特权的尊重。

拿破仑的侄子，即后来的拿破仑三世路易·拿破仑，在他的《拿破仑思想》（1839年）中指出："他在意大利缔造了一个伟大王国。意大利王国有独立的行政机构与军队……意大利这个名字是如此美丽，数年来却被废止。当时，它被归还给了此前被分割出去的诸省。那名字本身预示着它未来的独立。"

但是，事实上，拿破仑政权不受欢迎，它导致政府与社会的分歧，而且分歧变得突出。时至今日，它依然是意大利的一个特征。拿破仑政权不受欢迎的原因包括，它给人们带来沉重财政负担，7万人因拿破仑战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拿破仑时期是自罗马帝国以来，意大利在政治上最团结的时候，尤其是在试图塑造政治文化方面。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一如征兵制、征税及宪兵队的建立，这是法国为自身利益，基于法国模式强加给意大利的。

在法国的控制权已长久确立并获得当地精英阶层配合的地区，即伦巴第与艾米利亚，法国人做得最为成功。然而，在更南部的地区，尤其是意大利中部农村地区，法国人做得就没那么出色了。在利古里亚，拿破仑依靠法国行政官员，不太顾及当地的传统习俗与民意。但是，在皮埃蒙特，他起用了当地官员（正如他在其他地方所做的那样），并授予其中许多人高位。在伦巴第、艾米利亚与之前的奇斯帕达纳，也就是当时的奇萨尔皮尼共和国，拿破仑赞助的大多是意大利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拿破仑依靠地方自治。这样做使他从这些

地区已经显而易见的发展及启蒙程度中获益，尤其是在帕尔马公国。拿破仑根本就没有支持资产阶级。自1808年起，他确立了许多贵族头衔。1811年，他允许“旧秩序”贵族申请新的拿破仑头衔，然而后一种头衔远没有前者受欢迎。

被迫加入拿破仑体制的重重负荷预示着，1943—1945年，在墨索里尼的萨罗共和国里，人们在关于德国人的问题上将会遇到的情况。直接比较可能不太受人欢迎，但随后人们会看到二者均试图改写历史，而历史是应该严格审查的。

第八章　拿破仑之后的复兴与统一

1848年是“革命之年”。许多国家的紧张局势引发了一场席卷大半个欧洲的统治危机。

维也纳会议完全重新界定了意大利的边界。通过吞并热那亚与整个利古里亚，皮埃蒙特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它成了奥地利与英国抵御法国扩张的一道屏障。由于伦巴第——威尼西亚成了奥地利的一部分，托斯卡纳又成为哈布斯堡王朝次子的遗产，法国可能的扩张与势力影响被进一步降低。威尼斯与热那亚并未恢复独立，而且意大利共和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帕尔马重新成为波旁——帕尔马王朝，但却是在玛丽·路易斯去世后。她是拿破仑的第二任妻子，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地利的弗朗茨一世之女。与此同时，波旁——帕尔马王朝“进驻”如今已经成为公国的卢卡。当玛丽·路易斯在1847年去世时，王朝重新回到帕尔马，卢卡则并入了托斯卡纳。摩德纳公爵们如今成了哈布斯堡——埃斯特家族成员。

当时还存在着重要的文物归还活动。1814—1815年，法国不得不将此前攫取的许多画作与雕塑归还原主。教皇任命伟大的新古典主义雕塑家安东尼奥·卡诺瓦为教皇委托工作总指挥，卡诺瓦收回了许多艺术品。奥地利要求法国归还此前伦巴第与威尼斯失窃的作品。由于联军对法国的占领直到1817年才结束，这些要求得到满足。

由于许多变化的出现，当时意大利的独立主权国家数量少于1792年之前的数量。虽然教皇国与那不勒斯都被根深蒂固的旧政府体制削弱，相应地其合法性如今也受到挑战，但是它们都恢复了此前的组织形式，统治者也重新掌权。那不勒斯国王费迪南四世（西西里国王费迪南三世）从巴勒莫回到那不勒斯，废止了之前西西里推行的更加开明的1812年议会宪法。两个王国合二为一，费迪南成了两西西里国王费迪南多一世。两西西里是新王国的称号。目前，英国控制了马耳他与爱奥尼亚群岛，基本上形成在地中海称王称霸的局面。面对这种情况，意大利政局最终有赖于奥地利陆军与英国海军。法国已经基本上被清理出局。

皮埃蒙特（严格来说仍是撒丁王国）看似是唯一一个有望出现变

革，或者更确切地说，能形成现代国家，保障安全并实行管理的领地。事实上，1762年，英国旅行者约翰·欣奇利夫曾给第三世格拉夫顿公爵奥古斯都写信说道：“撒丁王国的君主就像是从山上滚下的雪球一样，不断汇聚着能量。它是唯一一个大国……完全处于上升期的国家。”1831年，在意大利全境范围内，正值大部分地区叛乱四起之时，朱塞佩·马志尼（1805—1872年）呼吁国王领导人们参加反抗奥地利的斗争，建立统一的意大利。

事实表明，拿破仑的统治在意大利很不受人欢迎，主要原因是拿破仑推行的征兵制之前引起了大规模反对。意大利王国的军队从1805年的2.3万人增加到1813年的9万人。前往西班牙、俄国与德国为拿破仑而战的士兵，大多有去无回。此外，保守主义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自由主义则曲高和寡。这些特征是后来意大利与外国评论者们常常忽视的。这种情况见于意大利，也存在于更广泛的地区中。就西班牙而言，拿破仑对意大利宗教生活与宗教机构的攻击是相当不受欢迎的。法国占领的经历让神职人员声名大振。伴随着1818年圣方济各遗体的发现，后拿破仑世界出现了宗教狂热。

虽然教皇为波拿马家族成员提供庇护，包括自1823年起对未来的拿破仑三世提供的保护，但是教皇采取了明显的保守主义路线。1823年当选的教皇利奥十二实行严格的审查制度。1824年，他颁布了教皇通谕《及早》，谴责自由主义及他口中的社会的去基督化。1829年，教皇利奥十二的继任者庇护八世发布教皇通谕《背叛的屈辱》。他在通谕中敦促教会领袖警惕错误教导，以及俗世颠覆教会的尝试。1831年，格列高利十六被选举为对抗自由主义者的热诚派候选人。格列高利屈服于奥地利的压力，立场坚定地反对新政治思想。

多亏了普遍存在的保守主义，1815年后，作为俄国支持的反革命神圣同盟政策的一部分，奥地利自1821年起能够轻而易举地压制意大利的自由主义起义。他们面对的情况要比1808—1813年法国在西班牙遭遇的保守主义起义（实际上是1806年在卡拉布里亚的保守主义起

义）要容易对付得多。在很大程度上，奥地利的行动受到了教皇的鼓动，而且也是对其他意大利统治者要求的回应，包括摩德纳公爵弗朗切斯科四世及1831年帕尔马的玛丽·路易斯提出的请求。奥地利的行动也反映出，奥地利控制意大利的决心，尤其是因为奥地利担心意大利公国内的极端主义将涉及奥地利控制的伦巴第与威尼西亚。这些担忧催生了外交与军事上的干涉主义。1821年，亚历山德里亚与都灵的卫戍部队为追求自由，发动起义。奥地利与皮埃蒙特保皇党军队的回应是镇压反叛者。同样，是年，奥地利镇压了那不勒斯煤炭党反叛（一场反保皇党运动），并恢复了此前保守主义的保皇政权。意大利虽然动荡不安，但在1830年整体平稳。当年，法国与比利时的革命都取得了成功。奥地利帝国首相梅特涅大公戏谑地说，意大利只是一个地理词语。这么说似乎言之有理。

1831年，意大利爆发了另一场革命。这次的焦点锁定在教皇国北部辖地（虽然也在摩德纳与帕尔马）。人们对以博洛尼亚为中心的教皇国北部诸省特别不重视，还将这些地方看作遥远罗马的摇钱树。事实上，1831年叛乱表明，尽管开明的民族主义获得的支持相对极少，但治理不善能导致人们对替代方案的支持。1831年，奥地利镇压了数次叛乱；1832年，奥地利为维护教皇统治再度干预；奥地利在教皇国北部辖地驻军，直到1838年才撤走。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拿破仑，也就是后来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有些人认为，拿破仑一世之子“罗马王”是拿破仑二世）参与了1831年意大利革命运动。这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

正如1843年尼古拉·法布里齐计划在教皇国北部辖区与那不勒斯率先掀起一场意大利全境范围内的革命一样，革命密谋仍在继续。教皇国北部辖区与那不勒斯之所以被当作起事地点是因为两地民怨最深。梅特涅对伦巴第——威尼西亚的局势信心满怀，因此把革命计划传递给了那不勒斯与罗马，结果却发现那里的政府对此反应平平。最终，革命者考虑到政府采取的防御措施，放弃了起义计划，只采取了

小规模的革命行动。然而，紧张局势并未因此而得到缓和。1844年，那不勒斯王国的科森扎爆发叛乱，后来被镇压下去。但是，这些联盟政府显然无力应对一场大规模起义。

与此同时，激进分子的失败导致越来越多的意大利民族主义支持者会聚到皮埃蒙特的领导下。由于皮埃蒙特政府对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许多意大利民族主义支持者变得更加保守。这种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与卡米洛·迪·加富尔伯爵（1810—1861年）有关，他自1852年起出任皮埃蒙特首相。

1848年是“革命之年”。许多国家的紧张局势引发了一场席卷大半个欧洲的统治危机。这些国家中有些在本质上还是民族主义的。在意大利，人们对奥地利统治与日俱增的敌对情绪是个重要因素。意大利复兴运动是追求统一的事业。在意大利与对手奥地利及盟友皮埃蒙特竞争关系中，意大利复兴运动成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月，意大利革命在巴勒莫爆发。博洛尼亚、佛罗伦萨、里窝那、摩德纳、那不勒斯、帕尔马与威尼斯也相继起事。在西西里，人们恢复了1812年宪法，议会控制着岛上大部分地区。那不勒斯的叛乱迫使国王通过一部宪法。相比之下，皮埃蒙特无须为民族主义的挑战而担忧。

最著名的奥地利指挥官陆军元帅约瑟夫·拉德茨基（1766—1858年）曾参与过拿破仑战争，他收复了奥地利的阵地。拉德茨基从米兰向东撤退，进入“四边形”坚固的堡垒中。“四边形”是莱尼亚诺、曼托瓦、佩斯基耶拉与维罗纳。联合意大利爱国军指挥官是皮埃蒙特国王卡洛·阿尔贝托（1831—1849年在位）。拉德茨基利用内线，集中兵力对付一字排开的皮埃蒙特军队，制胜率部前进的卡洛。拉德茨基军队中约有1/3的士兵是意大利人，奥地利军队中的大多数意大利士兵也都战斗在意大利战场上。1848年，拉德茨基在维罗纳附近的库斯托扎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此后，他又夺回了米兰及伦巴第大部分地区。1849年，拉德茨基在诺瓦拉战役中，力挫卡洛·阿尔贝托，迫使后者退位。接着，拉德茨基对威尼斯实施封锁。那里的人们在饥饿与霍乱

的折磨下投降。1850—1857年，拉德茨基升任伦巴第与威尼西亚总督。此举传达了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即奥地利依靠武力维护统治。

1848年5月，波旁王朝军队通过许多流血事件压制住了那不勒斯的反叛。1848年年末，1849年年初，这支军队恢复了对西西里岛的控制。在罗马，改革者庇护九世（1846—1878年在位）当选为教皇。他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尤其是放宽了审查制度，在罗马组建了经选举产生的当地政府，并于1848年在教皇国颁布宪法。但是，庇护不愿与皮埃蒙特一道，向信奉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开战。因此，庇护在1849年被人推翻。一个共和国宣告成立。此举是对旧秩序富有戏剧性的排斥。它对整个信奉天主教的欧洲来说意义重大。这些地区大多联合起来支持庇护。势不可当的法军乘坐轮船，从土伦快速来到奇维塔韦基亚，成功包围罗马。1849年，他们占领了罗马。西班牙与那不勒斯军队也伸出援手。是年9月，庇护为聚集在那不勒斯皇宫滨海大道上的那不勒斯军队祈福。与此同时，奥地利军队在亚平宁以东地区恢复了教皇的统治，并在托斯卡纳恢复了旧秩序。藏于那不勒斯圣马丁诺国立博物馆的阿基莱·韦士柏画作，描绘了教皇为那不勒斯军队祈福的场景。它捕捉到的那场胜利庆典似乎反映出旧秩序的强大。

1850年，庇护九世返回罗马。他不再是一位开明人士了。1854年，庇护将圣母无染原罪教义定义为信仰教条。这是圣母崇拜的关键一步。1864年，他发布了《谬论举要》，并将其附在通谕《何等焦虑》之后。在《谬论举要》中，他谴责了宗教信仰自由与议会制政府。1870年，庇护召集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1869—1870年），会议发表宣言《教皇无误论》。教皇国公开处决反叛者，它成为神权国家。更加具有积极意义的是，19世纪五六十年代，教皇国试图进行改革。但它并不具备必要的行政结构与资源。聆听罗西尼的《小庄严弥撒》（1863年）能让人体会到当时许多人感觉到的宗教狂热。

罗马共和国此前已将朱塞佩·马志尼推到前台，他成了三人统治集团的首脑。作为意大利复兴运动的重要思想家，马志尼对意大利的民

族性有一种伪宗教的看法。这种意大利民族性与他所谓的必要的道德重生息息相关。在他的推动下，这项事业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尊重。马志尼是位鼓舞人心的舆论领袖。他认为，自由是释放人类潜力、赋予意大利人以自主权的方式。马志尼的自由观结合了其理想国家的内部条件。尤其是，基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模式，为弘扬社会正义，马志尼想要建立的国家就算没有均等化，也要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实现这一目标，马志尼还热衷于调动工人合作社。与后来出现的墨索里尼一样，马志尼也是一位修辞学大师：这种比较并不广泛地受人欢迎。为有效地发动人民，将宗教与世俗的语言、观点融为一体，马志尼与墨索里尼一样，积极主动地利用报界。在他看来，上帝与人民的精神结合是民主的民族主义的奋斗目标与实现途径。马志尼的宗教是非教条主义的，但是意大利复兴运动的许多思想与大部分语言均表明天主教的影响。

细思意大利

意大利复兴运动唤醒了人们对意大利的兴趣。英国及其他国家的政治家与知识分子接受了它表现出的对自由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了它对以往所主张形象的弃绝，认同它是个“正派的”国家。例如，融合古典文明及风景与现代复兴希望的意大利“思想”深刻地影响了诗人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年）。他在一首十四行诗中赞美了古老的威尼斯共和国。华兹华斯还与意大利诗人、道德家与历史学家交好。乔治·拜伦伯爵（1788—1824年）明显享受在意大利的生活，他还深切同情意大利追求政治自由的壮志。拜伦要不是参与了作为现代十字军东征一部分的希腊自由之战，很可能会死在意大利。然而，19世纪初，意大利在英国的名声也许因为激进分子将那里选作藏身之所而受到损害。这些危险分子有着可疑的生活方式。例如，拜伦与生活无拘无束的诗人珀西·比希·雪莱。自1818年起，雪莱就生活在意大利，直至1822年在那里溺亡。

19世纪后期，意大利的事业变得更加流行，尤其是因为革命看似不大可能会在英国发生。诸如1846年私奔后搬到佛罗伦萨的布朗宁夫妇这样的作家，以及特别是像乔治·特里维廉这样的历史学家，对意大利的现状特别感兴趣。查尔斯·狄更斯积极支持意大利复兴运动，还有像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与帕尔姆斯顿子爵亨利这样的杰出政治家。例如，19世纪50年代，人们认为托斯卡纳的政策构成了宗教迫害，尤其是对新教徒的迫害。这使人们支持意大利复兴运动。一般说来，反天主教教义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它也确保了爱尔兰人对主教的普遍支持。

当时，有许多公众演讲与报纸文章支持意大利复兴运动。在威廉·贝尔·斯科特完成于1861年的画作《19世纪：铁和煤》中，当地报纸上刊登着当年3月纽卡斯尔一场演出的广告，说它是一幅“伟大的全景图！！！意大利的加里波第。为自由而战……”当年，英国是第一个正式承认意大利王国的国家。1864年，当朱塞佩·加里波第（1807—1882年）访问英格兰时，成群结队的工人阶级人士对他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还在当时掀起一股服装、饰品热潮，获得许多支持。有种饼干以他的名字命名，叫作加里波第。

然而，这种热情并未持续多久，意大利统一后，人们就失去了对它的同情与兴趣，而且，甚至于在意大利复兴运动期间，之前对运动的支持就明显有种纡尊降贵的成分，尤其是在英国。

意大利复兴运动的胜利

大多数评论者若知道1860年年末，时局即将发生剧变，定会大吃一惊。1859年，法国支持皮埃蒙特在意大利北部对奥地利作战，结果奥地利战败。法国这么做是皮埃蒙特首相加富尔伯爵斡旋的结果。能干的加富尔是奥地利梅特涅的翻版。虽然他们的社会追求并不见得有多么不一样，但是加富尔与梅特涅的政治理想不同。1852—1859

年、1860—1861年，加富尔担任皮埃蒙特首相。1858年，他与拿破仑三世达成共识，打算背地里激怒奥地利，使其参战。同时，奥地利参战也是自身愚蠢所致。1859年，法国军队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皮埃蒙特军队只有近6万人。1917—1918年，甚至更多地在1943—1945年，人们可以看到，外来势力在意大利历史关键时刻所起到的作用。但是，这种情况并非意大利所独有。例如，1918年与1944年，法国也有过类似经历。

拿破仑三世是那个时代墨索里尼式的人物。他十分自负地装模作样并追逐荣耀。这些对意大利统一大业来说至关重要。拿破仑三世自认是在追随叔父拿破仑一世的脚步，觉得自己是在做好事。他也受到了皮埃蒙特的影响。自1855年起，皮埃蒙特与法国结盟（还有英国及土耳其），并派出18000名士兵参加1854—1856年对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拿破仑三世与卡斯蒂廖内伯爵夫人间的风流韵事也对加富尔产生了影响。维琴妮是加富尔的表妹，1858年，加富尔为使维琴妮成为拿破仑三世的情妇，特意将她送往巴黎。

为将部队运往意大利，法国动用了汽轮、火车。这些交通工具缓解了阿尔卑斯山脉带来的阻碍，尤其是它们使得军队向前行进，阻止了奥地利军队从米兰进犯、蹂躏皮埃蒙特。铁路将法军运到土伦与马赛的港口。他们可以从那里乘汽轮，再坐火车前进。1859年5月4日，法国在马真塔战胜奥地利，后于6月24日在索尔费里诺打败敌军。法军的新式回旋加农火炮让他们在对阵奥地利的滑膛加农炮时占了上风。法国加农炮以精准的反炮兵火力打掉了大部分奥地利滑膛加农炮，从而摧毁了奥地利步兵。因为奥地利步兵不能很好地利用自己手中性能更优良的步枪。此前，奥地利步兵在测距与瞄准方面受训不足，结果导致法军能靠近他们展开刺刀战。法军采取的战术与拿破仑一世统治时期的类似，都使用了密集部署与纵队策略。

交战双方均计划不足、指挥不连贯。特别是，在有效、快速决策的系统化过程方面，它们既无原则指导，也缺乏实践经验。将军们尚

未达到即将成为理想的状态：根据特定时间的军事决策与相互关联的战术行动来实施战略计划。这种失败与毫无章法、松松垮垮的指挥有关：这种特征造成战略前后不一致，战斗缺乏有效的整体规划，还导致战术零碎。这些指挥实践反映出指挥官们的禀性，尤其是拿破仑三世糟糕的军事领导。

大量军队的部署加剧了运输、补给与管控士兵的问题。当时，约有25万兵力集结于苏法利诺。如此多的士兵给指挥与管控带来了巨大问题，双方统帅部基本上都失去了对战局的控制。战争变成消耗战。

然而，法国伤亡惨重，战役将给法军带来重重困难。这对皮埃蒙特的军队更是如此，而且，奥地利在苏法利诺取得后卫战斗的胜利。部分基于这些原因，法国并未加紧进攻奥地利坚实的“四边形”堡垒，也没有攻击威尼西亚。这在当时本可能构成可怕的挑战，尤其因为奥地利陆军中的意大利部队战斗力强且极少有临阵脱逃之辈。当时，人们害怕奥地利可能会恢复元气。拿破仑三世担心法国取胜后普鲁士的态度，也担心法国国内天主教圈子因关心教皇处境而施加的压力。所以，1859年7月，拿破仑三世转而通过协商签署了《维拉弗兰卡停战协议》。加富尔因为这份单独和约而辞去相位，但是他在1860年再度掌权。

威尼西亚归奥地利所有。反过来，奥地利也是希望和平的。因为它担心万一战争继续，革命民族主义将给奥地利带来挑战。皮埃蒙特获得了伦巴第与帕尔马。尽管根据1860年3月24日签订的《都灵条约》规定，皮埃蒙特不得不将萨伏伊公国与尼斯县割让给法国作为战争赔偿，但是它们也利于保持与法国的同盟关系，这是皮埃蒙特对付奥地利的有力保障。出生于尼斯的朱塞佩·加里波第因割地而愤愤不平地抱怨着。在两地政府与法军的双重压力下，尼斯与萨伏伊人民就合并事宜举行公民投票。伦巴第因工业与农业的重要性，以及它作为意大利北部中央舞台的政治声望成了皮埃蒙特的重要收获。米兰在意大利国内及意大利周边地区的号召力仅次于罗马。

长期以来，萨伏伊与尼斯都是皮埃蒙特统治者萨伏伊王朝的领地。自此之后，它们一直都归法国所有。一直处于热那亚统治下的科西嘉岛也经历了相同的命运。但是，它是法国在1768年购得的。在墨索里尼统治下，1940年在法国战败后的意大利占领期内，当时存在着恢复失地的希望。但是，自此以后，这些希望就再也没有得到广泛认同。

战争结束后，皮埃蒙特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1849—1861年在位）禁止意大利复兴运动代表人物加里波第攻击教皇国，推进统一大业：通常情况下，民族主义的条款把它的支持者们搞得四分五裂，而这也是民族主义的控制权从马志尼转向加富尔的一方面。

相反，1860年，加里波第辞去了他在皮埃蒙特军队中的将军一职，率领1000名红衫志愿兵从热那亚扬帆前往马尔萨拉。5月11日，他们登陆了。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是帮助西西里岛上的一次反叛，共同反对那不勒斯波旁王朝统治下的两西西里王国（西西里岛与意大利南部）。叛乱此前于4月4日在巴勒莫爆发。加里波第向前挺进时采取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并在战斗（在卡拉塔菲米与米拉佐）与巷战（在巴勒莫）中获胜。士气的作用很重要。在米拉佐，波旁王朝的军队虽然伤亡更少，但他们却后退了。英国人的合谋不仅体现在他们没有动用皇家海军试图阻止远征队，也未阻挠他们后来向本土地区的前进，还体现在英国把军舰挡在加里波第的汽船与那不勒斯的轮船之间，使后者无法攻击汽船。

1860年，加里波第从西西里越海在意大利南部登陆。9月7日，他占领了那不勒斯。后来，加里波第又在沃尔图诺河之战中击败弗朗切斯科二世。接着，他将自己占领的领地拱手让给了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使后者能建立起意大利王国，从而取得19世纪最大的一场胜利。与攻城略地同时发生的是那不勒斯人民发起的一场革命。也许加里波第能够快速取胜更多的是由于人们对波旁王朝的敌对情绪，而不是加里波第的共和主义，更别说来自掌权的皮埃蒙特议院的支持了。

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是不再坐在法国国王王位上的波旁家族中的一个支族。他们没有在那不勒斯国内外获得有效支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外来秩序当时被强加给那不勒斯。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秩序是由外界干预所带来的破坏因素所造成的。虽然当时及此后的一些那不勒斯人表达了这种观点，但其他意大利评论者并未对此大加宣传。相反，他们强调与外部敌人奥地利之间的斗争。

1859年，奥地利从博洛尼亚与安科纳撤走了卫戍部队。在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率领下的皮埃蒙特部队，利用局势从中获益。他们占领了罗马涅，随后向南进发，击败教皇与那不勒斯的军队，使加里波第不能决定意大利的未来。1860年3月，公民投票结果导致罗马涅正式被皮埃蒙特吞并。1859年，教皇军队在佩鲁贾残酷镇压了一场民众起义。但是，1860年，当皮埃蒙特军队抵达时，象征着教皇权威的堡垒被人摧毁。公民投票决定，翁布里亚成了新的意大利王国的一部分。撒丁王国在1859年获得伦巴第；随后在1860年3月吞并了摩德纳、帕尔马与托斯卡纳；同年10月，它兼并了两西西里王国；11月，它取得了罗马涅、教皇区与翁布里亚。

战争带来的经济压力

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极大地扰乱了意大利诸国的经济，使其此后也继续苦苦挣扎。部分原因是，其他地区的技术变革给意大利的农业与工业造成压力。这种情况带来累积压力，因为投资资本无法轻易积聚起来。此外，还存在着因资本主义与资源争取而引发的社会、政治紧张局势。由于王政复辟时期（1815年后）各国竞相恢复贵族阶级统治，更加开明的中产阶级受到了限制，经济选择也受到影响。资本主义的压力给个体农民家庭所扮演的角色带来冲击，尤其是在有着大农庄的平原地区。因此，个体农民沦为没有土地的日薪工的情况更突出了。为此，民众充满敌意的举动包括攻击稻田、发动罢工。

大多数人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1816年，由食物短缺与疾病暴发导致的生存大危机使死亡率攀升。因为人口整体呈上升趋势，越来越多的人寻找着土地、就业、食物与济贫供应的机会。这给经济体制带来更大压力。农业生产技巧与农业技术原始，土地面临的压力成了严重的问题。家中年纪较小的儿子与更加贫穷的佃农，处境尤为艰难。日益加重的农村贫困与散工数量增加有关。意大利南部，尤其是卡拉布里亚的贫困问题十分尖锐。

就像许多国家一样，营养不良曾是许多意大利人的永久性生活状态。人口增长导致人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谷物生产上。当时的普遍情况是，人们对动物饲养关注不足，而动物是肥料的主要来源。当时不仅存在着食物匮乏的问题，而且人们可获得的食物种类也不足。意大利面与干豆是主食。在许多地区，例如西西里岛西部与中部，面包常常短缺。于是，人们就用刺梨来代替面包。农民极少吃肉，食物常常是汤。

女人的处境尤为凄凉。在许多被遗弃的孤儿中，女孩的数量占绝大多数。许多女性从事着艰苦的农业、制造业工作，尤其是除草、编织与纺织。据说，1835年，西西里岛上大部分农妇要么从事着工业生产，要么给人当用人。

按照西方的标准来看，意大利经济落后、资本匮乏、国内市场有限，而且无意推动经济增长、现代化与变革。教会方面尤其如此。全球化的重重压力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意大利已经失去了许多工农业的相对优势，并由此导致市场与就业机会的流失。这削弱了传统经济中对补充性收入来源的依赖。相反，专业分工此时开始崭露头角。

与此同时，区域差异依然在人们应对经济压力时居于中心地位。在皮埃蒙特，不像在波河下河谷或是阿普利亚那样，占有土地的小农依然重要。因此，那里的阶级矛盾不突出，政治也更加稳定。但是，当这样的小农极少时，社会就会更加分裂。区域差异与地区内部分歧

同时存在。这一点在意大利历史上普遍存在。

技术与基础设施取得重大进步。地中海地区的第一艘蒸汽船是1818年在那不勒斯试航的“费迪南多一世号”。1839年，意大利修建了第一条铁路。1851年，人们在焦维山口，人工挖掘出意大利第一条主隧道。隧道全长3.2千米，位于海平面以上472米。这条隧道连接了利古里亚与皮埃蒙特，在1852年通了火车。为了在皮埃蒙特开发铁路系统，加富尔大举借贷。1866年，全岛通火车。1847年，电报开始出现。截至1851年，铁轨与电报覆盖了半岛，并将意大利与法国、奥地利相连，继而通往英国与德国。意大利理所当然处于变化之中。

第九章　意大利人的大国梦

意大利决意赶上那些已经取得大量殖民地的欧洲列强，尤其是英国与法国。这种决心使他们争勇好斗。

1861年3月17日，意大利王国诞生。皮埃蒙特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1849—1861年）此时当上了意大利国王（1861—1878年），加富尔则升任首相。意大利半岛因此而动荡不安。奥地利依然统治着重要的地区与领土，尤其是威尼西亚地区与一些民族主义者视为真正能够代表意大利的领土，即伊斯特拉、达尔马提亚与特伦蒂诺。此外，在意大利中部，教皇国反对新政治秩序。事实表明，庇护九世带头反对意大利统治与自由主义。1861年，新成立的国家实行宗教自由。这项政策遭到了教皇庇护的谴责，因为它动摇了天主教会的地位。

1862年、1867年，加里波第试图解放罗马，均以失败而告终。1862年，意大利军队在阿斯普罗蒙特山，血腥阻挠往罗马行进的加里波第军队。拿破仑三世保护了教皇的阵地，因为他想建立意大利联邦，而非单一制国家。这种保护比“十字军”的保护更加重要，因为后者是被教皇武装起来，来自信奉天主教的欧洲与加拿大。1867年，当加里波第的部队在蒙特罗通多击败教皇军队后，法军与教皇军一道在1867年的门塔纳战役中打败了加里波第。即使加里波第也许至少是在按一些当局人士的意愿办事，他在教皇国也没得到多少支持，此时还成为让意大利政府蒙羞之人。此外，马志尼对民主的追求，更别说革命共和主义，也宣告破产。

1866年，意大利在拿破仑三世的鼓动下，与普鲁士一道对奥地利作战。奥地利在库斯托扎战役（6月24日）中击败了意大利，并在亚得里亚海取得利萨海战（7月20日）的胜利。意大利政府不仅占领了威尼西亚，还有意夺取亚得里亚海另一侧的伊斯特拉与达尔马提亚。它先计划拿下利萨岛，但是意大利舰队遭到一支人数与装备更少的奥地利舰队的攻击。战斗变成一场舰对舰军事混战。其中，意大利军队毫无准备且缺乏指挥技巧，结果导致意方伤亡更加惨重。在战斗中，威尼斯水手为奥地利而战，对抗皮埃蒙特人与伦巴第人。意大利舰队依然控制着利萨附近的水域。但是，报界宣称，这场战役是失败的。

7月3日，普鲁士在今捷克共和国境内的萨多瓦对奥地利造成致命打击。他们继续向维也纳逼近。由于奥地利人民的意志崩溃了，而意大利人如今也在向着的里雅斯特与特伦托前进，奥地利要求议和。在随后签订的和平协议中，意大利得到了威尼西亚。这样的安排主要是因为普鲁士想要削弱奥地利的实力。这是一项重大收获，很难想象，如果意大利不通过这种方式，还能有什么办法得到威尼西亚。此前，意大利通过法国而受益，如今它又沾了普鲁士的光。意大利之前分散了奥地利与普鲁士作战的军队。

如果威尼西亚依然处于奥地利统治之下，那么不管是故意还是无心，这在当时也许会导致奥地利与意大利为此开战。此外，如果这场战争没有打起来的话，意大利也许会在“一战”早期加入协约国。但是，任何以威尼西亚作为奥地利一部分而展开的战争，均将给意大利人带来大麻烦，尤其是当奥地利人集中精力应对这项挑战时：奥地利军队当时会将总部设在米兰附近。

1870年，意大利再度从普鲁士的胜利中获益。由于与德国的战斗迫近，拿破仑三世从罗马撤军。面对权力真空，意大利军队向罗马发动进攻。罗马在经过了名义上的短暂抵抗后投降了。教皇国被兼并，这是对传统天主教的重大打击。罗马成了意大利的首都。1849—1870年，罗马在意大利追求独立、表明自身立场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政治重要性，使它成为当之无愧的首都。因此，新成立的国家吞并了1849年罗马共和国与古罗马的遗产。

庇护九世引退到梵蒂冈宫。他在那里将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逐出教会，并对新秩序表示拒斥。庇护九世的继任者们贯彻了这一方针，直到1929年《拉特兰条约》的签订才结束。反过来，因为教皇反对意大利复兴运动，开明的民族主义也对它持否定态度。伽利略成了意大利的民族英雄。此事具有象征意义。1887年，罗马竖起纪念伽利略的大理石圆柱。这件事受到反对教会干预的报界的赞扬，但却遭到梵蒂冈官方报纸的严厉批评。博洛尼亚新建了伽利略广场。事实上，

正如在第三共和国（1871—1940年）统治下的法国一样，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意大利自由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场反对教会干预的运动。斯波莱托新剧院是那个时期价值观的典型代表。它是在一座修道院的遗址上修建起来的，在1864年正式开放。

再一次地，意大利和法国一样。事实表明，这种政治文化在一个天主教信仰深厚的国家具有高度的分裂性，尤其是它引发了政治立场与宗教信仰的危机，并因此削弱了共和国。意大利的情形更加严峻，因为国家根基更弱。由于意大利复兴运动对教皇的处理，它无法再作为具有凝聚力的民族神话。对许多人来说，意大利复兴运动是一场内战，而不是像在一些国家那样是人们可以欣然接受，甚至是能让大多数人欢迎的裁定。例如，日本面对1868年明治维新与1877年萨摩藩叛乱的遗产时的态度。此外，从世俗宗教团体的旺盛精力上来看，该时期经历了明显的天主教复兴。

教皇的反对并不是反抗新政府与国家建设的唯一形式。在罗马涅，教会分子与激进人士均反对新政府。在意大利南部，普遍的强盗行为是农业秩序转变的一方面，其中包括旧地方家族的没落与新精英阶层的兴起，以及后者立桩标出自己的财产与地位的行为。面对持续不断、大多具有政治性的大规模强盗行为，以及当地支持的匮乏，地方对政府支持的缺乏以1866年巴勒莫的全面叛乱而告终。新政府废除了它不信任的民事法律体系，部分原因是当时存在着恐吓目击证人的做法，政府还派出军队强制执行新秩序。当时存在大量军队暴行，包括向平民开枪射击。

紧邻地区而非遥远政府依然是人们身份、兴趣与忠诚的来源。对一些人而言，意大利复兴运动看似是一场外国征服。马志尼民主的民族主义仅仅获得了零星支持。此外，当意大利全国的人均收入没有增加时，它在南部地区面临着特别的问题，尤其是人口过剩。正如2003年的伊拉克一样，意大利的新秩序在对待那不勒斯军队时也是粗鲁无礼的：大部分退伍老兵无薪可领、无工可做，有些人甚至还被投进监

狱。

人们的另一种应对方式是大规模的迁移，尤其是但不仅限于，从西西里岛与那不勒斯的人口迁移。意大利与法国的经济战催生了这场向外移民潮。经济战的起因是，1873年后，意大利决定增加钢产量。目的是为铁路提供铁轨，为海军供应防护钢板。于是，意大利就对钢铁征收了进口税。为此，法国对从意大利，尤其是从意大利南方来的食品，征收进口税。因此，当更便宜的美国硫黄出现在国际市场上的时候，它对西西里岛的硫黄生产造成了冲击，导致就业市场的新一轮崩溃。

离开意大利的移民在美洲大陆寻找经济利益，尤其是在阿根廷、巴西与美国。这些国家都有许多意大利定居地，这是更普遍的人口流散的一部分。意大利民族主义评论者哀叹劳动力的流失，却又无计可施。当时以及后来的人口外移将会成为意大利历史的一条主线，而汽轮服务的发展与为新移民提供帮助的家庭及其他联系，对这股移民潮起到了推动作用。意大利的大西洋航线兴旺起来。事实表明，热那亚作为意大利的海事中心，地位尤其重要。那不勒斯也意义重大。

波士顿、纽约与里约热内卢成了意大利历史的一部分。在巴西，政治家与雇主鼓励意大利移民，因为他们想要减少经济对整个非裔人口（包括奴隶与自由人在内）的依赖。美国的情况不大好，因为本土主义将敌对情绪特别对准了既信奉天主教，又来自地中海地区的意大利人。因此，美国人对只是天主教徒的爱尔兰与波兰移民的敌意就没有那么明显。这种仇视导致1924年美国对移民实行限制。

与此同时，美国的经济发展给意大利以沉重打击，尤其是美国的粮食出口。自19世纪70年代初期起，欧洲粮价下跌，意大利也不例外。这影响了所有的产粮区，包括翁布里亚在内，因此也进一步刺激了移民。

税收及公共开支政策很少能提高普罗大众的生活水平。政府过半的税收收入来自对生活必需品的间接征税，尤其是食盐与磨粉用谷物，还来自进城关税。但是，政府很少将钱花在工人阶级身上，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里的工人阶级。相反，钱用在了供中产阶级与国家享用的军队及新城市景观建设上。例如，那不勒斯的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大街与翁贝托一世拱廊街。1884年，那不勒斯遭遇了一场霍乱。

经济政策使北方工业区受益。19世纪50年代，加富尔曾支持那里的工业化。相对开明的关税政策打压了南方试图将工业发展到手工以上水平的尝试。此外，意大利的统一导致北方商品能自由进入南方地区，从而影响了那里的就业水平。面对热那亚以及那不勒斯附近的彼得拉萨这两个主要的钢产区，议会委员会决定，钢生产应该集中在热那亚。这项决定是由更加有效的游说导致的。

外居地主是南方地区的特殊问题。面对19世纪90年代西西里岛频繁的农民暴动，政府宣布实行军事管制，并将农民领袖流放到用于刑事惩罚的岛屿上。但是，相比之下，政府提出的土地改革政策却遭到地主阶级的阻挠。莱奥波尔多·弗兰凯蒂在《1876年的西西里岛》中，描绘了当时普遍贫困的生活状况。莱奥波尔多在书中写道，当他靠近内陆的一个村庄时："在山坡顶上，你会看到排泄物经雨水冲刷后布满斜坡，然后是一长串破旧平房。透过敞开的门，你会看到一个肮脏的房间。房子通常没有窗户。这是农民全家的共同栖身之所。如果农民还饲养了动物的话，那也是动物的巢穴。"这些房屋黑暗、潮湿。1871年，西西里岛上87%的人都是文盲。

为历史创作歌剧

威尔第与普契尼是那个时期伟大的作曲家。他们对历史做出了史诗般的解读。在《诺尔玛》（1831年）中，温琴佐·贝利尼

（1801—1835年）比较了罗马统治下的高卢与奥地利统治下的意大利的异同。朱塞佩·威尔第（1813—1901年）坚定不移地投身于意大利复兴运动之中，但他也清醒认识到了奥地利审查制度导致的种种问题。他像罗西尼对《威廉·退尔》（1829年）的处理一样，经常使用历史久远的间接指涉。《纳布科》（1842年）中被流放到美索不达米亚（伊拉克）的希伯来奴隶是受压迫的意大利人的隐喻，而《莱尼亚诺之战》（1849年）则以1176年伦巴第同盟击败（德国）皇帝巴巴罗萨的典故，号召今天的人们行动起来。《弄臣》（1851年）的故事背景设在曼托瓦。它描绘了一位穷凶极恶的公爵，原型人物也许是1328—1708年统治那里的贡扎加家族中的一员。威尔第在《命运之力》（1861年）中再现了1744年那不勒斯人在韦莱特里击败奥地利人的故事——在这种情况下，那不勒斯人被看作是意大利人。威尔第支持加里波第在1860年的远征，他还效力于意大利议会。

在《托斯卡》（1900年在罗马首次公演。它是基于维克托里安·萨尔杜1887年的戏剧《托斯卡》而创作的）中，贾科莫·普契尼（1858—1924年）展现了1800年处于反革命军控制下教皇统治的罗马。反革命军在此前一年镇压了罗马共和国，事实也确实如此。剧中主人公卡瓦拉多西与安杰洛提是自由的忠诚支持者，反派人物斯卡比亚男爵则是秘密特工头子。他想方设法镇压所有寻求变革之人。全剧整个故事情节都对应着拿破仑的成败。当拿破仑在马伦哥战役初期失利时，剧中响起了《感恩赞》。但是，拿破仑最终的胜利既使被捕的卡瓦拉多西备受鼓舞，他因此得意扬扬地歌颂着自由，拿破仑的成功又让斯卡比亚感到沮丧。卡瓦拉多西是一个未婚同居的自由思想家。这出歌剧在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上演时，由于使用了现代布景而破坏了故事刻画的历史时刻的张力，而且，它对各个事件与文化冲动之间联系的解读，不仅显得油腔滑调，还常常漏洞百出。

其他歌剧直面当下，尤其是19世纪90年代写实主义风格对农民的刻画。正如皮埃特罗·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1890年）与翁贝托·焦尔达诺的《悲惨的生活》（1892年）中刻画的贫民窟居民一样。这两出歌剧的背景分别设在西西里岛与那不勒斯。它们也为意大利别处的观众展现了“南方的问题”。

大国梦

虽然意大利面对着许多社会、经济、政治问题，但是，它在统一后，即刻就想成为一个大国。这种雄心壮志是受到了民族主义及自信心的驱使，而意大利的自信来自北方大规模的工业化，尤其是米兰与都灵，还有其他方面，例如热那亚的造船业。铁路使意大利本土各地相连，并为意大利北方地区提供了宝贵的运输网络。

民族主义的立场积极强硬，部分原因是人们的理智信仰认为，斗争是自然与人类生存、发展的主要特征。文化观点也觉得，斗争表现并巩固了阳刚之气，因此使社会与文明生机勃勃。这种观点为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未来主义者所共有。战争信仰表现出尚武精神与男性气概，大众文学又使这种信仰生生不息。1909年，未来主义在意大利兴起，刻意活跃的未来主义想要破旧立新。1910年，未来主义创始人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呼吁人们为威尼斯大运河铺上沥青或是筑路。因为据说它是过去及过去价值观的象征。

意大利复兴运动与斗争、战争理念相关，因此它是新成立国家的历史核心叙事。弗朗西斯科·克里斯皮在1887—1891年及1893—1896年出任首相。此前，他参加了1848年革命，在1860年与加里波第一道，入侵西西里岛。意大利全境范围内的街名与雕像铭记着胜利。街道与广场以萨伏伊王朝的统治者，即如今意大利国王们的名字命名，还以推动意大利复兴运动的政治家、大臣与军事领袖的名字命名，尤其是马志尼、加富尔与加里波第。因此，此前是教皇小镇的安科纳，

如今修建了加里波第大街与马志尼大街。另一个教皇小镇乌尔比诺也建了一条加里波第大街。锡耶纳市立博物馆里有个意大利复兴运动大厅。它向人们展示了那个时期标准的湿壁画，画作描绘了意大利复兴运动的故事。在马萨马里蒂马，大教堂广场成了加里波第广场。在地方层面上，当时出现了许多马志尼协会，但它们并不有意破坏政治体制。

在1848年宪法的规定下，国王地位变高，他们成了重要人物。君主有权任免首相、提名参议院成员，对外交政策的制定也起着决定性作用。大臣逐个对国王负责。这种情况减轻了集体责任。

“变形主义”的做法使政局复杂起来。正如在美国南方一样，它是通过将区域权力让与当地掌权派，从而在罗马议会中赢得选票的方式。这种（更加普遍的）交易政治不是原则性妥协。它削弱了人们对基于英国模式建立起来的、流行于19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初的两党制的支持，尤其是乔万尼·兰萨当年主张的两党制。能干的乔万尼在1860—1873年担任首相。西班牙的君主立宪制也效仿了这种体制。当时，意大利政党内部的分歧是个大问题，还有就是众议员对选民特别利益的关注。

众议员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往往不足。这导致人们对殖民地的热切追求，并视其为民族威望的象征。例如，1876年所谓的历史极左派当权就反映出这种情况。这是由加里波第的拥护者与共和党人共同组成的强大民族主义联盟；他们想要建立所谓的“第三罗马”。

自19世纪70年代末起，公众对议会组织管理的评价明显变差。政府虽然强调更加亲民的公众神话，但是未能缓解舆论评价的恶化。政客有时在议会里互相攻击，他们还明目张胆地谋求私利。只有少数男性可以投票。

1889年，意大利政府用修订后的刑法典与警务守则来抵制社会主

义与无政府主义，尤其是判处煽动、姑息政治犯罪与阶级仇恨为非法，判处组织危害公共道德、私有财产与国家的犯罪团体为非法。预防性警务实践得到大量应用。地方行政长官充当省警察局局长，镇压所谓威胁公共秩序、操纵选举的行为，他们还呼吁军队前来帮助。1898年，军队残酷压制一场饥饿骚动，在米兰杀死至少80人。几位画家在作品中都描绘了这一事件。是年，军队被调动起来打击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农业罢工者。1900年，一位无政府主义者行刺国王翁贝托一世（1878—1900年在位）。前者称，他的罪行是对1898年血腥镇压的复仇。19世纪90年代，由于政府以强硬手腕打压罢工与群众性政党的发展，人们明显感到危机四伏。这凸显了公众对自由主义的理想幻灭。这种理想幻灭既是保守主义者自身所感觉到的，也是人们对保守主义者的理想幻灭。自由主义者本身悲叹保守主义的假定与权力集团的影响，尤其是支持教权主义观点的影响。

反过来，政府政策有某种程度的自由化，包括1901—1903年，在朱塞佩·扎纳德利左翼自由党政府领导下，自1901年起实施的法典。在左翼自由党政府中，乔万尼·乔利蒂成为内政大臣。这种自由化的立场符合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的意愿。他的政策不同于父王翁贝托一世，反映了与社会党改良主义领导层的联盟。双方一致支持不经过革命就能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这种政策旨在帮助北方工人阶级，但在南方未能得到广泛认同。在南方，自由党出于议会与政治层面的考量，继续保持着与控制该地区的地主阶级间的同盟关系。但是，自由党与社会党的联盟关系在1903年破裂，部分原因是警察对罢工者的暴力行为。1904年，迫切要求采取激进行动的革命者推翻了社会党的改良主义领导。是年，第一次总罢工紧随其后，人们对此的反应使乔利蒂组建新右派政府并在普选中胜出。

1903—1905年、1906—1909年、1911—1914年与1920—1921年，乔利蒂担任首相一职。他当时试图寻求中间路线，镇压暴力罢工。但是，乔利蒂也在1907—1914年通过了社会立法，包括穷人医

疗、伤亡保险与退休金计划。他希望通过这些措施保住自由党政权。乔利蒂的政策也反映出意大利自由主义思想的丰富性。人们很容易看出，这些年的问题与这个时期的态度预示着战后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就好像意大利自由主义的失败是受到诅咒，必然会发生的一般。事实上，即使自由党人能避开议会且依法行事，这种方法也是错误的。

开明的自由主义思想、契约与意见一致对许多人来说，都是有意义的，即便它们在实施过程中常有瑕疵。在某种程度上，自由主义思想的出发点是它决意取代教会，成为社会福利提供者及界定者。这种思想利弊参半：反教权主义被当作非教权主义，被当作使国家变得团结统一、现代化的尝试。但是，自由主义政策难以践行，尤其是因为它在地方上缺乏支持，没有相关资源。结果就是杂乱无章的社会自由主义，而且，它也没有英国的社会自由主义那般行之有效。

大多数人的生活依然动荡不安，尤其是在南方。1915年，在接受了战争动员的男性中，官方公布的文盲率只有37.6%，南方的情况尤为糟糕。与这种保守主义同时存在的是传统主义。新体制中的一些元素，尤其是平等主义的法律秩序与政治代表的涌现，给传统贵族阶级以沉重打击。在变化的世界中，贵族阶级投资工业，他们发现自己不得不与新兴商业利益相融合。阶级障碍减少，尤其是为钱结婚的情况变少。

1911年是意大利复兴运动50周年，正值经济快速发展期。当年的领导是两届自由党政府。之前，正是这两届政府的前身使意大利复兴运动成为可能。为此，人们对意大利复兴运动的记忆不由得涌上心头。据说，人们认为，只有通过进一步的收益，才能保障并完成意大利复兴运动。在议会民主制中，意大利人觉得，这样的主题是适宜的。他们在1913年实行男性普选，取代了此前在1882年的有限选举权。意大利推动这种政策是适应改革社会主义的一种策略，同时也是对自由党人明确表示自身意识形态需求的回应，虽然自由党人担心南方保守主义对此的反应。1911年，马克思主义者批判意大利复兴运

动，说它带来了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而不是社会公正。同时，右派抨击自由主义未能使意大利变得强大、伟大。

意大利决意赶上那些已经取得大量殖民地的欧洲列强，尤其是英国与法国。这种决心使他们争勇好斗。意大利与法国的竞争尤为激烈，尤其是在1881年法国将突尼斯变成它的受保护国以后。突尼斯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附近的一部分，而意大利与奥斯曼帝国有密切的利益关系，并对后者垂涎已久。在1878年、1884—1885年召开的柏林会议中，意大利没能从决定巴尔干半岛与非洲大部分地区前途命运的协议中获得任何收益。1882年，意大利与法国的殖民争夺使它加入了三国同盟，与法国的敌人奥地利、德国达成防御约定。法国已进入阿尔及利亚，英国则占领了埃及。战争被认为是加速实现现代化、带来进步的方式，而且持这种观点的不仅仅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

在翁贝托一世与弗朗西斯科·克里斯皮的大力支持下，意大利先是在非洲东北部追逐其领土扩张的野心：在厄立特里亚、索马里，最终是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1887—1891年、1893—1896年，弗朗西斯科·克里斯皮出任意大利首相。意大利人希望这种扩张将为意大利农民提供土地，给意大利工业带来市场。厄立特里亚与索马里证明是相对易攻的，尤其是因为它们都易成为海军与两栖进攻的目标。在厄立特里亚，意大利占领了阿萨布（1882年）、马萨瓦（1885年）与整个厄立特里亚港口（1889年）。埃及与土耳其无法保护它们在厄立特里亚的利益（1889年）。1889年，索马里也被占领了。1894年，英国——意大利协议将哈勒尔置于意大利的势力范围内，把阿比西尼亚作为意大利的受保护国。这是1889年意大利宣布的情况。

但是，1896年，当阿比西尼亚皇帝孟尼利克二世在阿杜瓦战役中重挫意大利军队时，意大利的耻辱感汹涌而来。孟尼利克是非洲东北部令人肃然起敬的帝国缔造者。法国与俄国为孟尼利克提供军火，但关键因素是孟尼利克杰出的才干及意大利指挥官的无能。意大利指挥官将军力分散成冲锋队，因此在面对人数相当多的阿比西尼亚军队

时，无法彼此驰援。6000名意大利士兵丧生。1887年，一支人数较少的军队已经在多加利战役中覆灭。1894年，一份关于意大利军队调遣的英国军事报告满是轻蔑。它捕捉到了那个时代的刻板印象："专制主义与迷信滋生了意大利人性格中的恶习。意大利没有健康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宗教道德——不存在责任感——也没有任何军事美德的完美融合，而这对于组建一支值得依赖的军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随后，意大利人开始攻击土耳其人。作为对法国在摩洛哥扩张主义的回应，1911年，意大利入侵土耳其殖民地利比亚。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利比亚的阿拉伯人奋力反击，这次进攻远比当初料想的要困难得多。意大利人是第一个在战争中使用飞机的国家。战争扩大后，1912年，意大利占领了爱琴海的多德卡尼斯群岛，而罗得岛是群岛中最重要的一个岛屿。意大利人也与土耳其人在红海上交战，摧毁了当地的土耳其海军。

1898年的现代罗马

在阿瑟·柯南·道尔令人印象深刻的短篇小说《新地下墓穴》（1898年）中，与"旧罗马"形成对比的是"电灯长长的双链、灯火通明的咖啡馆、奔驰的四轮马车与小路上川流不息的人群"。虽然福尔摩斯从未出现在意大利，但是道尔自己去过那里几次。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意大利没有义务向盟国德国与奥地利伸出援手。因为它们之间的联盟是防御性质的，而奥地利与德国发动的都是侵略战争。但是1915年4月26日签订的《伦敦条约》把意大利争取了过来。根据条约规定，英国、法国与俄国向意大利许诺，它将从奥地利那里获得大量收获：特伦蒂诺、南蒂罗尔、的里雅

斯特、戈里齐亚、伊斯特拉与达尔马提亚北部。但是，这意味着，这些领土是需要被征服的。意大利官方对外宣称，这是他们抗击奥地利独立战争的最后阶段。在德国的恫吓下，奥地利把特伦蒂诺送给了意大利。但是，奥地利不愿交出协约国向意大利提供的其他地区。协约国挖走意大利就打破了德国潜在的同盟体系。此外，同盟国（德国、奥地利）如今不得不在意大利与奥地利两国漫长的共有边境线上配备人员、守卫前线。这是协约国从意大利获得的首要战略利益。

1915年5月20日，当议会就战争进行投票表决时，意大利国内只有社会党是反战的。政界剩下的人想让意大利变成一个大国。1914—1916年的保守主义首相安东尼奥·萨兰德拉将意大利的政策称为“神圣的自私自利”。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1900—1946年在位）是亲英派。他反映出萨伏伊王朝与英国的密切联系。贝尼托·墨索里尼（1883—1945年）当时是社会党报纸《前进报》富有煽动性的编辑，他因为支持战争被开除出党。墨索里尼觉得，主战是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调和一致的结果。在意大利及法国实业家的支持下，墨索里尼创办了干涉主义的报纸《意大利人民》。

当墨索里尼与他的朋友彼得罗·南尼在弗利躺在铁轨上阻止满载军队的火车开往利比亚时，反对利比亚战争的左翼反战和平活动就开始了。这场战争始于1911年意大利对利比亚的侵略。1914年出现了更多的左翼政治活动，尤其是在6月“红色周”期间，一场总罢工引发大规模骚乱，尤其是在艾米利亚。军队因此被调动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人们立即再度表达了和平主义的观点。1914年8月，社会党人安吉洛·塔斯卡宣布，“在法国与德国之间，我们选择共产国际”。事实上，1915年5月，意大利的战争策略引发当月充满敌意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与罢工，尤其是在工业重镇都灵。但是，此前反战的社会党如今聚集在了战旗下。

1915年5月23日，意大利对奥地利宣战；8月21日，意大利对土耳其宣战。但是由于意大利政府不想激怒德国人，让他们把军队派往

意大利前线，所以意大利政府直到1916年8月27日才对德宣战。意大利的这种不情不愿惹恼了英法两国。它们认为，意大利不想兑现诺言。此外，意大利一宣战，德国人确实立马就派出了军队。

为了打开通往戈里齐亚、的里雅斯特与伊斯特拉的通道，意大利军队在伊松佐河前线崎岖不平的恶劣山地上，不断攻击奥地利人，但却没有取得成功。在重兵集结的前线上，意大利无法从侧翼包抄奥地利军队，也很少有机会改变攻击轴线。因此，奥地利的防御火力占了上风。1915年，意大利军队在向山上挺进时，伤亡人数达到25万左右（相较之下，奥地利军队折损约16万人）而收益甚小。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地形优势，奥地利防御阵地坚如磐石。1914年，意大利总参谋长向政府报告说，军队并未做好战争准备。1915年，意大利军队参战时，仅有618台机关枪、132台重型火炮。意大利军队未能开辟出战场，也无法取得机动性。英法军队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

相反，1916年5月，奥地利军队自特伦蒂诺发起进攻，取得重大收益并造成巨大伤亡。之后，意大利军队用菲亚特卡车与铁路运送预备役，守住攻势。8月，在新一轮的伊松佐河进攻战中，意大利军队占领了戈里齐亚城，但未取得突破。英法军队在西线也一直没有什么进展。因此，意大利总参谋长路易吉·卡多尔纳缺乏想象力地强调攻击的做法，证明了当时人们普遍存在的问题，即无法反思作战目标与方式。1916年6月，意大利政府在议会中失去信任投票后解散。这是未能取得战争胜利，无法就战事达成一致而付出的代价。

看起来，意大利是联盟中不稳定的成员。奥地利虽然遭遇重创向德国求援，却还未崩溃。意大利军队在利比亚遭到塞努西部落的强烈反抗。土耳其在背后支持塞努西部落的抵抗。但是，更糟的情况即将到来。1917年10月24日，德奥军队在科波雷托进攻战中给意大利军队以沉重打击。德奥联军强调突袭与速度，而非消耗战。他们在雾气的掩护下，用卡车快速转移军队、机关枪与轻型火炮。在前进中，他们避开了意大利要塞，突破连贯的防线，切断了交通线。意大利军队

被向后推了128千米。这与意大利早期取得的成果形成了明显对比。意大利损失惨重，2万人死亡、4万人受伤、35万人被俘，3152门大炮落入敌手。由于奥地利与意大利的疏忽，双方的战俘也将吃尽苦头。

这种战败与发展较缓的政治、社会危机息息相关。危机让人们担心，意大利会像此前俄国在1917年那样崩溃，会如奥地利与德国在1918年那样瓦解，会似法国在1940年那样垮掉。1917年8月，都灵人走上街头，举行反战游行。人群呼唤着和平与面包。这重申了市民对战争爆发的担忧。此事意义重大，因为都灵是战略物资的重要提供者。

但是，科波雷托也注意到大多数农民不想为国而战的可能性，并质疑意大利的区域凝聚力：人们特别担心南方对战争不够支持。这让人们想起上一次，当意大利在1866年遭受奥地利攻击时令人担忧的情况。事实上，1917—1918年，南方爆发了呼吁和平与面包的示威游行。他们的着眼点是，男人都去前线打仗了，家中无人收割庄稼。天主教对战争的抨击与这种农民抵抗有关。然而，逃兵与不愿应征入伍的问题仍然影响着意大利中部与北部的军队。卡尔多纳不愿承担责任，将失败归因于部分军队的不愿战斗。这种情况也见于法军之中，1917年在俄军里更是普遍。意大利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似乎是疏离的。一场政治危机因此爆发。意大利的盟友担心它会崩溃。这种情况与自由党的政治秩序受到墨索里尼挑战时其所面临的问题十分不同，但却有些联系。

到头来，1917年10月，新政府在维托里奥·奥兰多带领下组建了起来。奥兰多是位有手腕的政治家。他提出的就职前提是让国王免去卡尔多纳的职位。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乐意摆脱卡尔多纳，法国人也迫切要求把他赶下台。1917年11月，意大利在皮亚韦河上加固了一条新前线。

面对侵略者，意大利人民重整旗鼓、团结一致。他们对共同的遗产与文化、对同一个民族与国家，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这使抵抗活动持续不断。1866年，在弗留利失势的奥地利人卷土重来。除一些人外，人们普遍不欢迎他们。随后，奥地利人开始搜刮食物、木材、动物与教堂钟。如此一来，人们就开始忍饥挨饿。在意大利，议会方式击败了和平主义。人们并不理会墨索里尼提出的军事独裁呼吁。意大利的奥兰多相当于英国的大卫·劳合·乔治与法国的乔治·克里孟梭。他用行为证明自己是位得力的首相。奥兰多采取措施解决严重的食物、煤炭与钱财短缺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美英贷款足以负担意大利的亏空。政府加强价格管控，严格限定面包供应量，为了节煤还大大减少民用铁路服务。

1918年6—7月，在冬至之战中，奥地利人试图复制自己在1917年的胜利，结果遇挫。他们越过皮亚韦河，但无法守住西岸的阵地。反之，面对着补给线可能遭突袭的压力以及雨后河水暴涨的情况，加之受到意大利能够调遣预备役，以及意大利火炮破坏力的影响，奥地利军队士气低落，最后不得不撤离。

是年秋，奥地利（奥匈帝国）土崩瓦解。意大利政府面对民族主义暴动，越来越担心自己会错失良机。他们还担心，自己的领土主张在认可民族自决论的和约中会被排除在外。更具体的是，随着南斯拉夫的成立，这两点将限制意大利的收益。政府下令让意大利指挥官阿尔曼多·迪亚兹发动进攻。1918年10月24日，他依命行事，发动了维托里奥·维内托战役。意大利对格拉帕山附近奥地利阵地的攻击以惨败而告终：他们直直地进入了奥地利的火力范围内，却没有任何收获，反而在6天内折损了近25000人。但是，在更东边的地方，10月26日夜，意大利军队渡过皮亚韦河。奥地利军队守卫桥头堡直到10月30日才结束。当时，他们接到了撤退命令。也只有在那时他们才垮掉，这是他们泄气的部队在撤退时造成的。奥地利人开始从意大利撤离，他们的许多战俘落在了乘胜追击的协约国军队手中。

11月3日，奥地利接受了没有商量余地的协约国停火条款。同日，意大利军队占领了的里雅斯特与特伦托。维托里奥·维内托战役结束，意大利俘获成千上万名奥地利人。11月4日，停火协议开始生效。随后，意大利人开始计划经布伦纳山口与奥地利，对巴伐利亚发动军事进攻。这一威胁影响到德国的决策。值此关键时刻，德军依然占据着比利时大部与法国部分地区，但那里如今变得易受攻击起来。

胜利是令人沮丧的。意大利有3500万人口，战争夺去了60万人的生命，并导致250万人受伤，其中50万人永久伤残。幸存者们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由战争带来的毁灭、中断与疾病造成了平民伤亡。其中，1917年，面对奥地利与德国的进攻，人们大规模奔逃。更高的赋税与借贷打击了整个国民经济，预算赤字飙升。然而，西班牙的经济因中立而大大受益，日本与美国也在战时取得了经济增长。意大利经济受到战争的重击。借贷与资源、劳力短缺共同导致通货膨胀，资源、劳力短缺是由意大利向战时经济转移的政策及征兵制造成的。1915—1918年，意大利国债上升了500%，通货膨胀增加300%。乔利蒂认为，战争是“自《圣经》中的大洪水后，人类面临的最大灾难”。

战前的自由党体制及战后1922年法西斯主义接管，预先决定了人们对二者的评价。但是，事情的发展方向出乎预料。事实上，在1919年11月的选举中，法西斯主义者表现不佳。他们没有在争夺中取得508个席位中的任何一个。相比之下，社会党赢得了156个席位，而他们在1913年的成绩是52个。如今更名为人民党的天主教徒在本笃十五世（1914—1922年在位）的支持下，获得了100个席位（1913年是29个）。传统的自由党与民主主义群体从1913年的427个席位，暴跌到252个席位。它反映出，与战争相关的巨变已给自由主义带来了严峻挑战。选举还有着明显的区域差异。113名社会党人的选区在亚平宁山脉以北，来自罗马以南选区的社会党人仅有10位。人民党不仅赢得了此前许多自由党中产阶级的选票，还削弱了社会党在农村地

区的优势地位。事实上，人民党在农村成了一个农民政党。

社会党在农村地区的协会与工会正变得日趋活跃，尤其是在波河河谷地区。这对意大利而言，预示着一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这种结果即将在1922年来临。在很大程度上，波动是由战争带来的变化造成的。但是，它也是对战前变化发展的一种延续，尤其是由经济破坏、大众社会崛起、实行男性普选权以及天主教徒重新参与选举政治所带来的重重挑战。

第十章　从和平到战争，从战争到和平

人人循规蹈矩、忠心耿耿，希望自己能谋得部长职位作为奖励，或者至少不会失掉既得利益。法西斯党为墨索里尼提供的人都是经过审查筛选的。这么做的目的是确保忠诚。

法西斯主义孳生

正如1919年选举所反映的那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意大利如欧洲大部分地区一般，处于狂热之中。人们普遍对意大利新获得的领地感到不满，因为这远少于当初协约国的允诺，而且也远少于英法所得。维托里奥·奥兰多因为之前在凡尔赛和谈中未占到上风，如今失势了。这种不满情绪导致1919年在加布里埃尔·邓南遮（1863—1938年）带领下，一支志愿军占领了伊斯特拉东部城市阜姆。邓南遮是一位热情洋溢、自私自利且自我中心的诗人。他醉心于民族主义。这正是他那个时代所有国家的常态。这位骁勇善战的诗人经历过陆战与空战。他将凡尔赛和谈结果称为“面目全非的和平”。1918年10月，意大利裔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阜姆投票决定加入意大利。这次尝试引发了意大利与美国、法国军队间的冲突。投票过程最终被叫停。这损害了意大利政府的权威。早些时候，自由党政府已经表明自己对和平协议的愤怒，因为和约将诸如阜姆这样意大利认为理应是自己领土的地方，分给了南斯拉夫。意大利人认为，根据1915年签署的《伦敦条约》规定，这些地方也是之前已经许诺给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进一步发展了民族主义的抗辩理由。他指出，意大利被剥夺了应有的收益。邓南遮将成为墨索里尼坚定的支持者。

意大利的论点很有逻辑。既然意大利的盟友们如此强调民族自决，那么阜姆就应该归意大利所有。但是，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是亲南斯拉夫的。法国为了抑制意大利、保持自己在巴尔干半岛的主导地位，也支持希腊与南斯拉夫，反对意大利。法国对捷克斯洛伐克、希腊、南斯拉夫与罗马尼亚的支持，削弱了意大利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

意大利对战时盟友的行为感到愤怒，尤其是因为自己未能得到它们此前许诺给自己的土耳其帝国的领土。结果意大利在战后占领土耳

其时，阻挠盟国意图保持对土耳其控制权的企图，并且意大利向凯末尔·阿塔图尔克领导的民族主义者提供武器，助他们重击法国与希腊的占领军。这两个国家都遵循了反意大利的政策。

但是，事实上，奥地利的垮台极大地增强了意大利的区域实力。此外，意大利得到了特伦蒂诺、南蒂罗尔、的里雅斯特、戈里齐亚、伊斯特拉与扎拉。举国上下用这些新领地作为新街道名，以示庆祝。

战争的结束也带来了严重的经济问题。战时对食物及商品的需求结束，军人复员给劳动力市场造成冲击，失业率上升。由天主教徒、社会党人组成的两大政党均威胁着传统的自由主义，而且双方拒不合作。重要的战前政治家与坚定的议会议员乔万尼·乔利蒂作为老式首相在1920—1921年重返政坛，但他无法真正理解这些年间的大众政治，不能控制其发展态势，尤其没能遏制住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在意大利，一些老兵转向支持政治极端主义，加入了墨索里尼在1919年成立的“战斗团”或曰法西斯主义小队，接受了法西斯主义。墨索里尼称他们为“战壕中的贵族阶级”。

墨索里尼从其他国家的“恐慌”中学到不少东西。1919年，一群反对党内大多数人的社会党知识分子，创办了日报《新秩序》，并号召将政党彻底改造成革命无产阶级政党。他们迫切要求建立工厂委员会，但未能说服社会党支持他们提出的在1920年发动总罢工的方案。相反，在列宁的鼓励下，1921年1月，他们成立了意大利共产党。墨索里尼的小分队与左翼农业工人交战，尤其是在托斯卡纳与波河河谷地区。他们攻克了共产党占领的工厂，以至于许多自由党人愿意将他视为对阵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堡垒。反对党派的暴力并不是对法西斯主义的防御性反击，而是积极主动的选择。因此，在某种层面上，他们的所作所为让人觉得，法西斯主义是一部分中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武装反动。这是一段特别让人感伤、充斥着暴力的时期，暴力从双方蔓延开来。

法西斯主义在不同地区对不同群体而言，含义千差万别。这使它更强大，也更兼收并蓄、令人困惑。它历时的变化，尤其是暴露在权力之下，更是加剧了这种情况。农村地区的法西斯主义是个重要元素。因为，法西斯主义最初正是在农村小镇上发展成强大的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的辩护者将法西斯主义称为“第三股力量”。它是资本主义与劳工分歧的社团主义替代方案，也是朝气蓬勃地实现现代化的方式。但是，与墨索里尼的共和主义和社团主义方式同时存在的这种方案，包括社会主义的元素。法西斯主义的现实是粗野的，它常常暴力反抗社会主义，并愿与新旧精英阶层联盟，果断坚决地对抗劳工。农村地区当然是这种情况，例如，托斯卡纳，以及费拉拉与博洛尼亚两省。法西斯主义者表明，他们愿意为地主效力，而且后者也开始在组织中扮演重要角色。

另外，法西斯主义也利用了知识分子、未来主义者及许多其他人对自由主义的敌意。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邓南遮所做的那样，法西斯主义呼唤着复兴与变革，却厌恶大众、现代化与中产阶级文化。战争危机导致精英主义者对自由党进步主义的唯理论，对实证论、议会民主制、社会主义与工业主义的蔑视。武力被看作是一场促进复元的精神革命、一种需要与一种反物质享乐主义的方式，并因此对墨索里尼产生吸引力。他将法西斯主义视为一股进步的政治力量。

与此同时，墨索里尼没有一套复杂的政治理论。在许多方面，他是一个想要夺权、懂得军队调动之道与夺权之策的人。他与法西斯党都特别钦佩技术革新，因为技术进步反映出19世纪思想的实证主义与唯物主义基础。1919年，没人知道法西斯主义是什么，它将会成为什么样子，因为连墨索里尼自己也不知道。为了取得优势，他日复一日、步步为营地继续前进着，但却没有制定长期方针。墨索里尼是反对自由主义的，因为他作为工人阶级出身的人，认为自由党人是工人阶级的压迫者。

法西斯主义的不同倾向使其在本质上变得动荡不安且混乱无序，

它要靠花言巧语来试图形成自身极其缺乏的凝聚力。法西斯主义的倾向体现在它倡议的新旧建筑风格中。法西斯主义风格是许多其他国家建筑风格的意大利版。它是与中产阶级妥协后的产物：根据当时人的喜好，建筑设计空间很大，包括装饰艺术运动与对18世纪皮埃蒙特巴洛克风格的模仿。

墨索里尼认为，雄辩术是感情与热情的一部分。这不仅因为他需要用雄辩的言论来领导众生，还因为，正如他在1932年所写的那样，法西斯主义是一个“宗教概念”。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方式是对所谓的自由主义与议会政治缺陷的回应。许多评论家认为，这些缺陷是文化、神话、美学与政治上的。在寻求更广泛的支持，降低对国力与目标过高（且无根据）的期待时，墨索里尼的激进民族主义得到了其意欲取而代之的大半个政治界的支持。这些期待是过去的重担、对现在的失望及对未来的希冀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墨索里尼招致讥讽也是可以理解的。工人阶级中的一些人是被墨索里尼的路线所吸引的，包括他许诺并实现了福利国家政策；中产阶级为墨索里尼承诺的维持社会秩序、为他们提供挤进上流社会的机会所打动，而且墨索里尼也都做到了；墨索里尼又向统治阶级打包票说，他会维持现状。事实表明，这就是当时的情况：贸易保护主义被保留下来，国家为工业体制提供了大量资金，地主也未被剥夺地产。

墨索里尼夺权

政府不受人欢迎，甚至都没有明确目标。因此，1922年，在墨索里尼夺权的压力下，政府屈服了。全副武装的法西斯主义者占据要职，因此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要求墨索里尼组织内阁，而不是像现政府希望的那样实行军事管制。墨索里尼的“向罗马进军”运动无疑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当时的政治秩序缺乏愿意为之而战的支持者。尤其是，在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统治下的军队，没有被调动起来打击法西斯主义者。他们本来可以这么做。当时在意大利没有发生类似于

德国在1923年的事件。当时，德国用武装警察成功阻止了较小规模的纳粹分子在慕尼黑发动政变的企图，并将对方置于死地。法西斯黑衫军当时应该没超过25000人，他们的武装也不够精良。罗马卫戍部队整整28000人全副武装。他们在与城市有一段距离的道路与铁路上建起行之有效的检查站。火车要在诸如奥尔维耶托这样的站点停下来。其他军队按政府的要求实行军事管制，例如在佛罗伦萨的军队。因此，国王对军队下达的放行黑衫军的指示是后者成功的必要条件。国王欣然接纳了墨索里尼，后来还愿意与之共事。结果，1944—1946年清算时，这些情况都对国王不利，尤其是在1946年意大利变成共和国时起到了重要作用。

“政治艺术家”墨索里尼

1926年，“九百派”艺术展开幕。墨索里尼在发言词中称：“政治是一门艺术……在政治中，有许多直觉性的东西……在某个具体时刻，艺术家用灵感进行创作，政治家则是依靠决断力。”

墨索里尼上台

起初，墨索里尼为了使内阁更能为人接受，任命了许多非法西斯主义者，第一届内阁中仅有3位法西斯主义者。尽管武装部队未被拿下，但是墨索里尼一旦掌权就控制了政府中的大部分职位。1919年，法西斯主义纲领号召组建民兵，它将成为在政党控制下的人民军队的前身，但是，该纲领并未付诸实践。法西斯主义者虽然忌惮军事指挥官，但是并未组建类似的军事力量。事实上，墨索里尼让1923年组建起来的民兵隶属于军队，并试图发展现有的职业武装部队。

这让墨索里尼赢得了军队支持。他所做的调动全国资源与能源的承诺也起到了相同的作用。据说，他做出的这一承诺是民主体制所缺

乏的。1923年，意大利成立最高国防委员会与全国动员筹备附属委员会。然而，不管墨索里尼对权力有着怎样的雄心壮志，法西斯主义政权的巩固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实现。1922—1924年，法西斯主义政权还是很有限的。1924年，议会议员、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吉亚科莫·马泰奥蒂发表的谴责法西斯主义暴行与选举操控的演讲，引发了一场危机。事实上，这场危机是严重的。他遭到了战斗团的绑架与谋杀。

这次谋杀引发了一场政治危机，但是墨索里尼在国会中赢得了信任投票，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也拒不将其免职。这是独裁专政真正的开始。墨索里尼接着在1925—1926年成功扩大了控制权。1928年，选举被取消。死于1928年的乔利蒂拒绝谴责自由主义，但大多数其他的自由党人接受了墨索里尼。

为了让墨索里尼的工作变得更加轻松，意大利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社会的政治色彩。政治协会的各种早期形式要么被取缔，要么改头换面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西斯党与法西斯主义工会也只获得了有限的官方角色。在某种程度上，在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长枪党也经历了相同的命运。但是，佛朗哥的统治权是建立在军队支持的基础上的。与之相反，墨索里尼需要法西斯党，因为它为墨索里尼提供了可以信任的忠臣。政党无处不在，它控制、监视一切。加入法西斯党意味着工作保障与事业晋升，非党员则面临着许多工作与日常生活方面的问题。政党坚持着对政务与日常生活的广泛控制。墨索里尼即党，根本就没有内部选举的空间。墨索里尼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方法，让政党首领反目成仇。此外，一旦他觉得某人权力过大或太受欢迎，就会上演卫兵换哨或是明升暗降、剥夺实权的戏码。因此，当墨索里尼认为伊塔罗·巴尔博过于受欢迎时，后者被提拔为利比亚总督，他在罗马的影响力也就被移除了。

部长更迭就像走马灯，而且每次人事变动都出人意料、难以预测。这导致人人循规蹈矩、忠心耿耿，希望自己能谋得部长职位作为奖励，或者至少不会失掉既得利益。法西斯党为墨索里尼提供的人都

是经过审查筛选的。这么做的目的是确保忠诚。

尽管法西斯政权意识到了农村地区仇视变革这个大问题，但是意大利为了能够自给自足，还是打算发展工农业，尤其是扩大小麦种植面积。意大利还面临着养活人口的压力。墨索里尼把法西斯主义看作是维护男性气概的方式（他对女性粗俗且具有掠夺性的个人态度也体现了这一点）。他认为，人口外移与生育率下降均挑战了建立强大的意大利这一愿景。因此，他反对人口外移，并采取鼓励提高人口出生率的政策：墨索里尼想让更多的男人去当兵，从而有更多殖民者去建设帝国。他不仅想打造新一代的意大利人，还想有更多意大利人。

女人主要不是工人，而是生育工具。这种方针也让天主教会感到满意。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母乳喂养的医学化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喂奶次数需严格遵照时间安排。1927年，墨索里尼在耶稣升天节演讲中称，意大利有能力“在世界上有所作为”，而这种能力与意大利人口在20世纪下半叶达到6000万有关。按照法西斯政权的要求，电影、文学作品、广播与广告宣传都重复着这一讯息。与此同时，意大利成立“全国妇女儿童组织”，以保护母亲与儿童。电影重新界定了女性应扮演的角色。法西斯主义沙文政权试图限制妇女权利。1927年，女性的工资被固定在只有男性同事一半的水平上。1938年，公司中女性能从事的工作岗位所占比例固定在10%。1936年，节育变成“反种族纯洁与健康罪”。人们也以同样的眼光看待本已被认定为违法的堕胎。

对女性的态度意味着，任何认为法西斯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有延续性的倾向都值得商榷。墨索里尼大力推广社会福利，把它作为国家建设的一部分。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以独裁主义的方式推动社会福利建设并不是自由主义的特征，而且这在文化问题上尤其如此。1930年，墨索里尼在演讲《女人与机器》中称，女人工作是“所有政治与道德疾病的根源……把女人与儿童从工作场所清除出去，不仅能把工作交还到一家之主手中，还捍卫了种族的实际完整性”。他频频提及

种族主题，这在意大利政客中并不常见。

1929年2月，墨索里尼与罗马教廷通过协商签署《拉特兰条约》，解决了意大利与教皇之间的一些问题，其中就包括梵蒂冈城的地位问题。这座仅有0.44平方公里的城市成了世界上最小的主权国。梵蒂冈认可意大利的地位。作为在1860—1870年占领教皇国的补偿，意大利向梵蒂冈支付7亿5000万里拉赔款。意大利还承诺：天主教将成为意大利的唯一国教；婚姻要遵循教会法规；学校将实行宗教教育；主教由梵蒂冈任命，但要宣誓效忠国王。梵蒂冈教廷得到保证，遇来敌进犯时，罗马将受到意大利的保护。

这些协议的签订是法西斯主义合法化的关键。它们使墨索里尼获得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支持，进而巩固了自身地位。它们也是更广泛的反共产主义的一部分，表明墨索里尼想要控制社会的愿望。这种态度与政策体现在教育体制改革中。改革后的课程聚焦工人阶级学生职业就业与天主教价值观培养。这些学生是被单独挑选出来，要成为中产阶级的。庇护十一（1922—1939年在位）此前批判过在马泰奥蒂危机中将改良主义社会党与天主教人民党联合起来的提议，这种联盟旨在对付墨索里尼。庇护十一称赞墨索里尼是“上帝派给我们的”，他试图用权威、秩序与家庭这些共同的价值观来支持自己的论点，结果发现墨索里尼是靠不住的。事实上，庇护在1931年的教皇通谕《我们不需要》中，谴责了对国家的异教崇拜，以及法西斯主义对教会的暴行。但是，1939年，他的批评被后继者庇护十二（1939—1958年在位）排除在外。庇护十二是庇护十一的前教廷国务卿。在很大程度上，出于保护教会的目的，庇护十二与墨索里尼政权达成和解。庇护十二对法西斯主义的手段心知肚明。

很多人都反对法西斯主义，但法西斯通过对媒体的控制，通过恫吓、囚禁与暴力手段，镇压人民反抗。独裁主义者墨索里尼是法西斯主义“领袖”与政府首脑。部长听命于他而非议会，墨索里尼提名法西斯大委员会成员。唯一获准存在的政党就是法西斯党。地方行政机关

接受自上而下的管理。法西斯主义控制着各种机构。1926年，随着意大利皇家学院的成立，科学、文化组织开始处于政府管理之下。1931年，教师与大学教授被迫宣誓效忠（1200名教授中只有13人拒绝宣誓）。与此同时，1938年，意大利开始实行对书籍的审查制度。墨索里尼认为，教育可以使社会变成法西斯主义的，由此建立了准教育机构。知识、教育与社会动员的目的不仅是培养模范公民，还是发明一种能够使意大利变成现代化强国的技术。青年运动"意大利青年刀斧手"（刀斧手是古罗马执法官的扈从。他们手持束棒，即一捆象征着权威与威力的棍棒）吸纳了6～21岁的男孩与9～17岁的女孩。运动的目的是指导年轻人，控制他们的娱乐休闲活动。爵士乐遭到禁止。墨索里尼试图改善工人阶级的命运，部分原因是为了兑现承诺，部分原因是他确实想做成这件事，部分原因是他能因此改变现有的非法西斯主义统治阶级。墨索里尼的做法是把一些依靠政党升了官的人安插在重要职位上。

意大利恢复了死刑。奥弗拉（全称"监视镇压反法西斯事业"，它是正规警察的秘密分支机构）是个重要组织。它对1937年罗塞利兄弟遇刺事件负有责任。这兄弟二人是法西斯党的政敌，此前离开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暴徒也会攻击其他人。1931年，在博洛尼亚，当作曲家阿图罗·托斯卡尼尼拒绝在音乐会上演奏国歌时，法西斯主义暴徒照着他的脸就是一拳。托斯卡尼尼后来去了美国。反对者因持异见而入狱。1921年，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年）创立了意大利共产党，后来还当上共产党书记。1926年，他被判处颠覆罪并一直被囚禁到死前不久。

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时期有着丰硕的文化成果。在音乐领域，普契尼依然活跃，还有诸如马斯卡尼、雷斯庇基与沃尔夫——费拉里这些作曲家；作家包括皮兰德娄、黛莱拉、莫拉维亚与嘉达；诗人有翁加雷蒂、夸西莫多与蒙塔莱。国际奖章包括多个诺贝尔奖。知名画家是基里科、卡拉、莫兰迪、西罗尼与巴拉。还有一些新画家，尤其是

古图索与阿尼戈尼。曼祖在雕塑界享有盛誉。建筑师有皮亚琴蒂尼、庞蒂、特拉尼与利贝拉。其中，法西斯政权的建筑师皮亚琴蒂尼在建筑中引入钢筋混凝土。上述许多人根本不是法西斯主义者，或者就像翁加雷蒂一样，最初是法西斯主义者，但后来退党了。但是，他们没有受到迫害。政权关注的是那些公开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人。

始于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给意大利经济带来了沉重打击。到1934年，约有10.7%的男性劳动者失业。由于其他地方机会更少，人口外移在大萧条时变得更加困难，工资收入也没有增加。虽然政府自1935年起进行的部分重整军备有助于增加就业、提高收入，但是法西斯主义失去了吸引力。工业方面的情况有所好转，但农业问题依然存在。墨索里尼提出的“粮食之战”聚焦于南方地区。它虽然不像同时代的苏联政策那般血腥，却遭遇了国家经济管理的常见问题。

此外，墨索里尼不喜欢南方地区，因此为南方提供的支援也极少：法西斯主义在那里不受欢迎。意大利在1925年开展的打击黑手党的运动对西西里不分青红皂白地实行了严厉的监管，这没给法西斯政权赢得多少群众支持。官方宣称取得了胜利。但是，根据同时代撒丁岛的描述来看，成功只是表面文章而已。实际上，政府对令人不快的事实秘而不宣，其中就包括可怕的贫困。意料之中的是，人们大多对政府疏离。卡洛·里维在描写意大利南部的巴斯利卡塔地区时，提到了这种情况（《基督停在了埃博利》，1945年）。1935年，里维因反法西斯主义政治被“困在”南方的卢卡尼亚。

作为一位敌视共产主义者，墨索里尼在国际社会上得到的评价整体上是正面的。然而，墨索里尼认为，国际关系的本质是竞争，武力是这种竞争的核心。这种理念影响了他在所有领域的全部政策，包括文化、经济、金融与社会政策。墨索里尼像许多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政治家与评论员一样，对新技术痴迷。他认为，机器就是他想要推行的强大独裁主义革新论的化身。飞机特别让法西斯主义者神魂颠倒。墨索里尼派意大利军用飞机飞出国门，打出自己的旗号，尤其是在南

美洲地区。在阿根廷与巴西，墨索里尼的政治模式格外受人欢迎。它在巴尔干半岛地区也是重要的。墨索里尼除了通过这种方式卖飞机外，还热衷于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优势。

墨索里尼将国际竞争当作汇聚举国之力的必要焦点，当作是一种取代社会矛盾的方式。这样的政策需要政府去宣传伟大成就。例如，国内政策包括抽干罗马附近的彭甸沼泽地，以消灭疟疾；宣布罢工非法，压低工人工资；保障火车准点。据称，更著名的一项成就是开始实现电气化。但是，这在某种程度上实际是为了拆散相关的工会，因为这些工会是极左的。警察被安插在火车上。虽然法西斯主义对人们态度的影响要小得多，但雇主从政府对工会的打压中得利。彭甸沼泽变沼为地的模式被视为法西斯主义海外扩张的样板。1933年，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在成立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时，将其视为国家干预的典范。

墨索里尼很乐意调动军队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意大利的民族主义理想经过他的重新规划后，在本质上是机会主义的，尤其好勇斗狠。1923年，意大利为使希腊在阿尔巴尼亚争端中让步，占领了科孚岛。事件源于希腊的扩张主义，但是最终意大利的计划奏效了，使用武力让部队感到很高兴。

1928—1932年，意大利对平民采取了极其野蛮残暴的行动，这导致约5万人丧生。利比亚因此被制伏了。这一过程增加了墨索里尼的威信，让人们觉得，他比之前的历届政府都更能干。法西斯军队阻塞水井、屠杀畜群，粗暴地强迫人们迁移。1935—1936年，墨索里尼在征服埃塞俄比亚时，恶贯满盈，其中就包括毒气的大规模使用（这违反了1925年签订的《日内瓦议定书》）。法国与西班牙在20世纪20年代攻打摩洛哥时，曾使用过毒气。意大利在这次军事行动中，调遣了包括殖民地军队在内的557000名士兵。国际联盟认定意大利的行为属于侵略，但这并未引发严重后果。

1936年5月9日傍晚，墨索里尼在罗马发表了一篇经过精心安排、充满戏剧性的演讲，宣布古罗马帝国“再次出现”。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的统治一旦确立起来就证明是严酷的。这种严酷性遵照了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的帝国范式。由此产生的抵抗运动遭遇了野蛮凶残的镇压。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意大利人不愿被打败。大多数驻守在埃塞俄比亚的军队来自其他非洲殖民地，他们是严厉的：厄立特里亚人长期以来都与埃塞俄比亚人有着激烈的冲突，而利比亚军队自视为白种的阿拉伯人。他们觉得自己比黑皮肤的埃塞俄比亚人更接近意大利人。虽然意大利没有做出类似于德国国防军实施大屠杀那样的暴行，但是认为意大利必定比德国更仁慈（而不是简单的更软弱）的观点，在利比亚人与埃塞俄比亚人看来是有待商榷的，而且意大利军队并非如此。

在战争如火如荼地进行的同时，意大利政府也发动了舆论攻势。负责协调这项工作的是1935年成立的宣传部。它鼓励有利报道、控制不利描述，试图控制信息传播。战争也被用来让法西斯体制看似必不可少且具有优越性，还用来给墨索里尼与军事化披上一层合法外衣。人们对冲突导致的严重财政消耗闭口不提。由于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政治信仰，所以对公民进行军事训练的政策对政府来说是重要的。这些侧重意味着，社会政策的社会福利性被边缘化了。

事实上，意大利无法轻松应对在埃塞俄比亚战场上，以及在西班牙内战（1936—1939年）中对佛朗哥阵营实行援助的繁重军事任务。它也无法从容解决普遍存在的军事集结问题。在西班牙内战中，意大利派出73000名士兵驰援佛朗哥。这个人数要比希特勒派出的多得多。意大利军队的飞机轰炸了西班牙共和国的城市，如巴塞罗那与马拉加；他们的潜水艇攻击了开往西班牙共和国港口的苏联船只。墨索里尼想要塑造佛朗哥政权，但佛朗哥无意破坏自身的独立性。意大利投身的事业可谓五花八门。例如，1937年，意大利的加里波第营作为志愿军，与共和党人并肩作战，在瓜达拉哈拉战役中对抗意大利军

队。这个营的名称有着巨大象征意义。

当时还存在着更广泛的外交与地缘政治冲突。墨索里尼任命各式各样的专业人士与法西斯党要员为使者。外交家们要顺从墨索里尼的反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并像他一样鄙视英国与法国。意大利起用持此种观点的法西斯主义外交家。1932—1939年，意大利驻伦敦使者迪诺·格兰迪就是一例。结果，这些外交家导致意大利对英国优势的忽视及可能的合作机会的丧失。同样地，虽然意大利外交家警告墨索里尼与希特勒合作可能会有种种危险，但墨索里尼都听不进去。1933年，墨索里尼提议，在英法德意《四国公约》的基础上成立“欧洲理事会”，以修订1919年巴黎和会上签订的条约。这个构想没能实现。

为了与英法在地中海地区一争高下，意大利人支持壮大海军的重要计划。虽然1934年墨索里尼将部队调至布伦纳山口，以应对奥地利纳粹分子控制奥地利的失败企图，但是到1938年，当墨索里尼成功接管后，意大利就与希特勒结盟了。墨索里尼长期以来都视希特勒为自己在奥地利与巴尔干半岛地区的竞争对手，因此英国一而再再而三地把意大利当成是可能的盟友。但是，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一样，对民主国家不屑一顾，反对英法。这些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末对他来说变得更重要了，而且，人们也不再觉得德国是阿尔卑斯山脉另一端的野蛮国度了。德意两国间的政治、经济联系得到加强。

双方采取联合措施，打击意大利的犹太人。1938年，所有犹太裔儿童均被逐出公立学校。法律禁止犹太人执教（200多人被解雇）、从事政务工作、参军，他们也不能做许多其他事情。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不得通婚。“过量的”财富也是不允许的。人们欣然执行这些政策。除了极少数正直的人仗义执言外，教会统治阶级很少对此发表批评意见。与德国和奥地利相比，意大利人民不大有反犹情绪，因此也就不太支持对犹太人的遣返与大屠杀。与此同时，意大利人虽同情他们认识的一些犹太人，但不愿将这种同情心延伸到其他人身上，更不要说为他们抗议了。新成立的政府机构“人口统治与种族总务处”负责法律

的执行，并坚决有力地开展执法活动。结果表明，法院轻易就范，常常决定了结针对犹太人的案子。在许多方面，《种族法》意味着意大利要重新实行过去的社会规范。尤其是到1870年为止，意大利要实行教皇统治下罗马的社会准则。此外，许多人参与了意大利境内的大屠杀活动，尤其是从掠夺犹太人中谋利。

1935—1936年，由埃塞俄比亚问题引发的一场大战似乎迫在眉睫。英法已制订许多计划，包括关闭苏伊士运河，以及轰炸意大利北部城市。到头来，冲突并未爆发。这进一步助长了墨索里尼的气焰，他已积极与英法的敌人密谋，包括阿拉伯与巴勒斯坦的民族主义者。意大利向阿富汗与也门提供军火，还支持马耳他的反英民族主义者。有些马耳他民族主义者还提议与意大利联合。

在墨索里尼的字典里没有“极限”这个词。意大利投身的事业，范围大得让人精疲力竭。潜在的国际对手没能意识到，意大利虽然有优势，但也有缺点。20世纪30年代末，当墨索里尼计划攻打埃及时，英国人急切地考虑着，如何才能更好地守住自己在那里的阵地呢？1938年11月，意大利众议院回应了夺取“突尼斯、科西嘉、尼斯与萨伏伊”的呼声，这些地方全是法国的领土。次年4月，意大利成功入侵前附属国阿尔巴尼亚。这次侵略使墨索里尼能向世人宣布，意大利像最近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希特勒一样，也在攻城略地。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在意大利国王与埃塞俄比亚皇帝之外，新增了阿尔巴尼亚国王的头衔。

1939年4月7日阿尔巴尼亚侵略战

阿尔巴尼亚侵略战是意大利对易攻的近邻阿尔巴尼亚发动的一场处置失当的战争。在某种程度上，这场由无能的意大利统帅部策划的侵略战之所以最终能成功是因为寡不敌众、四分五裂的阿尔巴

尼亚人没进行多少抵抗。入侵的政治决策来得有些突然，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意大利对德国占领波西米亚与摩拉维亚的回应。这个决定是为了让意大利受益。武装部队在入侵开始前不久才知晓这项任务：命令下达时间是3月31日。突如其来的决定影响了军队可获得的包括商船运输在内的资源，而且计划也不周全，长期两栖作战的准备不充足。统帅部在制订计划时未考虑到近岸水域的水深。早上4点50分，意大利船队的第一艘船进入都拉斯海湾。上午9时，那里的卫戍部队就被清除了。在整个军事行动中，意大利方12死81伤。他们驱散了50500名阿尔巴尼亚士兵，大多数人后来加入了意大利军队。由于大雾，运输先遣登陆部队的意大利船只延误了，而当都拉斯被占领后，本来要用作卫戍部队的军队作为第一拨军队登陆。码头不够，船只难以卸货下人。次日，虽然机动队因为在黑夜中备战时得到的是柴油而不是必需的汽油而有所延误，但是他们仍然向阿尔巴尼亚首都、内陆城市地拉那前进。

当从阿普利亚的格罗塔里埃机场空运的第一架飞机在地拉那机场着陆时，机动队赶到了地拉那。空运进展顺利，运来整整一个团的士兵，但飞机无法装下迫击炮与火炮。航空运输工具的匮乏意味着军队是被90架轰炸机运来的，飞机上加装了由木板组成的应急层。索古一世国王逃走了。

意大利官方记录将这次军事行动描绘成一场组织有序的胜仗，而促成这场胜仗的是子虚乌有的部队的绝妙行动。

1939年，意大利没有参与盟友德国与英法之间的战争，反而宣称自己并不好战。1939年2月4日，墨索里尼向法西斯大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强有力的报告，明确表示对法国的反对。虽然意大利与希特勒的关系有所改善，尤其是随着5月22日《钢铁条约》的签署，但是这依赖于双方达成的口头谅解，即德意两国不会在1943年前挑起战争。墨索里尼的女婿加莱阿佐·齐亚诺伯爵在1936—1943年担任意大利外交

部长。他反对与德国结盟，宣称希特勒让墨索里尼感到怒不可遏的原因是，前者没有就侵略波兰一事与墨索里尼事先协商就妄自行动。墨索里尼意识到，他与希特勒的地位并不平等，希特勒声望日隆。墨索里尼在夸大其词之余，也对意大利军队的先进性存有疑虑。

意大利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0年，德国战胜了丹麦、挪威、荷兰、法国与英国。这让墨索里尼在当年6月不顾军队警告，即对英法宣战。最终的结果对意大利来说是毁灭性的，失败、侵略、占领与内战席卷而来。

但是，最初的情况是让人感到乐观的。6月10日，在法军明显战败、英军从敦刻尔克撤退后，墨索里尼参战。因为他担心如果不这么做的话，自己将错失赢得荣誉、攻城略地的良机。战争看起来会是短暂的。他希望自己能捞上一把，得到媲美德国此前所获的那种收益。墨索里尼觉得，意大利的伟大需要建立在掌握地中海地区控制权的基础上。因此，他就得打败英国。墨索里尼想要从大英帝国与法国那里谋得好处，想要在巴尔干半岛获得更大的权力。在巴尔干半岛地区，墨索里尼长期以来都以牺牲南斯拉夫为代价，支持着那里的克罗地亚分裂主义者，并对希腊采取反对态度。

德国的胜利让墨索里尼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他在意识形态上接近希特勒，对民主国家不屑一顾。墨索里尼认为，由于英国在地中海地区势力强大，意大利只是处于半独立状态而已。但是，墨索里尼政权的本质是充斥着暴力与侵略的扩张主义。这些因素占了上风，让他无视意大利糟糕的财政、军事状况，让他忽视战争支持者实际上少之又少。意大利民众对战争不感兴趣。事实上，墨索里尼私下常表露出对意大利人民的轻蔑。

墨索里尼的政策包括压倒后勤主任们明显的悲观主义，摧毁英国

外交部认为意大利会保持中立的坚定信念，并打破与之相关的墨索里尼会打开英国与希特勒沟通的“秘密渠道”、充当和事佬的幻想。这是英国那些热切希望通过协商途径结束对德国战争的人所期望的。

人数少得多的法军在阿尔卑斯山脉拖住了意大利的进攻。双方伤亡不多，但意大利军队相对较重。更让意军感到耻辱的是，他们无法打败明显已经失败的敌人。部分原因是，法军已在这里的少数几条前进路线上筑好了一流的防御工事，这反映出阿尔卑斯山脉前线的本质。法军为保卫战做足了准备，没给意军留下模仿德国人机动作战的机会，也没让后者有效利用自己的人数优势。意大利通过战争夺回了1860年的失地尼斯与萨伏伊，但也就仅此而已。希特勒想要撑起维希政权统治下的法国，这种顾虑对战争条款来说是重要的。但是，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是，意大利未能通过打胜仗的方式来攻城略地，而这种胜利是希特勒所熟悉的。意大利直到1942年才攻占科西嘉岛，那也是德军占领维希政权统治下的法国的时间。

在与英国的关系上，德国与意大利也起了冲突。希特勒乐意让英国保有大英帝国，只要英国接受德国在欧洲大陆的统治地位即可。但是，墨索里尼想从大英帝国分得一杯羹。意大利参战前，空军中将、利比亚总督伊塔罗·巴尔博提议正面交战、突袭马耳他。空降兵与海军陆战队最先登陆，一个师的军队紧随其后，而这个师此前在登陆希腊科孚岛作战计划中接受过登陆训练。墨索里尼觉得，巴尔博提议的军事行动不是必要的。理由是，他错误地认为，因为法国覆灭在即，战争几乎已经结束。

墨索里尼的雄心壮志与支持他的人的观点都不是基于对意大利军事机器力量的合理评估。这种不足，以及他们误将虚化辞藻与幻象当作现实的做法，即将导致一系列的灾难。为了抵消德国对罗马尼亚政策的影响，为了保证巴尔干半岛地区依然明显处于意大利的势力范围内，1940年10月，意大利从处于自己控制下的阿尔巴尼亚进军，入侵希腊。但是，进攻被击退，希腊人反过来进入阿尔巴尼亚南部地

区。墨索里尼以为，意大利能轻松取胜的坚定信念被残忍地削弱了。寡不敌众、训练不足、装备匮乏的意大利军队在恶劣的地形上作战时，被人数更多、适应性更强、训练有素且士气高昂的希腊军队击败了。本来要突袭马耳他的意大利部队，最终到阿尔巴尼亚做援军去了。

意大利军队从意属殖民地利比亚出发，入侵埃及，是为了在赢得胜利时扮演重要角色，从大英帝国攫取领地。意军遭遇了人数比自己多得多的敌军（对方的215000名对阵31000名意大利士兵）。1940年12月，意军这次准备不足、指挥不利的侵略战在英军面前遭遇大溃败。当时的英军包括帝国军队，尤其是澳大利亚人。英军在一场精彩的反击战中奋勇向前，征服了利比亚东部地区，并获得大批战俘。因此，许多意大利家庭的男性成员都成了英军的俘虏。这极大地削弱了意大利国内对战争的信心。这些囚犯当时比留在意大利军队中的士兵们吃得还好。

1941年3月，英军也在东非击败了意军，并收复了英属索马里兰。虽然意军在埃塞俄比亚北部地区一直坚守到1941年年底，但是自1941年1月起，英军占领了包括意属索马里兰、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在内的大片土地。这对英国人来说是一场惊人的胜利，再次有近25万意大利人沦为俘虏。但是，后来随着帝国渐渐老去，加之在人们关于这场战争的记忆中主要是与德国的斗争，这项成就被大多数人遗忘了。

1940—1941年，英国攻击地中海地区的意大利舰队并取得成功，尤其是英军对意军在塔兰托军舰的突袭，以及1941年3月28—29日夜的马塔潘角海战，最终导致德国向意大利派出援军。英国原打算对地中海地区的意大利岛屿潘泰莱里亚岛或是十二群岛实施两栖进攻的计划，此时这变得不可能实现，或者是说多余了。英军在利比亚击败意军，导致希特勒在1941年1月11日下令调兵支援利比亚，做好西部地区守卫工作。次月，这支军队得名“德国非洲军团”。德国飞机与

潜水艇在地中海中部地区起到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德国开始在意大利感兴趣的地区变得举足轻重，即北非与巴尔干半岛地区。意军参与了始于1941年4月6日的南斯拉夫、希腊侵略战，其中包括5月对克里特岛的入侵。但是，德军才是主力。此外，意大利虽然也从最终的南斯拉夫及希腊领土协议中受益，但领地分割基本上是按德国要求进行的。意大利占领了此前曾为自己所有的领地，如爱奥尼亚群岛。

参战导致意大利开始强调对犹太人的歧视性对待。但是，再一次地，意大利人的反犹远不及德国人强烈。1940年6月，费拉蒙迪集中营开始运作。那里关押了来自罗马的160名犹太人。1943年，当英军解放那里的时候，集中营里关着1604名犹太人与412名非犹太人。无人遭到杀戮，也没有人被遣送到德国控制的欧洲地区。在这个阶段，费拉蒙迪集中营相对来说是有人情味儿的，而且自然原因导致的死亡率也低。集中营内有两座犹太教堂。意大利人拒不将外国犹太人遣出意大利。他们对犹太人的强制劳动也不是致命的。1938年后，犹太裔陆军及海军军官还在“桌子后面”躲了好几年。

与德国相比，意大利的工业基础要弱得多，褐煤与钢铁产量也很低。因此，意大利不能像德国那样建立起能有效满足自身需要的军工补给体系。这导致意大利的失败，并让人们普遍觉得战争已经成了随波逐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意大利严重依赖英法物资，但这条路如今走不通了。此外，虽然墨索里尼满口大话，还发表了种种独裁主义的效率理论，但是意大利无法像在1915—1918年墨索里尼前任统治时那般，实行资源的有效动员，也未能打造出强大的战时经济。经济没有实行军事化。税收目标未能实现。意大利对大型工厂下达的指示也是有限的。武器与武器系统的质量与数量均不足。在某种程度上，基于这些原因，意大利在早期惨败于希腊与英国后，难以重建自己的军队。

例如，因为意大利工业基地不能提高产量，也无法赶上飞机技术的发展速度，意大利无法保持住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初建立起来

的空军相对优势。1940年，意大利的大部分空军已经过时，较新的飞机也没有英式飞机那般性能良好。自1941年起，意大利人在使用德国发动机后，确实开始造出更有战斗力的战斗机，但是数量不足。1941年是意大利飞机制造的顶峰；1942年与1943年年初，飞机产量却明显下降。当时，可用资本、专业技术与生产设施都成问题。

人们的生活受到了严重冲击，包括取缔跳舞（1940年）、禁用汽车（1941年）。1939年，意大利开始实行配给制，后来这种政策扩大化，但是也有人逃避配给制。通货膨胀变得严重起来，赋税增加，结果导致大范围逃税。当兵不像在1915—1918年时那么容易被躲过去了。

意大利面临的更严峻问题是战略性与战斗层面上的，尤其是陆上作战指挥不利，以及未能联合陆海作战。这些问题而非武器匮乏使意军在东非与利比亚屡次失败，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了地中海地区。在那里，虽然意大利海军装备了许多现代战舰与潜水艇，但他们还是被打败了。意大利的32艘潜水艇以波尔多为基地，参与了1940年7月的大西洋海战。但是，它们取得的胜利十分有限，就像意大利在1940年德国攻打英国的闪电战中为德国提供了飞机援助一样。

德国的联盟政治不等于协作。德国及其盟国未召开过类似于同盟国那样的峰会，各国之间也无共享情报，并且普遍无法维持合作关系。直到1940—1941年意大利在希腊、北非与东非战败后，墨索里尼才不再拒斥德国在轴心国中的主导地位。这些败绩影响了墨索里尼对1942年、1943年战略性局势的看法：他敦促希特勒与斯大林媾和，集中兵力守卫西欧。这一政策旨在保护墨索里尼自己的阵地，但并不合希特勒的心意。

在战争中，意大利对巴尔干半岛实行了野蛮占领。这种暴行利用了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帝国扩张主义、种族主义，以及殊死“一战”还时常凶残蛮横的反抗组织。他们犯下的战争罪行是意大利人往

往避而不谈的。此外，虽然意大利军队的残忍没达到德军的程度，但东线上的意军对待平民也是野蛮粗暴的。1941年，东线上的意军有整整6万人；1942年，达到22万。意大利虽有大批部队陈师东线及巴尔干半岛地区与北非，但未能对“轴心国大战略”做出巨大贡献。意大利在北非与地中海地区的战局失利，使德国不得不执行新军事任务，补意大利的缺，而且，意军与德军在协同作战方面问题严重。最显著的是，他们没有与日军合作。在索马里，意大利在印度洋上有一个殖民地，在摩加迪沙有个港口。然而，意大利驱逐舰的基地却建在意属红海上厄立特里亚的马萨瓦港。在出现任何合作可能之前，这两个港口就被英国攻克了（分别是在1941年2月25日与4月8日）。

然而，1942—1943年，意大利军队依然在北非起到了重要作用。1943年，意军在西西里岛保卫战中也贡献了力量。人们存在着低估意大利战斗力的错误倾向，但事实是意大利确实没有担任起与其资源相当的责任，而且，意大利的努力也不成功。1942年11月，德意联军在埃及阿拉曼被英军击溃。之后，英军攻克利比亚，德意军队退回到突尼斯。德军极大地巩固了轴心国在突尼斯的阵地，但是遭到经利比亚前来的英军及当年11月入侵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的美军的双重攻击。1943年5月，突尼斯的德意军队投降，这使被捕的意大利人人数骤增。两个月后，西西里岛沦陷。

1943年7月10日“哈士奇行动”

两栖作战能力与空中支援使同盟国掌握了战争主动权，并使得他们大规模进攻地中海上最大的岛屿西西里岛。同盟国起先派出由18万士兵组成的军队，750支战舰、2500艘运输船与400艘登陆艇。这将成为欧洲战场上规模第二大的两栖作战，1944年的诺曼底登陆是第一。这些登陆比同盟军的1942年北非登陆要更加复杂。同盟军采用了相应的船岸协同技术，尤其是两栖浮箱栈桥的运

用与训练有素的海滩小分队的调动。英军在西西里岛东南部登陆，美军在更西端的斯盖拉米亚角与利卡塔之间上岸。

同盟军一登陆就遇到岛上敌方守军带来的种种麻烦。意大利第六集团军在阿尔弗雷多·古佐尼将军的指挥下，守卫着西西里岛。第六集团军中有海军与空军。古佐尼率领着31.5万人，其中有4万名德国军。他的军队主要由海岸师构成，即9支海岸师中的5支。此外，他只有一些过时的坦克。古佐尼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将兵力集中于西西里岛东南部，因为那里是同盟国在领土争夺中想要拿下的目标。意大利军事情报处（SIM）通过特工在里斯本获得确切消息，相信同盟国将在西西里岛登陆。然而，德国情报机构认为，同盟军会从撒丁岛或希腊上岸。德国指挥官阿尔贝特·凯塞林置意大利情报于不顾，将德国第14装甲师的坦克调至西西里岛中、西部地区。7月7日，古佐尼接到警告，说同盟国将于两三日内登陆。尽管凯塞林得知了从里斯本传来的情报，尽管同盟国在一通狂轰滥炸后于6月11日占领了近岸潘泰莱里的亚岛，凯塞林还是将部队留在了内陆，没有守卫西西里海岸地区。相反，意大利军队陈兵海岸，并于7月10日炸毁了杰拉岛与利卡塔岛，以免它们落入同盟国手中。

意大利军队虽顽强抵抗，但还是被打败了。例如，当第八集团军登陆时，他们遭到分散在那里131千米海岸线上的意大利第206海岸师的抵抗。第一拨英军以3比1的人数优势，远远压制住了守在那里的意军。意军没有坦克，被全歼。但是，当英军继而进攻由意军守卫的卡塔尼亚时，苦战23天才拿下这座城市。美国第七军在杰拉岛以南地区登陆。意大利海岸部队尽力抵抗，伤亡惨重。第429海岸警卫队的伤亡率达到45%。在50台过时的意大利坦克与飞机轰炸滩头堡的助力下，里窝那步兵师发动了反击战。但是，进攻失败了，伤亡人数达到一半。德军坦克远水难解近渴，最初无法给意军提供支援。当它们最终赶到时，进攻得以继续并首次获胜。但是，美军在海军火力的帮助下，英勇奋战，扩大了滩头堡阵地。同盟国

从当地黑手党那里获得帮助。有些试图建立组织反抗同盟国的意大利官员被枪毙，而一些美军则接受了黑手党成员的指导。

随后，英军守住卡塔尼亚，乔治·巴顿率美国第七军向北进发，前往巴勒莫，创造并利用从侧翼包抄敌军的机会。人手严重不足的阿希埃塔步兵师无法阻挡巴顿。巴顿在攻克巴勒莫后，击退了特罗伊纳的反攻，向东朝着墨西拿进发。美军用事实证明，自己比在突尼斯时更有战斗力了。他们反复获得并利用了部队的机动性。但是，德军作战力也很强。出于地形原因，装甲部队受到限制。德军就利用了地形优势。8月16日、17日，同盟军完全占领了西西里岛。结果表明，这里为同盟国提供了进攻意大利本土的宝贵基地。

墨索里尼垮台

意大利军事系统危机演变成一场法西斯主义危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二者有着相似的局限性，墨索里尼无法也不愿面对这点。他下定决心让意大利人坚持战斗。他认为，妥协有辱法西斯主义。墨索里尼这种无视现实的做法，反映出他掌权初期的故作姿态与死要面子。这种态度灾难性地延续到了战争时期。直到1945年被处死前，墨索里尼都将战争的失败归咎于除自己外的所有人：国王、教会、资产阶级、众将士与人民。

1943年，同盟国的轰炸严重挫伤了意大利人民的士气。人们对政府无法保护平民的无能感到愤怒。同盟国刻意通过轰炸来激起民愤，广发传单来强调这点。意大利防卫防御工事与民用避难所的匮乏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许多人逃往乡下，大后方崩溃在即。2月，米兰与都灵发生罢工。

同盟国入侵西西里岛。因此，法西斯主义领导集团内部及其他意大利领导人，尤其是国王，对墨索里尼越来越不信任。墨索里尼曾许

下豪言壮语，誓要带来极权主义的效率、实现国家现代化；此时，泄气的墨索里尼给国家带来的只有失败而已。这是继1896年阿杜瓦、1917年科波雷托之后，意大利面临的第三次屈辱，也将成为最严重的一次。

1943年7月24日，法西斯大委员会召开。这是自1939年后首次召开的法西斯大委员会。会后，7月25日，应国王要求，墨索里尼被捕。虽然佩特罗·巴多格里奥元帅一直以来都是碌碌无为之辈，但还是由这位前总参谋长组建了新政府。新政府将法西斯主义者排除在外。它得到了军队与教会的支持。巴多格里奥是个优柔寡断的蠢人。他试图在不必承认战败的前提下与同盟国达成协议。与此同时，德国迅速壮大兵力。

1943年9月3日，新组建的意大利政府与同盟国签署了《卡西比莱停战协议》。5天后，停战协议公之于众。但是，德军迅速占领了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由于意大利新政府此前已从罗马逃往布林迪西，所以未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虽然大多数舰队即便在德军突袭下仍能与马耳他的英军会师，但是意大利军队并未接到适当的指令。军队实际上已经分崩离析。指挥官为避免与德军发生冲突，解散了部队，也有部队自行解散的情况。继续存在的常规军在法律上仍效忠于国王，但一些人加入了游击队或被德军俘虏。墨索里尼在德国占领区成立了萨罗共和国。后来，许多拒绝支持萨罗共和国的意大利士兵被遣往意大利与波兰的德国拘留营，从事强制劳动。他们大多工作在兵工厂中。在另一条轨道上，教皇不再与法西斯主义串通一气。在某种程度上，教皇此前与法西斯主义联手是为了反对自由主义、反对民主与共产主义。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教皇下定决心，墨索里尼不可留。

墨索里尼政权的覆灭让许多同盟国战俘有机会逃走。他们往往从意大利人那里得到庇护。这些意大利人通常是冒着极大的危险这么做的。

本土的战火

1943年9月3日，英军从西西里岛入侵卡拉布里亚，未遇抵抗，并于9月4日、8日完成登陆。9月9日，在更北部的地方，一支英国两栖部队占领了重要的塔兰托港口。英军从那里进发，占领了布林迪西与巴里。9月14日，巴里陷落。意大利停火协议的签订给阿普利亚的这些军事行动带来极大便利，因为此处没有德国军队。

9月9日，侵略军主力在“雪崩行动”中，登陆那不勒斯以南的萨勒诺海湾。但是，德军对过度扩张的萨勒诺登陆做出的回应，比人们预想的更加迅速、坚决，尤其是在阻止同盟军使用蒙特科尔维诺机场的行动上。这个机场是同盟军在登陆日占领的。同盟军在费了很大力气才巩固、扩大了浅滩头阵地。这使他们在占领了萨勒诺与维耶特利港口后，无法使用这些地方。德国表明自己能比同盟国更快地壮大队伍。9月12日，德国的反击极大地考验了同盟国，使他们耗尽预备役军人，还迫使美国从各滩头堡派出了空降部队。德军遇围堵后，在9月16日开始撤退到那不勒斯以北地区。同日，萨勒诺的巡逻队第一次与从卡拉布里亚经陆路前进的英军会师。

10月1日，同盟军继续前进，进入那不勒斯。面对之前那里爆发的一场无法镇压的民众起义与同盟军的迫近，德军已经撤退了。同盟国得以控制意大利南部，但德国人在半岛上拉起了一道坚固的战线，充分利用多山的地形有效巩固己方的防御阵地。德军从阵地中巧妙回击，给进攻的同盟军以沉重打击。

9月9日，撒丁岛上的德国人与当地的意大利当局达成协议，他们将在不遭遇任何抵抗的情况下撤离撒丁岛。9月14日，在没有遇到撒丁岛一兵一卒的反抗下，美国伞兵代表同盟国登陆。德军向北撤至科西嘉岛，但遭到驻守在那里的意大利部队的抵抗。从撒丁岛来的德军占领了科西嘉岛的巴斯蒂亚港，但意大利装甲部队拿下了巴斯蒂亚，并迫使德军从海上撤离。当同盟军登陆时，岛上的其他德军逃走了。

在同盟军的压力下，意军从科西嘉岛撤退到撒丁岛，并将他们的辎重与车辆留下了。

1943年10月，新成立的意大利政府对德宣战。虽然此举对战争进程影响甚微，但它缓和了由同盟军占领产生的诸多问题，并确保意大利在战后将不会被占领，获得了比奥地利更好的待遇。

在9月11日一次大胆的空降作战中，德国人救出了被俘的墨索里尼。他们让墨索里尼负责管理意大利北部一个傀儡政权，即成立于9月23日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或曰萨罗共和国。但是，墨索里尼此时没那么重要了。他穿梭于妻子与情妇之间。德国人基本控制着轴心国中意大利剩下的地盘。墨索里尼宣称，法西斯主义确实是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意大利与意大利政府早已分崩离析。

人们通过萨罗共和国可以看到意大利在大屠杀中的罪责。萨罗共和国在没有受到胁迫的情况下，主动逮捕犹太人并将他们遣至灭绝营去屠杀。墨索里尼的态度暧昧不明。虽然他本人并不反犹，但他也接受了在1943年11月14日签署的《维罗纳宣言》中的第一条。第一条规定，“犹太裔是异族也是敌人”。1944年3月，乔万尼·普雷齐奥西获准成立人口统治与人种部。随后，种族检查团也组建起来。逾8000名犹太人被遣送，主要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他们中只有约1000人活了下来。德国人在意大利处决了7750名犹太人，意大利官员往往助纣为虐，参与其中。在威尼斯以前的贫民窟里，遇害者名单是令人心酸的纪念物。但是，近35000名犹太人躲过了被捕与遭遣送的命运。其中，约有29000人在当地人的帮助下，隐姓埋名地躲在城市与乡村。其他人逃往同盟国占领的南方地区与瑞士，或是在教堂中寻求庇护，包括梵蒂冈。近2000名犹太人加入了游击队的抵抗运动。并不是所有民众都遵从当局政策，许多犹太人正是由于这些人的慷慨、勇敢的帮助才活了下来。

意大利的战争是场苦战。同盟军在萨勒诺（1943年）与安其奥

（1944年）登陆，本想扩大战局，但未能达到预期效果。1943年7月、8月，看起来同盟军将迅速占领意大利，但罗马直到1944年6月才陷落。在战役中，同盟国调用的资源数量惊人。1944年5月，在最后以胜利告终的第四次蒙特卡西诺战役中，同盟国投入了25个师、2000台坦克及3000多架飞机。圣本尼迪克特建于529年的修道院毁于轰炸中。

在1944年作战季结束时，德国人依然控制着意大利北部地区，而且，他们只用了相对较少的军力就做到了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希特勒坚守阵地的原因是，他想限制同盟军从意大利基地对德国南部的突袭。

相反，由于同盟军突袭是胜利征服的一部分，意大利冲在了空战前线上。这些突袭造成破坏，导致战争中的社会动荡。早在1943年，英美联军的狂轰滥炸已毁掉意大利60%的工业产能，严重削弱了士气。轰炸集中在工业中心与港口，尤其是米兰、都灵、热那亚与那不勒斯。罗马也未能幸免。诸如威尼斯之类的其他城市就没有遭受那么多的轰炸。正如里米尼在1944年所经历的那样，靠近前线的城镇遭到严重炮轰。

事实表明，受到破坏的社会结构、失去的社会资本，难以在战后数十年内恢复。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在墨索里尼完全始料未及的失败所带来的增大压力的作用下，由墨索里尼制造的分歧的后遗症。直到1945年4月，同盟军才实现突围，进入意大利北部地区。这次突围复兴了意大利抵抗运动。前一年秋冬时节，尤其是冬天，德国血腥镇压了意大利的抵抗运动。在同盟军挺进前，游击队已解放了热那亚、米兰与威尼斯。4月28日，当墨索里尼试图逃往瑞士时，被意大利游击队捕获，随后被处决并暴尸米兰示众。另外，由于英美联军步步紧逼，在意大利的德军无条件投降。

在抵抗运动与萨罗共和国之间展开的这场内战中，墨索里尼是伤

亡名单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人。交战双方集结起来的军队，人数大体相当，但双方均未获得广泛支持。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双方对抓获的嫌疑人均施以暴行。人们在恶劣环境下疲于奔命，也就没了献身的念头。1943—1945年，当反德的爱国主义战争在意大利展开时，意大利还有一场法西斯主义者与反法西斯主义的内战，以及一场阶级战争。人们还不愿参与其中。例如，人们不愿参军。在抵抗运动内部，共产主义者与非共产主义者有着严重分歧。在实际战斗中，占主导地位的共产主义者基本上唯莫斯科马首是瞻，而这些来自莫斯科的指令在人们看来是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人民阵线”路线。这些冲突导致了人们信仰的瓦解、对体制信任的丧失，以及战后影响深远的暴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家庭、邻里关系变得更加重要。

自1915年起，意大利屡战屡败，人们对成功看得不再重要。二者可能共同导致了所谓的意大利男人“表述行为的男性气概”告急。简言之，它导致意大利社会中诸如宗教信仰与家族关系这些“女性”价值观的流行。但是，就这个问题而言，人们没有明显的性别区分，或者说就人们所觉察到的感情用事来讲，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此外，最重要的影响是全面的和平主义。这和在没有人员伤亡的情况下享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全部福利的待遇相互作用，尤其是在“冷战”时期。

战后再战

在意大利和在其他国家一样，战后政治开始崭露头角。人们下定决心要战胜过去。在这种情况下，战后政治意味着为历史辩护。因此，1946年，意大利司法部部长，同时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宣布对那些被指控犯有法西斯主义罪行的人实行大赦。与德国不同，尤其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后来意大利的一些主流政治家开始用积极的态度看待战时政权。更特别的是，人们对墨索里尼名誉的争论，尤其是对1943—1945年他在意大利北方建立的萨罗共和国受欢迎度的争论，直接关系到从共产党员到新法西斯主义者各类政治团体的合法性问

题。这些团体纷纷回溯20世纪40年代及更早时期，试图寻找证据证明自己的正直与对手的邪恶。因此，墨索里尼在意大利政治中能引起比希特勒在德国政坛上更大的共鸣。

在意大利，左派能在战时及早前找到自己引以为豪的敌视墨索里尼的源头。但是，更普遍的情况是，意大利大众文化强调的不是意大利在1940—1943年与德国的联盟，而是1943—1945年对德国的反抗。因此，焦点是解放战争。意大利人以充满英雄主义的色彩描绘着抵抗运动，尤其是将其作为对法西斯主义的救赎。这为战后的民主政体提供了恰当的源起。在另一个层面上，它转移了人们对意大利帝国主义角色的关注。这包括意大利战前在利比亚、埃塞俄比亚，以及1941—1943年在希腊、南斯拉夫的所作所为。在所有这些情况中，意大利都残酷镇压反抗。忽视这些有助于意大利人自欺欺人地扮演战争受害者的角色。事实上，人们常常将意大利军队与他们的德国盟友做比较，将意军视为未参与战争犯罪的“勇士”。意大利人通常用这种对比来描述德意两国战时在占领区的情形。

不同政党也试图把自己和抵抗运动扯上关系，从而用抵抗运动的好名声来获利。但是，它们的宣称往往是互相矛盾的。因此，基于法国戴高乐党的模式，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对共产党将抵抗运动说成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做法提出了挑战。反过来，1968年的激进分子批评天主教民主党冒用抵抗运动之名。他们认为，如此一来，抵抗运动真正的激进主义就遭到了忽视。例如，教会所参与的抵抗运动是有限的。虽然在诸如卢卡一样的地区，许多牧师因抵抗运动被枪决，但这并非当时的普遍现象。激进分子也宣称，战后政府虽由天主教民主党主导，但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法西斯主义政府的做法。但是，这方面却被弱化了。激进分子还抨击“权力集团”与教会对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这种论点被用于证明激进分子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反对现有体制的正当性。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些右派人士中存在着（虽然远未达到普遍

的程度）对墨索里尼与法西斯主义重新做出的积极评价。他们把墨索里尼看作一个比希特勒要和善得多的人物。墨索里尼确实比希特勒仁慈，但这种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尤其是，据称，墨索里尼为使意大利北方地区免受德国严酷统治之苦，以一种自我牺牲的方式同意出任萨罗共和国领导人。这一主张是后来新法西斯主义为自己辩护时的惯用做法，但对德国档案的研究无法证实他们的论断。

20世纪80年代，意共声望开始下降。这是人们对墨索里尼重新做出积极评价的原因之一。随着意大利像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一样，分享欧洲整体发展红利，意大利共产党的声誉在“冷战”后迅速下滑。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这种衰落，人们不再那么强调抵抗运动在意大利的作用了。此外，抵抗运动本身也受到了质疑。一些评论家认为，抵抗运动部分受到共产主义成分的影响。1943—1945年，大批意大利人曾支持萨罗共和国，并在低级别、反暴动的冲突中与反抗运动交锋。一些人开始对他们的历史进行更加积极的评价。其实早在“冷战”期间，迫于意大利政治及意大利政府反共立场的压力，一些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所谓的“萨罗勇士”。

第十一章　战后意大利的起起落落

虽然原因各不相同，但20世纪70年代严重的经济问题使意大利乱成一团。

战后的社会重组

在“二战”后的世界格局中，意大利在经历了最初的不确定后，安立于西方国家之侧。最初，人们不知道意大利最大的政党——共产党是否会让意大利与除希腊、荷兰外的整个东欧地区一道，加入苏维埃阵营中去。意大利处于一片废墟之中，国内以巴勒莫为首的一些地区长期如此。当时，意大利的海外帝国已全部瓦解，其他地方的意大利群体也被人驱逐，尤其是在科西嘉岛与突尼斯的法国人，还有在伊斯特里亚的南斯拉夫人。“二战”后，意大利骚乱再起。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意大利处于“冷战”时期与共产主义阵营交战的前线。南斯拉夫就属于共产主义阵营，还有双方就的里雅斯特展开的激烈领土争端。这场争端一直持续到1954年，直到美国出面解决才结束。1943—1945年，英美联军对意大利的解放或者说占领，在将意大利置于西方阵营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同样重要的是，战后美国为阻止共产党接管，对意大利政治进行了干预。

然而，当1946年意大利就组织共和国的问题举行全民公投时，虽然投票结果十分接近，但人们还是拒绝了旧秩序。是年，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为了儿子翁贝托二世而退位。但是，这并未对结果造成影响。美国赞成结束君主制。自1945年起，萨伏伊王朝传统的盟友英国也处于工党的领导下了。萨伏伊王朝开始流亡。此外，意大利取缔了“阁下”这个称呼，因为这是法西斯主义时期官员广泛使用的。当时，人们审判了一些法西斯主义领导人，并处决了许多法西斯主义分子。

意大利文化歌颂反法西斯主义善良大众的种种神话。这些反法西斯主义者是共产党与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还有几乎所有在法西斯主义统治时期受迫害的人的集合。这些神话见于“新现实主义”电影中，尤其是罗伯托·罗西里尼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1945年）、卢

齐诺·维斯康蒂的《大地在波动》（1948年）以及维托里奥·德·西卡的《偷自行车的人》（1948年）。《大地在波动》讲述的是阿茨特雷扎渔民们的故事。文学作品中也体现了这些神话，例如伊塔洛·卡尔维诺的作品《通向蜘蛛巢的小路》（1947年）。人们改变街道名以表明政治上新的正统思想。和许多其他城镇一样，安科纳兴建了一条吉亚科莫·马泰奥蒂街。人们重新看待民族主义。与此同时，将意大利看作是一个大国与帝国的观念遭人摒弃。古罗马的遗产基本上被放到一边，此前提及的意大利复兴运动也被束之高阁。

1948年，新宪法开始生效。它虽然反映了反法西斯主义反抗运动的价值观，但当时的社会分裂已经变得明显，包括针对电影引发的分歧。左派中只有部分人士试图将大多数人刻画成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形象。这种观点在意大利南方与教会那里没有得到多少支持，更不要说不知悔改的法西斯主义者了。

从那时起，关于意大利历史的论战使保守主义历史学家与评论家倾向于将20世纪80年代的问题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末。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左派在法西斯主义控制的意大利与自1948年起至20世纪90年代一直主宰新共和国的天主教民主党体制中，寻找延续性。理所当然，对延续性的批判将矛头指向了天主教民主党将1929年《拉特兰条约》写入新宪法的倡议。但是，这种批评忽视了天主教民主党面临的实现某种程度的社会和解的压力。如果说，当时意大利的去法西斯主义是不完全的话，那么它不仅部分地反映出天主教民主党的意愿，还有共产党领导的希望。

1943年，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作为意大利人民党的后继者成立了。在1948年选举中，天主教民主党击败意大利共产党及其盟友社会党。美国干预在选举中起到作用，但支持民主重建的投票具有更大的意义。自由党沿袭了1919年的选举模式，在1946年选举中表现依然不尽如人意。在这次选举中，天主教民主党、共产党与社会党获得了绝大多数席位。妇女获得选举权让天主教民主党赢得不少选票（正如

此前英国保守党的情况那般），同样让天主教民主党受益的还有来自天主教徒选民的支持。梵蒂冈大力进行政治宣传，美国提供资金援助。在1946年选举中，86%的选民投票支持联合政府。联合政府是在“二战”后由反对墨索里尼的政党组成的。

但是，1948年，意大利总理阿尔契德·德·加斯贝利击垮了联合政府。在选举中，这位手段高超的天主教民主党领袖几乎赢得了近半数选票。他在1945—1953年担任意大利总理。德·加斯贝利政治生涯的起点是1911—1918年以当选的特兰提诺天主教民主党议员身份，成为奥地利议会议员。“一战”后，1921年，他作为意大利人民党党员，被选为意大利议会议员。意大利人民党后来进化为天主教民主党。德·加斯贝利的意大利议会议员生涯直到1927年被法西斯主义当局逮捕时结束。他获刑4年，但在1928年就被释放了。1929年，德·加斯贝利成了梵蒂冈图书馆馆长。这个工作他一直干到1944年才结束。当时，由于他的秘密政治活动，德·加斯贝利被任命为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天主教民主党代表。

1949年，意大利以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北约（而被占领的西德直到1955年才加入）。这在当时是个大事件。美国为其地中海舰队与空军在意大利，尤其是那不勒斯，建起了重要的军事基地。但是，意大利的新经济秩序并不是美国所想要的。不管美国人怎么提议，意大利政府、商界与农业都表示反对。在很大程度上，意大利依然采用社团主义方案。只有菲亚特汽车公司真正相信美国的构想，并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1949年后开始建立起来的新经济秩序并不是像美国人想看到的那样。

意大利受益于经济快速发展的“长期繁荣”阶段。1951—1968年，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近6%，而且，这种“长期繁荣”直到1973年油价危机袭来时才结束。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使用了以美国为主的先进技术与生产手段，并得益于美国投资。在农业方面，机械化提高了生产力。工人们因此从农村土地上大量转移到城市，但那里

的工资率依然不高。意大利形成了混合经济，其中包括较多国家规划与国有化的成分。意大利经济的发展极大得益于国家能够置身于战争之外，在国防上的开支也相对较少。不同于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葡萄牙与西班牙，意大利没有需要保护的殖民地。

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北方的地位是反映南方相对失败的一面镜子，国家的经济、政治重地集中在米兰与都灵。意大利北方涌现出许多专门的制造业工厂。这些工厂引进了更加有效的新技术与组织管理方式。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自由党执政时期，意大利南方就被认为是失败的代名词。意大利历届政府与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基于“一战”前的自由党模式，觉得意大利南方是问题社会，而非经济表现欠佳的地区，并以这种方式来对待它。1958年，意大利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创始成员国。

官方的这种态度部分源于1950年在美国鼓励下实行的农业改革。这项改革旨在让人们继续种地。意大利南部地区农场平均面积过小，因此不能产生大量利润。这拉低了人们的生活标准，进而冲击了国内市场、制造业与服务业。事实上，在意大利，人们试图寻找的个体农户（还有美国人在被占领国日本实行土地改革时试图寻找的农户）都不富裕，只是贫穷程度有别而已。作为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面，人们后来试图鼓励合并。这种合并既有个人拥有土地的合并，也有农户间土地的合并。个人拥有的土地在意大利是高度碎片化的。由于农场规模限制了投资资本，所以其影响了机械化进程。人们不再种地，许多人去了用棚屋搭建的意大利北方城镇，尤其是米兰城外。这种情况集中在年轻人身上。许多年轻人觉得，农业工作条件缺乏吸引力：与其他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相比，尤其是与法国经济相比，意大利农业大多没有什么真正的竞争力。这种情况持续到现在，而且，随着新成员的加入，竞争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先是西班牙，随后是东欧国家。人们不再种地，这极大地影响了农村与小镇生活。许多小镇明显成了鬼城，大街上没有几个年轻人的身影。

从意大利南方向外的人口迁移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因为它降低了失业率，并因此减少了社会矛盾。此外，工人寄回家的汇款源源不断，这使家人可以增加个人收入、提高生活水平。人口外移通常都在西欧内部进行，或是迁移到以美国为首的传统目的地。但是，也有人去基本全新的地方，诸如澳大利亚、加拿大。

虽然政府在1946年实行大赦，但战争已让法西斯主义名誉扫地。在道德与政治保守主义的氛围中，右派以天主教民主党的形式重生：许多之前支持自由主义后来为法西斯主义摇旗呐喊的人，站在了天主教民主党的背后。这个传统以社团主义、教权主义的形式延续。它与英国的保守主义与美国的共和主义传统相比，差别很大。天主教民主党试图使意大利民主扎根于欧洲统一的土壤中。1951年，意大利成为欧洲煤钢共同体6个创始成员国之一，虽然它是其中最穷的一个。这6国还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其中，意大利在1955年与1956年召开的墨西拿会议，以及1957年签订《罗马条约》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虽然那个时期满腔热情的联邦主义者提出了许多观点，但极少有意大利领导人认为，欧洲经济共同体会取代民族国家。然而，对于仍然深受毁灭与政治混乱之苦的意大利来说，欧洲经济共同体为意大利经济的发展创造了空间。尤其是，在它的组织下，20世纪50年代，欧洲内部出现了出口商品的巨大繁荣。这种繁荣是战后恢复的一方面，同时也是欧洲后帝国主义时期调整的一部分。欧洲经济共同体内部关税下降乃至后来的废除，进一步促进了成员国间贸易的快速增长。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身份也是对共产主义阵营的拒斥。同时，它也代替了人们之前的帝国梦。

在“意大利奇迹”中，经济增长提高了利润，促进了投资，导致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意大利工业出口商品蓬勃发展。同时，意大利人的汽车拥有量显著上升。这是意大利生活、文化美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电视文化的兴起也体现了这种美国化。截止到1967年，菲亚特已经是欧洲首屈一指的汽车生产商了，其所有者阿涅利家族则参与了

意大利政治。诸如阿尔伯托·索迪许多作品在内的电影，展现了经济繁荣期的意大利社会。阿尔伯托本是一名演员，后来做了导演。意大利人买车后，石油进口变得日益重要。这让意大利开始对中东地区感兴趣，尤其是利比亚。1956—1970年，意大利的平均实际消费支出翻了一番，虽然受益者主要是中产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意大利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依然远低于英国、法国与德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然而，与法西斯主义的自给自足和战时生活必需品的匮乏相比，意大利经济出现了巨大反弹。

工业扩张有利于北方。然而，尤其是在南方，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共同农业政策（CAP）最终在1962年获得通过。它为农民提供了价格担保与收入补贴，降低了农村人口的减少率。不过，共同农业政策的消极面是它与意大利大规模腐败有牵连。虽然农民拒不遵守规定，但意大利政府也不支付相应的罚款，而且，一些农业数据造假。与此相关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导致食品价格上涨，这对城市工人与穷人造成了冲击。不过，汇率给人们带来的影响更大。意大利货币政策鼓励竞争性贬值。如此一来，就强行提高了进口价格。美国是为了稳定西欧非共产主义国家而鼓励它们组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

1953—1963年，意大利先后共有10位总理，阿尔契德·德·加斯贝利与阿尔多·莫罗是其中较为稳定的两位。虽然当时总理更迭频繁，但天主教民主党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发展出了一套贪污腐败、徇私舞弊的体制，还满不在乎。政治充满变数。此外，地方差异与社会分歧，国家与市民社会间的鸿沟依然突出。1960年，意大利爆发大规模群众游行，反对天主教民主党领袖、总理费尔南多·塔姆布罗尼，与天主教民主党、新法西斯主义者、君主制主义者之间的战略性同盟。这导致同盟关系破裂。在阿尔多·莫罗的领导下，天主教民主党接受了反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转而奉行“向左派开放”的模式。20世纪50年代，当非宗教的中间派作为天主教民主党与共产党之外的“第三势力”兴起时，这个可行的替代方案没能赢得选民支持。事实表明，天

主教民主党与共产党的二元性过于强大。两党均从广泛存在的腐败中获利，尤其是地方政府本身及地方与中央沆瀣一气的腐败。

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

虽然原因各不相同，但20世纪70年代严重的经济问题使意大利乱成一团，始于1967年的学生运动又导致都灵大学关闭。学生运动者称，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依然强劲，它内生于政府官僚主义与体制结构内。当权者运用权力的行为被视作法西斯主义的体现。事实上，机构中的保守主义与一些年轻人的个人抱负存在冲突，新生代拒绝接受上一代人的意识形态。一些年轻人似乎对社会富足与民主表示不满，并斥之为不公、乏味。虽然意大利社会公然反对法西斯主义，但年轻人仍将其视为法西斯主义的。年轻人宣称，意大利的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空洞保守的。作为回应，1968年3月，内政部部长保罗·埃米利奥·塔维亚尼提出，墨索里尼在1922年夺权是警察软弱无能的结果。他提醒学生们注意，历史不会重演。由学生及工人不满或曰“反体制活动”引发的重重危机，一直持续到1969年。“火热的秋天”导致政府在1970年对工会做出重大让步。

右翼激进分子的炸弹袭击与左翼无政府主义者的暗杀行动导致社会暴力愈演愈烈。他们的目标都是用所谓的“矛盾策略”来推翻自己藐视的民主政体。经济压力没有导致专制政权的产生，也没有让政府开始对国家资源实行引导。但是，经济困难确实助长了极右势力“民族联盟”的崛起。但是，他们与极左势力都没能掌权。20世纪70年代，极右势力没能参与任何政府联盟。在21世纪的头十年他们才以一种不太极端的形式做到这一点。

然而，当时极右势力筹划了3次政变，尤其是1964年卡宾枪骑兵总指挥乔凡尼·德·洛伦佐将军策划的政变。他曾效力于意大利情报部门。更明显的一次是1969年尤尼奥·瓦莱里奥·博尔盖塞亲王的政变企

图。还有就是极端势力的街头恐怖主义。极右势力的计划依靠军人，博尔盖塞亲王的方案则把美国中央情报局里的人也弄了进来。他还向意大利黑手党寻求帮助。

自1970年起就开始活跃起来的“红色旅”是极端势力中的重要团体。他们自我标榜为“新抵抗组织”，部分利用了来自四分五裂的左派的支持，而左派的分裂主要是由之前学生们的幻想及像南尼·莫莱蒂的《注视大黄蜂》（1978年）这样的电影中所表现出的理想幻灭所致。一些实业家被刻画成“跨国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者。对他们的攻击并未如革命者所希望的那样，为工人民主政体的建立铺平道路，却导致政治家屡遭暗杀。这些暗杀事件成为政治体制中的重要因素。因此，自1981年起，人们将1969—1983年称作“铅弹岁月”。左、右翼恐怖主义分子犯下的暴行共计14000起，导致374人丧生、逾1170人受伤。革命者是中产阶级而非工人阶级。左翼恐怖主义者被处决、囚禁，但右翼恐怖主义者资深要员从未被捕。

意大利共产党曾试图实现共产主义与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占主导的政治体制建制间所谓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和解”。这是更普遍的欧洲局势缓和的一方面，尤其是1975年《赫尔辛基公约》的签订，以及所谓的欧洲共产主义。这与意大利共产党早先对斯大林的狂热支持，以及1956年对苏联入侵匈牙利的支持形成了对比。

在1976年通过谈判达成的条约中，意大利共产党承诺不推翻天主教民主党，支持意大利继续作为北约成员国而存在。1978年，这一条约导致意大利政坛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阿尔多·莫罗被绑架、谋杀。他的五名保镖也因此丧命。莫罗曾在1963—1968年、1974—1976年出任意大利总理，他还从1976年起担任天主教民主党领袖。莫罗在促成这次和解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但是，对“红色旅”而言，和解是“跨国公司的帝国主义国家”与美国共同控制下的一方面。莫罗要接受“人民的审判”，这个过程要比恐

怖主义者所经受的严酷得多。具有象征意义的是，莫罗的尸体被故意抛弃在连接罗马共产党与天主教民主党办公室的道路的中间。“红色旅”希望通过揭露所谓的莫罗代表的阴谋，激起公愤，为其革命铺平道路。但是，这是个不切实际的愿望。

左翼恐怖主义继续存在，尤其是1999年对马西莫·丹托纳的暗杀，以及2002年对马可·比吉亚的刺杀。他们都是政府经济顾问。但是，左翼恐怖主义已变得无足轻重。应急反恐法规的出台、大规模逮捕，以及说服一些人转做政府证人的做法对极左恐怖主义造成沉重打击，虽然极右势力没有受到相似对待。涉嫌谋杀比吉亚的犯罪分子要么被处决，要么遭监禁。重要的是，“冷战”结束了。

诸如斯蒂凡诺·瓦奇拿的《执法者》（1972年）与弗朗西斯科·罗西的《精彩的尸体》（1976年）之类的电影，探讨了许多极右势力密谋的话题。意大利公民在这些电影中以受害者的形象出现。在艾利欧·培特利的《对一个不容怀疑的公民的调查》（1970年）中，内部政治动乱成了政治腐败滋生的土壤。小说也关注了恐怖主义的影响，正如洛里亚诺·马基雅维利的侦探小说一样。

其他所谓的阴谋也激起了人们的兴趣。虽然政府机构部门与犯罪网络、政治极端主义者在一些事情上的关系未经证实，但是这使人们产生了普遍的怀疑，而这种不信任又让人对整个体制失去了信心。虽然“红色旅”的言论并未为此类指控提供证据支持，但据称莫罗的案子与美国、共济会宣讲分会（P2分会）有关，野心勃勃的朱利奥·安德烈奥蒂也牵涉其中。安德烈奥蒂曾于1972—1973年、1976—1979年与1989—1992年担任意大利总理。他还是莫罗在掌权的天主教民主党内的竞争对手。人们一直说，安德烈奥蒂是个阴险的家伙，与黑手党有瓜葛。诚然，就间接联系而言，这种说法看起来确有其事。腐败的毒气笼罩着犯罪、商业、政治与特务机关，还利用了特务机关。腐败在一段时间里集中在P2分会中。P2分会成员众多、分布广泛，包括军界、特务机关、司法部、商界与政界领导。P2分会盛行于20世纪70

年代，在20世纪80年代末基本被摧毁。它的宗旨是扩大自己在意大利国内的势力，尤其是增加政治影响力。

相应的关系网络在梵蒂冈起到突出作用，而罗伯特·卡尔维之死再次让人疑窦丛生。卡尔维作为意大利安保信银行行长，在1981年被判犯有金融罪，获释后等待上诉。1982年，卡尔维死于伦敦。起先，这被看成是自杀，但当时有许多传闻。尤其是在意大利，人们认为卡尔维是被意大利黑手党谋杀的。1986年，另一位银行家米歇尔·辛多纳的自杀也被认为是一起谋杀。意大利社会仍然信奉天主教，但人们对教会不太尊重了。关于梵蒂冈治理不当与腐败泛滥的传言至今依然流行。但是，教皇方济各正在试图改革教廷，并在公开场合下谈到梵蒂冈致力于打击犯罪与黑手党。

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海洛因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高利润，黑手党活动急剧上升。事实上，人们说黑手党有通天的本事。这使政府受到攻击，尤其是在1979年，时任新成立的反黑手党委员会秘书的切萨雷·特拉诺瓦遇害。1982年，刚走马上任的巴勒莫总督卡洛·达拉·基耶萨也被杀。

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国内危机加重。人们担心，如果“冷战”愈演愈烈，意大利将会出现动乱。P2分会通过特务机关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搭上了线。美国中情局是反共活动的主力军，例如它在格拉迪奥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格拉迪奥体系旨在面对苏联占领时组织反抗运动。事实表明，这个体系是秘密政治活动的基础。梵蒂冈很可能也参与其中，并起到重要作用。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梵蒂冈力挺格拉迪奥体系，但它依然很有可能知道后者的存在。如果情况果真如此的话，梵蒂冈乃至教会都不可能不支持这个组织，以应对可能的苏联入侵。因为梵蒂冈的基本意识形态是基督教民主政体，也就是强烈反苏的。

一种可能是，国内与国际上的不满情绪重合，确实发生了相互作用。此外，意大利激进分子受到国际力量的大力支持，而不仅仅是接

受特务机关提供的用来制造分裂的资金而已。但是，激进分子与苏联和西欧共产主义盟友间的敌意减少了这种可能性。激进分子与共产党目标不一致，他们获得的资金也远少于苏联给意大利共产党提供的款项。从苏联的角度来看，激进分子无组织、无纪律，就是一群托洛茨基分子的继承者。

事实上，意大利共产党当时是西欧最强大的共产党组织。它不仅在1976年公然与“红色旅”划清界限，还迫切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对后者进行打击，因为“红色旅”曾怂恿人们“别投票，开枪”。从1972年起，至1984年去世，精明能干的意共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带领全党，对外宣称致力于发展1973年建立起来的民主体制。这不仅反映出人们感觉民主受到挑战，他们还觉得社会遭到极左与极右势力的夹击。情况确实如此。

后者极可能对当时发生在意大利最血腥的一幕负有责任，即1980年在博洛尼亚的火车站发生的爆炸案。有85人在这次暴行中丧生。更让人感到不安的是，人们有理由怀疑，这是极右势力与政府机构中包括特务机关在内的反民主分子合谋酿成的惨案。在某些事情上，二者显然沆瀣一气。极右势力策划的其他暴行还包括首个要案，即1969年的米兰丰塔纳广场银行爆炸案（炸死16人），以及1984年火车爆炸案。当时对公共空间的攻击是为了传播恐惧情绪、引起骚乱，也许也是为了栽赃极左势力，让他们名誉扫地。

在1976年6月的选举中，意大利共产党在巅峰时期得票率达到34.4%，由此导致右派与美国的不安。他们担心，意大利共产党也许能在政府中占据一席之地。即使意大利共产党试图通过将自己定义为欧洲共产党来减轻人们的焦虑，结果也无济于事。但是，1976年，之前想要“超越”天主教民主党的意大利共产党到头来还是失败了。此外，由共产党、社会党与各小党派组成的左派联盟，未能赢得预期中的半数选票。看起来，左派没能达到绝对多数。这反映出，左派未能如期望中的那样，获得足够多的工人阶级选票。

但是，在当时，贝林格称，选举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标志着反共的失败。1976年，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在他那杂乱无序、任性而为的电影《1900》中宣布，左派获胜。它描绘了20世纪意大利的历史。新创办的日报《共和报》也做出了同样的论断，宣布左派取胜。知识分子们将安东尼奥·葛兰西创立的“文化霸权”理论奉为圭臬。他们深信，某个社会将会实现这种霸权。事实上，虽然左派在一些艺术领域表现更加卓越，但更保守的天主教徒自20世纪40年代末起就开始主导着教育部、文化部，垄断国家电视与无线电广播公司。恩庇体制与派系斗争给大学造成极大影响，但当时也存在着多元主义。

右派在将公家变成腐败堕落、自私自利之地上，一点也不落后于左派。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一位意大利知名大学人文系的系主任惊叹于我授课的课时量。他还告诉我，他不教学生，因为他的职责是管束人文系。当我问及他的具体工作职责时，他回答说，他的系里没有共产党（而且共产党应该在博洛尼亚）。每周，他都要去罗马向相关部委官员做汇报，然后这位官员每两个月来校视察一次，他们会尽地主之谊殷勤接待。还传出流言说，这种接待还包括了餐前酒，或者说它是腐败的表现呢？笔者无从得知。这两种观点在意大利都有支持者。无论如何，人们的怀疑情绪相当普遍，现在依然明显。

到头来，意共还是走到了极限。此外，1976年，社会党在新领袖贝蒂诺·克拉克西的带领下，远离了意大利共产党。自1978年起，社会党将他们的锤子、镰刀标记改成了康乃馨。这也就破坏了组建人民阵线的可能。20世纪80年代，由天主教民主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共和党与自由党组成的联合政府执政。意大利共产党因此衰落。因为红色派与许多左翼神话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红色旅”凶残的虚无主义影响了整个左派。然而，克拉克西在1983—1987年升任意大利总理，社会党在1987年大选中获得了14.3%的选票，在1987—1992年参与执政并由此获利颇丰。

这一时期，由于巨额预算赤字，政府不得不大量高息借贷。但

是，20世纪80年代，意大利恢复了相当可观的经济增长。这刺激了消费主义的兴起，人们通过消费展现自我。1975年，已有超过90%的家庭拥有一台电视与冰箱。电视广告对消费主义的传播，对消费观的塑造、分享起到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消费主义已经开始式微。后来日益加重的重重危机，以及1989—1991年苏联解体，对消费主义造成了沉重打击。克拉克西将这看作重塑以社会党为主导、以左翼联合政府为中心的意大利政治的一个时机。

第十二章　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和社会难题

历史与教会带来的负担让意大利人对集体主义观念反应冷淡，而集体主义观念又是让世俗组织为公共福利奋斗必不可少的前提。

当西德正与此前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东德合并时，20世纪90年代，一系列政治危机吞没了意大利的政治体制。1992年，一场名为“净手运动”的反腐运动姗姗来迟。地方行政官在米兰发现大规模刑事腐败案件，因此给它起了“贿赂之都”的诨号。在全国范围内，腐败横扫商业活动、政治与有组织犯罪，人们因此对现有体制的公信力崩溃，或者说人们不再相信意大利能以目前的形式继续下去了。

法律程序起到了关键作用。受指控的要人包括两位前总理，即天主教民主党的朱利奥·安德烈奥蒂与社会党的贝蒂诺·克拉克西。安德烈奥蒂将罗马、拉齐奥大区与西西里岛置于他的政治荫庇之下。在这些地方，又以西西里岛的恩庇体制最是根深蒂固。安德烈奥蒂因与黑手党的牵连受到调查并被审判，但最终被判无罪。1994年，腐败透顶的克拉克西逃往突尼斯。2000年，他在那里去世。1994年，意大利法院对他进行了缺席审判，判决结果是监禁。这场诉讼打击了他们此前主导的恩庇体制。二人各自的政党，天主教民主党与社会党，均受到丑闻的严重冲击。1994年，两个党都解散了，成了所谓的“政党的共和国”之终结的一部分。克拉克西宣称，所有政党都非法收钱，为政党活动提供资金。但是，即便如此，他本人也是腐败堕落且毫无悔意的。

因此，其他政党变得出名或是以此为契机而成立。1993年，国家统一政府建立。1994年，没有经验的意大利力量党领袖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被选举为总理。1936年，贝卢斯科尼出生于米兰。在那里，他和克拉克西成了朋友。贝卢斯科尼经商发了大财，他先是做房地产生意，接着进军电视业。他是反共候选人。贝卢斯科尼想像经营一家大公司一样管理国家，但发现政府比预想的还要糟糕。国家的巨额债务对他也是个冲击。

出售国有企业减少了债务，但当他试图减轻由特别丰厚的养老金制度带来的大量债务时，失去了政治支持。1995年，由技术官僚组成

的政府推翻并取代了贝卢斯科尼。随后，1996年，在罗马诺·普罗迪领导下的中左翼政府执政。1998年，这届政府垮台。但是，共产党前领导人马西莫·达莱马迅速重组了政府。结果，2000年，他的政府解体后又被朱利亚诺·阿马托率领的，由技术专家组成的政府所取代。确保贝卢斯科尼无法掌权是人们一以贯之的目标。

2001年，贝卢斯科尼再度成为意大利总理。虽然他仍面临刑事起诉，但贝卢斯科尼通过在选举中承诺创造就业获得了不少选票。不过，创造就业机会的计划因资金问题他无力付诸实践。由于最近历届政府表现不佳、不够稳定，他从中受益。到头来，虽然贝卢斯科尼在2001年取消了继承税，后来还在2008年取消了首次购房税，但他在竞选中许诺的就业岗位没有落实。与唐纳德·特朗普一样，贝卢斯科尼是由演出主持人兼商人转型的政治家。他提出要让意大利重新开始，还宣称自己拥有商业才能。但是，据他的对手所言，贝卢斯科尼所谓的商业才能其实就是可疑的权钱交易。他们还说，贝卢斯科尼把这些做派带到了政坛与政府中，引来许多差评，导致恶习的产生与蔓延。贝卢斯科尼还阻挠了20世纪90年代的反腐运动。

2004年，在贝卢斯科尼领导下的一项重要变革是政府决定自2005年1月1日起，暂停征兵制，将军队精简为专业军种。征兵制的废除是更加普遍的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这个过程限制了国家控制的领域，结束了征兵这种具有某种程度的民族共同体验的操作。如今，有些人提出重新实行义务兵役，将其作为社区服务可能的替代方案。

意大利印象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人们明显对现代意大利失去了兴趣。例如E.M.福斯特的小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1908年）。事实上，自此以后，强劲的主流思想是将意大利重新看作一个不太

令人瞩目的社会，而不是18世纪遍游欧洲大陆进行教育旅行的英国年轻贵族所向往的富有想象力的过去之地。除去加里波第的共和主义、意大利复兴运动中的活力与成功，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由墨索里尼所打造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引发同时代人关注的“秩序与支柱”，意大利从此被人们看作是不如德国、法国或英国之类国家那般文明、发达的国家。这种对比在当时（如今依然）往往有着严重缺陷。尽管战后意大利在设计、时尚、电影、食品，以及诸如豪华油艇、造船、火车、家用电器、家具与照明等工业生产方面硕果累累，极大地提高了意大利的地位，但人们今天依然对意大利持有这种态度。人们对意大利的消极评价没有1945年那般明显。但是，在现代，当人们谈及意大利的政治、犯罪，尤其是意大利黑手党，还有意大利基于指南、游记与意大利回忆录而发展起来的庞大出版业时，人们往往觉得，意大利没有其他主要西方国家那么发达。一直以来都贴着落后标签的西班牙，近些年来更加成功了，还给外国评论家留下了现代与进步的印象。不过，这也许是英国长期存在的问题而不是意大利的问题。

眼前的问题

意大利当时在经济、社会、政治与宪法上存在严重的结构问题。虽然意大利在1993年为推行具有说服力的“得票多者当选”的政策，改革了选举制度，但又在2005年对新体制进行了合理调整。这种调整以及各政党门槛较低的代表制，使得意大利政坛又回到更加动荡的状态。此外，尽管意大利因身为欧盟（EU）成员国而受益，但这种关系的维持并不容易。因为，意大利受到来自德国（及其他国家）竞争的挑战，还面对着欧元的财政需求。

同时，人们也担心巴尔干半岛与北非的局势。事实上，意大利是北约的空军基地。1994—1995年，当北约对波斯尼亚发动空战时，

意大利从阿里亚诺到焦亚德尔科的空军基地都起着关键作用。1999年，当北约对科索沃与塞尔维亚作战时，以阿门多拉为首的意大利空军基地再次发挥着重要作用。2011年，北约从意大利的两个空军基地及意大利的两艘航空母舰上，执行了对利比亚的作战计划。这些航空母舰也被用于北约在阿富汗的部分战斗中。同时，意大利没有参与2003年的海湾战争。

更普遍的情况是，给意大利带来冲击的是臃肿庞大、功能失调的政治阶级可悲的表现，世俗与宗教组织的效率低下，需要长期大量公款投入的南方地区的特性，以及接受民意测验的人中有半数人认为政府应确保人人都有工作的观点。人们既依赖又厌恶政府。意大利拿下世界杯那年（2006年），意大利足球联赛也爆出巨大的贪腐丑闻。虽然其他国家的足球系统也存在着腐败问题，但许多评论家认为，意大利在世界杯与足球联赛中的腐败具有典型性。2007年，意大利个人现金消费支出比率为38%。这反映出意大利人对机构形式信心不足，以及意大利人以此作为逃税的重要手段。不过，人们不愿使用信用卡不一定是为了避税。与之相比，英国个人现金消费支出比率为18%，法国是22%。事实上，质疑电子货币的人相当多。但是，有组织的犯罪也刺激了现金经济。

历史与教会带来的负担让意大利人对集体主义观念反应冷淡，而集体主义观念又是让世俗组织为公共福利奋斗必不可少的前提。相反，通常以亲属群体为表现形式的无政府主义原子论占了上风。人际关系及与此相关的恩庇体系在商界、政界起到了重要作用。

意大利右派没有像样的精英管理层，左派也没有令人信服的改革先锋。像始于1986年的“慢食运动”这样的反文化思潮需要左派支持。因为，这些反文化思潮在某种程度上是反动、反科学与不切实际的。意大利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得不尽如人意，尤其是与德国相比，经济增长率也下降了。在与整个欧元区比较时，情况也是如此。意大利在欧洲地区与西班牙竞争时所保持的领先地位回落。虽然大多数银行在发

放贷款时通常相当审慎，但是意大利从2005年以后至今爆发的财政危机揭示出意大利银行体系中的严重顽疾。意大利在经济自由度指数与腐败指数上的排名也不尽如人意。2001年，在热那亚八国首脑会议期间，警察击退了反全球化暴力游行活动。但是，正如五星运动党（M5S）所揭示的，抗议者的一些观点与主流舆论相一致。

有组织的犯罪将全球化与腐败联系在一起。意大利黑社会与更广阔的世界发生着联系，尤其是非法毒品交易、卖淫、移民与军火走私。西西里岛的黑手党（科萨·诺斯特拉）、坎帕尼亚的克莫拉、卡拉布里亚的光荣会（名称源于古希腊卡拉布里亚方言）与阿普利亚的圣冠联盟都做得风生水起。光荣会从绑架转行开始贩毒。更普遍的情况是，这些黑社会把政治、犯罪与经商搅到一起，为害一方。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政府开始采取行动打击黑手党，因为长期以来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天主教民主党衰落了。结果表明，这给克莫拉提供了贩毒的机会。克莫拉也与天主教民主党交好。1992年，两位重要的反黑手党检察官，即乔万尼·法尔科内与保罗·博尔塞利诺（以及法尔科内的妻子与警察护卫）遇害。这是政府开展反黑行动的导火索。像1993年部分摧毁了乌菲兹美术馆的爆炸案一样，谋杀也是对政府强有力的公然藐视。这些检察官负责巴勒莫的大规模审判案。他们利用“向警方提供大量犯罪活动情报”的多玛索·布西达提供的线索在1986—1992年判决并监禁了360名被告。由于多起谋杀案件的出现，政府向西西里岛派遣了军队。

截至2016年，据估计，光荣会的财富达到了440亿欧元。光荣会、黑手党与克莫拉的收入之和占意大利国内生产总值的9.5%。次年，巴勒莫的法尔科内雕像被人割去脑袋。与此同时，克莫拉分支机构福贾地区的犯罪集团犯下多起谋杀案，这让人们再度担心起来。意大利侦探小说对意大利社会进行了更广泛的批判，而这种批判是深深植根于某种特定区域与城市环境的。外国小说家的作品也是如此，正如迈克尔·迪布丁的侦探小说《决战》（2007年）一样。书中的主人

公奥雷里奥·泽恩从威尼斯搬到南方后发现，那里是强盗横行、一片死寂的蛮荒之地。

人们情绪消极、信心缺乏，这让人觉得，这个时期之前是而且事实上现在依然是不太好的。民族自豪感与认同感不是来自军事力量、政治领导、公共机构或是科学发明，而是源于体育、食物、生活方式，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源于过去的经济、文化成就。在个体与家庭层面上，高失业率、人口外移，以及大批年轻人依然（包括已经30多岁的人）与父母同住的情况反映出希望破灭、乐观主义消失与期待落空的窘境。这种做法与家庭规模小有关。它与过去以及关于国家的陈词滥调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种情形导致当地人口增长有限，老龄化严重。截至2006年，意大利26%的人年龄在60岁以上，全国人口的年龄中位数是42岁。这些数据与德国相当，但不如英国、法国与西班牙的情况有利。与20世纪70年代极高的婴儿死亡率相比，意大利婴儿死亡率下降。因此，人们就不必再生育“保险”婴儿以应对其他孩子可能的死亡了。与此同时，农业劳动力数量下降也使人们不再需要那么多男婴了。同样地，人们关于家族结构与遗产继承观念的变化也起了作用。天主教会觉得，其他机构难以接受现代社会的本质，更别提它自己了。虽然天主教会对节育横加指责，但避孕的做法还是变得更加普遍。女性人均生育婴儿数量下降，尤其是在意大利，这个数字降至1.18%。女性工作模式是重要的，同样关键的是住房困难。随着欧元的使用，意大利出现了通货膨胀。这对人们的实际收入产生了影响，并由此导致住房难以获得。儿童保育开销也是个问题。在21世纪初，每年从意大利向外移出的人有近5万。

退休金问题加重了意大利的年龄失衡。在意大利，大多数养老保障金均由政府提供，私人养老金则相对极少。因此，未来不得不承担人们的长寿及慷慨的养老金保障所带来的种种问题。这意味着，年轻人要为老年人及即将步入老年的人埋单。事实是，年轻人极少，而

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年轻人将越来越少。

因此，公共财政要想拿出与银行相应的钱时，就面临着极其严重的问题。意大利政府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是有限的。德国在欧盟的经济主导地位意味着，意大利很难取得由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因而也就无法获得必要的资金。事实上，意大利无能为力的处境让人清楚地看到，它的命运是掌握在德国手中的。这让人不仅想起上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形，还有中世纪及后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们挥舞权杖对意大利的控制。人们过去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及与之相关的宿命论发出了声声回响。

与欧洲其他地区及日本、中国一样，赡养老人的经济负担与买房养家、工作晋升的压力一道，是年轻人肩头的重担。毫无疑问，这导致人们的失败感油然而生，一些人因此不愿生孩子。

民族幽默：达里奥·福与现代讽刺剧

1997年，剧作家兼演员达里奥·福（1926—201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位煽动者想通过由他提出的“人民反对教会与政府权威”的观点，代表人民反对权贵。福的剧作关注权力腐败问题。例如，《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1970年）讲述了一个由警察刑讯导致在押犯死亡的故事。《绝不付账》（1974年）说的是，居高不下的食品价格让家庭主妇们在商店里顺手牵羊。福将工厂而非传统剧院当作舞台，让他的剧作以这种方式走进千家万户。教会对福持批评态度，因为福本人从共产主义转向了类似于五星运动党的立场。福并不是唯一一个批评教会的人。2006年，艾玛·丹特因其戏剧《猿猴》也被人贴上了反天主教的标签。

当地低速的人口增长使大规模移民的影响变得更加突出。2011

年，随着卡扎菲上校的垮台与利比亚社会秩序的崩坏，移民人数骤增。这不仅意味着，从意大利前殖民地利比亚涌入了大量移民，还表明其他地方的移民用利比亚作为进入意大利的通道，尤其是来自意大利前殖民地厄立特里与索马里的移民，还有更广泛地来自非洲与中东地区的移民。2012年，欧洲人权法院不再允许移民像以前那样返回利比亚。

来到意大利的人数激增。2000—2009年，年均移民人数逾5万人。2016年，伴随着较高的增长率，从利比亚扬帆远航，移民意大利的人达到18.1万。在自土耳其经希腊进入欧洲的路线基本被关闭后，这成了移民进入欧洲的主要方式。2017年7月，意大利政府宣布，在现有的4个处理移民与寻求避难者申请中心的基础上，在卡拉布里亚、撒丁岛与西西里岛新增6个这样的中心。人们很容易在这些地区看到移民的踪迹。例如，人们可以在撒丁岛的萨萨里看到移民，也可以在像文蒂米利亚一样的其他地方遇到移民。据称，2017年8月，有多达70万的移民在利比亚等待迁移。世界人口的预计增长也许会让这些压力进一步凸显。世界人口将从2016年的76亿增加到2030年的86亿，也许到2100年将至少达到107亿5000万。其中，在绝对数字与百分比上的大部分增长将来自非洲。

大规模移民对意大利社会来说具有高度分裂性（对许多其他国家而言也是如此），给意大利社会结构带来压力。在2017年市政选举与2018年大选中，北方联盟党与五星运动党均对移民，特别是对罗马充满敌意，因为在罗马，移民关怀很成问题。2017年，一个主要的犯罪组织还因此被定罪。许多意大利人对单个难民及难民这个群体表示深切同情，但人们对难民数量激增也感到精疲力竭、日益担忧。

这加重了意大利与欧盟其他国家间的紧张局势。因为在意大利人看来，他们被欧盟委员会忽视了，承担着过重的负担。与法国及奥地利尽力避免移民从意大利继续向外迁移相比，意大利人的这种批评当然是有根据的。民怨沸腾。2017年，意大利政府试图给移民出生在意

大利的孩子以公民身份，而且其需要满足夫妻双方至少有一人在意大利居住了5年的条件。但是，政府的这项计划遭到公众的批评。本来，这项提案将使近80万名未成年人有权申请意大利国籍。执政的民主党因为担心无法获得足够的议会支持而取消了这项措施。北方联盟党此前积极奔走、强烈反对这项政策。北方联盟党领袖马泰奥·萨尔维民称，“公民身份不是一件礼物”。2017年9月，刊登在《共和报》上的一项调查显示，46%的意大利人表示，移民“危及公共秩序与个人安全”，2012年时这个数据是26%。

自2012年起就担任兰佩杜萨岛市长的朱西·尼科利尼在选举中失利。她将落选归因于人们对她欢迎移民立场的敌视，以及她对社会无序发展的不满：“经济危机与恐怖主义一道，意味着安全问题开始占上风，人们不再欢迎移民……大多数当地人当时反对我为争取移民合法性而奔走的活动，以及我反对兰佩杜萨岛与世隔绝的做法。”

但是，分开来看，移民做了许多事，尤其是社会工作。事实上，他们支撑着一个日益由领取养老金的人占主导的国家。后者在政党与工会中都有影响力，但却对移民不闻不问。移民也遭到右翼政党的抨击。由于自我隔离与政府干预，移民聚集在特定区域内，例如巴勒莫的巴拉洛。他们的栖身之所有些类似于罗姆人居住的贫民窟。移民为犯罪团伙利用，尤其是妇女被逼为娼。

意大利社会普遍存在的腐败也许内生于社团主义的传统之中。不过，人们不知道意大利政治文化的腐败性在多大的程度上与社会的腐败性互为因果。政府为帮助贝卢斯科尼避免因伪造账目受到起诉，甘愿修订法律。这凸显了在公共生活中难以保证清白廉洁的种种问题。与贝卢斯科尼（1994—1995年、2001—2006年及2008—2011年任意大利总理）有涉的大规模弊案削弱了人们对政治的信心，引发公众的普遍怀疑。艺术家们也以此为题，展开创作。例如，在南尼·莫莱蒂那充满敌意、令人困惑的电影《鳄鱼白皮书》（2006年）中，贝卢斯科尼的事业是建立在黑钱之上的。2017年，在对绰号为“意大利的最

后一位国王”的犯罪团伙成员马西莫·卡尔米纳蒂进行审判时，一则窃听电话录音表明，他曾将自己与同伙比作生活在一个鱼龙混杂、违法利益交换横行的社会中的居民，而且，他“甚至有可能与贝卢斯科尼同桌就餐”。那当然什么都证明不了。

贝卢斯科尼是商业电视大鳄。人们有充分理由批评他拉低了电视节目的档次，在整体上贬低了意大利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贝卢斯科尼从政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巨大的电视收益。与欧洲其他地区相比，意大利人的平均电视观看率相当高。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纪、没受过多少教育的人，他们喜欢看日间电视。这让贝卢斯科尼在经济上与政治上获益。相反，人们也可以说，贝卢斯科尼的电视公司是成功、优质、有效且盈利的，它是有党派倾向的国有电视行业的有力竞争者。

贝卢斯科尼谴责意大利共产党对他的批评。2008年，为确保自己有资格掌权，贝卢斯科尼指出大规模行动的可能性：“如果我们不能（在大选中）获得选票，我相信数以百万的人会涌向罗马提出要求。”贝卢斯科尼的支持者们以技术官僚政府不民主为由，维护他的独裁主义。他们还说，权力的制衡让意大利不服管束。但是，实行权力制衡是为了避免另一个像墨索里尼一样的独裁者出现。

然而，贝卢斯科尼虽有严重缺陷，他也不是墨索里尼。事实上，当人们比较这两个爱出风头的人在掌握与行使权力的方式时，就能看到意大利政治自20世纪20年代起发生的种种变化，尤其是人们摒弃了通过武力与恫吓来获得权力的做法。贝卢斯科尼与墨索里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贝卢斯科尼因2006年选举失败而被推翻。他对结果质疑，但司法部确认结果无误。由罗马诺·普罗迪组建的左翼联合政府取代了贝卢斯科尼支离破碎的联合政府。此前，1996—1998年，普罗迪就是意大利总理了。他还在1990—2004年担任欧洲委员会主席。但是，反过来，普罗迪政府因分歧而变得虚弱，处境岌岌可危，尤其是尝试改革导致分歧加重。普罗迪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成功稳定了财政局势。

天主教会对政府政策持有敌意，尤其是政府对同性恋民事伴侣关系的支持。但是，更让天主教会感到恼火的是，政府提议部分停止对私立学校的支持，尤其是财政补助。这些私立学校基本上都是天主教学校，它们的学术水平普遍低下。自2005年当选以来，教皇本笃十六世十分支持意大利主教们对国家政治时常发表的评论，这些评论强烈反对社会自由主义。

2006年，普罗迪政府在选举中胜出。2008年，贝卢斯科尼从天主教激进主义对普罗迪政府的反对中受益。由于普罗迪联合政府内出现叛乱，贝卢斯科尼在新一轮选举中渔利，重新掌权。贝卢斯科尼在任上利用职务之便，使自己及自己的许多商业利益免受严重的逃税、行贿罪行指控。他没有因为任何指控而被定罪。2011年，贝卢斯科尼因滥用职权及招嫖一位摩洛哥未成年舞者，遭到起诉并受审。法院判决招嫖罪名不成立，但认定贝卢斯科尼犯有税务欺诈。他因此被逐出议会。在本书写作时，贝卢斯科尼正在等待向欧洲人权法院提起上诉。当时，贝卢斯科尼面对巨额国债压力，不愿支持德国提出的希腊债务解决方案，被迫在2011年辞职。关于他与黑手党所谓的牵连，人们依然没能找到真凭实据。贝卢斯科尼一直都否认自己与黑手党有任何瓜葛。

由经济学家马里奥·蒙蒂率领的完全未经选举的技术官僚政府，取代了道德败坏的贝卢斯科尼。这届政府欢迎金融市场，因此也就对德国采取了接受态度。德国在安格拉·默克尔总理的领导下，始终反对贝卢斯科尼。意大利这届技术官僚政府一直掌权到2013年。是年，在一场胜负不明的选举中，由恩里克·莱塔领导的虚弱的左右翼联合政府胜出。相反，这届联合政府在2014年被马泰奥·伦齐率领的中间偏左势力取代。这股势力是在贝卢斯科尼的帮助下成功夺权的。来自托斯卡纳的伦齐，外号“破坏王”。2013年，他当上中左翼民主党领袖，该党的前身是意大利共产党。

更加意义重大的变化是由贝佩·格里洛领导的旗帜鲜明、直言不讳

的反政治运动，即五星运动党的崛起。格里洛曾是一名喜剧演员。五星运动党在2013年选举中赢得了1/4的选票，因此它的候选人当选为罗马与都灵市市长。作为一场民粹主义与乌托邦式运动，五星代表着政治领域后意识形态的转型，包括对传统左右派划分的超越。它为了用民意来取代代表制民主，主张用全民公决进行统治。五星也打击腐败，攻击那些任期超过一届的当权派，抨击欧盟，尤其是欧元。事实上，意大利的欧盟成员国身份过去依靠德国支持与意大利经济学家、银行家马里奥·德拉吉所支持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现在情况依然如此。这项政策给欧元区带来了稳定。自2011年起，德拉吉出任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有趣的五星运动党虽然在某些市政府做出了成绩，但一些人认为，如果用批判性眼光审视该党，如果这些人不掌权的话，那么五星运动党只是有些可信而已。在2018年2月一次民调中，近28%的受访者支持该党。

2016年，全民公决否定了政府为巩固自身地位而提出的修宪提案。政府提议，在选举中得票最高的党将在众议院中获得绝对多数席位，而且意大利将不会有直选的参议院。政府把这项提案包装成确保政治稳定的方式，但许多意大利人视之为独裁体制。这次失败导致意大利总理马泰奥·伦齐在2017年下野。意大利南方地区坚决投票反对改革提案，贝卢斯科尼也不同意。2016年12月，同样来自民主党的保罗·真蒂洛尼取代了伦齐。真蒂洛尼宣称，他的当务之急是制造就业机会，缓解2016年袭击意大利中部的那场致命地震所造成的破坏。事实上，人们亟须政府出台政治及财政措施。真蒂洛尼在政治生涯的早期活跃于左派阵线上。

虽然贝卢斯科尼在2013年被判犯有税务欺诈罪，但他作为意大利力量党的领袖，依然具有影响力。有些人认为，尽管自2015年起意大利力量党在民调中被北方联盟党超越了，贝卢斯科尼看起来仍然像是一位政界元老。据称，2017年，北方联盟党计划通过将党名与政策改得更有全国代表性在右派中起到代表作用。

腐败问题有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在一系列涉及垃圾回收的丑闻中，这一点尤为明显。这些丑闻反映出人们生活更加富足，物质文化出现转变以及政治的崩溃。丑闻相应地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压力，这成了一个政治话题，尤其是在罗马。在那里，违法分子以行贿与胁迫的方式换取公共合同。2015年，一位五星运动党的市长无法解决罗马的公共生活危机。但是，问题出在整个政治体制上。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在1976—2008年的大部分时期，罗马市处于多届左翼联合政府统治之下。

在那不勒斯附近的坎帕尼亚地区，情况更具戏剧性。截止到2007年年末，坎帕尼亚当地的垃圾场全都堆满了，垃圾回收也中断了。如果说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克莫拉在坎帕尼亚与垃圾有关的敲诈勒索案中扮演的角色相对来说非同寻常的话，那么这场危机也反映出社会上存在着更广泛的压力，尤其是人们对焚化炉及在居民区附近建垃圾场的反对。人们之所以持反对态度是因为大家比以前更清楚废气排放、径流及一些垃圾的危害，因而也就越发担忧了。在坎帕尼亚，犯罪分子为了在他们的垃圾场为新运来的垃圾腾地方，就付钱让男孩子们点火焚烧垃圾，对这么做释放出相当危险的烟雾不以为意。

2008年，比萨大学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以二噁英为首的坎帕尼亚垃圾场污染物导致了一场由环境污染引发的、影响范围更广的危机。那就是意大利男性精子数自20世纪70年代起的下降，尤其是在城区。下降最少的是像阿普利亚这样偏远的农村地区。污染也严重影响了2008年坎帕尼亚的奶酪产量。这场危机持续到现在。2013年，克莫拉烧毁了那不勒斯的科学博物馆。此事也能显示出该组织的嚣张气焰。考虑到克莫拉从政府在1980年救赎那不勒斯附近地震灾区的拨款中受益，人们就不应该对他们继续盗窃未来的行为感到惊奇了。光荣会参与了有毒废物与放射性物质的买卖活动。

与此同时，意大利受到更普遍变化的影响，其中包括气候变化。这成了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也是个体与群体经历及记忆的一部

分。2001年春，罗马出现了类似于热带地区的降雨量。但是，2005年10月，当我们探访意大利北部的阿达河与波河河谷时，我们看到那里的河面出现了与季节不相称的低水位。于是，谈话就围绕着阿尔卑斯山脉上的雪量减少、秋季变暖和气候变化展开了。人们感到心神不宁：水与生命息息相关，变化似乎到了失控的地步。事实上，2005—2006年，干旱导致水位下降，进而对农业产生了严重影响。2017年，旱灾让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缺水也使环境恶化。从河流中取水使河流水位下降。意大利最重要的波河的水位下降尤为明显。因此，汇入大海的淡水流量也减少了。亚得里亚海污染急剧上升也与这个问题有关。人们用水量的增加也导致天然蓄水层枯竭，盐分向地表转移。这严重影响了土质与农业生产率。降雪量下降也是一个影响因素。因为大多数融雪会变成地表径流，人们由融雪得到的水源要比以降雨形式存在的水源稳定。

虽然2015年威内托大区的人抱怨连连，但那里的饮用水水质依然不低。政府对水质有严格规定，定期检测水质、公布结果。旅行者们曾经抱怨过水的问题。现在，他们没有多少理由这么做了。2017年的夏天非常热，那年的春天也是60年来最干的，同时也许是自1800年以来最干的。罗马面临严重供水问题，部分原因是城市臭名昭著的供水管道泄漏，结果导致近44%的城市供水被浪费掉了。老化的抽水系统也同样是个大问题。一直以来，罗马市政府都未将此前许诺的改革付诸实践。许多公共喷泉被关闭，晚间水管中的水压被限制在8小时。

和大多数国家一样，意大利每年都要面对新危机。2005—2006年，意大利缺水；相比之下，2007年，社会凝聚力崩溃的体现是纵火者引发的森林大火。与希腊一样，意大利的此类事件也有意外转折。据称，这些纵火者效力于房地产开发商。他们不管官方态度如何，都要清除树木、开发土地。这种行为与自“二战”后人们对陆地风景的普遍破坏一脉相承。意大利南方及西西里岛的非法施工，尤其是海岸地

区的乱搭乱建，与北方杂乱无序的发展不相伯仲。在这个过程中也涉及腐败问题。

2012年，超级豪华邮轮“歌诗达协和号”因操作失误在意大利西海岸触礁搁浅，32人丧生。到2016年，人们把注意力转移到了银行上。意大利第三大（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银行锡耶纳银行问题尤为严重。它的间接所有者民主党用锡耶纳银行来集资。意大利最大的联合信贷银行不得不从股东那里筹集逾200亿欧元，但它轻松做到了。2017年，意大利政府对欧洲中央银行迫使贷方为不良贷款提高供应额的政策表示不满。人们认为，这可能会对意大利造成冲击，尤其是因为意大利尚有许多破产案长期悬而未决。

经济表现不佳与不良贷款带来了严重的问题。2017年，意大利经济增长率仅为1.5%，这是大国及欧元区经济体中最低的。2017年12月，失业率达到10.8%，超过了欧元区平均水平。2017年7月，青少年失业率为35.5%。东亚出口商品的增长给意大利制造业造成沉重打击。2017年，意大利旗舰航空公司意大利航空宣布实行破产保护。它背负着30亿欧元的债务，已经不再是一家生意兴隆的公司了。曾经号称在意大利市场占有率达到28%的瑞安航空公司也申请了非契约出价。2016年年底，意大利巨额公共债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32.6%。虽然因债务计算方法不同会有差异，但这个百分比是欧洲最高的。这种债务水平严重限制了政府所能选择的经济刺激方案。

与此同时，意大利每年是欧盟的第三大资金贡献者，仅次于德国、法国。开支并不是唯一的问题：意大利在医疗卫生上的花费略低于英国，但结果要好得多。意大利人均寿命长，比美国、英国的情况好。癌症死亡率低于英国、法国与德国，而且男女癌症成活率均高于欧盟平均水平。肥胖率低于英国、西班牙与德国。慢性疾病患病率低于英国、西班牙、德国与法国。



意大利南方的发展

安德列亚·卡米莱里在小说《偷零食的贼》（1996年）中，以阴沉的笔调描绘了环境变化腐败堕落的过程。故事发生在西西里岛：

“直到30年前，维拉塞塔村还只有20座房屋……但是，在繁荣年代，修路热、建筑热（这看似是我国宪法的基石：‘意大利是一个建在施工工程上的共和国’）同时到来。结果，维拉塞塔就处在三种高速路的交会处了。一条是超级高速公路，也就是所谓的连接线，还有两条省道跟两条省际公路。在经过几里长的如画风景后，人们看到这些路的护栏让人合宜地漆成了红色。因为，一些法官、警察、宪兵、金融家甚至是狱警，之前都死在了那里。这些路经常让缺乏警惕的旅行者大吃一惊，因为它们会突然无缘无故地（或者说原因过于明显地）在山坡上走到头……因此，维拉塞塔迅速变成一个无序扩张、迷宫似的小镇。”

卡米莱里在小说《水的形状》（1994年）中写道，在附近，有“落成的大型化工厂的废墟……当时看起来进步之风势头正劲……所到之处留下了赔偿金与失业率，真是一片狼藉”。

政府的失败与管理失灵及法院体系故障有关。毫无疑问，意大利在遵守欧盟法律方面表现极差。失调的政治体制导致人们对欧盟法律的这种蔑视。与此同时，有待商榷的是意大利当代发展中自相矛盾的本质。与犯罪网络和政治失衡同时存在的，是意大利天下无双的技术、交通、时尚、饮食与旅游业。这些产业让意大利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给北方地区带来高生活水平。意大利航空公司虽然倒闭了，但意大利有运作良好、不断扩张的高速铁路网，而且，2015年，米兰世界博览会成功举办。

历史待售

再一次地，历史是政治的一部分。1961年是那不勒斯与西西里岛并入意大利的百年纪念。这次周年纪念与1911年时的情形大不相同。1961年的意大利是一个共和国。不像在1911年，萨伏伊王朝的角色几乎不再引人注目。此外，以安东尼奥·葛兰西为代表的左派，此前谴责意大利复兴运动，说它是一场既无意实现又没带来社会公正的民主党运动。相反，1961年左派的重心是反对德国、反对1943—1945年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在这场反抗运动中，以意大利共产党为代表的左派做出了突出贡献。1961年，当时主导意大利政府的天主教民主党积极推动意大利复兴运动纪念活动。他们强调，意大利复兴运动是对左派思想的反抗，巩固了意大利民族主义的光荣传统，促进了意大利民族主义的发展。

意大利政治的发展通常与人们对过去的处理方式相互作用。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严重危机的背景下，意大利政治体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右派的改革。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社会运动党（MSI）不再处于政治边缘地带。直至1992年，意大利社会运动党为纪念墨索里尼夺权70周年还穿着黑衫、行法西斯礼。但是，1994—1995年，该党领袖詹弗兰科·菲尼将党名从MSI改为更加温和的后法西斯主义名称，即全国联盟政党。这是由天主教民主党衰落及1994年第一届贝卢斯科尼政府组建所引发的右派重组的一部分。全国联盟政党保留了一些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内容，但试图寻求认同，尤其是通过对反犹主义的摒弃。菲尼刻意与政党的法西斯主义遗存保持距离，数度前往以色列。1996年，他宣称，对墨索里尼的判决“最好留给历史学家去评说”。这表明，菲尼放弃了自己在1994年提出的墨索里尼是“20世纪最伟大政治家”的主张。对此，他在2009年评论说，“考虑到我在过去15年的所作所为，如果我当时仍持那种观点的话，我就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同样，在2009年，菲尼（在2008—2013年担任意大利众议院议长）宣称，“我们已与自己的过去和解。我们已明确

谴责了意大利在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历史”。

菲尼让法西斯主义从边缘地带走出后，人们就更难把1943—1945年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抵抗运动当作令人信服的民族神话，为当下的目的服务了。不过，它仍是共和国的建国神话，尤其是对左派而言。在左派这边，他们即使没有忽视，也弱化了英美在意大利解放中的作用。相反，他们鼓吹意大利的解放得益于全民自发的左翼抵抗运动。

作为意大利力量党领袖，贝卢斯科尼在1990—2015年主宰着意大利右派。他不愿就此作罢，试图为法西斯主义时期辩护，使其不受攻讦。长期以来，贝卢斯科尼都将历史修正主义看作是将他获得的各方支持统一起来的方式。因此，他拒绝参加每年4月25日举行的脱离法西斯主义统治的解放庆祝。贝卢斯科尼对法西斯时代的辩护显示出，图腾在意大利政治中的巨变。当时，意大利民众普遍对墨索里尼采取了半接受的态度。2009年，意大利力量党与全国联盟党合二为一。在贝卢斯科尼的领导下，它们组建成一个新党，还起了个不太恰当的名字，叫作自由人民党或自由运动党。但是，2010年，菲尼带头批评贝卢斯科尼，并成立了中立派“第三极”。结果，菲尼的议会党团“意大利未来与自由党”在2013年大选中败得一塌糊涂，未获得任何席位。贝卢斯科尼除了为法西斯时代辩护外，还在2009年试图推动立法，为参战老兵发放养老金、授予荣誉。部分抵抗运动士兵与萨罗共和国士兵才能享受这些待遇。事实上，这项提案将二者混为一谈的做法未获认可。

贝卢斯科尼政府也向利比亚提供了赔偿，因为利比亚在1911—1942年间曾是意大利的殖民地。在很大程度上，贝卢斯科尼政府采取这项政策是因为它需要并想要保住利比亚的石油供给。同时，贝卢斯科尼政府也为了劝说卡扎菲上校限制来到意大利的移民人数，并间接为意大利企业提供国家援助。因为所有的对利比亚赔偿均需用于购买意大利公司产品。但是，政府往往表现出极右倾向，弱化乃至忽视意

大利在海外犯下的暴行。与此同时，它还呼吁国际社会承认意大利人所遭受的苦难。2004年，意大利电视台报道了1945年南斯拉夫共产党军队向前挺进时，对伊斯特拉25万意大利平民犯下的罪行。当时，南斯拉夫试图夺取一个地区的控制权，而该地区是意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奥匈帝国那里获得的。伊斯特拉流亡者纪念活动的重要内容是对11000名大屠杀遇害者的缅怀。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被活活扔进石灰岩深坑中的。在2000—2009年，伊斯特拉流亡者的观点开始具有影响力。1918年年末，当意大利军队到达伊斯特拉时，没有发生此类屠杀事件。贝卢斯科尼政府比之前历届政府更愿表达或曰引导仇外情绪，也更愿推进这个议题。2005年，意大利为伊斯特拉遇害同胞确定了新的国家纪念日。每个市镇都举行了典礼并降半旗以示哀悼，媒体对此做了大量报道。这与战后边境争端协议有关。2009年，菲尼在距离伊斯特拉最近的意大利城市的里雅斯特发表演讲说，“伊斯特拉曾是罗马的，后来又归威尼斯所有。这意味着它是意大利的”。

为了报复埃塞俄比亚对意大利统治的反抗，意大利自1936年起屠杀了成千上万名埃塞俄比亚人。大量平民遇害，包括孕妇与儿童。意大利人还特别将枪口对准了知识分子。鲁道福·格拉齐亚元帅的际遇与意大利修正主义完全一致。他在利比亚手段毒辣，在1936—1938年时任埃塞俄比亚总督，还做过萨罗共和国国防部长与总参谋长。战后，他被判通敌罪并入狱服刑，1950年获释。2012年，人们在罗马附近的阿菲莱用公款竖起一座格拉齐亚纪念碑。意大利政府及军队从未承认过他们对利比亚与埃塞俄比亚的残暴统治。

与1961年的情况一样，国内政治也影响了2011年（150周年）那不勒斯与西西里岛占领纪念活动。在左派阵营中，共产主义的势力大不如前。因此，左派此时更愿认同意大利复兴运动是一场进步的民族独立运动的观点。相反，周年纪念日让贝卢斯科尼政府感觉有些尴尬。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联合政府包括了北方联盟党。这个分裂主义政党认为与南方的联合是一个错误，他们还经常对南方人横加指

责。

这些区别及其他差异也影响了更加具体的事件。例如，1860年，西西里岛小镇勃朗特发生民变。为恢复社会秩序，加里波第的一位将领在这场民变中杀害了当地要人并处决了5名激进分子。自20世纪50年代起，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将勃朗特民变视为被不彻底的意大利复兴运动粉碎的大革命的象征。2011年，来自对立面的政敌又用该事件来攻击意大利复兴运动，尤其把它看作北方对南方的压迫。

成立于1989年的北方联盟党在诸如维罗纳、帕维亚与特雷维索这样的中心得到大力支持。他们大力推进分离主义。在1992年、1994年、1996年、2001年与2008年的选举中，北方联盟党表现出色。它呼吁终止对意大利南方的补贴。在2008年选举中，北方联盟党的得票率是8.3%，但在2013年只有4.1%。通过强调意大利北方的独特性，北方联盟党肯定了自己的历史。它的全称是帕达尼亚独立北方联盟党。有时候，这种历史很成问题。因为，这种尝试是在说，意大利北方的政治身份早在罗马征服前就存在了。然而，还是有很多人认同这种联系。

由于宗教信仰的衰落，历史作为一种身份认同的方式也许变得更重要了。2000—2009年，教堂出席率不足20%。聚焦于意大利复兴运动的传统历史越来越不受人欢迎。这是众所周知的，让卡洛·钱皮深深引以为憾之事。这位温和派政治家在1999—2006年担任意大利总统。

意大利前途未卜，但其他国家又何尝不是这样？事实上，意大利的危机就是现代西方社会的危机。但是，这么说也是在逃避责任。统一后，意大利的表现要比德国差得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后，意大利的境遇远不及德国、日本与奥地利，虽然后三个国家都曾被占领过。此外，现代意大利政坛危机四伏，也没能建立起切实可行的民主国家制度。这与德国、日本和奥地利，还有法国，形成了鲜明对比。

意大利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增速喜人，但如今已成了一个社会动荡、经济困顿的国家。它看似无法采纳、实施能够带来经济复兴与政府改革的政策。意大利的窘境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但崩坏的政治体制，也许是其中最突出的原因。然而，英国又有什么不同呢？

第十三章　重新发现意大利：北部

人们觉得都灵值得一游的地方主要是国王的宫殿、大剧院、国王狩猎行宫及苏佩尔加大教堂。从苏佩尔加大教堂向外望去，能在一侧望见阿尔卑斯山脉壮美的景色。

走进意大利

追寻以前游客走过的路线，对我们简要讨论地区历史有一定的启发性。他们的观点与如今游人的体验一道阐明了我们对意大利各方面的历史特征的观感。过去最引人注目的游客体验是18世纪遍游欧洲大陆的旅者经验。宗教战争的结束及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使人们可以环游欧洲，尤其是可以让新教徒去信奉天主教的欧洲地区旅行，而意大利则是他们的首选。新富的英国人就是那个时代的美国人，他们的观点记录了人们在意大利旅行的体验。

如今，英国人前往意大利的主要方式是飞机。最近，随着廉价航空公司定期航班的增加，以及提供海外直航服务的意大利机场数量的增长，这个过程变得更容易了。以往，大多数游客只能去少数一些大型机场，尤其是米兰、罗马；如今，直达航班也会飞抵较小的机场，例如，阿尔盖罗、巴里、博洛尼亚、卡塔尼亚、库内奥、佛罗伦萨、福贾、热那亚、拉梅齐亚泰尔梅、莱切、奥尔比亚、巴勒莫、帕尔马、佩鲁贾、佩斯卡拉、比萨、里米尼、特雷维索、都灵与维罗纳。诸如阿普利亚、卡拉布里亚、西西里岛与撒丁岛这样的地区已经对游客开放了。

飞机出现以前是火车的时代。19世纪末，穿过阿尔卑斯山脉的铁路线使意大利铁路体系与更广阔的欧洲铁路体系连成一片。此后，铁路运输就发展起来了。我还能记起20世纪60年代初，从巴黎开往米兰的夜间卧铺列车。在火车上，我弟弟斯蒂芬·布莱克大半夜“砰”的一声从他的铺位上掉了下来。1979年，我首次前往都灵进行档案研究时，先得从伦敦乘火车，然后搭渡船越过英吉利海峡，再坐火车去巴黎，乘地铁穿越巴黎，最后转乘火车抵达都灵。事实上，这是对早期更加缓慢且充满不确定性的马车与小船世界的现代化升级。往返于意大利的旅途给游客的意大利之行定下了基调。路上的种种艰辛让人们在抵

达目的地时，更容易体会到一种成就感。

在火车、汽轮出现以前，游客们的意大利旅行并没有固定路线。人们能从英国扬帆远航至意大利，但那并不常见。虽然陆上旅行也能经由低地国家与德国，但是通常的路线是经法国到意大利。人们不得不翻越阿尔卑斯山脉，或从海上绕过这座天堑。直到拿破仑时期，从法国沿地中海海岸地区才有好路可走。

大多数游客倾向于选择阿尔卑斯路线。在汽轮出现前，这条路线与海航相比没那么危险，也没那么多变。当然旅途也有可能中断。最常见的路线是从巴黎出发，途经里昂，穿过塞尼山关口，前往苏萨（在通过这个关口时，游客坐在类似于轿子的装置里，由赤足搬运工抬过去），接着前往都灵。在1860年被割让给法国的拿破仑三世之前，萨伏伊和尼斯一样都是意大利领土。因此，萨伏伊的边界在勒蓬德博瓦桑。

都灵

游客如今往往急于冲过皮埃蒙特，或者将注意力集中在更南端的地方，以至于错过了此地。这种做法可不太好，因为皮埃蒙特有许多值得品味的东西，尤其是葡萄酒。公元前218年，这里被汉尼拔所毁。公元前27年，托里斯作为罗马殖民地奥古斯塔托里诺，得以重建。1563年，由于萨伏伊王朝将首都从萨伏伊的尚贝里迁至此地，都灵声名大振。皇宫在1658年建了起来。市中心的建筑深深打上了18世纪初建筑师菲利波·尤瓦拉与萨伏伊王朝的烙印。事实上，这里是意大利城市中最有皇家气派的，它的街道规划也最规整。1861年，都灵成了意大利的第一座首都。结果在1865年，意大利就迁都佛罗伦萨了。都灵随后发展成重要的工业中心，尤其是在19世纪末伴随着菲亚特汽车公司的发展。人们可以在巨大的国家汽车博物馆中感受到菲亚特汽车公司的魅力。

许多18世纪的游客喜欢这座城市，喜欢它那由直线构成的街道平面图，喜欢在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领导下新建的宏伟建筑。理察·波寇克认为：“这座小城大部分地方都建得格外好，街道宽阔笔直、宫殿美轮美奂。”威廉·弗里曼觉得，都灵是“一座美丽的大城市，街道宽阔、房屋建筑精美……公爵的宫殿宏伟壮观、装饰华美，房间布局合理”。1763年，子爵夫人玛格利特·斯宾塞指出：“人们觉得都灵值得一游的地方主要是国王的宫殿、大剧院、国王狩猎行宫及苏佩尔加大教堂。从苏佩尔加大教堂向外望去，能在一侧望见阿尔卑斯山脉壮美的景色。”

如今，游客仍能看到所有这些地方。18世纪中叶，萨伏伊——皮埃蒙特的人口是1774000，但只有都灵与亚历山德里亚的人口超过20000。

热那亚

游客从都灵出发，当时有多条路线可进入意大利：向东可及米兰、帕尔马，往南可达热那亚。遍游欧洲大陆的教育旅行在意大利段并无固定路线。影响游客的因素有：抵达地与预计出发地；当时的季节，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由于酷暑及罗马附近疟疾的初发；同行旅伴的意愿；旅行者想要会见或陪伴朋友的打算；他们计划参加具体活动的安排。当时特别著名的是雷吉奥（在艾米利亚而不是卡拉布里亚）、博洛尼亚与米兰的歌剧，在那不勒斯与威尼斯的狂欢节，以及罗马的宗教仪式，尤其是复活节活动。

游客从都灵经阿斯蒂、亚历山德里亚，抵达热那亚的地中海地区。热那亚与都灵迥然不同。虽然没有可以当作热门景点的皇宫，但热那亚的历史更加丰富多彩，艺术珍宝也更多。

公元前4世纪，热那亚作为重要的罗马港口建城。中世纪时，它

是一个独立城邦，而且，它曾就这一地位与比萨展开争夺。1284年，热那亚在梅洛里亚岛海战中击败比萨海军后，成了地中海西部重要的海洋强国。它的贸易伙伴远及克里米亚半岛。但是，热那亚在收益、财富、名气与多元文化主义方面，不敌竞争对手威尼斯。热那亚受到黑死病的打击，直到16世纪一直处于颓势。它失去了对撒丁岛及其爱琴海领地的控制，还一度处于米兰子爵的统治下。

16世纪，为回应海上强国土耳其的扩张，热那亚加入了西班牙体制并因此受益，尤其是通过对包括那不勒斯在内的西班牙世界经济与财政的渗透。热那亚兴建了许多宫殿。例如，总督宫（政府所在地）以及沿诺瓦路（如今的加里波第大街）修建的宫殿，还有耶稣会教堂。这些地方值得今天的游客一览。1576年，热那亚颁布了一项法令，巩固了寡头政体的权力，压制了“人民议会”。

虽然热那亚有钱修复、重建在1684年遭受法国海军轰炸，以及在1746—1748年因参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而毁损的城市，但是热那亚在17世纪发展陷入停滞，在18世纪陷入衰退。1768年，科西嘉岛被卖给了法国。在拿破仑一世的统治下，法国吞并了热那亚。根据维也纳会议的规定，皮埃蒙特得到了热那亚。19世纪，热那亚作为皮埃蒙特的港市与造船业中心，变得举足轻重。这些因素在1945年后的“长期繁荣”中更加重要起来。结果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衰退中，热那亚经济遇到严重问题。

1788年，律师查尔斯·阿伯特抵达热那亚后，称赞道：“热那亚的自然景观雄伟壮丽，恢宏的宫殿鳞次栉比，规模无与伦比。”但是，1729年，已婚妇女与情夫（丈夫之外的男性伴侣）间的越轨行为令人瞠目结舌。1778年，菲利普·约克对警察的表现颇有微词：“杀人犯经常逍遥法外。”

米兰

许多游客从都灵向东前往米兰，不过他们往往会发现乡村地区着实平淡乏味。伦巴第的大部分地区归米兰公国所有。自1540年起，哈布斯堡家族就控制着米兰，甚至在1559—1859年这个家族也断断续续地短暂主宰着米兰。米兰与意大利其他地方一样，人们只要越过边境就能发现差别。1776年，后来当上国会议员、下议院发言人，并成为第一代雷德斯代尔男爵的律师约翰·米特福特很快就觉察到：

> 政府不断更迭。撒丁岛君主为了艰难地支撑庞大的军事机构，养活人口众多的皇室，对农民巧取豪夺，从能干的农民身上榨取能够得到的每一法寻。由于皇室不需那么费力就能维持排场，所以就没对米兰居民施以同样的重压。旅行者很快发现人们花时间耕种土地。他们的住所是整洁的，而且农民们看似轻松自在、生活舒适，这是在皮埃蒙特没有遇到过的情况。

米兰作为重要的罗马中心城市，曾经名为梅蒂奥拉努，尤其是在后来帝国统治时期（见3世纪时绘有湿壁画的安斯佩托塔）。中世纪时，米兰再度变得重要起来。米兰是领先的工业中心与独立市镇，但它却处于一系列家族的统治之下，尤其是维斯孔蒂家族。在1447—1450年短暂的共和国时期之后，在米兰先是成为西班牙，后又沦为奥地利领地前，它处于斯福尔扎家族的统治下。1700—1709年，在伦巴第110万居民中，13万人生活在米兰，而紧随米兰之后最大的三个城市的人口之和仅为54000人。

英国游客觉得米兰社会特别友好，令人心情舒畅。但是，它缺少可与其他主要目的地相媲美的壮丽景象。游客评论往往十分有趣，但他们通常无法捕捉到政治上的变化。这可见于他们在18世纪时所做的评论。可以理解的是，游客与其他人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自1792年法国入侵后社会所经历的变化上，因而相应地将较早时期的变化降到了最低。事实上，当时也有重要发展。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在取代了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后，从18世纪初到1735年间主宰着意大利。自18世纪30年代末至1795年，它统治着意大利北部地区。但是，不

管后来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多么努力想要证明稳定政策的存在，但是那并不是说当时有着一项长期不变的政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宣称，自己以卡尔三世的身份继承了他的意大利属地。他自视为合法的西班牙国王，而不是凭借征服手段对这些领地进行统治。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他对这些领地的治理是通过传统的西属意大利议会来进行的。当时，西属意大利议会设在维也纳，但其成员依然是西班牙与意大利人。但是，他提出的财政主张并不受人欢迎，而且也许由此导致米兰贵族阶级与高级神职人员在1733—1736年对以它的征服者萨伏伊——皮埃蒙特统治者、撒丁岛的卡洛·埃马努埃莱三世为代表的公国统治表示普遍支持。事实上，在波兰王位继承战争（1733—1735年）期间，意大利普遍无人援助查理六世。这种情况是令人震惊的。

相反，在查理六世之女玛丽娅·特蕾莎（1740—1780年在位）统治时期，她极力扩大政府在米兰的权力。这反映出她面临的财政问题、维也纳人对改革的普遍兴趣，以及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意大利改革成功的更大可能性。虽然那不勒斯与西西里岛的贵族阶级根基稳固，但是在1734—1735年西班牙在重新征服中拿下了这两个地方。1747年，加布里埃尔·维里重新起草了米兰法律。1749年，买官卖官的做法遭到禁止。官员的工资也被固定了下来。1755年，成为城市官员的标准从贵族出身变成了拥有财富。米兰完成了土地测量。1760年，官方评估取代了税务自测体系。在享有全权的部长的统治下，中央政府的权力急剧扩大，政府的野心也膨胀起来。这些部长包括乔凡尼·卢卡·帕拉维奇尼伯爵（1744—1747年、1750—1754年在任）、费迪南多·博纳文图拉·冯·哈拉赫伯爵（1747—1750年在任）、比特拉阿莫·克里斯蒂亚尼伯爵（1754—1758年在任），以及来自附近的特伦托的卡洛·朱塞佩·迪·费米安伯爵（1758—1771年在任）。虽然当地政府由土著居民管理，但米兰推行了某种程度上的统一与中央集权。1757年，意大利议会被废除。1749—1783年，米兰的财政收入似乎翻了一番。

玛丽娅·特蕾莎的长子是约瑟夫二世（1780—1790年在位，这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统治着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1786年，约瑟夫以新行政单位、法庭及新法典取代了传统的行政及司法体系。虽然他因此与米兰贵族改革家生出嫌隙，但这些变化也以和平方式为人们所接受了。1784年，约瑟夫提出，“我已命（伦巴第）政府探寻因地制宜地执行德国诸省准则之法。当务之急自然是提高并加快推进司法公正”。

1796年，奥地利人在战争中不敌法国。1814年，奥地利重获伦巴第。直到1859年，那里为法国及皮埃蒙特联军所破。20世纪，米兰巩固了自己作为意大利财政及工业首都、设计与时尚中心的地位。一项证明就是，曼彻斯特自称是“北方的米兰”，但很少有米兰人赞同这种观点。

食物与旅人

意大利人以他们的食物品质与烹饪过程而引以为豪。如今，前往意大利的游客们都知道值得期待的东西有哪些。这并不是因为意大利以为人提供国际美食而著名。事实上，与英国甚至是法国相比，意大利受到国际饮食的影响更小。相反，外国人熟知意大利食物。对于在伦敦郊区长大的人来说，“吃意餐”是中餐与印度菜之外的选择。意式美食在其他地方也受人欢迎。我到日本的当天就被人带到省城一家意大利餐厅吃午饭。

诚然，如此经历无法捕捉到意大利饮食的种类、深度与质量，正如它无法捕捉到中餐与印度菜的种类、深度与质量一样。但是，它给人们以熟悉感。此外，大多数（绝非所有）现代意大利餐厅为人们提供的食物具有相当大的延续性，而且没有英国与美国那么多的“混合烹饪”。这在很大程度上给人们带来了似曾相识的感觉。

但是，旅行者在过去的体验具有极大的不可预测性。与食物匮乏同时存在的是食物的多样性。这是由不同的季节（如今仍是一种影响因素）与储存、运输食物及饮料的种种困难所造成的。与之相关的是，在准备及烹饪食物方面，意大利也有着更多的方式。当时，国外没有意大利餐厅的事实意味着这对旅行者来说是种新体验。例如，大多数人没尝过面食。1788年，查尔斯·阿伯特在热那亚发现了意大利小方饺：“它看起来像煮熟的牛肚。”1731年，约翰·斯温顿也在热那亚第一次吃到了意大利小方饺。他的评价就要积极得多。虽然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意大利许多餐馆专营意大利饮食，但是它们无法与某些贵族家族里的法国大厨相提并论。

旅行者体验到两种饮食习惯。在农村地区，食物不仅单一还时常匮乏。在城镇里，对有钱人来说，数量与种类都不成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下，对旅行者而言，橄榄油与大蒜的使用是完全不同的体验。他们特别不喜欢橄榄油。此外，在大斋期期间，旅行者需要有凭证才能吃上肉。地区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食用地方特色菜肴的建议十分有用。斯波莱托的羊肉给安德鲁·米切尔留下了深刻印象，让约翰·斯温顿感到耳目一新的是热那亚的牛肉与小牛肉，诺顿·尼科尔斯惊叹于苏莲托的小牛肉与黄油，约翰·弗莱明·莱斯特男爵则钟情于都灵的奶油与黄油。

从米兰一路向东

18世纪，自米兰出发有两条深入意大利的主要路线。旅行者可以向东走，经布雷西亚、维罗纳、维琴察与帕多瓦，到威尼斯；或者向东南进发，经皮亚琴察、帕尔马、雷吉欧与摩德纳，到博洛尼亚。从博洛尼亚出发，他们能继续前往佩萨罗与亚得里亚海海岸；或者，更普遍的情况是，向南越过亚平宁山脉，前往佛罗伦萨。伦巴第、威内托，以及特别是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许多城市，有许多能让人

大饱眼福的地方。帕尔马与摩德纳曾是公国首都，博洛尼亚则是主要的艺术珍宝中心。威廉·弗里曼在维琴察发现“许多由安德烈亚·帕拉弟奥设计的宫殿”，而维罗纳的圆形剧院给第二世帕尔姆斯顿子爵亨利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萨拉·边沁对后者却颇有微词：“由于没有下水道，秽物散发的气味常常恶臭连天。”1793年，她在帕多瓦吃到了“一些由美味的小鸟烤炙的晚餐，当地人称这些鸟为鹈。还有切成小块油炸的羊脑……酸模通常是配菜，人们会把肉在研钵中捣烂后，用模具烘焙成布丁状。那里的通心粉形状各异”。

画作吸引了人们的许多注意力，游客也觉得自己具有品鉴能力。1755年，维利尔斯子爵乔治专程前往琴托，参观画家圭亚奇诺的出生地：“我们的救世主在复活后展现在圣母面前的尊容是这样的：着色不错，但脸上没有恰当的表情。衣纹也显得十分漫不经心。”1788年，詹姆斯·罗布森谴责了朱利奥·罗马诺藏于曼托瓦得特宫的画作《世人的惨败》，我觉得，这件在鉴赏家们看来价值高得难以估量的作品在如此小的一间房里失去了它所有的伟大与庄严。因为如此一来，巨大无比的人形被降至人视线的高度，甚至于都没有到人所走的地板上。由于高度与距离的缺乏，画作中的人物及周围的风景失去了许多庄重感。因此，他无法理解湿壁画的意义。湿壁画旨在让观众感觉亲自体验了巨人的命运。

一些城市在罗马人到来前就存在了，尤其是曼托瓦，因为这里曾是伊特鲁里亚定居地。在罗马统治的漫长世纪里，这些城市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罗马人也建起更多城市。例如，帕维亚、雷吉奥与维罗纳。首都帕尔马与摩德纳以牺牲那些没有这种权力的城市为代价获益，尤其是皮亚琴察与雷吉奥。帕尔马在波旁家族统治时期建起一座大宫殿，但如今人们在探寻历史更加悠久的古迹时往往对其视而不见。在体验意大利18世纪风情时，现代游客的这种模式往往具有普遍性。今天的其他游客对诸如摩德纳与法拉内洛的法拉利博物馆之类的汽车博物馆更感兴趣。

不管政府结构如何，当时有名望的人往往住在城里（如今情况依然如此）。税收、租金与十一税将财富注入城市，从而保障了制造业与商业的发展。18世纪90年代，法国占领给该地造成恶劣影响。

威尼斯不是罗马城市

威尼斯与大多数意大利城市不同，它不是一座罗马城市。此外，因为这座城市建在疟疾肆虐的沼泽地上，可以说是开局不利。先是匈奴人（453年），后来是伦巴第人（568年）的“蛮族”入侵给威尼斯带来的破坏意味着，避难是首要任务。拜占庭最终行使了职权，但当地人变得更加果敢。697年，威尼斯选出第一届总督；828年，圣马可的遗体被偷运出埃及，当地人为安放他的遗体建造了一座巴西利卡教堂。圣马可取代了拜占庭的保护神。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威尼斯都处于大陆列强的阴影下，但海军力量与贸易给它带来了财富与权力。1082年，威尼斯助拜占庭阻止了诺曼人的扩张。拜占庭由此颁布“金玺诏书”，规定威尼斯人在拜占庭帝国内无须缴纳通行费与赋税。这是威尼斯巨大财富的基础。面对热那亚人的反抗，威尼斯必须保住这种豁免权与海上优势。在经过了13世纪的几场重要冲突后，威尼斯人在14世纪取得了胜利。

1297年，威尼斯宪法正式确立下来。在十人议会保护下，寡头统治集团基本稳定。十人议会是1310年为保障安全而建立的。1355年，威尼斯总督马里诺·法利埃罗预谋了一场专制主义政变，结果遭到镇压。他被处死在总督宫的台阶上。贵族阶级管理着威尼斯城。但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富人与占据人数优势的穷人间的分歧导致贵族阶级内部不和。海外领土让贫穷的威尼斯贵族可以利用职务之便掠夺当地人。1715年，面对土耳其侵略军，寡不敌众的威尼斯军队丢掉了威尼斯在希腊南部的领地。人们把这归因于贵族犯罪在威尼斯的增长。由于封爵机会少，贵族阶层无法因公受赏、提升社会地位。一直以来，历史学家们对威尼斯贵族衰落的原因都众说纷纭。例如，有人认

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淋病引起的不孕不育造成的，因为当时没有治疗淋病的可靠药物，而且/或者与贵族联姻有关：贵族面临着家族责任的压力，不能凭个人意愿行事。这种压力全欧洲的贵族都有。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家族资源分散，家中的弟弟妹妹就不能结婚。

公开讨论政治是被禁止的，尤其不能与外国人谈论政治。数百年间，意大利一度在海外与内陆地区建起了一个帝国。它的中心就是总督宫。那里有总督公寓、会议室与大国会厅，如今珍藏着提埃波罗、丁托列托、提香、委罗内塞与其他艺术家的画作。

威尼斯曾因身为性事之都而闻名于世。在戏剧《无事生非》第一幕第一场中，莎士比亚说丘比特“把他所有的箭在威尼斯都放完了”。萨谢弗雷尔·斯蒂文斯曾写道，交际花们是“最擅旁敲侧击的。她们在整个基督教世界里最摄人心魄”。1706年，赫特福特伯爵阿尔杰农发现，威尼斯“美女如云”。

威尼斯根深蒂固的独立传统让它与其他权威冲突频仍。1606—1607年，教皇颁布了一项针对威尼斯的禁令。1618年，西班牙策划的一场夺取威尼斯的阴谋被粉碎了。1797年，拿破仑因威尼斯拒不支持自己对奥地利作战而怒火中烧。于是，他兑现了之前的诺言，即“我将成为威尼斯的匈奴王”。威尼斯永久性地失去了独立地位。威尼斯在经过了奥地利、法国，以及自1814年起奥地利的再次统治后，在1866年成了意大利的一部分。

游客与他们的先辈一样，仍然折服于威尼斯精美绝伦的宝藏与景观。由于威尼斯没有罗马与许多其他城市那种壮丽雄伟的景点，游客在威尼斯无法与古典时期的文明亲密交谈。16世纪的意大利文化产品繁复地装饰着这座中世纪城市。威尼斯让人耳目一新。它在许多方面都是一种独特的文明，尤其是在与受古罗马影响的古典巴洛克风格相比较时。1793年，当萨拉·边沁离开威尼斯时，她指出了一种其他游客也注意到的对比：“岁月静好，美丽的威尼斯城自海面升起。但

是，雄伟壮观的建筑物特别让人感觉不舒服。”

威尼斯的替代方案是的里雅斯特。如今，它是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大区的首府。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意大利军队占领前，该区的一部分仍属于奥地利，而且，的里雅斯特曾是奥地利在亚得里亚海的港口与重要中心。它并不仰仗意大利。1754年，维利尔斯子爵乔治、纽纳姆子爵乔治与威廉·怀特海德一道，自维也纳经格拉茨前往的里雅斯特。他们在的里雅斯特发现，“沿亚得里亚海海岸的道路跌宕起伏，崎岖多石的程度超乎想象”，直到进入威尼斯地界，路况才好转。

的里雅斯特长期以来都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国际大都会。它在成为意大利的小跟班后，遇到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因此，的里雅斯特不再是那个一度繁荣的城市了，也就与意大利北方其他城市拉开了距离。但是，的里雅斯特惯有的咖啡馆文化与饮食诉说着自己比大部分意大利城市更加有趣的近代历史。

第十四章　重新发现意大利：中部

罗马曾是许多游客的目的地。它是很多旅程的终点。不管是在现实中，还是在象征意义上，它都是人们向往的国外旅行胜地。

在伦巴第平原以南，对想要进入托斯卡纳或是前往更南端的地方，在东海岸与罗马之间移动的旅行者来说，亚平宁山脉长期以来都是个大难题。没有几条通道可以穿过亚平宁山脉，少数几条路线也被冬雪阻断。通常，人们穿过亚平宁山脉的路线是从博洛尼亚到佛罗伦萨。1792年，医生塞缪尔·德鲁抱怨道："亚平宁山脉让我觉得很不满。它是通往贫瘠沙丘的漫长缓坡……令人沮丧且毫无价值的不毛之地。"

佛罗伦萨

对18世纪的游客来说，佛罗伦萨是艺术的象征。事实上，1752年该地对威廉·李而言是"一个十分快活的地方。这里有人所能见到的各种美德。雕刻、绘画与艺术学科至臻至善"。当时，人们认为，意大利最重要的艺术圣地是乌菲兹美术馆，因为那里收藏着文艺复兴时期的宝藏。1756年，纽纳姆子爵乔治数度参观了这座美术馆。在人们看来，佛罗伦萨已婚妇女特别随性。安妮·米勒说道："女人通常都水性杨花，她们的开销不大。"当皮蒂宫外的"人民"大声疾呼"面包与工作"，哼唱着具有威胁性的歌曲时，或者当18世纪20年代，佛罗伦萨面对由重赋引发的危机实行军事戒严时，游客们往往不会注意到此类特征。

"私通"

"博尔盖塞皇妃（阿涅塞·科隆纳）心地如此善良，以至于她经常把他的双腿放在自己的腿上。这位经验丰富的情妇凭借她的这种驯驭术让他成为最风流倜傥的年轻人，因为他得以驰骋在这双玉腿之上。"第四代切斯特菲尔德伯爵菲利普深谙旅行对他的私生子斯坦霍普的价值。常驻佛罗伦萨的公使霍瑞斯·曼评论道，"英国旅行

者常常打破‘私通’的完美和谐”。“私通”是指已婚女士在男性伴侣，即“情夫”的陪同下参加社交聚会。这位男伴有时就是她的情人。这种体制给人们提供了确立符合当地习俗的恋爱关系的机会。1750年，后来成为第一世奇切斯特伯爵、来自斯坦默的托马斯·佩勒姆（1728—1805年）与已婚的阿卡奥利女伯爵私通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女伯爵又爱上了另一位英国情人。1748—1749年，她的已婚闺密玛丽亚·塞利斯特里与第二世罗金厄姆侯爵查尔斯有过一段情。1755年，第十世亨廷顿伯爵弗朗西斯（1729—1789年）因为是玛切萨·卡波尼的情夫而知名。她是“佛罗伦萨贵族之花，而且，据我所知，这是一朵淫荡之花”。“私通”让人觉得，当时意大利女性性欲相当旺盛。弗朗西斯·德雷克认为，私通是学习意大利语的方式。

佛罗伦萨的前身也许是伊特鲁里亚的一个村庄。据称，它是由尤利乌斯·恺撒建立的。佛罗伦萨长期以来都是相对较小的定居地。12世纪，它成了自治的自由镇。与此同时，佛罗伦萨也意识到，它有必要与附近历史更悠久的菲耶索莱在历史神话上一争高下。1434年，科西莫·德·美第奇掌权。他来自银行家世家，家族客户包括许多教皇。即便面对当地人的极力反对，科西莫·德·美第奇的继任者们也保持住了这种现状。但是，1497年，在严格刻板的多明我会修士吉罗拉莫·萨佛纳罗拉的影响下，佛罗伦萨陷落。不过，他号召人们悔罪的呼吁并未得到广泛认同。1498年，萨佛纳罗拉被处决。在一段共和制插曲后，美第奇家族卷土重来。他们的统治从1530年（自1549年起，他们居住在皮蒂宫）一直持续到1737年，直到这支绝嗣为止。

随后，托斯卡纳大公国被传给了洛林公爵弗兰茨·斯蒂芬。他的妻子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女继承人玛丽娅·特蕾莎。虽然当时现代化的意义不同于今日，但是他试图让托斯卡纳变得现代化。例如，1748年法令大力简化了丧葬仪式。这证明，许多政府决心控制宗教活动，限制宗教活动的开支。去世的贵族被放在棺罩上，尸体周围点着12支蜡烛，

置于教堂。相比之下，老百姓只能点6支蜡烛。那些连公民都不是的平民则被剥夺了举行葬礼的权利。他们下葬时，只能放上4个大烛台。教皇本笃十四（1740—1758年在位）谴责这项法令侵犯了教会权力。

1765—1790年，当弗兰茨·斯蒂芬的次子利奥波德作为大公爵期间，他让托斯卡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恺撒·贝卡里亚的观点特别具有影响力。贝卡里亚在他的《论犯罪与刑罚》（1764年）中，抨击了死刑与拷打。他强调预防的价值，呼吁量刑一致，以理性与实用主义的方式来实现公正。虽然在18世纪40年代修订托斯卡纳法典的提案被否决了，但那里还是出现了重要变化。托斯卡纳改革了法官任命，取缔了囚禁债务人的规定，开始公布判决书，并引入对量刑与审案的严格规定。1786年，死刑被取消，被告的申辩权也得到认可。

在拿破仑的插曲过后，1860年，新建立的意大利王国从哈布斯堡家族手中抢走了托斯卡纳。佛罗伦萨自1865年起成了托斯卡纳的首都，直到这个位置在1871年被罗马取代。

锡耶纳

在南边，锡耶纳是佛罗伦萨的主要竞争对手。由于锡耶纳具有哥特式韵味与佛罗伦萨文艺复兴风格，它与佛罗伦萨相比，存在着考古上的差异。锡耶纳最初也许是由伊特鲁里亚人建造的，后来发展成罗马城市。作为一个制造业中心，它在中世纪时繁荣起来。在中世纪，九人议会主宰着这座城市。在市政宫博物馆，安布罗焦·洛伦泽蒂的湿壁画系列《好政府与坏政府的讽喻》（约1338—1340年）纪念了九人议会所扮演的角色。这些湿壁画描绘了政府给城市环境带来的影响，与如今意大利的情况相关。但是，锡耶纳一再败于佛罗伦萨。根据1559年的一项裁决规定，它成了佛罗伦萨的属地：如今，锡耶纳人不再认可这项裁决的效力。“赛马节”（锦旗）上一系列的游行与赛

马，将中世纪传统带到现代。

比萨

比萨是在罗马统治下的重要港口。这个独立国家在中世纪时迎来繁荣。但是，1284年，比萨被热那亚人打败。佛罗伦萨在1406年吞并了比萨，这使情况恶化。1776年，约翰·米特福德写道，到达“衰败的比萨城……昔日用于容纳共和国凯旋的大帆船的建筑物，如今成了亲王的马厩。失去自由让这个昔日繁荣城市的人口从16万降至15000人左右”。

相比之下，中世纪比萨的富足与独立给这座城市留下了许多那个时期的惊世骇俗之作，尤其是始建于1064年的大教堂。那里收藏着比萨人前一年在巴勒莫不远处成功袭击一支阿拉伯舰队所俘获的许多战利品。大教堂主立面直到13世纪才竣工，椭圆形拱顶是在1380年增建的。1152年，比萨开始建造一座不同寻常的圆形洗礼堂。然而，由于地基不稳，洗礼堂旁始建于1173年的建筑成了比萨斜塔。比萨凭借其独特的比萨——罗马式建筑风格，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卢卡

伊特鲁里亚人创建的卢卡有着传统的轨迹。12世纪，它从罗马城镇变成了自治市。虽然它在1314年受到比萨控制，但自1370年起，卢卡在它那依然令人瞩目的城墙内重新获得并保持了自己的独立。1429年，卢卡还击退了佛罗伦萨的进攻。国家间的关系往往危机四伏。例如，1715年卢卡暴发的动物疾病导致佛罗伦萨军队关闭了两国边境，禁止牲畜商进入。1805年，拿破仑把卢卡送给了他的妹妹埃莉萨。希莱尔·贝洛克将卢卡描述成“世界上历史遗迹保存得最好的小镇”。古城周围的城墙依然保存良好，城墙上绿树成荫的小径美景怡

人。

古城反映出许多此类地方重复利用的特质。圆形竞技场是以罗马圆形竞技场命名的。人们可以看到，那里的部分结构曾被用作中世纪房屋的墙壁。罗马广场上建起了一座8世纪的教堂。反过来，它又被一座建于11—14世纪的罗马式教堂所取代。

前往罗马

许多游客在向南挺进时，觉得自己进入了另一个意大利。1788年，查尔斯·阿伯特评论道："群山变得粗糙、昏暗。褐色的土壤、石头很多，而且，低劣的橄榄树与果实稀少的葡萄藤让这地方看起来破败贫穷。"穿过坎帕尼亚（如今的拉齐奥大区）到达罗马的路线让许多人感到失望。阿伯特写道，"在抵达罗马的一扇扇大门前，一路上净是悲惨、贫瘠、多沙的乡村——人们几乎没有尝试农耕……一路上，我们连连慨叹乡村景象之凄惨。"对萨拉·边沁来说，城市"似乎坐落于沙漠之中"。阿伯特也注意到野生动物的变化，因为蜥蜴经常在墙上爬来爬去。此外，很多人还要越过一条边境线。边境线之外是一方迥然不同的天地：教皇国。由于特伦托采邑主教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所以它是意大利唯一的教会国家。但是，它是非常大的一个。

罗马

罗马曾是许多游客的目的地。它是很多旅程的终点。不管是在现实中，还是在象征意义上，它都是人们向往的国外旅行胜地。在古典文学占主导的文化中，罗马曾是人们的兴趣之所在。1784年，查尔斯·卡多根参观了罗马。他认为："一个人不能冲过罗马，就像他不可能飞过罗马一样。我在那里待了整整两周。即便如此，我也只有时间大

致了解一下那里从古至今数不清的奇观异景而已。结果我决定，在返回英格兰之前，我要在罗马待上两三个月。”

罗马主要的吸引力之一是，人们在罗马很容易受到熏陶。像巴黎一样，罗马有游人乐见的设施。但是，由于游客对罗马经济而言更加重要，他们对罗马比对巴黎起到了更大的作用。游客购买画作、古董，聘请古文物研究者，向他们寻求艺术建议。罗马作为世界艺术殖民地使游客很容易能接触到这个城市的奇珍异宝。罗马展示的珍品种类繁复，这增加了它对人们的吸引力。罗马有古典式、巴洛克风格的雕塑、建筑与画作。许多游客把它当作自己旅行的文化目的地。由于人们在艺术、文化领域的兴趣及审美的变化，罗马在艺术上经历了重建。18世纪初，人们认为贝尔尼尼的作品可与米开朗基罗及古典世界的艺术品相媲美。但是，18世纪下半叶，随着在罗马及其周边地区古典时期遗址发掘工作的进行，人们的审美情趣大变，贝尔尼尼作品的名气大不如前。

人们对古罗马的兴趣并没有让现代意大利声名大振。1764年，第二世帕尔姆斯顿子爵亨利·坦普尔评论道：“看到蛮族与偏执狂带来的浩劫实在让人悲痛万分。除去那些凭借自身结构坚固没被摧毁的，或是为满足个人私欲而改作他用的建筑物外，幸免于难的少之又少。”

罗马的本质是教会，其中包括它作为朝圣中心的身份。但是，罗马没给英国人（詹姆斯党居民及天主教游客除外）提供多少访问点。对他们来说，教廷活动也远不及其他世俗宫廷的有趣。罗马向人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世俗娱乐项目，包括狂欢节与年度烟花表演。烟花从旋转焰火（旋转轮）中发射出去，让人觉得圣彼得在泛着红光。

人们也能以罗马为大本营，开启探索周边乡村地区的旅程，尤其是前往古典时期的遗址。例如，沿亚壁古道观光或参观群山中美景如画的城镇，尤其是弗拉斯卡蒂与蒂沃利。蒂沃利反映了意大利不同时期的历史古迹。山巅之城是一处避暑胜地。罗马皇帝哈德良的夏宫

（哈德良离宫）就建在那里。哈德良让人在宫中仿照那些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国外建筑，造了一些亭台楼榭。1550年，费拉拉公爵阿方索一世的次子、即将成为教皇的富有的枢机主教伊波利托·埃斯特，把修道院改建成一座行宫，即埃斯特庄园。阿尔巴诺的火山口湖泊与阿尔巴诺群山间的内米湖，别具风味。在某种程度上，该区的吸引力源于克洛德·热莱画作的魅力。他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克洛德·勒·洛兰（1600—1682年）。泛着金光的蓝天碧水与金色的石头点亮了他的风景画。画作的主题永远都是美丽的乡村风光。相比之下，虽然伊特鲁里亚遗址有重要的公元前7—前6世纪墓地群可供参观，尤其是在切尔韦泰里与塔尔奎尼亚，但是当时与现在都很少有人到那里去。

不太具有吸引力的是，罗马一直以来都是国家权力中心。结果是，为了建立新政治秩序，罗马不得不经历周期性城市清理。墨索里尼为此负有很大责任，但他称不上是始作俑者。在他之前，自由党建起了通常唤作“婚礼蛋糕”的维克多·埃曼纽尔二世纪念堂。为了占据已有的天际线，这座建筑建得过大了，而且，建筑物使用了来自意大利北方地区的大理石，与当地的石头并不协调。正义宫也建得不成比例。

1934年，墨索里尼宣称：“继君主的罗马与教皇的罗马之后，如今的罗马是法西斯主义的罗马。它既古老又现代，当为举世所敬仰。”他想让罗马成为法西斯主义的阅兵场。为了建造诸如协和大道这样的新景观，城市遭受了巨大破坏。如今在罗马广为人知，同时也是最流行的一个会面地点依然是“领袖阳台下的威尼斯广场”，尤其是因为多条公交线路在那里停靠。

与墨索里尼的罗马不同，君主的罗马与教皇的罗马都存在了数百年之久。罗马帝国将自己的权力中心转移到了君士坦丁堡，却没能赶走“蛮族”。但是，教皇表明自己能接过罗马世俗社会的控制权。这种地位为教皇提供了在教会管理上独立于拜占庭的基础。不过，来自强大统治者的干预，时不时地阻碍了这个过程并导致可怕后果。1309—

1377年，教皇在阿维尼翁处于法国控制下。阿维尼翁当时是教皇在法国南部的领地。这种情况直到1417年，即后来的“东西教会大分裂”时才结束。教皇马丁五世等到1420年才回到罗马。他不得不重建大部分基础设施。16世纪初，由于宗教改革与1527年罗马惨遭野蛮洗劫，天主教世界永久性地失去了部分地区。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即将掀起新波澜。

城市本身经历了不同形式的疏于照管。19世纪，教廷没有解决洪灾与疟疾；自由党政权（正如在那不勒斯一样）为装点门面，把穷人赶出中心区域；法西斯主义也夸下海口，在推行新体制前，提出自己的社会主张。腐败问题开始出现，尤其是在营建许可证上的腐败和其他大多数问题上的腐败。与罗马帝国及教皇统治下的罗马一样，作为独立意大利首都的罗马也大兴土木。人口从1870年的20万以下，上升至1900年的近46万。新国家需要有庞大的官僚机构，而罗马就是它的中心。在墨索里尼统治下，仪式性建筑至关重要。尤其是为庆祝法西斯主义掌权20周年，并乘意大利获得罗马世界博览会（EUR）主办权之机，墨索里尼计划在罗马郊区建造一座新城。古典主义风格建筑居于中心位置，更具现代主义风格的楼宇为罗马世博会而建。然而，这个计划因墨索里尼梦碎而破产。此外，政府在旧住宅区修建了公共住房，为工人提供栖身之所。自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人们建造或重建了罗马大部分地区，尤其是随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郊区的仓促发展。在过去的20年间，罗马有了一些发展，但仍无法解决城市垃圾与不断产生的腐败问题。

第十五章　重新发现意大利：南部

诺顿·尼科尔斯说这座城市“夜晚如此美妙，白天又是那么燥热”，以至于人们晚上都不睡觉：“我跟月亮的关系比跟太阳的更好。”

那不勒斯

那不勒斯及其所在地区主导着意大利南方的历史与旅行者体验。据说，大约在公元前680年，一些来自希腊罗得岛的商人建立了这座城市。反过来，公元前474年，来自库迈的希腊人建立的那不勒斯成了定居地，结果罗马人在326年接管了这里。罗马城地下遗址范围大得惊人。

罗马衰亡后，那不勒斯成了公国，先是处于拜占庭的统治下，后来获得独立。1138年，它又被诺曼人占领。在霍亨斯陶芬王朝统治后，那不勒斯在1266年为安茹王朝所占，1442年被阿拉贡人攻克。后者导致那不勒斯处于西班牙的统治下。17世纪初，那不勒斯是西欧人口最多的城市。随着西班牙区的建立，那不勒斯面积不断扩大。

但是，那时候，意大利北方经济的发展、繁荣已与南方之间产生巨大鸿沟了。大约在公元1100年后，意大利北方经济有了显著发展，南方经济则相对衰退，威尼斯是在公元1282年后开始衰落的。人们对南方相对衰落的程度与年表存在争议，尤其是就西西里岛而言。但是，本土的那不勒斯王国在政治上一路狂跌。14世纪，在某种程度上，那不勒斯王国的经济也是这样。它日益成为北方的经济殖民地。北方商人控制了南方的贸易，南方也成了北方的原材料与粮食来源。诚然，梅佐乔诺问题的源头要回溯至后来的中世纪。问题在16世纪、17世纪及随后的时期愈加明显。

作为对异邦统治的反抗，无论是安茹王朝、阿拉贡人或者西班牙人的统治，公众仪式的出发点是增强凝聚力、构建共同体。公众仪式也是为了表明个人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正如1585年的饥饿骚动一样，这是为了取代严重分歧。守护神的数量上升，为他们举行的庆祝活动贯穿一年始终。建国神话也起了作用，尤其是为显示自己比罗马

存在时间更久。1647年，反对西班牙统治的马萨尼洛叛乱在次年被平定。

1707—1734年，那不勒斯演奏了一段奥地利统治的插曲。1713年、1717年与1720年，查理六世认可了那不勒斯的特权，且极少改变那不勒斯及意大利其他地方的行政机构，也没有限制各地的贵族特权。但是，战争将奥地利的统治推到了一边。1799年，那不勒斯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插曲；1806—1815年，它又遭遇了拿破仑带来的变故。但是，自1734年起，那不勒斯一直处于西班牙波旁家族一个庶系分支的统治下。此后，1860年，那不勒斯被攻克，在1861年被强行纳入新成立的意大利王国中。

自此之后，那不勒斯在政治、社会与经济上对意大利政府来说都是一个挑战。正如早在18世纪人们能够看到的那样，改革的倡议总是逡巡不前。1735年，改革法院的尝试失败了；18世纪40年代，试图编纂法律的措施也破产了。1777年，当政府颁布法令宣布削减对那不勒斯公民的橄榄油补贴时，一石激起千层浪，民怨骤起。当局担心引发暴乱，废止了这项法令。18世纪，因不愿出于政治原因提高城市税收或削减城市补贴，例如对那不勒斯的面包补贴，数届政府决定提高农村地区的税额。因为那不勒斯政府无法对地方海关办事处实行监督，结果导致腐败横行。当地利益主宰着地方海关办事处。政府在信息真空中运作。例如，由于汇报不可靠且自相矛盾，那不勒斯政府无法准确掌握本国森林情况。

18世纪，旅行者从以彼得罗·法布里斯与克洛德·约瑟夫·韦尔内为代表的画家手中，购买了许多风景画。画作描绘了沐浴在阳光下的海港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这些画作捕捉到了城市的魅力。它们让那不勒斯看起来比威尼斯更具动感，更加阳光灿烂。约翰·诺查尔在他的《游历意大利》（1766年）中提到，“一般游览那不勒斯的最佳时节是天气变热之前”。1772年7月，诺顿·尼科尔斯说这座城市“夜晚如此美妙，白天又是那么燥热”，以至于人们晚上都不睡觉：“我跟月亮的

关系比跟太阳的更好。”冬季时，游客觉得那不勒斯空气宜人。

但是，那不勒斯进步主义经济学家安东尼奥·吉诺维西对这座城市的看法相当负面。虽然他对1726年那不勒斯7万名持有许可证的妓女及6万名依法律规定可以生活在那里的妓女数量的估计也许有待商榷，但它凸显出城市作为服务中心的地位。1800年，在全世界人口超过30万的19座城市中，那不勒斯位列14，在欧洲排第4，仅次于伦敦、君士坦丁堡与巴黎。

那不勒斯魅力依然不减。漫步在这座城市，比徜徉于罗马街头更令人感觉轻松愉快。但是，现在的游客也许会注意到驻守在那里的军队努力维持秩序。有时，当地人会说，年轻人加入克莫拉犯罪组织，反映了当地的贫穷与失业问题。事实上，意大利政府对该区进行了大量投资。一个更加合理的解释是当地民风如此，比如人们喜欢开快车、闯红灯。

那不勒斯大区

那不勒斯的周边景点过去曾吸引大量游客，到今天依旧如此。维苏威火山曾是个好景点。这处自然奇迹靠近那不勒斯市。与其他火山相比，它曾是，现在依然是人们常常游览到的。1793年，帕尔姆斯顿子爵夫人玛丽见到一次火山喷发的景象：“火山不停地向外扔出烧得通红的石块，就像许多火箭弹烟花冒出的火星一样。”

那不勒斯以西的古典时期景点，尤其是索尔法塔拉火山、波佐处、波西利波、巴亚、米西诺湖、库迈与阿弗纳斯湖，长期以来都吸引着旅行者们的注意力。在18世纪上半叶，它们继续受人关注。尤其是，坎皮弗来格瑞火山因温泉、蒸汽流、硫黄气体、神秘洞穴与令人忧心的火山坑而被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充满异域风情。这些景观反映出它的火山起源。该区域自古典时期就以作为通往冥界（地狱）的

入口而闻名。1719年，威廉·曼德维尔伯爵发现，“人们行走在地壳上，而地壳往往不足一尺厚。我在好几个地方用剑刺穿地壳。不管在哪儿，都会有硫黄气体喷出。如果接触到这种气体，它烫得足以灼伤人的手足”。住在那不勒斯的维吉尔及其他古典时期作家的作品都被旅行者当作消息来源。

18世纪下半叶，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周边的考古发掘现场，尤其是赫库兰尼姆、庞贝与帕埃斯图姆。前两座城市被79年维苏威火山喷发的火山灰掩埋。但是，截止到1738年，赫库兰尼姆剧院已完全被发掘。1748年，意大利也开始了对庞贝古城的官方发掘工作。这些罗马遗迹的发现对欧洲品位的提升起到重要作用，部分原因是整个地中海地区大部分古典时期遗址的相对不可获得性。1741年，约瑟夫·斯宾塞在参观完赫库兰尼姆后写道：“我沿古城街道走了2英里[(1)]……几乎不得不一路匍匐爬过狭窄的通道……面前是两三个冒烟的火炬……这行程更适合骡子而不是人。”

位于阿马尔菲半岛以南的萨勒诺海湾上的帕埃斯图姆希腊遗址成了重要景点。它对塑造新古典时期的品位产生了深远影响。帕埃斯图姆是对波塞多尼亚的拉丁化。大约在公元前600年，来自卡拉布里亚锡巴里斯的殖民者建立了希腊殖民地波塞多尼亚。由于疟疾横行，在罗马人统治时期，这座城市被抛弃了。1746年，人们在修建一条穿过这座遗址的公路时，发现了多座神庙。帕埃斯图姆美丽的田园风光、吃草的牲畜与柏树及夹竹桃，让它看起来就像是画家笔下田园诗般的古典时期场景一般。第二世帕尔姆斯顿子爵亨利评论道：“除了我第一次看到罗马时的情形外，它们比我之前见过的所有景物都更能打动我……巴尔米拉、巴勒贝克或是一些被遗忘的地方令人震惊。”他说的这些地方都在中东。

虽然如今穷游观念盛行，限制了游客所能到达的地方，但是卡塞塔王宫依然是个好去处。外国游客去得并不多。1752年，路易吉·范维德里开始了对王宫的设计工作。这将成为那不勒斯的凡尔赛宫。它

有一系列惊人的喷泉与水池，最后是一个人造小瀑布。英国没有可与卡塞塔王宫相比拟的地方，凡尔赛的小瀑布也不能和这里的媲美。

继续向南

意大利本土的大部分地区在帕埃斯图姆以南。虽然近来阿普利亚的旅游业更受欢迎了，但是帕埃斯图姆以南的地区相对依然没有多少人关注。阿普利亚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廉价航班。该地区的旅游业根基稳固，但也由此导致海岸边冒出许多丑陋不堪的住宅区，就像卡拉布里亚一样。

极南端地区的景象尤为荒凉。与大部分意大利其他地区相比，那里的山脉更有名，平原则没有那么重要（阿普利亚除外）。森林覆盖率更低，夏天也更热。正如与多山但森林大多遭到砍伐的卡拉布里亚一样，极南端地区的自然美更显荒凉。与之相对的是当地饮食中辣椒的重要性。迪亚曼泰市还会举行一年一度的吃辣椒比赛，庆祝辣椒丰收。

农业就业人口相对较高，但产出的粮食没有多少盈余。农业严重依赖欧盟农业补贴提供的保护体系。地区发展规划兴建了工厂、修建了公路，尤其是太阳高速公路。但是，它们没能促进意大利南方巨大的发展，也没带来青年就业。诚然，意大利南方没有可与美国南方相比的与国家其他地区的协调发展。它的经济增长也比不上资源匮乏的日本。基于长期的模式，人口外移数量一直居高不下。这导致许多房屋与居住地的废弃。有时，为了吸引人们到那里生活，这些房屋都贱价出售。许多城镇看起来又脏又破，例如科森扎。

意大利统一后自由党的霸权统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北方的工业繁荣，以及1918年后一边倒地援助北方的贸易保护主义，都没有使南方受益。1950年，意大利政府用国家基金建立起来的卡萨德尔梅佐

乔诺（意为“南方基金”）创造的新就业机会少之又少，但却解决了短期的政治问题。南方相对人均收入（作为意大利整体人均收入的百分比）与北方的经济增长有关。事实上，它从1951年的70.14%下降到1969年的65.05%。20世纪60年代，全国工业就业岗位的百分比下降至15%。截止到1970年，意大利近半数的失业人口在南方。大型工厂是“沙漠中的大教堂”。它们虽然反映出投资的结果，也吸引了投资，但未能为南方经济带来多少效益。原因是区域经济联系不足，当地新增就业岗位极少。南方社会体制遭到重创，这导致有组织犯罪的长盛不衰。政治也经受了不小的打击。政坛往往腐败横行，没有成效。由意大利政府主导的卡萨德尔梅佐乔诺并不允许意大利南方享有现代化的自主权。

18世纪，在少数几位深入帕埃斯图姆以南地区的旅行者中，大多数人对古典时期的建筑与考古感兴趣。1715—1719年，乔治·贝克莱在参观阿普利亚时，为莱切城的巴洛克风格建筑所折服。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有许多重要的罗马遗迹。人们用弗朗切斯科·安东尼奥·辛巴洛（1567—1631年）及其子朱塞佩·辛巴洛（1620—1710年）所创作的大量富有想象力的巴洛克风格作品，翻新了整个莱切。这两位艺术家都是本地人。朱塞佩的作品包括省督宫、圣十字圣殿的立面与圣坛，以及大教堂的钟楼。

以意大利南方为故事背景的最成功的小说之一是《奥特兰托城堡：哥特小说》（1764年）。这部引人深思的推理小说的作者是霍勒斯·沃波尔。1740年，作为旅行的一部分，他游览了那不勒斯。但是，事实上，他并没去奥特兰托。1786年，当伊丽莎白·克雷文伯爵夫人送给沃波尔一幅奥特兰托城堡素描时，兴高采烈的沃波尔回答道：“我都不知道奥特兰托还有一座城堡。”这幅如今名为《阿拉贡的奥特兰托城堡》的画作是在之前一年由威利·雷维利所绘。11世纪教堂中的殉道者教堂向人们讲述着过往的阴森恐怖。教堂里有许多在1480年被土耳其人斩首的殉道者留下的头颅与遗骸。当时，土耳其人破城

后，杀害了那些拒不皈依伊斯兰教的人。这座教堂里还有一幅12世纪的马赛克画，描绘的是一株生命之树安稳地长在两头奇异大象的背上。

1781年，英国大使威廉·汉密尔顿爵士（他的妻子爱玛后来成了纳尔逊将军的情妇）提到，他在参观伊塞尔尼亚时，见证了遗存的普里阿普斯崇拜。这是来自过去的不同寻常的遗迹。妇女们将蜡制祭祀用男根献给当地圣人。汉密尔顿把它们带回伦敦，交给了大英博物馆。这些后来成了理查德·佩恩·奈特所作的《普里阿普斯崇拜谈话录：古代神学》（1786年）一书的卷首插图。

第十六章　重新发现意大利：诸多岛屿

许多岛屿在意大利海岸线上星罗棋布。

西西里岛

西西里岛是地中海上最大的岛屿，有着巨大的农业、商业潜力。但是，西西里岛一直以来都是历史的臣民，甚至是受害者，而非缔造者。这对它的社会、文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西西里岛就像一块画布，其他文化在上面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迹。例如，长期以来，人们都对西西里语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它到底是一种意大利语方言（这本身就是一种含糊的称谓）还是作为一种地方罗曼语，是自成一体的语言呢？前一种观点更加具有政治正确性，尤其是从意大利政府的角度来看，但后一种说法似乎更准确。

迦太基与希腊争夺西西里岛的城市，尤其是锡拉库扎。公元前734年，希腊城邦科林斯移民建立了锡拉库扎城。西西里岛先后被罗马、拜占庭、阿拉伯人与诺曼人占领，后来又成了德国霍亨斯陶芬王朝、安茹王朝与阿拉贡人（西班牙人）的领地。1535年，查理五世（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参观了西西里岛。第二个这么做的统治者是萨伏伊——皮埃蒙特的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他在1713年访问了西西里岛。在这一年，西西里岛处于萨伏伊王朝的短暂统治下，它在1718年时被西班牙占领了。

在那段短暂时期里，统治者维托里奥·阿梅迪奥试图进行吏治改革。他从都灵派遣官员前去协助总督安尼巴来·马菲伯爵贯彻他的政策。信息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下令统计西西里岛的桑树与橄榄树数量，试图逐步做好路桥登记工作。同时，他也想要限制人们携带武器，但成果甚微，而且，当地的精英阶层也没有怎么抵抗西班牙的进攻。

由于西班牙的孤立以及在1718—1720年战败，奥地利后来自1720年起开始统治西西里岛。这种情况直到1734年西西里岛被西班

牙波旁王朝占领时才结束。那里就成了那不勒斯国王卡洛七世，即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之子，新建立的独立王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在波旁王朝的统治下，君主权力提高。农民被迫使用贵族的磨坊与橄榄油压榨机，还不得与贵族竞争。征收面粉税在政治上没有遇到反对，因为它主要将重担压在了穷人肩上。贵族参与税赋的评估、征收，这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尽可能地降低自己的纳税义务。狩猎成了富人的标配。他们可以用鹰隼、猎犬，穷人却不能结网、设陷阱。直到18世纪60年代，西班牙语一直都是官方语言，在某种程度上直到19世纪时它还是官僚们使用的语言。1860年，加里波第从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手中夺走了西西里岛。

虽然意大利的许多地区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均摇摆于独立与半独立的状态之间，但是西西里岛在上一个千年里情况并非如此。这让岛内产生了紧张局势，尤其是巴勒莫与墨西拿这两座城市间长期的竞争关系。

正如本书一再说明的那样，西西里岛因治理不当付出了代价，尤其是在过去的200年间。对外部世界而言，西西里岛最为人所知的要数黑手党了。这既公平又不公平。因为，绝大多数的西西里岛人一点都没参与到黑手党的勾当中。但是，所有人都受到了残酷腐败，以及它带来或导致的痼疾的影响。正如巴勒莫的郊区一样，这种痼疾体现在非法、不充分、滞后或是不存在的发展之中。勒索保护费的组织给经济造成沉重负担。即便如今暴力问题不像过去那么突出，腐败依然难以消除。

对游客来说，去西西里岛旅行一直是件冒险的事。由于西西里岛距离遥远，半开化的名声在外，去岛上参观的游客相对较少。1747年，墨西拿暴发瘟疫。它是西欧最后一个暴发瘟疫的城市。人们可以在巴勒莫与蒙雷阿莱的大教堂里，在巴勒莫的海军元帅圣母教堂中，感受到西西里岛惊人的阿拉伯——诺曼风格。虽然这种风格直到19世纪才引起人们的兴趣，但如今已深受大众喜爱。

1785年，詹姆士·霍尔男爵在前往西西里岛途中，“因风暴而停留”在斯特龙博利岛长达一周。其实，人们可以从那不勒斯或罗马乘船前往西西里岛。1764年，第二世帕尔姆斯顿子爵亨利决定不去那里，因为“很可能我会因为晕船而游兴大减”。1788年，当托马斯·沃特金斯在旅行中穿过西西里岛时，吃了一块他迄今为止见过的“最白的面包”。他还写道，就鸽子而言，“这个国家的比我以前吃过的要好太多，以至于它们看起来是种不同的鸟。它们像松鸡一样大，如食米鸟一样肥。它们是如此美味。要是我们英国的美食家吃到了这等珍馐，他们一定会暴食至死”。他写到了锡拉库扎，“这座城市的周边地区盛产13种麝香葡萄酒佳酿；我们日日都要品尝”。有些游客环岛航行。最受人欢迎的目的地是埃特纳火山，随后是希腊神庙。对锡拉库扎剧院的首批挖掘工作始于1756年。人们在1781年修复了神庙，在1787—1788年修复了引人注目的朱诺神庙与协和神殿。

在西西里岛旅行并非易事。1792年，查尔斯·布鲁斯伯爵与托马斯·布兰德觉得，巴勒莫人“极其热情好客”，但他们对西西里的路况与城外的住宿条件印象平平：“整个国家没有一个车轮。路是仅能供一头骡子通行的小道，散落四周的少数几间小屋就像科伊科伊人的村庄一样糟糕。”布兰德写道，通往塞杰斯塔的路，“崎岖不平，不是悬崖峭壁就是泥浆”。1785年，查尔斯·卡多根周游全岛并登上埃特纳火山。他在雪地里走了13千米后，在黎明时抵达火山口。

撒丁岛

撒丁岛长期以来都有人居住，最终生活在青铜时代的努拉格族人来到了这里。自公元前9世纪起，随着迦太基人的武力接管，撒丁岛处于腓尼基人的统治之下。第一次布匿战争后，罗马人在公元前237年控制了撒丁岛。撒丁岛的独立王国在中世纪抵抗住了比萨与热那亚的进攻。尽管付出了巨大努力，阿拉贡人还是在14世纪平定了撒丁人的反抗。西班牙当时掌握着控制权，直到1708年撒丁岛被奥地利人攻

克为止。自1708年起，撒丁岛处于奥地利的短暂统治下；接着，自1717年起，西班牙再度主宰着撒丁岛；自1720年起，萨伏伊王朝统治着撒丁岛。这对西西里岛来说是场不受欢迎的交换。1759—1773年，为将撒丁岛并入萨伏伊——皮埃蒙特，岛上的法庭与行政部门都重组了。几项封建管辖权受到压制，宗教教团的独立地位变得有限。为了让官员学会地方行政管理，卡利亚里与萨萨里的大学彻底改变了教学课程。

撒丁岛从未出现过像1768年反对法国兼并时，从英国吹向科西嘉岛的短暂抵抗风尚。撒丁岛也没有重要的古典时期遗址。1708年，在攻占撒丁岛的战役中，英国军舰从旁协助。但是，随后它基本上就被人遗忘了。撒丁岛也面临着严重的疟疾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起，撒丁岛一直以来都是海滨度假的主要目的地之一。

岛上大部分内陆地区都很值得一游，尤其是因为它与人们常去游览的意大利景点大不相同。沿着努拉吉前进，就撒丁岛唯一一处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古迹巴鲁米尼的努拉吉而言，人们可以依次看到腓尼基人、迦太基人与罗马人，尤其是诺拉与塔罗斯的聚居地。说到中世纪城镇，阿尔盖罗为人们提供了中世纪历史的大量证明。撒丁岛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这里汇聚了各种文化的影响。不过，这种融合不同于西西里岛。因此，加泰罗尼亚——哥特式风格在阿尔盖罗显而易见。

埃奥利群岛

许多岛屿在意大利海岸线上星罗棋布。有些是著名景点，例如卡普里岛与穆拉诺岛；有些则不那么有名。所有有人居住的岛屿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与如今的观点迥然不同的、过去的思潮在群岛上尤为明显，尤其是在西西里岛以北的埃奥利群岛上。群岛中最重要的是利帕里岛。公元前4世纪时，就有人在那里定居了。利帕里岛考古博

物馆陈列的失事船只货物，凸显了古典世界贸易的重要性。除大量的双耳细颈瓶外，人们还能看到自新石器时代起惊人的陆上发掘物。

咖啡文化

由于意大利连锁店、咖啡师与重要术语的存在，意大利以外地区的咖啡文化或多或少也是由意大利范式所决定的。浓咖啡、芮斯崔朵、大杯咖啡、玛琪雅朵、卡布奇诺与拿铁均来自意大利。意大利有着悠久的咖啡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这与它的地理位置有关。咖啡最早来自更东边的地方，来自伊斯兰世界，尤其是从也门及其港口穆哈港出口到地中海地区的咖啡。有证据表明，咖啡文化在16世纪时就存在于威尼斯了。17世纪，随着西印度群岛新生产咖啡的出现，运往欧洲的咖啡数量增加，咖啡文化也得到了发展。18世纪，巴西也开始大批量生产咖啡，由此导致咖啡价格骤降。此外，意大利没有与英国相媲美的茶文化。浓咖啡技术始于19世纪。1948年，加吉亚生产的商业咖啡机使制作浓咖啡的过程更加快捷，从而带来了现代性的一面。意大利人喜欢的咖啡与美国人的不同，前者采用的是深度烘焙的做法。1943—1945年，美国士兵为了能喝到更合自己胃口的咖啡，用开水把浓咖啡稀释了。如今，意大利每杯咖啡的含量往往低于英式浓咖啡，人们使用的杯子与度量器具也比英国和美国的小。

结语　意大利往何处去

意大利下辖诸岛的数量曾经比现在要多得多。出于历史原因，意大利失去了包括塞浦路斯（1570—1571年）、克里特（1669年）、科西嘉（1768年）、爱奥尼亚群岛（1797年）、马耳他（1798年）与罗德岛（1943年）在内的许多岛屿。这提醒人们注意，意大利并没有一条固定的边界。这一点极易被忽视。对许多人来说，1919年当阜姆被占领时，意大利复兴运动看起来变得滑稽可笑。此外，它与帝国主义有相通之处。人们看出了意大利想要称霸地中海，尤其是东地中海地区的野心。意大利的帝国主义不仅剑指其他帝国主义列强——英国与法国，还针对希腊、南斯拉夫与阿拉伯世界。

这些论点相当有分量，但的里雅斯特与特伦托成为意大利的一部分，也有运气与偶然性的成分。不过，科西嘉、尼斯与罗德岛的情况并非如此。尤其是，如果意大利在上一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的话，它将因此发生多么大的变化啊！想想都很有趣。因此，西班牙直到1976年才失去西属撒哈拉，它至今还拥有休达与梅利利亚。同时，葡萄牙依然保有佛得角群岛。

这件事与许多其他事一道，提醒人们注意，意大利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被预先决定的。但是，这个结论并不适用于后来的政权与意识形态。与这种令人不快的情况相关的是，人们用过去来声明未来的必然性。每个国家都有这种构建的历史。那些为纪念过去与现在，并引领着未来的建筑物就是实实在在构建的历史。但是，这些构建的历史在意大利似乎显得更加迫切。因为意大利的独立国家地位长期以来并不存在，或者说是岌岌可危，而且，意大利人民也是四分五裂的。与之相关的是，人们并不清楚民族与国家走了多远、应该走多远。在某种程度上，这反映出意大利想要赢得人们对统一的支持。但是，意大利过去帝国主义的抱负，事实上是普救主义志向的影响，也

起了作用。帝国主义的罗马与教皇最明确地表明了这种雄心壮志。统一后，意大利自由党政府及其法西斯主义继任者也有着强烈的帝国主义野心。

自1943年墨索里尼被推翻后，意大利一直在苦苦寻找着一个有意义且能解决国家严重分歧的角色。1943年组建的新政府与反抗运动均依赖于同盟国，而且二者都是四分五裂的。经济增长是战后第一剂万能药，它渐渐变成了欧洲的联合。与此同时，许多意大利人开始选择相信其他替代方案，但这些方案并未能成功应对挑战，例如，糟糕的贝卢斯科尼的意大利力量党。如今，希望破灭让人们对政治乃至国家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厌倦，因此选择回归到家人与朋友之中。意大利人的境遇不应如此，但鲜有迹象表明他们能得到自己应得的。回到拿破仑时代之前的小国状态，也许也是一种选择，但这种观点没有得到多少支持，而且，就算能实现，其过程也难以把握。

(1) 约合3.2千米。——编者注



未读 Club

为读者提供有温度、有质量、有趣味的
泛阅读服务



专属社群 独家福利
精品共读 活动特权

手机扫码
加入未读 Club 会员计划

未讀

都想生

世界中

版权信息

无论如何都想告诉你的世界史

HITO NI HANASHITAKUNARU SEKAI-SHI

作者：[日] 玉木俊明（TAMAKI Toshiaki）

译者：凌文桦

出品方：未读·思想家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目录

版权信息
卷首语
1　亚历山大大帝为什么没能跨过印度河
曾是“蛮族”的马其顿
远征波斯是父子二人的夙愿
美索不达米亚与印度之间的交易
法老面具上光彩夺目的青金石
“铁之帝国”亚述统治了东方
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波斯的“王之道”
亚历山大大帝留下的遗产
2　维京海盗曾经如何进行交易
是掠夺，还是交易
称霸欧洲大陆的可能性有多大
推翻“地中海中心史观”
贸易的中心是阿拔斯王朝
汉萨同盟是维京人的继承者
3　非洲的黄金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吗
“大航海时代”是日本特有的说法
撒哈拉沙漠和汉尼拔大象军团
马里帝国的黄金传说
晕船的航海家——亨利王子
让穆斯林商人带路的瓦斯科·达·伽马
假设：“从西非到新大陆”
大航海时代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4　亚洲贸易圈如何帮助织田信长夺取天下
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日本的战国时代
穆斯林商人席卷亚洲海域
作为军火商的耶稣会
织田信长舍弃了耶稣会
5　古登堡革命如何改变了商业世界
“古登堡革命”是什么
只有新教地区的经济增长了吗
15世纪的信息革命
商人创造了“标准语”
“经商指南革命”的作用

欧洲的商业习惯成了世界通用标准
6 葡萄牙和西班牙如何成为强国
如今被称为“欧盟的累赘”的葡萄牙和西班牙
将世界一分为二的条约
葡萄牙：商人的帝国
腓力二世的时代
太平洋贸易的开拓者
鸦片和奴隶成了世界商品
7 数学家费马如何奠定了保险的基础
概率论与现代社会
改变历史的一封信
古代的保险和中世纪的保险
汉萨同盟的合理的风险对冲
近代企业的诞生
哈雷彗星和人寿保险
从咖啡馆到世界保险业巨头
8 大英帝国因为擅长借钱而兴盛吗
国家的借款越少越好吗
深陷战争、财政困难的欧洲
英国的消费税和法国的土地税
决定胜负的泡沫事件
胜利的关键在于筹措战争费用的能力
9 棉花如何见证了亚洲与欧洲的大逆转
改变历史的商品
不断扩张的印度棉织品市场
欧洲人想要的印花布
难以超越的印度
全球性的生产体系
10 为什么“保持中立”让美国成了世界大国
不可思议地兼顾战争和贸易
中立城市汉堡的辉煌
拿破仑战争中的商人
作为中立国的美利坚合众国
从贸易角度看门罗主义
靠战争发财致富的中立国
11 蒸汽轮船中的世界史——马可为什么要去布宜诺斯艾利斯
“我们移民支持你！”
从帆船到蒸汽轮船的巨大变革
越来越大的港口
蒸汽轮船让世界成为一体

逐渐缩小的世界
被归为“非正式帝国”的拉丁美洲
12　强制收取手续费的国家如何控制了世界
成为“霸权国家”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
赚不到钱的工业革命
比人和物流都更快
为什么靠手续费能赚钱
世界史中的电信网络
返回总目录

卷首语

文春新书的总编曾经对我说过这么一句话：“你知道吗？所谓的历史呀，就是在居酒屋里一边喝酒一边讲给别人，让别人听了陷入沉思的事。”以这话为契机，我开始执笔写作此书。

本书的编辑前岛笃志先生给我发了一封邮件，邮件内写着：“请您务必写一本这样的书。”这是2017年10月的事。

说实话，要写这么一本书，真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我觉得任重而道远。可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如果自己能够成功地写出这么一本让编辑、总编和读者都满意的书，那该是何等的荣幸与满足呀。因此我接受了这个提议。

历史原本就应该十分有趣。之所以会变得索然无味，不如说是历史学家的缘故。历史学家为了忠于历史事实，必须尽可能地还原最真实的历史。这才是作为历史学者的最佳道路。

对历史学家来说，对事实的探究，也就是所谓的实况调查，才是最重要的工作。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不过这究竟好不好呢？历史学家并不考虑历史发展的故事性，几乎不在意如何撰写更有趣的历史，因为他们只在意如何更有说服力。我觉得历史学家的这种态度，便是历史会变得如此枯燥乏味、令人提不起兴趣的原因之一。

真正的历史学家，应该对历史事实加以解释，我们可以认为，这是赋予事实以生命。叙述能使历史事实更加生动形象，历史学家把这种叙述称为历史叙述。所谓有趣的历史，就是因为有了优秀的历史叙述，才变得多姿多彩。

我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写了本书。

本书由12个章节组成，从古代讲到了现代，从亚历山大大帝时代讲到了电信网络，横跨了很多个年代。本书还有关于海盗的叙述，恐怕这一部分与读者预想的有着极大出入，会备受期待。在关于保险的章节里，都是浅显易懂的知识，讲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保险是如何

发展而来的。在关于英国的巨额借款的章节里，我们多多少少能看到当时的英国与现代日本的相似之处。

意大利历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说过："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我们如今能看到的史料，实际上很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变化了。历史学家如果仅仅收集已有的史料，而无法获得新的史料，那么不久之后就会失业。

历史学家如果不想失业，就必须对史料做出新的解释。随着时代变迁，历史学家可以从新的视角出发，对史料做出解释。这就是贝奈戴托·克罗齐所说的"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这句话的含义。话说回来，如果历史学是一门尚不完善的学问的话，就会不断出现新的问题，历史学也就成了一门研究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学问。历史学家可以说是以此为职业的人吧。

当今的历史学，与其说是国家的历史，不如说更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消息。也就是说，相比于"硬件"，有更重视"软件"的倾向。在本书里，我尽可能地使用这样的历史研究成果，为读者呈现不同以往的历史影像。

至于成功与否，当然不是我说了算，而是靠每一位读者来评判。无论哪一种作品，一旦离开作者之手，便有了独立的生命，留给读者评判。本书也不例外。

在某种意义上，对作者来说，作品就像自己的孩子。但不同的是，作品一旦离开了作者，就成了独立的个体，把创造它的父母抛在身后，而完全属于读者。作为作者，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才行。

就像开头所写的那样，本书以"把历史生动有趣地讲给别人听"为目标写成。我希望每一位读者都能把本书的内容讲给身边的人听。

在此感谢给我机会撰写本书的文春新书总编，还有担任本书编辑的前岛先生。尤其是前岛先生，为了让本书生动有趣，他花费了很多心血。如果本书真的很有趣，那都是他的功劳。

唯有一点让我心有不安——我不喝酒，也不去居酒屋，因此，怎样在居酒屋里高谈阔论，只能凭空想象了。

2018年3月 于大阪某咖啡网吧

1

亚历山大大帝为什么没能跨过印度河

曾是“蛮族”的马其顿

众所周知，古希腊人自称“希伦人”，并且瞧不起其他民族，把他们都视为“蛮族”。养育了亚历山大大帝（前356—前323；前336—前323在位）的马其顿，并不属于希腊。因此那里的人不是希伦人，而被视为蛮族。马其顿不在希腊城邦的中心，不过是周边区域，为什么竟能把版图扩张到遥远的印度河呢？

纵观马其顿王国的扩张过程便会发现，马其顿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这些古代文明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三个古代文明，经过长时间的往来，形成了一个贸易圈。这个贸易圈便是贸易的通道，也可以说是解读亚历山大大帝远征的关键所在。这也是一个关于漫长的人类史的故事。

远征波斯是父子二人的夙愿

马其顿王国的兴盛始自亚历山大大帝之父腓力二世（前359—前336在位）时期。在这个时期，以雅典、斯巴达、底比斯等为代表的古希腊城邦迎来了穷途末路。腓力二世在喀罗尼亚战役（前338）中大胜雅典-底比斯联军，奠定了其在希腊世界的支配者地位。

马其顿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统治体系，都与其他希腊城邦不同。马其顿人原本生活在希腊北部山岳地带，后来在平原地带拓展疆土，在平原地带和山岳地带之间，随着季节的变化过着游牧生活。后人在公元前6世纪后半期的富人墓穴中发现了大量黄金制品，由此可以推断，那时的马其顿已经是极为繁荣富足的城邦了。

众所周知，古希腊并未形成大型的统一国家，而是形成了数量过千的诸多城邦。而且，各个城邦又以自己为据点，在地中海地区建立了殖民城邦。可以说，城邦的统治体系便是控制诸多的“点”。

与之相反，腓力二世的马其顿王国，采用了与这些城邦完全不同的统治体系。马其顿王国用“面”来控制领土。腓力二世在征服的地区大肆开垦农田，以粮养兵，并且大规模地组织常备军，从而进一步扩大领土。马其顿王国就是以这种“领域国家”的方式来进行统治的。

然而，在腓力二世面前有一个最大的“敌人”，那就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波斯。

在历史教科书中，写着“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波战争中，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最终战胜了波斯”。但这并不能完全确定。《卡里阿斯和约》（前449）中记载了最终希腊一方获胜，但是该和约是否真的存在，目前尚有争议。

更重要的是如何给希波战争定性。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波斯是统一古代东方世界的大帝国，其经济实力远比当时的希腊更强大。

对希腊一方来说，与强大的波斯帝国的战争，完全是生死之战。可对波斯帝国来说，这场战争不过是在西方的一场小小的竞赛而已。波斯帝国极有可能压根儿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大战。事实上，无论希波战争的结果如何，都不会削弱波斯帝国的实力。这种情况，用元日战争打个比方，或许大家更容易理解吧。对日本来说，与元朝这样的庞大帝国作战，完全是赌上了整个国家命运的战争，然而对元朝那样一个身经百战的庞大帝国来说，这不过是诸多战争中的一次小战役罢了。



示意图1　腓力二世被暗杀后的希腊

进一步说，希波战争之后，波斯为希腊城邦提供了军费等，并且对其中较为强大的城邦进行策反，促使它们反叛。最终结果是，在希腊，城邦之间战争不断。总之，波斯帝国的介入，是希腊世界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腓力二世决心讨伐波斯帝国。

为了能够早日成为腓力二世的合格继承者，亚历山大学习了很多知识，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就是他的家庭教师。公元前336年，腓力二世被暗杀，作为儿子的亚历山大在二十岁时成了马其顿国王。

这样看来，亚历山大大帝远征波斯，也有实现其父腓力二世的愿望的因素。然而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战范围远比其父所想的更宏大，庞大的帝国在他的手中逐渐形成。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可以认为，这与东方兴起的古代文明有着密切的联系。

美索不达米亚与印度之间的交易

我们目前认为，人类约700万年前出现在非洲，然后离开非洲，走向世界的各个角落。我们还知道，智人有过两次“离开非洲”的行动，一次在约15万年至10万年前，另一次在约7万年至5万年前。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大规模迁徙。

离开非洲后，人类逐渐从居无定所的狩猎采集生活，转变为定居的农耕生活。一般认为，人类最早开始农耕生活的地方，就在美索不达米亚。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形成了乌尔、乌鲁克、拉格什等城邦，还建造了被称为“庙塔”的阶梯状金字塔。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区域是一片冲积平原，积雪融化带来了定期的水位上涨，人们通过修建运河，获得了富足的农业产出。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王权十分强大，水利灌溉也很发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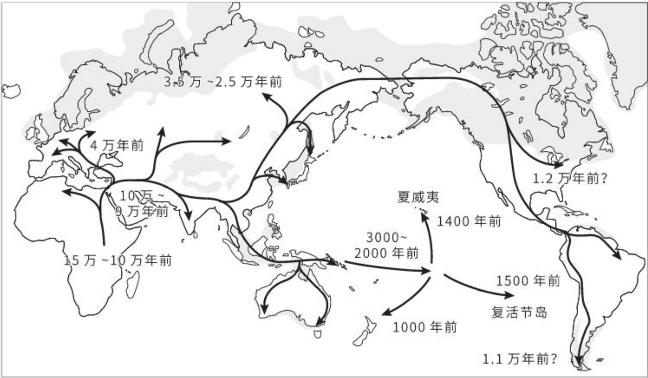


示意图2　人类离开非洲的路线图

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出土了数十万枚泥板文书，根据上面的记载，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小麦的收获量是播种量的数十倍之多。也就是说，一粒小麦播种下去，可以收获数十倍的产量，和日本相比的话，可以与江户时代的大米收获率相媲美，甚至更多。这样的收获量令人难以置信，农业确实孕育了繁荣的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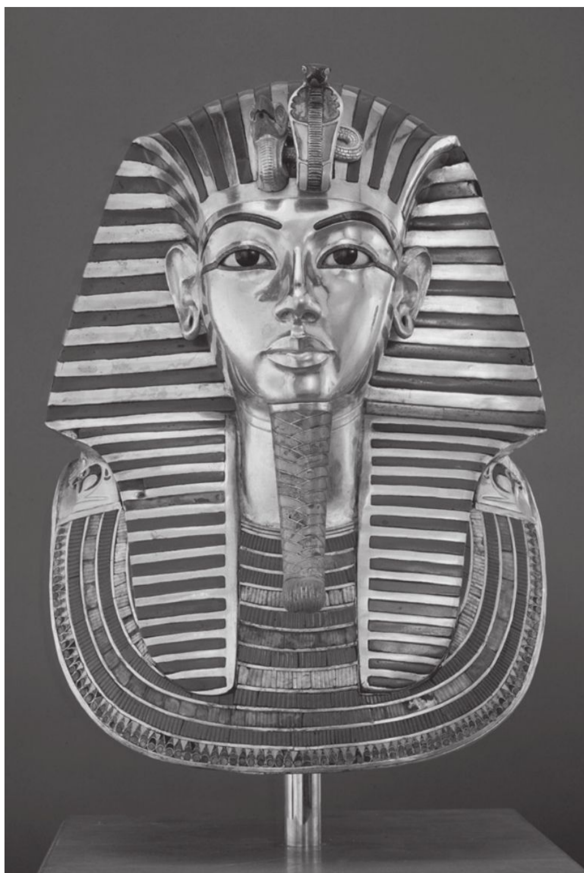
除此之外，人们还在印度的印度河流域发现了哈拉帕、摩亨佐达罗等古代城市的遗迹。印度河文明在约公元前2600年出现，而农耕活动在约公元前7000年就开始了。

通过现代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印度河文明之间存在贸易往来。例如，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遗迹中发现了由古代印度河地区制造的被称为“青金石”的宝石，还发现了印度河文明式样的印章。

这两个文明通过海上通道和陆上通道相互联结。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约公元前2350年的碑文中有这样一段内容：“梅鲁哈的船停靠在码头上了。”这里所说的“梅鲁哈”，指的就是印度河地区。此外，在印度还发现了洛塔尔等多处与阿拉伯海有联系的遗迹，这些地方可能就是当时的海上贸易枢纽。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印度河文明，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文明，但如果充分利用波斯湾和阿拉伯海，这两者之间有贸易往来是完全可能的。

法老面具上光彩夺目的青金石

在诸多古代文明中，最广为人知的应该是古埃及文明吧。古埃及的图坦卡蒙法老，是大概公元前1333年至前1324年的法老，以他的黄金面具和位于“帝王谷”的墓穴而闻名于世。在图坦卡蒙法老的黄金面具上，蓝色部分镶嵌的是青金石。在古埃及，人们把青金石视为天空之石、冥神奥西里斯之石，但实际上那里并不盛产青金石。那么，这些青金石究竟从何而来呢？毫无疑问，应该是从印度河地区进口而来。也就是说，不仅是美索不达米亚，就连古埃及也和印度河文明有贸易往来。人类即便有了固定住所，开始了农耕生活，也未必就会停止向其他地区行进的步伐。



图坦卡蒙法老的黄金面具（来源：Brdgeman Images/Afro）

我们可以把古埃及以东的古代文明世界统称为“古代东方世界”，人类的足迹一直拓展到了印度河流域，通过海上和陆上两种通道，形成了交流与贸易往来。而亚历山大大帝要征服的，便是这古代东方世界。从图坦卡蒙法老死去，到亚历山大大帝出现，经过了约1000年，在此期间，古代东方世界之间的交流变得越发密切。后来，因为出现了统一的帝国，这一地区变得更加强大了。

“铁之帝国”亚述统治了东方

古埃及王朝的兴起大约是在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古埃及王朝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古王朝时期（大约在公元前2686—前2185）、中王朝时期（大约在公元前2040—前1700）和新王朝时期（大约在公元前1570—前1070）。后来，古埃及国势渐衰，在公元

前30年，托勒密王朝被古罗马军队打败。古埃及王朝持续了3000年之久。

古埃及（新王朝时期）的衰弱，给东方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混乱。而统一了东方世界的正是亚述帝国。

所谓的亚述，指的是现在的伊拉克北部地区。亚述人在那里建立了城邦，独占了伊朗高原的锡矿交易，靠着贸易往来，逐渐繁荣昌盛。不过，在公元前15世纪左右，亚述人隶属于胡里安人的米坦尼王国，这个王国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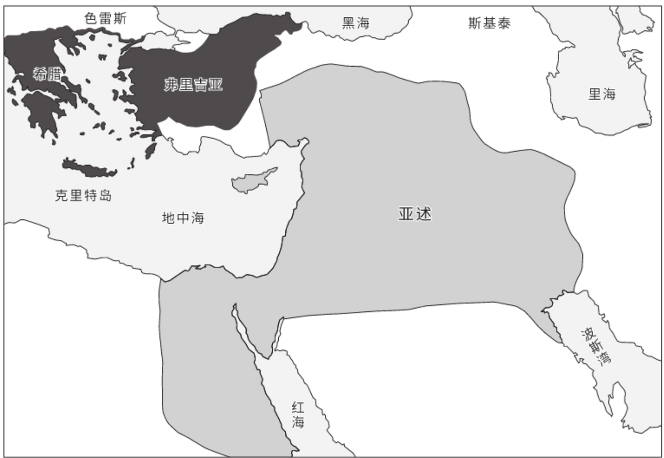


示意图3　亚述的最大版图

亚述人凭借铁器的力量，在东方世界兴起。他们继承了来自赫梯的铁器制造技术，进而控制了铁矿石产地亚美尼亚，渐渐成了一个强大凶悍的王国。亚述人在公元前9世纪有了铁质战车和骑兵队，在公元前8世纪末，逐渐吞并了叙利亚、腓尼基、巴比伦，使以色列王国灭亡。后来，他们在公元前663年征服了古埃及，史上首次统一了从美索不达米亚到古埃及的东方世界。

由此，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得到了统一。由于这两个文明本来就在相邻区域，以贸易为首的各种交流十分活跃，政治上的统一也由此得以实现。

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波斯的“王之道”

上面所说的亚述帝国，在公元前612年，遭到了新巴比伦王国

（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和米底亚王国（位于伊朗高原西北部）的联合攻击，最终灭亡。就这样，东方世界分裂成了新巴比伦、米底亚、古埃及和小亚细亚的吕底亚。而将它们再次统一起来的，就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波斯。

米底亚隶属于阿契美尼德家族。公元前550年，居鲁士二世创建了阿契美尼德王朝。他还毁灭了新巴比伦，解放了沦为“巴比伦囚虏”的犹太人。后来，在大流士一世（前522—前486在位）时期，波斯的统治区域从古埃及一直扩展到了印度河流域。



示意图4　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波斯的领土

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波斯在帝国内建成了道路网，这被称为“王之道”。后人推测，这个道路网应该是以从古埃及到美索不达米亚、再到印度河地区的东方通商之路为基础建成的。这样的推测较为妥当。

这条通商之路应该也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之路。本来仅仅属于少数商人的通商之路，却成了亚历山大大帝统率的大规模军队的通行之路。

亚历山大大帝留下的遗产

这样看来，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虽然是他本人完成的事业，但发展到这一步需要前期的漫长积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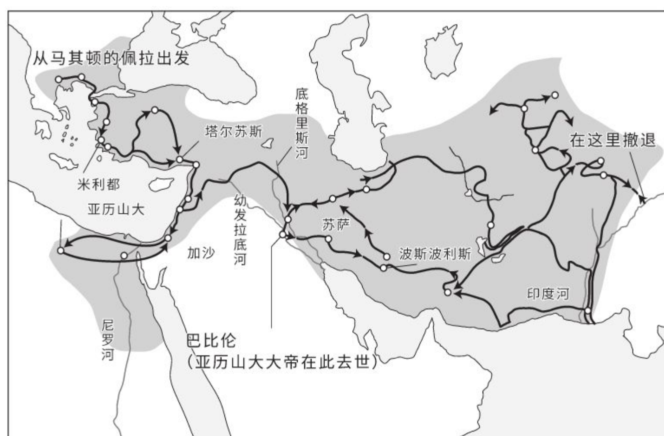


示意图5　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路线

马其顿属于希腊世界中的例外，有着向外扩张的愿望，因此，马其顿在城邦衰退时期逐渐兴起，成为希腊世界的统治者。后来，马其顿又向宿敌波斯挑战，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很重要的一点是，亚历山大大帝能够快速进攻，得益于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波斯以通往印度河地区的东方通商之路为基础而修建的道路网。我们还可以看到，马其顿军队一直行进到了印度河，但是放弃了继续向东远征，大概是发生了什么让他们不得不回头的事情吧（见示意图5）。战争持续了10年，军队疲惫不堪，我想大部分士兵也都不希望再战斗下去，甚至有了厌战情绪。但最本质的原因，如前面所说，应该是抵达印度河流域的东方世界贸易圈之后，通向前方的道路尚未建成。即使从印度自身的历史来看，能统一印度地区的王朝也不多。

以前有观点认为，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推动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催生了希腊化时代。的确，亚历山大大帝的扩张促进了人口、物资的流动，但“优秀的古希腊文明对东方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样的观念现在已被否定。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前，东西方之间的文化、经济交流就已经存在，甚至可以说，正是这样的交流让亚历山大大帝的伟业成为可能。而且，东西方的关系并非“先进的古希腊影响了落后的东方”（事实上，当时东方的物产比古希腊更丰富），而是互通有无的平等交易关系。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辞世。此后，他的帝国分裂为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叙利亚的塞琉西王朝和马其顿的安提哥那王朝。即使亚历山大大帝没有英年早逝，他恐怕也不可能长期统治这样广阔的领

土。在很久以后，阿拔斯王朝（750—1258）才实现了中亚地区的统一。

2

维京海盗
曾经如何进行交易

是掠夺，还是交易

请看示意图1。在8世纪到12世纪的欧洲海域，以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为根据地的维京人来势汹汹。在各种各样的小说和电影中，维京人留给我们的印象是不断掠夺的海盗。

根据记载，维京人确实在各地有掠夺行为。然而事实不止如此。维京人与西欧乃至拜占庭帝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商人进行交易，作为大航海者，在新大陆留下足迹，他们是将世界连接起来的商人。

在历史上，本来就很难明确地区分掠夺和交易。对于某种商品，卖家和买家所考虑的价格经常有分歧。在过去，即使卖家和买家拥有同样的权利，让双方都满意的情况也几乎没有。如果买方处于强势地位（如拥有武装、拥有政治权力等），以比卖家预想的更低的价格半强迫性地买取，这既可以说是商业行为，也可以说是掠夺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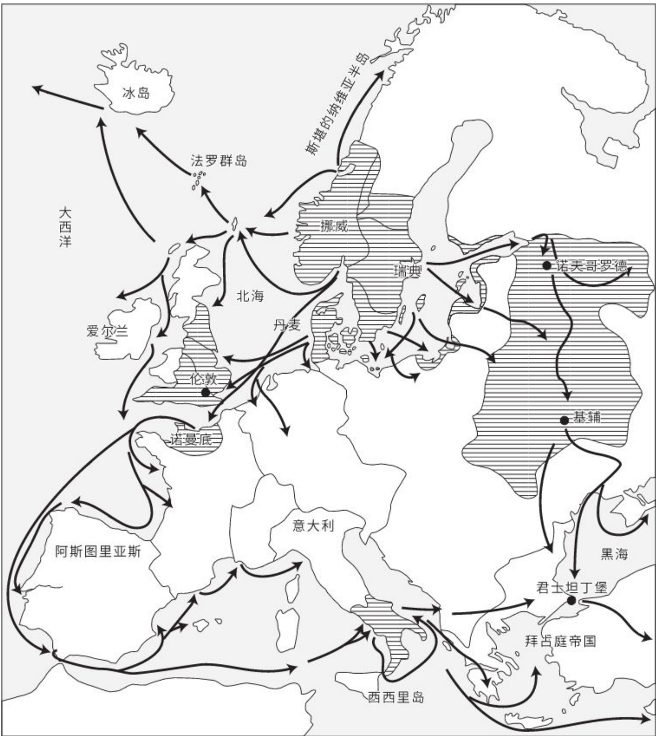


示意图1　维京人的主要航线和居住地

在13世纪的冰岛著成的《埃吉尔萨迦》，讲述了维京人、冰岛农场主埃吉尔·斯卡德拉格里姆松（他的祖父是挪威的农夫）的一生，其中对维京人的描述是“有时候是交易者，有时候是侵略者”。

如今，我们有很多关于维京人的史料，还有他们侵略西欧诸国的记录。这些都是受害者一方的记录，这样看来，“维京人等于侵略者”的说法似乎也合乎情理。

然而，近年来，随着考古研究的推进，人们通过对维京人遗迹的发掘，对他们的印象改变了不少。例如，在英国的约克、爱尔兰的都柏林、法国的勒昂等地，都发现了维京人的聚落。此外，在瑞典比约克岛（位于斯德哥尔摩以西约29千米处）上的比尔卡、原属丹麦的日德兰半岛上的赫德比等地，也都找到了他们的遗迹。这些地方都可以被视为维京人的贸易据点。

因此，在本章，我想试着不把维京人当成侵略者，而把他们当成商人来看。

称霸欧洲大陆的可能性有多大

当我审视维京人的活动区域时，这个区域的庞大令我震惊。

最有名的是从丹麦攻入英国的维京人。丹麦人定居的英格兰东部地区被称为丹麦法区。丹麦与挪威国王斯温一世进攻英格兰，在1013年成了英格兰国王。斯温一世之后，克努特一世建立了庞大的北海帝国。



维京长船（奥斯陆的维京海盗船博物馆）

维京人也被称为诺曼人。在10世纪，诺曼人罗洛率军入侵了法国西北地区。他们征服的地区就是诺曼底，罗洛的族人中的一支成了诺曼底公爵。到了1066年，威廉二世攻入了英格兰，成了英国国王——这就是“诺曼征服”。接着，诺曼人从诺曼底发展到地中海，占领了西西里岛，在1130年建立了西西里王国。

丹麦的维京人向西行进，与之相反，瑞典的维京人向东发展，9世纪下半叶在俄罗斯建立了诺夫哥罗德公国。

与此同时，维京人还在挪威到冰岛一带建立了殖民地。他们深入格陵兰岛，在1000年左右，格陵兰岛的维京人莱夫·埃里克松抵达了北美大陆，建立了名为“文兰”的殖民地。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在加拿大纽芬兰岛的遗迹中发现了维京人的纺车，从考古学上确认了维京人的移民。哥伦布到达西印度群岛是在1492年，维京人比他早了大概

500年。

这样看来，维京人当时很有可能在欧洲称霸。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他们没有形成征服和统治的体系，也没有在抵达的地区建立起统一国家。

这就是他们作为商人存在的意义。作为商人，他们以从商业买卖（偶尔是掠夺）中获得利益为主要目的，对地区的统治实在是没兴趣。即使在新大陆，他们也没有定居。因为他们撤退了，所以我们现在也没有将他们视为“新大陆的发现者”。

维京长船让维京人的航海成为可能。维京长船又窄又长，特点是吃水很浅。维京长船上不仅有桨，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有了帆。这种维京长船性能出众，可供100名以上船员乘坐。而且，这种船的强度很好，可以远距离航海。

推翻“地中海中心史观”

在这些进行商业活动的维京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向东行进的一支。请看本章的示意图1，他们到达了黑海和里海，甚至到达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他们还从近东、中东和中亚，经过伏尔加河，向东欧和北欧输出银币。而且，他们与亚洲的萨曼王朝（9世纪至10世纪，拥有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城市，支配着中亚）和阿拔斯王朝积极地进行贸易。

在此之前，在中世纪的欧洲，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地中海地区。这就是所谓的“地中海中心史观”。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1862—1935）对此颇有研究，他以《欧洲世界的诞生——穆罕默德与查理曼大帝》等著作广为人知。我想在此简单地介绍他的学说，从而看看欧洲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关系。

根据皮雷纳的观点，自罗马帝国以来，欧洲的中心就是地中海。在467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所谓的古代地中海世界统一体仍然存在，直到7世纪，由穆罕默德创造的伊斯兰世界才打破了它。

西罗马帝国衰亡以后，控制欧洲的是法兰克王国。法兰克王国经历了墨洛温王朝（481—751）和加洛林王朝（751—987）。皮雷纳的观点是，墨洛温王朝延续了自古罗马时代起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商业活动，但进入加洛林王朝后，这种局面就终结了，欧洲世界的中心逐渐向内陆地区转移。皮雷纳还认为，加洛林王朝的国王查理曼大帝

（768—814在位）是因为穆罕默德向地中海地区入侵才得到了王位，正所谓“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大帝”。

8世纪的帷幕揭开之时，地中海上的东西方之间的海运已经完全成了过去。除拜占庭沿岸之外，在地中海地区已经谈不上还有“交通”了。曾经是西方世界与黎凡特地区（位于地中海东部，包含现在的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等地区）进行贸易的首要根据地的马赛港也变得很萧条。此时，地中海的经济统一体已经支离破碎，要恢复得等到十字军的时代了。地中海地区的经济抵御了日耳曼民族的入侵，但在伊斯兰的高压面前，也难以招架，最终崩溃。（亨利·皮雷纳，《欧洲世界的诞生——穆罕默德与查理曼大帝》）

皮雷纳还认为，随着伊斯兰势力进入地中海地区，衰败的欧洲商业在11世纪至12世纪复活了。

比如，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热那亚等地的商人与黎凡特地区进行贸易，把香料等带入欧洲。后来，意大利商人以佛兰德斯地区（包含现在的荷兰南部、比利时西部、法国北部等地区）为中心，与北欧诸国进行贸易。意大利和北欧之间的内陆交通很发达，法国东北部的香槟地区形成了市场，其他内陆城市也发展起来了。也就是说，意大利商人让地中海地区的贸易恢复了活力，激活了欧洲经济，由此形成了连接地中海和内陆的交通网——这便是所谓的“商业复活”。

欧洲通过威尼斯和佛兰德斯这两个地方，与东方世界保持接触。始于这两个地方的商业活动，就像一种有益的流行病，扩散到了整个大陆。随着商业活动向内陆地区扩散，北下与南上的两个贸易网终于相遇了，相遇的地点就在从布鲁日到威尼斯的中间点——香槟平原。（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社会经济史试论》）

皮雷纳的这一学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然而，这种观点并没有考虑到维京人的存在，而且对于不同宗教和宗派的人们如何形成了“跨文化贸易”的问题，也缺少探讨。

换一个角度，从维京人和伊斯兰世界的视角来看的话，不仅是地中海，北海、波罗的海，甚至黑海、加勒比海都连接起来了，我们可以看到更具活力的商业活动。

我认为，在中世纪，在西欧的经济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伊斯兰世界。那时的欧洲，不过是伊斯兰世界经济网络的一部分，这样说才更准确。

贸易的中心是阿拔斯王朝

在伊斯兰世界和欧洲世界的巨大商业网络中扮演中心角色的，是阿拔斯王朝——这是一个在鼎盛时期从伊比利亚半岛延伸到中亚的大帝国。

阿拔斯王朝建立于750年，为伊斯兰世界带来了巨大转变，这被称为“阿拔斯革命”。在阿拔斯王朝之前，阿拉伯人以外的人会被强制征收名为“吉兹亚”的人头税，与阿拉伯人之间存在巨大的阶层差异，尽管他们也是伊斯兰教徒。阿拔斯王朝彻底消除了这种阶层差异，让所有的伊斯兰教徒都平等。这完成了从阿拉伯人的帝国到伊斯兰教徒的帝国的巨大转变。

阿拔斯王朝在塔拉斯河畔的战斗中，击败了中国唐朝的军队，后来，又建成了横穿欧亚大陆、远至非洲的贸易路线。762年，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成了远距离贸易的枢纽。



示意图2　阿拔斯王朝的最大版图

在这张巨大的贸易网中，维京人扮演了将欧洲与伊斯兰世界连接起来的重要角色。

维京人沿着那些连接波罗的海、黑海和里海的河流，向东方移动。他们从北方运来商品，在伏尔加河沿岸贩卖，这些商品主要是皮毛和被称为“萨卡里巴”的斯拉夫奴隶。相对应地，来自近东、中东和中亚的香料、丝绸、武器和银币，流向了波罗的海、北海沿岸。据说，查理曼大帝进行货币制度改革的时候，使用的银子正是从伊斯兰世界越过波罗的海得来的。

在中世纪，奴隶也是伊斯兰世界与欧洲之间进行交易的商品。比如，在伊斯兰势力的控制下，法国凡尔登与西班牙进行奴隶贸易，意大利商人也在黑海地区买卖奴隶。

最重要的是，皮雷纳并不认为“由于穆斯林商人的崛起，（基督教世界的）意大利商人在地中海地区被排除在外了”。商业活动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它打破了宗教和民族之间的壁垒。穆斯林商人积极地与不信伊斯兰教的维京人进行贸易，换句话说，他们形成了“跨文化贸易”。

在现在的研究中，人们不再认为是伊斯兰使西欧与拜占庭相隔绝，形成了封闭社会。实际上，地中海从未完全成为伊斯兰的海洋，在欧洲沿海地区，欧洲人的交易仍在进行。欧洲商人身处以阿拔斯王朝为中心的庞大贸易网络的西部边缘，也就是说，欧洲是伊斯兰贸易网络的一部分。

汉萨同盟是维京人的继承者

不过，还是应该指出，作为商人的维京人具有某种局限性。欧洲东部的河流并不都在维京人的控制下，维京人终归只是这个庞大贸易网络中的商人中的一支。

此外，维京人的贸易据点都规模很小。前文提过的比尔卡和赫德比只有几百人到几千人。正如一位阿拉伯旅行者所说，与中东的大城市（据说，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在鼎盛时期的人口有150万）相比，这样的贸易据点不过是小小的定居点，原始又缺乏便利性。这种贸易据点的特点是，由于规模很小，在衰退的时候会急速衰退。

尽管如此，由维京人开辟的北海和波罗的海的贸易网络，后来影响了汉萨同盟。“汉萨”的意思是“团体”，也就是商人联盟。汉萨同盟是以德国的吕贝克为中心的城市共同体，从12世纪下半叶到15世纪，掌控了欧洲北部的贸易。如果没有维京人的贸易路线，汉萨同盟就不会繁荣。在汉萨同盟之后，远航到亚洲海域的荷兰商人登场了。我认为，在世界史上，维京人所扮演的角色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

3

非洲的黄金
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吗

“大航海时代”是日本特有的说法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1492），瓦斯科·达·伽马开拓了印度航线（1498），麦哲伦舰队环球航行（1522）……通常认为，从15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的“大航海时代”，是欧洲支配世界的开始。

那么，这个“大航海”是如何开始的呢？它又给欧洲带来了什么？

让人有点意外的是，“大航海时代”是日本特有的说法。在英语中对应的说法似乎应该是“Age of Great Navigation”，但英语中并没有这样的说法。这是因为，“大航海时代”这个词是日本的拉丁美洲史先驱增田义郎先生最先使用的。实际上，英语中的说法是“The Age of Great Discoveries”（大发现时代）。我们必须记住，美洲大陆也好，印度航线也罢，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说都是“发现”。

进一步说，要确定大航海时代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是很困难的事。一般来说，是以1415年葡萄牙在非洲西北端的休达建立殖民地为开始，以1648年俄罗斯人到达欧亚大陆的最东端为结束。但这就产生了疑问：这样一来，横穿了太平洋、发现了夏威夷的詹姆斯·库克（1728—1779）不就和大航海时代无关了吗？在此，我想根据欧洲人到达不同海域的时间，不那么绝对地进行定义。

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大航海”是如何开始的呢？本来想去印度却到达了新大陆的哥伦布，开拓了印度航线的瓦斯科·达·伽马，都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过，我们也有“欧洲人瞄准印度，寻求亚洲的香料，从而开始了大航海”这样的印象。

然而，这并不是事实。葡萄牙的航海者确实绕过了好望角，到达了印度，但是，在葡萄牙刚开始“大航海”时，好望角还没有被发现。

也就是说，葡萄牙人最开始想去的并不是亚洲，而是非洲——这样就说得通了。我认为，欧洲人瞄准的，并不是亚洲的香料，而是非洲的黄金。

撒哈拉沙漠和汉尼拔大象军团

当时的欧洲人需要非洲的黄金。在14世纪，欧洲的黄金产量虽然

有所上升，但需求量上升得更为剧烈。欧洲人想获得西苏丹的黄金，可是，控制着黄金运输路线的是非洲本地的穆斯林商人。

非洲的黄金交易可追溯至7世纪。那时候，西非的加纳王国（7世纪—11世纪下半叶）成立了。让这个王国繁荣起来的正是横穿撒哈拉沙漠的穆斯林商人。穆斯林商人从撒哈拉沙漠的盐层中开采出了岩盐，带入加纳王国，用盐交换黄金，再横穿撒哈拉沙漠，将黄金运回伊斯兰世界。

有意思的是，加纳王国本身并不是黄金的产地。黄金最初产自塞内加尔河上游的班布克地区，不久后，开采点转移到了尼日尔河上游的布雷地区，以及东边的沃尔特河流域的森林地带。加纳王国本身没有金矿，但垄断了与挖掘金矿的部落的交易，成了黄金流通的据点，日益繁荣。后来，加纳王国为了增强商业实力，实行了中央集权。8世纪至9世纪，尼日尔河沿岸城市加奥（后来成了桑海帝国的首都，现属马里共和国）也作为商业据点兴起。在当时，加奥是阿拉伯世界所知的尼日尔河流域的唯一据点。



示意图1　撒哈拉沙漠的贸易路线

然而，像这样横穿撒哈拉沙漠进行交易，距离实在太远了。随着

撒哈拉地区的沙漠化日益严重，交易变得越来越困难，并逐渐衰退。

说到沙漠化，不妨再多说一点。据说，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前218—前201）中，让罗马人尝到苦头的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在越过阿尔卑斯山、从高卢攻入意大利时，牵了几十头战象。这些大象是从哪儿来的呢？是印度象，还是非洲象？

我们姑且不谈印度象，来看看非洲象能否用于这场战争。使用非洲象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在当时，迦太基是个以突尼斯为根据地，从地中海沿岸延伸到伊比利亚半岛的国家，还没有受到沙漠化的侵袭，迦太基周边正是非洲象的栖息地。那时的非洲象与现在的象相比体形更小，也不凶猛，如今已经随着沙漠化日益严重而灭绝了。我们常常认为，撒哈拉沙漠在过去和现在都环境险恶，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撒哈拉地区也曾有茂盛的草原，还有供商人往返的贸易路线。

马里帝国的黄金传说

横穿撒哈拉地区的贸易路线衰退后，在10世纪中叶，形成了新的贸易路线。这就是南北纵穿撒哈拉地区的贸易路线，控制这条路线的依然是穆斯林商人。

通过北非的穆拉比特王朝（1056—1147）和摩洛哥的穆瓦希德王朝（1133—1269），伊斯兰教被传入了西非。

在黄金产地西苏丹地区，加纳王国瓦解后，过了大概一个世纪，马里帝国（约1230—1473）成立了。马里帝国也在不断地伊斯兰化。马里帝国深知商业的重要性，制定了促进商业的政策，形成了安全且透明的贸易体系，进行贸易的主要商品是岩盐和黄金。

马里帝国的首都廷巴克图，后来成了撒哈拉沙漠中的通商据点，因繁荣而被欧洲人称为“黄金乡”。在撒哈拉沙漠南部的几内亚山区开采的黄金，由单峰骆驼驮着，经过廷巴克图，纵穿撒哈拉沙漠。

在非洲、中亚、拜占庭、印度和中国等地旅行的探险家伊本·白图泰（1304—1368），就曾从廷巴克图坐船到达加奥。这两个城市由尼日尔河相连。

在关于繁荣的马里帝国的诸多传说中，最有名的应该是“世界历史上最富有的国王”曼萨穆萨（1312—1337在位）的黄金传说。曼萨穆萨是伊斯兰教徒，相传，他在1324年去麦加朝圣的途中，挥霍了太

多的黄金，导致开罗的黄金市价暴跌，还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据说，他的资产约合现在的4000亿美元。

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移到欧洲。前面提过，在14世纪，欧洲的黄金需求量急剧增长。然而，欧洲人从西非获取黄金有一个巨大的阻碍，那就是穆斯林商人。

控制着纵穿撒哈拉沙漠的贸易路线的是已经伊斯兰化的柏柏尔人。此外，以埃及为中心的马穆鲁克王朝（1250—1517）也有很强的势力。欧洲人无法加入纵穿撒哈拉的贸易，因此不得不向伊斯兰势力购买黄金。在商业贸易中，控制了交通基础设施的一方肯定会占主导地位。因此，对欧洲来说，通过纵穿撒哈拉的贸易路线来购买黄金，是一场艰难的交易。

晕船的航海家——亨利王子

如何不经过伊斯兰世界将黄金从西非输入欧洲，这对欧洲人来说是一个挑战。葡萄牙的航海家亨利王子（1394—1460）解决了这个难题。不过，与“航海王子”之名相反，亨利王子自己并不乘船出海，因为他晕船非常厉害。他作为资助人，对航海、探险事业进行援助。

由亨利王子派遣的航海者，在1419年发现了马德拉群岛，在1427年发现了亚速尔群岛。大西洋上的小岛都成了葡萄牙的领地。不过，这个时期可能还不能称为“大航海”。

如果“大航海”的最初目的就是直接从西非输入黄金的话，那么“大航海”的开端就应该是1444年了。这一年，葡萄牙人到达了佛得角群岛，第二年到达了佛得角海岬。他们通过海上路线，到达了撒哈拉沙漠的南端，能直接参与西非的黄金贸易。1452年，葡萄牙的第一枚金币被铸造了出来。后来，葡萄牙人在1480年造访了马里帝国首都廷巴克图，也说明曾经亨利王子的目的便是与西非进行贸易。

让穆斯林商人带路的瓦斯科·达·伽马

非洲沿岸的海上路线其实不是由葡萄牙人首次开辟的。

根据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述，在埃及法老尼科二世（前609—前593在位）的命令下，腓尼基人从红海绕过好望角，用三年的时间绕非洲航行了一圈。此外，被称为迦太基之王的航海家汉诺，

据说也航行到了非洲的西海岸。

腓尼基人对这条海上路线的开拓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说，腓尼基人是在爱琴海文明中的克里特文明（大约前2000—前1400）和迈锡尼文明（大约前1600—前1200）衰退后，通过地中海贸易繁荣起来的。他们生活在东地中海的南岸，那里适合耕作的土地很少，他们除了海上贸易别无选择。因此，他们在地中海地区建立殖民城市，从公元前12世纪开始，几乎垄断了地中海地区的货物流通。前面提到的迦太基，就是腓尼基人在公元前9世纪上半叶建立的殖民城市。

腓尼基人的海上路线网络，涵盖了地中海全域、红海、非洲西海岸，甚至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到达了北海。到了15世纪，欧洲人的海上路线才总算接近了当时腓尼基人的规模。

让我们再回到15世纪的欧洲。欧洲人的最初目的是通过海上路线从几内亚进口黄金，所以他们沿非洲西海岸南下。结果，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到达了遥远的未知地区——这便可以说是大航海时代的开始了。

随后，1488年，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到达了好望角。这次航行让人们知道，通过海路可以绕过非洲大陆的南端去亚洲。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到达了印度的科泽科德。眨眼之间，葡萄牙便在印度洋和东南亚拥有了殖民地，这是欧洲国家首次进入亚洲世界。

瓦斯科·达·伽马的航海向导，是在马林迪（现属肯尼亚）雇用的船员，名叫艾哈迈德·本·马吉德。本·马吉德是阿拉伯人，他有很多与航海技术相关的优秀著作，我们通过他的著作可以知晓当时的波斯湾、印度洋甚至中国南海的情况。

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不仅是欧洲，亚洲和美洲也被卷入了大航海时代的浪潮中。

假设：“从西非到新大陆”

从已知的大陆到美洲新大陆的大西洋航线是谁发现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早在约公元前1500年，就已经有人从西非航行到西印度群岛了。在新大陆上，人们发现了黑人的骨头，这说明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非洲和美洲之间就已经有

来往了。我觉得这种观点有一定说服力。



示意图2　大西洋的洋流

示意图2展现了大西洋的洋流。有意思的是洋流的方向：在大西洋北部，洋流从美洲向欧洲流动；在大西洋南部，洋流从非洲向美洲流动。由此可见，要前往新大陆，从非洲出发比从欧洲出发更有利。

我认为，当时在西非的人们恐怕也知道，乘着这股洋流，就能去新大陆了（虽然当时应该没有“新大陆”这种说法）。不过，最初从西非航行到新大陆应该还是很少有的事情，传染病就是旁证。欧洲人到达新大陆时，印第安人感染了欧洲人带来的结核、天花等疾病，人口急剧减少。如果此前有很多非洲人越过了大西洋的话，这些病原体就应该已经被带到了新大陆，印第安人也就应该能对这些疾病免疫了。

大航海时代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在1498年，葡萄牙开辟了印度航线。根据以往的研究，我们可以认为，之前那条从红海经过亚历山大港到意大利的香料贸易路线（地

中海路线）很快就衰退了，取而代之的是好望角路线。

实际上，好望角路线也很危险。从瓦斯科·达·伽马的时代开始，又过了一百多年，在17世纪，好望角路线的香料运输量才超过了地中海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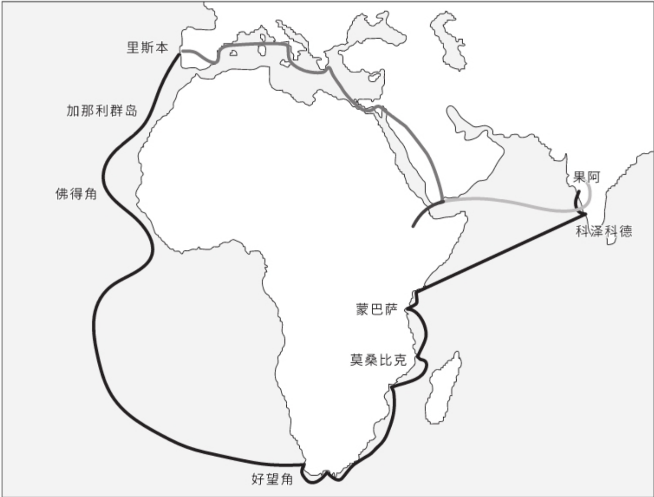


示意图3　香料的运输路线

香料贸易路线的变化，给意大利的经济带来了巨大打击。意大利通过香料贸易获得的利润减少，而且，在印度和东南亚形成了跨文化贸易圈，将意大利排除在外了。

最初，在从东南亚到欧洲的“香料之路”上，意大利的控制范围不过是从地中海的亚历山大港到意大利。相比之下，葡萄牙已经可以从马鲁古群岛直接将香料输送到欧洲了。

前面说过，掌握了交通基础设施的一方，会在贸易中占优势。在当时的“香料之路”上占优势的是控制了中东地区的奥斯曼帝国，而意大利不过是欧洲的一个可以被排除在外的存在罢了。

相反，葡萄牙控制着从东南亚到欧洲的商船，即使在亚洲也展现着前所未有的实力。

19世纪以后，欧洲在世界上确立了支配地位，究其原因，最不能忽视的就是海运的发展。欧洲的海运发达，带来了贸易优势和经济增长，这成了形成信息和金融控制的基础。从长远来看，这就是大航海时代最大的意义。

4

亚洲贸易圈如何帮助织田信长夺取天下

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日本的战国时代

大航海时代对日本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让我们试着把大航海时代的重大事件年表和日本历史年表放在一起吧。

16世纪，葡萄牙、西班牙等国进入亚洲，这与战国大名之间的争斗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以火绳枪（旧式步枪）为首的武器为战国时期的日本带来了一场军事革命。

最明显的体现就是1575年的长筱之战，织田信长的军队给武田胜赖的军队带来了毁灭性打击。人们曾认为这场战役中使用了300支火绳枪，后来修正为100支。在一场战役中使用这么多的枪械，在同时代的欧洲也几乎找不到相同的例子。毫无疑问，在当时，日本是一个军事国家。

实际上，在欧洲，近代军事革命也是在15世纪到16世纪才发生的。最早大量使用步枪、大炮等武器的战争是哈布斯堡家族（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和瓦卢瓦家族（法国）为争夺意大利进行的意大利战争（1494—1559）。

1467	应仁之乱（至 1477）	1534	耶稣会设立
1480	葡萄牙人到达通布图	1541	武田信玄成为甲斐国领主
1488	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葡萄牙）到达好望角	1543	火绳枪传入种子岛
1492	哥伦布（由西班牙支持）到达西印度群岛	1545	特利腾大公会议（至 1563）；秘鲁波托西银山被发现
1494	《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缔结；意大利战争（至 1559）	1549	方济各·沙勿略到达鹿儿岛
1498	瓦斯科·达·伽马（葡萄牙）去往印度	1550	葡萄牙在平户设立商行
1507	新大陆被命名为“阿美利加”	1553	川中岛合战（第一次）
1511	葡萄牙占领马六甲	1571	西班牙建立马尼拉市
1513	巴尔沃亚（西班牙）穿过巴拿马地峡	1575	长筱之战
1516	北条早云平定相模国	1576	大友宗麟购入“国崩炮”
1517	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	1577	德雷克（英国）环球航行（至 1580）
1519	科尔特斯（西班牙）征服阿兹特克帝国；麦哲伦（由西班牙支持）开始环球航行	1580	大村纯忠将长崎献给耶稣会
		1582	本能寺之变
1533	皮萨罗（西班牙）征服印加帝国	1596	圣菲利浦号事件；丰臣秀吉颁布禁教令

表1　日本战国时代与大航海时代年表

关于火器传入日本的时间和途径，有诸多说法。但毫无疑问的是，战国时代的日本人在仅仅几十年间，就能够大量生产步枪了。由此看来，日本可以说是军事革命最成功的国家。而有效利用了这一成

果的，正是织田信长。

为什么日本能以如此令人惊叹的速度追赶上欧洲的军事革命呢？耶稣会是关键所在。

耶稣会是1534年由依纳爵·罗耀拉创立的天主教传教组织（方济各·沙勿略也是创立成员之一）。实际上，耶稣会还有另一个作用，那就是进行贸易往来。武器是耶稣会在日本兜售的主要商品之一。

不论是葡萄牙，还是耶稣会，都在16世纪活跃在与欧洲相距很远的亚洲。其实，他们在到达亚洲以前，亚洲就已经形成了商业网络。葡萄牙人初到亚洲，充分利用了这个海上商业网络。而对建立亚洲的商业网络起到了巨大作用的是穆斯林。

穆斯林商人席卷亚洲海域

7世纪，穆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此后，伊斯兰教以阿拉伯半岛为起点，向世界各地传播。

在与中东地区相邻的印度地区，8世纪后有阿拔斯王朝（750—1258）、以德里为首都的德里苏丹国（1206—1526）和莫卧儿帝国（1526—1857），这些都是伊斯兰王朝。

可见，从很早开始，穆斯林商人就活跃在印度洋的贸易中。印度地区输出了大量产自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商品（包括香料、药物、金、铅、锡、宝石、木材、米、豆类、水果、皮革、象牙、家畜、纺织原料），将衣服、毛毯、金属制品、陶器、玻璃容器、首饰、金银货币、武器以及来自其他地区的转运货物等输入了西亚和地中海沿岸的城市。运送这些商品的就是穆斯林商人。

不过，穆斯林商人并没有垄断印度洋的贸易。印度洋地区有叙利亚正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印度教等，是一个有不同信仰的人们居住的地区，印度西北部的古吉拉特商人等群体也很活跃。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交流的舞台。

伊斯兰化的浪潮进一步推向了东南亚。杰夫·韦德教授指出，8世纪至11世纪，在占城（现属越南）等东南亚地区都形成了穆斯林共同体。

伊斯兰势力也影响了中国。11世纪下半叶，来自阿拉伯的使者到

达东南亚，也到访了中国。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海上贸易据点从广州转移到了泉州，他们很快在泉州建起了清真寺。在12世纪至13世纪，东南亚掀起了海上贸易的热潮，在泉州的穆斯林也积极地参与海上贸易。14世纪，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也到访了泉州，据他记载，这个“世界最大的港口”停靠着许多大型帆船。

就这样，穆斯林商人活跃在印度洋和东南亚，从8世纪至14世纪，逐渐建立了商业网络。接下来，从15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正是欧洲的大航海时代、日本的战国时代，此时的东南亚，迎来了“贸易时代”。

研究东南亚海洋史的泰斗安东尼·瑞德将东南亚的1450年至1680年这个时期命名为“贸易时代”。他认为，这是东南亚进一步伊斯兰化的时代。从1400年到1462年，马六甲、苏门答腊、马鲁古群岛的蒂多雷岛等地都被伊斯兰文化影响，后来这种影响又向文莱、马尼拉、占城等地扩散。

在这个时期，对东南亚来说，最大的市场是中国。中国从14世纪下半叶起，在两个世纪内，经历了人口的急剧增长。人口增长，也就意味着消费增长。

当时中国处于明朝（1368—1644）。明朝永乐年间（1403—1424），宦官郑和奉命航海至印度的科泽科德，接着抵达波斯湾，致力于对外交流，对贸易表现出积极的态度。

然而，永乐帝以后，明朝趋于强化原先的海禁政策。在民间，尽管从中国大陆移居到东南亚的中国人依然在进行着贸易，但对亚洲的海上交易来说，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存在感正在减弱。

这种情况下，在15世纪末的东南亚，作为重要贸易根据地的马六甲（现属马来西亚）日益繁荣。位于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马六甲海峡，现在也是海上交通要道。当时的马六甲海峡，是印度洋使用的三角帆船和东南亚使用的大帆船的会合点。控制了这个海峡，也就控制了东南亚和印度洋的交易。

因此，马六甲聚集着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尼西亚人，他们交换米、砂糖、鱼、棉织品、胡椒、樟脑、香料、白檀木材、瓷器、绢和贵金属。这里成了亚洲贸易的中心地区。

示意图1展示了17世纪时亚洲和印度洋的贸易路线。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期，东南亚和印度洋已经成了一体化的世界。

之后，欧洲商人也加入了这个以穆斯林商人为核心的印度洋和东南亚贸易圈。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到达印度的科泽科德，随后，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丹麦人和瑞典人也航行到了亚洲。尤其是葡萄牙人，他们在亚洲的贸易活动中最活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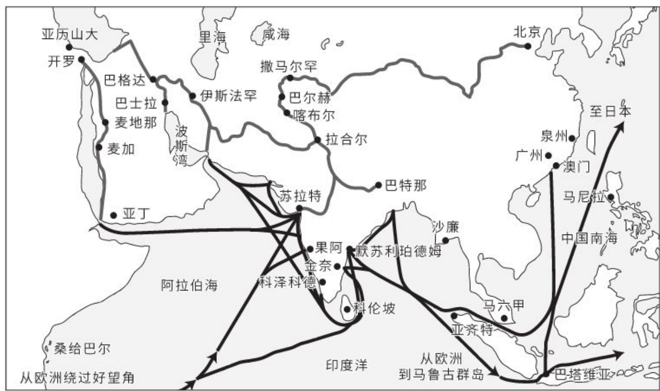


示意图1　17世纪亚洲和印度洋的贸易路线

葡萄牙人在亚洲贸易中发挥的最大作用，就是让东亚也加入了印度洋和东南亚贸易圈。

在印度和东南亚活跃的穆斯林商人，并没有进入中国以北和日本等地区。而明朝的民间船只，虽然活跃在东南亚和东亚，但并没有在印度洋频繁活动。

在这个时期，琉球成了东南亚和亚洲东北部之间的重要枢纽。琉球积极地向中国朝贡，也向东南亚的主要贸易港口派遣大帆船。根据现存记录，1430年至1442年，琉球向泰国的阿瑜陀耶王朝派遣使者至少17次，向苏门答腊岛8次，向爪哇岛8次。

至此，还没有出现将从印度洋到东亚的区域作为活动范围的商人。到了16世纪中叶，葡萄牙商人首次将亚洲的海域一体化，而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是耶稣会。

作为军火商的耶稣会

1540年，耶稣会获得了罗马教皇的承认。之后，耶稣会在印度和美洲新大陆传教，势力急剧扩大。他们最重视的是“葡萄牙属东印度”，这正是从中近东到日本之间的区域。

根据高桥裕史先生的研究，耶稣会从葡萄牙国王那里得到了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作为回报，耶稣会维护葡萄牙在亚洲的权益，并促进葡萄牙在亚洲的贸易。

由马六甲、中国和日本连成的贸易路线，对葡萄牙商人来说是最有利的路线。沙勿略在从鹿儿岛寄出的信件上写道，在日本的堺这个地方金银丰富，应该设立葡萄牙商行。对于葡萄牙与日本之间的贸易，耶稣会也会积极参与价格交涉等活动。贸易带来了各种具有吸引力的商品，这也有利于在日本传教。

日本战国时代的大名们尤其想要葡萄牙船只运来的军需品。耶稣会通过供应大炮、硝石（火药的原料）和弹药等，从大名那里得到传教的许可。织田信长也是这些战国武将中的一员。路易斯·弗洛伊斯在《日本史》中关于织田信长的详细记述很有名，而弗洛伊斯也是来自葡萄牙的耶稣会成员。

与耶稣会有关的武器中最有名的，当数由九州大名大友宗麟购入的“国崩炮”了吧。日本经由耶稣会驻澳门主教首次引进了这尊佛朗机炮。对日本来说，耶稣会是供应欧洲武器的军火商。

耶稣会让传教、贸易和军事成了一体。通过军需品贸易与耶稣会打交道的战国大名中，有不少皈依了基督教——大友宗麟接受了洗礼，想在九州建立基督教王国，大村纯忠甚至将领地长崎献给了耶稣会。

接下来，1580年，东印度巡察官瓦里格纳诺（耶稣会的亚洲总管）下令将长崎作为军事要塞，副管辖长加斯帕尔·科埃略在城中配备了大炮。难怪丰臣秀吉会认为“耶稣会正试图征服日本”。

在当时，葡萄牙先从日本购入铜，运到澳门和果阿（属印度）的工厂里，铸造成大炮后，再把大炮配备给葡萄牙在亚洲的各个领地。就这样，日本也被纳入了葡萄牙在亚洲的贸易与军事体系中。

织田信长舍弃了耶稣会

根据弗洛伊斯的《日本史》，织田信长见了前面所说的瓦里格纳诺，热情地款待了他，邀请他到安土城，赠予他绘有安土城风景的精美屏风。织田信长还允许耶稣会在安土城设立神学院，对日本青少年进行西洋式教育。有人由此认为，织田信长对耶稣会和基督教的态度是宽容的。但实际上是怎样的呢？

事实上，织田信长推崇的是耶稣会带来的西洋的先进科学技术，尤其是武器，而不是基督教。

在织田信长的时代，日本已经可以自己生产欧洲式枪支了。可以说，位于堺的军事工厂生产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而且，除了硝石以外，生产大炮所需要的材料都可以在本土制造（到了江户时代，硝石也可以自给自足了）。也就是说，对织田信长来说，作为军火商的耶稣会的重要性在逐渐减小。

而且，耶稣会也向织田信长以外的其他势力提供武器，同时也进行了自我武装。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即使织田信长没有在本能寺之变中被杀掉，他最终也会不可避免地与耶稣会势不两立。

5

古登堡革命如何改变了商业世界

“古登堡革命”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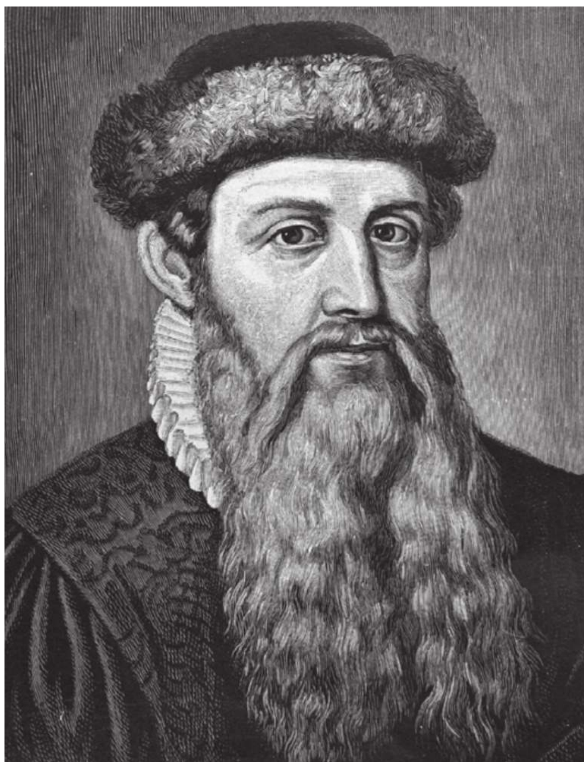
说到活字印刷，中国北宋崇宁年间（1102—1106）的《观无量寿经》是现存最早的活字印刷品。这种活字印刷是把字刻在陶制品上实现的。此外，13世纪，在朝鲜半岛的高丽也在采用铜活字印刷术。

直到15世纪，欧洲才出现了活字印刷。西方的活字印刷发明人是约翰内斯·古登堡（约1398—1468），“古登堡革命”的说法就是源自他的名字。古登堡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此之前，欧洲的书籍几乎都是手抄本。从中国传入的木版印刷在14世纪至15世纪才开始普及。而且，长期以来，只有神职人员才会读书写字，许多手抄本都是在修道院写成，只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传播。

关于古登堡的生平，并没有很详尽的记载。据说，他出生在德国莱茵城市同盟中的美因茨，父亲和叔叔都是大主教造币厂的官员。一般认为，古登堡在造币厂观察到了熔化的金银被倒入模具，按压成型，最终打磨抛光的过程，这成了他发明活字印刷的基础。

1428年，从事金属加工的古登堡迁到了位于莱茵河上游的斯特拉斯堡。1445年，古登堡创造了活字印刷。后来，1455年，他印刷并发行了《古登堡圣经》，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的圣经。



约翰内斯·古登堡

有了活字印刷术，书籍的数量显著增加。这是一场知识和信息的革命。以前只有部分神职人员有读写能力，现在其他阶层也能掌握这种能力了。这场革命使神职人员的权威降低，而且通过书籍、报纸、杂志等媒介，促进了欧洲民间社会的形成。

此外，它还对宗教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没有古登堡发明的活字印刷术，马丁·路德可能不会想到将圣经翻译成德文。对主张回归圣经的新教徒来说，出版用自己的母语而非拉丁语写成的圣经是非常重要的。

如上所述，古登堡革命在政治、宗教和文化方面的影响已经众所周知。在本章，我想从不一样的角度来论述，那就是古登堡革命对经济的影响。

只有新教地区的经济增长了吗

由于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太过有名，人们往往认为近代欧洲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新教，尤其是活跃在瑞士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

不过，当今的欧洲历史学界几乎已经形成一种定论，那就是不仅仅在新教地区，在天主教地区经济也显著增长。

韦伯将勤奋和禁欲称为“资本主义精神”。不过，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近代欧洲之所以会经济增长，正是因为向美洲、亚洲等地的对外扩张，使商业贸易急速增加。并且，在此期间，无论是天主教商人，还是新教商人，都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当然，欧洲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有宗教战争，在西班牙和其他地方还存在对犹太商人的排斥。但这种教义或政治上的宗教冲突与商业活动是两码事。

比如，近年的关于阿姆斯特丹商人的研究表明，即使在宗教冲突很激烈的欧洲内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也一起从事着商业活动。而且，有意思的是，在远离欧洲的大西洋贸易中，这种跨越教派的商业活动会变得更多。

从经济角度来看，天主教商人、新教商人以及犹太商人互相往来，实现了跨文化、跨宗教的贸易，贸易额和贸易范围都因此变大了。这就是从近代走向现代的欧洲世界。

那么，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和不同背景的商人如何一起进行商业活动呢？实际上，古登堡革命对此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5世纪的信息革命

对商人来说，信息是至关重要的。商人只有在认为自己掌握的关于商品的信息比其他人更确切时，才会进入市场。当然，这种判断也并不总是正确的（所以，才会有商人破产的情况）。但重要的是，商人需要在主观上认定“自己掌握了确切的信息”。

如果能掌握其他人不知道的信息，显然是很有利的。不过，在众多的商业活动参与者中，如果大家掌握的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差异太大，那么，除了一小部分掌握丰富信息的人之外，其他人都将会退出市场，而且，要想进入这样的市场尤其不易。因此，这样的市场并不能很好地发展。

也就是说，为了市场的良好发展，商业信息必须被广泛分享，让更多商人相对容易地参与其中。

近代欧洲商业之所以能飞速发展，正是因为在欧洲内部形成了能让商人相对容易地进入市场的环境。最重要的是让每个人都能容易地获得商业信息，而实现这一点的正是古登堡发明的活字印刷术。

商人创造了“标准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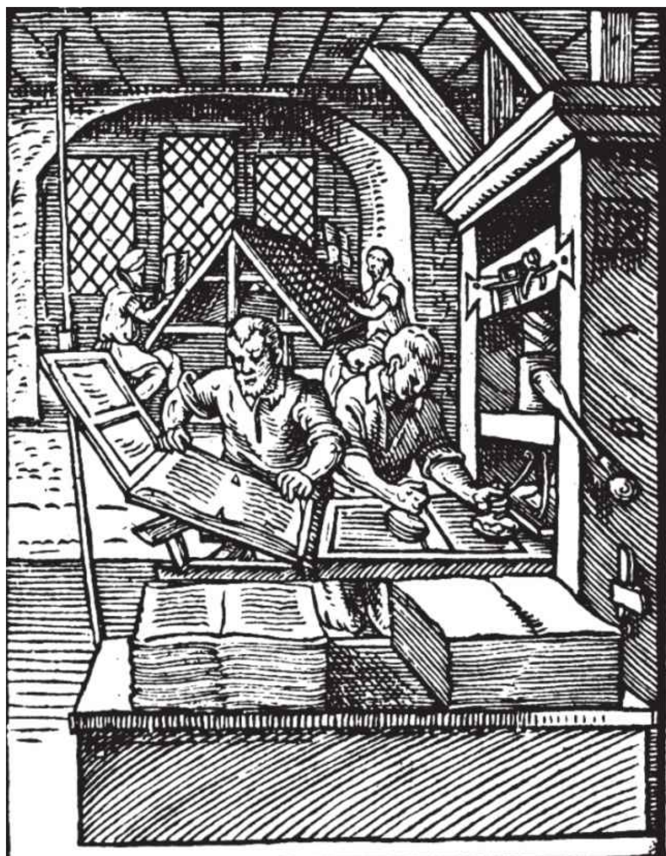
在此，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在古登堡以前的商人和文字信息传播的情况。

汉萨商人在北海和波罗的海进行贸易，他们被认为是“流动商人”。在12世纪前后，他们随身携带自己的商品，辗转于顾客的居住地之间。这些流动商人形成了一个同业公会，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他们在商业旅途中互相帮助。

不过，到了13世纪至14世纪，汉萨商人在城市定居了下来。一个原因是交易量增加了，另一个原因是商业贸易已经趋于稳定。当谷物、海产品、纺织品、木材等商品的交易量变得很大时，商人在旅途中已经不能很好地照看自己的全部商品了。此外，随着商业贸易趋于稳定，商人不再需要在场见证交易过程了。汉萨商人在定居后，通过写信的方式与交易的另一方沟通。

通信需要读写能力，但12世纪的汉萨商人还不会写字。于是，汉萨商人让神职人员替他们写信。我们并不知道汉萨商人具体是什么时候会写字的，不过，到了14世纪，除了拉丁语外，还出现了用低地德语（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德语方言）写的信件。到了15世纪，低地德语甚至占据了主导地位。

从官方的拉丁语到本地方言，从神职人员到商人，这样的过渡在意大利也出现了。我们从佛罗伦萨保存下来的历史资料中发现，1427年，在申报直接财产税时，人们必须提交一份报税单。这意味着，当时的佛罗伦萨已经是一个不会读写就很难生存的社会。而且，这份报税单也有意大利方言的通用版本。



印刷厂的情形（1568）

在现代以前，语言教育是从“声音”开始的。因此，一种语言的拼写并不是固定的。这一点在原始史料中可以看到，令后代的历史研究者大为困惑。

然而，当商业贸易有了统一的规则，商人之间的合约从私有的变成了公共的（如把合同提交政府机关、提供审判证据等），商业信函和合同的样式也逐渐统一。在这个过程中，“正确的拼写”逐渐形成。我认为，商业活动对当今我们使用的各国语言（方言）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路德的宗教改革（1517）之前，在商业世界里，曾经起到传播信息和知识作用的神职人员的地位已经下降，商人作为一股新的力量登场了。古登堡正是在这个时候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经商指南革命”的作用

随着活字印刷术日益普及，“经商指南”对欧洲的商业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是一种商业百科全书，把它称为“指南”，会更容易理解吧。“经商指南”中阐述了商业规则、谈判技巧，以及成为独当一面的商人的方法。

“经商指南”的原型出现在13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托斯卡纳和威尼斯，这都是当时先进的商业区。如前所述，欧洲商人从“流动型”变成了“定居型”，他们不再亲自辗转各地做现场交易，而是把交易委托给了当地的代理人。因此，遵守共同的规则就格外重要。

随着商业据点的转移，到了16世纪，越过阿尔卑斯山，在安特卫普（现属比利时）、阿姆斯特丹、伦敦等地都出现了“经商指南”。在中世纪的手抄本中，关于商人的文字并不多，但自古登堡革命以来，由于活字印刷带来的便利，很多商人都开始利用这种指南。

“经商指南”起源于意大利，而其中销量最多的是法国人雅克·萨瓦里在1675年创作的《健全的商人》。此书多次出版，被翻译成多种语言，1757年在英国出版的马拉奇·波斯特尔思韦特的《通用商业辞典》就是该书的英文版。在那个时代，还没有版权的概念，在翻译时往往会考虑到各地的不同情况进行修订。如此一来，指南就更加实用了。

这样的“经商指南”，促进了商业的标准化。无论在哪一块土地上，只要是读过同一本“经商指南”的商人，都会按同一套商业规则行事。此外，账簿、信件、合同等文件也有了规范。随着规则逐渐统一，进入市场变得容易了。而且，多亏了古登堡革命，合同也由手抄本变成了印刷品。这样一来，商人只需在合同上签字就可以了。这种变革所带来的影响甚至可能超过了现代IT革命（电子交易）对金融和贸易的影响。

此外，如果想扩大贸易范围，就需要与新的交易方取得联系。取得联系的方法是准备一封由共同的熟人写的推荐信，或者一封自荐信。而写这种自荐信的方法，也被写成小册子出版了。只要遵守这种商业书信的规范，即使是第一次写信的商人，也会很容易地被其他商人认定为合作伙伴。这样一来，商人之间的关系网就很快地扩大了。

在国际贸易中，语言问题也很重要。以前商人不得不学习各个国家的语言，而有了商务文件的规范之后，商人只需掌握少量的商务用语，就可以与其他地区的商人进行交易了。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经商指南”的传播并不会受天主教、新教或犹太教等宗教派别的影响。在商业世界中，规范化的力量超越了宗教的隔阂。

欧洲的商业习惯成了世界通用标准

从近代到现代，欧洲获得了全球经济的主动权，在这个过程中，“经商指南革命”起到了很大作用。即使在欧洲之外的国家，欧洲商人也实行了他们建立的商业规范。

举个例子，在印度果阿，很多商人使用葡萄牙语、英语或法语写成的商业信函，还接受了自欧洲传入的外汇票据、船运发票、报税单和委托书等。

如果把当时的印度和欧洲的经济实力相比较，其实印度未必比欧洲差。但说到像商业信函这样的商业习惯，还是欧洲成功地把自己的商业习惯推广到了印度。

而且，随着欧洲领土的扩大，最初不会说欧洲语言的商人，也不得不适应欧洲的习惯了。可以说，欧洲用军事力量强行推广了自己的商业规范。不过，对果阿的印度商人来说，欧洲的商业习惯也确实为他们带来了便利。我想更多地从这个角度来看——古登堡革命带来的规范化成了欧洲商业的优势。

就这样，欧洲人的商业习惯成了世界通用标准，在各地传播。全世界的商业活动都“欧洲化”了，各个国家的商人都不得不渐渐适应欧洲标准。

由此可见，古登堡革命对经济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再进一步说，宗教改革也与“市场”密切相关。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为宗教改革写的宣传小册子上。

在当时，书籍的出版离不开图书交易会。在法兰克福、莱比锡等城市举办的图书交易会，对书籍的传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有些时候，人们会设法得到辩论对手的书籍出版前的校样，加上自己的反驳文章，一起印在宣传小册子上。这样一来，辩论对手只有等到第二年的图书交易会才能反驳了。对宗教改革者而言，这样的出版行为既是重要的收入来源，也是宣传自我主张的市场活动。对接受新教教义的信徒来说，这些宣传小册子就是新的信仰的指南。

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宗教改革是一场基于市场原理的运动。宗教改革者通过宣传小册子，对自己的主张进行商品化，从而获得了“客户”，即信徒。

6

葡萄牙和西班牙
如何成为强国

如今被称为“欧盟的累赘”的葡萄牙和西班牙

在大航海时代，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是领先世界的国家。不过，如今这两个国家财政危机不断，更多地被称为“欧盟的累赘”了。人们大致有这种印象：这两个国家都曾经有发现新大陆、进入亚洲等辉煌成就，但后来快速地衰退，落后于荷兰、英国和法国，退出了世界史的舞台。这两个国家好像不过是支配欧洲的“开路者”，或者是起跑良好却半途而废的马拉松运动员。

但事实并非如此。葡萄牙和西班牙不仅仅是进入亚洲和美洲的开路者，还是15世纪至16世纪时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推动者。两国的影响力比我们想象的更大，到了18世纪至19世纪，它们仍是世界经济的重要角逐者。

将世界一分为二的条约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15世纪至16世纪时葡萄牙和西班牙进军海外的过程。两国都位于伊比利亚半岛，一开始，葡萄牙向东，西班牙向西，选择了两条方向相反的开拓路线。

葡萄牙沿着非洲西岸南下，进入了亚洲。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跟随阿拉伯帆船到达印度科泽科德。此后，葡萄牙在亚洲建立了多个殖民地。1510年，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占领了印度果阿，他接下来在1511年占领了马六甲，1515年占领了波斯湾的忽里模子，就这样控制了从东南亚到波斯湾的航线。

西班牙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征服了美洲大陆。除巴西以外，中南美地区都在西班牙的控制之下。因此，现在该地区的官方语言是西班牙语。该地区被称为“拉丁美洲”，其中“拉丁”就是“伊比利亚的”之意。

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无法对彼此的海外探险视而不见。特别是在西非沿岸，两国的竞争日益激化。西班牙派遣船只，试图阻碍葡萄牙，两国发生了冲突。在罗马教皇的调解下，1479年，两国签订了《阿尔卡苏瓦什条约》。根据该条约，西班牙获得加那利群岛的占有权，葡萄牙获得非洲沿岸、马德拉群岛、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的占有权，两国的纷争暂时缓解。



示意图1　《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和《萨拉戈萨条约》

但是，到了1492年，哥伦布在西班牙的援助下发现了新大陆，情况有了很大转变。第二年，西班牙籍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葡萄牙领地佛得角以西约五六十千米处画了一条“教皇子午线”，并规定在子午线以西，西班牙享有优先权。

这样一来，大西洋西侧都成了西班牙的领地，葡萄牙对此极为不满。1494年，两国达成一致，将分界线向西移了约1500千米——这就是《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

到了1522年，麦哲伦环游世界一周，人们发现地球是球体，是无法用一条线一分为二的。也就是说，在亚洲也需要划分界线。

对两国都尤其重要的，是对香料产地马鲁古群岛的划分。根据1529年的《萨拉戈萨条约》，以穿过马鲁古群岛东部的子午线为界，西侧归葡萄牙，东侧归西班牙。西班牙以菲律宾群岛的占有权和金钱为交换条件，将东南亚的大部分领土给了葡萄牙，因此，马鲁古群岛成了葡萄牙的领地。

也就是说，天主教以自己的势力把世界分成了两半。这简直是现代人无法想象的。

这样一来，至少在天主教教会看来，世界被分成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两部分。天主教教会认为，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而罗马教会是行使神权的机构，所以教皇能够随意分割世界。

按这种划分方式，连日本、中国都成了“被葡萄牙征服的领地”了。事实上，当时欧洲与中国、阿拉伯地区相比，还属于落后地区。然而，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欧洲人在美洲和亚洲都建立了根据地。可以说，欧洲人通过这两个条约达到了“分割世界”的目的。

葡萄牙：商人的帝国



示意图2　葡萄牙帝国

葡萄牙、西班牙在世界各地都建立了殖民地，但到了17世纪至18世纪，又逐渐失去了这些领地。1511年，葡萄牙控制了马六甲海峡，但到了1641年，荷兰取而代之；葡萄牙在印度的控制权也被英国和法国的东印度公司夺去。就这样，葡萄牙渐渐失去了费尽心思夺来的在亚洲的领地。

葡萄牙还在1703年与英国签署了《梅休因条约》。该条约规定，允许英国将毛织品出口给葡萄牙，同时，英国将葡萄牙红酒关税减免至法国红酒关税的三分之二。该条约使农业国葡萄牙在经济上日益依附于工业国英国。

不过，从这个角度并不能准确把握葡萄牙这个国家的本质。

葡萄牙本质上是“商人的帝国”。正是每个葡萄牙商人积极的商业活动，缔造了葡萄牙这个强大的海洋帝国。这种情况持续到了19世纪初。

从殖民地的规模来看，葡萄牙虽然在殖民地的大小上不如后起之秀英国，但其殖民地的范围之广是英国无法相比的（见示意图2）。葡萄牙在巴西、非洲的东部和西部、印度甚至东南亚都有重要的商业据点，织成了一张广阔的海上贸易网。这正是葡萄牙的强大之处。葡萄牙的殖民地范围之广，即使是在东南亚拥有殖民地的荷兰也相形见绌。

从领土大小、是不是工业国来判断一国的强弱，这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历史观。不过，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除了贸易优势大小、国民消费水平提高与否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的判断国家强盛

与否的标准。

而且，活跃在全世界的葡萄牙商人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可以不依赖国家而存在（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近代英国将国家与商人一体化，从而掌握霸权）。因此，即使葡萄牙失去了殖民地，葡萄牙商人的贸易网络仍然发达，在亚洲的贸易规模甚至呈扩大趋势。后来，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亚洲进行贸易时，不得不借助葡萄牙商人的力量与当地交涉。直至19世纪初，从波斯湾到中国澳门，商人的通用语言都是葡萄牙语，这是葡萄牙国力的最好证明。



示意图3　1600年伊比利亚世界的贸易路线

所以说，开拓了全球商业网络的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这两个国家（见示意图3）。荷兰、英国和法国都在后来利用了这个商业网络。

腓力二世的时代

近代西班牙最有代表性的国王，当数腓力二世（1556—1598在位）。他常常被认为是“见证西班牙从强盛走向衰败的国王”。

1571年，在勒班托海战中击败奥斯曼帝国，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在与英国的海战中大败，这些事件都发生在腓力二世在位时期。在那个时代，美洲新大陆的波托西（现属玻利维亚）等地的银矿产出的白银数量之多，令欧洲人震惊。这些从新大陆产出的白银，大部分流入了西班牙，推动了当时世界经济的发展。但是，腓力二世将这些白银用作战争资金，导致西班牙的经济实力不仅毫无提升，还在顷刻间衰退。以上就是人们对腓力二世的一贯看法。

但是，这样的思维方式未免把腓力二世面对的复杂问题过于简单

化了。

我们可以在示意图4中看到腓力二世的父亲查理五世在位时的领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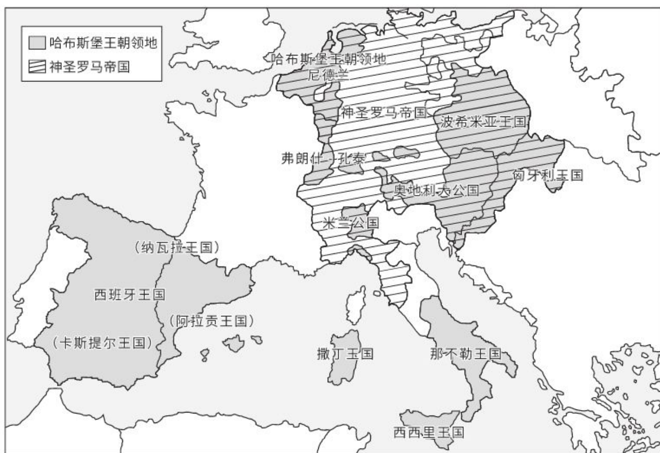


示意图4　查理五世的领土

查理五世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西班牙的国王，还控制着荷兰和意大利。1556年，查理五世退位，腓力二世继位，并继承了除奥地利以外的全部领土。

所以，对腓力二世来说，西班牙只是他的诸多领地之一。他面对的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让自己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帝国更加繁荣。在世人所熟知的西班牙史中，这一点经常出乎意料地被忽略。

进入近代后，有了民族国家的概念，英国史、德国史、西班牙史等各个国家的历史成了重要的研究课题。历史学家也倾向从这种角度研究历史。但是，腓力二世需要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管理自己的帝国。

从新大陆产出的白银流入西班牙后，被送到当时的欧洲经济中心安特卫普。安特卫普也是腓力二世的领地。毫无疑问，对腓力二世来说，安特卫普与帝国的繁荣息息相关。

如此看来，“白银的流出导致西班牙经济衰退，而荷兰成了经济中心，走向繁荣”这样的观点，略显牵强。因为这些地方都是腓力二世的领地，西班牙和荷兰不过是在帝国内部承担不同的职能而已。我认为，现代历史学家从孤立的各国历史的角度对腓力二世进行批判，是不恰当的。

腓力二世其实是败在了宗教上。在荷兰，新教徒较多，但腓力二世作为天主教世界的盟主，强制荷兰人信奉天主教。1585年，为镇压由此造成的独立反抗运动，腓力二世攻陷了安特卫普。结果，很多商人逃往阿姆斯特丹、伦敦、汉堡等地，安特卫普繁华不再。

太平洋贸易的开拓者

说起来可能让人意外，西班牙还是太平洋贸易的开拓者。1571年，菲律宾的马尼拉成了西班牙的殖民地。此后，从墨西哥的太平洋沿岸城市阿卡普尔科到马尼拉的航线形成了。西班牙的大型帆船经此航线将白银运往亚洲。

装载白银的船只从马尼拉出发，途经澳门，然后抵达中国。在马尼拉——澳门——广州航线承担运输重任的是中国的帆船。当时，中国的丝织品和陶瓷等商品深受欧洲人喜爱，然而欧洲能向中国出口的商品极少。西班牙的白银（实际上产自美洲新大陆），打破了这一僵局，填补了欧洲对中国的贸易赤字。这样的太平洋贸易一直持续到19世纪初。

西班牙的大型帆船每年运输价值200万比索的白银。葡属印度、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也共运输了价值约200万比索的白银。交易规模之大，由此可见一斑。西班牙不仅在欧洲进行贸易，还在太平洋贸易中用白银打开了亚洲市场。从15世纪中期至18世纪末，西班牙一直是世界上运输白银的主要国家。

鸦片和奴隶成了世界商品

18世纪至19世纪，有两种商品体现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在贸易活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那就是鸦片和奴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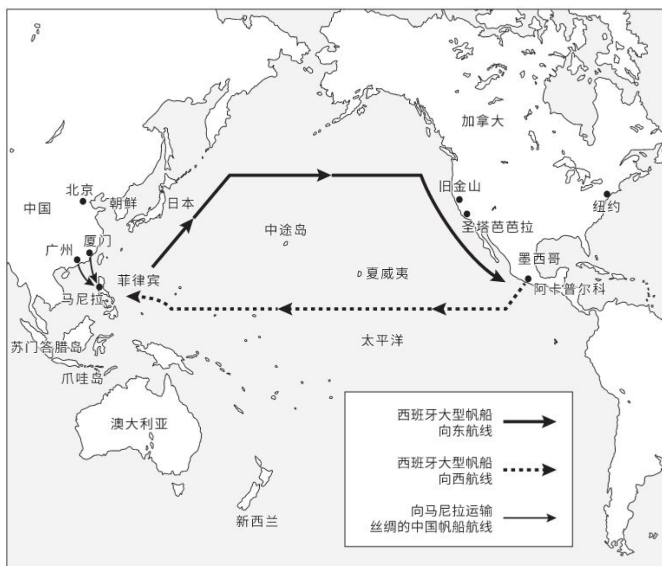


示意图5　西班牙大型帆船的航线

1840年，通过向中国走私鸦片赚得盆满钵满的英国与实行禁烟的清政府之间发生了武力冲突，最终导致了鸦片战争。其实，这当中有一个不为人知的事实——与英国相比，向中国输入鸦片更多的是葡萄牙商人。

英国东印度公司主要销售产自印度东北部的孟加拉鸦片。然而，流入中国的不仅仅是这种鸦片，还有产自印度中部和印度西北部拉其普特地区的马尔瓦鸦片。马尔瓦鸦片主要经葡萄牙商人之手从孟买和葡萄牙属港口向外输送。如表1所示，输入中国总量最多的是马尔瓦鸦片。

贸易年度	孟加拉鸦片	马尔瓦鸦片	土耳其鸦片	合计
1829	7143 （800～930）	6857 （740～1030）	700 （720）	14700
1830	6660 （790～1050）	12100 （400～760）	1671 （565～738）	20431
1831	5960 （885～1060）	8265 （645～800）	402 （550）	146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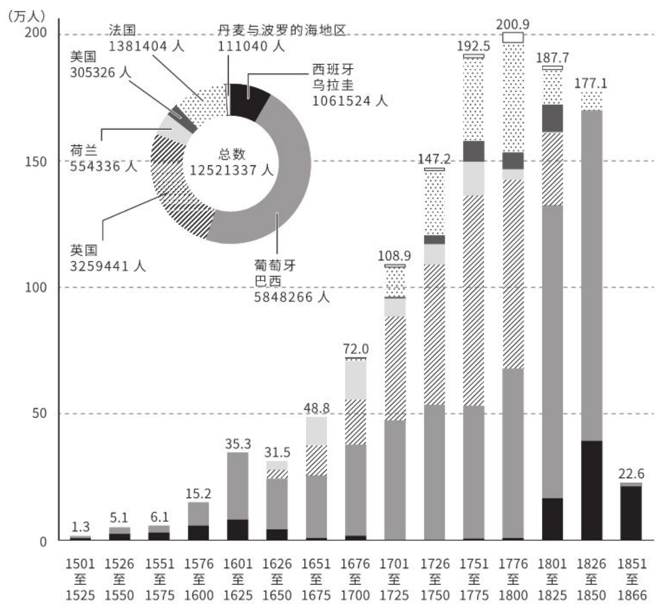
表1　中国鸦片贸易情况（单位：箱），括号内为每箱的价格区间（单位：美元）

鸦片贸易虽然是一段令人不堪回首的历史，但确实也体现了19世纪上半叶葡萄牙海运业在亚洲的巨大影响。

此外，以往的研究认为，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大多是通过英国轮船进行的。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运输黑人奴隶最多的是葡萄牙轮船。16世纪至19世纪，英国运输奴隶约326万人，而葡萄牙向巴西运输奴隶约585万人。

奴隶贸易是由历史学家所说的“砂糖革命”引起的。从17世纪起，人们在拉丁美洲大量种植甘蔗，欧洲人的饮食生活随之改变。对当时还处在贫穷边缘的欧洲人来说，砂糖成了热量的重要来源，它使欧洲人体格强壮，体力增强，平均寿命延长。

最早在殖民地大规模种植甘蔗的就是葡萄牙人。种植甘蔗需要劳动力，因此，大量奴隶从西非被运往当时葡萄牙的殖民地巴西。这样的生产模式，后来在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殖民地西印度群岛上也被使用。



图表1　来自西非的奴隶人数

19世纪初，拉丁美洲各国相继宣布独立。但是，巴西在1888年才废除奴隶制度，当时的西班牙殖民地古巴则是在1886年。这自然与甘蔗的种植有很大关系。从这一点来看，葡萄牙和西班牙是奴隶贸易的罪魁祸首。不过，两国促进了亚洲、非洲、美洲和欧洲的商业贸易

网的形成，这也成了日后两国自身国力的保证。

7

数学家费马
如何奠定了保险的基础

概率论与现代社会

皮埃尔·德·费马是17世纪法国著名的数学家，被誉为“数论之父”。在他的研究成果中，最为人所知的当数“费马大定理”。费马读了古希腊的数学著作《算术》后，在空白处加了48条注释，其中之一是：“当整数$n>2$时，关于x，y，z的方程$x^n+y^n=z^n$没有正整数解。”这条注释困扰了数学家300多年。费马写道：“关于这条定理，我确信已发现了一种美妙的证法，可惜这里空白的地方太小，写不下。”直到1994年，这条定理才由安德鲁·怀尔斯证明。



皮埃尔·德·费马

不过，说到对世界史的影响，费马留下的更重要的遗产是“概率论”。没有概率论，就没有我们现在的生活。概率论支撑了“保险”这套体系，无论是个人的人寿保险，还是进出口汽车或建造高楼时的财产保险，都离不开概率论。保险费率由事故或灾害发生的概率决定。人

们通过统计获得数据，再通过概率论计算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布莱士·帕斯卡

对于概率论，费马和另一位天才布莱士·帕斯卡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改变历史的一封信

一切都始于帕斯卡写给费马的一封信。帕斯卡在信中讨论了有关赌博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两名玩家掷硬币5次，正面朝上的时候多则A获胜，反面朝上的时候多则B获胜。但由于某种原因，两人不得不掷3次后就停止。在这种情况下，A、B两人应如何分配赌注的钱呢？

围绕这个问题，两人通信讨论了4个月。为什么这个讨论很重要？借斯坦福大学数学系顾问教授齐斯·德福林的话来说，“这封信首次展示了预测未来的方法”。

费马和帕斯卡讨论的是，如何利用数学方法，从过去发生的事中，推算出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提出问题的是帕斯卡，给出完美解答

的是费马。德福林在《改变世界的信件——帕斯卡、费马与概率的诞生》中详细介绍了他们的讨论，并评价道：“帕斯卡写了这封信之后的100年里，平均剩余寿命表成了英国终身养老金的基础，伦敦成了海运保险业的中心——如果没有保险，海运恐怕只会被那些能够承担巨大风险的富豪垄断。”

也就是说，费马和帕斯卡的研究奠定了现代保险的基础。

顺便一提，费马其实是法律专家（他在本职工作中的表现也非常优秀，曾在最高刑事法庭任职），一生都没出版过数学方面的论文。他的天分全部体现在与欧洲最优秀的数学家的频繁通信中。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都通过书信来讨论问题，帕斯卡和费马一生都未曾谋面，仅通过书信就开辟了概率论这个领域。

此外，在当时的欧洲，信件寄出后不一定能保证送到对方手上。因此，普遍的做法是把信复制很多份寄出去，自己也留一份备份。费马和帕斯卡生活的时代，对应的是日本的江户时代初期。从这个意义上讲，江户时代的信使制度可能要可靠得多。

近代保险制度的建立还借助了另一个重要的数学法则——雅各布·伯努利（1654—1705）等人提出的“大数定律”。这条定律简单来说就是“当随机事件发生的次数足够多时，其发生的频率会趋近预期的概率”。比如，掷骰子的时候，掷出一点的概率是六分之一。可实际上，如果只掷6次，掷出2次一点也是有可能的。不过，掷的次数越多，掷出一点的次数就会越接近六分之一。如果掷6万次，那么掷出一点的次数会非常接近1万次。这就是“大数定律”。

除了概率论，近代保险制度还需要通过统计来收集、处理庞大的数据。

古代的保险和中世纪的保险

在此，让我们稍稍回顾一下过去。

说到世界上最古老的保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的古巴比伦王国。人们将货物交给商人后，为防止商人带着货物逃走，在货物全部卖出前，会扣押商人的家属或财产。这其实和“人质”的性质差不多。

据说，古希腊和古罗马也都出现过航海保险，在当时被称为“冒

险借款（航海借款）”。

首先，船主或货主用船只或货物做担保，借来资金。船只、货物平安抵达目的地后，再连本带息归还借款。如果没能平安抵达，本金和利息的归还义务就会被免除。

显然，这与我们所知的保险不同。近代保险的本质是利用风险对冲，避免损失。但在“冒险借款”中，向船主或货主提供资金的一方并没有形成风险对冲。也就是说，“冒险借款”的主要目的是筹集所需资金，与其说是保险，不如说是投资。

1343年和1347年在热那亚写成的两份字据被视为最早的保险合同。合同中规定，船主或货主要事先向投资者支付风险费，发生损失时，船主或货主要将船只或货物卖给投资者。

但这还不能算是近代保险。中世纪的意大利保险业，本质上遵循的还是经验。人们常说“中世纪的意大利是近代经济的发源地”，但这种说法忽视了（或者说轻视了）近代与近代前的巨大差异。中世纪的意大利经济并没有直接发展成近代经济。

中世纪与近代的巨大差异还体现在企业形态上，这与保险的形式也有密切关系。

中世纪的企业，基本上是为某一具体事务而成立的，用现代的说法就是“项目型企业”。

在航海贸易中，为了某次航海活动，船主和投资者会聚集在一起，航海活动完成后，他们一般就会解散。与此相反，近代企业以永续性为前提，合同、雇佣和贸易都以公司未来还在经营为前提。生活在现代的我们会觉得这一切理所当然，但“以永久经营为前提”的企业其实在近代才出现。

中世纪的企业是一次性的，近代的企业是永续性的，这两种不同的企业，对合理行为的定义自然也不同。

比如，中世纪的商人在从事海上贸易时，如果某条航线只需要走一次，而这条航线上的遇难概率是十分之一，那么他决定不买保险也可以说是合理的。

相反地，近代贸易公司是长期经营，很可能需要走某条航线无数次。在这种情况下，为每次航行购买一定的保险才更合理。考虑到企业的永续性，经营者需要更长远的经营策略。

汉萨同盟的合理的风险对冲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武断地说近代商人做的是基于计算的合理的生意，而中世纪商人做的是投机性的不合理的生意。

在中世纪，企业是一次性的，商人虽然没有保险制度，但有其他风险对冲方法——比如汉萨同盟的“Partenreederei”。

研究汉萨同盟的专家菲利普·多林格认为，自14世纪中叶起在地中海地区和葡萄牙被使用的海上保险，直到16世纪中叶都没有在汉萨同盟被使用过。

汉萨同盟采取的方式是，虚拟地将船只分为几个部分，每个人持有其中的一部分。比如，一人持有船只的20%，另一人持有15%。通常，船长自己也持有一部分。

“Partenreederei”以前被译为“船舶共有组合”，现在更多地被译为“船舶共有制度”。这种做法实际上并不存在“组合”，因此，“船舶共有制度”更为贴切。更准确地说，“reederei”的意思并不是“船舶”，而是“海运”。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分摊在海运中产生的利润和风险的制度。

一直以来，汉萨同盟的研究者都认为船舶共有制度不如海上保险先进。他们认为地中海地区的海上保险更接近近代保险制度。

不过，这种观点是否妥当呢？在中世纪，概率论尚未普及，大数定律也尚未被发现，所谓的海上保险，其实也没有准确的风险计算。我认为，在中世纪，汉萨同盟的船舶共有制度让航海活动的主要执行人（船长）也成了“份额持有人”，让他承担一定的责任，是更有效的风险分散方法。

中世纪和近代的企业形态有着根本差异，我们不能用后世的标准衡量以前的情况，武断地认为“越接近近代的方式就越先进”。

近代企业的诞生

那么，近代企业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呢？换句话说，企业是从什么时候起具有永续性的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在不同国家、不同行业，近代企业产生的时间可能相差很远。如果只谈海运业，在19世纪下半叶，国际上的定期航线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近代保险也出现在

这个时期。

后面还会详细介绍，蒸汽轮船的出现让定期航线的规模扩大，船只的数量也迅速增加。与航海有关的数据越来越多，大数定律真正开始起了作用，表示“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的事故率也有了实际的意义。

有趣的是，从19世纪起，大数定律逐渐被视作社会的基本法则。比利时数学家、社会学家阿道夫·凯特勒（1796—1874）以“社会物理学”的名义，考察犯罪率、结婚率、自杀率等，指导国情调查，被称为“近代统计学之父”。由此，人们意识到，在人类行为中存在某些法则。

1838年，泊松分布被发现。泊松分布描述了一段时间内随机事件（如交通事故）概率的分布，是近代保险业的基础。不过，泊松分布被用于保险业又是很久之后的事情了。

哈雷彗星和人寿保险

在近代保险业中，和“概率”同样重要的还有“统计”。

从17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英国为了通过数据掌握国家、社会的情况，积极地尝试“政治算术”。借《政治算术》的作者威廉·配第（1623—1687）的话说，“数量、重量和长度”能展现社会的真实面貌。

这些“政治算术家”首先关注的是人口。配第的好友约翰·格兰特（1620—1674）统计了伦敦各个教区的死亡人数和死因，制作出“死亡率公报”，据此推算出伦敦的人口、可服兵役的适龄男性数量、育龄女性数量等，并发表了堪称政治算术开山之作的《对死亡率公报的自然和政治观察》（1662）。

当时，欧洲鼠疫肆虐，人们充满恐惧。制作“死亡率公报”是为了调查死亡人数多的地区，查明鼠疫的传播途径。身为医生的配第在著作《爱尔兰的政治解剖》中将国家比喻成身体，提出可以通过解剖（即数据分析）来发现、解决国家中存在的问题。

现在让我们将话题转回保险。

人寿保险比海上保险（损失保险）更便于统计。这两种保险的数

据量差别很大：海上保险中船只遇难的概率因航线、天气而不同，很难积累有效的数据；而人寿保险针对的是人的生死，假设城市中有10万人，那么只需一年就能获得相当数量的数据。

在17世纪下半叶的英国，人寿保险公司已经出现。但当时还没有计算保险费的明确根据，因此保险更像是一种赌博。

为近代人寿保险打下基础的是英国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哈雷彗星”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哈雷不仅发现了哈雷彗星是每76年出现一次的周期彗星，还是地磁场观测、信风和气压研究的先驱。他还是牛顿的好友，牛顿的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就是在哈雷的敦促和支持下完成的，甚至连出版费用都是哈雷承担的。

哈雷为人寿保险业做出的贡献完全不逊于以上成果——他编制了“生命表”。有了生命表，人们可以根据某个群体的人口、年龄、死亡人数等数据，计算出死亡率和平均剩余寿命。直到今天，人寿保险业也离不开生命表。

1693年，哈雷根据教会的记录，首次编制出生命表。由此人们才明白，看似孤立且毫无规律的个人的死亡，放到群体中看就会呈现某种规律，而且，只要掌握了某地的人口、居民构成、人均死亡年龄等，就能推算出具体的某个人大致能活多少年。

哈雷编制的生命表是从配第、格兰特的研究方法发展而来的。因此，说政治算术是近代人寿保险的源头之一也不为过。

从咖啡馆到世界保险业巨头

大概在1688年，伦敦有一家咖啡馆开业了。不久后，它搬到了金融街——朗伯德街，经常有商人和船员光顾。这家名为“劳埃德”的咖啡馆就是世界保险业巨头劳合社的前身。

在16世纪至17世纪，欧洲人形成了喝咖啡的习惯。17世纪下半叶，英国已经有了很多咖啡馆，并且很受欢迎。咖啡馆不仅是喝咖啡的地方，还是交换小道消息的场所。为了吸引顾客，咖啡馆在墙上贴满了商品广告、寻人启事，还摆着商品样品。这里被用来开展宣传活动，也是政治和经济活动的舞台，还对报纸和杂志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18世纪的劳埃德咖啡馆（来源：TopFoto/Aflo）

金融街上的劳埃德咖啡馆举办过船只拍卖，还将客人带来的最新船舶信息整理成《劳埃德新闻》（《劳埃德船舶日报》的前身）出版发行。

渐渐地，劳埃德咖啡馆里聚集了一批个体保险商。他们被称为“underwriter”，承接保险业务。对海上保险业来说，及时又准确的资讯比任何东西都重要。不久后，劳埃德咖啡馆里的保险商联合起来，组建了劳合社。1871年，劳合社取得法人资格，成为保险社团组织。

18世纪，劳合社基本垄断了英国的海上保险业务。到了19世纪，劳合社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海上保险组织。尽管在阿姆斯特丹和汉堡也形成了海上保险业，但19世纪最便利、承保金额最大的保险机构无疑是在英国。

劳合社的优势在于“再保险”。保险公司也需要保险。比如，在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或事故时，由于风险太大，单个保险公司往往难以应对。为了分散这种风险，保险公司会购买其他保险公司的“针对发生重大事故时所支付保险费的保险”。通过再保险，保险公司能够承保的范围更大了。

总结一下，近代保险业的形成离不开以下几点：费马和帕斯卡创立的概率论；政治算术等社会统计思想及实现这种思想的调查方法——统计学的发展；具有永续性的近代企业。

海上保险业的形成则离不开蒸汽轮船以及随之而来的定期航线，这使得航海的规模扩大了。

在18世纪到19世纪的英国，以上条件已经成熟，因此，才在伦敦诞生了劳合社这样的海上保险业巨头。

8

大英帝国因为擅长借钱而兴盛吗

国家的借款越少越好吗

财政赤字对国家来说是坏事吗？突然被问到这个问题，恐怕许多人都会挠头。

近代经济学推崇“预算平衡”——收入与支出相当，没有借款。2017年，日本政府的累计负债已达1000兆日元。如果以家庭收支来打比方，这就好比年收入是577万日元，却需要归还借款235万日元。这种状态无论在谁看来都肯定说不上好。

如果我们不看现代，从世界史的角度思考“国家与借款”的问题，会怎么样呢？

可能有点意外的是，强大的大英帝国曾是借款大国。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擅长归还借款，英国才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

深陷战争、财政困难的欧洲

不仅是英国，近代欧洲各国都曾为借款头痛不已。这种情况的首要原因就是战争。

近代欧洲的最大特点是战争连续不断。狭小的欧洲没能形成统一的帝国，各地势力几乎一直在争斗。15世纪，军事革命之后，枪炮被投入战场，各国军费飞跃式上涨。

时间	战争总支出	债务率（%）
1688—1697	32643.8	33
1702—1713	50685.0	31
1718—1721	4547.3	0
1739—1748	43655.2	31
1756—1763	82623.7	37
1776—1785	87599.6	40
1793—1815	831446.4	26

表1　18世纪英国的战争支出（单位：英镑）和债务率

为了维持庞大的军事开支，各国不得不大量借款。然而，找到新的财源可没有那么简单，许多国家为了还款甚至不得不卖掉领土。法国大革命（1789）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战争导致的财政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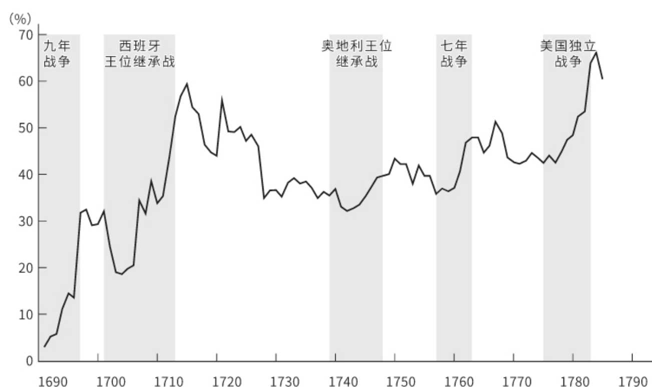
不过，有一个国家尽管背负了巨额债务，却成功避免了财政崩溃。这就是英国。

从17世纪下半叶起，英国的借款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据说，到了1788年，英国政府的借款已达名义GNP（国民生产总值）的约1.8倍。这些借款全部用于战争，尤其是与法国的战争。1689年，光荣革命后，法国介入了英国的王位之争。直至拿破仑战争结束（1815），两国之间的战争持续100多年，被称为“第二次百年战争”。

英国不断借款，仍然成了强大的国家，法国的波旁王朝却陷入了崩溃的境地。两国之间的差异到底在哪里呢？

英国的消费税和法国的土地税

研究英国历史的学者约翰·布鲁尔提出，18世纪的英国是“财政——军事国家”。换句话说，英国为战争借了大量外债之后，维持了财政的合理运行，成了强大的战争国家。



图表1　国债在税收总额中所占比例

与法国相比，英国的税收负担要重很多。法国的人口是英国的2倍至4倍，税收收入理应比英国更多才对。

英国的借款更多，却在法国发生了革命，英国不但没有发生革命，还奠定了日后繁荣的基础。两国之间的差异是什么？答案是税收制度。法国的税收以土地税等直接税为主，英国的税收则以消费税等间接税为主（见表2）。

年度	直接税		间接税		其他	
	英国	法国	英国	法国	英国	法国
1715	27	61	69	34	4	5
1720	26	—	69	—	5	—
1725	20	48	76	47	4	5
1730	24	48	73	47	3	5
1735	17	59	81	37	2	4
1740	26	48	73	47	1	5
1745	32	57	66	39	2	4
1750	28	—	71	—	1	—
1755	21	46	76	45	3	9
1760	26	—	72	—	2	—
1765	22	54	75	42	3	4
1770	18	50	75	45	7	5
1775	18	49	77	47	5	4
1780	21	45	73	51	6	4
1785	18	48	76	46	6	6
1790	17	38	75	51	8	11

表2　英国、法国的直接税和间接税在税收总额中所占比 例（单位：%）

英国的消费税所占比例的增长也与借款有很深的关系。每当发行新的长期国债，为了支付利息，英国都会提高关税、消费税、印花税等间接税。

这种以消费税为主体的税收制度成就了英国。

英国的消费税谨慎地避开了生活必需品，主要向奢侈品征收——如啤酒、煤炭、肥皂、皮革、玻璃等。国民收入提高后，生活必需品的消费量不会再增加太多，提升生活质量的奢侈品的消费量却会大大增加。如果向奢侈品征收消费税，那么在经济增长时，税收的增长率可以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英国向需求价格弹性高的商品征税，从而增加税收。

与之相比，法国是怎么做的呢？从17世纪初到18世纪初，法国的支出大幅增长。其主要原因与英国相同，也是因为战争。从17世纪到18世纪，法国曾经多次不履行债务，财政政策极为混乱。

法国之所以会财政崩溃，是因为丧失了信用。法国的负债比英国少，但需要支付的利息在税收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高于英国。这是因为法国由于多次不履行债务，已经丧失了信用，只有给出更高的利率才能筹集到资金。

法国税收的主要来源是土地税。与消费税不同，土地税的增长率很难超过经济的增长率。而且，法国土地的三成到四成归贵族和神职人员所有，他们享有免税的特权。这种不公平让法国国民更加觉得自己在被剥削。

在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法国才放弃了旧时以土地税为核心的财政制度，转为近代国家财政制度。从增加税收收入的角度来看，法国的财政制度远远逊色于英国。

决定胜负的泡沫事件

18世纪初期，英法两国几乎同时发生了著名的泡沫事件。英国发生了南海泡沫事件（这也是“泡沫经济”一词的来源），法国发生了密西西比泡沫事件。两个事件的开端和崩溃的过程都非常相似，最终的结局却很不相同。

让我们简单地看看事件的经过。英法两国的泡沫事件都由处理战争借款而起。

1711年，英国南海公司成立了。英国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获胜后，为了在拉丁美洲进行贸易，成立了这个公司，主要从事从非洲到西印度群岛的奴隶贸易。其实，英国成立南海公司的真正目的是偿还债务——由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英国的债务已经从1600.4万英镑涨到了5300.7万英镑，暴涨了3倍多。

南海公司没能从奴隶贸易中获得预想的高额利润，不久后，就开始把处理政府债务作为主要业务。具体的做法是，将国债转换成南海公司的股票，从而为政府融资。

1720年，英国政府宣布，除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持有的国债外，将其余所有国债（约3000万英镑）全部转换成南海公司的股票。同年5月前后，南海公司的股价飙升到了法定平价的5倍左右。但是，仅仅几个月之后，股价便跌回了原来的水平，之后又继续下跌，最终泡沫破裂了。

法国密西西比泡沫事件的主人公是苏格兰出身的企业家约翰·劳。

1717年，约翰·劳获得了密西西比公司的经营权，计划与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法国殖民地（法国当时在北美路易斯安那等地拥有广阔的殖民地）展开贸易。约翰·劳在扩大密西西比公司的同时，还成立了拥有货币发行权的皇家银行。

约翰·劳的目的是消除法国的财政赤字。他的想法是：法国皇家银行发行钞票，拥有特权的密西西比公司接受这些钞票，再将它们借给政府，政府以这些资金为本金来维持财政支出并偿还债务。后来，约翰·劳还发行了“不兑现纸币”（不能兑换黄金的纸币）。

密西西比公司没有实际业绩支撑，股价却在1719年从500里弗尔暴涨到了1万里弗尔。但是第二年股民的信心下跌，到了1721年，股价又暴跌回了500里弗尔。约翰·劳不得不逃离了法国。

从上述的过程来看，两个泡沫事件非常相似。

但是两国最终的处理方式却大相径庭。

在英国，负责处理南海泡沫事件的是辉格党政治家罗伯特·沃波尔（1676—1745）。1721年，沃波尔就任首相，首先将南海公司欠政府的债务减免一半，剩余的一半通过没收公司理事和被弹劾的政治家的财产、转嫁给英格兰银行负担等方式来解决。同时，还向投资者提供了一定补偿。

这里有一点很重要，沃波尔带领执政党辉格党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得到了议会的支持。在英国，财政部和议会几乎可以说是一体的，双方围绕预算案几乎从来没有过争执。同时，国债的偿还还得到了议会的担保。

此外，南海泡沫事件之后，英国以英格兰银行为中心进行了财政

制度的统一。这种政府、议会、中央银行相互联结的公债制度（资金筹措制度），成了英国在借款增加的同时还能成功筹措战争资金、维持财政运转的秘密武器。

相比之下，法国在密西西比泡沫事件之后的财政改革仍旧不断失败。1774年，被任命为财政总监的雅克·杜尔哥试图限制贵族和神职人员的免税特权，但遭到贵族的强烈抵制，仅仅两年就被迫辞职。继他之后，中产阶级出身的银行家雅克·内克尔在大革命后负责国家财政，发行了“指券”，但最终以严重的通货膨胀而告终。

英法两国不同的处理方式不仅影响了财政，还影响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这期间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荷兰。荷兰在17世纪迎来黄金期，成了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尽管在多次战争（如英荷战争）之后，荷兰的地位在不断下降，但在金融和投资方面，阿姆斯特丹依然是欧洲金融市场的中心，欧洲的金融信息都集中在这里。

在南海泡沫事件中也有荷兰人的身影，股价异常暴涨的背后就是成功抛售南海公司股票的荷兰投资人。与荷兰人在金融方面的丰富经验相比，英国人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初学者。

事实上，荷兰的资金也曾大量流入法国。但在约翰·劳的财政政策失败后，荷兰向法国的资金输出就基本停止了。相反地，在南海泡沫事件后，荷兰向英国的资金输出迅速增加。当时，伦敦和阿姆斯特丹之间每两周就有一艘邮船往返。无论是在信息方面，还是在金融方面，两个国家的联系都非常紧密。

总之，荷兰的资本已经对法国丧失了信心，而英国却因对泡沫事件的处理获得了资本的信任。与人们通常的认知不同，南海泡沫事件反而对英国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

胜利的关键在于筹措战争费用的能力

从18世纪到19世纪，欧洲各国陷入了无止境的战争中，最后取得胜利的是英国。

近代战争的规模并不算大，武器也没有很大的技术革新。英国能够取胜，并不是因为在军事上具有压倒性优势。

当时，英国海军采用的是“强制征兵”这一相当粗暴的征募方式。战争爆发时，海军会强制征募船员，人们好好地走在街上，就可能突然被拉到船上去。他们当中有不少流浪汉，因此，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战争爆发后失业者减少、犯罪率下降的报告。这样看来，很难说英国海军士兵的素质很高。

那么，英国的强项到底是什么呢？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实力和财政实力。要在战争中取胜，就必须坚持战斗到最后。这听上去似乎理所当然，但士兵需要吃饭，弹药需要补给，这一切都需要财力支撑。一旦财政崩溃，就无法继续战斗下去。

因此，战争的胜利者必然是能够成功筹措资金的国家。当时，英国发行公债以筹措战争费用，然后长期返还，正是这种制度让英国成了欧洲最强大的国家。

最重要的不是借款金额的大小，而是能否按时足额还款。在这个方面，现代日本做得怎么样呢？

9

棉花如何见证了
亚洲与欧洲的大逆转

改变历史的商品

如果说存在“改变历史的商品”，那么棉花无疑是其中之一，因为棉花大大改变了亚洲与欧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关系。

据说，棉花最早被种植是在公元前28世纪的印度西部。不过，棉花种植的传播速度较慢，直到距今1000年前左右，都只有东南亚、非洲和欧洲的部分地区在种植棉花。

在这些地区中，印度是最主要的产地。根据考古研究，公元前1世纪时，印度的棉花就已经出口到了埃及等红海周边地区。从那时起，直到19世纪，印度都在出口棉花。

北非与印度西岸之间的贸易在11世纪至12世纪达到了顶峰。不仅如此，在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岛也出现了印度产的棉织品。也就是说，当时印度棉织品的传播范围很广，已经到了印度洋的东西两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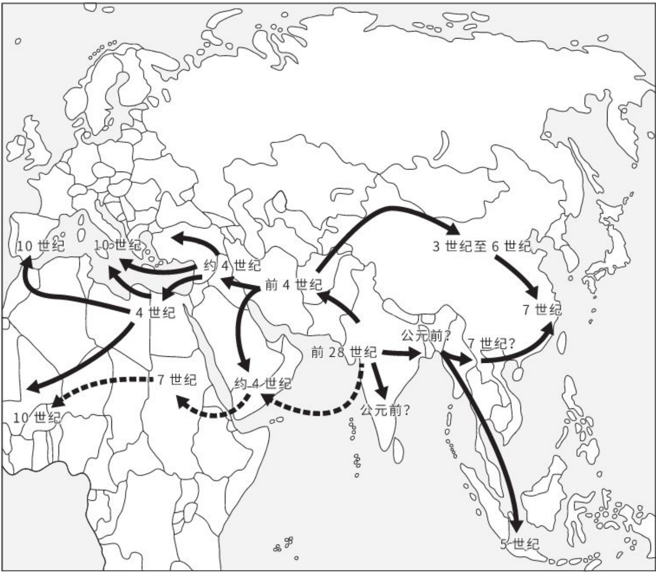


示意图1　棉花种植的传播

不断扩张的印度棉织品市场

随着时代不断发展，印度棉织品的传播范围也在不断扩大。15世纪末，欧洲商人绕过好望角，进入了印度洋。他们亲眼看到了印度市场上丰富的商品和庞大的商人群体。这里聚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商品，贸易体系也比欧洲更精密、复杂。

当时，印度的孟加拉地区是棉织品生产中心。从这里出产的棉织品有20种左右，既有廉价品，也有做包头巾用的上等棉织品。17世纪，阿拉伯人、帕西人（居住在印度的拜火教教徒）、土耳其人、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人等都参与到了棉织品贸易中。印度的棉纺织业者可以根据商人的需求，生产出各种商品，供他们销售。这在当时的欧洲根本无法想象。

17世纪，印度贸易圈已经扩展到了东南亚。古吉拉特（位于印度西北部，靠近现巴基斯坦边境）的商人渡过印度洋，到达了马六甲。两地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甚至有“坎贝（古吉拉特商人的港口）和马六甲离开对方就无法繁荣”的说法。毫无疑问，这个时期的印度已经出现了世界级的贸易圈，其规模甚至可以与最强大的明朝和清朝相匹敌，欧洲更不在话下。

欧洲人想要的印花布

印度的印花布（一种平织的棉布）在中世纪后期就传入了欧洲。顺便一提，“印花布”（calico）一词就是印度港口卡利卡特（Calicut，现科泽科德）这一地名的讹传。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商人和热那亚商人就向黎凡特（叙利亚、黎巴嫩等中东地区）的商人采购轻薄又保暖的印度印花布。

然而，要与欧洲实现贸易往来，就必须经过伊斯兰世界和印度洋，横跨广阔的欧亚大陆。因此，对印度来说，欧洲不过是一个偏远的市场，传入欧洲的印花布不过是印度输出到各地的棉织品中极小的一部分。

17世纪，欧洲商人终于可以直接出入印度洋了。印度的棉织品首先传入西班牙，接着传入欧洲其他地区。

让欧洲商人困扰的是，欧洲各国完全没有可以向印度输出的产品，与印度形成了彻底的贸易赤字。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欧洲各国开始限制印度棉织品的进口。1700年，英国颁布了《印花布进口禁止法》，此后，除荷兰外，欧洲的主要国家都在法律中做了相似规定。

荷兰是个例外，从印度进口棉织品后，再转手出口到本国的殖民地和非洲。事实上，欧洲各国尽管表面上禁止了印花布的进口，但很难阻止棉织品的走私以及从其他欧洲国家的流入。

在当时的欧洲，棉织品是新奇时髦的舶来品。棉花易于染色，印度的染织技术发达，生产出来的棉织品色彩缤纷，在欧洲大受欢迎。

耐用的毛织品的使用寿命是棉织品的2倍，因此，直到18世纪，英国在衣物原料中需求量最大的是欧洲原产的亚麻。

亚麻产自中欧的西里西亚（现波兰、捷克）等地。亚麻还可以用来制作船上的帆布和绳索等。亚麻布尽管穿起来不太舒服，但胜在耐用，因此被广泛用来制作衣物。令人意外的是，亚麻布通过法国和葡萄牙传入西非，也成了非洲奴隶的衣物原料。

棉织品则与毛织品不同，棉布无论洗多少次都比亚麻布穿起来更舒服，而且无论是在热带地区还是在极寒地区都能使用。因此，不久后欧洲也开始了棉织品的制造。

难以超越的印度

在教科书上通常写着：“工业革命后，英国的纺织业实现了机械化，大批量生产成为可能。英国的廉价机织棉布给印度古老的棉纺织业带来了巨大冲击。”大体的确如此，但英国的棉织品要战胜印度并没有那么简单。

众所周知，英国工业革命始于曼彻斯特的棉纺织业。曼彻斯特一带从16世纪下半叶起就是有名的棉麻粗布产地，而且离欧洲重要的奴隶贸易港利物浦只有几十英里[1]。可以说曼彻斯特的工业发展状况与利物浦的贸易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

直到18世纪30年代中期，曼彻斯特的棉纺织业都还只是面向国内市场的手工业。在棉织品的质量上曼彻斯特也远远无法与印度竞争，因为当时曼彻斯特产的是亚麻和棉花的混纺布。

18世纪50年代，曼彻斯特的棉织品产量大幅增长。棉织品出口额占全国出口额的比例从1750年的48%上涨到了1774年的86%，主要出口地是西非。不过，当时英国的染织技术还不成熟，无法像印度那样生产出色彩丰富的棉织品。

此时法国也开始了棉织品的生产。虽然法国的棉织品产量不及英国，但法国有许多人前往印度学习染织技术，因此在染织方面法国达到了能与英国对抗的水平。

总之，欧洲虽然试图抵制印度的棉织品，但一直没能成功。

重要的是，即使是在工业革命以后，英国的棉纺织业也没能超过印度。

为了发展棉纺织业，英国人发明了许多新的机械，比如约翰·凯伊的飞梭（1733）、哈格里夫斯的珍妮纺纱机（1764）、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1769）、克伦普顿的走锭精纺机（1779）和卡特莱特的动力织布机（1785）等。

和印度的手工纺织不同，英国有了工厂制度。英国的棉织品产量从1770年到1790年增长了10倍，随后的一两年里又增长了10倍。然而，直到19世纪20年代，英国的棉织品产量还是低于印度。

全球性的生产体系

除了技术革新和工厂制度外，英国棉纺织业与印度棉纺织业还有一个决定性的差异，那就是英国本身并不产棉花。这一点也成了英国全新生产体系的关键。

	旧的棉纺织业体系	新的棉纺织业体系
	约 1000—1750	约 1750—2000
制造中心	印度	欧洲西北部
贸易	长距离但碎片式，在海洋周边	长距离且全球化，包括大西洋和太平洋
竞争	替代出口地产品，但不至于毁灭出口地产业	进口减少，毁灭出口地产业
产品	客户定制化	标准化，时尚化
资源	基本来自本地	从他国进口

表1　新旧棉纺织业体系对比

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北部国家气候寒冷，完全不适合棉花种植，

要发展棉纺织业，只能从欧洲以外的地区进口棉花。

为此，英国建立了全球性的生产体系。这个体系的原型来自砂糖贸易。

在大西洋贸易中，欧洲人从西非向美洲新大陆运送奴隶，让他们在那里生产砂糖。葡萄牙在巴西、荷兰在加勒比海上的殖民地、英国在西印度群岛、法国在海地都大力发展种植园农业，向阿姆斯特丹、汉堡、波尔多等港口运送砂糖。

英国人将这种模式应用到了棉纺织业上。他们让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殖民地南部的奴隶种植棉花，然后在英国本土加工，生产棉织品。

为什么只有英国成功地建立了这种棉织品生产体系？简单来说，因为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帝国。英国从非洲向美洲新大陆运送奴隶，在新大陆种植棉花，然后运回本国加工，最后向亚洲销售。这整个过程都能通过英国自己的船只和英国控制下的港口完成。从生产、运输到海上保险，英国都能靠自己的力量完成。

进一步说，17世纪时英国就已经将势力扩展到了印度，英国人清楚地知道印度棉纺织业的发达。机械化和工厂化不仅是欧洲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更是降低生产成本的迫切需求。欧洲人口少于印度，因此必然会面临工人工资（即生产成本）高的问题。英国要想与印度的棉纺织业对抗，通过机械化来提高效率可以说是必然的选择。

英国成功实现了棉织品的机械化生产，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家。本来，英国一直是印度印花布的进口国，但到了19世纪，印度已经成了英国棉织品的进口国。1820年，印度进口英国棉织品1100万码[2]，到了1840年，已经激增到1亿4500万码。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发生这样的大逆转的前提是欧洲建立了不同以往的全球生产贸易体系。说到国力，有“制造业强国”之称的日本总会将目光集中到工业水平上，但大英帝国的强大之处在于将生产贸易体系和工业水平结合了起来。

10

为什么“保持中立”让美国成了世界大国

不可思议地兼顾战争和贸易

近代欧洲的两大关键词是“战争”和“海外贸易”。但认真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要想二者兼顾可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交战的国家必然会阻挠彼此的贸易。

比如，1581年荷兰宣布脱离西班牙独立后，西班牙禁止与荷兰的贸易，扣留荷兰船舶。17世纪英荷战争时，英国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封锁荷兰港口、扣留荷兰船舶。

然而，欧洲在战争不断的同时，从海外输入了大量物产（如砂糖、咖啡、茶等），实现了经济发展。

欧洲如何做到战争和贸易二者兼顾呢？秘密在于“中立国”和“中立城市”。

比如，英国和法国交战时，英国的商船很难向法国运送商品。因为在战时，交战国的商船很可能被扣留。

不过英国的商品还是能运送到法国——使用中立国的商船就可以了。还可以在英国的商船上挂中立国的国旗，这样也会被视为中立国的商船。

此外，虽然战时安特卫普等商业城市经常被占领，但贸易从不曾中断，安特卫普的商人以及停在那里的船只会转移到别的城市继续进行商业活动。

在以往的研究中，以西班牙、荷兰等单个国家，或安特卫普、热那亚等单个城市为对象的研究是主流。但这样的研究方法很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比如，在研究法国时，就可能得出“法国大革命和随后的革命战争导致了法国的贸易大幅衰退”的结论。然而，从欧洲整体来看，法国的贸易并没有停滞，法国商人去了其他国家的城市，等到法国的港口变得安全时，还会再回来——这种思考角度成了当今西方史研究的主流。

在欧洲历史上，“中立”是17世纪初产生的概念。战时通过中立国、中立城市或替代港口继续贸易活动，这在亚洲是没有的，可以说是近代欧洲特有的现象。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近代欧洲能在战争的同时发展经济的原因了。

中立城市汉堡的辉煌

首先要说的典型的中立城市，是1618年至1868年长期保持中立的汉堡。汉堡是位于易北河入海口的港口城市，曾经与吕贝克、不莱梅同为汉萨同盟的核心城市。尽管汉堡并不面向大海，但这里至今设有国际海洋法法庭，见证了它作为港口城市的历史。

汉堡能够繁荣的原因之一是对外国人采取包容政策。让不同地域、不同宗教信仰的商人自由地进行贸易，这是成为国际化商业城市的必要条件。这一点阿姆斯特丹做得很好，16世纪末到17世纪，阿姆斯特丹作为当时欧洲最大的商业城市，甚至还建有犹太教堂。

宗教改革后，汉堡属于路德派，与英国的联系非常紧密。英国人、荷兰人和从伊比利亚半岛来的商人（包括塞法迪犹太人）都来汉堡做生意。在16世纪至17世纪，汉堡的人名簿中已经出现了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名字。而且，据说在汉堡的葡萄牙中介人的数量已经超过了阿姆斯特丹。

此外，中立政策也是汉堡的优势。1568年至1648年，欧洲最强的商业国家荷兰为脱离西班牙进行了独立战争，这场战争被称为“八十年战争”。由于战争，荷兰在1621年至1641年中断了与葡萄牙及其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在1621年至1647年中断了与西班牙及其殖民地之间的贸易。

在此期间，汉堡成长为与伊比利亚半岛和美洲新大陆开展贸易的重要城市，尤其是在巴西的砂糖、钻石、靛蓝和胭脂红的染料、银等殖民地物产的流通方面，已经可以与阿姆斯特丹匹敌。

汉堡原本就与伦敦联系密切，甚至有“小伦敦”之称。17世纪下半叶，英国与荷兰之间爆发战争。18世纪，汉堡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与伦敦对接的主要贸易港。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堡的贸易网络帮助了英国扩张为海上帝国。

在战争不断的年代，汉堡作为中立城市，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成长为欧洲首屈一指的国际化商业城市。

拿破仑战争中的商人

18世纪中叶起，汉堡的贸易额快速增长。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汉堡的贸易额有了进一步的飞跃。

1795年，法国革命军占领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贸易与金融市场受到巨大打击。汉堡成了阿姆斯特丹的替代港。

有趣的是法国大革命对汉堡的影响。法国大革命前夕，从汉堡前往法国的船只数量明显增加，大革命后则大幅减少。而且，法国大革命期间，从汉堡前往英国的船只数量也有所增加。从英国前往欧洲大陆的船只中，最多的也是来自汉堡的船只。

法国大革命后，欧洲各国结成了反革命同盟，攻击法国革命政府。但随着法国的反攻，欧洲各国反而丧失了大片领土。这剧中的主角就是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

面对拿破仑，英国一直是反法同盟的核心。

1806年，拿破仑占领了柏林，同年颁布了禁止与英国通商的大陆封锁令。这不仅是军事上的战争，还成了经济战。处在拿破仑控制下的欧洲各国只能服从。1810年，汉堡也被拿破仑军队占领了。

面对这种情形，许多汉堡的商人逃到了中立国瑞典的贸易城市哥德堡。哥德堡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西部，由此掀起了一阵商业热潮。瑞典历史学家莱奥斯·穆勒将1807年至1815年这段时间称为哥德堡的“光辉岁月”。

但是，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败北，哥德堡作为国际贸易港的使命就此终结。汉堡复苏，与拉丁美洲之间的贸易额跃居世界第2位，还成了移民出航的重要港口，完美地搭上了19世纪全球一体化的快车。

拿破仑企图控制欧洲经济，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则拼命想要维持自己的贸易网络。与英国的贸易对每个欧洲国家来说都不可或缺，拿破仑试图通过大陆封锁令，切断欧洲各国与英国的联系，但这在现实中很难实现。可以想象，走私活动必然会在暗中进行。拿破仑战争和大陆封锁令都没能阻止欧洲的商业活动，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建立的“看不见”的贸易网络。

作为中立国的美利坚合众国

还有一个国家通过拿破仑战争获得了巨大利益，那就是刚刚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

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次年，《独立宣言》发表。1783年，《巴黎条约》签订，美国的独立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

但独立对美国经济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殖民地时期，美国所有的商业活动都在英国的法律、军队和商业网络的保护下开展。一旦独立，美国就失去了宗主国英国的保护。而且，战争让美国国内千疮百孔，贸易也跌到了谷底。

一般认为，让美国摆脱困境、奠定日后发展基础的是西部开发。但我想关注的是另一个侧面——海运业。

在殖民地时期，美国的造船业就已经相当发达。美国的优势在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造船所需的木材。西欧各国都很缺乏木材，需要从波罗的海地区进口，而美国本土就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完全能满足造船所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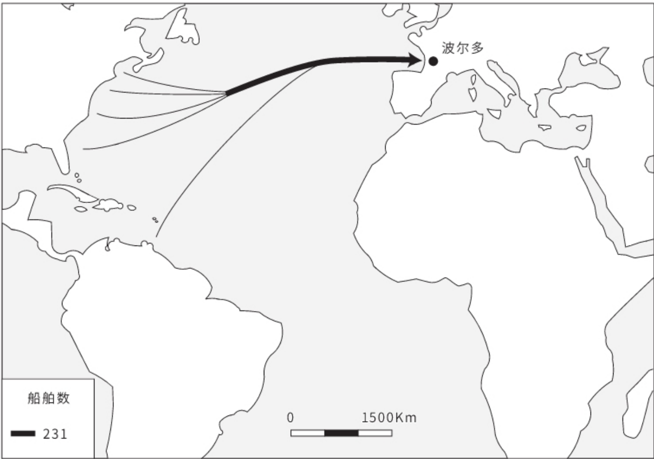


示意图1　到达波尔多的美国船只航线（1791）

而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又为美国的发展添了一把柴。

对美国来说，在对英的独立战争中，法国是支持自己一方的同盟国。因此，美国当时的革命政府曾呼吁向法国派遣外交官，搜捕英国船只。然而，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1732—1799）坚持了中立政策。1794年，美国与英国签订了《杰伊条约》，在此之后，即使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战争时代里，美国仍与英国、法国双方都保持了贸易往来。美国的海运业借此机会迅速成长，纽约、费城、波士顿、巴尔的摩等东海岸港口城市也得到了发展。



示意图2　到达波尔多的美国船只航线（1795—1815）

最能体现这个时期美国与欧洲大陆之间贸易状况的是从美国前往法国西南部港口城市波尔多的船只数量。波尔多是著名的葡萄酒产地，18世纪时还是知名的贸易城市，大西洋贸易，尤其是从美洲新大陆进口砂糖的贸易非常发达。

示意图1和示意图2分别展现了1791年和1795年至1815年从美国到波尔多的海上航线。

1791年前后，美国船只主要还是在美国东海岸和波尔多之间往来。但在1795年至1815年，美国船只的数量迅速增加（1795年有351艘，达到顶峰），航线也变得复杂起来。这些船只从砂糖的原产地西印度群岛将砂糖运到欧洲大陆的各个港口，甚至还会绕过南美洲最南端的合恩角，穿过太平洋，再绕过好望角，去往地中海和波罗的海。

如果没有中立的美国船只，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欧洲可能就无法获取必要的物资。此外，美国船只也为加深欧洲与大西洋之间的联系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贸易角度看门罗主义

从中立角度和经济角度来看，美国长期坚持的著名外交政策——门罗主义也展现出了不同的一面。

1823年12月，美国第5任总统詹姆斯·门罗（1758—1831）发表了《门罗宣言》，宣布美洲大陆不受欧洲各国干涉，美洲对欧洲的战争保持中立。一般认为，这是体现了美国的孤立主义的外交宣言。

然而，我们不能忽视《门罗宣言》还对经济产生了影响。当时美国正向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墨西哥等拉丁美洲国家请求签订通商条约，企图获取最惠国待遇。从这个意义上说，《门罗宣言》也可以被认为是美国为了保护自己的海运业在美洲的发展而颁布的政策。

到了18世纪末，美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海运国，船只数量仅次于英国。在“中立”的背后，无疑隐藏着美国建立并保护属于自己的贸易圈的企图。

还有一点也经常被忽视——在国际贸易的大背景下看，美国所谓的“奴隶解放”也有另一面。

1862年9月，美国南北战争激战正酣，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1809—1865）颁布了著名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这一举措一方面是为了批判迫使奴隶种植棉花的美国南部各州，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牵制美国南部棉花贸易的最大客户——英国。

不能忽视的是，身为世界第二大海运国的美国，一直在支持西班牙属古巴等地的砂糖贸易。古巴从19世纪40年代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砂糖产地，背后支撑它的是从非洲运来的黑人奴隶。古巴的奴隶制持续到了1886年。因此，从本质上看，美国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只是反对在国内使用奴隶，对运输国外奴隶生产的商品等行为没有任何限制。事实上，在此之前，反奴隶州的船只一直在运输古巴产的砂糖。

靠战争发财致富的中立国

日本人总是习惯将“中立”和“爱好和平”画上等号。事实上，采取中立政策并不意味着反对战争，相反，它可能意味着通过战争来获利。对交战国来说，中立国的存在非常重要，因为交战国可以通过中立国继续贸易，向国民提供必要的物资。

为什么近代以来亚洲经济停滞，欧洲经济却取得了巨大发展？历史学界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原因之一就是，欧洲各国利用了中立城市和中立国维持贸易，将战争的影响降低到了最小限度。

此外，欧洲各国还曾利用宗教战争驱逐异教徒。比如，新教徒商人、犹太商人曾被驱逐出天主教国家，被迫长途迁徙到其他地方——这也让欧洲商人的贸易网络得到了扩张。战争爆发时，这些商人会投靠亲友，在别的城市开展商业活动。在我看来，欧洲的“狭小”成了一种优势。正因为欧洲面积小，人们才可能在活动范围内形成诸多商业据点，并彼此独立。这在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庞大帝国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欧洲，即使商业网络中的某一个点因战争而崩溃，其他的点与点之间还能保持联系，整体的商业网络并不会被破坏。

11

蒸汽轮船中的世界史——马可为什么要去布宜诺斯艾利斯

“我们移民支持你！”

母亲从意大利的热那亚前往遥远的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作，然而一年后音信全无。13岁的少年马可说：“我要去美洲，找到妈妈。”

这是著名的《寻母三千里》的开头。之后，马可从热那亚乘坐轮船出发，在海上航行了27天，终于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他顽强地克服重重困难的故事已经被制作成动画片，被许多观众所熟知。

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马可的母亲要跑到遥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作？

《寻母三千里》这个故事出自意大利作家埃迪蒙托·德·

亚米契斯（1846—1908）的《爱的教育》，在1886年发表，当时正是“移民的时代”。

19世纪，欧洲各国通过工业化（工业革命）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有许多地区没能享受到工业化的成果。欧洲人口密度高，工资上涨慢，而在人口密度低的新大陆，工资上涨很快。当时欧洲移民的首选目的地是美国，巴西、阿根廷也有大量移民流入，原因自然是那里的工资高。

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后，马可得知母亲的雇主一家已经搬到了科尔多瓦。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科尔多瓦还有大概700千米的距离。这时，有位绅士告诉了马可关于母亲的消息，他说：“听我说，意大利的小伙子，拿着这封信到博卡去。从这里走路去博卡差不多需要两个小时，那里的人大概有一半是热那亚人。”

马可到达博卡后，看到了往返不停的“几千艘蒸汽轮船”，操控这些船的都是热那亚水手。

后来，在一个名叫罗沙里欧的小镇，马可已经身无分文。马可在船上认识了一位来自伦巴第的老爷爷，老爷爷把他带到了自己住的旅店。这家旅店名叫“意大利之星”，住着许多意大利移民，他们纷纷表示“我们移民支持你！”“大家都是同一个国家的人”，帮马可筹齐了旅费。

这些人都是为了得到更高的工资，才从欧洲来到了遥远的新大陆。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没有蒸汽轮船是不可能实现的。

从帆船到蒸汽轮船的巨大变革

与之前的帆船时代相比，蒸汽轮船出现后，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蒸汽轮船的优势在哪里呢？

事实上，我们并不能武断地说蒸汽轮船的效率就一定比帆船高。运输大量货物时，使用庞大的蒸汽轮船效率更高，但短距离运输少量昂贵商品时，如果是在适合航海的区域和季节，使用帆船会成本更低。

而且，蒸汽轮船未必比帆船快，帆船在顺风时的速度也可以很快。

那么，蒸汽轮船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是稳定性。

没有风，帆船就无法前行。而且，帆船的航行速度受天气影响很大，走同一条航线，有时只需要一天，有时则需要十天都不止。

而且，一艘船的延误可能会引起连锁反应。比如，A船原定10月1日到达某港口，在那里将货物转到两天后出发的B船上，这样B船就能在10月10日将来自A船的货物运到C港口。然而，天公不作美，A船没能按时到达，10月5日才到达该港口。这样自然就赶不上B船了，只能等待下一艘前往C港口的D船，而等待D船又需要一星期的时间。

目的地越远，需要转运的次数就越多，相应地，无法按时送达的风险也就越大，货物几乎不可能按时到达目的地。这就是帆船时代的物流情况。

蒸汽轮船出现后，这种现象急剧减少。蒸汽轮船不受风向的影响，可以确定航海所需天数。商人可以据此制订更精确的计划，这对他们非常有利。

此外，到了蒸汽轮船的时代，船体必然会越来越大。蒸汽轮船上引擎系统所占的空间就有整个船体的三分之一，除此之外，船上还需要放置燃煤的空间。因此，不把船体做大，就无法实现蒸汽轮船的高效利用。

越来越大的港口

港口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帆船时代的港口只要能停船就可以了，沿岸有一些傍港小镇，人们从这里出航远行。蒸汽轮船则不同，由于船上能装载的燃煤有限，装载太多燃煤会让船体变重、影响效率，因此，需要在港口设置存放燃煤的基地。而且，蒸汽轮船的船体比帆船大，港口也需要相应扩大。蒸汽轮船的出现，使港口城市不可避免地变大了。此外，港口设施的建设费用也迅速增长，如此巨额的基建投资不可能像以前那样由商人完成，需要国家的参与。

在近代的葡萄牙和荷兰，商业活动的主角是商人，而不是国家。但在英国，国家对商业活动的参与程度很高。

19世纪下半叶是帝国主义的时代，世界各地都能看到蒸汽轮船的身影，港口的建设也成为关系帝国命运的重要事业。殖民地遍布全球的英国成功控制了国际航线上的主要港口。

此外，以往的国际贸易大多由不同地区的商人像接力一样开展，但进入蒸汽轮船时代后，就不需要这样了。比如，英国的船只在印度的港口装货后，可以直接将货物运送到英国。也就是说，英国已经垄断了国际运输所需的基础设施。在国际贸易中，运输非常关键。垄断了运输设施的一方在价格的交涉、商业规则的制定上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

蒸汽轮船让世界成为一体

进入蒸汽轮船时代后，世界真正成了一个整体，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航线规模的扩大。

示意图1是19世纪中期英国P&O邮轮公司运营的邮船航线。从图中可以看出，P&O邮轮公司已经和中国建立了联系。英国的蒸汽轮船定期经由斯里兰卡的加勒去往澳大利亚的悉尼，此外还有船只前往中国。当然，这些航线并不仅用于邮政，还被用来运送乘客和商品。世界上的各个地区被英国蒸汽轮船的定期航线连成了一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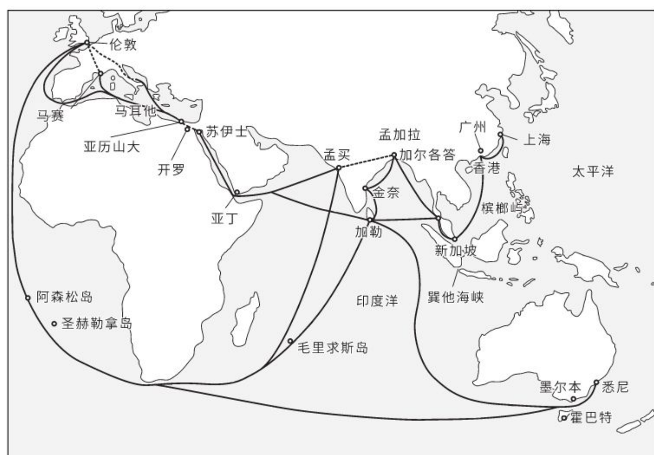


示意图1　19世纪中期英国P&O邮轮公司的邮船航线

19世纪上半叶，英国的蒸汽轮船到达了上海。在此之前，中国传统的海上航行用的是帆船。鸦片战争后，中英双方签订了《南京条约》（1842），开放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通商口岸，中国的帆船逐渐减少，蒸汽轮船增加。19世纪下半叶，西方的轮船公司向中国扩张，通行量巨大的上海——宁波航线、上海——汉口航线都被英美的公司控制。

德国进入中国较晚。三国干涉还辽后，1898年，胶州湾成了德国的租借地。汉堡轮船公司以青岛为据点，开通了前往上海、天津的航线。

1872年，中国的清政府也成立了自己的轮船公司——轮船招商局。

1885年，日本邮船公司成立了。轮船招商局和日本邮船公司是当时亚洲最大的两个轮船公司，和西方的公司展开了竞争。

表1和表2展示了当时各国进入中国港口的近海船和远洋船的吨位。在表中中国船的吨位在1912年大幅上升，但这是因为1904年改变了统计方法，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木造船也被记录了下来。

年度	美国船	英国船	德国船	日本船	中国船	总计[1]
1872	1633	1330	223	—	18	3303
1882	64	3956	257	—	2300	6679
1892	36	7220	371	98	3113	11240
1902	466	9789	2588	2455	4263	19749
1912	556	14103	1775	6930	6584	30144

表1　进入中国港口的近海船（蒸汽轮船）吨位

[1] 表1、表2中的总计包括了表中所列国家船只以外的别国船只。——编者注

年度	英国船	法国船	德国船	日本船	中国船	总计
1872	652	58	81	—	—	945
1882	1463	80	182	97	86	2023
1892	2439	124	363	218	147	3460
1902	3627	316	1024	1224	379	7224
1912	4931	600	1310	2991	2006	12848

表2　进入中国港口的远洋船（蒸汽轮船）吨位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近海航运中，大部分年份英国船的吨位是中国船的2倍以上，在远洋航运中，英国船也占有压倒性的优势。中国的主要交通网络被英国人掌握了，由此，中国的经济被世界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逐渐缩小的世界

除了航行的稳定性，蒸汽机的改良还让蒸汽轮船的速度大大提升。

表3根据芬兰海事史专家约里奥·卡奇南的数据制成，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蒸汽轮船在怎样的程度上让世界缩小了。

	1820 年（a）	1860 年（b）	a—b
亚历山大	53	10	43
马德拉	30	14	16
开普敦	77	39	38
孟买	145	26	119
加尔各答	154	39	115
香港	141	54	87
悉尼	140	53	87
瓦尔帕莱索（智利）	121	47	74
布宜诺斯艾利斯	97	41	56
里约热内卢	76	28	48
巴巴多斯	46	21	25
哈瓦那	51	19	32
新奥尔良	58	19	39
纽约	32	13	19

表3　各地向伦敦传递信息所需天数

简单来说，1820年，人类主要的远距离交通工具是帆船，到1860年变成了蒸汽轮船。如果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向伦敦传递信息，帆船时代需要53天，蒸汽轮船时代则缩短到了10天。从印度的孟买或加尔各答到伦敦所需要的时间则缩短了100天以上。在1860年，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伦敦所需要的时间缩短到了41天，到了《寻母三千里》所处的时代，可能会变得更短了。

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从伦敦到印度的航程变得更短了。而且，苏伊士运河只允许蒸汽轮船通行。

此外，世界各地的商品价格和薪资待遇的差距也缩小了。

例如，利物浦和印度两地的棉花价格，1873年相差57%，而到了1913年只相差20%。同一时期，伦敦和加尔各答两地的黄麻价格从相差35%变成了只相差4%。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蒸汽轮船出现后运

输量变大，运输时间缩短，运输成本下降。

蒸汽轮船运输的不仅是商品。前面我们说过，19世纪是移民的时代。大量的劳动力乘坐蒸汽轮船前往世界各地，谋求更高的薪资。从1846年起的30年间，欧洲与其他大陆之间的年均移民数量达到了30万之多。

随着移民数量的增长，从1870年到1910年，新世界（美洲）和旧世界（欧洲）的薪资差距缩小了20%以上。

《全球化与历史》的作者、经济史专家凯文·欧罗克和杰弗瑞·威廉姆森认为，从商品价格统一的角度来看，世界一体化始于19世纪20年代。他们的观点是，到了19世纪下半叶，商品和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已经在世界范围内统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基本上已经没有独立在世界市场之外的地区了。

被归为“非正式帝国”的拉丁美洲

除了商品和劳动力，资本也超越了国家和海洋的界线，在全世界活跃。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强国向贫困国家进行巨额投资，因为向贫困国家投资时收益率更高。

对英国来说，拉丁美洲是重要的投资地点。1826年英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额还只有2500万英镑，1895年已经增长到5亿5000万英镑，1913年达到11亿8000万英镑，相比1826年增长了近50倍。投资中所占比例最大的是公债，其次是铁路。说拉丁美洲的铁路是靠英国发展起来的也一点不夸张。

此外，拿破仑战争前，拉丁美洲产品的主要输出地是宗主国西班牙和葡萄牙，战后，英国成了最大的输出地。英国先进口拉丁美洲的牛肉、玉米、小麦、橡胶等，再出口到其他地区，从中获取利润。通过这种贸易，拉丁美洲的经济水平也有所提高。这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像马可的母亲那样从欧洲去拉丁美洲工作。

英国在世界各地都拥有殖民地，被称为“日不落帝国”。但与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正式帝国”不同，还有被称为“非正式帝国”的地区，即虽然不是殖民地，但经济、政治都附属于英国的地区。19世纪的拉丁美洲无疑就是这样的“非正式帝国”。有意思的是，英国以外的其他西方列强都没有这样的“非正式帝国”。

其中的关键还是英国强大的海运能力。英国也许没有将某个地区作为殖民地占领，但由于垄断了商品的运输，英国仍然实际控制了当地的物流与经济。反过来说，原本隶属于西班牙的拉丁美洲各国纷纷独立，也正是因为主要通商对象已经变成了英国，与宗主国的经济联系变弱了。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海运或者蒸汽轮船改变了历史。

12

强制收取手续费的国家
如何控制了世界

成为“霸权国家”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

有个说法叫“掌握霸权”，其中“霸权”指的是可以支配周围事物的压倒性的地位和力量。

那么，成为“霸权国家”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呢？军事力量？工业力量？还是人口和领土？

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答案是“手续费”。

说到“手续费”，人们往往想到的是赚点小钱。其实这种想法大错特错。

提出“霸权国家”这个概念的是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华勒斯坦，他还提出了著名的世界体系理论。按照他的说法，在世界史上只有17世纪中期的荷兰、19世纪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至越南战争的美国能称得上“霸权国家”。他对“霸权国家”的定义是：在工业、商业和金融业上完全压倒其他国家的国家。但我认为这个定义有些脱离实际。

我认为更合理的定义应该是：能够决定“在经济活动中什么是正确的”的国家。换句话说，制定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的国家就是“霸权国家”。

这意味着要参与到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就要遵守这个国家的规矩。各种各样的商业信息汇集到这个国家，国际商务中必不可少的贸易结算也在这里进行，巨额的资本也会流向这里。而且，很多时候，这样的国家会收取手续费来维持霸权。所谓的“手续费”就是入场费，要参与到经济活动这个游戏中，就必须向霸权国家支付入场费。

我们以典型的霸权国家英国为例。英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国家，在全世界都有殖民地，除此之外，英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手续费收入国。

赚不到钱的工业革命

人们通常认为，英国之所以能成为霸权国家，是因为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后，英国成了世界工厂，因此才能支配世界。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表1展示了英国的资本流向。1710年至1900年，英国很少实现贸易顺差。如果当时的英国像现在的德国或日本一样靠输出工业产品获取利益的话，英国的贸易收入理应大于支出。英国是世界上首个工业国家，但单从贸易收支来看，对外贸易似乎并没有给英国经济带来很大好处。

表中有一点非常引人注目：19世纪下半叶以后，海运业净收入、保险业收入、贸易利润、服务业收入大幅上涨。

19世纪的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运国家。而且，不论是船舶和港口等基础设施、金融和保险等服务行业，还是与国际贸易和海上运输相关的法律制度，英国都建立了世界标准。可以说当今的谷歌、亚马逊、微软等都采取了同样的战略，即掌控广义的基础设施（操作系统、平台等），然后建立自己的标准。

在英国发展基础设施的战略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电信业。英国历史学家丹尼尔·R. 黑德里克把这覆盖世界的电信网络称为“看不见的武器”。在当时，电信是以手续费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关键。

年度	贸易收支	海运业净收入	保险业收入	贸易利润	服务业收入
1710	-0.13	0.50	0.00	0.57	1.07
1720	-1.83	0.70	0.00	0.55	1.25
1730	-2.76	0.90	0.10	0.64	1.64
1740	-2.28	1.20	0.15	0.62	1.97
1750	0.48	1.50	0.23	1.13	2.86
1760	-2.36	1.80	0.29	1.32	3.41
1770	-4.44	2.80	0.29	1.14	4.23
1780	-3.82	3.20	0.26	1.06	4.52
1790	-10.14	4.20	0.45	1.79	6.44
1800	-10.24	5.20	0.73	2.92	8.85
1810	1.60	9.00	2.90	5.70	17.60
1820	-9.60	8.40	2.50	5.10	16.00
1830	-14.30	7.90	2.50	5.00	15.40
1840	-32.90	12.60	3.80	7.60	24.00
1850	-23.20	14.20	4.70	9.30	28.20
1860	-52.40	27.70	9.40	18.80	55.90
1870	-65.50	45.70	13.70	27.40	86.80
1880	-130.00	60.00	15.70	31.40	107.10
1890	-96.80	60.60	16.90	33.70	111.20
1900	-178.60	68.50	17.50	35.10	121.10

表1　英国的贸易产值和服务业产值（单位：百万英镑）

比人和物流都更快

为什么电信是英国掌握霸权的关键呢？因为国际贸易结算要通过电信进行。

过去，欧洲商人为了向远方的合作伙伴、交易对象、代理人传达正确的信息，每天要花好几个小时写信，写信的时间可能比真正从事商业活动的时间还要长。

有了电信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19世纪末，英国和澳大利亚之间传递信息仅需要1.8天。也就是说，信息的传递比人和商品的移动（即物流）都快得多。

此外，在电信出现之前，由于没有准确数据，商人只能推测当地的需求和价格情况，然后运送商品。客户订购的商品什么时候能送到也不确定，因此需要大量囤积可长期保存的商品。电信业的发展带来了通信革命，这让商业活动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铺设电信设施需要巨额的费用。而且，蒸汽轮船的制造成本远比帆船高，铁路的建造成本也是马车不能比的，这些都不是某个商人或某个商人联盟能负担得起的。能负担这些费用的只有国家，而最早动用国家力量参与经济竞争的就是英国。

近代早期掌握商业霸权的国家是葡萄牙和荷兰。这些国家的商人形成了贸易网络，通过贸易网络进行交易。这时商业活动的主体本质上还是商人，国家的参与度并不高。而在英国，国家很深入地参与到了商业活动中，这可以说是英国成为霸权国家的决定性因素。

英国为了让自己的蒸汽轮船占领全世界的海域，投入巨额资金建设港口和航线。当时的电信网络也有一大半由英国建设，尤其是海底电缆，这建立了跨越海洋的信息网络。世界上最早的跨国海底电缆是1851年英国的布莱特兄弟铺设的多佛海峡海底电缆。

此外，1895年，意大利人伽利尔摩·马可尼发明了无线电通信装置。但是，意大利政府对此漠不关心，因此他在英国创立了马可尼无线电报公司。1901年，马可尼实现了从英国的康沃尔到加拿大的纽芬兰岛的跨大西洋无线通信。就这样，通过英国的投资，全新的运输和通信网络形成了。

除此之外，电信还彻底改变了国际贸易结算的机制。

在贸易活动中，付款方开出票据，收款方收取票据。在电信业出现以前，开票人将票据送到承兑人手上需要很长的时间，国际贸易中时间更长。比如，从亚洲某个城市开出的票据送到伦敦原本需要几十天，电信普及后，只需要两三天就可以在伦敦结算了。

伦敦成了世界电信网络的中心，这意味着国际贸易结算都要在伦敦进行了。

为什么靠手续费能赚钱

如前面所述，贸易结算中的手续费就像赌博中的抽头钱、游戏中的入场费。为什么靠手续费能赚大钱呢？

一个原因是手续费绝对不会被拖欠。只要想参与“游戏”（即参与交易），就必须支付手续费。投资活动只能在盈利后获得分红，相比之下，手续费的收入要稳定得多。

另一个原因是受竞争的影响小。只要像英国这样垄断了结算方式，就根本不会出现价格竞争。更重要的是，即使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起来了，也不会对收取手续费产生影响，相反，这部分收入还会增加。

这与工业很不一样。从18世纪末起，英国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家。但在1870年前后，英国的工业产值渐渐被其他国家赶上。到了20世纪，“世界工厂”的地位已经被德国和美国抢走了。

众所周知，工业的发展和国民工资水平的提升，会导致制造成本提高，产品价格上涨。这样一来，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会越发激烈，利润率也会下降。

但英国的情况不同。其他国家的工业越发达，经济水平越高，就越需要频繁地利用英国的电信、金融和保险（运输商品还需要英国的蒸汽轮船）。竞争对手越强大，英国收取的手续费就越多。

19世纪还是铁路和海运网络扩展到全世界的时代。为了让运输网络顺利运转，各地需要共享列车和船舶的出发时刻和到达时刻等信息。让信息共享成为可能的就是电信系统。铁路和船舶即使不是由英国制造的，也需要依赖英国的电信系统。对电信系统的技术支持和保养维护也成了英国收取手续费的形式之一。

最后，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掌控结算系统的国家可以制定商业规则。比如，19世纪末国际社会确定的金本位制，就源于1816年英国的《金本位制度法案》。英国的标准成了世界标准，这就是霸权国家的强势。

世界史中的电信网络

电信网络让英国成了霸权国家。如果将电信网络放在世界史中观

察，就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示意图1展示的是1891年的世界电信网络。这张图是不是很熟悉？事实上，当时的电信网络与国际贸易路线基本重合。



示意图1　1891年的世界电信网络

地中海的海底电缆与意大利商人和穆斯林商人的航线重合。经苏伊士运河到红海的海底电缆与穆斯林商人和奥斯曼帝国的贸易路线重合，穆斯林商人前往印度的航线上也铺设了海底电缆。而且，这张电信网络还沿着印度商人、印度教教徒、亚美尼亚人和东南亚商人往来的路线延伸。葡萄牙人开拓的绕过好望角前往印度的航线上也是如此。此外，从伊比利亚半岛到南美的海底电缆也沿伊比利亚半岛的商人和塞法迪犹太人的贸易路线铺设。

从爱尔兰到北美的海底电缆沿着先由维京人、后由英国人开拓的航线铺设。据推测，这条路线的北美部分从16世纪起就被北美原住民、法国人等用来进行海狸毛皮交易。北美到加勒比海的海底电缆路线原本也是塞法迪犹太人的商业航线。

从俄国西部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电缆路线原本是亚美尼亚商人、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商人、雅库茨克商人等俄国商人的贸易路线。上海和香港之间也铺设了海底电缆，这条路线曾是中国商人、华侨和东南亚商人的贸易路线。

总而言之，电缆路线与近代国际贸易航线基本重合，这也体现了历史的连续性。

而且，由于文化和宗教的不同，人们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以前

只能像接力赛一样进行交易。近代之后，电信技术的发展填补了这种鸿沟，商人可以直接与交易对象联系了。由于电信业的发展，国际商业习惯趋于统一，交易成本大幅下降，这一方面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另一方面也让国际贸易格局从过去不同文化之间的合作变成了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单极支配。

人们常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英国也不是单凭自身力量成为霸权国家的。正是诸多国家的长期开拓铸就了大英帝国。

[1] 1英里≈1.61千米。——译者注

[2] 1码≈0.91米。——译者注



未读 Club

为读者提供有温度、有质量、有趣味的
泛阅读服务



专属社群 独家福利
精品共读 活动特权

手机扫码
加入未读 Club 会员计划